

# 西方现代思想史

[美]: 罗兰·N·斯特龙伯格 著  
刘北成 赵国新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 - 2003 - 1862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SINCE 1789, 6th Edition by STROMBERG, ROLAND N.,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publishing as Prentice Hall, Copyright 1994, 1990, 1986, 1981, 1975, 1966 by Prentice - Hal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Pearson Education, Inc.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Copyright 2004

本书经 Pearson Education, Inc. 授权, 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其简体中文版本。非经书面授权, 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摘录、复制或转载。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现代思想史/(美)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9

ISBN 7 - 80211 - 005 - X

. 西...

. 斯... 刘... 赵...

. 思想史 - 西方国家

.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5038 号

## 西方现代思想史

---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66560272(编辑部) 66560299 66560273(发行部)

h t t p://www.cctpbook.com

E m a i 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730 千字

印 张:45.75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

## 中文版序

得知我的欧洲思想史著作将要译成中文出版,我非常高兴。

我听说,中国古代皇帝总有两个历史学家跟随左右。左边的历史学家负责确保一切事情和行为有序得当,右边的历史学家负责记录人们的思想。(在同一时代的欧洲,奥古斯丁提出两种城市之别: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在人类历史上这二者既是分立的又是纠缠在一起的。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这样我们必须设法在两者中生活,尽管并不容易。这二者迥然不同,有各自的内在结构、各自的历史和传统……它们在历史上不断地相互作用,在人类事务中互相影响,互相碰撞,互相纠缠,令人迷惑。这就是“思想史”关注的对象。

如何在思想与行动、文学与实践两个领域之间建立“统一的联系”——现代西方文化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出自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这是小说家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的主题,也是两三个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和思想家作品的主题。卡尔·马克思试图用“实践”来进行综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中的夜晚世界和白昼世界领域确实有所不同:一个是行动和事件的世界,是战争与政治、商业和工业的世界,另一个是精神、书本、观念和艺术的世界。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比较中国和西方的思想传统时说过:“这里有两个世界,我们注定要同时生活在它们两个之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也都是这方面的例子。(我们这些轻信的人会在暗地里猜想,我们的世界要比政客和工业界领袖们的世界更好。蒙田曾经指出:“人是邪恶的,但是他们写的书是好的。”)

福斯特的另一部小说试图探讨亚洲世界和欧洲世界的二元论。这种联系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挑战,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尤其如此。今天我们

也必须生活在这两个世界里。因此我很高兴地想到,我的著作传入中国以后,可能多少有助于这个进程。刘北成教授承担起把我的著作译成中文的工作,我以为这项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罗兰·斯特龙伯格

美国威斯康星 - 密尔沃基大学,名誉退休教授

2002年11月

# 导 论

“了解前人是如何想的,比了解他们是如何做的更有益。”伏尔泰如是说。这样说,不仅是因为这种故事比起伤感地转述“行动”历史上那些战争、饥馑和革命(犹如在圣奥古斯丁著名的二分法中上帝之城相对于人间之城)更令人愉快,而且还因为这种历史似乎代表了更高的人类成就。人类的思想也包含着令人痛心的错误。但是,柏拉图、米开朗基罗、伽利略和弗洛伊德足以胜过在多数通史中显赫一时的凯撒、拿破仑和俾斯麦。既然我们不可能无所不学,那么与其把有限的精力用于了解军事家和政治家,还不如钻研艺术、文学、哲学和科学领域的伟大作品。

进而言之,实际上,在事件的背后是思想,至少可以说,思想是事件的重要组成因素。J.N.菲吉斯<sup>[1]</sup>宣称:“现实世界是人们思想的产物。”H.G.威尔斯<sup>[2]</sup>认为:“全部人类历史从根本上说是思想的历史。”诚然,另外一些人,如卡尔·马克思宣称,人类行动的“现实世界”是第一位的,思想仅仅是副产品。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写道:“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利益和理想利益,”但是他马上补充说,“由思想所创造的世界观念经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利益火车头所推动的行动轨道。”这似乎属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种没有结论的争论。我们只能确定,在这两个领域即“两种现实力量”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和无休止的互动。我们会考虑,在所谓的工业革命中亚当·斯密及其弟子的经济思想是否没有英伦三岛上的煤矿或气候那么重要;很难否认二者都很重要,但是同样很难证明哪一样是首要的,哪一样是次要的。

---

[1] 菲吉斯(J.N.Figgis),20世纪初美国思想史研究者。

[2] 威尔斯(H.G.Wells,1886-1946年),英国作家,著有《世界史纲》等。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一篇著名的讲话中指出，“掌权的疯子”会利用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法国大革命中的男男女女从18世纪“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那里获取口号，但是往往误解了他们的思想，或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的思想简单化。今天，历史学家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背景时，拥有比当时那些人更多的资料，所看到的情景与革命参加者所看到的大相径庭。但是，很显然，在对大革命进行解释时，最重要的是，了解推动人们采取行动的因素。

许多历史学家把思想和现实加以比较，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1789年以前的法国贵族对自己的看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例如，他们自认为是公元5世纪法兰克人的后裔。但是，很显然，这种自我认识规定了他们的认同，强化了他们的高傲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行动方式。因此，“思想”可能成为历史的决定因素。约翰·洛克是对18世纪启蒙运动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他早就指出：“实际上，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或意象是看不见的力量，时时支配着人们。”叔本华也说：“观念主宰世界。”人们在采取行动时可能完全超越了对直接的外部刺激做出最简单的反应，而是根据自己头脑中的某种概念或思想。因此，历史最好被理解为思想的集合。<sup>〔1〕</sup>

这种争论会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但是对于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也正是一个学点儿思想史的理由。思想史最关注的，正是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形成过程中，思想和行为之间的互动。

思想史并不讨论人的头脑中形成的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是如何形成的。这种问题历史学家最好留给别人解决。<sup>〔2〕</sup> 古人德谟克利特认为，思想来自人体之外，就像原子轰击大脑。17世纪的洛克显然也赞同

---

〔1〕 这种说法甚至适用于某些个人化的事物，如爱情。正如在小说和电影中依然给予赞扬的那种不无夸张的浪漫爱情是一种文学、艺术和哲学的创造。乔治·吉辛（英国小说家，1857 - 1903年）的“现实主义”小说《古怪女人》中的一个人物不耐烦地说，“现实生活中”，男人和女人都很少会“陷入情网”的。“一万对夫妇中也找不到一对会有每部小说中两对夫妇那种对彼此的感情。”——原注

〔2〕 “1号大脑中曾经发生什么情况？……在膨胀的灰质漩涡上发生过什么？人们对遥远的漩涡星云了如指掌，但是对此却一无所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历史更像是一种神谕，而不是一门科学。或许以后，很久以后，人们会用一种统计表和这种解剖切片来讲解历史。教师会在黑板上用几何公式来表示某一时期某一民族民众的生活状况……于是，他用手中的尺子指着1号大脑的第2叶和第3叶之间的灰色模糊区域说：‘你们现在在这儿看到的是对这些因素的主观反应。正是这一点在20世纪第2个25年导致了极权主义原则在东欧的胜利。’（阿瑟·凯斯特勒《正午的黑暗》）——原注

这种观点:思想来自于经验,经验以某种方式在人脑中留下印记。但是,柏拉图认为思想来自另一个世界,并且使这个世界变得可以认识:思想不是来自感官经验,不仅恰恰相反,而且思想(理念)使轰击我们的那些混乱印象变得有意义。康德部分地赞同这种观点。笛卡儿提出灵魂与肉体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本原,由此挑起了17世纪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至今也未结束。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哲学家、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来解决,暂且认定人有能力——可能是万物中独一无二的——操控“一个与外部世界相对峙、相分离、相对立的内心世界”(奥尔特加·y·加塞特<sup>[1]</sup>)。

如果说大学生在了解“伟大的思想”后能够受益,那么应该了解哪些思想呢?如今,这些“思想”被分布在许多知识部门里。思想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阿瑟·洛夫乔伊最初也是感到沮丧,因为活生生的思想被割裂成至少12个“学科”,每个学科从被肢解的思想中扯走一块,然后关起门来孤立地研究。这12个学科包括几门不同的“科学”、哲学、宗教、文学(分出几个分支)、社会学、经济学等等。文学批评家有时会想到应该了解点历史,科学家有时会想到应该学点哲学。但是他们通常都对其他领域茫然无知。有时他们试图编写自己的内史,但通常都很糟糕。

思想史研究者通常坚信,任何一个时代(各个时代不同)都有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影响着思想和表达的所有领域。柯勒律治写道:“任何时代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思考精神,这应该是宗教和道德的精神和基调,甚至是艺术、习俗和时尚的精神。”最近一位学者宣布:“思想史学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勾画每一历史时代的思想前提,解释这些思想前提在不同时代的变化。”<sup>[2]</sup>米歇尔·福柯和朱利亚·克里斯蒂娃<sup>[3]</sup>等结构主义理论家提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知识型”、话语模式或符号系统,这些东西会突然发生变化。换一种更通俗的说法,20世纪60年代有独特的品位和风格,到了70年代则发生急剧的变化。按照海登·怀特<sup>[4]</sup>的说法,思想史学者“试图撰写一般意识的历史”,而不是各个分支学科的历史。他或她力图寻找构成

[1] 奥尔特加·y·加塞特(Ortega y Gasset, 1883 - 1955年),西班牙哲学家。

[2] 约翰·格林《思想史的目标和方法》,《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1957年6月。——原注

[3]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 - 1984年),法国后现代思想家。

朱利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年 - ),保加利亚出生,法国当代思想家。

[4]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年 - ),美国后现代历史学家。

每一时代的“思想基础的词语、情感和概念”(吕西安·费弗尔<sup>[1]</sup>)。

即便我们不能看到清晰界定的时代精神整体,我们也能看到大量跨越各个知识领域界限的互动。伟大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就受到作为小说家和散文家的让·雅克·卢梭的决定性影响。诗人艾略特<sup>[2]</sup>曾经是哲学系的学生,从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和 F.H.布拉德利<sup>[3]</sup>那里获益匪浅。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文学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而他的许多灵感也来自那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在研究思想时,我们有几种可以选择的方式。我们可以选取一些公认代表人类思想成就顶峰的思想家,即达尔文、爱因斯坦、马克思、尼采之类的思想家。我们也可以不选取个人,而选取一些重要观念。莫蒂默·阿德勒<sup>[4]</sup>在研究时选取了6个在千百年里让人回肠荡气的重大观念,如正义、平等。约翰·莫利<sup>[5]</sup>宣称:“人类社会的基本争论少之又少,而且出人意料地一成不变。”用语可能变化,但基本理念始终如一。这种“万变不离其宗”的观念与进步观恰成对照。在进步观念中,“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每一步都给前人的思想增添了某种东西”(路德维希·冯·米泽斯<sup>[6]</sup>)。不过,这两种观念都有道理。

我们也可以选择不那么抽象但完全切合19世纪的思想: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支配了那个时代的词语。阿瑟·洛夫乔伊<sup>[7]</sup>在开创思想史研究时就选取了一些关键性的结构概念,如“伟大的存在之链”和“尚古主义”。我们还可以着重展示公认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法国革命、工业革命、俄国革命甚至两次世界大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纯粹的思想家或学者。我们也可以寻找各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或知识型,表明这种东

[1]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 1907 - 1960年),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

[2]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 - 1965年),美国出生,英国诗人。代表作是《荒原》。

[3]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 - 1941年),法国哲学家。

F.H.布拉德利(F.H. Bradley, 1846 - 1924年),英国哲学家。

[4] 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 1902 - 2001年),美国哲学学者,倡导开设原典研究课程。

[5] 约翰·莫利(John Morley, 1838 - 1923年),英国报人,政治家。

[6] 路德维希·冯·米泽斯(Ludwig von Mises, 1881 - 1973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是他的学生。

[7] 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 1873 - 1962年),美国的思想史研究开创者,著有《伟大的存在之链》等。



西是如何跨越各种界限而影响所有的思想领域。浪漫主义就是 19 世纪初的这样一个主旋律。

本书试图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对上述方式都有所涉猎。思想史应该成为一种了解我们西方欧洲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体系的导引:引导学生接触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希望他们将来能更深入地探讨;把这些思想与社会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揭示思想的连续性和谱系;显示这些思想是如何在大文化语境中相互联系的。一本书很难达到所有这些目标,但它至少应该指出路径。

用思想来丰富我们的头脑,就能成为生活的更充实的文明公民。努力学习全部思想,当然是一个伟大的抱负。沃尔特·佩特<sup>[1]</sup>建议学生“完整地阅读大学者的著作。完整地阅读柏拉图的著作;完整地阅读康德的著作;完整地阅读穆勒的著作”。非常好的建议,但对于大多数人根本不适用。奥尔德斯·赫胥黎<sup>[2]</sup>是一位用小说形式来研究思想史的杰出学者。他认为:“仅有科学是不够的,仅有宗教是不够的,仅有艺术是不够的,仅有政治和经济是不够的,仅有行动(无论是否出于公心)是不够的,仅有思考(无论是否升华)是不够的。缺了什么都不行。”但是如何才行呢?“无事不学”是 12 世纪圣维克多隐修院的于格<sup>[3]</sup>的建议。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尽可能多地了解整个知识结构,乃是思想史学者的追求。

---

[1] 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 1839 - 1894 年),英国文艺批评家,著有《文艺复兴史研究》等。

[2]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 - 1963 年),英国学者,著有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

[3] 圣维克多的于格(Hugh of St. Victor, 1096 - 1141 年),法国神学家。

# 目 录

中文版序 .....	( )
导 论 .....	( )
第一章 伟大的传统及其衰落 .....	( )
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遗产( )——中世纪思想及其崩溃( )—— 从中世纪到现代( )——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现代 政治思想的开端( )——巴洛克时代( )	
第二章 17 世纪的科学、思想革命 .....	( )
中世纪的科学( )——哥白尼革命( )——开普勒和伽利略 ( )——科学革命的继续( )——新世界观( )——弗兰西斯·培 根( )——勒内·笛卡儿( )——17 世纪的其他哲学家( )——牛 顿革命	
第三章 17 世纪的政治思想革命 .....	( )
中世纪遗产( )——宗教宽容( )——绝对主义和主权国家 ( )——清教徒革命( )——哈林顿和霍布斯( )——光荣革命与 洛克( )	
第四章 17 世纪末:转向启蒙 .....	( )
路易十四时代( )——正统论与批判( )——复辟时期的英国 ( )——洛克的《人类理解论》( )——莱布尼兹( )	
第五章 启蒙运动:自然神论者和“哲学家” .....	( )
自然神论( )——伏尔泰和孟德斯鸠( )——狄德罗和百科全书 ( )——晚年伏尔泰( )——卢梭( )——社会契约( )	

- 第六章 启蒙运动:怀疑主义者和“科学家” ..... ( )  
英国的怀疑主义( )——大卫·休谟( )——社会科学在启蒙运动中诞生( )——经济学( )——历史编纂( )——其他社会科学( )——启蒙运动的扩散( )——启蒙运动的局限( )——启蒙运动的结束( )
- 第七章 浪漫主义和革命 ..... ( )  
法国革命( )——对革命的抨击( )——拿破仑时代( )——伊曼努尔·康德和哲学革命( )——后康德时代的哲学家( )——浪漫主义的起源( )——各种不同的浪漫主义( )——浪漫派的政治观念( )——浪漫主义的意义( )
- 第八章 意识形态的时代:1815—1848年 ..... ( )  
欧洲的形势:1815—1848年( )——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 )——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 )——民主( )——1848年革命( )
- 第九章 进步的理念:黑格尔、孔德、马克思 ..... ( )  
黑格尔( )——孔德( )——马克思( )——进步观念( )
- 第十章 达尔文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信仰危机 ..... ( )  
达尔文与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的传播( )——其他科学的影响( )——斯宾塞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维多利亚时代的信仰危机( )——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与宗教: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哲人( )
- 第十一章 从自然主义到现代主义 ..... ( )  
19世纪中叶之后的文学( )——自然主义( )——象征主义( )——对象征主义的批评( )——萧伯纳与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 )——20世纪初现代主义的诞生( )——非理性主义者( )——弗里德里希·尼采( )——弗洛伊德( )
- 第十二章 19世纪末的社会和政治思想 ..... ( )  
继续前行的社会主义( )——费边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社会民主主义( )——无政府主义( )——民主制( )——社会学思想的兴起( )——宗教危机( )——作为宗教的民族主义( )
- 第十三章 困境中的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 ( )

战争的思想根源( )——战争结果:苏维埃共产主义( )——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 )——战后的文学和思想( )——20年代的弗洛伊德( )——爱因斯坦和科学革命( )——20世纪20年代文学中的观念( )——文学复兴时代的人物( )	
第十四章 从经济萧条到30年代的战争 .....	( )
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与西方知识分子( )——脱离共产主义( )——哲学革命( )——左倾年代的文学( )——萨特与存在主义( )	
第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	( )
反复的震荡( )——战后景象( )——存在主义( )——萨特与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没落( )——意识形态的终结( )——保守主义的种种倾向( )——战后时期的一些思想潮流( )	
第十六章 反叛与反动:1968—1980年 .....	( )
新左派与激进的60年代( )——左派的没落( )——结构主义( )——女性主义革命( )——略论禁令的解除( )——绿色革命( )	
第十七章 解构的80年代 .....	( )
东方的没落( )——大学与知识的零碎化( )——解构主义( )——后现代主义( )——某些学术团块( )——宗教( )——科学( )——艺术( )	
结    语 .....	( )
索引 .....	( )
推荐文献 .....	( )
译者后记 .....	( )

# 第一章 伟大的传统及其衰落

中世纪是一个漫长的训练期,使西欧知识界形成了秩序观念。

——阿尔弗莱德·诺思·怀特海<sup>〔1〕</sup>

在 16 世纪,理性、天启和习俗的结合解体了。

——加勒特·马丁利<sup>〔2〕</sup>

## 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遗产

一般认为,欧洲思想的现代历史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在 17 世纪发生了我们将要描述的具有最深刻意义的文化思想“革命”。这一革命是与主要发生在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的伟大的“科学革命”紧密相关的,后者包括在西方传统上无与伦比的人物伽利略和牛顿的成就。这一个革命还与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一身二任的人物相联系,这些人大胆地尝试全新的思想方法,从而开创了“天才的世纪”。这一思想潮流导致了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虽然在某些方面偏离了 17 世纪的主流,但毕竟坚实地建立在 17 世纪的基础之上。因而,17 世

---

〔1〕 阿尔弗莱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 - 1947 年),英国数学家、哲学家。

〔2〕 加勒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 1900 - 1961 年),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纪被普遍认为是现代的黎明。

不过,在思想史上,革命比我们想像的要少,而连续性比我们想像的要多。让我们首先对 17 世纪以前欧洲所拥有的光辉遗产做一简短的描述,免得我们错以为严肃的思想都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回想一下古代世界的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从泰勒斯到柏拉图(从公元前 600 年到公元前 370 年),然后是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多葛派再到新柏拉图主义者(从公元前 350 年到公元 350 年),还有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家欧几里得、厄拉多塞、盖仑、托勒密。这些人给全世界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思想宝藏。虽然在 6 世纪到 11 世纪欧洲因蛮族入侵而切断了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这些财富有所损失但从未湮没。希腊人以思想开放、勇于探求真理而著称。他们创造的硕果累累的思想成就使得多少世纪以来的欧洲人受益匪浅。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可以看做是逐渐汲取希腊遗产的过程,这一过程直到 16 世纪也未完结。在罗马帝国末期(公元 4 世纪),圣奥古斯丁的思想就融合了他本人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少量的新柏拉图主义以及某些拉丁作家具具有教训意味的话语。接下来,在 12 世纪“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的一些思想与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文学一道流行起来,某些科学知识(欧几里得、盖仑、托勒密)也被重新发现。13 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传回欧洲,这是以一人之力完成的希腊思想百科全书。最后,14 至 15 世纪伟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使欧洲如醉如痴,因为它打开了古典古代的全部源泉,充分满足了人们的渴望。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向后看的,把古代作为一切真理的源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古人的顶礼膜拜,有时使现代研究者迷惑不解:他们原以为这些人文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现代人,没想到他们却拜倒在古代权威脚下。但是,只要我们想一想那些字字珠玑的诗文所包含的古典思想是多么丰富,这个困惑也就云消雾散了。在古代文明没落了 10 个世纪之后,能够对古代顶礼膜拜,这本身就足够解放了。

中世纪的伟大哲学家安瑟姆<sup>[1]</sup>、阿奎那等人致力于把希腊哲学融入基督教,向野蛮的欧洲灌输理性世界观,力求把希腊、罗马思想和基督教早期神学家思想冶为一炉,铸造一个伟大的传统。他们努力调和各种对立的思想。现代人早已洗刷了对这些哲学家的偏见和说他们猥琐蒙昧的指责。如果对欧洲思想传统做一个概括,首先应该指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的

---

[1] 安瑟姆(Anselm, 1033/34 - 1109 年),经院哲学学派建立者。

活力。其他文明在多少世纪里死气沉沉,束缚于习惯之网,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或者说像冰川那样缓慢移动。其他文明(现代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想建立一种文明形态学,认为人类历史上有21个或者24个文明)从来不具有我们的文明所显示出来的那种变革能力。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文明拥有来自多种来源的复杂遗产。正如尼采指出的,在西方文明传统破晓之时,希腊人的灵魂中就有狄奥尼索斯精神和阿波罗精神同时在挣扎。这无疑是希腊充当了东西方桥梁以及混合了不同民族(爱奥尼亚人和多利安人)的结果。在马其顿和罗马世界帝国时期,希伯来因素与希腊哲学以及其他思想源流冲撞和融合,形成了基督教。在接下来的中世纪,整个古代世界的多重遗产——希腊哲学和科学、东方宗教——都流入日耳曼社会这个具有旺盛精力的蛮族世界的模子里。这种情况就像各种陈年老酒装入新瓶子里,或者说在年轻的躯体里烈火中烧。欧洲被迫把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价值体系融为一体,因此也就不断地致力于新的综合。在具有创造力的两极对立中,许多人看到欧洲历史反复出现的这个主旋律。



托马斯·阿奎那

西方历史充分展现了辩证发展进程。在希腊哲学中,毕达哥拉斯与泰勒斯相对立,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相对立,唯物主义者与怀疑论者又与前二者对立;基督教融合了希腊哲学,形成了更高的综合。在中世纪,彼得·阿伯拉尔<sup>[1]</sup>用他的理性

---

[1] 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 1079 - 约1144年),法国哲学家、神学家。

哲学来反对圣伯纳尔<sup>〔1〕</sup>的强劲的存在信仰,阿奎那把这二者综合起来,但又遭到奥卡姆<sup>〔2〕</sup>的否定。接下来,我们看到新教反对天主教,我们还看到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古代哲学的复兴给现代欧洲人提供了令人欣喜若狂的丰富的精神食谱。

如果说在各种紧张关系或对立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基本的紧张或对立的话,那大概就是科学的、崇尚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希腊哲学思想传统与狂热的、“献身的”、推崇道德的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对立。马修·阿诺德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指出:“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我们的世界就在这两极之间运动。”他把希腊文化的精髓界定为“如其实际地观看事物”,把希伯来文化的精髓界定为“品行与服从”。对真理的渴求、明晰的头脑、敏锐的洞察、深刻的判断——这就是希腊精神。希伯来精神则追求公正、要求道德完善、坚持寻求人们的行动准则。二者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最严重的冲突莫过于16世纪新教兴起后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狂放的思想 and 情感的谴责。二者也可能融为一体,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再到伊拉斯莫和罗耀拉的伟大思想体系就是如此。二者可能会轮流占据上风,也可能在不同地区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这两种精神过去确实存在着,现在依然存在着,只不过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受到赏识或者说那样唯我独尊。

对于中世纪哲学家来说,神学的真理和自然界的真理是各立门户的两个领域。二者各不相同但互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基督之光和古代哲人之光都照亮了人类活动的道路,前者无疑更加崇高,但后者也不可或缺。在阿奎那的思想中,信仰和理性是旗鼓相当的伙伴。二者都基于权威,一个以教会为权威,一个以亚里士多德为权威。尽管这两种强大的真理源泉有时会发生冲突,但它们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从而使阿奎那能够在表面上成功地把二者调和在一起。它们确有许多共同之处。

欧洲思想传统的最普遍也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可以称作乐观的理性主义,也就是相信外部世界有一种合乎逻辑的秩序。这种秩序不仅人类头脑可以认识的,而且几乎可以用概念性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我们必须牢记,宇宙完全可以看成是没有任何计划和模式的混沌——或许从我们身为希腊人和希伯来人的后继者所拥有的遗产出发,我们很难承认这一点。但

---

〔1〕 圣伯纳尔(St. Bernard, 11世纪末 - 约1130年),法国哲学家。

〔2〕 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 约1285 - 1349年)



是许多人持这种看法,希腊哲学家中就有伊壁鸠鲁学派以及更早的“晦涩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如是说;但是这些声音被柏拉图和斯多葛派那里那种认为存在一个理性的世界秩序的相反观点所淹没了。或许还有人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宇宙是什么样的,我们人类的思想受制于我们的感觉,根本不可能直接接触外部现实,因此也不可能认识外部现实。这种怀疑论观点也可以在某些希腊人那里找到,譬如埃利斯的皮朗或者柏拉图的前驱克拉提罗斯,据说后者完全沉浸于哲学而默不作声(只是摇动手指),因为他认为关于事物的任何说明都不是真实的。(当代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也一度陷入类似绝境。)但是克拉提罗斯终于被口若悬河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取代。苏格拉底喋喋不休,直到雅典人用毒药封住他的嘴。柏拉图意识到大多数人生活在阴影中,确认存在着一种高于感觉的理性,认为聪明人可以通过理性确定真正的知识。即使皮朗以及柏拉图学园后期的教师转向了怀疑论,在西方流传下来的也不是这种怀疑论,而是通过柏拉图主义或斯多葛主义(被基督教所吸收)流传下来的对一种合理的客观秩序的信念,也就是说,这种秩序至少能被人类部分地认识。(古代的怀疑论在文艺复兴后期被发现,但在此之前湮没了许多世纪。)

我们不应该忽视基督教里的理性脉络。当然它是犹太宗教思想的一个衍生物。宇宙中存在着一种秩序,上帝作为超验原则的存在保障着这种宇宙秩序。当代一位著名的以色列人阿巴·埃班写道,主宰犹太人思想的信念是:“宇宙不是各种狂野不羁的神秘力量组成的混沌状态,而是在一种可以表达出来的智慧和法则指导之下遵循着秩序和进步的模式。”亨利·法兰克福在《哲学之前》一书中评论道,“看来,希伯来人与希腊人一样,也打破了此前一直流行的思考模式”,即抛弃了早期民族所具有的非理性的自然无序观。“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鬼神的宇宙,乃至诸如伊朗宗教里面的二元论宇宙,都是一种随机和反复无常的宇宙。希伯来人的万能上帝乃是世界秩序和律法的保证者,也是实现他最终的仁慈目的的保证者。”

希腊哲学家反对诗意比喻,寻求更准确的术语,发明出西方人后来耳熟能详的“理性主义”。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其主导思想是柏拉图对感觉世界的不信任,即认为我们触摸的、感觉的和目睹的世界是杂乱无章的、不可知的;只有通过坚决地压制感性和推崇理性,才能找到作为解决之道的秩序原则;理性的典范就是数学和演绎逻辑。牛顿教诲现代人,观察和理性可以同时并用。但是直到17世纪,人们还觉得前

者会玷污后者。不过,柏拉图并非对可感知的世界没有兴趣,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更是坚持把可感知的世界作为出发点。希腊人和中世纪哲学家都没有嘲笑深入细致的观察,但是他们也确实有些偏爱抽象推理。我们应该意识到,科学必须是以假定事物有一种合理的秩序作为前提条件,否则观察就一无所获;西方思想的主流就是以苏格拉底的热忱、柏拉图的洞察力和基督教的信仰来恪守这种信念,抗击非理性主义和怀疑论。亚里士多德的出发点是:“人是理性动物。”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人是一个理性世界的一部分。西塞罗宣称:“完美的理性存在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在今天这个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像古人那样相信这种说法了。但是,我们的全部现代科学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种观念也渗透到有关人与社会关系的传统认识中。

欧洲的传统肯定通过沉思、冥想、“哲学”获取真知、“智慧”的可能性,并对这种方式予以高度评价。“哲学”(philosophy)原意就是“爱智”。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一致认为,鉴于世人被污泥浊物裹挟不前,既世俗又有缺陷,他只有排除万难才可看清真理,但即便如此,他有幸得窥部分真理,并始终追求真理。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人的灵魂来自于纯粹知识领域并将回归那里,因此使人与知识领域有了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沉思的生活是最有价值的生活,沉思生活高于纯粹行动。后来有人认为,这种对沉思冥想的偏爱使伟大的西方传统丧失了许多宝贵的实用知识,而这些实用知识可能得自平凡的来源。这种说法确实符合中世纪大学的情况。但是这种偏爱是对思想潜力的极大肯定。

当然,异教的古典思想方式与基督教思想方式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奥古斯丁至少部分地化解了这个矛盾。他认为,希腊哲学家所主张的智慧理念是一种实用的善,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更高的智慧,那是真正的智者在掌握了实在的智慧之后还要进一步追求的东西。到了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的遗产之间的这种矛盾体现在相互冲突的人物身上。一方面是中世纪思辨思想的创始人阿伯拉尔,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工具进行理性的分析。另一方面是圣伯纳尔,他宣传通过基督教的默祷而不是通过逻辑来认识上帝的神秘方式。但是,12世纪的圣维克多隐修院的于格、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以及13世纪伟大的托马斯·阿奎那都认识到二者的价值,力求调和这两个对立面。应该强调的是,中世纪思想的主旋律是寻求两种思想方式之间的调和,毕竟二者都承认人类具有认识客观真理的

可能性。

这里还需要指出另外有一个与此紧密相关的特点。西方传统抵制那些轻视物质世界、认为人的精神与物质世界格格不入的倾向。那些倾向在某些东方哲学中十分明显,在西方也时有表现。基督教在早期阶段曾经面临所谓的诺斯替教渗透的危险。诺斯替教大概可以追溯到波斯的二元论。诺斯替教对基督教具有某种吸引力,因为基督教本身也具有精神和物质的二元论倾向。但是基督教的二元论没有这种东方信仰那么绝对,因此,诺斯替教最终被视为异端。中世纪的法国南部也偶尔出现类似现象,如清洁派,但是遭到残酷的镇压,成为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的著名事件之一。诺斯替教和清洁派与印度的托钵僧有相同之点,即极端蔑视肉体。他们认为,人的闪光点是人灵魂,灵魂完全与肉体无关,但成为肉体的俘虏。灵魂必须设法逃脱这种禁锢。他们往往会变成极端的禁欲主义者,寻找机会尽早结束生命;还有些人会用打破一切道德戒律而放荡不羁来表达对物质世界的蔑视。在基督教内部,他们否认基督曾经真的道成肉身,认为他不过是看起来像是有血肉之躯。在他们看来,精神和肉体是截然分离的两个领域。



哥特式大教堂

正统基督教坚持道成肉身,因此对肉体更加尊重一些。对于基督徒来说,物欲尘世和肉体虽然是次要的东西,但也还是好东西。此岸生活虽然只是通向彼岸更纯粹生活的驿站,但也不应不予尊重。人不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相反,这个世界被交给了人类,让人类来支配,由人类来塑造和

创造。<sup>〔1〕</sup>

与东方相比,西方具有更多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一点早已显露。在公元8世纪,西方基督教会和东方基督教会(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爆发激烈的争论。起因是拜占庭基督教会颁布法令,禁止偶像崇拜,即绝对禁止在宗教艺术中把基督描绘成人形。(在伊斯兰教会艺术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如果说西方人喜欢把基督想像成一个人,像凡人一样有生有死,那么东方则视之为对基贬低。

当然,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一直是中世纪思想里的强大要素,甚至在中世纪思想屈从于专横的信仰要求之时也是如此。欧洲在11世纪刚刚重新产生了有体系的思想,我们就看到安瑟姆在试图用理性的观点来论证上帝的存在,阿伯拉尔在用严密的逻辑来检验《圣经》是否有自相矛盾之处。在中世纪盛期,大学相继建立,亚里士多德备受推崇,法则的观念,即必然客观的联系支配着宇宙万物的意识十分流行。<sup>〔2〕</sup>

## 中世纪思想及其崩溃

与过去流行的看法恰恰相反,中世纪不仅是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苗圃,而且在技术上也是颇有成就的。另外,中世纪在其他方面看起来也似乎具有惊人的现代性,让我们想到西方思想在本质上具有连续性。流行思想常常会表现出一种千年王国的主题,与现代的革命意识形态极其相似。在中世纪盛期,佛罗雷的约阿欣<sup>〔3〕</sup>的信徒在《圣经》的《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找到依据,鼓吹穷人起来打倒富人、建立一个公正、富裕、平等的人间天国。历史进程将在这个大灾变的事件中达到顶点,在一次剧烈的革命之后

---

〔1〕 这种基督教人文主义最终可以追溯到犹太教的先知,后者“在历史中(而不是在超时空的层面)与上帝交流”,在普通人和各个民族日常遭遇的事件中发现了深刻的宇宙意义。——原注。

〔2〕 哥特式大教堂是中世纪最光荣的成就,曾经被视为神秘主义和思想混乱的产物,现在则被认为具有几何学的合理性,是基于柏拉图的宇宙和谐论的思想深刻的成就。参见奥托·G·冯·西姆森:“哥特教堂:设计和意义”,载西尔维亚·L·思拉普主编《中世纪社会的变化》,1964年。——原注。

〔3〕 佛罗雷的约阿欣(Joachim of Flores, 1130/ 1135年 - 1201/ 1202年),意大利神秘主义者,预言家。

将会在人间实现上帝的王国。当代马克思的信徒几乎也没有走得更远；进步观念和革命观念的萌芽在这里已经出现了。这种运动从来没有取得过成功，但是它们表明了中世纪思想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也证明了一个事实，与那些老生常谈相反，官方教会的正统观念并没有包容了一切思想。

## 从中世纪到现代

中世纪曾一度遭到误解和贬低，现在则凸显出来，被视为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复兴时期。这一次的复兴为随后的一切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创造了条件。到 13 世纪为止，大学已经成型；主要通过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欧洲人已经掌握了大量的古代科学、数学和哲学。在 13 世纪，更多的知识流入欧洲，这些知识通常都包含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注释本中。它们是东方长时间消化希腊思想的成果。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这其中不仅有亚里士多德主义，还有新柏拉图主义。这两种因素有时被解释者混合在一起，有时被各自展现出来。这里不可能讲清楚中世纪哲学的复杂故事。应该指出，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是 13 世纪的大型知识活动场所。正如群山中凸起的巅峰，托马斯·阿奎那在这些知识舞台上兀然突起。

托马斯主义乃是欧洲思想的一次大胆飞跃，使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哲学有可能为基督教所用。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科学家和哲学家，他的思想体系无所不包，但没有任何强加于人的“信仰”因素；因为在他看来，人们所观察、思考、接受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不能经受严格分析的。后世科学家发现，亚里士多德说错的地方往往比说对的地方多，但是他之所以出错绝不是因为他拒绝科学探讨。他一直被教会所怀疑。阿奎那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据理力争，终于使人们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基督徒无需害怕亚里士多德和理性，理性与信仰从根本上说是和谐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建构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似乎融古代思想精华于一体。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里他都是伟大的神喻代言人。科学史研究者克龙比(A. C. Crombie)说他是“那种跨越中世纪科学的悲剧性人物”，长久占据着舞台中心，直至最后被他自己所锻造的武器所打倒。除了物理科学外，这个说法也适用于其他领域，如政治学、生物学、美学，当然还有形而上学或纯粹的真理论和认识论。在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亚里士

多德曾长盛不衰,但是后来伽利略发起攻击,17世纪的伟大科学家也加入战斗,导致亚里士多德在一系列问题上——天体的位置和结构、运动理论、自由落体理论、重力理论、真空理论、液压理论——节节败退。他的静止世界观在许多基本方面一直统治着自然科学,到19世纪达尔文才推翻它;他的四元素说一直是化学公理,18世纪的化学革命才颠覆了它。在形而上学领域里,亚里士多德宇宙观强调的是,万物皆有追求的目的,每种物体皆是形式与物质的结合,所有的物体构成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通向上帝。上帝矗立在那里。他是事物的终极原因,但是他并没有创造宇宙万物,也不可能关心宇宙万物。这种观念渗透进人们的世界观,直到17世纪的哲学革命(科学革命的伴生物)才遭到挑战。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虽然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厌恶,并丧失了在中世纪所拥有的那种威望,但不可能被彻底抛弃。他的诗学也同样如此。他的政治学也成为中世纪的思想背景,成为17世纪反叛的目标。



“伟大的存在之链”

古典时代的人认为,一切形式的生命,无论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都有一个等级排列。“伟大的存在之链”就是对这种排列的贴切比喻。

有关亚里士多德体系的细节,我们留待各个思想领域发生反叛之时再来详述。有一点需要重申,尽管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有种种错误,但是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科学的、理性的。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上帝的性质、天命、灵魂的性质、世界的创生),他的结论与基督教并非一致。但是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与我们今天的观念相去甚远,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是陌生的、甚至是非理性的。除了诸如地球不动这种事实性错误,那种目的论(事物都有所追求)的解释对于我们有什么用呢?或者说,他赋予无生命物体以生命特征的做法现在还有什么价值?本质和偶然、潜能和行动、形式和质料都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关键术语。它们今天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它们都属于中世纪经院学派的术语。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正是这个遭到蔑视的学派教会西方人有条理地思考、分类、批判和观察。

如果说13世纪阿奎那对两个体系的调和没有能够长久地流传下去,那么

真正流传下来的是他对广大知识领域的解放,使它们成为纯粹理性或者说哲学的对象。由此,科学、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学科来探讨,不再听命于宗教的正统要求或圣经权威。

13世纪末,神学与哲学、信仰与理性的托马斯主义结合开始破裂,但不是势如水火,而是友好分离,各走各的路。两个领域开始明显区分。它们的道路有可能交叉,有可能冲突,但是通常不存在一方控制或主宰另一方的问题。理性思想已经获得自由,踏上漫长的征程。

14世纪和15世纪是两个十分大胆的世纪。这是一个转变时期,西方的基本制度发生深刻变化:教皇权力衰落,现代世俗国家崭露头角。奥卡姆大概是那个时代最敏锐的思想者。他的思想显露了那个时代的勇气。例如,13世纪的那种理性与信仰的结合已经不复存在。奥卡姆指出,以上帝的存在为出发点的宗教真理根本不能接受理性的验证,而只能用信仰来接受。司各脱<sup>[1]</sup>也在一定程度上如此认为。正如戈登·莱夫(Gordon Leff)所描述的,“就彻底的摧毁力而言”,奥卡姆在欧洲思想史上可能是无与伦比的,



奥卡姆

他在许多方面都是惊人地超前而具有现代性。他和他的伟大对手方济各会教士邓·司各脱促成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终结,虽然他们还在使用其方法。他们的结论往往在根本上是怀疑主义的,从而关闭了通向旧式“理性”的大门,而打开了其他的大门。他们根本不试图理性地思考上帝、事物的本质或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所喜欢探讨的那些抽象概念。对于奥卡姆来说,那些不过是文字游戏。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是直接经验;只有我们所经验到的事物的现象特征才是真实的。奥卡姆代表了人们的兴趣从形而上学到科学、从抽象一般到具体特殊的转变。他的一些信徒对现代科学做出了开创性的重大贡献。<sup>[2]</sup>

人们通常把这些后期经院哲学家视为思想史上的转折点。过分雕琢的经院研究方法反而使“精微博士”邓·司各脱受到责难,从而被视为一个衰败的信号,或许也标志着用怀疑主义探索形而上学真理的终结。大

[1] 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 1266 - 1308年), 苏格兰神学家。

[2] 这些人包括奥雷姆、比里当、萨克森的艾伯特。

卫·诺尔斯(David Knowles)写道:随着奥卡姆去世(1350年),“一种伟大的思想结构、一种古代哲学观念逐渐消失,在经历了纯哲学黯然失色的两个世纪后,让位给现代世界的新世界观和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在奥卡姆去世和伽利略诞生之间的两个世纪里,在“纯哲学”领域之外,一系列划时代的运动席卷了欧洲:这就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神秘主义、新教改革运动。说到现代思想的奠基者,谁也不会遗漏伊拉斯莫、路德和加尔文,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远非现代。16世纪初期震撼欧洲的反叛不仅仅属于思想史,而是属于整个历史。这是西方文明史上的经典一幕,只有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法国大革命可与之相提并论。当然,这同时也是一场思想运动。

## 文艺复兴

当经院哲学分裂成对立的两派,即现代派(奥卡姆主义)和古代派(司各脱主义)之时,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开始向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挑战,推



伊拉斯莫

崇诗歌和语言学。人文主义者和经院哲学家陷入激烈的争论。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德意志,即科隆经院哲学家与人文主义者雅各布·罗伊希林<sup>〔1〕</sup>及其追随者之间的争论。在这场“书籍之战”中产生了一部文笔辛辣的讽刺作品《无名人物的信件》(罗伊希林著)。1500年至1520年,在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前夕,人文主义运动达到激动人心的高潮,其标志包括这场争论以及马基雅维利、伊拉斯莫、托马斯·莫尔以及欧洲各地的其他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著述。为了理解这场

〔1〕 罗伊希林(Jacob Reuchilin, 1455 - 1522年),德国学者。



运动,人们应该把它看做是对一个枯燥乏味的“理性时代”的反叛。人文主义者转向文学,把文学当做破除经院哲学那种毫无想像力的重智主义的解毒药。但是人们还应该想到在古代经典中可以找到极大的乐趣。这些经典对于我们来说或许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但是它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却是具有完美风格的智慧宝库。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谓自明的真理正在逐渐被人遗忘,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古典作家及其辉煌风格曾经产生长久广泛的影响。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是,通过接触希腊罗马文献来丰富和陶冶人们的心灵。这种理想一直流传到19世纪,至今尚未完全过时。或许,只要西方文明存在,这种理想就不会消亡。<sup>〔1〕</sup>人们不仅会在这些作品中发现用优美语言所表达的最高智慧,而且还会发现那种只有伟大的艺术品才能对人的性格所造成的持久影响。古代的经典作品是无与伦比的,更是不可超越的——这种看法几乎没有人提出质疑。甚至到了17世纪末,有人提出质疑后,招致了当时最伟大的批评家布瓦洛的嘲笑。这是由于古典语言尤其是希腊语极其完美,即便已经掺杂讹误,但就其涉猎的范围、文字的优雅、表达的精确而言,在当时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古人所具有的那种天然的尊严——罗马人的严肃、荷马时代的简朴——在日益“堕落”的时代已经可求而不可得了。人类少年时代的语言毫不造作,不是“文学风格”而是自然风格。这种风格一去不复返。文明也如人生,有其黄金时代,当青春的自发性与成熟的智慧混合在一起时,就会产生卓越的思想能力和表达能力。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就是如此。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这种看法极为普遍。

人文主义者不仅把目光投向雕塑艺术,而且也投向历史。他们用一种现实主义眼光来研究人类事务,开始深入到人类经验的真正结构。但是,人文主义者最根本的目的,即这种广泛的历史和文学教育的目标,是追求文化与智力的统一,即塑造拥有最高智慧的全才(Whole Man)。这种人应该是受传统陶冶而变得文明,受文学训练而能明晰地表达。与现代的异化诗人不同,他是社会的充分参与者,充当政治和社会领袖的角色。他与其他人共享文明遗产,懂得文明遗产是共同财富,个人所能给它增添的东西

---

〔1〕 现代瑞士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经写道:“我们把西方使人得以充分发展的基础归功于古典世界在西方,自我的每一次大提升,都是由于与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而引起的。”(《现时代中的人》,1963年)——原注。

微不足道。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古典主义者。

他们也把神学变得更人性化了。马丁·路德不仅受益于人文主义者,而且受益于奥卡姆主义及其在宗教上的盟友(对待上帝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态度)。路德否定经院神学,反对其苍白的重智主义,强调人们的内心情感生活,从而在中欧的普通民众中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大震动。与此相仿,我们看到亨利八世的代理人在牛津烧毁司各脱的著作;“至尊法”使英国教会与罗马教皇一刀两断,随之而来的包括教育方面的禁令,旨在改变原来的教育:“教会法的研读受到压制,学习古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数学、医学则受到鼓励。中世纪基督教教义的标准概要——彼得·隆巴德<sup>[1]</sup>的《箴言四书》——被废止,直接阅读《圣经》受到鼓励,人们借助人文主义作家的作品研读亚里士多德和逻辑,而把经院学派的‘繁琐问题和晦涩注释’弃置一旁。”<sup>[2]</sup>

这里有必要破除历史学家所谓的文艺复兴神话。正如一位学者最近指出的,这种神话“尽管遭到众多批评,却依然在流传”。这种神话说的是,中世纪几乎是一个完全黑暗的时代,当时仅有的智性活动就是那一点点徒劳而繁琐的演绎推理;15世纪文艺复兴的到来,奇迹般地使所有的领域摆脱了愚昧无知,给欧洲带来了生机、光明、科学和创新。至少就科学和技术而言,这个神话毫无真实可言。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对于科学和技术几乎毫无贡献。对于现代物理学更有价值的传统,乃是中世纪晚期巴黎经院学者那一谱系,其中有让·比里当、尼科尔·奥雷姆以及萨克森的艾伯特<sup>[3]</sup>。人文主义者沉潜于古书中;总体上他们对亚里士多德和盖仑亦步亦趋。他们拒绝依据新的经验来修正古典思想,在这方面有些惊人的事例。至于说到技术,在中世纪建造大教堂和制造钟表的工匠发挥了那种机械方

---

[1] 彼得·隆巴德(Peter Lombard, 1100 - 1164年),意大利人,神学家,曾任巴黎大主教。

[2] A. R. 迈尔:《中世纪后期的英国》。

[3] 让·比里当(Jean Buridan, 约1297 - 约1358年),法国经院哲学家、数学家。尼科尔·奥雷姆(Nicole Oresme, 1323 - 1382年),比里当的学生,德国人,数学家。萨克森的艾伯特(Albert of Saxony, 1316 - 1390年),德国教士,数学家。尼科尔·奥雷姆(Nicole Oresme, 1323 - 1382年),比里当的学生,德国人,数学家。萨克森的艾伯特(Albert of Saxony, 1316 - 1390年),德国教士,数学家。

面的才智,但是中世纪的学者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都对他们不屑一顾,而这种才智恰恰是现代科学得以发展的基础。<sup>〔1〕</sup>直到16世纪末,现代科学才开始起步,是在那些与人文主义不同的路线代表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我们硬要把这个运动说成是“文艺复兴”的一部分,那么至少应该说清楚,这个运动与那个产生了米开朗基罗、马基雅维利、伊拉斯莫和托马斯·莫尔的运动不是同一运动。

无需把人文主义者未曾梦想到的更遥远的未来境界都归功于他们,他们的成就已经十分辉煌。首先,所谓的文艺复兴大大拓展了欧洲人的思想范围。实际上,这种量的变化本身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变化最显著的特征。大量的古代文献被挖掘出来,从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翻译过来(对于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这两种文字其实是新的领域),经过编辑加工后付梓出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重新发掘出来的遗产当然也包括那些因与主流思想方式不一致而遭到压制或被遗忘的东西。这其中包括非常有意思的、不落俗套的希腊哲学家,被否定的(但结果却是更接近真理的)科学家;卢克莱修和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怀疑论者;希腊化文明时期各式各样的神秘哲学,诸如秘术哲学和犹太教神秘哲学。这些东西都见诸人世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也热心于挖掘,并且部分地通过考古学而形成一种洞察古代世界的历史认识。这是这个著名学派的另一众所周知的特点。

知识和思想的拓展造就了一种精致的怀疑主义,因为人们很难设想在众多的知识和思想中只有某一种是正确的。怀疑主义也是历史意识的产物,因为人们已经可能去想像其他的话语和其他的生活方式。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想,不是某一种信条或某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优雅的、有风格的生活方式——“把生活创造成一件艺术品”。人们努力通过文学的风格意识和古典的和谐意识来全面开发和协调人的天性,培养自己的品性。实际上,人们兼收并蓄,避免教条主义,形成了一种用美学原则把各种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折衷主义。艺术感和美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显著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更复杂精深的知识环境的产物。这里没有新的教条,没有主宰的探究路线。人们在大量有意思的古代思想中尽情享受。

---

〔1〕 中世纪的技术成果值得一提。正如小林恩·怀特指出的,“中世纪晚期乃是历史上人们有目的的以机械方式利用自然力的一个决定性发展时期”(《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迁》,1962年)。在这方面,古代人是极其落后的,而所谓的黑暗时代则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原注。

从一个方面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高雅深刻。他们具有怀疑精神,语言表达细腻,通晓各种不同的观点,也了解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们似乎令人惊异地古怪和愚笨。他们固守传统的宇宙观和物理学,还固守传统的生理学和心理学。他们不仅相信地球不动、星体由透明空虚之物构成,而且还相信四元素说(土、水、火、风)和四体液说(血液、粘液、胆汁和忧郁汁),认为体液在人体中的组合决定了人的脾气和性格。他们相信大自然的宏观世界和人的灵魂的微观世界之间存在着感应,例如,绿宝石保护贞节,肠鸣与天上雷鸣相关。他们大半相信炼金术士那种点石成金的梦想,相信希伯来神秘哲学中的神秘字母或数字的魔力。魔法和巫术包围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它们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医学从古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总之,在我们看来,科学革命来得太迟了。但是许多历史学家提醒我们,对于人的生存而言,这个旧世界比现代世界更令人满意。当时的种种解释可惜并不准确,这在后来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非常投合人的天性。对此我们不可能详细论述。在这个“被遗弃的意象”(C. S. 刘易斯<sup>[1]</sup>的说法)、“人的小世界”(J. B. 班伯勒<sup>[2]</sup>的说法)里,人与自然更为统一、亲近,人被当做宇宙的焦点和中心——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观点。有人说,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本体保障和美学启示。但是它不能不让位给另一个在科学事实上错误少得多的世界。

## 宗教改革

在这个世纪里,不论我们怎么大谈校园里的哲学家和文学方面的专家,其实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最深的是基督教。它渗透进生活的每一方面,用它的礼拜日规定了时间的节律(礼拜日——这个词的现代意思对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变化提供了一个讽刺性的说明)。基督教还影响了建筑和艺术的形式以及民众思想的基本结构。我们只需想像一下无处不有的教会、修道院、大教堂、宗教游行和钟声——赫伊津哈在其名著《中世纪的衰

---

[1] C. S. 刘易斯(C. S. Lewis, 1898 - 1963年),英国学者,先后在牛津和剑桥任教。

[2] J. B. 班伯勒(J. B. Bamborough),当代英国学者。

落》中描述了这些钟声如何在居民区上空回荡。那种把中世纪说成是“信仰时代”的陈旧说法会使我们想像一幅充满虔诚和祈祷的画面,从某些方面看,其实大谬不然。在那个时代,野蛮民族的凶猛力量随时可能推翻全部秩序,虔诚被迫退缩到修道院里,正如周期性的改革呼声所显示的,即便在修道院里保持虔诚也很艰难。教会被封建化了,教皇统治逐渐堕落。一个精力十足的下层阶级不时地产生出大声疾呼的异端代言人,同时民间诗歌则取笑教士,颂扬肉体快乐。13世纪晚期最有名的作家让·德·墨恩在《玫瑰传奇》中既嘲讽批评教士,又表现出极端享乐主义和非道德主义的性爱态度——可以说性爱上的这两种态度是当时文人阶层中的典型态度。<sup>〔1〕</sup>但是,即便反抗,也无法逃脱这种无所不在的宗教,因为它笼罩全部文化。人们甚至都不会想到要脱离它。<sup>〔2〕</sup>基督教是人们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效忠对象。人们可以属于基督教的某一派,而攻击其他派别的基督徒,但是成为一个反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是根本不能想像的事情。

文艺复兴拓展了有教养的欧洲人的视野,使他们看到了某些与中世纪教会的教条不同的古代观念(如伊壁鸠鲁主义)。但是这只影响到极少数人。人文主义者中彻底反基督教的人数往往被夸大了。17世纪以前,反基督教立场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思想基础。当时有些人梦想实现一种普世宗教的综合,以一种非教条的结构来体现所有宗教,包括当时知道的其他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真谛。这就是后来的自然神论的先声。当时也确实存在着少数大胆的“无神论者”,尤其在马基雅维利居住的佛罗伦萨——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分子否认有一个人格化的超验的神灵。但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基督教解释,鹿特丹的伊拉斯莫则是其中的向导。他们并不因为反对经院学派的理性主义神学和僧侣的隐居精神而变得不虔诚。

从1520年到大约1540年,“德意志的戏剧”(指宗教改革——译注)吸引了欧洲的注意力。路德抨击罗马教会的呼声传遍了欧洲各地,激起了轩然大波。这里无须详述人们经常描述和分析的过程,只需指出,到1540年代,新教也僵化成了同样不宽容的教条,加尔文宗与反宗教改革之间开始了宗教战争,结果许多知识分子对宗教的幻想破灭了。欧洲知识分子最初

---

〔1〕 这部名著的第一部分反映了比较纯洁的“典雅爱情”传统,第二部分篇幅更大,墨恩以肉体之爱更为高级的名义攻击这种精神恋爱。——原注

〔2〕 一个著名的具有民众基础的异端例子是法国南部阿尔比教徒中的清洁派。他们遭到残酷镇压,成为中世纪不宽容的最著名的表现。——原注

对路德大无畏的反叛行为备感兴奋,但很快就认识到,除了产生新的教条主义和对异端的迫害外,不会有其他任何结果。许多人文主义者最初对反对教会腐败和虚伪的主张十分同情,但是新教对艺术的破坏,天主教徒歇斯底里的“教皇崇拜狂热”以及下层阶级中爆发出来的各种超乎常理的教派,使他们感到厌恶。然而,谁也不能否认那种使加尔文宗信徒和耶稣会的热情达到高潮的精神纪律是多么引人注目,这种纪律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尤为显著。

除了唤起一种更狂热和更不宽容的信仰外,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还有其他许多后果。这场运动本身就是国家日益成熟、民族主义日益兴起的一个表现。它最终消除了对王权的制约,从而强化了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它还消除了人们对跨国的天主教会的忠诚,从而加强了民族主义。它使各个国家都陷入内战和动乱,从而迫使世俗政府来维持秩序和决定信仰的条件。因此,宗教改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思想领域,伴随宗教改革出现了主权概念和君权神授观念,与之对立的是加尔文宗和耶稣会的反抗权利理论。各种不同的教派执意向社会推行自己的宗教正宗观念。它们都确认应该有一种权力来支配世俗政府之手,使之能够执行教皇或长老的指令。它们导致了16世纪最后数十年法国的严重内战。虽然一些可恨的专制君主翻云覆雨、纵横捭阖,从而削损自由、强化君权,但是比起那些党同伐异、使欧洲大开杀戒的圣职人员来,他们倒还更值得同情。因此,通过不同的途径,现代国家在教会破产的过程中得以诞生。

宗教改革的爆发打破了欧洲在宗教上的统一,使整个大陆陷入动乱,最终在对神学狂热的厌恶中产生出一种怀疑主义。蒙田一针见血地指出:“仅因为这个人提出某种猜测就把他活活烧死,让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sup>〔1〕</sup>欧洲慢慢地走向宽容(这一点在下一章里展开论述)。还须经过一些时日人们才完全接受怀疑主义,把它作为政治秩序的基础。不过,调和适应的方式正在逐渐形成。人们惊讶地发现,两种或者更多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可以相安无事地共存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中。由此,西方文明度过了自古以来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难关。

---

〔1〕 参见《蒙田随笔全集》下卷,陆秉慧、刘方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 现代政治思想的开端

16 世纪后期最重要的思想家是政治理论家让·博丹<sup>〔1〕</sup>。他相信巫术和魔法,他呈现自己的思想时显得混乱不堪,这些都在提醒我们:我们距离启蒙时代已经多么遥远了。但是,他的一篇论文预示了两个世纪后的经济理论。他还与蒙田共同主张,讨论宗教是毫无结果的,宽容是惟一的出路(《悖论》,博丹死后于 1596 年发表)。博丹最著名之处是他提出的主权概念。他稍微有点夸张地说,在他之前没有人真正懂得国家是怎么回事。他攻击亚里士多德这位政治理论的古典权威,尽管他使用亚里士多德的许多概念。博丹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在政治体的某个地方寄寓着一种“绝对的和永恒的权力”,这是一种不可分割的、不受限制的、长久不变的权力,它可以是由某一君主所行使,但是它不因那个君主去世而消亡,它是归属于国家的一种不可摧毁的抽象物。博丹对当时法国政局的混乱痛心疾首。虽然有些混乱而且方向不明,但是他还是得出了对于后人极端重要的思想。<sup>〔2〕</sup>

一种新型国家正在从 16 世纪的大混乱中脱颖而出。它更为强大,往往形成绝对主义的政府,但它对各种宗教信仰日益宽容,而且能够在广阔的疆域内加强秩序,推动经济发展。在博丹去世前一年,纳瓦尔的亨利恢复了法兰西王国的统一,平息了各个教派之间的冲突,随后在 1598 年发布了著名的《南特敕令》。在 1614 年被暗杀之前,这位精明能干却有些放荡的国王已经为后来强大的法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当 17 世纪的曙光降临时,正如博丹等人所隐约预见到的,欧洲已经站在大变革的门槛。王权领导下的主权国家的兴起也是这些变革中并非无足轻重的一项。在博丹的思想中(以及那些与博丹关系密切的“政治家学派”的思想中)强大的世俗国家与宗教宽容乃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恢复国家的统一,结束宗教内战。大约与此同时,海德堡的医生埃拉斯都(Erastus)创建了一

---

〔1〕 博丹(Jean Bodin, 1530 - 1596 年),法国政治哲学家。

〔2〕 博丹还论述过历史研究方法。他对历史研究的重视远远超过 17 世纪深受笛卡儿影响的那些哲学家的看法。在这方面,他也是启蒙运动的先声。当时还有几位法国人,包括弗朗索瓦·博杜安、拉波普里尼埃,也写了论述历史方法与历史哲学的小册子。参见 J. 富兰克林《博丹和 16 世纪法律和历史的的方法论革命》(1963 年)和唐纳德·凯利《现代史学的基础》(1970 年)。——原注

种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重要教义：埃拉斯都主义这个术语长期以来表示在信仰问题上世俗权力拥有最高权力。

博丹的思想还有一个引人瞩目之处，那就是他试图通过对各种法律的收集、比较和分析来建立一种法理学。与亚里士多德对古代世界所做的伟大综合相似，博丹怀着新的信心，开始为建立一种关于人类制度的科学而进行现代探索。在这方面，博丹也隐约是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人们可以看到新时代的破晓曙光，但旧时代的阴影依然笼罩。

因此，至少在那些新教流行的国家，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与新教对传统宗教权威的攻击相结合，破坏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即使在其他国家也有今昔之别。新建的耶稣会的观念就体现了这一点，尽管耶稣会是天主教反击宗教改革的打手。耶稣会和加尔文宗这两大对头却也有一些共同的显著特点。其中之一是，二者都极力想弥合积极生活与冥想生活之间的裂痕。柏拉图和古希腊人宣称后者高于前者。这就带有分离二者的倾向。中世纪的修道院制度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分裂。13世纪大学里的教职员都是那些离开了修道院的修士，但是他们仍然倾向于把形而上学和神学置于其他实用学科之上（法律是一门主科，但是机械工艺则完全排斥在外，实验科学几乎不存在）。中世纪晚期的神秘主义强调寂静主义。人文主义者本身往往流露出唯美欣赏的贵族理想，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提倡积极生活，肯定政治和商业之类事业的价值。

或许我们能够从这种积极行动主义的反叛中看到当时各种革命的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宣称经院学者已经变得冷漠而猥琐，指责他们脱离现实、不食人间烟火。修道僧团受到严厉批评而被废除，甚至在天主教国家也是如此。许多人认为，加尔文把（世俗）工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受尊重的高度。不久，弗兰西斯·培根发出号召，要求从机械工艺中汲取活力，在科学领域里与死气沉沉的经院哲学一刀两断。耶稣会士、热表现世的人、策士谋臣、周游四海的旅行家都热血沸腾，急于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自己的宗教热情，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行动与思考结合起来。马基雅维利、伊拉斯莫和莫尔把政治变成了一门独立自主的研究。

## 巴洛克时代

16世纪末，举目四望，我们会看到一个伟大传统的种种衰亡迹象。这



并不是说有哪一个反叛者完全否定这种传统。最近的学术研究有力地证明,路德的思想来源包括圣保罗到圣伯纳尔以及中世纪晚期的神秘主义者和奥卡姆主义者;如果说加尔文是更激进的反叛者,那么他也是一个优秀的古典学者,他当然要把基督教神学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人文主义者都对他们心目中的伟大的古典传统顶礼膜拜。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虽然科学革命开辟了新的天地,但也从历史上有所借鉴。它的大多数伟大先驱,诸如开普勒、伽利略、培根、笛卡儿,即便不敬仰亚里士多德,也会对柏拉图推崇备至。尽管如此,在16世纪的多数大学里虽然讲授这个传统,但对它缺少敬意;有人反对所谓典型的经院哲学方法;有人对中世纪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也不满意;有人在寻求新的综合体系。

法国随笔作家和怀疑主义者蒙田是16世纪的一个“世纪末”伟人。他对莎士比亚有很大影响。他和莎士比亚一样,兴趣广泛,对人性好奇,头脑开放,不恪守教条,喜欢标新立异,讨厌学究气。这才是成熟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结出的硕果。蒙田精通古典作品,但不做它们的奴隶,而是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在哲学上他是怀疑主义者,在这方面也继承了皮浪等古代哲学家的观点。在他思想发展的某一阶段,新近发现的古代斯多葛主义哲学或宗教——在戏剧家塞涅加的作品中有所体现——深深吸引了他。但是他并没有长久停留在任何一个立场上。蒙田的睿智散文使许多读者入迷,因为这位伟大的作家洞悉人性、看破红尘。可以说蒙田对人类愚昧和虚妄的抨击代表了最高的智慧,但是很难否认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虽然他怀有一种斯多葛主义的信念,相信哲学家通过理解和超然物外可以获得拯救,但是他没有给人类整体提供多少希望和鼓励。没有人会把他当做进步观念的提倡者。蒙田对于自己的同胞极其厌恶,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为了自己并不真心坚持的观点而互相残杀。这些人不仅残忍而且虚伪。他思考人类的处境,感叹道:“还能想像得出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凄惨而又卑劣的生物更可笑吗?”他的悲观主义就源于这种怀疑主义。既然人类只能用绝对不完善的



蒙田

感觉意识来指引自己,人类就割断了“与其他一切的联系”,如果人类自以为是理性的,那不过是他们的一种荒唐的自我欺骗。最聪明的人懂得,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不过是揭示了他们根本上的无知。如果伟大的西方思想传统像人们乐观地说的那样理性,那么不难想像,由于有了蒙田,这种说法也就暂时失效了。

虽然蒙田自称是天主教徒,但他实际上“用丝带绞杀了宗教”。他与其说是一个基督徒,不如说是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将异教道德移植到法国”。<sup>〔1〕</sup>因此,他或许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先声。“自由思想”在17世纪的法国偷偷流传,导致了18世纪的“自然神论”和无神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蒙田。但是,他的怀疑主义、他对理性的攻击以及他对人性的过低评价则与理性时代所流行的观念圆凿方枘、不相契合。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由于重新发现了大自然的秩序,人们开始恢复了信心。当然,这种信念已不是旧的信仰。蒙田的时代正处于未死与方生之间。

蒙田目睹了宗教战争的恐怖,因而转向斯多葛主义和古代经典寻求内心的解脱。他的文雅的怀疑主义隐藏着一颗因同胞的暴行和愚昧而深深战栗的心灵。他们怎么能确保他们的信仰就是正确的?他嘲笑新教徒,因为后者以为在《圣经》的基础上可以达成一致。不可能!好争斗而又愚昧无知的人类会为《圣经》的每一句话而争执不下。这正是虔诚的主教波舒埃后来用以反对新教的一个论点。不过,所支持的是那些称作“政治家”或现实主义者的天主教徒,后者准备最大限度地实现宽容;他还支持纳瓦尔的亨利,因为后者愿意放弃自己的新教信仰来换取国内和平。(蒙田曾拜访亨利四世,可能对后者产生了影响。)

蒙田一直被看做是典型的巴洛克作家。巴洛克这个词先是用来表示一种艺术风格(绘画、建筑、雕塑和音乐),后来扩展到文学,再后来被用来涵盖当时欧洲整个思想文化,其时间是从文艺复兴之后到宗教改革在某种意义上结束之前,大约是从1570年到1650年。学者们对巴洛克的起讫时间说法不一,相差数年。这一现象极其复杂,分期上的差异不足为怪。毕竟这里涉及许多不同的国家和许多文化领域。但是,对于这个概念,人们基本上是认可的。至少它是一把打开理解这个时代的思想情绪之门的钥匙,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好的钥匙。巴洛克是对纯粹古典主义的反叛,

---

〔1〕 H.丹尼尔·罗普斯:《天主教改革》,1962年。

在某些方面狂野不羁、甚至杂乱无序。在某种程度上它是 19 世纪浪漫主义的先声。它是一个令人赞叹的艺术创新运动,让美学想像自由驰骋,但是在它对古典主义的片面否定和它的反叛情绪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侵袭欧洲的某种思想感情危机的征兆。随着科学和理性主义的胜利,到 17 世纪中期,古典主义开始卷土重来。巴洛克是适应那个躁动时代的躁动风格。导致躁动的原因包括宗教不宽容和内战、怀疑主义、文艺复兴的复杂性以及接踵而至的新天文学的首次冲击。



巴洛克式餐具:芦笋式沙锅用的勺子、餐具、肉叉

在结束关于蒙田的介绍之前,有必要谈谈他在写作上的巴洛克风格。他的写作有些杂乱,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缺少古典的整齐对称,似乎没有规矩。他注重变化和运动:无论他的生活还是他的写作都不是静止的,他迷恋过程而不是结果。他写道:“我不描写存在,而是描写转变。”当然,这是他的怀疑主义的一个侧面:除了我自己的思想外,没有什么确实存在的真理,而我的思想是在不断变化和成长。<sup>〔1〕</sup> 在这方面,蒙田的前现代怀疑主义与最近的西方思想潮流颇为相似,正如当代艺术形式与巴洛克艺术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蒙田断言,人性是相同的,人都是一样的,因此他理解了自己,也就普遍理解了人。现代存在主义对于其他一切持根本怀疑态度,似乎也提出同样的假设。

蒙田在写作上还表现出一种跌宕起伏的风格,追求震颤和休克效果。他还在某种程度上迷恋怪诞乃至残酷。尽管他真诚厌恶人们之间的野蛮残杀,但是我们觉得他很喜欢玩味血腥的细节。蒙田曾经是一个军人,并以此为荣。总的来看,与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相比,巴洛克时代则显得有些硬朗。

〔1〕 参见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在其《悖论与问题》中论变易:万物皆变,越变越好。

1560 年前后,巴洛克风格开始统治了南欧的建筑,在某种程度上也扩展到北方。它的最伟大的天才是那不勒斯人贝尔尼尼<sup>〔1〕</sup>。进入 17 世纪罗马城开始焕然一新。贝尔尼尼发挥出巨人般的精力,对新罗马城的建造贡献甚大。他建造了许多广场和喷泉,至今令游人赞叹不已。巴洛克建筑与罗马的结合,广义地说是与当时天主教建筑的结合、特别是与最有活力的新修会耶稣会的结合,使得它在精神上与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联系起来。可以用格列柯<sup>〔2〕</sup>的触目惊心的绘画作品中的那种扭曲愿望做一例子:一种强烈的宗教精神,受阻于客观现实的羁绊,有点像 19 世纪浪漫主义的方式,拼命地想变形和扭曲——这是一种神圣的疯癫,远远不同于冷静理性的古典风格。



贝尔尼尼设计的罗马圣彼得广场

巴洛克这个术语也常常用在文艺复兴后的大画家身上,如鲁本斯、丁

---

〔1〕 贝尔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 1598 - 1680 年),意大利雕刻家、建筑家、戏剧家和画家。

〔2〕 格列柯(EL Greco, 1541 - 1614 年),西班牙画家。据说格列柯眼球畸形才导致画面扭曲,或许他本人想画得整整齐齐。

托列托、伦勃朗和委拉斯凯兹。<sup>〔1〕</sup>当然,丁托列托和鲁本斯看上去是最典型的巴洛克画家。无论我们在哪里看到巴洛克风格,它都显得活力四射、无所顾忌,追求宏大效果,推崇不对称而非对称,追求运动而非静止,喜欢打破边际而非整齐划一。在文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巴洛克精神既体现为“玄思”诗人<sup>〔2〕</sup>的奇思妙想和诡异意象,还体现为詹姆士一世时期戏剧的狂野特征,后者往往以谋杀、乱伦、巫术为主题,表现叱咤风云的英雄。在法国的舞台上也表现出同样的趣味:喜欢华丽,渲染暴力。从西班牙引进的悲喜剧就属于这一类。尼古劳斯·佩夫斯纳<sup>〔3〕</sup>说道,“无比的辉煌、疯狂的铺张、极度的繁复,这一切很可能会让(被奉为风格主义宗师的——译者加)米开朗基罗本人感到厌恶”,但是它们却出现在文艺复兴后的某些极端的艺术形式中。(“风格主义”先于并预示了巴洛克。)



《圣女和孩子在花环中》,  
鲁本斯画,1621年

巴洛克的关键理念是运动和变化。万物无常,一切皆变,犹如万花筒。让·鲁塞<sup>〔4〕</sup>对法国巴洛克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专著的标题是《喀耳刻和孔雀》,前者是希腊女神,是变化和巫术的象征,后者是一种喜欢装饰和炫耀的鸟。二者都是巴洛克艺术家和剧作家所赞美的。要复杂不要简单,要变化不要稳定、要繁复不要单一——这些就是巴洛克的永恒主题,它们与古典主题正好相反。古典绘画,如17世纪晚期新古典主义回潮时期

〔1〕 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 - 1640年),荷兰画家。

丁托列托(Tintoretto, 1518 - 1594年),威尼斯画家。

伦勃朗(Rembrandt, 1609 - 1669年),荷兰画家。

委拉斯凯兹(Diego Velasquez),西班牙画家。

〔2〕 “玄思”诗人通常指多恩(Donne)、马韦尔(Marvell)和沃恩(Vaughan)等。

〔3〕 尼古劳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 1902 - 1983年),德裔英国艺术史学者。

〔4〕 让·鲁塞(Jean Rousset, 1910 - 2002年),瑞士学者。日内瓦大学教授。

普桑<sup>〔1〕</sup>的某些作品,就是把作品题材瞬间冻结,呈现为永恒的静止,并且追求完美的统一和对称。古典派画家也不喜欢曲线。相反,巴洛克绘画作品凸显弯曲旋转的线条。贝尔尼尼的喷泉就是如此。巴洛克“对待直线就像对待一大罪恶那样唯恐避之不及”(让·鲁塞)。鲁本斯和丁托列托的绘画作品充满了曲线和螺线,贝尔尼尼的喷泉也是弯曲、旋转的,它们常常被视为最典型的巴洛克作品。此外,巴洛克显示出一种对下层人物的偏爱(带有浓郁的田园气息),与古典主义对尊贵英雄的推崇形成反差。

体积庞大也常常被视为巴洛克的一个因素。这不是说所有的巴洛克艺术都是庞大的,或者说庞大的就一定是巴洛克艺术,但是追求壮观和幻觉效果就可能导致“巨人症”。贝尔尼尼建造的圣彼得教堂大广场以及他建造的那些大喷泉都被公认是巴洛克风格。有人发现路易十四的辉煌的凡尔赛宫也有巴洛克因素,尽管古典因素是主要的。对庞大艺术的喜好早在古代希腊化时期就出现了,当时有一种对希腊城邦那种纯粹严格的古典主义的否定。打破桎梏、追求最大极限,显然会导致巨人症。

我们不应该蔑视巴洛克时代,否则会犯下错误。巴洛克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是20世纪的人比19世纪的人更欣赏这种艺术风格。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文化亲缘关系。威特科尔教授(一位高级权威)写道,巴洛克那一代人是“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代强人”。贝尔尼尼、普罗密尼、委拉斯凯兹、伦勃朗、鲁本斯和哈尔斯<sup>〔2〕</sup>都属于当时的艺术巨匠之列。我们还可以把丁托列托和年轻的普桑列入这个名单。如果把巴洛克的概念推广到文学领域,莎士比亚和詹姆士一世时代的剧作家以及其他一些作家也可以包容在内。在建筑领域,巴洛克大概产生出最后一种真正原创性的有活力的欧洲风格,至少在20世纪之前可以这样说。18和19世纪的折衷主义不断地向它回溯借鉴,当然也回溯借鉴欧洲其他伟大风格,如哥特风格、文艺复兴风格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等。

巴洛克有许多侧面,因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削足适履的定义陷阱(正如后面要谈到的浪漫主义的情况一样)。但是,冒险与困惑相结合的巴洛克风格恰好符合那个迅速转变时代的形象:它提起古老的锚链,开始在尚

---

〔1〕 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 - 1665年),法国画家。

〔2〕 普罗密尼(Francesco Borromini, 1599 - 1667年),意大利雕刻家。

哈尔斯(Frans Hals, 约1581/1585 - 1666年),荷兰肖像画家。

不熟悉的大海上向着未知的目的地远航,但是对船体的平衡毫无把握。对运动和不稳定的强调正是巴洛克的精髓。贝尔尼尼宣称,人在运动时最像人。巴洛克时代的人赞同古代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旋转主宰一切。”这是一个不安定的时代——政治不安定(宗教战争导致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思想也不安定。自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可怕冲突开始,欧洲就进入了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时代:他们对整个宇宙进行探索,向建立物理学新秩序迈进。接近17世纪末牛顿才将这个新秩序建立起来。因此,毋庸奇怪,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期人们不可能保持古典的平静。对于这几代人来说,什么也不能驯服,什么也不能平衡。他们发现了一些奇异而可怕的事物。随着两千多年的世界图景土崩瓦解,现代世界的景象在17世纪的人们眼前闪烁不定,忽而令人兴奋,忽而令人惊骇。

这是巫术与魔法的时代,也是现代科学和哲学诞生的时代;这是伟大艺术和建筑的时代,但是这种艺术风格缺少定力,很快就土崩瓦解;这是战争、革命、饥馑与苦难的时代,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社会历经磨难而崭露头角;这是奇迹般的巴洛克时代。大约从1580年到1630年,这段岁月将永远与莎士比亚、蒙田和鲁本斯的名字连在一起,同时这也是开普勒、第谷和伽利略的时代。正是科学革命最终塑造了17世纪,为之指明了方向。

## 第二章 17 世纪的科学、思想革命

思想史上有许多无聊的真理和有益的谬误。

——阿瑟·凯斯特勒<sup>〔1〕</sup>

希腊人把科学视为对自然的理性探索,这种思想似乎正是西方文明特有的理智特征的根基。

——莫里斯·科恩

### 中世纪的科学

实际上,科学革命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中世纪的科学绝不是像曾经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不屑一顾的,现在反而(因为神话已经破灭)还不时地受到肯定。12世纪,在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论著(《后分析篇》)的同时,还重新发现了希腊和阿拉伯的数学。中世纪的数学家,如比萨的莱奥纳尔多和乔丹纳斯<sup>〔2〕</sup>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果说科学分析的数学演绎法相当兴盛,那么观察和实验方面的经验方法也在某种程

---

〔1〕 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年),匈牙利裔英国小说家、批评家。莫里斯·科恩(Morris Raphael Cohen,1880—1947年),美国哲学家。

〔2〕 比萨的莱奥纳尔多(Leonard of Pisa,约1170—约1250年),意大利数学家。乔丹纳斯(Jordanus Nemorarius,1225—1260年),德国数学家。



度上得以流行。诚然,中世纪的大学实际上几乎没有实验技术,但是主流哲学观念,即亚里士多德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很注重经验的。诸如阿尔伯图斯、罗吉尔·培根等中世纪的大学者都怀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尽管他们之中最伟大的托马斯·阿奎那对物理和自然科学不如对伦理、政治和形而上学思想更为关注。凡事都有个先后顺序。12 和 13 世纪给后来的科学奠定了坚实的逻辑思维的基础。因此,如果嘲笑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经院学者的错误而忘记他们建立的基本真理,则不合情理。不过,他们确实不能造就一次科学的“文艺复兴”,因为他们是旧的错误观点的囚徒,无法挣脱出来。

14 世纪似乎正在酝酿着直到 16 世纪末才确实发生的那场突破。奥雷姆、比里当、萨克森的艾伯特等晚期的经院学者已经在研究那些运动概念,而 200 多年后开普勒和伽利略正是因为探索这些概念而赢得更大的名声。但是,这是一次流产的科学革命。历史学家承认,这些北方的经院学者的工作虽然开始很有希望,但最终不了了之,“14 世纪末,经院学术创新的辉煌时期走到了尽头”,巴黎和牛津在科学领域停止了创新。大约从 1350 年到 1660 年,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很奇怪地摇摆不定;这个时期因百年战争和随后宗教改革时期的冲突而普遍停顿。欧洲北部受到的破坏比南部严重,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能够跃居前列。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大学成为中世纪晚期主要的科学中心;它在科学革命中也是光荣之地。哥白尼曾经在那里学习,伽利略后来在那里任教。帕多瓦还是解剖学家维萨里<sup>〔1〕</sup>定居之地,被称作“生理学的伽利略”的英国人威廉·哈维师从于他。帕多瓦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中世纪的成就并加以发扬光大。



帕多瓦大学

帕多瓦的哲学传统实际上是左翼亚里士多德主义,即

〔1〕 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 1524—约 1564 年),意大利医师,解剖学家,生于布鲁塞尔,后来在巴黎、帕多瓦任教。

阿威罗伊主义(阿威罗伊是阿拉伯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注释者)。阿威罗伊主义保持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对实验的兴趣,但没有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里亚里士多德主义信徒常常表现出的那种教条主义。在帕多瓦长期保持着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而且,正如克罗比所说的,“16和17世纪的主要科学家熟悉并运用了中世纪前辈的著述”,每一项重大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无知的历史著作对中世纪怀有一种非理性的偏见,总是重复着中世纪毫无科学建树的老调。这种偏见至今广为流传。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过,在16世纪,只有少数地方和少数人维护着科学传统,他们将永远受到人们尊崇,跻身于流芳百世的人类思想成就代表之列。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这里说的是主流的人文主义者们,往往重视文学而忽视科学。某些人文主义者,如不朽的艺术家兼科学家达芬奇怀有科学兴趣,但他们总体上注重美学方面而不是科学方面。(其实,达·芬奇作为科学家的才能一直是被夸大的。)人文主义者对古代经典顶礼膜拜,反而对科学产生一种反动作用,因为本本主义和食古不化乃是科学发展必须克服的障碍。人文主义者重新引入柏拉图主义,但正是由于推崇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相对立的理论,他们就间接地刺激了科学探究。尽管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相比算不上科学家,但他是一个数学家;凡是对这位伟大的雅典人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把数学置于教育的首要地位,因为数学教给我们的是所有发达思维的基本原理。因此,在空间、重力、物质性质和天体性质等重大问题上,柏拉图学派(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发展出一系列与亚里士多德学派不同的观点。对于哥白尼所进行的划时代的研究工作来说,这一被重新发现的古代科学学派乃是最重要的背景。

## 哥白尼革命

1543年,波兰裔德国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一书,提出日心说这一假设,认为地球和行星围绕太阳运转,而不是像公认的那样,所有的天体在一系列球面轨道上围绕着不动的地球旋转。(此前这部著作已经以手稿形式在少数学者中间流传。)关于这本书有许多神话。在此需要谈两点。首先,哥白尼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日心说的人,古代就有几个著名科学家已经提出来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库斯,他是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希腊人,是“古代的哥白尼”。

柏拉图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学派曾就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复兴,对于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这些关键人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弗兰西斯·培根都把注意力从亚里士多德转向柏拉图。)在哥白尼之前,15 世纪德国牧师库萨的尼古拉斯也曾经推测,地球是在一个无限的宇宙中运动。他的这个想法来源于柏拉图主



约翰·罗利制作的太阳系仪

太阳系仪受到富裕的天文学家和公共演说家的青睐。

这种机械仪器重视了哥白尼日心说所描述的天体运动。

义,并且被他的宗教神秘主义笼罩着。

其次,长期流行的地心说不是简单地基于迷信和神学偏见,而是基于当时看来最好的证据。中世纪学者所公认的宇宙论出自于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化时期的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托勒密对亚里士多德体系提出了某些修改,但基本上赞同这一体系。大地在宇宙的中心静止不动,因为再没有任何东西推动它的情况下,如此沉重的实体是不可能动起来的。古人不懂得惯性定律,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人们很难想像那些巨大的物体在没有任何东西推动和指引的情况下在空中旋转并且一直沿着轨道运行。

这样一个结论是科学天才进行大量研究的结果,单靠观察是不可能得出这个结论的。伽利略赞扬哥白尼具有想像力,能够设想在常理中不可能的情况。经验显示的是,当我们抛出一个物体后,它不是无限持续地运动,而是很快就落到地上。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解释说,抛出的物体后面形成真空,空气填充真空,形成动力。重力则是推动所有的物体寻找它们在地球中心的自然归宿的力量。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认为,物体的自然状态就是静止,除了天然要动的生命体和下落的物体外,任何物体都必须有一个推动者使它动起来。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质量除以空气阻力的值成正比。在真空中,物体以无限大的速度下落。不过,亚里士多德学派认为不可能有真空。

大地之外就是水、气和火的领域。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要素按照当时的说法是上升的。然后就是太空,天体在一系列球面轨道上围绕着地球旋转,第一层是月球,然后是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最后是恒星。(月球是一个分界线,在它之上都是纯粹的、不可败坏的、永恒而神圣的,在它之下都是不完善的、易变的和不纯粹的。)"最高轨道"凭借某种飞轮结构转动着其他层球面轨道。正如通常的天堂示意图所显示的,最高的天层是"上帝和所有得救者的住处",但是它与这个体系没有直接关系。

这幅画面有些难解之处;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并不完全一致,天体观察的结果迫使托勒密的体系增加了"本论"这种很别扭的机关,即行星在自己轨道上运行时的小圆周和地球不严格在各种轨道中心时的偏心圆周。随着观察变得越来越准确,这些"保全面子"的小机关也越来越多。然而,通常人们说哥白尼假说简化了这个模式,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这里有必要重申,反对地动说的主要论据都是物理学的论据。赞成地球静止的论据令人信服,动力学领域的论据尤其如此:像地球这样沉重的物体,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推动者,怎么可能动起来?如果动起来,又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它下落?要使人们相信地球在空中旋转,那就必须先有关于万有引力和惯性运动的现代理论。常识和实验似乎都支持这种观点:没有向它们施加一种有形的推动力,物体不会保持运动状态;抛出的圆球会很快落地。手离开后,圆球显然还保持暂时的运动,对此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用气流来加以解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还支持这种观点:由于物体向地球中心的方向下落,引力必然向这个方向吸引宇宙万物。哥白尼知道自己的假说有许多未解难题,也没有梦想由自己来证实这个假说。他只是作为一种建议提

出来,留待未来的科学来检验。

最后还有一种荒诞说法,即某些势力合谋压制了哥白尼的真理。其实,哥白尼假说提出之时并不是不证自明的真理,相反,在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看来,它几乎是不证自明的荒唐;而且它也并非像后来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惊人的新发现。诚然,公认的宇宙论已经被纳入基督教神学,抛弃它会对教徒造成许多伤害。但是,教会并没有反对哥白尼的工作。路德称他是傻瓜<sup>〔1〕</sup>,但是许多博学的科学家也抱有同样的看法。学术界早已证明,拒绝接受哥白尼学说,主要不是因为反动派的阴谋,而是其他因素,主要是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当时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依然主宰着欧洲大部分地区,人们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研究,要么是神学,要么是人文学科。

针对物理学界对地动说的否定,哥白尼用经院哲学的方式加以反驳,即从事物的性质和目的来推理论证,这显得软弱无力。<sup>〔2〕</sup>例如,他仅仅说,我们应该认为运动比不动更高贵、更神圣,而不是相反;引力是“造物主赋予物体各个部分的一种天然倾向,是为了把各个部分结合成一个天体,从而促成它们的统一和整体性”。哥白尼不愿发表他的学说(直到临死前才在他的一个年轻弟子、德国新教徒雷蒂库斯的一再敦促下发表),并不是害怕教会不高兴,因为教皇本人似乎也敦促哥白尼发表他的学说。哥白尼是担心遭到嘲笑,因为他对人们提出的反对意见还不知道如何回答。哥白尼秘而不宣的做法可以换个理由来辩护:当时公开他的学说有可能败坏科学革命的名声,从而延误整个科学革命。过早公开那种让人目瞪口呆的创

---

〔1〕 与有些人的说法相反,加尔文显然对哥白尼一无所知。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可能欣然接受哥白尼的观点,因为加尔文自己在论述这类问题时所阐释的主要观点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证实了上帝的光荣;自然现象越奇妙,就越显现上帝的伟大。加尔文接受新的天文学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参见爱德华·罗森《加尔文对哥白尼的态度》,载《观念史杂志》,1960年,7-9月号。——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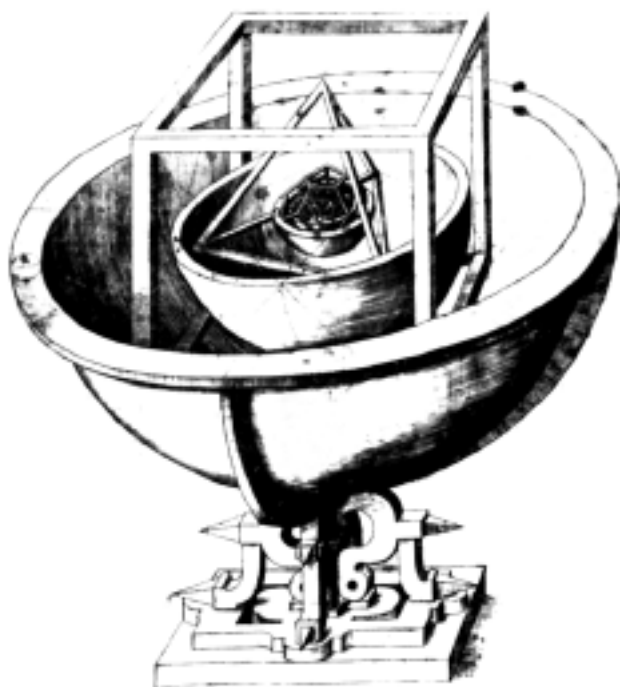
〔2〕 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中,目的因(终极因)最为重要,也最受重视。要想理解一个对象,我们需要知道它的物质成分、形式、形成动力,但最重要的是,需要知道它的目的。例如,一扇窗户是用玻璃做成的,有窗户的形状,是由工匠制造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成为现在的它;但是,很显然,如果窗户没有用途,就不可能有什么窗户。对一扇窗户的最终解释是,它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向外看的目的。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推论,但是在后人眼中,它显得可笑,好像不动脑子,用现象解释原因。对目的论的颠覆,是科学革命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原注

新,可能是不明智的策略。在能够证明之前,不应该宣布出来。哥白尼的胆怯可能是更明智之举。总之,哥白尼确实还没有使自己的假说做到让人信服的程度。同时代人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他的宇宙论,不应为此受到责备。

## 开普勒和伽利略

整个亚里士多德科学已经在逐渐受到怀疑。1572 年对一颗新星的观测、1577 年对彗星的观测都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些现象不能纳入托勒密的框架里。(这颗彗星竟然穿越了所有的水晶球层面!)伽利略认为,亚里士多德学派都是一些呆子。他对经院学派的观点逐一给予毁灭性的打击。不仅他们的宇宙论有错误,而且他们的动力学也有错误,其他方面也有错误。例如水力学,亚里士多德学派认为,物体在水中下沉或者漂浮,与其形状有关。伽利略则认为与比重有关。曾经被视为最尊贵也最可信的科学体系在 17 世纪初陡然崩毁。但是,到伽利略为止,让沉重的地球运行的

动力体系最令人困惑不解。到了牛顿那里,这个问题才完全澄清。如果说帕多瓦在解决哥白尼的难题方面遥遥领先,那么德国南部在宇宙论革命的初期也起了突出作用。实际上,欧洲各地的天才人物都发挥了他们的才华。出身低微的土瓦本人开普勒在图宾根大学(在德国南部斯图加特附近)接触到哥白尼学说,后来来到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在魅力四射的丹麦天文学观察家第谷手下工作,再后来成为哈布斯堡皇帝的官方天文学家。第谷在家乡丹麦只能听到讥笑,但在德国城市奥格斯堡则受到欢迎。



开普勒及其设计的太阳系

第谷孜孜不倦地工作,逐渐积累了大量证据,从而使旧天文学日益动摇。开普勒历经磨难,后来又在 30 年战争的艰难环境中工作。他终于打破了“正圆形的专制”,发现了行星运行的真正规律。他还阐释了惯性运动的概

念,后来伽利略对此作了精彩的证明。开普勒的才华超群逸伦,但他始终是半个中世纪人。他寻求天体的和谐,将神秘主义与科学融为一体,显现出半新半旧的思想状态。另外,他始终确信几何学是宇宙的基础。(“几何学在创世纪之前就存在,它与上帝的精神同样永恒,它就是上帝本身。”)行星运动三定律以及其他真知灼见都被他的玄思所淹没。如果他把这些发现集中起来,或许就能早于牛顿将近一个世纪发现引力定律。<sup>[1]</sup>人们普遍认为,开普勒的巨大劳动和非凡创造力标志着新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决定性突破,但是这位出身低微的德国人还不能实现对新知识的综合。在他那个时代,也只能如此。

开普勒既有超乎常人的信念,又有超乎常人的精力,正如阿瑟·凯斯特勒所形容的,开普勒是“毕达哥拉斯式的神秘主义与科学的综合体”。虽然他未能完全进入现代科学,但是他克服了重重物质和精神上的困难,抵达了现代科学的门槛。德意志的皇帝要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军费这类更重要的开支上,因此付给开普勒的薪金非常可怜。当时受雇的天文学家主要被当做占星术士使用,因此开普勒通过给名人算命挣钱。他最后在领取薪金的旅途中死去,身上不名一文。由于缺少必要的数学工具,他不得不在计算上耗费巨大的劳动。他从未停止寻找他相信宇宙中肯定存在的和谐与法则。他最大的不幸在于,几乎没有人能够接受他最重要的发现,因为人们无法抛弃把圆周运动视为完美的理想形式的观念。这种观念只能慢慢地向后退缩。开普勒描述的椭圆形运动不那么受看,似乎就像他本人的命运一样尴尬。他在默默无闻中死去,但此后他的声誉不断上升,今天他已经被奉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之一。

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医生、英格兰人威廉·吉伯<sup>[2]</sup>于1600年发表了关于磁体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延续了自中世纪开始的研究),苏格兰数学家约翰·纳皮尔<sup>[3]</sup>发明了一种重要的数学工具(对数)。稍早些时候,英国

---

[1] 行星运动第一定律是,行星的轨道是椭圆形的。第二定律是,行星到太阳的向径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等的面积。第三定律是,行星公转周期(即围绕太阳一圈的时间)的平方等于行星到太阳平均距离的立方。第三定律已经提示了牛顿的引力定律(引力与物体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原注

[2] 威廉·吉伯(William Gilbert, 1544 - 1603年),英国物理学家。

[3] 约翰·纳皮尔(John Napier, 1550 - 1617年),英国数学家。

通过伦纳德·迪吉斯、托马斯·迪吉斯和约翰·迪伊<sup>〔1〕</sup>向哥白尼伸出援手。法国在笛卡儿之前产生了伟大的数学家彼埃尔·费尔马。在德国,纽伦堡可以自称是最早的天文观察重镇,在科学革命中依然地位显要。不过,伽利略在世之时,意大利占据着舞台中心。1610年,伽利略用望远镜所作的观察(这个望远镜不是他发明的,但是经他改进过)及其轰动一时的观察报告,引起欧洲人对托勒密体系崩溃的关注,并且激发起前所未有的普遍兴趣。



伽利略和教士探讨他的科学发现

伽利略的天才和眼光由此主导了科学革命。这位伟大的意大利人并非永远正确,<sup>〔2〕</sup>但是他那激扬的文采和丰富的科学想像力,使他能够让有教养的人完全信服地接受哥白尼的“假说”。他不仅用观测令人信服地动摇了旧的宇宙论,而且还有力地批驳了许多反对地动说的陈词老调,诸如离心力会把地球转成碎片,抛向空中的物体会落在任一不同的点。然后,他凭借卓越的天才探讨人们长期以来讨论的一个问题,发现了落体加速度定律。最关键的是,他实际上已经发现了惯性定律:与原有的表面上的常识观念相反,物体在运动时不必有一个

持续的推动力,一旦动起来,靠自身的动量就能持续运动。

伽利略与教会当局冲突的故事众所周知。在他的晚年,准确地说是1633年,伽利略受到审讯,他被迫放弃自己的观点,随后被软禁在自己的农庄(他在那里没有停止科学著述)。罗马教会的立场有时会让人产生误解:哥白尼学说若是作为纯粹的“假说”而不是作为事实提出来,教会就准备容

〔1〕 伦纳德·迪吉斯(Leonard Digges),于1550年制造了第一架望远镜。

托马斯·迪吉斯(Thomas Digges,1546-1595年),英国数学家,对哥白尼体系作了改进。

约翰·迪伊(John Dee,1527-1608年),英国数学家。

〔2〕 例如,他绝不接受开普勒的行星椭圆形运行轨道的重要定律。他对这位同时代的伟大德国人总是表现出不宽容和嫉妒的态度。——原注



忍它,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sup>〔1〕</sup> 虽然所有的记载都表明,伽利略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无意嘲弄宗教当局,也不想败坏宗教信仰,但是他犹如一个先知那样有力地宣称,《圣经》不应用来做物理学教科书,否则宗教本身会名声扫地。当时,在特伦托会议精神的支配下,教会不可能接受与《圣经》某些段落相悖的哥白尼 - 伽利略宇宙观。新教有时也做出类似的反映。教会蒙昧主义不仅可悲而且也不那么有效,因为无论在天主教国家还是在新教国家,科学革命正在进行之中。意大利的博雷利<sup>〔2〕</sup>和托里拆利,法国的笛卡儿和帕斯卡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例证。这些人接受现行的惯例,即把他们的一些科学成果当做“假说”而不当做事实。笛卡儿生前压着一些成果不予发表。对科学家的迫害,仅仅延迟了科学革命,而不能挫败科学革命。

纵观最近的许多研究成果,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关教会压制科学真理、推行蒙昧主义的传统故事有许多夸大之词。虽然确有其事,但是不像流行的历史书本所说的那样严重。有许多“理性主义神话”必须抛弃。开普勒名义上是路德宗教徒,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天主教国家工作,不仅没有受到滋扰,反而很受尊崇。伽利略与教会的戏剧性冲突乃是由于触及到前面所说的限定,即如果将哥白尼学说当做“假说”提出来,教会不会反对。(哥白尼学说事实上可能也是“假说”,而不是绝对真理。)也有人说伽利略属于那种生性好斗、难以共处的人;恃才傲物的特点在他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耶稣会很快就接受了新天文学,并且对此做出新的贡献。例如,可能是沙伊讷<sup>〔3〕</sup>在因戈尔施塔德(德国城市)首先观察到太阳黑子。(不过,耶稣会愿意支持第谷的学说,而不愿支持哥白尼的学说。第谷认为,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但是行星和太阳都围绕地球旋转。这样的修正既适应了新的观测结果,又维护了旧体系的本质。)当然,那种反对新学说的保守僵化势力肯定存在,但是典型的现象存在于大学和科学院里,其基础就是阿瑟·

---

〔1〕 正如克里斯托弗·希尔指出的,在罗马天主教统治的西班牙,“哥白尼革命很容易地得到认可”,1594年萨拉曼卡大学就讲授哥白尼学说,腓力三世还邀请伽利略到马德里来。——原注

〔2〕 博雷利(Giovanni Alfonso Borelli,1608 - 1679年),意大利生理学家、物理学家。

〔3〕 沙伊讷(Christoph Scheiner,1573 - 1650年),德国人,耶稣会士,因戈尔施塔德大学数学教授。

凯斯特勒所说的那些“维护传统、垄断学术的专业人士……迂腐的学究”。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人反对弗洛伊德、反对现代绘画、反对乔伊斯和劳伦斯的小说,可能也与上述情况相似。反对者并非都是“宗教人士”,也并非都是愚钝之人。各种各样的保守分子以及不能马上适应一种崭新观念的人都会联合起来,相反,有些敏锐的教会人士则会成为先锋派的一部分。保守主义和教权主义很难说成一回事。在伽利略时代,教会势力要更为强大,但是它的基本态度是,避免用自己的权力来限制科学探究。相比之下,低级教士的视野更为褊狭,高级教士的思想开明得多。总之,对伽利略的惩戒十分可悲,但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整个教会对科学的无知和排斥。

伽利略毕生致力于破除反对地动说的种种经典论点。这位意大利人常常被赞誉为最伟大的实验科学家。在科学想像力方面,即在提出假设和设计实验方面,他确实超凡绝伦。(他是否真的做过从比萨斜塔上往下抛掷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的著名实验,是值得怀疑的;这个故事看来完全是张冠李戴。)他认为他的方法是数学方法,而主要不是实验方法。一位研究科学革命的历史学家指出:“现代惯性定律是人类仅凭实验几乎不可能得出的。”柏拉图主义对伽利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伽利略的核心思想或者说信念是:“宇宙是一本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书。”由此我们回到《圣经·约伯记》和柏拉图的著述所阐述的西方传统的古老核心信念:宇宙有一种秩序,事物都依次而来。当然,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伽利略的方法是相当复杂,包括提出假设,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检验假设,依据所得结果提出进一步的假设等等。但是这种方法的基础是一种柏拉图主义信念:大自然的结构可以被人认识,可以用数学公式来揭示。伽利略具有把物理问题“数学化”的能力,也就是说,不仅仅从纯感知角度或动力学角度来设想问题,而且要寻找数学规律。正是这种能力使他有可能做出根本性的发现,诸如惯性运动定律。这实际上是对“经验主义”的突破——伽利略把亚里士多德主义等同于“经验主义”。这条成功之路最终通向了牛顿。

## 科学革命的继续

总而言之,伽利略的天才实验冲击了欧洲人的想像。他的雄辩文风、他在1633年与教廷的冲突都促成了他的声誉:他被视为在人类构想世界的历史上的新时代先驱。像他那样把强大的理智能力与大胆的想像力集

于一身的人极其罕见。就在这个时候,布鲁诺于 1600 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科学事业产生了一名烈士。布鲁诺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和宗教异端分子,并非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不过,在中世纪与现代之交的晦暗微明时期,许多重要人物都是把真正的科学天才与幻想、神秘哲学或秘术集于一身,例如库萨的尼古拉斯、医生帕拉切尔苏斯<sup>[1]</sup>。第谷和开普勒也是如此。)精力旺盛的布鲁诺提出了许多标新立异的思想,其中最离经叛道的是多个世界论。当我们知道地球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即不再像以前所说的那样是惟一拥有重量的实体时,也就可以想像可能存在着许多地球、许多人类以及许多基督。像梅内尔夫人<sup>[2]</sup>这样的现代基督徒会觉得不难想像这些星辰展示了千百种上帝。

但是 16 世纪绝大多数基督徒却难以想像。甚至才华横溢的帕斯卡也承认,新宇宙的空空荡荡令他感到害怕;他的意思不仅是说宇宙空前地扩大了,而且是说旧的宇宙观认为没有“虚空”。宇宙是充实的,里面没有空隙或空间。简单地说,宇宙论革命包含着人的整个观念的重大变化。思想史学家对“世界观”这个东西比对严格的科学问题更感兴趣和更为关注。他们会把科学问题留给科学家来考虑。人们经常说,“就思想视野而言,现代世界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伯特兰·罗素);17 世纪科学造成的思想视野的变化“使基督教兴起以来的一切都黯然失色”(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上千年来支持着人们理性意识的那种现实观念正在消退”,新的现实观念正在取而代之(梅里克·卡雷)。

要想描述这一巨大变化,就要全面扫描 17 世纪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如培根、笛卡儿、伽桑狄和霍布斯。这是下一节的内容。这里我们只能概括地描述伽利略之后,17 世纪中叶科学革命继续展开的进程。

为了继续伽利略所开创的伟大事业,非常有必要发展数学这种“大自然的语言”。伽利略的方法局限于几何学。下一步是把代数学应用于物理学;伽利略的嫡传弟子卡瓦列里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但是主要的进展是由法国的费尔马和伟大的笛卡儿取得的。用代数符号表示几何关系,是科学方法的一项重大成就。由此发展下去,经由帕斯卡,最后由牛顿和莱布尼兹创立微积分。

---

[1] 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 1493 - 1541 年),瑞士医生、药理学家。

[2] 梅内尔夫人(Alice Meyneil, 1847 - 1922 年),英国诗人。



托里拆利

同时,伽利略的另一个学生托里拆利于 1643 年进行了大气压的实验,吸引了欧洲所有渴求知识的年轻科学家的兴趣。实验结果在法国由梅森神父<sup>〔1〕</sup>

公布。(梅森所在的修道院是当时科学运动的一个中心——这是教会并不总是科学之敌的另一个证明。)接下来,托里拆利的实验被杰出的帕斯卡用一系列经典实验加以完善。帕斯卡爬到山上,观察气压计的水银柱是否随着空气比重的减轻而下降。结果,帕斯卡推进了气体力学,实验方法这一次取得胜利,亚里士多德主义再次遭到失败。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个重要教条是:真空是不可能的。但是,帕斯卡证明,真空确实存在!气泵实验在 17 世纪的情况就像电力实验在 18 世纪一样,是业余科学家最爱在社交聚会或在公共场合向目瞪口呆的观众演示的实验。

英国实验家罗伯特·波义耳发现了气体因压力和温度变化而膨胀的定律。始于中世纪的光学实验在 17 世纪特别盛行,伟大的笛卡儿和牛顿完善了光的折射色谱分析。如何解释光的这种现象,成为一个重要科学问题,引起了热烈争论。

由于有了更好的显微镜和更精细的观测技术,科学家也能够对生物进行更仔细的研究。虽然公认的“生物学时代”还有待时日,但此时已经有了一些重大发现。威廉·哈维<sup>〔2〕</sup>的成就十分突出。他是伟大的意大利实验解剖学家维萨里的私淑弟子,正如他的英国同胞霍布斯所说,正是他第一次使“人体科学”引起世人注意。其实,哈维的成就不过是正确地描述了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的机能,但这足以赢得普遍的激赏,恢复了人们对解剖学的强烈兴趣。笛卡儿用他的权威来支持这样一种机械观念:动物和人的

〔1〕 梅森(Marin Mersenne, 1588 - 1648 年),法国数学家、医生、音乐理论家、神学家。

〔2〕 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 - 1657 年),英国医生、生理学家。

身体不过是机器而已。这种做法是把有机现象强行纳入物理学体系,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因为这毕竟涉及两个不同的领域。然而,新的观念刺激了研究工作并提供了新的见识。另一个引起轰动的发现是荷兰观察者看到了微生物。由此,人们可以通过显微镜获得有关生物体的大量新知识。

到 17 世纪 60 年代,伟大的科学学会的时代到来了: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先后成立。此前,科学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国王对科学家个人的资助——第谷领取丹麦国王的津贴,开普勒由德意志皇帝资助;或者靠某些科学“爱好者”、赞助者的活动,如梅森神父或英国的亨利·奥尔登伯格<sup>〔1〕</sup>。科学研究变成越来越有组织,越来越同步,从而使人们能够获得比以往多得多的知识资源。待到牛



威廉·哈维

顿出现之时,科学资料和数学方法已经积累到足以使他又可能完成一个大综合了。进行这种综合需要有他那种旷世奇才,但是在 1687 年以前即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力不所逮。

一般说来,到牛顿出现之时,许多激动人心的科学前沿成果产生了既令人不安又发人深省的影响。谁也不知道这些成果会产生什么结果,或者说它们如何组合在一起。人们只知道,自古以来基本不变的宇宙观再也不能让人们信服了:

太阳失落了,大地失落了,人类的智慧  
不能告诉人类到哪里寻觅。

约翰·多恩<sup>〔2〕</sup>

〔1〕 奥尔登伯格(Henry Oldenburg, 1615 - 1677 年),德国人,英国皇家学会首任秘书,皇家学会学报创始人。

〔2〕 多恩(John Donne, 1572 - 1631 年),英国诗人,散文作家。

## 新世界观

我们前面提到的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都不是哲学家。但是他们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哲学后果。他们推翻了中世纪的宇宙论以及大部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同时，他们往往蔑视亚里士多德用“目的因”、目的、目的论所作的解释。目的论在17世纪备受批评。弗兰西斯·培根指出，它就像献身上帝的处女，让人赏心悦目，但不会生育。在莫里哀<sup>〔1〕</sup>的一部戏剧里，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学者遭到嘲笑，因为他煞有介事地解释说，鸦片之所以让人睡觉是因为它有催眠性质。在莫里哀那个时代，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也是废话一句。解释的方式在发生变化。亚里士多德学说曾经让多数人信服，但是科学革命时代的培根和伽利略们已经弃之如敝屣。必须放弃寻找终极原因的努力，否则一事无成。不要去想什么终极目的，只需对观测所得进行分类和计量，虽然不再雄心勃勃，却会更有收获。终极目的是不可知的，只要细心研究实际原因，就能获得征服大自然的力量。

遭到批评的还有亚里士多德学说中万物统一的观念。伽利略致力于用数学、量化方式来处理物理世界，因此他主张区分物体的基本性质（第一性质）和次要性质（第二性质）。只有前者可以被视为是实在的，或者说在科学上是有意义的，后者则都可以归结为前者。基本性质是指大小、形状、运动、体积和数量等这些可度量的性质。物理性质应该被简化成可以确切计算的力学命题。应该排除一切泛灵论的表征，即那些似乎表现灵魂、生命或意志的东西。今天，我们觉得物理世界当然是这样毫无生机的；由此可见，17世纪的思想对于西方世界的渗透是如此彻底。（最近有哲学家再次提出所谓的“泛心理主义”，但是这种哲学很少被广泛接受。）把水或岩石说成有某种程度的生命，会使我们感到奇怪。不过，亚里士多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如此。他教导说，万物都是质料和形式的结合体，都被连接在伟大的“存在之链”中，这个链条是从最底层、最惰性的物质一直延伸到顶端最纯粹的天使本质。（这个观念以及所吸纳的一些新柏拉图主义因素，至少在中世纪是被广泛接受的。）笛卡儿哲学提出物质（延展的物质）和精神

---

〔1〕 莫里哀(Moliere, 1622 - 1673年), 法国剧作家。

或灵魂(思维的物质)鲜明区分的二元论,从而与亚里士多德学派发生冲突。后者把灵魂视为肉体的形式,与肉体不可分割,灵与肉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新观念则与之相反。基本性质与次要性质,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等等与新观念十分契合。还应该指出,具有等级性质或主张“存在之链”的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让位给了一个新的宇宙体系:万物都具有相似的性质,都服从于同样的法则,仅有数量上的差异。

机械的世界图像取代了有机的世界图像。“世界是一个整体,所有的动物躯体都是其中一部分,世界整体是有生命的。”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一个著名柏拉图主义者的说法,也是古希腊哲学家的典型观念,无论他属于柏拉图学派,还是亚里士多德学派或是斯多葛学派。实际上,我们已经学会了把世界基本上看成一部机器——至少在牛顿之后两个世纪以来在受过教育的人中间,很少有人不把世界视为一个由运动中的物体组成的动力系统。或许这是因为古代哲学家对机器没有多少体验,所以他们倾向于用生命体的比喻来想像宇宙。这种看法所产生的一个让现代人感到惊异的观念是,人与宇宙、小宇宙与大宇宙之间有一种感应或亲和关系。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正如他的戏剧所表现的,人们认为天上的乌云和雷鸣预示着人间的某种坏事。这并不完全是无端的迷信,而是从强调万物联系的哲学所能得出的推论。文艺复兴时期,博学之士认真地寻找点金石,试用各种魔法,因为在他们看来,大自然充满了各种奇异的潜力,通过某种办法没准能把这些潜力发掘出来。

但是,17 世纪的科学和哲学把人与物理世界隔离开,把世界看成机器,把人看成与之不同的东西——把大自然与精神分开,这在西方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正如怀特海指出的,大自然变成了“阴暗沉闷的状态……只有无休止、无意义的物质骚动”——“坚硬、寒冷、没有色彩、没有声音、一片死寂”。人们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根据物体的目的来理解星星、石头、彩虹,也不必把人的灵魂与这些东西所谓潜藏着的灵魂扯到一起。但是,物理世界具有可度量的关系,人们可以发现这些关系。只要把握住物理世界的规律,就能使它为人类服务。一些敏锐的批评家认为,旧宇宙观在许多方面能够让人获得更多的心理满足,而新宇宙观则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和疏远,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帕斯卡正是对这一点感到恐惧,因而回归了宗教。但是,许多人不是采取这种态度。在伽利略之后,谁也不可能恢复旧的宇宙观了;像伟大的笛卡儿这样的哲学家开始推演新的宇

宙观。

人们司空见惯的“世界图像”(海德格尔的术语。——译注)确实是在发生巨大变化。蒂利亚德教授在论述莎士比亚时代时指出:“上帝把又热又潮的空气放在又热又干的火与又冷又潮的水之间,旨在制止它们的战争;天使显形于以太之气,魔鬼显形于尘世浊气。”这类观念在今天的人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我们在这些观念里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化学理论的影子。这种理论直到18世纪末才被完全取而代之。但是,此时科学界对目的论解释以及天使和魔鬼显形已经不屑一顾了(尽管牛顿在炼金术上投入了许多时间,17世纪还有一些科学家依然迷恋巫术)。一种思想结构的完全消亡和另一种思想结构的取而代之,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但是在17世纪这个过程正在发生。

这里再概括一下上面所谈的要点:人们将学会把自然界看做由惰性物质按照力学关系组合而成的,而不是与生物类似的巨大有机体。人们将把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截然分开,这种二元论与亚里士多德的一元论形成强烈的反差;后者认为,所有的物体都有同样的基本心理特征,只是有程度差异。人们将不再寻找物体的不可捉摸的“本质”,而是去关注可观测的属性。人们也将把中世纪人的“封闭世界”极大地拓展为“无限的宇宙”,而且两种宇宙还有一个差异:前者是完全充实的,后者则充满了广阔的虚无空间。如人们常说的,科学革命产生一种十分重要的心理后果:从“把世界看成一个有限的、封闭的、等级森严的整体”转变为“一个由于有相同的基本要素和法则而结合在一起的、不确定的、甚至无限的宇宙”(A.科伊利)。〔1〕在旧秩序下,人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人们或许再也感觉不到与大自然的那种血脉相连的亲近感了,但是新的知识给人类带来了支配力量。

将来人们很难毫无疑问地认定,伽利略-笛卡儿-牛顿的新观念就是对的,旧观念就是错的。我们现在知道,宇宙其实不像一台机器;17世纪和18世纪人们形成的宇宙图像一直流传到我们的时代,而且被大多数人潜意识地视为理所当然(在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的时代,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已经

---

〔1〕但是,正如R.G.科林伍德指出的,变化主要不是在数量方面,而是在性质方面——不仅宇宙变大了,而且地球的位置也变了,使得宇宙丧失了有机性质。——原注



不这样看了),但是这种宇宙图像是一种人为的设想,是一系列思想建构,不一定符合客观现实。不过,它可能是很有用的工具。它确实确实是极其有用的工具。有人甚至说,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有益的谬误。

## 弗兰西斯·培根

培根属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权贵之列,可谓阅历丰富、见识过人。他大胆抨击传统的思想流派,号召在知识领域实行变革,主张建立新术语、新方法、新机构和新教育。<sup>〔1〕</sup>他文笔犀利,佳句连篇。实际上,培根著名的《新工具》(1620年)一书几乎满篇警句格言。培根最醒目的警句是:“抛开种种观念,从头了解事物”;实践出新知;把公认的看法束之高阁;重新考察所用的术语;观察、实验重于一切。他对古人大加贬斥。他说,古希腊人没有给我们留下哪怕一个有用的实验。这个刚愎自用的英国人有时显得过于“务实”,对于文人的任何空话都不能容忍。但他也错误地嘲笑伽利略:他在判断科学问题时十分容易出错。虽然他自己不是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他对观察知识的热情是真诚的。在热烈提倡实验时,他不能理解数学分析的重要性。不过,他写的东西总是既有刺激性又往往犀利深刻,因此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培根被誉为“现代亚里士多德”、“大自然的秘书”(后一个头衔也被赋予同时代的法国人笛卡儿)。在17世纪的英国,人们引用他的著作超过其他所有哲学家的著作。他也蜚声国外。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以及英国出现的科学复兴(产生了波



培 根

〔1〕 培根的同胞、伊丽莎白时期的沃尔特·罗利勋爵,也对传统学术进行大胆抨击。1656年,弗兰西斯·奥斯本认为他是“第一个冒险转动风帆,改变航向,偏离经院学派的老路”。——原注

义耳和牛顿),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培根的开创性启示。英国人后来也倾向于把他们在科学和工业方面的领先地位归功于培根勋爵这位“归纳科学之父”。

尽管培根有种种缺点而且反复无常,但是他一贯坚持的怀疑主义(在任何事情上绝不唯权威是从,对一切公认的观念提出质疑)是积极健康的,犹如一阵清风吹扫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枯叶败絮。他不仅敲打神学家和经院学者,并相当粗暴地警告神学家不要插手科学问题,而且抨击人文主义者,因为后者仅仅专注于文艺风格,使他感到愤怒。17世纪,甚至在科学界依然有人迷恋巫术和占星术,培根对此不能容忍。我们感到我们与培根一起进入了新时代。但是,他未能完全成功地界定新时代的方法。在英国,培根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讥讽纯粹的理论家,却往往导致无方向的经验主义陷入混乱;霍布斯后来写道,“药剂师、园艺师、狂热者和补锅匠”都在皇家学会里漫无目的地进行实验。与笛卡儿相比,培根的思想不那么系统,因此笛卡儿的名声总是比他大;与这位法国人相比,他也不算上是科学家。最重要的是,由于他对数学比较忽视,他就错过了时代的主题。虽然他意识到粗鄙的经验主义的某些危险,但是他还是应该受到批评,因为他没有注意到,我们仅仅积累事实,用表格把它们排列起来,那是不可能得出多少东西的;我们必须首先提出问题,构想出一个假设,然后用事实来检验它。不过,在长时间受困于玄思的沙漠之后,也不妨潜入事实的海洋中浸泡一会儿。在后一种情况下,培根的建议也许是一种很好的策略。

在培根的论著中,最脍炙人口的段落是《新工具》中关于人们常犯的错误或谬见的论述。这段文字试图对难以界定却极为诱人的谬误加以分类。培根说,人类有四种谬见(假相),即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种族假相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共有的,培根发现人太容易迷恋某一教条。我们不妨把这称作常见的难以控制的谬误,即不愿保持开放头脑的错误。洞穴假相涉及的是个人特质;这种假相使人过分强调个人眼界和经验的重要性;个人应该超越自己的偏见。培根对市场假相的论述特别有意思,因为这正是他最喜爱谈论的语言问题。他认为,人们一直是最近称作“标签癖”的受害者;人们给事物贴上一个名字,然后就被自己制定的概念所误导。这就是标签假相,或者说是未经检查的词汇所导致的假相。剧场假相其实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制造体系的假相:理论家用很少的东西编织出很大的网,然后使信奉者陷入这些表面有理、其实虚构的体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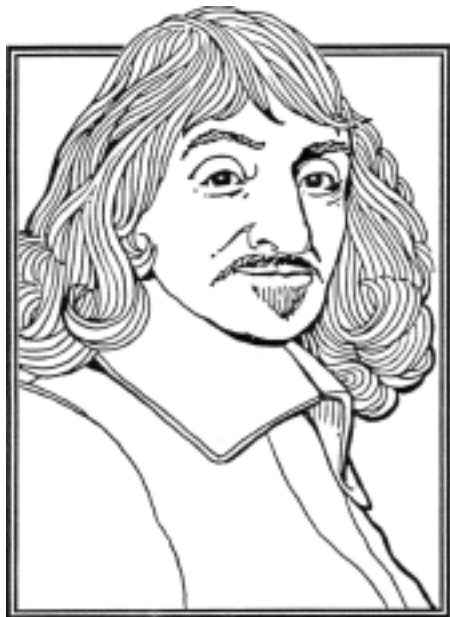
培根的假相论至今仍然能使我们摆脱大部分常见的思维错误。它能打倒一大片轻浮的记者、狂热的理论家、草率的思想家（以及胡写考试论文的学生）。或许它不能作为严格的科学方法，然而在日常生活和政治中作为清晰思维的基本指南可能更有实用价值。假相论显示了培根不盲从、敢怀疑的基本思想特征。他坚决要我们扫除过去的“假相”，重新检验一切——语言、体系、教条。至此，我们可以说，在欧洲历史的这一特定时刻，没有比这更中肯的忠告了。

整个 17 世纪的科学复兴可以看做是实验者和数学家之间的争论，双方各有长短，直到最后牛顿出来表明，二者的恰当结合能够产生出最佳结果。无目的的实验可能一无所获；自然科学和化学都有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在实验热情方面无人能与炼金术士相比。深受培根主义影响的英国皇家学会常常受到霍布斯嘲笑。但正是由于这种瞎忙活，才有了罗伯特·波义耳的气体膨胀定律。没有实验，是不可能发现这个定律的。托里拆利和帕斯卡对大气压的令人振奋的发现，是实验的另一个胜利。这一发现推翻了重要的亚里士多德原理：大自然憎恶真空，从而居高临下地修改了理论。

在另一阵营中，笛卡儿的纯粹数学演绎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伽利略的方法）在这个世纪取得了许多轰动一时的突破，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但是，当人们发现这个伟大的法国人的科学错误不少于他的成就时，他的方法论最终也声名扫地。我们下面将讨论这位卓越的法国人，他对 17 世纪科学发展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培根。他们两人分别代表了表面上对立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其实这两派不可能是泾渭分明的。也就是说，培根派并没有完全抛弃理论，笛卡儿派也没有完全抛弃观察和实验。但是，培根不是数学家，他所提倡的是：广泛开展事实研究，用表格来排列所获得的结果，比较它们的异同，通过这种归纳的方法就能够达到对大自然属性的真正理解。他意识到，基于事实而提出的假设乃是推进实验的一个有用工具。他与笛卡儿一样嘲笑经院哲学的终极原因，主张把自然现象归结为数量和力学现象（“物质和运动”），关心支配大自然的力量——关注实际结果而不是思辨智慧。与笛卡儿一样，他希望把科学与形而上学分开。总之，这两位 17 世纪伟大的“大自然的秘书”既有重大的分歧，也有许多重大的相似之点。

## 勒内·笛卡儿

笛卡儿出生于法国的都兰,受业于拉弗莱什城著名的耶稣会学校。虽然他一直尊重其博学的老师,但是与培根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人一样,他对传统知识感到不满意。只有数学对他的胃口,因为数学似乎显示了其他学科所缺乏的确定性。三十年战争(1618 - 1648年)期间,他曾在军中服役。据他自己后来的描述,1619年11月10日夜里,他突然受到一种启示,给他指示了致力于重建科学的人生道路。直到17世纪30年代,他才完成并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结果,立即引起轰动。伽利略受审事件使笛卡儿搁置了《世界体系》一书的出版计划。但是,1637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方法谈》(全名《谈在各门学问中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寻求真理的方法》)。接下来发表的著述有《第一哲学沉思集》(1641年)、《哲学原理》(1644年)。他于1650年在访问瑞典时去世,年仅54岁。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的天体力学体系完整地呈现于世,赢得广泛的声誉,直到牛顿给了它致命一击。笛卡儿身为伟大的数学家,其公认的成就首先是做出了坐标几何学或称解析几何学这一重大发现,再就是推进了光学的发展(发现折射定律)。但是,他的方法论和哲学更引人瞩目。笛卡儿主义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自然科学。在这三个方面,它都深刻地影响了17世纪乃至整个现代的思想。



笛卡儿

在17世纪中期的欧洲,笛卡儿哲学已经如日在中天。笛卡儿似乎是新科学最完美的哲学家。与伽利略不同,他是体系完整的哲学家;与培根不同,他不是业余爱好者,而是真正的科学家。此外,他的文字才能也非同一般,虽不敢说与伽利略和培根相提并论,却也成鼎足之势。这三人与迂腐偏执、轻视语言技巧的经院学者形成鲜明反差。如果说培根喜欢漫谈,笛卡儿则拥有后来长期成为法国思想标志的那种明晰;虽然有人说这种风格是笛卡儿开创的(他的直接前辈拉柏雷、博丹和蒙田的文章谈不上很有条理),但是它可能是巴黎经院

哲学的一份遗产。笛卡儿在耶稣会接受了全面的教育,而且确实广泛深入地钻研过经典著作。但是,他与培根一样,公开与过去决裂,宣告一种新的方法。

笛卡儿的重力和宇宙旋涡运动理论最终被牛顿的理论所取代,这使笛卡儿作为科学家的名声有些受损,但是没有人能剥夺他在科学上的一系列荣誉。其实在笛卡儿生前,帕斯卡就曾发现他的实验和观测中的一些缺点。笛卡儿作为哲学家的情况也同样如此。18 世纪的启蒙运动转向约翰·洛克指引的方向,却依然把笛卡儿奉为伟大的先驱者。他被公认为现代最有影响的三、四位思想家之一,这种历史地位始终不可动摇。

“笛卡儿的梦想”,准确地说是 1619 年(11 月 10 日他做)的三个梦,是建构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科学”、科学的科学,即基本的方法论。确定一个新的起点,从不证自明的第一原理出发,运用不可推翻的逻辑推演——这种新方法将是无懈可击的。这就意味着,它必须是数学方法,因为笛卡儿一直确信,其他知识都不具有确定性。他沉迷于几何学之中。“几何学家运用这些长长的其实很简单容易的推理链条,做出很艰深的证明。这引发了我的想像:所有进入人们认知范围的事物都能够借助同样的方式非常恰当地相互联系起来。”只要确保起点正确,把问题分解成最简单的要素,按部就班地进行推理,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呢?只要推理程序正确,一切迎刃而解。培根也有类似的见解,他曾说过,不要跳跃太快,必须沿着真理的阶梯一步一步攀登。培根和笛卡儿的差异在于,笛卡儿致力于宏大的体系建构,重视数学,相对忽视实验;笛卡儿曾经暗示,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起点,接下来几何学就可以带着我们完成旅程。

笛卡儿赞成这位英国同道(他读过培根的著作)的观点:要以“系统怀疑”为起点,不要轻信任何东西,除非是绝对自明的东西。他赞成伽利略和开普勒的信念:数学是宇宙的语言——与伽利略和开普勒相比,他的这种信念没有那么强烈的柏拉图式神秘主义,但是更坚决更专断。笛卡儿确信,逻辑,尤其是几何学那种从公理出发的推理,只要正确运用,就是绝对可靠的工具;这种逻辑可以应用于大自然,从自明的定理推演出物理定律。他对自己所发现的解析几何学或坐标几何学感到特别惊讶,因为这一发现显示了代数和几何、即数字领域和空间领域之间存在着严密的联系。这种体验类似于毕达哥拉斯惊讶地发现音符竟然显示出一种数学对称性——由此开启了柏拉图思想流派。笛卡儿的一个更重要的思想是解析,即为了

把一个问题简化成便于理性处理的要素,我们应该把它分解开来——毫无疑问这是他所擅长的光学给他的提示。我们在对问题逐一解决之后,就可以把这些片断重新组合成完整的答案。

笛卡儿把所有的物体分成广延类和思维类两种。自然物质被等同于“广延”。他断言,物体的基本性质不是硬度、重量、颜色等等,而是长度、宽度和深度,即“广延”。前面那些性质是伽利略所说的“次要性质”,后来被洛克说成是主观性质;“基本性质”是可度量的性质。这种二元论使笛卡儿声名卓著。笛卡儿的二元论是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区分,用他的术语说,是对广延物体与思维物体的区分。为了对付物质世界,笛卡儿把它说成是机械的、严格受规律支配的世界;他将亚里士多德生机论的最后一点残余从这个世界清除出去。一切物质,包括生物的身体在内,都受到这个物质定律领域的严格支配。与这个领域相对,人的认知心灵加入另外一个领域,心灵或精神的领域。为了使之“符合科学”,笛卡儿不得不让自然界变得毫无生气;他甚至提出一个有争议的著名命题:动物没有灵魂,没有情感,不过是一些机器。他的二元论引发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我们由此必须假定,人的身体与人的心灵只有一种偶然的关系,没有其他关系。灵—肉之间的关系迄今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但是这种“机器中的鬼魂”图像一直受到现代人的严厉批评。不管怎么说,笛卡儿把物质世界说成一台完美的机器,它极其井然有序,因而可以用严格的定律来解释。

没有理由认为笛卡儿会认可他的一些门徒从他那里引申出来的唯物主义。如果广延物体存在于一个独立领域,那么思维物体也会存在于另一个独立领域,后者对于笛卡儿的体系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他的著名的确定性起点就是我们本能地认识到我们正在思考着的自我本身,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可能有任何怀疑。“我思故我在。”从这个所谓的确定性出发,笛卡儿推导出上帝的存在。他的论证让人想起中世纪安瑟姆和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这种证明方式遭到奥卡姆的否定,后来康德也予以批驳。但是,当时绝对有必要肯定上帝的存在,以此作为存在着一个合理的世界秩序的证据。笛卡儿指出,即便我存在,即便我有着明晰的思想,这些思想也可能是错误的;这种“过分怀疑”法使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即一个邪恶的上帝会赋予我这样一种让我很容易上当的天性。因此,有必要证明确实存在着一个完美、仁慈的上帝,而我不可能根据外部事物来证明这一点(怀疑方法禁止这种证明;外部事物可能是错觉),只有从我的存在出

发来证明。笛卡儿的论证是,我对完美和无限有清晰明确的观念,这种观念不可能从我的存在中产生,因此只能来自上帝;我不可能从我自身引申出我的存在,否则我就是完美的化身了。

从我的存在和思考到上帝的存在,再回到客观自然界的确定性——“我思故我在”引发出来的这一连串论证似乎陷入了循环论证,使许多人不能信服。我们被告知,即便是一个清晰的观念也不足为凭,因为魔鬼可能在我们脑子里做了手脚,但是一个关于完美的清晰观念就可以当做上帝的证明。实际上,相信上帝存在的惟一理由是,上帝存在着,我有关于上帝的清晰明确的观念。但是我有清晰明确的观念的惟一理由是,上帝存在着。这里所说的至少是笛卡儿关于上帝存在的一个论证;对于这些论证,人们很容易做出有力的批驳。但是历史学家所看到的是,笛卡儿极其渴望把他的科学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与哥白尼和伽利略一样,他在寻找确定性,而不是可能性。他觉得,绝对需要有一个上帝来作为秩序的保障者,作为一个本原,以确保我们的科学不仅仅是我们建构的一组任意的符号,而且确实是大自然的语言,使我们能够借助它来窥见大自然的秘密。

笛卡儿的宇宙体系也需要上帝充当原动力。但仅仅如此而已,因为这个宇宙机器从此就自动运转了。因为大自然憎恶真空,所以在上帝推动了第一个粒子之后,粒子就一个推动一个,形成了循环流。这样散布在整个空间中的许多旋涡很复杂地组合在一起,足以解释一切运动,上帝仅仅作为原动力而不可或缺。笛卡儿在他的体系中没有留下虚无的空间,他不喜欢宇宙中有虚空或真空,就此而言,他更接近于旧物理学而非新物理学。但是他那个独具匠心的体系对天体运动提供了一个机械解释。他在这里误入歧途。正确的路线是牛顿对引力定律的探寻。而且这位英国的天才很快就证明,即便是按照笛卡儿的理论往下推导,用笛卡儿的旋涡也无法解释已经观测到的运动。但是,笛卡儿的体系还是红极一时。尽管它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是即便在英国,由牛顿学说取而代之,也还是需要一些时日。在法国,甚至在 1687 年之后很长时间它还依然独领风骚。

笛卡儿所犯的错误还有一些。在否定动物具有敏感性之后,或许最著名的错误是,他确信灵魂(更确切地说是灵与肉的接触点)藏在松果腺里。实际上,他认为,可以从第一原理推导出一套完整的先验医学!很显然,演绎法也会走火入魔。但是,在笛卡儿的惯性理论的透彻解析以及他所钟爱的光学研究中,演绎法发挥得精彩绝伦。我们可以断言,他想建立一种放

之四海皆准的科学方法,只是一个幻觉;没有什么魔法钥匙能够打开所有的科学大门。但是,与培根一样,他给所有的思想一种激励。他的自信的理性主义基调唤醒了欧洲,把17世纪变成了一个“理性时代”。这位非学院派哲学家文采飞扬,佳作连篇,产生很好的宣传效果。笛卡儿着意为一般读者写作。甚至有人建议,应该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他的哲学。也许最意味深长的是,17和18世纪左右潮流的思想家不是像过去那样出自大学,例如培根、笛卡儿、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

笛卡儿把自然界说成一台机器,把人说成能够掌握机器原理的理性人。他成为17世纪“理性主义”的主要先知。他确信,所有的人都拥有领悟某些事物的先天的自然能力,例如领悟“一些事物与同一事物相等同,它们也彼此等同”(即 $A = C, B = C$ ,那么 $A = B$ )的命题。我们会回想起苏格拉底和小奴隶的故事:即便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头脑也能理解逻辑命题。<sup>〔1〕</sup>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个清晰而明确的思想,它很可能是这些先验真理中的一个,即不是从经验习得的真理。因此我们就能够从头来反思哲学,只要我们使用正确的方法;我们的头脑有这种能力。到这个世纪末,洛克的经验主义抨击笛卡儿的“先天观念”<sup>〔2〕</sup>,但实际上保留他的大部分理性主义。笛卡儿选择了理性世界,他使其后两个世纪在很大程度上跟着他走。他是理性时代的真正奠基者。

## 17 世纪的其他哲学家

笛卡儿无疑是对17世纪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他身后留下一系列的论争风波。门徒、敌人、修正者层出不穷。1633年,他的著作被教会列入禁书目录,尤其是遭到耶稣会的极力反对。但是有些教团对他的著作颇有共鸣,奥拉托利会和詹森派尤其支持一种修正了的笛卡儿主义。这些教团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保留了奥古斯丁-柏拉图主义传统。那种传统所主张

---

〔1〕 苏格拉底向一个小奴隶问几何学问题,这个小奴隶的回答表明他有这种知识,尽管他自己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见柏拉图:《美诺篇》。

〔2〕 严格地说,笛卡儿并不相信“先天观念”,即头脑中的某种内容,而是相信人固有一种思维能力,即无须学习或从经验中寻找就能认识某些事物的能力。就此而言,他似乎是正确的,但是他把这种信念推到极端:心灵本能地看到的一切“清晰明确的观念”都应该是真理。——原注



的理念——物质二元论与笛卡儿的二元论颇为相似。奥拉托利会神父马勒伯朗士<sup>〔1〕</sup>就是某种修正过的笛卡儿主义的最著名的支持者。实际上,马勒伯朗士的哲学可以被视为笛卡儿主义与奥古斯丁主义的新综合,是把基督教与笛卡儿主义调和在一起的新经院哲学,正如阿奎那曾经把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调和在一起。

马勒伯朗士神父希望创造出一种不伤害基督教传统的新的科学哲学;怀有这种愿望的人不止他一个。英国有一个剑桥柏拉图派就致力于调解科学与宗教,该派成员有亨利·摩尔、拉尔夫·卡德沃思、本杰明·惠奇科特<sup>〔2〕</sup>然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精神的,上帝赋予人类心灵一盏理性神灯,因此探索大自然就是在完成一项虔诚的工作。约翰·雷<sup>〔3〕</sup>在《造物中彰显的上帝智慧》中表明了他们的观念。这个剑桥群体在英国促成了一种舆论,让人们觉得宗教和科学是亲密的伙伴。他们的名声远播海外,例如莱布尼兹这位重要的欧陆思想家就很尊重他们。另外,伟大的英国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曾主持一系列反对无神论的著名讲演,第一讲由他本人开讲;牛顿也陷入这种科学有神论的模式。人们完全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英国有一个“祭坛与实验室的联盟”。

但是,也正是在英国出现了科学哲学中最激进的异端——勇猛的托马斯·霍布斯。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或许只有同样离经叛道的巴鲁赫(本尼狄克特)·斯宾诺莎。后者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以磨镜片为生的犹太人。霍布斯自称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把精神简化成“头脑的运动”,从而抛弃了笛卡儿的不伦不类的二元论。霍布斯深受笛卡儿的影响,接受几何学推理方法,同时他也深受他的法国朋友彼埃尔·伽桑狄的影响,后者恢复了古代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笛卡儿不是原子论者,而且还否认有真空存在;在他心目中的世界里,没有“虚空”,而是充满了互相碰撞的微粒。伽桑狄则认为,世界是由“原子与虚空”构成的,原子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合,形成我们所知道的物体。这种观点听起来比笛卡儿的微粒充满论更现代一些。

关于霍布斯的政治学巨著《利维坦》(1651年),容后再谈。霍布斯是一

---

〔1〕 马勒伯朗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 1638 - 1715年)法国哲学家。

〔2〕 亨利·摩尔(Henry More, 1614 - 1687年),拉尔夫·卡德沃思(Ralph Cudworth, 1617 - 1688年),本杰明·惠奇科特(Benjamin Whichcote, 1609 - 1683年)。

〔3〕 约翰·雷(John Ray, 1627 - 1705年),英国博物学家。

个性情中人,一个攻击型激进分子。他被视为无神论者,尽管他否认这一点,但这也许是真的。他曾经说上帝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精神”(根据霍布斯观点,如果有神的话,神应该以物质形态存在;这也是古代伊壁鸠鲁学派观点)。他否定自由意志,因而把新科学哲学中的决定论因素推到了前台。作为一名科学家,霍布斯没有什么名气。在与剑桥教授约翰·沃利斯辩论时,他自称有数学才能,结果遭到痛击。他主要是作为政治理论家而著名。但是他的无神论唯物主义引起了正统派的公愤,实际上几乎引起当时所有人的公愤。

因此,左翼笛卡儿主义能够导致严重的颠覆倾向。马勒伯朗士努力把笛卡儿主义变得受人尊重,却遭到人们的怀疑,原因在于斯宾诺莎让笛卡儿主义显出无神论面孔,从而使笛卡儿主义声名狼藉。斯宾诺莎这位伟大的犹太哲学家于1677年过早地去世了。他因离经叛道而被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公会革除教籍。(从此他就放弃了他的犹太名字巴鲁赫。)他坚信清晰明确的观念不可能错,因为宇宙是理性的,人是它的一部分;他关心的是动力因而不是目的因;他探索单一的科学方法。就这些而言,他是笛卡儿主义者。但是,与霍布斯一样,他抛弃笛卡儿的二元论,转而采纳一元论:万物都是由同样的物质构成。他注意到笛卡儿陷入循环论证,指出这个法国人实际上是以上帝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他自己的存在为出发点。而人自身的存在正是斯宾诺莎的出发点,也是他的落脚点。万物所包含的单一物质,他称作上帝,并且把上帝等同于自然界。他不加掩饰地追问,如果上帝是无限的,他怎么可能是超验的,即脱离这个世界的?

这种“泛神论”类似于古代的斯多葛主义;泛神论信条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东山再起,殉难的布鲁诺就遭到这种指控。现在,它又尾随着笛卡儿卷土重来。斯宾诺莎把它与一种新的科学机械论结合起来。斯宾诺莎认为,其他的精神和实体都不过是单一神圣物质的存在形式。这种泛神论观念使他必然会确认一个决定论的宇宙:自由意志不过是我们的有限知觉所产生的一种幻觉。我们可以这样说,脚指头在晃动时会想像自己有自由意志。但是我们知道,大脑乃至整个有机体在控制它。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是如此,实际上是出自于上帝的思想,是那个包罗万象的伟大有机体的一部分。如果万物归一,任何形式或部件都不可能有自身的自由。决定论是斯宾诺莎的核心观念。这一点十分契合新科学,因为它没有给“终极因”留下任何余地。因为一切都必须如此,所以除了严格地描述它们的实际运转

外,不必寻求进一步的解释。

但是,斯宾诺莎对伦理学的兴趣大于物理学。他的伦理学体系的含义引起了很多争论。如果我们承认一切都是必要的,我们就得承认一切都是必然的和恰当的,不论它是多么邪恶。斯宾诺莎在 18 世纪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对邪恶问题提供了一个至少是自圆其说的答案,因为这是一个困扰启蒙运动的难题。我们称之为邪恶的东西不过是一些我们无法知道它在宇宙计划里的终极目的的东西。如果脚指头能够思考的话,它肯定会觉得把它削掉是不公正的。同样,我们之所以认为某种东西邪恶,那



斯宾诺莎

不过是我们的偏见所致。斯宾诺莎把这种冷静的哲学超然态度奉为伦理理想,就此而言,他类似于斯多葛派。毫无疑问,斯宾诺莎受到那个学派的强烈的直接影响。

他还对我们关于善恶的判断错误作了一个分析,把这种错误归咎于我们感情用事。我们说一个事物好,是因为我们想得到它,而不是相反。我们的情感与我们的意识紧密相连,会欺骗我们。但是,理性能够揭示真正的哲学,并且战胜情感。(在斯宾诺莎的必然世界里面,为什么感情可以例外?这一点还不清楚。)斯宾诺莎在情感和态度方面是一个非常超然的理性主义者。指出这一点很有必要,因为后来的浪漫派泛神论者倾向于从他身上读解出一种神秘的自然崇拜,但实际上他与此几乎毫无牵连。他还经常被人说成是“沉迷于上帝的人”,但实际上任何沉迷都与斯宾诺莎无关。“不喜不悲,只是理解”是他的经典格言。平静的独断论——“我不假设我发现的是最好的哲学,但是我知道我懂得真正的哲学”——斯宾诺莎以这种谦逊、退让的方式掩盖着一种安详的自信。

他或许不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但是他为 17 世纪已经令人兴奋的哲学佳酿增添了许多风味,即古典理性主义。除了以前的斯多葛派和以后的黑格尔之外,其他的哲学家没有像他这样断言“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斯宾诺莎的完全非正统的一元论使他无论在基督徒还是在犹太人都成为

异端的代名词。就此而言,他超过了笛卡儿:泛神论被视为比笛卡儿的二元论更危险的敌人,因为笛卡儿的二元论有可能与基督教达成和解。

霍布斯的唯物主义、斯宾诺莎的一元论和伽桑狄的原子论,使得17世纪后半期喜欢思考的人有了充分的选择。他们可以偏离传统的思路,要么去追寻新的神灵,要么根本不要任何神灵。与此相反的是马勒伯朗士和剑桥柏拉图派所代表的调和倾向。在某种意义上,最引人注目的时代标志是布莱斯·帕斯卡。帕斯卡生于1623年,是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天才,16岁就发表几何学方面的重要论文,两年后又发明了一种加法器,后来在微积分方面有开创之功(后来由莱布尼兹与牛顿所发展),在概率论方面也做出根本性贡献。托里拆利在真空管和大气压方面所作的实验激发了帕斯卡的兴趣,他做了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实验,并提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水压定律。他曾经与年长的笛卡儿见过一面,虽然他还是一个小伙子,但是他敢与笛卡儿进行争辩。无论怎么看,他注定有一个极其辉煌的科学前程。但是,他仅仅活到39岁,而且在1654年之后,在一个历史上最著名的宗教皈依事件<sup>〔1〕</sup>之后,他主要致力于道德和神学问题。



帕斯卡

但是我们不能说 he 为了宗教放弃科学,因为他与剑桥柏拉图派一样,认为真正的科学是服务于上帝的。

帕斯卡卷入詹森派的争论,使他在法国要经历一段长时间疾风暴雨的生活。为了捍卫詹森派、反击其主要敌人耶稣会,他撰写了一部伟大的作品《致外省人信札》。詹森主义是一种奥古斯丁神学,有点路德的风格,强调人无法靠自己得救,完全靠上帝的恩宠。帕斯卡可能并不完全是一个詹森派教徒,他家的其他成员是真诚的詹森派教徒,因此他捍卫詹森派教徒,免得他们遭受教会惩罚。

与笛卡儿不同,帕斯卡认识到数学方法的局限性。数学在自己的领域里是确实可靠的,

〔1〕 1654年,帕斯卡陷入宗教狂热。这年10月撰写《罪人的皈依》,11月撰写祷文秘藏于贴身衣衬。

但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应用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实验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们所能获得的结果是或然性，而不是确定性。在形而上学领域和宗教领域里，情况又有所不同，那是信仰的领域和心灵的领域，用帕斯卡的名言说，这个领域其自身的理性（理由），是理性所不了解的理性。帕斯卡从内心发出呼喊：“基督教的上帝并不仅仅是几何学真理的创造者。”他宣称“我不能原谅笛卡儿”，因为笛卡儿把上帝仅仅当做一个伟大的钟表匠，一个原动力。

实际上，帕斯卡相信，人类的活动有三个不同的领域。大脑和心灵（理性和意志）的活动分别对应的是科学和宗教的领域。此外，他加上一个政治领域，这个领域显然是肌肉活动的领域（力量在这里最重要）。这些领域都自成一体，我们不应把它们混为一谈。帕斯卡不赞成科学家去充当政治家，反之亦然，教会也不要插手政治或科学。这种观念是与现代西方的许多思想与实践相抵牾的，在盎格鲁 - 萨克逊世界尤其如此。同时代的霍布斯极力把政治以及宗教都纳入科学；启蒙运动也追寻这样的目标。清教徒把政治道德化，这种倾向一直贯穿现代的政治社会改革之中。然而，帕斯卡认为，数学家用几何学来探讨上帝或国家问题，其荒谬程度不亚于政治家以为用战争可以解决科学问题。每一个领域都有各自的技巧、方式和天才人物。帕斯卡让我们把它们分得清清楚楚。

帕斯卡竭力使宗教以及哲学的大部分从科学理性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就此而言，他是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连剑桥柏拉图派都向自然神论靠近，即用大自然的杰作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在 18 世纪，伏尔泰承认帕斯卡的伟大，但不能理解帕斯卡怎么会是一个如此执迷的基督徒？帕斯卡是一个孤独的巨人，不属于任何学派。在我们这个时代，偶尔有人把他视为基督教存在主义的一个先驱。他对科学主义的流行深感不安，认为如果不加以遏制的话，这种潮流会摧毁精神价值。今天，我们会比他那个时代的人更能理解这一点。这种强大的新力量（我本人也参与其中）究竟是什么？我们听到帕斯卡的询问。它会对人类造成什么影响？3 个世纪之后，我们走在这种科技文明的道路上，依然询问着同一个问题。而帕斯卡是第一个正视这个问题的人。

尽管帕斯卡有种种先见之明，但当时是笛卡儿的时代、理性的时代、科学的时代。到 1687 年，一个更伟大的人将打消所有残存的疑问，给欧洲人提供一个他们所渴望的彻底的科学体系。这个人就是出身于林肯郡农庄

的艾萨克·牛顿。

## 牛顿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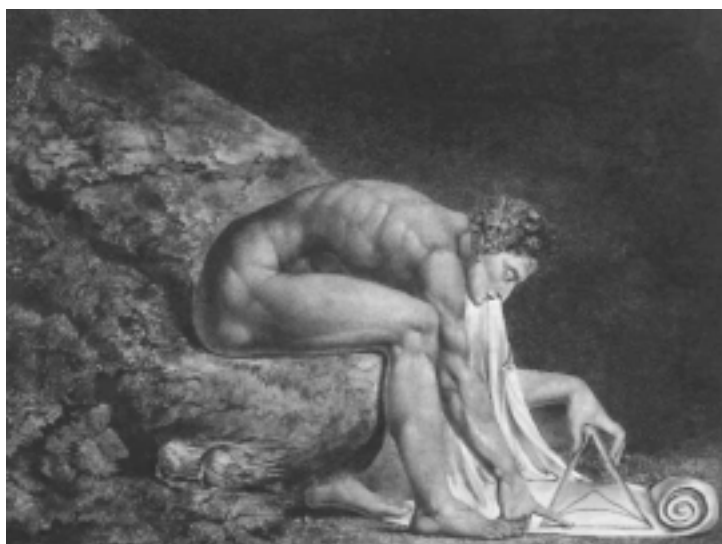
由伽利略、培根和笛卡儿发起的思想革命,在17世纪后半期得到许多人的热烈支持。科学和数学所引发的兴趣成为几乎没有人能够抵挡的诱惑。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每一次发现都引起轰动。物理学和数学一路领先,但是,哈维发现血液循环规律、马尔比基随后加以补充,列文虎克深入“小动物”的微观世界,约翰·雷发表植物学巨著,这一切使生物科学也进入人们的视野。各种各样的神学偏见几乎都在新科学的成功面前烟消云散了;由于最伟大的科学家中间也有帕斯卡和波义耳这样虔诚的教徒,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和解潮流。但是,另一方面,笛卡尔主义激起了一场辩论。在辩论中,一些左翼笛卡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直到1687年牛顿澄清迷雾之前,人们一直不能确定科学运动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尽管科学成果捷报频传,但是在牛顿之前没有产生一个公认的综合体系:没有一个普遍的运动和引力理论,而且新的世界观正在经受推敲。1672年,一位学者认为,有4种不同的宇宙学说供人选择。还有人说有7种。例如,第谷的学说主张,行星围绕太阳运转,太阳围绕地球运转。但是,根据观测的结果,无法在这几种学说中做出选择;因为这几个模式都同样符合观察资料。只有解决运动和引力问题,才能解决这个宇宙理论问题。

有必要重申,在许多人看来,笛卡儿是“把哲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打破了由逍遥学派(即亚里士多德学派)长期维护的科学、形而上学和神学的联盟,创造了一种新的力学。新力学只需上帝在某个缥缈的过去给世界推第一下——这是危险的无神论观念,即便笛卡儿非常依赖上帝,需要上帝来充当一个秩序井然的宇宙的保障者。许多伟大的学者,如帕斯卡和莱布尼兹等,发现这种观念令人不安。我们马上会想到帕斯卡的著名例子:他对没有神灵的世界机器感到恐怖,因而退缩到神秘宗教信仰。尽管剑桥柏拉图派和马勒伯朗士派力求实现一种调和,许多人仍在怀疑观望。人们需要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明:新科学不会破坏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基础。

尽管出现了一些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先驱者,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受过教育的人在内,还远远没有转而确信或者置身于受有条理的科学定律所

支配的宇宙。巫术信仰依然盛行。大多数欧洲国家在 17 世纪一直有针对男巫和女巫的司法判决,尽管有减少之势,但到 18 世纪初才结束。17 世纪末美国马萨诸塞发生的著名的巫术恐慌,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西方文明的愚昧部分的反常表现,因为马萨诸塞的清教徒远远不是那种情况,英国和欧洲大陆有教养的圈子也相信同样的东西。当时英国最伟大的作家托马斯·布朗或许就是一个狂热的巫术信徒。在 17 世纪强烈的非理性主义精神的种种表现中还应该提到致力于神秘知识的秘密会社,其中最著名的是玫瑰十字会。“舆论”在整体上还不属于理性时代;直到牛顿对宇宙的“法治”(定律)做出令人信服的证明之后,理性时代的舆论才形成。

由于牛顿 1687 年对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做出了伟大的综合与总结,所有的迷雾似乎被一扫而光;尘埃落定,大自然显露出最隐秘的秘密,于是,欧洲准备进入乐观的启蒙运动时期。另外,牛顿对有神论伸出援手;宗教与科学的合作再次进入一个长时间的蜜月时期,而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变成了奇特的古玩。当时,牛



《牛顿》威廉·布莱克绘

顿就很快就被视为非凡人物;迄今为止,这位剑桥巨人沐浴着诸如“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就”这样的颂词。在欧洲大陆,一些笛卡儿主义者反对牛顿体系,但越来越不成功;另一方面,少数人对泛神论倾向感到不满。但是,直到很久以后,就像以前帕斯卡曾经是反对笛卡儿体系的主要发言人那样,贝克莱主教<sup>〔1〕</sup>成为反对牛顿的世界机器观念的主要发言人。“上帝说,让牛顿出世,于是便有了光。”<sup>〔2〕</sup>拉普拉斯称赞《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人类天才作品中的极品”。牛顿引力公式所概括的宇宙原理成为全部物理学的基础,直到爱因斯坦革命之后才发生变化。

牛顿是数学家、物理学家,还是不太成功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另外,他

〔1〕 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 - 1753 年),爱尔兰主教及哲学家。

〔2〕 这是蒲柏撰写的颂词。

还对炼金术非常入迷。他是万有引力定律的发明者、光线分析的概括者,另外他与莱布尼兹一起成为微积分的创始人,这些表明他的天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正如他自己清醒地意识到的,他走在别人已经为他铺设好的大道上;他的任务是,把一个世纪以来各式各样的科学家和数学家所提供的大量资料汇集起来加以综合。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宏大的开创工作,笛卡儿和帕斯卡的数学贡献,吉尔伯特、托里拆利、波义耳的各种真知灼见只不过是其中最显眼的一部分;还有许多科学成就在这里不可能提及。<sup>〔1〕</sup>应该指出,牛顿并没有“发明”万有引力学说,仅仅是给了它一个严格的表达公式和严格的论证;他和莱布尼兹是分别同时独立地提出微积分,接着为了荣誉而展开一场很不体面的争吵,这件事也说明微积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积累的产物,其构成要素是数学在长期演进中发展形成的。例如,帕斯卡就发现了一些要素。这里并不是抹煞牛顿的任何功绩,而是鉴于他被恭维之词所覆盖,需要把他的成就摆正。简单化的历史把功劳归于发明的最后完成者,但发明总是一种社会产物。

但是,牛顿的非凡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是一个性格古怪、喜怒无常的天才;他的那部注定成为欧洲历史最重要著作的作品差点儿就没有拿出来付印。牛顿是一个贫穷的农村孩子。他进入剑桥大学,表现出数学天分,适逢其时地成为剑桥的数学教授。1665—1666年,瘟疫流行,他从剑桥回到故乡林肯郡。显然,就在那个时候,这位23岁的年轻人作了全面的思考,从而奠定了他后来关于运动和引力的伟大发现的基础。苹果落地的传说就是借青年牛顿是在田园风光中思考这一情节加以虚构的。他所考虑的问题并不简单。牛顿突然想到,使物体落地的力可能与使月球保持运行轨迹不变的力是同一种力,并且得出了平方反比定律。他发现,两个力“几乎毫厘不差地”相等。所有的质点互相吸引。两个物体的质量的乘积除以距离的平方就得出它们之间的引力。

在伍尔斯索普村(牛顿的家乡),牛顿还开始研究微积分。这是数学的

---

〔1〕 另外一些人中,值得一提的有丹麦的勒麦(Roemer, 1644 - 1710年)的光速测定与恒星观测;法国的皮卡特(Picart, 1620 - 1682年)的大地测量学;荷兰的惠更斯(Huygens, 1629 - 1695年)对牛顿也关注的许多问题的探讨。意大利的波雷里(Borelli, 1608 - 1679年)与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 1635 - 1703年,牛顿的英国同胞和一贯的竞争对手)几乎更早地发现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胡克一直这样认定。——原注



一个分支,对象是各种变量及运动中的事物,例如计算曲线变化的速度。但是,在回到剑桥之后,牛顿又忙于其他有意思的科学项目和数学项目。尤其在光学方面,他用棱镜把白光分解成不同颜色组成的光谱。他的光学实验和分析成为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典范。1672年,牛顿发表了这些成果。他因此被接纳进入皇家学会。他认为,光基本上是由粒子组成的。这种粒子说使他陷入一些他所不喜欢的争论。(19世纪科学家抛弃光的粒子说,支持波动说,后者符合实验数据。但是由于爱因斯坦革命,科学家们认识到,光至少在有的时候应该被视为像牛顿的粒子那样的东西——爱因斯坦的光子。)牛顿的划时代的引力论著作得以发表,显然缘于在皇家学会与埃德蒙·哈雷的一次偶然交谈。(哈雷以发现哈雷彗星而闻名。)哈雷敦促牛顿写出详细的论证和交付印刷。哈雷还承担了出版费用。在这种敦促下,原来秘不示人的牛顿抓紧撰写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巨著。

《原理》于1687年出版。牛顿在这部非凡的天才之作中贡献的不是一项成就,而是一系列的成就。众所周知,他严密地证明了引力定律;他还证明,这个定律可以应用于一切类似物体,无论地球上的还是宇宙中的。而这种普遍性是此前不被接受的。(例如,伽利略曾认为,地球上的重力不同于支配天体运行的力。)牛顿出色地把伽利略的自由落地运动定律与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结合起来。在知道行星速度的条件下,引力定律足以解释行星的运动。应该指出,在解决宇宙动力学时,牛顿也给有关太阳与地球的相对运动的争论盖棺论定。“他证明,在动力学的角度看,巨大的太阳不可能围绕着小地球旋转,但是一种中心物体及其附属物体应该围绕他们共同的引力中心旋转,太阳系的中心在太阳内部”(A.C.克隆比)。

经过严密的计算,牛顿还废除了笛卡儿提出的、后来常常被用于解释天体运动旋涡的说。牛顿从宇宙力学转向宇宙结构,突出了恒星与行星的质量。他关于地球在两极略微扁平的推论使得18世纪持怀疑态度的几何学家远至秘鲁和拉普兰(瑞典北部)进行证实。另一个出色的计算是岁差,即地球轴心略略有些晃动,其来回角度缓慢变化的结果就是岁差。牛顿严格地证明,地球两极拉平造成中间略略膨胀,会对地球轴心产生可以观测到的影响。不仅如此,《原理》还解决了潮汐和彗星问题,对这些长期难以解释的现象做出了解释。例如,潮汐是由月球引力造成的。

总之,所有的难题顷刻之间迎刃而解,整个画面井然有序。牛顿发现了钥匙。这就好像一种密码,原来破碎难认,但突然一下子就全部破解了。

因此,认识牛顿方法论的意义就非常重要。与帕斯卡一样,他懂得实验验证的重要性,因此在利用数学作为研究工具的同时也纠正笛卡儿对演绎法的夸大。当然,他接受伽利略和笛卡儿的基本假定:科学探讨的是“基本性质”,即可度量的运动和广延性质。而且,他用数学方法来表达他的著名引力等式。如果没有数学方法,他就不可能得出那样的结论。但是,牛顿坚持认为,“假说”,即未经实验证实的学说,在科学中没有立足之地。一个学说不论在逻辑上多么诱人,在没有得到实验证实之前,是不应该被接受的。清晰和美丽都不是一个学说的正当性证据。“美丽的学说被丑陋的事实杀死”,对于这种可能性,牛顿十分理解,而笛卡儿就不以为然。我们必须避免“我们自己编织的梦幻和虚构故事”。牛顿的方法也是完善的:提出临时的假设,充分利用数学工具,但又是以经验为基础。牛顿的“推理规则”包括解释的节约原则:除了对现象的必要解释外,不要多余的说明。用牛顿的话说:“我们只接受能够真实而充分地解释自然现象的原因。”

除了他的科学成就<sup>〔1〕</sup>和成功的方法论外,牛顿在思想史上之所以重要,还因为他支持一种有神论:给上帝保留一个位置,把上帝说成是一项宇宙所遵循的计划的积极维护者。应该强调的是(因为有时被忽视),牛顿学说是从有神论的角度对笛卡儿主义的改进。笛卡儿允许上帝承担一个消极的角色,即宇宙的秩序与合理性的保障者,允许上帝开动这个机器,此后这个机器就自行运转了。牛顿的世界机器(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需要上帝照看它。牛顿宣布:“他永远存在,无处不在;正是因为他时刻存在、处处存在,他就构成了时间和空间。”在1692年致理查德·本特利的信中,牛顿写道:“我认为仅仅用自然原因解释不了”天体状况,“我不能不把它描述成一个自觉的能动者的设想和发明。”行星体系有着如此令人惊叹的统一性,这应该被视为一种选择的结果。”他公开否定笛卡儿主义,即“用力学原理根据均匀散布在天空的物质推导出世界的构架”。牛顿所提倡的节约原则也支持了他的有神论;就引力而言,他指出:“我不自称了解”它的原因;他仅仅描述引力是如何起作用的。笛卡儿学派就是以此来攻击他,说牛顿并没有真正对引力做出一个解释,而笛卡儿则用旋涡理论给出这种解释。

---

〔1〕 关于牛顿物理学的局限性(绝对空间和绝对观察者的设定),见本书后面的阐述。牛顿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方面可能遇到的疑难。这些疑难在他那个时代以及在他身后的两个世纪还没有变成实际问题,而牛顿恪守他的原则:不允许理论超越所观测到的数据。——原注

情况的确如此。牛顿仅仅满足于提出十分精确的描述性公式,而且完全服务于实际目的。如果再往下探求,就将会像古人那样追问无法解答的问题。引力依然是一种神秘力量,是一种有距离的作用,无法解释,只能描述。牛顿留下的印象是,这种奥秘以及其他奥秘只能靠求助于“该体系的创造者”来说明。有人指责牛顿学说是一种唯物主义,即把运动的固有力量和引力视为物质的属性,但牛顿的信徒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这种思想。

由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定律问世,这个自哥白尼开始的科学天才的世纪不是抵达了终点,而只是获得了胜利的证明,结束了基本原理的探索。下一个世纪,在物理学和宇宙学领域里,除了给牛顿做注脚外可做的事情不多。但是,人们受到强大的激励,认为在其他领域应用类似的方法也会取得类似的胜利。笛卡儿的普遍科学方法之梦已经破灭了,于是人们会情不自禁地相信牛顿的方法会有广泛的适用范围,尽管牛顿不曾明确认可这种信念。牛顿是一个谦虚的人,知道人们所能认识的东西很少,但是他对大自然的征服诱发了一种过分的骄傲与自信。人们觉得,用同一把钥匙很快就能破解大自然的所有奥秘。因此,牛顿学说率先进入启蒙运动。

在研究 17 世纪的历史发展时,许多历史学家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以为这是常识战胜迷信的征程,那就错了。最大的错觉莫过于,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某种知识,所以就认为那种知识应该是很容易了解的。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当年是需要天才来揭示的。天才的思路多半不是常识的思路。伽利略受到触动的是,哥白尼在想像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时,竟然“允许理性如此强暴他的感知”,因为日心说在当时是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我们时代的一位伟大科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写道:天才的一个特征就是,他能够设想任何东西都不是它表面那个样子。从哥白尼到牛顿,17 世纪的科学天才的标志不是“常识”意识,而是奇幻的梦想、飘逸的想像和大胆的理论。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于一个简单的公式,一个表面上非常简单的成功秘诀,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一点所欺骗。一个高尔夫大师表面上毫不费力的一击,乃是多年练习和特有的运动才能的综合表现。表面简单的牛顿公式背后所包含的是超过一个世纪的天才们的努力。

牛顿的时代开始了。但牛顿这个名字的流传也需要一些时间。在牛顿的巨著问世后的一段时间里,牛顿自己所在的大学还在教授笛卡儿体

系！牛顿在欧陆也不是很轻易地被人接受。笛卡儿传统已经根深蒂固，名声极大的荷兰科学家惠更斯和德国天才莱布尼兹都反对牛顿。惠更斯早前就发现了牛顿引力定律的许多内容，但是他在 1690 年却提出了一个笛卡儿旋涡理论的修改方案，以回击牛顿对这一理论的批评。他不怀疑牛顿平方反比定律的有效性，但是他认为牛顿根本没有解释引力是什么（确实如此）。法国著名的科普作家、法兰西科学院秘书丰特奈尔（1657 - 1757 年）是一个待人和气的朝臣和高雅的作家。他是 18 世纪启蒙哲学家的先驱。他从未背离年轻时所信奉的笛卡儿主义。1752 年，已经 95 岁的丰特奈尔依然捍卫笛卡儿的旋涡说。<sup>〔1〕</sup> 迟至 18 世纪 30 年代才由伏尔泰承担起使法国转向牛顿学说的任务。甚至到了那个时候，伏尔泰还抱怨说，要做一个爱国的法国人，就必须在表面上信奉旋涡说。荷兰数学家格拉弗桑德<sup>〔2〕</sup>在把牛顿学说引入法国的过程中也起了关键作用。

笛卡儿信徒总是抱怨说牛顿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释。除了这些人外，牛顿学说所遇到的强大却徒劳的反对者是莱布尼兹和贝克莱主教（见本书第六章）。莱布尼兹特别反对牛顿体系所假定的绝对时空。他指出，空间和时间作为实体并不真的存在，它们是关系概念；它们类似于“在什么上面”或“在什么之间”之类的概念，表达的仅仅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它们视为客观存在，我们就自欺欺人了。牛顿把空间设想成类似一个大空箱子。物质粒子被放进这个箱子，然后按照某种力学定律相互发生作用。这位德国智者还嘲笑牛顿的上帝概念，说牛顿的上帝就像一个笨拙的工人，把活儿干得乱七八糟，被迫留下来到处修修补补。敏锐的莱布尼兹已经预先提出了某些非常现代的爱因斯坦学说的结论，但是这些想法在 18 世纪初期还不成熟。牛顿对西方人思想的长期统治刚刚开始。

---

〔1〕 一位名叫卡德瓦拉德·科尔登（Cadwalader Colden）的美国人 1751 年提出一种宇宙运动理论，试图用另一种动力学概念来补充和修正牛顿学说。笛卡儿的探索已经不复存在。科尔登的独创体系很快就被证明是一派胡言。——原注

〔2〕 格拉弗桑德（William Jacob's Gravesande, 1688 - 1742 年）荷兰自然哲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 第三章 17 世纪的政治思想革命

我首先想指出的人类普遍倾向是,永无休止、至死不渝的对于权力的渴望和追求。

——托马斯·霍布斯

一个民族可以让一个国王垮台而依然是一个民族;  
但是如果一个国王失去了人民,他就不再是国王。

——哈利法克斯侯爵<sup>〔1〕</sup>

整个 17 世纪,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卷入一场政治革命,其意义不亚于思想和科学革命。这场革命有时表现得非常激烈。17 世纪 40 年代,伟大的清教革命和内战震撼了英国,导致了奥利佛·克伦威尔实质上的军事独裁,然后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在欧洲大陆上,可怕的三十年战争(1618 - 1648 年)使德意志陷入四分五裂,使西班牙和意大利岌岌可危,但是把法国推上欧洲权势结构的顶峰。法国经历了漫长的统一之路。黎塞留主教<sup>〔2〕</sup>把统一活动推向高潮。他无情地镇压王权的对手,建立了无比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1624 - 1640 年)。这种中央集权在路易十四漫长统治(1661 - 1715 年)的前期达到顶点。在这些政治动荡的过程中,有些东西崭露头角:主权国家克服封建多元结构脱颖而出;为了结束宗教派别之间

---

〔1〕 哈利法克斯侯爵(Marquiss of Halifax, 1633 - 1695 年),英国政治家和思想家。

〔2〕 黎塞留主教(Richelieu Cardinal de, 1585 - 1642 年),法国政治家。

的争斗,人们致力于寻求宗教和解的方式;个人主义兴起,取代中世纪的团体和集体个性;个人自由与新国家的主权权威之间的对立问题开始突现。

新的政治理念大量涌现,涉及主权、宗教宽容、自由和权威等内容。人们寻求能够实现完美国家的方案。科学革命波及到政治领域:人们觉得,笛卡儿的普遍科学方法也能打开政治和社会科学之门;就像自然科学的情况一样,“理性”也会在人类事务中大行其道。(克里斯托弗·希尔<sup>[1]</sup>发现,在有关国王的观念中,太阳和心脏等这些与科学进展相关的比喻十分重要。英国的清教徒和辉格党人喜欢谈论力量的均势或平衡。很显然,科学至少为政治辩论提供了大量的比喻。)

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1690年约翰·洛克发表了《政府论》。该书是他对英国一个世纪以来政治实验所得结论的提炼。这种政治学论述在某种意义上与他的朋友牛顿对物理学的综合旗鼓相当。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可以说是牛顿与洛克的时代。为了理解以洛克为代表的政治学革命,有必要回溯政治思想在17世纪的冒险——在这方面17世纪也是名副其实的“天才世纪”。

## 中世纪遗产

在17世纪以前,亚里士多德也是欧洲政治思想传统的主要来源。他的《政治学》在整个庞大的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中并非无足轻重。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国家对于人类而言是一种很自然的东西;它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产生的;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希腊的城市国家“城邦”是从家庭、村落进化而来。把国家视为约定的或创建的东西,即由人们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东西,这种观念乃是17世纪的创造。亚里士多德强调国家活动的无所不在与至高无上。这种国家观再加上他的那种目的论,所导致的乃是现代自由主义斥之为过分国家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东西。国家的目的是促进美好生活(善的生活)和公共福利。应该积极地努力实现这一目的,这一任务优先于个人权利——在希腊政治思想中几乎没有考虑个人权利。只有通过国家这个有秩序的共同体,才能获得美好生活。如果不同意

---

[1] 克里斯托弗·希尔(John Edward Christopher Hill, 1912 - 2003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见或个人私利与共同目标发生冲突,国家有权利或有义务压制它们。应该提醒的是,按照现代标准来看,城邦是很小的社会——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有秩序的国家不可能比这更大。在这种紧密结合的小型共同体里,群体意识很自然地笼罩一切,个人主义几乎不可能抬头。

众所周知,在这方面,柏拉图持有更极端的观点。他让个人完全隶属于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有计划、有秩序的共同体(《理想国》)。但是,如果把这种理想国等同于残忍的极权主义,那就错了。希腊政治思想浸透着法律意识。政治社会的标准应该在独立于人的理性结构中寻找。权威机构的建立恰当合理,就应该服从它;但是偏离法治的暴政令人憎恨,应该予以抵制。亚里士多德对政体做了分类,分出优劣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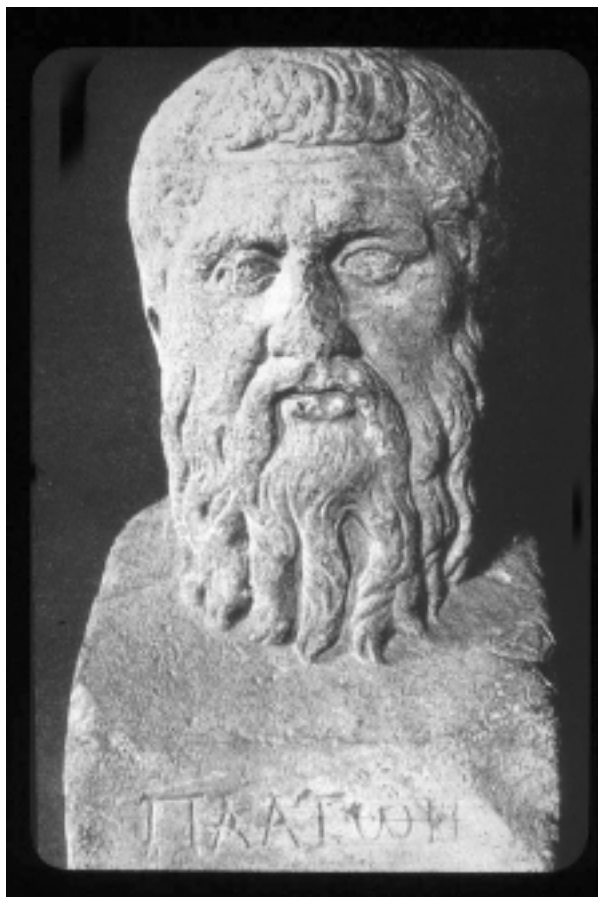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在荷马头像前思索》

	好的	坏的
一人统治	君主政体(1)	僭主政体(6)
少数人统治	贵族政体(2)	寡头政体(5)
多数人统治	共和政体(3)	民主政体(4)

数字按顺序表示由好到坏的排列。因此,君主政体最好,僭主政体最坏。“好”(善)适于理性和法律相一致的,比任何具体的政府类型更重要。应该指出,虽然通常人们认为亚里士多德主义对民主政体并不友好,但是在他看来,多数人的统治可能比一个人的统治要好得多。

当然,中世纪的政治思想主要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同时混合了基督教基本主张。圣托马斯·阿奎那同意,国家是一种自然制度,因为人类必须在一起生活,尘世生活虽然不是最高级的善,但也是一种积极的善,共同生活就必须有政府。此前有一种说法,认为“人间之城”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里的生活是堕落的。与这种论断相反,阿奎那这位中世纪知识的集大成



柏拉图

者极力振兴一门独立的政治学,其理论至今还是现代一些重要的政治学者的一个思想来源。天性温和的阿奎那主张中庸,强调法治。人不是完美的,但也不应当更为下贱,因此需要有权威来约束他;但是他的本性没有完全丧失,他身上还存有理性,使他能够追求一种维持某些自由的政治秩序。与在其他领域一样,阿奎那在政治理论领域也紧紧追随亚里士多德。权威是必要的,但是暴政应该受到民众意志的遏制;政府应该谋求普遍利益,否则它就丧失了合法性,而且人民可以反抗它,甚至在某些条件下有义务反抗它。现在有一种说法,把革命权利说成是由后来的清教徒和洛克提出的,这显然是错误的。中世纪历史的主题

之一,是教会与皇帝(或者国王)之间的争权夺利。双方都竭力寻找说明为什么人民应该推翻对方统治的理由。中世纪学者洛滕巴赫的马内戈尔德<sup>〔1〕</sup>把君主比做牧猪人,认为如果他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应该被废除掉。中世纪著名的政治评论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sup>〔2〕</sup>比阿奎那走得更远,因为他承认有杀死暴君的权利。<sup>〔3〕</sup>

许多中世纪政治思想强调有限的立宪君主制;现代立宪政体,例如英国的议会体制,便是从中世纪发展而来的。法律研究在中世纪的大学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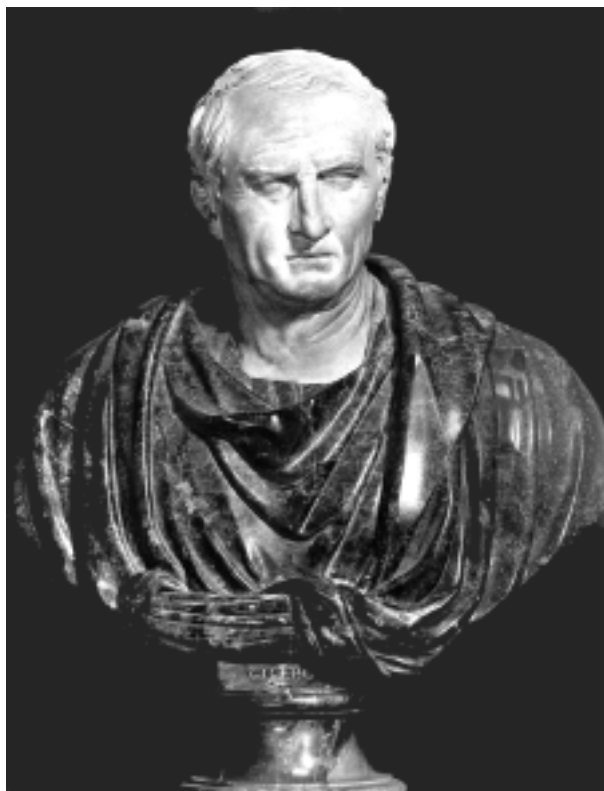
〔1〕 洛滕巴赫的马内戈尔德(Manegold of Lautenbach, 1030 - 1103年),德意志经院哲学家。

〔2〕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 1115/ 1120 - 1180年),英格兰学者,曾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秘书。著有《教廷史》。

〔3〕 在教会内部,对教皇权力至上的反抗在 1415 年的康斯坦茨会议达到顶点。思想史家 J. N. 菲吉斯曾热情地称会议的决议是“世界历史上最革命的文献”。显然,这种主张教会拥有立法权而非行政权的公会派观念,既具有强烈的中世纪色彩,也对后来的德国路德派、法国胡格诺派和英国清教徒革命产生了影响。——原注



世纪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到 17 世纪,一些中世纪的观念遭到否定,至少遇到了挑战。首先是那种对永恒价值领域——法律的来源——的盲目接受。在中世纪,法律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被“发现”的。人们相信,所有的人类法规及其正当性都源于一种更高的法律。在阿奎那的理论中,有三种法律高于人类的实在法,最高的法律是永恒法,再有就是自然法。自然法指引着人法,在发生冲突时否决人法。在中世纪,这种观念并没有形成具体明确的制度,但是它根深蒂固,不仅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之上,而且滥觞于希腊罗马(斯多葛



西塞罗

派)哲学。到 17 世纪,更高法律的观念依然发挥着影响,但是它也遭到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挑战,并且由洛克这位公认的“自然法”哲学家加以修正。不过,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已经成为西方遗产中最有意义的特征之一。西塞罗对这种观念做了一个经典的表述,这是一个被人们铭记于心、经常引用的表述,“不是在罗马有一种规则,在雅典有另一种规则……今天一种规则,明天一种规则,而是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在所有的时间、对所有的民族都有约束力”,因为这个法律有“一个人类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即上帝,他是这个法律的创制者”。说这话的是基督教出现之前的一位“异教”罗马人,因此,自然法的概念主要源出于古代世界的普世帝国经验和在一个世界性国家中的相同公民地位。众所周知,建立世界国家的理想、建立统一的“基督教国家”的理想,在中世纪始终存在,在查理曼大帝或奥托大帝时期也曾兴盛一时,尽管当时的实际政治状态与其说是统一不如说是分裂。

这些古老的观念仍然萦绕着现代世界,尽管在 17 和 18 世纪其中一些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然法迟迟不肯隐退,实际上它也从未消亡。在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时期,它依然十分活跃。杰斐逊就引用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思想作为健全政治哲学的原理。至少到 18 世纪,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和暴政危害的观点还被视为真理。例如,乔纳森·斯威夫特

说出过一个格言：“一切自由国家需要避免的邪恶就是暴政，即最高指挥权或无限权力完全集中在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之手。”孟德斯鸠在著名的《论法的精神》中也讲授类似的学说（详见本书第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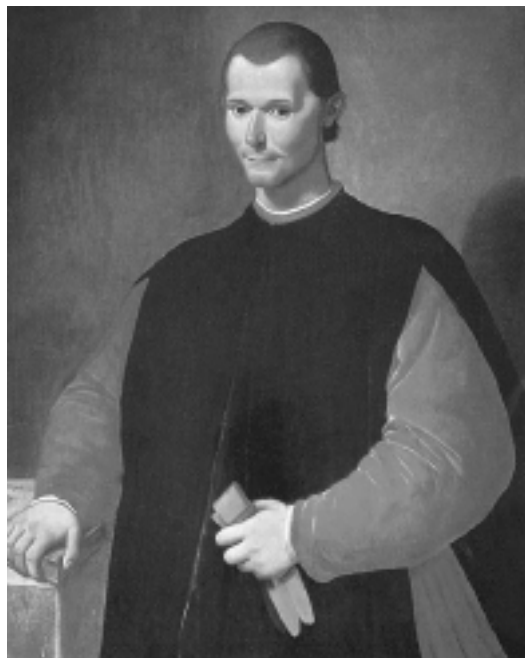
中世纪的政治思想还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国家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以积极的方式促进美好的（善的）生活。这种表述听起来挺好，但是它意味着，国家应该具有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职能，而这是现代欧洲的自由主义所厌恶的。如果面对这个问题，今天的欧洲人或美国人大概会说，国家不应该试图监管民众的宗教生活或信仰，甚至不该过问民众的道德，除非涉及维护社会安定的需要。至少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会这样讲。可以说，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中，几乎没有与社会、国家相对抗的个人“权利”这种观念。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允许人们有有限的私有财产权，但又强调这种权利永远准备为了共同体的需要而牺牲。对于个人权利，只是轻描淡写。众所周知，中世纪封建主义认为财产主要属于共同体，而非个人。

主张国家是有机体而不是约定的产物，强调共同体而贬低个人，也就意味着主张一种为现代自由主义所厌恶的不平等主义。社会被视为与宇宙一样具有等级结构。就像人体一样，社会有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各有各的功能，如果脚丫要求有与脑袋一样的权利，岂不奇怪？托马斯主义者（阿奎那的信徒）认为，平等就是根据人的（不同）天性对人区别对待，而不是一视同仁。一视同仁的提法是现代观念，是在 17 世纪才出现的。

总之，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在某些方面与现代观念相似，但在另一些方面则迥然有异，令我们很难理解。人民主权、法律至上、废除暴君的权利等等可能受到今天人们的欢迎，同时等级制度、没有个人权利、宗教裁判所式的政府等等会让今天的人反感。可以说，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与哲学、科学一样，中世纪的政治学遗产在 17 世纪也经历了巨大变化。人们利用了其中的一些思想，但同时改造了整个结构，抛弃了大部分的旧观念。这方面，新兴思想家也具有更系统的理论。而中世纪政治思想则杂乱无章。当时，社会四分五裂，习俗也各式各样；思想很少能赶上实践的发展。

当时所缺乏的一样东西就是国家主权观念。总体上看，中世纪的人强烈地感受到有一套客观的规律（法则）支配着政府，整个社会散布着一套义务与责任的体系，人们几乎不能想像权力集中于一个地方并且向一切人发号施令。如果社会被想像成一个有机体，那么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主

权权力的位置。在中世纪,根本就没有什么主权国家,只有权力的分散,尤其是世俗之剑与神圣之剑的分立,即教会统治者与世俗统治者的分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晚期,著名理论家帕多瓦的马尔西里奥<sup>〔1〕</sup>在《和平保卫者》(1324年)中试图消除这种分权状态。他支持世俗国家,主张完全取消教会在此岸世界的统治权。



马基雅维利

15 世纪,意大利的城邦国家首先突破了中世纪的多元权力结构,发展了某种统一的主权国家,尽管在规模上比后来北方实现的民族国家要小得多。马基雅维利在政治学上的精彩创新,成为后来政治思想的滥觞。威尼斯的寡头共和国在一些人看来是一个典范,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可怕的样板。但是无论如何,在 17 世纪之前,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相比,它是一个在具体制度上更为先进的国家<sup>〔2〕</sup>。(由于威尼斯外交报告的技巧性和详尽性,我们可以获得有关 16 世纪欧洲各国事务的许多准确知识。)只是到了 17 世纪,欧洲主要国家才开始达到这种政治成熟状态。它们能够也确实吸取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思想和实践经验。它们还能够利用我们所熟知的自然法学派所代表的政治理论,但是它们必须对这种理论加以修改,以适应新的形势。17 世纪的欧洲正在经历一场政治革命。

## 宗教宽容

16 世纪,新教大反叛,即宗教改革,打破了古老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基本原理。当一个国家出现两个或多个纷争的宗教教派时,那种认为国家应该推行统一信仰和道德的观念就变得不可容忍了。在一段时间里,欧洲

〔1〕 马尔西里奥(Marsiglio of Padua, 约 1275 - 1342 年),意大利学者。

〔2〕 值得一提的是,帕多瓦大学在科学革命中起了突出的作用,而帕多瓦就位于威尼斯共和国境内,受益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彻底的世俗精神和有效率的组织。——原注

充斥着血腥的内战、残酷的宗教迫害,人民饱受苦难。这最终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仅反对这种现象,而且反对造成这种现象的许多观念。形势逐渐变得明朗了:只有建立在新的基础上的世俗国家能够使欧洲恢复秩序。总之,世俗国家从教会分裂中收获渔人之利。诚然,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都试图控制世俗政府,借以消灭对手。加尔文派和耶稣会都恪守旧的观念:除了遵从上帝(其实是他们教派)律法的世俗统治者之外,其他一切统治者都不具有正当的权威性。但是,从长远看,这种特许造反的宗教观念遭到民众发自内心的反对,因为他们渴望和平及终止宗教狂热。因此,当疯狂的宗教战争消退之后,欧洲已经更加成熟,乐于接受新的政治变革。欧洲人不再欢迎干预政治的教会,希望强大的世俗君主能够维护秩序、保障和平,还希望确立能够体面地实现宗教宽容的原则。在17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宽容和主权国家一起高歌挺进。

关于宗教宽容的争论几乎早在宗教改革之初就开始了。巴塞尔的塞巴斯蒂昂·卡斯特里昂<sup>[1]</sup>就此问题与加尔文本人展开了一场彪炳史册的辩论。在宗教改革的氛围中,卡斯特里昂不可能占据上风。加尔文及其同僚泰奥多尔·贝扎<sup>[2]</sup>为反驳卡斯特里昂而提出的有力论据是:难道我们的信仰可以是不确定的吗?卡斯特里昂曾经指出,这些神学观点不值得严肃对待,因为它们有许多可疑之处。但是,加尔文反驳道,如果它们是可疑的,那就是说基督欺骗了我们,我们的信仰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必须承认,当人们有强烈的信仰时——信仰是有个性的人的天性——他们就不可能容忍反对意见;人们不能容忍出格的错误。宽容难道不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怀疑主义吗?正如蒙田指出的:“仅因为这个人提出某种猜测就把他活活烧死,让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确实如此。现代思想界对蒙田的指责给予肯定的呼应。“猜测”这个词值得注意。如果一个人的信仰不过是一种“猜测”,那么可以断言,用刀剑来推行它,是极其愚蠢的。但是,如果人们真的相信它是上帝的真理,那就另当别论了。16世纪乃至17世纪,很少有人能够接受在宗教事务上的无所谓态度。

宽容在开始时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必要。自16世纪开

---

[1] 塞巴斯蒂昂·卡斯特里昂(Sebastian Castellion, 1515 - 1563年),萨伏依人,新教徒,宗教自由的鼓吹者。

[2] 泰奥多尔·贝扎(Theodore Beza, 1519 - 1605年),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继承者,希腊学者、神学家。

始涌现、到 17 世纪已成汹涌之势的文献,向我们一而再地表明这种紧迫的必要性。诡谲的是,宽容的实现最主要应归功于那些面对迫害也不放弃自己信仰的宗教信徒的狂热,这些英勇的新教徒本身也是不宽容的。我们可以设想,新教教派如果独自掌握了国家政权,无不成为排他主义者。但是,如果一个政治社会存在较多的不同教派,那就有必要发明一种政治理论,允许它们共同存在,避免相互残杀。

恐怕很难说大多数弱小的新教教派天然倾向于宽容。但是他们确实希望能够扩大宗教宽容的范围,以便把他们自己包括在内,而且他们也不敢奢望控制国家。正是从他们的行列中,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宽容提倡者。卡斯特里昂的继承者中,值得一提的是荷兰莱顿大学反对加尔文的阿明尼乌<sup>〔1〕</sup>。他抨击加尔文的先定论和自然堕落说,提出一种较温和的神学教义。这种阿明尼乌主义在 17 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很受欢迎。到 1630 年,加尔文宗神权主义者在荷兰大势已去,荷兰共和国成为一块经济繁荣,同时容纳多种教派的著名国度。在法国,胡格诺内战所造成的苦难,促成了包括宗教宽容在内的“政治家纲领”。1598 年的南特敕令,标志着欧洲在一个大国里蹒跚地迈出了走向宽容的第一步。

但是,由于清教徒反叛<sup>〔2〕</sup>以及在此之前的长期争论所造成的氛围,英国关于宽容的争论表现的最为激烈。英国最早鼓吹宽容的小册子据说是由一个浸礼宗教徒(托马斯·赫尔韦斯<sup>〔3〕</sup>)于 1612 年撰写的。但是,在此之前也可以见到支持宗教宽容的零散言论。例如,1593 年,沃尔特·雷列爵士<sup>〔4〕</sup>在议会里呼吁对不受欢迎的布朗派<sup>〔5〕</sup>实行宽容。由于清教徒革命,争论愈演愈烈。圣公会和非国教徒,以及一些非宗教人士都参与争论。

---

〔1〕 阿明尼乌(Arminius,1560 - 1609 年),荷兰基督教神学家、荷兰归正会牧师。

〔2〕 清教徒反叛,是一个历史术语,表示 1640 年开始的英国革命。

〔3〕 托马斯·赫尔韦斯(Thomas Helwys,约 1550 - 约 1616 年),英格兰清教徒领袖。1608 年随大批分裂派信徒迁居阿姆斯特丹,建立第一处浸礼会。1611 年返回伦敦,鼓吹宗教宽容。

〔4〕 沃尔特·雷列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4 - 1618 年),英国探险家,早期美洲殖民者。

〔5〕 布朗派(Brownist):16 世纪英国新教徒罗伯特·布朗鼓吹每一个教会都应该独立自主,自己选举自己的主持者和管理者。其信徒称作布朗派。

在圣公会中,有一个著名的群体被称作“广教论者”<sup>〔1〕</sup>,主张实现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其早期领袖是主教奇林沃思。这个群体深受阿明尼乌主义和基督教人文主义影响(他们与前面提到的与科学有关联的剑桥柏拉图派关系密切),反对狭隘的宗派主义,反对对形式、仪式和教义的偏执。他们强调基督徒的品行,贬低神学。实际上,可以说他们的基本原则是,努力把信仰的内容减少为几条“要旨”。德莱顿<sup>〔2〕</sup>捕捉到他们的精神:

信仰并非基于高谈阔论,  
必须信仰的东西简约单纯。

这些“心胸广阔、不拘形式者”后来成为英国国教中所谓的“低教会”群体。他们认为理性是不宽容的教条主义的解毒剂。他们的某些思想还成为18世纪自然神论的先声。但是他们并非缺乏宗教热情。如果他们能够获准一种“预言的自由”(杰里米·泰勒<sup>〔3〕</sup>的著名论文的标题),他们会期望所有的基督徒都赞成少量的信仰“要旨”,进而奉行真正的宗教而不会四分五裂。他们坚持一个著名的信念:“理性”能够发现宗教的要旨。但是,在实践中对基督教教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谈何容易。一些基督徒指责广教论者抛弃的东西太多了。洛克虽然不是宗教人士,但深受广教论者的影响,到该世纪末,他把基督教简化成对两件事的承认:一是上帝存在,二是基督曾存在于人世并谆谆教诲人类。

当然,不是所有的英国国教徒都如此宽容。广教论者就绝不宽容罗马天主教徒,当然也不宽容非基督徒。清教徒也基本如此。1643年威斯敏斯特会议<sup>〔4〕</sup>表明,布朗派和公理宗比清教徒中占主流的长老派更宽容。杰出的长老派人士理查德·巴克斯特<sup>〔5〕</sup>说,当他与新模范军中的新教徒争论时,他发现:“他们经常激烈争论的话题是他们所说的良心自由,也就是说,

---

〔1〕 广教论者(latitudinarian),宗教信仰上的自由主义者。奇林沃思(William Chillingworth, 1602 - 1644年),英国神学家。

〔2〕 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 - 1700年)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英格兰第三位桂冠诗人。

〔3〕 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 1613 - 1667年),英格兰圣公会教士。

〔4〕 英国国会为改革英国国教会(圣公会)于1643 - 1652年召开的会议。

〔5〕 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 1615 - 1691年),英格兰清教牧师。

世俗长官绝不要决定任何宗教事务,世俗长官只须处理民政事务,维护安定,保护宗教自由。”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的划分是典型的清教徒的态度,使我们想起罗杰·威廉斯<sup>〔1〕</sup>在 1644 年发表的著名小册子(在英国写的,并以英国为背景,但常常被说成美国文献)。这里所探讨宽容之路不是降低对信仰的要求,因为圣公会的广教论者很可能被清教徒指责为缺乏宗教热情。问题在于,必须把精神事务与民政事务区分开。市民社会的政府只需要维护社会安定。它所关心的仅仅是防止暴力活动而已。精神事务必须用精神方式来处理,只能用思想和灵魂的武器来解决。正如威廉所使用的著名比喻,国家就像一艘航船,送载前往不同目的地的旅客。它只关心如何保证他们安全抵达,而无意替他们决定他们的去处。让教会与国家分开,这样各个宗教教派就可以信奉自己的信条,而且不会伤害其他教派。

教派的多样性确实逐渐促成了宽容。在辩论中,非宗教人士倾向于强调务实。如果英国想顺利发展,只需要承认现实状况,停止推行一种正统信仰的徒劳做法。在内战期间,彼此残酷迫害。长老派在威斯敏斯特会议表明自己与原来由劳德大主教<sup>〔2〕</sup> 掌管的圣公会一样不宽容。理查德·巴克斯特认为,宽容确实很好,但我们只能“宽容可宽容者”!克伦威尔的护国公政府为了社会安定,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宽容,但罗马天主教徒除外。1649 年由军官提交给议会的《人民公约》后来被称作“英国第一次真正提出来的宽容要求”。该文件主张不对“教皇制和教士制”实行宽容,但是在清教徒统治下,虔诚的圣公会教徒实际上很少受到骚扰。在克伦威尔去世和查理二世复辟后,“五哩法”和“宗教考查法”<sup>〔3〕</sup>对弑君的教派实行了某些报复,但是,这个时期的流行情绪还是对独断的教条主义和神学的反感,甚至对宗教反感,认为宗教缺乏上流社会的良好品行准则。

1685 - 1688 年,当詹姆士二世试图在英国推行天主教时,宽容在英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原来的对头圣公会和不从国教者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天主教的威胁。1688 年的光荣革命巩固了这一联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1〕 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 1599 - 1683 年),北美罗得岛殖民地的创建人。1644 年,他在英国获得殖民地特许状时,他还写了一篇对话,鼓吹宗教自由。

〔2〕 劳德(William Laude, 1573 - 1645 年),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英国革命中被处死。

〔3〕 五哩法要求牧师宣誓绝不反对圣公会,拒绝宣誓者将被驱逐,不得进入原教区周围 5 哩之内;考查法规定所有政府人员必须参加圣公会的圣餐。

“宽容”的胜利是建立在对天主教的极其不宽容的态度上。而英国牧师队伍中的最大裂痕,即清教徒与圣公会之间的分歧,由此得以弥合,同时为宗教宽容基本上扫清了道路。1689年法案远远没有走完这段路程,但是完全的宗教自由从此逐渐得到发展。

在关于宗教宽容的长期辩论中,有各种值得注意的论点。(1)有人认为,宽容没有写在《圣经》里面,因此不属于基督教精神范围。不从国教者与圣公会广教论者一样,是以《圣经》作为自己信仰的基础。奇林沃思说:“《圣经》,惟有《圣经》是新教的信仰所在。”此外,早期的教会并不实行迫害,而且仅仅要求信奉少量的信条。(但是,应该指出,在成为官方宗教之前,基督教本身是受迫害的少数派,承受不起内部分裂。)(2)有人断言,可怕的宗教战争已经证明,迫害是无效的。用武力不可能改变人的信仰。洛克在《论宽容的信札》里指出,强制只能制造虚伪,其实不能改变信仰。用剑能够迫使人们表面上顺从,但是这毫无价值。(3)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1644年)中有一个关于信仰的名言:真理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它无所偏向,但是它将会取得胜利。这句话也许值得推敲,但在当时却提出了一个庄重的主张。它与(2)是相互呼应的:如果说不可能用强制来使人信服,那么是在一种自由的氛围中可以用理性的论证来说服人。弥尔顿认为,宗教自由不会像某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导致道德败坏和思想混乱,而是会使所有在英格兰这片土地上的人都变得犹如圣人一般。(4)最后,我们从最高尚的理想主义回到最实际的观点。一些务实的人常常宣称,哪里有良心的自由,哪里就有商业的繁荣。他们把荷兰作为一个例证。因宗教信仰不同就把顾客或工人赶跑,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教友派信徒的钱与一个圣公会信徒的钱都是一样的钱。如果一个异教徒十分勤奋,那他也是一个有用的公民。这个论点在1660年之后变得越来越流行。它很接近埃拉斯都主义<sup>〔1〕</sup>:宗教是一桩便利社会的事务,它的公共形态应该受国家管制;它的标准应该是社会功利,而不是理想的真理。埃拉斯都主义一度令人惊骇,其实它很接近1688年革命后的胜利者辉格党中许多人所接受的思想。

---

〔1〕 埃拉斯都主义(erastianism),主张国家至上,取名自16世纪瑞士医学家和神学家埃拉斯都。



## 绝对主义和主权国家

反对内乱的同时也就会主张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红衣主教黎塞留<sup>〔1〕</sup>在他的《政治遗嘱》中明确无误地提出把国王变成绝对统治者的目标。<sup>〔2〕</sup>从 1634 年到 1642 年,他实施的政策是打击内乱,制服贵族,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强化中央政府机器。黎塞留提高了君主的标准,主张君主应该公正而诚实地进行统治。黎塞留根据品行和能力来挑选公务员,对官员中的腐败和以权谋私十分鄙视。他还扶持艺术和科学,建立了著名的法兰西学院。但是,黎塞留根据马基雅维利提出的君主的成功秘诀,希望他的国王既要受人爱戴,也要让人惧怕。他应该无情地镇压任何反抗,无论是贵族,还是法院,还是不堪



黎塞留

赋税重压的农民。黎塞留摧毁了胡格诺派(新教徒)的独立军事力量。当他们不再构成政治威胁时,他愿意对他们实行宗教宽容。这也是一场革命,与同时发生在英国的革命同样广泛,也几乎同样暴烈,但是方向不同。

当英格兰的斯图亚特国王竭力走向王权绝对主义时,他们缺少黎塞留那种手腕,又遭到议会和习惯法的抵制,从而最终头破血流。但是,在 17 世纪,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法国走上了正确道路,而英国没有。当时,英国处于虚弱和分裂状态,路易十四时代(1661 - 1715 年)的法国则在实力、荣耀和文化诸方面均遥遥领先。英国采用中世纪的立宪主义,它的成功直到 1688 年以后才显现出来。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扫荡国家内的中世纪残

〔1〕 黎塞留主教(Cardinal de Richelieu, 1585 - 1642 年),法国政治家,曾任黎塞留地方的主教,故名。他使法国从混乱政局趋于稳定。

〔2〕 虽然这个文件的真实性受到伏尔泰以及另外一些人的怀疑,但是现在看来它基本可信。参见亨利·希尔(Henry Hill)编辑校订的《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政治遗嘱》(1961 年)一书中的讨论。——原注

余,无异于科学和哲学领域的革命。黎塞留和笛卡儿都是理性主义者和改革者,他们用明晰和效率消除了中世纪的混乱。(在此并不想断言他们之间有什么直接影响,只是想表明他们具有共同的时代精神。)王权专制主义是一种新的潮流。国王都在夺取前所未有的权力,而议会以及(英国的)习惯法则代表了中世纪的传统。

把君主政体视为最佳政体的观点,并非新鲜说法。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亚里士多德就持有这种主张;在中世纪,但丁是该主张的热烈支持者之一。但是,亚里士多德以及主流传统并不喜欢无限制的君主政体,而是倾向一种有限的、立宪的君主政体。国王长期以来被赋予“神圣权利”,但是“神圣权利”并不意味着绝对主义:他们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这在中世纪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然而,从博丹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基调。前面已经提到这位主权概念的开创者。这位《国家六书》(1576年)的作者大概会自称是政治革命的哥白尼或开普勒。他是一位半新半旧的学者,有一半思想还停留在中世纪,但是他批评亚里士多德,力图寻求一种新的国家概念。他最主要的创见是,每个国家都存在着“主权利”,这是“一个国家的绝对、永恒的权力”,不能限制,不能分割。

博丹的思想也影响到英国,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都铎王朝后期的一种倾向,即“把君主政体看成是天然的、上帝认可的一种政体……建议甚至断言,君主的权利是不受人类法律和机构限制的。”(J.W. 艾伦)。众所周知,在英国历史上,一段最直率的表述出自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个国王之笔。这个笨拙的詹姆士一世亲自写了一本书,题为《自由君主政体的真正法律》(1598年),表达了他竭力推行而导致灾难性结果的思想。这是一篇粗糙的论文,但是它确实有力地提出,“国王应当被称作上帝”,因为他们拥有同样可怕的权力。另外一些更有思想的作者也提出类似主张。伟大的作家约翰·多恩<sup>[1]</sup>在小册子论战中是詹姆士国王的至高权力的捍卫者之一。而耶稣会的苏亚雷兹和贝拉明以及苏格兰的加尔文派教徒主张有权废黜国王。

“主权”这个新概念很容易被用于支持君主绝对主义的主张。这个概念强调,在国家的某一位置,存在着一种发号施令的权利和权力。约翰·

---

[1] 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72 - 1631年),英国选学派诗人,散文作家。

海沃德<sup>〔1〕</sup>爵士在 1603 年就得出这个明显的结论。当时他注意到,由许多人一起来表达一个意志,这种设想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一个主权通常应该意味着一个统治者。托马斯·克雷格爵士写道:“支配人们内心的理性,总是向往君主政体,因为它是最确定的政体。”当代许多美国学生以为君主政体是一种古老的迷信,因而在此需要强调,绝对君主政体乃是 17 世纪出现的新观念,而且得到了“理性”以及那些拥护科学和哲学中的新理性主义的先锋派的支持。与这种新观念相辅相成的是“主权”的发现,这是当时政治理性主义的一个主要胜利,可以说,它是政治学的万有引力定律。

16 世纪的法国保皇党和 17 世纪的英国保皇党甚至宣称,反抗最恶劣的国王也是不正当的,因为即便是暴政也比无政府状态好。他们是在内战的阴影下、怀着内战引起的各种恐惧心理进行写作的。他们把这种一锅粥的混乱状态归咎于国家这个厨房中有太多的厨师。当许多人各执己见却都要发号施令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一个井然有序的政府?两个人或更多的人不可能同时驾驶一辆小汽车。国家就像军队一样,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俗话说,两个好将军不如一个差将军。现代政府已经学会如何委托权力,还学会如何把主权推崇为一种抽象的国民意志,但是在现代国家的早期阶段,人们很自然地会把主权意志人格化。这种思路在某些方面与科学家的理性主义不谋而合,因为科学家也是用删繁就简、消除混乱、追求明晰、寻找简明的公式来概括自然现象,使其归结为一些秩序原理。

大多数捍卫绝对统治的人其实并不真的主张国王掌握完全无限制的权力。他们常常做这种鼓吹,是因为他们希望国王拥有更大的权力,以便结束叛乱和内乱。但是,如果受到压制,他们就会多少有所保留了。维护无限制的权威与维护无限制的自由一样难以讲通道理。在欧洲历史的这一阶段,在整个欧洲大陆,尤其在法国,由于现实面临的无政府状态和内战,因此人们强调权威。16 世纪下半叶和 17 世纪,先后有一些理论家(巴克利,霍布斯、波舒哀、菲尔默<sup>〔2〕</sup>)强调权威重于自由,主权国家重于个人权利。他们试图用理性的论证来支持权威和主权。通常,他们在论证的过程中也会不得不承认需要有所限定。

---

〔1〕 约翰·海沃德(John Hayward, 1560 - 1627 年),英国历史学家。

〔2〕 巴克利(William Barclay, 1546 - 1608 年),苏格兰法学家。菲尔默(Robert Filmer, 约 1588 - 1653 年),英国理论家,著有《父权论》,受到洛克的批判。

我们可以用移居法国的苏格兰人威廉·巴克利作为一个例证。16世纪末,他著书立说,其中有这样一些论点:权威来自上帝;主权不可分割;主权若被分割,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社会迫切需要秩序;《圣经》支持君主制;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按逻辑讲,国王而不是议会(等级会议)才应该是主权者;同理,国家也应该高于教会。我们会发现,巴克利的论点新旧杂陈,就像开普勒融中世纪因素和现代因素于一身;他引用《圣经》和神法,而且显得很看重中世纪晚期支持世俗权力、反对教会的帝制派。但是他也有一些新的理性论点,尤其是主权观念以及因宗教动乱时期渴求秩序的心理而提出的功利主义论点。无论根据宗教论点还是依据功利主义论点,巴克利发现很难否定造反权利,尽管他十分希望减少这种权利。

如果按照上帝的意志,国王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如果他违反了上帝的法律又该怎么办?因此,总是潜藏着一种对以宗教制裁的形式所体现的“更高法律”的诉求。当时加尔文教徒和耶稣会二者反抗君主制的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如果这一论辩完全建立在实用功利的理由上,说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纯粹是因为这样更符合社会的利益,那么如果国王的统治违背了社会的利益,废黜他也就理所当然了。因此,运用理性的论证,就不可能完全取消公民的自由,尽管17世纪有些理论家试图这样做。从当时的社会情绪看,那些最伟大的理论家竭尽全力进行这种论证,乃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在把哲学激进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时,他们就陷入了矛盾。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天才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

## 清教徒革命

1641年,英国爆发革命,然后经历了一系列狂风暴雨般的事变:内战、国王查理被议会(准确地说,是控制议会的军政府)处死,替代王权专制主义的各种政体试验。与此同时,英国也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理论浪涛。议会方面当然会努力论证自己挑战和推翻王权的正当性;他们援引了过去的反抗理论,也多少添加了一些新的因素。亨利·帕克<sup>[1]</sup>可以作为他们的一个典型。他认为,国王不等于王国,如果他没有履行为王国服务的

---

[1] 亨利·帕克(Henry Parker,1604-1652年),英国贵族,清教徒。

职责,就可以废黜他。这种论点似乎没有超越中世纪学者洛滕巴赫的马内戈尔德所谓国王犹如牧猪人的说法;但是帕克大胆地提出主权寄于议会的主张。然而,议会领袖不愿显得过于激进,帕克一度远远走在同党的前头。议会代表了富裕的乡绅。这个保守的阶层不仅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捍卫传统的英国政府观念,反对新的绝对主义统治:国王企图不经他们的同意强行征税,用新设立的王室法庭驾驭习惯法的法庭。议员们宣称,英国的“古老宪法”渊源于萨克逊时代,得到大宪章(1215年)的确认,体现在习惯法之中,它是对王权的一种限制。他们的对手嘲笑这些说法,但是这些说法也并非空话。它们毕竟得到人们坚定而真诚的维护。因此,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议会表现为保守的一方。

通常所说的清教徒反叛,包括一种宗教因素。其基础是清教的兴起和发展,以及批评国王查理在宫廷里容忍“教皇党”并且不认真实施反天主教法律。当时清教在英格兰蒸蒸日上。通常我们在考虑清教的时候,想到的是欧洲大陆上加尔文的神学理论,如上帝万能论、预定论、上帝的选民论等,以及加尔文对教徒言行的苛刻规定。但是,研究英国清教的学者强调,清教的起源也有本土因素。很显然,有一种情绪超越了教派界限,对“分离派、求正派、喧嚣派甚至教友派、长老派和公理会”都能发生作用。无论清教有多么严格的限制,清教包含着一种强烈的行动主义,一种不仅仅批判教会仪式、组织和教义中未经改革的残余而且要有所行动的愿望。清教徒觉得难以理解的是,仁慈女王伊丽莎白使英国国教会稳定下来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受到上帝启示的人竟然如此之少。他们改革教会和宣传神旨的炽烈热情,很自然就转移到政治领域;他们大多不是宣传个人的判断自由,而是鼓吹加尔文式的新教教会,即由民政官员贯彻牧师的教令,除旧布新,惩治罪人。在法国、荷兰和苏格兰,他们已经表明自己是历史上最令人敬畏的革命者。在革命期间,他们之中曾经有人说过:“不安顿好宗教,你就绝不会安顿好共和国。”敬神乃是政治的基础。

国王和他的顾问劳德大主教发起了将清教徒清除出英国国教会的运动。清教对放荡的时代风气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因此它不仅代表了一种宗教情绪,而且代表了一种道德情绪,甚至主要代表了道德情绪。神学教义不是最重要的,成问题的是戏院、五月柱舞、不守安息日、教堂仪式过于华

丽等等。当托比·贝尔奇爵士<sup>〔1〕</sup>义愤填膺地抱怨这些人要取消欢乐时,清教却因为推崇坚强性格和严肃态度,即典型的加尔文伦理而得到传播。当然,在一段时间里——参见16世纪法国胡格诺派“反暴君理论家”的作品和加尔文本人的《基督教原理》最后一版——加尔文新教宣传有权反抗宗教信仰错误的国王。英国清教徒当然知道胡格诺派的作品。但是他们最初很少谈论革命。冲突是在两大对立的政治团体之间展开的,这两大团体都有悠久的传统和伟大的法统尊严。

当国王头脑简单地恪守王权至上的逻辑时(国王就应该像个国王的样子,而不应该成为“威尼斯的总督”,虽然他可以与议会商量,但是应该由他为自己的臣民制定政策),议会在众多小册子的包围下,逐渐从与国王分享政府权利这种暧昧观点,转向主张将国王的“职位”与他本人区分开,乃至最后大胆地宣称,国家的最高权力寄托于议会“这个最高法庭和协商机构”。在主权概念产生以后,国王和议会共同治理王国这一古老模糊的观念再也不能畅行无阻;二者之中,必须有一个是主权拥有者。正如霍布斯指出的,两个人骑一匹马,肯定有一个人坐在前面。狮子和独角兽为了王位必有一争。

革命一旦爆发,就如脱缰野马。不久就涌现出更加大胆的理论。其中,引人注目的军队辩论造成了民主观点与保守观点之间的碰撞。民主观点主张,一切人都应该有选举权。保守观点认为:“凡是在这个王国中没有长久固定利益的人,都无权参与处理国家事务或享受相关利益。”也就是说,选举权应该与财产所有权如影相随。实践中而不是理论上的胜利最终属于后者。但是,清教徒革命通过平等派运动提供了或许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民主思想体系。<sup>〔2〕</sup>具有感染力而又不太负责的约翰·李尔本<sup>〔3〕</sup>以及平等派的其他鼓动者理查德·奥弗顿、威廉·沃尔温等,都体现了当时理性主义和科学潮流的影响。奥弗顿显然是一个科学爱好者,而带有某种模糊的霍布斯式的形而上学思维。平等派否定传统,力求在理性的基础上重新建设一个理想社会,这就使他们成为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家。我们能够感觉到,科学和理性都被用来支持这些平民渴望已久的东

---

〔1〕 托比·贝尔奇爵士,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中的人物。

〔2〕 平等派并不赞成彻底民主的普选制,他们显然想把乞丐和仆人等排斥在选举之外。而且,他们支持户主普选制,使他们的思想超前了两个世纪。——原注

〔3〕 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 1614? - 1657年),英国平等派领袖。

西：与傲慢的绅士平起平坐，在议会中有代表，修改法律以救济穷人（例如，废除负债监禁），实现免费的教育和医疗，禁止土地垄断。理性主义是一种思想武器，他们借以破旧立新。在理论上，平等派的小册子几乎没有什么令人瞩目之处，但它们无疑是意义深远的社会文献。它们远远走在时代前面。17 世纪作为民主运动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由此听到了它的模糊声息。令思想史研究者特别感到兴趣的是，促成这次未成功的民主运动的因素，不仅是英国的革命变动，而且还有四处流溢的理性主义思潮。我们似乎听到奥弗顿在发问，如果笛卡儿能够基于理性把一切推倒重来，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社会和政府领域做同样的事情？理性的时代正在孕育 150 年以后的其他不同的政治乌托邦。

与此同时，清教徒革命中激进派还受到基督教千禧年主义和救世主义的影响。在宗教改革的动乱时期，尤其在德国，这些思想大量涌现。所有的历史研读者大概都知道，马丁·路德对罗马的挑战促发了一场这位新教改革者本人并不赞成的农民大起义；从新教反叛的左翼产生了诸如闵斯特公社<sup>〔1〕</sup>这样奇特的激进产物。这种流行的革命千禧年主义也是在中世纪出现的。穷人第一次读到《圣经》，并受到路德宣传的鼓舞，以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发挥。他们设想出一些非同寻常的基督教神学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出明显的劫富济贫倾向。《启示录》和《但以理书》第 7 章尤其被用来认可一个尝试各种终极乌托邦理想的乐园。在千年王国里，私有财产和婚姻之类的制度都将消亡，所有的教友都是平等的，基督返回人间，将作为君主统治一千年，直到最后审判日到来。清教徒革命随着一次次《圣经》宣示而跃动，这些《圣经》宣示负载着旧约和新约中令人难忘的意象。“第五王国”成员在革命期间一度是一个重要群体。他们表达了这种以神圣的名义进行社会革命的圣经革命观。

革命的极左派杰勒德·温斯坦莱<sup>〔2〕</sup>被一些现代共产主义者奉为先驱。他质问，难道不该用经济民主来补充政治民主吗？如果庄园主可以反抗国王，那么为什么穷人就不能反抗庄园主？他所支持的“掘地派”是一些无地的农民。他们并不想进行暴力革命，只是想占据农村的公有土地。这个运

---

〔1〕 1534 - 1535 年，闵斯特城的再洗礼派建立的公社。

〔2〕 杰勒德·温斯坦莱 (Gerrard Winstanley, 1609 - 约 1660 年)，英国革命期间掘地派领袖。

动极其弱小,但是,温斯坦莱的思想被包括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内的许多人视为对社会政治理论的重大贡献。正如李尔本作为一个民主的先驱具有重大意义,温斯坦莱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也具有重大意义。

## 哈林顿和霍布斯

从1640年到1660年,英国产生了大量的政论家和政治论文。其中包括诗人约翰·弥尔顿。他在165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为处决国王查理(1649年)辩护。在清教徒革命期间所有的政治理论家中,仅次于霍布斯的伟大理论家大概要算是共和主义者詹姆斯·哈林顿<sup>[1]</sup>。著名的《大洋国》(1656年)一书就是他的作品。与17世纪的许多政治思想家一样,哈林顿也希望自己的思想科学化,他的著作中明显带有机械模式的痕迹:事物是相互平衡的;各种力量之间也寻求平衡;只要遵循这些原则,就可以设计出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哈林顿不仅熟悉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而且也像他们一样通晓古代历史。他按照理性设计的国家机器看上去很像是古代作家的方案。波利比乌斯就是一个伟大的榜样,他强调国家的内部力量应该平衡。哈林顿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发掘这方面的古代智慧。哈林顿在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方面,似乎更有原创性,虽然这也能从古代史学家那里采撷而来。他认为,财产是理解一个共同体的公共事务的钥匙。只有在财产广为分散的地方,民主政体或者“共和国”才能运转。他把英国革命的发生解释为此前经济革命的结果:那场经济革命结束了国王和少数贵族对财富的垄断,把财富分配给了“中等阶层”。由于经济结构改变了,政治上层建筑也随之变革。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分析,尽管事实并不完全与之符合(它更适用于法国革命);我们很容易看到它对马克思以及其他经济决定论者的影响。但是,哈林顿也对约翰·亚当斯和美国联邦党人<sup>[2]</sup>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包括《大洋国》中反帝国思想的影响:在《大洋国》中,殖民地被视为无益的负担,因为它们注定迟早要独立。他并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身为地主阶级成员,他在设计权力均衡的方案中为地主阶级安排了一

---

[1] 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 1611 - 1672年),英国革命时期的政治理论家。

[2]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美国联邦党人指亚历山大·汉弥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



个位置。下层阶级也应该有代表,但不能占据支配地位;贵族应该成为下层阶级的遏制力量,他们将会被证明是国家的无价之宝,因为他们有闲暇来学习和充任政治领袖。

但是,哈林顿认为,应该制定法律来控制每一地产的规模,使富者不至于过富。富人阶级和平民阶级一样,如果掌握太多的权力,就成为一种危险。只有用权力来遏制权力;任何个人、任何阶级都不应该被赋予太多的权力。从他这里可以找到反对纯粹民主的依据:纯粹民主违反了上述准则,把权力赋予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就可以运用这种权力来剥夺上层阶级,从而毁灭整个共同体。因此,他提出一个土地法设想,不顾可以想见的强烈反对意见,对任何人所能拥有的土地数量设定了上限。在哈林顿的“共和国”里,不是哪一部分人,而是全体人民表达共同的利益或集体意愿,制定法律。顺便说一下,作为共和主义者,他当然准备好了过没有国王的日子,而英国在 1649 至 1660 年间正是如此。查理二世复辟后,哈林顿身陷厄运。但是他的著作并没有被所有的英国人遗忘。

哈林顿有些幻想家和空想家的味道,与当时许多人一样迷恋“按照科学”得出的完美公式,但是在处理政治这个棘手的问题时,他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作家。他对孟德斯鸠等伟大后继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位《大洋国》的作者属于现代政治理论的不朽开创者之列。在当时那个政治理论成果的收获季节,只有一个人超越了他,那就是伟大的托马斯·霍布斯。

清教徒革命迫使霍布斯逃往巴黎,使他转而思考政治。由于他同时也醉心于数学研究和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因此他决定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可以说,他决心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社会科学家。马克思把霍布斯称作“我们共同的前驱”。1651 年,霍布斯最著名的著作《利维坦》问世,该书探讨了“国家的内容、形式和权力”。早在 1640 年,即革命开始后的第一年,霍布斯就写了一



霍布斯《利维坦》卷首插图

在英国人霍布斯看来,利维坦所象征的那种按照理性建构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是政治和平与社会秩序的最好保证。

篇短论,以手抄稿的形式流传。这篇短论维护绝对主义统治,反对议会统治,成为他逃离英国的原因(因为他“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对待他”)。在流亡期间,这篇短论扩展成了《利维坦》。尽管有许多英国人耗费时间和才华来批驳这部著作,但是它至今仍被视为英国人所创造的最伟大的政治理论著作。众所周知,霍布斯是一个极其大胆的思想家。依据他的机械唯物主义,他竭力把人类事务纳入自然科学的范围。他排除一切,只保留受机械原理支配的“物体”;他认为,思想和社会也必须严格按照对待其他“物体”的方式来考察。这种把人类现象和社会现象纳入物理学框架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是一种低级错误,因为这混淆了不同的范畴。但是,在17世纪,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世上有一种统一的科学方法,而且人们很自然地会把自然科学中的有效方法应用于其他领域。

在埋头创造一种科学的政治理论时,霍布斯力求像笛卡儿一样首先找到一个无可置疑的真理,然后从这个真理推演出其他的结论。他在分析人性时发现了他的这个真理。他强调人类追求权力的自私冲动以及傲慢和嫉妒心理。自私和彼此之间的不信任,被确定为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因此,处于初始的“自然状态”的人,发现身处一种战争状态。霍布斯说,甚至现在我们在国际关系中还能看到这种情况:这种关系是野蛮和不讲道德的,即便在不使用暴力的时候也是互相刺探和欺骗。他断言,过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霍布斯对这种令人吃惊的人性权力在人类事务中的角色之间的关系有独到见解——这是一种“永无休止、至死不渝的对于权力的渴望和追求”。他尖锐地指出,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权力有无限的贪求,而且因为他们必须永远拥有更多才能保护他们已有的东西。拥有最大权力的国家也最热衷于谋求更多权力。毋庸置疑,霍布斯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他那种透彻的现实主义见解犹如一股凉爽的清风,告诉我们人世的真相,而不是给我们制造幻觉。毫无疑问,这里不免有夸大的成分,因为并非像霍布斯所暗示的那样世上只有自私和权力。但是它们的确存在,人们需要关注它们。

当霍布斯接下来转向社会契约时,我们会很自然地想知道这位现实主义者会得出什么结论。社会契约并不是新概念。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欧内斯特·巴克爵士写道:“(这个观念)已经令多少代人苦苦思索。”)在霍布斯著作问世之前的那些年,许多人都在使用这个概念,法国胡格诺派和英国议会成员尤其如此。它还是自然法学派的一个常用概念。

诚然,霍布斯给这个概念赋予了新的令人惊讶的意义。以前,它通常被用来证明反抗政府的合理性,被当做一个限制国家权力的理由:国家的权力不能超越一种想像中的与人民的协议所规定的范围。因此就出现了胡格诺派的政论《为反对暴君的权利辩护》(1576年):只有上帝才能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国王受上帝律法的约束;他与上帝签订了一个契约,保证实行公正的统治和维护真正的宗教。如果他没有做到这些,人民就可以不服从国王,因为在国王与人民之间也有一个契约。

霍布斯把社会契约论变成了论证主权国家拥有无限权威的一个论据。但是,首先需要指出,把处于尚无政府或文明的“自然状态”的野蛮人,想像成如同一群资产阶级律师一样庄严地聚集在一起制定一份契约,看来是极其非历史主义的。一个世纪后,大卫·休谟对社会契约论提出尖锐的批判。以他为代表的一些人指出,制定契约的过程不仅需要原始人不可思议的那种机巧和推理,而且需要一定的法律知识——在制定契约之前,必须懂得什么是契约!霍布斯对此会这样回答,他其实对契约的历史真实性没有什么兴趣。他是在进行一种笛卡儿式的解析练习。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应该如此,在实际上不一定完全如此。科学定律乃是对自然的抽象。

不管怎样,霍布斯对社会契约做了一种论证。为了摆脱不可忍受的状况,摆脱“孤独、卑贱、污浊、野蛮和短命”的生活,人们聚集在一起,同意把主权交给一个独裁者,由他负责阻止人们本能地互相残杀。“人民的福利就是最高的法律。”应该指出,霍布斯笔下的契约是全体人民之间的契约,而不是人民集体与主权者之间的契约。人民彼此同意接受一个主权者;他们没有与那个主权者进行谈判。他们由此而创造出一个利维坦国家,一个“人间上帝”,人们不能有反抗它的权利,也不能诉诸更高的法律。更高的法律根本不存在。惟一的自然法过去是、现在也是自我保存的法则。霍布斯从这一条推演出其他的法则,如遵守契约:这样做符合我们的自我利益。但所有这些都都可以归结为自私法则。

人们处于自私的考虑,同意把自己的自由交给国家,就必须把国家的命令奉为法律。法律就是主权者的命令。应该指出,霍布斯表示,我们服从法律是因为我们知道这符合我们的利益。我知道,如果我不服从,而且其他人也如此,那我就没有安全保障。霍布斯的理性主义在此表现得十分明显:他所说的人民能够以理性的方式自动推导出他们的公民职责,但实际上过去和现在很少有人如此理性。当然,霍布斯会说,这是法则的逻辑。

人民把政府建立起来之初,他们是平等的,是一个个的个体;然后他们决定把权力交给一个独裁者。迄今许多人认为,霍布斯的思想乃是一种不寻常的组合,主张的是一个平等主义的独裁者。

霍布斯倒不是一定要鼓吹王权绝对主义。“主权者”可以是按照统一意志行动的一群人。霍布斯的确宣称,君主制是最佳政体,因为其意志是不可分割的,而且能够保守政策秘密;即便在所谓的民主政体里也总是需要有一人做出决定。由此观之,霍布斯无疑会欣赏萧伯纳的俏皮话:“众多雄心勃勃的国王都嫉妒合众国的总统。”<sup>〔1〕</sup>其实,也不尽然。霍布斯也为一个主权者群体留有余地。不管怎样,他绝不支持享有“神圣权利”的君主。君权神授是霍布斯不能苟同的。政府的正当性应该用科学的、符合自然的推理来论证,而不应该用超自然力和迷信来论证。《利维坦》用很大篇幅抨击僧侣阶层,说他们用废话来逃避政治。如果教会继续存在,它就必须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这是彻底的埃拉斯都主义。英国王党不喜欢霍布斯,议会派也同样不喜欢他。他们的立论都是基于习惯、传统和宗教认可,而霍布斯对于这些则统统予以激烈的否定。有人认为,霍布斯给克伦威尔这位独裁者提供了依据或辩护,因为这个暴发的强人无法用世袭权利说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不管怎样,霍布斯为君主制所做的论证完全是一套非正统的说法。他甚至不赞成世袭君主制。

与此同时,霍布斯的理论也支持权威,反对自由。他对内战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十分惊骇,因此希望主权者紧紧把握权力,不给任何狡猾的反叛者留下丝毫可乘之机。洛克后来评论道,霍布斯被臭鼬吓着了,就把自己托付给狮子。霍布斯坚信,最坏的暴君也比没有政府强;只要有了造反权利,必将导致无政府状态。霍布斯的思想乃是政治保守主义与一般哲学激进主义的奇特组合。或许由此可以解释他的思想中的某些矛盾。他希望肯定国家的权威性,但是他剥夺了其传统资源和神圣性,反而会削弱国家。说到底,霍布斯所说的主权者完全是因为实用而获得正当性,因此也肯定能够被确立他的人民所推翻。《利维坦》的辉煌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霍布斯论证时所遵循的严格逻辑上;但问题恰恰在于政治是非理性的,政治充满了最不合逻辑的设想。(哈林顿认为,霍布斯太缺少实际政治经验,因此不可能成为一个可靠的政治向导。)

---

〔1〕 原文 Ambitious kings env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霍布斯在他的基本假设中认为当前的社会发展符合他的看法,不管他的看法是否科学。他所设计的国家是主权国家,是由权利平等的个人组成的。他根本不考虑那种缺乏主权利力、由各种权利群体组成的中世纪世界。霍布斯笔下的“政治人”都是极其理性的,十分清楚自己是什么人,自己的利益在哪里。他们不再把通过自然起作用的神法当做政治权威的根基;他们自己制定法律。霍布斯的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和原子论个人主义属于他的时代,也属于未来,而不属于过去。而且,他鼓吹的权威主义也是如此,我们不要忘记,在他那个时代,人们在寻找克服国内动乱和思想纷争的手段。

但是,大多数英国人厌恶霍布斯。有些人讨厌他是因为觉得他反对自由,有些人是出于宗教信仰,还有些人是因为他全然不考虑传统和情感。王党和议会派都不喜欢他,议会中的“托利党”和“辉格党”(17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都不喜欢他。因此,“利维坦”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与一个世纪后的卢梭和两个世纪后的马克思一样,霍布斯的著作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对于霍布斯的思想含义,至今众说纷纭。如果说现代各个世纪都有打破政治传统迷信的伟人,那么霍布斯可以自诩在17世纪扮演了这个角色。

## 光荣革命与洛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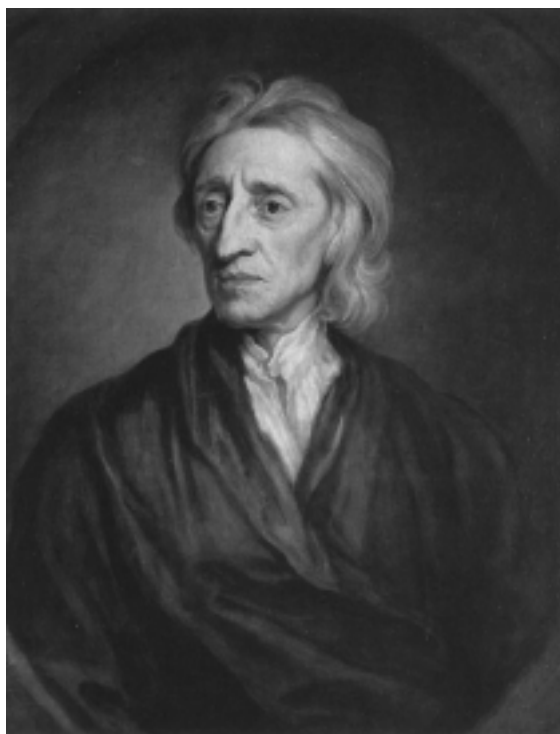
在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思想成就之间,横亘着查理二世的复辟王朝。在这段艰难时日,清教徒革命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只是搁置一边。君主权力的限制、议会的权利、王权继承的问题,到1688年以前基本上都悬而未决。由于一个具体的争端,1680年的《排斥法案》使英格兰分成辉格党和托利党。泰特斯·奥茨虚构的阴谋案和赖伊豪宅阴谋案<sup>〔1〕</sup>引起的恐慌和摇摆,使得政治温度居高不下。1685年,詹姆士二世继承王位,决心结束这种不稳定状态。他轻率地按照法国王权的模式在英国推行绝对主义统治和天主教,结果很快导致几乎举国一致反对他的革命。1688年,他被

---

〔1〕 泰特斯·奥茨(Titus Oates, 1649 - 1705年),圣公会牧师,1678年捏造天主教会图谋杀害查理二世的阴谋案。赖伊豪宅阴谋案(Rye house plot),系1683年揭发出来的新教徒图谋杀害查理二世及其弟詹姆士的阴谋。

迫逃离英国。应议会中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共同邀请,他的荷兰女婿(和他的女儿玛丽一起)接受了王位。这次光荣(和不流血的)革命的特殊形势与革命后不久问世的洛克的政治理论有着某种具体联系。

不过,早在几年前洛克就已经撰写他的政治论著了。《政府论两篇》的第一篇专门批驳绝对主义最忠实的辩护士罗伯特·菲尔默爵士。罗伯特·菲尔默爵士很早以前写过一部《父权制》,以手抄本形式流传,1680年才付梓发行。他为绝对主义王权做的辩护是英国人中很少见的(或许霍布斯除外)。英国王党分子或托利党分子通常都不否认议会也应分享一些政府权力。然而,菲尔默深受博丹和霍布斯影响,坚决主张主权权力不可分割,否则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进而毁灭整个社会——这是一种我们已经熟悉的论证。他竭力论证君主的权威,理由是这种权威说到底源于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服从国王就类似于,也是源于孩子对自己父母的天然服从。这种父权制论点也是十分陈旧的。人们通常把家长权威的来源追溯到亚当,因为上帝给了他“统治所有的造物”的权力,他是第一个君主。菲尔默只不过对此作了一种略微复杂的表述。他对社会契约论的否定倒是比较有理:社会契约是一种神话,历史上从未有过,也不可能有过。



洛克

洛克成功地抓住菲尔默论证中的薄弱之处加以嘲笑——这对洛克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然后,他在享有盛名的第二篇中提出了自己的、同菲尔默和(间接地)霍布斯针锋相对的观点。虽然洛克在这部著作中没有提到霍布斯,但是他脑子里无疑会想着著名的《利维坦》。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人攻击过《利维坦》,例如乔治·劳森、主教布拉姆霍尔、约翰·伊查德等。“围猎利维坦”成为一项流行游戏。在批驳霍布斯方面,洛克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创新之处:由于种种理由,霍布斯实际上冒犯了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就应该指出,洛克在这篇论文

中要表达的观点大多不是首创。他本人承认特别受益于“贤明的胡克”和德国的普芬道夫。理查德·胡克是伊丽莎白时代的神学和自然法思想家。

萨缪尔·普芬道夫是与洛克同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当时已经声名卓著。还有许多辉格派政论家鼓吹自由、反对王室暴政;他们之中有些人要比洛克大胆的多,例如阿尔杰农·悉尼<sup>〔1〕</sup>。他因被指控参加赖伊豪宅阴谋而于1683年殉难,获罪的原因其实可能是他的小册子《政府论》。在胜负决出之前,洛克一直谨慎地保持沉默。但是,应该承认,那些人写的政论文没有一篇既雄辩,又不失尊严,而且推理严谨。洛克的《政府论》与光荣革命相重合,似乎是为光荣革命代言,但是它很快就成为一部政治学经典之作,其名声经久不衰。一个多世纪之后,美国的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斐逊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洛克已经对政府问题作了最终的、或许是惟一正确的结论。

洛克有一些实际政治经验(他担任过杰出的辉格党贵族沙夫茨伯里的秘书、贸易委员、贸易委员会秘书、外交特使)。他的重要著作《人类理解论》也表明,他的广阔的哲学世界观是经验主义的,即基于感性经验而不是基于天赋的或抽象的理念。作为罗伯特·波义耳的信徒,皇家学会的会员、兼职的经验派医生,洛克恪守他的经验主义,但是在年轻时笛卡儿和霍布斯也曾经令他兴奋。我们会看到,他的哲学经验主义实际上带有不少理性主义色彩。他的政治理论看不出特别符合经验主义,与孟德斯鸠、休谟、伯克乃至后来的托克维尔比较,倒是更接近霍布斯,属于抽象推理一类。但是,它处处都显出那种“博大、健全与融通的意识”——这是洛克的特征。在这里他展现了那种把相当抽象的观念变得似乎清晰易懂的伟大天才。这一点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同样显而易见。

在洛克笔下,最初人们自由、平等,生活在没有政府的“自然状态”之中。至此,洛克与霍布斯是一致的。但他很快与霍布斯分道扬镳。这种自然状态不是人与人的恒久战争状态。人们天然有足够的理性使他们懂得,不要伤害彼此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这里有一种自然的道德法则,是每一个拥有理性的人都“能够理解的、平易的”法则。在这种假设的自然状态中(洛克与霍布斯一样毫不关心它是否真的存在过。他认为,类似的例子是可以找到的,现存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类情况;但即使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在逻辑上也有必要做出这种假设),人们对于自己的生命、

---

〔1〕 阿尔杰农·悉尼(Algernon Sidney, 1622 - 1683年),内战期间属于议会派,担任过多种公职。他写《政府论》也是为了回击菲尔默的《父权制》。

自由和财产(个人“把自己的劳动掺入”其中的东西)有一种自然的权利。人们发现在这种状态下生活还能忍受,但不太方便。尤其是缺少一个公认的裁判来裁决财产纠纷,这就使得“对财产的享用很不安全、很不稳妥……充满恐惧和持续不断的危险”。洛克的意思显然是,没有政府,人们不会互相残杀,甚至不会公然地相互偷盗,但总会有争执发生,而最不方便的是,没有合理合法的手段来解决争执。

但是,因为人们不是非有政府不可,因此他们就会努力与政府讨价还价;他们不必把他们的所有权利都交给政府。设置一个权力无限的专制君主,岂不荒唐?建立政府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利,如果政府把他们的权利剥夺殆尽,那就违背了建立政府的本意了。我在进入社会时只是放弃一些自由,为的是更好地享用其他自由。而且,我放弃那些东西完全是经过我同意的。“人天然是自由、平等、独立的;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强使任何人脱离这种状态而屈从于他人。”(《政府论下篇》第95段)政府所获得的只是有限的权力,政府所受到的限制之一是“未经本人同意,最高权力不能剥夺任何人的任何财产”。

一旦多数人议决了政府的特定协议或宪法,政府就不得超越其正当的权限。如果政府或官员有非法行为,或者是侵犯人们的自然权利,或者是超越宪法规定的权限,他就“不再是一个官长”,而且会遭到反抗。如果由一个不正当产生的立法机构来制定法律,如果行政机构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这个政府就该解散,权力又回归人民了。政府不能通过针对个人的法律,未经人民同意不得征税,未经人民同意也不得把立法权转交给其他任何团体。由议会强加给新君主的著名的1689年权利宣言<sup>〔1〕</sup>,宣示了这些观点;洛克看来提出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抗议会的权利法案。虽然他说立法机构是“最高权力”,但是他也指出,立法机构也要对基本道义法则负责。有些事情它也不能做。或者说,“人民”享有“废除或改变立法机构的最高权力”。(英国的宪政在这方面没有听从洛克的教导。)

洛克雄辩地宣称,造反的危险远远小于暴政的危险。人民不会轻易造反,宁肯忍受冤屈。但如果你告诉当权者无须害怕人民对暴政的反抗,你就会引发更糟的后果。托利党的逻辑通常是:(1)造反权等于无政府状态,

---

〔1〕 该宣言即通常所说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1689年2月由英国议会通过,4月威廉和玛丽加冕时宣誓接受该宣言。



(2)无政府状态比暴政还糟糕。洛克针锋相对地否定这两个假设,尤其是第一个假设。

综上所述,洛克对自由的贡献显而易见。但是这里也有必要指出洛克的局限性。第一个初始契约(洛克看来设想了两个契约,但这在社会契约思想中很常见)<sup>[1]</sup>需要获得所有人的同意,社会由此而建立,人们同意属于同一个共同体,同意接受多数人的意志。但是这种“社会”契约只发生一次,而且是在遥远的过去,今天我们只是通过接受国家法律表示默认而已。我们惟一的不同选择就是移居另一个国家。这无异于说我们生来就属于一个政治共同体。

但是第二个契约(或者某种协议)是为了建立一个特定政府,看来也只发生一次。经过多数人的表决,通过一个宪法;然后,宪法大概一直起作用,除非君主或立法机构进行非法活动而使政府“名存实亡”——造成革命形势,但是洛克坚决认为这种情况极少发生。而且,这种政体不可能是专制政体,但也肯定不会是民主政体。洛克显然欣赏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实行的贵族体制:政权主要掌握在少数上层地主阶级手中,实际上议会只代表这个集团的利益。诚然,洛克不时地提出需要进行议会改革。但是,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真的希望实行民主选举;很难看出他的理论能够允许在正常情况下对这个统治阶级进行民众监督。<sup>[2]</sup>人们的印象是,他乐于为1688年光荣革命辩护。可以说,这场革命导致了议会专政的寡头政治,而洛克希望这个政权长治久安。洛克的其他著作也没有对“劳苦大众”以及辉格党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层表示过多少同情。令人惊讶的是,他甚至对奴隶制有所偏袒(洛克从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种植园获得经济收益)。

洛克自称解决了个人对抗国家的自由与权利等问题,但是有人会指责他不过制造了一些词藻。如果只是说“不经同意,国家不得剥夺财产”而不做具体界定,这种空泛之词有多大意义?(洛克会赞成实行个人所得税或

---

[1] 在霍布斯和后来的卢梭那里没有这种设计;这是自然法学派的设计。——原注

[2] “当社会已经把立法权交给由若干人组成的议会,由他们和他们的后继者继续行使,并给议会规定了产生后继者的办法和权威,那么只要政府还继续存在,立法权就绝不可能重归于人民。”(《政府论下篇》第243段)还应该指出,人民当然也不能仅仅因为偶尔对政府不满,就可以行使革命权(虽然有人似乎认为洛克说过可以行使革命权),除非政府在特定方面违反了自然法或者宪法。——原注

实行国家征用权、战争时期没收外敌资产吗?)多数人通过一个基本法来剥夺一个人的财产或少数人的某种权利,是否如洛克所说那样荒诞不经?是否有可能用一种一般准则来划分什么是正当地捍卫自由,什么是无理地反抗权威?在1830年到1860年的美国,自称忠于洛克原则的人们就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

这不过表明,政治绝不可能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很难发现几条有约束力的一般法则。这并不意味着剥夺洛克的荣誉。他在时代需要的时候,出色地为支持自由而写作。正如他所说的,当时人们关于造反所产生的弊害写得太多,而对于同样有害的“统治者的傲慢和以专横权力加诸人民的做法”(《政府论下篇》第230段)写得太少。他所捍卫的自由对于他来说,大概是指他自己所属的英国富人阶级的自由(而且洛克本人是,至少后来是上层资产阶级的一员),但是凡是受到政府不公正待遇的人都可以援引这种权利。讨论政府的文章很少有像洛克的《政府论》那样明晰、透彻,而且通篇入情入理。《政府论》确是一部适逢其时的政治启蒙导论。

还有一些政治思想家值得我们关注。洛克就把德国的萨缪尔·普芬道夫<sup>[1]</sup>视为最杰出的政治理论家之一,把他的名字与西塞罗、亚里士多德以及《圣经·新约》相提并论。在洛克推荐的5部政治论著中就有普芬道夫的两部。说到这位萨克森的智者,人们就会联想到经常被盛赞为现代“国际法奠基人”的荷兰的格老秀斯<sup>[2]</sup>。格老秀斯是出类拔萃的自然法理论家。他直接反对霍布斯的观点,认为人有一种社会本能,因此政府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这种观点似乎又回归到亚里士多德了。但是,格老秀斯把主权国家完全视为一种既定事实。他是在三十年战争的恐怖笼罩下写作,因此主要目标就是为这些利维坦怪物之间达成某种合作与协议而奠定基础。18世纪的人哀叹他的著作带有一种巴洛克式的紊乱——孔狄亚克会说:博大精深但毫无条理。普芬道夫则属于下一代学者。他力图把博丹、霍布斯、格老秀斯的思想融会为一种系统的科学的国家理论。但是在后人心目中,他似乎没有同时代的其他人那么具有独创性,顶多是一个洛克式思想家。德国人表现出对自然法思想的强烈偏好,这可能是因为他

---

[1] 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 1632 - 1694年),德国自然法和国际法理论家。

[2] 格老秀斯(Hugo Grotius, 1583 - 1645年),荷兰国际法理论。

们的政治体制是帝国,不是主权国家而是由许多小单位组成的联邦。莱布尼茨就反对斯宾诺沙和霍布斯而维护自然法。

斯宾诺莎也涉足政治理论研究。他与霍布斯一样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且他的一元论哲学也要求他如此,但是他并不像这位英国人那样颂扬权威轻视自由,而是大谈在自由的氛围中进行理性讨论的价值。他确信凡事都有必然性,但这并没有使他否认自由的必要性。宇宙是理性的,我们的心灵是这种理性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在理性地思考时,我们的心灵就不应该受到任何束缚。宗教宽容和民主是斯宾诺莎世界观的一部分。

不过,还是洛克的影响最大。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光荣革命使英国在 18 世纪走向成功。英国从漫长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脱颖而出,与路易十四的专制君主国相比已经略胜一筹。在 18 世纪,英国愈益繁荣富强。有秩序的自由似乎是它的成功秘诀。建立一个强大安全的国家,并不需要有一个专制的主权者。在经历了动乱之后,英国已设法改造了中世纪的政治体制,使之适应现代国家的需要,既维护了古老的自由,又确保了新的高效率。这是现代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成就。20 世纪,新论迭出,因此可能还需要捍卫这个说法:在现代国家中,惟有英国曾经竭力推动议会民主,其他现代国家的政府体制都是从英国体制派生出来的。清教徒革命时期的鼓动家以及政治思想大师——哈林顿、霍布斯和洛克——都对这一历史性成就做出贡献。

## 第四章 17 世纪末：转向启蒙

旧时代悄然淡出，新时代初露曙光。

——约翰·德莱顿

启蒙运动最强大的思想力量，不在于它对宗教信仰的拒斥，而在于它以新的形式所宣布的信仰和以新的形式所体现的宗教。

——恩斯特·卡西勒<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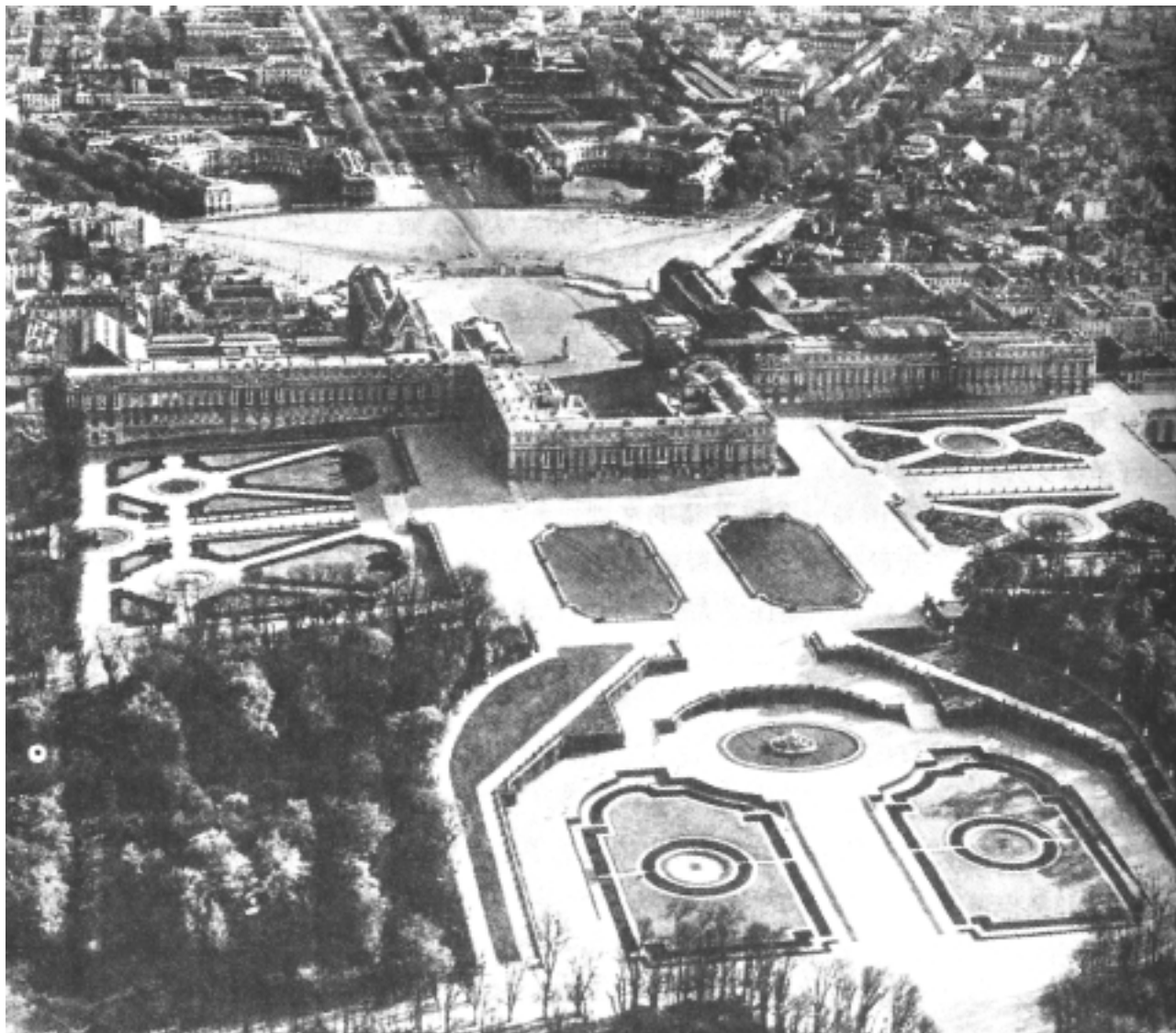
### 路易十四时代

三十年战争(1618 - 1648 年)使德意志满目疮痍，而英国则正在经历革命和内战。与此同时，反宗教改革和巴洛克艺术的中心西班牙，从顶峰急剧跌落，变成一个衰败、消沉的二流国家。意大利与德意志一样四分五裂，商业也由盛转衰，文艺复兴的辉煌只存留暗淡的余光。当 1661 年路易十四亲政时，他可以满意地宣称，法国在欧洲没有竞争对手。法国在一个强大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并且找到路易十四这个出色的演员，因为他能够承担起一个伟大君主的角色。在 1689 - 1713 年争霸世界的较量中，欧洲其他国家史无前例缔结成联盟来遏制法国。在此之前，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强权机器一直在政治上支配着欧洲，不断扩张法国的疆域，强迫各国承认法国的优势地位。就在这个时期，法国的文学、科学、哲学、艺术和

---

〔1〕 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 - 1945 年)，德国犹太哲学家。

建筑绽现出辉煌繁盛景象。由此观之,无怪乎伏尔泰在回顾历史时,把这一时期视为伟大的时代。迄今为止,大多数法国人一直持这种看法。



法国凡尔赛宫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把凡尔赛宫设计成象征绝对主义的建筑。

这是拉辛和莫里哀的时代。他俩的戏剧至今被法国人奉为“经典”,犹如英国人尊崇莎士比亚和约翰逊<sup>〔1〕</sup>,德国人敬仰歌德和席勒。大体说来,这是法语兴旺的时代,犹如英语在伊丽莎白时代突然实现了作为文学工具的功能。古典主义是此时文学的特征。可以说,随着政治秩序和稳定的确立,杂乱纷繁的巴洛克风格逐渐成为昔日噩梦。看来,“无可置疑的是,绝对主义和古典主义有着相通之处”(R. W. 迈耶),二者都讲究秩序、权威

---

〔1〕 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 - 1784 年),英国 18 世纪最著名的文学家。18 世纪后半期有“约翰逊时代”之称。

和统一。当然,二者是在路易十四时代汇聚、融合在一起的。实际上,古典主义早在路易十四之前的黎塞留时期就开始兴起。主要提倡者是马莱伯<sup>[1]</sup>。这个小学究因在混乱的文坛推行秩序而红极一时。语言必须净化,校正标准因而确立。口号是和谐、统一和秩序。戏剧、诗歌都必须遵守“准则”。1636年,高乃依<sup>[2]</sup>的西班牙悲剧《熙德》受到指责,说它的情节不是发生在同一地点和一天之内,违反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高乃依被迫自我辩护。古典主义时代由此开始。此后高乃依只得循规蹈矩。继之而起的拉辛,以恪守这些准则为荣,成为法国文学的典范。黎塞留创立了法兰西学院,使之成为清规戒律的官方卫道士和体面文学成就的奖赏机构。路易十四继续鼓励艺术的发展,利用艺术来为法国增光(也是一种“文化外交”)。



由芒萨尔于1678年改建后的凡尔赛宫正面

他是否真的懂得艺术?尽管谄媚者可能夸大了他的才能,但太阳王确实是一代天骄。他品味高雅、才智机敏,不仅是拉辛、布瓦洛和莫里哀的庇护者,还成为他们的朋友。他扶持吕利<sup>[3]</sup>创作歌剧。他兴建了奢华的凡尔赛宫及其园林、雕塑。法国已经蓄

势待发,但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超出了仅仅庄严地主持这场繁华的表演。尽管他有许多过失,但他使众多毫无审美品味的强国君主相形见绌。他懂得艺术和文学,把它们作为自己重中之重的责任。他的品味虽然是严格古典主义的,但在历史上的政治家中则属于出类拔萃之列,至少就意大利文

[1] 马莱伯(F. de Fran?ois de Malherbe, 1555 ~ 1628年),法国诗人。

[2]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1606 - 1681年),法国剧作家。

[3] 吕利(Jean - Baptiste Lully, 1632 - 1687年),法籍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十四的宠臣,法国歌剧的创始人。

文艺复兴的这一支脉而言。<sup>〔1〕</sup>

在路易十四时代,即 17 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段,伟大的批评家布瓦洛、伟大的剧作家莫里哀以及许多画家和建筑师都出色地表明,古典主义能够把优雅、得体与机智、尊严、恢弘融为一体。波舒哀主教为绝对主义王权辩护的正统理论迎合了法国宫廷的口味,因为驾驭这个宫廷的国王具有异乎寻常的尊严和分寸感。凡尔赛宫拔地而起;人们说,这座伟大的宫殿带有巴罗克的味道,因为它试图用宏大的规模以及巨大的楼梯和富丽堂皇的镜廊造成慑人心魄的气势。然而它是按照古典主义风格遵从严格的合理性设计的。勒诺特尔设计的园林和芒萨尔设计的建筑都与普桑后期绘画一样<sup>〔2〕</sup>,追求极端的简洁和严格的合理性,从而体现和谐、庄重和宏伟。

布瓦洛是“艺术领域的牛顿”。在他看来,理性给予我们艺术科学;每种艺术样式都有各自的准则。除了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三一律外,他还增添了一些规定,全是为了达到明晰、经济、得体、客观。当时的数学热潮也影响到艺术:自然美往往被解释为符合几何原理,凡是不规则的都是丑的。总体看来,这种审美态度不欣赏新奇,怀疑变革。一切艺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早已被揭示出来。英国古典主义者约翰·伊夫林<sup>〔3〕</sup>认为:“古希腊罗马的建筑达到了对一个完美无缺的建筑所要求的那种完美。”这一真理被野蛮的哥特人所败坏,因为他们的臃肿建筑乃是“沉重、黑暗、压抑的寺院堆积”。这就是古典主义者看到哥特式大教堂所产生的全部印象。现在,通过帕拉第奥(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建筑师,其风格是极端的规整)等古典光荣传统恢复者的作品,人们又回到正道上来。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up>〔4〕</sup>宣布:“建筑师应该讨厌标新立异。”理性时代在哲学领域冲劲十足,但在艺术领域因循守旧。二者都同样基于理性、数学、法则和秩序。

---

〔1〕 在艺术史上,文艺复兴的古典主义分化成两个流派,一个是巴洛克艺术,另一个是风格主义。路易十四的趣味属于前一种,站在华丽、正统、“壮丽”一边而非正统的、反对理想的完美主义的风格主义相对。

〔2〕 勒诺特尔(Andre Le Notre, 1613 - 1700 年),法国园林建筑师。  
芒萨尔(Jules Hardouin Mansart, 1646 - 1708 年),路易十四的建筑师。  
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 - 1665 年),法国画家,古典主义艺术的代表。

〔3〕 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 1620 - 1706 年),英国作家、园艺家。

〔4〕 克里斯托弗·雷恩(Sir Christopher Wren, 1632 - 1723 年),英国天文学家、几何学家、物理学家和建筑师。

艺术领域的这种守旧精神典型地体现在 1687 年爆发的“古今之争”中。当时夏尔·佩罗<sup>〔1〕</sup>（著名建筑师克劳德·佩罗的弟弟）探讨在诗歌创作方面现代作家是否不如古代作家。此举招致大批评论家布瓦洛的嘲讽。他表示，一个理智健全的巴黎人竟然会贬低荷马和维吉尔，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布瓦洛承认，今人在某些方面胜过古人；通常人们承认，今人理所当然地应该在科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说到文学，胜利属于古典主义和“古人”。在英国发生了持续数年的“书籍之战”，与这场争论遥相呼应。乔纳森·斯威夫特卷入其中。<sup>〔2〕</sup>虽然这场争论有助于进步观念的初步渗入，但也清晰地揭示了人们对古代典范的深切尊崇以及艺术领域不可能发现新原理的信念。

正如雷恩和伊夫林的言论所显示的，借助于法国的霸权和财富，法国的古典主义扩散到欧洲各地。在内战和克伦威尔独裁之后于 1660 年复辟的英国君主查理二世曾经在法国宫廷生活，在那里形成自己的品味。以后他也一直崇尚法国。复辟时期几乎是英国人在风尚、道德和审美准则方面都效法一个外国的唯一时期。德意志小邦国的宫廷都变成法国的文化附庸。这种文化优势没有因欧洲各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而有所损害，进入 18 世纪其影响在欧洲显得愈益彰明，扩及普鲁士和俄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艺术家常常奔赴法国，因为那里既有金钱又有声誉。与阿伯拉尔和阿奎那的时代相仿，巴黎再次成为欧洲的思想中心，同时它还是艺术和社交中心，是现代的罗马与雅典的叠加。游客从欧洲各地前往巴黎，在那里呆头呆脑地张望，幸运的话还能在沙龙里混迹于欧洲大陆最文明的人群。

世纪之初，朗布耶侯爵夫人<sup>〔3〕</sup>开创了沙龙这种法国特有的机制，为作家提供一个论坛。在鼓励文雅的交谈与举止的气氛中，作家们与法国社会的精英聚首交往。法国贵族在这里学会把一个奇思妙语看得比一场决斗胜利更有价值。沙龙设在巴黎而不是凡尔赛。在凡尔赛的宫廷里，以国王为中心而精心安排的膜拜仪式变得浮华而乏味。在巴黎的沙龙里，光彩夺目的贵妇人成为高贵的女主人，在家中招待与欧洲贵族摩肩接踵的“文

---

〔1〕 夏尔·佩罗 (Charles Perrault, 1628 - 1703 年), 法国作家。

〔2〕 斯威夫特撰写散文《古代书籍和现代书籍为争夺希腊神话中的文艺之山而战》，英国的争论由此得名。

〔3〕 朗布耶侯爵夫人 (Catherine de Vivonne, Marquise de Rambouillet, 1588 - 1665 年), 因创立文学社交沙龙而对 17 世纪上半叶法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



人”。(由于王室和贵族的种种联姻关系,沙龙成为一个国际交往场所。)伏尔泰在对这个时代所作的精彩记述中宣称,路易十四时代留下的最伟大的遗产是“社交精神”,即马修·阿诺德<sup>〔1〕</sup>所说的“高尚而诱人的社会交往与风尚的理想”。阿诺德还指出:“在法国这个国家,即便是富有文雅阶级之外的人民也大多过着我们所说的人的生活,文明人的生活。”



《若弗兰夫人的沙龙》,P.L. 德比古作

若弗兰夫人(前排右数第三位)是启蒙哲学家的女赞助人之一。她为《百科全书》等项目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援助。

在有些沙龙里,私下的谈话可能是相当大胆的:有些“放荡者”嘲笑宗教,甚至窃窃私语,散播国王的坏话。但是这些都不是公开的。到下一个世纪,一个昔日朝臣回忆说,他们在路易十四时代噤若寒蝉,在路易十五时代窃窃私语,到路易十六时代就放言无忌了。路易十四时代确有一些窃窃私语,但并未影响文雅与虔诚的外观。莫里哀的轻快喜剧多数都很粗俗下

〔1〕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 - 1888年),英国批评家和诗人。

流,但也有少数作品尖锐辛辣;《答尔丢夫》(即《伪君子》)讥讽表面虔诚笃信的伪君子,一度在耶稣会的压力下被禁演,但最终得以放行。一种色情文学在暗地里流传着。但是莫里哀也嘲笑卖弄学识的贵妇人(《可笑的女才子》)以及那些过分愤世嫉俗的人(《恨世者》)。

与18世纪相比,路易十四时代更讲究形式,偏好严肃庄重,其格调略显沉重呆板。宫廷里人们比较虔诚笃信,与路易十五的宫廷相比更讲道德。(路易十四的情妇都有一些个性;1657年,他受波舒哀主教的怂恿而废黜当时的情妇,然后他又找了一个。)国王从起床到就寝,都有一套精心安排的公开仪式,既反映了宫廷对琐碎礼仪的热衷,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君权的崇拜。“对生活各个领域实行中央集权控制,这是路易十四统治的一个特点。”众所周知,路易十四说过,至少人们相信他说过:“朕即国家。”(这也许是编造的。)甚至文学艺术都要受到官方管制。总之,当时是试图把一个大的全部文化思想活动都纳入一个模式。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伟大君主政体想像成一个恣意妄为的专制主义政权或者一个现代极权独裁统治,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路易十四的言行录或训令中,他和他的顾问们表达了他们的王权观念:与黎塞留一样,他们既给国王提出高标准的要求,又赋予国王一些非凡的性质,因为国王位于社会的顶端。路易十四的国家准则大多取自古典主义的理想:应该是一种完美的对称,一切都各就各位、井然有序,绝无疏漏散乱之处。整个国家被想像成一座金字塔,国王处于塔尖。但是国王也是整体秩序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支配这个国家的法律。“神授权利”当然要讲,但是这个新型专制主义的真正核心理念则是出自于理性主义哲学,后者是那个时代一切实用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源泉。我们已经看到,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以及权威主义者都是基于“理性”来设计各自的理论。奥弗顿<sup>[1]</sup>、哈林顿、霍布斯、斯宾诺莎都认为自己的政治观念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笛卡儿理性主义也对路易十四的国家观有很大的影响。它被调集来为绝对主义王权服务。国家应该有一个元首,一个能够代表国家主权的伟大君主,难道还有什么能比这种辉煌的金字塔国家更符合理性呢?

[1] 奥弗顿(Richard Overton,约1625年-?),英国革命时期平等派领袖。

## 正统论与批判

为这种国家进行辩护的政治理论家中,最著名的是莫城主教雅克·波舒哀<sup>[1]</sup>。这位虔诚的宗教人士,赞同无神论者霍布斯的观点:只有把全部权力交给一个主权者,才能终止人类的自然状态,即无政府状态。君主制不仅是惟一可行的合法政体,而且也是最自然的、最符合上帝意志的,因此也是最合理的。波舒哀区分了绝对政体和专横政体。后者是野蛮的,前者是文明的;专横政体恣意妄为,是非理性的,绝对政体受制于理性。因此,在波舒哀看来,国王也受法律约束,尽管国王不是被迫就范。在一个理性时代、充当一个文明国度的君主,这就决定了他要以符合理性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力。此外,他还受到习俗和传统的约束。看来,“波舒哀心目中的上帝代理人不是利维坦,其权力不是绝对一律地施加于由孤立个人组成的人群。他是对国家体制和复杂的臣民等级体系行使他的权威。他和他的臣民都尊崇古老的习俗和久经考验的体制,因而能够和衷共济”(斯蒂芬·斯卡尔维特)。黎塞留和路易十四确实使得君主权力大大增强,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打破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由地方权益和特权利益组成的古老结构;国王在理论上拥有绝对权力,在实践中却受到许多古老习俗的限制,这些习俗“在实际应用时如同法律一般不得违抗”。

波舒哀的政治论著不太严谨,不免有前后抵牾之处。但是他文笔出色,还写过其他许多著作,包括一部世界史<sup>[2]</sup>。他几乎相当于路易十四的官方辩护士,这种地位使他的著述非同一般。身为皇太子的监护人,他能对国王施加个人影响;虽然只是莫城主教,他实际上是法国教会的首领。他撰文反对新教、反对法国天主教会内的寂静主义,即由居永夫人传播的那种流行的虔敬主义。他还反对奥拉托利教派神父理查德·西蒙的《圣

---

[1] 波舒哀(Jacques - Bénigne Bossuet, 1627 - 1704年)法国的高级教士、历史学家、王权神授理论家。

[2] 波舒哀撰写的《世界史论》把人类的历史描绘成一个舞台,先是基督启示的酝酿阶段,然后是揭示和向全世界传播的阶段。这是一部天意决定的历史。这部著作乃是自奥古斯丁以来第一次撰写世界通史的尝试,影响巨大。——原注

经》评注<sup>〔1〕</sup>。简言之,波舒哀就是正统论的发言人。他的雄辩才能(他最喜欢的方式是演说)令同时代人叹为观止。他的政治信条是,国王只对上帝负责,他们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这种信条使他与教皇的正统观念发生冲突。波舒哀是高卢派,即主张限制教皇在法国的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由法国僧侣掌握这种权力,而法国僧侣的主宰是国王。这是路易十四政权的一个重大问题。波舒哀于1682年制定了高卢主义条例,对教皇权威发出猛烈攻击(宣布教皇并非不犯错误;教会会议高于教皇;教皇不得干预法国君主政府和法国的法律与习俗)。

如果说波舒哀为王权辩护表现出一种刻板的正统精神,那么到太阳王统治后期则出现了一种批判精神。费奈隆<sup>〔2〕</sup>(也是教会人士,康布雷大主教)或许可以算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先驱。他为教诲王储、路易十四的孙子,写了《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书中包含一些对路易十四“扬威”政策的抨击,认为这种政策使法国连年征战,国力耗尽。费奈隆的理想国是高度管制的国家,类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或共产主义国家。他强调,在这种国家里,统治者力戒奢华铺张,也不穷兵黩武。他那种批判乃至嘲讽的语调将与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一脉相传,与波舒哀那种正襟危坐的辩护大相径庭。<sup>〔3〕</sup>现实已经出了问题。这个“大君主国”确实有了麻烦。它开始时辉煌显赫,把法国推上欧洲权势的顶峰。但是路易十四的自负与野心使他在欧洲的战争中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法国危在旦夕。太阳王大势已去,仅余荣誉的光环。当他去世时,法国举国欢呼。

由于推崇统一和对称的古典主义理念,路易十四的政府就不能容忍任何新教徒的存在。1685年,发生将新教徒(胡格诺派)驱赶出法国的事件。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认为,这是“历史上奉献给统一之神莫洛克<sup>〔4〕</sup>

〔1〕 西蒙(Richard Simon,1638 - 1712年),法国牧师、古希伯来语学者、圣经评注的创始人之一。圣经评注(biblical criticism)是自17世纪开始形成的一门学科。一些学者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方法分析《圣经》,使之变成一部历史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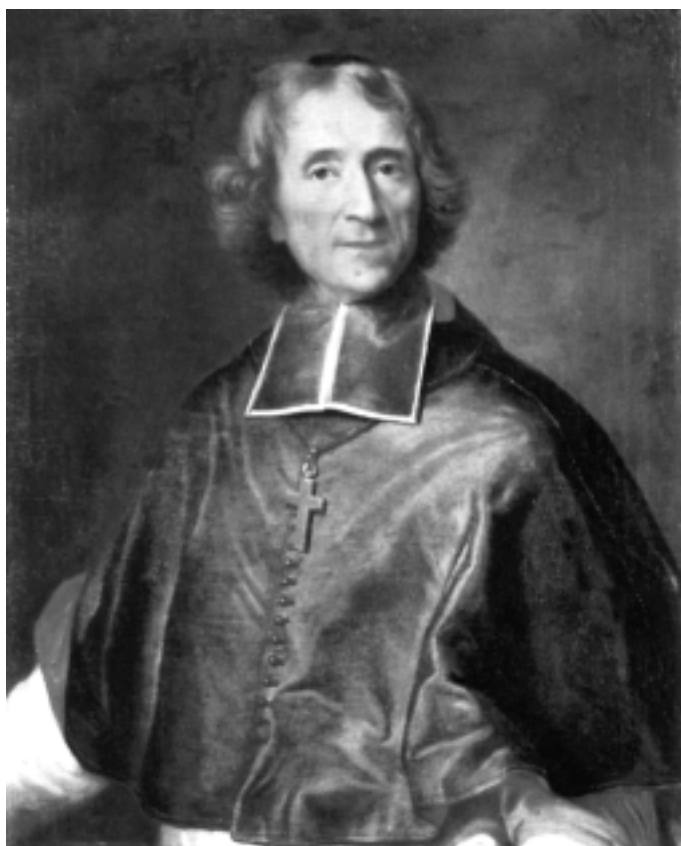
〔2〕 费奈隆(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1651 - 1715年)法国天主教大主教,寂静主义及其主要信徒居永夫人的支持者。

〔3〕 不过,对费奈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就会修正原来把他视为不成熟的启蒙哲人的看法。这里只需提示最重要的一点,他深深浸润于宗教之中,只不过与波舒哀相比,不那么教条,但更虔诚。——原注

〔4〕 莫洛克,古代腓尼基人的火神,以小孩为祭品。

的最大祭品”。法国丧失了一批有价值的公民,而王国获得了对称。在法国内外,在欧洲各地,许多人对这一傲慢而狂热的行动痛心疾首,认为它预示了法国的衰落。或许可以说,这一事件使英国的詹姆士二世丢了王位(英国人对这一事件深恶痛绝,因此反对这位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按照法国模式推行绝对主义政策)。此后,批判的溪流开始洞穿铁板一块的国家。费奈隆说,有的政权“在人民心中毫无基础”,它造就奴隶而不是造就臣民,因此它是一尊泥足神像。

丰特奈尔<sup>〔1〕</sup>也是路易十四统治后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法国科学院秘书、科学普及工作者、批判方法的提倡者、笛卡儿理性主义者。他才华横溢,写了许多小册子。他活了 90 多岁,可谓伏尔泰时代启蒙哲人中的耄耋老者。他对“僧侣权术”怀有抑制不住的厌恶之情,而这正是 18 世纪“自然神论者”的明显特征。实际上,这种宗教怀疑主义或“自由思想”在整个 17 世纪一直在暗地里绵延不绝。其主导源泉是蒙田以及对笛卡儿思想的左翼解释:这个机械的宇宙无须上帝而自动运行。这种见解要是公开说出来,



费奈隆

那就太危险了,在黎塞留时代就会面临牢狱之灾。丰特奈尔采用了含沙射影的策略。他的《神喻的历史》假借抨击异教徒的迷信,巧妙地向读者暗示,基督教也包含着迷信时代的野蛮遗迹。丰特奈尔确信,任何盲从权威的信仰都是愚蠢的。与其他自然神论者一样,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一桩可以用科学来确定的事实。但是,他主张把这种科学的或自然的宗教当做一种文明的宗教,取代以启示为基础的、过时的基督教。他猛烈抨击教会,把

〔1〕 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 1657 - 1757 年) 法国科学作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教士描绘成骗子和兜售奇迹的小贩。这种态度也是自然神论者的一个特征。1686年,他重新挑起多种宇宙模式的讨论。

攻击宗教,就是攻击国家,因为君主权力建立在所谓“神授”的基础上,而且教会是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当英国开始走向宗教宽容时,欧洲大陆几乎还没有人敢于声称,应该把宗教和政治、教会和国家分开。或许可以说,博学的彼埃尔·培尔<sup>〔1〕</sup>正是在这一点上展开了最大胆的突击。1685年,在迫害新教徒的过程中,培尔被驱逐出法国。他定居荷兰后,通过他的著作(《论彗星》和《历史批判辞典》)和主编的文学月刊(《文化界新闻》)而享誉整个欧洲。培尔年轻时就读于图卢兹的耶稣会学院,后来放弃了天主教而改信新教(加尔文宗),在色当的新教学校任教。但是,在荷兰鹿特丹,他的同事朱里约指控他摈弃一切宗教而成为无神论者。这是不实之词。不过,他确实已经公开地离经叛道了。他的政治论点不仅招致来自法国的怒火,而且引起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即奥伦治的威廉)<sup>〔2〕</sup>的愤怒,结果使他丢了教职。培尔肯定是一只牛虻,因此才会使路易十四和威廉三世这两个在一场大战中打得你死我活的仇敌都对他深恶痛绝!他的战斗生涯终止于1706年,时年59岁。实际上,下一代的启蒙哲学家、自然神论者、社会批评家都读过他的书,尤其是《历史批判辞典》(1697年出版),并从他那些大胆的思想中受到激励和启发。(当时书籍很容易从荷兰偷运进法国,从而避开书刊检查。)

培尔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个真正先驱,其作用仅次于牛顿和洛克。他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思考。他特别关注那些涉及邪恶、人类生活中的天意、自由意志、宗教信仰与道德行为的关系、宗教宽容等等的问题。他表现出对摩尼教和诺斯替教的同情,因为这些异端都认为世界上的邪恶有一个独立的本原。他喜欢抨击加尔文教或者其他基督教派,因为他们把上帝说成是邪恶的根源。他最著名的说法——著名的“培尔悖论”——是:无神论者倒可能是好公民,因为公民道德不涉及宗教(另外,他还喜欢说,其实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基督徒)。在所有的领域里,他都遵循自己的格言“谬误并不因为久而久之就不是谬误”,坚持“事实准确”和“批判

〔1〕 培尔(Pierre Bayle, 1647 - 1706年),法国文学评论家、怀疑主义哲学家。

〔2〕 威廉三世(William III, 1650 - 1702年),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执政,1688年光荣革命后与妻子玛丽成为英国君主。

思维”的高标准,对各种事物重新进行考察。这种做法为启蒙运动提供了表率。培尔独自完成的非凡作品《历史批判辞典》成为《百科全书》这座50年后启蒙哲学家树立的丰碑的先驱之作。

培尔写道:

历史学家必须只考虑真理的利益。为了真理,他必须毫不顾及自己的荣辱得失、喜怒哀乐乃至爱国之情。他应该忘记自己属于某一国家,忘记某一信仰对自己的抚育,忘记自己受惠于某一个人,忘记这些人是自己的父母、朋友。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就像麦基洗德一样,无父、无母、无族谱。<sup>〔1〕</sup>如果有人问他:“你是哪里人?”他必须回答:“我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德国人,也不是英国人,也不是西班牙人……我是世界居民。我不效力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不效力于法国国王,只服务于真理……”

虽然这种认真、公正的学术理想可能并不新颖,但是重申这一理想,却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标志。当时,培尔的非正统思想与他追求准确、客观的史学标准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看到,孟德斯鸠年轻时写了一篇论文,对谴责异教徒的正统教义予以批驳。这正是培尔所宣扬的立场。

针对培尔的思想,莱布尼兹撰写了《神正论》,因为在他看来培尔是怀疑论者和悲观论者。培尔与洛克一样,不喜欢夸夸其谈的理论,拒斥古老的权威,提倡重新审视一切。不过他没有像洛克那样,建立新的、明晰的确定性标准。培尔重申了奥卡姆的信念:宗教不可能与理性发生关系,因此我们的理智不可能认识宗教;宗教不过是纯粹的信仰而已。培尔对世界上的邪恶现象痛心疾首,因为他目光所至,历史的每一页都充斥着苦难和残忍。他当然对那些大谈神意和“有益的必要性”的人极其反感,不管他是主教波舒哀还是斯宾诺莎。他所接受的加尔文教教义无疑会促使他相信,肉体是罪恶的,此岸世界充斥着魔鬼的诱惑。但是他对这种说法也很反感,不愿接受。启蒙运动中有一种激愤的悲观主义(见伏尔泰的《老实人》),同时有一种同样强烈的打击、消灭邪恶的愿望。这二者都在培尔身上有所体现。

---

〔1〕 麦基洗德,《圣经》人物,既是国王,又是祭司。“无父、无母、无族谱”,见《圣经·新约》《希伯来书》第七章。

正是因为有培尔、丰特奈尔和费奈隆这些人,当 1715 年太阳王去世之时,法国已经做好了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准备。他留下了一个战败的国家。法国依然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称霸世界的野心受到遏制。国库已经枯竭,农民怨声载道。不过,长期和平已经到来,经济繁荣将会重现。继任的国王和蔼可亲、软弱无能,无法赢得路易十四享有的那种敬仰。时代精神变成了批判、讽刺、大胆、褻渎,同时还有牛顿和科学所带来的新的信心和希望,即认为人类正在向现世理想社会迈进。总之,启蒙运动即将展开。

对启蒙运动做出贡献的也不仅是法国人,即便在法国也是如此。英国(1707 年兼并了苏格兰,因此该称作大不列颠)不仅是 1689 - 1713 年战争的主要战胜国,而且是牛顿和洛克的故乡。这里发生了光荣革命,诞生了议会制政府,实现了思想自由、公民自由以及很大程度上的宗教宽容。英国的声望如日中天,甚至启蒙运动中的法国伟人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也大量地吸取英国的思想资源。在这些思想资源中,最重要的是洛克。洛克关于人类认识论的著作,我们在后面还要论及。

至此,让我们对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对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做一个小结。法国把优秀人才吸引到一点,即巴黎及其周围;法国不仅在经济上扶持了这些人才,而且使他们大大受益于清澈、明晰、流畅的法语,因为此时法语已成为欧洲科学界和外交界的国际语言。当时,欧洲乃至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比这个法国城市更适合成为世界思想文化的首都。它将声望(必然带来权势)与风度、才智、思想结合在一起。它提供了具有国际氛围的活动场所(沙龙、科学院)——巴黎不仅属于法国,而且属于世界。人们会谈到,启蒙运动时期罗马因陈腐的教权主义而黯然失色,伦敦因英国人对思想的冷漠态度而显得有些土气,柏林还笼罩着一种半野蛮气氛,莫斯科根本不值一提。18 世纪,这些地方都仰望着法国,有教养的阶层都用法语交谈、写作。这个准备就绪的舞台很适合启蒙运动,因为这个运动既是法国的,也是世界性的。

## 复辟时期的英国

“这是一个精神愉快、衣食无虞、彬彬有礼、无拘无束、轻松嬉笑、心境



平和、赏心悦目的时代。”这是威彻利<sup>〔1〕</sup>的剧作中一个人物的说法。1660年以后,清教在英国受到明确的排斥。当时最流行的文学作品,例如巴特勒的《休迪布拉斯》<sup>〔2〕</sup>,都对清教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1668年,佩皮斯<sup>〔3〕</sup>在其著名的日记中吐露心声:“对清教徒的辱骂已经越来越乏味了,而且毫无用处,他们最终会被发现是最聪明的一批人。”但是,对某些清教表现的攻击依然持续。这些表现包括:政治上的共和主义,对剧场和其他娱乐的查禁,加尔文教的神学。不过,清教时代的严肃自律精神在经历了反动时期之后并没有中断,到18世纪已重新崛起,到19世纪终于高奏凯歌。即使在复辟时期声色犬马的氛围中,最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清教徒,即约翰·密尔顿;当时问世的书籍中,将会历久不衰而且拥有最多读者的也是清教徒约翰·班扬<sup>〔4〕</sup>的《天路历程》。但是,流行时尚已经转到另一方向。克伦威尔的尸骨被挖了出来,就地抛散。“快乐君主”查理二世重登王位;从法国流亡归来的朝臣成为时局的主宰。

英国复辟时期的轻浮庸俗,恰与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稳重庄严形成鲜明对照。追求典雅(这个时期有“文雅时代”之称)和“更有教养的生活方式”,乃是明显存在于两个国家的共同现象。但是,英国的上流社会混杂着一种粗俗之气,在国王身上就有明显的体现。查理二世有不少美德,举止大方,外表高贵,但是他喜欢讲下流故事,追逐粗俗妓女,在这方面形迹近乎小丑。复辟时期的剧场让人难以启齿——那里终日欢声笑语,但毫无礼义廉耻:

阴谋就是剧情,淫秽就是机智。

英国没有出现拉辛式的人物,悲剧在这里也不合时宜。范布勒、康格里夫<sup>〔5〕</sup>和威彻利的戏剧,与莫里哀的戏剧相比,同样机智,但更喧闹、更淫

〔1〕 威彻利(William Wycherley, 1640 - 1716年),英国剧作家、诗人。

〔2〕 巴特勒(Samuel Butler, 1612 - 1680年),英国诗人、散文作家。《休迪布拉斯》是第一部针对思想而不是针对人的英语讽刺诗。

〔3〕 佩皮斯(Samuel Pepys, 1633 - 1703年),英国海军长官,因所写日记而闻名。

〔4〕 约翰·班扬(John Bunyan, 1628 - 1688年),清教作家。

〔5〕 范布勒(Sir John Vanbrugh, 1664 - 1726年),英国剧作家、建筑师。

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 1670 - 1729年),英国讽刺喜剧作家。

稗,结构也不够完美。有意思的是,莫里哀作品的英国改编本也变得粗俗了。这两个国家都是由贵族和朝臣领导潮流,但是英国人(我们会想到乡绅韦斯顿<sup>〔1〕</sup>)没有法国人那么讲究。不过,复辟时期英国最主要的作家是约翰·德莱顿。他用古典的对偶句表现出高超的洞察力,从而开启了18世纪。他多才多艺,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最出色的才智表现在讽刺上。德莱顿切身体会到,这个时代过于矫情,重形式轻内容,因而缺乏力度和庄重。他自己显然有些勉强地迎合那种淫荡时尚。



《浪子生涯:玫瑰酒馆的纵酒作乐》 威廉·贺加斯作。

贺加斯是英国复辟时期一个敏锐的观察家、雕刻家、画家。

这个场景出自他雕刻的抨击懒惰、平庸、道德堕落的英国贵族系列版画。

著名的文学浪子罗切斯特伯爵<sup>〔2〕</sup>的愤世嫉俗反映了复辟时期整个情绪的“坚硬与机敏”。罗切斯特与蒙田、霍布斯以及稍后的斯威夫特同属一类人。他们都觉得人性并不值得夸耀。在罗切斯特心目中,人是一种怯

〔1〕 乡绅韦斯顿是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中的人物。

〔2〕 罗切斯特伯爵(John Wilmot Rochester, 1647 - 1680年),英国宫廷才子、诗人。

懦、贪婪、淫欲的生物,表面上的美德只是虚伪的假象。这种霍布斯式的人性论在比较愉快的 18 世纪受到尖锐抨击。在复辟时期(1660 - 1688 年),尽管宫廷里花天酒地,但英国还没有找到政治上的安宁。快乐君主忐忑不安地坐在王位上,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的权力和界限。约翰·伊夫林热切地祈祷:“无限仁慈的上帝造就这些事物,但愿有一个稳定而严肃的机构来统治我们的国家和教会。”这一愿望直到 1688 年之后才得到满足。这一时期,英国飘忽不定,虽然没有公开的内战(1688 年以前),但仍有严重的动乱。争论的焦点逐渐集中于查理二世的弟弟是否享有继承权的问题(查理二世有几个私生子,但没有合法的男性继承人);泰特斯·奥茨掀起了一次全国性反对天主教的歇斯底里;不断发生阴谋、反阴谋、公开处决等系列事件;另外还发生了对外战争、瘟疫和伦敦大火。瘟疫迫使牛顿回到家乡农庄,反而使人类受益无穷。有些人也把伦敦大火说成是因祸得福。但是英国在对外战争中获益甚少,查理变成强大法国的附庸,因此被视为对新教事业和国家利益的背叛。虽然宫廷里歌舞升平纵情声色,但整个国家没有什么值得庆贺之事。

当然,这个时代绝非完全轻浮贫乏。查理确实花费许多心思考虑究竟去会见哪一个情妇:内尔·格温,还是斯图尔特夫人,还是克利夫兰公爵夫人?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即对科学怀有真挚的兴趣,因此由他来主宰牛顿的时代并非完全不合时宜。皇家学会就是在他统治的第二年获得特许状。学会在培根哲学的旗帜下,粹集了牛顿、波义耳这样的科学家。德莱顿、考利等诗人,佩皮斯、伊夫林等公职人员也纷纷支持科学运动。民众或许还会相信巫术——最后一批巫术审判发生在 17 世纪末。但是,科学观念日益发展。当然,除了少数自由思想者外,一般人并没有摈弃宗教,不过,宗教已经在脱去神学外衣,也不再带有迷狂气氛。任何煽动宗教狂热的东西都引起强烈的反感,因为人们马上会联想到革命和内战:不正是那些过分虔诚的迷狂者煽动人们杀死了他们的国王吗?查理秘密信仰天主教,其弟詹姆士(准备继承王位)公开信仰天主教,这些都引起社会的惊恐。人们已经习惯把天主教徒与极端的新教徒归为一类,因为二者都与保持温和、理性的信仰水火不容。天主教徒被说成是盲目相信教宗的一贯正确性,极端的新教徒则同样非理性地沉浸在内心启示的妄想中。一个神智健全的人懂得,宗教信仰太少不行,太多也很危险。人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放在别的方面,就算是不该放在娱乐上,那也应该放在科学、诗歌、戏剧以及新型的

“政治算术”研究(威廉·配第爵士<sup>〔1〕</sup>)或者其他有用的技艺上。

在查理二世时期,殖民活动十分活跃,英国、至少一些英国人获得了财富。1685年继承王位的詹姆士二世招致了全国一致的反对,这反而为未来立宪时期英国的强大实力和荣耀奠定了基础。1688年光荣革命后,威廉三世时期的英国在1689-1713年的漫长战争中,领导盟国打败了强大的法国。前一章在论述洛克的伟大政治著作时,已经提及随着光荣革命而来的政治论战。事实上,英国和法国一样,18世纪的基础是在17世纪末奠定的。这不仅仅是牛顿和洛克的时代,而且也是辉格党和商人势力崛起的时代,还是宗教宽容和理性宗教的时代,是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兴起的时代。



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设计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

这种风格就是新古典主义。英国人与法国人一起把希腊人开创的这种风格当做艺术的正道而大加赞赏。说它是正确的,是因为它是“自然的”。这种风格被确定为简朴、和谐、明晰、文雅、宜人。它排斥粗劣、笨拙、迂腐、过分的激情,总之一切不守中道或失衡的东西。在建筑上,17世纪初,伊尼戈·琼斯把16世纪意大利人帕拉第奥那种严格的古典风格引进英国。17世纪中叶的动乱时期,这种风格一度消沉,然后由于与洛克同庚的克里斯托弗·雷恩加以振兴。在许多英国人心目中,雷恩简直可以与洛

---

〔1〕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 - 1687年),英国经济学家,被公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

克、牛顿三足鼎立。雷恩曾经担任天文学教授,与他们怀有同样的科学兴趣。作为 1665 年大火后伦敦重建的首席建筑师、圣保罗大教堂的建造者,克里斯托弗爵士异乎寻常地改变了英国人的审美趣味,使之转向新古典主义。但是,17 世纪晚期的时尚中还存留着一种巴洛克因素,主要体现在当时另一位伟大的建筑师(也是剧作家)身上。他就是约翰·范布勒<sup>[1]</sup>。他对哥特式建筑和中世纪城堡感兴趣,建造了巨大而不适宜居住的豪宅(其中最著名的是为马尔伯勒公爵建造,最后令马尔伯勒夫人大为光火的布兰姆宫)。到 18 世纪,他的风格已经遭人诟病。随着他的去世,18 世纪严谨、高雅、庄重的罗马风格的时代,建筑领域的伯林顿和肯特<sup>[2]</sup>的时代到来了。



范布勒为马尔伯勒公爵设计的布兰姆宫,英国牛津郡

文学的情况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德莱顿等人指责伊丽莎白时代的文人,包括莎士比亚在内,不够文雅,缺乏条理,表达不精确。他们被公认是美玉,其实他们是璞玉,含有许多杂质,剔除之后才能造就优秀的文学。新古典主义也不可能认可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及其同伙那些生硬的反论和杂乱的格律。因此,环境已经变化,18 世纪那种文字工整、讲究思想性的韵文将应运而生,蒲柏将写出抑扬顿挫的韵文,文雅的“想像愉悦”将受到欢迎。18 世纪伊始,杰里米·柯里尔<sup>[3]</sup>对戏剧表演中海淫诲盗现象发

[1] 约翰·范布勒(John Vanbrugh, 1664 - 1726 年),英国戏剧家、建筑师。

[2] 伯林顿(Richard Boyle Burlington, 1694 - 1753 年),英国建筑师,18 世纪新帕拉第奥式风格创始人之一。

肯特(William Kent, 1685 - 1748 年),英国建筑家和画家。

[3] 杰里米·柯里尔(Jeremy Collier, 1650 - 1726 年),英国的一个主教。

起了一次著名的抨击。由此就给这个世纪定下文雅的基调。复辟时期的浪荡使那种对“文雅举止”的追求受挫；现在中产阶级开始树立自身的形象。他们抛弃了革命的清教主义，纷纷购买艾迪生、笛福、蒲柏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成为文雅的读者大众的主体。18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这种文学市场的出现。这使作家摆脱了对贵族庇护的依赖。他可能在格拉布街<sup>〔1〕</sup>饥寒交迫，也可能像蒲柏那样名利双收。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一种高贵职业中骄傲的一员，不再是阿谀奉承的弄臣或某个贵族膝下的哈巴狗。

于是，“舆论帝国”时代开始了。所谓“舆论帝国”是后来的一位历史学家回顾整个法国革命历程时概括启蒙运动主要特征的说法。当时出现了一个买书和读书的大众群体，作家也尽力取悦这个群体。供求法则支配了文学和思想领域。这在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则是前所未有的。以前，写书和出书是为了满足教育的需求，书籍只是被有限的学者和学生使用。有的书写出来只是为了取悦某个有钱的施主。施主通常是国王或贵族。17世纪以前，几乎不存在一个庞大的、能够和愿意购买严肃书籍的读者大众群体，也不存在能够广泛发行的报纸和杂志。这样的读者群和报刊是从18世纪初开始出现的。<sup>〔2〕</sup>

蒲柏的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他靠翻译荷马史诗发了财。这项工作乃是对当时新古典主义的一份重要贡献。英国人借用古典文学白银时代的名称，把这个时代称作“奥古斯都时代”。他们追求“中庸之道”，即适度精神。英国文学的刻意文雅，更多地反映了清教的影响，而不是希腊罗马精神。不过英国人自以为是在重现古代艺术的理性准则。英国从复辟时期转向奥古斯都时代，其实是转向细腻、文雅乃至纤弱。世纪交替之时，德莱顿写道：

（我们的时代）终于学会了文雅；

---

〔1〕 格拉布街是伦敦的一条街道，是为生计挣扎的独立作家、新闻记者和出版商的传统聚居地，也是出版业的一个中心。

〔2〕 根据约瑟夫·弗兰克在《英国报纸的发端：1620 - 1660年》（1961年）中的描述，英国的报业在革命时期产生了一些柔弱的根芽，但是在克伦威尔和复辟时期，这些根芽都被拔除。直到1688年以后的一代人才找到适合自由新闻业成长的土壤。——原注

但是得到了技巧,失去了强劲。

不过,18世纪,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先优势不在文学艺术领域。它的最大成就和最值得夸耀之处,乃是1688年之后终于实现的自由。这是一种有秩序的自由,而不是混乱的自由,与之相伴的是“稳定而适度的(国家和教会)建制”。正是这种自由吸引了孟德斯鸠、伏尔泰这样的法国人,否则他们不会对英国社会那么倾心。

当然,英国还在一个领域占有优势,那就是与牛顿的名字相连的领域。除了科学领域和宪政领域外,英国对启蒙运动的影响还包括“伟大的洛克先生”的威望。洛克不仅是英国自由的经典阐释者,而且在1690年发表了《人类理解论》,为自己又增添了新的桂冠。它比其他任何文献都更准确地概括了整个欧洲感觉到即将随着18世纪一起露出曙光的新秩序的基本原则。

## 洛克的《人类理解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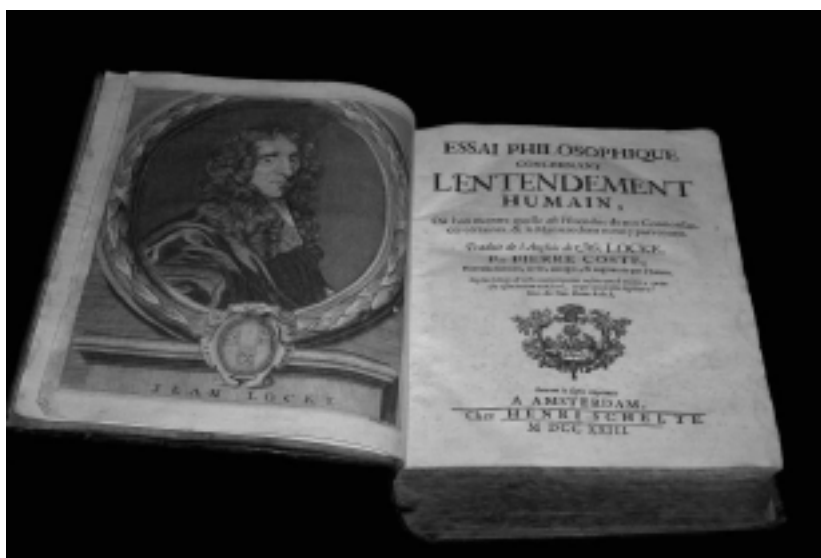
启蒙运动期间,约翰·洛克与牛顿一样声名显赫。在所有的文献中,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最有资格成为“启蒙运动宣言”。就对一个时代的影响而言,洛克属于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完全可以与在他之前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和在他之后的卢梭、马克思、达尔文以及弗洛伊德等人相提并论。与许多伟大的通俗哲学著作一样,《人类理解论》也遭到严厉的批评。人们说它有许多明显的不严密之处。但是我们不要盲目地追随那种极端形式主义的态度。洛克的不严密恰恰具有心理学的优势。与不严密的思想体系相比,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反而可能更不容易让人相信。洛克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他以一种杰出的方式在哲学与普通人之间加以调和。乔治·桑塔亚那<sup>[1]</sup>指出:“如果洛克的思想再深刻一些,就可能没有那么大影响了。”洛克的政治论著所表现出的那种清晰的表述、透彻的分析和健全的常识感,也同样体现在这部更著名的著作中。只不过在这部著作里,他力图阐释我们的头脑是如何工作的,所加工的对象是什么。

这是一部十分自觉的革命性著作。它摆出一副谦虚的样子,但这是假

---

[1] 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 1863 - 1952年),西班牙哲学家,小说家。

谦虚,因为洛克其实是想荡涤以前所有的哲学。一开始,他只是给自己设定比较卑微的抱负:“消除认识之路上的一些垃圾。”正确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在踏上认识之路之前,先检查我们的头脑,看看它们适合哪一种旅行。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只有在地球上行驶的交通工具,就不应该计划到外层空间旅行。当然,洛克发现,我们的头脑是有限的。但是,他认为,如果我们仅仅在适合我们脑力的范围之内活动,我们就能在这种健全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知识。这套知识将会是确定的和真实的。洛克所发现的坚实基础



洛克的《人类理解论》

不是笛卡儿的“明晰观念”,而是感觉经验。洛克先是攻击那些相信“先天观念”的人(应该是指笛卡儿主义者;在英国,彻伯里的赫伯特勋爵是最好的例证)。或许洛克也把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算在这种批判对象之列。很难找到有什么人主张人天生就具有实际的“观念”,但是

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儿认为有一种固有的理性,即成熟的大脑中有一种默认某些先验的逻辑命题的能力。洛克似乎也做出这种假设。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可以在洛克的这个主张中找到:“理智中的一切无不首先存在于感觉之中。”对此,莱布尼兹重复亚里士多德的话,做出经典性的反驳:“除了理智本身。”洛克合乎逻辑地推论,理智扮演着一种被动的角色,就像是感觉印象的登记处。洛克认为,头脑中没有什么思想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张白纸,一块“白板”,经验在上面印下所有的一切。“所有的知识都建立在或最终来自于感官……或感觉。”我们最崇高的观念,天才的最复杂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感觉印象的简单积木。简单的观念经由大脑把它们叠加在一起就变成复杂观念。

在洛克看来,大脑具有这种通过“反省”把简单观念组合成复杂观念的非同小可的能力。但是,人们觉得这基本上是一个机械过程。洛克的一些信徒则将其阐释为“联想”法则的作用。这个法则决定了观念是如何汇聚



起来的。洛克本人在再版的《人类理解论》中对此有所暗示,后来英国的大卫·哈特利<sup>[1]</sup>、法国业余“哲学家”孔狄亚克和爱尔维修对此做了发挥。在后者那里,它变成对一切“形而上学”做粗俗嘲弄的手段。洛克本人在这个问题有些模棱两可。如果大脑确实在这里完成某种创造性任务,那么他的经验主义就打了折扣。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批评洛克,说他虽然一开始勇敢地高举纯感觉经验的旗帜,但是他偷偷塞进了许多理性主义的假设,因此不能称为一以贯之的经验论者。洛克的出发点,《人类理解论》的基本精神,“与厌恶玄想的潮流相契合”。为了驱散所有的自命不凡的形而上学和毫无意义的幻想,洛克希望在他本人所属的务实的市民阶级中受到广泛的欢迎。有人说,他代表了哲学上的鲁宾逊。鲁宾逊是洛克同时代的同胞丹尼尔·笛福创作的一个自力更生的人物。洛克追求简明、务实,而且不想成为怀疑论者。因此他十分大胆地宣称,万物都是简单明了的。但是他确实没有恪守他的经验主义。他说,我们的大脑是一块白板,汇聚到它那里的东西都来自感觉。但是,它又有以某种方式发现普遍法则的能力,能够获得“清晰而确定的”真理,具有数学确定性和明晰性的真理。在洛克的经验论和他的理性明晰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逻辑断裂。贝克莱和休谟对此做了阐释。洛克断言:“理解力具有一种天生的能力,能够觉察到观念的联贯和无条理,并且能恰当地加以整理。”它可以推理。那么,它真的是一块白板,真的是从经验获得一切吗?

洛克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区分物体的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我们知道,伽利略早就提出这种区分。洛克认为,“硬度、体积、形状、运动和数量”都会如实地进入我们的头脑。这些性质是物体的基本属性,确实“存在”,因此我们如实地感受到它们。颜色、声音、气味、味道和触觉等第二性质,并不存在于客体之中,而是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洛克发现,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通过感官获得的。这就提出了难题。他有时几乎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仅仅通过我们的感官获得知识,那么我们就绝不可能确信他所宣称的他的方法的可靠性。实际上,我们就非常可能陷入绝望的怀疑论。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感觉印象或我们自己的“观念”,而且这些东西完全是可以被了解到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它们是否符合外部世界存在的东西呢?按照洛克的分析,它们与外界的客体并不是一回事,没有什

---

[1] 哈特利(David Hartley,1705 - 1757年),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么能够保证它们与客体完全相像。你眼睛视网膜上的影像与你所看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们完全依赖它来获得我们的知识,很显然,这种知识肯定不具有洛克所说的那种确定性。他说,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是确定而真实的。但是他在试图论证这种确定性的过程中却引发了最严重的怀疑主义疑难。在洛克之后的许多哲学家心目中,那种认为头脑能够如实地捕捉到外界事物的知觉“直接摹写”论,实在是太天真了。洛克提醒我们,在我们与客体之间,隔着我们的感觉这个屏幕。

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我们的知觉至少有一些不是“指向外界”。例如,色盲者的情况就能使我们发现,颜色取决于我们的视觉器官。洛克从伽利略那里借用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承认这种情况属于第二性质,但是也竭力用第一性质来证明存在客观知识。贝克莱后来证明,这种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当我们思考一个事物的时候,大小和形状也与气味和味道一样是“主观的”。一切呈现出来的知识,是我们的特殊感觉器官赋予我们的,而不是直接和立即认识到的。

另外还有一些对洛克的批评。他在术语的使用上不够严谨,而这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该有的问题。例如,他使用的一个关键词“观念”,既表示来自外界的感官刺激,又用来表示头脑里的观念。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细心的分析家带着后来人的敏锐批判眼光来阅读洛克的作品,那么这位英国哲人可能就像是那样一类作家:开始时斗志昂扬,大有“筚路褴褛,舍我其谁”的气势,结果却是身陷困境,只得敷衍了事。他曾许诺要将一切知识置于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最后却以某种绝望的怀疑论或唯我论(即我只能认识我自己的精神世界)收场——这是他的两个主要的英国后继者贝克莱与休谟最后分别持有的立场。正如以赛亚·柏林<sup>〔1〕</sup>指出的,洛克“最终创立了两个世界”,一个是主观世界,一个是外部世界。我们可以认识和使用主观世界,但是它并不保证自身的客观真实性。把我们与外部世界隔开的是我们的“观念”这一屏幕。这一结果远非他的初衷。

根据几代批评家挑剔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来评判一个思想家,是不太公正的。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无数的人在读洛克的作品时感到,一种新的启示降临了,眼前的迷雾被拨开了,知识王国重获新生。一点点健全的常识就驱散了所有晦暗的形而上学,打开了窗户,放进了光亮。

---

〔1〕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 1909 - 1997年),英国哲学家,思想史学者。

观察、验证、科学,成为通行的口令。昔日的太虚幻境一扫而空,哲学从天上落到地上,从神秘和晦涩转向事实和真理,变成对于每一个人都既有用又能理解的学问。后来的启蒙哲学家会说:“常识之光已经普照欧洲。”以赛亚·柏林则指出,几乎可以说正是洛克创造了“常识”。在伏尔泰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米克罗梅加斯》中,我们可以看到,启蒙哲学家们是多么心悅诚服地把洛克视为惟一谦逊而明智的哲学家,以及如何揭穿其他所有学派的虚妄。斯特恩<sup>[1]</sup>让他作品中的主人公特里斯川·项狄宣布:“是他把世界从无数粗俗错误的垃圾堆里解救出来。”博林布鲁克<sup>[2]</sup>怀着崇敬之情写道:“他诉诸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和自觉的认识,而且他让自己所呈现的一切都清晰易懂。”在晚些时候,即1829年,美国的一位崇拜者称颂到:“在《人类理解论》中,智力科学第一次以清晰易懂的面目出现,不再掺杂长期以来使之扭曲变形的虚妄幻觉,使得每一个有教养的人凭借朴素的健全理智都可以理解。”正是根据洛克的启示,人们抛弃了那些无益的繁琐论证和单调乏味的空泛之词,直接立足于简明的基本原理之上,从而有了一种找到新起点的感觉。

在启蒙运动之后,一些浪漫派在批评启蒙运动的弱点时,将其对审美的漠视归咎于洛克,说他让人们忽视美、艺术以及除了平庸事实之外的一切。约瑟夫·德·梅斯特尔抱怨说:“这是所有的宗教、所有高雅情感、所有崇高冲动的毁灭。”洛克身上确有只重实用的倾向。传记作者莫里斯·克兰斯顿指出,当洛克参观欧洲大陆上的大教堂时,他感兴趣的仅仅是它们的大小尺寸!在18世纪,“洛克的信徒”,实际上就是启蒙运动所推崇的人,是谨慎、小心、务实的人。他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人,是有道德的人和有用的公民,可能很有智慧,但不太可能是诗人,心甘情愿地撇开崇高而朦胧的经验领域,厌恶对终极问题的冥思玄想,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冰冷哲学的触及”<sup>[3]</sup>扼杀了启蒙时代的诗意。

但是,在18世纪,人们宽慰地转向洛克的方法,发现它在各种不同的

[1] 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 - 1768年),爱尔兰籍小说家。代表作是9卷本的《项狄传》。

[2] 博林布鲁克(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 1672 - 1751年)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

[3] “冰冷哲学的触及”(touch of cold philosophy),出自济慈(Keats)的诗作《莱米亚》。

方面都富有成效。它把人们从陈规陋习中解放出来,并且提示了新的方向。一般而言,它就是蒲柏所说的“人类的正当研究对象是人”,不是上帝。具体而言,洛克的白板概念,即空白的头脑可以被经验任意塑造,暗示了教育的重要性,展示了通过改善社会环境来改变人性(当然是变得更好)的令人振奋的前景。后来,当爱尔维修宣布“人们的性格源于他们的外部环境”时,他无疑是在引申洛克的观点,但这是很自然的引申。洛克主义也与牛顿主义一起,推广实验的经验方法和提高实用科学的地位。它激发人们充满信心地期待,运用这种方法能够获得“真实而确定的”知识。

在所有的领域里,洛克主义都鼓励进行实验。在文学领域,那些受《人类理解论》影响最深的人,如斯特恩,最不可能再墨守新古典主义的规矩。洛克是偏见和惰性的敌人,他与弗兰西斯·培根乃至蒙田一样,对人类的偏见、谬误和非理性做出精辟的评论。对于洛克来说,理性的思考是最重要的:

神庙都有其神像。我们看到它们对于大多数人类有多么大的影响。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和形象是无形的权威,时时刻刻统治着他们;对于这些东西,他们都普遍地心甘情愿地服从。因此,最重要的是,必须关注人们的理解力,正确地引导它去探索知识和做出判断。

但是,多数人“几乎根本不运用理性,而是照别人的样子亦步亦趋”,还有些人则“是用激情取代理性”。第三种人虽然力求遵循理性,但缺乏“所谓博大、健全与融通的意识”,结果是以培根所说的假相崇拜者的方式误入歧途:被一个命题牵着走,或将一个理论无限演绎。假如人们从童年就接受了某些原则,使其深深扎根于脑海之中,那么这些原则就会“因长期习惯和教育而固定在那里,不可能再拔除”。洛克调动他那强劲的常识力量来反对这种成见,反对用情感代替思考,反对迷信权威,即“放弃我们对公认意见的认同,不论这种意见出自我们的朋友、同党、邻居,还是举国一致的声音”,因为这种东西“使得比其他各种人加在一起还要多的人陷于愚昧或

谬误”。这里表达的是启蒙运动的真正呼声。<sup>〔1〕</sup>一旦从形而上学和权威束缚下解放出来,启蒙运动就会凭借着实践理性勇往直前,通过独立思考来开拓真知的疆域。

《人类理解论》引发了许多争论。这对一部提出挑战性论点的著名作品来说,乃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洛克沾了他的朋友、伟大的牛顿的光,而且与这位科学家一样,他没有遇到多少阻力就在当时的知识界赢得了赞许。但是,也有一些批评者。英国国教会主教斯蒂林弗利特在洛克的著作中发现了“霍布斯主义、怀疑论和离经叛道”,认为他那种激进的经验主义颠覆了所有的普遍原则或一般概念,因此会摧毁基督教。到1713年,贝克莱主教把洛克主义转换成非物质论(稍后还会论及);在此之前,也有一两个人做过这种尝试,例如阿瑟·科利尔<sup>〔2〕</sup>。约翰·诺里斯<sup>〔3〕</sup>在1701年发表的著作也从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这种学说经由剑桥学派在英国牢固确立)的立场批判洛克,并且掺杂着被马勒伯朗士神父修正过的笛卡儿主义的影响。他们的著作都比较晦涩难懂,而贝克莱从某种洛克式原理出发却突然转向纯粹唯灵论(除了观念,其他一切都不存在),这惊人一跳几乎吸引了整个有教养阶层的注意。接着,大卫·休谟证明,洛克的思想里潜藏着各种怀疑论。大卫·哈特利则发展了机械论的心理学。由洛克开创的“观念之路”分别导致了唯灵论、怀疑论和决定论。

它还导致了自然神论。这一点在下一章里讨论。斯蒂林弗利特主教曾推想,如果人们只接受建立在感官知觉上的知识,而不接受其他知识,那就会摧毁基督教信仰乃至一切宗教信仰的基础。洛克被指责鼓吹唯物主义:说他是一个改头换面的斯宾诺莎主义者,因为他排除了所有关于本质的真正知识,而这就意味着排除了上帝。除了斯蒂林弗利特之外,威廉·卡罗尔也是这样一位批评者。他预见到在洛克这里萌发、在休谟那里将充分展开的怀疑论。洛克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仅相信上帝存在,而且相信基督教启示是可以得到清晰的证明。但是他的方法和观念,与其他同路人,尤其是法国笛卡儿理性主义者培尔和丰特奈尔的影响一起,开启

---

〔1〕 这段里的引文出自洛克的文章《理解力的运用》。他原想把这篇文章作为最后一章加到新版的《人类理解论》中,但是他一直没有写完。这篇文章是在他去世后与另外一些未完成稿一起发表。——原注

〔2〕 科利尔(Arthur Collier, 1680 - 1732年),朗福德马格纳的教区长,哲学家。

〔3〕 诺里斯(John Norris, 1657 - 1711年),圣公会牧师,哲学家。

了怀疑之门，

## 莱布尼兹

在洛克的论战对手中有一位显赫的思想家。此人不仅在他的德语世界，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

莱布尼兹是 17 世纪晚期伟大的理性主义体系哲学家之一。他的一些观点成为德意志启蒙运动的独特特征。

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具有重大影响。他就是戈特弗里德·莱布尼兹。作为科学家，他与牛顿争夺发现微积分的优先权。在这场不体面的争执中，英国方面至少有同样多可责备之处。后来数学在微积分方面的发展采取了莱布尼兹的形式而不是牛顿的形式。至于优先权，显然他们是同时独立地得出结果。这种情况在科学中并非绝无仅有。莱布尼兹首先发表了成果，生性谨慎的牛顿私下里也完成了这项研究。作为哲学家，莱布尼兹曾与洛克和塞缪尔·克拉克<sup>〔1〕</sup>进行辩论，因而使得他在法国的崇拜者也群起反对洛克—牛顿世界观。莱布尼兹是一个深刻而敏锐的思想家，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他深受柏拉图主义、

经院哲学以及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后者在他年轻时（他的生卒时间是 1646 - 1716 年）令他振奋。他力图对所有这一切做一个综合。在 18 世纪大多数启蒙哲学家看来，莱布尼兹过于形而上学。他们总体上觉得洛克的简明的经验论更合他们的口味。但是，莱布尼兹思想的说服力和独创性是不能否认的。他的多才多艺也体现在其他许多活动和规划方面，例如组建柏林科学院，制定以科学神学为基础统一欧洲教会的计划，制定欧洲政治统一的计划。他留下许多未发表的文章，预示了某些方面现代

〔1〕 克拉克 (Samuel Clarke, 1675 - 1729 年)，英国神学家、哲学家。

科学的发展。后来的学者从中看到一个极富思想能力的头脑。

莱布尼兹不能接受洛克的经验主义。他指出,确实存在着先验真理,即不是来自于感觉经验的、但更确定的纯粹理性的真理。太阳明天还会升起,是与2加2等于4的命题完全不同类型的真理。他用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在洛克的说法“理智中的一切无不首先存在于感觉之中”后添加“除了理智本身”,从而对洛克提出反驳。洛克的经验主义与莱布尼兹的理性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正是这种二元对立和张力构成了18世纪哲学的特征。人们转向被观察到的、感觉到的、体验到的事实,在这种现实中发现了新意和真理。这些与昔日形而上学所提供的枯燥的抽象概念迥然有别。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也期待着这些事实产生出普遍规律,而且是最严格的规律。他们觉得概括性结论的得出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他们究竟是从事实得出规律,还是让事实去适应已经根据纯粹理性推导出的规律?

莱布尼兹批评牛顿的绝对时空概念,还批评他把物质看成固体离散粒子的观念。就此而言,莱布尼兹似乎预示了极其现代的爱因斯坦的观念。他还预示了20世纪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发明。他不愧一位伟大的数学家。

莱布尼兹本人描绘的世界图景十分有趣,但当时几乎没有赢得什么人支持,被人们看做纯粹玄想。今天看来,它可能不那么异想天开了。莱布尼兹宣称,宇宙是由“单子”构成的。它们是微小的精神单位,每一个都映照出宇宙,但是它们不与自身之外任何事物发生互动。这种单子最令人惊讶的特征或许是,每一个单子都是一个“视点”;它们有各自不同的位置,因而以不同的方式反映这个宇宙。单子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克服笛卡儿二元论的努力,也是对斯宾诺莎一元论的一个反驳。莱布尼兹的宇宙是极其多元化的,其中每一个最微小的成分都是各不相同的(与泡利<sup>[1]</sup>的不相容原理相对照,就会发现这种观念是令人惊讶的现代)。同时,每一个成分都与其他所有成分相互联系着,每一个单子的变化会引起其他所有单子的变化。这个体系有一种上帝预定的和谐。受笛卡儿科学和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莱布尼兹把经院哲学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纳入了这个极其新奇的世界画面中。今天看来,这种观点贴近现代亚原子科学研究的惊人发现。

---

[1] 泡利(Wolfgang Pauli, 1900 - 1958年),奥地利出生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由于伏尔泰在《老实人》中的嘲弄,莱布尼兹关于“可能存在的最好世界”的乐观主义在18世纪闻名遐迩。莱布尼兹认为,甚至包括上帝的意愿在内,凡事必有其充足的存在理由。上帝在许多可能的世界里选出了这个世界,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一定的理由。世界有其必然的法则和相互的联系;一旦某一特定世界被选中,它其中的所有事物就必然会过去和现在的样子,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其实,上帝决定了过去历史的每一个情节和未来所有的事件,这些都是整体结构所需要的模式的一部分。但是上帝本来可能选中其他许多可能的世界。他之所以选中这个,是因为这个世界所包含的可能的邪恶最少。在每一个世界里都必然会存在一些邪恶。最初,上帝运用他那完美的头脑,犹如大型计算机在运算(我们可以猜想),判断出哪一个世界包含的邪恶最少,然后就创造出了它。

莱布尼兹最后的著作之一是《神正论》(1710年)。该书试图解释为什么我们所见到的邪恶是可能的数量最少的那一种。这是回应培尔的悲观主义而写的。这部重要著作探讨的是迷惑了整个18世纪的问题。卢梭后来的回答是,善必须包括自由选择,因此势必包含恶的可能性。这种回答是莱布尼兹所考虑的多种答案之一。或许他最著名的回答是:凡是创造出来的世界必然不完美,不完美是造物的一个必然属性。惟有上帝是完美的。如果我们问,上帝为什么在他身外创造一个世界?我们可以回答说,存在,即使是不完美的存在,也比不存在好;或者说世界要完美,就需要事物有等级之分,就需要用不完美来衬托完美。当莱布尼兹纠缠于这类问题,包括(人和上帝的)自由意志问题时,我们可能会觉得他坠入无底深渊。我们可能会像伏尔泰那样举起我们的手,只是指向我们在身边能够看到的邪恶。<sup>〔1〕</sup>

有些人认为莱布尼兹是晦涩的德国形而上学的开创者,而且他打发邪恶的方式也很暧昧。他们最好也想想这位旷世奇才的另一面:他的实用技术。著名的科学史家乔·德·桑蒂拉那历数了莱布尼兹的贡献,包括“航空学(他发明了这个术语)、声学、光学仪器、钟表机械、天象仪、导航、运河、

---

〔1〕 莱布尼兹的《神正论》是18世纪大量神正论论著中最著名的。在其他人的论著中,我们还可以提及爱尔兰主教威廉·金的《邪恶根源论》。后者在18世纪30年代的英国引起广泛讨论,而且是亚历山大·蒲柏的名诗《论人》的一个主要资料。金的这部论著的拉丁文原本,于1702年问世。——原注



操舵装置、马车车架、车轮、轮轴轴承以及车床等”。<sup>〔1〕</sup> 与培根、笛卡儿、帕斯卡、惠更斯以及 17 世纪其他伟大的科学家一样,他也怀着热烈的愿望,想把理论知识转化成征服自然的实际力量,绝不因为这属于体力劳动领域而置之不顾。这就是“工业革命”的必要框架。其实“工业革命”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长期进程;而决定性的一步是在 17 世纪迈出的。

莱布尼兹的体系,包括其乐观的理性主义,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嘲笑,但是它确实对启蒙运动做出了贡献。它不属于基督教正统体系,因此招致德国宗教界的刻骨仇恨。它在玄想方面非常大胆。虽然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的理性化(在某些方面)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N.L.托里),与其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分道扬镳(有一位启蒙哲学家抱怨,莱布尼兹不是把灵魂物质化,而是把物质精神化),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它与启蒙运动不仅不矛盾,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启蒙运动。莱布尼兹说到底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力图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解决最深刻的道德问题。他还是一位科学家和数学家。与 18 世纪大多数启蒙哲学家相比,他在气质上较为保守,不喜欢培尔身上所体现的那种破坏精神。他十分准确地预见到,这种批判将导致革命。但是宗教界人士却指责他鼓吹无神论。不可否认,他的思想不时地靠近斯宾诺莎主义。

总之,虽然莱布尼兹在 18 世纪初就与世长辞,但是他与洛克一样,对 18 世纪的思想运动做出重要贡献。在 18 世纪的德国,通俗化理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以一种简单化和通俗化的方式传播莱布尼兹的思想。但是,德国并没有像英国和法国那样为启蒙运动的展开做好准备。它的宗教气氛更浓厚,不太鼓励自由思考。当时,德国最有创造性的运动是以哈雷大学为中心的宗教虔敬主义。1666 年,路德派牧师菲利普·斯彭内尔<sup>〔2〕</sup>开始致力于给日渐衰败的路德教注入新的精神。英国的约翰·卫斯理从德国的改革者和神秘主义者,包括 17 世纪的雅各·伯麦那里借鉴了

〔1〕 《美国历史评论》,1959 年 4 月号,第 625 页。——原注

〔2〕 斯彭内尔(Philipp Spener, 1635 - 1705 年),德国神学家,虔敬派领袖。

大量的思想,在 18 世纪 30 年代开始力图振兴英国的教会。<sup>〔1〕</sup> 莱布尼兹遭到保守的德国宗教界的刁难,在自己的祖国却难以发表作品。在法国他反而受到更多的关注。

法国思想史家保罗·阿扎尔<sup>〔2〕</sup>把 1680 年到 1715 年这段时期称作“欧洲良知的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孵化出来的思想,到 18 世纪逐渐变得羽翼丰满;在阴影下潜伏的思想,到 18 世纪显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少数“精英”的思考到 18 世纪已经为所有的识字者耳熟能详。深受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思想影响的、以洛克、牛顿、培尔和莱布尼兹为代表的那一代人,完全可以称做是启蒙运动之父。科学经验主义、新的政治观和艺术观以及批判精神相继诞生。这些构成了 18 世纪的序幕。

---

〔1〕 伯麦(Jacob Bohme, 1575 - 1624 年),德国神秘主义者。伯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黑格尔后来说,伯麦是从柏拉图到他本人之间惟一具有独创性的哲学家。伯麦的神秘主义无疑影响了威廉·布莱克、圣马丹以及 18 世纪那些影响了歌德的德国虔敬主义者。因此伯麦也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鼻祖。他的影响延续到启蒙运动结束之后。——原注

圣马丹(Louis - Claude de Sain - Martin, 1743 - 1803 年),法国神秘主义者。

〔2〕 阿扎尔(Paul Hazard 1878 - 1944 年),法国史学家,著有《18 世纪欧洲思想》。

## 第五章 启蒙运动：自然神论者和“哲学家”

在这个时代，主宰人类命运的是一种更高贵也更真实的哲学，……(而非)那种对错误和腐败习以为常的、令人沮丧的哲学。

——孔多塞

真理不再受制于特殊趣味，  
它的普遍模式将激励全人类。

——托马斯·沃顿<sup>〔1〕</sup>

### 自然神论

17世纪是一个理性时代。这是不可否认的，因为人们一提起它就会想到伽利略、牛顿、笛卡儿、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和莱布尼兹。更准确地说，那个世纪的主要思想家都致力于完善科学分析的方法，即仔细的、严格的、合乎逻辑又符合自然的研究方法，不再直接诉诸超自然的原因。上帝被认为的确存在，但是他是一个有序宇宙的最终保障者，人们需要在考查和分析现象本身的过程中寻找自然界的规律。辉格党的一个洛克信徒直率地说：“我们不应在《圣经》中寻找英国宪法。”人们也不再可能在《圣经》中寻找科学真理。实际上，甚至有少数人开始质疑，在《圣经》里找宗教真

---

〔1〕 沃顿(Thomas Warton, 1728 - 1790年),英国桂冠诗人。

理是否明智！人们也不应把任何东西当做权威看待，如果说《圣经》是上帝的启示，那也必须加以证明。17世纪开始出现了严肃的《圣经》评注，以理查德·西蒙神父的《旧约全书史考》（1678年）最为著名。该书用一种相当现代的方法质疑前五卷（统称“摩西五书”）是否出自摩西。<sup>〔1〕</sup> LM再有，如果仅凭理性就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并且能揭示出道德准则，那么这些陈旧的犹太故事还有什么用处？于是有少数大胆的、或许是不虔诚的人开始这样断言，不过通常是在私下里。多数人不愿意做这种大逆不道的推想，觉得基督教至少应该与现代科学理性取得一致。他们确信这是能够做到的。

正如中世纪经院哲学所显示的，宗教与科学、神学与理性哲学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欧洲的一个老问题。就此而言，18世纪是又一个经院哲学时代，只是改换了一些术语。它也力求协调整理性和基督教。少数人想彻底废除后者，另一极端的人则打算抛弃理性来维护宗教，但多数人希望实现一种调和。

在18世纪前夕，一个苦恼的女士“被自然神论所吓倒，几乎神经错乱”。她恐惧地发问，难道基督教“仅仅是个神话”，“没有更多的理由使人去信仰基督而不信仰穆罕默德”？查尔斯·莱斯利<sup>〔2〕</sup>写信安慰这位软弱的女士，用“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批驳自然神论者。多数人都根据牛顿和波义耳的榜样确信，自然神论者很容易被驳倒。但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易行。1700年，论战刚刚开始。直到1740年，战火还没有彻底熄灭。正如约瑟夫·巴特勒<sup>〔3〕</sup>主教此时给另一部反对自然神论的名著写的前言中所说的，“基督教……现在终于被发现是虚构的，对于这种说法，许多人已经逐渐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批判精神占了上风。较为保守的人士徒劳无益地抱怨，没有什么神圣的了；上帝自己也受到审查了；《圣经》被要求在理性法庭上提交自己的证明材料。在1690 - 1730年间诞生的启蒙精神首先表现为这种盘根问底

---

〔1〕 这位罗马天主教神父竟然与异端斯宾诺莎和霍布斯同流合污，大胆地批评《圣经》，这一事实也反映了一些天主教徒要使新教徒陷入困境的愿望，因为新教徒主张，“《圣经》，惟有《圣经》，才是信仰的依据。”——原注

〔2〕 莱斯利（Charles Leslie，1650 - 1722年），苏格兰神父。1698年写成《一种对付自然神论者的简单易行的方法》。

〔3〕 巴特勒（Joseph Butler，1692 - 1752年），英国道德哲学家、神学家。

的怀疑主义,质疑古老的神话,不迷信任何东西。因此,很自然的是,启蒙运动时期最激动人心的论战是关于宗教的论战,由那些自称“自然神论者”的批判家来抨击那些较为正统的基督徒。应该指出,除了无畏的批判,启蒙运动另一个同样典型的特征是,它本身对所谓理性的信仰。自然神论者如其名称所表示的,是相信有神灵的。他们认为,神的存在是可以运用理性加以证明的。他们不像某些后来绝望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那样在疑问的荒原上流浪,而是真正的信仰者,只不过具有自己的方式。

18世纪并不完全是一个否定宗教的时代。自然神论者和怀疑主义者毕竟是少数。这个世纪既产生了伏尔泰,也产生了卫斯理。但是,这个世纪大多数思想领袖对终极目的不感兴趣,讨厌神学争论。过去这种争论太多了。这是一个思想世俗化的时代。正如托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指出的:“宗教不再是人类的主要兴趣所在,而缩小成可以放肆地越过的生活的一个部分。”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把启蒙运动界定为“使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世俗化”的努力。阿诺德·汤因比提醒我们,对于历史上大多数人和大多数时代来说,宗教是“主要兴趣所在”。但是启蒙运动挑战这种习惯。正是在这个世纪,如果不是还有利用宗教来支持世俗科学的合法性和维系社会道德这样的实用考虑的话,许多人都希望抛弃宗教。

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著名作品,约翰·洛克还写了一部书,名为《基督教的合理性》。作为一个具有自己方式的虔诚教徒,他似乎是因为希望了解我们在宗教事物上究竟能获得多少确定知识而撰写了著名的《人类理解论》。在他写作时,英国人普遍地厌倦神学争论、革命时期的教派狂热和暴力;任何类型的“狂热”都遭到冷遇。当时的主旋律是调和,1688年的温和革命加强了这一主旋律。但是18世纪英国的统治阶级并不欢迎无神论或其他激进的非正统教派,因为基督教还被公认为道德的支柱,因而也是政治社会的支柱。(在荷兰写作的皮埃尔·培尔攻击传统观念。他声称,无神论者可能是好公民。由此引起轩然大波。很难找到哪个体面的人会表示赞同。)在宗教问题上采取更温和方式的时机已经成熟。这种温和方式将会表明,不含狂热成分的基督教只不过是良好健全的理性,即“常识”。

圣公会的广教论者就宣传这一主张。其中包括一些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剑桥柏拉图主义者,他们希望在宗教与科学之间扮演调解人角色。大约从1700年到1720年,该学派的一个主要人物是圣公会学者和哲学家塞

缪尔·克拉克<sup>〔1〕</sup>。在英国教会里,广教论者战胜了被怀疑是詹姆士托利党(1688年以后被废黜的斯图亚特世系的拥护者)的高教会分子。广教论者与早期的宗教宽容鼓吹者卡斯特利奥一样,主张信仰的条款应该“少而简单”,教条要少,基督徒道德内容要多,“狂热”要少,善行要求要多。从神学角度看,加尔文主义过于极端,或许太富于革命性,因此过时了;阿明尼乌主义——荷兰抗议派的更温和的、主张自由意志的、道德主义的立场——变得更流行了。不从国教者——长老派、贵格会、独立派——不仅不再受欢迎,而且本身的教条狂热也降温了。

因此,洛克的主张只不过是众多鼓吹温和的、理性的基督教的声音中的一个。迫害已经成为过去。1693年,随着许可法的废止,英国开始了一个出版自由的时代。在整个18世纪这种自由很少受到破坏,直到该世纪末法国革命风暴降临才受到限制。在理性的时代,基督教也要接受自由讨论的考验;它的信徒,包括洛克,相信它能顺利地通过这种考验。相信基督教与理性毫不矛盾的看法(尽管也有某些东西是在理性之外通过启示获得的),在当时是相当典型的基督徒信念。当然,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也持有这种信念。但是在18世纪,“理性”这个概念更倾向于指牛顿科学,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最爱使用的论证宗教的观点是,由伟大的定律所揭示出来的自然的有序性乃是一个最不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存在着一个智慧的造物主,这个造物主为这些定律的运作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架构。

这个时候,基督教与自然道德之间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一致。洛克和塞缪尔·克拉克都宣称,伦理学已经是或者能够是一门严格的科学,而它的戒律与基督教的戒律极其吻合。当时,备受欢迎和崇敬的杂文作家沙夫茨伯里勋爵支持人天生有道德感(或者类似的东西)的说法,把这种道德感视为自然宗教的根源。理性侵入了伦理学;人们不再满足于根据圣经权威来接受道德信条,而是觉得必须证明它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当然,伦理是否仅仅以理性为依据,人言言殊。比较正统的理性基督徒会说,理性能够证实启示;更大胆的人会表示,理性取代了启示。主要的论战就是在道德和圣经这两个领域中展开的。自然神论者认为,凭借理性能够认识关于上帝的真理和道德原则。他们批驳《圣经》,指斥它的矛盾和荒谬。在对宗

---

〔1〕 克拉克(Samuel Clarke, 1675 - 1729年),英国神学家、哲学家。

教展开自由讨论所引发的各种论争中,有关《圣经》的论争最使虔诚的信徒不知所措,因为《圣经》充斥着大量的疑难之点。

简言之,由于允许基督教接受理性的考验,因而引发一系列的争论。非正统基督徒或反基督教分子人数虽少,却给正统基督徒制造了严重的麻烦。大约从1690年到1730年间,英国出版的书籍有很大一部分涉及三位一体的争论或“自然神论”的争论,其中还有一些涉及关于《圣经》的各种问题。在关于三位一体的争论中,有人认为《圣经》和“理性”都不能给传统的三位一体学说提供什么支持。他们对此做出有力的论证。这一争论使不从国教者和圣公会都发生了分裂。三位一体论的反对者就这样给“正统”基督教一个沉重打击。这是因为自从基督教时代初期的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以后,在西方所有的基督教教会中,三位一体论实际上一直是正统的一个支柱。在三位一体论的反对者中几乎没有反基督教分子。但是继他们之后出现了自然神论者,其中有些人确凿无疑地是反基督教分子。

自然神论的立场是,仅凭理性而无须启示,足以使我们得以正确地理解宗教和道德。自然神论者不同于洛克、克拉克和沙夫茨伯里那些人。后者认为,基督教与理性是一致的;不要前者只要后者是胡闹。可以说,这些基督教理性主义者无意之中给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打开了大门。但是,有些关于这一运动的论述令人惊讶地忽视了这两种信念之间的重大差别,一种是相信基督教是理性的,另一种则相信基督教是不必要的。后者在18世纪被称作自然神论。

一般而言,自然神论者,包括约翰·托兰德、马修·廷德尔和安东尼·柯林斯<sup>[1]</sup>在内,尊重基督教的道德、基督教的上帝概念,但攻击基督教的教义。他们说,这个美好的宗教不过是所有的人仅凭理性就可以了解的自然宗教而已,不需要用什么特别的启示来促进它,所谓的启示不过是犹太人的迷信,基督教已经遭到这种非理性的希伯来主义以及希腊的形而上学的侵蚀,因此它包含着多少世纪积累下来的大量杂质。但是,耶稣本人是一个杰出的德育教师。他所教诲的伦理戒律实际上是与儒教、伊斯兰教、斯多葛主义乃至其他伟大的世界宗教的伦理戒律一样。说到底,在所有的事

---

[1] 托兰德(John Toland, 1670 - 1722年),英国哲学家、自由思想家。廷德尔(Matthew Tindal, 1657? - 1733年),英国律师。柯林斯(Collins, Anthony, 1676 - 1729年),英国法官、自由思想家。他们都是基督教自然神论的鼓吹者。

情上都有相似之处,这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理性素质,或者说同样天生具有道德感。(自然神论者的看法大同而小异。)基督教可以用一部自然神论著作的书名来表示,即“自然宗教的再版”。它“与创世一样古老”。基督就好像是一个牛顿主义科学家与一个仅凭理性推演出道德教诲的朴实哲学家的结合体。

沙夫茨伯里与苏格兰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sup>[1]</sup>提出了一种与美感相关联的道德感。这种道德感虽然不是“与生俱来的”,却是可以由人性的基本倾向发展而来。它能够导致无私的仁爱。沙夫茨伯里与哈奇森并不反对让个人利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们有意批驳霍布斯的人性自私说。沙夫茨伯里的文章典雅洒脱,备受推崇,对于塑造18世纪有教养的英国人的绅士形象贡献甚大。

但是,伯纳德·德·曼德维尔<sup>[2]</sup>在《蜜蜂的寓言》中却惊世骇俗地宣称,自私导致公共福利,“私人的恶德反而是公共的美德”。例如,奢侈的生活支持了经济的增长,明智的政治家是通过驾驭人的卑劣本能来进行统治的。曼德维尔对沙夫茨伯里描绘的君子冷嘲热讽,确实令人不快,但也发人深省。这场伦理之争引发许多后果,其中之一是,自然神论者甩开宗教权威,在“自然”或“理性”之中来探寻道德的准则。如果说洛克满足于把道德托付给《圣经》的权威,那么18世纪的英国道德学家则不再满足于此;在迄今属于权威的领地上进行“理性游行”,这是使保守人士感到十分惊恐的事情,而这种游行正畅行无阻地穿行于伦理学领域。有人说,理性是不可能失误的,因为它在“自然”中清晰可见。但是,人们能否仅凭理性发现行为准则?

自然神论有许多荒谬之处,在英国从来没有赢得第一流思想家的支持。18世纪中期以前,科尼尔斯·米德尔顿<sup>[3]</sup>和大卫·休谟就已经证明,自然神论的下述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世上有一种自然道德或者说有一种自然宗教,它是一神论的和开明的,所有的人,包括野蛮人在内都能凭借天赋的理性感受到它。主教约瑟夫·巴特勒在《自然宗教、天启宗教与自

---

[1] 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 - 1746年),道德哲学家、美学理论家,许多学者认为他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最早的重要人物。

[2] 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 1670 - 1733年),荷兰裔英国医生、道德哲学家。

[3] 米德尔顿(Conyers Middleton, 1683 - 1750年),英国牧师,理性主义神学家。



然构造和进程的对比》(1736年)这部思想深邃并久负盛名的著作中阐明,人们在“自然”中找不到明确的道德原则。但是,从否定角度看,自然神论者以及其他各种批判正统宗教的人士做了大量的破坏性工作。在整个争论中产生了数以百计的著作。虽然大多数作者是比较正统的教会人士,但是争论本身使得所有公认的正统信条都有了疑点,基督教的可靠性也就成了问题;大多数人可能会得出结论:既然学者们众说纷纭,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理睬神学了。自然神论者是一些精明的宣传家。虽然他们没能建立起正面的信条,但是或许可以说,他们达到了主要目的,即使传统的基督教陷入困境和名声扫地。

英国的自然神论漂洋过海,传到了欧洲大陆,当它采取了伏尔泰的警句格言的形式后,变得愈加声名卓著。当英国的启蒙运动以贝克莱、休谟和亚当·斯密这些重要人物为标志继续推进时,正是在法国这一思想运动赢得了最大的成功,获得了最高的声誉。我们不应忘记,法国哲人们从英国人那里受益匪浅。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是亲英派,牛顿主义者和洛克主义者。伏尔泰直接受益于英国的自然神论者。他早年见过一位自然神论者,即流亡的詹姆士党人博林布鲁克勋爵。德国的光照派<sup>[1]</sup>也把英国看做是“启蒙”之源(见后面关于莱辛的论述)。不过仅就自然神论而言,法国也有自己的传统;在蒙田和笛卡儿之后就开始了自由思想。笛卡儿的朋友梅森神父就已经感到有必要写一本书,反击“当代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和放荡者的离经叛道”。西蒙神父和斯宾诺莎在对《圣经》的批判研究方面开了先河。丰特奈尔的工作已经产生很大影响。年轻时代的伏尔泰发现,“放荡的”肖利厄神父<sup>[2]</sup>在巴黎宣扬和奉行令人吃惊的伊壁鸠鲁哲学。

但是这些思想大多不能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能自由地流行。18世纪初,只有英国有思想和出版自由,因此人们可以读到越来越大胆的论著。这些论著攻击《圣经》的真实性、可靠性、内在一致性乃至道德观。这些攻击冒犯了许多人,但没有遭到压制。英国的自然神论者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胆大包天的世纪;人们对所有的教条、所有公认的观点都提出质疑。如果上帝都可以被审判(正如有人对英国自然神论争论的描述),那么还有

---

[1] 光照派(Illuminati),1776年创立的一个秘密革命组织,总部在巴伐利亚的因戈尔施塔特城,属于德国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派别。

[2] 肖利厄神父(Guillaume, abbé de Chaulieu 1639 - 1720年),法国诗人。

什么是神圣的呢？

在英国,18世纪20年代,一位论派和自然神论者之间的争论掀起的“离经叛道”浪潮对正统基督教造成了破坏,到30年代则出现了局部的反动逆流。贝克莱主教是这股逆流中的杰出人物。他对“渺小的哲学家”或渺小的无神论者口诛笔伐。巴特勒主教也是如此。他的著作前面已经提到。其他人中最著名的是威廉·劳<sup>[1]</sup>和约翰·卫斯理。威廉·劳是一位有现实影响力的宗教作家。经过长期的论战,他最终完全抛弃了宗教中的理性主义。卫斯理可能是该世纪最伟大的基督徒。他是英国福音运动的创始人。他面向下层阶级布道,坦诚动人,影响巨大,如同自然神论者一样,使大多数体面的英国人,不论辉格派还是托利派,不论高教会派还是低教会派,都受到震撼。在很长时间里,卫斯理宗(循道宗)声名狼藉,除了穷人,几乎没有人愿意与之发生关系。它后来十分重要,但它与理性时代格格不入。在奥古斯都时代的英国,体面的中上层阶级都不想成为无神论者或自然神论者,但是他们谴责一切宗教“狂热”,偏爱已经变得低调的英国国教或一位论派清教,因为它们除了要求信徒奉行资产阶级美德之外没有其他的苛求。该世纪末,伊拉兹马斯·达尔文<sup>[2]</sup>指出,上帝一位论只不过是给基督徒的临终安慰。卫斯理以及后来的英国国教低教会派都相信情况确实如此。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乔纳森·爱德华兹<sup>[3]</sup>也持同样看法。他们担心基督教越来越世俗化,最后简化成单纯的道德准则。有教养的人已经开始不相信圣经故事了。卫斯理和爱德华兹都是伟大的人物,但是他们生不逢时,无力扭转这种纲纪松弛的潮流。经济繁荣和自满情绪、新的知识和思想都推动着这一潮流。

自然神论在法国采取了一种比在洋溢着自满情绪的、辉格党统治的英国更尖锐的形式。法国的教士更明显地属于特权等级的一部分,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垄断着教育,对政治有很大影响。他们可能也更反动:英国教会善于妥协,在自然神论风暴面前能够忍气吞声,而法国的庞大教会则不

---

[1] 威廉·劳(William Law, 1686 - 1761年),英国牧师、作家,主张温和的神秘主义。

[2] 伊拉兹马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 1731 - 1802年),英国医师。他是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的祖父。

[3] 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 1703 - 1758年),美国公理会牧师、神学家,“大觉醒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能善罢甘休。虽然耶稣会的敌人詹森派在世纪初取得胜利<sup>〔1〕</sup>,从1700年到1760年,耶稣会逐渐占了上风。耶稣会在某些方面是灵活的,但是在教义问题上绝不让步,激烈地反对“放荡者”。在1730-1760年法国启蒙运动的鼎盛时期,宗教论战贯穿始终,异常激烈。在伏尔泰和狄德罗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神论一直是伟大的法国哲学家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1764年,伏尔泰还在重申他在青年时代学到的自然神论。他的《哲学词典》中的“有神论者的信仰自白”(他已经开始喜欢用“有神论者”来代替“自然神论者”,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可以看做是对自然神论信条的总结。上帝是存在的,但是他遥不可及,而且他可能不想直接插手人类事务。不过,应该至少让人民相信他是扬善惩恶的。世上有一种普世的、原生的、悠久的宗教。它既简单,又是理性的。所有的宗教都出自这一来源。苏格拉底、穆罕默德、孔子、耶稣,说到底,他们都奉行这同一个普世的自然宗教。它铭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它的律令可以归结为“崇拜上帝,做个义人”。教士和蒙昧主义的玄学家篡改了耶稣的简单启示,使之变得无法理解,然后他们就可以凭借他们的那套玄妙咒语来虐待和迫害人民。一旦推翻了这些虚伪的导师,人们将会变得宽容。教士大可不必存在,但是还需要有一种公共教会;人们应该在哲学家的指导下用一种很规矩的方式礼拜上帝。这种经过改革的自然神论的教会将会促进良好的公民品质和兄弟般的博爱。18世纪许多“哲学家”的立场大体如此。他们与费尔奈庄园的智者(指伏尔泰)一样认为,人类的新时代已露出曙光,那种光亮就是“常识”和简单明晰的真理。

应该再次强调一下,启蒙运动的多数参与者都坚定地信仰上帝,但是对正统基督教冷嘲热讽。在后半个世纪出现了一些无神论者,但是他们很不典型。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达朗贝尔。这位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和百科全书编纂者与笛卡儿一样,梦寐以求的是发现一个支配大自然的简单法则,即一个能够归纳概括一切现象的终极原理。达朗贝尔认为,这个法则将会是对上帝存在的终极证明,非常光彩地证明上帝的智慧和伟大。无神论会导致绝望,或者说它是绝望的产物;而启蒙运动是乐观主义的。它

---

〔1〕 前面提到,帕斯卡曾经维护詹森主义,但是教皇发表声明谴责詹森主义,波特罗亚尔修道院的詹森主义中心被摧毁了。不过,詹森主义并没有消失,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依然有很大影响。它在法国的高等法院及其反对王权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原注

的上帝与古代神话毫无共同之处,那些神话根本不能望其项背;作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上帝,他们在他们心目中要更加辉煌壮丽。

这里有必要提及自然神论的一个最明显的矛盾,或许也是它的一个致命伤。这就是它的极端理性主义导致了对“自然”宗教的确认,但否定大多数人能够有这种理性能力。斯宾诺莎在伏尔泰之前就持这种看法:大众不是理性的,必然受感情支配,因此需要宗教。“人民需要一个宗教”,但“哲学家”不需要。自然神论者宣称,所有的人内心都有理性之光,使他们无须借助启示就能感受到一切必要的宗教真理。但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自然神论者又补充说,大多数人实际上没有这种能力,只有少数觉悟者有这种能力。为了调和这个矛盾,他们被迫宣称(典型的自然神论说法),教士的阴谋使人类堕落,并牢牢控制着人类。不过,他们又常常承认,许多人总是被迫听命于自己非理性的愿望和恐惧,而不受理性控制。因此,他们甚至像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主张,不要让人民知道他们的信仰并非名符其实的真理,隐瞒这一秘密乃是明智的做法。或许基督教以形而上学的形式所提供的东西,与哲学家用理性外衣包装起来的真理是一样的——一种适当的基督教肯定会这样做——作为推行美德的主要工具都会如此。富兰克林指出,他逐渐认识到,基督教虽然可能并不是严格的真理,但确实有用,而直言不讳的自然神论虽然可能是真理却没有用处。可以说,伏尔泰所遵循的就是这一路线。自然神论者沿着他们的思路走进死胡同,最终返回到正统阵营来。

## 伏尔泰和孟德斯鸠

我们需要回过头来描述法国的伟大思想时代,那是哲学家的时代,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时代。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使法国人感到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有一种从一个庄严的权威下解放出来的感觉。17世纪所留下的遗产包括沙龙和那些被上流社会所接纳,向贵族卖弄辞藻的文才子。但是此时悄悄地出现了一种轻松的气氛,也出现了一种更强烈的批判精神。

新精神的最初迹象之一,是拉布雷德男爵即孟德斯鸠所写的一部生动有趣的著作《波斯人信札》。这部著作是在尼德兰出版的。那些在法国难以出版的书在尼德兰很容易印行,当然必须通过走私把书偷运进法国。这

部 1721 年出版的著作后来被公认为是历史上伟大的文学成就之一。它利用了公众对中东地区新的初步了解。17 世纪末,旅行者的报道和一些文学作品的翻译,重新刺激了欧洲人对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兴趣。(自然神论者之所以发现所谓的普世的自然宗教,也与欧洲人新近获得的这些有关儒教和伊斯兰教的零碎知识有关。)这位年轻的加斯科尼(地名)贵族看来是受到 37 年前问世的意大利的乔万尼·马拉纳写的《土耳其间谍信札》的启发。启蒙运动是一个讽刺的时代。(欧洲舞台上已经出现了爱尔兰的才子和社会批评家乔纳森·斯威夫特。他的《格列佛游记》在孟德斯鸠这部作品的 5 年后问世。)



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男爵是大受欢迎的《波斯人信札》和《论法的精神》的作者,他普及了由一种相互制衡制度加以保障的政治均衡观念。

在孟德斯鸠的这部著作中,有两个波斯人游历欧洲,在彼此之间的通信中评论欧洲的奇特风俗,并与自己国家的风俗进行比较。这本书之所以流行,应该说与它不时地涉猎“后房”文化之类的诱人话题有关,但是它也是一部严肃的社会批判作品。书中有一些相当大胆的批判,影射在世的或新近故去的欧洲当权者,例如路易十四。书中还有一些一般性的政治议论,反映了作者对霍布斯、洛克和社会契约的兴趣。书中还表达了强烈的反教权主义观念——这是孟德斯鸠终其一生的态度,也是启蒙运动的典型情绪。修道士无异于癫狂的苦行僧,教皇类似于魔法师,宗教仪式都是迷信,由此得出的教训是,惟有善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人类的各种宗教之所以有价值,仅仅是因为它们引导人们过善的生活;神学争论是荒唐可笑的,宽容才是惟一明智的准则。《波斯人信札》包含着许多自然神论思想,而且表现出对文明比较和政治制度研究的兴趣。这种兴趣致使孟德斯鸠在 20 多

年后撰写了另一部更伟大的著作。

《波斯人信札》是光芒四射的法国启蒙运动的破晓曙光。在那个充满智慧、严肃、批判和战斗的时代,孟德斯鸠只是不朽的领袖之一。至少还有一位思想领袖在声望、文采和作品数量上超过了他。此人的事业早在路易十四之后的摄政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他就是伟大的伏尔泰。

伏尔泰年轻时是一个纨绔子弟,也是一个才子。他的聪明谈吐和迷人风度使他成为巴黎社交界的宠儿。他在20几岁就成了受欢迎的剧作家。正当春风得意之时,他因爱情和政治缘故而遇到麻烦。1726年,为了争夺一个女演员,他与罗昂-夏博骑士发生纠纷。伏尔泰(原名阿鲁埃)被迫离开法国前往英国,时年32岁。各种记载都说,这次在英国的3年之行,改变了伏尔泰的生活;以前他没有严肃的思想目标,现在他找到了这种目标。他不喜欢英国的食品、气候乃至社交界,觉得与法国相比都令人沮丧,但是他对英国的自由——特别是关于自然神论的争论所体现的自由——感触颇深。牛顿和洛克的学说尤其令他叹为观止。

其实情况并非那么简单。在去英国之前,伏尔泰是用他的警句妙语和冒险活动自娱娱人。这次英国之行以后依然故我。他原来就不乏严肃,而且早在1719年他就通过流亡政治家博林布鲁克接触到英国思想。他曾在耶稣会的学校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后来很长时间都推崇那些教师。他早就读过培尔的著作,还曾与法国那些私下嘲笑基督教的“放荡者”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现在所知,他的第一篇作品是论邪恶问题的论文(1713年);第一部重要剧作是悲剧《俄狄浦斯王》,提出了挑战性的严肃思想,攻击加尔文派和詹森派的严厉而好报复的上帝。

不过,说英国之旅是伏尔泰一生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有一些道理。他回国后开始更严肃地工作了。他成了洛克和牛顿学说在法国的传播者。当然,他并非是惟一的使徒。他的情敌和科学对手莫佩尔蒂<sup>[1]</sup>也致力于同样的事业。如果说有一些拥护牛顿学说的女士很快就起来批驳法国的笛卡儿主义者,这两位多情的哲学家所受到的爱戴可能也起了一些作用。伏尔泰转向一项严肃的工作,即研究数学和从事哲学写作。他与情妇夏特莱侯爵夫人定居西雷城。夏特莱夫人是一个才智出众的女性。他们一起工

---

[1] 莫佩尔蒂(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 1698 - 1759年),法国科学家,有多方面的科学成就。

作。伏尔泰变得很富有;除了其他方面的才能,伏尔泰还有精明的经营意识,“金融才能”。(伏尔泰善于投资,总能收益。他还扶危济困,把大量钱财散给朋友乃至素不相识的人。)他在西雷过着豪华的生活,并且运筹帷幄,通过代理人进行广泛的商业活动。但是,他在西雷也坚持日常的读书和写作。

可以说,以伏尔泰转向“哲学”生活和他的《哲学通信》发表(1733 - 1734年)为标志,启蒙运动正式开始了。1736年,秘鲁探险和莫佩尔蒂率领完成的拉普兰(北欧拉普兰人居住区)探险,证明了牛顿的理论,即地球是扁圆的。而笛卡儿派原来是反对这种说法的。伏尔泰一语双关地讥讽说,这个结果压扁了地球和笛卡儿派。这并不意味着牛顿派与笛卡儿派的斗争就此结束。伏尔泰有众多的敌人。他们嘲笑他的《牛顿哲学原理通俗解说》(好不容易才在1738年出版),他沮丧地说:“要想在法国做一个好公民,就得相信旋涡理论。”他进一步指出,



伏尔泰

伏尔泰才华横溢,热情洋溢的文学和政治著作,加上其个人生活中的种种喧嚣事件,使他跻身于法国启蒙运动著名人物之列。

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人的民族傲慢造成的。有人猜测,伏尔泰之所以迷恋夏特莱夫人,不仅倾倒于她身体魅力,而且折服于她的数学知识。夏特莱夫人在西雷着手研究牛顿思想,后来发表了比伏尔泰更好的牛顿学说阐释。但是,夏特莱夫人喜欢莱布尼兹,伏尔泰不能予以赞同。

1736年,伏尔泰开始与普鲁士腓特烈王子通信。腓特烈王子不久成为腓特烈国王,继而被称作腓特烈大帝。他们之间的友谊成为启蒙运动的又一里程碑,标志着哲学家与他们的朋友、未来的哲学王的时代开始了。

虽然牛顿科学和洛克哲学代表着哲学家们心中时时刻刻挂念的事业,但是伏尔泰并未忘记发扬社会批判的传统,他的批判比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更尖锐、更公开。《哲学通信》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用英国来衬托法国的缺陷。英国不仅产生了牛顿和洛克,而且产生了自由。那里实干

而讲道德的公民恰与法国骄奢淫逸的贵族形成鲜明对照(就伏尔泰本人以前的生活状态而言,这种评论出自他的笔下多少有些奇怪)。伏尔泰畅所欲言,难以自禁,因此这部著作大大冒犯了法国人,他不得不再次到一个偏僻地区隐居。但是,应该指出,这种惩罚是比较温和的。在18世纪的法国,批评政府和社会的人不会受到持久而残酷的迫害,通常至多担心被流放到外省乡间庄园。在《哲学通信》遭到查禁的时期,伏尔泰实际上在东部边境伯威克公爵的司令部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尽管那里在进行小规模战争(18世纪的战争很少搅乱生活的暇逸)。即便作家被关进巴士底狱,正如伏尔泰早年曾有过的遭遇,他们也住在豪华的房间,实际上被当做国王的客人来对待——这是一种非常文明的软禁方式。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评论说:“真是独一无二的监狱,把人监禁在那里,却没有审判,被监禁者还可以著书立说,摇撼社会秩序的根基!”伏尔泰指斥法国没有英国人所享受的那种自由,其实,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政府根本无意迫害文人,至多给他们造成一些不方便而已。不管怎么说,在懒散、优柔寡断的路易十五统治下,旧制度造成了一系列愚蠢和邪恶的现象,因而必然遭到伏尔泰的许多攻击。

到1750年,伏尔泰已经步入中年,但他的传奇生涯还远未结束。他后来还撰写了一些伟大的著作(如《老实人》),发动了一些口诛笔伐的战斗(如卡拉事件)。他绝不会被驯服,他的笔也不会就范。他已经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还是皇家史官,在宫廷有一处住宅,如果他愿意的话,随时可以入住(当然他不愿意);他还获得给国王写颂词的资格。他是一个有国际名望的人;他的剧作虽然有时可能比较平庸,但上演时照例座无虚席。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授予他一枚勋章,他与教皇保持良好的关系(当然,本尼狄克本人也具有哲学家的气质)。他能获得“密札”来强使自己的对手闭嘴——这与人们通常的想像恰恰相反。他继续与腓特烈大帝互相问候,而且很快开始与俄国女皇互致敬意。对于围绕着他持续不断发生的争论、阴谋和风流韵事,法国公众感到有趣,但也逐渐有些厌倦。在1749年他的情妇、牛顿派战友、非凡的夏特莱夫人去世<sup>[1]</sup>之后,伏尔泰一度在波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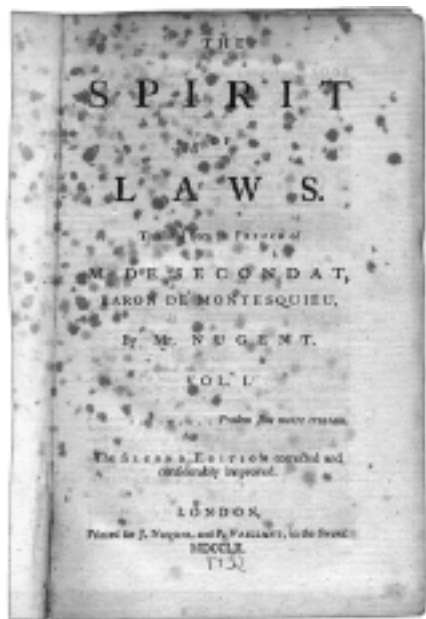
---

[1] 夏特莱夫人死于难产。她生下的孩子是她许多风流韵事中的一次的结果。孩子的父亲既不是伏尔泰,当然也不是她的丈夫。怀孕这件事似乎并没有使伏尔泰特别烦恼,但是他心爱的“爱弥儿”的去世确实使他十分悲痛。——原注



坦寄寓于腓特烈门下,但是后来与这位同样反复无常的天才发生争吵,最终与他的侄女(也是他的情妇)定居在费尔奈。这个地方位于瑞士边境,离日内瓦的距离与到法国巴黎的距离差不多。他基本上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从未停止写作,依然是启蒙运动的化身。著名的卡拉案件非但没有使他的这种角色减色,反而使他成为反对不宽容和宗教偏执的象征。我们后面还要接着论述伏尔泰。不过此时有一些更年轻的人已经登上舞台。

孟德斯鸠在 1748 年做出了他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贡献。《论法的精神》用去了他十几年的心血,是他的代表作。人们常常称它是第一部对政府和政治所做的真正科学的探讨。它自称是基于经验资料对所有民族的法律和习俗所做的一项系统研究。因此,它也可以被视为社会学的开拓之作。孟德斯鸠也对酝酿中的经济学有所贡献。(社会科学在幼年时期都是混在一起的。)霍布斯、斯宾诺莎甚至洛克的研究方法是抽象的、理论性的、泛泛的,而孟德斯鸠的方法是,至少看上去是历史的、经验的。他根本不提社会契约,因为那是一个理论概念,是一个模式,在真实历史中难以见到。不论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英译本)封面

是否能够通过经验主义的测试(按现代标准,他的学术显得很幼稚;或许我们会觉得,他那些最好的部分不是“经验的”,而是思辨的),这部著作立即成为这类已经写成的著作中的极品。它对所有步其后尘的作家都有影响。意大利的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深受它的启发。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试图依据它来制定一部法典。它几乎成为所有开明人士的政治圣经。

今天看来,它似乎是一部有些奇特但确实才华横溢的著作。其中一部分是政体分类,令人想起亚里士多德,只不过孟德斯鸠具有更强的历史意识。在三种政体中,共和政体适用于小型城邦国家,但它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君主政体适合于当今的欧洲;君主权力不受封建阶级遏制的专制政体适合于罗马曾经拥有的那种庞大帝国。每一种政体都有其“原则”或者说内在精神,如果失去这种原则,这种政体就会沦丧。共和政体的原则是美德,封建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这个论点虽然不像其他一些论点那样具有独创性,但也发人深省。这部著作在论述政体分类之后突然转而论述气候和地理环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这是该书非

常有名的部分。虽然古代作家希波克拉底和近代作家博丹等人都思考过气候的影响,但孟德斯鸠对此做了特有的彻底探讨。不过他的一些结论相当可疑:北方民族比南方民族更勇敢,东方民族在思想上比较懒惰。孟德斯鸠宣称,热带民族在做爱时更热情。说到音乐,他在意大利和英国都听过歌剧,把前者的欢快也归因为气候。这些思想当然很幼稚,但是它们显示了对造成文化多样性的原因的一种积极的好奇心,而且必然会激发起人们的争论。孟德斯鸠的观点前后不太一致。他认识到造成不同文明之间性质差异的原因很复杂,因此在物质原因和道德原因之间摇摆不定。这个部分只是关于历史因果关系问题的最初论述,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还在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依然众说纷纭。但是,孟德斯鸠预示了后来一些思想家如黑格尔、孔德、马克思乃至今天的汤因比的历史体系。

当然,还不止这些。《论法的精神》最后一部分追溯了罗马法和封建法律历经中世纪的发展过程,虽然分量较小,但也是意义重大的开创性史学研究。上述三个部分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这个问题引起人们的争论。许多人认为孟德斯鸠的体系有一种根本性的混乱,有的人想通过重新编排和增加注释来纠正这种混乱,但也有人认为该书实际上有某种内在的统一。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与许多社会科学的早期开创者一样,孟德斯鸠也是在啃一块根本啃不动的大骨头。今天我们都知道,建立一门无所不包的社会科学,几乎是不可能的。用一个宏大法则或几个相对简单的法则来说明所有的社会现象,这种牛顿式的理想犹如一团鬼火,成为几代社会科学家注定徒劳的追求,卡尔·马克思是其中最后一位追求者。孟德斯鸠对一系列不同的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同时总体上显示出一种历史理解的倾向。他执迷于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各种文明会有差异,为什么它们会有兴有衰,为什么不同的政体会在不同的时期得到发展?这些都是很正当的问题,也是极其难以回答的问题,用任何单一“法则”都不可能把它们都解释清楚。而且,在那个时代,必要的经验资料也很缺乏。孟德斯鸠所描述的历史有些是凭空想像的。

不过,孟德斯鸠毕竟以真正的启蒙时代的方式探讨新的科学意义上的法则:“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他希望将牛顿的方法应用于人类文明的现象。他以极具启发性的方式来揭示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这种探讨将注意力引向社会研究,把社会当做一个独立的领域加以客观、严格的研究。毋庸置疑,这种探讨会极有成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迄今还没有人能够把历史学和社会学变成18世纪哲学家所设想的

那样严格的科学,而且看来永远也做不到。但是,在18世纪,这种想法是鼓舞人心的,非常贴近那个时代的主题:牛顿和洛克的科学正在征服一切,甚至在人类事物的领域也在荡涤古老的谬误,开创一个更文明的时代。孟德斯鸠于1755年去世,但他的精神还在延续。

孟德斯鸠也是一个崇英派,把英国政制视为最令人赞赏的启蒙政治理性的典范。后来常常有人指出,他对英国政制的阐释是错误的,因为他基本上把它说成是国王、议会和法官之间的权力平衡,而实际上辉格党寡头政权操纵着国家(而且是借助十分腐败的手段)。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但英国确实是18世纪欧洲最自由、最宽容的国家,法国哲学家们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来赞美英国。自由和宽容是他们最推崇的美德。虽然法国比起英国在这方面进展有些缓慢,但毕竟是在进步之中。到18世纪40年代,出版商已经敢于印刷过去不能公开出现的作品了。

## 狄德罗和百科全书

启蒙运动进入更大胆的时期。此时为首的宣传家是一个英俊、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德尼·狄德罗。他来自外省,出身贫寒。在他早期的作品和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新展现的自由因素的影响。虽然他的《哲学思想录》(1746年)被誉为“18世纪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它基本上是对英国自然神论的复述。其创新之处不在于思想本身,而在于敢于在法国出版。(1720-1750年间有许多自然神论的小册子在法国秘密流传。)当时也有人想查禁他的这本书,但是控制这种事情已经再也不那么容易了;这本书得以公开发行和阅读。让-雅克·卢梭于1742年抵达巴黎并



狄德罗

成为狄德罗的朋友。两人都出身低微,而且最初都没有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那样受人尊敬。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都是很自然地进入法国最高层的社会。

狄德罗和卢梭也都更加激进。但是他们生逢其时。二人都是真正的天才，熟读古典作品，思想富于创造。巴黎那些由妇女主宰的沙龙总是欢迎文学天才，因此很快就热烈地接受了他们。（而且狄德罗极其英俊潇洒，卢梭也很有魅力。）

当时还有一些“哲学家”：孔狄亚克、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在巴黎这座无与伦比的思想文化首都洋溢着激动人心的气氛，人们此时不仅能够充分地探讨洛克和牛顿，而且可以讨论尖锐批判洛克的英国主教贝克莱以及伏尔泰、孟德斯鸠等等许多人的思想。科学得到迅速发展，并且变成一种时髦。达朗贝尔是著名沙龙女主人唐森夫人的私生子，此时成为一个伟大的数学物理学家；孔狄亚克根据洛克和哈特利的原理创立了机械心理学；著名的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已经开始撰写巨著《自然史》。多才多艺的狄德罗是道德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小说家，还是小发明家和科学家。最重要的是，他是百科全书编纂者。这群哲学家中最有才华，也最多才多艺的狄德罗理所当然地承担起这项伟大的编辑事业。这项工作从18世纪50年代持续进行，最终成为这个时代最著名的思想文化里程碑。

百科全书几乎算不上什么新鲜事物。在此之前至少有两部类似的作品，即培尔的《历史批判词典》和苏格兰人伊弗雷姆·钱伯斯的《百科全书》（1728年）。法国的《百科全书》从这两部书中受益颇多。启蒙哲学家们并没有抄袭耶稣会编的《特雷沃词典》（1704年）。新的百科全书比以前这些作品要更加宏大和包罗万象。它把培尔对新颖刺激的思想的兴趣与钱伯斯对艺术和科学的重视结合起来。人们普遍认为很需要这样的出版物。几经挫折之后，这项工作最终落到狄德罗的手中——这毫不奇怪，因为狄德罗不仅文思敏捷、知识广博，而且他与巴黎文人有广泛的交往。在出版商和当局眼中，狄德罗的一大缺陷是，他像伏尔泰一样喜欢写惹麻烦的作品。这些作品包括粗俗小说《世密的首饰》和他表达非正统宗教观念的《盲人书简》（1749年）。在《盲人书简》中狄德罗借助一个先天双目失明的人但后来恢复视力的人的例子，得出一些典型的洛克主义结论：一个盲人会有不同的感觉经验，因而对一切事物、包括上帝都会有不同的观念。<sup>〔1〕</sup> 我们

---

〔1〕 一个先天失明但后来复明的人能否通过视觉认识原来通过触觉所了解的对象，这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由爱尔兰人威廉·莫利纽克斯于1692年给洛克的一封信中首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以各种形式成为18世纪的一个哲学话题。——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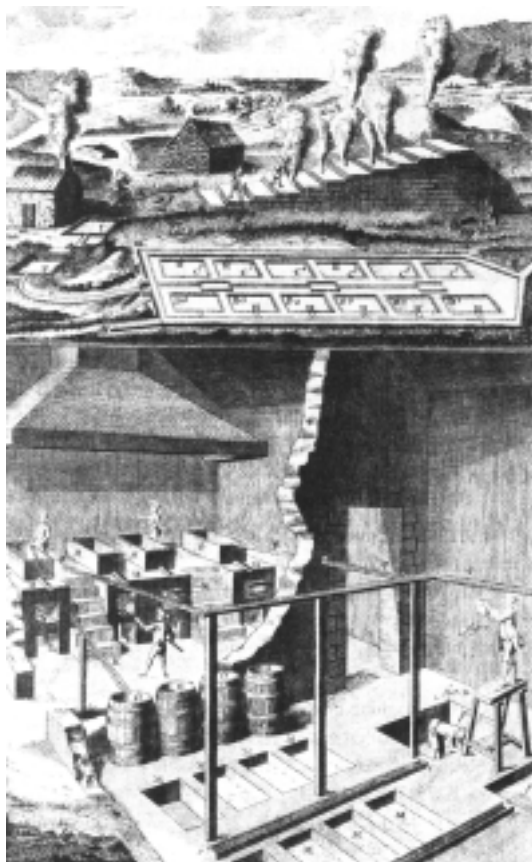
都会想起鲁珀特·布鲁克<sup>〔1〕</sup>的著名诗句：水中的鱼儿把上帝想像成

鱼的形状、鱼的思想，无限庞大，  
鳞光闪闪，无所不能，仁慈宽厚。

在思考的过程中，狄德罗发表了许多有意让虔诚的信徒惶恐不安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基本上来自培尔和英法两国早期自然神论者。狄德罗的观点比伏尔泰更极端。伏尔泰虽然信奉自然神论，但他认为信仰上帝对于道德和社会秩序是很重要的。狄德罗则赞成培尔的说法，无神论者也能像宗教信仰徒一样做一个好公民。信仰不信仰上帝“根本不重要”。

因此当局在1749年借一纸“密札”突袭狄德罗的住宅，把他投入万塞讷监狱。这严重地影响了百科全书的编纂进度，但也可以说反而给它做了某种免费宣传。狄德罗在狱中受到良好待遇，可以读书、写作，甚至可以在晚上公开地去会见情妇。几个月后，狄德罗保证不再重犯“乱写乱说”之错，因此被释放出来。他的朋友卢梭正是在到万塞讷探望他的途中决定撰写一篇关于艺术和科学的论文，这篇论文使卢梭在学界一举成名。百科全书第一卷是由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的（主要工作一直是由狄德罗承担），及时地得到了国王的批准，于1751年出版。尽管主编之间发生了争执，与检查官员麻烦不断，狄德罗的个人生活也跌宕起伏，但百科全书每年都能推出一卷。到1759年，第8卷正在付印，当局突然颁布了一道国王敕令，谴责并查禁全套百科全书。

惊恐的保守派认为《百科全书》宣传“自然神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爱尔维修那部轰动一时的著作《论精神》（1758年）也株连《百科全书》，从而



采矿技术

这张图片出自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描绘了提炼和加工工业矾矿的方法。

〔1〕 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 1887~1915年)，英国诗人。

助长了这种偏见。爱尔维修是一位富有的金融家和业余哲学家。他写的这本书公开暴露了启蒙思想中的一种倾向,即支持赤裸裸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道德观。不管怎样,在这股反动潮流袭来后,《百科全书》的工作停止了6年。当时在英法之间也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战争。这是18世纪最激烈的战争。“哲学家们”和百科全书派都被看做不仅缺乏爱国主义,而且在知识

RECUEIL  
DE PLANCHES,  
SUR  
LES SCIENCES,  
LES ARTS LIBERAUX,  
ET  
LES ARTS MÉCANIQUES,  
AVEC LEUR EXPLICATION.



Desmoulin, Paris, chez les Citoyens, par la Citoyenne.

A PARIS,

Chez { BRASSON, au Salon National, ci-devant  
DAVID, au Salon National, ci-devant  
LE BRETON, au Salon National, ci-devant  
DURAND, au Salon National, ci-devant

M D C C. L X I I I

AVEC APPROBATION ET PRIVILEGE DU ROI.

1762年与《百科全书》一道出版的12部木刻图集第一卷的扉页。这些版画与《百科全书》同时出版,描述了实用工艺和科学中使用的机器工具、设备和工艺技术。

品味方面亲英崇英。此时的狄德罗实际上已经是单枪匹马。他凭借极大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继续进行编纂工作,终于在1766年欣慰地看到大功告成。后来,17卷的《百科全书》又增添了11卷图片和7卷补充资料和索引。

在法国,凡是有出人头地欲望的人都会像购买布丰的《自然史》或伏尔泰的剧本那样购买《百科全书》;在拉图尔<sup>[1]</sup>为国王情妇蓬巴杜尔夫人画的著名肖像画上,她书桌上的一排书中醒目地放着一卷百科全书。《百科全书》被公认在传播启蒙思想方面具有巨大影响。该书是得到政府许可后付印的,至少在名义上接受了审查。但主要的审查官马尔泽布<sup>[2]</sup>是一个真正具有宽容精神的人,他本人几乎就是一个启蒙哲学家,因此审查是很宽松的。我们很难用几个形容词来概括如此浩繁卷帙的内容。应该指出,这部百科全书会使现代读者惊讶,因为在人们的印象

中,这类书籍应该是文字直白,态度客观,注重事实,不露声色。但是,这部百科全书充斥着各种华丽的文采,纯粹个人的独白,“你”、“我”的称呼,还偶尔有狂放的宣泄。“噢,诗意的甜蜜幻境!你的魅力毫不亚于真理本身,使我沉迷。但愿你陪伴着我,使我快乐,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你在现代百科全书中能看到这种句子吗?它的选题有时显得异想天开和随心

[1] 拉图尔(La Tour, 1704 - 1788年),法国18世纪著名肖像画家。

[2] 马尔泽布(Malesherbes, 1721 - 1794年),皇家出版总监。

所欲:狄德罗对什么感兴趣就把什么写进去。这种习惯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虽然《百科全书》通常对地点和历史不感兴趣,例如,在“法国”这个标题下只有几行字,但书中给“日内瓦”一个很长的词条,或许受伏尔泰的影响,讨论了加尔文教和其他教派。其态度既冒犯了日内瓦人,也冒犯了法国教会。

《百科全书》明显地强调科学、数学、技术等学科。《百科全书》以启蒙运动的典型方式,颂扬实用知识,贬低虚张声势的形而上学。它用各种方式贬斥正统宗教,包括讽刺性的旁白,关于可以做双重解释的异教众神的词条,对耶稣会的抨击,对穆罕默德的颂扬等等。它在政治上并不显得很激进,但是洛克的原则渗透进许多词条之中。《百科全书》用许多方式宣传新思想。这部书十分实用,因此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虽然书中的实用知识是可以为任何人服务的,但是这本书中巧妙地夹杂着对哲学家们所珍爱的事业的宣传。

尽管《百科全书》在 1759 - 1763 年间遇到了危机,但是“哲学家”们反而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群体。尽管总是有敌人,但是他们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因此讽刺作家开始拿他们来取笑,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现有体制”中一个有权有势的因素。他们在宫廷里有朋友,包括权倾一时的蓬巴杜尔夫人和首相舒瓦瑟尔。伏尔泰也曾与百科全书派合作过,但他与其主体部分一直疏远,与狄德罗从未建立起亲密关系;他还曾经允许一些词条署上他的名字。(看来,即便是意识形态的战友也惧怕伏尔泰的辛辣笔锋,对他也无爱戴之情。后来伏尔泰出版了自己的《哲学词典》。)然而,由于一场内部的争吵,哲学家的统治时代中断了。

## 晚年伏尔泰

伏尔泰的晚年是他最辉煌的岁月,但是一种悲观主义情绪或者说一种饱经风霜的乐观主义慢慢袭上心头。按照某些人的说法,这位不知疲倦的作家坚持了长达 60 多年的写作,却没有显示出任何哲学上的一贯体系。虽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明晰易懂,富于教益,但是放在一起却成了“各种明晰思想的大杂烩”。对于一个写作如同谈话那么容易的人,人们很难因为他偶尔的前后矛盾而责备他。总的看来,随着年龄变老,伏尔泰的思想越来越趋于灰暗。这本来是自然过程,只是情妇去世、与腓特烈大帝的友谊破裂、1756 - 1763 年战争以及 1755 年里斯本大地震等一系列事件使得伏

尔泰愈加悲观。

伏尔泰对里斯本大地震的论述,使得这场灾难载入人类永远的记忆。地震和海啸对葡萄牙美丽首都的袭击在方方面面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地震和海啸给欧洲其他地方也带来了程度较轻的影响)。毋庸赘言,这并非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毁灭性灾难。但是,在18世纪,它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用研究伏尔泰的著名学者西奥多·贝斯特曼的话说,它“犹如晴天霹雳落到整个西方世界,使得所有思想家的哲学都发生了持久的变化”。贝斯特曼或许有些夸张。但是,早期启蒙运动,包括伏尔泰在内,倾向于乐观主义的信条。最极端的莫过于蒲柏的说法:“凡是存在的,都是对的。”伏尔泰是一个真诚的自然神论者,他与其他自然神论者、理性基督徒一样,信仰上帝,也相信宇宙是有序、和谐的。他相信人是有理性的,现在已经在牛顿和洛克的引导下步入正轨,必将阔步前进,用理性消除荒诞与邪恶。这些乐观的希望被伏尔泰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打破了。伏尔泰很不幸地遇到了里斯本地震。他开始谈论“这个世界上血淋淋的悲剧和荒唐可笑的喜剧”。他否定历史进步,开始论述循环,“白天与黑夜的永恒交替”。他对人性也不太尊重了。

很难说他已经放弃了希望。在那首关于里斯本地震的诗中还是以希望结尾:尽管现在不好,“总有一天一切会好起来”。伏尔泰的名著《老实人》最后暗示了实现理想的手段:让我们耕耘我们自己的花园。但是讥讽的笑声充满了这位老实人赣第德的冒险经历,受嘲弄的是那些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慈善世界里的人们。这个世界不仅充满了苦难和残忍,而且这种邪恶是捉摸不定的,既无规律也无理由,就像里斯本地震无缘无故地摧毁了这个城市,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了所有的人,却饶恕了其他同样罪孽深重的城市。没有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七年战争期间,他写下《老实人》,还发表了另外一些悲观的看法,他认为这个世界“疯了”,几乎无法忍受。

对于伏尔泰来说,这种幻灭反而成为一种动力。莱布尼兹和蒲柏的乐观主义——就像伏尔泰所表述的,在可能存在的最好世界里一切都向最好发展<sup>〔1〕</sup>——早就有了自鸣得意的情绪。如果“凡是存在的,都是对的”,谁还会被激怒去发动反对邪恶的斗争?伏尔泰认为一切都出了问题,因此挺

---

〔1〕 显然,伏尔泰误解了莱布尼兹,否则就是故意歪曲莱布尼兹的观点。参见第四章。



身而出来纠正一些错误。耕耘自己的花园,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尽我们的力量来反对邪恶。抛弃大而无当的乐观主义,我们脚踏实地地翻土耕耘,坚持不懈地一点一滴地进行改革。

伏尔泰的批判视野从来没有放过基督教教会的不宽容。他年轻时目睹了詹森主义争论。18世纪20年代,他在思想上成熟之时,自然神论运动达到顶峰。法国教会的弊病随处可见,改革迫在眉睫。修道院大多都很腐败。高级教士已经成为特权贵族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行为方式经常是最背离宗教的。除了耶稣会,其他教士对法国知识生活没有任何重要贡献。鉴于这些事实,或许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伏尔泰愤怒地要求“消灭”这些“丑行”。我们知道,他是自然神论者,主张用自然宗教取代天启宗教,用哲学取代僧侣权术。不过,他相信宗教的必要性——尽管少数开明人士不需要宗教,但是“人民需要一种宗教”。学者们认为,伏尔泰的宗教观非常含混,无法判断他究竟是把基督教完全视为古代迷信的遗存来加以否定,还是仅仅想改革基督教。他与教会的关系显然是剪不断理还乱,爱恨交加。他一直在恶作剧地揭露《圣经》中的矛盾和荒谬之处,旨在败坏天启宗教的声誉。但是他对整顿教会、利用教会表现出比狄德罗和其他哲学家更大的兴趣。他晚年时参加教会礼拜活动,对费尔奈附近的当地教会团体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赞扬基督教各个教派中神学教条最少的贵格派。

伏尔泰与教会方面的长期斗争在1762年达到了顶峰:图卢兹的让·卡拉案件给他提供了一个教会不宽容的最好例子。虽然直到1787年宽容才被写进法律,其实18世纪的法国很少发生宗教迫害。后来的研究表明,被伏尔泰搞得声名狼藉的卡拉案件确实令人悲痛,但不是一个典型事件。它发生在比较特殊的环境,与当时法国正在和两个新教国家(指英国与普鲁士。——译者注)打仗有些关系。这个案件在18世纪的法国是十分罕见的反新教的狂热表现。(时隔不久,在1780年的戈登暴动中英国爆发了反天主教的疯狂行为,尽管宽容在英国似乎早已根深蒂固。)卡拉案件的基本情况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信奉新教的小店主被指控为了阻止自己的儿子皈依天主教而杀害了他。鉴于看起来铁证如山的弥天大罪,卡拉被处以残忍的极刑。由于伏尔泰的激情投入和巨大影响力,这个案件最终得以平反,但是为时已晚,未能及时挽救不幸的卡拉。

人们普遍认为,宽容是18世纪哲学家的主要美德和贡献之一。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反对宗教不宽容和教会的偏狭。但是应该指出,他们并没有打算宽容一切。狄德罗和伏尔泰的传记作者都指出,哲学

家们只希望自己有言论自由,而不给自己的敌人言论自由。就像哲学家的反对者希望压制他们一样,哲学家们也想方设法压制自己的对手。阿瑟·威尔逊(著有《狄德罗传》)认为,检查官马尔塞布反而是最宽容的人,因为他希望在不失礼貌和政治安全的条件下让双方都有发言权;互相争执的双方,无论哪一方有压制别人的权力,都不会让对方说话。虽然主要是笔墨之战,但也残酷无情。哲学家们持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在这个世界清除谬误、确立理性。理性只能是某一种东西,不是什么都算理性,因此对理性的强烈信仰也就意味着采取一种不宽容的态度,即便把这种不宽容称作文明的不宽容。伏尔泰不打算宽容偏执的教权主义的“丑行”!他也非常典型地不宽容任何被他视为“愚蠢”或“错误”的东西——这类事情很多。说他促成了卢梭的流亡(见本章下文),似乎也是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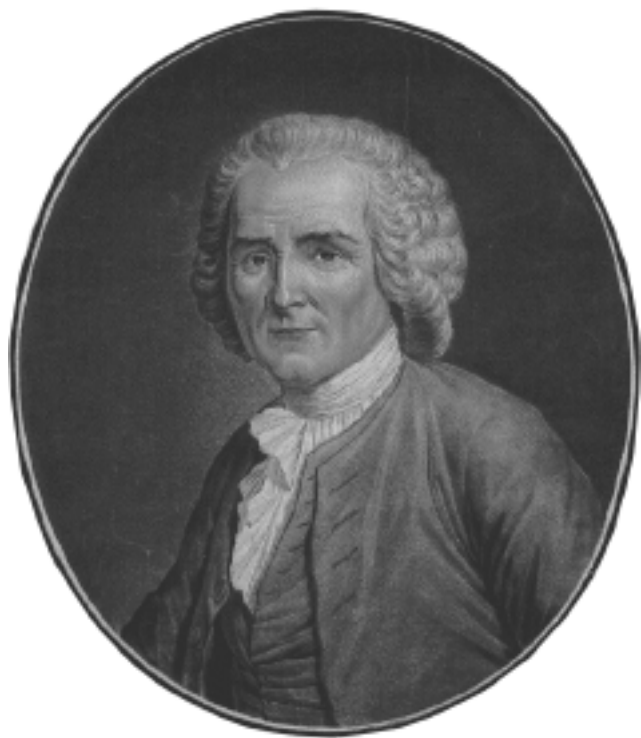
伏尔泰与大多数哲学家一样(卢梭是一大例外)不太赞成民主。在18世纪,民主主义者是极其罕见的。伏尔泰通常把人民说成“群氓”。他曾经表示,群氓永远是群氓。鞋匠和家仆绝不可能成为哲学家!这种态度使得许多现代崇拜者多少感到难堪。彼得·盖伊写过一本论述伏尔泰政治观念的出色著作。他竭尽全力为这位理性主义的英雄辩护,但在大量反民主的言论中只能找到赞成民主的只言片语,而且大多是在晚年说的。伏尔泰在这方面的立场是合乎逻辑的。这个世界需要用哲学理性来挽救,而哲学理性只能出自启蒙运动的少数先进代表。最终所有的人无疑都会变得开明,但是现在以及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愚昧的大众是教士的同盟者。如果说民主就是由多数表决来决定事情,那么伏尔泰一伙的道德专制主义是敌视民主的。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让理性君临天下。为此,他们主要指望“开明专制君主”。他们宁愿要理性的专制,也不愿要愚昧的民主。伏尔泰的追随者孔多塞指出,一个江湖骗子误导人民要比一个天才拯救人民容易得多。米拉波在赞扬腓特烈大帝时写道:“一个贪图喝彩的君主永远不会得到后代的赞赏。”有些重农主义者(后面还要讨论)也宣传开明专制。他们信奉理性不可抗拒论,认为君主不可能不按照理性行事!

上面所说的几点仅仅是为了指出启蒙哲学家与现代自由民主思想之间的某些差异。18世纪哲学家对后来的思想运动做出了某些贡献,但是在许多方面也有根本差别。直到1789年革命爆发为止,整个18世纪是一个贵族世纪。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也与政治家和社会领袖一样显示出这种时代特征。我们会注意到,当时支配着艺术乃至生活方式的新古典主义精神是一种贵族精神,因为它注重秩序、等级和高雅。只有等到浪漫主义出

现,才会有对古怪个性、社会动荡和异域经历的兼收并蓄。而浪漫主义只是在启蒙运动已经结束之后才全面兴起。在启蒙哲学家中只有一个人预示了浪漫主义和民主以及其他的未来趋势,而他命中注定要疏离其他启蒙哲学家。

## 卢梭

让·雅克·卢梭似乎是天造地设的伏尔泰的思想对手。他们两人的鲜明反差和冲突成为法国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戏剧故事。(直到20世纪,一些追随者还在延续这两位巨人的争执,甚至和他们一样大动肝火!)鲜明的反差也体现在他们的生平方面:伏尔泰少年得志、成竹在胸、阅尽沧桑,卢梭漂泊不定、历经挫败,直到接近40岁才意外成功;伏尔泰是巴黎人,卢梭来自外省僻壤;伏尔泰在高级社交圈中如鱼得



让·雅克·卢梭

水,卢梭则是一个乡巴佬;伏尔泰是所有女人的征服者,而卢梭一有女人走近就张口结舌,只能在幻想中做一个热烈的情人。至于思想方面,伏尔泰是一个怀疑论者,才思敏捷,玩世不恭,卢梭则是一个内心紧张严肃、感情热烈的信徒;伏尔泰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卢梭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伏尔泰赞成贵族统治,卢梭主张大众民主;伏尔泰是古典主义者,卢梭则是浪漫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们两人都是鼓动宣传的罕见天才,能够用生动的文学作品来体现当代的重大思想问题和争论。关于卢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他没有发明什么,但是他点燃了一切。”这个说法几乎也同样适用伏尔泰。两人的才华和各自在知识谱系中的基本地位极其相似,因而使得他们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两人合在一起,几乎可以代表这个世纪。

卢梭在16岁告别了在日内瓦的不太愉快的生活。他终其一生都是学习者、思想者和梦想者,但缺乏社交能力。他既不是伏尔泰那样的处世能手,也不是狄德罗那样喜欢交际的天才。他于1742年抵达巴黎时,不是像当年伏尔泰那样作为一个神童而处处受到社会的欢迎,而是一个30岁的

成年人,经历了没有目标的漂泊生活后依然一无所成。卢梭后来在那本引人入胜的《忏悔录》中在不动声色的假象下尽可能地让读者觉得,他悲惨的少年生活不应归咎于他本人,而应归咎于他的生活环境或者其他人的罪过。但是,他生来懒惰和过分敏感也是其中的原因。正是由于这种敏感,使他能够不停地写作;他对大自然的描写和对内心活动的描写,给欧洲散文开辟了一个新方向。

卢梭初到巴黎,带着一套新发明的记谱法,把自己想像成一个音乐科学家。但是这套记谱法并没有引起卢梭设想的那种轰动。不久,这块外表粗糙的钻石怯生生地挤进了珠光宝气的沙龙。他被任命为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结果是一塌糊涂。卢梭认为他的雇主智力低下,大使则以他过分傲慢为由将他辞退。卢梭一生都在争吵之中。显然,他与人很难相处,性格有些病态。在这次挫败之后,卢梭又经历了一些不快的岁月。这使他对冷漠无情的巴黎上流社会逐渐充满怨恨。他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社交能力来对付巴黎上流社会,而巴黎上流社会也拒不承认自己的才华。

有奖征文活动拯救了他,使他有机会把自己对社会的积怨用公众可接受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征文的题目是,“艺术和科学的复兴究竟有助于敦风化俗还是有助于伤风败俗?”卢梭所采取的立场通常被人视为出乎意外,但是第戎科学院的学者(第戎是一个严肃的外省省会)很可能基于旧式基督教原则,喜欢一个赞同后者的回答。不寻常的倒是,居然有一个像卢梭这样聪明的巴黎作家会持这样的主张。后来卢梭描述自己读到这个题目的感觉犹如一次宗教顿悟和信仰转换,就像笛卡儿在1619年11月的经历一样,犹如一道光亮给他指示了以后的整个人生道路。这发生在1749年10月,当时他去探望在万塞讷监狱中忧郁憔悴的狄德罗。他激动地说:“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宇宙,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卢梭的观点是,文明总是被艺术所败坏。这种观点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根据一项仔细的研究,有68篇文章批判这篇论文。卢梭后来也承认这篇论文有缺陷),但也很难否认它的实际意图还是有些道理的。卢梭的意思是,巴黎上流社会所充斥的是被自诩艺术庇护人的夫人们所控制的所谓文人墨客以及那些阿谀奉承的势利小人;这个灯红酒绿、骄奢淫逸的上流社会本身糜烂不堪,而且还在败坏整个社会。它已经越来越远离人们关于思想文化之都的想像。在这种描述中确实包含着真知灼见。为了持续地做些严肃工作,伏尔泰也不得不抽身退出巴黎。高谈阔论与风流韵事、勾心斗角交织在一起,这种氛围可能非常好玩,不过,这就是哲学吗?针对这

个荒淫无耻的“索多玛”城和伪哲学家们，卢梭表达了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

卢梭在获奖的论文中宣称，埃及、希腊和罗马都是因为骄奢淫逸而衰落。随着生活方式变得精致文雅，真诚也就丧失了。这样的话，我们的知识最终不都成了浮华虚荣了吗？我们最终造成的不就是怀疑主义吗？卢梭呼应蒙田的“我知道什么？”，谴责人类理智的傲慢。与此同时，他又有些自相矛盾地赞扬培根、笛卡儿和牛顿，因为他们带来了有用的知识。他实际上并不是反对所有的“文明”，仅仅是反对当代上流社会糜烂而矫揉造作的文明的某些方面。不过，他的基调是强调“回归自然”，以此作为克服矫揉造作的法宝。他赞扬斯巴达人和西徐亚人；在他看来，诚实的农民要比谄媚的朝臣好得多；没有过多“书本知识”的人要比学者好得多。对此，伏尔泰以不屑的口吻反击道，卢梭想让人类回到四肢爬行的状态。

巴黎上流社会最初并没有认真看待卢梭的这篇论文，而是把它当做一个娱乐品来消遣。这里确实有悖常理：一个人既通过写作来竞争奖品，又在文中论证所有这类智力活动都是让人堕落孱弱的。（卢梭所赞扬的斯巴达人大概没有举办过文学竞赛。）卢梭被各种邀请搞得不知所措。他的士气被看做是与他的观点相互印证，被人们津津乐道。或许是由于胆怯，或许是出于原则，卢梭拒绝觐见国王，也拒绝了一份皇家津贴（这发生在歌剧《乡村卜师》获得成功）。当时，巴黎的哲学家们常常在无神论者霍尔巴赫男爵的沙龙聚会。卢梭不久就开始与所有这些哲学家争吵起来。

卢梭从第一篇论文的原始主义很快就推进到他后来作品的观点：人在自然状态中是好的，但是现存社会使他堕落。由这一基本观点引发出来的耸人听闻的观点有：（1）爱情与婚姻是文明的灾难性发明，是女性的阴谋；（2）私有财产是另一种有害的发明，是巧取豪夺的结果，带来了不平等、贪婪和战争。对于第二点，伏尔泰尤其不能赞同。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卢梭攻击私有财产是再次攻击文明本身。

卢梭接着提出，创造了国家的社会契约出自欺骗和伪造，是富人奴役穷人的一个阴谋。他的意思是，现存国家是不合法的，因此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全部推倒重来。卢梭所推演出来的结论成为现代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出发点。虽然这些结论在他那里仅仅是些想法，甚至让我们觉得不过是一些辞藻，但是在一代人之后的法国革命期间，这些词句却被人们极其热烈地引用。这是因为卢梭的作品已经广泛流传，几乎没有人能够抵挡住他的文笔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特殊魅力。可以说，卢梭的《社

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自从原始基督教的时代以来欧洲世界所接收到的最令人震撼的社会启示。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写于 1755 年,是为了响应第戎科学院的又一次有奖征文。但是这一次卢梭没有获奖。有奖征文的题目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它是自然法所认可的吗?”卢梭受到启发,想接着阐明他在第一篇论文中提出的一些相当模糊的思想。在这第二篇论文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他所设想的人在自然状态中的状况。卢梭笔下的自然人与霍布斯笔下的自然人大相径庭:他是快乐、健康的人,没有文明及其压力和束缚所造成的那些不幸,他的需求不多,也很容易满足。在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时,他对别人的痛苦也怀有恻隐之心,因此他有社会意识。卢梭关于原始纯真状态的说法简直是一幅伊甸园的画面。那么,为什么人类要告别这种快乐状态,堕落从何而来?实际上,卢梭把这一切归咎于贪婪和自私。至少有少数人欲壑难填,贪求超出必要范围的财富和权力,为此不惜牺牲自己同胞的利益。私有财产不祥地出现于人间,为了保护财产而产生了国家。从此总的情况是越来越坏。

应该指出,这里有一个矛盾。卢梭说人天性是好的,但是丧失了原初的美德,原因是——他很坏!或者至少是有一些人很坏,其他人显然无力抵抗他们。他在其他地方谈到人的两种本性,一种是高级的,另一种是低级的。但是,既然有这两种人性,那就应该永远都有。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类曾经幸福过,后来就不再幸福了呢?或许,这种原初的自然状态只是一种文学比喻?卢梭的思想充斥着“两极性”,即莫衷一是的二元论;但是,毫无疑问,人的心灵本身都是如此。在洞察人的心灵方面,卢梭是无与伦比的专家。

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中,卢梭进一步表明,这种伪造的政府契约是由少数富人阴谋家强加给人民的,并借此建立起一种专制统治,却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了合法性。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全新的契约,这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而是所有的人彼此之间的契约。在撰写这部著名论文之前,卢梭还发表了两部“小说”。这三部作品都产生于 1761—1762 年,是他创造活动的高潮,也是他事业顶峰的标志。随着教育和情感小说《新爱洛绮思》和《爱弥儿》的发表,他的文学成就达到顶点。也正在这个时候,他与“哲学家”团伙正式分道扬镳。他与狄德罗发生了争吵;他与把他当做自己宠爱的哲学家的那个上流社会夫人决裂了;他离开巴黎住到乡下;他给伏尔泰写了一封充满敌意的信(“我不喜欢你,先生……”)。他在 1761

年写道：“我坚决地与‘哲学家’团伙分道扬镳。当他们宣传亵渎宗教的思想时，我根本不喜欢他们。这就是他们不能原谅我的地方。”卢梭又补充说，他也坚决地反对宗教偏执，绝不会取悦教会。他小说中最著名的段落是“萨伏依牧师的信仰自白”。这是对自然神论上帝的一首充满激情的赞美诗。它确实两边不讨好，无论对虔诚的教徒，还是对不敬上帝者。它既充满了宗教情感，但又完全背离正统。威廉·布莱克的诗句概括了卢梭的命运：

嘲笑，不停地嘲笑，伏尔泰、卢梭。

他与 18 世纪的无神论和反基督教思想发生了某种联系，但恰恰是他与它们的对立成为他与伏尔泰争吵的原因。诚然，卢梭激烈地抨击基督教会的欺诈和虚伪，很想用自己的自然宗教取而代之。与那些自称的自然神论者相比，他是更真诚的自然神论者，因为对于他来说，上帝和宗教真的很重要。其他 18 世纪的自然神论者要么像狄德罗那样觉得上帝并不重要，要么像伏尔泰那样，出于实用主义考虑，认为维持一种对上帝的信仰是有用的。

伏尔泰认为，卢梭此时已经疯了。实际上，卢梭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除了天生的喜怒无常外，又增添了一种病痛）。由于有钱有势



卢梭著作《爱弥儿》的插图，1779 年在这本广为传阅、备受推崇的著作中，卢梭阐释了因人施教的思想。

的朋友不多，在发表了《爱弥儿》和著名的《社会契约论》后，他受到迫害，不得不逃离法国。他指责基督教徒和哲学家结成邪恶的同盟来迫害他，并非没有道理。

《新爱洛绮思》是一个关于道德问题的充满激情的感伤小说,歌颂了一个美丽妇人的贞淑。她战胜了肉欲的诱惑(尽管曾经陷入其中),坚持忠于自己并不爱的丈夫,甚至使自己的意中人也相信有一种友谊高于肉体结合。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小说之一,似乎欧洲的所有妇女和一半男人都为之落泪。人们常说,浪漫主义伴随着这部小说而诞生。我们毋宁说,卢梭是浪漫主义的先知。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森的小说《帕梅拉》和《克拉丽莎》的启发,借鉴了纯洁少女遭受诱惑这一时髦的感伤主题。这是感伤小说的时代。

《爱弥儿》是一部教育论著,宣讲的是卢梭的信念:“在离开造物主之手时,一切都很好;落入人类的手中,一切都堕落了。”后来伟大的法国批评家泰纳<sup>[1]</sup>对卢梭的这一核心思想做了解释如下:

抛弃文明人矫揉造作的习惯、多余的需求和错误的偏见……回归你自己的内心,倾听它隐秘的情感,让你自己听从本能和良知的指引;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原始的亚当……他长期被埋在泥土的硬壳下面,在被清除了污垢而发掘出来后,他能够以完美的形式和纯洁的面貌重新回到原来的基座上。

《爱弥儿》被称作“现代教育的基本论述”,因为它显示一种意识,即需要把儿童当做一个发展中的人格来对待。卢梭批评洛克的观点,指出儿童不是小大人,不能简单地晓之以理。他区分了儿童的成长阶段:例如,5到12岁是前理性阶段,感觉占主导地位,教育应该诉诸具体的经验。12到15岁,人们应该接触需要智力来解决的问题;然后是逐渐灌输道德,最后是探索性的奥秘。这里我们再次见到卢梭最珍视的思想:儿童的天性是无邪和善良的,尽管他承认存在着一些邪恶倾向,因此在这个问题不能一以贯之。他断定,顺其自然而不是与自然对抗的“自然教育”是最好的教育。现行的教育是建立在错误的原理上。卢梭的忠告是,“反常规而行之”,你倒可能做对了!他抨击由奶妈代哺的习俗,引发了母亲自己哺育的时尚,甚至贵族妇女也趋之若鹜。人们已经熟悉的原始主义主题又显露出来:把真正的斯巴达健身方式强加给可怜的儿童(例如,冬天开窗睡觉)。卢梭还借机发

---

[1] 泰纳(Hippolyte Taine, 1828 - 1893年),法国思想家,著有《艺术哲学》、《当代法国的起源》等。



表了一个讲演,鼓吹简单诚实的劳动优于名实不符的职业:我们都应该当木匠或类似的匠人。

卢梭也把前面提到的著名的萨伏依牧师信条放进《爱弥儿》中。这个牧师主要凭借直觉意识到上帝的存在,但也引用了“设计论”的论证(即把宇宙看做上帝设计的杰作)。培尔和伏尔泰认为,邪恶问题是批驳一切宗教宇宙观的最强有力的论据;卢梭也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邪恶必然存在,因为它是自由意志的必要条件。如果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如果人们只不过是一些机器,美德就不可能有任何价值了。自由意志使人们能够选择善,从而赋予它以价值。如果人们不选择善,他们就会因他们的选择而吃苦头。后面这个命题会使许多人感到十分可疑。但是卢梭的回答是一种古典的回答,而且他很雄辩地呈现这种回答。他的基本观点是,有善必有恶,恶是善的对立面。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是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世界上为什么有或似乎有那些不必要的、多余的和反常的恶呢?也许人们会说,譬如,为了享受食物,就必须有饥饿感。但是人们为什么要受饥饿之苦呢?不过,卢梭毕竟是始终如一的乐观主义者,曾经回信反驳伏尔泰关于里斯本地震的观点。

萨伏依牧师在探讨了这个问题之后,对于灵魂不朽的问题发表了一番完全背离正统的说法。其中根本没有基督教的救赎教义。美德本身就是奖励,邪恶本身就是对邪恶者的心灵惩罚。卢梭当然不能接受基督教的原罪教义。人性在本质上是好的。人性确实被败坏了,但是我们知道,卢梭提供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堕落故事:人类抛弃了简朴平等的生活,追逐财富,建立了私有财产,从而造成了一系列的不幸。这种情况是可以矫正的,因为人类没有丧失自由意志,也没有背负任何先天的罪愆。

萨伏依牧师最后呼唤一种更纯粹、简单的宗教,这种宗教应该少一些教条,或者根本没有教条,有些类似于虔敬派或寂静派<sup>〔1〕</sup>。爱弥儿在18岁时,适时地聆听了萨伏依牧师的道德教育。然后他前往巴黎,但是又富有象征意义地离开了这个“嘈杂、泥泞、烟雾弥漫的城市,那里的女人不相信荣誉,男人不相信美德”。爱弥儿回到乡村。接下来的爱恋经历这里就无须详谈了。这本书在法国被查禁,甚至在荷兰也被查禁。这是因为它既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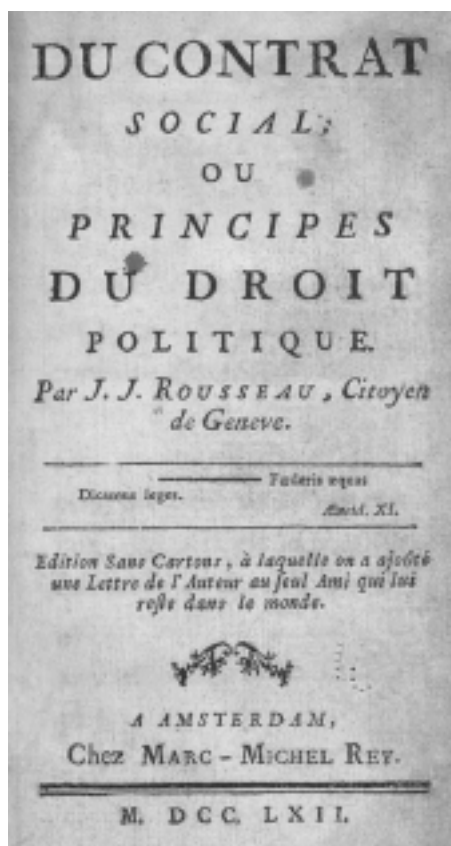
---

〔1〕 虔敬派是德国路德宗教会中的一派,斯彭内尔、弗兰克等是其主要领袖。该派强调,信仰的要旨不在恪守死板的教条,而在于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内心的虔诚。寂静派是天主教的一个神修学派,主张人的修德成圣在于绝对寂静,直接与上帝对话。

犯了正统宗教,也冒犯了强大的“哲学家”团伙,另外还因为它包含着政治激进主义的思想。(这本书里包含着《社会契约论》的一些思想萌芽。)在伏尔泰和其他哲学家,即所有的理性主义者看来,这是一派胡言乱语,保藏着祸心,要消除理性的成果,使人类回到原始野蛮状态。他们嘲讽卢梭,促成对他的驱逐,但是他们无法消除卢梭的作品给读者公众造成的印象。卢梭的读者要比《百科全书》和伏尔泰戏剧的受众要多得多。

## 社会契约

卢梭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原始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他倡导回归田园般的自然,后来又写了动人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这个卢梭难道不是与《社会契约论》的作者形成了令人迷惑的反差吗?因为,从表面上看,《社会契约论》包含着大量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卢梭号召用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来取代骗人的旧契约。他鼓吹平等和一种民主政体,但是他几乎废黜了个人的所有权利。因为这个新社会把所有的权力都寄托给共同体,把公众的意志变成一种公意。公意是一种集体意志,但不是个人意志的总和。



《社会契约论》封面

为了解决或解释这个矛盾,我们就必须回顾卢梭的核心思想:个人在本性上是善的,恶是社会的产物。由这一点可以向两个方向推理。人们可以断言,由于个人是善的,社会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赘物。卢梭的一些追随者(特别是本书后面要论述到的葛德文)就采取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有时卢梭也试探一下这条路,但是他主要采纳另一条路线。社会绝不是不必要的,而是影响个人的决定性因素;人们的任务就是重新建构它,把它从一种败坏人的力量变成一种振奋人的力量。良好的社会不应建立在自私即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无私即共同体的基础上。它应该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是精心组织起来的乌托邦。总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顺理成章地描述了一种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国家是怎么产生的?它既不像菲尔默所说的是由家庭演化而来,也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自然形成的有机体。卢梭批驳霍布斯的说法,认为人类绝不会自愿地把自己交给利维坦式国家,让它来奴役自己。国家确实应该起源于契约,但是迄今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契约;一些强大而较少顾忌的人完全是靠着欺骗和暴力来推行他们的意志。群众原来一直是很轻信的,但是他们将要觉醒了。为了确保他们的自由,人们将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契约。他们将不会再把一个国王推上宝座,而会把自己确立为自己的统治者。他们的主权者就是公意。这是全体的意志。它是全体人民的政治意志。但是,在卢梭的许多批评者看来,他刚把人民解放了,旋即使人民重新受到奴役——使人民屈从于这种抽象的公意。因为公意不是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一种理念,表示人民应该有的意志,而且必须是正确的意志。此外,个人要把自己的全部权利交给国家;与洛克所主张的社会契约(受到大多数法国启蒙哲学家的欢迎)不同,这里没有给个人保留任何“自然权利”。卢梭认为,离开了社会,不可能有任何“权利”;人在自然状态中没有“权利”,而只有强权。

卢梭当然无意于支持一种极权主义国家;实际上他也不可能知道自已的理论会意味着什么。他甚至没有预料到,就在自己去世(1778年)后不久爆发了法国革命,在革命期间狂热的独裁者们会那样利用他的公意理论。尽管如此,卢梭的政治学说显然是国家主义的,他的直接后继者可以说是黑格尔。他甚至鼓吹一种公民宗教,即一种官方的自然神论;所有的公民必须接受它,拒斥者甚至有可能被处以死刑!近年来,卢梭的批判者常常把他说成是一个法西斯先驱;他们的主要依据就是这种强制推行的国家宗教。但是,应该指出,至少按照一些卢梭思想研究专家的说法,卢梭是在描述一个尽善尽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个人利益彻底溶入公意,社会团结达到最完满的程度。我们无法搞清楚卢梭是否会支持迫害政策。他确实认为,在一个完美的社会里,个人的最高忠诚应该奉献给那个社会,而不应该奉献给其他某种权威。这与柏拉图的结论完全相同,人们有理由因此而批评卢梭的思想是非自由主义的。但是,说卢梭的政治体系带有宗教裁判所的性质,则不免过于夸张。卢梭确实深受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影响,在他的《社会契约论》可以看出,他同样不能容忍任何人挑战法律,同样把国家视为有机体。这就造成了某种令人困惑的情况:卢梭与卢梭在打架,即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卢梭与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卢梭在打架。

在法国革命中,同样可以看到民主主义的狂热和几近极权主义的独裁

的那种结合。“雅各宾民主”就是卢梭思想的一个产物。有人将现代社会主义追溯到卢梭。对现代法西斯主义,也有这种看法。很显然,现代世界的许多东西竟然是出自于这个日内瓦人的思想。不过,近年流行的一些卢梭专论错误地严重夸大他的极权主义侧面。由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本身具有扑朔迷离的性质,还由于卢梭本人的论述自相矛盾,因此这种争论恐怕是永远不会了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新的研究结果认为,卢梭基本上是站在个人一边,他并不想要任何利维坦式国家,实际上他很像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见阿尔弗雷德·科班的《卢梭与现代国家》,1964年修订版)。正如科班所说:“他的思想始终保留着一个坚实的、不可化解的

个人主义核心;即使逐渐高涨的共同体价值观潮流也不能将其冲刷瓦解。”如果没有注意到卢梭对国家和共同体的区分,就会产生某种误解。“公意”是共同体的意志;它不可能完全或者根本不能由现存国家所体现。卢梭认为,实际上,就像民主一样,它也是一个在现实世界很难实现的理想。他没有像黑格尔那样神化国家,而只是神化了“人民”。

“原始主义”、已逝“黄金时代”的神话或者“高贵的野蛮人”的神话,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实际上属于一种人类的意象或神话原型。<sup>〔1〕</sup>因此,卢梭可以归入一个悠久的传统,或者说,他重申了一个人类所熟知的古老而简单的思想。但是他改写了这个神话,赋予它一种新的意义,使之适应现代人的需要。关于黄金时代的神话大多



“高贵的野蛮人”,印第安切罗基部落首领斯托金·图基的肖像。一些启蒙作家认为,美洲著居民的文化代表人类单纯、诚实的美德,没有受到堕落文明的玷污。

〔1〕 参见洛夫乔伊和博厄斯的《原始主义及相关古代观的文献史》(1935年)以及M·伊利亚德的《神话、梦幻和神秘》(1960年)第2章。洛夫乔伊教授曾经正确地指出,严格地说,卢梭不是一个“原始主义者”,因为他并不认为人类可能或者应该停留在野兽般的早期生存状态。把这个术语应用于卢梭,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他对早期人类生活做了许多论述,而且他在将现代人与古代人比较时,常常否定前者。——原注

只是设想了“最初”有一个理想的、幸福的、天堂般的时代。按照一些说法,那时人类是长生不老的,能够与上帝交谈,没有任何罪愆,也不需要工作。基督教对这个神话的演绎别具一格:它把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反而看做是一种幸运,因为人类不可能停留在这种原始阶段,必须在历史中前进,从而达到比原始阶段更好的最后阶段。卢梭把这种思想表达得更为明确,同时把它世俗化了。人性或许曾经是纯洁的,人或许曾经是自由的;但是,人类有一个被贪婪所腐蚀的伤口,由此导致了堕落,坠入私有财产、物质主义、无信仰、无道德。如果人类能够真诚地悔恨自己的罪恶、决心建设一个新社会,完全从那个腐败的旧社会挣脱出来,那么人类就能获得拯救。这个新社会不是简单地恢复那个无忧无虑的原始状态,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建完全的和谐、自由与平等。这就是卢梭所设想的并且广受欢迎的说法。这种说法究竟是深刻还是幼稚?这是一个现代人赖以生机的神话,还是一个古老的幻想?

卢梭没有像伏尔泰和理性主义哲学家那样把目光投向开明专制君主。对于他来说,理想的政体就是纯粹民主制,即便这是不实际的(他也这么想),那也应该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直接参与。因此,政府管理的单位应该小一些。一个大国应该实行由这样一些小单位组成的联邦制;由此,在提倡联邦主义即较弱的中央政府方面,卢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当我们听到把卢梭称作“潜在的极权主义者”时,千万不要忘了这一点(指卢梭的联邦主义倾向)。他所宣扬的紧密结合的共同体更像是城邦国家;它们应该拥有的民主统一是那种在紧密结合的小型共同体中常常能够实现的东西。卢梭几乎不可能赞同把这种共同体扩大成一个大型国家。他确信,谁也不能把公意中自己的那一份委托给别人,即使是通过选举的方式也行不通:卢梭不接受代表原则。今天我们会自以为实现了民主,因为我们每隔几年就会选举某个人代表我们进入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如果卢梭活到今天,听到我们自吹,肯定会嘲笑我们。

因此,更确切地说,卢梭应该被视为一种小型共同体的提倡者。这类共同体应该是极其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并且松散地组合成一个联邦。还应该记住,《社会契约论》仅仅是没有完成的宏大的政府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他的政治理论的另外一些内容可以在其他著作中看到,例如他为科西嘉岛制定的非常有意思的宪法。

人们早已指出,卢梭实际上不是什么革命者,那些在法国大革命中利

用卢梭的人发明了一个神话的卢梭。<sup>〔1〕</sup> 卢梭不仅仅对群众和暴力有一种过敏似的不信任,而且对中央集权的国家怀有一种敌意,而中央集权的国家恰恰是革命中的激进派所追求的东西,也是大革命的最持久的后果之一。但是,我们不应忽视卢梭思想中暗含的革命内容。如果说有不止一个卢梭的话,马布利和摩莱里<sup>〔2〕</sup>就制造了一个现实的卢梭。卢梭成为大破大立的提倡者,即提倡对一个没有希望的腐败文明进行彻底改革;他还是一个民主理论家。尽管法国大革命的方向并没有完全遵循卢梭的理想社会观念,但我们确实可以把他看做是促成法国大革命的全部因素中最深刻的因素。

最后,我们需要对这个复杂的“卢梭问题”作一个简短的总结。或许,最好的方式是从“两极性”或矛盾性的角度来看待卢梭。人生而自由,但又自己奴役自己;人就天性而言是善的,但就天性而言又易于腐败;人是痛恨权威的,但又需要权威;人必须有宗教,但又不愿服从任何神;历史是一部恐怖的记录,但会以乌托邦结束。等等。卢梭运用语言的魔法把这些深刻的见解烙印在欧洲人的思想里。卢梭对于许多人来说意味着许多意义。他是平等和民主的鼓吹者,是简朴和社会主义的宣传者;他既鼓舞了人们回归自然,又激发了一种乐观的未来主义。研究卢梭思想的学者们对其思想含义争论不休,但都认为他被误解了,而且认为他也不易理解。但是平民百姓却自认为完全能够理解卢梭,并且受到启发去改变世界。

直到 1778 年去世,伏尔泰一直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最后几年,他已经被奉为德高望重的圣人。1778 年,他最后一次前往巴黎,成为一次盛大的凯旋。卢梭在 1763 年后心情很坏,几乎陷入疯癫。但是他还创作了一些不朽的作品(包括无与伦比的《忏悔录》)。他与伏尔泰同年去世。此时,浪漫主义的风格与情绪喷薄欲出,而卢梭是浪漫主义的一个先知;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浪潮即将席卷而来,卢梭的名字将会挂在许多人

---

〔1〕 参见戈登·H·麦克尼尔的论文《反革命的卢梭》(《美国历史评论》,1953年7月)和《卢梭崇拜和法国革命》(《思想史杂志》,1945年4月)。另外参见本书第七章。卢梭还曾应邀为当时的波兰拟定一部宪法。卢梭在这部宪法中表现得相当保守,力求以传统为基础,而不是大破大立。——原注

〔2〕 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 1709 - 1785年)是孔狄亚克的长兄和达朗贝尔的堂兄,也是著名思想家。

摩莱里(Morelly, 生卒不详),著有《自然法典》。马布利和摩莱里被视为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

的嘴边。伏尔泰的名字也将被反复传颂。从政治意义看,他们两人都具有毫不逊色的革命性,但是法国大革命造就了一种不亚于卢梭崇拜的伏尔泰崇拜,把伏尔泰奉为“对偏见、迷信、狂热、封建特权以及所有的专制暴政进行正面攻击的第一位哲学家”。总之,这两位伟大的 18 世纪哲学家共同促成了革命。但是,在革命期间,他们最终还是互相争斗。

## 第六章 启蒙运动：怀疑主义者和“科学家”

在某些时期,虚假的怀疑主义到处泛滥……而真正的怀疑主义总是不够。

——雅各布·布克哈特

我不喜欢你所说的 18 世纪的人。他们处理事物都太简单化了。

——亨利·柏格森

### 英国的怀疑主义

如果说卢梭的背叛在某些方面促成理性时代牧歌的结束,那么在打破自信的理性主义方面,出自英国的反戈一击则起了更大的作用。英国是牛顿和洛克的故乡,曾经决定性地影响了 18 世纪思想。几十年后,同样的风向带给欧洲大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英国经验主义谱系中的洛克哲学后继者们得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结论。他们接受洛克的基本假定,并加以推演,但不是导向肯定,而是导向怀疑主义,不是导向实在论,而是导向“非唯物论”。这一点,在前面讨论洛克时已经有所提示。

乔治·贝克莱主教既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卓越的哲学家。他对牛顿和洛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与上个世纪的帕斯卡相似,贝克莱认为牛顿和洛克的观念太浅薄,而且过于唯物主义。他的《论运动》(1721 年)今天看来很是不同凡响,因为它认识到牛顿提出绝对时空的错误;与莱布尼兹一样,贝克莱这个聪敏的爱尔兰牧师在某种程度上是马赫和爱因斯坦



的先驱。此外,贝克莱还看到,任何科学理论都不能自称是在原原本本地描述事物的性质;我们所能说的仅仅是,这是一组起作用的符号,借助于这些符号我们对某个范围的现象有所预见。这是现代物理学家最终被迫接受的观点,而这一点使贝克莱成为一个真正的先知。当时没有什么人重视这个观点。

这位克罗因教区主教<sup>〔1〕</sup>所做的视觉研究在很长时间内是实验心理学的经典。他具有充沛的精力和广泛的兴趣:关注自己家乡爱尔兰的社会改革(《询问者》),试图在北美的罗得艾兰建一所学院,与



贝克莱主教

自然神论者进行交锋(《阿尔西弗朗或渺小的哲学家》),也与辉格党人唇枪舌剑。身为保守派,他希望能用自己的唯心主义驳倒大不敬的唯物主义者。他对焦油水治疗疾病的功效怀有一种奇特的热情;这成为他的一大怪癖。但是,贝克莱还是具有敏锐的才思。他的唯心主义被认为是他的最大怪癖,因为似乎这个发疯的主教自以为他已经抹煞了物质的存在。但这实际上包含着他对哲学的非凡贡献。虽然贝克莱也了解欧洲大陆哲学家马勒朗士、莱布尼兹等人的思想,但是他一直对洛克保持着最大的敬意,同时又对洛克的认识论进行系统的批判。他称自己的“非唯物主义”是严格的经验主义、符合逻辑,甚至符合常识。贝克莱认为,如果我们在感知事物时仔细地考察原委,小心地使用术语,我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洛克没有完成他对这一过程的分析。洛克指出,我们有关于外部对象的“观念”,只是在对象作为观念(今天的说法是“感觉数据”)出现在我们的头脑中时我们才认识它们。例如,我们对眼前书桌的认识就是由我们的各个感觉器官带给

〔1〕 贝克莱在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哲学,尔后成为该学院的研究员,后来被任命为德里学院院长和圣公会(爱尔兰)教会克罗因教区主教。与18世纪许多圣公会人士一样,贝克莱基本上是一个学者,教会职务几乎仅仅是挂名。——原注

我们的一系列感觉印象——大小、形状、颜色、质地等等。我们不是直接认识事物,而是通过我们的感觉来认识事物。本来一切都很正常;贝克莱认为,洛克却错误地把某些性质说成是“基本的(第一性的)”,是对象本身固有的,是作为实体或本体实际地“在那里”。洛克确实主张,大小、运动和数量这些基本性质并不像次要性质(如颜色、气味、味道等)那样依赖于我们的感觉。但是,贝克莱认为,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第一性的性质或本质,所有的性质都是主观的,都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这就是他在一系列对话(1713年)中所做的精彩论证。这些对话是柏拉图之后几乎无与伦比的佳作。洛克在他的实在本质论中保留了中世纪思想的残余。我们在仔细地分析之后发现,“事物”可以被打发掉了,它不过是感觉数据的集合!

除非它被感知到,否则它就不存在。存在就是被感知。对于一个无生命的对象,当我们说它“存在”时,只不过是说有人感知到它或者有人能感知到它,否则毫无意义。贝克莱向读者挑战,看谁还能找出“存在”这个词的其他意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实在就变成精神上的存在。存在着的只是“精神”(心灵)和“观念”(输入心灵的感觉数据)。贝克莱不断重申,这种推理思路是基于经验、遵循逻辑的;他绝不认可任何神秘事物。他的“唯心主义”与起源于19世纪德国哲学家的那种唯心主义不同,后者确认了一种神秘的、不可言喻的精神实体,而贝克莱则拒绝任何本体。现代哲学家会说,贝克莱在否定事物有什么本质特征时是正确的,尽管他在利用这种“现象主义”来论证精神的世界和上帝的世界时可能走得太远。贝克莱断言,他让世界恢复了原貌:“一切都像以前那样真实。我希望,称一个事物为‘观念’时并不使它变得不太真实。”他补充说,如果你对吃“观念”、穿“观念”这种说法感到惊讶,那么观念这个词本身并不重要;只要你同意下面的观点就行:“我们吃的、喝的和穿的都是感觉的直接对象,这些对象不可能在没有被感知的情况下存在。”

当然,这位主教接着论证上帝的存在,其论据是:出现在我们心智中的观念应该是由“无所不在的永恒心智”引起的。我们不可能有一个上帝的“观念”,即不可能把他作为一个感官知觉来直接认识,但是我们从可被感知的对象的存在来推测上帝的存在,因为这些对象肯定是由某种东西引起的,肯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感知者。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实际上是上帝的思想——这是一种诱人的描述,但无疑偏离了贝克莱的经验科学。不过,他毕竟是以经验为依据并且进行彻底的推理。尽管人们斥责他陷入明显的矛盾,但是他用彻底的推理给予常识性的洛克理性主义一个沉重打击。狄

德罗不安地写到,唯心主义最为荒诞,也最难驳倒。贝克莱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启蒙时代的唯物主义。

在贝克莱的分析中最具有生命力的,也是被哲学界长期公认最无可争议的,是他对认为事物具有固有特性或实体特性的观点的抨击。即使这类性质存在,我们也无法认识它们,因为它们只能通过我们的感觉呈现给我们,我们所能说的就是,我们从外界获得了信号,然后把它们转化成关于这个事物的观念或意象。贝克莱指出,当我们说“这个桌子是褐色的”,细究起来,我们说的不对。褐色是一种颜色,而颜色只有具有感觉器官的人才能认识。因此这个颜色不是存在于桌子中,而是存在于我们心中。“无感觉的事物不可能产生任何感觉。”物体的形状、大小或重量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差异;它们也是我们感觉的结果。

## 大卫·休谟

如果说贝克莱是接替了洛克,那么大卫·休谟就接替了贝克莱。休谟是他那一代人中最敏锐的哲学家。这位爱尔兰人,出身低微,很早就怀有“探讨哲学和各种学问”的热情,25 - 26岁时在巴黎艰苦奋斗,写成《人性论》,于1738 - 1740年分三卷出版。用他自己的话说,它“从印刷机上一出生就成了死胎”(意思是当时没有什么反响。——译者注)。1752年该书修改后出版,书名是《人类理解研究》。从书名可以看出洛克的影响。这本书的情况好得多了。他的其他各种论著也有助于他获得极大的声誉。这些论著包括著名的《英国史》以及有关道德、宗教和政治问题的论文。他在宗教问题上有怀疑论乃至无神论的名声,因此使他无法得到他所渴望的爱丁堡大学教职。但是,当他1763年访问巴黎时受到“哲学家”们的推崇,而且他在欧洲各地都被公认为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从此他的声誉历久弥新;时至今日,他依然被视为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大卫·休谟

启蒙运动中期,休谟给怀疑主义遗产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怀疑主义新的动力,使之成为批判性探究人类知识的工具。

休谟思想大胆、不拘成见,学识渊博、推理严谨。他确实是一个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甚至几乎可以说他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但是,他所得出的结论,即彻底的怀疑论主张,却使启蒙运动的乐观的理性主义陷入最严重的困境。它使这种理性主义开始衰落,到康德哲学时终结。康德本人也受到休谟的启发。

休谟的思路是一种坚定的经验主义,是洛克和贝克莱的延续;他证明,这种思路会导致怀疑主义。《人性论》试图把科学方法应用于对人的研究。与洛克一样,为了确定人类认识的性质和范围,休谟从考察心灵入手。他极大地改进了洛克对认识过程的考察。洛克所谓的“观念”被休谟分解成(1)感觉印象,(2)作为这种感官知觉的结果在心灵中形成的意象。休谟的分析要比洛克和贝克莱精细得多。无须十分深入地了解,我们就可以注意到,休谟是循着下列方式得出其著名的怀疑论的:

(1)休谟接受贝克莱对“物质对象包含实体或本体”说的批判,但是否定这位主教对“精神”或心灵的信念。他指出,对精神或心灵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分析。根本没有什么被称作“心灵”的实体,有的只是一系列心理过程。我们怎么能用经验来证明“我存在”?我们所认识到的其实只是:感知活动正在进行。

(2)更重要的是,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性质做了详细的考察。他发现,我们关于实在的、经验的事物所做的一切推理,都是这一类寻找因果关系的推理。换言之,如果我们对外部客体世界做任何有目的的思考,而不是仅仅记录它们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引进因果关系——例如,我确定,棒球在空中运动是因为我用棒击打了它;再如,我确定,冰融化是因为天气变暖了。然而,休谟在分析结束时得出的结论却是,根本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来证明这种推论的正当性。一个物体紧邻另一个物体(球紧邻棒),在时间上有一种先后秩序(球在被棒击打后在空中运动),这两点都能被经验所认定。但是我们并没有体验到原因和结果;我们完全是在假设这种因果关系。这种假设是基于对同样事情反复发生的经验,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将来永远会发生。人们可以说,“自然过程永远持续不变”,但这是无法证明的,因此只能说具有这种可能性,即使是极大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一个信念问题。在感觉经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迫使我们相信一个事件引发另一个事件。我们被迫得出结论(至少休谟是如此):不是“理性”而是“习惯”支持着我们的科学定律。我们已经习惯于假设,过去发生的事情将来还会发生,但是这是“理性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永远无法”证明的事情。后来的哲学

家发现很难驳倒休谟的这个观点。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3)休谟对人类心灵活动方式的探幽洞微,使他得出了另外一些怀疑主义的结论。他认为,“理性”其实在生活中没有多大作用。休谟非常关注道德哲学。他发现,在我们的行动中,“理性……除了服务和服从感情外,绝不能冒称起其他作用。”道德不能判断,只能感觉。”在价值观念方面,理性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道德判断是基于情感上的认同与否,这与我们的痛苦与快乐相关联,根本不可能由推理得出。包括洛克在内的一些人主张:“道德是可以论证的。”这种主张大错特错。当然,有些道德情感是人共有之的,例如人们普遍反感凶杀、残忍和欺骗。这些情感值得重视,但它们不是理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通过逻辑来理解它们。它们完全是情感、情绪,不能用逻辑来对待它们。人们当然对它们进行了推理,但几乎一无所获。

休谟对“理性”所做的精细界定,特别生动鲜明地出现在他对道德决定的分析中。“理性”不仅仅是一种沉着而明智的状态。人们在压制某些狂野的非道德冲动时,通常会说是在用“理性”来战胜“情绪”。休谟却说,其实,他们是在用一种更冷静的情绪来战胜另一种更激烈的情绪。“理性”有两种用法。一种是表示在数学和逻辑中进行的抽象推理,对各种观念的比较,对它们彼此关系的辨析(例如,4大于3, $2+2=4$ );另一种是表示经验性的、实验性的推理,例如在外部世界寻找和验证事实。经过考察,这两种理性看来都不能决定道德选择,但是它们可能起辅助作用,承担某种类似奥古斯丁为理性所设计的那种“婢女”角色。例如,如果我们需要决定是否去教堂,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观察力,计算我们周围的教堂数量,估量抵达它们的距离;我们可以考虑邻居们的习惯,检查《圣经》中的印刷错误,阅读教会史书籍,还可以做其他许许多多涉及理性的事情。但是,休谟坚持认为,当我们做决定时,我们肯定超越理性而转到感情或情绪层面:我们想不想去教堂。事情就是这样。理性绝不可能告诉我们这是对还是错,因为这不在它的管辖范围。休谟在一段著名文字中指出,道德家是如何经常不知不觉地把“实然”(是)变成“应然”(应该);严格地说,这是行不通的。而这一点恰恰是伦理学的全部问题所在。有人说休谟把理性驱逐出伦理领域,这种说法固然不对,但是休谟的确说过:“理性是而且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感情外,绝不能冒称起其他作用。”现代哲学家也得出了极其相似的结论:价值的认定是超出推理范围的,是纯“感情的”。

(4)几乎毋庸赘言,休谟认为上帝的存在也不是用理性能够证明的。

他并没有自称是无神论者,而且明确地表示宇宙中很可能存在某种基于 intelligence 的一般秩序原则。但这只是一种猜测,远远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明。这个猜测与因果关系的情况一样。我们不是基于经验或理性,而是基于信念而接受它。我们可以信以为真,但这纯粹是一种信念的选择——“纯粹信念”。休谟确信,自然神论者和理性基督徒都错了,因为他们大谈用理性来支持各种宗教。

(5)休谟在政治论著中同样得出怀疑主义的结论。他最初似乎还满怀信心,希望发现一种政治“科学”。但是他很快就断定,政治现象不可能得出数学那样的定理法则,“在政治学中,确定任何一般原理都必须极其谨慎。”他支持孟德斯鸠把社会契约说成一种虚构。他还进而补充说,这甚至是一种不必要的虚构。与其杜撰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神话来为政府正名,不如干脆说,政府是建立在有用的基础上,“完全是基于舆论”。在卢梭流亡和受迫害的艰难日子,他认识了卢梭,并结为好友。他比较赞同洛克,尤其是卢梭的观点:人类没有政府也能。他认为美洲印第安人就是一个例证。但是,随着财富的增加和社会的愈益复杂,政府因为有用而逐渐兴起;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契约,契约观念也许是一个象征,或者是对历史的简写。武力和暴力是人类政治史上迄今为止最明显的现象(这种看法也与卢梭一致)。休谟嘲笑洛克所说的“缄默的同意”。大多数人被迫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国家里。他们服从政府,是因为政府有用。今天的社会没有政府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就有了一种服从的义务。但是,如果政府不再有用,例如它变成“令人无法忍受的压迫”机构,它要求我们服从的权利也就是失效了。

因此,政府的好坏是与它对社会的用处成正比的。培利<sup>〔1〕</sup>和边沁不久也追随休谟,把这种有用性界定为快乐的总和;休谟是功利主义学派(后面要详细论述)的思想来源之一。诚然,这种解释并没有让我们完全满意,因为我们还必须界定什么是“有用的”。但是这至少免除了用政治形而上学来确立政府的合法性的种种努力,如世袭权利、君权神授或社会契约。休谟的怀疑主义在这里既表现为对这一大批神圣原则的否定,也表现为反对把抽象理性当做这种事情的指南。政治社会实际上是基于本能和习惯。习俗是比理性更好的指南。从休谟的思想出发,只须迈出一小步就抵达埃德蒙·伯克的结论: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是极其危险的思想。

〔1〕 培利(William Paley, 1743 - 1805年),英国圣公会牧师,功利主义哲学家。

休谟对历史的兴趣没有什么超常之处:他懂得政治信念和忠诚乃是长期社会演进的结果。它们不是出于人们的意愿,而是自然发展起来的;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它们,因为“习俗之饼”<sup>〔1〕</sup>是理性无法操纵的。只有时间能够带来进步和启蒙(也许相反)。在17世纪,历史学的地位很低。到18世纪,历史学开始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认真对待;休谟和伏尔泰就是最好的例子。历史学不再仅仅是一种闲暇话题或治国宝鉴,而是智慧和真理的储存器,生活的指南。

应该指出,休谟并没有从怀疑主义得出阴暗消沉的结论。相反,他竭力强调,我们健全的人类本能终归能够制服这些理性的诡辩,而且也确实做到了。我们有道德观念,我们信仰上帝,也相信科学法则——这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本能,或者说出于生存意愿。这是非常自然的,值得尊重。理性不仅仅在日常生活中是而且应该是感情的奴隶。休谟说,如果我们停留在理性上,就会被疑惑所困;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生活就会停顿,幸好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启蒙运动的另一位伟大的怀疑主义者皮埃尔·培尔也得出同样的结论。)<sup>〔1〕</sup>十分幸运的是,因为理性不能驱散所有这些乌云,大自然本身就足以达到那个目的。”休谟说,我吃饭,与朋友交谈,打牌,相比之下,我的哲学思考就显得“冰冷、造作和可笑”。我发现,它们不过是游戏而已。这种游戏值得一玩,但毕竟还是游戏。按照一些人的看法,英国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的某些方面或许贻害无穷,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始于休谟:让哲学脱离现实生活,成为一种文字游戏。

但是,至少休谟把自己的怀疑主义贯彻到底了,因为怀疑主义者必须对自己的怀疑主义持怀疑态度。“真正的怀疑主义者不仅对自己的哲学信念,而且对自己的哲学疑问都会有所保留。”不信任理性也就意味着回归本能、习惯,回归休谟经常说的“习俗”。这些即使在哲学中不受青睐,在生活中还是可靠的指南。应该指出,在这个意义上,休谟不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我们可以和应该信任我们的本能。

托马斯·里德、托马斯·布朗和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等苏格兰“常识”哲学家为了反驳休谟,抛弃了经验主义,退而承认某些“先天观念”或直觉原则的存在,力图用这种拼凑方式来挽救“常识”结构。在他们身上,既可以看到启蒙哲学的某种混乱,也可以看到一种强大的冲动,要维护其明晰

---

〔1〕“习俗之饼”(cake of custom)是英国政论家沃尔特·白哲特(W. Bagehot, 1826 - 1877年)创造的一个比喻,意思是,社会习俗日积月累,形成饼一样的块结。

性和确定性、不愿因过分推理而陷入迷惑不解的困境。启蒙运动的核心悖论恰恰在于,它所说的“理性”其实是一种追求澄明的宗教信仰,理性本身扼杀了这种理性。扼杀启蒙运动“清晰的理性之光”的元凶却是最彻底的理性主义者:贝克莱和休谟。

当然,有了休谟之后,原来指望全新的方法会产生确定性的那种信心已经残留不多。确实可以说,休谟就像蒙田一样认为,我们从“理性”那里实际上不可能获得什么确实的知识,至少不可能获得什么真正重要的知识。不过,在运用精细观察和严格分析这些科学方法方面,没有人能超过这位苏格兰人(指休谟)。尽管他贬低了人类的理性,但是他确实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的认识。休谟之后,启蒙运动已不复原貌了,但依然不失为一种启蒙运动。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休谟本人欢迎将他的结论斥之为异想天开的那种批评。至今他常常被视为英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且还没有人能够鞭辟入里、令人信服地批驳他的怀疑主义论证。但是与贝克莱一样,他的时代不愿承认他的贡献。过了很久,人们才完全承认他是一个哲学家。在18世纪,“贝克莱和休谟对经验哲学中观念的剔除,对经验哲学的发展进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洛克和牛顿的观念继续统治了一段时间”(M. H. Carré)。

休谟思想开放,虚怀若谷,坦诚待人。例如,他曾经帮助一个批评他的人:他觉得那个人的批评有待完善,因此他提供意见,使之更加尖锐。他还帮助他的对手解决论著发表的困难。他反对一切绝对主张,但有一个明显矛盾,即他迷恋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和品味。在这方面他写了一些文章:推崇中庸、温和、简洁和严整的风格,否定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居然认为一个现在已经无人提及的剧作家约翰·霍姆优于莎翁。由此可见,他的观念也不免带有时代的一个盲点。

当然,休谟的思想博大精深,绝非简短的评述所能涵盖。他的影响极其深远,浸润至今,依然强劲有力。我们已经提到过当代的分析和实证哲学家;休谟还影响了埃德蒙·胡塞尔,后者是今天在法国和德国如日中天的那种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因此,可以说,他是当今所有哲学的共同先驱。他的伦理学和政治思想也同样很有影响。埃德蒙·伯克和杰里米·边沁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延续了休谟的政治学谱系;休谟的朋友亚当·斯密在创建现代经济学说时深受他的启发;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从休谟那里继承了宽容和大度。绝对主义者和“圣战士”大都不喜欢休谟及其顽固的怀



疑主义,但是一些非正统和有影响的现代派则赞同这种精神。例如,我们会想到美国的大法官霍姆斯<sup>〔1〕</sup>。他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改革者的“欺骗”极为蔑视,但是他本人也对一切神圣原则提出深刻质疑。哪里能够摆脱成见和偏爱、让心平气和的批判智慧一展身手,哪里就有休谟精神。有人说它具有破坏性,有人说它令人振奋。很显然,它兼有这两种作用。再重复一遍,它在瓦解其他各种信仰的同时也瓦解了启蒙运动的绝对信仰。

## 社会科学在启蒙运动中诞生

毋庸赘言,18世纪使“科学”享有极大的荣耀。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写道:“哲学精神现在也就是观察和精细的精神。”观察、实验、分析;基于细致的研究制定清晰严格的一般法则——这是确实可靠的方法,是笛卡儿和牛顿的产物,现在被认为臻于完善。因此所需要做的仅仅是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依然被迷信和混乱所困扰的各个领域。培尔的思想代表这个世纪的精神——“错误并不因为其古老就好些”;让我们用有效的脑力劳动来清除过去的一切马虎和轻信。这也是亚历山大·蒲柏在著名诗句“人类的正当研究对象是人”中所表达的意思。

在这个世纪里,自然和物理领域里的新进展鼓舞了人们对科学进步的信念。到该世纪中期,电成为大众的玩具,专家和业余爱好者都喜欢演示这种神秘力量。1746年,穆申布鲁克<sup>〔2〕</sup>发明了莱顿瓶(电瓶);1752年,美洲的本杰明·



《拉瓦锡与夫人》,1788年雅克·路易·大卫作

拉瓦锡在夫人的帮助下,在巴黎兵工厂建立了一间精巧的化学实验室,在此他进行了各种实验,为他宣布实现化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1〕 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1841 - 1935年),美国著名法学家,联邦法院大法官。

〔2〕 穆申布鲁克(Pieter van Musschenbroek, 1692 - 1761年),荷兰实验科学家。

富兰克林进行了著名的实验,证明闪电就是电。到该世纪末,亚历山德罗·伏打发现了把电能储存在一种简单电瓶中的方法,人们制造出最初的蒸汽机和简陋的火车,在大批人群的围观下乘气球上天(1783年在巴黎)——“工业革命”开始了。凯伊、克隆普顿、阿克赖特、纽可门和瓦特使英国进入了一个机器技术的时代。其后果到19世纪初才显露出来。汽车、铁路、飞机、电报和机械化工厂的萌芽在18世纪已经隐约可见——仅仅隐约可见,但足以暗示技术无限进步的诱人前景。在理论方面,达朗贝尔、拉格朗日和世纪末叶的拉普拉斯等数学家改进和完善了牛顿力学。在其他科学领域,布丰描述了各种生物形态,瑞典的林奈对生物进行了分类,莫佩尔蒂和狄德罗对生物的起源做了推测,多少预示了19世纪的进化理论。化学不甘落后,开始反叛亚里士多德,并且在18世纪大约从施塔尔(1717年)到拉瓦锡(1783年)<sup>〔1〕</sup>逐渐形成一门现代科学。

不过,启蒙运动期间,占据舞台中心的是对人的研究。<sup>〔2〕</sup> 这里是令人振奋的前线,在这里人们能够把当时对人本身的强烈兴趣与同样受到尊重的牛顿和洛克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今天,我们往往着重看18世纪社会科学的缺陷,即过分的简单化和过分的乐观主义。错误似乎就出在要把人文简化成物理,把人和人社会说成牛顿式机器。但是,不能否认,18世纪奠定了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经济学、社会学、历史研究、政治科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后来在现代世界得到了发展。它们都脱胎于启蒙运动,它们的创始人是当时那些全能的启蒙者,如休谟、伏尔泰、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所写成的法国启蒙运动的经典著作之一是他对政治科学的开创性贡献,这在前面已经谈过。在18世纪60和70年代,人们的兴趣开始集中经济学家身上。他们在法国被称作“重农学派”。(Physiocracy的意思是由大自然进行统治。)

---

〔1〕 施塔尔 (Georg Ernst Stahl, 1659 或 1660 - 1734 年), 德国化学家和医生, 提出燃素说。

拉瓦锡 (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 1743 - 1794 年), 法国化学家, 用氧气学说推翻燃素说。

〔2〕 在 C E 雷文 (《自然宗教和基督教神学》1953 年) 看来, 科学在 18 世纪可能遭受了一次“突然的日全食”。与 17 世纪相比, 真正伟大的科学家确实寥寥无几。——原注

## 经济学

18世纪经济理论的背后隐含着当时人们的某种伦理关怀和问题。现代经济学家非常讲究“科学性”,他们会很惊讶地得知他们这门学问最初是道德研究的一个分支,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18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道德哲学教授。他在写出不朽的《国富论》(1776年)以前写过一部论述道德情感的著作(1759年)。爱尔维修的《论精神》对重农学派产生深刻影响。这部著作在1759年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它公然鲜明地支持享乐主义伦理——带来快乐即为善,造成痛苦即为恶。沙夫茨伯里伯爵、弗朗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的导师)<sup>[1]</sup>和休谟都以比较温和的方式论证类似的主张。对于经济科学来说,这个主张的意义在于,经济学把永远追求个人幸福最大化的“经济人”作为自己的基本假设。第一位重农主义者魁奈在其开创性作品《经济表》(1758年)中开门见山地宣布:“用最小的公共代价获取最大量的快乐,乃是最完美的经济行为。”没有这种“经济人”,也就不可能建立一门经济科学。“经济人”相信现世幸福就是人生目的,因此他们要以系统的、有预见性的方式来为之奋斗。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科学的一个前提,显然就是对这一享乐主义伦理的普遍接受。这对于今天的人们似乎已司空见惯,但是启蒙思想家对“追求幸福”的重视则反映了某种新的倾向。古希腊人重智慧轻幸福、古罗马人重权力,中世纪人推崇圣洁;加尔文和新教徒尽管据说是带来了“资本主义伦理”某些因素(勤劳、节俭、节制),但无意把现世成功作为终极理想。

现代经济学的另一个前提是经济个人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学者和信奉者想当然地认为,不受任何团体支配的自立自强的个人,乃是最典型的社会单元。社会和思想的进化在很多方面都为此做了准备。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帮助这些独立的个人走到一起创立政府。在新的经济思想中另一种现在人所熟知的因素是社会和谐观,即认为个人活动的总和可能产生社会和谐。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一个人都不断尽力去为自己所能控制的资本谋求最有利的使用”——用什么能够防止出现那种意愿相互冲突的混乱局面?或者说,救治社会无

---

[1] 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 - 1746年),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美学理论家。

政府状况的良方是什么？斯密指出，幸好上天凭借一只“看不见的手”，确保在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时社会整体随之受益。《国富论》的一些部分接受了曼德维尔提出的著名观点——“私人恶德乃是公共美德”。人们追逐财富，贪求奢糜，反而给穷人提供了工作，给国家带来了财富。这种社会和谐观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得自于牛顿的宇宙比喻：所有的质点都在运动，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宏大体系。

在重农学派和斯密之前，人们对经济问题也有许多思考。孟德斯鸠1748年就已经提出了建立一门研究社会现象的一般科学的概念。所有的法国重农主义者都承认从《论法的精神》中受益匪浅。甚至自博丹那时起，除了大量探讨具体问题的务实文章外，也有一股严肃的经济理论思考的潜流在涌动着。洛克本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达德利·诺思都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在法国，坎特龙<sup>〔1〕</sup>的《论商业的性质》在18世纪初期就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直到1755年才付印出版），梅隆<sup>〔2〕</sup>1734年发表的《关于商业的政治论》也是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攻击。

这里应该谈谈这些被称作“重商主义”的早期经济学思想。思考经济问题，并不新鲜。在亚当·斯密之后，人们往往把斯密之前的一切思考都斥为即兴遐想和不着边际——思维简单，支离破碎，错误百出。对于从16世纪晚期到18世纪初期的这些早期经济论著，人们夸张地使用了“重商主义”这个词——这个词是后来的发明，旨在对各种现象进行分类，有些像现代历史学家把“封建主义”套用在中世纪的政治秩序上。最近一些研究者怀疑这个术语是否够用，怀疑对这批文献的贬低（把它们说成至多具有历史价值）是否公平。重商主义据说是一种用显而易见的方式来增强经济实力的纲领。它着眼于商业，其判断通常是管窥蠡测、浅见薄识。但是，尽管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及其之后的一些人）相比，这些思想散乱而不系统，但是这些开拓性思想为后来的大综合做了准备，而且最先提出假设：人能够有意识地指导自己的行动去增加财富。17世纪，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就试图把笛卡儿的数学分析方法应用于经济现象。一般而言，与后来更辉煌的重农主义者相比，重商主义者对用计划来改善经济的可能性怀有更大的信心，也更乐观。但是他们也看到有时“法则”会压倒统治者的意志，因此他们建议明智的政治家应该顺应“自然”，而不要对抗自然。

〔1〕 坎特龙(Richard Cantillon, ? - 1734年),英国经济学家,长期住在法国。

〔2〕 梅隆(Jean Francois Melon, 1675 ? - 1738年),法国经济学家。

无论他们有多少可取之处,早期经济学者到了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的时代就逐渐衰落式微。人们指责重商主义者提倡干涉“贸易自由”,违背了自然法则。旧的经济秩序,无论是否得到所有的“重商主义”理论家的认同,本身是管制性和歧视性的。它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进口商品与本国产品竞争显然是坏事,因为这样会使本国的手工业者失业,因此必须加以限制乃至禁止。金银流失也被视为坏事,而赢得贵金属则是好事。“良好”的贸易享受补贴的鼓励;出口本国产品来换取外国的原料就属于这种贸易。关税、禁令、补贴都被用来确保实现“贸易顺差”和保护国内制造业。此外,国家有时还试图控制工资和物价。

这种“体制”很容易导致腐败,因此在1750年以前就有零零散散地出现了一些抨击,有人还建议最好用“贸易自由”来取代这种臃肿的特权体系。大卫·休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性批判。他指出,贸易顺差是一个幻想,从长远看,经济法则总是在打破这种幻想。顺差带来了硬币,从而引起物价上涨,结果是出口下降。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是逆差,物价就会下落,就将赢得市场。因此,最终总会实现一种平衡。(法国的先驱者坎特龙大约在同时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观点。)与自己的朋友和苏格兰同胞亚当·斯密相比,休谟的经济思想既不全面也不系统,但是为亚当·斯密的思考做了铺垫。

不过,自魁奈开始,重农主义者最先建立了以经济活动必须完全自由为前提的体系。魁奈是路易十五的宫廷医生。他的思想很快得到米拉波侯爵(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米拉波的父亲)以及其他人的支持。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派,在18世纪70年代很容易就成为最有影响的运动。伏尔泰笑谈形势:1760年前后,法国人逐渐厌倦了戏剧和警句妙语,开始大谈小麦。从1756-1763年战争到1789年革命爆发,法国经济陷入困境,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长期无法弥补政府预算的亏空。因此重农主义者对旧体制的抨击和彻底改革的建议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当然也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重农主义者或许太执著于教条,因此不能成为成功的改革者。但是他们的教条改变了思想史。他们主张,在自由竞争的经济中,以私人产权为基础,实现经济活动的完全自由。这就意味着打破整个政府管制结构,废除关税壁垒,彻底简化税收体系。归根结底,这意味着在经济上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权利上的平等,但不一定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平等,因为人的天赋各不相同)。

重农主义者对农业有一种明显的偏爱。从现在的眼光看,他们的信条



弗朗索瓦·魁奈

魁奈发明了“重农主义者”一词，领导这个法国经常学派批判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中最令人吃惊之处在于，他们完全否认商业和工业的价值。法国当时是一个农业国，这使它比主要对手英国更重视农业。因此这并不是多么古怪的事情。亚里士多德也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因为它符合正义（自然）”；后来美洲的圣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宣称，耕作是唯一诚实的谋生之路。这种轻视工商业的偏见广为流布，且根深蒂固。在中世纪的基督教里，这种偏见表现得非常突出。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生产出剩余价值。商业不过是交换而已，制造业所增添的仅仅是工匠劳动的价值；但是，土地能够生产出价值。这种“唯农”主义实际上与重农学派的自由贸易思想紧密相连。他们坚决主张取消一切税费，只保留一种土地税，理由是，所有的税收都应该出自那一个来源，因为只有它才创造价值。而且，他们建议应该

放手实行贸易竞争，因为他们认为大富商是在通过垄断来获得不义之财。自由竞争将能确保商人和企业家只能获取应得的回报。与英国亚当·斯密的理论不同，法国的重农主义并没有很容易地转向工业时代的经济学。虽然重农学派获得了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经济科学创始者的不朽声名，但是他们与农业之树一起凋零，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而销声匿迹。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亚当·斯密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由于19世纪资产阶级工业主义经济学家（李嘉图、西尼尔、穆勒）按照学理都出自斯密门下，因此当时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大多认为斯密是其辩护士。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斯密不时地斥责一切追逐财富的人，称赞简朴的生活。他不仅推崇伏尔泰，也赞扬卢梭。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根本不喜欢商人。他对农业社会怀有极大的同情；在非常醒目的“论劳动穷人”这一章中，他表现出对这一阶层苦难的深切同情，其态度远远超过了当时一般人。斯密认为，工人受到了雇主的压迫和欺诈，雇主们合谋压低工人的工资。工人还是消费税的受害者。消费税不公平地落在穷人身上，进一步压低了工人

的工资,从而使整个国家受到损害。这些观点以及《国富论》中其他的论述表明,斯密的思想中有一种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因此,他后来以资本家圣经的作者而闻名,岂非咄咄怪事!

《国富论》完全支持重农学派的经济自由纲领。斯密认为,只要政府停止补贴和管制,许多不平等不公正就会消失。只要扩大了个人的活动范围,个人的潜力就会得到释放,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进步。国家(政府)的职责不是“监督私人的产业,指导它以最符合社会利益的方式运作”。政府的权力应该用来保卫国家疆域,或许还应该开办邮政和学校,同时公正地伸张司法正义;除此之外,应该让每一个人照看自己的利益,个人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也能最好地增进自己的利益。政府绝不适合承担经济职能。没有人能管好一个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企业——根据这个原则,斯密不仅反对政府插手企业活动,而且反对联合股份公司,即现代大公司的前身。斯密不可能成为现代大公司的盟友,正如他不是当时的垄断商人和非经营地主的盟友。实际上他是为小企业家说话。显然他相信或者部分地相信,自由放任原则也能使“劳动的穷人”受益,因为它打击了穷人的主要压迫者,即富有的垄断商人。

斯密的这部开创性的经济科学教科书全面探讨了各种经济现象,确立了后来所有的学者论述经济科学的模式。如果非得挑出一个他最得意的理论,可以说那就是劳动分工论(虽然他绝不是第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专业化可以导致经济效益的提高。裁缝自己不做鞋,而是从鞋匠那里买鞋,反之,鞋匠自己不做衣服,而是花钱让裁缝为自己做。这样,双方都受益了。国际贸易也应该如此。重商主义反对与外国人做生意。但是,如果外国人生产的产品比我们的便宜,我们就应该从他们那里购买,用我们生产的比他们的便宜的产品与之交换。显然,自由贸易是与分工理论紧密相连。世界上的贸易障碍越少,实现专业化的机会就越大。



《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卡通画)

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成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定了自由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

斯密没有像重农学派那样否定商业和工业的生产价值的能力。他认为重农学派过于教条。他利用了约翰·洛克那里以粗糙形式出现的劳动价值论(洛克也不是该理论的最早发明者)。洛克宣称,直到人在土地上劳动后,土地才产生价值,因此“将绝大部分价值加在土地上的的是劳动”。斯密写道:“对于拥有任何商品的人来说,如果不打算自己使用或消费,而是用它来交换其他商品,那么它的价值就等于他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由此开创了一个具有远大前程的理论。这个理论被李嘉图和马克思以不同的方式所采用,直到《国富论》问世一个世纪后才被抛弃。但是,斯密并没有把生产出来的全部财富都归功于劳动;“股份”(资本)和土地都有功劳;利润和地租也都是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前者包含着利息和风险回报。斯密对它们之间的确切关系不太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在像其他问题上一样发起了延续到19世纪的讨论。另外一个例子是工资理论。他提出的人口增长总是使工资降到维持生存的水平说法后来与马尔萨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斯密的这部著作几乎成为18世纪的代表作;只要是想开列18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目录,就会发现它与《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一起成为少数几个理所当然的、公认的必选项。不久,政治经济学就被小威廉·皮特等政治家作为依据来废除重商主义的管制条例。新观念的推广虽然进展很慢,但不可阻挡。在法国,伏尔泰长期执著于科尔伯的重商主义,反对重农学派的攻击。<sup>〔1〕</sup>腓特烈大帝则受到杰出的米拉波伯爵的影响,从重商主义转向了自由贸易。米拉波伯爵后来在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声名显赫,他的父亲米拉波侯爵是一位著名的重农主义者。霍尔巴赫男爵的《社会体系》(1773年)这部开创性的政治论著,也显示了重农主义对他的强烈影响。尽管受到书刊检查的压制,甚至受到嘲讽,重农主义者依然怀着传教士的热情,极力宣传他们的信条。这个时代要求学者必须表现出机智,而经济学家的大多数论文却令人遗憾地显得那么沉闷乏味。但是斯密等人成功地让经济学论文具有了可读性。他们努力地传播经济学思想,俨然时代的代言人。一种新的科学思想已经诞生,而且必然要成为西方思想的一个永恒部分。小米拉波的态度十分典型。他赞扬这门“被称作经济学的简明而深刻的科学”,说“它在我们这个时代最终论证了长期遭到忽视和

---

〔1〕 伏尔泰最初对重农学派的主张很有兴趣,开始在费尔奈附近经营农场,排干沼泽,种植苜蓿,但是由于没有赚钱,他转而反对这些重农主义者。——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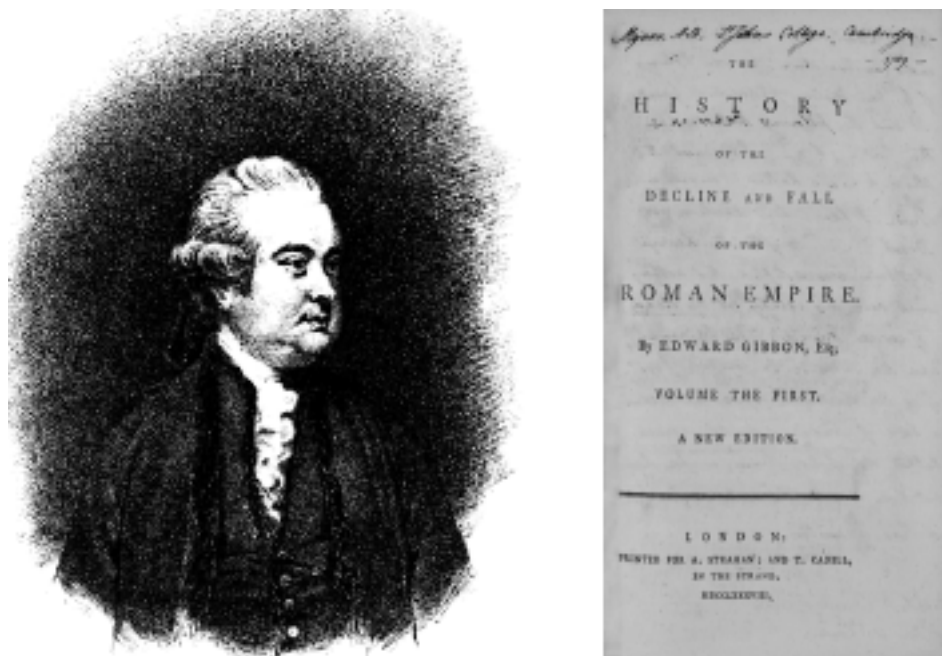
不为人知的原理……一旦君主们熟悉了它,人们就将获得幸福”。

它确实符合时代的需要。应该再次指出,重农主义者在那个时代是大胆的改革家。他们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不分阶级,在税收面前人人平等。这与法国大革命要实现的目标相去不远。这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人应该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他们的另一个基本命题当然是自由——人应该不受干涉,摆脱专横的不平等的限制和恩惠。这些原则在当时是很激进的,尽管后来有一些激进派可能不喜欢它们。富人和特权阶层是他们的敌人。此外,这些经济学家忠于启蒙原则,认为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应一视同仁。他们的观念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国际主义,目标是“世界公民”。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经济科学是如何与启蒙世界观相契合的。经济学致力于寻求与牛顿定律一样的普遍法则;它试图把社会有机体说成是一部机器,后者受制于人类可以确定的原理,因此也是人类可以理解的。它主张自由或自由放任,是因为它认为社会就像一部良好的机器,或者说像牛顿所揭示的世界机器,能够“自行运转”。社会将会像大自然一样显示出自然秩序。社会不应该是单纯由意志驱动的,而应该是一个有序的体系。发现了这把钥匙,这部机器就会上紧发条,从此遵循着永远不变的经济行为法则自动运转起来。

## 历史编纂

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寻找实在而可确定的事实,不能容忍科学研究中的偷懒耍滑,同时拒绝用超自然力量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自然现象。这种精神非常有利于历史研究,因此在18世纪涌现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在撰写严肃史学作品的伟大作家中有伏尔泰和休谟的身影。但是,比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休谟的《英国史》更著名的则是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此之前,具有历史意识的孟德斯鸠也对这个题目颇感兴趣。这些作品立足于比以前大多数作品更充分详尽的研究基础之上(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明显地贬低历史)。它们还显示了某种分析和解释史实的能力。因此,有些人认为现代的历史研究创立于18世纪。



吉本及其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封面

吉本在书中宣称,基督教被确立为帝国的官方宗教,加速了帝国最终的分裂、堕落和衰亡。这一观点使他声名大噪,评论者对他毁誉参半。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启蒙运动实际上没有高度发达的历史意识。它对过去基本上怀有一种偏见,认为往昔充斥着谬误。达朗贝尔表达了一种愿望:过去应该统统否定;伏尔泰惟一感兴趣的是由笛卡儿开辟的“理性时代”。许多哲学家对进步观念产生兴趣,并且像孔多塞那样勾画人类历经不同时代向前和向上发展的轮廓,但是除了最近一两个时代外,他们对其他所有时代的看法都是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他们对民族历史毫无兴趣,对民族差异也几乎毫无认识。人们写历史会有许多原因,但是把历史当做一个严肃而持久的研究课题可能就需要有一种信念,即认识过去对于理解现在乃至理解人类的一般处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要理解任何事情,我们都必须对它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追溯它的发展过程。启蒙运动基本上没有这种信念。哲学家们看不出研究遥远的过去时代还有什么必要(在这方面孟德斯鸠是一个例外),认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出自某种社会科学。他们根本不想用历史来作为认识现实的一个手段。

在只重现实的启蒙运动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例外,这就是詹巴蒂斯塔·维柯。今天人们往往把他看做是现代历史学的最伟大的理论先驱。维柯驳斥笛卡儿的科学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所有的认识对象中最容易了解的,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因此人也就能够理解历史。他认为,理解过去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在;他给历史学家提供了许多实用的方法论准则;他十

分清楚,过去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大不相同。他提出了一种历史循环模式。维柯是一个令人炫目的天才,他不仅对历史,而且对语言、神话,以及法律的演变等都提出了惊人的想法。但是他在那不勒斯写作时,长期偏处一隅,对于该地区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他可能对后来的赫尔德以及浪漫主义时代的德国历史学家产生了影响,但是对于18世纪的其他人几乎没有影响。维柯和后来德国的浪漫派都确信,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和民族都对人类整体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没有更好更坏的分别,用19世纪历史学家兰克<sup>[1]</sup>的话说,都“与永恒保持相同距离”。这显然鼓励人们对过去的各个部分进行认真的研究,因为它们各有各的价值。这不是18世纪的主流观念;按照主流观念,过去的时代几乎不值一提,大多数时代都陷入令人绝望的愚昧之中,只有现代才是有价值的;现代并不是从过去中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的。就整体而言,这种追根溯源的解释、这种发生学研究方法是迥异于启蒙时代的思维方式的。

不过,18世纪有一批文章推测了人类发展过程,从而促成进化观念的诞生。古希腊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例如马基雅维利,实际上没有相信社会不断完善的进步观念。其实,正像有人指出的,只要对基督教关于人类走向最后得救历程的图式稍微做一点逻辑上的改动,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千年王国的世俗版本。这在逻辑上只是小小的改动,但在实质上是巨大的变化。它使天堂降到人间,用充满希望的现实乌托邦取代了那个虚无缥缈的彼岸天堂。到18世纪末,伏尔泰的弟子孔多塞侯爵在那篇关于人类精神进步的著名论文中,把欧洲历史分成10个发展阶段。他认



罗马圭斯蒂齐亚广场的詹巴蒂斯塔·维柯雕像

维柯的影响在启蒙运动时期很少扩展到意大利之外。如今,他的历史哲学因其处理过去资料的创造性方法而受到推崇。

[1] 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 - 1886年),德国历史学家。

为自己生活在第九阶段,接近于达到具有无限的“尽善尽美能力”的第十阶段。这种相信人类历史贯穿着一个有序计划的观念主要出自于玄想而不是基于实证的历史研究,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有利于历史研究的框架。

历史研究或许是一门保守的学问;1790年以后,它是以伯克的世界观为依托发展起来的。按照伯克的观点,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缓慢生长的有机体,不能按照一张社会蓝图来任意编排,几乎根本不听从人的意志。现代历史学与社会学一样,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后的保守主义思想流派,而不是起源于启蒙运动。在历史观念方面,休谟是一个例外,而18世纪哲学家基本上持极端的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态度。他们相信有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理性可以发现它,政治工程师可以实现它。那种缓慢而无限的生长过程的观念不适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喜欢的是一蹴而就直奔乌托邦。

不过,他们追求准确和强调批判(考证)的方法论,确实为历史科学奠定了基础。而且,正是在18世纪,大型公共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陆续问世,便利了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为他们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

## 其他社会科学

对于其他的人类科学本应给予详尽地阐释,但限于篇幅只能做简略的概述。有一种心理学非常接近启蒙运动的主旋律:即洛克的白板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复杂观念”出自于“简单观念”即感觉印象,而后者是考察认识过程的基础。我们已经知道,休谟把这一理论发展为一种更精细的分析。大卫·哈特利以“联想定律”为基础,提出了一套机械心理学。这位英国人因此而名噪一时。他的联想心理学后来长期被许多心理学教科书所引用。18世纪洛克主义心理学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行为主义”理论,也就是把精神现象归结为因外部刺激而产生的可预见的机械反应。这里包含着社会改革的意谓。爱尔维修写道:“如果我能证明人实际上完全是教育的产物,那么我无疑是在向人类揭示一个重要的真理。他们将会明白……要想幸福和强大,没有比完善教育科学更重要的了。”人的思想受制于严格的学习规律,因此完全可以被操纵,正如我们也可以通过精细地调控环境来决定人的选择。这种说法在今天会让人想到令人反感的极权主义洗脑手段,但是在18世纪它意味着一种令人鼓舞的消除邪恶、保障持久进步的手段。人的思想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因而可以无限地改进;根本不存在什么固定的、先天的局限——例如,根本没有什么原罪。许多人就是这

样来诠释由哈特利、爱尔维修等人所推进的洛克主义心理学的。

这就意味着一场教育革命。在这个领域里,改革者不止卢梭一人。像法国拉夏洛泰<sup>〔1〕</sup>这样的改革者确信,人在实践中学习(“人天生要行动”),并且批判传统的学习方法太书本化、太重视智育。他们是20世纪美国所谓“进步主义”教育的先驱。

启蒙时代的心理学是现代实验心理学(行为主义和巴甫洛夫心理学)的鼻祖;另外,它还具有一些更深刻的见解。在狄德罗包罗万象的著作中,有一些猜测预示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色情小说家萨德侯爵这位有争议的人物可以说是开创了性学研究。但是,这种“深层心理学”探索到了非理性无意识领域的边缘,却不代表启蒙时代的心理学。启蒙时代的心理学主张“外因论”而不是内因论,是在社会中寻找决定人的思想的因素。一部最为入诟病但意义重大的著作就是拉美特利<sup>〔2〕</sup>医生的《人是机器》(1748年)。这部著作大胆地断言,人只不过是一部机器。拉美特利由此得出的伦理学结论骇世惊俗(机器是不对其行为负责的,因此就不存在什么犯罪,生活的惟一正当目标就是追求感官享乐),但是把人视为机器的观念却是与启蒙运动心理学的主流合拍。

历史学家维柯和政治科学家孟德斯鸠也可以被称作社会学家。这个名称是19世纪由孔德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后来人把这种研究本身定义为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那么18世纪的学者已经对这种研究十分感兴趣了,但是缺少展开研究的条件。可以说,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科学在它们的这个童年时期是混合在一起的,构成一门“人学”。后来它们才分崩离析,自成专业。经济学长期被称作“政治经济学”,就表明了其中的联系。还需要指出的是,从制度角度看,人们刚刚开始系统地收集和保存统计资料。例如,到18世纪末,人们才有可能获得准确的人口资料。

博物学家布丰的《自然史》乃是18世纪最杰出的学术著作之一。他也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写成《人的自然史》(1749年)。人类各种族之间为什么会有差异?这些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当时在这方面还只是一些大而化之的说法,但是探究毕竟开始了。我们知道,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

---

〔1〕 拉夏洛泰(Louis - Rene La Chalotais, 1701 - 1785年),法国的法学家,高等法院法官。1763年发表著名论文《论国民教育》。

〔2〕 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 1709 - 1751年),法国哲学家、医生。

论述了人类的文化差异,并且把这些差异归因为气候和地理因素。有关陌生民族的信息已经开始传入:人们开始有了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真实知识;威廉·琼斯爵士和法国安基提尔-杜佩隆<sup>[1]</sup>翻译的印度文学的最早译本问世。

这仅仅是开始;大部分工作还有待完成。但是思想已经产生。孟德斯鸠表达了这一思想:人类的法律和习俗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但并非“胡思乱想的产物”,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必然的关系出自事物的本性”)。特殊的规律可以导致比较一般的规律,由此循序渐进,最终上升到统一的人类规律,即与牛顿万有引力原理相对应的社会原理。这就是启蒙思想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他们注定空手而归,但是这种探索激发了众多的天才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致力于学术活动,现在依然如此。

## 启蒙运动的扩散

以上我们主要论述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在18世纪,法国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国家;除了在艺术和科学领域里的巨大声望外,它还有数量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庞大人口——是英国人口的4到5倍,甚至比当时俄国的人口还多。此外,它还拥有巴黎这个独一无二的伟大城市,巴黎集中了它的全部辉煌。巴黎属于全世界。

我们也提到了英国的启蒙运动,提到了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以及最后由亚当·斯密所体现的杰出的“苏格兰探索”。英国的18世纪还值得再多说几句。它的氛围与法国大不相同,因为英国当时比较安于现状。没有不可解决的社会政治危机来打扰它的安稳生活。在法国,尽管经济取得进展,但行政改革问题和社会等级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个国家,由于毫无出路,最终在1789年爆发了革命。英国早就经历了革命。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动乱之后,英国实现了稳定和自由。1715年以后,英国人无意于改变现状。他们与长期执政的“首相”沃波尔一样都认为,最好别惹是生非。当时没有多少尖锐的社会批判,几乎没有政治上的反对意见,直到18世纪60年代才出现抗议运动,但是与1789年法国的革命相比这种抗议也是温和的。英国没有出现伏尔泰和卢梭式的人物,没有对教会的口诛笔伐。如果说英国

---

[1] 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 1746 - 1794年),英国东方学家。安基提尔-杜佩隆(Anquetil - Duperron, 1731 - 1805年),法国东方学家。

对于伏尔泰根本看不上眼,那么本身就很可怕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sup>〔1〕</sup>也会把卢梭完全看成一个疯子。18世纪的政体可能是不民主的,而且还有些腐败,但是给英国带来了繁荣、和平和自由。即便是头脑犀利的休谟对英国的政治也没有什么怨言:他对自己能够“在一个宽容而自由的国土上”自由地写作表示感谢。到18世纪70年代,情况有些变化,少数人开始鼓吹议会应该具有更大的代表性,议员应该由民主选举产生。还有一些人要求实现有法律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平等,而不仅仅是默认现实。但是,他们还不得不与因普遍繁荣而产生的自满情绪抗争。

自鸣得意、彬彬有礼以及稍微有些过分的节制或许可以说是18世纪英国的特征。伟大的大教堂教长斯威夫特<sup>〔2〕</sup>对这种状况冷嘲热讽,但无济于事。“奥古斯都时代”依然有巨大的魅力。它的帕拉第奥古典风格的建筑或许过于拘谨古板,但是它给贵族和中产阶级提供了惬意、悦目的住宅,并且提供了许许多多文雅的教堂。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是一种娱乐,尽管按照后来浪漫主义的标准存在着许多缺陷。这种文学是一种社会艺术,旨在寓教于乐,启迪民风,培养绅士,丝毫没有那种激昂的表达个人自我的浪漫冲动。奥古斯都时代的英国人阅读艾迪生的令人愉悦的随笔,讨论鲁宾逊的资产阶级美德,随着菲尔丁和盖伊捧腹大笑(与欧洲大陆的讽刺相比,这两人的讽刺基本上是温和的和建设性的),与理查森和柯珀一起伤感落泪。<sup>〔3〕</sup>这种文学无疑有其局限性,但也确实迷人有趣。18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诗人应该是文采横溢的蒲柏。他的目标是,精妙地说出

多有意会却未见精妙表达的思想

---

〔1〕 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 - 1784年),英国启蒙运动最有影响、最机智诙谐的文学家之一,18世纪下半叶通常被称为“约翰逊时代”。约翰逊有一些古怪的言行。研究者认为他患有“抽动秽语综合症”。

〔2〕 斯威夫特曾担任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教长。

〔3〕 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 - 1719年),英国随笔作家。

鲁宾逊是笛福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的主人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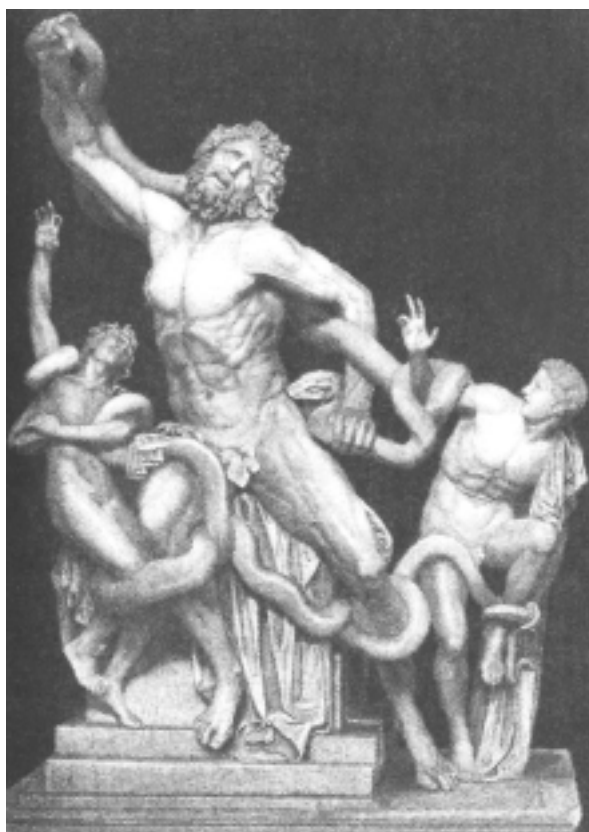
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 - 1754年),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盖伊(John Gay, 1685 - 1732年),英国民谣歌剧的创始人。

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 1689 - 1761年),英国小说家。

柯珀(William Cowper, 1731 - 1800年),英国诗人。

(因为“艺术作品应有更多的智慧而不是显得道貌岸然”)。1760 - 1780 年,最伟大的文学家当属约翰逊博士。他是交谈大师、诗人、批评家和辞典编纂家。他主持了英国最好的谈话,把警句格言倾泻给洗耳恭听的博斯韦尔<sup>[1]</sup>。这些既是文学史,也是思想史,因为在这种沉稳的风格背后包含着一整套关于自然、人类、上帝和社会的观念。这些观念有洛克的、牛顿的、新古典主义的和理性主义的。不过,这些观念要么在前面已经论及,要么与法国启蒙思想大同小异,我们就无须阐释了。



拉奥孔

这座古希腊雕塑是公元前 2 世纪罗德的阿盖桑德尔·雅典诺多罗斯和波律多洛斯的作品。此雕塑捕捉到拉奥孔和两个儿子与即将来临的死亡搏斗的壮烈时刻。受这一作品启发,戈特霍尔德·莱辛写成探讨审美价值和哲学的名著《拉奥孔》

在欧洲大陆,法国的时尚往往支配着欧洲各地的生活。这在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喜欢用法语说话和写作;俄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 18 世纪,法国维持了自 17 世纪开始的文化霸权。其他欧陆国家没有什么人能够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比肩而立,也没有人能法国的艺术家一争高下。诚然,法国的“哲学家们”特别喜欢意大利的歌剧,而且把它引进法国。当时流行教育“大旅行”,英国人在进行“大旅行”时,不仅去法国,也去意大利。但是,高雅的法国路易十五风格绝对统治着家具、装饰和建筑。德国一些宫廷不仅接受了这种“洛可可”风格,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今天我们都很难超越慕尼黑、安斯巴赫、维尔茨堡当年留下的这些文化瑰宝。但是这种风格起源于法国、基本定型于法国;法国的服装和礼节也影响着当时的时尚。从哥本哈根到里斯本,全欧洲都在仿效凡尔赛,无怪乎一位法国建筑师在 1765 年写道:“无论在哪儿,你都会发现我们的建筑师坐着头把交椅。我们的雕塑师

[1] 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 1740 - 1795 年),苏格兰随笔作家、传记作家。他是约翰逊的文学俱乐部的成员,著有《塞缪尔·约翰逊传记》和《伦敦日记》等。



也遍布各地……巴黎之于欧洲犹如雅典之于希腊;它为世界其他所有地方提供艺术家。”他还可以补充说,它还提供思想。

不过,我们不要忽略了其他国家。启蒙运动是世界主义的。启蒙哲学家往往很难说是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他们讲的思想是没有国界的,他们讲的理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们谈论的只是全人类。孟德斯鸠有一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他想了解的不是只对法国有好处而对人类有坏处的东西。伏尔泰为了从法国国王那里谋取一点好处,曾经厚颜无耻地赞颂法国的军事胜利。但是他更经常地表现出对战争和军队的厌恶、对学识和欢乐的热爱,而不分畛域。他有一次竟然向腓特烈祝贺普鲁士战胜法国!德国的启蒙思想家莱辛表示,为了献身人类而舍弃祖国,他也心甘情愿。因此,如果说法国学者支配了18世纪,那么这绝不是出于任何傲慢的民族主义精神,而是由于他们把自己的精神财富慷慨地奉献给任何国家任何愿意接受的人们。

在德国,前面已经提到,从莱布尼兹到沃尔夫留下了一笔思想遗产。莱辛时代(大约从1745年到1770年)反对这种十分枯燥的理性主义,把目光投向法国和英国。莱辛特别喜爱英国人的思想,但是他对英法两个国家凡是有价值的东西不分轩轻、兼收并蓄。身为批评家、学者、剧作家和哲学家,莱辛体现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全面才能。虽然他反对沃尔夫,但是他依然保持冷静的理性和对澄明的追求,而这正是区分启蒙运动与后来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标志。与伏尔泰一样,莱辛的著述跨越许多领域,也有些散乱,但是他对一切都保持旺盛的批判精神,从而发挥了其他学者不可企及的影响——如他自己所说,促成人们思想的活跃。莱辛保持了莱布尼兹的乐观主义,在《论人类的教育》中指出,人类追求充分的理性和完整的真理的进步过程是在历史中逐步展开的。<sup>〔1〕</sup>这是德国人关注历史的先声。这种历史兴趣后来在赫尔德、费希特、黑格尔那里充分展示出来。但是,这种用进步的计划来勾画历史轮廓的做法带有启蒙运动的典型特征,这方面孔多塞的纲要最为著名。

莱辛常常被人称作“德国文学的奠基人”(这种颂扬可能有些言过其

---

〔1〕“给我们的朋友提供一个关于邪恶问题的可能答案:邪恶会随着一代代的人而减少,因为随着上帝的计划的展开,每一个人都为根除邪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允许人类参与根除邪恶,这是更高的善。”——原注

实,毕竟在他之前还有马丁·路德,还有《痴儿历险记》<sup>〔1〕</sup>)。他追求格调,喜好争论,这两点都是启蒙思想家的特征。与多数法国启蒙思想家相比,他对宗教没有那么不虔敬。他宣称讨厌“自由思想者”的浅薄和武断。但是,从他的兴趣、个性和思想基调来看,人们有理由把他称作“启蒙运动的典型人物”。他也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唤醒昏昏欲睡的德国,使之振作起来,投入生气勃勃的精神生活,其标志是具有批判精神、高雅文学、高水平学术以及欢迎新鲜思想。他为德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代人铺平了道路:那一代人中间产生了歌德、希勒、赫尔德、康德和费希特。

在德国的其他启蒙思想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约翰·尤斯蒂<sup>〔2〕</sup>。他是德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诸如邮政这样的许多实际方案,从日本引进丝织业技术,撰写了关于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的大量文章,被称作“财政主义之父”。他也推崇开明专制。

其他国家也对启蒙运动做出了呼应。米兰的贝卡里亚侯爵以孟德斯鸠的理论为基础撰写了著名的《论犯罪与刑罚》。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受到这部著作的启发,试图对这个落后国家的法典进行改革。我们前面谈到过那不勒斯的哲学家维柯。他的“新科学”是历史社会学。与革新旧的法律和政府结构的努力一样,被重新唤醒的历史意识似乎也是整个意大利的启蒙运动的一个标志。正如历史学家E.W.科克伦指出的,在托斯坎纳,人们对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那个时代的法国思想怀有浓厚兴趣;尽管在理解上有所不同,但是启蒙运动的概念也冲击了佛罗伦萨,自辉煌的16世纪以后这里第一次表现出兴奋,对许多新思想表示欢迎。

“开明专制”意味着使政府更合理化也更简单,建立更系统的法律和刑罚体系,并且确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某些相互义务。开明专制不仅光临佛罗伦萨,也出现在其他国家,如西班牙、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启蒙运动使西班牙民族得以振兴。西班牙在经历了16世纪的“黄金时代”之后,随着霸权的丧失,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也一蹶不振。1705年,西班牙只出版了4本书,而且这4本书均不值一提,其萎靡的程度可见一斑。在西班牙,笛卡儿、伽桑狄和牛顿的学说被判定为歪理邪说,大多数科学学科遭到

---

〔1〕 《痴儿历险记》(Simplicissimus)是17世纪德国小说家格里美豪森(H.J.Ch.von Grimmshausen)写的长篇小说。

〔2〕 约翰·尤斯蒂(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 1720 - 1771年),德国学者,担任过官员和记者。

禁绝。欧洲为争夺孤立无助的西班牙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即将开始大战时,查理二世,人称“走火入魔的卡洛斯”(1661 - 1700年)的阴暗时代走向终结。在其统治时期,西班牙陷入愚昧和迷信,还在实行公开大规模烧死宗教异端的火刑。18世纪带来了某种程度的觉醒。派遣到南美的探险队和新创办的数理工程学院体现出对一种科学的重视。包括塞万提斯在内的以往的西班牙作家的作品全集被编辑出版,报纸和聚谈会(*tertulia*)开始兴起。聚谈会类似于法国的小型聚会,中产阶级人士聚在一起,严肃地讨论新思想。法国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使得虔诚的传统主义者惊恐不安。他们哀叹:“放荡不羁、不讲道德、奢侈腐化、萎靡不振,所有这些法国人的恶习已经在我们中间广为传播。”这当然是夸大之词。至少可以说,到18世纪末,西班牙的启蒙运动还局限于少数人之中。20世纪西班牙的伟大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甚至宣称,西班牙完全错过了启蒙运动,这正是它的根本不足之处。不过,一些学者在对18世纪的西班牙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这另一种以偏概全的极端结论。当时确实有一些活跃的思想者在敲打着这片曾经产生熙德和科尔特斯<sup>[1]</sup>的土地,使之从长眠中苏醒过来。费霍神父<sup>[2]</sup>可以看做是西班牙的洛克、伏尔泰或莱辛。他主张改革,抨击传统的谬误,对各门学科都有探究的兴趣。但是,他本人是本笃会修士;与法国相比,一般而言,西班牙的启蒙运动远远没有那么放肆不敬,也没有强烈的反教权主义色彩。西班牙启蒙运动的确造就了一些改革者。他们抨击奴隶贸易,谴责压迫妇女,反对虐待美洲印第安人,反对法律上的不平等和贵族的特权。他们不仅不攻击王权,而且指望着王权来改革停滞落后的社会。西班牙的启蒙运动扩散到新大陆,其影响在那里的大学中明显可见。查理三世在西班牙推行“开明专制”,并且特别重视推动经济发展。

18世纪末,瑞士的裴斯泰洛齐<sup>[3]</sup>从卢梭的《爱弥儿》中得到启示,提出了一套教育方法。启蒙运动的影响之大,这里很难免不挂一漏万。美国人也感受到它的影响,因为它从这个民族诞生之时起就通过那些杰出榜样的思想和教养塑造了这个民族。这些启蒙运动造就的榜样包括托马斯·杰

---

[1] 熙德(Cid, 约1043 - 1099年),11世纪西班牙的著名军事统帅。

科尔特斯(Cortez, 1485 - 1547年),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墨西哥和秘鲁。

[2] 费霍(Feijóo, 1676 - 1764年),西班牙教育家。

[3] 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 - 1827年),瑞士教育家。

斐逊、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潘恩以及其他在欧洲(尤其在英国和法国)的知识界如鱼得水的“世界公民”。罗马教廷和其他教会也受到启蒙运动的浸染,尽管对某些启蒙思想十分反感。英国的国教会在信仰上变得极其宽容,以至接近自然神论了。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

腓特烈二世,开明专制君主,军事天才、音乐家、作家、艺术与科学的赞助人,某些哲学家认为在他身上体现了哲学家的理想。

耶稣会自 1540 年以来就成为罗马教会的打手,但是在 1773 年被解散了。这是他们的对手启蒙哲学家的胜利。当然这些有学问的教育工作者(指耶稣会士——译注)在反动阵营中也有敌人,例如有一些君主就嫉妒他们的权力,讨厌他们对教皇的忠诚。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这两个主要的开明专制君主拒绝发布镇压耶稣会的教皇命令。1764 年法国取消耶稣会的事件乃是长期斗争的最后爆发。这一次对耶稣会的指责还是老调重弹:热衷世俗事务、宽宥罪恶、在神学中宣扬自由意志和理性主义,对君主缺乏忠诚(教皇至上),甚至据说赞成弑君行为。1758 年,一个在耶稣会工作过的青年人刺杀国王,这就使上述最后一项指责显得可信了。这些指

责谈不上是进步势力在反对反动势力。它们是由詹森派和高卢主义者提出的,正值战争引起的某种歇斯底里狂热之时。但是,也有人指责耶稣会的教育过时落伍,过分注重修辞和古典典籍;他们呼吁教育应侧重更现代的语言、科学和历史。当耶稣会关闭时,法国至少有 84 所学院也随之关闭,由此可见耶稣会对高等教育的实际垄断。随之而来的危机导致了大量的教育思考和教育试验(在西班牙也有同样的情况)。到 1814 年,作为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反动的一部分,耶稣会才得以恢复。

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对伏尔泰采取了一种非常可疑的宽容态度。英国和法国的许多主教也接受了启蒙哲学家的一些观点和态度。有些教会的卫道士指责伏尔泰完全凭借机智和讽刺的伎俩来吸引公众,但是他们在反击伏尔泰的观点时也试图模仿伏尔泰的文体。

到18世纪70年代,在开明专制君主的圈子里,除了老资格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外,又增添了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和西班牙的查理三世。他们接受启蒙运动的理想,并试图付诸实践。启蒙哲学家与欧洲不太开化地区的君主惺惺相惜,乃是启蒙运动史上既有趣又意味深长的一页。今天,伏尔泰的大部分手稿和狄德罗的藏书都在俄国,这是由于叶卡捷琳娜收集这些东西的兴趣比其他人更强烈。伏尔泰与腓特烈之间跌宕起伏的友情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这位普鲁士国王还邀请其他法国学者到他的宫廷做客。当时想充当新型哲学王的,不仅有腓特烈和叶卡捷琳娜,而且还有一群小国君主,如那不勒斯、托斯坎纳、丹麦以及西班牙的君主。正如人们指出的,这就意味着要改革行政机构、颁布新的法典、对犯罪实行比较人道的惩罚(遵循贝卡里亚的箴言:刑罚的目的不是以牙还牙的报复,而应该是恢复人性),甚至推行一些根本性的社会经济改革。约瑟夫二世竭力废除自己的落后国家中的农奴制,但叶卡捷琳娜没有这种举动。腓特烈在文章中明确地阐述了君主对人民的职责,承认君主对人民的福祉负有责任,主张君主也要体现理性和法律的统治。开明专制君主还提倡宗教宽容。毫无疑问,这些君主在实践中并不总能兑现对启蒙运动的这些口头承诺:叶卡捷琳娜似乎无法接触到俄国的社会现实,令人惋惜;约瑟夫二世未能使自己的许多改革扎下根来、不可逆转;腓特烈不愿意触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不过,他们毕竟做了许多事情,而且失误也不都因为缺少良好意愿。18世纪开明专制君主的改革为19世纪的民主和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承认(例如,当代研究意大利复兴运动即统一运动的历史学家就认同这一点)。总之,开明专制基本上可以说是思想影响政治的一个绝佳例证。

需要重申的是,启蒙哲学家的政治思想,尤其是重农主义者的政治思想是倾向于开明专制的。雷纳尔写道,“最幸福的统治应该是由一个公正开明的专制君主实行的统治”(《欧洲在两个印度的殖民地和商业的哲学与政治史》,1770年)<sup>[1]</sup>或许,哲学王其实只需要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法国国王问魁奈,如果他是国王,他会做什么。魁奈的回答是:“什么都不做。”但是,他会聪明地让“法律”<sup>[2]</sup>来统治。他本人则愿意成为理性至上

---

[1] 雷纳尔(Guillaume - Thomas - François de, Abbé Raynal, 1713 - 1796年),法国历史学家。

[2] “法律”在这里主要指自然法则,也指人定的法律。

的化身。

如果说叶卡捷琳娜的专制主义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那么反抗专制君主的思想就更是如此了。俄国激进主义传统的主要先驱拉吉舍夫是被女皇送到德国大学学习的。他在那里学习了法学和其他学科,接触了爱尔维修和其他较激进的启蒙哲学家的思想,从而使他在归国后抨击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他因此而被捕和被流放。(参见拉吉舍夫的《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1790年)。应该记住,1789年已经证明,开明专制并不是18世纪思想惟一成果。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各地已经出现文化民族主义的苗头,后来反法、反启蒙的情绪就是由此而来。莱辛告诫德国作家,不要再模仿法国作家,而应该开始创造自己的风格。民族主义在崭露头角;从长远看,普鲁士不会跟随腓特烈排斥自己的民族语言,按照法国人的方式进行思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腓特烈本人却成为德国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对启蒙运动的反叛自卢梭就开始了,到1800年形成高潮,其中包括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反对18世纪的世界主义,因为后者在实践中往往意味着接受法国文化霸权。

对于经常被思想史研究忽视的另一个欧洲宗教群体或文化群体来说,启蒙运动对他们的意义十分重大。犹太人的思想发展往往是与基督教世界的发展同步的。犹太人在中世纪有自己的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式经院学者,最著名的是迈蒙尼德。在文艺复兴时期,起源于希腊化时代诺斯替教、然后体现为喀巴拉<sup>〔1〕</sup>的犹太教神秘主义,与当时的新柏拉图主义同时发展,也吸引了一些人文主义者。当然,这时欧洲学术界普遍地越来越重视希伯来研究。为了研究《圣经》和古代文献,能够熟练掌握希伯来语,乃是人文主义者引以为荣的一种学术成就。到18世纪,我们看到,与基督徒的做法一样,犹太教士也把牛顿原理应用于论证犹太教。虽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士把斯宾诺莎开除出教会,但是理性主义对欧洲犹太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17世纪,可以说,犹太人也有自己的宗教改革狂热,即萨巴泰·泽维<sup>〔2〕</sup>的弥赛亚运动。当这种狂热消退时,与欧洲基督教世界发生的情况一样,一种理性主义东山再起。

〔1〕 喀巴拉,希伯来文的音译,原意为“传授之教义”,后指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

〔2〕 萨巴泰·泽维(Sabbatai Zevi, 1626 - 1676年),犹太神秘主义者。生于今天的土耳其,曾自称弥赛亚。

对于犹太人来说,启蒙运动是一个“解放”时代,因为西欧各国开始允许他们享有公民权,允许他们加入共同的文化。18世纪思想家所提倡的理性、宽容和世界主义的观念对于这一进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犹太人也在思想上做出积极的呼应。在犹太启蒙学者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摩西·门德尔松。他是莱辛的朋友。他敦促自己的犹太同胞接受所在欧洲国家的公民身份,融入欧洲文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做犹太人,只要把公民事务和族群传统区分开,就能既做一个好公民,又做一个好犹太人。门德尔松还面向基督徒,解释犹太教的性质,澄清种种误解,为更大限度的宽容创造条件。莱辛以门德尔松为原型创作了剧本《智者纳旦》。门德尔松与莱辛一起大声疾呼,宗教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信条,接近上帝的途径有许多种;因此,在这个启蒙的时代,犹太人和基督徒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志同道合的伙伴。门德尔松的自然神论(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把这两大宗教传统视为通向同一目标的不同途径,而不是争风吃醋、水火不容的两种特殊启示,从而为二者实现一种新的联合奠定了基础。



犹太启蒙学者门德尔松(1729 - 1786年)

门德尔松是哈斯卡拉运动(犹太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呼吁宗教宽容,支持犹太社区融入普通的德国文化和生活。

启蒙运动的传播既可以从空间角度讨论,也可以从时间角度讨论。启蒙运动是何时结束的?——或者,它是否结束了?启蒙运动通常被用于指18世纪,或者从牛顿和洛克到法国大革命(1689 - 1789年)这一个世纪。有人把它向前推延,将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政治学革命囊括进来——显然,用这种更宽泛的界定就必须把笛卡儿、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包容进来。如果做更狭义的界定,启蒙运动就相当于启蒙哲学家的时代,大体上相当于伏尔泰长寿的一生,其中叠加着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鼎盛时期,或许还可以叠加上重农学派的活跃时期。这就意味着大约从1720年到1778年的时期。因此,人们倾向于把结束时间定在18世纪末。

就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断限有其不可否定的道理。接下来,我们迎来了另外一场被称作浪漫主义的运动。这场运动具有不同的“时代精神”。

它打破理性时代的戒律,指斥其所爱,推崇其所恨,完全颠倒神鬼阴阳两界。如此绝对的大逆转在时尚潮流的兴替史上是前所未闻的。我们还迎来了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本身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一个产物,但是它也是一场大动乱。在它之后,一切都不复旧貌。伊曼努尔·康德也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这位柯尼斯堡哲学家算做启蒙思想家——他本人以此为荣。但是,他也改变了人类思想,从此新的潮流变得势不可挡。总而言之,1789年到1815年的大变动构成了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全方位的革命。18世纪那种独特的氛围和独特的观念大交融再也不会出现了。

然而,启蒙运动还在延续。也就是说,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依然具有重要影响;与所有伟大的思想运动一样,它在其后人类的思想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在它发生之后,世界完全改变了。关于它的种种影响,这里不可能全面具体地论述,只能举几个例子。从学术角度看,在大部分英美世界,哲学依然倾向于休谟给它修正的方向。经济学理论虽然已经远非亚当·斯密时代的面目,但至今还带有他的独特视角所打下的印记,将来或许还会如此。从更一般的角度看,甚至在20世纪种种社会悲剧发生之后,启蒙运动特有的乐观的理性主义依然焕发着活力,在美国尤其如此。我们认为18世纪贡献了这样的观念:人类现在和将来都会“进步”,科学技术对推动人类进步起了最大作用,人类的目的是享受世俗的幸福。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这些说法表示怀疑,但大多数平民百姓可能还是信奉它们。与许多社会科学一样,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在18世纪孕育出来的。今天的公共政策的目标也是由启蒙运动确定的:物质福利、幸福。人们还会想到宗教宽容、人道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以及民主和社会平等。所有这些都主要源于这个世纪。

更深入地看,很显然,我们的基本思维习惯以及我们的语言方式,也主要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虽然我们可能喜欢引用莎士比亚的作品和国王詹姆斯一世颁布的《圣经》英译本,但是我们不再用巴洛克文体写作;虽然我们可能还去教堂,但很少有人怀着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那种宗教狂热。<sup>〔1〕</sup>

---

〔1〕 科学运动产生了对传统修辞的批判,认为传统修辞过于铺张华丽。它提倡清晰平易的文风。这种文学革命对现代语言的影响似乎超过了其他因素。——原注



## 启蒙运动的局限

既然启蒙运动给我们带来了如此之多美好事物,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浪漫主义时代的人们要否定它,至少是对它的某些部分深恶痛绝?简单地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停留在启蒙时代,而是跨越它?浪漫派认为,启蒙运动具有他们所说的那种庸人之气,因为它蔑视诗歌,贬低天才的想像,不尊重崇高或“热情”。在18世纪,“热情”是一个贬义词。热烈的情感和奔放的想像都受到怀疑,被视为产生谬误、贻害社会的根源。它们甚至会引导人们回归宗教!洛克建议父母扼杀孩子的诗兴,因为那是胡思乱想的领域。牛顿也认为诗歌是“精心编造的胡言乱语”。当然,这种“冰冷哲学的触及”不可能消灭一切诗歌,但是它会使大部分诗歌变得平淡乏味生硬造作,成为一种说教。诗歌可以用来点缀科学的真理,但是它不能创造这些真理:“真理用诗歌包装,放射出更耀眼的光芒。”<sup>〔1〕</sup>伏尔泰和达朗贝尔坦率地承认,“靠想像创作的现代作品普遍不如前人的同类作品”,因为“追求眼见为实而不愿推测臆想的哲学精神已经广泛传播,深入到纯文学中”(达朗贝尔)。

关于18世纪的风格,这里做一点讨论。伏尔泰的英雄对偶句当时广受赞赏,现在已失去光彩。卢梭的小说也是如此。他本意是表达内心的情感,结果打破了禁忌,却陷入了伤感缠绵。对于大多数18世纪作家而言,之所以不能表达真情实感,既缘于新古典主义规范施加给文学的清规戒律,也由于他们自己的胆怯作祟。新古典主义追求简洁、升华和澄明,因此显得过于追求文雅,在诗歌中则显得过于斯文。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例如英国的约瑟夫·艾迪生,并不反对表达各种情感,甚至不反对表达激情(“热情”),但是他们对这些情感十分戒备。正如马修·阿诺德所宣布的:这是“一个散文时代”,而不是诗的时代。这个时代推崇科学与明晰,没有顾得上心灵的领域,那里包含着另外不同的更深刻的真理。当这个雕琢

---

〔1〕 诗人汤姆森(1700 - 1748年)在一首诗中描写牛顿是如何解开整个白日的耀眼长袍,从混成一片的白色中,收集一缕缕的光线,将色彩之母那丰富的系谱,展现给曾被迷惑的眼睛…… ——原注

的时代变得繁冗之时,我们就看到了洛可可风格,或者往往(在法国)归在“才子”(bel esprit)名义下的类似事物。这是指一种令人愉悦的修饰风格,但相对于早期古典主义的庄严肃穆而言,也是一种堕落。在音乐方面,它体现为所谓的意大利风格,是一种轻松、嬉闹的音乐。卢梭曾为之而战(如果在卢梭身上发现洛可可风格,那是令人奇怪的,但他的音乐确实如此)。在绘画方面,它体现为弗拉戈纳尔—格勒兹—布歇画派<sup>〔1〕</sup>的那种精致、造



《占领迦太基》,乔瓦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作

洛可可大师提埃坡罗不但创作描绘古代场里的油画,还用宏伟的壁画装饰洛可可建筑。

---

〔1〕 弗拉戈纳尔(Fragonard, 1732 - 1806年),法国画家。  
格勒兹(Greuze, 1725 - 1805年),法国风俗画和肖像画家。  
布歇(Boucher, 1703 - 1770年),法国画家、设计师。

作、轻佻。在建筑方面,洛可可风格表现为小巧、精美,就像路易十五的家具那样。这种品味产生了如此绚丽多彩的装饰作品,因此我们不应该对它过于苛求。但是人们或许可以怀疑,一个过分讲究的社会还有多少活力。今天,值得玩味的是,洛可可这个词在法语里隐含着文弱颓败之意。它毕竟是大革命来临之前的末代风尚。

泰纳在他那部 19 世纪的名著<sup>〔1〕</sup>中宣称,新古典主义提倡虚假的清晰,从而败坏了启蒙时期的政治科学。但是,不可否认,新古典主义也给人们带来了欢乐:蒲柏的平易而机智的诗歌,巴赫、亨德尔和莫扎特的音乐(逐渐趋向洛可可),建筑物的漂亮的装饰风格,法国大师的绘画,威尼斯大师提埃坡罗<sup>〔2〕</sup>的作品。古典派和浪漫派之间的争论永无休止,也永无结果,因为一边是清晰、秩序和克制,另一边是热情、兴奋和冒险,而人们先是会逐渐厌倦这一边,然后又逐渐厌倦另一边。但是,很显然,18 世纪末,其中一个循环又要转完一圈,显现出衰微之势。这种艺术与真正的社会现实脱节,是贵族的、上流社会的艺术。它表现闺房里的风花雪月或者是高度理想化的“自然”。

年轻的歌德描述了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如何对启蒙哲学家的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根本不能忍受它们。那些学说都是外在的、肤浅的,无视那些深层的、具有永恒魅力的人类经验领域。他们认为这种肤浅缘于启蒙运动晚期那种极其造作的风格。

针对新古典主义的矫揉造作,在 18 世纪就出现了一种不加掩饰的反叛文学。这种文学本身并不令人满意。这种变态的、不道德的小说体裁在萨德侯爵的作品中登峰造极而臭名昭著。萨德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不光彩形象,从而把启蒙运动的另一面推至极端。这一面就是由爱尔维修和拉美特利所主张的享乐主义伦理学:感官享乐应该成为人生目的。许多 18 世纪的小说都颂扬肉欲带来的快乐,其中包括轻松愉快但声名狼藉的《芬妮·希尔》<sup>〔3〕</sup>。但是这种享乐主义会显得极其庸俗或者像萨德作品中那样令人恶心。人们可以批评 18 世纪缺乏崇高的伦理标准。即便我们把萨德看做是一个畸形浪子,但是大多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都排斥高昂的宗教热

---

〔1〕 指《艺术哲学》。

〔2〕 提埃坡罗(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 1696 - 1770 年),意大利壁画家。

〔3〕 《芬妮·希尔——一个追求享乐的女人的回忆录》(Fanny Hill),作者克莱兰(John Cleland, 1709 - 1789 年)。

情和艺术热情,而仅仅让人们追求幸福。

追求幸福,这个著名的口头语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旨趣。保罗·哈泽德<sup>[1]</sup>在《18世纪欧洲思想》一书中专辟一章来论述“幸福”。他指出,当时有许多著作、小册子、小说和诗歌都涉及这一主题。“什么是幸福?”可以与“为什么有邪恶?”一起被视为18世纪的最大热门话题。人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时代已经开始让人们在人间而不是在天堂享受幸福,那些导致人们相互残杀的狂热理想都是欺骗,应予以揭穿。因此,人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实在的、符合常识的方式来享受当下的幸福。但是当人们仔细探究这一问题时,根本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幸福。如果幸福仅仅意味着物质和感官享受,那么人们可以谴责这个时代缺乏高贵精神,把人降低为畜生。我们会由此想起约翰·穆勒在批评功利主义伦理学时讲的那个故事:一个绅士总是把糖果藏在房子周围,因为他只有在意外地发现糖果时才能享用它!如果你也这样孜孜不倦地寻找“幸福”,你可能根本找不到它;因为幸福是追求其他事物的副产品。

狄德罗撰写的《布干维尔环球航行续编》(1772年)是这位著名哲学家和百科全书编撰者的一部杰作。书中展现了塔希提岛上居民的幸福生活。他们很自然地满足性欲,不以为耻。直到一个白人(指布干维尔)到来,用他的道德破坏了当地人的兴致。这部著作被说成是弗洛伊德和玛格丽特·米德学说的先驱而受到推崇,但至少我们可以说,与这两位现代人相比,狄德罗似乎不太懂得无限制的性享乐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还可以说,这个热带岛屿很难成为欧洲和整个西方的榜样。

这个放荡的启蒙运动(或许可以这样称呼)显示了在这个世纪里发生的某种进步或者说是某种倒退。理查森的小说是用道德说教包装起来的(狄德罗和卢梭都承认深受其影响,卢梭在《新爱洛绮思》中也模仿了这种方式)。帕梅拉经受诱惑,可怜的克拉丽莎遭到诱拐和强暴,但小说把这些表现成贞洁的姑娘以基督徒的坚毅精神面对考验,最终美德战胜堕落,而且坏人也恶有恶报。不过,小说是带着明显的色情愉悦来描写那些罪恶的细节。<sup>[2]</sup>萨德笔下的朱斯汀娜也是一个克拉丽莎,只是作者对她毫无怜悯之心。那些强暴者都是聪明人;保持贞洁不过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假正经。萨德作品所贯穿的主题是,那些最为人诟病的冲动其实是“天然的”本能,

[1] 保罗·哈泽德(Paul Hazard, 1878 - 1944年),法国学者。

[2] 帕梅拉和克拉丽莎分别是理查森的两部同名小说的女主人公。

反对它们乃是一种愚昧的表现。“这种可憎的手足情谊受到万恶的基督教的赞扬”,必须予以打破;爱是一种危险的人性弱点,因为它妨碍享乐。有人认为,萨德不值得认真对待。对此我们不能苟同。萨德确实代表了18世纪一个杰出群体的一个极端,或许可以说这是享乐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拉克洛<sup>[1]</sup>的《危险的关系》是另一部不讲道德的作品,当然也是一部好作品。

在这个“沉溺于色情”的时代,卡萨诺瓦<sup>[2]</sup>这个神奇的情场老手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这位意大利人也是一个哲学票友(与萨德一样),认识伏尔泰和狄德罗,出入上流社会。他身后留下的一部回忆录成为18世纪最重要的私人文献之一。据说他为路易十五设在鹿苑的著名淫窟招募姑娘。显然,爱情本身没有错,而荒淫是爱情的敌人(萨德对此直言不讳),而且会在道德上陷入死胡同。拉克洛笔下对贞洁妇人的勾引、萨德笔下性对象遭受的凌辱和折磨,都是荒淫无度的表现。这些方式当然不是18世纪发明的。实际上色情文学主要源于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尤其见于阿雷蒂诺<sup>[3]</sup>的作品)。但是,18世纪寻欢作乐的贵族社会既摆脱了对神谴的迷信和恐惧,又浸染于情爱小说和绘画的诱惑,因此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公开而广泛地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另外,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拉美特利之类的启蒙哲学家显然也对此起了一些作用。

18世纪的风格特征要比上面所述复杂得多。它在方方面面都有所尝试。在英国,与斯蒂尔-艾迪生派那种优雅教养和自负的辉格党作风形成对照的,既有斯威夫特的粗犷和悲观,也有菲尔丁的健康现实主义和理查森的淫荡。虽然卢梭创作洛可可音乐,但他也在其他方面支持严格的古典主义,谴责宫廷“游宴”艺术的造作和奢华。1760年以后,古典主义再次复兴,表现为英国乔舒亚·雷诺兹和法国大卫的绘画,温克尔曼对古代文物的考古发现,约翰逊博士激昂有力的文学批评等等。不过,此时哥特风格也有一点复兴之势,表现为草莓山<sup>[4]</sup>和恐怖小说。极度造作的洛可可风格也遭遇到贺加斯或斯摩莱特的粗犷的现实主义的冲击。总而言之,这个

---

[1] 拉克洛(Pierre Ambroise François de Laclous, 1741 - 1803年),法国小说家。

[2] 卡萨诺瓦(Giovanni Giacomo Casanova, 1725 - 1798年),威尼斯冒险家。

[3] 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 1492 - 1556年),意大利作家。

[4] 草莓山是英国文学家贺拉斯·沃波尔所购置的庄园名称。他用哥特风格改建了这座庄园,使之成为哥特复兴式建筑的象征。

世纪充满了躁动和尝试。有些学者发现,18世纪后期,对乏味的古典主义和疲弱的洛可可的不满至少沿着两个方向推动着艺术和表态方式:一个方向是具有更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古典主义,另一个方向是以理查森和卢梭的小说为代表的情感崇拜。

18世纪最后30年,情感崇拜在欧洲文学界已经深深地扎下根了,有时与“理性主义”平分秋色,有时则取而代之。(卢梭竟然能够几乎同时创作《新爱洛绮思》和《社会契约论》。)<sup>[1]</sup>“情感人”可以落泪,可以尽情宣泄。一种沉思和伤感情绪风靡社会。英国诗人爱德华·扬格的《夜思》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获得巨大的成功:他属于墓地派,细细地玩味着哀伤和死亡。哥特建筑的阴影和可怜的帕梅拉的命运使那些沿着理性思考接受自然神论的人感到困惑。1784年,阿尔伯加蒂<sup>[1]</sup>笔下的女主人公劳拉被4本书搅得神经错乱:伏尔泰的《老实人》、卢梭的《新爱洛绮思》、扬格的《夜思》和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对于那些思想闭塞的人来说,这4本书的奇怪组合肯定会让他们大惑不解。令人吃惊的是,理性主义的、冷嘲热讽的、提倡科学的启蒙运动居然与最极端的感伤主义相依相伴。但是,大约自1760年起,后一种潮流确实是十分时髦的。

不论有多少成就与挫败,18世纪的艺术注定要被浪漫主义的滚滚洪流所淹没,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成为表示文学性不足的代名词。就此而言,20世纪的批评者比19世纪的批评者要客观一些。我们可以赞同这样的说法:浪漫主义引进了私人的表述,个人的见解以及敏锐的直觉,这是前所未有的。18世纪的风格更社会化,因而也更形式化。人们不是求新求异,而是因循温故;人们所使用的是(也受制于)传统的语言和方式。18世纪的文学是沙龙文学、客厅文学,反映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普遍有教养的社会的品味。但是这种文学没有天才个性的概念,也就是那种超越一般人的、无所禁忌的冒险心灵。艺术家与社会的疏离或异化这个现代主题尚未展开,或者说刚刚展开。如果像里卡多·昆塔纳所说的<sup>[2]</sup>,18世纪有一种神话,那么这个神话所描述的就是“正常人”(normal man)和“共有的经验”。这与浪漫主义何等地不同!我们在评价启蒙运动的风格时,不要忘了这些。

---

[1] 阿尔伯加蒂(Francesco Albergati Capacelli, 1728 - 1804年),意大利贵族,作家。

[2] 见里卡多·昆塔纳《斯威夫特的思想与艺术》(纽约,1936年版)。

## 启蒙运动的结束

可以说,当启蒙运动开始看穿自己的“神话”时,它的自信也随之动摇。怀特海说的好,这是一个“基于信仰的理性时代”。它始于一种坚定的信念:科学的经验主义能够使人们得出某些普遍法则。但是经验主义导致了怀疑主义,或者说没有能够找到人们所期待的简单而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对理性的信仰是对澄明的信仰,即相信一切终究水落石出。这也是对不含有形而上学成分的科学的信仰。还有一种如影相随的信念:“自然”和科学能够给道德和宗教提供明确的指导。但是,这些信念都过于简单化了,或者说是严重的误解。科学并不具有规范作用,不能提供价值;科学的“法则”(定律)只是尝试性的、操作性的,除此之外,我们不能赋予它们其他的意义。卡尔·贝克尔所提出的著名概念“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说的是:这些哲学家实际上保持了中世纪基督教的信念,即这个世界具有上天安排的秩序,同时把这种说法用于现世而不是来世的天堂,用科学理性而不是用神学来揭示这个天堂。(戈登·赖特指出,启蒙哲学家嘲笑那些宗教奇迹,却相信人类能够尽善尽美的奇迹。)

从18世纪人们对“自然”这个词的不同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造成上述基本问题上的思想混乱的某种根源。毋庸置疑,这个词与那个时代的主题紧密相关。新古典主义作家所追求的是“自然”,自然神论者用以取代天启宗教的是“自然”,社会科学家在寻求人类事务的严格规范时所求助的是“自然”,道德家探求人类行为准则时所依据的是“自然”。阿瑟·洛夫乔伊在《作为美学标准的自然》一文中列举了这个词的8种定义。他指出,“追随自然”的原则对于新古典主义是饮鸩止渴,因为“几乎所有反对新古典主义标准的人都祭起这面旗帜”。约瑟夫·巴特勒早就向英国的自然神论者指出,“自然”是完全不确定的。18世纪的人在“自然”里看到的是秩序、简明和规律;也有人像某些浪漫主义者那样看到的是无规则、不讲规则、自由精神、追随“自然”而不墨守成规。启蒙运动衰落的根本原因或许就在于,它诉诸“自然”时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自然”有一个明确的而毫不含糊的权

威标准,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sup>〔1〕</sup>

最后,法国大革命这场大灾变当然也促成了启蒙运动的结束。大革命从18世纪哲学家那里获得了启示和理念。但是,首先,它很快就横扫了他们的文雅规则,进而探索前所未闻的政治领域;其次,它规模如此宏大,使人不由地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不言而喻,也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它的暴烈和过激引起了反感,导致人们反对所有那些被认为激发了大革命的理念。欧洲知识界大多追随伯克和梅斯特尔,反对法国大革命以及作为其背景的思想运动(指启蒙运动——译注)。1789年开始的长达25年的苍黄反复使得整个文明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无论是社会领域,还是政治领域,还是思想领域。

启蒙哲学家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引发了或促成了法国大革命,影响了大革命的方向?这已经是思想史研究中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几乎没有人否认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起了重大作用:破坏了人们对旧制度的尊崇,鼓励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卢梭还向人们提示,在现存社会秩序的废墟上将会矗立起一个更美好的新社会。很显然,成为大革命导火索的那些哀怨、不满和愚蠢举措,都不是他们制造的;贵族的贪婪、国王的软弱、商人的野心,也不是他们引发的。但是,他们提供了点燃这场大火的花柴,而且,正是在他们的指引下,大革命才成为一场伟大的、影响深远的运动,而没有成为多少世纪以来所发生的那类无目的的暴动和抗议。

当然,我们承认,启蒙哲学家和百科全书派既没有期盼革命,也不曾欢迎民主。革命者歪曲了他们,用自己的愿望和目标来解释他们的学说。在大革命期间,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语录挂在每一个人的嘴上;这些语录大多被断章取义,所附会的意思会令原作者目瞪口呆。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很清楚了。例如,卢梭的政治思想很微妙也很复杂,甚至自相矛盾,但是,按照我们的理解,他的思想并不像圣茹斯特和罗伯斯比尔所想像的那样支持革命的全民民主。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的运动把思想家和实践家卷入同一潮流,但彼此并不完全理解。在组成这一宏大历史事件的整个

---

〔1〕 启蒙运动末期,“自然”概念已混乱不堪。萨德侯爵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反对自然就是顺从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矛盾斗争;“惟一真正的犯罪是冒犯自然”,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然本身就包含着所有的犯罪,因此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犯罪。——原注



进程中,意识形态是一个因素,但仅仅是一个因素。

无论是大革命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大概都会同意,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主要起了一种否定的作用,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总体而言,他们希望扫除他们称之为迷信、腐败、矫揉造作的东西和过时的法律。至于用什么取代旧社会,他们则含糊糊地诉诸理性、自然或自然法。伏尔泰认为,如果人们摆脱了僧侣控制的宗教,就会变得非常有理性,这就够了。卢梭则提出,如果人们把非自然的污垢清除掉,就会变得尽善尽美,这就够了。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补充说,如果给社会松绑,消除国家干预和社会不平等这些累赘的机制,那么社会就能自行运转。这些人其实并没有搞明白任何社会问题,只是要求消灭现有的一切。有人批评启蒙哲学家犯了“虚无主义”,是破坏者,不是建设者。他们在主观上并非如此,但是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指责。<sup>〔1〕</sup>最早的革命者并不认为这是虚无主义,恰恰相反,他们天真地相信,只要把旧制度消灭掉,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在现实中,他们不得不接受沉重的教训:人就其“自然本性”而言不是那么有理性,也不是那么有道德,因此美好社会不可能自动产生。

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认为,正是18世纪的哲学家促成了人们摧毁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秩序,高扬起理性和人道的旗帜,给人类指出了前进的基本方向(尽管不能准确地知道具体的路线)。对于他们来说,有这样的荣誉就足够了。而且,仅仅是一代人就享有这么大的荣誉。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总是宣称,伏尔泰、卢梭等一伙人歪曲人性、歪曲历史,从而使得欧洲人陷入万劫不复的痛苦之中。也许我们还涉世不深,没有对现代世界的足够体验,难以客观地对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做出判断。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法国大革命开辟了新的现代历史阶段;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18世纪哲学家的伟大思想和情感,同时也结束了他们那个时代。

---

〔1〕 当时,启蒙哲学家的反对者常常提出这种指责。夏尔·帕里索在他创作的喜剧《哲人》(1760年)中说:“他们有本事破坏,但毫无建树。”——原注

## 第七章 浪漫主义和革命

### 法国革命

思想观念在法国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法国大革命始于 1789 年，在随后若干年里主宰了整个欧洲舞台。大革命是以引人注目的“启蒙哲学家”运动为先导的。后者展示了一个光彩耀人的思想领袖画廊。这些人物晚至 1740 年代后期崭露头角，18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如日在中天，哺育了未来的革命领袖。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引述革命期间一个法国人的话：“他们用言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言论确实所向披靡。”这些言论出自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及其弟子们之口。这些人被视为权威，后来甚至被供奉在革命政府建立的先贤祠中。革命中的主要派别更多的是按照他们所信奉的理念而不是他们的社会阶级成分来划分的。一个知名学者指出，无套裤汉主义，这种巴黎的革命世界观，“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种社会政治经济现实”。雅各宾派这个 1792 - 1794 年的统治集团乃是由各种社会阶层的人组成的。革命领袖也往往把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产物。布里索在 1791 年 9 月夸耀说：“我们的革命不是起义的结果，而是半个世纪启蒙的产物。”一个重要杂志于 1791 年 4 月宣称：“哲学指引了法国的一场伟大革命。”

不幸的是，启蒙哲学家在社会政治事务方面的理念通常都很模糊，事实证明不足以指导革命。革命在一个英勇的开端之后就堕入痛苦血腥的内乱，接着导致了 1793 - 1794 年的恐怖。有些人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启蒙思想的混乱与矛盾，也有人归咎于启蒙思想的不切实际。爱尔兰裔英国政

治家和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成为所有法国敌人的圣经。这部保守主义宣言指责革命以抽象理念为依据,认为在政治领域中,惟有具体的人际纽带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才起作用。应该承认,正如现代思想史学者约翰·洛所说,“试图寻找启蒙哲学家关于未来政府的看法,结果几乎总是一无所获。”

事实上,几乎所有启蒙思想的幸存代表(那一代的伟大人物大多已经去世)<sup>〔1〕</sup>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感到惊骇。说到底,他们是主张通过思想启蒙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合乎理性的进步;他们大多蔑视民众,寄希望于某种开明专制。他们信奉合乎理性的秩序与合乎科学的方法,而这些却在革命时期的狂欢动乱和胡言乱语中遭到践踏。正如有人指出的,“革命”这个词在启蒙哲学家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踪影。在他们的期望中,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不是狂暴革命的结果,而是循序渐进的、大体不出所料的改革的结果”。最激进的启蒙哲学家之一霍尔巴赫男爵(无神论者,至少在仆人不在场时自称“上帝的私敌”)在其政治著作《自然政治》(1773年)中就曾写道:“在革命时期,人们义愤填膺、头脑发热,从不诉诸理性。”虽然启蒙思想家(并非完全一致)大多在口头上敌视教会,但希望用理性祭司取代基督教僧侣。此外,他们通常不想废除君主制,而是想让王权成为启蒙的工具。



断头台

所谓的吉伦特派聚集了大部分启蒙知识分子。而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为首的雅各宾派则激烈地斥责启蒙思想家和百科全书派。1793 - 1794年,他们要么把吉伦特派成员送上断头台,要么迫使其走投无路而自杀。“文人”几乎成了叛徒的同义词。激进的雅各宾派认为,他们的敌人是那些“最有教养、最工于心计和最奸诈狡猾的人”。罗伯斯庇尔宣称,那些

〔1〕 伏尔泰和卢梭这两个对立的思想巨匠都在1778年去世;休谟于1776年去世;狄德罗于1784年去世;达朗贝尔于1783年去世;孔狄亚克于1780年去世;腓特烈大帝于1786年去世。布丰和富兰克林都已经是耄耋老人。他们是无与伦比的一代启蒙思想家。但是他们的嫡传弟子,如孔多塞和马农·罗兰继承了这一传统。——原注

人“竭力关照自私的富人和平等的敌人”。雅各宾派只推崇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即卢梭,而且是处处援引卢梭,有如走火入魔。罗伯斯庇尔把他称作“圣人”。但是,被他们当做保护神来供奉的那个卢梭乃是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敌人;他是相反的启蒙哲学家,拒绝精深的理性,偏爱天然情感。罗伯斯庇尔宣称,如果卢梭能活着看到革命,“谁能相信他那仁厚的心灵将不去欣喜若狂地拥抱正义和平等的事业?”但是,温和的布里索和罗兰夫人同样是卢梭的信徒;他们所依据的却是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论著。这种差异至今让学界纷争不已。与罗伯斯庇尔相反,罗兰夫人的情人蒲佐在死牢里写的一封信中说,如果包括卢梭在内的那些启蒙哲学家还活着的话,“他们会同罹此难。如果他们和我们一样没有流亡的话……孟德斯鸠、卢梭、马布利都会被判处死刑;他们都会丧命于断头台。”

吉伦特派是一个由理性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派别。他们反对流血和群氓暴力,厌恶其政敌用来消灭他们的那种武力手段。围绕如何处置国王展开的争论(1792 - 1793年)使得各派之间分崩离析,也最终导致吉伦特派垮台。吉伦特派不情愿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因为他们害怕这种激烈举动会导致种种后果。但是,恰恰是在吉伦特派领导下,法国开始了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20多年几乎连续不断的欧洲厮杀,从而使法国革命变成了世界性革命。吉伦特派里面有一些最激烈地反对“教士阴谋”和“迷信”的斗士,或者说百科全书派、无神论者和反叛的教士。他们支持(其实是他们制造了)引起争议的《教士公民法》,对教会实行国有化。他们之中有些人主张借此改革基督教,还有些人则主张建立非基督教的信仰。

左翼的雅各宾派依据自己对卢梭“公意”的读解,提出一种民主观念。他们的目标是平等,公意概念以及常常成为他们的权力基础的群众行动或暴民行动使得他们赞颂人民群众。这一思想倾向不太看重个体权利和议会制度,而把它们看成是自私和腐败的。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根本没有规定分权,也没有保障个人自由。它批准了一种基于民众意志的、由公民投票产生的专政,其权力授予少数人来行使。罗伯斯庇尔宣称:“我代表人民说话。”这种“集权主义的民主”有时候在某种深层意义上说是民主的,即具有亲民的情感、平等的热情和让人民直接统治的愿望(罗伯斯庇尔想建设一个能容纳一万两千人的大会场,让民众观看立法者的活动)。但是它蔑视合法程序和个人权利。其结果就是在1792 - 1793年极端的战争危急条件下的恐怖统治。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是狂热的美德共和国时期的伟大的革命宣传家和主要政治人角色。身为启蒙运动的信徒,他怀疑基督教,但主张崇拜最高存在、理性女神。他宣布,无神论是贵族的東西。他的上帝是人民的某种抽象化身。他是一个很好的民众鼓动家,但是他与真实民众的关系基本上是冰冷而不愉快的。他刻板、真诚、咬文嚼字,善于言辞而拙于行动(罗伯斯庇尔除了演讲,几乎没有做过其他什么事情)。以正直自居的罗伯斯庇尔首先是一个演员,一个毫无私利的彻底政治化的人物。他把自己当做历史精神的化身。他看见血就会过敏而全身发抖,但是他能以人道的名义下令处死成千上万的人。埃德蒙·伯克指责这场革命耽于抽象的理论而缺乏务实的判断。罗伯斯庇尔似乎就完全体现了他的指责。这个恪守原则的人变成了血腥的独裁者,最后被他用来消灭自己的敌人的革命机器所毁灭。

罗伯斯庇尔并不是法国革命最激进的产物。尽管雅各宾主义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精神,主张共同体高于个体,但它不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罗伯斯庇尔及其战友主张有权为了社会福祉可以用各种方式来管制私有财产,但是他们相信最好的社会秩序应该是像卢梭所建议的那样,让每个公民都拥有一点儿财产。这完全可以称作是一种小资产阶级乌托邦或手工业工人的乌托邦。在革命中出现了社会主义,但是它还来不及充分发展。在1795年的绝望日子里,革命似乎正在土崩瓦解,一小伙社会主义者试图发动一场起义。这个由巴贝夫和邦纳罗蒂领导的“平等派的密谋”一败涂地,但留下了一个强大的传统。这些社会主义先驱者也从卢梭的某些著作中获得启发。他们的思想是粗鄙的,但他们的情感却很



罗伯斯庇尔

炽烈,他们痛恨私有财产、商业和奢侈,颂扬贫困的美德、诚实劳动和简朴生活。邦纳罗蒂活了下来,成为一根纽带,联结着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潮。这种无套裤汉社会主义散布到欧洲各地,对那些贫困阶级的空谈

理论的代表人物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它很接近于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意大利的巴贝夫主义者鲁索就重申萨沃纳罗拉<sup>〔1〕</sup>的回归中世纪的主张,号召富人们抛弃自己的珠宝。

革命中的种种极端现象反而使革命名声扫地。随着内战、迫害、恐怖和国际战争横扫欧洲大陆,革命最初在欧洲各地引起的欢欣雀跃到18世纪90年代就转变为失望和幻灭。最初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大多因革命而欣喜若狂,包括许多后来变成革命死敌的人。年轻的华兹华斯吟唱道:“能够活到那个黎明时分是多么幸福。”不止华兹华斯,还有梅斯特尔、夏多布里昂、康德、费希特、诺瓦利斯、歌德等等,许多人最初都有这种兴奋之情。卢梭在英国也有狂热的崇拜者,例如托马斯·马尔萨斯的父亲就要人们只称他“卢梭之友”。卢梭的信徒吉尔伯特·韦克菲尔德于1799年被指控公开希望法国入侵和征服英国而遭监禁。这个时期人人都在读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呕心沥血20多年,到1787年才完成这部巨著。这部著作焕发着共和精神,至少在1789年的氛围中它是这样被人们读解的。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似乎在告诉人们,古代的罗马国家自从有了第一个皇帝就开始衰落,基督教最终使它完结。

但是,法国革命迷失了方向,陷入暴力、劫掠和不义。它最后以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这种可怕的场面告终。结果,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理性时代的种种前提假定,然后予以拒斥,从而促成浪漫主义的转向。1794年以后,一个原来的启蒙哲学家圣马丹<sup>〔2〕</sup>变成了一个与共济会的诡秘分支有联系的新神秘主义宗教的领袖。卢梭的影响也沿着直觉和想像的方向散播。

## 对革命的抨击

法国革命很快就招致了思想反击。英国的伯克首先发难,于1790年发表《法国革命感想录》。伯克宣称,革命之所以走进误区,是因为革命的领导者要摧毁整个政治体制,并想在一夜之间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制。他把这种错误归咎于启蒙哲学家、政治理性主义者的基本观念。他们的方法

---

〔1〕 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 1452 - 1498年),意大利宗教改革家,曾发动“焚烧虚妄”运动,后被教会和世俗当局处死。

〔2〕 圣马丹(Saint - Martin, Louis - Claude de, 1743 - 1803年)法国神秘主义者、作家,以“无名哲学家”之名而广为人知。

是抽象理论的方法,而在这样一个领域玩弄抽象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伯克讥讽地写道:“西哀耶斯神父有许多鸽笼,里面放满了各种现成的宪法,贴着标签,分门别类,排着序号。”但是,宪法不应该是从政治理论家贩卖的货物中挑选出来的,而必须是像一棵大树一样,是从一个国家的土壤中历经数个世纪生长起来的。

伯克的这部著作体现了他的风格,表现出对现实政治微妙结构的一种令人惊叹的洞察力。如果将它看做一部文学作品,那么它是新兴的浪漫主义风格的主要散文作品之一。在这种雄辩中浮现出来的主要思想是,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历史产物,不能像一台机器那样被随意修补;社会是人类智慧的储藏库,应该受到尊崇,如果必须加以改革的话,那也必须充分考虑其制度机构的连续性。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思想是,政治共同体是由历史塑造的,它已经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可分解的纽带,使得自由的政府有可能存在;社会有机体有其自身的等级体系,因此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平民百姓会尊重“天然的贵族”;一般规则和抽象原则于政治无任何帮助。



埃德蒙·伯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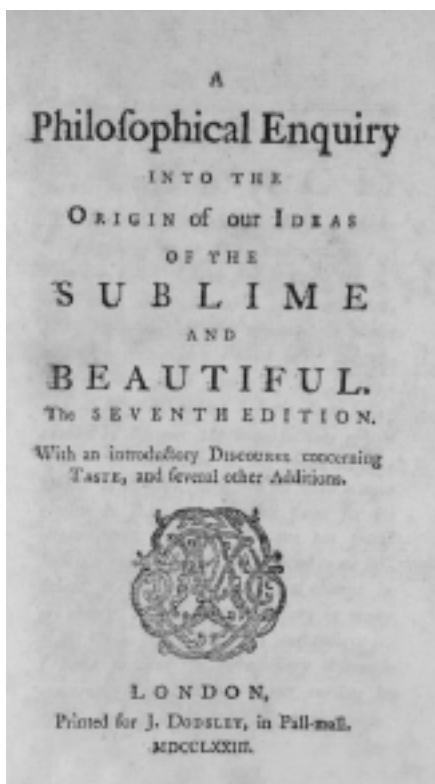
虽然埃德蒙·伯克支持美国革命,他却尖锐批评了法国革命,认为这场革命打破了法国的传统,把新的政治结构建立在自由、平等等不明确而又崇高的原则基础之上。

他对那些不安分的革新者表示怀疑,认为他们没有耐心去吸取祖先的智慧,却非要为彻底的社会改造描绘蓝图,似乎他们是先知先觉。

伯克一方面摒弃法国人所宣扬的“抽象权利”,一方面也力图阐明人的真实权利;他确实相信人应该拥有这种权利,但是他也强调人们在进入文明社会时,为了从建立政府中获得种种好处,在某种程度上放弃某些自由。

这种真实的权利是建立在西方政治社会的基督教基础上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如果从维系他生存的古老习俗和传统的结构中割裂出来,他就无异于野兽了。再者,人是一种宗教动物,如果没有基督教,他就会转而信奉另一种可能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宗教。因此,尊崇上帝和尊崇社会秩序乃是人生两大职责。二者相互关联。因为历史就是上帝意旨的显示。人们指责伯克说他仅仅因为教会历史悠久就推崇教会,但他的虔敬确实是真诚的。

这位爱尔兰演说家对以后的保守主义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国革命感想录》在欧洲一版再版。路易十六亲自将它翻译成法文。它之所以流行,不仅是因为它的那种富丽堂皇的文风,而且因为它的那种似乎神奇的预言性质,因为伯克在法国革命刚刚开始不久就宣告了它的必然失败。许多人认为,伯克的这部论著超越了保守派的派性,对政治思想乃至社会改革理论做出了一种真正的贡献。他确实不反对变革,条件是变革应受到恰当的控制。由于出身低微,他本人的经历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激情战斗——支持美国独立,为了爱尔兰和印度的利益<sup>〔1〕</sup>,最后是反对法国革命。



《论崇高美和秀丽美》封面

从性情上看,这位爱尔兰人一点也不像人们想像的那种保守分子;他的一个传记作者指出:“他的天性总是最急切地促使他去服务于某种伟大的事业,去纠正某些可怕的不公。”迄今伯克的许多思想被视为凡是想积极参与政治的人都必不可少的智慧。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宣称:“不了解伯克的政治家就如同没有罗盘的航船会在暴风雨的大海上迷失方向。”当然,伯克的许多观点也融入了现代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秩序的虔敬,对草率的改革者及其一蹴而就的计划的不信任,社会成长的有机体观念。

伯克的文风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同时代人,不仅对反革命事业而且对浪漫主义都产生重大

〔1〕 在著名的沃伦·黑斯廷斯审判案中,伯克发表长篇激烈的演说,抨击这位第一任英属印度总督,斥责他对印度人民采取的专横而不合法的行动。这一审判案从1785年拖到1795年。——原注



作用。18世纪50年代,当伯克还是一个奋斗的年轻律师时,他就转变为一个文人,撰写了论文《论崇高美和秀丽美》。这篇论文通常被认为是从新古典主义转向浪漫主义趣味的一个标志。他认为,当美的领域实际上被和谐、均衡和典雅这些古典规则所统治时,还有另外一个感觉领域存在,这就是“崇高”。它唤起恐惧和敬畏,它不像古典美那样使我们变得文质彬彬、使我们同化于社会,而是让我们感到孤独,同时又让我们兴奋和欣喜若狂。伯克本人一直带有一点浪漫色彩,他的事业更是如此。或许有点矛盾,他的最后这部伟大著作在内容上是保守主义的,在文风上是浪漫主义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位伟大的反革命鼓吹者同时也是一位革命者。

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不乏挑战者。1794年,潘恩予以反击。他的《论人权》在伦敦畅销一时。威廉·葛德文的《社会正义论》充盈着法国精神,在个体完美状态的理想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理性主义乌托邦。葛德文是诗人雪莱的岳父。他的妻子是女权提倡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他们周围有一个英国左翼群体。葛德文是一个哲学无政府主义者,敌视国家及一切制度性组织(例如,他也抨击公共教育制度)。潘恩写道:“政府就像一件外衣,乃是失去贞节的标志。”

“即使没有政府,具有共识的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作为一个杰出的女权捍卫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与其丈夫威廉·葛德文一道为最激进的启蒙运动社会事业而斗争。

社会”应该能够完成政府权力所篡夺的所有必要的社会职能。这种思想可能是从卢梭思想中引申出来的。摆脱了政府的干预,社会将会自行运转——这乃是亚当·斯密那一派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但是到了葛德文嘴里就变得更激进了:“如果我们让每个人都听从自己心灵的进步,不要想方设法用任何类型的公共设施来管制他们,人类不要多久就会变得唯真理是从。”

随着英国逐渐与革命的法国展开了殊死搏斗,葛德文对卢梭的推崇也变得不受欢迎。著名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利因持有亲法的政治态度,一伙暴徒捣毁了他的实验室。在苏格兰,粗暴的批评不绝于耳,迫使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宣布收回他对法国温和政治领袖孔多塞的赞扬。柯勒律治最初与他的朋友华兹华斯都对革命报以同情,后来也“丢掉了他的声音刺耳的造反小喇叭”转而反对革命异端。柯勒律治深受伯克启发,却与伯克齐名,被视为英国保守主义的开创者。不过,激进的报人威廉·柯伯特也加入反雅各宾主义的事业。在英国教会内部,威廉·威尔伯福斯领导的福音派运动站出来反对18世纪教会对自然神论的纵容,进而斥责不信神的法国人。

## 拿破仑时代

伯克作为“卫道者”竭力捍卫传统和“惯例”,他可以说是逆流而上。正如英国大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后来指出的,尽管暴行累累,但是法国革命确实发生了,而且“它教导人们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当做权利的最高标准”;它使男人和女人<sup>〔1〕</sup>都习惯于变革;它不可挽回地扫除了旧秩序。即便是伯克也不能想像还有可能在欧洲恢复旧貌,因为他确实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很快,法国军队就把革命传遍整个欧洲。拿破仑·波拿巴的独裁统治(1800-1814年)使得欧洲思想界大多转而反对革命,但是拿破仑的军事胜利则继续颠覆着旧的格局。他还找到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来支持他用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秩序来统一欧洲和结束“封建主义”。

本雅曼·贡斯当、斯塔尔夫人和勒内·夏多布里昂引领了一群才华横溢的法国流亡者。这些人逃脱了他们所说的暴君统治。另外有一些欧洲人,如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歌德,从未丧失对拿破仑的信仰,认为拿破仑的出现乃是天意,上天赋予拿破仑的使命就是用一部进步的法律将欧洲统一起来。还有一些人退而保持中立。在法国,所谓的观念学派,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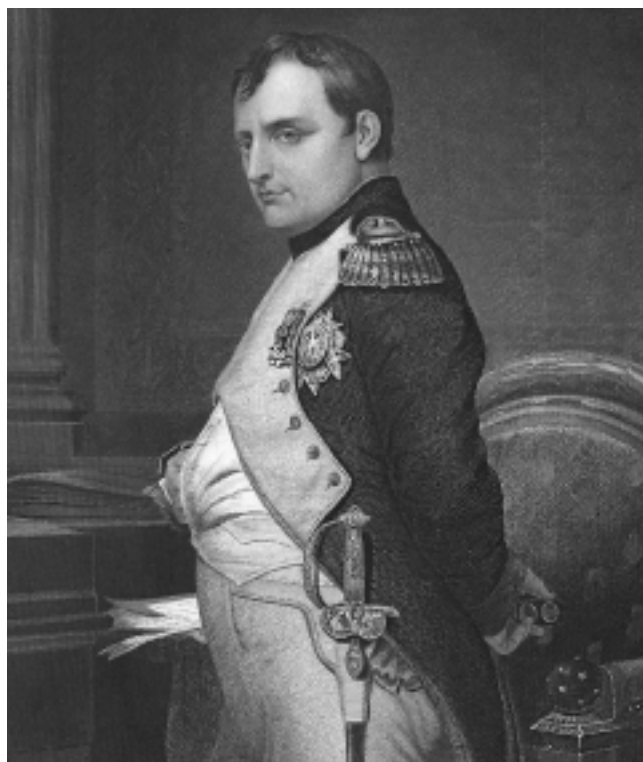
---

〔1〕 法国革命在雅各宾掌权的高潮时期是非常反女权主义的;它把罗兰夫人和奥林普·古兹(后者力图确立与“男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一般译为“人权”)一样的“女人的权利”)送上断头台,禁止妇女出席公共会议,除非她们带着编织活儿,安静地坐在那里。已经垮台的、由孔多塞领导的吉论特派倒是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女权主义。——原注

启蒙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sup>〔1〕</sup>（侥幸逃脱断头台）的思想追随者，面对革命在政治上的失败和幻灭，变得越来越冷峻客观，努力像严谨的科学家那样研究人类的心灵：推进孔多塞的“社会数学”，“沟通生命世界和非生命世界”。（德斯蒂对孔德的影响表明他与现代社会学兴起的关系。）

法国的一群杰出的科学家，其中包括生物学家拉马克和居维叶，证明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比较中立的科学能够繁荣发展。拿破仑也习染了那个时代对历史和东方的兴趣。他在1798年远征埃及时，随军带去200名学者，为的是研究那块令人神往而又十分神秘的古老土地。拉普拉斯改进了牛顿的物理定律，从而完善了“经典力学”。他发表了著名的《宇宙体系论》，试图不用牛顿的“第一推动力”的神迹来解释宇宙的运行和演化。（当拿破仑问他为什么没有提到上帝时，他回答道：“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

拿破仑本人乃是思想最解放的思考者。他喜欢在私下谈话时用他的无神论和玩世不恭来使人震惊。但是他确信“只有宗教才能给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因此他不能容忍任何公开的无神论，并且平息了革命与教皇的争端。私下里，拿破仑把通奸称作“区区小错一桩，化装舞会上的小插曲”，但是《拿破仑法典》这部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确立新的平等主义的伟大法典却规定严惩通奸，因为“婚姻的稳定有利于促进社会道德”。他是反女权主义的，说女人“不过是生儿育女的机器”。他蔑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蔑视“所谓的文学风格”。他宣称，在他的藏书中，他最喜欢的是有关他的军队的统计资料！但是，他自己无所不读。凡是艺术界、科学



拿破仑·波拿巴

〔1〕 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 Antoine - Louis - Claude, Comte, 1754 - 1836年)法国启蒙哲学家,在法国革命期间与朋友卡巴尼斯共同发起了观念学派运动。

界、哲学界乃至政界所流传的书籍,他都不放过,还常常做出精辟的评论。他确实不欣赏他的政敌斯塔尔夫人和夏多布里昂所采用的新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虽然他不是斯大林,也不是希特勒,但是在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思辨性的思想总体上没有得到发展。

拿破仑不认为自己是暴君,当他得知人们都这样看他时显得很惊讶。当他被流放到偏远的圣赫勒拿岛后,他在临终前宣称,他的使命是消灭封建主义、重新统一欧洲大陆,用公正不阿的法律来“确保人的尊严”。为此他改组了革命,使之变得务实,平息了法国的动乱,用任人唯贤的原则给普通人打开了机会大门。他把法治下的自由平等输出到德意志和意大利。他恢复了波兰的独立,因此他在波兰和欧洲其他地方总有支持者;他在15年的统治期间几乎不间断地进行战争,这种战争就像是欧洲的内战,尽管许多法国之外的人把它视为法兰西帝国主义的表现。有些人像诗人雪莱那样最初对他欢呼致敬,最后斥责它使自由事业的叛徒。贝多芬最初把自己的英雄交响乐题献给拿破仑,但是当这位第一执政给自己戴上王冠后,贝多芬就把乐谱撕破。这个故事一直有人质疑,但不妨信以为真。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也一直是坚定的波拿巴主义者。关于这位伟人,人们一直褒贬不一。按照荷兰历史学家彼埃特·盖尔的史学经典之作《拿破仑:赞誉和诋毁》的观点,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来自科西嘉的小个子从无名鼠辈窜升为显赫一时的世界主宰,他身后留下的这个世界已不复从前了。他所表达和体现的力量远远大于他本人的超常个性。

在这个划时代的岁月里,欧洲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震撼。像神圣罗马帝国这样的古老界标都被连根拔除,一个个王冠落地,一个个新主人登场。拿破仑是许多年里承担反对基督者这一角色的最佳候选人。据估算,1803-1814年伦敦的预言家乔安娜·索思科特的信徒高达数十万人。这个不识字的德文郡村妇因宣布基督再次降临而引起轰动。她所发布的消息恰与动荡的时世相应合,当时英国人既担心法国入侵,又苦于物价上涨与失业加剧。托马斯·马考莱感到十分惊异:“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老妇人,除了算命女人的狡黠之外别无所长,所受教育不超过一个佣人,却被奉为一个女预言家,身边簇拥着数以万计的信徒。这一切居然发生在19世纪,发生在伦敦。”当时在具有宗教改革传统的德意志南部和瑞士也涌现出各种千年福音教派。

关于拿破仑的争论会无休无止。英国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威廉·黑

兹利特在得知拿破仑最终失败的消息后,据他的朋友海顿描述,他“身心俱废”。“他蓬头垢面,走来走去,白天难得有清醒的时候,晚上总是醉意沉沉”,这样持续了几个星期,直到有一天,他仿佛大梦初醒,从此滴酒不沾。海顿认为,拿破仑可耻地背叛了真正的事业,但是到1821年这位伟人去世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后人永远不能理解这个时代的人对拿破仑的感情”——他的崛起、他的辉煌和他的失败对人们产生了多大的影响。那些时刻都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毫不奇怪,从1789年革命初曙到1815年拿破仑最后失败,浪漫主义就是在这激荡的25年中兴起的。

在对抗拿破仑的过程中出现的最显而易见的政治冲动便是民族主义。它的诞生时间通常被定在1807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遭到惨败之后。德国思想巨匠费希特与赫尔德以及一些名气不大的作家和青年组织者宣扬了民族主义。启蒙运动本身一直是鼓吹世界主义的。费希特确信,这是那个现在遭到贬斥的时代(指启蒙运动)的众多错误之一。法国人领导了启蒙运动;现在,歌德、贝多芬、席勒、康德时代的德意志正在承担欧洲思想文化的领导角色。费希特在其广为流传的《致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7年)中宣称,德意志已经在思想文化方面觉醒了,它也应该在政治上觉醒。革命的目标——人人权利平等——确实值得追求,但是权利需要植根于特定的人类家庭,而不是含糊不清的普世人类。革命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因素。它是一场法国革命,因为它发生在那片土地上,那个原先高度封建化的国度里,把各种各样的行省集合在一起。(可以说巴黎是革命的中心,许多外省城市则亦步亦趋。与革命敌人厮杀的战争把整个国家团结起来。)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种冲动: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把文化统一起来,例如,把各地方言统一成一种法语。

民族主义乃是革命题中应有之义。一旦旧的社会等级秩序土崩瓦解,民族(nation,国民)就成了新的社会平等的天然载体。人民为什么是平等的?因为都是祖国的孩子。国家不再受制于特权阶层的统治,而是成为大家的财产,是平等权利的卫士和象征。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高唱:“自由的王国!人人平等!”在人民的国家(Volksstaat)里没有特权等级,只有属于同一个民族的平等公民。

民族主义是19世纪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意识形态,我们在下一章里还要讨论。与此同时,拿破仑的军队连根铲除了各国的旧式君主制度,使之再也不能恢复原貌。1815年,在拿破仑最后失败之后,各国政要为了重建欧洲而聚集维也纳。他们试图用“王朝正统”作为政治权威的指导原则,但

这种做法没有什么成效。不久,意大利人就率先揭竿而起,试图使意大利半岛摆脱奥地利的控制。烧炭党、青年意大利党前赴后继。它们是自 1820 年起最浪漫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

## 伊曼努尔·康德和哲学革命

“作为有记载的思想史上的一个明显的断裂例子”(J.H.兰德尔),浪漫主义确实是 1780 - 1815 年革命的一部分。它当然不能说是这个革命的全部。大约在这个时段,可以说至少发生了三个革命。它们不期而遇,互相重叠,相互影响,但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它们是法国革命、康德革命和浪漫主义革命。此外,纵观历史还应加上所谓的工业革命。



《纯粹理性批判》封面

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各种联系。弗朗西斯·杰弗里<sup>[1]</sup>于 1816 年表示他对这些革命都不喜欢。他把“我们文学中的革命”归因于“法国革命的煽动”。后来有一些研究浪漫主义的学者也支持这种论断。这一时期的历史如此喧嚣躁动、令人亢奋,这一代人不可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拿破仑的生平那么富于戏剧性,简直是匪夷所思。但是,拿破仑乃是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信徒,因此他不喜欢浪漫主义;革命本身一直沐浴在古典主义之中——古典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浪漫主义所否定和取而代之的风格。而且,有一种浪漫主义发展是与保守主义对革命的反动紧密相连的;我们在伯克那里已经看到这种萌芽。(后面我们将要看到,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类型的浪漫主义。)

[1] 弗朗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rey, 1773 - 1850 年),《爱丁堡评论》创始人。

浪漫主义的来源显然不仅是法国革命。大概可以说,在 1781 年前后席勒和青年歌德的作品中,它已经崭露头角了。当时根本不是一种革命的政治氛围。年轻的歌德十分热衷于神秘的宗教。他曾描述他和一些朋友如何开始厌倦伏尔泰时代的干巴巴的理性主义;他们觉得它极其枯燥无味。这位未来的德国文学大师写出了早期的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是一部煽情之作,在赚取全欧洲的眼泪方面不让卢梭的作品。席勒的《威廉·退尔》确实鼓舞了许多革命者,但它是迟至 1804 年才写成的。

革命与浪漫主义之间的这些不确定联系也同样出现在这二者与康德的哲学革命的关系上。马克思曾经宣称,康德哲学乃是与法国革命相呼应的思想革命。马克思的朋友诗人海涅也有同样的说法。他指出,随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发表(1781 年),“德国开始了一场思想革命,这场革命与法国的物质革命惊人地相似。”但是,康德对法国政治情况一无所知;他所致力探讨的哲学问题是英国经验主义者约翰·洛克、贝克莱主教、尤其是大卫·休谟以及自己的同胞莱布尼兹留下的。这位科尼斯堡的安静哲学家是在法国革命发生之前写完他的



伊曼努尔·康德

汉斯·施诺尔·冯·卡诺斯菲尔德作。18 世纪末,柯尼斯堡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创作了新的哲学体系,将 17、18 世纪的不同哲学传统融入到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系。

主要著作。虽然法国革命深深触动了他(他表示希望能够享受革命火焰的温暖,但不要被烧着),但是这个事件似乎并没有改变他的基本立场。法国的革命者肯定没有读过这位东德意志教授的晦涩作品。但是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是卢梭。卢梭对康德和法国革命都有深刻的影响。据

说,康德的早上散步是当地人对表的依据。<sup>〔1〕</sup> 康德惟一一次没有出来散步,是因为阅读卢梭的《新爱洛绮思》的结尾。卢梭对康德的影响表现为对科学理性的节制:科学理性在自己的领域里可以获得准确的知识,但是它需要补充一个本质和目的领域,而后一个领域只有通过其他认识方式才能深入。

康德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也同样是复杂矛盾的。康德的信徒费希特和谢林把他的思想往这个方向推进,但是康德并不太赞成他们对自己思想的解释。很显然,他对启蒙运动的假设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以至于在理性的殿堂里一切都不复旧貌,而且他与其他极其不同的通向真理之路敞开了大门。但是康德的禀性并不那么浪漫。他生于 1724 年,长期以来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启蒙哲学家”,受教于经过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加以系统化(也简单化)的莱布尼兹哲学学派,表现出强烈的科学兴趣。只是到了该世纪中期,休谟和卢梭两人的思想震撼了他,使他从“独断论的梦幻”中苏醒过来。但是,他的主要目标还是把科学理性从休谟的怀疑主义攻击中拯救出来。

休谟这位 18 世纪苏格兰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偏离了洛克的经验主义。洛克认为,感觉经验是知识惟一真正来源;精神的作用是消极被动的,只能是吸收外界的刺激。休谟则证明(康德认为这种证明是“不可辩驳的”),人的精神仅靠感觉根本不可能接触实在,人们所拥有的科学不过是建立在“意见”的基础上。我们的经验只能是一系列毫无关联的感觉印象。因果律不可能完全从经验中得出;它不过是我们的人为设定。如果我们只能感觉到 A 和 B,而不会感觉到“原因”,我们怎么能说 A“引起”B?例如,当 A 击中 B,使 B 运动时,我并没有看到“原因”;我看到的是事件和系列。在康德看来,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可能有一种正当有效的科学?然后他试图克服休谟的这种怀疑论,使科学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具体地说,这个问题涉及到“综合先天判断力”的地位,这里说的综合是与严格的逻辑或“分析”相对的一种事实。人们在自然界观察到的各种联系是像数学真理那样确定,还是像休谟所说的是意外的、偶然的和不确定的?

康德的答案大体上是这样的:精神或智力绝不是消极被动的,它们也包含着对经验加以整理的组织原则。精神本身包含着若干形式和范畴,这些概念能够赋予经验以意义。这些“思想本身的基本条件”是先天的,也就

---

〔1〕 一般的说法是,康德每天午饭后出来散步。



是说,不是来自经验,而是独立于或者先于经验而存在。康德列举了这些形式和范畴:空间和时间的感知形式;包括原因、结果在内的 12 个知性范畴。这些都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判断类型相对应——数量、质量、关系、模态以及更细的划分。所有人的精神里都包含着这些范畴,因此精神是一个基本的统一体——而理性是“先验的”。

我们的精神调节着而且实际上决定着我们的知识。康德赞同莱布尼兹而反对洛克的这一观点,即我们的精神里除了感官带给我们的东西外别无它物;精神这个组织者本身对感觉资料进行筛选和分类,从而使之变得可以理解。康德的所有观点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专业哲学家的注意力。当然,我们在此无须加以重述。但是,可以说,根据他的有力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精神是有创造力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理性是先验的。由此我们就将理性从经验主义的怀疑论中解救了出来。歌德将康德的理论解释为“如果我不是从一开始就心里装着这个世界,即使睁着眼睛,我也看不见”。换言之,如果我们的精神里没有能够赋予意义的预设结构,那么感官印象就没有任何意义,而是如威廉·詹姆士所说的“乱哄哄嘈杂一片”。人如果没有内在精神结构,科学中的这些“坚实的”感性资料就将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令人绝望。

康德断言现实是精神的一种造物,由此引发了关于康德是否“唯心主义者”的争论。虽然康德的一些信徒走的更远,但是康德本人似乎并不否认物自体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们通过撞击我们的感官来给我们提供不可或缺的基本的认识资料。(他的“批判哲学”无意于进行形而上学的论述,而是致力于分析我们的认识方式。)关键在于,如果我们的精神中没有一个理性结构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外部世界。没有精神,经验就毫无意义。但是,外部世界确实存在着,对于理性过程也同样不可或缺;没有可以分类的资料,精神也是枉然。正如有人指出的,有知觉而无概念,就会视而不见,有概念而无知觉,就会空虚无着。电脑必须有能够让它处理的数据。

需要补充的是,对于康德来说,我们所谈论的知识、即科学知识、关于外部世界的准确知识,并不是惟一的知识。这实际上不是终极实在的知识。科学的领域是完全正当有效的;他只是希望能将它从他认为可疑的基础中解救出来。因此把他说成是科学的敌人就大错特错了。他一直对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他本人也对科学做出过一些贡献。但是,科学知识是一种特殊的知识,适合于生活的实用方面。这是一种关于表象的知

识,而不是关于本质的知识。用康德的著名术语说,它属于现象学,而不属于本体论。它涉及的是事物的性能,但没有涉及“物自体”。前面已经提到,卢梭的影响促成了他的另一个重大目标,即把价值领域从科学家那里解救出来。于是他建立了两个(或许是三个)迥然不同的知识领域。作为实用知识的科学处理的是表象世界,即现象世界。宗教靠的是人的直觉,处理的是本质领域。康德认为,这两个领域决不能混淆。它们是不同的范畴。他的成就之一就是批判用物理世界的事实来论证上帝存在的证据。这些传统的证据,尤其是其中的“设计论”(即把宇宙的复杂精妙归因于上帝的设计,从而证明上帝的存在。——译注),直到18世纪还很流行。为此,他与普鲁士当局发生了一些麻烦。康德把这些古老的“证据”批得体无完肤,后来再也没人敢重新提起它们。康德认为,科学上适用的证据与上帝毫无关系。上帝的存在是不能“证明的”,但是我们在道德经验中能够找到关于上帝的强烈暗示。

当然,终究有一个本体领域存在着,但是康德不能肯定我们是否真的能认识它。先验理性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之中,使我们能够理解世界。康德认为,它是神秘的、是属于本体的。他说,理性能够分析自己,但不能解释自己——解释自己为什么是这样。这种问题超出了理性的极限。我能够知道我拥有它,看到它能做什么,但是我无法知道它本质上是什么。这就好像人要挣脱自己的皮肤。当我们试图对有关终极目的或起源的问题进行推理思考时,我们遇到的表明,这些问题是理性所无法解决的。所谓的“二律背反”或“矛盾”是指明显对立但同样正确或同样错误的命题,例如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还是没有开端,可能不可能有没有原因的原因,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

康德指出,在道德经验或审美经验中,我们能够洞见本质,但只能是瞬间顿悟。人的灵魂也是一种物自体,它能够凭借不同于分析理性的另一种理性而与其他的物自体发生联系。康德这里似乎徘徊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之间。一方面,他说,他“不得不排斥知识来给信仰留出空间”。他的名言中被引用得最广泛的是,他宣称,布满繁星的夜空和道德律令是两个同样令人惊异的领域。另一方面,康德就本性而言绝不是神秘主义者,因此对我们是否能够接触到本质不敢做出断言。很显然,我们注定要过一种分裂的生活,而每一种生活都不完美。关于现象的科学知识是准确的,但流于表象。关于本质的精神知识是深刻的,但我们永远不能企及。这个结论使科学家和浪漫主义者都不满意。

康德的伦理学论述也名闻遐迩。康德从他的基本立场出发,认为正当有效的行为准则不可能在经验中找到,只能在纯粹理性中寻求。“绝对律令”,即基本道德原则,不可能存在于环境,只能存在于道德主体即个人。善的意志就是善本身;有理性的意志就是善的意志。行为的道德价值是由动机决定的,而不是(像功利主义者所主张的)由结果决定;责任意识,即对邪恶冲动的理性抵制,乃是最高的道德素质。康德最终提出了著名的道德律令:一个人不论做什么,总应该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或者用他的另一个说法,永远把人当成目的,而不是当做工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自私地把别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康德对美学理论的影响同样巨大。在让艺术成为独立领域这一点上,康德是与浪漫派异曲同工。在这位科尼斯堡的智者看来,美不是像古典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客体,它存在于观看者的心目中。我们认为什么是美的,其判断标准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中。它是我们的思想素质的一个既定部分或者说先验部分。康德认为这些标准不是随意性的,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由某种特殊文化环境所决定的。他认为,就像科学知识和道德价值一样,这些标准也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先验理性。它们应该是不分时空、人所共有——尽管这些标准存在于本质领域,因而难以确认。不管怎么说,美学领域是自律的;它与道德领域和科学领域一起,组成多种考察事物的方式,但各成畛域,各自产生出各自的真理。

有人说康德是一个破坏者,因为他让一切都取决于主体,因而打破了传统的确定信念,颠覆了客观真理。或者说他是以一种“颓废派”方式,重形式轻内容,重意识轻客体。(莱昂·都德<sup>[1]</sup>,说他是“鬼才”,应该对整个“愚蠢的19世纪”负责。)但是,在康德自己看来,他一直是在努力把理性从武断的主观主义下解救出来。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在这个现代重大思想革命中,康德是新旧两种世界观之间的过渡人物。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康德给后人留下了未解之谜。

康德的未加以弥合的二元论让人们觉得世界似乎是分裂的。人们大多对此不太满意。他的“批判哲学”(需要重申,它只是一种批判分析,而没有创造一种“体系”。)可以被许多不同的体系当做出发点和基础。有些康

---

[1] 莱昂·都德(Leon Daudet, 1867 - 1942年),法国作家。他是著名小说家阿尔方斯·都德的儿子。

德派学者忘记了物自体,要么成为唯心主义者,主张世界完全是精神产物,要么成为实证主义者(现象学者),声称我们不可能认识终极实在,因此应该满足于对我们的观察结果进行整理和编排。还有一些人沿着浪漫主义或神秘主义方向推进康德的本体论思想,强调宗教直觉或艺术直觉在以非理性主义方式触及深层隐秘实在时所起的作用。虽然康德本人谈不上是一个浪漫派,但浪漫主义运动恰恰始于他潜心写作,试图把自己的不同思想混合起来之时。在德国哲学中,康德的直接继承者费希特和谢林试图寻找一种统一原则,把不同的思想领域,即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结合在一起(参见后面的论述)。

当然,大多数人不可能仔细探究这位伟大哲学家的思想。许多人一直认为他是极其晦涩难懂的,甚至是根本无法理解的。然而,康德是真诚地希望他的作品能让普通人看懂(这是卢梭主义的一部分),他也确实给专业哲学家之外的许多人留下了虽然模糊却深刻的印象。<sup>〔1〕</sup>他成了“思想者”的原型和典范。这个谦谦君子确有某种令人惊奇之处:他住在一个不太有名的大学城,习惯于恬静淡然的生活,从未想迈出城池一步。这样一个人竟然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向乃至人类的历史。19世纪末,才30岁时就名利双收的南非将军扬·史沫资曾决定引退。他说:“我喜欢安静地坐着,喜欢给我的桔树浇水,喜欢研读康德的批判哲学。”喜欢思考的人大概都有这样一个梦。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写道:“我的这本书只不过会在这个人类认识领域中引起一种全面的思想变革。”这并非妄谈。他的“哥白尼式革命”主要体现为,把舞台从精神之外转移到精神之内。人的精神是具有创造性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不是孔狄亚克所说的石蜡,<sup>〔2〕</sup>而是能动的主体给自然界赋予了规则。创造性的精神不仅在文学中而且在科学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提出假设,探究性质;纯粹的经验主义是拙劣的科学方法。一个人作为本体之物乃是一种有高贵尊严的生物。康德的政治思想虽然可能不是他的理论中最强的方面,但是它强调自律的道

---

〔1〕 威廉·布施是一位儿童流行诗歌作者。他创作的《麦克斯和莫里茨》(1865年)是相当于《爱丽丝漫游记》的德语作品。他在自传中写道,他虽然不懂康德的思想,但为之倾倒。他说,康德的作品使他对心灵中的秘密之处产生了好奇心,“人的心灵居然有那么多隐秘之处。”——原注

〔2〕 孔狄亚克认为,感官接受知识正如“石蜡能够记录印记”。

德主体的尊严,主张人应该是自由的,应该被视为目的而不是工具,因此对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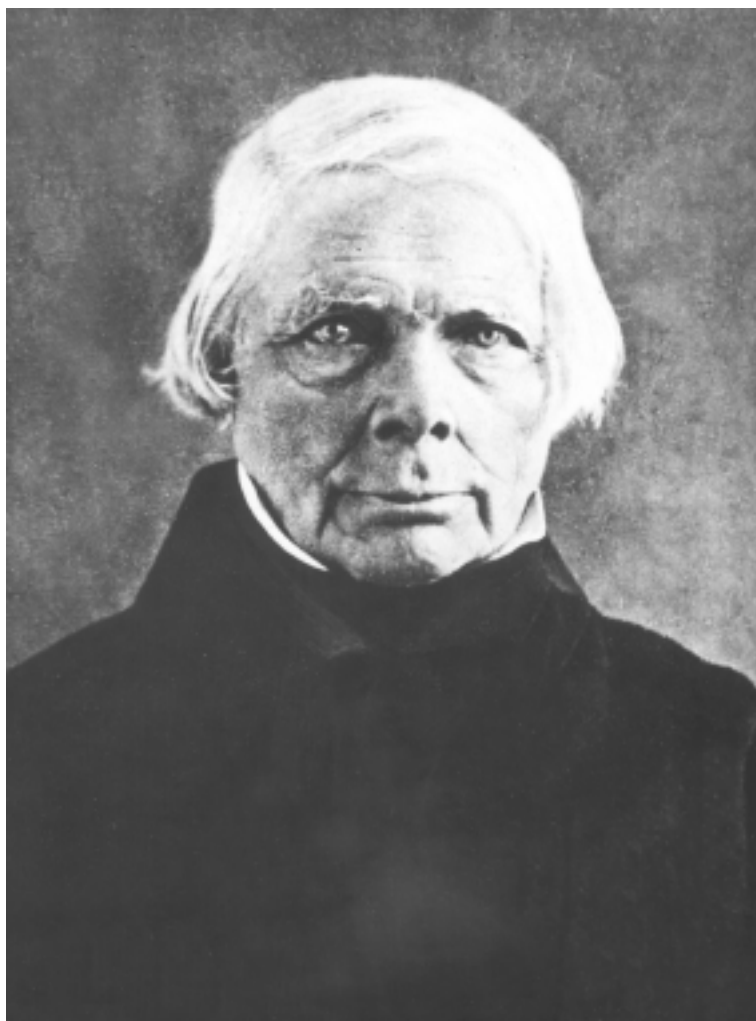
## 后康德时代的哲学家

德国哲学的黄金时代开始于康德,结束于半个世纪后的黑格尔。在此期间还有几位杰出的思想家,其中最重要的是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费希特读了康德的著作后极其兴奋,自动担任康德哲学的主要阐发者。与这位科尼斯堡人(指康德)相比,费希特具有更大众化的眼光。1799年,他因触及宗教而被耶拿大学解职。后来他写了《致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是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里程碑。费希特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浪漫派;他认为,哲学应该是一门严谨的科学。但是他鼓吹唯心主义哲学,把康德的模棱两可的观点转到这一方向上。宇宙包含着一个绝对自我,我们自己的意识不过是其一部分。这种绝对自我是一种独特的、自由的活动;它竭力在完全的自我意识中实现自己;它是整个自然界的基础。

这种世界观虽然是用德国形而上学的常见晦涩术语表达的,却极其引人注目,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类意志或意识的激进看法,即把它说成是宇宙的中心,是宇宙所包含的绝对精神的一种表达。我们是以我们的意识作为出发点。它是一种由本能所确定的东西。它逃避我们的思想,因为它不能被对象化(试想像一下能否把你的意识当做你的思想的对象)。理性本身只能是这种人类主体的发明,因此被费希特视为一种能动的想像。费希特通过把万物都归于绝对精神的名下来克服康德的二元论,因此他比他的老师走的更远,认为世界不过是人的灵魂或者人的想像的放大。他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辩证原理,即正/反/合。这个原理被一些人误以为是黑格尔提出的。在费希特看来,精神沿着这种辩证法而展开。纯粹主观的自我首先要确立一个对立的“非我”,从而开始辩证的进程。在现代心理学者中被视为新颖的东西,有许多早已出现在费希特那里了。他是一个热烈、有说服力、但有些散漫的思想家——黑格尔曾经嘲笑他。但是在普及浪漫主义关于自由创造想像的观念方面,他的贡献超过任何人。

谢林是费希特的弟子、黑格尔的朋友和同事。他对黑格尔有很大影响。他在1797年到1802年间源源不断地发表著述,创立了他所谓的先验唯心主义。他比费希特更强调自然界是绝对精神的客观形式,并且指出了

后来黑格尔在许多方面遵循的道路。谢林思想最引人注目之处,尤其是与浪漫主义相关之处,可能是他把艺术创作说成是最高的人类成就。正是在艺术创作中,绝对精神的两种形式,即有意识的力量和无意识的力量融合成了一个合题;正是在艺术中,无限通过有限的形式表现自己。当艺术家运用自然之物塑造某种东西时,例如米开朗基罗雕刻一个作品时,主观精神(米开朗基罗)和客观自然(大理石)合而为一。浪漫派诗人当然会如饥似渴地汲取谢林的思想,因为他给艺术提供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形而上学基础。浪漫主义把诗人推崇为先知,用谢林的话说是“被亏待的人类立法者”——这种做法与谢林的思想有密切关联。柯勒律治以及稍后的托马斯·卡莱尔把这种德国形而上学引入英国诗歌。谢林后期反对黑格尔的极端的理性主义,提出了某种存在主义的萌芽思想;他影响了克尔恺郭尔,后者19世纪40年代在柏林听过他讲课。谢林逐渐转而反对所有抽象的、概念化的思想,将其斥之为“否定哲学”,认为它们低于具体的、存在的实在。



谢林(1775 - 1854年)

他对宗教神话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如卡尔·容格以及我们今天的一些人。

德国哲学的洪流持续到伟大的黑格尔。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黑格尔。这一洪流在19世纪、尤其是上半叶的欧洲思想界冲出了一道宽阔的路径。直到19世纪末,专业哲学几乎都受到它的支配,只能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做出选择。但是德国哲学并不只想在哲学系占据一席之地,而是有着更大的诉求。19世纪中期以前,把这些主题变成专业问题的进程仅仅是开始。德国哲学提供了取代宗教的哲学,用绝对精神取代基督教的上帝。这种新

宗教比基督教更富于人道主义。人在其中的位置几乎相当于上帝。绝对

精神看上去几乎就是放大的人的自我。人的意识反映和参与了这种神性。人类的艺术和道德经验实际上是存在于人并通过人发挥作用的宇宙力量。德国的唯心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产生了在19世纪彰明较著的“泰坦精神”。但是,在一些人看来,这种泰坦精神极其危险。诗人斯温伯恩<sup>[1]</sup>呼喊:“光荣归于至高无上的人。”

## 浪漫主义的起源

浪漫主义常常被认为始于卢梭。还有一些18世纪的作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偏离理性、中庸和秩序这些古典规则,也被认为具有某些浪漫主义因素。他们喜欢怪诞、原始、神秘等等能够唤起崇高美来对抗秀丽美的东西。富人们为自己搭建人工的荒野废墟;来自北美或南太平洋的“高贵野蛮人”在欧洲的画室里备受优待。“哥特小说”因其所描述的恐怖住所和邪恶鬼魂而风靡一时。这种“狂野”事物在18世纪大量出现,或许过去也一直如此。(中世纪人们喜欢想像森林中或深水中的怪物。)比较文雅的诗人们托马斯·格雷和威廉·柯珀<sup>[2]</sup>被归入“前浪漫派”,因为他们情感内省,而当时时兴的就是“温情的人”。我们提到过年轻歌德的伤感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催人泪下方面足以挑战卢梭的小说。狂飙突进运动中席勒早期的戏剧就包含着歌颂黑道生活的《强盗》(1781年)。

在法国,启蒙理性主义势头更为强劲。如前所述,拿破仑是它的支持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约瑟夫·卡尔·施特德勒作,1828年。  
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歌德引导德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探求生命中的创造力。

[1] 斯温伯恩(Swinburne, 1837 - 1909年),英国诗人。

[2] 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6 - 1771年),英国诗人。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 1731 - 1800年),英国诗人。

者,鼓励观念学派,直到最后才像蔑视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唾弃他们。但是,凭借着夏多布里昂的有力参与,法国的浪漫主义脱颖而出。夏多布里昂是当时的文学领袖。他的《阿塔拉》和《勒内》以新大陆的森林为背景,浸透着浓厚的宗教精神,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夏多布里昂的生活本身就活力四射,在风花雪月中游移于文学和政治之间,极富浪漫色彩。夏多布里昂是其后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之父,而卢梭是它的鼻祖。

在英国,年轻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和威廉·华兹华斯正在尝试一种新的诗歌,使他们颇有一种革命者的感觉。在世纪之交,他们与诗人预言家威廉·布莱克一起开创了英国的浪漫主义,但是有一段时间它还不为人知。布莱克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天真之歌》(1789年)和《经验之歌》(1794年),但许多年都未引起注意。进入19世纪很长时间,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图案设计师和版画家,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诗人。拿破仑战争打断了文学活动。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致力于撰写政治小册子,而夏多布里昂则被迫流亡。但是浪漫主义在德国却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柏林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他的哥哥奥古斯特·施莱格尔,德累斯顿的诺瓦利斯和耶拿的谢林这一伙人自称浪漫派,并传播对于这一运动极其重要的哲学思想。施莱尔马赫的神学(1799年)和贝多芬的音乐(自1800年起)标志着这一时期浪漫主义富于创造力的青春期。德国的浪漫主义一直是这一运动的中流砥柱,不仅在哲学里结出硕果,而且用源源不断的文学作品风靡一代人。让·保罗·里克特被称作德国的卢梭,成为青年人崇拜的一个偶像。

浪漫主义的更大胜利还在后头。它的影响在1810年到1830年达到顶峰。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开始获得声誉,并且与雪莱、拜伦和济慈一起形成自莎士比亚以来最著名的英国诗人群体。他们都被称作浪漫派。拜伦勋爵成为一个奇迹般的文化英雄。1812年,他“一夜成名”。在伦敦,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消息也比不上《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前两章出版所造成的轰动。1816年,他因丑闻(通奸加乱伦)而离开英国之后,他的名声远播欧洲大陆。若干年后,普希金通过俄文版、马克思通过德文版读到拜伦的诗篇。稍有一点近代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他在意大利极尽声色犬马之娱后,为希腊独立而献身。他死于1824年,时年36岁。丁尼生<sup>[1]</sup>说,整个世界因拜伦之死而黯然。但是,在饱经生与爱的疯狂后,牺牲年轻的生命,这

[1] 丁尼生(Tennyson, 1809 - 1892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诗人。



够多么浪漫！或者，如普希金所说，宁为雄鹰痛快一时，不作乌鸦苟活百年。<sup>〔1〕</sup>

出生于瑞士的斯塔尔夫人是一个魅力非凡的女人。她写作、恋爱、与拿破仑唇枪舌剑，并于1813年发表《论德国》，将德国浪漫派介绍到法国。拿破仑垮台后，从1820年到1830年，法国被浪漫主义所征服。1820年，席勒的剧作《玛丽·斯图亚特》（写于1801年）倾倒了巴黎；1830年，雨果的剧作《欧那尼》引起了法国戏剧史上最激烈的争执。雨果和拉马丁以及小说家大仲马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公认领袖。他们是当时最著名也最杰出的作家。与此同时，画家德拉克罗瓦为首的画派也自称浪漫派。此外，还应数上司汤达、缪塞、奈瓦尔、乔治·桑、维尼<sup>〔2〕</sup>、巴尔扎克，当时肖邦和李斯特也在巴黎。“1823年到1835年这十几年是法国的文化启示录”（杰弗里·哈特曼<sup>〔3〕</sup>）。法国浪漫主义的力量有时被人们低估了。要知道，在这个具有强大的古典主义传



斯塔尔夫人

统的国度里，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抱残守缺的法兰西学院5次否决接纳雨果的提案。最后一次是在1836年。古典派和浪漫派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使得戏剧表演季节总是生气盎然。1829年，法兰西学院谴责浪漫主义“搅乱我们的规则，冒犯我们的杰作，败坏大众的舆论”。即使在浪漫主义的高潮时期，18世纪的古典主义和洛可可趣味依然十分流行。

在英国，济慈的朋友认为，刻毒的文学保守派对他的夭折负有一定的

〔1〕 这句话出自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中普加乔夫之口。

〔2〕 维尼(Alfred de Vigny, 1797 - 1863年)，法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

〔3〕 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耶鲁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

责任。最伟大的德国文学家歌德早期对浪漫主义贡献重大,晚年却宣布古典主义是健康的,浪漫主义是病态的。“压制肉欲、培养智力、维受理性的优势,这一切又有何益?想像力就像最强大的敌人,伺机而动。”)顽固的古典主义者始终存在,而且在浪漫主义时代,还出现了古典主义复兴的迹象。如果说浪漫派到1830年已经收获了大部分成果,那么他们到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就遭到了新一代的毁灭性攻击。后者指责他们过于煽情和夸张。

然而,从1760年到1840年这一更大的时段来看,欧洲确实受到了某种崭新的、激动人心的和颇受争议的东西冲击。我们还没有界定它,只是在指出它的几个标志时提到它的一些特点。实际上,浪漫主义的定义是很难把握的;有人宣称,无法定义浪漫主义简直是这个世纪的耻辱。浪漫主义这个词具有许多含义,其中一些还是相互矛盾的。夏多布里昂的浪漫主义是天主教的和保皇派的,而雨果的浪漫主义(虽然最初是保守的)却是共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甚至是革命的。既有战斗的浪漫派,如拜伦为希腊而战斗,马志尼为意大利民族主义而奋斗,也有退隐田园的浪漫派。浪漫派敢爱敢恨,打破传统的道德界限,但是18世纪以及其他世纪都有这种现象。浪漫派关注中世纪,把中世纪从启蒙运动的讥讽中解救出来,但是他们也崇敬和赞美“古典古代”的昔日辉煌——“美丽的希腊,悲惨的废墟”。<sup>〔1〕</sup>

为了解开这堆乱麻,有人提出,不仅存在着一种浪漫主义;这个术语“变成了一个标签,被用于表示五六种彼此之间只有某种偶然联系的东西”(克里斯托弗·道森<sup>〔2〕</sup>)。喜爱大自然,把直觉视为真理的来源,注重表达情感,把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这些观念和时尚实在同一时期突然冒出来的,都被塞到一个笼统的名义之下,但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洛夫乔伊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表示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应该使用浪漫主义这个词的复数(romanticisms),而不是这个词的单数(romanticism)。后者“已经表示许多东西,因此单就它本身而言,它已经没有意义了”。从这种唯名论的观点出发,人们可以走的更远。就像我们今天这个高度专业化的时代里许多文学研究者那样,人们可以把一切标

〔1〕 这句诗出自拜伦《哈尔德·哈罗德游记》。

〔2〕 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 1889 - 1970年),英国天主教历史学家。

签都抛弃掉,只考虑单个作者和单个文本。当精力都用于解释柯勒律治的一首诗上时,就没有时间费神考虑什么“浪漫主义”了。

但是,一个时代的情绪可能真的不那么合乎逻辑。而且,当时的欧洲各地确实有一种普遍的情绪,人们需要用一个词来加以表示它。很可能,“这个难下定义的词就是最本质的表达”(G.K.切斯特顿<sup>[1]</sup>)。像爱情、善、蓝色这些无法通约的事物是无法定义的,只能表示出来。如果我们过分追求一种狭窄的浪漫主义定义,我们就可能忽视一个虽然不那么明晰却十分重要的现实,即这个时代的精神或这个时代的语言。它表示出人类意识的深刻变化。用来概括一个时代的一般性术语都有类似的问题,例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维多利亚时代风尚、现代主义等等。但是我们需要这种术语,以便于赋予文化现象以统一性。即便它只能部分地表示表面上的统一性,它作为一种理想类型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历史。

## 各种不同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对启蒙运动的一种反抗。启蒙运动是一场强大的、广泛的精神和思想运动,但最终耗尽了人们的支持,引发了一场反革命运动。启蒙运动推崇理性主义、古典主义、唯物主义,不喜欢强烈的激情、主观性和混乱无序。它追求澄明,力图消除神秘。到头来,它变得乏味、单调、沉闷。它的强调个人利益和快乐主义的伦理学看上去猥琐庸俗,毫无英雄气息。(伏尔泰说,他不喜欢英雄,英雄太吵闹了。)

因此,浪漫主义时代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卡莱尔宣称:“我根据我本身的经验宣布,世界不是机器!”针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伯克宣称,理性不过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且绝不是最大的部分”。柯勒律治补充说,纯粹的“算计能力”低于“创造性的素质”(当然这里隐含着康德哲学和后康德哲学的影响)。启蒙哲学家攻击传统的基督教,提倡“自然神论”或理性宗教,实际上把上帝看成一个机械师。浪漫派则反其道而行之,陶醉于各种神秘事物。夏多布里昂说,没有比神秘事物更让人开心的了。(浪漫派的宗教信仰也免不了有自己的异端,即泛神论倾向或者说用一个伟大的世界灵魂取代基督教的上帝。)在理性时代,宗教信仰不过是一种礼节性的行为而陷入

---

[1] G.K.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1874 - 1936年),英国评论家、诗人、散文作家和小说家。

沉寂；它现在重新受到青睐。

在文风方面，浪漫主义反叛束缚戏剧和诗歌的清规戒律；它是“一次反抗古典主义旧传统的起义”。雨果对悲剧规则的破坏，导致了古典派对《欧那尼》的愤慨。浪漫派宣称，每一出戏都可以有自己的规则，而无须遵循支配所有戏剧创作的公式（例如时间、地点和清洁的三一律；英雄必得高贵；各种诗体有相应的格律）。浪漫主义不太循规蹈矩，而是提倡一种更个人化、更私密的情调，即卢梭开创的那种情调，仿佛促膝谈心，而不是振臂高呼。在18世纪，诗歌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这种高雅的文学形式“受格律压迫，越雕琢越孱弱”，似乎无法表达真情实感，正如约翰逊博士（他本人谈不上是浪漫派）指出的：<sup>〔1〕</sup>

环视诗人，一片肃杀之气，  
空论喧嚣，激情沉睡。

虽然黑兹利特对新诗不无批评，但是他承认：“到上个世纪末，我们的诗歌已经蜕变成最陈腐、最平淡、最机械的东西了。”因此，浪漫派诗人决心袒露自己的灵魂，散文作家决心宣扬离经叛道，或许做的有些过分了。

同样，民间文学也吸引了浪漫派，主要是因为新古典主义规范不愿意认真看待平民百姓的东西。浪漫主义这个词就源于中世纪的“罗曼司”。传奇故事被称作“罗曼司”是因为它们是用当地方言而不是拉丁文写的。在很长时间内，所有的严肃写作都必须使用拉丁文，否则就会被打入另册。现在，像赫尔德这样的民俗学家致力于搜寻“农民的简朴民谣”。华兹华斯认为，他自己正在用乡间的质朴语言写诗。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法国革命民主的民族主义也有这样一个因素。浪漫主义在某些重要方面也是对贵族统治的民主反抗。旧制度渗透着等级意识，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就反映了这种意识。任何事物都应该处于一个完美体制中的固定位置上，承担不同（也不平等）的角色。正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段著名文字所警告的：

---

〔1〕 出自约翰逊博士的著名《辞典》中对“罗曼蒂克”的定义：

1. 类似于传奇，狂野……
2. 不可思议，虚构。
3. 想像：充满荒野场景…… ——原注

“秩序一旦废除,琴弦一经松懈”,<sup>〔1〕</sup>整个结构就会坍塌。点错一个句号,就会导致国家毁灭。新古典主义的衰落是与整个(在理论上)结构严密的旧社会制度的衰落密切关联。

在18世纪,人们追求常识和中庸,似乎遗忘了理想。浪漫派通常蔑视这种粗鄙的物质主义的伦理。卡莱尔讥笑道:“灵魂丧失,但胃口极佳。”萨克雷说,那是一个饕餮的时代。此时所有的人都嘲笑“洛克这种人”,即稳健的公民,仅以毫无光彩的“幸福追求”为目标。浪漫派反感这种快乐主义,从而采取了某种高姿态。但是拜伦在《唐璜》中同时也嘲笑了主人公的疯狂冒险。

中世纪的风格卷土重来,因为鄙视教士统治和歌特式建筑的理性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时代此时结束了。爱德华·吉本曾经说,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矗立着“我所见过的最糟糕的建筑”;数十年后,约翰·罗斯金宣布,它是最美丽的人类造物(《威尼斯之石》)。法国革命开始推倒哥特式大教堂“这种僧侣迷信的堆积”;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浪漫主义时期则出现了哥特式建筑的复兴。在18世纪,诗人托马斯·沃顿认为但丁的《神曲》“不堪卒读”,伏尔泰的一个信徒说它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诗。但丁在英国享有的盛誉是由布莱克、拜伦、雪莱和柯勒律治造成的,并且得到维多利亚时代人的热烈附和。

同样,对高山森林等野外风光的爱好,也是浪漫派对新古典主义的反抗,因为新古典主义讨厌那种不规则的事物(阿尔卑斯山被认为是极其丑陋和粗野)。卢梭的《一个孤独者的漫步遐想》开创的风格传递给拜伦、夏多布里昂乃至拉马丁的《沉思录》。众所周知,大自然对华兹华斯和亨利·大卫·梭罗时多么重要。这种对自然的亲近使我们看到浪漫主义更积极的方面;德国的哲学唯心主义给它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华兹华斯在他的诗中表达了这种泛神论的精神:

〔1〕 出自莎士比亚《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

……一种崇高的感觉，  
那是某种深深地浸入的东西，  
它存驻于落日余晖  
四望无际的海洋和流动的空气  
湛蓝的天空和人的心灵；  
一种情绪、一种精神推动着  
所有思索者，所有被思索者，  
它翻滚涌动，无所不至。

这种把实在基本上看做是精神的观念基本上出自于德国哲学。德国诗人诺瓦利斯、里克特和荷尔德林把这种抽象的哲学翻译成具体的诗意象征。柯勒律治则把它们引入英国。许多人开始或多或少地持有这种唯心主义浪漫派立场，也就是说，我们会在自然中看到上帝或某种更高的存在，并且与之交流，感到它与我们心灵有一种根本上的亲近。在卡莱尔的第一部作品《旧衣新裁》（《衣裳哲学》）可以看到比较通俗易懂的浪漫派唯心主义。这位文笔生动的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的感官所能认识的、我们的科学所能探索的外部世界，只不过是表象。而实在是神圣的和无法看见的对应物，它与表象相对，正如灵魂与肉体相对。”

从1820年到1840年，超验主义成了法国和美国文人中的口头语。美国哲人爱默生是它的代表人物。这种鲁莽的理论会告诉人们：一切“表象”，例如社会习俗都是欺骗；只要敢于寻找自己的自我并付诸行动，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圣贤。它很接近于神秘的泛神论。后者是基督教早就痛恨的异端，主张人们只要有身心陶醉感，就能直接与上帝交流。它往往以新柏拉图主义为依据；布莱克的神秘主义就可以回溯到这一来源。柯勒律治声称，他在阅读德国人的著作之前就已经在古人的作品中发现了神秘主义。当时对印度宗教哲学传统的发现也影响重大。埃德加·基内<sup>〔1〕</sup>于1841年写道，“东方的泛神论，被德国人改造之后”，导致了他所说的“东方文化复兴”。（其实，印度教经典的发现和翻译主要应归功于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即威廉·琼斯爵士和安基提尔-杜佩隆。）

---

〔1〕 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 1803 - 1875年), 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艺术家和诗人在创作中尤其感受到这种“无限的精神”。艺术家依靠自己的直觉“在一刹那间获取真理”(柯勒律治),而且是比实验或分析结果更深刻的真理。诗歌意象是自然的象征,是诠释现实的钥匙。浪漫主义的幻想 - 宗教因素可以在英国预言家诗人和艺术家威廉·布莱克的作品中



威廉·布莱克的画作《上帝》

《上帝》是《欧洲,一个预言》的扉页插图,代表了布莱克关于创造性天才灵威的观点。

看到。布莱克一本正经地把自己的思想与宇宙精神等同起来。<sup>〔1〕</sup> 他相信,诗人和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成为宗教先知,赋予古老的宗教真理以新的意义。布莱克早在19世纪后期象征派出现之前就已经是一个“象征派”,早在卡尔·容格之前就发现了“无意识的原型”。他给众神起了新的名字,并且声称要在英国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他的那些令人难忘的天真烂漫的歌曲触及到永恒的宗教和道德经验。

浪漫主义的宗教信仰不仅出现在伯克的著作中,而且出现在瑞典预言家伊马努尔·斯维登堡的作品中。斯维登堡生活在18世纪(卒于1772年),身后留下了一个“新耶路撒冷教会”教派。在英国至今还有一个斯维登堡学会;在美国,这个学会也有相当势力。德国浪漫派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论宗教》,1799年)力图把基督教从教条变成人的内心体验,把字面上的信仰变成具体的人的生活状态。在19世纪,这种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基督教融合起来,剔除圣经本本主义,认为基督教的根本真理比圣经的文字表达更深刻、更广阔。浪漫主义神学强调以内心情感经验作为衡量信仰的标准,从而与福音派的和虔敬派的基督教复兴相互呼应。当然,旧的教派依然活跃,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德国莫拉维亚教会和英国贵格派的影响下沉迷于宗教。

卫斯里的循道宗和德国的虔敬派都始于18世纪,但到了这时变得更加强盛。英国教会内部的福音派运动乃是对18世纪教会过于宽松的一种反弹。它在18世纪末兴起,对于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产生很大影响。稍后出现的牛津运动(19世纪30年代在牛津大学盛极一时,直到1845年发生著名的约翰·亨利·纽曼“叛教”转向罗马的事件)重视学理、讲究形式,整体上是反动的。它的浪漫主义表现为对仪式、神秘事物和历史传统的喜爱。牛津运动成员之所以反对当时占据主流的世俗自由主义,原因在于他们不喜欢它的浅薄的唯物主义。约翰·基布尔、E.B.普西等人聚集在纽曼旗下写了大量诗歌和论文,该运动因此而得名。有些牛津人跟随纽曼转向天主教,但是多数人继续支持英国教会中的“高教会”。浪漫派的宗教就是如此多样,其共同点在于都怀有一个愿望:使宗教信仰变成热烈而有个人意义的东西,能够让体验到它的活生生的存在。在这一点上,与新教福音派信徒和斯维登堡派泛神论者一样,转向天主教的纽曼也是一个

---

〔1〕 可比较法国浪漫派诗人热拉尔·德·奈瓦尔的说法:“人的想像力所发明的东西无一不是真的,无论是此岸世界的还是彼岸世界的。”——原注



“存在主义者”。

## 浪漫派的政治观念

浪漫主义在政治上是暧昧的。它与法国革命在时间上重合,因此不可避免地与此一重大事件相互作用。最初,大多数浪漫派都欣喜若狂地欢迎革命。当华兹华斯在巴黎街头与法国人跳舞时,他们在精神上与年轻的华兹华斯同气相求。然后,他们转而反对革命,倾听伯克发表的浸透着浪漫主义情感的大控诉。革命之所以失败,或许就是因为它太受制于18世纪理性主义这一反动信条。多数浪漫派都把作为特殊历史事件的法国革命与它所片面地体现的更广阔的历史潮流区分开来。他们相信人类正在前进,也不希望返回到革命前的旧制度,但是他们认为,革命错误地以启蒙运动的唯物主义为依据,因此堕入了玩世不恭的物质主义。托马斯·卡莱尔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法国革命史。他认为,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革命(至少到拿破仑之前)没有产生什么“伟人”。但是这位英雄崇拜的鼓吹者也谴责旧制度,因为它也没有提供振奋人心的领袖,而这正是衰落的明确标志。浪漫派可能像华兹华斯那样对人类尽善尽美的前景保持一种葛德文式的天真信念,但是他们也相信,只有人民发挥自身意识的潜力,而不仅仅是通过政府体制的变革,这个乌托邦才会实现的。

柯勒律治在政治上的反复可以说是很典型的。他对政治很感兴趣(在1789年前夕的英国,许多人怀有政治改革的方案和希望),最初对法国革命也欢欣鼓舞,曾写下一首欢呼攻占巴士底狱的颂歌。但是,他在1798年写的《法兰西颂》记录了他的失望。他认为:“在伯克先生的著述中可以发现几乎所有政治真理的萌芽。”但是他也认为,伯克对革命的仇视失之偏颇。柯勒律治认为,公共政策需要坚实的道德基础,康德的绝对律令——人不应该被当做物——可以成为这样的基础。他反对经济个人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认为后者是“庄重的谎言”。在浪漫派政治思想中,社会是神圣的,是由神秘的纽带维系着。柯勒律治拥护这种社会有机论。

在19世纪初我们看到,浪漫派的政治思想与保守派的意识形态交融在一起,而后者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宪政主义的敌人。我们在下一章会进一步地讨论这个现象。在英国浪漫派诗人行列中,另外一些重要人物也表现出浪漫主义在政治上的暧昧。如果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最终成为托利党人,当时最受欢迎的诗人拜伦则是一个贵族革命家。他为捣毁机

器的卢德派辩护,对反叛者大书特书,在希腊起义中捐躯。但是,纵观拜伦的一生,我们会发现,当他要求“美酒和女人、欢乐和笑声”时,也就差不多袒露了他的思想。拜伦式的反叛者只不过是一颗高傲而忧郁的灵魂,他宁肯选择孤独,也不喜欢他的同胞——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在任何实际政治活动中能否获得成功。雪莱就被马修·阿诺德<sup>[1]</sup>称为“美丽而无用的天使”(最近一些传记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雪莱也不时地大呼造反:

英国人,你们为什么耕作?  
是为了那些杀死你们的老爷吗?

但是他更多地沉浸于诗歌和美色。这些诗人中最伟大的是约翰·济慈。他根本就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他最感兴趣的是夜莺。

有的研究者指出:“浪漫主义培育了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向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种乌托邦”(W.V.穆迪和R.M.洛维特)。确实如此,至少有些浪漫派是这样的。但是其他学者(C.格拉纳)的论述也同样正确:“浪漫主义包含着政治传统主义的复兴,有时是提倡新的封建制度,反对社会分裂,颂扬维护共同体的意识,本能地恪守仪式化的风俗。”当然,我们应该考虑到其他人的情况,如济慈和缪塞。他们根本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

我们应该如何调和这些差别?一方面,柯勒律治反对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法案,另一方面,雨果战斗在街垒上。二者之间似乎有天壤之别。<sup>[2]</sup>我们可以这样说,尽管政治方向各有不同,但是这个激荡时代造就了一种共同意识高涨。甚至济慈也意识到一种迫近的气氛或者说大变动(“伟大的精灵正在地球上逗留”),尽管他没有认同任何一种政治信条。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一文中指出,凡是经历过恐怖时期和跟随拿破仑拖着带血的双脚在俄国雪地上跋涉过的人(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本人就有这种经历),再也不会被冷静克制的古典主义悲剧所打动。无论有多少种选择,对于浪漫主义时代的人们来说,浪漫主义是一种令人激动的事物。

[1]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 - 1888年),英国诗人、评论家。

[2] 前苏联一位历史学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区分两种浪漫主义:一种是好的、进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一种是坏的、消极的或反动的浪漫主义。但是这种办法于事无补。——原注

与众不同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浪漫主义与政治的关系。他恰恰是在拜伦捐躯一年后(1825年)去世的,而且他是因莫斯科大火和拿破仑溃退而与拜伦在同一年(1812年)出名的。他曾在非凡的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监督下按照启蒙模式接受教育,但是在1800年以后他追随浪漫主义的潮流。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对政治从来没有很大的兴趣。不堪重负的领导责任促使他在惶惶不可终日的1812年转向一种神秘宗教。在向莫拉维亚教派和贵格派的教友请教之后,他一改自己的放荡生活方式,变得几乎痴迷般的虔诚,显得极不正统(从俄国东正教会的眼光看)。到1814-1815年,大战即将结束,胜利者集会决定欧洲的未来面貌。这位欧洲最显赫的人物却卷入与几位美丽而信奉神秘宗教的女人的风流韵事。朱莉·德·克吕登纳是一位波罗的海男爵的遗孀,年轻时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尤物。她与斯塔尔夫人、让·保罗·里克特以及其他一些文学界人士熟稔。40岁时她转向宗教,与一些新神秘主义的重要哲学家交往,如圣马丁,慕尼黑的预言家弗兰茨·冯·巴德尔。她在1815年初遇见亚历山大一世,用她的预言才能和美色使之拜倒在她脚下。他们一起设计了神圣同盟,旨在基于真正属灵的基督教建立一种新的治理国家的原则。这个乌托邦被战后的政治现实打破了,只是变成朱莉和亚历山大都没有料到的反动象征。

朱莉很快与沙皇分手,转而致力于帮助穷苦无助的人们,结果使她招致整个德意志南部地区当局的嫉恨。至少她还认为属灵的基督教具有深远的社会功用。而沙皇却陷入无所事事和绝望。他是在1825年去世的(谣传说他是伪装去世,后来以一名西伯利亚神父的身份现身。这当然是一个浪漫故事。列夫·托尔斯泰却信以为真)。这个事件却成了一个信号。一些年轻军官深受法国革命和拜伦式浪漫主义的影响,发动了一次革命。当然,12月党人起义失败了。但是他留下了一笔遗产,俄国后来的革命者直至列宁都引以为训。

在俄国这种国度里,人们对国家认同尚不明确,因此浪漫主义尤其容易与民族主义靠近。彼得大帝强迫俄国实行西化;在圣彼得堡,人们说法语或德语,而不说俄语。这意味着,俄国是悲惨野蛮的,必须按照外国人的形象来改造。叶卡捷琳娜引进法国文化和观念,尽管她晚年开始对俄国民间文化产生兴趣,努力发展俄语。最早的斯拉夫派在18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后来命名的斯拉夫派说,不是人造城市圣彼得堡,而是莫斯科,才是俄国的真正心脏。在论战中,卢梭对民众文化和乡村的推崇,浪漫主义对民

俗和民族特性的喜爱,支持着斯拉夫派对抗西方派。这场长期论战永远撕裂着俄国人的性格。

## 浪漫主义的意义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学界试图寻找一个浪漫主义的单一定义,但都失败了。有人据此得出说这个术语毫无用途。(他们经常对这类术语下这样的定论,例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然而,这些术语依然流行,因为即便它们不太准确,人们却需要它们。)尽管有各种反对意见,浪漫主义这个术语还是流传下来,因为它确实可以用来涵盖1780年到1830年前后这一时期的一些明显的文化现象。或许我们应该使用若干个术语,但是我们可以维持一个提示性的术语,只是对它作更细致的区分,对它做出限定,标明它的例外。

浪漫主义革命乃是现代历史上最激动人心、最有创造力的时期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康德的哲学革命和法国革命都密切相关。在浪漫主义革命中,最基本的因素可能是主观主义。从康德的观点看,主观主义就是人的精神参与对现实的塑造。人的精神不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过去人们是从认识对象的角度来考虑认识过程;现在重心转移到主体。柯勒律治宣称,在牛顿体系里“人的精神永远是被动的,(面对外部世界)是一个懒惰的看客”。但是,这位英国浪漫派哲学的主要阐释者立即强调说:“任何以人的精神的被动性为基础建立的体系必然是错误的。”这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核心见解。正如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指出的,人的精神是镜与灯<sup>〔1〕</sup>。它照亮通往真理之路,而不仅仅是反映真理。人的精神天生具有想像力和创造性,实际上能够塑造外部世界。

许多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破坏性原则,是“颓废”的标志。健康的社会不能这样来把真理相对化。最终我们会接受尼采的观点:有多少个人视角,就有多少真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起来(对此我们在下一章里详述),也打破了社会的统一,而且从此愈演愈烈。18世纪的文学是一种社会文学,不是追求表达个人的心灵,而是力图传播共同的理念。局外人、厌世者(见莫里哀的戏剧)、怪人通常会受到嘲笑,而不会受到赞扬。现在出现了拜伦式的英雄,这种人孤独而抑郁,“厌恶人

〔1〕 见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

类”。浪漫主义开启了人群中的孤独这一现代人的命运,说得好听些是开启了个人自我发展的特权。浪漫派制造了诗人被冷酷无情的社会所毁灭的传说(如查特顿,谢尼埃<sup>〔1〕</sup>);由于“庸众”的迫害,他们“在骄傲中陨灭”,但因独立不羁而受到敬仰。那种我行我素的梭罗式个人主义者登上了历史舞台。

华兹华斯以浪漫派特有的方式写道:

窥视我们的思想、人的思想——  
我的出没之地,我的心声倾诉之地。

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唤起如此恐惧和敬畏”的了。浪漫派诗人们开始了对内心意识这个最神秘的领域展开了漫长的探索。这些作家已经散播下后来成为深层心理学的种子。弗洛伊德把歌德(以及莎士比亚)列入作为他的心理分析先驱的那些创造性作家名单。他还应该加上威廉·布莱克。今天许多人认为后者是弗洛伊德的前驱。拜伦在1820年就在思考:

如果某个道德海洋上的哥伦布  
向人类展示他们灵魂的两极

人们会用怎样不同的眼光观看世界? (“又会获得多少新鲜东西?”)《唐璜》中接下来的段落暗示,那些隐秘一旦被揭露,就会使人们对人的创造力产生新的理解。由此就开始了对人类行动动机的探寻。这是一个漫长、艰难、或许危险的探索。

浪漫派的许多重要诗作都运用穿越时空的记忆,叙述从童稚到成熟的成长过程,即自我的探险历程。“教育小说”,即关于自我发现和自我教育的小说,是一种延续到20世纪的浪漫派文体。司汤达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试图复原关于自己过去的全部记忆,为的是“推测我是哪种人”。这个小说家的真名是贝尔,用布鲁拉尔的名字写回忆录。面对深不可测的记忆源泉,他十分无奈,只得承认:“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对一个稳定自我(即“身份”)的探寻由此开始了;这种自我的基础受到浪漫主义主体的质疑。

---

〔1〕 查特顿(Chatterton, 1752 - 1770年),英国诗人,服砒霜自杀。谢尼埃(Chénier, 1762 - 1794年),法国诗人,死于断头台。

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变成 19 世纪小说的又一重大主题。

因此,正如黑格尔在其早期作品《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精神进入另外一个领域,即内心主观道德意识的领域”。洛夫乔伊认为,与启蒙运动的标准化和简单化相反,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多样性或多元论,是追求和欣赏独特和个别而不是普遍和一般。约翰逊博士曾经以古典主义的名义宣布:“我们不想数郁金香上的花纹。”而浪漫派就是想做这样的事情。19 世纪在建筑方面是折衷主义、古为今用,在艺术和思想方面是“兼收并蓄”。独立的民族文化已经各具形态。正如诗人罗塞蒂<sup>[1]</sup>所说,人类已经被划分成人们。他认为这是欧洲衰退的一个标志。从这个意义上看,浪漫主义预见到以后两个世纪愈演愈烈的思想和社会的破碎化。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满足于这样一个定义。浪漫派坚持在他们的超验哲学和他们对理想真理热烈追求的统一。如果他们看到今天“后现代主义者”欢庆价值领域的混沌无序,他们大多会感到震惊。



加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的画作  
《海雾之上的流浪者》

尽管他们之中有人陷入时髦的悲观厌世或拜伦式的愤世嫉俗,但是他们总体上是乐观主义的。他们的基调是对生活和艺术的热爱。文学评论家特里林<sup>[2]</sup>指出,济慈的书信所具有的令人愉悦的效果,是今人所无法企及的。语言的更新是造成这种效果的部分原因,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其中包含着新的启示和希望。诗人的这种冲动也扩散到其他艺术门类。萧伯纳指出:“1813 年,音乐前所未有地变成世界上最令人惊愕、最令人陶醉、最不可思议的艺术。”贝多芬和舒伯特的神奇精力传递给了后继者,肖邦、舒曼、柏辽兹。这些人的生活与音乐都是浪漫主义的。尽管有

[1] 罗塞蒂(Rossetti, 1828 - 1882 年),意大利裔英国诗人、画家。

[2] 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 - 1975 年),美国文学评论家。

布莱克、德拉克罗瓦、加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sup>〔1〕</sup>（他宣称：“画家不仅应该画他亲眼见到的东西，而且应该画他在心里看到的东西。”），但是视觉艺术似乎受浪漫主义影响较小，这大概是因为绘画和雕塑在精神上更古典，更擅长描绘安静和平衡状态，而不像贝多芬的奏鸣曲那样表达强烈情绪的汹涌推进。

无论浪漫主义思想是多么错综复杂，但是在这个时代出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几乎空前绝后的创造力大喷发。它不仅激活了语言，并且让诗歌接近了人民。法国的缪塞和雨果，英国的拜伦和华兹华斯、德国的歌德和克莱斯特<sup>〔2〕</sup>，美国的爱默生和朗费罗，苏格兰的彭斯，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所有这些名字都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这种文学深入民众的意识，提供了雅俗共赏的意象，其影响在英语里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戏剧。就俄国而言，19世纪上半叶的这一代作家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文学。

浪漫主义的平民性也表现为他们所描述的各种吸血鬼（最近一部由克里斯托弗·弗雷林撰写的吸血鬼文学史就是从拜伦的作品开始论述）、弗兰肯斯坦的怪物<sup>〔3〕</sup>以及格林兄弟的童话。狄更斯和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作家无一不是从浪漫派文学遗产中脱胎而来。

如果我们把浪漫主义时期的伟大作家和艺术家划归某个社会阶级，肯定不会成功，因为他们的社会来源十分复杂。济慈的父亲是马厩雇工管家，布莱克是服饰用品商的后代，托马斯·穆尔<sup>〔4〕</sup>是一个杂货商的儿子，约翰·克莱尔<sup>〔5〕</sup>本人是农场工人。形成对照的是，雨果的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个将军。拜伦勋爵当然出身高贵，虽然不是家族中的富有支系。巴尔扎克实际上出身资产阶级，在自己的姓前面加上“德”是为了听起来像贵族。乔治·桑的父亲是贵族，母亲出身低微；她在修道院长大，最初穿着男性服装，像个农民，而不像个女权主义者；她先嫁给一个乡绅，然后带着两个孩子跑到巴黎，写了80部小说，成了名人。她的故事是那个时代的缩

---

〔1〕 加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 - 1840年),德国浪漫主义画家先驱。

〔2〕 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1777 - 1811年),德国剧作家。

〔3〕 典故出自雪莱夫人写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同名主人公是一个学者,被自己创造出的怪物杀死。

〔4〕 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 1779 - 1852年),爱尔兰诗人、作曲家。

〔5〕 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 1793 - 1864年),英国农民诗人。

影。在新的城市文学市场上博取名利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作家成为显眼人物、当代文化英雄。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级,具有各式各样的背景。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的才能和他们的浪漫主义热情。归根结底,这就是艺术家的自我表现信条:

织一个圆圈,把他三道围住,  
闭上你双眼,带着神圣的恐惧,  
因为他一直吃着蜜样甘露,  
一直饮着天堂的琼浆仙乳。

(柯勒律治)<sup>〔1〕</sup>

---

〔1〕 出自柯勒律治《忽必烈汗》,参考屠岸译文。



# 第八章 意识形态的时代

## 1815—1848 年

### 欧洲的形势：1815 - 1848 年

1815 年以后，欧洲涌现出各种政治和社会上的“主义”。这是拿破仑战败后新旧世界方生未死时代的产物。拿破仑曾经在欧洲广大地区推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打碎旧秩序，进行彻底的革新。现在革命及其伟大的领袖都消失了。虽然大多数有思想的人都为摆脱了暴发的科西嘉冒险家而欢欣鼓舞，但是即便是最反动的人也不相信还可能回到 1789 年以前的旧制度。那么前途是什么呢？在整个欧洲，人们都感到需要静心思考，寻找新的航线。大革命摈弃了旧欧洲，但是也没有建立起一个新欧洲。从恐怖统治到拿破仑独裁，再到连年兵燹后的军事失败，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实力较量中，大革命一一落败。缪塞写道：“凡是经历了 1793 年和 1814 年的人，心灵遭受了两次重创。”他把“目前这个世纪的所有病态”都归因于这种心灵创伤。那么用什么来医治这种“世纪病”呢？

凡是经历了革命、战争、波拿巴主义政权及其失败的人有可能像司汤达的小说《巴马修道院》中的年轻主人公那样，看破红尘，愤世嫉俗。他们还有可能躲到浪漫主义文学的欢乐中，逃避公共世界，转向纯粹的个人世界。但是，寻求新的社会原则的必要性是不可回避的。从 1815 年到 1848 年，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意识形态成为欧洲各地思想界的主要关注：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一些地方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表现更突出，因为这两地都在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

一些旨在建立经济和政治学说的思想或思想体系受到瞩目。即便是

在纯哲学领域,政治的冲动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哲学家黑格尔发明了一种被许多人视为过于形而上学的体系,但是他的主要旨趣是在人类历史以及人类的政治秩序。受他影响的人很多,包括批判历史学家大卫·斯特劳斯,社会经济学家马克思以及许多民族主义者。

1815年的维也纳和约试图重整欧洲的政治秩序和道义原则,但是基本上失败了。它对各个民族和政府的安排遭到反对,起义随即发生。在意大利北部的情况最为突出。若想理解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的动荡局势,可以用这个地区来做个案研究。此前意大利曾强烈地感受到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有不少意大利人曾经对启蒙运动做出贡献(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早在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党之前,革命群体就已经在18世纪广泛传播的共济会中开始形成。拿破仑·波拿巴生在科西嘉岛,按祖籍应该是意大利人而不是法国人。他用拿破仑法典对意大利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废除了封建特权,也因此赢得了许多意大利人的支持。随着拿破仑的最终失败,所有这一切也都烟消云散,基本上回到奥地利控制下的旧秩序。维也纳会议采纳“正统”原则,使得原有的多数君主重返王位。这其中也包括意大利北部的萨伏伊王室。托斯卡纳大公仰赖奥地利人的鼻息,威尼斯和伦巴底则由奥地利直接统治。怀有理想主义的意大利青年对这种反动的和平安排极其不满。其激烈程度是欧洲其他地方所不及的。民族主义在德国始于普鲁士兵败耶拿遭受屈辱之时,此时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基于对外国统治的仇恨而高涨。

沙皇亚历山大把法国人民与拿破仑区分开来(其实大多数法国人一直拥护拿破仑)。但是,非常宽厚的和平条款是有代价的,法国恢复了路易十八所代表的波旁王朝。保皇党开始得势;甚至维克多·雨果在1820年时也是君主派。不过,很快就出现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社会主义者也崭露头角。“合作主义者”<sup>〔1〕</sup>到19世纪30年代对知识分子也有很大影响。下一次的法国革命没过多少年就发生了。它是在1830年爆发的,迫使查理十世退位。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把君主主义(但并非“正统”)与自由宪政主义结合起来的态度暧昧的政权。这个七月王朝在18年后也寿终正寝。极端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者都不接受它。它的主要支持者是大资产阶级,即大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

---

〔1〕 合作主义(associationalism)主张由各种公民自治联合组织来管理社会,既反对完全放任自由市场的个人主义,也反对国家性质的集体主义。

英国在 1832 年也发生了革命。这是和平的革命,但是在议会通过伟大的 1832 年改革法案之前,也发生了一些骚乱。通常的说法是,这次改革标志着“中产阶级”战胜了旧式贵族,但在 1832 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下院的政治领袖还是出自土地贵族。就像法国 1830 年革命一样,这次改革并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大多数英国人并没有获得选举权。不过,这次改革再加上几年后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为 19 世纪英国的社会稳定提供了基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重新分配议会席位,给新兴工业内陆地区提供平等的代表名额,从而使得这样一个飞速工业化国家的新兴企业家能够分享政治权力。

因此,也可以说,在 19 世纪上半叶,中产阶级或工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他们的社会学说取得了胜利。更广义地看,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后果是,引发了 19 世纪的三大社会思潮: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大革命把个人的形式平等或法律平等确立为社会的原则。它所推翻的旧制度是有机体式的、法团结构的、等级制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把人当做平等的个人,而是视为各种群体的成员,在一个总体结构中履行不同的职能。这种观念相当于运动队之类的团体中的流行观念。在一个橄榄球队里,如果锋线队员自称与四分卫球星同等重要,那会被视为可笑。虽然不平等,但是在理论上,每个人在这种社会中都有一个位置,老爷可以有豪宅,穷人也同样有权拥有自己的茅屋。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的 50 年间,类似托马斯·卡莱尔这样在某些方面比较激进的思想家都可能滋长对旧秩序的怀恋之情:穷苦农民与工厂苦力不同,至少还有一个庇护者。<sup>[1]</sup>

法国大革命昭示了平等和自由。人们可以自由地发展,也可以自由地挨饿。中世纪的农民根据习俗(身份)而持有土地;19 世纪的工厂工人就没有这种保障。他有可能发家致富,但他一旦倒霉,没有人来拯救他。

对于这种形势,人们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由此产生上述三种思潮。有些人认为,整个变革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他们希望尽可能地恢复 1789 年以前的秩序。他们痛恨工业主义,鄙视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认为,尊卑有序的农村社会是最好的。他们抵制地位平等和政治权利平等、

---

[1] 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一书中请读者想一想“格尔思生为撒克逊贵族塞得利克的奴隶”,虽然并非“人类极乐的一个样板……但是在我看来,他与今天兰开夏和白金汉郡的许多人相比还是幸福的,尽管那些人生来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原注  
格尔思是司各特的小说《艾凡赫》中的人物。——译注

反对成文宪法和契约关系。

如果说这些保守派是属于右翼,那么他们在某些方面也与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同气相求。社会主义者也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竞争秩序。他们宣称:“革命结束了一种不平等,但造就了另一种不平等。”新的不平等甚至比旧的不平等更难以容忍。财阀统治取代了贵族统治。法律上的平等意味着一种较量,强者和无耻者把弱者和不幸者打翻在地。新的金钱统治阶级比旧统治阶级还要坏。正如切斯特顿<sup>[1]</sup>在他那首诗《秘密的人民》中所写的,社会主义者认为,

他们把我们交到闷闷不乐的新主人手中:  
没有威严,没有荣誉,也不敢携带佩剑。

社会主义者与保守派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想回到旧制度,而是想继续前进,争取在一个新社会里实现实际上的(经济上的)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至于这个新社会的性质以及实现途径,他们的主张纷繁多样。

那些对革命取得的成果(法律平等和自由竞争)基本感到满意的人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他们基本上是所向披靡,因为重归往昔乃是不可实现的梦臆,而社会主义也几乎同样是乌托邦。因此,“中间阶级”春风得意、名至实归,尽管人们对他们所支配的社会满腹怨言。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情况都归结为社会阶级——这基本上是由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表述模式。毕竟有许多工人农民甚至贵族都赞同这种自由主义的模式,而社会主义者绝大多数都是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子弟。但是,当时发家致富的企业主却产生了强烈的阶级意识。

工厂主理查德·科布登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他说,权力应该从土地寡头手中转移给“精明而勤奋的中间阶级”。这些新人在使用蒸汽动力的新制造业(尤其是科布登所在的纺织业)中发家致富。他们小心地与位于社会上层的贵族阶级和位于社会下层的“暴民”划清界限。他们自认为不同于这两个阶层之处在于,他们兢兢业业,效率高,有道德。(有人说,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被一种不道德的共同纽带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性关系上,前者已经越出了道德的束缚,后者还没有遭遇道德的束缚。)

新兴资产阶级是严肃的、节俭的、正直的、勤奋的,按照一些批评者的

---

[1] 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 1874 - 1936年),英国文人。

说法,也是铁石心肠的。当然,他们是这个朝气蓬勃的工业革命初期的财富创造者。他们以自己的成就为荣,鄙夷那些贡献小于他们的人。“资产阶级”这个概念太宽泛了,有必要加以更细的划分。在法国,“大资产阶级”是指银行家和社会显贵组成的一个小圈子。他们是“政治上的自由派”和“社会问题上的保守派”,对较低的社会阶层毫不尊重,对民主毫无兴趣。1830年革命后,大约40个法国男人中有1个获得选举权,此前75人中只有1人有选举权。在英国,1832年改革后,5个男人中有1个获得选举权。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下层资产阶级与工人联合起来,要求实现普选权。英国避免了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产阶级下层与上层一样获得选举权。

“资产阶级”这个词在社会主义者和文学界这两个圈子里成为口头语。资产阶级的标准形象(例如杜米埃<sup>[1]</sup>的漫画所刻画的)也确有现实中的某些根据。边沁派的《威斯敏斯特评论》就把文学视为文明的赘物,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宁可让穷人挨饿,也不应搞公共慈善事业。不过,我们应该承认这个“勤奋而精明的”阶层在社会中的力量。总体上看,他们拥有完全不应受到轻视的特性:勤奋和精明。正如他们在19世纪后半叶所显示的,他们也并非远离文化界。他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财富。尽管可以说他们的天然栖息地是交易所和工厂,而不是大学和议会,但是他们在这个时代发出了强大的声音。他们的重要代言人中也包括那些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即一门锐利的新科学的创造者。



杜米埃的漫画《金钱》

伟大的法国小说家、“人间喜剧”的观察者巴尔扎克曾经指出,如果资产阶级摧毁了贵族,那么继之而来的将是资产阶级与下层人民之间的全社会大搏斗。资产阶级用来摧毁贵族统治的武器——反对特权和不劳而获、要求更多的民主和平等——显然可以被反过来用于反对资产阶级。柯勒律治在反对1832年扩大选民范围的时候,警告中产阶级说,你们不可能仅仅让自己获得选

[1] 杜米埃(Honore Daumier, 1808~1879年),法国漫画家。

举权就止步了,你们最终将不得不把选举权给予所有的人。卡莱尔警告雇主:如果不照顾好他们的工人,就将逼迫工人走向社会革命。因此“社会问题”很早就提出来了。几乎没有思想家喜欢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所扶持的新社会组织。

尽管社会主义者大加指责,但不能说新兴资产阶级完全无视穷人的福利。他们的信条是自由竞争,但是他们不能否认,“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是需要某些社会服务的。教育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证。那些年,“教师在漫游世界”。<sup>〔1〕</sup>基佐嘲笑大众,但也在1833年推行法国教育改革,其方案被称做法国初等教育宪章。这项改革虽然没有推行普遍免费的初等教育,但是它要求每一个市镇设立一所公立小学,从而启动了实现普遍义务教育的进程。从幼儿园到文科中学的德国教育体系成为普遍仿效的榜样。德国以及法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把公共教育视为灌输公民意识以及培养下层阶级严肃的工作习惯的主要手段。

年轻的约翰·穆勒在1831年论述“时代精神”时宣称:“人类的精神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时代正在孕育着变化,19世纪将作为人类精神和整个人类社会体制上的一个最伟大的革命时代而流芳百世。”所有的人都感受到几乎令人晕眩的变化。马修·阿诺德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校长。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30年等于300年的时代。”拉马丁询问:“难道我们永远不能在这个时代的海洋上抛锚停留一天吗?”社会政治思想前所未有地躁动不安,既反映了这种关切,也为1848年革命的到来铺平了道路。1848年革命所引发的大地震几乎不逊于1789年革命。在这又一次大灾变的时刻,许多人期待着被延迟的社会天国马上到来,各种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混为一团。结果又是一次明显的失败和幻灭。但是,在1848年以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依然在发展;1815年到1848年间所诞生的政治思想从此与这个世界休戚与共。

## 保守主义

上一章已经指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从伯克开始的,这一派

---

〔1〕“教师在漫游世界”(The schoolmaster is abroad),出自英国政治家布鲁厄姆勋爵(Lord Brougham, 1778 - 1868年)在1828年的一次演讲,借当时许多教师出国旅游的现象,说明教育的作用很大。

的所有后来者都受益于他的《法国革命感想录》。有人发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本身是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这个词表示的是由某个理论家精心制造出来并强加给现实生活的政治学说。但是,保守主义者通常认为,人类社会并不是这样运转的;其价值观和制度都不是在书斋里制造出来的,而是从源远流长的历史事物这一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宪法不应该是写出来的形式规则,而是存在于人民的心中,否则就不是好宪法。

领袖不是从某种选举程序中产生出来的,而是自发承认的结果。抽象的权利既没有价值又非常有害;真实的权利乃是民族历史的产物,体现在这个民族的习俗中。然而,事物的自然状态已经被党派和信条的纷争打破了。保守主义者不得不对这些新情况做出反应,因此也就迫不得已地著书立说。正如约瑟夫·德·梅斯特尔所说:“为了指引社会,思想原则重于道德原则。”

在英国,柯勒律治是以伯克的原理为出发点。虽然他没有像伯克那样完全否定理性主义在政



柯勒律治

治中的作用,但是他也与伯克一样尊崇传统,强调社会的有机体性,偏爱历史中的道德秩序。他的影响贯穿 19 世纪,成为托利开明派的一个哲学依据。应该指出,英国和欧洲的保守主义一般是反对他们的对手自由主义者所尊奉的自由放任个人主义和消极国家原则的。(这里说的是 19 世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柯勒律治主张,政府应对工厂主加以管理,政府应扶持教育,国家有责任用各种积极方式提高公民的道德和知识。据此,甚至可以说英国有一种“托利社会主义”。柯勒律治的后期思想中最有特色也

是建立新型民族教会的主张：由思想和实践的各个领域中的杰出人物来领导——不是专门的“教士阶层”(clergy),而是全部由最优秀、最出色的人组成的“知识阶层”(clerisy)来给民族指引方向。柯勒律治所主张的基督教是自由主义的,是建立在个人良知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教义或礼仪上的:这是他的浪漫主义的一个遗产。他竭力反对无政府个人主义和唯物主义,就此而言,他是保守的。他在英国国教会中的广教会派<sup>〔1〕</sup>立场,主要是诉诸知识分子。

在19世纪的英国,保守主义比自由主义更支持政府实行救济穷人的福利措施。保守主义与农村地主阶级紧密结合,当然不会赞同平等主义或平均主义。柯勒律治就反对1832年的改革法案。但是在英国工业化早期,工厂改革和其他人道主义措施的主要推动者却是一位托利党人,即沙夫茨伯里勋爵。约翰·罗斯金<sup>〔2〕</sup>是柯勒律治思想的传人。他自称是“一个激烈的老派托利党人”,对英国工业化社会的物欲横流和道德沦丧大张挞伐。柯勒律治也影响了本杰明·狄斯累利。狄斯累利可能是英国前所未有的最有文采的首相。他主张由一个民主化的保守党来引领社会改革。



托马斯·卡莱尔

罗斯金和狄斯累利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受到托马斯·卡莱尔的影响。卡莱尔可能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最有影响的社会政治思想家。我们很难搞清楚应该把卡莱尔放在思想谱系中的什么位置上。他要么是托利党人,要么是社会主义者,但也绝不是自由主义者。这位苏格兰的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是所谓的“社会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言人。在政治经济方面,浪漫主义有时推崇自由精神,赞扬造反者,同时也显示出一种卢梭主义倾向,谴责都市主义和工业主义。浪漫派中几乎没有人喜欢“黑

〔1〕 广教会派(Broad church),英国国教会内主张调和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的一部分人。

〔2〕 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 - 1900年),英国艺术批评家,详见第十章。



暗的撒旦工厂”及其老板。卡莱尔笔下的漫画式人物“下兜齿的普拉格森”<sup>〔1〕</sup>就是其中的一个。浪漫派认为,在这种非人道的生产制度的冲击下,有机的人类共同体纷纷瓦解。卡莱尔以一种极度浪漫主义的、激情四射的、极具震撼力的散文风格,宣布“社会问题”已成燃眉之急,猛烈抨击“财神福音书”,即不负责任的经济学,指斥人们用“金钱关系”取代真实的人际关系。他的保守主义倾向表现在对有机共同体的强烈偏爱,对强人领袖(“工业巨头”)的呼唤,对自私的个人主义的痛恨。

现实世界需要振兴信仰,用信仰把人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中。旧的基督教信仰因受到启蒙运动的致命伤害,正在衰亡。这个“寒彻的时代”<sup>〔2〕</sup>及其冰冷的理性主义只会破坏,不能建设。卡莱尔及其朋友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马志尼认为,他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是,创造一种适合后革命时代的新宗教,把人类从启蒙运动的唯物主义中拯救出来。马志尼宣称:“没有高尚目标的生活,不献身于伟大理想的生活,绝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行尸走肉、苟延残喘。”法国社会主义预言家亨利·圣西门早就写下《新基督教》。他的思想对卡莱尔和马志尼有很大的影响。卡莱尔的宗教是英雄崇拜,其灵感来自于模仿代表人类成就的最佳榜样。

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法国表现得最强烈。那些流亡者在1815年后光荣归来,至少在几年内主宰了思想潮流。只有极少数出类拔萃的自由主义者,包括拿破仑的敌人贡斯当和斯塔尔夫夫人,提倡立宪主义、公民自由、有限君主制和强势议会。这个阵营或许还应该包括令人敬畏的夏多布里昂。他从文人转变成政治领袖。不过,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更为突出。保守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和博纳尔伯爵。

梅斯特尔于1753年出生在萨伏伊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是卢梭的崇拜者。在18世纪80年代,他逐渐迷恋上秘教,但在教会谴责秘教之后,他就放弃了它。(在那十年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思想,包括共济会的神秘变种;莫扎特后期的伟大歌剧《魔笛》就是一个例证。)梅斯特尔作为一个外省议员,婚姻也很幸福,如果不是因为法国大革命,他可能不会在思想史上留下名字。最初他支持革命,但是在急风暴雨的1793年与雅各宾政权发生冲

---

〔1〕“下兜齿的普拉格森”(Plugson of Undershot)是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中描写的商人。

〔2〕“寒彻的时代”(Chilled age)这个意象出自华兹华斯的诗《在阿夸潘登特附近的沉思》(1837年)。

突后,他与许多人一样选择了流亡。在瑞士洛桑,他出入于前法国政府首脑内克及其才智出众的女儿斯塔尔夫人的社交圈子。他在那里见到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他开始整理自己关于革命的根源、失败的原因和重建法国的手段的思考。

当时,博纳尔在海德堡流亡。梅斯特尔在1796年写信给他说:“你与我同气相求。”他们只能等待拿破仑时代结束。博纳尔已经回到法国,而梅斯特尔则作为撒丁王国的大使前往俄国。他的主要著作是在圣彼得堡写成的。在拿破仑垮台后,他回到法国,受到热烈欢迎。他被视为复辟王朝的主要理论家。他于1821年去世。具有相似思想的博纳尔成为正统派的精神领袖,得到年轻而激烈的拉梅内等人的支持。拉梅内后来转向左翼。不过,在这些人之中,梅斯特尔的著作最为有名。

梅斯特尔的著作的一个特点是,充斥着对整个启蒙哲学的强烈厌恶之情。他希望“彻底消灭18世纪的精神”。他认为,启蒙哲学家带来了毒药,引发了革命这种病态;必须排除这些毒药,法国才能恢复健康。洛克、休谟、伏尔泰、卢梭统统是邪恶之人;伏尔泰的容貌就透露出他是受魔鬼差遣。但是,梅斯特尔还要进一步证明,在什么基础上才能遵循正确原则重建社会。梅斯特尔,尤其博纳尔,在这方面提出的见解颇具启发性,影响了许多并不赞成他们的保守主义立场的人。他们在揭示民主或自由主义秩序的弱点的同时,提出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些有益思想。梅斯特尔既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也是一个博学的学者。

这两位所谓的反动分子都清楚,返回到1788年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感到痛心,梅斯特尔只好把它解释成惩罚法国所犯罪恶的天谴。梅斯特尔不仅仅是“过去的先知”(这个妙语是为他杜撰的)。当时非常需要建立新的政治哲学。保守主义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促成这样的观点: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是历史的和传统的,而个人主义和民主都是病态,与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互为因果。世界上没有普遍的准则;每个民族都有一种适合自己的政体,在许多世代形成了一种政治文化。无视和轻视历史是政治错误的主要根源。抽象的政治理论导致了许多危害。社会是一个活的机体。用平等的辞藻来取代社会成分之间自然的有机关系,是一种疯狂的表现。契约协定、成文宪法、关于社会关系的法律规定都是虚假的,使人异化——就好像要一个家庭进行选举,制订成文准则以及子女和父母签订契约。

保守主义者认为,只有君主制(至少在法国)可以提供政治上的安全和

稳定。他们支持绝对君主制的论证现在可能已经不堪卒读,但是这个保守主义流派对19世纪思想有很大影响。博纳尔被人称作社会学奠基人;当然,这个头衔更多的是赋予奥古斯特·孔德的,而孔德深受博纳尔的影响。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是一部社会分析的开创之作,也受益于保守派作家。托克维尔显然在验证拉梅内在《论宗教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关系》中提出的假设:民主导致专制,民主崇尚平庸,民主会使人失去根柢、不敬天神、物欲横流。尽管保守主义理论家所推荐的美好社会的方案几乎没有任何成效,但是他们对这类事物的研究,对宗教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的研究,颇具启发性。德国以萨维尼为首的历史法学派就强调法律的演变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梅斯特尔的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浸透着对人类境遇的悲剧性质的深切意识。历史是一片血海,刽子手是政府的缩影;人类必须背负着某些原始的罪孽。正是这种野蛮状态要求人类必须服从权威,不可能有任何自由民主。不过,梅斯特尔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是反自由主义的:他希望在一个权力分散的社会里用传统、贵族和地方机构来制约君主,就像在旧制度下那样。梅斯特尔这样的悲观主义者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而不能接受民主,也同样不能接受专制主义。如同不能相信群众一样,也不能相信当权者。他把“绝对”君主制与无限的专制君主制加以区分。在《论教皇》一书中,梅斯特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教皇应该在国家主权和个人自由之间居中调停。这个观点没有什么影响,根本没有引起教皇的注意,但是它显示了梅斯特尔希望限制国家权力的愿望。他认为,议会民主不是法国的出路,但是他承认,议会民主也许适合英国。在法国,民主只能导致一个新的波拿巴。1848 - 1851年的事变表明,这个预言是何等准确。梅斯特尔作为一位论辩家遭到太多的诋毁,但他的罕见的洞察力和闪光的思想,使他至今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

保守主义流派最深刻的见解无疑是它的这个信念:如果丧失了原始的、种族的共同体纽带,人类社会就将毁灭。最近,本杰明·纳尔逊(美国参议员)指出:“一个建立在纯粹利己主义之上的社会……将会原子化,使人丧失归属感。”在下一节里我们将看到,正如保守主义者所说,功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等个人主义流派开始占据舞台。这些自由派宣称,自由立的个人乃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当他们得知自己的成果将归自己所有后,他们的能量就会释放出来;个人富了,整个国家也富了。但是,这种学说会导致社会意识的沦丧。社会变成了个人的集合体,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由非

人化的市场力量及“金钱关系”来控制的。这种原子化将会摧毁人类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共同体意识和人际纽带。

保守主义思想派生出一种强大的社会批评,因为他们的敌人自由主义者占据了制高点,迫使他们就像牛津的纽曼派<sup>〔1〕</sup>那样去捍卫“失败的事业和虚妄的忠诚”。他们不喜欢资产阶级的商业气息,也不喜欢大众民主。他们推崇的是贵族式的、但是对社会承担责任的社会理想。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承认自己受益于博纳尔:是博纳尔使自己懂得社会不是单纯的个人集合体,而是“一部有机的机器,每一个部件都对整体的运转做出了贡献”。尽管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许多差异,但是他们都坚持以社会原则来反对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坚持启蒙运动的信念:理性可以发明一种新的更好的社会组织。保守主义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硬要尝试,可能会造成灾难。最接近保守主义学说核心的态度,莫过于对伯克所说的“我们理性的那些难免有错而不堪一击的发明”的不信任。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都相信人们能做得更好,而保守主义者则担心人们会做得更糟糕。他们所倚重的是所谓天然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常常似乎意味着现状。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时代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稳定的秩序已不复存在。

## 自由主义

在不断变化的 19 世纪上半叶,尽管保守主义者竭力阻挡变革的潮流,但这是最没有希望的努力。而且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与普遍怀有希望的情绪背道而驰。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种繁盛局面;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的巨大创作能量和大量涌现的解决全部人类问题的种种方案就反映了这种乐观主义。切斯特顿在论述狄更斯时写道:“这是一个充满邪恶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文化巨匠,例如雨果,大多怀着浪漫的进步梦想,狂热地投身于实现梦想的事业中。除了拿破仑垮台后那几年,这个时期总体上不是保守主义者的黄金时代。他们将在 1848 年后再卷土重来。

自由主义这个术语与浪漫主义一样,始终是非常宽泛而不确定。按照

---

〔1〕 纽曼派(Newmanites)是以纽曼(1801 - 1890 年)为首的主张在圣公会内部强化天主教因素的牛津运动参与者。

普遍的看法,当时它在英国最为强劲。虽然这个词是到 19 世纪 30 年代才被正式使用,但是英国具有一种自由主义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的革命,提倡的是代议制政府和公民自由。英国自 1688 年起就再也没有绝对的王权。英国人喜欢回顾《大宪章》和《权利法案》这些里程碑,认为自己比其他民族更自由。这种信念实际上成为一种民族宗教。法国大革命的雷霆风暴使得英国在 1795 - 1820 年间限制了这种自由,导致了自 1688 年以来英国政府与人民之间最可恶的疏离关系。

1819 年,曼彻斯特的激进鼓动家在演讲时,警察与听众发生流血冲突。继之颁布了高压的 6 项法令,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受到压制,人身保护法也暂停实行。但是,这种压迫并未持续很久。1825 - 1840 年,在辉格党的推动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标志着自由主义的胜利:扩大了贸易自由(取消关税、垄断以及其他对贸易的限制)和个人自由(出版和宗教信仰),实施了政治改革(1832 年改革法案把选举权扩大到中产阶级,并根据人口数量更平等地重新分配了选区)。1829 年,《天主教解放法》的颁布和《宗教考查法》的废除,消除了政治上对不信仰国教的基督徒的歧视,尽管英国国教依然不可撼动,而且犹太人是在 30 多年后才获得类似的待遇。

所有这一切都与在“梅特涅体制”下的欧陆大部分地区形成鲜明反差。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伯爵试图控制德意志地区的政治,把出版自由视为“现代祸根”。甚至在具有自由传统的大学里,有 7 名哥廷根大学教授成为思想审查的受害者。青年意大利党的领袖马志尼甚至被瑞士驱逐出境,于 1837 年到英国避难。伦敦成为各种躲避欧陆政治迫害的流亡者的避难所。

英国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也同样引人关注。自由主义者制订了严酷的 1834 年济贫法,反对 10 小时工作日法。后者是托利党提出的,旨在禁止新兴机械化工厂非人道地长时间使用女工和童工。自由主义者中的一个最激进分子弗朗西斯·普赖斯认为,给予穷人大量的福利救济就等于“奖懒罚勤”。在大英帝国内部有一批勇敢者坚决要求废除奴隶制,但是他们大多数是托利党人。总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19 世纪初期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有点奇怪的东西。

自由主义与当时两种著名的思想体系紧密相连,而这两种思想体系也彼此密不可分。它们就是功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前者是怪才杰里米·边沁的创造。边沁早在 18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著书立说,到 1810 年他创立的学派开始显赫起来时,他已经步入老年。他对宗教冷嘲热讽,他试图凭借着简单化的人类行为理论来建立一门社会科学。这些都表明,他实质上

是启蒙运动的产儿。浪漫主义者不喜欢他；他是人们所知道的惟一个使柯勒律治怒不可遏的人物。约翰·穆勒是边沁的主要信徒詹姆斯·穆勒的儿子。他在自传里描述了自己小时候所经历的非人道的智力培养方式，那种方式最终使他精神崩溃。在《艰难时世》中，狄更斯用托马斯·葛雷梗的形象来嘲讽功利主义对想像力的压制。穆勒只是在诗歌中找到慰藉之后才获得精神上的舒缓。在有了这种戏剧性的和富有象征意义的经历之后，穆勒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把边沁和柯勒律治说成是那个世纪两个平分秋色的开创性人物。浪漫 - 保守主义和理性 - 自由主义这两个思想路线派生出两种不同的思潮，即便是穆勒这样聪明而气度恢弘家也无法将二者完全调和起来，但是这二者基本上覆盖了英国 19 世纪的主要历史。



弗朗西斯·哈奇森像

哈奇森的道德哲学和美学理论界定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范围。

功利主义的谱系可以上溯到各种不同的来源，其中特别是 18 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爱尔维修的《论人》和苏格兰学派的弗朗西斯·哈奇森<sup>〔1〕</sup>和大卫·休谟。爱尔维修论证了一个命题：最好的政府就是能够保证人民拥有最大“幸福”的政府。他还赞同早期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的主张：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不扰民，让人民自己去谋求自己的利益。哈奇森已经使用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种说法。休谟批评社会契约这种 18 世纪所钟爱的政治神话。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仅仅是舆论。”

也就是说，对于政府的认可，完全取决于在公民心目中它是否有用。威

〔1〕 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 - 1746 年)，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美学理论家。

廉·佩利<sup>〔1〕</sup>在他那部影响广泛的教科书《道德和政治思想原理》(1785年)中接受了这种观点,并且把功利界定为幸福的总和。一个法律是好是坏,就看它是增加还是减少这种福利总和。

边沁著述甚丰,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就是他1789年发表的《道德与立法原理》。但是这位威斯敏斯特女王广场公园街的隐士能够靠着一份遗产而沉溺于自己对社会工程的兴趣中,源源不断地提出了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的改革建议。法律和制度必须根据它们实际提供的福利来加以评价。这是那种要求依据理论原则而立即实行全盘改革的体系理论家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主张自然会招致伯克派保守主义者的愤慨。功利主义也是立足于个人主义,主张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利益的最好评判者。在计算福利的总和时,“每一个人都应该作为一个人来考虑。”边沁主义者通常支持普选权的民



边沁及功利主义原则

主原则,有时也主张妇女应该与男人一样享有选举权。<sup>〔2〕</sup>

边沁主义者还提议对政府的其他许多方面进行大胆改革。他们主张用一院制议会取代两院制议会;贵族和君主制都应该废除;应该用成文法典取代习惯法。监狱应该改革,学校应该改革,几乎一切事物都应该改革。这简直就是一种革命学说,因为它要求一切制度和政策都要到理性法庭出庭为自己辩护,如果不能通过对其有用性的检验,要么废除,要么修改。当然,它仅仅提供一些看似有理的公式,作为衡量功利的依据。边沁认为,暴力革命很可能造成比它所消灭的状态还不幸福的状态。边沁的这种看法也只能使现状的维护者稍稍感到慰藉。

为了促成这个宏图大略,詹姆士·穆勒等边沁的追随者撰写小册子,

〔1〕 佩利(William Paley, 1743 - 1805年),英国神学家。

〔2〕 边沁多次改变观点。他最终显然是倾向于主张把选举权的范围不仅局限于男人,而且局限于识字的人,尽管“人类中的每一个”都应该是“公共舆论”的组成部分。——原注

编辑杂志,推选议员,招募信徒。19世纪20年代,这个运动具有了很高的组织性,也达到了巅峰,随后又影响了整个世纪。他们自称“哲学激进主义者”。就他们要求对所有的公共机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一点而言,他们确实很激进。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并没有那么激进。他们不仅仅是和平的改革者,只是要求转变而不是要破坏,而且他们捍卫私有财产,一切以自由自主的个人的私利为出发点。尤其是在最初的改革激情过去之后,功利主义者往往接受最小政府的主张,采纳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詹姆士·穆勒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正式成员),反对社会主义。边沁写道:“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向政府提出的要求,是有节制的和合理的,如同狄奥根尼要求亚历山大:‘不要挡着我的阳光!’我们不需要什么恩赐,我们只需要一条安全和开放的道路。”

此外,边沁主义者从来没有把自由放任变成一种教义;对于任何具体政策,问题永远是它究竟会增加还是减少幸福或福利的总和。19世纪40年代,功利主义信徒埃德温·查德威克就致力于伦敦城市卫生改革。19世纪后期,政治作家戴西<sup>[1]</sup>宣称,功利主义不是把财产权和其他个人权利奉为根本,而是贬为权宜之计,实际上就颠覆了这些权利。如果你能让功利主义者相信,集体主义或严酷的专制主义能够造成更多的幸福,那么他就只能表示赞同。边沁曾经宣称:“我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对政府的干预感到恐惧。”

在自由主义阵营里,边沁及其追随者不同于自然法学派。后者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一个突出来源,可以上溯到洛克和1688年光荣革命。功利主义认为,这种高于实证法的所谓权利既无意义,又不真实。(边沁斥之为“胡说”;如果被称作“不可侵犯的”权利,那是信口胡说!)根本没有什么绝对的“自由”;具体的自由要想有意义,必须体现在立法中,而这种立法的性质应该取决于对实际情景的研究。(在这一点上,边沁与伯克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在多数问题上是对立的。)例如,从边沁的角度看,言论自由是可取的,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神圣权利,而是因为权衡一下,它对于整个社会的实际作用利大于弊。很显然,自然法或其他更高法则,在评价具体行为时,会与边沁的评价原则,即功利,发生冲突。在伦理学领域里,康德的理性原则是与边沁的功利原则相对立的,前者是以行为的内在品质来评价行为,后者是根据行为的后果而不是行为的意图来评价行为。

---

[1] 戴西(Albert Venn Dicey, 1835 - 1922年),英国法学家。



立法的宗旨应该是个人幸福单位的总和。为这种本质性事物提供一种精确的计算方法,有许多难题。但是,必须找到一种“幸福计算法”,即对福利的科学衡量方法。对这种关于人类福利的精密科学的探寻是漫长的。迟至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宣布解决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理论强调“边际效用”是价格的决定因素,是生产的调节器<sup>〔1〕</sup>(详见第九章)。快乐和痛苦是两大支配原则:一个人的劳动和消费在达到某一点后,再增加的部分并不能让我感到为此所增加的支出是值得的。

对边沁主义的批驳意见不胜繁多。首先,它似乎对满足或幸福的品质不做任何区分;“图钉与诗歌等量齐观”;一只撒欢儿的猪与苦恼的苏格拉底不分轩轻(幸福真的是最高价值吗?),约翰·穆勒对此提出抗议。纽曼惊呼:“如果人没有追求的话,那就听命于边沁主义吧。”这种完全非英雄主义的伦理似乎推崇的就是自私自利和享乐主义。对于几乎同时崛起的浪漫主义者来说,这是特别不能容忍的。由此导致了一些特别具有典型意义的冲突。功利主义者与浪漫派诗人一样也是少数派,“就宗教而言他们是不可容忍的无神论者,就政治而言他们是残酷无情的共和主义者”(布鲁厄姆勋爵1827年的断语),他们冒犯了大多数体面的英国人,在议会里从来都是少数。1809年,他们之中的一位被关进伦敦塔。

批评者指出,功利主义原则按其字面推导,必然导致明显的不公正;例如,把老人杀死,让他的儿女喜笑颜开,或者消灭少数派,让多数人欢天喜地。按照功利主义原则,如果一项歧视黑人的法律能够让占人口多数的白人高兴,那就应该使其通过。人们对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做了区分:前者不问行为本身只看后果,后者强调按规则办事效果最佳。哲学家可以推导出这些以及更多的论点。可以推测,边沁生前还没有充分推导出他的政府科学的全部涵义。(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被涂上防腐剂后一直放在伦敦大学学院的一间屋子里。)研究者通常会得出结论,边沁的思想混杂着各种意识形态和偏见,因此不可能成为他自称的那种纯科学。

总而言之,边沁应该在雄心勃勃的空想家画廊中占据一席之地。那些空想家提出的方案都没有弥合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但是,边沁的影响要比他们多数人都大得多。功利主义者的努力所产生的影响贯穿了整个世纪,

---

〔1〕“边际效用”的英文是 marginal utility,与功利主义所强调的功利(utility)有理论上的联系。

尽管没有出现他们最初期待的那种政治制度的大改造,但也促成了许多的改革。他们提倡的方法十分重要:由议会设立的委员会进行彻底的调查。调查、立法、监督、报告,这些构成了边沁程序。费边派社会主义者后来也捡起了这一方法。批评者指责边沁派缺乏现实政治感。但是,边沁派毕竟揭示了弊端,并且力主改革。功利主义的影响超越了国界,波及俄国、西班牙乃至拉丁美洲。它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理性准则,免除了含混的口号和革命的辞藻;它的方法看上去是科学的。当拜伦勋爵 1823 年怀着自由希腊的梦想、担任希腊起义军总司令时,他遇到在另一派反抗组织中任职的另外一位英国人。这就是哈林顿伯爵查尔斯·斯坦诺普。他既是一个战士,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曾经试图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机构进行改革。

## 政治经济学

在英国自由主义阵营里,功利主义者的亲密盟友是政治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全新的学问。这个术语是法国作家安托万·德·蒙克列田在 1615 年杜撰出来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发现,19 世纪乃至 20 世纪经济分析的关键思想实际上在前几个世纪里都曾出现过。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思想得到系统的发展,并且形成了一个专业。这很类似于 19 世纪自然科学中所发生的情况。

当然,18 世纪对经济学研究做出了辉煌的贡献。法国人把这门新科学称为重农主义,就此发表了大量的著述,对启蒙哲学和革命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他们与著名的苏格兰学者亚当·斯密相比则大大逊色。斯密于 1776 年发表的《国富论》被公认为人类思想的一个里程碑,其意义几乎不亚于牛顿的《数学原理》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实际上,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牛顿的《数学原理》。牛顿的朋友洛克既论述过政治理论,也略微涉猎过经济学。苏格兰的亚当·斯密是在牛顿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他在 18 世纪 40 年代当学生时,对物理学有浓厚的兴趣,还曾经研究天文学史。在《国富论》里,社会被说成是个人的集合体,他们对自身利益的有理性的追求将会导致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作家伯纳德·曼德维尔早就以不那么严谨的方式提出了“私人的恶德反而是公共的美德”这一命题。另外,在亚当·斯密之前,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就认为,个人基于自利而采取的行动合在一起,构成受普遍法则统治的社会秩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牛顿所谓孤立原子服从普遍合理法则的观点相类似的思想。

这种牛顿式说法在 18 世纪思想界俯拾即是。例如,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一位思想领袖西埃耶斯神父认为,在立法过程中,“所有的特殊利益都应获准伸张和相互冲撞”,然后“它们最终汇拢而融合成一个意见,就像在自然界里从一大堆对立的力量中最终可以看到产生出一个更强大的力量”。

19 世纪,有一批杰出的理论家沿着这个大有希望的道路前进。萨伊和西斯蒙第<sup>[1]</sup>继续提供了法国人的贡献,但主要是英国人占领了这个此时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或许这是因为英国的经济增长一花独秀,因此成为检验经济思想的实验室。但是拿破仑时代的急剧变化和痛苦调整,也提供了一个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实验室。也许值得重视的是,西斯蒙第转向了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德国“浪漫主义”经济学家李斯特和米勒<sup>[2]</sup>则斥责英国“古典”学派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预设。在英国,伟大的苏格兰作家卡莱尔加入柯勒律治的行列,谴责这门“阴沉的科学”;而经济学家则把他们斥之为浅薄的外行和廉价的温情者。<sup>[3]</sup>

这门新科学发展得非常迅速,欣欣向荣,令人振奋。李嘉图于 1817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达到了一个高峰,接下来在 1821 年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英译本出版。普及读物也随之出现,如 19 世纪 20 年代晚期女才子马塞特女士从讲解化学转到讲解经济学,哈丽雅特·马蒂诺<sup>[4]</sup>撰写阐释经济科学新观念的小故事。这些作品风靡一时。“和有学问的女士谈论政治经济学是极其时髦的事情”。政治经济学的势头方兴未

[1] 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 - 1832 年),法国经济学家。

西斯蒙第(Jean - Charles -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 1773 - 1842 年),瑞士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他曾经在法国短暂生活,与拿破仑会面交谈。

[2] 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 - 1846 年),德国经济学家。

米勒(Adam Heinrich Müller,1779 - 1829 年),德国经济学家。

[3] 约翰·穆勒在一篇评论卡莱尔的文章中说:“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他完全像一个白痴。为了保持他的名声,他最好不要掺和这个学科。”柯勒律治予以回击,把政治经济学说成是“一脸严肃的胡说”。

[4] 马塞特女士(Mrs . Marcet 系笔名,原名 Jane Marcet,1769 - 1858 年),撰写了《政治经济学谈话》等。

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1802 - 1876 年),英国女作家,著有《政治经济学解说》等。

艾,马尔萨斯、西尼尔、麦卡洛克<sup>〔1〕</sup>、穆勒父子等人的力作纷至沓来。1856年,一位著名议员指出:“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土地的法则,而且是法律的地基。”政府领袖向经济学家咨询——现在依然如此——议会委员会向他们讨教。经济思想史学者埃里克·罗尔指出:“成套的经典理论已经成为产生政治领袖和行政官员的那些社会阶级公认的精神武装的一部分。”

这个威力巨大的神庙给出了什么建议呢?经济学家绝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总是在激烈地争论着。这个学科以拥有头脑敏锐的领衔人物为荣。在1810-1845年的“古典”时期,经济学界大体可分成以穆勒为首的左派和以麦卡洛克为首的右派。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就有效需求问题进行了一场重大争论。一个世纪以后,凯恩斯力排众议,判定马尔萨斯正确。李嘉图这位荷兰犹太人通常被视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或者仅次于他的导师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他在股票市场上发了财,25岁就金盆洗手,致力于研究纯理论问题。李嘉图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暧昧。许多认为他属于经济学家中最冷漠无情的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大谈工资总是接近维持生存的水平“铁律”(“劳动力的天然价格就是使劳动力能够生存下去,一个接一个地维系着其群体,既不增加,也不减少。”),但是他的著作也导致了一种社会主义,因为他本人最有名的事情是宣布,地主实质上是社会公敌。

李嘉图显然不像亚当·斯密那样坚决地认定,有上天的“看不见的手”保障,经济活动就会实现一种天然的和谐。他认为,地主和工厂主是天然的死对头。地租上涨,带动食品价格上涨,进而迫使工资上涨,导致制造业利润下降。按照李嘉图的思路,由此不可避免地会得出结论(许多社会主义确实就很快引伸出这种结论):因为雇主为了维持高利润必定会压低工资,所以工资劳动者会与雇主陷于对立。在英国的政治领域里,围绕着要求废除谷物法(对谷物实行保护性的进口定额制)而展开了长时间的斗争。约翰·布赖特等自由主义的工厂主抨击托利派地主是寄生虫。他们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凭借的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欧文派社会主义者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中获得启示。马克思则在其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体系。

当然,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它的通俗理论所传递的主要信息依然是个人主义以及摆脱政府沉重压迫的企业自由。竞争和利润刺激能够确保生

---

〔1〕 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 1790-1864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大纲》。麦卡洛克(John Ramsay McCulloch, 1789-1864年),出生在苏格兰的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的发生、发展、研究对象及重要性》。

产的最高效率和财富的最公平分配。斯密以及重农主义者都认为:“政府的全部管理艺术就在于给予人和物自由。”斯密的后继者可能不那么注重道德,但是他们依然认为,自由竞争制度是最好的;国家干预很少能达到有效的目的,要么有害,要么多余。政治经济学是以人的自私或自利为前提的。斯密设定了一种谋求自身好处的“经济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想最有效地获得更多的财富。斯密的后继者把这种预设作为出发点。他们指出,指令性经济背负着昂贵的官僚体系,而非指令性经济基本上能够自动运行。

尽管主要的政治经济学家绝不会设想完全不要政府,但是他们大力鼓吹自由贸易理论(他们假设经济基础本身就强劲有力,而且19世纪的实际情况令人意外:国家在与私人企业同步发展壮大)。国家通过保护性关税和特许垄断实行的“重商主义”管制很快就被说成是不懂经济的愚昧时代的产物。(由李嘉图策划的一个成就是,通货摆脱政府控制,货币供给由黄金市场决定。)萨伊的市场定律设定,在自由市场中生产和消费相互自动调整。工资基金理论断定,“人为”的努力,如工会,不能改变实际可得的工资总量。在马蒂诺女士讲的一个小故事中,一次罢工之后,工资有些增加,但是工厂主通知工人,必须解雇一些人。如果有些工人的收入超过应有的份额,另外一些工人就会减少收入。如果工资总量增加了,企业主就会丢掉生意,大家都会丢掉工作。

在另一个故事中,马蒂诺女士讲解的是,济贫的公共开支会增加税收,结果是打击了资本,增加了失业。此时,马尔萨斯已经用他著作的人口理论影响了许多人。他认为,人口总是趋向于增长到生存极限,从而使贫困生生不息,除非有某种壮举能够打破这种令人沮丧的循环。强硬的1834年济贫法就是由经济学家制订的。该法把福利救济搞成不仅难以得到,而且令人屈辱。目的在于阻止贫困而不是救济贫困。

穷人如不饥寒交迫就不去工作,这种观念在18世纪广为流传。阿瑟·扬格表示:“除了饥渴,穷人自身没有其他任何动力去劳动;对此只能治标无法治本。”曼德维尔、笛福、重农主义者杜尔哥以及18世纪其他论述过贫困问题的作家都持有与扬格相同的观点。一般而言,对于启蒙哲学家来说,平等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不是生存状况的平等;后者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阿纳托尔·法朗士<sup>[1]</sup>把这种法律面前的平等嘲笑为富人和穷

[1] 法朗士(Anatole France, 1844 - 1924年),法国小说家。

人都有在街上睡觉的平等权利；布莱克则讽刺这是让狮子和绵羊适用同一个法律。《百科全书》中的词条“乞丐”是这样写的：值得同情的穷人（包括儿童）应安排在工场劳动，其他穷人则应被遣送到殖民地。现在成为显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支持这种信念。

詹姆士·穆勒指出，资本的增长往往不如人口增长得快，而资本的增长又不能靠强制来实现。如果古典经济学家听到今天人们辩论如何通过政府部门的活动“创造经济增长”，他们要么会大惑不解，要么会捧腹大笑。他们眼中的世界严格地受制于大自然的局限性；他们认为，回报递减（连续投入越多，产出反而递减）和人口增长可能成为人类总体状况取得重大改善的障碍。这是一个定律。他们只是偶尔才给一个前途光明的暗示。“阴沉的科学”的这种习惯性悲观主义恰恰与英国从1780年开始的（或许是人类的第一次）经济持续增长所引起的兴奋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是勤劳节俭的胜利果实。英国的小工厂主和小业主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战后英国的有利环境中白手起家发财致富。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倡他们那种勤俭的清教精神。

他们的口号是自助。被卡莱尔视为可怕的“财神福音书”的那种信条，在他们看来是进步的途径。英国的成就不应归结到其他因素，而应归功于这个工业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威力。正是他们承担起工业化进程的领导责任。他们有精力、有抱负；资本主义竞争体系给他们提供了刺激；政治经济学的信条对他们的努力给予了科学上的认可。

当然，经济学家不愿意被人看做是某一阶级或某一观点的意识形态辩护士；他们宣称，他们在创造一种中立的科学，任何人都可以运用，但绝不可忽视。他们确实开始发展出一套富丽堂皇的思想。这种发展迄今尚未结束，而且始终处于争议之中，但是这套思想由于明显高水准的学术内涵而具有权威性。对于这种思想做出贡献的不仅仅是英国人；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理论家也加入了这个与其他学科一样在19世纪形成的国际学术共同体。

英国经济学家在鼎盛时期既备受推崇，也招致怨恨，引发了激烈的反对呼声。社会主义者采取的立场与英国经济学家宣传的经济个人主义和不平等主义背道而驰。边沁支持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但接受经济上的不平等，认为这是前一种平等的结果。每个人都有权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包含着平等。但是因为人们的才能和精力是不平等的，这也就意味着酬劳是不平等的。实现经济上平等的惟一可行途径是，强迫人们同意与他

人一起分享自己的劳动果实。但是,这不仅违反了公正原则,而且会破坏刺激机制,造成经济灾难。柯勒律治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是对立的 社会思想领袖不谋而合的例子。法律平等和经济平等,只能选择一项,无法兼得。正如伦理学学者指出的,这是个人公平与分配公平的矛盾问题。边沁承认,在另外不同的基础上,财富的平等分配能够促成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指出,功利递减原理意味着,对于已经拥有相当财富的人来说,增加一点财富所带来的快乐要小于财富较少的人。这就提出了一种困境:人们在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的名义下认可不平等,进而认可了不幸福。

英国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体现为以约翰·布赖特和理查德·科布登为首的曼彻斯特学派。除了功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这两大思想体系之外,其他因素也对这种自由主义的形成起了作用。布赖特是教友派信徒;曼彻斯特从一个外省市镇发展成一个大城市。英格兰中部新兴的资本家通常是不信奉国教者,是旧的贵族体制之外的“新人”。作为不信国教者,他们时常与歧视做斗争;布赖特说,由于他这一类人所遭受的迫害,他必须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圣经在曼彻斯特学派中起着与经济学说同样重要的作用。布赖特-科布登集团把圣经的词句挂在嘴上,对可恶的土地贵族统治的象征谷物法大张挞伐。丁尼生嘲笑布赖特虚伪,是“戴着宽边帽、叫卖圣物的小贩”,但是这种指责其实并没有刺痛布赖特。自利乃是与政治经济学完全一致,也符合清教徒的良知。反对穷兵黩武乃是自由主义信条的一部分,布赖特由此而勇敢地反对 1854 - 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宗教和经济学结合起来,造就了一种反战思想。自由主义者确信,自由贸易能够消除战争,把各民族联合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和平的贸易竞争将取代贵族争夺荣誉的战争游戏。

总之,近代自由主义有若干流派。正如我们在功利主义和自然法理论这两派就个人权利的来源所展开的争论所看到,这些流派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它们都对国家持有否定观念,捍卫个人、反对政府压迫,相信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基础。

自由主义遭遇到抨击。批评者认为它只是让少数人享受好处。哈罗德·拉斯基写道,社会主义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自由主义理想确保中产阶级充分地获得自己的特权,却依然让无产阶级身系锁链。”撇开辞藻不谈,这段话比较准确地表达了现实中的悖论:法律面前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可能意味着实际状况的不平等。自由——所有的公民都有凭借自己的精力、能力和运气取得成功或遭到失败的自由,法律对所有的人维持同一个游戏

规则,国家绝不干预来保护弱者或倒霉者——也就可能意味着不平等乃至不公正。这也就意味着成功者会获得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嘉奖,而失败者(不论由于什么原因)只可能听到最古老的呼喊:倒霉活该。

##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几乎是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登上舞台的。“社会主义”这个词可能是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使用的,但是这种思想本身形成得要早一些;在20年代人们使用的术语是“合作主义”。1822年,夏尔·傅立叶(其父是贝桑松地区的一个商人,也是一个退休公务员)发表了《论协作》;在此前后,古怪的圣西门伯爵抛出了一系列著作,借以证明自己是第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和圣西门都不是谦谦君子。两人都自称是现代牛顿,可以想见他们会如何争风吃醋了。与此同时,英国有一位成功的资本家名叫罗伯特·欧文。他用样板来推广建立更社会化的工业组织的计划。数以千计的人到新拉纳克来参观他的样板。

启蒙运动中就有社会主义的先兆,尽管与启蒙哲学家中的个人主义主流相比十分微弱。卢梭有时说私有财产是“神圣的”,但是在一段令伏尔泰震惊的著名文字中,他把后来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归结为最早的抢占行为:某个人说:“这是我的”然后就把它抢走了。在充斥着贪婪和腐败的“文明”出现之前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比较幸福的阶段。恩格斯曾经指出,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卢梭的“公意”概念——社会整体的意志,高于个人意志的总和——乃是国家主义的一个渊源。他的《社会契约论》告诉人们,所有的权利都来自于社会;私有财产并不是一种绝对权利,而是社会所许可的便利手段。如果说卢梭影响了一些社会主义者,那么这些人也不是属于那种强调更大的生产力和更多的财富的社会主义者,因为卢梭认为,斯巴达式的简朴才是美好的生活。另外一位身份不清的作家摩莱里被称作是“18世纪思想家中惟一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卢梭,尤其是摩莱里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实际上是由基督教的伊甸园所体现的黄金时代神话的回声。卢梭把原罪转化成私有财产的发明。这与宗教改革时期某些激进的新教教派所复兴的原始基督教相去不远。



研究社会主义历史的学者诺伊斯把震颤派和拉普派<sup>〔1〕</sup>这些共产主义教派称作“现代社会主义的真正先驱”。

人们经常会提到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格拉古”巴贝夫及其悲惨的平等派密谋(1795年)。巴贝夫鼓吹“分配社会主义”,断言:“大自然赋予所有的人享受一切产品的平等权利。”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原则看上去可能过于简单化了,但是时至今日它还具有相当大的魅力。平等派的影响贯穿19世纪,并且涌现出大量的方案和计划。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层出不穷,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情绪:一是对自由主义不满,因为它似乎意味着另一种名义下的不平等和剥削,二是急切地希望有某种社会改造的新方案。

由于政治经济学似乎支持人人自私的原理,因此激怒了道德之士。威廉·科贝特<sup>〔2〕</sup>写道:“在他们的原则和意见中有一种令我痛恨的冷漠。”还有人认为它缺乏秩序,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把资本主义“体系”说成完全是“占有者和追逐者的麇集”。人类的聪明才智应该能够发明出比这种自私的争夺更好的方式。自由主义者的明确回答是,自由竞争体系是在市场法则统治下自动运转的,基本上反映了人们的意愿,而计划经济体系需要由某些自封的精英对生产什么和如何分配做出武断的决定。但是,贫困的蔓延和下层阶级的苦难已经使得寻求更好的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社会主义学说大多出自法国。1842年,年轻德国人恩格斯住在工业化的英国。当他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时,他开始研究法国的社会思想家,并且发现了至少有8个人很重要。他不久就与他的朋友马克思进行了交流。马克思于1843年来到巴黎,尽其所能地会见了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其中不仅有傅立叶和圣西门的超群逸伦的门徒,而且有新近出现的社会主义先知,如蒲鲁东、卡贝。

乔治·奥威尔<sup>〔3〕</sup>曾经指出,那些自称为工人阶级说话的社会主义者其实都出身于上层社会,这个传统大概是由圣西门伯爵(1760 - 1825年)开创

---

〔1〕 震颤派(Shakers),1747年起源于英格兰的基督教派别,过着公社式的生活并信奉独身。

拉普派(Rappites),19世纪初拉普父子在美国创立的一个教派。

〔2〕 科贝特(William Cobbett, 1763 - 1835年),英国散文作家,报人,抨击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弊病。

〔3〕 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 - 1950年),英国小说家及散文家,代表作《1984年》。

的。他是法国贵族,祖系可上溯到查理曼大帝。他曾经在美国革命期间战斗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侥幸逃脱了断头台,然后在金融投机中发了财。接着,与工厂主欧文一样,圣西门倾家荡产来宣传他的新社会蓝图,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从1802年到1825年,他源源不断地发表著作,身后留下了一个教派。19世纪30年代,一群杰出“使徒”在巴黎组成了一个团体,后来分散开向世界传播福音;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后来主持开凿了苏伊士运河。

圣西门的社会主义设想强调的是秩序和组织、效率和精英统治;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工厂,由社会工程师组成的统治阶级按照理性原则来计划和管理社会。他的宗教“新基督教”也是由一群教士精英来主持。卡莱尔呼唤“工业领袖”拯救社会,使之摆脱盲目的潮流和财神福音书。这也显露出当时圣西门的强大影响。圣西门可能是马克思之前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代言人,而马克思也深深受益于这位法国智者。后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统治者也把圣西门奉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开山鼻祖。应该指出,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既不民主,也不属于无产阶级,尽管他首先使用无产阶级这个术语来描述现代产业工人阶级。它强调的是计划和社会工程;新的经济制度应该用理性秩序取代混乱状态,从而通过增加生产和实行比较平等的分配来消灭贫困。

与这位法国的专家治国论者几乎同样名传假迹的是罗伯特·欧文。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一位和蔼的老板使他知道了卢梭、葛德文以及其他启蒙思想家。他是家里13个孩子中的一个,9岁就开始劳动,18岁就在欣欣向荣的棉纺织业独立创业。欧文买下苏格兰新拉纳克的棉纺厂,然后开始改造这些愚昧、堕落的工人(大多数是孩子);他缩短了工作时间,改善了居住条件,实行了禁酒,创立了学校,开设了合作商店,平价出售商品。他成为一个模范社区的仁慈的独裁者。世界各地的人都来此参观。欧文享有模范雇主的名声,因此他1829年访问美国时被请到国会演讲。此时他还是可敬的开明资本家典范,但是他很快就开始实施全盘改造社会的大胆方案。他试图创建一个极不正统的理性宗教,堪与圣西门的新基督教媲美。但是,欧文的主要精力是以新拉纳克为模式建立更多的社会主义公社。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从拉普派手中购买的新和谐村最为有名,但是在美国和英国还有许多规模不等的公社。它们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但毕竟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热情实验者。他们满怀为大公、舍小私的理想,建设欧文所说的“新道德世界”。欧文在英国一度拥有极其众多的信徒;欧文运动研

究者、历史学家哈里森指出:“在 1839 - 1841 年的鼎盛时期,散发的小册子就有 250 万份,每一年有 1450 场演讲,每周出席星期天讲座的观众高达 5 万人。”

欧文的公社与傅立叶主义者的公社一样,似乎不仅没有证明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反而证明了自由主义 - 功利主义的说法:人在根本上是受自身利益所驱使。欧文派采纳的是一种简化的李嘉图社会主义,即试图发明一种以劳动力为基础的交流手段,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他们试图废除家庭这个私人利益的堡垒,推崇某种公有生活方式——正是这一点以及宗教上的离经叛道,吓坏了附近的居民。傅立叶的信徒也创办了一些实验性的公社(美国新英格兰的布鲁克农场最为有名)。他们至少在性道德方面更大胆。傅立叶本人虽然是个单身汉,但他却认为一夫一妻制家庭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制度根源。在他的乌托邦里,可以立即离婚,群居,实现彻底的性解放。傅立叶的“情欲引力”已经暗含了后来弗洛伊德的某些观点。不同于欧文和圣西门,他是一个心理学家,试图把他设想的社会体系建立在利益和情欲的恰当组合的基础上。他为理想公社绘制的蓝图比欧文的蓝图要更精确。科学(以傅立叶为代言人)决定了公社组织的每一个细节。

这些都属于乌托邦社会主义。在傅立叶和卡贝的相继影响下,对社会主义公社的热情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时尚。哈丽雅特·马蒂诺写道,合作原则“在为付诸实验之前是绝不会罢休的”。实验的结果似乎是对它的否定。但是傅立叶主义的思想传播到全世界。远至斯堪的纳维亚、中国和拉丁美洲,都可以发现它的踪迹。在俄国,1845 - 1849 年,彼得拉舍夫斯基<sup>[1]</sup>传播“沙里亚·傅列”(夏尔·傅立叶的俄语音译)的思想,而且将其与俄国的农民村社及其中世纪公社习俗联系起来。今天以色列的基布兹(合作农场)据说在某些方面也是傅立叶的思想(经过东欧)的产物。

埃蒂安·卡贝是乌托邦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1839 年)的作者。他主张把全部财产和权力都交给公社,就此而言他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这个词,马克思可能就是从卡贝那里学来的。与欧文派和傅立叶主义者一样,伊加利亚派在新大陆(伊利诺、衣阿华和得克萨斯)建立公社,其中一个公社一直坚持到 1898 年,但是这种乌托邦理想在实践中普遍遭到失

---

[1] 彼得拉舍夫斯基,俄国知识分子,曾组织一个秘密的读书会,后被沙皇政府破获。参加者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败。美国的资本主义气氛咄咄逼人无孔不入,对于这些梦想家来说可不是有利的环境。他们不主张暴力,无意于革命,只是希望通过榜样的力量来传播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造反传统。在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布朗基接续了这种传统。

在19世纪30年代反对残酷竞争的社会伦理的大合唱中,还有另外一些先知的声音。那10年,法国最流行的政治读物是拉梅内的《一位信仰者的话》。(他把自己的名字由La Mennais改成Lamennais,这一举动具有民主意味。)先前他是一个著名的反动分子,现在他变成同样狂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位信仰者的话”出自一个神父之口。他希望罗马教会变得更加民主,但在梵蒂冈不但没有获得什么同情,反而遭到驱逐。这位布列塔尼的教士感到“人类社会的核心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革命”,注定要产生一个“新世界”。他声讨雇佣奴隶制,谴责统治者玩忽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他的英国同道是托马斯·卡莱尔。他在历久不衰的经典之作《过去与现在》中用极富煽动力的文笔唤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在法国,这10年属于雨果、拉马丁、乔治·桑和巴尔扎克。这些伟大的小说家用所谓的“社会浪漫主义”风格对社会现实做了栩栩如生的描述。这些流行作家促成了大难临头的感觉。1848年革命发生后,显示了这种社会主义的复仇力量。

总之,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者都主张变革,以实现社会对私有财产的某种控制,但是在控制的程度、方式和体制等问题上则众说纷纭。他们更擅长纸上谈兵而拙于实践,他们的实验几乎同样遭到悲惨的失败。就此而言,他们并没有构成对现有秩序的重大威胁。但是他们是一支五彩缤纷的队伍。他们的观点对于许许多多不满现实的人来说具有无穷的魅力,因为现实与理想相比令人绝望。思想浪漫的知识分子逐渐开始抱怨:行动并不是梦想的姊妹(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作曲家罗伯特·舒曼竭力把庸人世界与浪漫主义理想、弗洛雷斯坦和欧西比乌斯加以协调,结果却导致精神分裂。<sup>[1]</sup>

马克思借助于德国哲学和无情的英国经济学,试图把社会主义从其“乌托邦”的错误起点拯救出来。他一直承认受益于创造了社会主义这一理念的社会主义者先驱,只是指责他们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过于天真。

---

[1] 舒曼采用弗洛雷斯坦(Florestan)和尤西比乌斯(Eusebius)两个笔名发表乐评。前者表现为冲劲十足、热情如火,后者内敛、敏感、忧郁。

##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种能够把左中右三种有时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是保守的,强调传统、共同体精神、国家的权威。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自由民主的,因为它立足于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即分享国民福利和获得法律保护的平等权利。它也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正如当时的某些政治领袖所显示的,解放被压迫民族(他们理应要求摆脱异族统治)与解放被压迫阶级相辅相成。

1821年,一次起义遭到奥地利军队镇压后,一位16岁的法律专业学生目睹了一批流亡者撤离热那亚。他就是出身于热那亚一个医生家庭的朱塞普·马志尼。他由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他不喜欢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过于消极和自私;他肯定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的民主和“合作”的价值。人民应该无私地聚积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马志尼的社会主义乃是无私献身于整个民族共同体的一种体现。民粹的民族主义的信仰就鼓励这种献身。马志尼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的口号是和谐与合作。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是最主要的样板)所论述的民族主义产生了自己的神话,即给各民族赋予了实现上帝所计划的人类进步发展的特殊使命。根据浪漫派民族主义,民族是一种有机的成长过程,在历史中绽放光彩,表现出一个民族的深层潜力。自由的个体是通过在一个扩展的群体意识之下的这种成员身份来实现自我。正如马志尼所解释的:“民族性是上帝赋予每一个民族在塑造人类过程中的角色:这是它必须完成的使命和任务,由此神圣的目标才能在这个世界实现。”由此可见,民族主义既不反对个人理想,也不反对国际主义。

只有在每一个民族都获得解放并实现文化繁荣之后,人类博爱的终极目标才能实现。每个人必须首先是自己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渴望博爱的人也渴望有一个祖国。”正如每一个民族在寻找一种共同体的过程中得以形成,众多民族将混合起来,形成一个人类整体。在人类的交响乐中,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位置。

各种运动通常是由知识分子领头,在民众某种程度的支持下,扩散到欧洲各地。19世纪40年代,斯拉夫派在俄国风靡一时。当时德国所有重要的思想家和作家无不带有民族主义;从严肃的哲学家到民众组织者概莫

能外。1848年,民族主义成为政治大爆炸的关键因素;当时最突出的全欧性人物可能是匈牙利的民族主义领袖科苏特。波兰的民族主义曾在1830年和1863年两度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不过,首席发言人是马志尼。“雄辩、重复、散漫”,他的散文乃是浪漫主义鼎盛时期所产生出来的辞藻泛滥的最佳样板。他把这种语言技巧与对政治组织的激情结合起来。当他不写作、不演讲时,他就致力于建立组织,筹划秘密活动。尽管似乎不应该责难这样一个满怀社会责任感的人,但还是可以指摘他本质上的利己主义。正如他自己经常说的,他觉得最重要的是,让民族选择并固守一种英雄主义的使命。马志尼决心统一意大利民族,这种选择给他的生命赋予了意义和冲动。这是他的宗教。

民族主义或许后来转向了反动,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它是自由主义的、进步的、民主的。它意味着人民有自由和自决的权利。人们还想不到它与国际主义有什么不一致,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在宏大的国际交响乐中承担自己特殊的角色。具体而言,它意味着波兰、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争取摆脱外国压迫的斗争。欧洲的弱小民族由于(通常是第一次)发现了自己是一个承担着特殊使命的民族而找到了一种奋斗目标和身份认同。丹麦人原来对自己单独的民族性质毫不了解,现在则努力恢复古老的丹麦语和丹麦习俗。瑞典的哥特风格也体现了类似的冲动。比利时人此时觉得不管荷兰国王是多么仁慈,在一个外国国王统治下生活就是低人一等。



马志尼

在这个倾向历史思维的时代,对于许多人来说,从地方观念、地域联系转向更大的共同体,这种变化乃是人类走向某种世界统一的未来乌托邦的一步。伏尔泰曾经认为:“祖国越大,人们对它的情感越少。”对于一个过于庞大的、几乎无法了解的大家庭,不可能有那么亲切的感情。”这也是为什么18世纪的哲学家怀疑超出村庄范围如何能够实行民主。但是,由于交通和通讯的改进,打破了乡土观念,人们有可能把民族当成一个大家庭。马志尼的时代适逢铁路的时代。而且,

在这个倾向历史思维的时代,对于许多人来说,从地方观念、地域联系转向更大的共同体,这种变化乃是人类走向某种世界统一的未来乌托邦的一步。伏尔泰曾经认为:“祖国越大,人们对它的情感越少。”对于一个过于庞大的、几乎无法了解的大家庭,不可能有那么亲切的感情。”这也是为什么18世纪的哲学家怀疑超出村庄范围如何能够实行民主。但是,由于交通和通讯的改进,打破了乡土观念,人们有可能把民族当成一个大家庭。马志尼的时代适逢铁路的时代。而且,

随着传统地方社会的衰落以及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对共同体的需求就逐渐转向了民族。在旧制度下,法国很少有人会首先自认为是法国人;地方认同更为重要(布列塔尼人、普罗旺斯人或加斯通人)。那种社会秩序属于过去;技术因素和经济因素促成了集中化的历史运动。

在这种演化过程中,18世纪后期开始的“阅读革命”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在全国流通的杂志和书籍能够打破地域文化的藩篱。这个时期,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某种文化创造的产物——主要存在于诗人和哲学家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他们抽象地颂扬的“人民”之中。(有人指出,这种“人民”不过是马志尼的伟大精神。)它主要存在于知识分子之中,而不是民众之中。然后它才会慢慢渗入下层,尤其是城市民众之中。民族永远是不完善的共同体。迈克尔·奥克肖特<sup>[1]</sup>认为,现代民族人为性太强,自发性不够,缺少共同的传统、信仰和目标,因此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民族主义是否定性事物,是相对于外界竞争对手或敌人来界定的。民族国家很少能完全与民族吻合。因此,甚至在大不列颠,苏格兰人也保留着强烈的分离意识;很难说有一种“不列颠”民族主义。(看看西班牙那里巴斯克人的情况,更不用说东欧那些杂居的民族。)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民族主义情感一直是现代欧洲最强大的政治因素,而且被输出到世界各地。

## 民主

尽管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包含着民主的因素,但是在这个时期,民主的理念还没有像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那样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借助其他思想慢慢地渗透进人们的头脑,几乎还没有坚决的支持者。它没有任何堂皇的学说作为后盾。历史上的思想传统基本上是反对它的。约翰·穆勒在19世纪中期指出,潮流转向民主,这“不是哲学家的产物,而是最近日益强大的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本能的产物”。

启蒙运动带有强烈的反民主色彩,这么说是因为它怀疑大众的智慧,进而怀疑用多数表决而不是由理性来做出决策的智慧。洛克在日记里袒露心扉说,人类大多数深陷于“情欲和迷信”。启蒙运动的另一位先驱者培尔认为,在平民百姓中找不到“任何忠告、理性、鉴别力、学问和精准描述”。大众的非理性是从弥尔顿到伏尔泰的著作中的一个主题。伏尔泰把大众

---

[1] 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 1901 - 1990年),英国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

称作畜群,而且认为他们永远处于那种状态。这位伟大的思想反叛者认为:“绝大多数男人以及更多的女人不假思索就下结论,说话不动脑子。”他怀疑大众是否值得教育。(后来有一个伏尔泰的信徒说,对群众进行教育,无异于在一个干锅下烧火!)

葛德文在其著名的《政治正义论》(1793年)中愤怒地提到用计算人数来决定真理“这种无法忍受的对全部理性和正义的侮辱”。他指出,真理“并不因为信仰者人数多而更显得正确”。如果我们像启蒙思想家那样确信“理性神位在此”,那么提议用其他方式来决策就显得很荒唐了。真理不能用是否流行来检验。2加2不等于5(除了在奥威尔的《1984年》噩梦国家中),尽管证实这一点却需要经过斗争。正如一位学者在论述清教徒时所说的,“上帝的权威不等待一个多数票来确定”,理性的权威也是如此。柯勒律治认为,民众的呼声反而需要由“理性的规定和上帝的意志”来检验。各种教条的社会改革家也持相似的观点。欧文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之一。他认为,由民主选举的议会来统治,简直是匪夷所思,因为这很可能既无效率又动荡不安。法国杰出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宣布,普选权体现了“共和国的实利主义”。

虽然卢梭一直被说成是民主观念的一个源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如此,但是他的那种民主(他没有用这个词)与我们今天对民主的界定相去甚远。卢梭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回到文明之前的纯洁状态(当然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小型的民主共同体中,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自愿团体的一部分。卢梭认为民主至多只适用于小型社会。他的这种看法在18世纪的政治学者中不是孤立的。在他们看来,代议制,即选举代表来体现自己的观点,这种做法根本不是民主。如果民主指的是纯粹民主的话,这当然是不民主的。

法国大革命期间,罗伯斯比尔所实行的雅各宾民主和恐怖统治有一个预设:公意不是通过计算选票得出来的,而是一种神秘的统一,可以由独裁者来体现和表达。人们所说的这种“极权主义的”民主会败坏民主的声誉。当罗伯斯比尔的民主在1794年7月崩溃后,反动便开始了。大革命期间被人们惟一认定的“民主”完全出自这段经验。当诗人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的乡间邻居想表达他们对这两个奇怪的城市知识分子的不满时,他们想不出还有什么比称呼他们“民主派”更恶毒的了。

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自己先验地掌握正确的答案,因此如果民主意味着让民众投票来决定事情,他们不可能欢迎这种民主。他们



只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才是民主的,即他们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对人民最好的,也就是说,他们主张民享的政府,而不是民治、民有的政府。英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马考莱认为,普选权“对政府赖以存在的所有目标都具有致命的威胁,是与文明的存在本身格格不入的”,这主要是因为只会有少数人能够掌握政治经济学这门复杂的科学——西尼尔认为,它是“所有科学中最艰深的科学”。愚昧无知的选民会为了某些明显的短期利益而破坏经常令人不愉快的规则。英国反对特权和贵族的领袖约翰·布赖特说:“我才不会假装成民主派。”

在1815 - 1848年这个自由主义时代,正是一位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使自由与民主的矛盾成为一部传世之作的主题。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1831 - 1835年)中认为,大众文化施加了一种“多数人的暴政”,从而扼杀了个人创造力。多数的统治,无论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都对个人自由形成压迫,特别是迫使任何人不得脱离标准模式。个人自由需要保护,以防范任何外界权威,民主的权威可能会像君主的权威一样是压迫性的——实际上更具压迫性。自由主义者常常断言,民主会导致社会主义,因为无财产的多数人如果获得政治权力,就会用于剥夺拥有财富者。或者用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说法,他们认为民主会通过暴民统治而导致独裁。“古典的自由主义”把自己标榜为个人主义对专制和民主二者的胜利。19世纪有许多著作宣布民主与自由二者永远对立。<sup>[1]</sup>

在反对或怀疑民主政府或社会平等的学者名单中还应该增添上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参见下一章)。他固守启蒙运动的信念,把理性视为“经过训练的理智”而不是“民众的事情”,因此他不可能成为民主派。他所谓的理性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的自我展现被说成是历史的本质。他倾向于把理性——绝对精神——置于有思想的人,即知识精英之中,认为他们的智慧与劳动大众的愚昧无知形成鲜明的反差。在黑格尔看来,民主属于已经逝去的小型社会的时代,不适用于现代国家。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在撰文反对扩大选举权、更公平地分配议席的1832年英国改革法案。

此外,我们还应该提及浪漫主义。它倾向于推崇那种蔑视群众、愤世嫉俗的拜伦式英雄,那些在“鼠目寸光的大众”之上天马行空的天才人物。

---

[1] 参见维多利亚时代的爱尔兰学者莱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 1838 - 1903年)论述这种冲突的历史著作《欧洲理性主义精神的兴起及其影响的历史》(History of the Rise and Influence of the Spirit of Rationalism in Europe)。

无论某些浪漫主义者和某种理想化的“人民”(不要与任何真实的卑劣人性的典型相混淆)之间有多大的吸引力,他们的主要兴趣始终环绕着自我,非凡的自我。这种根本性的个人主义是与民主相抵牾的。

许多人注意到,尽管他们不喜欢民主,但是民主代表了未来的潮流。卡莱尔说,民主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要求”。与此同时,卡富尔伯爵在1835年认为,民主是“预定的进化”。两年后,红衣主教曼宁<sup>[1]</sup>认为:“欧洲的进程似乎趋向于通过召唤大量的人民进入政治权力,从而促进民族生活和行动的发展。”托克维尔的伟大探索乃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对民主的扩散,无论如何哀叹抱怨都无济于事,所能做的只有考察其后果,学会如何与之共存。



水晶宫

世界博览会,1851年

1847年,“社会浪漫主义”的政治演说家马志尼宣布:“上天的旨意乃由

---

[1] 曼宁(Henry Edward Manning, 1807 - 1982年),英国西敏寺大主教。

人类的进步精神所荣耀地显示出来:欧洲正在飞速地向民主挺进。”如果像马志尼等许多满怀希望的斗士那样确信人类进步的趋势,那么就几乎只能顺理成章地接受民主这一结果。最好的社会应该是让所有的人分享好处的社会。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达到一种完美的境地,那么如果所有的人都达到这种境地就更完美了——这就像中世纪用目的论来对上帝存在所做的论证:在现实存在的某种东西中有一种更完美的存在。随着现世进步的观念深入19世纪人们的思想,并且变成了伟大的信仰原则,它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民主。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导师、牛津三一学院院长休厄尔博士<sup>〔1〕</sup>在论述水晶宫世界博览会这个进步的象征时,把艺术和科学的进步界定为从为少数人服务扩大到为多数人服务。

## 1848年革命

鼓吹政治改革和社会拯救的思想在欧洲各地流传(拜伦和边沁在俄国的名气不亚于在英国),为1848年革命打下了基础。当时弥漫着期待救世主和大灾变的情绪。欧洲确实应该到了某个历史顶点。历史学家米什莱和基内等人<sup>〔2〕</sup>和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都用赞扬的笔法来呈现一直受到贬黜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甚至卡莱尔著名的法国革命史著作也表明,在革命恐怖的动乱中可以看到某些令人兴奋的预示。人类正在前进。不同的意识形态会对人类前进的目标各持己见,但是几乎没有人否认确有某种目标存在。

19世纪30年代是烦躁不安的时代;浪漫派青年先是在雨果的话剧《欧那尼》上演时奚落传统主义者,接着把矛头对准更大的目标。披着长发和身着奇装异服的“波希米亚人”在30年代创造了另类天地:麻醉品、同人杂志、另类道德、对自己出身的资产阶级的诅咒等等,在很多方面与130年后的激进青年很相似。1835年,在里昂丝织工人的一次起义之后,法国政府对164名激进分子(其中大部分是青年)进行“大审判”,判处了其中的121人。在监狱中度过一半生命的布朗基成为一个革命英雄。正如前面所述,马志尼组建了青年意大利党,先后被驱逐出意大利、法国、瑞士,直到30年

〔1〕 休厄尔(William Whewell, 1794 - 1866年),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2〕 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 - 1874年),法国历史学家。

基内(Edgar Quinet, 1803 - 1875年),法国诗人,历史学家。

代后期来到伦敦,从而成为后来许多政治流亡者的先驱。他在伦敦成为卡莱尔夫妇的亲密朋友。他继续以青年意大利党的名义写作和进行密谋,很快就成为一个名闻遐迩的人物。

在英国,宪章运动产生了一份签名人数众多的、要求民主选举议会的请愿书。国会下院对此不予理睬。工人阶级的发言人,如爱尔兰人费格斯·奥康纳,甚至对有产者发出威胁。罗伯特·欧文在晚年把注意力转向刚刚起步的工会运动。查尔斯·狄更斯和盖斯凯尔夫人<sup>[1]</sup>的流行小说包含着他们对社会的抗议和讽刺。甚至可以说,正是在这10年城市穷人的状况得到揭示。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与伦敦《晨报》发表的亨利·梅休<sup>[2]</sup>的报道遥相呼应。1837年,狄更斯发表了《雾都孤儿》。

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大辩论转到自由贸易与关税保护的争论上,具体体现为要求取消保护农业不受外国竞争伤害的谷物法的斗争。自由主义的工厂主组成了反谷物法联盟,把政治辩论引向基层。他们赢得了胜利。正是这一胜利和1832年议会改革使得英国在1848年避免了革命,以更稳健的步伐走向民主。

19世纪40年代,在法国新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中,有彼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他出身于手工业者阶级。他是一个不太系统但雄辩的写作者,提出“财产就是盗窃”这一轰动的说法。他反对不劳而获,主张废除非生产性的财产(《什么是财产》,1841年)。虽然马克思后来嘲笑蒲鲁东的经济思想过于粗鄙,但蒲鲁东可能是当时最有名的激进理论家,马克思在1843年特别希望能与他会面。蒲鲁东反对国家主义,对无政府主义传统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建议用农民和工人的合作社来解决经济上的不公正。他嘲笑当时另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的济世良方。后者鼓吹建立国家工厂。在蒲鲁东看来,问题的根本是需求,而不是生产。如果工人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国家工厂也会与私人工厂一样变得萧条。蒲鲁东的说法是解释经济萧条原因的消费不足论的经典表述。他支持“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在英国鼓动的货币改革。欧文派也在其中。他们希望通过某

---

[1] 盖斯凯尔(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 1810 - 1865年),英国小说家。1848年发表《玛丽·巴顿》,反映曼彻斯特的工人状况。

[2] 欧仁·苏(Eugene Sue, 1803 - 1857年),法国外科医生,撰写小说《巴黎的秘密》,于1842年在报纸上连载,引起轰动。

梅休(Henry Mayhew, 1812 - 1887年),英国新闻记者和社会学家。

种方式用劳动力作为货币的本位。

蒲鲁东很少长时间地停留在某一个观点上。当时的社会主义者通常不具有系统深入思想。但是他们关注越来越多的对路易·菲利浦于1830年建立的“资产阶级王朝”不满的人们。尽管七月王朝在允许言论自由和扶持教育方面已经相当自由了,但是它的宪法只允许少数有选举权,它的社会哲学是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它的口号“发财去吧”是经济个人主义的浓缩体现。路易·菲利浦是因革命而获得王位的,因此当1848年初暴烈的抗议活动到处蔓延时,他很容易接受劝说放弃王位。德国和奥地利都对巴黎发出的信号做出呼应。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欧洲大部分地区怒火沸腾。

米兰在3月爆发起义,赶走了奥地利驻军。威尼斯紧紧跟上,重演这一幕;皮蒙特国王查理·阿尔伯特令人吃惊地颁布了一部宪法,然后对濒于崩溃的奥地利宣战。马志尼从流亡地伦敦赶到巴黎,作为贵宾,受到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人、诗人拉马丁的接待,然后徒步跨越阿尔卑斯山,在米兰受到热烈的欢迎。伟大的作曲家威尔第几乎同时到达米兰,马志尼邀请他谱写一首战斗进行曲。这一段历史体现了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革命”。<sup>〔1〕</sup>

但是,从一开始革命者中间就存在着分裂的萌芽;温和派惧怕马志尼,而马志尼不信任温和派。温和派要的是立宪政府、法治、保护财产,绝不要社会主义,甚至也不要民主。各邦国也在相互猜忌,想方设法扩展自己的边界。民族意识几乎还没有形成。在米兰,保守的皮蒙特国王颠覆了马志尼的公民政府,允许奥地利人卷土重来。马志尼哀叹道,人民不是把国旗扔在原则脚下,而是扔在一个卑劣者的脚下。在那不勒斯,国王菲迪南惊魂甫定,就废除了他先前颁布的宪法。

在罗马,11月15日,群众攻陷了宫殿,杀死了反动的教皇顾问罗西伯爵,教皇遂化装逃离罗马。无所不在的马志尼立即成为罗马共和国的首脑。罗马共和国存在了3个月,然后被法国军队颠覆。此时新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选举了另一个波拿巴为总统(使激进派大失所望),而这位拿破仑三世得到保守的农民和天主教徒的支持。与此同时,德国的革命也昙花一现,在混乱中结束。法兰克福议会制定了一部冗长的宪法,但是发现没有

---

〔1〕 见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尔(L. Namier, 1888 - 1960年)的专著《1848年:知识分子的革命》(1946年)。

人准备好来实施它。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沙皇亚历山大的小弟弟)毫无自由主义色彩,迫不及待地支持反攻倒算。圣彼得堡没有发生革命。伦敦也是如此,尽管发生了一次宪章派的大集会。英国舆论对意大利的事业基本上表示同情,这与马志尼有很大关系。但是,英国也仅仅是表示同情而已。



理查德·瓦格纳

理论的混乱以及知识分子政治能力的不足(尽管马志尼在罗马政绩辉煌)被认为应对 1848 年的失败负责。1848 年成为历史上功败垂成的一个转折点。的确,1848 年,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对革命的参与以及他们对这种角色的力不从心都令人瞩目。拉马丁一度成为法国的政治领导人,后来怀着对人类的极度厌恶而退出政治舞台(“我见过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我的狗。”)理查德·瓦格纳<sup>〔1〕</sup>曾经是德累斯顿三头执政之一,后来被迫逃往瑞士。法兰克福议会里都是些气度恢弘的律师和教授。这段历史扫荡了人们对预言家、幻想家和无实际经验的人从政能力的信任。1848 年后,他们基本上退缩到象牙塔中。福楼拜大声呼喊:给我一个最高的象牙塔!在瓦

格纳令人晕眩的歌剧和波德莱尔创造的新型诗歌中,都可以发现那种经历革命政治后的幻灭。

但是,与所有的伟大历史事件一样,1848 年革命留下了许多长久的沉积物。普选权在 1848 年的法国一下子就确立下来,此后就以某种形式保留下来,从未废除。一种新的现实主义从 1848 年的幻灭经验中产生出来。浪漫主义无论在艺术中还是在政治中都不再时髦。年轻的马克思以《莱茵报》编辑的身份参与了德国的 1848 年革命。他在 1849 年逃到伦敦后,修改了原来认为革命迫近的观点。经过了将近 10 年的时间,社会主义事业才

〔1〕 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 - 1883 年),德国作曲家。

出现复苏的迹象。马志尼返回伦敦,沮丧地在一旁观看着意大利的统一是如何以远不如他所预言的那么浪漫的方式完成的。意识形态和“主义”并没有消亡,但是它们在后半个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的实证主义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体系,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政治中的实力政策也风行于世。浪漫主义者的悠然梦想和乌托邦主义者的淳朴方案看来都与时代渐行渐远了。

## 第九章 进步的理念： 黑格尔、孔德、马克思

### 黑格尔

康德之后德国哲学的领衔人物黑格尔于 1831 年死于霍乱(当时的一种瘟疫),享年 60 岁。黑格尔哲学在全欧洲的学术界所向披靡。直至 19 世纪末,甚至在英国和美国(有人认为它过于抽象和玄想而予以抵制)大学里的主要哲学家也基本上属于这个学派。不过,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这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由专业学术所继承的。虽然黑格尔本人是一个大学教授,但是他并没有陷入狭隘的专业,也不仅仅是为其他教授写作。他原先其实是一名中学教师,还做过家庭教师,后来是由于发表的著作而获得柏林大学的任命(按照出生地,他是南德意志人)。黑格尔的重要性或许主要是由于它对于马克思的影响而为人所知的。马克思于 1836 年到柏林求学,加入了解释这位大师思想的左翼派别。这些人自称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经受了黑格尔主义的洗礼。他不仅仅是一个弟子(他对黑格尔提出了根本性的批判),但是如果没有黑格尔主义因素,也不可能

有他的思想。

马克思不是黑格尔对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产生影响的惟一例子。通俗形式的黑格尔主义几乎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综合性对那些面对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的急速变化和纷纷攘攘的争论感到迷惑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俄国社会主义者别林斯基写道,当他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后,他受到震撼:世界有了新的意义。历史和世界不再是一片混沌;任何一个事件都在一幅展开的图中有自己的位置。“对于我来说,历史过程中再也没有什



么事情是任意的或偶然的了。”这种启示来自黑格尔的论断:“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如果理解不错的话,人类事件的过程显示了一种有目的的计划,是与宇宙的性质密切相关的。

这种“历史主义”并非始于黑格尔。作为西方文化之基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就是在人类历史中寻找意义和目的。可以说,黑格尔只是把这种人类与时俱进最终回归上帝的观念世俗化了。这不是反基督教的启蒙运动的特征;伏尔泰虽然对历史非常有兴趣,但他所看到的基本上是一部“罪恶、愚蠢和不幸”的记录,而且混乱不堪、无序可循,理性只是偶尔莫名其妙地取得胜利。但是,从卢梭开始出现了有的学者(F.C.李)所谓进步的“浪漫主义神话”,即经由历史从异化到回归,经由文明抵达历史时间终点时的更高完美境地。圣西门等社会主义者确信,“人类精神进步的最高法则”决定了历史进程;“人不过是它的工具”。德国浪漫主义民俗学家赫尔德接受了那不勒斯学者维柯尚无名气的“新科学”,支持另外一种历史主义,即认为人类是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创造着自己的命运。

当然,黑格尔所继承的遗产主要是德国哲学。康德的批判哲学把世界分成了主体和客体、本体和现象。黑格尔则提倡一种恢弘却模糊的整体论,即把宇宙看做是一个宏大的整体。绝对精神(相当于上帝的哲学概念)乃是包罗万象的惟一整体;它是通过有限的人类精神在历史中的发展而存在和呈现的。绝对精神力图通过这种精神的演化来完成自己。黑格尔解释说,绝对精神有3个部分:纯粹理念或者说自在的绝对精神、自然或者说自为的绝对精神以及自在而自为的绝对精神。研究纯粹理念的哲学是逻辑学,即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逻辑、具体的逻辑;它高于传统逻辑的静态概括。研究自然的哲学是自然哲学,即各门提高到哲学层次来理解的经验科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试图揭示人类的意识是如何与外部的社会演化模式联系起来的,内心和外界的辩证互动是如何在一种无限的变化过程中向上向前演进的。

因此,世界在理念上的根本统一也就是人类通过辩证发展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精神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精神在人类历史中的自我实现最终导致(或者说更密切地接近)充分的自我意识,即外部异化的物质领域不断地与精神遭遇,被精神所征服和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简单的正-反-合的公式。而且,这个公式是费希特首先提出来的。它常常被用于表述一个进程,一种变化的动力:首先是一种状况或一个陈述,然后是对它的否定,最后是一个包含并调和这二者的新陈述,接下来又会遇到新的

否定,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请记住,对于黑格尔来说,这种过程不仅仅是一种论辩结构,而是宇宙的运转方式。作为起点,有(存在)被无(非存在)否定,在“生成”中形成综合,世界由此开始。这是一个流动中的世界,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因此它的逻辑只能是辩证逻辑,而不是静态逻辑。

所有这些都十分抽象晦涩,令人望而却步,不过黑格尔并不乏具体的论述。比较务实的历史学家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完全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黑格尔学识渊博,讲授过自然科学、法律、国家、政治和宗教。他力图把实在的物质世界纳入他的理念的精神领域。他是否提出了一种唯心主义,把实实在在的现实归结为虚幻缥缈的精神?他最著名的弟子马克思对此做出肯定的论断。黑格尔是否写过,“历史是披着事件外衣的精神”?马克思嘲笑黑格尔使形而上学具有自然或人类存在的外形。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发现了正确的方法,但是他把历史进程的主体错误地视为抽象的理念或意识,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给它蒙上了神秘主义”。我们的起点应该是有感知能力的人,他们是在工作中而不是在思想中实现自身,他们是在工作中产生思想。



黑格尔(1770 - 1831 年)

但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解释不一定正确。黑格尔似乎把历史进程视为精神与物质的斗争,前者先把自己对象化,然后再竭力克服这种异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至少是帮助了上帝或绝对精神来达到它们的目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差异可能比某些人想像得要小。他们不过是强调了辩证法的不同侧面。重要的是,他们两人都不像他们各自的一些门徒那样固守一种决定论的体系,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他们两人都看到思想和物质之间有一种真实的互动关系。列宁曾经指出:“

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

黑格尔并不像有些人指责的那样认为历史的模式可以完全用逻辑来确定,无需考虑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研究人的行动、实际发生的事件,但是我们必须“把事情看透”,进而发现它们的内在逻辑。这样做,我们不一定能为历史找到一种整齐的逻辑图式,但是我们会发现更宏大的意义模式。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人类历史有三个主要阶段:亚细亚阶段,古典希腊

罗马阶段,日耳曼—欧洲国家阶段。它们的标志分别是绝对君主权力、地区性自由(城邦)以及综合了二者的强大国家中的自由。黑格尔的弟子鲍威尔<sup>[1]</sup>把辩证法用于圣经新约研究,发现正题是犹太民族主义,反题是保罗的普世主义,合题是公元2世纪出现的成熟的基督教会。这种削足适履使鲍威尔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任意剪裁历史是很危险的。但是提出假说是必要的。在这个时代,专业的“科学的”历史学繁荣发展,在德国尤其如此。与黑格尔同时代的兰克和尼布尔<sup>[2]</sup>等历史学家重视利用档案材料和考证文献。他们认为黑格尔过于玄虚。但是,他给历史赋予了深刻的哲学涵义,从而唤起人们对历史的极大兴趣,因此所有的历史学家可能都应该把他们的专业基础归功于黑格尔。过去从此不仅仅是信而好古者的消遣对象或者娱乐和编写故事的资料,而且是令人振奋的人类进步景象。它如果能够得到正确的读解,将会告诉我们有关人类生存目标的基本真理。

黑格尔是从政治角度来界定历史时代的。在奥古斯特·孔德看来,关键是思维方式,而马克思则认为是经济生产方式。黑格尔对政治的偏爱反映了当时德国处于分裂而谋求政治统一这个政治问题的紧迫性。黑格尔有理由认为,当下时代的主导制度是民族国家。19世纪多数历史学家像英国史学大师弗里曼<sup>[3]</sup>一样相信:“历史是过去的政治。”反对这种狭隘定义的呼声不绝如缕,但还是有理由说,政治秩序通常给各个时代打上突出的印记,从古老的东方专制制度到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封建制度到领土型民族国家的时代,乃至某种欧洲联盟。政治只不过是人们组织起来集体生活的方式;它是一个基础。如果社会没有找到一种政府管理方式,既不可能有有效率的经济生产,也不可能思想文化生活。无论如何,在杰克逊和林肯的美国也好,在狄斯累利和格拉斯通的英国也好,在俾斯麦的德国也好,19世纪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时代。

有人指责黑格尔鼓吹强权即真理。与所有宣称宇宙具有合理性的学说体系一样,黑格尔的体系似乎要人们相信,凡是发生的事情都是有好处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任何历史时刻的主旋律都是适逢其时。代表

---

[1] 鲍威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1792 - 1860年),德国神学家,神学杜宾根学派创始人。

[2] 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 - 1831年),德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3] 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英国历史学家。

这种主旋律的社会集团都具有其历史正当性。“历史时刻会光顾每一个民族”。有些民族是“世界历史性”的民族,注定要比其他民族对“伟大的设计”做出更多的贡献。一切事情包括战争都是图案中的必要组成部分。黑格尔多次宣称,作为个体的人是历史目的论的不自觉的工具,“理性的狡计”利用人们来达到它的超验目的。这种元历史的决定论通常都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把后者当做自己的运作手段。许多批评家认为这里面包含着导致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危险。当然,黑格尔鼓舞和支持了救世主义类型的民族主义。霍布豪斯<sup>[1]</sup>后来竟然指责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因!举一个例子来看,波兰的民族主义者、黑格尔的信徒奥古斯特·基耶兹柯夫斯基伯爵<sup>[2]</sup>就用黑格尔和赫尔德来论证他的大斯拉夫国家的主张,认为它将为人类演进的下一个阶段、或许是最后一个阶段增添光彩。与其他民族主义神话一样,泛斯拉夫主义也喜欢这样的思想家,因为他似乎在教诲人们,历史有一个大势所趋的目标,这种历史进步的承担者是“历史性的民族”。

黑格尔不仅支持民族主义事业,而且他也关注着其他方向。认为万物皆有必然地位的整体论显然也会给任何一种事业留有余地,只要它们显示出必然的动因。黑格尔本人的政治观点有些暧昧。在某些方面他是一个“右翼人士”。虽然他年轻时是狂热的拿破仑支持者,但是他的主要政治著作确是反动时期的作品(《法哲学》,1821年);他宁要君主制,不要民主,而且反对个人主义。黑格尔推崇自由,但不是消极自由,即自由放任。他的积极自由是卢梭所谓的“强迫下的自由”;自由被说成是可能性的实现。以小孩子为例,我们强迫小孩子上学是为了扩大他成长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如果让他选择,他不会选择上学。在黑格尔看来,愚昧无知就是奴役状态。“自由的”野蛮人实际上远远没有现代人自由,尽管后者受制于国家统治。任何生物都不是绝对自由的,只有实现其自然赋予的可能性的自由。鸟可以自由地飞翔,但不能像鱼一样游泳。人作为有理性的生物是通过开发自己的理性潜能来实现自由,而这就可能需要牺牲许多行动的自由。我们必须生活在一种有组织的国家里,服从它的法律,遵从共同体的利益。

如果说黑格尔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或某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没有什么

---

[1] 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ey Hobhouse, 1864 - 1929年),英国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

[2] 基耶兹柯夫斯基(August Cieszkowski, 1814 - 1894年),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

比专横的权力更与他的思想格格不入的了),那么他的许多信徒却并非如此。有些人成为右派(强调秩序、纪律和国家实力),有些成为中间派(强调立宪政府和法治),但是还有些“青年黑格尔派”成为无神论者或共产主义者,其中马克思最为知名。别林斯基也是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黑格尔也影响了反对经济个人主义的温和派,例如19世纪80年代英国主张福利国家的重要思想家格林<sup>[1]</sup>。当黑格尔推崇国家的时候,他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使用国家这个词。在他的体系里,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辩证综合,或者说是普遍与特殊结合成的“具体的普遍”。在辩证法里,更高的形式绝不是废除了原先的形式,而是一种上升。“市民社会”意指私人利益相互竞争的经济领域——这是政治经济学家驰骋的世界。市民社会是必要的,但还不够,需要有国家来纠正它的不公正之处,使之井然有序。黑格尔认为,国家应该凌驾于私人领域这个共同体之上,应该代表整个社会。马克思正是在这一点上批评黑格尔。马克思认为,国家只能反映市民社会某一阶段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必然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把一个资产阶级经济与一个真正的社会国家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但是,黑格尔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

黑格尔并不是像蒲鲁东以及其他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把国家想像成一个与其臣民对立的利维坦,一个威胁恫吓人民的恶霸。他的国家更接近卢梭的公意,是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合理精神的体现。这种观点对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有吸引力,因为它既考虑国家的要求,也不忽视个人的要求。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只有成为公民,个人才能完全自由和拥有权利。这种支持联合、反对个人主义的倾向,尽管带有保守色彩,却使黑格尔受到较温和的社会改革者的偏爱。

当然,马克思在黑格尔主义中所看中的是辩证法所暗示的通过革命方式、历史不断进步的变动意识。当受到束缚的变革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刻突然爆发出来时,革命的时刻就来临了。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演变进程究竟会带来什么结果;正如黑格尔最著名的一句格言所说,密纳发的猫头鹰只是在黄昏降临了(The and of Minerva flies late)才起飞;历史学家在一件事情发生之前从来不会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黑格尔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暧昧立场也体现在他的宗教观念中。宗教问题当时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最紧迫的问题。黑格尔是一

---

[1] 格林(Thomas Hill Green, 1836 - 1882年),英国政治哲学家。

个毫不含糊的基督徒,他的哲学是与正统信仰相一致的,也是对正统信仰的支持。但是,丹麦牧师克尔凯郭尔<sup>〔1〕</sup>指责他把基督教理性化、抽象化,从而使之丧失了活力。尼采也如是说。“说上帝就是精神的那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向无信仰迈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一步。”黑格尔的新式经院哲学让理性和宗教重合在一起,但最高的综合是哲学。基督教是一种象征或神秘的表达方式,适合于那些不能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基督教有幸能够让自己的稍微低级的表达与黑格尔哲学一致。如果说许多基督徒因为发现自己的信仰与最先进的哲学一致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那么当然也会有许多人反感这种恩赐态度。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与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一起把宗教抛在一边,仅仅考虑黑格尔的哲学,并把它转换成一种纯粹世俗的和人道主义的陈述。青年黑格尔派表现出对圣经研究和宗教研究的热忱。马克思的激进事业的起点是无神论,而不是社会主义。大卫·施特劳斯与他们关系密切。他的考证性著作《耶稣传》(1835年)是19世纪最轰动的书籍之一。它属于最早把基督教创始人当做一个历史人物来对待的重要表现之一。施特劳斯很有底气地宣称,真正重要的不是有关耶稣的那些事实的真伪,而是他的生平所表达的理念。

后黑格尔派沿着黑格尔的思路向前迈出一步,就超越了黑格尔。他们发现,上帝不过是人类的一个发明。处于现在精神发展的高级阶段,人们能够看清它所代表的纯粹是人类的一种抱负。马克思的导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宣称:“政治应该成为我们的宗教。”在意大利,黑格尔主义变成了反教权主义者的信条,后者认为国家高于教会。因此,罗马天主教会1864年颁布著名的《谬误举要》,列举现代异端思想,也把黑格尔主义作为一种反教权的自由主义列入其中。实际上,黑格尔把宗教从历史领域里排除出去,认为进步只是社会和政治进步,与宗教无关。他把个人宗教信仰与公共事务明确地分开,这是一种传统的路德派立场。

作为一种宗教的替代品,黑格尔主义提供了一幅人类为了实现上帝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挺进的画面,每个人在其中都有一份贡献。我们的鸿鹄志向就是因为我们作为这项伟大的集体事业的一分子而产生的;即便我们有限的成就让我们感到沮丧,我们还是会满怀信心全力以赴,因为我们知

---

〔1〕 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 - 1855年),宗教存在主义的奠基人。

道,我们的努力会在伟大的图案中占有一席之地。

黑格尔主义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一个罕见的统一的整体哲学。它是19世纪的几个体系中的第一个。只有孔德、马克思的体系以及斯宾塞的达尔文主义体系能够与之相提并论,而且,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思想还是来自黑格尔。当时人们被突如其来的急剧变化和层出不穷的新思想搞得不知所措,因此需要这样的综合体系。黑格尔提供了一个显然令人满意的统一体,让一切各就其位,并且揭示出令人眼花缭乱的事物表象背后的秩序。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孰是孰非?面对这个问题,黑格尔主义者会回答说,三者都有道理。它们各有其时间和空间的位置,都是不断进行的对话中的一个角色。面对革命和反革命、战争和政治动乱,黑格尔主义者会表示,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必然格局的组成部分。黑格尔为理性和宗教二者都找到了位置。许多人认为二者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但黑格尔认为它们不过是表述同一个真理的不同方式。这种调和体系几乎与托马斯·阿奎那在13世纪中世纪文明的巅峰时期所提供的调和体系同样令人瞩目。

黑格尔的影响遍及欧洲各地,除了专业哲学家外,还影响了其他各种各样的人。这是一个辉煌的成就<sup>〔1〕</sup>。19世纪后期,由于布拉德利和鲍桑葵的作用,黑格尔的思想方式在英国的大学里安了家。另外,自19世纪80年代起,由于格林的作用,黑格尔的国家观成为反对自由放任式个人主义的一个资源。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和秦梯利<sup>〔2〕</sup>使黑格尔主义在意大利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到19世纪末,出现了一股潮流,反对黑格尔的僵化的一元论;美国实用主义者威廉·詹姆士认为它是一座不通空气、令人憋闷的房子。20世纪有一些实证主义者对它发起激烈的攻击;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部重要著作中,自由主义者卡尔·波普(生于维也纳)实际上把极权主义世界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黑格尔的有害影响。(仿佛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列宁和斯大林都是黑格尔的信徒。)但是像亚历山大·科耶夫<sup>〔3〕</sup>这样的哲学家重新燃起了左翼对黑格尔的兴趣,发现他比马克思更有说

---

〔1〕 这种影响可能是间接的。黑格尔的学说曾经使拉美感到震惊,但是在这位伟大的法国诗人去世后,人们检查他的书房时发现,所有的黑格尔著作都没有裁开。同样,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读过马克思的书。——原注

〔2〕 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 1875 - 1944年),意大利哲学家。

〔3〕 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 1902 - 1968年),俄裔法国哲学家。

服力。

总之,黑格尔一直是一个几乎永不枯竭的源泉。20 世纪的存在主义者莫里斯·梅洛-庞蒂宣称:“所有伟大的哲学思想均源于黑格尔。”确实有许多存在主义者追溯到黑格尔;让-保罗·萨特的词汇——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就出自黑格尔。奇怪的是,存在主义的另一位伟大的先驱者克尔凯郭尔则强调人类意识的根本不受制约的自由,反对他心目中的黑格尔思想。

无论对黑格尔学说的其他方面如何评价,没有人能够否认,黑格尔是一个揭示运动和变化的哲学家;他的宇宙观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他把事物放在过程、发展和演变之中。与达尔文后来所暗示的不同,在黑格尔看来,世界的演变不是盲目的或偶然的,而是有目的的,旨在实现更大的完善。

## 孔德

在德国,“回归康德”运动——告别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方向,回到现象论——所扮演的角色有些类似实证主义在法国的作用。从 1850 年至少到 1880 年,实证主义大有占据思想舞台中心之势。

伯里<sup>〔1〕</sup>在他那部经典之作《进步的理念》一书中,把孔德奉为 19 世纪进步信念的典范。马克思在年轻时不断地与黑格尔的幽灵搏斗,但从来没有能完全摆脱它。他认为,法国这位社会学创始人与黑格尔相比在哲学上“极其可怜”。情况确实如此。孔德的“实证主义”明显地继承了法国启蒙运动的反形而上学精神,主张固守事实,避免无谓的形而上学思辨。在法国复辟时期,维克多·库赞<sup>〔2〕</sup>创作出具有黑格尔主义性质的哲学,但是相当晦涩。启蒙哲学家和观念学家的传统要强大得多。

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6 卷)是在 1830 年到 1842 年陆续问世的;1848 年后,在后浪漫主义岁月,这部著作开始流行;实证主义成为第二帝国时期的思想正统。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在这个巴斯德和贝尔纳<sup>〔3〕</sup>的时代,

---

〔1〕 伯里(John Bagnell Bury, 1861 - 1927 年),剑桥大学历史教授。

〔2〕 库赞(Victor Cousin, 1792 - 1867 年),法国折衷主义哲学家。

〔3〕 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 - 1895 年),法国微生物学家。

贝尔纳(Claude Bernard, 1813 - 1878 年),法国生理学家。



自然科学享有崇高的威望。巴斯德和贝尔纳都自称是孔德的信徒。实证主义看来比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更适合做科学的哲学基础,比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更适合做政治秩序的基础。

约翰·穆勒写了一部著作论述实证主义,对于实证主义在英国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查尔斯·达尔文在1838年受到马尔萨斯的重要启发,几乎同时也读到孔德的著作,从中汲取了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生命的观念,摆脱了神学——或者说,摆脱了一种新型科学神学。英国的孔德主义者比斯利教授是马克思的朋友,在1864年实际上主持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次会议。乔治·艾略特及其丈夫也对孔德推崇备至。19世纪50年代剑桥大学教授理查德·康格里夫也是孔德的信徒。他的一个学生、历史学家和随笔作家弗雷德里克·哈里森是英国最主要的实证主义宣传家。

19世纪70年代,实证主义在俄国知识分子中也很流行,前承黑格尔,后接马克思,成为热忱的向西方学习者偏爱的时尚。后来成为最伟大的女性科学家的波兰姑娘玛丽·居里,在年轻时出入实证主义者圈子,遭到沙皇警察的极度怀疑。在意大利,实证主义成为19世纪后期的主要哲学流派,其主要代表是罗伯托·阿尔狄哥<sup>〔1〕</sup>。总体来看,孔德的实证主义也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一样,成为19世纪上半叶这个综合的时代的主要体系之一。有人把黑格尔称作又一个阿奎那,巴兹尔·威利<sup>〔2〕</sup>也把同样的称号送给孔德。不过,这位19世纪的经院学者不是把自己的《大全》“建立在独断的神学之上,而是建立在独断的科学之上”。

我们在孔德那里可以见到与黑格尔同样的政治暧昧立场。孔德(曾经担任圣西门的秘书)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他与卡莱尔一样认为,经济个人主义导致不负责任的无政府状态,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让利他主义高于利己主义。孔德认为,社会演进的规律总是从利己到利他。他反对正统的宗教,而代之以科学的宗教。孔德提出的人道教对于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具有吸引力。这位无所畏惧的科学工作者,人类的勇敢奉献者,坚决反对迷信和谬误,挑战教会和所有束缚人类探索的人。

与此同时,孔德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大受欢迎。拿破仑三世推翻了1848年建立的共和国,推行威权主义统治,但是他也有一些进步的纲领。经历1848年革命的一代人因幻灭而远离政治,躲在象牙塔中埋头艺术或

---

〔1〕 阿尔狄哥(Roberto Ardigo, 1828 - 1920年),意大利实证主义哲学家。

〔2〕 威利(Basil Willey, 1854 - 1897年),英国历史学家。

科学。孔德不喜欢革命,也不喜欢民主,偏爱秩序井然的等级社会<sup>〔1〕</sup>。19世纪末,夏尔·莫里斯的准法西斯组织“法兰西行动”就对他表示敬意。约翰·穆勒虽然对实证主义的某些方面产生兴趣,但他宣布,孔德的社会方案是“人类的大脑所能构想出来的最彻底的从精神到世俗的专制主义体系,或许只有罗耀拉能与之媲美”。这位法国的不可知论者(指孔德)与那位西班牙耶稣会创始人一样,害怕思想自由和混乱,推崇教阶制度。不同的是,孔德的教会必须是由科学家来领导。

按照孔德的著名的人类发展三阶段论,根据各个时期的主导思维方式,人类社会从神学阶段发展到形而上学阶段,然后再发展到实证阶段。孔德笔下的历史至少与黑格尔笔下的历史一样是思辨的;史实是无法塞进这种图式的。例如,人类学家就不再接受孔德关于宗教进化的观点,即从物神崇拜到多神教再到一神教。历史学家也会指出,科学早在古希腊人那里就出现了,形而上学迟至与孔德几乎同时代的黑格尔还存在。如果孔德的公式简化成一个命题:原始民族不可能进行现代思维,那么这几乎就是一句同义反复的废话。对于这种简单化的历史分期,包括马克思的5个经济阶段和黑格尔的3个政治阶段的划分,人们总会有各种反对意见。(孔德有可能知道18世纪那不勒斯历史哲学家维柯。维柯生前默默无闻,但后来被赫尔德复活了;维柯发现所有的文明都从宗教或神权阶段,进入英雄—贵族阶段,然后进入凡人或民主阶段,每一次的过渡都很突然,“一阵隆隆的雷鸣”就结束了前一个时代,开始了下一个时代。但是,这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进步,而是一个无限的循环。)不过,像约翰·穆勒这样目光敏锐的批评家也认为,孔德的三阶段论乃是理解文明自然演进的一把富于启发性的钥匙。

欧洲正在进入实证阶段,需要在此基础上重建其文明。孔德把实证主义定义为一种观察事物的方法。它需要运用假说,但是不对现实的本质做出任何结论。孔德赞同康德的观点:科学仅仅研究现象。用他自己的话说,“人的心灵认识到,获取绝对理念是不可能的,因此放弃对宇宙起源和目的的探寻,也不再试图去了解事物的终极原因。这样做是为了集中精力通过把理性和观察结合起来的实验来发现实际有效的定律,即事物嬗替和

---

〔1〕 美国南方的奴隶主(例如乔治·菲茨休)用孔德的学说来论证他们主张一个有机、稳定和威权主义社会的观点。——原注

相似的不变关系。”这种思想不太新颖。欧内斯特·勒南<sup>〔1〕</sup>本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孔德的信徒,但是他批评孔德“用糟糕的法语”说出200年来所有的科学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样说不太公平;只是自康德以后人们才对这些东西有了清楚的了解,而孔德揭示了其中的许多含义。在哲学上,他或许比那些教条地坚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更敏锐;他认为,唯物主义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可能言之凿凿地说现实的本质是什么。(列宁会反驳实证主义或现象论,而主张一种知觉直接复写论,后者在哲学上是很天真的,但是给生机勃勃的唯物主义开启了大门。马克思主义者似乎觉得实证主义有些乏味,不适合革命者的需要)。

基于同样的理由,孔德认为无神论也不能得到证明。我们对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都不能获得确定的知识。科学仅仅是描述性的;我们甚至不能谈论“原因”,只能谈论“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发生的)序列”。在《实证哲学教程》中,孔德把各门科学安排在一个逻辑秩序之中。从最抽象的数学开始,然后是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最后是最具体的学科,他称之为社会学。当然,他自认为是最后这门最伟大的科学的发现者。他的社会学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而且很独特地将伦理学包括在内;自孔德之后,人文研究还有所发展。孔德承认,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因此不能把社会科学“还原”为生物学,也不能把生物学“还原”为数学。社会学家把社会现象转换成统计数字,实际上是对其学科创始人的下述警告置若罔闻:这种做法往往“是用一种大话来掩盖概念的空泛”。

后期(在堕入情网之后),孔德把伦理学和宗教放在最高位置,甚至高于社会学,并且创造了一种人道教。第二代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无情地嘲讽那些创立新宗教的科学家,这显然也击中了孔德的要害。孔德似乎是无可救药地把他的多重角色——社会科学家、社会改革家和宗教先知——混淆起来了。不过,这几种角色的混合也使他的体系对大众具有了吸引力。他的英国弟子弗雷德里克·哈里森曾经吹嘘说:“实证主义既是一种教育规划,又是一种宗教、一个哲学流派,还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它真的兼有这些性质吗?

作为一个哲学流派,实证主义得以延续下来,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精深(参见第十三章论述的逻辑实证主义)。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延续下来,只

---

〔1〕 勒南(Ernest Renan, 1823 - 1892年),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是它的范围现在比孔德设想的狭隘得多。人道教与前两者枘方凿圆,扞格不入,但是一度曾显示出令人震惊的活力。当时的知识界渴望建立一种新的信仰。许多地方,远至巴西,都出现了孔德教会。(实证主义在拉丁美洲极其流行。)英国和法国都建立了实证主义协会,崇奉历史上的伟人——按照孔德的建议,用这些伟人取代基督教的圣徒。当乔治·艾略特表达一个诗人的愿望时,她正是这样想的:

加入由不朽的先辈组成的无形的合唱,  
他们在人们心中复活,使心灵更加辉煌。

孔德以科学的精准原则来做这一切,显得颇为滑稽:从阿基米德到牛顿等,供人们崇奉的伟人不多不少 81 人。

这很像卡莱尔所推荐的现代的价值源泉:英雄崇拜。而且他们两人都深受圣西门的影响,这一事实显示了这位法国的理性主义者(孔德)和那位苏格兰的雷公(卡莱尔)之间的一种奇怪联系。20 世纪的学者、研究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历史的沃尔特·E·霍顿指出,英雄崇拜一度相当流行,成为一种替代性宗教,“继承了原来由教会所履行的职能”。塞缪尔·斯迈尔斯<sup>〔1〕</sup>所撰写的成功的资本家和工程师的动人传记则给民众提供了榜样。但是,实证主义教会远远没有达到创始人的期望。实证主义主要成为“理性主义者”即反宗教激进分子的旗帜。

孔德去世后,实证主义在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极其时髦。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当时的名流大家,如生理学家克劳德·贝尔纳、辞书专家艾米尔·利特尔、历史学家伊波利特·泰纳以及最耀眼的全能“文人”勒南。这批人基本上把孔德涉足宗教视为一种怪癖,只接受他的科学方法。但是他们倾向于把科学作为一种替代的宗教。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最终认识到,科学本身不能给我们提供价值、理想和目标。迄今就我们所知,价值、理想和目标只能出自于对大自然的经验研究之外。他们所持有的信念——科学是一项有价值的天职,因为它对人类有益——是很难用科学方法来证明的。

勒南这位热忱的探寻者一直在寻求一种能够与他的科学世界观和平共处的宗教。与当时英国的那位精神同道马修·阿诺德一样,勒南对信仰

---

〔1〕 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 1812 - 1904 年),苏格兰作家,著有《自助》、《工程师们的生平》等。

的退潮痛心疾首,渴望获得宗教体验。他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否定基督教;他的《耶稣传》是最知名的《圣经》“高级评注”普及读物之一。该著作对基督教的超自然主张进行了考证批判,触动了全欧洲的正统基督徒。他还否定过于抽象玄虚的黑格尔主义。他与波德莱尔和福楼拜一样,倾向于创造一种艺术宗教。但是,他毕生苦苦追求而不得的是“科学的宗教”。他最终成为一个怀疑主义者。

他在经过实证主义改造的黑格尔主义中几乎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即人类在历史中的进步提供了上帝存在的证据。在生命的终点,他仍坚持说:“科学本身就能把灵魂引向上帝。我的宗教依然是理性的宗教,即科学的宗教。”对于思考不多的大众来说,科学以新技术作为武装,为进步信念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依据。到19世纪80年代,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变得惊人的明显。而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就是科学。对于一些像勒南这样懂得社会对价值观的需求的人来说,科学也能够提供这些价值观念。但是,到19世纪末,这种观点在知识分子中就不太常见了。在诗人和宗教人士中开始出现视科学唯物主义为精神之敌的反击潮流。当然,这种情绪属于下一个时代。

19世纪后半叶是取得伟大的科学成就的时代。西方文明变得越来越具有实证主义色彩,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思维方式受到排斥。日常生活充斥着科学和技术,受到机械模式和解释的影响,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觉的精神生活当然应该恪守所谓实证主义的规范,反对任何没有直接经过实验或论证来验证的真理。维多利亚时代的银行家兼作家白哲特<sup>[1]</sup>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生长的是某种实在的东西。”他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商业和科学。法国学者贝特洛<sup>[2]</sup>在1885年抱怨说:“这个世界今天已经没有秘密可言。”

不久前哲学家卡伊·尼尔森<sup>[3]</sup>指出,自启蒙运动起,思想史的全部冲动“是在确定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时,把科学的权威而不是宗教或哲学的权威变成自己的第二天性”。“世界逐渐解密”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形而上学(即那种认为无需和先于经验研究,纯粹哲学思考就可以设计出

---

[1] 白哲特(Walter Bagehot, 1826 - 1877年),英国博学多才的经济学家,作家。

[2] 贝特洛(Marcellin Berthelot, 1827 - 1907年),法国化学家,政府官员,曾任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

[3] 尼尔森(Kai Nielsen),加拿大哲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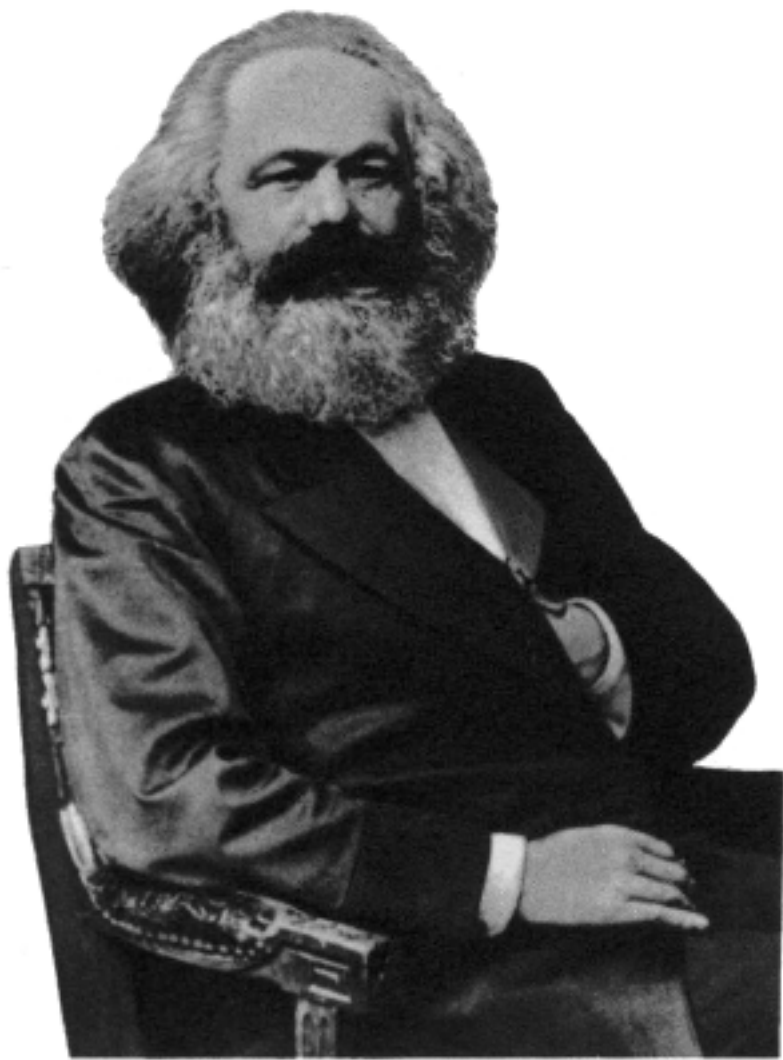
世界的基本范畴和要素的信念)已经不再能起信仰治疗的作用。孔德的实证主义在两代人之后被逻辑实证主义所承袭。后者是一种更精深复杂的哲学,但同样反对形而上学。

诚然,在激烈地反对这种生活“理性化”时,一群边缘的艺术家和诗人声称反抗科学理性,而且这种反抗愈益明显。因此,孔德虽然不是这种理性化的发明者,也不是惟一表达这种理性化的思想家,但他的确代表了现代西方文明的一种基本特征。

## 马克思

关于孔德的评价在许多方面也适用于马克思。马克思与其他一些青年黑格尔派背离了老师的思想,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或现象论。他们

认为,黑格尔把思想说成是第一性的,这是本末倒置,等于用车来驾马,让儿子生出父亲。他必须“颠倒过来”。现实实际上是物质性的,观念仅仅是物质存在的投影。在人类历史中,我们的出发点是真实的、感性的人,而不是幽灵般的观念。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认为,上帝是人的发明,是人类理想的投射。(其流行作品《基督教的本质》被乔治·艾略特译成英文。)在19世纪30年代青年黑格尔派这个柏林的小团体中,马克思的老师布鲁诺·鲍威尔有一



卡尔·马克思

句名言,后来经常被错当成马克思的话。这就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也加入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队伍,一起创造无神论档案馆,结果使他丧失了一个获得大学教职的机会。

马克思是莱茵地区的一位律师和公务员的儿子。他脱离了充任犹太教拉比的家族传统。虽然他的父亲是启蒙运动自然神论的拥护者,但年轻的马克思却具有激烈的反宗教观念,这既得自于浪漫派诗人,也源于他自己的暴躁脾气,或许还来自于他的博士论文所探讨的古希腊唯物主义者。起初,他迷恋拜伦的风格,写了一些浪漫主义诗歌,但不太成功。马克思思想深处的浪漫主义结构表现为他的造反观念、普罗米修斯不惧天神的精神、对受压迫者的同情以及对商人市侩的敌意。他从波恩转学到柏林大学改学哲学后,就加入了黑格尔派小圈子。他先后受到青年黑格尔派摩西·赫斯这位“共产主义拉比”和恩格斯的影响,接受了社会主义。恩格斯的父亲是莱茵地区的一个棉纺织业资本家,在英国曼彻斯特有分支业务。年轻的恩格斯根据英国国会对令人震惊的工厂状况的调查和自己在曼彻斯特的亲身体会,于1844年发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他后来成为马克思的终身战友和支持者。

另一位青年黑格尔派波兰人基耶兹柯夫斯基发明了另一句名言:在黑格尔之后,接下来应该去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马克思是天生的活动家,也是一个杰出的宣传家。他获得一份为科隆的一家报纸做撰稿人的工作,后来成为该报的主编。但是,他很快就因冒犯新闻检查制度而丢了工作。他离开自己的家乡莱茵地区,目光转向西边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荟萃之地巴黎,同时他还在继续从事一项对黑格尔的批判研究。1843-1844年,马克思试图在巴黎创办一份《法德年鉴》杂志,但仅仅出了一期。他在其中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无产阶级(这是社会主义先驱圣西门使用的概念,马克思可能早就熟悉它了)已经显露于世,注定成为人类的解放者,体现着历史辩证法的下一轮运动。

马克思在庞杂的1844年“巴黎手稿”(长期不为人知,20世纪才公之于



摩西·赫斯

世)中批判黑格尔,和恩格斯一起批判费尔巴哈、施蒂纳以及其他黑格尔派战友。他和恩格斯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神圣家族》,后者出版后悄无声息,前者则丢在一边“让老鼠去批判”。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原来表示精神外化为自然(然后再克服这种异化),马克思则加以改造用于表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身上发生的情况,即过分的劳动分工和他人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占有,剥夺了工人对创造性劳动的满足感。马克思在早期比晚期更强调这个异化概念。(他把这个思想的来源主要归于“博士俱乐部”的另一个成员摩西·赫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不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疏离),而且也与自身及其他工人相异化(疏离)。这是对一个靠着“金钱关系”(马克思借用卡莱尔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人际纽带来运转的、机械化和理性化的社会所做的心理学批判。

马克思与家乡一位男爵的女儿、自己青梅竹马的爱侣结了婚,但是他对事业的选择让他的母亲和岳母都大失所望。1845年,这位激进青年被德国和法国驱逐出境。他迁居比利时,如其所愿地积极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认为这个由威廉·魏特林领导的手工业者团体过于道德化,在理论上太天真;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更科学的理解”而不是他们原来那种“不现实的人道主义”。他们把他视为一个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但是在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他们撰写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是两人思想的一个简化的陈述,长期受到信徒们的珍重。马克思的那些比较晦涩的著作使他们感到神秘,而这份宣言则使他们能够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历史由阶级斗争构成;今天因资本主义出现了危机,这种冲突变得更加尖锐;各种社会主义因为缺乏足够的理论理解和历史知识而批判力量不足——这些观点引出了一个呼唤无产阶级革命的激昂号召:“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1848年,欧洲各地爆发了革命,但几乎毫无共产主义性质。30岁的马克思回到5年前工作过的科隆主编一份报纸。统治阶级可能发抖了,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他们很快就恢复了勇气,利用革命者之间的混乱和矛盾,重新控制了局势。到1849年年中,马克思和燕妮(后者又生了一个孩子)典当了家传的珠宝,逃到伦敦。伦敦是那一年反动时期许多大陆革命者的避难所。马克思夫妇在伦敦度过了自己后来的生活。

马克思最初的生活十分艰难,他的6个合法子女中有3个幼年夭折。但是无须掩盖一个事实,即马克思通常的生活是富裕的,能够满足他的随意而大方的天性,因为恩格斯和其他朋友给他提供津贴,而且后来这种支



持变得有些过于奢侈了。当然，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在这个外国流亡者麇集的伦敦，马克思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教授或一个有地位的“文化人”。他为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撰写欧洲报道也能获得一些收入。有些人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位伟大的资本主义反对者竟然一直被一位资本主义的报业大亨养着（尽管格里利对社会主义也有兴趣）。从1851年到1862年，这份报纸发表了署名马克思的487篇文章。尽管其中有四分之一多是恩格斯撰写的，这种数量还是令人叹为观止，许多文章生动活泼，其中可以发现《资本论》的蛛丝马迹。

《资本论》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马克思为之付出了智慧和精力。他沉浸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只是偶尔停顿一下，写一篇应时之作。他对近期发生社会革命已经不抱幻想；他被迫承认，资本主义比他想像的生命力要长久。马克思到伦敦的第一年就见到正在准备1851年水晶宫世界博览会的状况。这个博览会展示了各种新技术产品，成为确立资本主义自信心的一个里程碑。饥饿的19世纪40年代几乎奇迹般地让位给稳定而繁荣的50年代。在法国，被马克思所厌恶和嘲笑的拿破仑三世控制了局势，主持了将近20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左派的事业凄风苦雨；马克思曾经加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复存在。马克思有十几年的时间脱离政治活动，长期聚精会神地研究经济发展规律。

1857—1858年，马克思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计划。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获得巨大的成功。这对马克思是一个鼓舞。他志在成为“社会科学”创始人，在人类研究中做出类似达尔文在较低级生物研究中的成就。与达尔文一样，他的目标是绘制一个基于社会存在现实的人类进化图式。它将显示，人类从大自然中获取生存资料的斗争如何经历了若干阶段的变迁；在各个阶段，社会关系都发生改变，反映了物质条件的变化。

然而，《资本论》第一卷到1867年才付梓出版。由于60年代的气氛再次发生改变，他也有精力再次关注实践，回到政治舞台。这个动荡的10年是加里波第、林肯和俾斯麦的时代，美国奴隶和俄国农奴获得解放，德国和意大利实现统一。波兰发生的一场革命（很快遭到镇压）促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而马克思与该协会一直关系密切。1863年10月，马克思出席了伦敦支持美国内战中的北方的大集会。（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对手蒲鲁东与卡莱尔一样支持南方。）意大利的解放者加里波第在伦敦受到盛大的欢迎，据说是该城欢迎外国来宾的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这都是激动人

心的时刻。

马克思多年实际上承担着第一国际的书记工作,为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直至1874年主要由于普法战争的后遗症,第一国际被迫偃旗息鼓。马克思这次旨在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梦想的努力是否比20年前的第一次尝试更有成效,确实大有疑问。而且这一次的实践活动延误了他的巨著的完成。不过,《资本论》第一卷在1867年的问世以及他在1871年发表的关于巴黎公社的精彩政论,使他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承认。《资本论》按计划要展开一个庞大的历史、社会和经济分析,但始终未能完成。另外3卷是在马克思去世后陆续问世的,是由他的朋友和弟子根据零散的片段编辑而成。第一卷出版后用了4年时间才售出1000册,但是几年之内就先后被译成俄文和法文,德文的第二版也开始发行。虽然该书的宗旨是向产业工人,即现代“无产者”说明他们自我解放的道路,但是它的论述并没有定位在工人阶级的理解水平。一个工人在接受了马克思送给他的一本《资本论》后说,他觉得给了他一只大象(意为沉重而无用的东西)。(在序言里,马克思以嘲讽的口吻表示,这部著作不是为浅薄的人写的。)虽然这部著作有不少雄辩动人之处,但是对于多数读者来说还是过于深奥和专业,只能为少数专家所领会。<sup>[1]</sup>

直到1887年,即马克思去世后4年,英文译本才问世。当时正值维多利亚中期文学和思想大丰收的高潮。严肃的读者都沉溺于约翰·穆勒、约翰·罗斯金和马修·阿诺德,很少有人会关注一个德国流亡者的难以啃动的大块头著作。该书的社会主义读者反应极其热烈,但是他们人数很少,而且在文化上很孤立。甚至在社会主义者中,马克思也有许多竞争对手。恰在此时,《资本论》的分量足以压倒他们大多数人。

马克思借以创造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的来源当然是黑格尔、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和政治经济学。他的朋友摩西·赫斯曾经写过一部著作,论述欧洲思想的三足鼎立格局,分析德国、法国和英国各自独特的思想倾向。他希望能把它们结合起来。马克思似乎是努力来完成这种综合。他分别在这三个国家生活,分别侧重研究了德国哲学、法国的社会思想和英国的经济理论。他对这三者进行了批判,但是在批判之后又利用了他所保留的东西。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错的,辩证观念和总体观念是对的。欧文和圣西

---

[1] 维尔弗雷德·帕累托曾经认为,人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发现了“激情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旨在使普通人和学者都能满意”。——原注

门创造了有价值的社会主义理想,但是不懂得如何实现它。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对现实经济关系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是没有看到经济规律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不过,马克思与他的许多信徒不同,不是仅仅死读一本书。他熟稔从荷马到巴尔扎克的西方文学传统。他的女儿爱琳娜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我们家的圣经”。

马克思比从他那里汲取一种教条体系的弟子们要复杂的多。在读了这些弟子的一些作品后,马克思曾经感慨:“谢天谢地,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朋友证实:“他嘲笑那些鹦鹉学舌般念叨他的无产阶级教义的蠢人。”恩格斯是一个生气勃勃但不那么精细的学者。他是一些简单化说法的源头;但是,他在晚年也对持“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恼火。不过,马克思的学说里肯定有些因素引起这种庸俗化。许多人见证,马克思可能有些傲慢;德裔美国政治家卡尔·舒尔茨说他“好斗、不容异见”;与马克思一争高低的革命家米哈依尔·巴枯宁骂他“爱虚荣、背信弃义、性格怪僻”。他不能轻易地否定对他的思想的通俗解说,因为他的一个核心信念就是,思想应该结合和影响社会活动,并且通过这种实践经验再加以修正。他的使命不是像黑格尔那样仅仅制造另外一个苦心孤诣的或透露着研讨班气息的哲学混合物,而是要帮助人们改变世界。马克思未能解决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但是他做了努力。

正是这种戏剧性的、确实很浪漫的光环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了神秘性。它的最简单的基本思想是古代救世主义的基督教或犹太教的一种世俗化的版本。被剥削的工人必须打破奴役他们的精神和物质枷锁,进行一次颠倒乾坤的伟大的革命,然后迎接一个标志着人类历史终结的理想社会。不过,这种宗教的信徒根据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解或误解,又增添了一些重要的细节。半通俗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科学地证明了资本主义为自己挖掘坟墓,因为资本主义越来越具有垄断性和剥削性,既成为“生产的桎梏”,又成为大众苦难的根源。它最终会因不堪自身的重负而崩溃。马克思主义者确信,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记录,阶级是由其在经济生产过程中的角色界定的;随着资本主义末日的临近,现代无产阶级越来越对自身的状况和历史角色有自觉的认识。社会阶级是“社会变迁的杠杆”,这是马克思的许多著名比喻之一。历史阶段是根据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

级来界定的,最初是奴隶主,然后是封建领主,现在是资本家阶级。<sup>〔1〕</sup>

马克思主义宣称,经济生产方式基本上决定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形态。这就意味着,现实地说,现存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价值观不是永恒的,而仅仅是阶级统治的烟幕。他们所谓的永恒的经济法则只是适用于他们自己的经济体制。对正统信条的颠覆恰恰成为马克思主义对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魅力。后来弗洛伊德也与马克思一样成为“揭示欺骗的大师”,向我们证明人们所宣扬的理想掩盖着某种秘密,可能掩盖着卑微的甚至无耻的动机。奥登<sup>〔2〕</sup>在回忆20世纪30年代在大学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时说:“我们对马克思感兴趣正如我们对弗洛伊德感兴趣一样,因为它是一种揭露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sup>〔3〕</sup>这是一个历史学家修正全部历史解释的宣言!除了后来的女权主义再也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提并论。

上述情况是很意味深长的,因为马克思的召唤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很奇怪的是,虽然马克思声称是向工人阶级说话,但他在多大程度上与工人阶级息息相关,他对社会和历史的精彩分析有多少现实基础,还是令人怀疑的。例如,最近一项关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情况的深入研究<sup>〔4〕</sup>显示,“阶级”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阶级是马克思的想像力的创造,是一种逻辑推论,而不是一种由观察发现的事实。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对此做出详细的论述。它是一个理论分析的法宝。现实中有多少个阶级,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不同的地方做出不同的回答。有时,“资产阶级”这个词更像是人性的一种要素,而不是一种社会现实。<sup>〔5〕</sup> (看来,地主

〔1〕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是劳动雇佣者和商品生产者,即“工厂主”。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把资本家与企业主区分开来。资本家是提供金钱用以投资的人,企业家则借贷这种资本、租用土地,雇佣工人,从而形成生产设施。——原注

〔2〕 奥登(W.H.Auden, 1907 - 1973年),英国诗人,后加入美籍。

〔3〕 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 帕特里克·乔伊斯:《人民的幻想:工业化的英国和阶级问题;1840 - 1914年》(1991年)。——原注

〔5〕 参见P.N.弗班克:“马克思尚未写成的一章”,《邪恶的快乐:社会阶级观念》(1985年)。——原注

现在也是资本家。)一个阶级存在但无人知晓,马克思所暗示的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发生呢? (“阶级意识”是工人阶级被告诫应该具备的但实际十分缺乏的东西。)

马克思的辉煌思想大厦被许多现代人当做一种工具,用于整理混乱的世界。但是确实可以说,它可能比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更像是一种“范畴的舞蹈”<sup>〔1〕</sup>,一种用抽象概念组建的模式。凡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就拥有了一个几乎可以对任何事情做出解释的统一的思维体系。他就会有一幅世界整体的图景。但是,真实世界中的事实或事件必须经过译解(有时十分费力)才能被纳入这种思维结构之中。它们的实际含义也就变成了某种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占有一席之地之象征符号。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几乎任何事情都不是它表面所显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优势,即按照它自己预设的前提,它基本上是不可辩驳的。凡是对这些前提发出质疑的人当然会被斥责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是在“虚假的意识”驱使下,带着有色眼镜观看世界。

马克思对现实所做的主要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sup>〔2〕</sup>在他的主要著作中,马克思断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率从长远看必然会逐步下降,这就驱使资本家变本加厉地剥削工人,从他们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的比率因为机械化的发展而呈下降趋势。(马克思依据他所继承的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利润的惟一来源是人的劳动力,而不是机器的生产力。)在《资本论》再版的版本中,马克思从原先所说的工资必然会降到纯粹维持生存的水平这样一种观点稍微倒退了一些,转而强调精神的贫困化而不是经济的贫困化,即强调相对剥夺:工人的状况可能有所改善,但是雇主获得的更多。他谈到工人因为变成机器的附属物而在精神上沦丧。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状况越来越糟糕,这也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原因。然而,事实上,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越来越糟糕。有证据显示,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人口在大量增加,但普遍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般的成功故事!资本主义虽然可能在道义上失败了,但是在物质上成功了。

---

〔1〕 “范畴的舞蹈”(dance of categories)是美国哲学家詹姆士对抽象的逻辑论证的比喻。

〔2〕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3章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具有一种有趣的暧昧性。这就导致了他的信徒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通观马克思有关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论述,可以看到一种摇摆。一方面他认为,这个可恶的制度将很快被被压迫阶级的暴力革命所推翻,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个不断进步的、具有生产能力的制度在付出自己必须付出的一切后会平静地寿终正寝。马克思的这种进步论观念使得他不时地承认,资本主义毕竟是社会上升发展阶梯的倒数第二阶,比以前所有的阶段都要好得多。它包含着许多美好的事物,它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会被保存下来。辩证的否定不是抹煞它所反对的东西,而是将其保存在更高的形式里。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母体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资本主义不可能一无是处。资本主义完成了许多进步的事业,创造了先进的技术,打破了地域单位,组建了全国性的经济乃至国际经济,而且使民众逐渐习惯了理性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未来的社会主义不会摧毁这这些东西,而是会完善它们。资产阶级无意之中唤起了工人的自觉意识,并实现了一种具有民主潜力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承担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历史角色,在它把自己的角色演完之前,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会在舞台上亮相。不成熟的革命,例如浪漫的造反者所呼唤的那种革命,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只有水到渠成的时候,新秩序才会诞生,而且这种诞生的过程会几乎没有什么痛苦。

对于那些不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浪漫的革命者,马克思一直持蔑视态度。奇怪的是,今天第三世界的独裁者和恐怖分子竟然会求助于他的权威。在俄国,1890年前后,相对于此时声名狼藉的恐怖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比较保守的选择;而且,1917年以前,列宁主义乃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圈子中的异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创建的,但并未完全得到马克思的认可。它放弃了暴力革命,转而致力于和平的教育工作。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革命将会在适当的时机通过选票自动到来。可以说,马克思一直信奉民主,而列宁严重地误解了马克思,用“无产阶级专政”来表示革命精英分子实行的专断统治。

另一方面,马克思确实有一种革命者的气质,从来没有完全把对现存秩序的忿恨置之脑后。他晚年依然带有反叛性格的痕迹,在去世前一年他还高兴地说,今天的孩子们“面对着人类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时代”。他显然对自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狂暴而危险的灾星而得意。他告诉俄国的革命者,他们有可能利用村社传统,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跳入社会主义——这种令人惊愕的异端思想竟然出自马克思本人。只要形势看起来有可能重

振激进的事业,无论是在 60 年代的一段时间,还是在 70 年代俄国,马克思都把这看成是有希望的信号而欢欣鼓舞。但是在 1871 年巴黎公社失败使他大为失望后,再加上他晚年被疾病和体弱所困扰,马克思似乎丧失了对再次爆发革命的希望——除了在他的理论似乎并不适用的地方,如俄国。他可能一直在怀念 1848 年的时光,玩味他年轻时那种彻底的黑格尔式改造的远大理想。

要求马克思彻底地自圆其说,这是没有意义的,是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都做不到的。难道他能够接受对他的经济学的批评吗?要知道这些批评出现在他的晚年,他已经不可能吸取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基于劳动价值论。斯坦利·杰文斯<sup>[1]</sup>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资本论》第 1 卷出版刚刚 4 年就问世了,打响了“边际效益”学派攻击李嘉图 - 穆勒传统的第一枪;到 19 世纪末,它就赢得了几乎所有专业经济学家的支持。马歇尔和大陆经济学家门格尔和瓦尔拉斯<sup>[2]</sup>也对“新古典”革命做出了贡献。这一革命破坏了马克思价值学说的基础。

商品并不包含着任何由劳动力构成的玄虚的“价值”;价值就是交换价值,而决定它的是,人们对一个商品的需求欲望有多大,需要费多大劲才能生产出它:这与其说是一种社会换算,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换算。最后的增量,即边际增量决定了交换价值。商品按比率交换,因此它们的边际效益就相等了。在边际主义的指引下,经济学变得极其数学化;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格确定成为自牛顿以来几乎最精妙的研究。就连瓦尔拉斯也曾宣称:“经济学是一门可与力学和天文学相提并论的数学科学。”由此它就与历史学和政治伦理学分道扬镳了。

这个故事只不过是 19 世纪后期各门学科职业化这个大故事中的一部分。与马克思曾经嘲笑欧文和圣西门幼稚一样,此时马克思也被归入业余人士之列。讲究辞藻、玩弄技巧、用思想服务于自己热烈渴求的目标,马克思的这些做法都与科学方法相去甚远,尽管他宣称建立了“社会科学”。大

---

[1] 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 - 1882 年),英国经济学家。

[2]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 - 1924 年),英国经济学家。

门格尔(Carl Menger, 1841 - 1921 年),奥地利经济学家。

瓦尔拉斯(Marie - esprit Léon Walras, 1834 - 1910 年),法国经济学家。

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三人被公认为经济学“边际革命”的开创者。

学基本上对他置若罔闻,只有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sup>[1]</sup> 19世纪90年代在罗马大学讲授唯物主义历史观,另外在俄国有少数马克思主义的教授,即“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那不勒斯的伟大哲学家克罗齐曾经对马克思产生兴趣,但是他在1900年发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斥责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有马克思的信徒。1890年以后,社会主义运动东山再起,马克思则是其最主要的先知。有关情况,我们在后面还会述及。

与此同时,由于马克思的体系包罗万象气势宏大,而且提供了可以替代现存文化的立场,这就使得马克思对知识分子极具吸引力。这既是它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弱点所在。表面上人们必须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不容其他任何异说。阶级文化论把所有现存“资产阶级”思想统统归为“意识形态”即“虚假意识”。宣称取而代之的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垄断着真理。这里非黑即白、泾渭分明。马克思主义不是进入一间知识大厅,混迹于其他客人之中。它占据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建筑物,人们必须对是否进入它做出抉择。

马克思后半生一直住在英国。但是他在英国的影响很小。他的追随者中包括他出色的女儿爱琳娜萧(40多岁时悲剧性地自杀)和古怪的汉德曼(经常全身着工人服装,头戴一顶大礼帽)。像威廉·莫里斯<sup>[2]</sup>和萧伯纳这样的重要人物虽然欣赏马克思,但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者。英国的社会主义更多地源于约翰·罗斯金而不是马克思,而且在对待各种思想来源时其实是采取相当折中的态度。不管怎么说,在1919年以前,它没有多大的力量。1900年诞生的工党最初在目标上完全是工联主义性质的。与此同时,1885年以后,福利国家的观念借助于黑格尔主义的社会思想开始渗透进自由党。

关于这个世纪末的活跃景象将在下一章里述及。毋庸赘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和德国都是一种强有力的力量。而在这两个国家产生了两种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前面提到的渐变和革命的矛盾倾向。法国的

---

[1] 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 1843 - 1904年),意大利哲学家,意大利第一位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人。

[2] 爱琳娜(Eleanor Marx, 1855 - 1898年),马克思的小女儿。

汉德曼(Henry Mayers Hyndman, 1842 - 1921年),英国马克思主义者。

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 - 1896年),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者。



激进思想界给予马克思一定的位置；马克思的一个女儿就嫁给了一个杰出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但是，法国激进派也尊重马克思的竞争对手蒲鲁东以及另外一些人。法国左派是以四分五裂著称于世。

## 进步观念

马克思的思想是进步观念的又一种版本。它带有深刻的历史主义性质，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连续不断的演进阶段，以生产技术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类型为划分标志。历史上不同的社会阶段因其内在矛盾而导致没落并且培育了下一个阶段的萌芽，从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到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再到“资本主义”都是如此。（马克思把 11 世纪到 17 世纪都说成是资本主义起源的时间，从来没有确切地断定向资本主义过渡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与黑格尔和孔德一样，马克思的宏观历史阶段图式过于简单化，但也非常具有刺激性。

它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模式，而且是一种末日审判的宗教。人类千百年的跋涉最终会抵达光辉的顶点。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而最终到来的是无阶级社会，到那时再也没有那些扭曲的意识形态来破坏真善美的意象，人人享受的物质丰裕将迎来真正的自由。“共产主义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马克思本人的乌托邦主义昭然若揭。

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不是其经济学说，而是黑格尔主义。在他那部最令人瞩目的著作中，马克思竭力落实经济细节，但是资本主义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一宏观观念则根源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变异的辩证法规定了人类的运动，即经历不同发展阶段而抵达某个最终目的地。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宇宙进程，具有无法穷尽的神秘性。马克思试图把这种唯心主义的或宗教性质的观念改造成具体的、物质的观念，但是很显然，他是先有了这个模式然后再进行经验研究。

“历史站在我们一边”的信念对于任何运动都是一种强大的动力。19 世纪的意识形态，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都利用这种信念。诸如邦雅曼·贡斯当和约翰·布赖特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圣西门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俄国斯拉夫派这样的民族使命鼓吹者，无一例外地宣称以往的历史时代都指向他们所尊奉的事业，即一个漫长的逐渐展开的故事的最后结局。

在这个历史专业的形成时代，历史学家讲述一些萌芽如何历经多少世

纪而成长为强大的法国、英国和德国。在创作有关民族形成的论著时,他们的倾向性显然不逊于马克思。例如,基佐的法国史就是如此。他是学者兼政治家,在七月王朝时期地位显赫。他在法国的竞争对手是更富有文采的浪漫主义者米什莱。马考莱是英国的米什莱。他是一个散文作家、诗人、议员。他写的一部英国史在19世纪50年代成为畅销书,用华丽的辞藻讲述自由如何兴起和击败君主暴政的故事,几乎不掩饰他的辉格党偏见。俄国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对于促成俄国民族自豪感所做的贡献可能大于其他学者——对于一个正在寻找自己的特征的民族来说,这是一桩紧迫的事情。

19世纪中期,这种历史著作(有些是文学经典)大量涌现。它们通常都暗含着一种宣传意图,旨在解释历史的目的。当然,19世纪50年代是达尔文和进化论的十年。这将在下一章展开论述。有一些作家试图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或制度的历史。在达尔文的影响下,人们普遍形成了一种观念:万物皆变,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当时还不十分清楚这是一种直线进步,但是看起来,尽管不太容易,还是在向更高的形式进化。达尔文的朋友赫伯特·斯宾塞创造了一种极其流行的进化论意识形态,把人类社会描述成逐步向前向上的发展。浪漫主义曾经刺激了人们对过去的想像和兴趣;伯克派认为过去是政治智慧的学校;德国哲学家把过去看做是真理的展现过程。卡莱尔、马考莱、米什莱等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来普及严肃的历史。另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作家,例如实证主义的亨利·巴克勒<sup>〔1〕</sup>。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许多图书馆和私人书房的书架上都摆放着他撰写的多卷本英国史。

与此同时,历史学在德国人的引领下正在走向成熟。由于欧洲各地的重要国家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将各种资料集中收藏起来,这就使得大学研讨班可以对它们进行仔细的考订并且当做原始资料来使用。人们越来越觉得,历史研究最终从一个猜想和议论的领域转变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米什莱和阿克顿宣称:“历史学是在档案的母体中诞生的。”德国历史学家用科学的考证方法武装起来,坚信他们的耐心探究最终能揭示人类的重要真相。英国信奉天主教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阿克顿爵士说:“历史不仅仅是事件过程的记录,更不仅仅是政治事件的记录。它是探究根源和起因的哲学,它探究对事件起决定作用的深刻的精神根源。”

---

〔1〕 巴克勒(Henry Thomas Buckle, 1821 - 1862年),英国历史学家。

尽管有时人们指责德国学院派,说他们制造了一些沉闷的琐碎的政治史,但是他们实际上很注意历史的宏观图景。德国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典范、精力充沛的历史学家兰克撰写了有关中世纪史、宗教改革史和近代早期史的大部头著作,按照今天的标准他的研究范围也是不可思议的宏大;他在 90 岁时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撰写“通史”的准备。

兰克不是信奉简单意义上的“进步”的历史学家,因为他认为每个时代都“与永恒保持相同距离”,必须从它自身的角度来理解它。但是他确信,所有的碎片都将因某种原因而拼凑在一起,构成一个宏大的和谐的图景。正如法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路易·勃朗所说的,历史循着上帝之手为它设计的道路前进。拉塞尔·奈在谈到广受欢迎的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sup>[1]</sup>时,写道:“他把美国的过去看做是由上帝和人共同编写的一部伟大戏剧,逐渐走向胜利的最后一幕,到那时基督教传统和理性时代的许诺都将变为现实。”

当时,新英格兰的学者,如班克罗夫特,通常会到德国去接受先进的教育。阿克顿爵士和他的朋友、慕尼黑大学教授多林格尔<sup>[2]</sup>共同阐述了一种基督教历史神学。按照他们的说法,基督教真理是经过教会的中介在历史中逐渐呈现出来的。这是显示历史学的时代影响的一个有意思的例证,尽管梵蒂冈拒绝承认其中的意谓:以往的教会并不拥有全部真理。一位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情爱文学的学者指出,恋爱变成了“事件”,因为事情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在演进和发展;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理解的框架从静态转变为动态。

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开始相信,过去不仅仅是有趣的或有教益的故事的储藏室。19 世纪的重大理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假定了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上升发展。尽管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激烈批判者,但他也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多数人一样对长远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让历史的车轮再多转一圈,目标就将达到。

有一位法国的历史和社会理论家成为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重要例外。

---

[1] 奈(Russell Nye),20 世纪美国历史学家。

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 1800 - 1891 年),被称作“美国历史学之父”,著有 10 卷本《美国史》。

[2] 多林格尔(Johann Joseph Ignaz von Dllinger, 1799 - 1890 年),德国历史学家,著有教会法和教会史领域的论著,其著作被列入梵蒂冈禁书目录。

他的一生(1816 - 1882 年)几乎与马克思完全同时,也同样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这个人就是被称作种族主义之父的戈宾诺伯爵。他的代表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正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即历史主义的盛行期,以 4 大卷的形式问世。作为法国贵族的后代,戈宾诺看破红尘,把悲惨的文化衰落归咎于种族的混杂。他认为,人类的某些品质与纯粹的种族相对应。他宣称,雅利安人这个最纯粹的白种人种是最有创造力的。但是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由于它与其他种族混杂,因此它也播下了毁灭的种子。

戈宾诺的这部非专业的作品,即便是在当时也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但是它以无所不包的体系和刺激性观点而激发人们的想像。戈宾诺最终成为瓦格纳的崇拜者,并且把自己的种族主义假说传给了英国人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sup>[1]</sup>。张伯伦直接影响了希特勒在 1919 年后的德国所宣扬的民族社会主义。实际上,戈宾诺认为,日耳曼民族也与其他民族一样早已经混杂不纯了。他认为历史的轨迹就是不断的衰落——当然,其方向和命运完全与进步主义者的设想相反。与戈宾诺一样,进化论社会学家瓦歇·德·拉普日<sup>[2]</sup>认为退化多于进步;正如现代人的卑贱的唯物主义和廉价文化所显示的,自然选择似乎是劣胜优败。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在 20 世纪继承了这个观点,使之变得更为流行。但是在 19 世纪中期,它是一个反常现象。到 19 世纪末,关于退化的话题才变得比较常见了。1848 年后的幻灭引发了人们的一些怀疑。乔治·索雷尔后来所说的“对进步的幻灭”早就出现在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大·赫尔岑关于这种幻灭的痛苦回忆中:

如果进步是目的,那么我们在为谁工作?这个莫洛克<sup>[3]</sup>是谁?辛勤劳作的人接近他,他不给予奖赏,反而后退;这些筋疲力尽、在劫难逃的大众所能获得的安慰,仅仅是嘲弄的答复:在他们死后,世间将变得美好。

---

[1] 张伯伦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1855 - 1927 年),英国亲德派政治哲学家,著有《19 世纪的基础》。

[2] 德·拉普日(Georges Vacher de Lapouge, 1854 - 1936 年),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

[3] 莫洛克(Moloch),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巨神,信奉者必须为之做出牺牲。

不过,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才激愤地全盘否定进步的神话。埃米尔·布隆内尔<sup>〔1〕</sup>把进步观念称作是“一种公理式信仰,既不需要证实,也不能够证伪……是一种准宗教信仰,否定它就是一种亵渎行为。”迟至1908年,英国哲学家兼政治家贝尔福爵士<sup>〔2〕</sup>还在断言:“在西方文明一千多年来的前进运动中,现在没有任何停顿或倒退的迹象。”

现在看来不同寻常的是,这些信念不仅仅相信进步是循序渐进的向前向上的运动,而且是全社会的运动。我们今天会倾向于说,有些事情无疑是在“进步”,只是要把这个词限定在某些方面:技术变得效率越来越高,科学知识积累得越来越多,交通和通讯越来越快捷。但是,生活的其他方面依然如故,甚至变得更糟了。只有鲁莽者才会宣称,艺术<sup>〔3〕</sup>、道德或政治智慧进步了。(一位法国诗人怀疑做爱的技术千百年来有什么进步。)我们把所有的领域整合起来的能力也江河日下。有些技术进步造成了其他领域的退步,例如引起精神紧张和道德崩溃。19世纪的乐观主义者认为,社会是一个单位,进步是整体性的,因此各个部分都参与不断的改良。

19世纪上半叶充满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目的的变革而引起的兴奋,虽然也有工业增长和城市化最初痛苦的岁月,但总体情绪是乐观的。切斯特顿在他论述狄更斯的著作中写道,“(19世纪)上半叶充满了邪恶的事情,也充满了希望”,下半叶则反过来。如果说1860年以后出现了更多的疑问,那么其中的原因应该从达尔文主义中以及从传统宗教的衰落中寻找。

在由“忏悔的”贵族组成的、一贯迫不及待的俄国知识分子中,在19世纪60年的“民粹派”中,也有类似的现实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他们反对浪漫主义,崇尚科学,信奉唯物主义,主张还原论。他们使得“虚无主义”一词广为流行,意思是嘲笑父辈的价值观念,质疑所有的权威。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对他们做了勾画。他们成为俄国的第二代革命者,并且产生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最坚定、也最狂热的革命者。后者对列宁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老一代的贵族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是温和而无力的。科学主义被引进爆炸性的俄国舞台,其含义变成了一种坚实而激烈的社会态度。

---

〔1〕 布隆内尔(Emil Brunner, 1889 - 1966年),瑞士神学家。

〔2〕 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 1848 - 1930年),曾出任英国首相。因1917年作为外交大臣签署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贝尔福宣言》而著名。

〔3〕 20世纪的历史学家雅克达·霍克斯(Jacquetta Hawkes, 1910 - 1996年)看到西班牙洞穴中原始人的绘画,情不自禁地大喊:艺术如此古老。当然,20世纪的艺术要回顾原始人的作品,从中汲取灵感。——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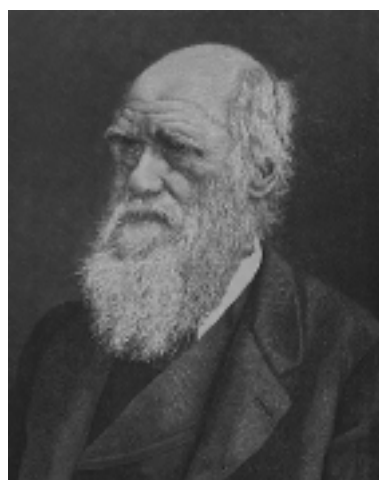
表达 1848 年以后的幻灭和反浪漫主义情绪的哲学家是天才而愤世嫉俗的阿瑟·叔本华。他在年轻时曾冒险向伟大的黑格尔哲学挑战,但是没有赢得任何支持者;晚年,他的思想变得十分时髦。叔本华断言,宇宙中的决定因素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性,而是意志。这是一种盲目的、非道德的冲动力量,在人的身上体现为需求、欲望和食欲。这种专横的意志把我们毫无意义地束缚在生活的轮子上。叔本华认为,除了东方哲学所追求的最高智慧——泯灭意志——外,只有艺术,尤其是音乐,能够充当解毒剂。(19 世纪上半叶,印度教典籍的知识刚刚开始进入欧洲。)

叔本华把世界视为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权力竞技场,把理性视为直觉的工具。虽然使用着完全不同的术语,但是叔本华的观念其实无异于达尔文。

# 第十章 达尔文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信仰危机

## 达尔文与达尔文主义

变化乃生命之法则，在灌输这个典型的现代观念方面，没有人比查尔斯·达尔文做出的贡献更大。我们之所以没有把他放在第三章中加以研讨，这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人从他所发出的信息中看不到令人欣慰的进步观念。变化应该予以承认，但不一定是改善；即便是改善，其代价也令人无法接受。在达尔文笔下，自然界不仅呈现出一幅残酷的、为生存而斗争的场景，“牙齿和利爪滴着鲜血”，而且，这种斗争或许还是无目的的；自然界当然是一团乱局。偶然的机缘决定了后果，死亡的结局装点了生命之树。这极大震动了传统的宗教信仰，除此之外，它不仅威胁到圣经上说的上帝造物的教义，更为严重的是，它威胁了人类灵魂的惟一性。温伍德·里德<sup>〔1〕</sup>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维多利亚时代有一个年轻人，长期受“怀疑之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绝望之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浸染，因而轻生弃世。恐怕这还不是惟一的一例。有的时候，达尔文式的绝望情绪似乎扩散到



达尔文

---

〔1〕 温伍德·里德(William Winwood Reade, 1838 - 1875年)，英国学者，著有《人的殉难》。

整个维多利亚社会,扰乱了它的美梦。

这本公认的19世纪最重要的著作出版后(在19世纪末,有人在杰出人士当中作过民意测验,以确定19世纪最有影响的10本书。结果显示,惟有《物种起源》出现在所有书单之中),出现了一场长期而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可能会产生如下令人欣慰的结论:(1)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并不总是残酷的;它悄无声息地进行,而且它得到的回报是效率和关爱,而不是冷酷无情或残忍凶恶。“最强者”不一定能生存下来,但最优秀者却适应了环境;恐龙灭绝了,蟑螂却活下来。(2)如果说达尔文式的世界充满了苦难和死亡,可是,没有哪一位严肃的思想家曾认为生命是永恒不败的玫瑰。现实主义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生命中令人不太愉快的方面,但是,人们对“邪恶问题”总是会给出解答。达尔文其实是复活了一个老问题。(18世纪的思想家们曾对里斯本地震深感忧虑。)也许有恶就有善;不打碎鸡蛋就不会有煎蛋饼。(3)种种痛苦和斗争最终是为了什么,短暂的生命肯定不能知晓,但是人们可以与丁尼生一样,“模模糊糊地相信那个宏大的希望”,即肯定有一个最终有益的目的。

这些重要观点以及其他要点,在围绕着达尔文主义的长期争论中逐渐显露出来。最终,它们没有消除那种让人不安的感觉,即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是一方乐土了。但是,它们也没有驱散维多利亚时代普遍存在的乐观情绪。当然,人们的心智风景线永远是变动不居的;每个人都可以从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思想革命中认识到这一点。变化取代了稳定。达尔文让人们知道了他的存在。

同其他伟大的科学发现者一样,达尔文并不是新真理的惟一和非凡的创立者,毋宁说,他得益于长期以来许多人作出的贡献。1859年,他决心出版他下了20多年功夫的一部手稿的简本,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至少还有一位博物学家将要提出大致相同的论题。时至今日,依然有少数学者认为,达尔文和生活二者对阿尔弗雷德·R·华莱士<sup>[1]</sup>太不公平;有学者认为,还有人也是这种接近成功的候选人。但大多数学者断定,达尔文,同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一样(这两位分别创设了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但也不乏竞争对手),应该得到这份殊荣。倒不是因为进

---

[1] 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 - 1913年),英国博物学家,与达尔文同时提出自然选择的进化论。



化论自身的缘故——进化论此前至少已存在半个世纪,而是因为,他给了它比较合理的解释,让人信服。

进化观念有一段历史。古希腊人,如阿纳克西曼德和恩培多克勒就提到过它。此外,在1858年前的一个世纪里,作为一种思辨观念,进步曾引起人们的兴趣。18世纪,人们对生物学表现出极大兴趣。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有名的作家布丰,以及其他杰出的启蒙哲学家,包括狄德罗和莫佩尔蒂思索过生命的起源和物种的性质。另外,查理·达尔文的祖父,做医生的伊拉斯谟·达尔文,在1798写的诗中推测,原初的“微小形式”

一代接一代繁荣兴盛

获得新生力量,长出更大的枝干;

无数种植物从中生发

撒入鳍、脚和翅膀的领域。

性情怪异的苏格兰法学家蒙博多勋爵<sup>[1]</sup>,这位业余的人类学家和多产作家,持有类似的看法,他甚至声称,他的一些朋友长尾巴。在谈到这位到处受嘲笑的蒙博多勋爵时,约翰逊博士说道:“其他人也有奇思怪想,但隐而不发。”

但是,在达尔文的这些先驱当中,没有一个人论证实际的物种演变。似乎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它,布丰也不遗余力抨击了它。但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里,各种资料从四面八方涌来,一群研究者摸索着寻找一个答案。达尔文收集到的许多条证据来自许多不同的领域,这使得进化论的演进成为思想史上最有趣的一个研究课题。

证据主要来源于新兴的地质科学,以及相关的古人类学,化石研究。在18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这些研究开始盛行。日内瓦地质学家德·索绪尔似乎是第一位在1779年使用这个术语的人。1788年,苏格兰人詹姆斯·休顿提出了“均变”理论。在整个18世纪,人们对化石的意义和地球的年龄进行了思考,尽管经常是异想天开。1780年,德国矿物学家维尔纳提出的一种假说,地球最初为海洋所覆盖,海水退却之后,留下了各种矿物、

---

[1] 蒙博多勋爵(Lord Monboddo,1714 - 1799年),著有《论语言的起源与发展》。

化石和岩层。<sup>〔1〕</sup> 这就是“灾变论”或“水成论”，看来与圣经故事非常吻合。休顿向这种正统观提出挑战，他用各种不变的自然力在漫长的时间里的缓慢作用来解释这些现象。这种“均变论”惹恼了一些宗教人士，因为它很难与旧约上的叙述取得一致。这两个学派之间由此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对于任何一门科学来说，争论都是一件好事。

今天，我们可以说，两派都有合理之处，但是从时间因素考虑，休顿显然更胜一筹。在地球年龄这一问题上的革命乃是我们世界观念的重大变化之一。在1780年至1830年之间到来的这场以地质学为基础的革命，可与17世纪天文学上的革命相提并论。在空间的无限拓广之后，又有了时间的无限绵延。“啊，地球实际存在的年代是多么的悠久漫长，”伟大的法国古生物学家拉马克惊叹说，“那些认为地球只存在了六千零几百年的人，他们的思想又是有多么渺小！”（当时通行的正统学说还是以圣经记载为依据）。

随着新证据、尤其是化石逐渐增多，保守主义思想被迫让步。英国国教教士威廉·巴克兰<sup>〔2〕</sup>（当时地质考察成为深受英国人喜爱的一种乡村户外运动）折中了圣经观点和地质学观点，保留了圣经上的洪水灭世说，但是他提出更久远的系列洪水说。<sup>〔3〕</sup> 在19世纪20年代，巴克兰自称发现了六千年前洪水的证据，印证了圣经所记载的那一次。但是，他用经过修正的灾变论来适应威廉·史密斯以及法国科学家居维叶这些化石分析大师所搜集的古生物学证据。巴克兰认为地球经历过好几次大洪水，可能是四次，每一次洪水都灭绝了地球上一切生命，每一次洪水过后，上帝都要重新创造生命。为什么上帝偏偏以每一次大灾难为界线、分好几个阶段来完成他的工作，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这依然是个谜。但是，灾变论者虽然挽

---

〔1〕 德·索绪尔(Horace Benédicte de Saussure, 1740 - 1799年), 瑞士物理学家、地质学家。

詹姆斯·休顿(James Hutton, 1726 - 1797年), 苏格兰地质学家, 被公认为现代地质学之父。

维尔纳(Abraham Gottlob Werner, 1750 - 1817年), 德国地质学家, 水成派创始人。

〔2〕 威廉·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 1784 - 1856年), 英国国教会牧师, 古生物学者。

〔3〕 奇切斯特主教戏仿蒲伯描写牛顿的诗句: 疑团升起, 洪水传说有待澄清:/ 巴克兰出面, 事情反倒更糊涂。——原注

救了圣经记载,却牺牲了公认的那种创世进化论。

另一位英国人查尔斯·赖尔<sup>〔1〕</sup>在19世纪30年代撰写了一部权威性的地质学综合著作。这部著作对于青年达尔文有着不同凡响的重要意义;后来成为剑桥科学家的达尔文写道:“我觉得,我的书有一半出自查尔斯·赖尔爵士的思想。”他终生都是赖尔的朋友,赖尔的办公室里有他的照片。赖尔是一个彻底的均变论者,他毫不理会宗教方面的反对意见,认为它们无足称道。越来越多的化石知识表明,进化是有可能发生的;与此同时,时间观念的革命也给了这种观点一臂之力,因为新的时间观念为一个绵长缓慢的过程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但是,化石记录上明显出现了巨大时间间距以及突然的中断,使巴克兰的观点显得有理有据。(在漫长的稳定时期之后,突然发生转变,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种情况,尽管我们拥有更多的化石记录。)赖尔不是进化论者。他不可能在化石中寻找足够的证据来支持物种转变或演变(即某一物种实际由另一物种演化而来)。生物学证据似乎支持了物种恒常不变的传统观念,其他证据也说明了这一点,例如杂交动物没有繁殖能力。当然,某些物种灭绝的证据现在威胁到了古老的“伟大的存在之链”。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泛泛的进化观念已经在社会弥漫:社会变迁的明显事实促成了它们的传播。但是,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孔德,都没有提到低等生命形式的进化。黑格尔认为:“自然和历史是两回事儿。”自然没有历史。”人类与低等生命形式有着一种逻辑上的、但不是时间上的联系。自然界的循环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过程,从中演化不出什么新东西,这与人类历史的情况正好相反。黑格尔热衷于让人类历史成为“上帝”恩宠的独特领域,这就使他远离自然进化论。浪漫派的科学观被称作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为一些德国哲学家所津津乐道,虽说它是从进化的角度构架起来的,但决不“科学”;这种观念认为,有一股精神力量贯穿着整个自然。

叔本华,这位令人关注的德国哲学悲观论者相信,这股生命力量在我们身上表现为一种生存的本能,大自然用它来诱使我们积极进取,物种因

---

〔1〕 查尔斯·赖尔(Sir Charles Lyell, 1797—1875年),英国地质学家,认为地球表面特征是在不断发生缓慢变化的自然过程中形成的,反对灾变论或求助于《圣经》,主要著作有《地质学原理》。

此而绵延不绝地繁衍。这种观念可能也影响了达尔文主义的形成。不过，虽然有少数人提到物种演变的进化论，但这只是一种思辨观念，缺乏足够的证据。早在1800年，拉马克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物种的进化，他的理论注定很有生命力，却未能说服大多数思想家。拉马克相信，习得的特征能够继承下来。长颈鹿由于够食物而把它的脖子伸长了一点，然后就把这点进步遗传给后代，它的后代的脖子就由此而变得更长。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后天习得的特性是不能通过基因来遗传的。达尔文对拉马克很是诋毁和嘲笑，拉马克这个牵强附会的愿望或意图或许很能吸引人，但肯定流于空想，这就好像在说，鸟儿想去飞翔，使得鸟类的一个器官伸长为翼翅。达尔文则主张，有些鸟类恰好有非常近似于翅膀的器官，它们生存的机会更大一些——这是一个机械的和偶然的过程，假如不把意志或愿望归因于自然界的话，就会更科学一些。至少他认为，这种“自然选择”无疑是进化当中最重要的过程，即使它不是惟一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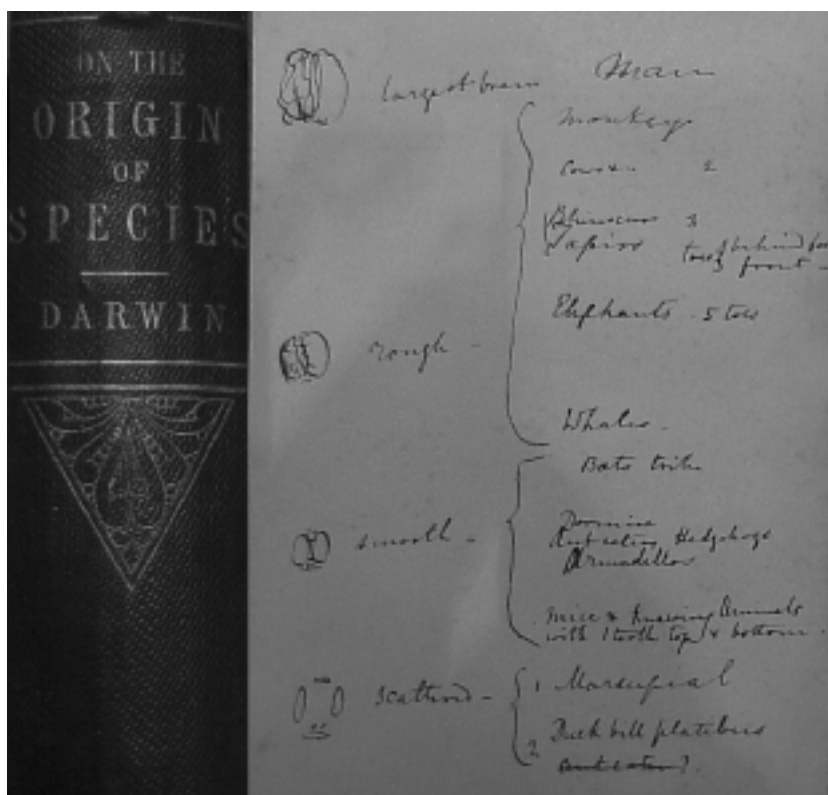
科学知识在好几个领域内的迅速发展，还有广泛的科学探险，带来了许多有关地球上生命形式的新材料。从1831年到1836年，达尔文本人乘贝格尔号远航，研究和搜集动物学方面的证据。这位显露不出什么天才迹象、病歪歪的青年人，原本打算继承他那威严父亲的衣钵去行医，结果未能如愿，接着，剑桥大学的一位教师让他申请贝格尔号的一个职位，从而改变了他的一生。在动身之际，他本来没有打算去推翻人们根深蒂固、倍加珍视的观点；但是，在采集和观察标本的过程中，他脑袋里却形成了许多疑问。他开始深信，物种并非一成不变。在几乎相同的环境下，为什么会出现许多不同的亚种？

不过，总的说来，在贝格尔号上度过的难忘的五年中（他的日记详细记载了这段时间的生活），达尔文只是急于进行观察和采集工作，将各类标本（骨骼、岩石、化石、稀有植物和动物）带回英国，扩充博物馆的收藏——正是越来越多的标本为建立关于地球的年龄和演变、生命的起源和本质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一有空闲就整理这些标本。有一大批职业的或业余的博物学家对这些事情苦思冥想。达尔文只是其中之一，但他是最伟大的，至少是最执著的。由于收入足以供温饱，他就在肯特郡的一个乡村定居下来，在那里进行搜集和实验工作，一边同病魔做斗争，一边应付维多利亚式家庭生活的拖累（他家里有10个孩子）。

然而，正是由于读了其他学科的书藉，达尔文才形成有关演变成因的

理论。托马斯·马尔萨斯与赫伯特·斯宾塞给他提示了“适者生存”的观念。在19世纪头40年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印了好几版。达尔文在读这本书时说过:“这本书马上让我想到,有利的环境下,物种的变异往往能够保留下来,在不利的环境下,就会被毁灭。结果一个新的物种形成了。”那位忧郁的牧师(马尔萨斯)提请人们注意的环境是,人口增长的速度往往超过食品供给的速度。出生的人总是要比活下来的人多得多。在动物和植物界,情况就更是如此。在1837至1838年间,达尔文就形成了这种假说,接下来,他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悉心去收集证据支撑它。早在1844年间,他就写出了一份手稿,但是,在使它完全具有说服力之前,他不会发表的。由于天性保守,达尔文实际上不愿意接受自己的逻辑。

他采取谨慎态度,汲取前人率尔操觚的教训。这些人为数不少,不止可怜的拉马克一人。1844年,苏格兰百科全书编撰家、以博学著称的学者罗伯特·钱伯斯<sup>[1]</sup>匿名出版了《造物的自然史遗迹》。这本书提出的进化论假设,引人深思,尽管这个假设不够明晰,证据也不够充分。这部著作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达尔文成名的15年前,人人



《物种起源》书脊和手稿

都在谈论进化论,诗人们备感沮丧(丁尼生的名句“牙齿和利爪滴着鲜血的自然界”出自《悼念》,该诗集问世远远早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科学家争执不休。钱伯斯最后得到的裁定是“无法证实”。解决这个问题固然紧迫,但是显然必须超越这种非专业行为。所以达尔文等人不停地工作。

[1] 钱伯斯(Robert Chambers, 1802 - 1871年),出版家,曾出版《钱伯斯百科全书》。

《物种起源》是一部科学论证的杰作,作者精心构思的目的,就是让读者明白,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可思议的物种演化观念实际上有根有据。达尔文用大量的例子证明,迄今为止,地球上出产过的物种肯定多于活下来的物种(尽管大象是繁殖速度最慢的动物,如果所有的小象都活下来,地球的承受能力很快就会被突破)。除此之外,他还倚重人们同样熟知的事实,即每一物种都会发生少量变异。两个人不可能长得完全一样,一个人总是要比另一个高、壮、聪明、英俊。所有活着的动物也是如此。鉴于生存斗争激烈,由于某种原因,生存价值更大的那些变体一定能够活下来,而且它们自身繁殖的速度比其他物种快。环境状况的变化,例如气候的变化,将向它们提出挑战,要求它们去适应。

达尔文所利用的另一个因素出自地质学证据,是地球迄今存在的时间。在达尔文时代,人们所认定的地球年龄并不像今天我们说的那么长,但肯定比以前认为的要长——从大致6千年到达尔文时代的50万年再到今天的40亿年。他认为,这段时间足以让无穷多次细微的自然选择滴水穿石。

达尔文在论证这些问题时,行文言简意赅,很有说服力,这得力于他对古典修辞的娴熟掌握。达尔文的著作之所以能够传世(我们把他的进化论观点用于分析他自己),乃是因为,他不仅擅于汇总证据,而且擅于表述要点。达尔文不像精英式专家那样大量使用深奥费解的术语或高等数学知识;只要识字,差不多人人都能看懂这本书,但这本书的科学性令人印象颇深。少数人曾指出,这本书实际上未能证明它的要点;某一物种是怎样突然转变成另一物种的,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达尔文未能提供决定性的证据。但是,他援引了解剖学、育种试验<sup>〔1〕</sup>、古生物学以及其他领域的知识,合并成支撑他的自然选择假说的大量证据。

## 达尔文主义的传播

达尔文的书一面世,便销售一空,随即引发了争议。这场达尔文革命

---

〔1〕 达尔文曾经深入伦敦酒馆的工人当中,学习他们怎样培育鸽子,这是下层阶级特别喜好的一种消遣。这是说明他的科学求知欲和旁观博采的一个突出事例。——原注

几乎触及所有领域。这就是它成为思想史上经典之作的原因。宗教、哲学、社会科学、文学以及艺术从此均不复旧貌。进化论的巨大影响导致一切思想的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

大多数科学家服膺于进化论,尽管他们对达尔文以“自然选择”为主要原因的理论未必完全接受。各地情况有所不同。达尔文本人评论说:“很奇怪,国籍居然影响观念。”法国人把路易·巴斯德奉为自己的生物学英雄,往往把达尔文主义视为一个帝国主义式的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物种起源》出版12年后,法国人类学家的一



漫画《人不过是蛆虫》(1882年)

1881年达尔文发表一部关于蚯蚓的生态学论著。漫画以此取名。画中,达尔文坐在上帝的位置上,俯视着一个英国绅士是如何从混沌中逐渐进化而成。

次会议宣布,“没有任何证据,甚至没有任何预设”支持把自然选择当成物种转变的原因。但是,到了1872年,达尔文可以这样写,“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承认进化论原则”,而且他觉得,多数人都认为自然选择是主要的进化手段。少数人固执己见表示反对;反达尔文主义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杰出的美国哈佛大学博物学家路易·阿加西斯,在后半生的时间里,他试图推翻这个“洪水猛兽式的”理论,并因而丧失了自己的科学声誉。

尽管达尔文最终保持住作为一个伟大科学家的地位,但他的理论经历了某些修正,而且还在被修正。达尔文对于遗传机制知之甚少,而学界也

是到 1900 年才理解这种机制。(奥地利修士格雷戈尔·孟德尔在 1866 年就发表了他的开拓性发现,可是在 1900 年之前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界的重视。)今天,几乎没有生物学家否认自然选择的重要性,但是,变异的功能,包括大突变或偶然发生的极端变异的功能,似乎同样重要。而这是达尔文尚不了解的因素。达尔文主张进化的演变过程是缓慢和渐进的,而且宣称“大自然不会制造飞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现代理论强调突变飞跃。晚近的遗传学证实,遗传并不仅仅像达尔文所说的那样,通过亲本特征的混合而发挥作用;所有的亲本特征都保存在基因里,很可能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后来的某一个体的身上。先是漫长的稳定时期,然后是急剧全面的变化,这是惯常的进化方式。达尔文的错误在于,他把这种显见的非连续性归因于化石纪录的不完整。<sup>[1]</sup>不用说,在达尔文之后生物学有了长足发展;这里也无须考察当代进化理论的种种精妙之处。总之,理论是沿着达尔文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

令人叹惊的是,拉马克的进化论更具有道德吸引力,到了世纪之交,居然还有拥护者。它能够让人接受进化论,而不接受自然选择。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和自由思想家塞缪尔·巴特勒本人对正统宗教持有批评态度,他最初很赞赏达尔文,后来逐渐认为他是骗子。巴特勒受到罗马天主教生物学家圣·乔治·米瓦尔<sup>[2]</sup>的影响,回到拉马克的进化论。达尔文曾把米瓦尔看做危险的敌人。巴特勒在《新旧进化论》(1879 年)中向当时确立的所有科学法则展开进攻。他依据拉马克式的原则,制定出一套很有吸引力的进化宗教观。每个人对人类的知识和意识都有所贡献,而且把他的贡献传承给下一代;我们都能够感觉到,我们所学到的、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并没有付之东流,而是构成了人类进步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很不幸,从遗传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并不正确。我们可以尽我们的所能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但是,他们无法通过生物遗传机能来继承我们的知识。

---

[1]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在 50 亿年前的“寒武纪爆炸”当中,突然产生了现存大的数种类的动物。同样,智人的产生也是相当突然的。——原注

[2]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 1835 - 1902 年),英国小说家、批评家。著有《埃瑞洪》(Erewhon),即 nowhere 一词的倒写,意为乌托邦。

圣·乔治·米瓦尔(St. George Jackson Mivart, 1827 - 1900 年),英国学者,著有《物种起源》(The Genesis of Species, 1871)。Genesis 在《圣经旧约》中作为第一卷的标题,意为“上帝创世纪”。米瓦尔以此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相颉颃。



达尔文的真科学具有令人不安的内容,这其实是当时许多人反对他的原因,尽管当时的迹象不如后来明显。著名德国科学家冯·贝尔不相信这种把人看做“物质的产物”并且把人贬低到动物水平的理论。达尔文以前的朋友、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亚当·塞奇威克<sup>[1]</sup>宣称,接受达尔文主义将会“把人类降低到(有史以来)最低的水平”。萧伯纳后来写道,“假如能够证明整个世界都是这种选择(指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结果,那么,只有傻子和无赖才能坚持活下来。”

当然,让某些基督教徒感到震惊的是,达尔文学说暗含对“创世纪”的否定以及对人类特有的灵魂的否定(如果灵魂存在的话,根据达尔文的原理,它就已经存在于变形虫之中了)。但是不安的情绪不只存在于正统宗教界。萧伯纳和巴特勒并不持有正统的信仰。在达尔文主义的世界里还可能讲什么道德价值吗?或许最令人不安的特点就是整个过程明显是偶然性的和无目的的。偶然因素决定了整个物种的灭绝,而其他物种,在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它们死亡之前,也会现身世上,自有一段风光的时候。比起中世纪人们对世事变幻无常的思考,达尔文的思想更令人沮丧。

在研究自然的过程中(以及经历了爱女夭亡的个人悲剧后),达尔文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赖尔的地质学最先使他脱离了圣经里的基督教思想;接下来,自然选择观念在他的大脑中又摧毁了自然宗教的经典论证,即种种证据表明,各种生物体现了上帝的设计和目的。在19世纪初,英国的一部流行教科书是威廉·佩利<sup>[2]</sup>的《自然神学》(1802年)。该书利用了大量经过仔细观察而得到的详细材料,论证有机体适应环境的神奇能力,证明这一切都是“聪明的上帝”有意设计的。换一个视角来看,佩利的许多例子则可被视为自然选择之后适应环境的结果,而不是上天的设计。再进一步看,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极不完美的设计案例——当代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sup>[3]</sup>所说的“莫名其妙的安排和令人可笑的解决办法”,像他的一本书的

---

[1] 冯·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 1792 - 1876年),德国胚胎学家,提出比较胚胎学。

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 1785 - 1873年),英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学者。

[2] 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 1743 - 1805年),英国神学家。

[3] 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Gould, 1941 - 2002年),美国进化论科学家、古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散文作家,提出“间断平衡”进化理论。该理论被称为“生物进化大爆炸”理论。

名字所揭示的“熊猫的拇指”。神圣的造物主按说应该赐予大熊猫一个正常的拇指而不是一个临时凑合着用的拇指(由于适应环境而形成的腕关节骨)。残留的退化器官也同样说明问题:动物身体的某些器官不再有用,但它们的存在却证明了这种动物先前的身体结构。

在《物种起源》的结尾,达尔文提出了一种实际上被广泛接受的有神论:令人高兴的是,上帝经过一番选择,将所有生命的种子种在少数简单的生命形式之中,而不是分门别类地创造出物种。但是,正如他的书信以及后来出版的著作所揭示的,达尔文放弃了这一立场。他从生物界看到了太多的偶然因素和邪恶,让他无法相信有一个仁慈的神圣计划的存在。“我无法让自己相信,仁慈和全能的上帝会故意创造出埃及蠓,有意让它们寄生在活生生的毛虫的体内,也无法相信,他会创造出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还想到,人类思想自身就是进化顺序的产物,因而它纯粹是生存的工具。我们之所以有种种想法,是因为它们能够让人类应对环境,而不是因为它们是对还是错。

这些想法注定会让其他人感到震惊。说来也奇怪,这似乎把科学与神学都置于缺乏任何高尚理由的境地;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生存竞争的工具。让达尔文本人有些困惑的思考,反映出有许多人的思考被这种新的认识弄得乱了阵脚。达尔文不愿意成为教条主义者,他自称“不可知论者”。但是,仔细研究他的宗教观点,可以发现,把他的宗教观点归结为无神论,不算是荒腔走板。达尔文绝对没有为上帝造物和天意安排去搜寻任何证据。

与此同时,大惊失色的基督徒和某些达尔文思想的坚定追随者之间展开了争论,这给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界增添了不少生气。最有名的一场争论是1860年塞缪尔·威尔伯福斯主教与托马斯·赫胥黎之间的交锋。赫胥黎有“达尔文的斗牛犬”之称。这位性喜辩论的科学家对宗教敌意很深,他断言:“就像赫拉克利斯的摇篮边躺着被扼死的蛇,在每一门科学的摇篮旁边都躺着被消灭掉的神学家的尸体。”据传说,“油滑的塞姆”(这是他的敌人对他的称呼)表示,他可不情愿认猴子为祖先。赫胥黎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应:他宁愿是一只诚实的类人猿的后代,也不愿意是一个有脑袋却不

愿意使用的人的后代。<sup>〔1〕</sup>然而,并非所有的宗教人士都反对达尔文学说。而且,达尔文的敌人当中有一些科学家和其他非宗教人士。不过,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已成为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精彩片断。我们还会提到它,因为它包含的因素不仅仅是达尔文主义。

有人论证说,达尔文主义所说的进化符合上帝的意愿。他们试图以此来结束这场冲突。生命从原始的黏土造的东西,经过无数时代,上升为有理智有灵魂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就没有崇高的东西吗?(亨利·德拉蒙德<sup>〔2〕</sup>的说法)即便存在着种种残酷和苦难,人类毕竟还是拥有了一个辉煌的结果,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达尔文主义的信徒指出,“滴着鲜血的牙齿和利爪”这种说法有点言过其实;生物的生存主要取决于它与自然的斗争,而不是生物之间的竞争,而且,生物之间的合作有助于它们的生存。那些悉心照料后代和互相帮助的动物往往能够生存下来。与精力和智力相比,体力是次要的。自然选择经常是悄无声息和毫无痛苦的,是通过阻止低劣生物的繁殖来进行的。智慧更高的物种终将胜出,人类就是伟大的例证。

美国博物学家阿萨·格雷称赞达尔文“恢复”了自然的目的论。即使是“分期实施的计划”,毕竟有一种设计。正如卡莱尔夫妇所指出的,不管我们是否起源于变形虫,这与我们的精神生活无关。著名美国哲学家乔赛亚·罗伊斯<sup>〔3〕</sup>坚信一种进化论的唯心主义。他指出,与动物不同,人类的精神的确在寻找价值:这个事实与达尔文的事实同样是无可非议的,即便二者之间的差别有些令人不解。达尔文没有、也不可能把我们变成野兽。他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和令人费解的知识,但只要人类的意识存在,它就会超越物质,就会追求理解和善。一些最保守的神学家和老派的加尔主义者,反而容易接受达尔文主义。他们早就知道,苦难和冲突乃是原罪的后果,因此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只有天真的乐观主义者才会对如下看法感到

---

〔1〕 赫胥黎的后代继续激烈地反对有神论。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20世纪著名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自称“人文主义者”,他宣布,尽管牛顿已经证明无须上帝来引导天体的运行,然而“有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观念,摒弃上帝引导生命的演变过程这种观念,就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了”。(On Living in a evolution, 1944年)——原注

〔2〕 亨利·德拉蒙德(Henry Drummond, 1851 - 1897年),英国银行家,著作家,参与建立使徒公教会。

〔3〕 阿萨·格雷(Asa Gray, 1810 - 1888年),美国19世纪著名的植物学家。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 1855 - 1916年),美国哲学家。

不安:如柯勒津治所说,世界不是一个穿着衬裙的女神,而是一个穿着紧身衣的魔鬼。

生机论的进化观认为,“生命力”是进化的基本原因,自然选择只是它使用的一个手段。这就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一种非理性的“奋进不息、坚忍不拔、充满生机的力量,一种自发的活动,愿望十分迫切的一种意志”。这位另类的德国哲学家把意志当做构成宇宙基本现实的精神,以取代黑格尔的“心智”。叔本华是悲观主义者。在他看来,这股力量折磨着我们,它诱使我们经历生活的磨难和骚乱,它是聪明人压制欲望、力求内心平静的大敌。其他人对生命力的看法要乐观一些。作为自然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的智力不乏创造性。法国生机论在19世纪末亨利·柏格森的通俗哲学中达到顶点(关于柏格森,下文中还要加以探讨)。它从进化论出发,补充或替代了达尔文的机械论和唯物论,它与拉马克的观点有些类似——拉马克依然后继有人,尽管他的门徒很少是职业生物学家。

但是,从哲学上讲,达尔文主义进一步败坏了唯心主义和唯理智论的声誉。“自然主义”认为心智是进化的产物,观念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甚至我们之所以确信自然界是能够被理解的,也是因为我们祖先中不能理解自然的那些人没有生存下来。理性是幸存者的特征。萧伯纳剧中的一个人物说过,现代的观点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在故我思”。理性是它打算去理解的自然的产物。与猴子的尾巴或长颈鹿的脖子一样,心智本身也是进化的产物。真理就是有用的东西,或者是经过多年的斗争一直发挥作用的东西。心智不再与它试图理解的世界相对立;它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其进程的产物。(当然,这种观念本身也可能不是永恒的真理,只不过是进化的产物。)

柏格森、尼采和美国的实用主义者(如约翰·杜威)都受到这种大胆思想的影响,并为它大伤脑筋。无论怎么看,思想领域已被改变了。宇宙观发生了转变。在安纳托尔·法朗士看来,这场“现代革命”产生了矛盾的后果,它既给人们带来了自信,又产生了不安,对此,大多数人可能会同意。杜威在《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1909年)中认为,由于破除了柏拉图主义的永恒事物和黑格尔的封闭的形而上学体系,转而提倡“转变原则”,达尔文主义就鼓励了多元化和大胆实验。进化论宛如令人耳目一新的轻风吹拂唯心主义荒原。它呼唤新的知识和新的艺术形式,例如,在建筑方面,它要求的不是传统风格的建筑,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时代所要求的现代

样式。

## 其他科学的影响

科学作为主导思想模式勃然兴起,这主要归功于达尔文,但它是一种更大模式的一部分。许多人指出,这种变化大约出现在19世纪中叶。牛津学者马克·帕蒂森<sup>[1]</sup>则追溯到1845年至1850年。美国大法官小奥利佛·温德尔·霍尔姆斯<sup>[2]</sup>认为,在所有的思想代沟当中,他那一代与父母一代之间的思想代沟最为严重(大约1865年左右):“这就是看待世界的科学方式所产生的影响。”除了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他还提到赫伯特·斯宾塞和亨利·T·巴克爾,这两个人试图应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事务。关于斯宾塞及其“社会达尔文主义”,下文还要详谈;还有其他有科学进步和科学英雄。

天文学家们准确地测量了地球与太阳以及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对于星球之间的难以置信的距离有所认识,他们还发现其他星系的存在这一惊人事实。拉普拉斯1796年出版的《宇宙体系论》几乎以掩饰不住的狂喜来赞美物质自然界的井然有序。但是,最终导致物理学在19世纪末发生巨变的那些困惑,早就冒出来了。1827年,法国军事工程师萨迪·卡尔诺注意到能量损耗显然是无法挽回的,就像身体凉下来之后失去的热量那样。当整个宇宙接近平衡温度的时候,它是否用掉了所有能量?(著名英国物理学家卡尔文勋爵之所以轻视达尔文主义,原因在于,他认为,热力定律表明,宇宙的存在不可能像地质学家所说的那么久远。)在此热力学似乎否定了牛顿的物理定律,因为牛顿定律设定的是互逆关系,而不是不可逆的单向运动。科学家们为解决这个困惑所做的努力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悲观论者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中发现了反对进步的另一个论据:从长远看,世界的发展方向是反过来的。

波兰姑娘玛丽娅·斯克罗多夫斯卡(她婚后的名字玛丽·居里更为世人所知)以路易·巴斯德为自己的偶像——巴斯德因对细菌学和医学做出

---

[1] 马克·帕蒂森(Mark Pattison, 1813 - 1884年),牛津大学林肯学院院长。

[2] 小奥利佛·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1841 - 1935年),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

非凡贡献,被称为“生物学的伽利略”。她想去巴黎学习物理和化学。在华沙时她就已经喜欢上了化学实验室。她的表兄曾在伟大的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手下工作,门捷列夫建立了元素周期表,而未来的居里夫人将给它添加几个很有分量的脚注。在19世纪,化学革命与生物革命同步发展。18世纪末,法国的一位银行家和业余科学家成为化学领域的牛顿,此人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恐怖统治<sup>[1]</sup>的牺牲者,他就是安托万·拉瓦锡。化学当时处于思想波澜的浪尖上;在思考科学观念对于其他知识学科的影响时,柯勒律治认为,舍勒、普里斯特利和拉瓦锡的发现,“将无限多样的化学现象简化为少数基本元素的作用、反应和互换”;这些发现对于哲学和其他领域的影响,与牛顿在18世纪的影响相比,毫不逊色。值得注意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阐明他所宣称在自然界中存在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时候,往往援引化学例证。

在英国,化学与达尔文所在的圈子发生了有趣的联系。约翰·道尔顿(他是汉弗雷·戴维的门生,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在风景如画的威尔士的朋友)提出了原子论,发现了化学亲和力的带电性质;当“原子”结合在一起,它们相互交换电脉冲。电流与磁力相似,在此也与化学联系起来。原子被认为是坚硬的、不可简约的物质单位,这就是它在希腊文中的原义;也就是牛顿所说的“固态的、实心的、无法穿透的”粒子。

著名的苏格兰天才学者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尔致力于研究大气分子明显的不规则和无法预测的运动,直到1905年爱因斯坦遇到这个问题时依然感到困惑。它是自然界不确定性的一个例证,打破了科学主义对完全有序和可以彻底解释的自然秩序的信仰。麦克斯韦的伟大贡献在于,他用数学公式表述了电磁学定律。电流现象研究的长足进展,从18世纪末的伏打和伽伐尼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米歇尔·法拉第发明电动机,为电气大举侵入生活铺平了道路:在此后几十年内电力开始为城市照明、火车运行、工厂运转提供动力。克拉克·麦克斯韦尔对各种射线的理论预测导致了科学家对X射线、无线电波以及其他形式的放射性能量的发现。他在1864年出版的著作可能是世纪末爆发的整个科学革命的开端,这场科学革命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斯·普朗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玛丽

---

[1] 小奥利佛·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1841 - 1935年),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

· 居里等人(见第七章)。

尽管达尔文在公众中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但是上述科学研究领域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它们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同时也产生了某些理论上的困惑。在19世纪后半叶,专业性科学组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其标志是为数众多的国际性会议、期刊、专业学会、合作研究。所有的自然科学都取得了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揭示出宇宙令人惊奇但有时也令人惊惶的面貌。

在大学内部,科学家们领导了改变高等教育基本原则的斗争。在19世纪中期以后,牛津和剑桥发生了教育史家所说的“从牧师到学监”<sup>〔1〕</sup>的转变。这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科学化的过程;新的学监可能是人文主义者,也可能是科学家,反正不是牧师。老派的神职人员中有许多人痴迷于科学;而有些新的学监则为此感到惋惜。但不管怎么说,这时候的牛津和剑桥已不再是达尔文在19世纪20年代所见到的那个样子了,那时候,科学在大学里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而大学的主要目的是为英国国教培养教士。大学的目标现在变成提供文科教育,为世俗事业提供人才。课程科目扩大了,历史、各种现代语言被纳入其中,而且,在旧有的授课(希腊文—拉丁文—数学)基础上至少添上了某些自然科学。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法国,1866年巴黎大学解散了神学系——巴黎大学中世纪创建者的在天之灵,肯定会寝食难安。

不过,思想界的主要领袖依然是“文人”。他们不是专家,有些人甚至不是大学出身。赫伯特·斯宾塞,以最通俗的方式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综合了一切知识的设计师,就出自科班之外。他出身中下层,主要靠自学成材。此人精力充沛、记忆力惊人,深受赖尔和冯·贝尔的影响,他在达尔文之前创造出“适者生存”这个短语。人们已经不假思索地称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是这个说法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他的进化理论实际上更多地带有拉马克的色彩,而不是达尔文的色彩。达尔文说他“胜我十倍”;事实上,斯宾塞涉猎的范围和思考问题的胆略远远超出那位喜欢称自己为无足称道的科学家的人(也许这是他故作谦虚之态)。事实上,达尔文最喜欢写的是北极雁和蚯蚓的习性而不是哲学理论。把进化论扩展到万事万物还有

---

〔1〕“从牧师到学监”(from clergyman to don)是恩格尔(A. J. Engel)1983年出版的研究19世纪学术职业兴起的专著的书名。

待于斯宾塞放手去做。

## 斯宾塞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斯宾塞著作等身、涉猎甚广，鲜有能望其项背者。他渊博的学识往往让对手望而却步。倘若以著作的销售量为衡量标准，他堪称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严肃思想家。美国出版商亨利·霍尔特<sup>〔1〕</sup>写道：“也许没有哪一位哲学家能像斯宾塞那样从1870年到1890年风行一时。”霍尔特享有在美国销售斯宾塞著作的特权，令人羡慕。威廉·詹姆士把斯宾塞的体系称做是“自圣托马斯或笛卡儿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建立包罗所有知识的综合体系的尝试”。新知识纷纭复杂，旧框架轰然倒塌，这一切让人头晕目眩、无所适从，他们迫切地寻找这样的一种综合。斯宾塞素有中产阶级的马克思之称；他也可被称为英国的孔德或黑格尔。



赫伯特·斯宾塞

与其他雄心勃勃的体系建造者一样，斯宾塞也会逐渐贬值。斯宾塞致力于建构一种普遍的进化理论，结果几乎没有流传下来什么。正是针对斯宾塞的情况，T.H.赫胥黎谈到“一个美丽的理论会被一个丑陋的事实毁掉”，而斯宾塞所设计的整个宇宙都遵循相同进化规律的图式，受到太多“丑陋事实”的干扰。斯宾塞把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被归结为同样原理。他把这些原理概括为，从同质性向异质性的进化，从无差别到有差别的进化，从分离到统一的进化；“从一个相对分散的、均质的和不确定的格局到相对集中的、多样的和确定性的格局。”概莫能外。换句话

说，宇宙始于散布在空中的原子，人类社会始于没有分工的孤立的个体；随着劳动分工或分化，它们都向一个复杂的、有组织的体系发展。读到这里，学生可能马上会想到许多反对意见。现在的科学家让我们去相信，在宇宙

〔1〕 亨利·霍尔特(Henry Holt, 1840 - 1926年), 美国小说家, 著名出版商。



初始之际(或宇宙循环往复之际),原古的原子发生爆炸,此后就一直散布开去,这与斯宾塞的说法正好相反——按照他的说法,分散的宇宙尘粒逐渐聚合在一起。而原始时代的人类社会是十分紧密地组织起来的。

然而,斯宾塞后期的社会学对理论家们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他强调,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内,社会的变迁是通过非稳定平衡来完成的。斯宾塞的模式不同于马克思的模式之处在于,前者强调循序渐进和渐变,后者则强调突变和革命——这令人回想起均变论与灾变论的争论。

不幸的是,斯宾塞同马克思一样,随意地将他的科学研究与意识形态混在一起。他开始将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即适者生存)观念应用于经济社会。斯宾塞一度主编过《经济学家》杂志。他是在熟悉了政治经济学之后转向进化论的,因此把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写道:“可以说,适者生存这个原则是对李嘉图经济学的一个总的概括。”斯宾塞随意地将意识形态因素掺杂在他的社会科学里。尽管他还从爱德蒙·伯克那里借用了把社会看成一个复杂有机体的观念,但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这个自由主义传统可以从曼彻斯特学派一直追溯到约翰·洛克。斯宾塞是一位十分放肆的“不可知论者”,他的科学实证主义断然排斥无法用经验来证实的东西。本质、起源、终极原因都属于“不可知”领域,思考这些问题毫无用处。斯宾塞是一位像孔德那样的实证主义者,像《纯粹理性批判》的作者康德那样的现象学家。事实上,虔诚的基督徒把他当做这个时代的一个领头的离经叛道分子。

斯宾塞的自由主义表现在他对个体进化的见解中。他认为个体一直朝着更自由、更少限制这个方向发展。尽管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但社会也变得更具有多样性,更加自由。竞争是进步的关键。斯宾塞常常心安理得地认为,穷人是无法适应竞争环境的人,最好任其死掉。下面这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最早出现在《社会静力学》1851年的第一版中,但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的版本中基本保留下来,“杜绝当前的悲惨状况必然会使将来的几代人处于更严重的悲惨境地”,因为,“联系起普遍的人类的利益加以考量,而不是单独地考量”,让自然的竞争过程淘汰那些有缺陷的有机体,是更明智的和更善良的做法。这就好比是一个外科手术,它固然会产生痛苦,可是为了身体的长远利益,它却必不可少。对于弱者和穷人的慈善关怀,斯宾塞显然是无情加以拒斥,这使他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饱受攻击。

至少可以说,斯宾塞的观点是混乱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竞争,涉及的是病弱机体和健康机体,不应与经济竞争相提并论。也许为下一代人考虑,我们不会让身体或精神有缺陷的人活下来繁衍后代;然而一个病弱之躯可能是一个思想或艺术天才,他对整个人类的价值要比一位健康的运动员大得多。一个人陷入贫困,可能是运气不好或环境不利造成的,而并非由于天赋能力或性格上的问题;把那些在争取经济成功的竞赛中落后的人都说成是“不适应环境者”,应该淘汰,这是欺人之谈,很难让人相信。

另外,各种不同的社会单位在受自然选择的制约方面有所不同。斯宾塞有时把它们混为一谈。是个人之间在特定社会内部的相互竞争,还是社会与社会之间进行竞争,还是例如家庭这样的社会组织之间在进行竞争?著名社会进化论者 E. B. 泰勒<sup>[1]</sup>认为:“世界上那些最能维护自身的机制逐渐会取代不太胜任的机制。”斯宾塞与黑格尔一样,认为通过社会单位之间的竞争,就像通过国家之间的竞争一样,我们可以提高效率。斯宾塞强调说,社会就是类似于人体的有机体,在功能上组成一体而且经历着成长过程;它们受到环境的考验,从小发展到大,从简单发展为复杂。他激烈地反对帝国主义,深信一个国家或种族不应强行统治另一个国家或种族。同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也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即在现代世界,战争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国际主义。这些看法也许有自相矛盾之处。一个社会内部的残酷竞争难道就不会阻碍这个社会与其他社会进行生存竞争吗?如果你们对自己国家的穷人残酷和冷漠的话,当你们与另一个国家对抗时,肯定得不到他们的支持。

除了上述混乱观点之外,斯宾塞还一贯认为,自由竞争能够创造出最优秀的社会以及最优秀的人类。所谓“最优秀”是指最有效率、最能适应环境的挑战。正是在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影响下,社会人类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而问世。社会人类学最初提出这样的假设,即人类社会有一个与生物界类似的进化阶梯。例如,在宗教上,最早出现的是万物有灵论,一路发展下去,最后出现了一神论;世界上现有的“原始”民族在欧洲人走过的路上刚刚起步,这条路最终将把他们引向欧洲现在的地位。泰勒宣告:“人类的组织机制就像岩层一样,其接替系列全球基本一致。”对于诸如此类的人类发展规律的怀疑也随即出现。到 19 世纪末,这门新科学(即人类学)的实践

---

[1] 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 - 1917 年),英国人类学家。

者们发现,每一个原始民族都有其独特性,无法套用某一种进化模式。尽管如此,社会和人类学的最初动力就产生于人们对发现这些规律的期盼。

斯宾塞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认可的社会伦理,被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毫不隐讳地描述为“赶快干活,否则完蛋”。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未能取悦于其他达尔文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很多方面是一种激进的信条(例如,它是反宗教的),引起了许多社会主义者的兴趣。马克思著作的编者,马克思的女婿爱德华·艾威林<sup>[1]</sup>甚至捏造了一封信,把马克思和达尔文扯在一起。在德国,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sup>[2]</sup>英国社会主义者拉姆齐·麦克唐纳<sup>[3]</sup>在1894年出版的一本论社会主义和科学的著作的前言中写道,达尔文主义“在思想上不仅没有与社会主义相对立,而且它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斗争是生活的法则;条件变了,社会制度也随之改变。这两种观念很容易被派上激进用场。萧伯纳在《为什么达尔文得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欣赏》一文中,同往常一样,半是严肃半是调侃地指出,达尔文主义煞了资本家的气焰,告诉他们,他们之所以发家致富,并不是因为这是他们应得的,而只是出于偶然。事实上,现有研究表明,达尔文主义并非像过去所说的那样,是急于证实自己巧夺豪夺合理的商人所青睐的对象。

托马斯·赫胥黎积极支持达尔文、反对教会人士。1893年,他在著名的系列演讲中宣称,在人类事务中,自然选择并不是应该遵守的规则。在这个领域与在自然界不同,进步表现为同自然和进化的斗争,“步步为营,遏制宇宙的进程。”他同意马修·阿诺德的观点:

人应该始于并了解自然止步之处,  
自然和人决不能成为忠实的朋友。

活下来的可能是最优秀的,这是从实用的角度,而不是从道德角度而言的。毫无控制的进化会导致道德退化和社会崩溃。或者,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人类有理性的进化表现在,用更高的生存价值——福利与和

[1] 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 1851 - 1898年),英国社会主义者,作家和政论家;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的丈夫。

[2] 见 Alfred Kelly, *The Descent of Darwin*, 1981年。——原注

[3]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 1866 - 1937年),英国工党领袖。

平——取代粗野的肉体冲突,人类的进化是由大脑而不是膂力来组织的。有人指出,即使在生物领域中,冲突也不是惟一的法则;作为一种生物生存的手段,合作还是存在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亲王在一本拥有大量读者的书中就是这样认为的。<sup>[1]</sup>)

由此及产生了一系列有趣的争论和无数的混乱。达尔文本人在后一本著作《人类的由来》(1871年)中宣称,如果让“精神和身体孱弱者”活下去,而不是像“野蛮”部落那样把他们消灭掉,那么对于人类是有害的。他还宣告:“在全世界范围内,无数低级人种将被高级人种淘汰。”达尔文似乎实实在在地采纳了斯宾塞主义。由于他坚信妇女的天性不同于男子,近年来女权主义者也对他颇有微词。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在《遗传天才》一书中(1869年)创造了一个术语“优生学”,用以表示一门通过维系比较聪明的遗传种系来改良人类素质的科学。在有了希特勒之后,这类观念显然让我们感到不舒服。

“社会帝国主义者”是达尔文主义众多支系中的一个。1894年,一位名叫本杰明·基德<sup>[2]</sup>的35岁的英国文官兼业余生物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社会进化》,这本书立刻成为畅销书,被翻译成包括汉语在内的10种语言。尽管基德的盛名后来完全消失,在当时他至少是与卡尔·马克思齐名的社会思想家。基德的社会进化论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大杂烩。自然选择是针对社会群体来施行的,那些借助宗教信仰、有合作的习惯而紧密结合的群体更具有优势。基德的思想中也混杂着世纪末所特有的某些非理性主义因素。他还是一个古怪的反动的女权主义者。他认为,女性虽然在理智上逊色,但是,在进化的阶梯上,她依然领先于男性;情感比理性重要。在这里,进化论观念继续迸发出火花,有些火花还相当炫目。

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深受达尔文影响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也一度占据了文学舞台的中央。爱弥尔·左拉、杰克·伦敦、杰哈特·豪普特曼<sup>[3]</sup>以及其他同类作家以极为坦诚的笔触书写社会底层的生活,他们追求

[1] 这里指的是克鲁泡特金(1842 - 1921年)的著作《互助——一个进化的因素》。

[2] 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 1858 - 1916年),因《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一书而闻名。

[3] 杰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 1862 - 1946年),德国剧作家,于19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一种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态度以及已经近于宇宙悲观论的现实主义:命运是盲目的,通常也是残酷的。《物种起源》出版的时候,左拉和托马斯·哈代(伟大的英国小说家,后来是诗人)都是19岁,他们这一代人感受到了它的巨大冲击。他们除了受到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影响之外,还受到科学在总体上产生的特定影响,把科学方法应用于文学和哲学的实证主义的特定影响,以及社会总体上所发生的迅猛变化、尤其是科技和工业的迅速变化的影响。左拉还受到了法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惨败的刺激——这个事件似乎证明,在一个激烈竞争和迅速变化的世界里,一个民族要么适应,要么消亡。一切似乎都证明了这样一个教训,即稳定已不再是常态;变化之神成为新的主宰;谁若不识时务,谁就会倒霉。

## 维多利亚时代的信仰危机

生活在19世纪70年代的那一代人发现,这股新的反宗教思潮已经使父母和孩子的思想变得泾渭分明,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sup>[1]</sup>的父亲对于儿子受到斯宾塞的教唆深感绝望,他认为,一个不信仰基督教的人要么是“骗子、疯子,(要么是)傻子”。英国自由党首相威廉·格拉斯顿认为,文明社会不可能在诽谤圣经的启示力量中存在下去。“恶魔掀起来的不可知论的尘埃充斥了我们的肺管”,保守派人士这样哀叹道。这场信仰危机的成因,可能主要是,对于这部古代神圣著作进行的一种新的历史考证,而不是达尔文和科学。但是,就像法国作家于勒·龚古尔所说的那样,科学每天都咬上帝一口。这两记重拳,一记来自历史,另一记来自自然界,几乎是同时出击。在英国,《随笔与评论》<sup>[2]</sup>,这部反对完全根据字面意义来理解圣经的里程碑式宣言,在达尔文抛出重磅炸弹之后的一年就面世了,几乎产生了同样震撼人心的效果。二者都是世俗化大潮流的组成部分。

基督教在19世纪依然非常活跃。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出现了一场宗教复兴,由此产生了牛津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他们热衷于古代的神迹和

---

[1]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 - 1894年),英国作家,著有《金银岛》、《化身博士》等。

[2] 《随笔与评论》(Essays and Reviews),1860年出版,收有7篇文章。作者有6位是思想自由的圣公会教会人士,还有1位是非宗教人士。

仪式<sup>〔1〕</sup>，有意去抵消日益蔓延的实证主义的影响；在另一个方向上出现的是势力更大的英国低教会派的福音运动。各类基督教福音派教义都强调，教徒在皈依后应笃信教义，身体力行。英国福音派是以反对 18 世纪英国国教松弛放纵、徒有基督教虚名的名义起家的。另外，它也反对不信上帝的法国大革命。福音派教徒的神学非常简单，他们强调的是意志而不是复杂的教义，他们严格遵守道德信条，满脑子工作伦理。结果，他们招来了无数言辞激烈的对手。这些对手不无道理地指责他们思想狭隘和庸人习气，但是，福音派教徒在个人行为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场运动的奠基人之一威廉·威尔伯福斯（也就是赫胥黎的死对头“油滑的塞姆”的父亲<sup>〔2〕</sup>），在下议院工作了 45 年。他在退休之际回忆，在过去的 100 年中，下议院是如何从醉醺醺、大吵大闹的浪荡子的聚会变成了现在庄严持重的议会。

英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工业国家，大概主要与这种约束和激情有关。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品质”——节制、勤勉、节俭、思想严肃以及厌烦包括艺术在内的无所事事的娱乐活动——实际上源于福音主义的精神以及不从国教的新教各派的类似精神。福音派的改革热忱体现在废奴运动、海外传教活动中，还表现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力求保护工人不受虐待（福音派的托利党人沙夫茨伯里勋爵，是主张通过立法来限制劳动时间的最有名的倡导者）。但是福音派没有向现存社会秩序提出挑战。他们劝告工人不要造反，而要接受从属地位，通过努力工作来提升自己。福音派惊人的精力和奉献，他们的狭隘与狂热——注定会遭到维多利亚时代许多年轻人的反抗——对于后世人来说是难解之谜。但是，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员。在居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那里，福音派的基督教思想是最强劲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中产阶级创造了它，还是它造就了中产阶级？这个问题需要卡尔·马克思来回答。（历史学家鲍伊德·希尔顿<sup>〔3〕</sup>最近探询了它与社会经济思想的

---

〔1〕 神迹，指天主教念珠祈祷时默想的关于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 15 件事迹，如耶稣诞生、受难、圣母升天等。

〔2〕 塞繆尔·威尔伯福斯 (Samuel Wiberforce 1805 - 1873 年)，英国教士、教育家。1860 年在与赫胥黎的辩论中攻击达尔文的进化论。他是慈善家和政治家威廉·威尔伯福斯之子。

〔3〕 鲍伊德·希尔顿 (Boyd Hilton)，剑桥大学历史教授。这里提及的是他的著作《赎罪的年代》(The Age of Atonement)。

关系。)

英国国教中的第三股力量广教会派源于柯勒律治的概念“知识阶层”。这支力量非常微弱,尽管它的思想成就非常突出。实际上,柯勒律治向世俗精神作了让步,他希望能维系一种全国性机构,吸收最优秀的和最出色的人士,致力于宇宙最美好的事物。罗马天主教会早已分裂得不成样子,1860年它又面临着自由主义与保守派传统主义相互对立的危机,这场危机导致教皇于1864年颁布《谬误举要》,1870年召开影响重大的全世界基督教会议。

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信仰内部的所有这些分歧,比起“高等考证”<sup>〔1〕</sup>引起的那些分歧,显得无足轻重。一群有影响的教士和学者在《随笔与评论》中实际上宣布,我们应当正视现实,即受过教育的人已不再相信圣经字字是真理了。他们希望表明柯勒律治以及其他浪漫派神学家早先提出的观点,即放弃圣经记载的真实性并不意味着要毁掉整个基督教,还有其他理由来证明基督教的有效性。但是,对于那些笃信基督教的人来说,这本书令他们震惊,它导致了英国国教内部的一场异端审判。19世纪60年代又出现了所谓高等考证派的大众化读物,例如恩斯特·勒南的耶稣传和J.R.西利的《看这个人》(1865年)<sup>〔2〕</sup>。我们都记得,在这两本书问世之前,还有黑格尔主义者大卫·斯特劳斯在1835年出版的耶稣传。事实上,德国人在利用现代历史研究手段来研究旧约和新约方面领风气之先。

这些事情都不是新出现的。早在17世纪,著名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奥托利会的传教士理查·西蒙神父就对圣经进行了考证(在信仰路德宗的德国,更早就出现了这种苗头)。18世纪的自然神论者和怀疑论者从这些考察中收集了许多材料;在整个18世纪,人们就当时所接受的各种圣经版本一直在展开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些版本造成了许多棘手的文字问题(圣经原本亡佚,翻译和抄写错误百出,各种解释相互冲突——这些问题直到今

〔1〕 高等考证(higher criticism)和低等考证(low criticism)都属于圣经考证学(Biblical Criticism)。

〔2〕 勒南(Ernst Renan, 1823 - 1892年),法国学者,1863年出版《耶稣传》(Life of Jesus)。

J.R.西利(John Robert Seeley, 1834 - 1895年),英国历史学家。《看这个人》是耶稣传记。“看这个人”,这句话是罗马总督彼拉多将耶稣指给犹太人看时说的(见《约翰福音》第19章)。

天还足以养活一大群学者)。由于新的信息涌现,再借助于考证学的发展(德国历史学家由此而闻名),对圣经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高等”(历史)考证不同于“低等”(文本)考证之处,主要在于人们意识到,其他古代民族的丰富口传材料在许多方面与圣经有关。圣经不再被孤立地看做一部独特的文献。它被纳入刚刚重新发现的大背景之中。这样来看,它就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神迹的记录。

1878年,J.韦尔豪森<sup>[1]</sup>有力地论证了原先的一种理论,即圣经中出现较早的篇章(《摩西五经》),有相当一部分在它们记载的事件发生很久之后才见诸文字,直到公元前400年左右才定型,也就是说,已经距摩西将近1000年了。韦尔豪森的看法在学者中间、尤其是年轻学者中间占了上风。一位法国学者在1894年写道:“无论何人,只要他全然不带偏见,只要他不预先断定一切批评都是假的,他一定会接受如下观念,即这部祭司法典是在巴比伦之囚以后才形成。”简言之,《摩西十诫》并不是由摩西传达的上帝旨意,而是出自4世纪或5世纪那些犹太律法学家之手,后者面对的是流传几百年的来历不明的资料和传说。

对于某些虔诚的教徒来说,这个结论令人震惊,因为它对圣经是否是天启真理提出质疑,也就是向基督教的根基提出质疑。自由派神学家认为,以色列和犹太<sup>[2]</sup>的历史在广义上证实犹太民族被赐予独特宗教使命的说法是合理的。但是自由派神学家的观点很难说服那些从小就对圣经上的每一句话深信不疑的人,例如格拉斯顿,因为他们相信圣经是基督教赖以生存的稳固基石。令爱德蒙·戈斯<sup>[3]</sup>感到惊异的是,他母亲“已经形成了一种很明确的观念,圣经中的所有叙述显然是绝对真实的,不容变更,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她肯定比她那老于世故的儿子更有代表性。

1872年,乔治·史密斯<sup>[4]</sup>提请人们注意古巴比伦的洪水记载。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旧约中的许多内容都能在犹太人所接触过的巴比伦人等古代民族的宗教文献中找到对应记载。拓宽对非西方文化的了解,促成了这种对传统的欧洲宗教的去中心化。人类学研究成果借助于某些书籍

---

[1] J. 韦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 1844 - 1918年),德国圣经学者。

[2] 犹太(Judea),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包括今巴勒斯坦南部地区和约旦的西南部地区。

[3] 爱德蒙·戈斯(Edmund William Gosse, 1849 - 1928年),英国诗人,批评家。

[4] 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 1840 - 1876年),英国亚述学家。



(例如 19 世纪末詹姆士·弗雷泽流传甚广的成功之作《金枝》)而得以普及;这些成果显示,甚至有些原始宗教的教义也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教义非常相似。在 19 世纪,随着欧洲人对印度思想的认识逐渐加深,另一个完整的高级宗教的世界显现出来。这一切都削弱了基督教独一无二的地位。比较宗教学发现,降临世上、被杀死后又复活,然后又去救赎他人,这样的神祇出现在许多传说中;这很可能是人类的一个神话原型。基督传奇故事中关于殉难者、行奇迹者、人民之子(“人子”)、流浪汉等人的神话也是各个民族所津津乐道的故事。

希伯来思想也许依然有其独创性——坚定的一神论,对弥赛亚的强烈企盼,严格的道德诫律。但是,圣经故事所讲述的许多细节,基本上没有能够超越其他古代民族的经验。犹太人决不可能重新成为过去意义上的“独特民族”。

到了 19 世纪末,人们在对新约进行考证后,开始质疑,四福音书是否能够构成有关基督生平的四种独立证据。马太福音和路德福音的作者严重依赖马可福音,而且,甚至马可福音所包含的一些插入性文字也不是来自耶稣本人。所有的故事都取材于耶稣死后几十年才形成文字的口头传说。这些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然而,经过细致入微和饶有趣味的历史分析,最终的结果是,记录耶稣生平的福音书的准确性遭到了怀疑,加在他身上的各种观念和格言警句的准确性遭到了怀疑。怀疑思想更严重的人,如伯特兰·罗素会说,还没有过硬的证据能够让一个不带偏见的人相信基督的存在。即便确实有过这样一个人,有关他生平的记述也是杂乱无章,很不可靠。

历史上是否存在耶稣其人,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摧毁基督教。但是,有些头脑简单的虔诚教徒会那样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现代主义者”和“基要主义者”之间的争执不久就使大多数基督教会产生了分裂。1864 年,本来就很愤怒的教皇庇护九世,因意大利的自由民族主义者攻击教皇的世俗权力而大发雷霆。他发布了《谬误举要》,使罗马教会站在与 19 世纪大多数思想对立的立场;自由主义和民主、现代科学和黑格尔哲学,都被宣布与基督教和教会势不两立。1870 年,又是这位教皇召集了全世界基督教大会,主要目的是宣告教皇无谬误这一教义。这是继 16 世纪特伦托会议之后的第一次大会。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斗争,教皇的目的达到了,在斗争过程中,许多德国、法国、英国的主教反对教皇党;在教皇上谕颁布之

后,天主教徒中的一些自由派人士脱离了教会。

毫不奇怪,不久尼采就宣告上帝的死亡,夏尔·贝玑<sup>〔1〕</sup>惊恐地注视着西方历史上首次出现没有耶稣的世界。许多生活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人认为,这个问题令人非常痛苦。1888年,汉弗雷·沃德夫人发表了小说《罗伯特·埃斯梅尔》。这部流行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一个英国国教会牧师接触到高等考证,最后他相信有关基督生平的超自然说法无从实证,良知促使他脱离教会,放弃神职。对于维多利亚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故事。

约翰·莫利<sup>〔2〕</sup>评论说:“一度生机勃勃的信仰现已偃旗息鼓。”在格拉斯顿这样的人看来,这个结果一定会“完全斩断把人与未知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而这个纽带在依旧受人尊敬的宗教的名义下,给予人们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希望,从而减轻人们现实生活的艰难困苦。”一本著名的通俗小说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人们发现了一份文献,它明白无误地证实,基督复活的故事是假造的,然后就出现了这样的后果:所有的法律和秩序轰然倒塌,文明生活全部灭绝。

但是,在1876年,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父亲、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学者莱斯利·斯蒂芬在他的《不可知论者的自辩》中宣称,他不再有什么信仰,但还想继续做一名绅士。一群活跃的“理性主义者”(“现世主义者”)对于教权主义的垮台欢欣鼓舞,他们自己组建了一种怀疑论者“教会”。一位诗人写了这样一句俏皮话,“宗教信仰主要存在于诚实的怀疑中”,而不是宗教教条中。利顿·斯特拉奇<sup>〔3〕</sup>说,维多利亚时代的无神论者都是怀有宗教热忱的。与孔德和费尔巴哈一样,他们都想建立一个人道宗教。1885年,有一位无神论者制造了一桩轰动一时的事件:他被选入议会,但就职时拒绝宣誓,因为誓词里有这样一句话:“上帝保佑我吧。”

## 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与宗教: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19世纪后半叶的作家大多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这种悲观情绪或焦虑。

〔1〕 夏尔·贝玑(Charles Péguy,1873 - 1914年),法国诗人。

〔2〕 约翰·莫利(John Morley,1838 - 1923年),英国学者,报人,下院议员。

〔3〕 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1880 - 1932年),英国传记作家。

在维多利亚的名人中间,从各方面衡量,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或许是最杰出的思想家。他涉猎的范围之广是当时其他英国思想家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从纯粹哲学一直延伸到政治思想和经济理论;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他写出了维多利亚时代最有权威的教科书。他的许多文章还触及文学和伦理学。他涉足政治,而且与妻子一道写出了19世纪最著名的女权主义文献。他积极参与了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以及其他反潮流的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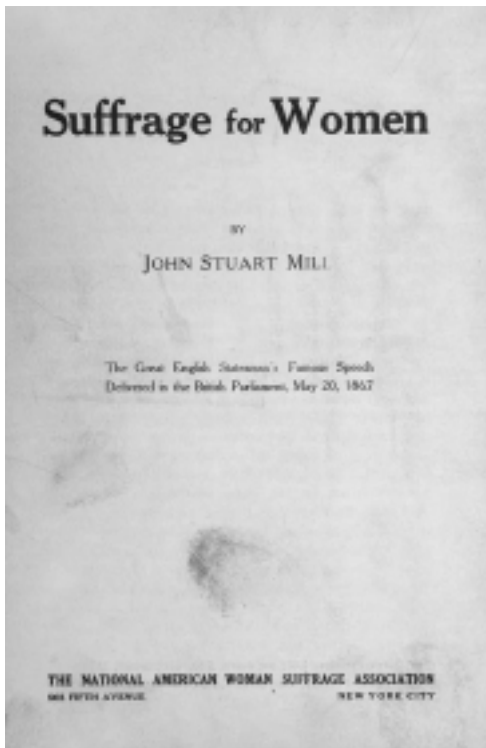
他的父亲詹姆士·穆勒继续坚持边沁对宗教的鄙视态度,把宗教看做是幼稚的迷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就是在这种反对有神论正统观念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发现,一边是严厉的理性主义,一边是他在精神上对更温情、更令人宽慰的东西的需要。这使他在二者之间无所适从。正如他在著名的《自传》中所讲述的,他在柯勒律治那里找到了让心理感到平衡的东西。诗歌取代了宗教的位置。伯特兰·罗素就是读了穆勒的著作后放弃宗教信仰的,有同样的经历的肯定不只罗素一人。穆勒年轻的时候(1831年)曾写过一篇题目为《时代的精神》的文章。他指出,这个社会“最耀眼出色人物”都悄然无声地放弃了宗教信仰。穆勒对孔德产生了兴趣,他在这位法国人开创的学科和社会思想中找到了矫正英国个人主义的办法,尽管他并不接受孔德思想中的许多内容。这位与妻子哈利特·泰勒合葬在阿维农的穆勒,受惠于法国人之处甚多。<sup>〔1〕</sup>他极为赞赏托克维尔那部论民主的巨著。

穆勒读过狄更斯的小说,还与托马斯·卡莱尔缔结了牢固的友谊,尽管后者在很多方面与他志趣相反。这种向多维视野开放的胸怀,是穆勒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人说他的思想是一系列妥协。这看上去可能与他满怀热情投入各种事业的行为相矛盾,但是他的一个主要事业是争取思想自由。在这个问题上,他写出了权威著作。但是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否定康德和黑格尔;对于他这种英国头脑而言,这两个人的思想过于抽象。他在哲学上属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因此不赞同康德主义者的说法,思想的法则纯粹是精神建构;他认为它们在客观上是存在的,而且他系统论述了归纳逻辑——科学的方法论。

---

〔1〕 阿维农是法国东南部的城市。1858年,穆勒夫妇在法国和意大利旅游,哈利特·泰勒在阿维农患感冒不治病故。因怀念妻子,穆勒以后每年在阿维农生活一段时间。1873年,穆勒病故于该地。

穆勒是个人自由的古典捍卫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抱有同情态度,但是他惧怕所有社会主义规划中暗藏的强制因素;他强调,合作必须是自愿的。在他那本著名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他以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为基础,但是他已做好准备,如果在无限制的私有企业的大潮中出现了合理的例外,他会予以支持。有人指出,随着这本书版本增多,那些例外也随之增加,结果穆勒成了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始祖。他总是乐于用柯勒律治对于共同体的偏爱来调和边沁主义的狭隘的个人主义。他曾经大胆放言:“比起人类大多数当前的处境,共产主义施加的种种限制简直是自由。”但是,尽管他同情社会主义的理想,穆勒依然怀疑,在人性的当前状态下,不使用强制手段,社会主义能否行的通。而他决不放弃个人自由的信念。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作  
《妇女的普选权》封面

实际上,他最有名的著作是《论自由》,而且他的妻子哈利特对这本书贡献颇多。这是为维护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而进行的经典论证,虽说读者看完全书还在考虑,穆勒是不是留下了太多不严密之处。“针对文明社会<sup>〔1〕</sup>的任何成员,违逆他的意志而正当地行使权力,只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防止别人受到伤害。说是为了这个人的利益,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道德上的,都不是充分的理由。强制他去做什么或忍受什么,不可能是正当的……即便在其他人的看来,这么做是明智的、甚至正确的。”(显然我们当代的福利哲学完全否定了这一原理。)穆勒进而为争取最大限度的思想和讨论自由去寻找理由。我们所压制的学说很可能是真理,除非

我们敢妄自尊大地说,我们的看法永远不会错;即使不是真理,它还可能含有一些真理的成分;即使它几乎没有真理的成分,它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它

〔1〕 穆勒强调“文明”这个词;他说,野蛮人比较适合开明的专制君主来统治,自由的王国非常需要治下的人民具有高度的自制力。——原注

迫使我们出示证明我们信仰的理由,以防止思想僵化停滞。<sup>〔1〕</sup>

不过,穆勒说得很清楚,在某些情况下,自由言论必须受到限制,例如当它“积极怂恿某些有害行为”的时候。法官小奥利佛·温戴尔·霍尔姆斯后来评论说,在拥挤的戏院里没有喊“着火了”的自由,这就是穆勒的意思。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就准确的界线达成共识?霍尔姆斯利用这个原则禁止反战人士在战时自由发表言论,而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这项判决严重践踏了公民的自由权利。穆勒似乎认为这些界线能够在逻辑上划清。喜欢强调社会要求而不是个人要求的人,都能够利用穆勒的大多数论证来反对他。这种维多利亚时代的回应,有一个例子,就是詹姆士·费茨詹姆士·斯蒂芬<sup>〔2〕</sup>的《自由、平等、博爱》。

尽管如此,穆勒的这本小册子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和高度的严肃性,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部杰作。穆勒认为,现代世界太缺少维护人类的尊严所必需的自由。他借用了自己的朋友托克维尔所谓“多数人暴政”的观念,认为“多数人的暴政”已经取代君主专制主义,对自由构成了威胁,民主时代产生了这个时代特有的不宽容。“现在几乎没有人敢于特立独行,这是当前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从鞋子到思想,一切都在标准化;正如此后的许多人一样,穆勒抱怨,大众文化促成了从众和平庸。穆勒为一些不被理解的事业奋斗过,例如,允许犹太人成为国会议员,保障海德公园演说的自由。后者是英国自由的著名象征,穆勒当时是国会中的无党派议员,在议会中使用阻挠手段挽救了它。<sup>〔3〕</sup>

或许穆勒最为人知的奋斗体现在他的另一部名著《论妇女的从属地位》之中。这部论著写于1861年,就在这一年,俄国解放了农奴,美国黑奴制开始走向尽头,加里波第为了意大利摆脱外国统治而开始远征。解放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过程。解放的结果有时不尽如人意,但这个过程不可避免而且不可逆转。这本书是穆勒同哈利特·泰勒以及她与前夫生的女儿

---

〔1〕 穆勒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同代人、伟大的罗马天主教徒约翰·亨利·纽曼为了让宗教信仰适应自由主义,提出了类似观点,异端对于信仰是很重要的。除非错误使我们澄清思想,否则我们对自己信条的理解总是不够完整。——原注

〔2〕 詹姆士·费茨詹姆士·斯蒂芬(James Fitzjames Stephen, 1829 - 1894年),英国法官。他在《自由、平等、博爱》一书中质疑这些口号的价值。

〔3〕 当时托利党政府试图禁止人们在海德公园集会。穆勒和另外一些议员成功地阻挠了这一提案。见穆勒《自传》第7章。

合写的(穆勒与哈利特等了好多年,直到哈利特的丈夫去世后他们才结婚。在当时,离婚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本书1869年才出版。在此之前,争取把妇女选举权纳入1867年改革的斗争失败了。这表明反对势力根深蒂固。世界似乎准备好去解放奴隶,但还没有准备好去解放妇女。穆勒夫妇发起的这场运动在很多年内没有什么成果。

与对妇女的普遍看法相反,穆勒夫妇认为,性别差异的根源在于社会习俗,而不在于先天的心理素质,因此,妇女与男人有同样的智力潜能,应当接受同样的教育。维多利亚时代其他著名人物,包括约翰·罗斯金和托马斯·卡莱尔在内,强烈反对穆勒的观点。卡莱尔的思想在很多的方面都不太正统,他娶了一位智力超群的女性,却认为,她的职责就是支持和照顾他,女性天生就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达尔文也认为,在科学家所在的创造性领域没有女性的一席之地。1864年,詹姆士·布赖斯<sup>[1]</sup>评论说:“那种认为妇女的头脑同男子的头脑一样是可以而且值得栽培的观念,在一般的英国家长看来是一种冒犯,甚至是一种革命的胡说。”伊莉莎白·巴雷特·勃朗宁<sup>[2]</sup>深入思考过女诗人的困境:如果太有理智,就会被认为不正常(不像女人),如果十分女性化,就被认为浅薄。

虽说穆勒夫妇的小册子在英国掀起了妇女运动,但它绝不是第一个探讨这个问题的。雪莱的岳母、左翼卢梭主义者威廉·葛德文的妻子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1792年就出版了《为妇女权利辩护》。女权主义传统来自启蒙哲学家。虽说社会主义者由于宣扬性解放而让许多人感到不快,他们却是一直在关注妇女解放问题。圣西门的弟子们就在寻找一位女性弥赛亚。1848年以前一个重要的女权主义者群体中有著名的小说家乔治·桑。19世纪40年代,马志尼流亡伦敦时,与一个英国家庭结下了交情,这家的4个女儿同那位著名的法国小说家乔治·桑一样,个个叼着雪茄。奥斯卡·王尔德的母亲,这位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爱尔兰的一位女士宣称,追溯女人的历史,从古到今,“透过各个时代经久不息的滚动,我们听到的只是她们的枷锁声响。”

---

[1] 詹姆士·布赖斯(James Bryce, 1838 - 1922年),英国历史学家,外交家。著有《神圣罗马帝国史》。

[2] 伊莉莎白·巴雷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1806 - 1861年),英国女诗人。丈夫罗伯特·勃朗宁也是诗人。

接着,英国就有了自己的女性乔治<sup>[1]</sup>;这个女人自称乔治·艾略特,放弃了自己的原名玛丽·安·伊文斯。也许她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如果她不是的话,那么这个头衔就会落到杰出的勃朗特三姐妹中的一个人身上。伊莉莎白时代最伟大的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爱妻,伊莉莎白·巴雷特·勃朗宁本人并不以诗人自诩。即便妇女事实上没有处于被奴役状态,她们在思想上受到奴役(她们的确处在不同的和从属的法律地位,这正是穆勒所质问的),这种看法不大符合为数众多的第一流女作家的情况。勃朗特姐妹和艾略特继承了简·奥斯汀的卓著事业,她们是长期享有盛誉的女小说家。妇女可以写小说,并且几乎垄断了某类不太深奥的故事写作。还有那些才气逼人的“女才子”,从世纪初令人生畏的哈特利·马蒂诺(以及《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玛丽·雪莱)到世纪末的比阿特丽斯·波特·韦布<sup>[2]</sup>。韦布的突出贡献在于经济学和政治思想,即使是不在于科学。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从他夫人那里受益之多以及对她崇拜之深,不下于奥古斯特·孔德的人道教。

在对待妇女以及对待其他事物的态度上,维多利亚时代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对于性别角色和两性交往的处理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大多数伟大小说的有趣症结,这些小说包括狄更斯、艾略特、萨克雷、哈代、梅瑞狄斯、巴特勒、吉辛的小说。最近,简·纳尔丁在研究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时发现,随着他年事渐高而且与时俱进,他向更自由的女权主义方向发生转变。

实际上,维多利亚时代人对于女性的理想化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而这一点恰恰后来遭到女权主义者的反对;闺房天使被写得过于纯洁,简直不食人间烟火,作家有意让她遗世独立成为美德的象征。萧伯纳曾写道,总得有什么东西去崇拜,于是维多利亚时代人“制定了一种道德和约定:女性即是天使。”都说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在性方面讳莫如深——萧伯纳就说过,他直到步入青年,才知道女人也长一双大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一个有关女性的神话,即有一些女性是高不可攀的仙境中人。工作了一天之后,男人们从那个显然不够完美的工作世界回到家里,应该能

---

[1] 18世纪到19世纪初,统治英国的汉诺威王室的国王为乔治一世、二世、三世和四世。

[2] 比阿特丽斯·波特·韦布(Beatrice Potter Webb, 1858 - 1943年),社会主义者。与其丈夫西德尼·韦伯、萧伯纳等一起创建费边社。

够遇到不同的和更美好的事物。妇女也想去那个破烂的市场或肮脏的工厂里面工作,或涉足腐败的政界,这种观念会让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感到惊讶。不管怎么说,穆勒超越了这种父权制思想状态。

在生命即将走向尽头之际,他重新思考了他的反宗教立场。他感觉到唯科学主义已经破产,他渐渐开始相信能力有限的上帝的存在。上帝不是全知全能的,他(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在《有神论》一文的结语中,穆勒似乎对于19世纪所有形式的信仰都做出了裁决。他向人道宗教表示敬意:“那个真正的、尽管纯粹是人的宗教。”黑格尔的精神似乎出现在如下叙述中:

人在一生当中要有所作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作为,从而向圆满走近一点点(善战胜恶),这是最令人感到鼓舞和兴奋的想法,它能够给每一个人带来启迪。

但是,他可能还要补充一句:超自然力可能也会作出贡献——这是对他毕生坚持的理性主义立场的巨大让步。

## 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哲人

诗人、批评家、散文作家、讽刺作家马修·阿诺德史无前例地替文明传统大声辩护。阿诺德对于基要主义的基督教百般挑剔,很不中意,但是他对于宗教的式微深感忧虑。他在1852年发表的诗歌《恩培多克勒在埃特纳》,是对那位古代达尔文自杀一事的追思——恩培多克勒发现生活毫无意义,便纵身跳进了火山。阿诺德在他本人这首最有名的诗篇中哀叹,信仰的海洋“向后退却,(发出)忧郁的、长长的咆哮声”,把我们留在了黑暗笼罩的平原上。阿诺德深入思考了浅陋浮躁的“现代生活的怪病”,提请那些醉心于进步观念的维多利亚时代读者,文明不是由物质性的东西和纯粹的人数构成的;它是理智和品味的发展,“某种适度心态”,开通,理智,审慎,精致。阿诺德对现代生活的堕落感受得最深刻——早于大多数知识分子——他看到了它“病态的忙乱和相互抵触的目标”。

在《文学与教条》一书中,阿诺德以他特有的温文尔雅的方式,呼吁从教条主义者手里挽救宗教的精髓,从基督教徒手里挽救基督教。福音派



“市侩们”思想偏狭,使他很反感。但是他并不宽容唯物主义的科学家。宗教教条主义和科学教条主义都是精神的敌人,精神应该是宽容的、开明的、有人情味的。本质上说,阿诺德的宗教类似于孔德的人道宗教。他对生活的推崇比不上他对文学——“世界上思想和言论的精华”——的推崇。“最优秀的诗歌具有一股塑造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快乐的力量,这一点是别的东西做不到的。”圣经固然在伟大文学的行列,但很难比得上柏拉图、莎士比亚以及其他大师。他曾有一句名言: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都是欧洲文明基本组成部分,但是,在福音主义盛行的英国,希伯来精神过剩。



马修·阿诺德(卡通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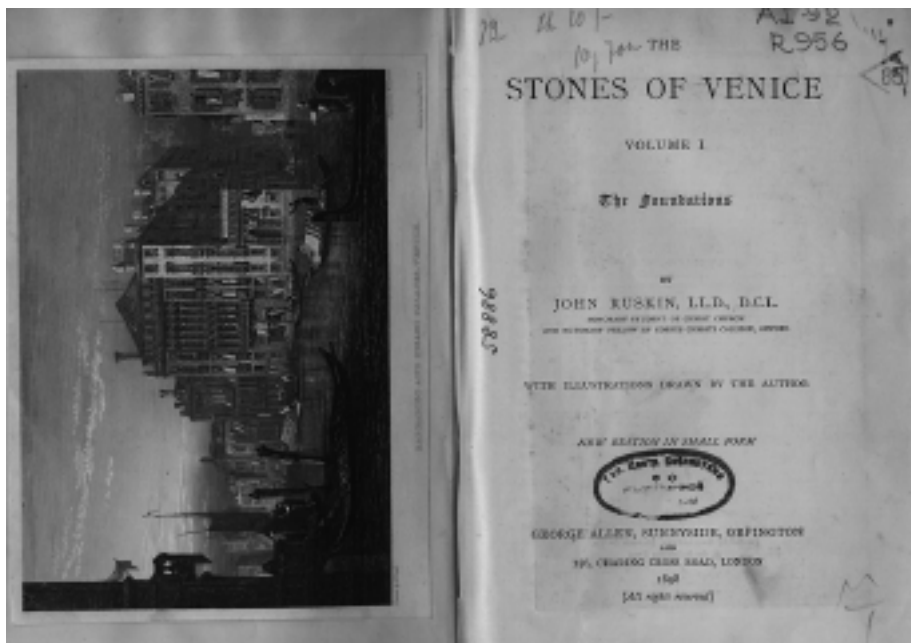
阿诺德把教条的科学  
与教条的宗教相提并论,说它们  
同样令人痛惜。这与列夫·

托尔斯泰的观点非常类似。这位俄国文学巨匠宣称,“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  
的两种瘟疫”,一个是教会里的基督教,即国家及其仆从的宗教——托尔  
斯泰本人经常是它的死对头,另一个是“唯物主义”,即包括达尔文主义者  
在内的科学家们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粗糙教条。托尔斯泰认为,不加批判  
地把科学当做一尊新神来供奉与信仰,教条的宗教何其相似。

另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哲人约翰·罗斯金<sup>[1]</sup>提供了一种以社会服务  
为宗旨的宗教。罗斯金是学建筑出身的,他的《建筑的七盏灯》和《威尼斯

[1]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 - 1900年),英国作家、评论家和艺术家。

之石》使他在 19 世纪中叶成为维多利亚时代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权威；他出色的描写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托马斯·卡莱尔。而且，罗斯金从新的中世纪主义视角继承了卡莱尔对经济个体主义的批判。罗斯金认为，所有伟大的艺术都出自健全的社会；哥特式艺术出自中世纪工匠之手，当时的工匠还没有沦为机器的附庸，他们是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罗斯金就像现代的耶利米<sup>〔1〕</sup>一样，怒斥工业时代的英格兰只有物质没有精神：“除了人外，我们制造出了一切。”劳动分工毁掉了创作过程的完整性。结果建筑失去美感；伦敦是“一堆可怕的、乱糟糟的砖结构建筑物”。萧伯纳说过，罗斯



金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反倒让人感觉马克思的批评很温和。罗斯金在《给那后来的》（1860年）<sup>〔2〕</sup>一书中厉声反对不负责任的经济学和忽视弱者的社会信条。这本书极具说服力，因而成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圣经。

研究曼彻斯特学派的历史学家 W D 格兰普<sup>〔3〕</sup>认为，罗斯金对自由放任学说的质疑最为有力。

手艺人、诗人和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sup>〔4〕</sup>到 19 世纪末一直是英国社会主义的灵魂人物。他的信念中既有马克思的成分，也有罗斯金的成分。但是，事实上，这两种社会主义思想差别非常大。罗斯金既反对唯物主义又反对民主（反对平均主义）。经济 and 道德更新的关键在于以新的态度对待劳动和艺术。罗斯金暗示说，道德衰弱原因在于审美方面。中产阶

〔1〕 《圣经》中人物，公元前 7 世纪和 6 世纪时希伯来先知。

〔2〕 《给那后来的》(Unto this last) 这个标题语出《马太福音》第 20 章。

〔3〕 W D 格兰普(William D. Grampp)，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有《曼彻斯特学派经济学》(1960 年)。

〔4〕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 - 1896 年)，英国工人运动领袖。

级的清教思想和功利主义合在一起,使他们对艺术极端漠然,这位商人的儿子如是说。罗斯金最初深受中产阶级喜爱,随着他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攻击越来越多,他受欢迎的程度逐步下降,到了晚年他精神异常,时好时坏。罗斯金一直被奉为散文大师,他的门徒包括世界各国的一些大作家:普鲁斯特、托尔斯泰、甘地以及弗兰克·劳埃德·赖特<sup>[1]</sup>都在其列。他试图根据中世纪模式重新建立一心一意为社会服务的制度(和平队<sup>[2]</sup>会让他感到高兴)<sup>[3]</sup>。这些主张能否成功很令人怀疑,但罗斯金死后在牛津大学留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院,这个学院一心帮助工人阶级子弟上大学。

由于他对中世纪情有独钟,罗斯金似乎很接近约翰·纽曼领导的牛津运动的天主教思想,事实上,在19世纪晚期的美学流派中也可以看到该运动的痕迹。不过,罗斯



威廉·莫里斯开办的学校

金并没有走上朝拜罗马的大路。他的确信仰一个超验的上帝,但是,很难说这个上帝是基督教徒的上帝。他可能同意阿诺德的看法,现代人最需要的是—种信仰,但是,同阿诺德—样,他想要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信仰,这种信仰来自对于美和手工艺的认识。观看伟大的艺术品和建筑,而且,首先成为—名艺术家,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美好的东西,人类由此

[1]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1867 - 1959年),美国建筑师。

[2] 和平队,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美国政府代表机构,成立于1961年,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

[3] 在现代改革事业中利用中世纪的骑士精神,这种做法有—段历史。1810年,法国流亡贵族弗迪南·德·贝尔蒂埃创建了信仰骑士会,它是启蒙运动时期共济会的一个分支。——原注

可以重新获得完整性。他写道：“看清世事的，是诗歌、预言和宗教。”

一个可信的基督教神话式微之后，出现了许多竞争者来填补空位——阿诺德思忖道，这个神话无论存在与否都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许多维多利亚人都有类似于亚瑟·克拉夫<sup>〔1〕</sup>经历，他毕生都在怀疑，但始终上下求索。穆勒使他变成了怀疑论者，他转向卡莱尔去寻找信仰，后来又抱怨：“卡莱尔把我们领进荒野，然后就撒手不管了。”同马修·阿诺德一样，他也辞去了牛津大学研究员职位；牛津运动、功利主义、上帝一位论派、实证主义，牛津大学里的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只是使他更加困惑。他受到柯勒律治的广教会的吸引，1848年他又对革命充满了希望，但他从没有找到他一直在寻找的答案。他因从未成名而知名，以未能实现自己的希望而成名。正是那种希望使人认为他是牛津大学最聪明的学生。但是克拉夫还是写道：

战斗过，却失败，  
总比从未战斗过好。

“不要说斗争没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有时候似乎很愿意玩味他们的精神痛苦。

当然，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志得意满。诚然，自由贸易和自助等统治阶级正统观念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助》是19世纪英格兰的一部畅销书。乔治·奥威尔<sup>〔2〕</sup>曾说过，他父亲一生只读过两本书：圣经和《自助》。斯迈尔斯的《工程师们的生平》也很受欢迎，这本书里讲的都是穷小子如何发家致富和暴得大名的故事。法拉第的父亲是铁匠，斯蒂芬森的父亲是煤矿工人。以个人主动精神为基础，在干预得最少的政府和自由贸易的统治下，英国走向了富强之路。伦敦颇有影响的杂志《经济学家》毫无异议地断定，个人利益的总和“永远等于公共利益”。

维多利亚女王的漫长统治（1837—1901年）成为英国全盛时期的传奇象征。这正是中产阶级如日中天的时代，一个“改善的时代”。但是，在主

---

〔1〕 亚瑟·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 1819 - 1861年），英国诗人。

〔2〕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 - 1950年），英国小说家，著有《1984》。

要作家中间,从来不乏反抗的声音。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学家查尔斯·狄更斯以前嘲讽法律和教育、残酷无情的贫民院、愚蠢无能的官僚,他此时在《艰难时世》(1854年)中挥动如椽大笔,使劲鞭挞这个任由贪婪的资本家和冷酷的政治经济学家横行的世界。查尔斯·金斯利<sup>〔1〕</sup>的小册子《廉价衣服和邋遢鬼》揭露了劳动剥削。卡莱尔和罗斯金激烈的声音渐行渐远;前者由于痛恨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而显得很片面。金斯利,还有罗伯特·勃朗宁的朋友 F·D·莫里斯<sup>〔2〕</sup>都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宗教就是争取社会公正和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事业。到了 1884 年,对于英国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已成为一个宗教替代品。

---

〔1〕 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 - 1875 年),英国作家,牧师。

〔2〕 F·D·莫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 1805 - 1872 年),英国国教会神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

# 第十一章 从自然主义到现代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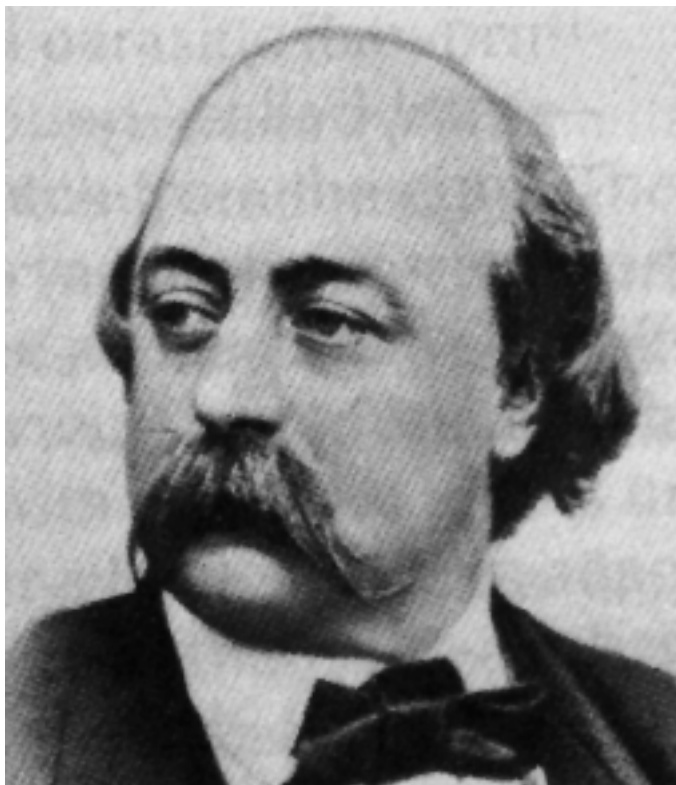
## 19 世纪中叶之后的文学

19 世纪纯文学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是文学在欧洲各地大放异彩的时期。在“阅读时代”，作家成了文化英雄。他们可以凭藉写作来摆脱贫困和默默无闻状态，像乔治·桑那样一举成名，像巴尔扎克和狄更斯那样发家致富，像维克多·雨果那样操纵许多人的命运。诗人和小说家承担了以前属于教士的角色。随着传统教会的式微、宗教和哲学领域内所有共识性正统观念的衰落，富于想像力的大作家们为现代世界提供了绝大多数价值观念。他们行使了社会学家、社会史家以及社会批评家的职能，生动地记述了这个时代纷至沓来的所有紧要事件，其中既有公共生活事件，又有个人生活事件：都市社会、工人状况、贫困、性、婚姻、妇女角色。弗洛伊德说过，他们是首批精神分析专家。

在结构上不拘一格的长篇小说，这个“松散肿胀的怪物”，引领着潮流。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艾略特、萨克雷、狄更斯、哈代在英法两国思想领域的重要性，不在哲学家和科学家之下。在政治文化贫乏的俄国，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等作家充当了更为重要的公共角色：先知和导师。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诗坛也发出了不凡的声音，勃朗宁和丁尼生领一代风骚，诗篇亘绝古今。与浪漫派相比，他们的诗风更持重；与“世纪末”的唯美主义反叛者相比，他们诗歌的教谕味道更浓厚；与二者相比，他们更有可能

成为沟通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桥梁。由于易卜生、豪普特曼、王尔德、萧伯纳等人的缘故,戏剧也蓬勃发展起来。

1848年以后的那一代作家有一个特点:他们日渐脱离公共价值观,在欧洲大陆尤其如此。有一群后浪漫主义作家自称为“现实主义者”。文学和艺术联手对抗浪漫主义的梦想和姿态。在法国,“为艺术而艺术”<sup>〔1〕</sup>流派不满浪漫派的文风和题材,指责他们多愁善感、故作多情。戈蒂耶<sup>〔2〕</sup>大声疾呼:“把我们从中世纪中救出去!”他的朋友乔治·桑的那种“流畅文风”为古斯塔夫·福楼拜所诟病。“为艺术而艺术”是主张文学应该精雕细刻和减少道德说教。这些作家厌恶资产阶级社会,同时又对社会主义乌托邦产生了幻灭,他们退而持守一种嘲讽的超然姿态。他们躬行极为客观的、“科学的”方法来对待文学。他们尊奉“现实主义”,在小说中不写英雄人物。他们文风简洁、文字雕琢,有几分回归古典主义的意味。伟大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的《路易莎·米勒》,标志着他“从年轻时代的华丽繁复转向一种质朴平和的风格,更适合描写普通人和人类的情感”;<sup>〔3〕</sup>这也是狄更斯所走的道路,是时代的特征。



福楼拜(1846 - 1880年)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19世纪50年代最著名的法国小说。作者无情地嘲笑了浪漫主义。可怜的爱玛·包法利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最有名、同时也是最可悲的女主人公之一。她由无法接受现实而毁掉了自己,尽管我们可能很同情她对沉闷的外省生活环境的反抗。《包法利夫人》不作道

〔1〕 “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最早由邦雅曼·贡斯当于1804年提出,后来因戈蒂耶的阐释发挥,成为唯美主义的主要理念。

〔2〕 戈蒂耶(Theophile Gautier, 1811 - 1872年),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在法国文学从早期浪漫主义转向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过程中影响深远。

〔3〕 见朱利安·巴登(Julian Budden)著《威尔第的歌剧》(The Operas of Verdi)。

德判断的立场令公众感到震惊,而且开了稍后出现的“自然主义”的先河。在自然主义作家的笔下,世界处于偶然和盲目的机缘的支配下。福楼拜生性孤僻,他以“现实主义”为策略攻击资产阶级的偶像。在这方面,与他不谋而合的是俄国流亡作家伊凡·屠格涅夫。屠格涅夫的生卒年恰好与马克思相同,而且他30年代末可能在柏林见过马克思。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是描述19世纪中叶两代人冲突的经典之作。爱玛·包法利有些像稍后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她也是铤而走险犯下了通奸罪而陷入毁灭。她们是哈代笔下的苔丝和左拉笔下的娜娜的前驱,她们都是悲剧命运的牺牲品。

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与现代主义诗人的先驱夏尔·波德莱尔一道,既赢得了恶名,又取得了真正的艺术成功。1857年,一个因《包法利夫人》,一个因《恶之花》,两人都面临刑事起诉。在英国,所谓的拉斐尔前派画家和诗人遭到批评,被说成道德败坏;<sup>[1]</sup>在19世纪60年代有意挑战的诗人阿尔杰农·斯温伯恩<sup>[2]</sup>掀起了一场风波。这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蔑视基督教和传统道德。在斯温伯恩未发表的小说《莱斯比亚·布兰登》<sup>[3]</sup>中,除了同性恋主题外(戈蒂耶和波德莱尔也曾触及这一主题),还有唯美主义思想,它要求人们培养他们的感受力,沉浸在美感之中。波德莱尔的“撒旦崇拜”不仅体现在一种新诗所具有的震撼技巧之中,似乎也要求这位诗人选择病态和变态的主题。

1866年,约翰·莫利义愤填膺地写道,斯温伯恩是“一帮色情狂中的淫荡之首”。实际上,斯温伯恩的“头韵诗”<sup>[4]</sup>迷倒了整整一代唯美主义者(在他失去创造力和步入平静的老年之前),他建议用“美德的百合和倦怠”换取“邪恶的玫瑰和狂喜”。他早年的崇拜对象也包括意大利的奥尔西尼<sup>[5]</sup>

[1] 青年画家亨特、米莱斯和罗塞蒂于1848年建立的画派,倡导发扬拉斐尔以前的艺术精神(感情真挚,形象朴实)。后来有刘易斯加入。1854年,几人分道扬镳。该画派当时被一些人斥为借标新立异来欺世盗名。

[2] 阿尔杰农·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 - 1909年),英国诗人、批评家,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反叛诗人的象征。

[3] 《莱斯比亚·布兰登》(Lesbia Brandon)。莱斯比亚是古希腊岛屿名称,因希腊女诗人萨福等一群女同性恋者生于此岛而闻名。

[4] 头韵诗是一种押头韵的英文诗体,例如 Round the rocks runs the river。

[5] 奥尔西尼(Felice Orsini, 1819 - 1858年),意大利民主主义者,1858年暗杀拿破仑三世,未果,后被处死。



这类革命人物——此人曾试图暗杀拿破仑三世。

哈罗德·尼科尔森<sup>〔1〕</sup>曾写道,斯温伯恩的诗剧《阿特兰塔在卡吕冬》(1866年)的面世,对于渴望新奇的“知识分子”(这是他的用语)来说,是“一道耀眼的闪电”。“这个时代正在寻找它的异端。”异端就是主张,艺术的惊颤效果、或为艺术而生活的惊颤效果,比美德更重要;主张个人体验比公共责任更有价值。如果说斯温伯恩的《诗歌与民谣》“仿佛在文学界引发了一场地震”,那么可以说,它直接引领了奥斯卡·王尔德和瓦特·佩特——他们肆无忌惮地鼓吹一种无视道德的新唯美主义,同时在生活中向社会礼教发起挑战。维多利亚时代的体面社会果真被激怒了。他们把这种邪恶归罪于法国人,结果,1887年当局试图查禁或审查从英吉利海峡对岸舶来的文学作品。唯美主义反抗商业社会规范的全部故事,迅速蔓延到欧洲,这个欧洲不久就处于瓦格纳和尼采、易卜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支配下——这种反叛本身的来源倒是十分体面(牛津和剑桥所传授的希腊古典作品恰恰是产生堕落的首要机制)<sup>〔2〕</sup>

新作家总体上是不涉及政治的。这些新作家讨厌颐指气使的资产阶级、肥头大耳的银行家或庸俗的商人,在这方面他们不会亚于头脑简单的社会主义斗士。波德莱尔宣布,无论哪种形式的政府,无论是共和政府还是君主政府,都没有给诗人留下位置。1848年以前,他是傅利叶主义者,同时也仰慕社会主义者布朗基和普鲁东;1848年他曾参加街垒战斗。但在那场革命失败后,同许多人一样,他陷入悲观绝望。在他悲观地逃避社会的同时,他最伟大的文学创作时期开始了,直到他染上梅毒,英年早逝。

## 自然主义

左拉作品中的一位人物说:“每隔二十年理论就会发生变化。”处于现代时期的文学和艺术确实有这样的标志:每隔几年就有一代不安分的人起来造反。这原因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诗人约翰·贝里曼<sup>〔3〕</sup>叶芝和奥登

〔1〕 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1886-1968年),英国外交家和作家,著作等身。

〔2〕 《伊壁鸠鲁信徒马利乌斯》的作者瓦特·佩特是19世纪晚期唯美主义的领袖。——原注

〔3〕 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1914-1972年),美国诗人。

的诗歌弄得非常紧张,他评论说,自己决不会完全像他们那样写作,“如果那样的话,我的位置又在哪里呢?”每一代人,最终是每一位作家,都想发现自己的声音。一种新的风格、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所带来的兴奋感很快就会消失。如果说乔治·桑开始让福楼拜感到厌恶的话,最后,这位大师本人也失去了制造震颤效果的能力。



左拉在 1868 年

在 19 世纪中叶“现实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之后的艺术运动是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这两个重要流派有相同的地方。象征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 80 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然主义的反动;(巴黎的)“脱离左拉”,(柏林的)“彻底摆脱霍普特曼”,是象征主义及其近亲“颓废派”的战斗口号。然而,“世纪末”象征主义的源头实际上却在波德莱尔和兰波这两位 19 世纪 50、60 年代的作家那里。而且,爱弥尔·左拉及其追随者发出的强劲冲力到 1890 年也只波及世界上部分地区;杰克·伦敦和斯蒂芬·克莱恩<sup>[1]</sup>美国作家只是在 1900 年左右才听说自然主义。易卜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主要人物感受到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有时候,他们是同时感受到二者的影响的。

一般来说法国是美学创新的开路先锋。在法国,自然主义是 19 世纪 70 年代的流行口号,左拉是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作为福楼拜时代现实主义的延伸,自然主义是一种更严酷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者在文学作品中探访贫民窟,深入“充满生活气息、人头攒动的街区”(于斯曼<sup>[2]</sup>的说法)去发现罪犯、妓女、酒徒;左拉还在农村发现了腐化堕落行为(见《土地》)。自

[1] 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 1871 - 1900 年),美国小说家。

[2] 于斯曼(Joris Karl Huysmans, 1848 - 1907 年),法国小说家、艺术评论家,早期受自然主义影响。

然主义的动机显然是想通过揭露资产阶级引以为荣的这个社会的种种可怕之处,让资产阶级不得安生。在这个达尔文和巴斯德的时代,科学对于自然主义的影响可以在左拉的主张中看得出来。左拉说,作为一名小说家,他不过是一名具有科学精神的社会学家,用手头上的笔记本记录下人们生活的本来面貌。(不过,这种说法是很可疑的。)科学上的决定论笼罩了自然主义文学。左拉的那部卷帙浩繁的家庭史小说意在追寻,环境和遗传因素对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生活产生的影响。<sup>〔1〕</sup>

原则上,自然主义作家并没高扬什么理想,也不去发现什么价值观念。他们的作品只是如实地展现世界本身严酷的现实:充斥这个世界的主要是像野兽般残忍的人或穷困潦倒的人;这也是一个受偶然因素和机缘支配的世界。实践上,自然主义著作很容易激起读者对那些贫困的可怜人的同情。但左拉描写产业冲突的小说、拥有众多读者的《萌芽》,并没有把工业里的凄惨悲剧归咎于矿主。(比较一下格哈特·霍普特曼描写西里西亚织工的名剧,就可看出来这一点。)每个人都陷入罗网,身不由己。正如狄更斯笔下的一个人物所喜欢说的:“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但是这类宣传小册子式的作品十分尖刻地揭示了残酷的生活状况,的确发挥了社会服务的作用。

在左拉的英国同行、才华横溢而又颇有争议的托马斯·哈代身上,可以看到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它部分来自达尔文主义。哈代在19世纪90年代的小说,尤其是《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把人写成了几乎可称之为邪恶的神灵所制造的孤苦无助的牺牲品。在《苔丝》的结尾,哈代评论说,“众神的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纯粹的偶然因素毁掉了生命。哈代后期小说惹怒了英国公众,他不得不彻底放弃小说创作,自1895年后转向诗歌创作。但这股风气已经广为流布开来。爱尔兰人乔治·莫尔<sup>〔2〕</sup>、美国的杰克·伦敦、克莱恩、弗兰克·诺里斯<sup>〔3〕</sup>以及西奥多·德莱塞等人,沉浸在时新的无神论的同时,揭露工业社会的黑暗面,表现都市丛

---

〔1〕 左拉的《卢贡玛卡家族》是包括20部长篇小说在内的小说集,副标题为《第二帝国时代的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

〔2〕 乔治·莫尔(George Augustus Moore, 1852 - 1933年),爱尔兰作家。

〔3〕 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 1870 - 1902年),以美国西部为背景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

林中的生活伤痛。西奥多·冯塔纳<sup>〔1〕</sup>领导着柏林的一个著名自然主义流派,其基础也同样是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厌恶。

尽管亨利·易卜生剧作甚多难以分类,这位挪威戏剧家的打破传统信仰和习俗的戏剧,很可能最符合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范畴。他的戏剧 19 世纪 80 年代在欧洲轰动一时。它们触痛了社会的敏感神经,当然引起公众的激烈争议。易卜生的《群鬼》在欧洲大陆首场演出 10 年之后,于 1891 年在伦敦上演,在英国引发了一场戏剧争论,就像法国经常发生的那样;《群鬼》成为当代的《欧那尼》<sup>〔2〕</sup>。萧伯纳为此写了《易卜生主义的精髓》一书,为该剧辩护。该书也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萧伯纳在这本书中发出疑问,为什么有人称颂易卜生是在世的最伟大的戏剧家、现代的莎士比亚,而有人则以维护社会体面和社会秩序的名义要压制他?答案在于,易卜生无情地攻击了传统道德。在《群鬼》中,表面上端庄贤淑的妻子和母亲实际生活在谎言、不贞和腐朽之中,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名剧《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在《人民公敌》(1882 年)里,体面社会迫害一个诚实的人,因为他想说出财产罪恶来源的真相从而有可能妨碍这个社会的物质繁荣。虽然痛恨“社会中坚”(易卜生另一部戏剧的名字),但易卜生遵循的是自然主义的路数,没有更多地推崇理想主义的改革者。在他笔下,戏剧《培尔·金特》的同名主人公是一个现代唐·吉珂德,他把梦想当做现实,令人感到滑稽可笑。由于《玩偶之家》的缘故,易卜生成了女权主义的英雄,可是,易卜生却说自己与女权运动毫无关涉,这令女权主义者好生尴尬;1898 年,他对挪威的女权主义者说:“我一直以描写全人类为己任。”

## 象征主义

易卜生在晚期剧作中采纳了象征主义的观念和技巧。在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象征主义突然侵入欧洲的文明意识中,极少有严肃的作家(音乐家或画家)不受这股风气的有力影响。与此同时,象征主义宣言(莫雷亚

---

〔1〕 西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 1819 - 1898 年),德国作家,被认为是德国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的第一位大师。

〔2〕 《欧那尼》(Hernani)是维克多·雨果的剧本,1830 年演出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见本书第七章。

斯<sup>[1]</sup>所作)、《瓦格纳评论》在巴黎面世,马拉美的诗歌以及前自然主义者乔里斯·于斯曼耐人寻味的重要著作《逆流》的出版,这些都是一场名符其实的审美意识革命的征兆。也许这场革命是现代史上意义最深远的革命。

于斯曼《逆流》一书中的主人公德·爱森特是一切“极端唯美主义青年”的原型。奥斯卡·王尔德和《黄皮书》不久就将他们引见给维多利亚时代惊慌失色的公众。他们形销骨立,腐化堕落,老于世故,是颓废文明最后的苍白、但却是雅致花朵,他们用艺术和不良习气来自娱自乐。王尔德《道连·格雷画像》的主人公拿起一本臭名昭著的《逆流》,感觉到“一股浓烈的香味好像一直萦绕着书页,令人心神不安”。冷漠、残酷、长着绿眼睛的荡妇充斥“颓废派”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巨制。像王尔德这样的同性恋者,这类颓废人物,可能变得更加邪恶,体现了马里奥·普拉斯<sup>[2]</sup>所说的“浪漫派的痛苦”。利用文学来攻击体面社会,会让人怀疑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罪恶。俄国象征主义者亚历山大·杜勃罗留波夫<sup>[3]</sup>吸食鸦片,住在贴着黑壁纸的小阁楼里,做黑弥撒;他是这些“世纪末”艺术家兼叛逆者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的一个例证。

象征主义—颓废派的观点从巴黎迅速传到维也纳、意大利、俄国以及整个欧洲,它几乎成了尼采所说的“我们这群无家可归的人”的旗帜。这是一小群先锋派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胡果·冯·霍夫曼斯塔尔<sup>[4]</sup>,这位深受马拉美影响的维也纳剧作家和诗人,在1893年写道,在欧洲各城市散布由好几千人组成的一个“精神共济会”,他们体现了这一代人的意识。

象征主义的根源肯定早就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上一代“受诅咒的诗人”波德莱尔和兰波。兰波相信,诗人避开理性思考,在“合理的感觉混乱”状态之下接触象征领域,就能够更深一层地接触现实。兰波的这个观点近似于宗教神秘主义。他过的是一个异化的反叛者的生活,他离开欧洲,在非洲各地游荡。有些人把这个古怪的天才当成真正的宗教崇拜对象。

诗歌完全不同于散文,或许这就是象征主义流派的首要原则。诗歌不

[1] 莫雷亚斯(Jean Moréas, 1856 - 1910年),法国诗人。

[2] 马里奥·普拉斯(Mario Praz, 1896 - 1982年),意大利艺术评论家。

[3] 杜勃罗留波夫(Dobrolyubov, 1836 - 1861年),俄国文学评论家。

[4] 胡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 - 1929年),奥地利诗人。

应说理,也不应叙事,也不应描述,它应该利用形象和象征,去传达理性的描写所无法表现的微妙的、内在的心理世界。这股创作“纯粹”诗歌的冲动,源于兰波的朋友保罗·魏尔兰在19世纪60年代所属的帕尔纳斯派<sup>[1]</sup>。它的目标是使诗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散文分道扬镳,使诗歌偏离以前所有的文学原理,使它不同于丁尼生和勃朗宁所写的长篇叙事诗。诗歌不应当成为另一话语模式,而应该是一种符咒,借助一种词语的神秘性,去捕捉那些不可言喻的情绪和印象;戈蒂耶把诗歌称作“一种精巧复杂的文体,充满了隐喻和暗示,挤压了言说的疆域”。

法国象征主义者认为,理查德·瓦格纳实际上是象征主义的创始人。他们宣布,瓦格纳的艺术观是“象征主义的源头”。诗歌应当仿效音乐。这位变成预言家的伟大德国作曲家提出了冶各门艺术于一炉的总体艺术观念。他还提出,社会需要情感和宗教上的振作,需要恢复共同体的感受和文化丰富性,而艺术正是一种拯救之道。但是,瓦格纳比法国象征主义者更信奉艺术的社会功能,认为一所国立音乐厅可以使人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市侩作风和唯利是图思想的影响。即便是马克思(几乎是他同时代的人)也没有像他这样蔑视金钱崇拜;但是瓦格纳的革命建立在一门赞美英雄人物的新艺术的基础上,这门新艺术是从民众无意识当中挖掘出来的。这位19世纪最伟大的歌剧作家深深地影响了弗洛伊德、容格和尼采。在很多方面,他是整个现代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成功的艺术家和预言家,他筹到足够的资金在巴伐利亚的特洛伊特<sup>[2]</sup>建立了他的剧院。他的歌剧在这里上演,来自世界各地的门徒开始汇聚于此。

易卜生、瓦格纳、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法国象征主义者,在整个欧洲,从罗马到斯德哥尔摩再到圣彼得堡,形成了一个声气相投的先锋派团体。瑞典的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和意大利的加布里尔·邓南遮也是元老级成员。王尔德也是,或许他是这场运动主要的理论家和最有争议的人物。

---

[1] 帕尔纳斯派(Parnassian school):1866至1876年期间,法国一部分年轻诗人不定期地出版了3册诗歌丛刊,定名为《当代帕尔纳斯》(帕尔纳斯是希腊名山,相传这座山是祭祀太阳神和美术之神阿波罗以及诗神缪斯的圣地),帕尔纳斯派因而得名。

保罗·魏尔兰(Paul Verlaine, 1844 - 1896年),法国诗人,曾抛下妻子,与兰波一起出游。

[2] 特洛伊特,德国中东部巴伐利亚城市,该城尤以瓦格纳1872年到此定居而闻名。

思想传播的路线从伦敦延伸到巴黎、再到维也纳,然后又从维也纳回到伦敦,遍及整个欧洲。1884年创办《瓦格纳评论》的法国象征主义者和颓废派(他们在大师瓦格纳死后不久创办这个刊物),包括马拉美和迪雅尔丹<sup>[1]</sup>。迪雅尔丹曾学过音乐。他的小说《月桂树被砍倒了》引入了“意识流”写法,影响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以及詹姆士·乔伊斯和现代文学。(瓦格纳也直接对乔伊斯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场语言和生活的革命,让19世纪末少数具有创造精神的欧洲青年大为振奋。近年来有一些理论家,如米歇尔·福柯和朱利亚·克里斯蒂娃,认为这一时期的知识型或意识形态素<sup>[2]</sup>发生了剧烈的突变;一个全新的话语世界取代了旧体系。整个欧洲几乎同时感受到了这种危机意识。它的根源是一种极端无聊、对“险恶社会”极端厌恶的情绪。这种强烈的反感使得《逆流》的主人公德·爱森特斩断了他与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也放弃了表现这个世界的那种现实主义的、科学的文风。在帝制之下的德国,西奥多·冯塔纳对周围的一切“无比憎恨”,无论是宫廷、贵族还是资产阶级(1896年)。这是一种典型的反抗姿态。在一个毁坏了一切美感和正直的社会秩序面前,象征主义者感到义愤填膺——德·爱森特惊呼:“(这是一个)险恶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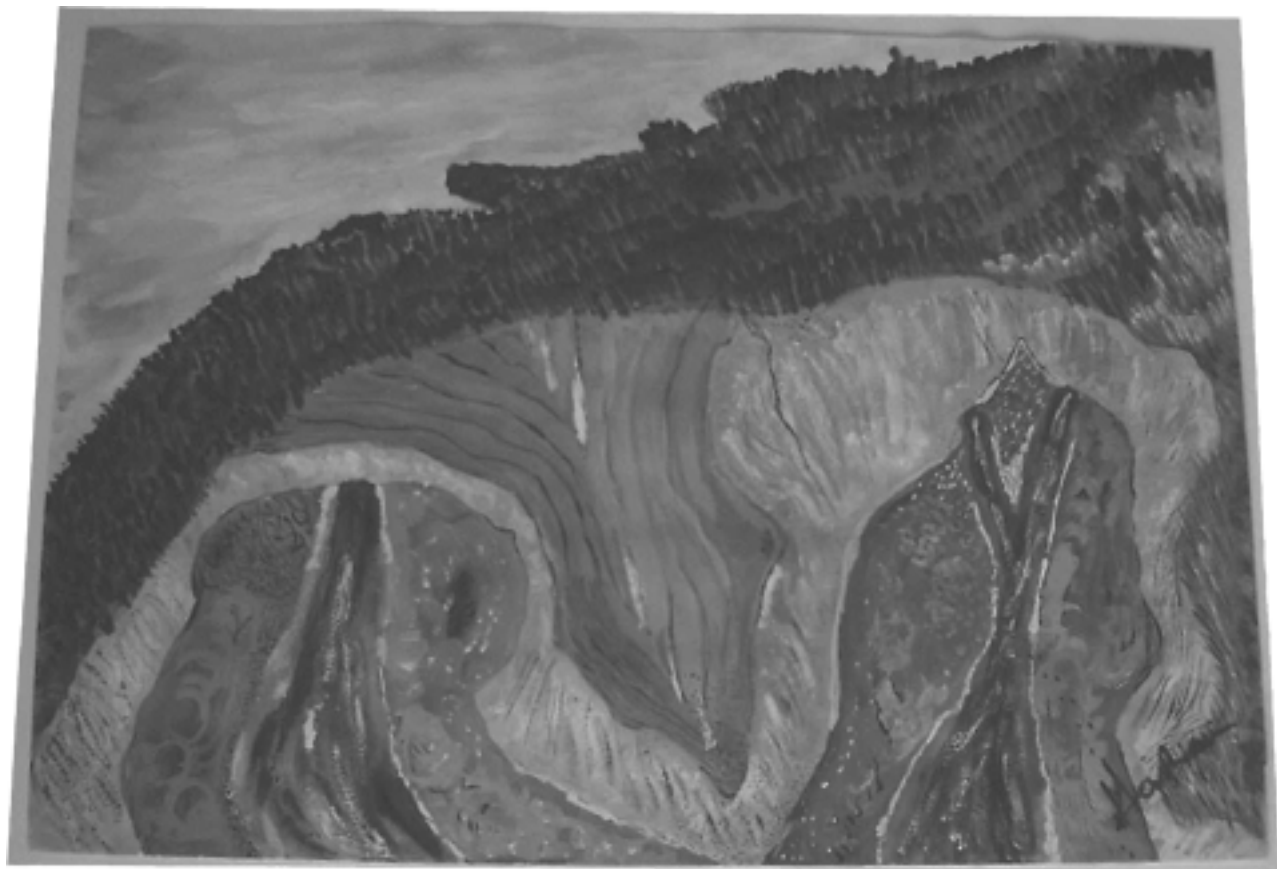
有人说,象征主义者既不能接受也不能改变现实——他们对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梦想已经绝望——所以他们利用生活和作品去否定现实,否定现存主流社会的现实。他们发明了一个想像的世界并称它为现实。王尔德表达了象征主义对外在“现实”的反抗,表达了艺术家创造的一种新世界图像。王尔德写道,“生活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显示它自身的人为性质”,他又补充说,“第二项任务是什么,尚无人发现”。他宣告,自然是一件可怜的东西;让它去模仿艺术。自然的确模仿了艺术;伦敦的雾是对印象派画作的模仿。<sup>[3]</sup> 巴尔扎克和狄更斯发明了19世纪。根据同样的精神,这位

[1] 迪雅尔丹(Edouard Dujardin, 1861 - 1949年),法国作家。

[2] 知识型(episteme)是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词与物》中使用的概念,表示每个时代的基本认识模式。意识形态素(idéologème),意指意识形态中的最小单位。法国思想家克里斯蒂娃在《小说的文本》(Le Texte du roman, 1970年)中使用这一概念,认为它既有在文本中的组织功能,又能表示文本在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意味。

[3] 印象派画家把伦敦的雾画成紫色的,人们才发现伦敦的雾确实是紫色的。后来发现这是工业污染造成的。

隽语大师(王尔德)评论说:“任何傻瓜都能创造历史,但把它写出来就需要有一个天才。”



印象派画作《rua cave》

象征主义最著名的文学形象之一、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sup>〔1〕</sup>的戏剧《阿克塞尔》<sup>〔2〕</sup>的主人公,独自住在一座瓦格纳式的城堡里,研究信奉偶像崇拜的哲学;当他遇到前来刺杀他的那个姑娘,两人立即而且庄严地陷入了爱河,他们决定自杀,因为现实不可能像他们此时此刻感受和体验的爱情那么完美。(波德莱尔发现自己的每一次浪漫爱情几乎都立即令他失望。)阿克塞尔伯爵和萨拉认为,继续活着太庸俗:“我们的仆人都能替我们做那些事。”在邓南遮的颓废小说《死亡的胜利》中,男女主人公也把死亡当成最令人激动的事情。

这种强烈的理想主义是基于对当前现实的彻底憎恶,它本身就可能变成死胡同,导致人们自杀或沉溺于毒品之中。但是,象征主义也有它积极

〔1〕 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Villiers de l'Isle - Adam, 1838 - 1889年),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

〔2〕 爱德蒙·威尔逊的那部研究象征主义的经典之作的书名就是《阿克塞尔的城堡》。——原注



的一面。毫无疑问,它成功地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类型,这种写作以充满诗意的笔触去探索无可名状的内心世界,努力暗示那些无法言传的东西,这其中包括“神经官能症的微妙心理,激情过后的垂死自白”,这都是从波德莱尔和兰波到魏尔兰和马拉美的法国诗人一直在培养的东西。乔伊斯的弟弟说过,乔伊斯最喜欢的诗歌是,“利用像符咒一样吸引着大脑、带来惊奇和美感的文字的魔力,去捕捉各种心绪和印象……”

叶芝曾宣称:“要是一个人真正的生活被偷走了,他就得到别的地方去找它。”这种“内心的转向”源于敏感的个体对国家的疏离;它造就了一种新的诗歌,一种新的语感,一种新的欧洲意识。它是整个19世纪艺术与文学逐渐脱离社会这一进程的高潮(这个社会就是“被看做上流社会的那一帮吵吵嚷嚷的银行家、中小学校长和牧师”)。在19世纪80年代,象征主义不仅全面反叛主流社会(社会主义者和博物学家已经进行过这类反抗),而且全面反叛上一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那一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希望通过批评社会来改变这个社会)。它反叛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社会,这表现在,易卜生在《野鸭》中从攻击幻想转向攻击对幻想的需要。象征主义是一些人的“内心活动”:他们放弃了改变社会的希望,而且厌倦了浪漫派尝试过的唯心主义的出世语言。历史就是不断地耗尽所有选择的过程:“我们已经厌倦了众所周知的寻常事物。”资产阶级已经读懂了歌德和雨果!

这场危机的一个标志就是,在理性与智力之间产生了分裂感,甚至“智力成了灵魂的敌人”(路德维希·克拉格斯<sup>[1]</sup>);“灵魂起来反抗智力”(叶芝,1892年)。象征主义者曾说过“感官合理的混乱状态”,词语的神秘性,不事说理的新诗。丰富、微妙、像梦一样难以捉摸的内心世界,与外在公开的自我分裂开来,成为一个需要专门探讨的领域。这个领域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于科学家和政治家的方法。象征主义者寻找一种新的诗歌语言,这是因为日常的话语语言无法传达体验的真正滋味。从科学研究转向小说创作的维也纳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引用比利时象征主义者莫里斯·梅特林克<sup>[2]</sup>的话说:“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潜入海底最深处,然而当我们从水

[1] 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 1872 - 1956年),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和批评家,创立德国的生机论哲学运动。

[2]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 1880 - 1942年),奥地利作家。

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1862 - 1949年),比利时诗人、剧作家。其象征主义剧作《普莱雅斯和梅丽桑德》等影响甚广。

里出来,我们苍白的指尖上的水珠却丝毫不像它所来自的海洋。”

大部分现代诗受到象征派大诗人魏尔兰和马拉美的影响,在他们之后是儒尔·拉弗格<sup>[1]</sup>和保罗·瓦莱里。几年后,T.S. 略特把象征主义的风格和基调带入英诗。与西欧的象征主义相比,俄国象征主义在总体上更有神秘色彩,而且更加激进。按照诗人维切斯拉夫·伊万诺夫<sup>[2]</sup>的“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艺术家在破除难解之谜的时候所使用的特殊智慧应该用于改造生活,建设一个新世界。但是这种恢复诗歌政治职能的希望在欧洲也不是完全没有的,奥地利的胡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就是一例。

## 对象征主义的批评

同大多数读者一样,老派的现实主义作家通常也对这种新文学吃惊不小,他们认为,这种文学出身穷困潦倒的流浪汉之手,几近疯狂。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这场运动的创始人,马拉美和穆西尔,他们都是严肃的作家和思想家。其他人,如王尔德和邓南遮,是处于中间的人物,他们都是一些在人格上无法让人忍受的人物,同时也是热忱的艺术家。“世纪末”的唯美主义反叛者和革命者五花八门,什么类型都有。他们与文学传统毅然决裂。1910年,一位重要的英国诗人称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诗歌为“疯狂”之举。当时这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侨民正在将法国象征主义的技巧和见解引入英国文学。

马克斯·诺尔道<sup>[3]</sup>宣称,心智健康的人其实没有隐秘的生活。这位犹太社会主义者写了一本名为《堕落》(Entartung, 1892年)的书来攻击新文学。这本书可以与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1897年)中对象征主义的激烈抨击相提并论。诺尔道在新文学中看到的只有“堕落”。他宣称尼采、沃尔特·惠特曼、瓦格纳、易卜生,甚至托尔斯泰(托氏本人是反对象征主义和颓废派的)以及那些法国诗人,都是病态。他们都是疯子,都与社会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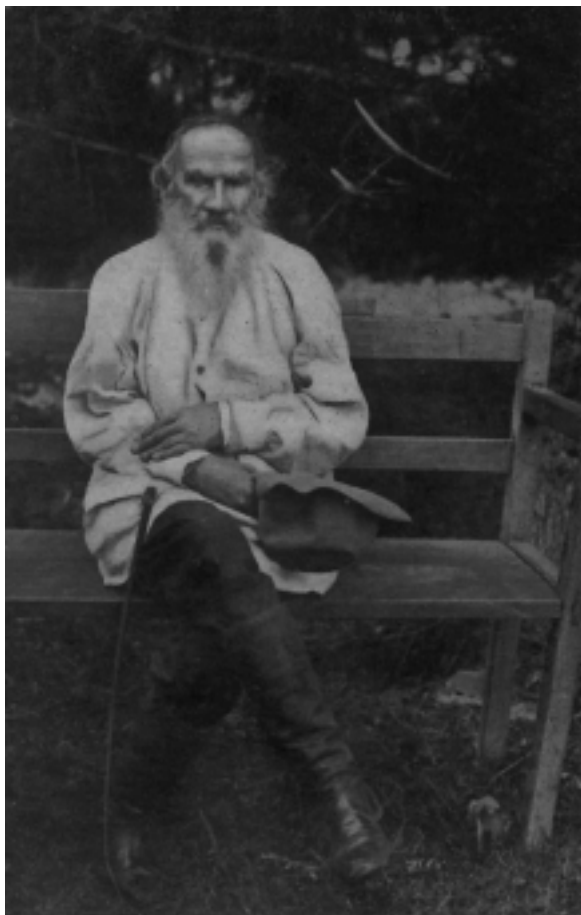
[1] 儒尔·拉弗格(Jules Laforgue, 1860 - 1887年),法国印象派诗人,“自由诗体”的创始人之一。

[2] 维切斯拉夫·伊万诺夫(Vyacheslav Ivanovich Ivanov, 1866 - 1949年),俄国象征派诗人、哲学家。

[3] 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 1849 - 1923年),医生、论辩家、早期犹太民族主义者。

敌,沉迷性欲(诺尔道相信,过度纵欲会毁灭文明)。这位德国社会主义者差不多准备赞同柏拉图的主张,将艺术家从社会中驱逐出去,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他确实宣布自己推崇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的“健康的艺术”。(先锋派作家几乎都崇拜莎士比亚,这可能会使他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现代派极少能通过他的批评审查——霍普特曼的《织工》是一个例外。他庆幸普通人没有受这些很有诱惑力的妖言的影响,因为他们更喜欢的还是音乐厅的曲子和滑稽戏,而不是瓦格纳和易卜生。

德高望重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谴责这种新文学和艺术,说它们是精英式的,反社会的,而且晦涩难懂。文学应当说普通人的语言,向他们传达重要的真理。而这些现代作家彼此之间都几乎难以交流。他们的座右铭是“我憎恶群氓”。托尔斯泰认为自己可以说俄国农民的语言。在晚年(他死于1910年),托尔斯泰给俄国农民写过简单明了的道德故事。《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在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之后,转向一种原始的基督教,写下一些很有感化力量的宗教小册子。19世纪末的“回归宗教”运动反对实证主义科学的统治。托尔斯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当托尔斯泰陷入绝望之时,哲学家的抽象概念,科学家列举的事实和理论,都对他无济于事。于是他转向了基督教——这不是俄国东正教会的官方基督教,那是他攻击的对象,而且俄国东正教试图谴责他的学说——而是早期基督教徒信奉的原始教义。托尔斯泰认为,那种徒有其表的宗教歪曲了基督的原意,而基督的原意所包含的深刻的精神真理,绝不是纯粹的教条所能表现的。他否定原罪、基督神性以及各种圣礼,称这些东西都是“粗俗、堕落的巫术”。俄国教会因而开除了他的教籍。他的宗教著述(例如《上帝的王国在你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也感受到东方宗教的影响,而且试图发现作为一切信仰基础的基本真理。



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也许是一战之前那段时

期最伟大的预言家；他使世界为他倾倒；世界各地有很多人来到他的俄国庄园顶礼膜拜。虽然他也是俄国地主贵族中的一员，但他强烈谴责俄国以及欧洲地主贵族的腐朽。像卢梭或美国哲人亨利·梭罗一样，他主张回归简朴生活，去除一切矫揉造作。他谴责战争以及一切强制形式，这使他成为和平运动的英雄和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国家是人类的敌人。对邪恶势力采取不抵抗原则，这是他政治信仰的基石，虽说他本人并不总是遵循这个原则。尽管他倡导无政府主义、和平主义以及与政府不合作的态度，但是，俄国政府——可能是世界上最专制的政府——却不敢动他。杜霍波尔事件是说明他享有世界性声誉的一个突出例证。<sup>〔1〕</sup>他竭力挽救这个基督教共产主义流派免受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并且成功地在世界各地筹募一笔资金，把他们集体运往加拿大。

托尔斯泰送光了他文学创作挣来的钱，最终他又放弃了所有的财产（这让他的夫人大为惊愕）。他后来最有名的弟子是伟大的圣雄甘地，那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圣人和现代印度民族之父。世界上有无数人承认他是先知。在那些到托尔斯泰庄园朝圣的人当中，有美国政治领袖威廉·詹宁斯·布莱恩<sup>〔2〕</sup>。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就是靠读托尔斯泰的圣经评论而挺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役的，他在战后试图按照托尔斯泰的计划去做一名乡村教师。这个计划没有兑现。有人可能猜想，这是因为托尔斯泰与农民之间的距离之远，远远超出列夫伯爵自己的想像。但是他的地位和名气却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他能获得这么大的声誉，在19世纪的作家当中实属罕见。他通过影响大众舆论而成为影响世界的人物。

在1886年之前，对于西欧人来说，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文学。屠格涅夫是惟一的例外。而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外国度过的，更证明了这个普遍的看法。此后俄罗斯文学风行一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归功于托尔斯泰，而且也归功于反对自然主义的趋势，“转向内心”以探索人物心理的趋势。其中的关键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最伟大的心理小说家。后来弗洛伊德把他同莎士比亚和歌德放到一起，称他们是精神分析的真正创

---

〔1〕 杜霍波尔(Dukhobor)，18世纪兴起于俄国的农村教派。他们否认教会和国家的权威，主张个人直接接受启示。由于他们坚持平等主义和平主义，不断遭到迫害。

〔2〕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 - 1925年)，美国民主党和平民党领袖，律师、演说家。

始人。<sup>〔1〕</sup> 普遍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俄罗斯人的心灵中获取了灵感,据说俄罗斯人的心灵最为深沉。但事实上,他在文学上主要得益于欧洲作家:莎士比亚、卢梭、拜伦、司各特、狄更斯、歌德、巴尔扎克、雨果,同时也得益于俄国作家的先驱:普希金和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2年,其情绪激昂的气质使人联想到波德莱尔;他年轻时也是社会主义者,1849年被捕,在西伯利亚的牢营中度过了四年时光。尽管这段经历十分可怕,却为他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出狱后,他不再是激进分子和无神论者,而是一名保守分子和宗教信徒。

从1866年到他1881年去世,他写出了一系列震惊世人的小说。从《罪与罚》到《卡拉玛佐夫兄弟》,这些小说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哲学、宗教和心理学上留下了思想印记。在生动地表现严肃思想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成功的作家。如果说弗洛伊德称他是精神分析先驱,尼采则从他那里借来了超人这个观念,萨特则认为他是存在主义的发源地。尼采的“上帝死亡”说,以及它所表示的可怕的危机感,也可以在这位俄国作家的作品中发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人物说,历史可分为两部分:从大猩猩到毁灭上帝,从毁灭上帝到改造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怀有这样一种信念:斯拉夫民族肩负着挽救堕落的欧洲的潜在使命,因为他们还信教,没有被物质主义腐化。他与托尔斯泰一道,是1914年后基督教复兴运动的先行者,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称他们是“精神时代的先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这种哲学维度,而不是文体的新奇。

## 萧伯纳与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sup>〔2〕</sup>

萧伯纳是另一位固守传统表现方式的大作家。尽管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他没有用晦涩的风格装扮自己的思想。他为易卜生辩护,支持瓦格纳和尼采,阐述马克思的思想,他还是女权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萧伯纳的使命就是将新思想强加给眼界褊狭的英国人。正是由于这个原

〔1〕 三部最伟大的俄狄浦斯式的作品是《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和《卡拉玛佐夫兄弟》。弗洛伊德还应加上下一代作家D.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原注

〔2〕 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Edwardian),是指活跃在20世纪最初10年(1901-1910年)即爱德华七世在位期间的英国人。

因,他的风格只能是直截了当。他的戏剧经常借用人们所熟悉的闹剧或滑稽戏的结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戏剧中注入了大胆的思想。驾驭“思想剧”的才华和伏尔泰式的机巧聪慧使这位博学多才的爱尔兰移民脱颖而出。在动荡不安的19世纪80年代,这位年轻人闯荡伦敦,见到社会主义者、空想家、女权主义者以及海德公园里的演讲者等各色人物。



萧伯纳的卡通像

萧伯纳的一些剧作本着社会主义的精神揭露了社会的罪恶或虚伪;还有一些剧作反映了他对当时流行一时的尼采思想和生机论思想的沉迷。伯特兰·罗素认为,萧伯纳是英国的弗洛伊德(他们正好同龄),说他“驱散”了有关性和家庭关系的“谎言”。萧伯纳的大部分剧作都令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感到震惊,但他的妙趣横生却使他们兴致盎然,心甘情愿地接受辱骂。这正是因为他那种闪烁才智的批评方式,所以他同伏尔泰一样,成了“可以为所欲为的疯子”,有权去批评人们的精神偶像。

精神偶像。

萧伯纳的戏剧贯穿着大胆、自由的精神,打破各种礼教,教人们伸张个性。萧伯纳采纳了尼采的一个见解,让他笔下的唐璜发现,最优秀的人实际上都在地狱里而不是在天堂里。他颠倒了通行的规则:女人喝白兰地,吸雪茄,男人则卑躬屈膝、胆小如鼠;令人尊敬的职业斯文扫地,而不受尊敬的职业却令人肃然起敬;华伦夫人的职业(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色情业)不比一个体面商人的职业更糟糕。萧伯纳笔下的凯撒是一个尼采式的超人,他的行动受到理性的控制,超越了善恶。《回到马士撒拉时代》宣扬“创世进化”或“突生进化”理论,这是颇有影响的巴黎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特别喜欢的一个主题,事实上,“生命力”是萧伯纳一贯的主题。克林·威尔逊评论道,萧伯纳的戏剧“写的都是同一件事:‘生命力’的隐蔽的创造冲动,以及它促使人们去做根据日常逻辑难以理解的事情的方式”。

《人与超人》与弗洛伊德的《释梦》在同一年写成。这部剧作的主人公是一位现代唐璜,但剧中真正的胜利者是唐纳·胡安娜这位新女性;约

翰·西蒙写道,萧伯纳的戏剧“把女性看做损人利己者,但同时也认为女性本质上比男性更健康、更明智”。在这部剧中,正如在他的大部分戏剧中,萧伯纳所涉及的思想范围极为广泛,包括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性解放、女权主义、生机论和新的美学信条。在5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萧伯纳写了50多部剧作,还有大量的散文,其中包括相当有分量的音乐批评。他创作的鼎盛时期是1895到1917年。他还参加费边社的政治活动,一度出任市政务委员会的教区代表。他与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其他人物如威尔斯、罗素一起,为加强那个时代惊人的思想能量做出了贡献。但是,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他不是一名文学现代主义者,他的作品与先锋派作品不同,几乎不存在与大众交流的障碍。他只是在思想上是现代的。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sup>[1]</sup>的创作能力更为惊人,他在50多年里写了100多本书<sup>[2]</sup>,平均每年两本以上,此外他还给杂志写了数量众多的文章和评论。单凭这些他很难成为不朽人物,因为许多低俗小说作家单凭出版数量就足以超过他。但是,威尔斯是一位高质量的作家,无论他的小说还是其他体裁的作品,都是如此。与萧伯纳一样,他在文体上没有什么创新,他喜欢让普通读者看懂他的书。晚年,他曾激烈批评那些卖弄新奇文风的作家。但他早期的小说赢得了高度赞扬。1912年,有人在文学界权威人士当中进行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在当时所有在世的英国小说家中,威尔斯的地位仅次于哈代,但此时哈代已停止小说创作好长时间了。有人根据他在1900到1910年间所写的社会讽刺作品,盛情地把威尔斯比做狄更斯。1906年一篇有代表性的评论称他为“幽默风趣的作家,尖酸刻薄的才子,处处表露出新的创意”。这些小说,例如《托诺-邦盖》和《波里先生的历史》,鲜明地再现了英国、主要是伦敦的真实人物,这些人不是有钱有势的大人物,而是普通的小人物。这些故事针砭时世,生动揭示了“中下层阶级生活的绝望无助”、他们的狭窄眼界以及可怜幻想。

众所周知,威尔斯同时还创作另一种文学体裁。他可以说是这种体裁的创始人。那就是科幻小说。他在这方面的作品有《时间机器》、《隐身人》、《月球第一人》和《莫罗博士的岛屿》等等。它们为后来的恐怖片、星际

---

[1]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年),英国作家。

[2] 1966年威尔斯研究会编订了他的著作目录,他独立成书的著作共有156种,尽管有些只是寥寥数页的小册子。沃伦·瓦格纳在《H.G.威尔斯和世界国家》一书中列了108种,有些著作与颇受欢迎的《世界史纲》一样,是多卷本。——原注

旅行和未来学建立了模式,而且这些小说也被拍成早期电影。尽管在威尔斯之前已经有少数作家探索过“科幻小说”的创作,但使它登堂入室的却是威尔斯。威尔斯是公认的科幻小说大师。后来的科幻小说家都以他为鼻祖。



威尔斯的作品《时间机器》

威尔斯出身寒微,他父亲做过家仆,当过二流运动员,后来开商店,但很不成功。威尔斯对小人物的了解还是很真实的。他从未在牛津或剑桥念过书。他曾在布店当学徒。他大学时代学的是理科,他拿到

一份微薄的奖学金,到南肯辛顿师范学院学习,后来在伦敦大学获取理学学士(1889年)。这时候,他遇到过一场严重事故(在足球比赛中受伤),他的第一次婚姻也是灾难性的,但他挺过来了。他精力过人,那种活跃的生命力在一生中如火山喷发。这似乎是时代的风尚。有一位学者为威尔斯的朋友安妮·贝赞特撰写传记,第一卷的题目便是“安妮·贝赞特早年的五面人生”<sup>〔1〕</sup>。贝赞特夫人最初信奉无神论,是查尔斯·布拉德洛的弟子,布拉德洛因1885年拒绝在下议院做宗教宣誓而知名;贝赞特夫人还是女权主义的先驱,她提倡节育和自由恋爱;她与萧伯纳一道成为(社会主义的)费边社的创始成员,她教过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帮助组织工会和罢工,后来却受到通神论的影响,去了印度,并发起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她在甘地之前担任印度国大党主席)。这在维多利亚—爱德华七世时代是一种很正常的生活方式。

〔1〕 Arthur Hobart Nethercot, *The First Five Lives of Annie Besa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原注



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阶段,人们同样可以在威尔斯身上发现他至少有五面人生。在 19 世纪 80 年代,也就是在他青年时代,他已成为社会主义者,聆听萧伯纳、威廉·莫里斯和亨利·乔治的教诲。与此同时,达尔文主义的科学进化论精神也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威尔斯就此写了许多本书,1902 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冗长书名最能体现他的主旨:《机械和科学发展对人类生活和思想可能产生的作用》。他具有一种预言未来科技发展动态和后果的特殊才能,这种才能与他的科幻小说创作才能密切相关。航空、原子能(也许还有核战争)、预制装配的房屋建造、郊区化、巨型城市等人类即将遇见的事物,威尔斯都预见到了,虽说他的预见并不让人感到怪异,但也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要知道,在 1902 年,莱特兄弟还没有进行他们首次飞行,放射性尚未发现。在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威尔斯显示出他不仅了解最新的科学信息,而且能够想像出科技变迁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未来学现已成为一门学科(尽管尚有争议),而它的开端就被追溯到威尔斯。

与萧伯纳一样,威尔斯晚年成果颇丰,而且笔耕不辍,但他最终还是与时代格格不入;他的鼎盛时期在 1914 年之前。无论小说创作,还是非小说创作,他都取得了成功,不仅保持了很高的学术质量,而且又能适合大众阅读。这种成就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写的《世界史纲》成为严肃的史学著作中销量创纪录的畅销书。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他在 1910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安·维罗尼卡》中,以同情的笔触大胆地表现了“一位解放了的女性”。这部小说甚至令他的社会主义朋友们感到震惊。就此而言,他为推动妇女解放所做的贡献,也许比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任何一位伟人都重要,甚至超过了萧伯纳和罗素。

## 20 世纪初现代主义的诞生

在欧洲大陆,一种更有魄力、更有胆识、更有实验色彩的艺术风格一直方兴未艾;直到 20 世纪前十年结束之际,它还没有对英国产生太多的影响。弗吉尼亚·伍尔芙曾宣称,临近 1910 年末,“人类品性发生了改变”;她主要想到的是当时伦敦举办的后印象派画展,这次画展在公众当中引起了巨大争议。

这场革命已经在欧洲进行一段时间了。要是把从 1890 年到 1910 年间

所有的美学“宣言”汇编成书,决不会少于730个。野兽派是马蒂斯和杜菲领导的一个著名画派;立体派随之产生。我们在德国的表现主义和法国的立体主义中可以分别看到现代主义绘画的两翼:注重情感的倾向和注重理性的倾向。立体派注重几何分析,表现派则注重主观象征;它们的共同之



考考斯卡的画作

处是激进的实验主义倾向:偏离传统的现实主义,在抽象的形式或内心的幻象中寻找更深刻的现实。亨利·马蒂斯解释说:“客体有一种固有的真实,必须把它从客体的外在表象下分离开来。”“忠实的描摹不是真实。”另一位大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于1910年创作了第一幅抽象画。他宣称:“客体总是屏蔽我的意蕴。”“远离实在,远离物质,回到精神”成为箴言。

这是对更深刻的真实的严肃思想追求,它力求将人类从科学理性的牢笼中拯救出来。但普通人往往对这种

新艺术深恶痛绝。它的那种反现实主义取向是人们不喜欢它的一个原因。人们无法从这类绘画或雕塑当中“认出”什么东西,并且怀疑这些艺术家在拿他们开玩笑——这种看法倒是有一丝真实的成分。这些艺术家挺身而出反抗的是资产阶级碌碌无为和民众平庸市侩的世界,他们反对的是官僚主义、机械呆板和琐屑无聊的世界。公众的反应通常是震惊和愤怒;当现代主义艺术像通常那样更大胆地去表现色情的时候,公众的反应就更激烈了。伦敦和纽约的观众朝现代画展扔东西。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居然用马鞭子抽打考考斯卡<sup>[1]</sup>的一幅绘画!本来不好发火的爱尔兰人,却因为J.M.辛格<sup>[2]</sup>的剧作《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而发生骚乱,闹了一个星期,而这部剧作现已被奉为经典。这是自浪漫主义运动以来最极端的与传统决裂的事件,或许比浪漫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刚刚适应先前的那场

[1] 考考斯卡(Oskar Kokoschka, 1886 - 1980),奥地利表现派画家。

[2] J.M.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 1871 - 1909年),爱尔兰剧作家,被称作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领袖。

决裂(指浪漫主义)的人们来说,这次决裂太过火了。对 19 世纪各个时期人们的艺术观念的研究,例如,佩尔西·施拉姆<sup>[1]</sup>在论述九代汉堡人的著作已经表明,艺术家与普通公众、先锋派品味与民众品味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步扩大。

资产阶级支持技术的不断变化,而且崇信“进步”,但排斥艺术中的任何新东西,这似乎十分矛盾,但情况确实如此。一百年后,他们却又甘愿拿出几百万美元去买当时他们嘲笑和忽略的绘画作品:凡高、毕加索、马蒂斯、克利、蒙德里安的作品。这场革命自然也扩展到其他艺术领域。音乐是一个引起激烈争执的领域。1903 年巴黎音乐学院排斥莫里斯·拉威尔<sup>[2]</sup>,1907 年古斯塔夫·马勒与维多纳音乐界发生激烈争执,但这些事件与几年后人们面对更大胆的创新时的反应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瓦格纳和德彪西篡改了自然音阶,阿诺德·勋伯格则完全排斥自然音阶而采用 12 音作曲法。他的“序列音乐”创造了一种新的音乐结构。1913 年勋伯格和艾尔班·贝尔格<sup>[3]</sup>的作品上演,引发了维也纳人的抗议骚动。在此之前,巴黎发生了一场更有名的骚乱,起因于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中大胆的节奏和不和谐的和弦。

新的建筑也招致了类似的强烈抗议之声。维也纳建筑师阿道夫·洛斯<sup>[4]</sup>的“国际式风格”深受美国的影响。他在 1910 年成为群起攻击的对象,他在米歇尔广场设计的建筑物洛斯宅,招致“一片愤怒之声……这种强烈的愤慨之情在维也纳还是罕见的”。这是与建筑学传统,也就是与过去的各种风格实行决裂。过去,古希腊的、中世纪的(这是浪漫主义所复兴的)、文艺复兴的或者巴罗克的风格,体现了把建筑提升为艺术的追求。现在的这种决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现代主义的先行者路

---

[1] 佩尔西·施拉姆(Percy Ernst Schramm, 1894 - 1970 年),德国历史学家。

[2] 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 1875 - 1937 年),瑞士巴斯克裔法国作曲家。他在巴黎音乐学院三次竞争罗马大奖,都因评委中有几位极端保守的成员反对而落选。

[3] 艾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 1885 - 1935 年),奥地利作曲家,师从勋伯格。

[4] 阿道夫·洛斯(Adolf Loos, 1870 - 1933 年),生于捷克,主要活动在奥地利。因其建筑理念而闻名。

易·沙利文<sup>〔1〕</sup>的作品就是例证。难道每一种人类文化方式不是像社会进化一样必须适应新环境吗？正如美国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瑞士的勒·科比西埃<sup>〔2〕</sup>以及建筑界的其他年轻的反叛天才的作品所显示的，临近1914年时，最激动人心的领域莫过于建筑学现代主义的前沿。



米歇尔广场的洛斯特

这是才华横溢的一代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得到基本认可，我们在第十三章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一战前夕，詹姆斯·乔伊斯、D.H.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弗兰茨·卡夫卡和马赛尔·普鲁斯特正值作家学徒期，但已经预示了小说的革命。

这场艺术和文学大爆炸受到了新兴的哲学和科学观念的推动，我们将在下文讨论。这些新兴的观念包括亨利·柏格森的直觉、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酒神精神、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以及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密切相关的物理学革命。（未来主义宣言大声呼喊：“时间和空间在昨天死掉！”）与此同时，政治社会思想继续蓬勃发展。

有人可能会认为，光是欧洲就足以让人们眼花缭乱、无暇旁顾。然而艺术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把触角伸到域外之地。安德列·纪德宣告：“欧洲令我厌烦。”保罗·高更辞掉布鲁塞尔一家银行的工作，到南太平洋寻找绘画题材。罗伯特·路易·史蒂文森云游四海，最终在萨摩亚定居。在“世纪末”的这一代作家和艺术家当中，有很多人几乎总是处于运动不居的状态；可以说，他们“居无定所，行无定向”，这种情况决非雷纳·马利亚·里尔克一人所有。就当时艺术所受到的具体影响而言，日本的影响也是一个方面。当时日本与西方的联系非常引人注目，有一些作家如美国人拉夫卡迪奥·赫恩<sup>〔3〕</sup>对此做过概述。在20世纪头几年的法国，“空气中

〔1〕 路易·沙利文(Louis Sullivan, 1856 - 1924年),美国现代建筑(尤其是摩天大楼设计美学)的奠基人。

〔2〕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1867 - 1959年),早年曾经是草原式建筑学派的主要倡导人。

勒·科比西埃(Le Corbusier, 1887 - 1965年),国际式建筑学派的第一代建筑师,该学派最积极的倡导者。

〔3〕 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 1850 - 1904年):在都柏林长大,19岁移居美国,1895年入日本籍,取名小泉八云。

弥漫着东方的气息”。埃兹拉·庞德,这位在英国领导现代主义的美国侨民,在他的意象主义诗歌中采用了日本俳句形式。不久,非洲雕刻对欧洲先锋派艺术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影响。

## 非理性主义者

19世纪末的艺术、文学与各种哲学思潮紧密交织,我们在上文提到尼采和柏格森时就已经暗示了这一点。因为这些哲学家把艺术当成通向真理的主要途径。他们是后科学主义者,而且是某种程度上的反理性主义者。他们相信,最深刻的真理逃避我们纯粹的逻辑分析。他们会赞同法国小说家兼政治家莫里斯·巴雷斯<sup>[1]</sup>的说法:“我们的理智——这是附在我们的自我的外表上的多么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们的逻辑本身是一种语言建构,它肯定无法穷尽无限丰富的经验。生活远远大于思想。

在法国批评家乔治·盖伊-格兰特<sup>[2]</sup>看来,深受亨利·柏格森影响的诗人,在“主观主义放纵”当中表现出一种情感狂乱,柏格森宣扬的自由的内在流动完全不同于公众对时间和空间约定俗成的看法。伊妮德·斯塔基<sup>[3]</sup>在回忆这位巴黎哲学家对她们那一代人的巨大影响时这样写道:“柏格森给我们带来了诗歌和神秘的直觉,证明了自由和理想主义的合理性,释放了意识的流动。”柏格森在19世纪90年代在巴黎大学的讲演,就产生的轰动效应而言,足以同中世纪阿伯拉尔的演讲相媲美。不久,人们就把他与笛卡儿、卢梭和孔德相提并论,把他当成一代思想大师。柏格森的第一部名作于1889年面世,当时他30岁。与尼采相似,柏格森的行文极具天分,确保他拥有一批读者;他在使用隐喻和诗歌意象方面不拘一格,因为他相信,纯概念思考无法最好地传达现实的本质。柏格森是作家们的哲学家,他与象征主义运动息息相通。

柏格森严格区分了理性的、概念化的理智和直觉性的理解。前者是实用的工具,关注有用的知识,但并不能产生真理,因为现实是无法如此条块分割并用概念来思考的。这一点接近于康德的现象—本体之辩。现实是

---

[1] 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es, 1862 - 1923年),法国作家、政治家,以鼓吹个人主义和狂热的民族主义而产生较大影响。

[2] 乔治·盖伊-格兰特(Georges Guy - Grand),20世纪法国学者。

[3] 伊妮德·斯塔基(Enid Starkie,1903 - 1970年),牛津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

一个连续的整体,需要用直觉来把握。“生命力”存在于万物之中,流过直接经验。与理智相比,直觉(被界定为本能,它具有自我意识和反思性)让我们更接近“生命的本质”,而理智处理的是生命的表面现象。柏格森说,他是从思索时间的意义而开始哲学思考的。他自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钟表显示的日常生活的时间,也就是物理学家所说的时间,完全不同于经验中的实际时间。人类的智能分析和划分事物,使人们产生了前一种时间观念,这种时间观念固然有用,但不符合经验。

当我们用直觉来把握直接经验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是一个无法分割的连续体,它是一种我们只能用诗歌意象来描述的“绵延”(duration)。其他事物也是如此。科学告诉我们,钟发出的声音是一系列的振动,可我们却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来体验。一首曲子不是一系列音符,它是无法描述的;我们只是通过直觉来感受它。按照华兹华斯的说法,科学在“屠杀式地进行分解剖析”。现实是不可分割的,因而也是无法分析的;只要我们出于权宜之计不得不对它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是在歪曲现实。“科学只是由一些惯例组成的,它徒有其表的准确性完全建立在这种情况下之上的;科学所提供的事实,尤其是科学定律,都是科学家人为的成果;因此科学不能教给我们任何真理;它只能充当一种行为规则。”<sup>〔1〕</sup>尼采会说,科学在本质上是神话。

批评者反对柏格森主义或实用主义把“概念化”过程贬斥为约定俗成。他们只需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这些哲学家也不能不使用概念性的或思想性的语言,否则就等于禁止思想。大家都承认,概念与现实不是一回事。就在此时(19世纪90年代)奥地利科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马赫<sup>〔2〕</sup>(爱因斯坦深受他的影响)非常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这一点。概念性知识不能穷尽现实,也不是处理现实的惟一方法。但是,要是说科学与现实完全分离,说它根本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关现实的东西,说它只是展示它自己武断制订的符号和象征,这就走得太远了。然而,柏格森主义者对科学的反击很有说服力,依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的主要结果是证实了和恢复了“直接经验”形式——如文学、宗教以及各种神秘的或非理性的经验——的正确性。

---

〔1〕 R. B. Perry, *Present Philosophical Tendencies* (1912年), pp 230 - 1. ——原注

〔2〕 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 1838 - 1916年),奥地利科学家、哲学家。

柏格森主义的主要思想打破了处于支配地位的实证主义对于宗教或形而上学思想的禁锢。艾蒂安·吉尔松<sup>〔1〕</sup>在回忆柏格森对他们那一代人产生的影响时写道：“自孔德和康德以来，形而上学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力量展开反对科学决定论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夏尔·戴高乐说柏格森“更新了法国的精神面貌”。

柏格森提出了一种生机论的进化理论。他在一本销路甚广的著作《创世进化》中<sup>〔2〕</sup>反对达尔文主义的机械论。他认为生命本身含有某种目的性力量，没有这股力量，就无法解释进化。当时，“突生进化”学说得到许多思想家的支持，它在英国最主要的支持者是萨缪尔·亚历山大。“突生进化”学说认为，自然是逐渐创造出自身的，而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生命演化出新的和不可预知的形式。我们身处一个尚未完成的世界中，我们也在帮助它形成。“创世进化”，正如柏格森所指出的，是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崭新观念。这个令人振奋的观念把达尔文主义者那种相当阴郁的机械无神论变成了对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的神奇自由的感受。

编辑兼作家夏尔·贝玑是柏格森的法国弟子之一。他是一个不拘泥于教条的基督教徒、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1914年之前，他是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作家。贝玑说，柏格森的哲学是“直觉的哲学……它讲的不是科学理性的缺陷，而是直接接触有生命的事物、活动的事物的本质的意图”。这种哲学强有力地使贝玑最终推向了神秘主义。小说家们也把那种表现未曾加工的“意识流”的主张归功于柏格森。我们前面还提到他对萧伯纳的影响。

柏格森是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的朋友。他与詹姆士和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息息相通。在攻击理智性或观念性知识方面，他们大体一致。正如杜威所说的，“有一种经验在支撑着知识及其对象，支撑着它们的图式化或结构成分。”换句话说，直觉经验更为深刻，成为支撑着认知过程的基体。正如尼采所说，我们必须反对所谓纯粹感知的教条。柏格森与这两位实用主义者有些类似于现象学创始人埃德蒙·胡塞尔。胡塞尔比他们更晦涩一些。他在世纪之交用现象学这个术语来表示一种系统的学问，

---

〔1〕 艾蒂安·吉尔松(Etienne Gilson, 1884 - 1978年), 法国天主教哲学家, 中世纪哲学史学家。

〔2〕 《创世进化》(Creative Evolution, 1908年)。

即研究事物和概念在被语言形成概念之前是如何直接传递给精神的。

英国人 F.C.S. 希勒、意大利人帕皮尼和佩佐里尼<sup>〔1〕</sup>是实用主义在欧洲的代表。实用主义在欧洲不及它在美国影响大。帕皮尼后来成为法西斯主义者,也许这表明了实用主义容易受到环境影响和容易接受一切活跃的信条的倾向,据说柏格森主义也有这种倾向。在德国风行的“创世进化”观念或“生命哲学”(马克斯·舍勒<sup>〔2〕</sup>乃是柏格森的德国同道)有一个弱点:它们常常将时新的东西都当做生命力或历史精神的显现而加以接受。知识分子莫名其妙地迷恋 1914 年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综合症在作怪。战争发生了,令人感到新奇;因此它在本质上一定是神圣的。理性无法对它进行判断,因为生命在理性之上。

## 弗里德里希·尼采

在德国,当人们谈论形而上学复兴的时候,总要引用哈特曼、洛采和倭铿<sup>〔3〕</sup>,还有舍勒。但在 19 世纪末的德国,弗里德里希·尼采是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影响力遍及欧洲。在 19 世纪 80 年代,他就以一系列振聋发聩的作品而声名鹊起,这些作品不同于以往的任何著述,他在这些作品中利用德语从全新的角度阐述了许多惊人的观念。他的著作异乎寻常,以至于数年后他才成名;但是,到了 1900 年,也就是在他 45 岁中风失去语言能力的 10 多年之后,他在欧洲知识分子当中风靡一时。(“知识分子”这个词刚刚被用于描述某种精神气质;在法国,据说这个词的起源可追溯到 1898 年在德雷福斯事件的喧嚣声中发表的一份“知识分子宣言”。)

欧洲的青年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经常欢呼,说尼采准确地表达了他们未

〔1〕 F.C.S. 希勒(Ferdinand Canning Scott Schiller, 1864 - 1937 年),德裔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优生学家。

帕皮尼(Giovanni Papini, 1881 - 1956 年),意大利新闻记者、文学家。

佩佐里尼(Giuseppe Prezzolini, 1882 - 1982 年),意大利新闻记者、随笔作家、文学批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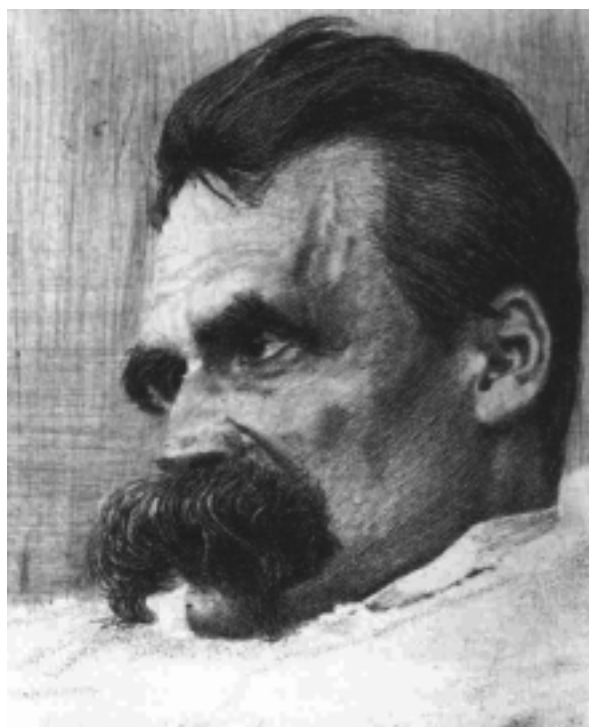
〔2〕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 - 1928 年),德国哲学家。

〔3〕 哈特曼(Karl Robert Eduard Von Hartmann, 1842 - 1906 年),洛采(Rudolf Hermann Lotze, 1817 - 1881 年),倭铿(Rudolf Eucken, 1846 - 1926 年),均为德国哲学家。



能说出的内心感受：“早在他的著作面世之前，尼采的影响就已经在我们中间存在；它降落在成熟的土壤上，”安德列·纪德如是说。从都柏林的威廉·巴特勒·叶芝到布拉格的弗兰茨·卡夫卡，富于想像的作家对尼采的呼应尤其强烈。但是，尼采是一部宣言，他道出了所有与众不同的人物的心声，这些人是精神上的少数派，是大众的公敌，他们对深受报纸影响的大众深恶痛绝。事实上，尼采是现实欧洲文明的敌人；人们所应该做的只不过是，摧毁欧洲文明，重新开始。“我看到一股强大的悲凉情绪笼罩着人们心头。最优秀的人厌倦了他们的工作……一切都是虚幻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过去的一切也是如此。”

在预言式著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尼采借鉴古希腊的酒神颂歌，采用了一种抒情诗形式。尼采是一位少年得志的学者、古典语文学家，24岁就获得博士学位，当了巴塞尔大学教授。尼采与当时新兴的刻板枯燥的学术专业化取向发生了冲突。那些学院派批评他的《悲剧的诞生》（1872年）过于玄奥。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没有精神的专家”，正是尼采所抱怨的对象；他们认为尼采马虎草率、不够严谨。作为教授，尼采并不成功，所以不久他就称病辞去大学教职。



弗里德里希·尼采

不过，《悲剧的诞生》是一部出色之作，包含了尼采主要思想的萌芽。尼采认为，古希腊人的天才主要不是像浪漫派所主张的那样源于欢快的乐观主义，而是源于悲剧性的受难；与其说它体现在哲学理性主义和科学，不如说它体现在原始的激情放纵，这种原始的激情放纵经过理性的调和，“升华”为艺术。狄奥尼索斯，这位代表音乐、悲剧和纵酒狂欢的低等神祇，在尼采看来，是这股原始力量的象征，没有这股力量，人们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造力。它正是过于理性化的现代欧洲人所失去的东西。古希腊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既有狄奥尼索斯又有阿波罗。阿波罗的“有分寸的节制，明智的宁静安详”，讲究形式而不失灵活的做派，与狄奥尼索斯不讲求形象、有节奏的狂乱相辅相成，

创造出最高级的艺术,正如古希腊艺术所表现的那样。“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古希腊悲剧:它是经常在阿波罗式的形象世界里现身的狄奥尼索斯式的合唱队。”古希腊人不仅是理性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中还充盈着生存意志。他们最伟大的时代是以赫拉科利特和埃斯库罗斯为代表的早期哲学家和戏剧家的时代。柏拉图和欧里庇得斯则是古希腊人颓废的标志。西方文明所继承的正是古希腊人的颓废而不是他们的伟大之处。

这种振聋发聩的视角颠倒,体现了尼采尖锐的反偶像思想,他的“价值重估”。他反对的对象有:基督教教会(这种否定生活的宗教适合于奴隶)和传统的道德(“最有害的无知”)。人类需要有超人来拯救颓废文明,他一定要超越道德,“毫不怜悯退化的人”。查拉斯图拉在他最有名的一句箴言中宣布“上帝死了”:欧洲人杀死了他;一种具有强制性的信仰不再存在。尼采以轻蔑的口吻拒斥(保罗的)基督教<sup>〔1〕</sup>,与马克思经常表现出的态度很相似:说它是“人民的柏拉图主义”,一种“致命的和具有诱惑的谎言”。然而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需要新的神祇,至少是新的神话;与上帝的死亡相伴生的是一场因精神空虚而引起的可怕危机。

既然看透了所有的神话(尼采伟大的怀疑之作是《人性、太人性的》1878年),那么,除了生命本身,就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我们必须有勇气去接受生活现实及其全部的意义虚无,因为生活就是如此。通过生活,通过努力塑造我们的现实状况、实现我们自身的独特品性,我们就能够证实我们自身的生命力。在否定基督之后我们可以接受狄奥尼索斯。从尼采回肠荡气的文字中浮现出的基本精神是,骄傲地张扬个性,对抗群氓,对抗当权者,乃至对抗宇宙本身。存在主义者从他那里学到的是,完全自由的人性意识有力量在非道德的世界中去维护并进而创造价值。“既然我们杀死了上帝,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成为有资格做出这种事情的神祇吗?”

对尼采产生深刻影响的人包括叔本华、瓦格纳和达尔文。他早年在瑞士见过瓦格纳;1864年,他在读叔本华的文章时也读了达尔文的著作。叔本华的“生命是意志而不是理性”的观念,浸透瓦格纳和尼采的思想,但是尼采逐渐摒弃这位伟大的悲观主义者(叔本华)的做法:认为生活一无是处而沮丧地加以否定;查拉斯图拉的 amor fati(爱命运)就是对叔本华的答复。即便我们看到生活是无理性的,我们还要拥抱生活。

---

〔1〕 保罗的基督教,指罗马天主教。

非理性主义思想并非新鲜事物。哲学家施莱格尔在晚年(1837年)曾说过,最真实的思想根本不是理性的而是直觉的和神秘的。这番话令他的听众大为惊愕。叔本华宣布:“意识纯粹是我们精神的表面,对于它,正如我们对于地球表面一样,我们不知道它底下的内容,只知道它的外壳。在有意识的理智的下面,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意志。这是一种进取的、坚韧的活力,一种恣意强求的意志。”叔本华将意志和理性区分开来,把前者说成是最重要的。这种区分也可见于达尔文描述的自然图式:理智只是生存的工具,是努力适应环境的整个有机体的组成部分。正如尼采所津津乐道的:如果说我们还能够理解这个世界,这是因为未能理解这个世界的人没能活下来。

出生于萨克森的尼采不是一个书斋哲学家。他宣称:“我用我的整个身体和生命来写书。”他所有的思想都是针对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对于欧洲的现状深恶痛绝,尤其是对1870年战胜法国之后、让骄傲和繁荣冲昏头脑的德意志深恶痛绝(在普法战争中青年尼采曾在普军服役),这是他的基本情怀。尼采向那些在动荡起伏的世纪之交满怀喜悦的青年读者传达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对于当前处境可怜的人类的轻蔑。民主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大众,还有经济人,都是他以嘲讽口气攻击的对象。他认为,重新开始的唯一机会就在于依靠一小撮绝对没有被腐化的残余分子。灭绝现有的人类、创造出超人——尼采的这个号召,如果落到希特勒那种人手里,将是一种危险的观念;但尼采既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他在这些问题上与他曾经崇拜的瓦格纳分道扬镳。他自称是“一位善良的欧洲人”,他讨厌反犹主义。

尼采是一位敏锐的心理学家。他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容格很有启发。人性中隐秘的、未被文明化的本我(id)的力量潜藏在无意识领域中(尼采用德语 das es 即英语的 it 来表示这种力量。弗洛伊德可能是通过格奥尔格·格罗德克<sup>[1]</sup>获得了这个词;在英语中它通常被翻译成“id”);它可以升华成创造力。这种狄奥尼索斯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与性欲有关。尼采曾指责说,基督教道德观把性本能与道德败坏联系起来,从而毁灭了西方文明。“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已经弃绝了性欲,那他就错了,因为

---

[1] 乔治·格罗德克(Georg Groddeck, 1866 - 1934年),德国医生,敬重弗洛伊德的思想,与弗洛伊德有通讯联系。

他的性欲还在以怪异的吸血鬼的形式继续存活,戴着神秘的伪装折磨着他。”尼采用箴言形式抛掷出需要心理学家更加系统地阐述的思想。事实上,他几乎是激励人心的新奇思想的无穷渊源。

同所有伟大作家一样,他的政治影响不只一端。作为无神论者、传统宗教和道德的激进批评者、自由精神之友,这位最不循规蹈矩的思想家自然会对左派产生吸引力。许多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把革命的行动主义归功于他。他是先锋派的宠儿,是“波希米亚人”的导师。有些俄国布尔什维克也把他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在另一方面,尼采蔑视民主制和社会主义,他认为二者是基督教奴隶道德的谬种流传,教人们顺从、平等和平庸。他鼓吹人的不平等,他的话可用来替帝国主义、专制主义以及战争张目。贝尼托·墨索里尼从左翼社会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受了尼采的影响;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对他大加赞美,虽说他们显然误解了他。<sup>〔1〕</sup>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协约国政府把尼采与普鲁士战争机器联系起来。(尼采的崇拜者、美国文人 H.L. 门肯<sup>〔2〕</sup>说,美国参战后,有一天,警方曾询问他与“德国鬼子尼采”的关系——当时尼采已经死了 17 年了。)但是,任何真正了解尼采著述的人都发现,这种看法的荒唐程度不亚于大多数的战争宣传。

近些年来,尼采那种腐蚀性的怀疑主义,却对“解构主义”批评有所启发。他指出,所有的人类陈述只不过是无法证实的武断之言,它们源于权力意志。他喜欢说,有多少种不同的视角,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真理。简言之,尼采的思想火焰在许多方向上闪动,而且在所有被人们视为不可能的地方引燃了导火索。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威力。这位居住在锡尔斯-玛丽亚(瑞土地名)的哲人说过:“我是炸药。”确实如此。弗吉尼亚·伍尔芙在读柯勒律治作品的时候,曾说到思想会“爆炸”并引发其他各种思想。尼采就是能够产生这种效果的人。《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读者遍及世界(例如它出了很受欢迎的日文本),它还被编成曲子(里夏德·施特劳斯和古斯塔夫·马勒先后作曲),它与卢克莱修、但丁和歌德等人的作品一道,成为

---

〔1〕 保管尼采书信文件集的是他的妹妹,此人思想上亲纳粹,她在编辑整理尼采著作的过程中带有倾向性,结果尼采似乎与希特勒主义声气相投。只是最近几十年来,尼采的著作才出了一个完整和准确的版本,这样一来,对于尼采的评价才渐趋公正和全面,这个过程仍在进行。——原注

〔2〕 H.L. 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 1880 - 1956年),美国评论家、报人。

欧洲文学中的伟大哲理诗。

说到底,尼采对理智主义的反叛似乎是他最显著的特征。这是范围更广泛的反理智主义倾向的一部分。象征主义诗人也有这种倾向(瓦格纳是尼采和象征主义诗人共同的思想来源,1884年《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出版,象征主义运动诞生)。犹太宗教哲学家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马丁·布伯<sup>[1]</sup>,在哈西德派的犹太民间传说中发现了“一股原始的生命力,一种不假思索的、面向直觉经验的开放性,这种东西在过于精致的西方基本上已经消失了”。(Ritchie Robertson)客观理性是人类堕落天性的产物,会把事情物化,掩盖了它们的本相;创造神话的过程是一条比创造概念的过程更容易通向真理的途径。(见俄罗斯哲学家兼神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创造性行为的意义》,1914年。)奥地利人罗伯特·穆齐尔放弃了科学转而从小说创作,因为他认为只有后者才能发现内在的真理。他曾论及理智与深度之间的冲突。在法国,乔治·索雷尔大力宣扬一种新原始主义的向野蛮神话的回归,回归到正常本能还没有被过多的理性败坏之前的状态。这方面还有许多其他例证。这个时期的一个流行信念是:西方社会濒临死亡,导致它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过于理性化,或者说理智过多,科学和抽象的知识过多,人类失去与自然的联系,失去与神话和象征的接触,失去与正确的宗教和言语的联系。

“人类的理性太疲倦了,”罗曼·罗兰在1913年出版的史诗小说《约翰·克里斯多夫》的最后一卷中让主人公思索着。“它刚刚付出巨大的努力。它倒下来沉睡不起……即使是科学也表现出这种理性疲倦的迹象。”厌倦这个词似乎不适合用来描述1914年前的创作爆炸,但谁也不能忽视无理性的音调。“我一直认为,我本人就是我深信不疑的一场更伟大的文艺复兴的喉舌,”爱尔兰大诗人叶芝在1892年写道,“这场灵魂反抗理智的斗争在世界上刚刚开始。”

## 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萧伯纳是同龄人。他深受尼采启发,但只比尼采小12岁。他比亨利·柏格森略为年长。弗洛伊德是一批具有创造性的

---

[1]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年),犹太宗教哲学家。

犹太艺术家和科学家中的一个(这批人大多背弃了古代宗教信仰)。他们出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莫拉维亚或捷克斯洛伐克,早年随家人迁居维也纳;有同样经历的还有古斯塔夫·马勒、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爱德蒙·胡塞尔。弗洛伊德三岁时来到帝国首都,此后就一直在那里生活,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才因纳粹迫害而流亡异域。1881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后来他在这里当教授。他在一生中度过绝大部分时间的维也纳住所开展著名的精神分析治疗。现在这个住所已成为一个圣地。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这个城市。他所开创的精神分析运动是一场国际性运动,首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瑞士人,即苏黎世的卡尔·容格。弗洛伊德的密友桑多尔·弗伦奇和卡尔·亚伯拉罕分别把精神分析传播到布达佩斯和柏林。该学会在欧美的主要城市都有分支组织,或许伦敦和纽约的分会最为出色。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向弗洛伊德学习,他也经常出国讲学,最引人注目的是1909年至1910年,当时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刚刚发起。不过,弗洛伊德早年曾在巴黎师从过夏尔科博士<sup>〔1〕</sup>。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是医生,本性上是一位头脑冷静、差不多属于实证主义的科学家,是达尔文—巴斯德的实证精神培养出来的。他轻视宗教,经常贬低艺术;认为宗教和艺术是患有神经官能症的人所依赖的幻想支柱。弗洛伊德总体上不喜欢形而上学、神秘主义或者一切无法从经验上得到证实的科学方法。如果说他在研究无意识心理的时候使用了一些奇怪的象征和神话,他这么做全是为了理解无意识心理,也是为了制服它。“哪里有什么本我,哪里就有自我。”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天才的一个关键之处就在于,他在西方文学方面的深厚功底。他以令人信服的妙笔援引西方古典文学作品来建构

〔1〕 夏尔科博士(Jean - Martin Charcot, 1825 - 1893年),法国医生,现代神经病学的前驱。弗洛伊德1885 - 1886年在他的诊所实习。

他的主要概念:俄狄浦斯情结、那喀索斯情结(自恋)、净化(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概念)。他对文学和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弗洛伊德集科学家和艺术家于一身,他在这两方面所做的平衡经常是不稳定的,两头不讨好,但这也是他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在 100 年前,维也纳就有一位医生安东·梅斯梅尔<sup>[1]</sup>大力推广弗洛伊德时代所说的催眠术,用来治疗“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是“神经错乱”的一种,它的标志是瘫痪、颤抖以及其他找不出明显生理学原因的身体问题等症状。<sup>[2]</sup> 在观看夏尔科使用催眠术的时候,弗洛伊德认为,他已经发现,疗效不是催眠本身造成的,而由于唤起了潜藏的记忆。在维也纳,作为一名渴望有所作为的年轻开业医师,弗洛伊德利用自己的专长,尝试各种办法将被压抑的经验带到意识领域,来唤起潜藏的记忆。大脑里存在“无意识”区域,这个观念很早就有,晚近时期,叔本华主义者爱德华·冯·哈特曼的书中就有描述(《无意识哲学》,1869年)。我们在上文中已说过,弗洛伊德受惠于叔本华和尼采。叔本华就曾探讨儿童性欲和压抑。

实际上,弗洛伊德所处理的问题也是人们一直在思考的,因为它们是人类经验的基本组成部分:性冲动、家庭关系、梦、掠过我们心头的零星思想,隐秘的、难以启齿的欲望和语言。小说家和诗人们曾探究过这些事物,民间文学偶尔触及,但尚未有人对它们加以系统和科学地处理。或者说,至少还没有人认为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是人性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心理学本身就是一门新学科:据说,第一个心理实验室是威廉·冯特<sup>[3]</sup>在 1879 年建立的。当然,伟大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都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坦诚地承认他们走在前面。有关狄更斯、哈代以及 19 世纪几乎所有的小说家和诗人的各种研究成果都告诉我们,这些作家在弗洛伊德之前就探究过人

---

[1] 安东·梅斯梅尔(Anton Mesmer, 1734 - 1815 年),奥地利医生,发明一种催眠术(mesmerism)。

[2] 梅斯梅尔称这种力量为“动物磁力”,他相信它的载体是一种无形的流体,很像古代斯多噶学派所说的“元气”。但不久就搞清楚了,这类具体的物质根本不存在,虽说心理力量还是存在的。——原注

[3] 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 1832 - 1920 年),德国实验心理学家。

的心理。<sup>〔1〕</sup>狄更斯发现自己有催眠能力,1844至1845年间他日夜不停地对一位朋友的妻子进行催眠,她患有肌肉挛缩和惊厥症,在接受催眠状态下,这些病症有所减缓,狄更斯的做法让妻子万分嫉妒。当病人处于昏迷状态时,狄更斯向她询问她的各种梦境,想更多地了解她所说的威胁到她的“幽灵”的情况。

弗洛伊德将大量材料汇聚到一起,总结出一个一般性理论。他继续援引文学和临床材料。探察病人被压抑的记忆的“自由联想”方法,是卡尔·容格独自发现的,这可能受到迪雅尔丹在1886年出版的“意识流”小说《月桂树被砍倒》的启发。1879年,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发明了词语联想测试法。

弗洛伊德写了一些评论作家和作品的论文,论述哈姆雷特、蒙娜丽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文章引人入胜但也颇有争议。在这些文章中,他试图用被压抑的性冲突来揭示这些杰作的独特性质。他因此也就成了文学批评领域的弗洛伊德学派的创始人。此外,弗洛伊德赋予文学和艺术新的主题和题材。一度受到禁锢的、惊世骇俗的话题,例如乱伦、同性恋、幼儿性欲以及各种“变态行径”,被公之于众,这不仅仅是弗洛伊德一个人努力的结果。维也纳医师理查·克拉夫特-埃宾在1886年出版了《性心理变态》一书,引起了广泛讨论,就在这一年,弗洛伊德开始他的精神分析业务。(另一位性学先驱是英国人哈夫洛克·葛里斯。)但是弗洛伊德把性冲动的这些反常表现与灵魂内部本能欲望和社会禁忌之间冲突的生动画面联系起来。自我被本我和超我互相对立的要求撕裂,成为二者交锋的场所。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悲剧,剧作家和小说家很快就学会了怎样去利用它。

在1914年以前,精神分析还是默默无闻,到了20年代,它就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后面还会探讨这方面的情况。不过,弗洛伊德一生中最有创造性的时期是20世纪前十年。他最有分量的著作《释梦》出版于1900年。这是在他刚过40岁、经历一场中年危机后进行自我分析的产物。这本书开篇讲的是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以前断定,引起神经官能症的压抑通常与性有关,现在他把创伤性的性体验定位在童年时代。他最初假设的是

---

〔1〕 另见罗斯玛丽·萨姆纳:《托马斯·哈代:擅长心理分析的小说家》(麦克米兰,1981年),以及埃克伯特·法斯:《退回精神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与精神病学的兴起》(1989年)。小说家司汤达似乎也预示了深层心理学的出现。——原注



儿童受到了大人的性骚扰或诱奸；但不久他开始相信，事实上，性欲早就存在。（通过对梦的分析，弗洛伊德声称，他发现自己的在两岁半的时候就对父亲产生了性嫉妒心理。）这是对维多利亚人尤为津津乐道的天真童年神话的一次重创，导致很多人反对弗洛伊德的意见，甚至厌恶弗洛伊德本人。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不顾一切继续拓展他的大胆理论。他的理论已成为精神分析的基石。其内容是，男性幼儿早在两岁的时候就可能对他的母亲产生性依恋心理，对父亲心怀嫉妒，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并发症。（有人可能成为同性恋——弗洛伊德不把同性恋视为“生理变态”，而是视之为能够为人所理解的人格偏差。）

弗洛伊德相信，基本人格特征形成于幼年时期。到了1905年，他又补充了先前未能提到的、性发展初期阶段的细节，他试图把这些细节与成熟时期出现的性格特征联系起来。这些发展阶段是口腔阶段、肛门阶段和生殖器阶段。与此同时，弗洛伊德详细记录了一系列案例，并用自己的理论进行了解释，它们是安娜、朵拉、狼人、小汉斯等人的案例，这些案例注定要给他带来很大的声誉，同时也会引起某些争议。

弗洛伊德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具有挑战性、争议性和独到性。他吸引了一大群出色但其中也有些古怪的门生和同事。他们也喜欢表演俄狄浦斯式戏剧，与自己的精神父亲决裂，自立门户，独扯理论大旗。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某些方面具有专业性科学组织的特征，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它更像一个很容易发生神学纠纷和异端分离的宗教派别。到了1913年，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分裂发生了。弗洛伊德的年轻同事、帮助创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苏黎世人卡尔·容格，与弗洛伊德发生激烈争执，然后离开弗洛伊德，创建自己的精神分析门派。

精神分析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伪科学（正如许多人的说的那样），是一种人本主义宗教，还是一套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有人可能会说，它主要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不仅因为弗洛伊德是很有造诣的文体家，对世界文学明显感兴趣，而且，使他成名的那种治疗方法，就是分析者与病人之间的长时间对话，就是在讲述生活的故事和展开情节。1910年大作曲家和指挥家古斯塔夫·马勒精神混乱，想找他的维也纳同乡弗洛伊德博士面谈。弗洛伊德对他说，实际上，我应当向你请教。马勒的一支交响乐很像弗洛伊德式的分析，乐曲中，困惑不能自己的灵魂回顾了过去，发掘出许多奇怪的记忆，最后成功地进行了心理整合。另有一位维也纳人

亚瑟·施尼茨勒,也是犹太人,同时也是医生。他用戏剧的形式表现他的心理学研究。弗洛伊德本来也会这样做;许多作家在文学创作时也取材于本我—自我—超我的三角关系、俄狄浦斯情结以及弗洛伊德所论述的其他戏剧性心理。弗洛伊德认为自己是科学家,这只是因为他有科学家的气质。

## 第十二章 19 世纪末的社会 和政治思想

### 继续前行的社会主义

虽说马克思的理论深深地影响了社会主义,但并没有垄断社会主义运动。就这个术语(社会主义)最宽泛的意义而言,它指涉的范围很广:从相当保守的右翼势力,其中包括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福利国家的改良者,到 19 世纪 80 年代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极左派。在这两极的中间,还有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赖以生长的土壤,当然就是对现存社会经济秩序的严重失望情绪,而这种秩序被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

马克思的同时代人中有米哈伊尔·巴枯宁。此人是俄国革命家。马克思曾与他多次斗争。巴枯宁的思想一度风行,尤其在俄国;巴枯宁门徒的恐怖主义策略,最终让巴枯宁名声扫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群魔》中精彩地讽刺了他的这些门徒。蒲鲁东在当时法国社会主义中的威信至少与马克思不相上下,但他在很多重要的地方不同于马克思。美国人亨利·乔治的著作《进步与贫困》,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部分地区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成为萧伯纳和威尔斯所在的著名的费边社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费边社成员借用了马克思的许多言辞,却反对他的经济理论,他们致力于建立性质比较折中的渐进式社会主义。诗人和手艺人威廉·莫里斯既是罗斯金的门徒,也是马克思的门徒。他大力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回归中世纪工匠的传统。

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嫡传弟子们也围绕着对马克思本意的理解发生争

执,分裂为左右两派。也许我们可以根据各国的偏好来探讨这种洋洋大观的社会主义局面(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但我们最好按照“从右到左”这个顺序来看待这一局面。1889年,英国贵族哈考特勋爵<sup>〔1〕</sup>宣布:“现在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他的意思是说,除了不干涉联盟的少数狂热分子外,事实上,所有的人都不再教条式地捍卫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所谓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是指,除了强制性维护合同和惩罚犯罪之外,国家不予以任何干预。我们在前面(第九章)曾提到黑格尔派哲学家 T.H. 格林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牛津所发挥的作用:他是这场温和革命的促动者。<sup>〔2〕</sup>“煤气与用水”的社会主义,即公用事业设施的公有制,开始在伯明翰等城市出现,在那里,托利党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指出,现代城市急需建立公共卫生部门。在与之相对的另一政党内部,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探讨一种“新的自由主义”,到了 1910 年,“新自由主义”基本上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新自由主义完全不同于旧自由主义之处在于,它认为贫困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

很难想像还有比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和长期执政者奥托·冯·俾斯麦更保守的人物了,但是,这位铁血宰相却是主张由政府管理并且由政府出一部分钱来资助社会保险(健康、年老、失业)的先驱人物。1890 年新即位的德皇威廉二世,刚刚把俾斯麦免职并撤销了反社会主义法,就呼吁召集一次国际会议来探讨“国际劳动立法”。按照丹尼斯·麦克·史密斯<sup>〔3〕</sup>的说法,从 1900 年到 1914 年几乎一直在担任意大利政府首相的焦利蒂,“研究《资本论》,付诸应用并从中受益”。焦利蒂同意下面这种看法,向工人让步可以防止他们追随那些疯子参与暴力革命。前面我们还提到了,建立在管家制度和团结传统基础上的一种托利社会主义。

在法国,就在德雷福斯事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之后,一些自称激进派或激进社会主义者的民主党派,与社会主义眉来眼去;诸如白里安和克列

---

〔1〕 哈考特勋爵(Lord Harcourt, 1827 - 1904 年),英国律师、报人、政界人物。担任财政大臣时提出对死者的财产征收累进税法案。

〔2〕 迈纳勋爵回忆说,“(19 世纪 70 年代初)我到牛津的时候,自由放任理论还在坚守阵地……但是,10 年之内,极少数墨守成规、持守旧说的人开始被当做古董冬烘。”

〔3〕 丹尼斯·麦克·史密斯(Denis Mack Smith),剑桥大学教授,意大利史专家。

孟梭<sup>〔1〕</sup>等国务活动家为了保护小产业的利益,准备向大产业征税,福利支出的预算直线上升。政治家兼知识分子布尔茹瓦<sup>〔2〕</sup>的《团结》发现,自然界的情况与社会一样,更多的是合作和相互依存,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与此同时,这些资产阶级激进派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行为毫不同情,他们动用军队镇压罢工。



夏尔·贝玑

1891 年新即位的罗马天主教教皇利奥十三世颁布著名的教皇通谕《新事物》(论劳工状况),攻击资本主义的贪婪和物质主义。这个对新的社会道德的呼唤引起了广泛讨论,激发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复兴。在 19 世纪 90 年代,基督教社会党在奥地利和德国出现。社会基督教思想绝不是新事物;法国的阿尔伯特·德·曼恩和拉图尔·杜宾<sup>〔3〕</sup>追随拉梅内(见第八章),对中世纪的统合主义经济学产生了兴趣。美因茨的传教士 W.E.凯特勒<sup>〔4〕</sup>

〔1〕 白里安(Arisitide Briand, 1862 - 1832 年),法国政治家,当过 11 次法国总理。克列孟梭(George Clemenceau, 1841 - 1929 年),法国政治家,一战期间出任总理,战后被授予“胜利之父”称号。

〔2〕 布尔茹瓦(Leon Bourgeois, 1851 - 1925 年),法国政治家,国际联盟的倡导者。

〔3〕 阿尔伯特·德·曼恩(Albert de Mun, 1841 - 1914 年),法国基督教社会党领袖。

拉图尔·杜宾(La Tour du Pin, 1834 - 1924 年),法国贵族,帮助曼恩创建法国基督教社会党。

〔4〕 W.E.凯特勒(Wilhelm Emmanuel von Ketteler, 1811 - 1877 年),德国美因茨主教,社会改革家。

试图让工人阶级得到德国政治领导人的关注。这些人在政治上都是保守派；他们希望转变上层阶级的思想而不是希望下层阶级去革命。但是，他们反对现代资本主义，主张从根本上重新组织经济生活以适应基督教原则。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开始出现天主教工会，个别资本家（如列昂·霍梅尔）开始尝试着开办“基督教工厂”。

像法国的夏尔·贝玑这么重要的先锋派作家，要是有人给他的社会思想进行分类，他很可能被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末，英国也经历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重要复兴。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著名文人G.K.切斯特顿与他的朋友、流行诗人希莱尔·贝洛克自成一派，显得十分活跃，两个人都是天主教徒，传统上有教皇至上主义者之嫌，他们鼓吹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或基督教无政府主义，他们的机智和学问赢得了一批读者。切斯特顿是萧伯纳的朋友和辩论同伴，是爱德华七世时代头脑最机敏的人物之一，他为爱德华七世时代讽刺风格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也为侦探小说的兴起做出了贡献。但是贝洛克的《奴隶的国家》表明了这些“分配主义者”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敌视态度；他们的理想既不是产业的国有化，也不是福利国家，而是把财产广泛分配给小生产者。

## 费边社会主义

我们应当把费边社看做社会主义的中间派。费边社的言辞并不温和。费边社脱胎于刚有雏形的所谓新生活协会。这个协会的创始人是一位杰出的苏格兰人，名字叫托马斯·戴维森。当时他们正在寻求一种新的信仰。1884年费边社与戴维森集团分道扬镳；转过年，萧伯纳加入费边社。费边社成员认识到，边际效用革命已经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声誉扫地，因此，他们马上断定“抽象的经济学”没有太多的价值。为了寻求一种更注重经验的经济学，他们利用了费边社创始人比阿特丽斯·波特·韦布的导师查尔斯·布思<sup>〔1〕</sup>的思想，布思著有一部极为详尽的、开拓性的著作《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9卷，1892—1897年）。布思写道：“无论是正统的经济学还是非正统的经济学，它们的先验推理都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由于受到德国历史学派（古斯塔夫·施莫勒和阿道夫·瓦格纳）的影响，布

---

〔1〕 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 1840 - 1916年),英国轮船主、社会学家。

思将费边社成员引向一种注重事实和描述的经济学。

韦布夫妇(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的主要作品都是大部头的历史著作,研究的对象是地方政府、工会和贫民救济。他们相信,应当借助确凿有据的文献来解决问题。但是,费边社撰写的许多尖锐批评资产阶级社会的小册子,却主要以辞气争胜,而不是以罗列史实见长。事实上,费边社成员的见解并不一致;他们是一群易于负气使性的文人,改变不了相互吵闹的积习。但勤奋而干练的韦布夫妇,才华横溢的萧伯纳,再加上经常来助威的 H.G. 威尔斯,以及其他大显身手的著名学者,使这个圈子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费边社成员深信,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更高级的形式,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下一个阶梯。C.E.M. 乔德在 1951 年写的回忆录中流露出他们的使命感:

1914 年以前,英国在社会和经济上明显存在不平等现象,多数人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少数人穷奢极侈、摆阔斗富,令人愤慨。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会消除贫困和苦难,整治不平等现象。这便是费边社会主义最初时期的情况。我们的队伍以萧伯纳、韦布和威尔斯为先锋,阔步行进,势不可当——步调轻微有些不一致——直奔生产工具、分配和交换实行国有制的希望之乡,我们相信这个希望之乡近在咫尺。

在早期阶段,费边社成员没有太多的学究气,因而能够向工人阶级听众大声宣扬他们的主张。1887 年 11 月 13 日,萧伯纳、威廉·莫里斯、安妮·贝赞特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游行,遭到了警察的粗暴对待。此后,他们选择了通过议会来实现渐进式变革的道路。他们的任务是向政客们全面提供工人生活中的事实,迫使他们承认社会立法的必要。他们运用这一原则最成功的一次,也许就是韦布夫妇针对官方对济贫法所做的一次全面调查而于 1909 年提交的少数派报告。这份报告通常被认为是新的经济福利哲学最重要的表达。报告认为,防止贫困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个体的责任。

在韦布提交报告两年之后,自由党政府促使《国民保险法案》通过。一家主要报纸称其为英国“有史以来所尝试的最伟大的社会重建计划”。它以德国制度为蓝本,允许政府管理和分配一笔资金作为失业保险金。为了

支付这笔资金以及不断上涨的其他政府开销,就在这一年,议会同意征收所得税,二百年来这在国会里还是头一次。反对派宣布,这项税收与个体的基本权利是对立的,是名副其实的社会革命的第一幕。有些人把它与当年查理一世非法征税相提并论。但是,费边社非常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一种“集体主义”,他们说,这种集体主义是拥有大产业以及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然结果。

在这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与务实的、倾向工联主义的产业工人之间,存在一种心理鸿沟。可以想像,威廉·莫里斯邀请工人们到他那典雅的家中探讨劳动美学,他们的神色是多么局促不安。乔治·奥威尔写道,社会主义一直是知识分子的而不是工人的思想信条。费边社成员是知识精英;比阿特丽斯曾说过,每当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就去想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里面最聪明的阶级中最聪明的人。法国以及英国的工会领袖,往往鄙视那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说他们喜欢理论争论胜过喜欢“劳工运动的实际工作”。然而,从1871到1906年,费边社的确出了很大的力,帮助工会得到法律承认和获得罢工的权利,其中包括财产损害诉讼的豁免权。他们带着复杂的心情观察劳工组织的迅猛发展。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谴责工联主义者只想替工人多争取一点报酬,而不想“改变整个制度”。列宁宣布,工联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法国的“工团主义者”则梦想通过一场总罢工来完成革命,他们认为,不断涌现的工会组织是“构成未来社会基础的单位”。但是,工团主义主要理论家乔治·索雷尔,后来却不再相信工会是社会革新的力量。不管怎么说,工会的出现实际上与社会主义思想家无关,而且工会产生了自己的领导人,产生了特定的文化——这种文化主要以酒吧、音乐厅和足球赛为标志,而不是以政治集会和革命为标志<sup>〔1〕</sup>——它们单独形成了一股力量,它们只是偶尔与社会主义政党合作。

一些工团主义理论宣扬彻底脱离政治。讲求实际的工联主义者在争

---

〔1〕 莉莲·路易·希曼在评论克里斯·瓦特斯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和流行文化政治,1884-1914年》(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年)时写道:“尽管社会主义者千方百计加以引导……但大部分英国工人最喜欢的,还是到酒馆里推杯换盏和兴致勃勃地观看足球赛,而不是参加合唱团和文化补习班。”音乐厅最早出现在19世纪50年代;到了1900年,伦敦已经有50多家音乐厅,“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到那里去消遣和娱乐。——原注



取某些政党的支持时,往往不顾及这些政党的立场。在英国,议会里的工党诞生于 1900 年,它的成立受到 H. M. 海德曼的非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和费边社的一些影响,但是它在下院中的席位不到百分之十,而且,它直到 1918 年才采取社会主义纲领。而工人组织一般更喜欢与老牌政党、尤其是自由党打交道,无声无息地向它灌输工会的现实目标。这正是费边社的办法。

费边社认为,社会主义是未来的潮流。但它是逐渐到来的,每天接近一点,而不是通过一场大革命一蹴而就。议会民主制和其他自治机制将确保它被和平采纳。费边社极力强调地方政府的作用;与通常的说法相反,此时(1914 年前)他们并没有提出全部工业的国产化,而是希望郡和区新成立的政务委员会能够拥有和经营大部分工业。他们的确把公有制当做万应灵药。他们以为,从经济活动中排除地主和资本家,就能增加工人的分量并带来物质繁荣。在这方面,他们经常是很天真的。

##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

德国的情况很不相同。在那里,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成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初是通过挫败俾斯麦消灭他们的企图而赢得了威望。这位诡计多端的首相建立了欧洲最早的、由国家管理的社会福利制度,试图减轻贫困和分化工人,同时,他在 19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宣布社会主义者是非法的。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从这场迫害中生存下来,培养了能干的领导人,在 1890 年取得合法地位之后(除了很短的一段时期外)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它也是第二国际的主导力量。第二国际这个世界性组织多次召开激动人心的国际代表大会,每年五一都组织盛大的游行。到了 1914 年,它的成员有一千二百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毁掉了它。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与工会建立密切的联系。他们接受了以和平民主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这个立场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赞同。<sup>〔1〕</sup>恩格斯一直活到 19 世纪 90 年代(马克思已于 1883 年去世)。在第二国际的会议上,他们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激进主义。他们依据马克思

---

〔1〕“由少数人引导无意识的群众进行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恩格斯在这一点最有名的论断。——原注

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理论,鼓吹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与费边社不同,他们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是一步一步来临的,他们在等待资本主义制度一下子崩溃的伟大日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拒绝在政府中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

他们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群众组织,出版自己的报纸和杂志。其领导人是一些受过教育的很有才干的德国人,即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爱德华·伯恩斯坦和卡尔·考茨基。这些人都认识马克思,可以说,是马克思指定的接班人,尽管马克思很少与其中任何人意见一致。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适合德国人对节日的喜好,还发展了一种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文化,以歌曲、游行、野餐为内容。与法国和英国的工会活动家不同,德国工会活动家把社会民主党人当做他们的政治援手。

很难否认,正是马克思本人给他们留下了理论争论,使他们的会议气氛十分活跃。“改良还是革命?”是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争论。在19世纪90年代末,马克思的老朋友爱德华·伯恩斯坦选择了前者,其方式似乎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的思想,从而引发了一场风暴。伯恩斯坦相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衰落、无产阶级苦难加重的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中产阶级没有消失,而是在增加;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而不是更糟;阶级斗争有所缓和而不是越来越尖锐。伯恩斯坦的结论使他的立场接近于英国费边社。他声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里,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在逐步让位于民主组织。”

既然有了政治民主,就有可能通过投票而不是街垒战来建立社会主义,这不是伯恩斯坦的思想要点,尽管他对此深信不移,就像其他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那样。不过,大多数人依然相信,这场胜利会突然来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法兼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保持无产阶级精神直到胜利的那一天。陷入妥协政治之中将会削弱阶级意识。社会民主党拒绝接受伯恩斯坦的渐进思想和阶级合作主张;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差点把他开除出党。然而他们依然相信,通过法律、民主、议会手段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

法国社会党也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他们因派系纷争而分崩离析。在20世纪头10年中,他们设法形成统一的局面,但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1899年,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同意在左翼共和派领导的政府中任职,法国社会党人就这一举动展开了严肃的争论。两位杰出的社会党领导人让·饶

勒斯和儒勒·盖德展开了交锋。饶勒斯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费边社一样,他认为,以这种方式渗透到资产阶级阵地是件好事,因为资本主义政权将会一点点垮掉;可是,如果不去占领它的前哨阵地的话,它又怎么能够垮掉呢?但是盖德通过滔滔不绝地阐述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勉强占了上风。(盖德的一位主要助手是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与德国反对伯恩斯坦的那些人一样,他强调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团结,强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水火不容。与德国的同道一样,在1914年之前,法国的社会主义团体拒绝就任政府中的部长职位——它本来是可以借此来分享政府权力的。不过,左翼和右翼的冲突继续存在。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力量要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弱,虽说比英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强;1914年,该党在国民议会中赢得六分之一左右的席位。

他们还缺少团结,党内存在强大的非马克思主义传统。如果说盖德,这位“戴着长柄眼镜的托尔克马达<sup>[1]</sup>”,是一位刻板的马克思主义论辩家,那么大学者和批评家饶勒斯则是一位文明的人文主义者,他的许多思想不是来自马克思,而是另有所宗。列昂·布鲁姆<sup>[2]</sup>后来写道,在饶勒斯看来,社会主义是“顶峰,汇合点,人类自文明以来创造的一切成果的遗产”。还有一些法国社会党人继承了蒲鲁东“互助论”的衣钵,怀疑国家,倾向于地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强烈推崇个体的自由。<sup>[3]</sup>蒲鲁东的追随者让·夏尔-布伦<sup>[4]</sup>毕生为地方分权主义而奋斗,他反对各种形式的中央集权;治疗社会痼疾的办法是让人们扎根于具体的、生活群体中。这与马克思主义主张中央集权的倾向正好相反。

意大利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改良主义者、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1] 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1420 - 1498年),西班牙第一任宗教总裁判官。

[2] 列昂·布鲁姆(Leon Blum,1872 - 1950年),法国的第一个社会党总理(1936年)。

[3] 蒲鲁东摇动他那生花的妙笔写道:“被统治就是接受那帮子既没有权利也没有德性这样做的家伙们的规训、检查、监视、指挥、法律支配、控制、囚禁、教导、宣传、灌输,在他们那里挂号登记,接受他们的评估、鉴定、审查、命令……(统治者)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去征用、训练、敲诈、剥削、垄断、勒索、压榨、哄骗、抢劫(被统治者)……(被统治者)稍有反抗,便遭到镇压、纠正、诋毁、威吓、迫害、折磨、缴械、扼杀、监禁、枪杀、审判、判刑、驱逐出境、用作牺牲品、出卖、背叛……”——原注

[4] 让·夏尔-布伦(Jean Charles - Brun,1870 - 1946年),法国教师,新闻记者。

例如菲利普·屠拉蒂<sup>〔1〕</sup>,认为民主制的发展已经使革命成为时尚的手段。但是左派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是危险的异端。意大利出现了围绕马克思主义的热烈探讨。大哲学家本尼狄托·克罗齐曾对马克思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最后认为马克思过于教条而予以拒斥。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sup>〔2〕</sup>教授辨析了唯物史观,与艾基立·劳里亚粗糙的实证主义决定论展开交锋。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拉布里奥拉的著作过于深奥。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争论经历了相似的转向。经过著名的G.V.普列汉诺夫的介绍,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俄国。普列汉诺夫,这位自学成才的人,像许多有政治意识的俄国人一样,流亡国外,在瑞士生活和从事著述多年。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革命者在政治上主要信仰民粹主义,其思想基础是确信俄国村社制度具有独特性。早期俄国社会主义的“三巨头”是信奉黑格尔主义的别林斯基,马克思的无政府主义对手巴枯宁,还有亚历山大·赫尔岑。赫尔岑是很有影响的作家,参加过1848年巴黎的六月革命,革命失败令他极度失望。借助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些俄国社会主义先驱在俄国村社中发现了蒲鲁东互助论的“自然基础”。虽然巴枯宁和赫尔岑后来的声望有所下跌,但是他们对民粹主义运动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社会革命党就是民粹主义运动衍生出来的。

在19世纪60年代沙皇政府镇压了村社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们不是暴力团体。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皮萨列夫<sup>〔3〕</sup>入狱,1868年莫斯科大学关门。结果在70年代产生了青年理想主义者“到民间去”的朝圣运动。这次运动使他们幻想破灭,并导致几百人被捕。在这次与农民接触的尝试失败之后(农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中),知识青年中间由于绝望而出现了一波革命恐怖主义。这又是一条死胡同。民粹主义演变成暴力,在1881年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中达到高潮。在反对民粹主义狂热行为的过程中,冷静而注重分析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欢迎。在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产生的后果是,使人们从撰写非法的革命小册子转向系统地研究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某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甚至可

---

〔1〕 菲利普·屠拉蒂(Filippo Turati,1857 - 1932年),意大利社会党创始人之一。

〔2〕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1843 - 1904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

〔3〕 皮萨列夫(Dmitrii Pisarev,1840 - 1868年),俄国讽刺文学家。

以合法存在,这是对它温和外表的一种不寻常的赞赏。青年列宁能够出版一部论经济发展原理的著作。有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赞同资本主义制度比落后的俄国进步这种说法。马克思主义这件武器既可以用来打击农业民粹主义,又可以用来打击革命恐怖主义。

普列汉诺夫本人是一位很有教养的、甚至对审美趣味要求很高的知识分子。他主张等待民主革命的到来,理由是俄国只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才会发生民主革命。但是那些更具有行动气质的人却不大愿意等待。1903年,列宁提出建立职业革命家的精英团体,训练他们去夺取政权。对于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普列汉诺夫来说,这是异端;俄国社会民主党大部分成员都赞同普列汉诺夫。事实上,在大多数时候,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集团是少数派,而孟什维克派在人数和名声上都大得多。(二者加在一起在俄国依然是少数派。)1917年,胜利和名声出人意外地降临列宁的头上;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他远离马克思主义正统,而且他大部分时间侨居瑞士,因此他在社会主义谱系中很孤立地偏居极左翼(另外参见第十三章)。

我们总结一下马克思主义论争: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风行一时(但是英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成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正统指导思想;这些政党在1914年前夕有了良好的组织,拥护者不断增多。但是在这些政党内部,围绕着下述问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民主政治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那么在民主政治和工联主义的时代,阶级斗争、革命和一举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是否已成为过时的方案?通常给出的答案是,既不放弃马克思主义转而去采纳费边社的渐进主义和机会主义(如伯恩斯坦所提出的),但也不强调通过非法或密谋手段进行暴力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只有少数俄国人主张暴力革命)。

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坚信,一场启示录式的革命将会改变整个制度,但他们认为,只要他们的政党在选举中赢得大多数,这场革命就会和平地到来——是理论,而不是经验告诉他们,这里有某种必然性;同时他们也拒绝与非社会主义者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执政。因为这种妥协很不稳定,会引发一定程度的内部冲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之间,也就是说,在法国的阿拉伯特·托马斯和儒尔·盖德之间,在德国的爱德华·伯恩斯坦和罗莎·卢森堡之间,在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之间,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个人气质,都有很大差异。这种矛盾状态可追溯到马克思主义

学说内部未能解决的两难之境,尤其是唯意志论与决定论之间、精英主义与民主之间、革命与进化之间的两难之境。一方面是对他们的呼唤,要求他们代表被压迫者去行动,另一方面是一种信念,即相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已经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做好了准备。后者似乎更科学、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却会导致一种消极态度,也就是列宁所嘲笑的“挽歌式社会主义”,只满足于消极等待。

## 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算作社会主义者,这是一个概念辨析问题。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裂痕很深;让无政府主义者不能容忍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采取政治行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还想继续使用国家政权来进行革命。因为,虽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希望,革命之后国家将逐渐“消亡”(恩格斯的话),但是他们主张,在革命和共产主义最终实现之间的过渡时期,应夺取和利用国家政权,在此期间,“无产阶级专政”可能是必要的。无政府主义者相当准确地做出预言:马克思主义者在利用国家的时候,必然受它的腐蚀。根据无政府主义观点,革命必须在国家政权之外进行,而且必须立即消灭这个恶魔,用自由公社的联合取代它。

无政府主义在德国的影响很微弱(尽管有时候它也很引人注目;一位德国无政府主义者被怀疑在芝加哥的秣市广场扔炸弹,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无政府工团主义”,或者说通过工会而采取直接行动的主张,在法国比较有势力,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比较有势力,或许这与国民气质有关。无政府主义者很可能是喜爱和平的,是中央集权制的敌人,是自由和合作的朋友。可是,在19世纪80年代、90年代,人们更熟悉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者采用暗杀或其他暴力行动。他们根本不相信通过选举和议会所采取的政治行动会有什么价值。



芝加哥秣市广场骚乱

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那位大师那里学到的是,经济决定一切,代议制立法机构是虚伪的,资本主义掌握并将继续掌握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将它粉碎为止。革命胜利之后,不再有议会或国家;纯粹自由的无阶级社会将出现——政府根本不存在。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唯意志论方向上走得很远,超出了党的正统思想的藩篱。他们强调个体通过行动改变自身处境的自由;没有什么东西是预先决定的。他们甚至可能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神话,一个宗教,根本不是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是知识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内部,持有这种观点的典型人物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以及后来的比利时人亨利·德曼<sup>〔1〕</sup>。最典型的人物是下文探讨的乔治·索雷尔。

无政府主义种类繁多,不一而足。事实上,就其本质而言,这些个人主义的激进分子不可能持有一种共同的信念。其中相当多的人试图通过劝戒,或更恰当地说,通过行动来煽动革命。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在 19 世纪 90 年代掀起一波暗杀浪潮,不仅让资产阶级而且也让社会民主党人感到震惊,社会民主党人也愤怒地谴责他们。从 1880 年到 1901 年,恐怖主义分子暗杀了俄国沙皇、美国总统、奥地利王后、意大利国王和法国总统;在 20 世纪前 10 年,他们的暗杀行动继续进行,被杀的人当中有开明的俄国首相斯托雷平。1914 年 7 月 4 日,一枚原本用于刺杀约翰·D 洛克菲勒的炸弹在纽约爆炸,三名无政府主义者身亡。就在一个月前,年轻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和他的波斯尼亚战友(把他们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可能更合适),刺杀了奥地利王储,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恐怖对象不限于大人物。曾用炸弹袭击下议院的著名法国恐怖分子拉瓦科尔,搞过好几次没有政治动机的谋杀。1894 年,22 岁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爱弥尔·亨利,在巴黎火车站咖啡馆里扔了一颗炸弹,造成二人死亡,二十人受伤,而这些人都是工人、小商店主和公务员,没有一个显赫的政治人物。在法庭上,他被指责滥杀无辜,可他却满不在乎地回答,“每个

---

〔1〕 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Arturo Labriola),意大利工团主义者。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弟弟。他创办的《社会主义先锋队》周刊是意大利工团主义运动的中心。亨利·德曼(Henri de Man,1885 - 1953 年),比利时劳工党领袖。

人都有罪！”1881年，另一位法国好斗分子前去刺杀政治领袖列昂·甘必大<sup>〔1〕</sup>，由于没有找到甘必大本人，他就开枪杀死了他遇到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权当替死鬼。这些人笃信“用行动去宣传”。他们只想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渲染他们认为被当局袒护的可怕的不公正现象。

把无政府主义完全等同于这些骚乱分子是错误的。托尔斯泰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是主张非暴力的。他很清楚，消灭国家需要很长一段时期，因为这需要人性发生基本的变化；“从国家暴力过渡到自由、合理的生活，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家是用了几千年时间才定型的，所以它还得用几千年时间才能解体。”以暴易暴只会延长这个周期。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哲学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俄国人。他就是克鲁泡特金亲王。

在世纪之交，麦克斯·施蒂纳<sup>〔2〕</sup>的一本书很是流行，译成英文后的书名是《自我及其所有物》。施蒂纳曾是马克思所在的柏林博士俱乐部成员，后来马克思把他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放在一起加以嘲笑。施蒂纳一直想把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个体化。费尔巴哈将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变成整个人类，马克思将它变成无产阶级；施蒂纳则在个人那里为它找到了归宿。所有范畴都出自于我的心灵；惟一的最高现实就是具体的人。惟一重要的东西即是个体的自由。人们创造他们自身的现实并应当有他们自身的道德观。这种无政府主义与正在发生的性革命密切相关，它试图从社会道德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这场颠覆维多利亚时代道德的反叛。尼采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变成我们自己”，这是世纪末这种解放情绪的一部分。惟一值得先锋派艺术家注意的政治信条就是无政府主义。

乔治·索雷尔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主要政治思想家之一，通常被认为与社会党人饶勒斯、右翼政论家夏尔·莫拉斯三足鼎立。把他算做无政府主义者，是把一个复杂的思想家过于简单化了。但是，痛恨国家和一切权威，这倒非常接近索雷尔的主要气质。在他许多相互矛盾的政治思想中，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敌视“中央集权的雅各宾国家”以及（索雷尔这位知识界局外人所说的）国家在大学中的思想领导权。他从未加入政党组

〔1〕 列昂·甘必大(Leon Gambetta, 1838 - 1882年), 法国共和派政治家。

〔2〕 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 1806 - 1856年), 德国哲学家。



织;他希望教育摆脱国家的控制。一切官僚的、有组织的、接受指挥而不是自主发生的事物,都在索雷尔鄙视之列。

这位牛虻式的人物,毕生都在逆潮流而动。他是一位很有影响力并且非常有原创性的思想家。最初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逐渐感觉到正统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官僚化,变成了体面人。(索雷尔与马克思本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他与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门徒的机械教条之间的距离那么远;他很清楚,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要精妙细致得多。)他们的唯科学主义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启示录式的宗教。每人都靠神话活着,现代欧洲需要的就是一种有活力的神话。索雷尔在说到“革命的神话”或者说到总罢工的时候,总是带着赞同的口吻;这些信念可与早期基督徒的信念相提并论。柏格森和尼采的许多非理性主义思想也渗入索雷尔的思想中,虽然看起来与其说是一种直接影响,还不如说是思想的平行发展。事实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 18 世纪意大利的维柯,他推动了维柯思想的复兴。詹姆斯·乔伊斯在维柯复兴中撷取灵感,而且把维柯所说的历史时代的循环起伏编织进他的长篇小说。当一个社会被过多的文明和民主消耗殆尽,必然会出现一个野蛮的时代来更新它的活力。索雷尔之所以笃信“神话”和保持本色的无产阶级,乃是因为需要从根本上进行道德和文化更新。“民众的灵魂必须回到原始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一切都是本能的、创造性的和诗意的。”

这个目标如何达到,还不太清楚,也许像乔伊斯所想像的,可以通过全面更新语言来做到。索雷尔提出了革命精英的观念,主张以一种新神话或新宗教的名义猛烈地扫荡资产阶级文明。“索雷尔主义”将挺进意大利,融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索雷尔一直活到向那位意大利领袖热情欢呼,但他也热情颂扬列宁——他赞颂一切动摇令人压抑的现状的东西。)在他后期思想中,索雷尔放弃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转而拥护民族主义的神话,因为看起来,后者似乎具有更大的潜力。他对工会的幻想逐渐破灭了,因为工会竟然同商业公司一样,唯利是图和官僚主义严重。到了 1910 年,索雷尔开始接近莫拉斯的“整体民族主义”。索雷尔最初是德雷福斯的捍卫者,但他最终与取得胜利的德雷福斯派分道扬镳。实际上,索雷尔似乎铁了心不同任何人保持一致。他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大转弯”。但是其中始终如一的基调是,从道德角度批评现代文明,即主要依据卢梭

的精神,批评其腐败、浅薄和颓废。

## 民主制

索雷尔的思想在许多年里还是有几点是始终如一的,其中包括他对民主的憎恶。批评民主的人很多,可能还没有谁像他那样对民主深恶痛绝。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他憎恨国家的结果。暴君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这并不重要,暴君就是暴君;那种认为建立在议会基础上的政府所带来的麻烦要少一些的信念,让索雷尔大为震怒。他指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点点暴君的影子和奴隶的气息!”本着同样的精神,赫伯特·斯宾塞宣布,由民众选举所产生的议会,如果威胁到了自由,那么它的神圣权利也与国王的神圣权利一样,应该受到抵制。但是,对索雷尔来说,民主还代表了社会最后的颓废阶段,然后,维希政权这个晴空霹雳标志着社会回归到野蛮状态;民主是价值和社会秩序被毁灭后的残存之物。民主是腐化和堕落的,因为它所对应的社会阶段就是以这些腐化和堕落为标志的。领导与等级制度在未堕落的阶段占上风。

民主制实际上是在19世纪后几十年中形成的,无论就这个词的政治意义还是社会意义而言,都是如此。1867年《伦敦时报》的社论指出:“有人提议,把权力从有钱人和有才智的人手里转移到每天必然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那些人的手里。我认为这个提议是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sup>〔1〕</sup>托马斯·卡莱尔赞同说,扩大选举权,就像“穿越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但是,1867年和1884年,英国一步步地实现所有男性公民的选举权;到了1910年,女性也强烈地要求选举权。1848年之后,法国实际上一直没有废除普选制度,但在第二帝国期间,普选受到操纵,因此失去了主要意义。但是,1874年之后,共和国重新确立了。德意志帝国有一个由普选产生的国会,尽管它缺乏负责的权力。首相俾斯麦认为,“当今时代,由350人组成的议会不可能最终指导一个大国的政策。”也许它不可能,但是,在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中产生一个向它负责的内阁,这样一种政府体制在英国获得成功,而且在法国,它至少勉强维持下来了。

到了19世纪90年代,先前敌视议会制政府的一些左派和右派却‘团结

---

〔1〕 正如狄斯累利在《坦克雷德》中评论的,“我不相信公众会思考。他们怎么可能呢?他们根本没时间。”——原注

起来”支持它。1889 年法国的民主政治受到挫折,几乎再次出现一个军事独裁政权,但这一次,威胁失败了,反民主的冲动基本上被平息下来。按照专门研究法国民主制度的历史学家戴维·汤姆森的说法,在 1871 年到 1876 年这段时期,“法国农民大众的信仰发生了转变,开始信奉民主共和制”。自由主义者的信仰也发生了转变,此前他们一直确信,正如托马斯·马考莱所宣称的,普选权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与文明的存在势同水火”。此时,更为典型的是普雷沃-帕拉多尔<sup>〔1〕</sup>在《新法兰西》中表达的观念,制衡大多数人的意志可以防止滥用普选权,从而导致一种切实可行的“自由共和制”。

所有的政府都必须关注公共舆论。批评家们指出,公共舆论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这取决于公共舆论的开明程度。那些还不相信民主制的人不但抱怨选民无知、感情用事,而且抱怨竞选方法有失尊严,抱怨政治机器和老板们的操纵。他们还抱怨说,根据格雷欣式的政治法则,坏政客一定会挤掉好政客。<sup>〔2〕</sup>但是,只要是明白人,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少数人在政治和社会上的统治依然可行。“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主人”,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许多国家建立起公共教育制度,强制人们送孩子上小学。文盲现象在南欧和东欧依然大量存在,但到了 1900 年它在西欧几乎销声匿迹。廉价的通俗报纸,通常迎合最低的知识水准。它们的兴起,在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些人看来,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在动荡不安的 19 世纪,数以百万计的人离开了传统的农村环境,搬入大城市,大城市突然之间变得拥挤不堪,在这里,一种新的流行文化正在经受临产的剧痛。

民主原则的一位批评家亨利·梅因<sup>〔3〕</sup>也不得不承认:“民主的原则已经发起了攻势,必将所向披靡,反对者势单力孤。”民主原则的胜利得到了“普遍认可”。然而,除了这种“大局已定”的感觉外,在那些很有思想、而且对社会持有批评态度的人中间,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几乎同样强烈的舆论。这些人认为,民主要么是一场失败、一场灾难,要么是一场骗局。对于民主的兴起,知识分子与其说热情赞扬,不如说深表遗憾,或深表忧虑。托克维

---

〔1〕 普雷沃-帕拉多尔(Lucien - Anatole Prevost - Paradol, 1829 - 1870 年),法国文人。1868 年发表《新法兰西》,攻击拿破仑三世的统治是“民主专制”。

〔2〕 格雷欣法则,也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指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金属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必被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排挤掉。

〔3〕 亨利·梅因(Henry Sumner Maine, 1822 - 1888 年),英国法律史专家。

尔和穆勒都不相信民主,因为他们担心智力和素质的降低。(穆勒为民主所做的最有力的论证是,它可能成为一个逐渐提高大众水准的教育过程。但是到了19世纪末,这种情况也还很难看到。)

马修·阿诺德在1861年初版、1979年重新发行的《民主》一文中写道:“我们社会可能注定变得更加民主;那么将由什么人或什么东西给这个国家带来高雅的格调呢?这可是严重的问题。”一个社会拥有真正的价值,不仅是因为大部分人积极活跃而且有自由;它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生产了素质高的人。1865年后,美国哲人、民主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也以类似的文雅语调说话。素质和“高雅格调”的问题,贯穿所有抨击大众文化所体现的民主的言论中。在19世纪这类抨击随处可见。马克思的朋友布鲁诺·鲍威尔曾认为:“大众是精神的敌人。”在易卜生的话剧《人民公敌》中,斯托克曼医生宣布:“少数派总是正确的。”

19世纪80年代,法国作家爱德蒙·谢勒<sup>[1]</sup>大声疾呼:“经过这场危机,人类能否保留住天才、美、高贵品质,还是一个疑问。在这场平庸化的悲剧中,在这场各民族的阴沉、可怕的经历中,是否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从历史消失,这还是一个问題。”文学、艺术甚至哲学都选择了挑衅性的、反社会的道路,这是对19世纪兴起的、公然炫耀民主的都市文化的反应。伯特兰·罗素,虽说他主要思想倾向是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可是,在1920年他却惊叹:“像这样尊重龌龊不堪的大众就是在毁灭文明!”事实上,导致这种敌视态度的因素,不仅是有教养的少数人的精英意识,而且还有阅读通俗小报、受标语口号影响的大众的“愚蠢行径”。欧洲文化漫长的传统创造出一整套极为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表现方式;现在它被组织起来,通过让人消费得起的书籍、期刊、博物馆、音乐厅,供人们利用,而这些消费手段却是知识分子佯作不屑一顾的都市—技术社会的组成部分。先前有许多人被挡在这个高雅文化圈子之外,现在他们可以步入其中。正如D.H.劳伦斯所言,这个“欧洲的文明意识”形成了另一个天地,那些能够登堂入室的人在这里满心喜悦。但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它与生产者 and 消费者、购买者和销售者、工程师和工人、酒吧老板和政客所组成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些现实的人来说,正如叶芝所写的,“我们和所有的缪斯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

知识分子的兴起,以及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交锋,这些内容充斥现代时期。在19世纪末,这种对抗达到了顶峰,或许是因为这两种现象刚刚

[1] 爱德蒙·谢勒(Edmond Scherer, 1815 - 1889年),法国神学家、文学批评家。

兴起的缘故。莱昂内尔·特里林<sup>[1]</sup>在《自由的想像》中说,支配欧洲文学的“那些人,据我们所知,对待民主自由主义的传统是漠然的,甚至是敌视的”。正是现代世界的不寻常的矛盾、它的极端的“两面性”,这种动荡的活力,同时造就了无文化的大众和愤世嫉俗的艺术家-知识分子。

“但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痛恨乌合之众!”沃尔特·萨维奇·兰多<sup>[2]</sup>的信条几乎成为 19 世纪晚期所有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乔治·吉辛<sup>[3]</sup>在世纪末写道:“我身上的所有本能都是反民主的,我简直不敢去想,当群众绝对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英国会是什么样子。”他注意到,这不是一个阶级问题;无论上层阶级还是下层阶级,当他们聚在一起时,都是“吵吵嚷嚷的怪物”。这群“吵吵嚷嚷”的大众,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喧闹的侏儒,是思想贫瘠、目光短浅的文化所造就的只会看报纸的“报废的人”。他们让十分敏感的少数人感到恼火,后者认为自己的智识使自己有别于大众。这少数人虽然具有共同的感受,但他们可能来自任何阶级。吉辛就是一个典型的落魄文人,在“波希米亚区”或“格拉布街”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遇到民主文化时发出“恐怖惊叫”的文明少数派,不完全是愤世嫉俗的艺术家。科学家有时候也写下他们对大众心性的不信任。这是为理智制定的又一个极高的目标,它要求最高超的才智。维多利亚时代的法制史学家亨利·梅因,在他那本 1885 年出版的、经常为人所引用的《大众政府》中宣称,普选“可能会禁止詹妮纺织机和动力织布机,以及脱谷机的使用”,普选可能保留格里高利历法和禁止牛痘接种法,实际上,普选会阻碍科学进步。H.G. 威尔斯,这位科幻小说家预言说,未来社会是根据科学有效组织起来的,他相信“民主因其内在的矛盾,必然会成为明日黄花”。他认为,民主的主要矛盾是,民主依据的不是“理智判断的过程”,而是非常无知又反复无常的公众舆论。关于科学真理(诸如达尔文主义)和民主价值之间的冲突,当时有许多讨论。尽管有一些人认为科学本质上是民主的(甘必大宣称:“蒸汽机站在共和派一边。”),但也出现了相反看法。在 1904 年出版的《科学面前的民主》一书中,法国社会学家 C. 布格莱引用了 T.H.

---

[1] 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 - 1975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2] 沃尔特·萨维奇·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 - 1864 年),英国诗人,散文作家。

[3] 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 1857 - 1903 年),英国小说家。

赫胥黎的观点,认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的说法是荒谬的。他指出,民主制的敌人,如夏尔·莫拉斯和保罗·布尔热<sup>〔1〕</sup>称得上科学精神的真正传人。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社会主义者对民主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中许多人鄙视“资产阶级民主”,说它是骗局,是为了将工人的注意力从他们真正的目标——社会革命——转移开来而精心策划的诡计。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有意或无意地与资产阶级剥削策略联系在一起。如果工人阶级的确获得了多数选票,试图改变社会制度,这个骗局就会露出真面目。在任何情况下,真正的决定都不是律师和演说家作出的;恩格斯称他们是“议会呆子”。民主制反映了社会的阶级结构,但无法改变它。不管怎么说,最终目标一定是社会主义;民主只能是手段,也许它还不是最好的手段。

包括列宁在内,许多人都做了类似的思考。但是这些看法不能完全消除人们这样一种感觉,即民主毕竟是一种现实的力量,社会主义者应当利用它。难道它们不是最能代表群众的意愿吗?然而社会主义领导人拒绝参加议会制政府,他们更喜欢等待整个制度最后崩溃——在那之后,一定会出现某种民主,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民主。这表明社会主义者对于以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的形式出现的民主制有很深的怀疑。

不用说,右翼思想包含反民主的因素。诚然,许多保守分子看到,普选并不一定会产生混乱或共产主义,于是他们转而支持民主。法国的工业家和主教共同“支持”他们曾经漫骂过的共和制。以夏尔·勒努维耶<sup>〔2〕</sup>和雅克·普雷沃-帕拉多尔为代表的一派保守主义分子转向了自由主义民主制,因为后者能够取代革命的或“雅各宾”式的民主制。这条思想路线导致了一种明显低调的、赞同民主的理由,即民主不但不是乌托邦,而且正好相反,它是矫正乌托邦的方法。乔治·克列孟梭断定,民主“在各种可怕的邪恶中是最能让人忍受的”。这种关于民主的论述乃是对民主含义的完全颠倒。

法国保守的民族主义者批评议会制民主腐败、软弱、权力分散、制定不

---

〔1〕 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 1852 - 1935年),法国小说家。

〔2〕 夏尔·勒努维耶(Charles - Bernard Renouvier, 1815 - 1903年),法国哲学家。

出有效的政策,是亡国的催化剂。但亚当夫人<sup>〔1〕</sup>创办的《新评论》,爱国的民族主义的喉舌,却偏离了这种判断准则,它认为,在对德战争中,与保皇主义精神相比,共和精神更能增强民族的力量。其观点与英国的本杰明·基德的观点很接近。与此同时,影响甚大的夏尔·莫拉斯发起了“法兰西行动”运动。这场运动可能是 1900 至 1914 年间最活跃的运动,当然吸引了青年学生的注意力。它出版了一份著名的报纸。在莫拉斯不知疲倦的笔下,源源不断地流出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和小册子。这是以秩序的名义对整个自由主义民主精神的反动。它号召恢复君主制,并召唤法国的古典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

莫拉斯继承了孔德对于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憎恨。在他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的主题,即需要有才智的少数派来领导国家。这场运动留给(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法西斯主义的礼物之一是“统合国家”思想。这种思想是从天主教社会运动那里借来的,是回归到中世纪的社会观念,即把社会看做是由各个群体组成的等级体制,而不是平等个人的集合。在 20 世纪头几年,法兰西行动运动强烈敌视共和国,在 1912 年之后,随着战争阴云临近,它倾向于支持共和国,因为它是积极爱国的和强烈反德国的。作为民族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反犹主义者、民主反对者,莫拉斯向自由主义议会制国家开战。他作为一个先驱者,已经隐隐约约地预示了战后的“革命的保守主义”,即后来人所共知的法西斯主义。

古斯塔夫·勒邦也认为民主已经对国家造成了致命的威胁。这位才华横溢的业余心理学家写了一本研究群众心理的名作《乌合之众》(《群众心理学》)。这本书初版于 1895 年,后来不断地再版;它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产生过影响,也影响到阿道夫·希特勒。在《政治心理学》(1912 年)之中,勒邦尖刻地斥责选举产生的代表,这些人受“民众最卑鄙的利益”的支配,只想着重新当选,根本不顾国家的利益,他认为民主使现代国家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权威危机,同时他敦促可敬的中产阶级在社会保卫战中反攻,他也预示了法西斯主义的出现。

最后,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一群才华横溢的社会学理论家当中,有些人认为民主制其实并不民主。自相矛盾的是,它恰恰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精英统治。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在民主制之

---

〔1〕 亚当夫人(Mme Adam, 1836 - 1936 年),法国文人,极端热烈的共和派分子。

内,还是在民主制之外,政治都是少数人的事。”韦伯的朋友罗伯特·米歇尔斯<sup>[1]</sup>布,寡头政治是一条铁律。为了协调选举人和选举过程之间的关系,政党——民主的产物——的存在很必要的;但事实上,随着政党的发展和壮大,它们不可避免地落入少数人的控制之中。选举人越多,政党就越多;寡头政治与民主是同步发展的。这个悖论足以和马克思所谓的发现媲美,即资本主义在制造利润的过程中反而摧毁了私有财产;民主通过开动自身的工具——群众性的政党——反而产生了寡头政治,正是由于群众性政党规模庞大,迫使政党形成一种精英主义的结构。政治首领们所组成的“看不见的政府”控制了美国的政治,许多研究著作都曾指出这一点,例如M.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的著作《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米歇尔斯的著作《寡头政治的铁律》依据的是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意识形态上最民主的政党却逐渐被少数内部成员紧紧控制。

有两位意大利人处在精英主义理论的最前沿。一位是西西里人盖塔诺·莫斯卡,著有名作《统治阶级》(初版于1896年),另一位是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他们已经发现,意大利的现实情况已经贬损了意大利复兴运动(即统一运动)时期人们的高度期待。在谈到意大利政府的一位首脑时,帕累托说他是“统治和掠夺这个国家的那个投机分子集团的首领”。

## 社会学思想的兴起

透过表面上的形式结构和官方宣布的目标,去发现社会机制的真实实践,这种志向是新型社会研究即社会学的一个特点(社会学这个术语,出自奥古斯特·孔德)。这种志向可以和弗洛伊德的观念相提并论。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外表的后面,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可以说,它是幻想破灭的产物;按照历史学家弗里茨·林格<sup>[2]</sup>的说法,社会学是“在悲剧面前一种英雄式的进行理性阐述的理想”。马克斯·韦伯、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思想以及这一代才华横溢的社会理论家中其他人的思想,的确有这种冷冰冰的悲观主义特点。他们步马克思和孔德的后尘,改进和深化了已有的观念,然而他们在行文当中却保留了开阔的视野和生动的力量。他们还没有成

---

[1] 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 1876 - 1936年),德国社会学家,精英理论创始人之一。

[2] 弗里茨·林格(Fritz Ringer, 1934年 - ),德裔美籍学者,欧洲思想史专家。



为目光褊狭的专家。从 1890 年到 1920 年,这段时间的确是社会学的黄金时代。

社会学是清醒者的避难所,这种状况从韦伯的经历中可以看出。韦伯的父亲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一位著名政治家。韦伯本人也很想从政,但是,在海德堡大学读书期间,他受到母亲的思想影响,放弃了这个想法;他厌弃他父亲所在的那个庸俗的圈子。他一度精神崩溃,有好几年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他在摆脱了精神崩溃状态之后,像弗洛伊德一样(大约在同时)成为很有影响的思想家、作家和讲演者。可以理解,“世界除魅”成为韦伯的一个著名主题。刺激社会学发展的主要社会因素,或许是从乡村社会环境到都市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快速变化,在德国,这种变化尤为迅速。但是还有一种促成因素,那就是浪漫主义政治理想失败之后产生的幻灭情绪;这种情绪在德国最强烈。正是在德国,俾斯麦的现实主义外交取得了 1848 年的革命者不能取得的成就。

在 19 世纪 60 年代实现统一之后,德国的社会转型尤为突然。但是,法国小说家莫里斯·巴雷斯所说的“失去根柢”的现象在法国也很明显。离开规模小、联系紧密的乡村社会,走进大城市,必然要经历文化休克。一些重要的社会学家都有过这方面的亲身经历。爱弥尔·涂尔干在巴黎大学(索邦)<sup>〔1〕</sup>读书时感到非常孤独;在他辉煌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论述他所谓的失范,即那些失去了稳定社会规范引导的人们惶惑不安的心理状态。在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社会学的重要先驱弗里德里克·滕尼斯作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区分: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前者指小规模的、有内聚力的、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体,例如长期比邻而居的人群;后者指由现代城市或国家组成的“大社会”,庞大而复杂。在“大社会”里,个体感觉更自由,但也更心神不安。乔治·齐美尔从农村来到城市,也有过文化休克的体验。他写了一篇有名的开拓性文章,论述城市生活对人们心态的影响:“造成现代生活中最深刻的问题的根源是,在势不可挡的社会力量面前,个体还想保留他的生存自主权和个体性。”在城市里,个体有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机会、更强烈的精神刺激,但也面临着丧失社会纽带、无归属感、迷失生活方向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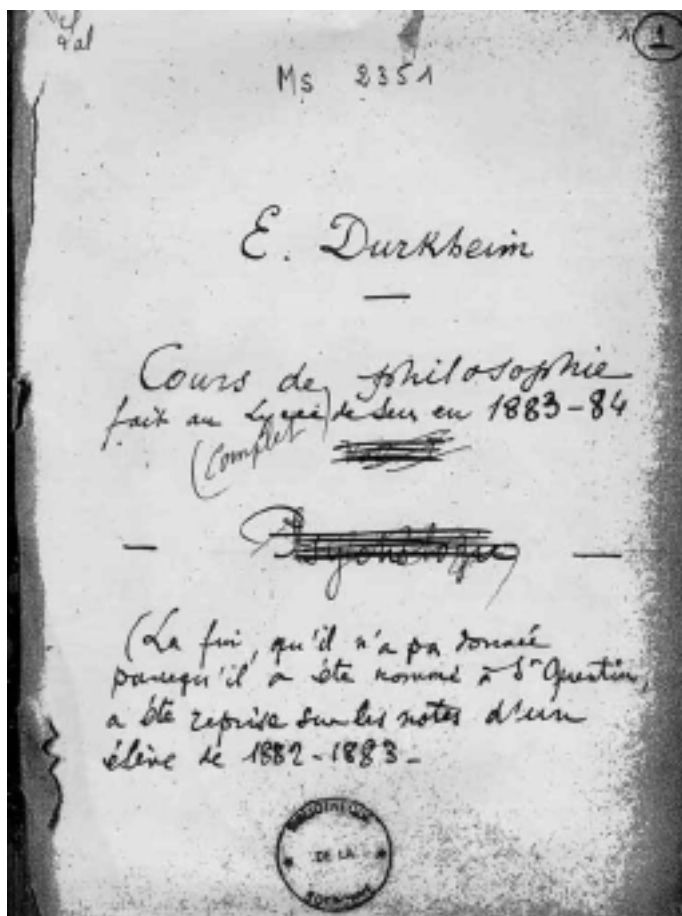
在韦伯、涂尔干和罗伯特·米歇尔斯的笔下(米歇尔斯的确提到“政治社会学”),社会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社会学是对于

---

〔1〕 据其他资料,涂尔干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书。

社会现象所做的科学的或不偏不倚的研究,它可以研究各种各样的事物;在这一时期,社会学家们很愿意于将它引向政治。韦伯研究了政治权威的诸种形式以及西方经济秩序的起源;米歇尔斯考察了政党的结构。费边社会主义者格雷厄姆·华莱斯的《政治中的人性》,是一部另辟蹊径的著作。认为,以往的政治学总是探讨抽象的概念,很少探讨现实的人。华莱斯认为,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就会认识到,那种认为人们按照理性行事的观点是错误的;“大部分人的大部政治观点,并不是出自于经过检验的推理思考,而是出自于用习惯检验的无意识的或半意识的推论。”华莱斯表明,现在之能以出现理性下降的情况,是由于人们背井离乡、“脱离原住地”、被抛进大城市的乌合之众之中。

涂尔干强调现代人丧失了他所说的“社会团结”。他还认为,在人类丢失了原始的团结形式之后,社会学能够帮助现代人找到某种更为高级的团结形式。涂尔干写道:“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的信仰陷入了困境;传统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个体判断从集体判断中解放出来……突然出现的新生活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sup>〔1〕</sup>与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者”<sup>〔2〕</sup>的观点接近,他认为国家的力量可以防止现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分崩离析后果。作为巴黎大学的思想名人,(阿尔萨斯犹太人后代的)涂尔干也是第三共和



涂尔干手迹

〔1〕 从以下事实中可以看出 19 世纪都市化迅速发展之一斑:1801 年,在欧洲都市化程度最高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居住在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的人口不超过 10%,而到了 1901,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 35% 以上,有 58% 的人口居住在 2 万人以上的城市。应当记住,绝对数字可能更大,因为英国的人口在 19 世纪几乎翻了两番。——原注

〔2〕 讲坛社会主义者是 19 世纪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中主张社会改良的一派。在他们的推动下,俾斯麦采取了社会福利措施,以遏制工人政党的影响。

国政府的要员,是高度集权的法国教育体系的行政官员。也许这位社会党人兼社会学家利用民主国家,能够恢复那种已经丧失的团结,从而给个人提供一种指导。像他这样相信官僚可替代教士和族长,可能是把信任放错了地方;涂尔干能够比较有效地诊断现代人的不幸,但在提供药方时则力不从心。

在这些社会学家当中,马克斯·韦伯无疑是最伟大的。这位学者博大精深、成果丰硕,让人想到弗洛伊德和容格。韦伯的主要经历是在海德堡大学当教授。他不断地经受病痛的折磨,1920年去世,年仅56岁。在那段时间里,他写出了一批视野广阔、见解敏锐的著作,涉及的时空范围从古代和东方社会到欧洲社会,探讨的主题有宗教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权威的类型等。他最为人知的著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著作引发了一个专门的学问。(几年前,齐格蒙特·鲍曼<sup>[1]</sup>写道:“新教伦理之争早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单凭它产生的证据和观点的数量,就足以使争论的成果与它试图阐明的主题同样需要讨论和深不可测。”)韦伯的主要论点通常经过简化之后被表述为,宗教观念与世俗活动相互作用产生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新教和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相互作用的,前者导致了“现世的禁欲主义”,赋予工作和节俭以神圣的特质。

韦伯的社会研究表现出惊人的渊博。与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他发现,为了理解某些事物就必须理解一切事物。他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法律学家。社会学刚刚被确认为一个学科;德国社会学家协会于1909年成立;韦伯获得一个被专门称作社会学教授的教职,距离他去世只有几个月。他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892年,讲的是中世纪贸易公司的历史,此后发表了一篇研究古罗马农业与法律关系的论文。然后他对当时德国东部地区的农业工人状况做了一个调查,调查成果收入“社会政治学”论丛出版。在学术思想成熟时期,韦伯开始写大部头的综合研究之作《经济与社会》。就规模而言,这本书可与马克思《资本论》相提并论——而且,同《资本论》一样,这本书没有完成,它是在作者死后别人编辑和整理杂乱的遗存片断才成书的。韦伯的某些灵感源于马克思。马克思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利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现象。韦伯赞同这种观念。

他对世界各种社会中的城市的分析是一部经典之作。同马克思一样,韦伯的兴趣始终在于解释欧洲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并不认为

---

[1]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年-),波兰后现代思想家。

资本主义是所有社会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阶段,而是认为它是西欧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所产生的独特事物,它的形成在某些方面可归功于古代犹太教和基督教。它并不是作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实体脱胎于封建主义;就某种程度而言,它是一直存在着的,就像封建主义依然存在一样。这只是相同的构成成分在比例上逐渐发生变化的结果。(有人可能认为马克思也说了类似的意思,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资产阶级”不是表示一个社会实体,而是表示一种原则,这种原则通过历史起作用,“消灭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支持“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韦伯似乎在说,合理性和效率乃是从西方文明早期播下的种子萌发出来,无情地和不可逆转地发展着。韦伯的主要兴趣在于他所说的合理化,合理化指的是事物组织得井井有条、遵守某些规则和有序的过程这种趋向。他的朋友米歇尔斯在社会民主党走向官僚化过程中所看见的东西,韦伯则视之为欧洲历史上的一条基本原则,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条基本原则。一些习俗或形式始于传奇事迹或巫术,然后稳定下来成为常例。(夏尔·贝玑曾评论道,“一切事物都始于神秘,终于政治。”)例如,音乐逐渐变成了一门科学。政府从王室演变成为官僚机构。在这个过程中,自发性消失了,“除魅”(这是韦伯的术语,表示巫术的去除)现象发生,学究式的专家取代了自由精神而占据主导地位;这当然会有很大的损失,但效率上会有所提高。

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具有非个性化和官僚主义的特征而令人生厌,这种厌恶情绪也出现在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中。这种情绪在韦伯的一位同时代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他就是维尔纳·桑巴特。<sup>[1]</sup>而韦伯却成了社会主义者的敌人,因为他指出,集体所有制也不可能推翻合理化、除魅和“异化”。“资本主义”也罢,“社会主义”也罢,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样的。劳动分工、官僚制、职业化、纪律、效率等等,工业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都不会被所有权是赋予国家还是赋予大公司这个问题所触动。实际上,社会主义者通常提出了一种更严重的集权化和合理化。任何一种先进的技术型社会都会经历相同的异化和失范问题。

由此产生了韦伯的悲观看法。这通常是一道斯多葛主义的指令,即要求人们坚忍而顺从地“忍受我们时代的命运”,不要期待奇迹的发生。(在

---

[1] 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 - 1941年),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史学家,以研究资本主义著称。

这一点上,他又与晚期弗洛伊德有相似之处。)被锁在合理化“铁笼”里的现代人,不太可能十分幸福,而我们对此又无能为力。韦伯把谴责一股脑儿地倾泻到各种新宗教的发明人以及学术界的先知身上。学生不应当向教授讨教如何生活!如果我们无法忍受一个严酷的现实,我们可以回归旧有的宗教:

对于那些无法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忍受我们这个时代命运的人,我们应当告诉他:他最好静悄悄地回去,无须通常那样公开认错,只是如常人一样。旧教堂张开了宽阔的手臂,以慈悲为怀欢迎他。<sup>〔1〕</sup>

由此可见,这些社会学家不能给我们任何有关拯救的启示,而只是指出了我们目前的困境。当然,韦伯对后来的社会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使用的词汇已经成为它固定的组成部分。影响尤为深远的是韦伯对政治权威模式的分析——父权制权威、世袭制权威、官僚权威、超凡魅力的权威。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官僚制度取代了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更有个人特征的权威来源的时候,韦伯所说的“超凡魅力”型的领导重新出现了。(“超凡魅力”,音译“卡理斯马”,是韦伯给我们增添的词汇之一。)因为循规蹈矩的、消除个性的权威有一个突出的弱点,那就是它无法应对紧急情况。当官僚主义心态遇到一种新情况时,它就无能为力了。伟大的个体应运而生,不管怎么说,他是通过他独特的人格力量迫使人们效忠于他的。拿破仑像两千年前的凯撒那样表现出超凡魅力。后来又有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当然,19 世纪末也不乏先知式人物。从托尔斯泰和斯特凡·格奥尔格到玛丽·贝克·艾娣和布拉瓦茨基夫人<sup>〔2〕</sup>,都以不同的神秘方式行使着领导权威。似乎正是为了呼应韦伯对巫术魔法终结的感叹,一大批魔法师应运而生。他们通常与边缘化的文学前卫派有联系。那些前卫派纷纷加入

---

〔1〕 见韦伯:《以学术为业》。

〔2〕 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 1868 - 1933 年),德国诗人,以他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学流派。

玛丽·贝克·艾娣(Mary Baker Eddy, 1821 - 1910 年),美国基督教科学派创始人。

布拉瓦茨基夫人(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 1831 - 1891 年),出身俄国贵族家庭,现代接神学创始人。

密社<sup>〔1〕</sup>和其他神秘主义教派。

在其他知名的社会学家当中,意大利社会经济理论家帕累托也像韦伯那么悲观(帕累托才华横溢、博学多才,还是工程师和数学家)。他认为人类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他曾说过,要是知道自己的著作《社会学通论》会有许多人看,就不会写它了!马克思对未来无阶级的乌托邦的预言是错误的。各个集团和阶级争夺权力的斗争永远不会结束。如果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获胜,它也会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最终遭到其他阶级的反对——这种说法准确地预言了俄国以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据说,在所有社会理论家当中,帕累托最让列宁头疼。)

帕累托一针见血地把所有的理想归结为自私自利的权力斗争,这让人想起了霍布斯和他著名的意大利先辈马基雅维利。帕累托认为,当我们意识到理想中潜藏的错觉、意识到权力的现实,从而尽可能地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我们才能最好地实现自由。我们应当追求建立一种流动的精英阶层,这样就能将潜在的革命者吸收到权力圈子中。但总的说来,帕累托并没有给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他只是在描述现实,他对现存的欧洲统治阶级的状态并不乐观。他的社会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他试图划分思想里的基本情感因素,即“积淀”。他认为各种思想体系的基础是这些情感“积淀”。所谓“积淀”类似于容格的“原型”或韦伯的“权威模式”,是真实存在的、通常是理性原则的无意识决定因素。<sup>〔2〕</sup> 当时几乎没有人像他这样无情地揭露理想和意识形态。

尽管这些社会学家极为博学,而且他们对知识的追求通常不带功利动机,但是他们决非超然于世事之外或不作价值判断。他们都看到了危机。涂尔干“说起社会学时带着先知的那种道德热诚”。他认为社会学能够通过解释如何获得团结和避免失范来拯救我们。韦伯有时候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非常雄辩。他是存在主义的先驱:雅斯贝斯是他的学生。表

〔1〕 密社(Hermetic Society)是由英国神秘主义者安娜·金斯福德(Anna Kingsford, 1846 - 1888年)创办的通神会。安娜·金斯福德是英国最早的女医生之一,还主编了一份女性主义报纸。

〔2〕 帕累托列出了六种“积淀”(residue),但似乎可以归纳为两种主要形式:“联合的本能”和“集合的执著”。他用这两种形式所表达的东西,很接近于现代化的、多元主义社会和整体的、有机社会,也就是滕尼斯所说的法理社会和礼俗社会。讲求联合的狐狸是资本家和狡猾的政客;狮子则带有封建主义的英雄豪壮色彩,或许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超凡魅力。——原注

面上最客观的帕累托实际上最愤世嫉俗。道理很简单,他之所以采取超然的立场,是因为他对世事不再抱有幻想。假如你真的不再相信各种“神仙”,而是要忍受生活,那你只好远远地走开,抱着超然世外的态度去嘲笑生活。社会学有权成为拒绝或讽刺社会的一个策略。故作外人之态,来大发感慨:“看看这些怪人,他们的风俗习惯有多古怪!他们做的事情该有多荒唐!”这是斯威夫特和孟德斯鸠在 18 世纪就用过的老策略。某些社会学家也如法炮制。<sup>〔1〕</sup>有人说社会学是乡村无神论者对乡村傻瓜的研究。社会学本身也要用社会学来阐释。在这一时期,它与社会主义者、愤世嫉俗的艺术家以及其他局外人一起批评大众民主、“资产阶级”、平庸市侩以及其他精神上的敌人。

## 宗教危机

社会学家认为,宗教危机是具有整合性信仰的紧密共同体的消失所造成的。涂尔干认为,宗教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社会团结;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必须具有某种共同的价值体系,后者通过典礼和仪式而变得神圣化。(1912 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可能是他最出色的著作。)人们普遍相信,祖先传下来的基督教信仰不再履行这类功能。自从基督教分裂为经常互相敌视的教会和教派之后,长期以来,基督教普遍遭到理性主义者、怀疑论者、不可知论者、人文主义者、实证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科学家、历史学家的攻击。社会主义者与夏尔·贝玑一道指责基督教是富人的宗教。我们都知道,达尔文主义沉重打击了正统宗教。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我们杀死了他。)弗洛伊德是无神论者。夏尔·贝玑将基督教时代的结束确定为 1881 年(第一次出现了“没有耶稣的世界”)。科学实证主义的名气从来没有像当时那么大过。许多书籍以“一元论”的名义宣告,宗教不再具有认识功能,因为科学已经或即将掌握全部答案。恩斯特·海克尔<sup>〔2〕</sup>的《宇宙之谜》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它是世纪之交的一部畅销书。

诚然,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人当中,这种一笔抹杀宗教的倾向比在

---

〔1〕 这类讽刺中最明显、最有名的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林德在《中部小镇》一书中对美国小镇的无情讽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它与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一样很受欢迎。刘易斯的小说也以美国小镇为讽刺目标。——原注

〔2〕 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34 - 1919 年),德国医生,解剖学教授。

普通民众当中更为明显——尽管有关确定大众宗教心理的研究(例如 1900 年进行关于去教堂做礼拜的一次调查)通常显示,民众的宗教情绪减弱。但是,与 19 世纪中叶相比,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一个突出的逆反现象,即有些人试图恢复或重新界定宗教信仰。我们已经指出,这一时期的某些哲人,例如托尔斯泰和柏格森,在不遗余力地振兴宗教,虽说这是一种非正统的宗教。精神冲动往往被引向非正统的宗教、甚至被引向非基督教的宗教。

柏格森的著作以及威廉·詹姆士著名的演讲集《宗教经验种种》强调宗教经验作为一种经验的价值。《宗教经验种种》阐述了詹姆士的立场:重要的是信仰的意愿。宗教即便是虚假的,但它具有心理上的价值;至少它非常有趣。最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对象化的宗教观念都是信仰本能的外在表现。数年之后,伊曼纽尔·穆尼埃<sup>[1]</sup>说道,一个世纪前,一个人要么是基督教徒,要么是反对一切宗教的理性主义者,而现在,这两种人都不多了,反倒是出现了形形色色多少带有异域情调的新宗教。有人甚至可能像叶芝一样,发明了一套私人神话。

在法国文人、甚至在某些英国文人当中,出现了一股天主教复兴热情。乔治·桑塔亚那<sup>[2]</sup>被罗马天主教的“了不起的错误”所吸引,这件事就表明这些宗教皈依现象尤为复杂;没有人真的以为这种信仰是“真实的”,但只有浅陋的人才会认为,指出这一点便足以毁灭宗教。认为宗教是虚假的、但却有用的、或者相信起来有好处,这种看法无疑是有缺陷的。西蒙娜·韦伊<sup>[3]</sup>后来抱怨说,柏格森把宗教信仰描述得“像一粒粉色的高级药丸,它能够给人大量的活力”。但像这样带着自我意识转向宗教,把宗教当成诗歌或神话,是世纪末先锋派的典型做法。许多人这样做完全是出于逆反心理,有意走向事情的反面,例如画家伯恩-琼斯<sup>[4]</sup>就曾说过:“科学越是具有唯物主义特征,我就越要画天使。”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英国,一个离经叛道的诗人转变为天主教徒,就像欧内斯特·道森和弗朗西斯·汤普森<sup>[5]</sup>那

[1] 伊曼纽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 1905 - 1950 年),法国作家,新闻工作者。

[2] 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 1863 - 1952 年),西班牙人,哲学家,诗人,文学批评家。1872 年移居美国,1924 年定居罗马。

[3] 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 1909 - 1943 年),法国哲学家。

[4] 伯恩-琼斯(Edward Coley Burne - Jones, 1833 - 1898 年),英国前拉斐尔派画家。

[5] 欧内斯特·道森(Ernest Dowson, 1867 - 1900 年),英国颓废派诗人。

弗朗西斯·汤普森(Francis Thompson, 1859 - 1907 年),英国审美派诗人。



样,在体面人中引起的震撼,远远大于下一代人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所引起的震撼。

弗洛伊德的同事卡尔·容格后来成为他的对手。他们的一个主要分歧在于,容格赞成利用宗教来治疗神经官能症,而宗教是弗洛伊德一笔勾销的东西。容格这位苏黎世的精神病医生,受到过尼采的影响。他最初转向心理学的原因是,心理学似乎将宗教、哲学和科学结合在一起。容格并没有像弗洛伊德那样强调性压抑和童年经历的重要性,把这些经验说成是精神失常的根源。两人都相信,无意识是心理决定因素,梦是了解无意识内容的钥匙。但是,对于容格来说,与其说无意识是野蛮的反社会冲动的根源,不如说在某种“集体无意识”之中孕育了神话或“原型”。问题是如何治疗自我分裂。办法是,将这种无意识的神话素材与有意识的社会自我结合在一起。集体无意识出现在神话、童话、艺术、诗歌以及睡梦中。它的原型可在一切伟大的宗教中找得到。容格本人就是一个天才学者,他在古代和当代文明之中漫天撒网,寻找这些原型。在这方面,他是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的先驱;他的门徒倾向于研究比较神话学,以及从主题角度分析艺术和诗歌。

完全成熟的或“个体化的”人格一定会消解“人格面具”(persona)。“人格面具”是容格的术语,它的含义是大致相当于弗洛伊德的术语“自我”(ego)。它是我们的社会角色,社会期待我们去扮演的角色,也是人为性质的人格的面具。它必须学会吸收无意识心理成分,以利于个体化和创造性。在此,容格显然把目标对准了这个时代的主要心理困境,即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精神分裂。他对人格类型进行过有名的分类:内向型和外向型(以及更细的分类),显然与这个问题有关。

在这里宗教表现为一种心理需要,它的作用是培育和丰富心理,因为它与整个人类的全部内在体验联系在一起。宗教是人类的基本需要。这些伟大的“神话”表现了最深层次的心理语言,植根于人类的集体生活之中,满足人的基本本能。没有它们,人性就会枯萎。他认为,一旦人类脱离这个领域,就会产生巨大的损害。容格在《未被发现的自我》中写道:“本能的动力和意象共同形成了一种先验的东西。人类若是忽视它,将非常危险。”假如我们不去认识和控制潜藏在无意识中的力量,它们将会狂暴地、以非理性的方式冲脱出来。他认为,现代人过多地生活在理性概念的领地里,忽视了潜在的情感决定因素。容格附和尼采的说法,即现代个体过于理性化了,需要重新接触某些健康的原始主义。“人类社会的进化取得的

巨大成果……是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的。”

与弗洛伊德一样,容格(比弗洛伊德年轻 20 岁)具有长久而惊人的创作生涯。尽管他的文笔不如弗洛伊德准确清晰,他还是能够把神话、象征和神秘体验的重要性传达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以深刻的震动,把他推向了神秘主义,而神秘主义一直是符合他的性情的。不过,他依然是一位职业精神病医生。他坚信:“精神病医生是最懂得心灵健康的人,社会上的许多事情严重依赖心灵的健康。”他的“学派”不如弗洛伊德的学派兴旺,但是大人物却请他排忧解难。美国最富有的一个家族的后代、精神上很苦恼的保罗·梅隆,给他建了一所房子,并以容格的名义出版了系列丛书。

在这位瑞士哲人家门的上方,镌刻着一句拉丁文口号,大意是:“无论你承认与否,上帝总是存在的。”我们总得去选择一种信仰,就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他说,弗洛伊德把他曾驱走的上帝当成超我给弄了回来。)与弗洛伊德不同,容格喜欢告诉病人“找一些东西去信仰”。当然,他并没有擅自规定信仰的形式;它可能是一种东方神秘主义,也可能是一种原始的泛灵论,还有可能是一种“高级宗教”,因为价值存在于原型的根源之中而不是形式结构里。西蒙·韦伊会在此发现另一种“粉色药片”;事实上,(让弗洛伊德恼火的是)容格受到亨利·柏格森不少影响。

年轻的伯特兰·罗素本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反基督教人士、怀疑论者、哲学上的反唯心论者。他在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1903年)中,却用了几乎很痛苦的语调说明人对信仰的需要。在十多岁时,罗素就追随穆勒和达尔文,不再相信上帝,而且对自己身处其中的维多利亚时代令人窒息的虔诚氛围深恶痛绝。与托尔斯泰很像,他最反感的是“有组织的世界性教会”。然而,与那位俄国哲人另一个相似的地方是,罗素对宗教充满了渴求。他后来这样写道:“在我能够接受的任何哲学信仰中,我从来没有找到宗教式的满足。”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尝试,因为他认为:“为了珍视生命,有必



伯特兰·罗素

要去珍视纯粹的生命之外的某些东西……人类生命之外的某种目的。”人道主义者”的困境在于,仅仅去崇拜人性,就会使人失去杜绝人们做明显邪恶事情的标准(罗素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位年轻的哲学家,注定要活到将近一百岁<sup>〔1〕</sup>,并且成为 20 世纪最著名的人士之一。在《一个自由人的崇拜》中,他面对着一个残酷和乏味的世界,雄辩有力地呼唤着自由精神的能力,“不因机遇的主宰而灰心丧气,独立于这种统治他外在生活的恣意暴政,保持着一种心灵的自由。”人类要面对这一事实,即他们在广阔无限的、非人格化的宇宙中只是微不足道的、转瞬即逝的偶然事件,他们的所有成就注定要“埋在被毁灭的宇宙的废墟之下”。因此人类只能在心灵的自由中去寻求安慰,去形成一种信仰,一种“对善的看法”。罗素奋力向残酷的命运做出普罗米修斯式的挑战。

所以说宗教精神传播很广,但是教义的趋向却各种各样,混乱不堪。就在 1914 年之前,英国学者 J. N. 菲吉斯在《十字路口的文明》一书中表达了他对那座众声喧哗的巴别塔的失望——尼采、柏格森、詹姆士、托尔斯泰、罗素——他们宣扬无神论、怀疑主义、直觉主义、生命力、“信仰意志”、权力意志。

俄罗斯充斥了各种奉行神秘教义的信仰。作曲家斯克里亚宾宣扬艺术家有救世主的作用,他宣布自己就是上帝所选定的救世主;诗人伊万诺夫<sup>〔2〕</sup>鼓吹,基督与狄奥尼索斯在“为狂喜而狂喜”状态下神秘地结合在一起;这些人处在“新宗教和迷信激增、扩散”的氛围之中(马丁·库珀<sup>〔3〕</sup>)。在欧洲的另一端,詹姆斯·乔伊斯在都柏林遇见了密社和通神学会,这些团体读的是布拉瓦茨基夫人、安妮·贝赞特以及其他现代神秘主义者的作品。人们对于超常的精神现象,如神灵托信、神视、闹鬼等有着严肃的兴趣;剑桥大学哲学教授 C. D. 布罗德<sup>〔4〕</sup>等人还允许它使用自己的名义。加入精神研究协会成了一件很时髦的事。在世纪之交那几年出现了一些言行怪诞的、走极端的神秘学人物,例如弗里德里克·罗尔夫(笔名科尔沃

〔1〕 罗素(Bertrand Russell),生于 1872 年,卒于 1970 年。

〔2〕 斯克里亚宾(Alexander Nikolaievich Scriabin, 1872 - 1915 年),俄国作曲家、钢琴家。

伊万诺夫(Vyacheslav Ivanov, 1866 - 1949 年),俄国诗歌白银时代的象征派诗人。

〔3〕 马丁·库珀(Martin Cooper),20 世纪英国史学家。

〔4〕 C. D. 布罗德(Charlie Dunbar Broad, 1887 - 1971 年),英国哲学家。

男爵)和阿莱斯特·克劳利<sup>[1]</sup>(术士、色鬼、信奉魔法者)。被弗洛伊德学派除名的奥托·格洛斯<sup>[2]</sup>和其他人创建了一种性宗教,此人曾被弗洛伊德视为主要门徒,后来因生活丑闻而被开除,此后,他的名字就不再见于有关心理分析的记载。

尼克拉·别尔嘉耶夫<sup>[3]</sup>曾提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他所说的“精神时代的先驱”之列,这位俄国存在主义者还提到另一位俄国人索洛维约夫和两位法国人:莱昂·布洛瓦<sup>[4]</sup>和夏尔·贝玑。贝玑最初是德雷福斯派和社会主义者,主编过战前法国知识界最有影响《半月丛刊》,这本杂志刊载各式言论。尽管他本人是天主教徒,但在本质上却信奉自由之精神。与托尔斯泰相像,他反对一切虚假的和低劣的东西,他宣扬正直,致力于精神和思想生活,宣扬社会公正,献身于艺术,以此来证实人类灵魂的价值。

次要人物可能比主要人物更能显示时代的趋向,这方面的例子是萧伯纳和威尔斯的朋友 A.R.奥雷奇<sup>[5]</sup>,他主编了一本名字叫《新时代》的杂志,它很可能是伦敦最主要的先锋派文学的喉舌。奥雷奇出生于利兹,早年是费边社社会主义者,后来又成为所谓社会信用理论的狂热支持者,这是当时主要的经济上的灵丹妙药。但到后来,他受到亚美尼亚术士兼骗子 G.I.古尔捷耶夫的影响,古尔捷耶夫与布拉瓦茨基夫人都是红极一时的神秘学者。古尔捷耶夫声称自己传授的精神学源自古往今来所有宗教圣贤的思想,是一种具有神秘教义的神智学,受他影响的人很多,其中有叶芝和美国建筑学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古尔捷耶夫是许多东方的精神领袖的先驱。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们把那些厌倦世事、惶惑不安的西方年轻人弄得神魂颠倒。<sup>[6]</sup> 欧洲人的精神饥渴由此可见一斑。

---

[1] 弗里德里克·罗尔夫(科尔沃男爵)(Frederick William Rolfe, Baron Corvo, 1860 - 1913年),英国画家和摄影家,曾写诗、撰文。

阿莱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 1875 - 1947年),英国作家,自称是“吸毒和性交成瘾者”。

[2] 奥托·格洛斯(Otto Gross, 1877 - 1920年),瑞士精神分析学者。

[3] 尼克拉·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 1874 - 1948年),俄国哲学家。

[4] 莱昂·布洛瓦(Leon Bloy, 1846 - 1917年),法国小说家,狂热信奉天主教。

[5] A.R.奥雷奇(Alfred R. Orage, 1873 - 1934年),英国学者,报人。

[6] 就在1914年之前,多次访问欧洲的孟加拉诗人和哲人泰戈尔在他第一次访问欧洲引起了轰动。——原注

## 作为宗教的民族主义

对于一些人而言,社会主义是一个替代性的宗教,对另一些人来说,艺术或科学是替代性的宗教。对民众而言,最显眼的、带有象征和仪式的价值体系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完全忽视它。贝玑最突出的文学成就之一,是他把圣女贞德提升到法国民族象征的地位。19 世纪之前,贞德在法国几乎是默默无闻。有些浪漫派对于中世纪的事物都感兴趣。他们复活了 15 世纪这位奥尔良姑娘、殉难者、抗英女英雄的故事。19 世纪中叶的伟大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尤其是儒勒·米什莱,将贞德描述为法兰西民族之母。她的神话愈演愈烈。不但贝玑,还有夏尔·莫拉斯也在她身上大做文章;这么做的不光有保守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反教权主义者以及神职人员都聚集在贞德周围,把她当成民族团结的象征。

左派人士也在法国历史上找到了自己的英雄,他们自己推出了法国向全人类承担的使命。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关系感到困惑不已。他们最后得出结论,革命之后,民族差别不会消失,而是更加纯粹;民族的生活特色将在更高的层面上继续存在。不能让资产阶级把德国的过去据为己有!马克思本人倾向于认为,在摆脱了资产阶级政权之后,民族会成为社会主义人类所在的自然形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会显示,民族主义的吸引力要比假想的国际主义大得多——显然,对于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见下一章)。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种族特征的延续是一个惊人的事实。苏格兰人与居住在同一个岛上的英格兰人在政治上已经联合两个世纪了,然而,在精神上,苏格兰人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是大不列颠王国的一部分(现在依然也没有)。这个联盟保持下来,是出于实用目的的需要,但是它从来没有在人们的心里或思想里扎下根。威尔士人也是如此。

至少文学得承认这一事实,在比较著名的文学民族主义运动中有爱尔兰凯尔特复兴运动,这场运动利用爱尔兰民间文学的主题,它甚至企图复兴古代凯尔特语作为文学媒介,威廉·巴特勒·叶芝,也许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就是在这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米斯特拉尔<sup>[1]</sup>,他是法国的普罗旺斯省用复兴的奥克语写作的诗人。

---

[1] 米斯特拉尔(Frederic Mistral, 1830 - 1914 年),法国诗人。

1896年,西奥多·赫茨尔的著作《犹太国》奠定了犹太文化复兴的基础。其目的是想在祖先生活过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现代犹太国家。犹太复国运动大会于1897年开始召开。一种政治色彩不太鲜明的犹太复国主义让青年卡夫卡和布拉格的其他犹太作家很感兴趣。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德国和奥地利的反犹骚乱,使犹太人深切感受到这一现实:欧洲再一次受到不宽容心态的控制。但是,这时候,犹太复国主义主要是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事情。

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被同化的”犹太人也继承了他们所在国家的文学传统;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有一群杰出的、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犹太习俗礼仪的犹太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为欧洲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名单包括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古斯塔夫·马勒、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卡夫卡、柏格森,有一半犹太血统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转向犹太人复国主义,这是对现存欧洲文明不满的一种表示,也是寻找自己身份的手段。像马丁·布伯这样的神学家在宣扬一种根深蒂固的犹太民族主义的拯救恩宠时,他的腔调与莫拉斯、巴雷斯、瓦格纳以及其他“整体的民族主义者”的腔调相同。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历程还没有展开;它的起源却在世纪之交的思想动荡之中,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寻求新的价值观念。

就在1914年前,民族主义发展到顶峰,几近狂乱。加布里埃尔·邓南遮<sup>[1]</sup>,著名的意大利作家,他的变态的色情小说和生活方式使他在19世纪90年代成为“颓废派”的领袖人物,在1909年左右,他成了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号召意大利磨刀霍霍扑向非洲,然后再向全世界进军。(意大利作出的反应是,从土耳其人手里夺下了黎波里,这为后来与一战爆发有很大关系的续发事件做好了准备。)泛德意志联盟幻想着德国人统治整个欧洲。在法国,莫拉斯领导的爱国的、激烈反对德国的“法兰西行动”,很受学生的欢迎。饶勒斯<sup>[2]</sup>在1911年试图将社会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反对扩大兵役制,但没有成功,这是1914年和平主义破产的预兆。各式各样的泛斯拉夫

---

[1]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863 - 1938年),意大利作家,政界领袖,见下一章。

[2] 饶勒斯(Jean Jaures, 1859 - 1914年),法国社会主义领袖,在一战爆发前夕,因反战被刺身亡。

主义在俄国非常盛行,丹尼列夫斯基<sup>[1]</sup>认为,在拉丁民族和北欧人支配世界历史之后,该轮到斯拉夫人的了。不管怎么说,俄国人要么向亚德里亚海挺进,要么退回乌拉尔山之后,泛斯拉夫主义者法达耶夫宣布,统一东欧的斯拉夫民族,显然是俄国的必由之路。在伦敦,有关英帝国命运的书籍也同样流行,按照历史学家爱斯梅·温菲尔德-斯特拉福<sup>[2]</sup>的说法,“出版界散发着血腥味,回荡着雷鸣声”。

国际生活就是一个角斗场,那些不准备参与争夺权势的竞争力的国家注定会消失——这是世纪之交很多人都信奉的达尔文主义遗产。在西奥多·罗斯福时代,这种观念席卷整个美国,让许多头脑复杂的人感兴趣。(罗斯福本人肯定是最有见识的美国总统之一。)例如,英国诗人约翰·戴维森<sup>[3]</sup>是尼采的一位门徒,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不道德的”,因此狂热地支持英国的帝国主义行径。他与路特亚德·吉卜林一道,认为英帝国主义有权去统治并且有权去严厉统治那些次要的人种。社会主义者 H.G. 威尔斯解释说,“那一群群黑人、棕色人种,还有不洁白人<sup>[4]</sup>,还有黄种人”,将不得不出局,“他们注定要灭绝和消失”。

这类说法与 1914 年爆发的世界大战关系很大,那场战争结束了维多利亚时代,开辟了世界历史新阶段。思想家们对这些事件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

[1] 丹尼列夫斯基(Nikolai Yakovlevich Danilevski, 1822 - 1885 年),俄国作家,泛斯拉夫主义鼓吹者。

[2] 爱斯梅·温菲尔德-斯特拉福(Esme Wingfield - Stratford, 1882 - 1971 年),英国历史学家,著有《英国文明史》等。

[3] 约翰·戴维森(John Davidson, 1857 - 1909 年),英国诗人。

[4] 不洁白人,原文是 dirty white,指的是 WASP(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白种新教徒)之外的白人,如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等。

# 第十三章 困境中的西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 战争的思想根源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1914年国际秩序被打破,这种局面将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主导作用。长达四年之久的大规模杀戮导致俄国的赤色革命、意大利和德国的黑色革命,欧洲各地普遍失去了信心。这场战争最终给战胜国造成的心理打击几乎不亚于战败国。战争期间,宣传机器甚嚣尘上,真理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由于战争的缘故,一种新的犬儒主义应运而生,对人类价值的信仰荡然无存,这种情况是欧洲近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生1939—1945年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更深重的灾难,它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

人们不免试图在1914年的政治秩序危机和思想文化危机之间寻找某些对应关系。历史学家习惯于从外交史和政治史角度——民族利益的冲突,各国之间的联盟,军事计划,国际会议和国际对抗——来描述1914年战争的起源,这么做是正确的。但是,关于战争的起源,也有思想的因素掺杂其中。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导致战争的一个显见因素。政客们时不时地根据达尔文主义精神宣布,斗争、竞争和武力是生命的规律。民主制度迫使官员顾及公共舆论,而公共舆论经常是好战和思想狭隘的,同时带有激烈的爱国热情。外交不是在真空中发挥作用的;政治家属于他们所在的时代,接受那个时代盛行的思想观念。詹姆斯·乔尔<sup>〔1〕</sup>在颇有见地的演讲

---

〔1〕 詹姆斯·乔尔(James Joll, 1918年-),英国历史学家。



《1914年:未言明的假设》中认为,历史学家需要“重新建构研究对象没有说出来的假设”,“重新创建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所处的舆论氛围”。

1914年未言明的假设包含着在作家和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那种对战争的独特渴望——这让后人很难理解,但是,这是战争之初“八月”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开始的时候,战争在各国极受欢迎。拉姆奇·麦克唐纳<sup>[1]</sup>在英国抵制战争精神之时,意识到自己在反对“英国历史上最得人心的战争”。人们志愿报名参军的景象证明了这一事实。而且,争先报名的是青年诗人、艺术家、大学生、知识分子。法国、德国、俄国的情况基本相同。不久,意大利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毕加索为罗兰小说  
《7月14日》配的插图

在知识界的领袖中很难找到反对这种尚武精神的人。罗曼·罗兰是极少数试图采取抵制态度的人物之一。他惊呼:“各国思想领袖无不满怀信心地宣称,本国人民的事业即是上帝的事业、自由的事业以及人类进步的事业。”很多人都在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神圣事业,包括上一章探讨的大部分人物,1914年他们仍然在世:柏格森、涂尔干、贝玑、韦伯、弗洛伊德(他“把自己的利比多献给了奥匈帝国”)。另外,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同样显眼的还有诗人和小说家托马斯·曼、斯特凡·格奥尔格以及阿诺德·本涅特<sup>[2]</sup>等。在战争之初,除了极个别的例外,社会主义者忘记了他们在理论上反对战争的原则,反

而团结起来支持本国的事业。在英国,当红的偶像人物是青年诗人鲁珀特·布鲁克<sup>[3]</sup>,他和其他许多愿为战争牺牲的人一道,慷慨赴难,义无反顾。诚然,罗曼·罗兰说“无不”,那是夸张,但是,在1914年,反战者属于极少数。他们试图阻挡奔向战车的人流,只是招致灭顶之灾。

这种极端好战精神如此强烈,足以证明,弗洛伊德在战争期间发现的

[1] 拉姆奇·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 1866 - 1937年),英国工党领袖。

[2] 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 1867 - 1931年),英国作家。

[3] 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 1887 - 1915年),英国诗人。

“死亡愿望”是正确的。造成这种气氛的原因可追溯到1914年前的思想倾向。其中比较明显的因素有：一种愿望：即因厌倦单调乏味、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文明，从而产生的追求刺激、冒险和浪漫经历的愿望；一种意识，即觉得战争可以为精神更新提供了机会，因为战争可以与过去决裂，可以迸发出无私的理想主义；一种激昂情绪，即因集体感的恢复和阶级冲突、人际冲突的弥合而欢欣鼓舞；一种启示录式的、尼采式的心态，即把始料未及的大灾变看成对一个衰亡文明的可怕审判，但同时也看成复兴的必要前奏，看成一场“炼狱之火”或大洪水。所有这些态度都与战前思想倾向有关。

第三点可能与战前思想的联系最密切、最明显。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一种回归人类的光荣方式。卡尔·沃斯勒<sup>〔1〕</sup>写给克罗齐的信令他们激动不已：“一个七千万人口的民族兴高采烈地上演了一出气势恢宏的话剧，所有的人，毫无例外……为大家活着，为祖国活着。”诸如马克斯·舍勒<sup>〔2〕</sup>这样的思想深邃之士也逐渐关注“在多元社会中寻找统一和共性”。居然有那么多人认为战争是根治社会失范、精神飘零的良方，能够实现一种共同体，即“整体的民族主义”。在这场战争中，战壕里的人们形成了休戚与共的情感，这种情感让他们彼此依赖；他们中的许多人，



候鸟协会

即使后来讨厌战斗，也很珍视这种体验，并且希望把它带入战后的生活中。

〔1〕 卡尔·沃斯勒(Karl Vossler, 1872 - 1949年), 德国浪漫主义作家。

〔2〕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 - 1928年), 德国哲学家。

研究 1914 年思想氛围的人都知道,一种奇异的神秘精神可以解释人们为何多年忍受痛苦而大力支持这场战争;这种精神主要存在于青年人当中,在那些带有诗人气质的青年人、理想主义者和不安分的年轻人当中。“老人送青年人上战场”,这种陈词滥调最错误不过了。年轻人叫嚷着去打仗,他们责怪老年人胆小退缩。)1914 年,一直被赋予浪漫色彩的战争终于来临了,它把人们从琐碎和贪婪的岁月中解脱出来,因而大受欢迎。在法国,自从 1905 年以来,出现了尤金·韦伯<sup>[1]</sup> 仔细研究后所总结的“纪律、英雄主义、复兴、民族天才”现象。夏尔·贝玑在 1905 年从社会主义转向民族主义,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这位德雷福斯派作家变成了一名爱国主义者、反和平主义者,充满热情地预言未来的对德战争。1913 年,在法国青年大学生中间进行一次思想调查,结果发现,对他们产生主要影响的人有贝玑、巴雷斯以及其他同类人物。其中一位是保罗·克洛岱尔<sup>[2]</sup>,他的戏剧和诗歌融合了英雄主义、宗教和法国传统。

就在战争爆发前的那些年,德国掀起了一场青年运动,其狂热的理想主义随后注入了战争。青年运动的候鸟们<sup>[3]</sup> 起来反对他们的长辈。他们满脑子尼采式思想:在启示录式暴力的伴随下实现彻底的精神更新。斯特凡·格奥尔格这类诗人还在幻想着用战争净化灵魂。像亨利·柏格森这样相对比较温和的哲学家认为,战争将会给欧洲带来“道德的新生”。贝玑在参加马恩河战役之前还在吟唱:“死于正义之战该有多么幸福。”他在这场战役开始不久就死在战场上了。

这种狂热的战争精神对于促成战争的爆发有很大作用。这倒不是说诗人和知识分子有意地策划了战争;这场战争的爆发有如晴空霹雳,完全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只有极少数职业外交家知道当时的危机有多么严重。但正因为这个原因,它几乎就像是神灵发出的预兆。

几个波斯尼亚青年刺杀弗朗兹·斐迪南大公,引燃了战争的导火线。1914 年之前欧洲狂躁的激进思想让他们激动不已。他们崇拜高尔基、安德列耶夫、惠特曼、王尔德和易卜生。他们从 1848 年的浪漫主义那里学到的是诛戮暴君(马志尼,《威廉·退尔》);他们生活在青年时代的文学浪漫主

---

[1] 尤金·韦伯(Eugen Weber),美国当代历史学家。

[2] 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1868 - 1955 年),法国作家。

[3] 这里是“候鸟协会”名称的转用。候鸟协会是 1901 年创办的德国青少年徒步旅行协会。此后各种学生团体纷纷成立。

义氛围中,受到当时一些令人振奋的作家的思想滋养,受到象征主义和颓废派很大影响。他们与国际上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保持着联系。<sup>〔1〕</sup>

当然,每一方都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都说自己受到了对方的攻击。为了给自己找到支持战争的理由,社会主义者认为,如果他们不参战的话,他们的国家就会连同社会主义运动一道被毁灭。德国人进而指出,俄国的胜利将是欧洲最反动势力的胜利。同样,法国人相信,德国人的征服将会彻底摧毁法国所取得的社会进步成果。各国的工人阶级都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而知识分子出身的社会主义者没有想到战争会以这种方式到来。第二国际经常在口头上宣告,世界各地的工人决不当在资产阶级统治者强迫他们参加的战争中自相残杀,但是这场战争却不是这样发生的。绝大多数人只知道他们的祖国受到攻击,因而必须挺身保卫它。英国、德国和俄国的少数社会主义者和劳工领袖固然有不同的想法,但只好遵守党的纪律。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德国的李卜克内西,还有流亡在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中的列宁,起来反对这场战争,在英国,拉姆希·麦克唐纳辞去工党领袖的职位。但是,在那几年中,这些只是旷野中的呼喊。

知识分子参与战争的程度很是惊人。他们当然奔赴战场,亲临战阵;有些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还自愿参军;他们写诗咏怀,称这是一个再生的过程,颂扬它的神秘性。许多未能亲临战壕的人则把才智用在宣传上。英国文坛巨子阿诺德·本涅特,当上了英国一个宣传部门的主管;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炮制了许多手册,证明敌人永远是邪恶的(这种材料必须让人信以为真),证明敌人野蛮凶残,然而,这类故事大都是向壁虚构。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罹难。在那些牺牲的才智之士当中,有英国诗人鲁珀特·布鲁克、威尔弗雷德·欧文、艾萨克·罗森堡、查尔斯·索利、爱德华·托马斯;艾弗·格尼发了疯。才华横溢的画家弗兰茨·马克、埃贡·希尔、奥古斯特·麦克、雷蒙·杜尚-维龙和安贝托·波丘尼惨遭杀戮;诗人乔治·特拉克尔和雕塑家威廉·莱姆布鲁克自杀。造就法国精英的著名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11到1913年毕业的学生,有161人参军,有81人死于战争,另有64人受伤。一部阵亡法国作家选集收录了500名作家的作品,其中有贝玑、阿兰·富尼埃(法国的鲁珀特·布鲁克)还有普西夏里等人的作品。这个单子可以一直开列下去。

---

〔1〕 见弗拉基米尔·德迪耶夫的文章《50年以后的萨拉热窝》,载《外交事务》,1964年6月,以及他的著作《通向萨拉热窝之路》(1966年)。——原注

在西线战场可怕的大屠杀中,伤亡最惨重的是下级军官,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们不禁发出疑问,随着这些人成千上万地罹难,该有多少可能震惊世界的成就被埋葬?他们当中,有的人才智可能在乔伊斯、爱因斯坦或艾略特之上,只是因为战场捐躯,而没有写出《尤利西斯》和《荒原》,也没有提出相对论。另一方面,在这场战争的刺激下,出现了大量有创造性的作品和思想。



战壕中士兵在进餐

1914年的8月却不是这个样子,当时,反叛的一代人找到了他们的伟大圣战。伊莎朵拉·邓肯<sup>[2]</sup>还记得:“当时我们都热情如火,激情燃放。”思想史研究者发现,这种精神状态与上一代人的思想躁动有很多联系。

如果说这场战争最初很受欢迎,那么到最后,它却往往成为令人痛苦的幻灭,这种情绪延续了很久,影响了战后人们的世界观。“战争是地狱,建造这所地狱的人是罪犯,”西格弗里德·萨松<sup>[3]</sup>在战壕里写道。在诗歌中可以发现幻灭的发生发展过程。这场战争产生了质量很高的诗作。它一直是作家的战争,甚至它的理想破灭也产生了灿烂的文学篇章。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场战争能与它相比。最初的“光荣的幻想”沦落为伤心和失望,以痛苦告终。苦恼、恐怖、被等待死亡的心绪折磨的神经、被毒气杀死

幻灭的情绪很快就开始出现了。赫伯特·里德<sup>[1]</sup>回忆说:“只需在战壕里呆上一周,就会涤除那些残存的对战争的浪漫想法。”随着战争旷日持久,伤亡人数增长,抗议的呼声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最后,活下来的人大都为自己曾卷入战争而感到羞耻。然而,应该记住,在

[1] 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 1893 - 1968年),英国作家。

[2] 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 1893 - 1968年),英国作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 1893 - 1968年),英国作家。

[3] 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 1886 - 1967年),英国诗人、小说家。

的士兵、令人讨厌的伤口,甚至虱子,都成为前线诗人笔下的素材:<sup>〔1〕</sup>

冬日的战壕,阴沉可怕,  
这里有巨型炸弹和虱子,却没有朗姆酒。

不久他们就开始蔑视那些待在家里、对战争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的人。一种生死患难的袍泽情谊把士兵们紧密地联系起来,有的时候,他们还感觉到,自己与敌对战壕里的受难者的关系,比起他们与待在家里的那些体面人或指挥他们的高级军官之间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战士诗人写道,基地那些喝兵血的将军“急切地将忧心戚戚的敢死队赶上前线去送死”,而他们自己却安然回归故里,老死户牖之下。那些在最初几场战役中幸存下来而且像大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那样几乎挺过整个战争的人(欧文在即将停战之际阵亡),对于战争的感受只有恐怖、遗憾、无聊。战争引发的浪漫情绪一去不返,战后时期人们一想到战争就深恶痛绝。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情绪却有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因为战胜国中的和平主义舆论使得一心复仇的德国人有可能推翻和平协议,打破力量平衡。

## 战争结果:苏维埃共产主义

这场导致生灵涂炭的战争结束之后,并没有产生一个“美丽新世界”,而是出现一片愁云惨雾,失望沮丧的景象。奥匈帝国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一堆新成立的、没有明确边界的、乱糟糟的小国家。在英国,这场战争让老旧的自由党一蹶不振,却使工党势力大增并且开始采纳社会主义纲领。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美国总统也躬逢其盛。结果,战败的德国人刻骨铭心地感到不公正,战胜的协约国也产生了分裂。大多数人认为,巴黎和会并没有给道德崩溃的世界带来一种新的目标意识。国际联盟是战争期间人们寄予未来希望的主要象征;到了1919年,它费尽波折总算在争议声中成立了,但是美国不肯加入,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这种看法:它注定让人失望透顶。

---

〔1〕 在战斗的间隙有大量的闲暇去写诗;士兵并不总是待在渗水的战壕中。另外,“来自阿尔芒耶尔的小姐”(一首歌曲的名称——译注)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疾病问题。——原注

1917年11月的俄国革命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惟一的一线希望。在推翻旧有统治阶级的“震撼世界的10天”里,这场革命的领导人谴责整个国际政治秩序以及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并且发出世界革命的号召。它的领袖似乎是一个天才人物,是引人注目的焦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历史上更为人知的是他从事革命活动时用的化名尼古拉·列宁(许多历史书和百科全书都把这两个名字混在一起,称他弗·伊·列宁)。他很早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强烈的支配欲和不安分的个性。沙皇政府判了他哥哥死刑,并把他从莫斯科大学开除,<sup>[1]</sup>但这丝毫不能平息他的革命气质。尽管他头脑冷静理智并且对经济理论和(经常超出他理解能力的)哲学问题感兴趣,但他是一个浪漫主义的革命者。他深受民粹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狱中之作《怎么办》(1863年)的影响,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解释的那样,这需要毕生的彻底奉献,在反抗现行统治秩序的残酷斗争中,心无旁骛,也不应顾及道德。此时,俄国革命已形成光荣的传统;正如列宁所言,他是第四代革命者,往上可追溯到1825年虽败犹荣的十二月党人。革命已经成熟地发展成为一门艺术,主要由那些受良心谴责的俄国上层人士来实践,这些“忏悔的贵族”对本国的落后深感耻辱。

严格地说,列宁不是贵族家庭出身,但也决非无产阶级出身。他的父亲是外省的一名晋升上来的中级官员(这种身世与阿道夫·希特勒一样)。列宁本人上了大学。马克思认为知识分子的领导对于头脑简单的工人来说是必要的。这种精英主义成分在列宁身上体现得极端明显;正如阿道夫·G·迈耶所说,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才智不凡之士的产物,这些人意识到了不可遏抑的趋势,合理地组织了历史的原材料,从混乱不堪的要素中创造出秩序和进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受到尼采的一些影响,他们更加强调这种创造性意志要素。俄国的现实情况几乎也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这一立场。无产阶级尚未出现,这个国家只不过刚刚开始工业化,中产阶级是否存在,还是个疑问。没有人能够满怀信心地等候第二天会发生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资本主义只不过刚刚开始。列宁嘲笑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安魂曲式社会主义”。他试图证明,一个由积极分子组成的精英式政党符合马克思主义,他期盼革命早日发生,建立革命专政。

列宁与列昂·托洛茨基(此人是地主的儿子)一道,详尽阐述了这种理

---

[1] 原文有误,应为喀山大学

论。认为俄国能够从落后的农业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无疑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但有人会说,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因此革命可能在这里发生,随后扩散到全世界。恰恰因为俄国如此落后,它才为一场成功的革命提供最好的机会。这场革命将由此变成世界革命。培养一个由少数训练有素的人组成的政党,用非法手段夺取政权,从长远看,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列宁选择了这样一个由“革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先锋队”政党,以工人的名义展开活动。列宁没有完全坚持这一立场,但是他一直在想办法调和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论。1903年,他分裂了党,但是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在(人数本来就不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实际上是少数派。从1900年到1917年,列宁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主要是在瑞士度过的。在此期间列宁从事理论工作,他的周围聚集了少数忠实的门徒,这些人被他身上超凡的魅力给迷住了。但是,在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舞台上,他不是一个重要人物,当时支配这个舞台的主要是西欧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是极少数从一开始就反对1914年战争的人之一。甚至大部分布尔什维克认为,除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受德国侵害之外别无选择。列宁不是和平主义者;他宣扬的是,将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转变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国际性内战。他的立场几乎没有得到声援;绝大多数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依旧效忠他们的政府。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乘坐那一系列著名的闷罐车从瑞士返回俄国。德国人允许它开往彼得格勒,因为他们认为,列宁会让俄国退出这场战争。他的确改变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立即号召结束战争,但是新政府却在欧洲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人的怂恿下继续战斗,结果只见形势逐渐恶化。这种形势导致布尔什维克在11月初发动政变,最终产生了列宁领导下的专制政权。这种形势构成了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列宁又是独自一人推动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

非法夺取政权,利用恐怖手段对付反对派,组织秘密警察查禁持不同政见者,这些做法并非始于斯大林,而是继承下来的,只是在1924年列宁死后斯大林又加以强化而已。但是,以公有制企业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卓有成效,这种消息不胫而走。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担心自己的利润,他们为什么要实行封锁和武装干涉来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这是有计划的财富生产,代表了未来的经济。在玛丽·居里的朋友、法国人保罗·朗之万的领导下,西方知识分子签名抗议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热情赞扬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献身的人。



新成立的苏联共产党政府很早得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重要支持。1927年,在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十周年之际,美国自由派杂志《国家》



夏尔·贝尔贝

评论说:“在这黯淡的时代,它的十年却闪烁着光芒。”在萨科—万泽蒂案件引起骚乱的1927年,<sup>[1]</sup>恐怕这是左派很具代表性的看法,虽说在1918—1921年俄国内战的恐怖中,以及恐怖主义和政治迫害造成的混乱中,同情列宁独裁的人有所减少。1921年伯特兰·罗素访问了俄国。他认为列宁是他所遇见过的最令人反感的人。对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的浪漫化早就开始了,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是始作俑者,但是,在可怕的内战期间,红色专政建立了秘密警察制度,以恐怖的手段对付一切反对派人士(包括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内战之后出现了向资本主义的倒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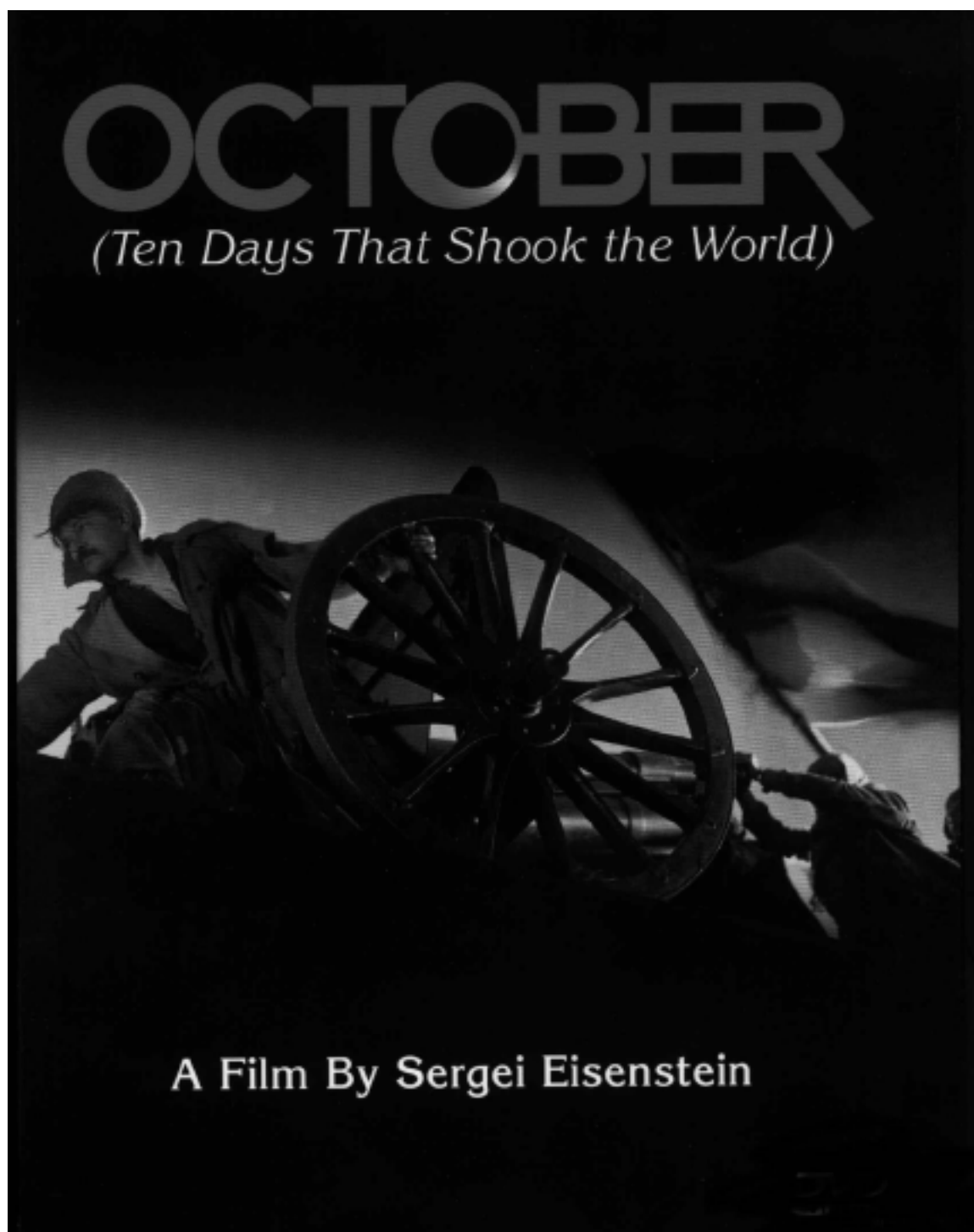
经济政策)。列宁死后,党内就政策发生了纷争,与此同时,他的继承人在党内展开了权力斗争。只是在1929年之后,西方世界出现了大萧条,约瑟夫·斯大林作为苏维埃强人开始崛起,西方知识分子才重新集合起来,形

[1] 1927年夏,共产主义者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抗议运动,反对两名意大利出生的美籍无政府主义者被判处死刑,这两个人被指控在1920年马萨诸塞州的南贝斯特里发生的抢劫案中犯了谋杀罪。这也许是最为轰动的案件,甚至超过了德雷福斯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后者是前者的原型),因为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指控说这是一场诬陷。几十年后,学者们倾向于认为,至少其中的一位“意大利裔牺牲者”是有罪的,但是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深信不疑的第一条就是,他们是歇斯底里的反共运动的牺牲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维埃政权本身就在野蛮地迫害无政府主义者。——原注

成了一股支持新俄国的主要力量。

## 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

没有哪一个地方能比德国的情况更令人困惑和绝望的了。战争的结束大大出人意料；很少有德国人意识到他们即将战败，因此他们很难接受全盘失败这一事实。他们根本没有尝到受侵略的失败滋味；整个战争期



《震撼世界的十天》电影海报

间,德国军队一直在敌国土地上作战。现在政府突然求和,然后接受了苛刻的停战条件;皇帝退位,在几个月之内,德国人发现自己被迫接受一个迦太基式的和平<sup>〔1〕</sup>,忍受胜利者强加给他们的屈辱。与此同时,一个陌生的新政府,以社会民主党人为首的共和国,取代了皇帝政权,许多地方都发生了革命,包括阿道夫·希特勒自认的家乡慕尼黑。随着士兵返乡,各地一片混乱。

希特勒的痛惜之情(后来他的自传《我的奋斗》有所记载)在许多人心目中引起了共鸣(不只在德国):一切都付之东流。充满艰辛和英雄主义的岁月,二百万人的死亡,无数人受伤——“一切均已枉然。”就在几年之前,一个强大和繁荣的德国支配着欧洲。现在到处都是饥饿和内乱,一个大败亏输和群龙无首的民族正在同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叛乱做斗争。俄国沙皇退位,为布尔什维克掌权打开了道路。难道这也是德国的命运吗?列宁对此深信不疑;这是他下大赌注的依据。在慕尼黑、布达佩斯一度出现地方性的共产党政权。甚至希特勒似乎也一度认可了慕尼黑的苏维埃政权。在20世纪20年代,相当多的德国人把票投给了共产党。然而大部分德国人怀着恐惧的心情关注着他们所听到的俄国正在发生的野蛮行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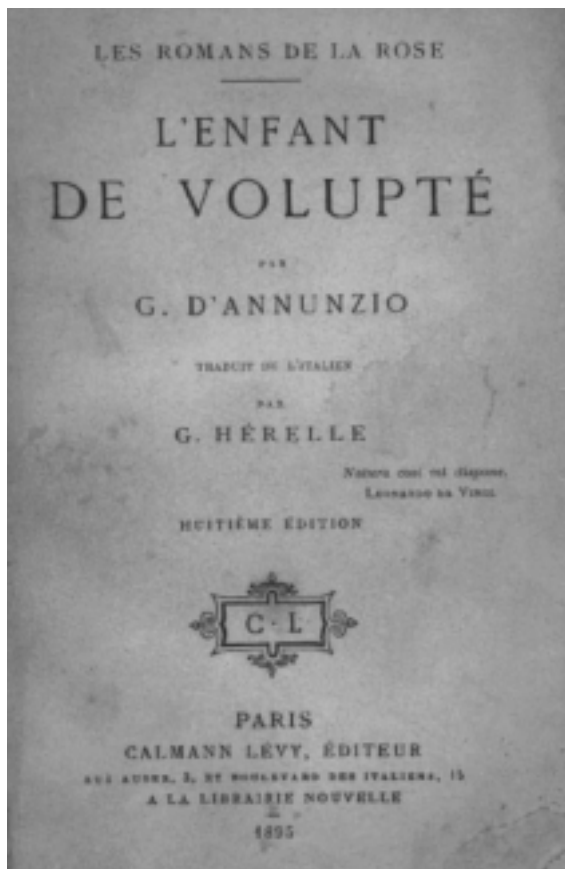
希特勒是一个不成器的艺术家,一个性情古怪、与环境格格不入的人。他在战争中参军。1919年,在动荡不安的慕尼黑,他作为一名很有成效的煽动者而崭露头角,帮助创建了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后来成为这个党的绝对领导人。他痛斥马克思主义者、政客、现代社会的道德败坏、卖国贼,他尤其痛斥犹太人,把他们当成替罪羊。但是,在战后的混乱局势中,他的党只是诸多心怀不满、漫无目的寻找出路的团体之一,直到20年代末,它才名声大噪。邻国意大利已经落到了一场自称为法西斯主义的新运动手里。这场运动强调恢复秩序,通过铲除衰弱势力重振民族雄风。人民必须团结在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周围;这位领导人应体现民族的意志,采取无情的手段摧毁腐蚀人民的毒药。墨索里尼不像希特勒那么肯定这种毒药是犹太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极少表现出反犹倾向。但希特勒可能会赞同这位意大利领袖的看法:在一个国家中,不仅必须清除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还必须清除议会制民主,因为这种堕落的制度使得政府无法果断行动。

---

〔1〕 迦太基式的和平指对战败一方条件苛刻的和约。当代西方人以“迦太基式的和平”来警告缺乏国防武力的可怕后果。

贝尼托·墨索里尼是一位有才华的左翼社会党人。1915年,在讨论意大利是否应该参战这个问题上,他持支持立场,与党内大部分人决裂。此后,他为所欲为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尝试。他受到尼采和索雷尔的影响。在战后的动荡岁月中,他成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而显露头角。意大利遇到的麻烦与德国相似。尽管名义上是战胜国,意大利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遭受屈辱(意大利人认为这都是在巴黎和会上由盟国一手造成的),而且它还很难调整过来以适应和平时期的经济。议会制民主表现得糟糕;意大利人的自尊心备受挫折。

希特勒还在推行战争精神,把他的党徒命名为“冲锋队”,把他的党按照军队的形式来组织。这种战争精神在战后得到了意大利超人式的人物邓南遮的附和。邓南遮是诗人和小说家,50多岁时成为战争英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神秘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邓南遮的创造。希特勒的盛大政治仪式从中有所借鉴。邓南遮以退伍士兵首领自居,在1919年进军发生纠纷的城市阜姆。他在夺取这座城市时使用的那些大张旗鼓的炫耀姿态不久即为墨索里尼仿效——建立穿统一制服的私人军队,举行游行和大规模群众集会,领袖站在阳台上向人群发表演说,人群高呼口号做出回应。邓南遮,这位瓦格纳和波德莱尔的崇拜者(在崇拜瓦格纳这一点上邓南遮与希特勒相似)、19世纪90年代的颓废派小说作家,从一个文学奇才变成政治活动家和冒险家。恩斯特·诺尔特<sup>[1]</sup>写道:“在年轻一代的意大利人看来,他是集尼采和巴雷斯于一身的人物。”在战争中他是飞行



邓南遮的作品

邓南遮与希特勒相似)、19世纪90年代的颓废派小说作家,从一个文学奇才变成政治活动家和冒险家。恩斯特·诺尔特<sup>[1]</sup>写道:“在年轻一代的意大利人看来,他是集尼采和巴雷斯于一身的人物。”在战争中他是飞行

[1] 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 1923年-),德国历史学家,著有《法西斯主义的三副面孔》等。

员,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他最能体现“列奥那多精神”〔1〕那是尼采的权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力的意大利版。邓南遮创造了许多政治口号,其中的一个是,意大利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它应当团结起来向财阀统治的国家发动阶级战争。(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个相当新奇而蛊惑人心的利用!)

调动人们的意志和热情来解决政治问题,这种方式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独特因素。其来源可以追溯到战前的思潮。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两人都属于这样一类知识分子,即自学成才、阅读广泛而杂乱,努力探索被希特勒称作他的世界观的那种东西。他们非常肤浅地拾起许多战前的非理性主义思想。法西斯主义没有一套完整一贯的教义,可他们却认为这是优点;在他们看来,直觉高于理智。战前思潮的影响还突出地体现为,法西斯主义公然偏爱精英领袖或具有超凡魅力的“伟人”:元首或领袖。它还从尼采



恐怖的法西斯主义

的经典著作中搬来了对社会价值进行彻底革命的概念;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分子想摧毁整个民主—自由—多元主义的秩序,并用另一个秩序来取代它。但究竟用什么秩序,还不太清楚。当然这个秩序一定是有机和整体的。

墨索里尼赞同“统合国家”观念。这种观念在夏尔·莫拉斯的法兰西行动中特别突出,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产生强烈影响。墨索里尼把这种观念与黑格尔的国家观念揉和在一起。(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乔万尼·秦梯利是法西斯主义智囊团中的重要人物。)这种国家主义是卢梭和黑格尔的遗产。在法西斯主义

思想中,它与尼采和索雷尔的革命能动论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虽不和谐却行之有效。有些左派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支持墨索里尼,至少最

〔1〕 列奥那多是达·芬奇的名字。列奥那多精神(Leonardist spirit)表示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初是这样。法西斯主义宣称,他们既反对物质至上的资本主义,也反对物质至上的社会主义;它想利用由国家和领袖所代表的人民集体意志来强制实行劳资合作。

无论是因为法西斯主义的理念、其领导人的超凡魅力人格(墨索里尼最初活力四射),还是因为旧秩序的破产(这种原因最有可能),法西斯主义在战后意大利风行一时。意大利人厌倦了腐败无能的议会体制;他们同样讨厌只产生混乱而从来没有一以贯之纲领的社会主义。列宁式的专制政权未能在意大利发展起来;或许在意大利缺乏可行性,而且,不管怎么说,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向往的是无政府主义(实行地方工人自治,而不是利维坦式国家)。法西斯主义似乎提供了有活力的领导人,一个崭新的开端、一种新的信念。它感化了意大利国王,而教皇本人(庇护十一世)相信墨索里尼是“上帝派来的人”。意大利最杰出的智者本尼狄托·克罗齐也一度因为法西斯主义活力十足和重振民族的精神面貌而赞成它。意大利的著名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纷纷颂扬这个新政权。1922年后,才过了几年,几乎所有的人都大失所望。墨索里尼想用精力充沛的、英雄式的精英人物来替代“普选的谎言”;结果他只是使意大利处于一种腐败的寡头政治之下。不少意大利优秀人才移居国外。有些人,例如大作家伊格纳齐奥·西洛内<sup>[1]</sup>,成为共产党员,同法西斯主义暴政做地下斗争。

把意大利塑造成为一个“极权主义”社会,这是法西斯主义公开宣布的目标,但实际上基本没有实现。与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比,墨索里尼只是一位温和的独裁者。他只监禁了很少的人,也没怎么杀人。然而他发明了褊狭的种族或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这个概念没有给少数族群或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留下空间,而且主张由该共同体控制出版和教育,以便在每一个人身上打上单一文化的印记。他认为,这样一来,意大利就可以克服它的弱点,重振古代的光荣。

“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用于指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下一章将更详尽地探讨民族社会主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和北美其他各种运动。这些运动包括比利时的雷克斯运动和法国的几个法西斯同盟,其中“火十字”声势最为浩大;1934年2月,法西斯主义者在巴黎发起大游行。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组织“保安团”,早于纳粹党出现,1938年纳粹占领奥地利后

---

[1] 伊格纳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 1900 - 1978年),意大利小说家,政治领袖。

将其消灭。在罗马尼亚,铁卫团鼓吹恢复古代的风俗,摈弃现代主义、仇视犹太人,认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象征,铁卫团还提出了分配土地来帮助农民的激进纲领。在英国,被认为最有才华的年轻工党领袖奥斯瓦尔德·莫斯利,试图在英国建立法西斯党。

这些运动都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它们证明了一种共性的存在,尽管它们的具体教义不尽相同(这倒无关紧要,因为所有的法西斯主义都表现出教义上的错乱)。法西斯主义是对秩序、权威和整体性社会崩溃的反应。它可能是受欢迎的群众运动。因为群众同样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秩序的消失(他们的感受比上层阶级更深刻)。法西斯主义本是一种情感反应,在无知的人们的领导下,它野蛮不羁、无理性、倾向于暴力。但是,我们不应忽视的是,它也是对多元主义现代化所造成的心理困境的一种反应。法西斯主义令人困惑和感兴趣的地方是,它的确援引了一整套重要和深刻的思想;大大小小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流对这些思想半通不通,他们只知道些皮毛而且还有误解,但是他们被战前流行的尼采、莫拉斯、索雷尔和勒邦这类人物的思想给深深打动了。

## 战后的文学和思想

必须承认,其他国家的主导思潮都对民主大加挞伐。就“法西斯主义”这个富有弹性的术语最宽泛的用法<sup>[1]</sup>而言,这些思潮都能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Y·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是当时的一本重要小册子。作者发现,现代民主制是对历史悠久的欧洲的一个威胁。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影响深远的著作《西方的没落》中,欧洲的衰败以民主告终,民主是有机文明衰败所遗留下的一片瓦砾。与乔治·索雷尔相似的是,萧伯纳既钦佩列宁又钦佩墨索里尼——只要是民主的敌人便是他的朋友。H.G.威尔斯呼唤一个由管理专家组成的“武士”阶级。美国人沃尔特·李普曼<sup>[2]</sup>在《舆论》(1922年)和《虚幻的公众》(1925年)等书中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这些书拥有大量的读者。D.H.劳伦斯认为,民主

---

[1] 近年来,有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学者对于民主、自由主义等术语的用法产生了怀疑,因为这类术语可用于指许多不同的事物,“对于严肃的分析目的来说没有价值。”我们可以谅解这种看法,但不必完全附和。

[2]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 - 1974年),美国新闻评论家。

是有悖常情的;任何健全的社会都可以找到它的天然领袖,任他去统治。“凡事最终要有一个真正的首领,每一种有机的事物都必须如此。”虽说劳伦斯从来不认为墨索里尼符合他的凯撒主义标准,但庞德却予以认可。伊芙林·沃<sup>[1]</sup>赞同墨索里尼,后来又赞同弗朗哥在西班牙的独裁统治。在其他亲法西斯的知识分子当中,著名的先锋派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sup>[2]</sup>对希特勒产生了好感,后来他成为弗朗哥政权的支持者。以上说的都是20年代文学和思想界的重要人物。

魏玛时期的德国出现了各种新保守主义流派,他们悲叹“下等人的统治”,这是1927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作者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反动人物爱德加·容格<sup>[3]</sup>(此人后来为希特勒所杀,在反对民主思想方面,希特勒容忍不了任何竞争者);容格是路德派教徒,他的思想很接近奥地利天主教思想家奥特马尔·施潘提出的回归中世纪的主张。罗伯特·布拉希拉克和德里尔·德·拉·罗谢尔<sup>[4]</sup>加入了夏尔·莫拉斯和莫里斯·巴雷斯等老派人物的行列,当时他们还活跃在那些至少算是半法西斯分子的法国知识分子中间。在左翼方面,那些拥护苏联共产主义的人,当然渴望本国出现一个严厉的专制政体,粉碎资本家,建立社会主义。

不过,总的说来,20年代是反政治的或者说是非政治的。在阴郁的俄罗斯和偏远的意大利出现的怪事和怪人,还没有那么强大的吸引力,并不能主导西欧知识界主流,同时西欧自己的那些软弱无力的政治家们只会招致鄙视;这是斯坦利·鲍德温、卡尔文·柯立芝、爱德华·赫里欧<sup>[5]</sup>时代,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正在没完没了地暗中玩弄联合政府的把戏。路德维

[1] 伊芙林·沃(Evelyn Waugh, 1903 - 1966年),英国讽刺小说家。

[2]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 1904 - 1989年),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

[3] 爱德加·容格(Edgar Jung, 1894 - 1934年),德国纳粹党重要成员。

[4] 罗伯特·布拉希拉克(Robert Brasillach, 1909 - 1945年),法国作家、报人。德里尔·德·拉·罗谢尔(Drieu de la Rochelle, 1893 - 1945年),法国作家。

[5]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 1867 - 1947年),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23 - 1937年间三次出任首相。

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1872 - 1933年),美国第30届总统(1923 - 1929年)。

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 1872 - 1957年),法国政治家和文学家,曾出任部长、总理、议长等职务。



希·马尔库塞<sup>〔1〕</sup>回忆说:“我都记不起来那些年我是否投过票——当然,也就更记不起来投给谁了。”托马斯·曼的《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是一个很典型的反应:“我讨厌政治和政治信仰,因为它使人无知、教条、固执和丧失人性。”这股政治氛围反映的是,在战争导致幻想破灭之后,人们警觉地怀疑一切高尚的理想。



达利的超现实主义漫画(1941年)

在另一方面,文学和艺术获得了大丰收。20年代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于连·本达<sup>〔2〕</sup>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这位法国文学批评家和社会评论家指责知识分子背叛了他们捍卫永恒真理的使命。人们应当避免为任何一种政治上的“主义”服务。“迷惘的一代”过于迷惘,以至于或许除了酒色之外,什么都不相信。弗吉尼亚·沃尔芙笔下的达洛维夫人<sup>〔3〕</sup>,

无法忍受作为一名重要政客的妻子的生活;政界的事情令她厌烦,窒息了她的精神,所以她就用培养纯粹私人事务的感受力来获得解脱。

很难想像这一时期的大作家——D.H.劳伦斯、安德列·纪德、欧内斯特·海明威、詹姆斯·乔伊斯、T.S.艾略特——会不反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明,虽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反感在战前就已经存在。他们都是有名的漫游者;美国“侨民”跑到巴黎,加入海明威和格楚德·斯坦因<sup>〔4〕</sup>的队伍。英国“侨民”劳伦斯痛恨故国,他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寓居新墨西哥、墨西哥和意大利;乔伊斯逃避爱尔兰,先后到过的里雅斯特、苏黎世和巴黎。当然,还有躲避共产主义的俄国难民,躲避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难

〔1〕 路德维希·马尔库塞(Ludwig Marcuse,1894 - 1971年),德国哲学家和文学家、戏剧批评家。

〔2〕 于连·本达(Julien Benda,1867 - 1956年),法国作家。

〔3〕 《达洛维夫人》是沃尔芙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4〕 格楚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1874 - 1946年),美国先锋派作家。

民以及后来躲避纳粹主义的德国难民。与远离故土、身处异乡的同时,他们在想像中远离西方文明,这一点表现在劳伦斯对伊特鲁里亚人和阿兹特克人的崇拜上,表现在庞德引进汉字或他所想像的中国文学上。这种遗世独立的情绪战前那一代人也曾有过,但是,有一道严格的界线将这场战争与战前那一代人隔离开来。伊芙林·沃认为,这实际上是英国历史上新老两代人之间第一次重大分化,事实上他们可以分为三类人:1914年前老一代“成名者”,他们基本上没有亲临战场;上过战场的幸存者;1900—1905年左右出生的人,他们正好没有从军经历。但是,根据各种流行说法,早在20年代初,在处世方式和道德规范上,青年大学生与长辈已经迥然不同。卡夫卡的朋友麦克斯·布罗德说过:“1914年之前和1914年之后截然不同”——他们只是名义上在同一片土地上。

“一个老掉了牙的婊子”——这是庞德对西方文明的裁定。与此同时,通常比较乐观的H.G.威尔斯(他在战争期间创造了一个警句“用战争终结战争”)认为:“我们所在的文明正在倒塌,而且我想它倒塌的速度非常快。”诸如此类的评论不胜枚举。最经典的论述当数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这位德国中学教师刚好在1914年之前写成这本书,到了战争结束之际,这本书已经有许多译本。与威尔斯那本更受欢迎的重新评价历史的著作《世界史纲》一样,《西方的没落》也是一位有感而发的业余历史学家写成的著作,有意让职业历史学家自惭形秽;它以尼采式的文化悲观主义忧郁基调全面概述了欧洲历史,称得上一部文学经典。它认为欧洲文明在中世纪达到了顶峰,此后就一直在衰落,这种观点变得十分时髦。在奥尔德斯·赫胥黎<sup>[1]</sup>的小说《旋律与对位》中,那个以D.H.劳伦斯为原型的人物看到了一个退化过程:我们的祖先是巨人,我们却是小侏儒。有英国“忧郁的教长”之称的威廉·英奇<sup>[2]</sup>,在1920年出版的一本书里,称进步的观念是“西方150年来的实际信念”,并且发现它是一场骗局。比斯宾格勒更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在20年代就开始了他气魄宏大的对社会兴衰进行的比较历史研究,这部书在1934年出版了前三卷,接下来的三卷,也就是全书的精华,在1939年接近收尾。由于疾病的原因,他未能参战,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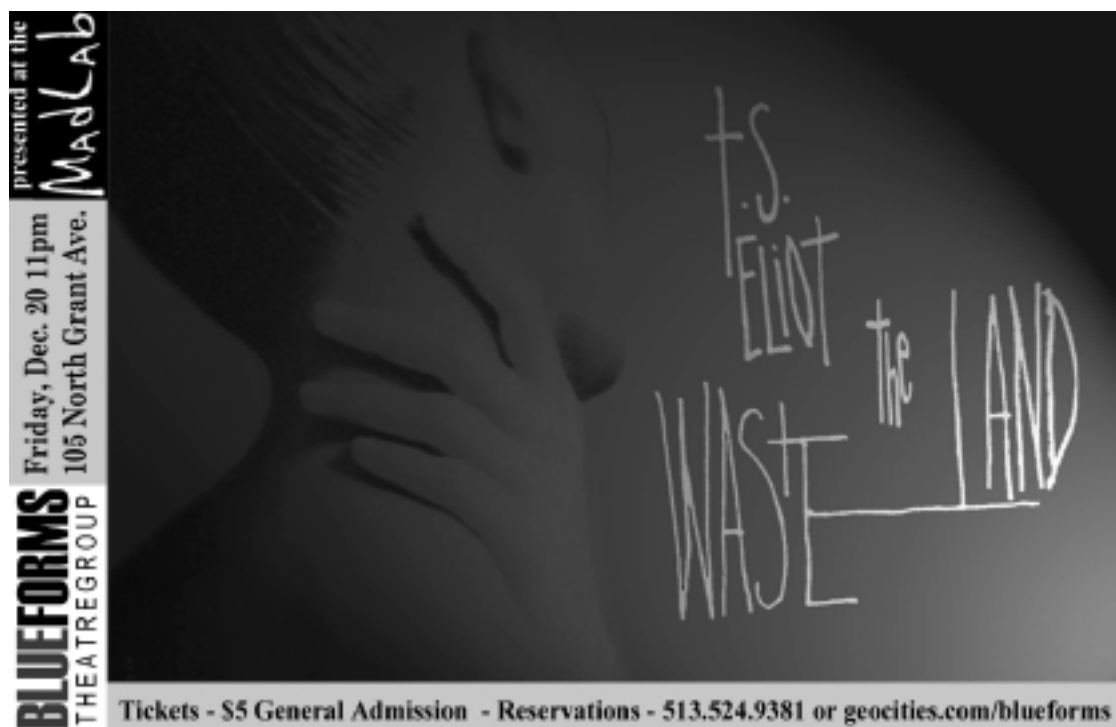
---

[1]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 - 1963年),英国小说家、评论家,以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著称。

[2] 威廉·英奇(William Inge,1860 - 1954年),英国国教圣保罗教堂的教长,经常撰文抨击乐观主义观点。

场战争本身却激励这位才华横溢的牛津研究员从事这项也许是 20 世纪最令人钦佩的历史综合工作。最后,他认为西方的失败是一种精神上的失败。

奥尔特加·Y·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表达了一个相似的主题:欧洲衰败的原因在于缺乏有创造力的领导人。保罗·瓦莱里论欧洲危机的文章(“事实上精神严重受到侵害”)和 T.S.艾略特的名诗《荒原》表达了相同观念。这些年间涌现的文学经典大多如此。对于绝对腐败世界的厌恶情感,可见于伊芙林·沃那些妙趣横生、才华横溢的小说,其中的第一本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衰落与瓦解》。这种厌恶情绪也体现在法国小说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所做的微妙的心理探索中。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小说记述了法国社会的衰颓。20 世纪 20 年代回响着送别欧洲时代的挽歌。



《荒原》被改编成戏剧,这是一家剧院的海报

艾略特的《荒原》是 20 年代初的一颗炸弹,出现在所有大学生的书架上;它从法国象征主义者那里借鉴了现代主义风格,它的思想主旨风行一时,它所产生的影响极少有“高雅作品”能够企及。诗歌一开始就引用了佩特罗尼乌斯<sup>(1)</sup>的话:“我们都想死。”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因为它不再产生新的生命,欧洲已经失去它的创造力。这位美国出生的哲学博士和昔日的银行职员,利用所有象征主义技巧,找到了表现宗教和爱情徒劳无益的

(1) 佩特罗尼乌斯(Pertorius, 27 - 66 年),古罗马作家。

意象：“这里没有水，只有岩石。”过去滋养文化的能量之泉已经干涸，只剩下恐惧和胆怯。“我给你看一捧尘土中的恐惧。”<sup>〔1〕</sup>这个伟大的传统并不是在轰鸣声中、而是在抽泣声中结束的。现在人们认为，艾略特更多地是在记述一场严重的个人危机，而不是记载西方的没落，但这两个层面完美地融为一体；读者都愿意接受后一种意义。

艾略特不久就在17世纪的基督教里找到了逃避现代世界的去处。这种做法当时很流行。在法国，由雅克·马利旦<sup>〔2〕</sup>领导的一个重要群体回到中世纪的托马斯主义，而德语世界的卡尔·巴特和卜仁纳<sup>〔3〕</sup>的新卡尔文主义的名气更大。自由主义的世俗进步信仰垮台，导致这些“新正统派”神学家回到原罪说和世界堕落说。这些被详尽探讨的神学并不符合正统，因为它们通常“去除了圣经的神话色彩，或许还要援引容格学说以及其他现代观念，把基督教解释为存在意义上的真理——即揭示人类状况的真理——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正确”。但是它们可以消解战前那些基督徒以及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浅薄乐观主义，那些人相信这个世界的问题会圆满解决的。基督与其说是一位鼓吹仁义道德的传教士，不如说是一个预言大灾变的、“末世论的”预言家，他宣布世界的末日到了，让人们在上帝与世界之间做出选择。使西方人变得浅陋低微的，是由于赞美人性而产生的骄傲这种罪过。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sup>〔4〕</sup>曾写道：“不要去相信人性，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种信念是近年出现的一种异端，非常危险。”

巴特通常被认为是当时最伟大的神学家。他的《论罗马人书》（1919年）标志着他与先前盛行的自由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德国神学决裂。先前的神学受到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上帝计划的实现。这种自由主义神学认为，上帝的目的已在这个世界实现，它几乎与世俗的进步观念融为一体。巴特断然否定这种看法。没有这样一种将人类与上帝统一起来的综合体；二者几乎是完全疏离的，人类是不完美的，需要上帝的帮助才能得以完善，但是只有在圣经依稀透露的启示中才能找到上帝。这种新神学（有“危机神学”、“辩证神学”、“宣讲神学”等各种

〔1〕 译文见紫芹选编《T.S.艾略特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5页。

〔2〕 雅克·马利旦（Jacques Maritain, 1882 - 1973年），法国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家。

〔3〕 卡尔·巴特（Karl Barth, 1886 - 1968年），瑞士新正统派神学家。  
卜仁纳（Emil Brunner, 1889 - 1966年），瑞士新正统派神学家。

〔4〕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 - 1979年），英国历史学家。

名称)表面上具有相当反动的特征——回到了原罪说以及路德宣称的需要天恩挽救的不幸人类说——实际上这些特征使它显得具有革命性质。人们摒弃了一个腐败的世界,而又拒绝接受那种与这个世界相妥协的、乏味的、制度化的基督教(或它的世俗替代物)。在这里,巴特援引了19世纪丹麦宗教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在复兴克尔凯郭尔思想的过程中,他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致相同的特征可见于马丁·布伯的犹太教神学以及N.别尔嘉耶夫基于俄国东正教发表的观点。别尔嘉耶夫原先是共产党员,在20年代逃离了列宁治下的警察国家,来到柏林,后又到了巴黎。布伯的名作《我和你》在1923年面世。该书区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把上帝当做对话中遇到的“永恒的你”。这些见解很令人激动,其中有一些远不如巴特的思想那么正统。巴特的亲密伙伴鲁道夫·布尔特曼<sup>[1]</sup>通过他的“非神话化”传递了现代主义色彩更浓厚的思想信息。“非神话化”意味着,圣经中表现上帝意旨的语言只是一个外壳,它包含着重要的、忠实于生活的内核。

对流行文化的强烈反感强化了知识分子的感受:文化已经堕落。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来临,植根于传统的欧洲高雅文化之中、具有良好教养的少数派,越来越游离于大众之外。在20年代,“人民”更感兴趣的似乎是体育事件、航空、侦探小说、填字游戏、电影明星、麻将、桥牌和米老鼠,而不是严肃的思想或优秀的文学和艺术。高雅和低俗、精英文化和流行文化——美国文学批评家范·威克·布鲁克斯<sup>[2]</sup>所说的野花稗草——之间的鸿沟变成了大峡谷。普通人成为可悲的笑料,文化民主成为一个奄奄一息的文明的最后荒诞。“女店员心态”和作为“蠢材”(门肯<sup>[3]</sup>的说法)的凡夫俗子成为人们熟知的讥笑对象。

门肯本人所在的美国成为人们最喜欢用的替罪羊,因为它是新型大众媒体最明显的来源,虽说这些大众传媒在欧洲并非不受欢迎。一个又一个的欧洲批评家称之为“美国的威胁”,这是当时一本法文书的副标题。一个没有艺术或文化的国家,一个市侩的家园,顺从守纪的美国文化敌视自由;伯特兰·罗素重复了托克维尔在一个世纪之前的观点:“显而易见,在这样

[1] 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 - 1976年),德国神学家。

[2] 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1886 - 1963年),美国批评家。

[3] 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1880 - 1956年),美国报刊专栏评论家。

一个社会里,自由只能在私下里才存在。”但是批评美国文明最猛烈的莫过于美国知识分子。欧洲人以从未有过的姿态去欢迎美国文学,部分原因在于,像辛克莱·刘易斯这类美国作家激烈地挖苦和讽刺自己的国家。一些反叛文人为1922年召开的“美国文明”研讨会撰稿,猛烈批评美国文明,不久他们纷纷逃到了巴黎。

## 20年代的弗洛伊德

在20年代,可以感受到1914年之前所形成的强烈颠覆思想的全部威力,此时弗洛伊德现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沃尔特·李普曼是在1915年发现了他的重要性。李普曼写道,这位伟大的维也纳心理学家“已经对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冲击,其后果很少有人敢去预测”。弗洛伊德的维也纳同乡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直到1919年才发现弗洛伊德,他惊奇地发现这位心理学家“能说出点道道”。弗洛伊德也加入了20年代的悲观氛围。可能由于年纪和病痛的缘故,他变得更加悲观了。战争使他把攻击性和性一同视为一种基本冲动,使他在探讨生命/爱情驱策力、情欲力量的同时,也探讨死亡的本能。人类天生是攻击性动物,他们会剥削、抢劫,如果没有受到有力约束的话,他们甚至会折磨和杀戮他人。弗洛伊德在给爱因斯坦的信里说:“在生活经历和历史提供的所有证据面前,谁还敢对此持有异议?”他在20年代的著作,例如《文明及其不满》,让读者感觉到,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斗争不会有满意的解决办法,而且永远也不会结束。秩序井然的社会要求压抑“本我”的冲动,但是这么做一定会使个体受到挫折。“文明的代价是神经官能症”。科学的缓慢进步只是我们还怀有的一线希望;他一如既往地鄙视宗教,集体的神经官能症(《一个幻觉的未来》)。但是,在评论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中,莱因霍尔德·尼布尔<sup>[1]</sup>把他和巴特主义的悲观论联系起来,因为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是悲剧式人物,为矛盾所苦恼。当然,不难看到,弗洛伊德破坏了理性思想的界线。他指出,“无意识的险恶丛林”(查德·沃尔什<sup>[2]</sup>语)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决定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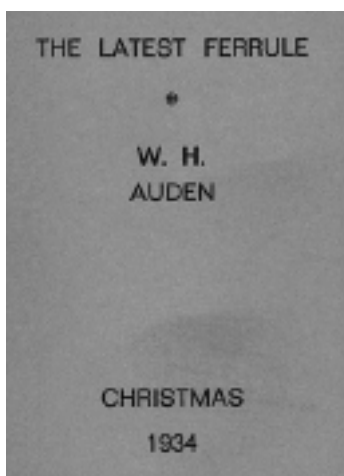
随名气与日俱增,精神分析迅速膨胀为一项大产业,尤其是在美国。尽管弗洛伊德身体状况不佳,尽管他发起的精神分析运动内部继续分裂,

---

[1]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 - 1971年),美国神学家。

[2] 查德·沃尔什(Chad Walsh, 1914 - 1991年),美国神学家。

但是直到他 1939 年去世,弗洛伊德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创造力和巨大的影响力(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纳粹分子把他从维也纳赶到伦敦)。



奥登的作品

后来诗人 W. H. 奥登<sup>[1]</sup>写道:“对于我们而言,他现在不再是一个人,是整个舆论氛围。”在理解这个“舆论氛围”的时候,出现了某种反讽。通常人们把弗洛伊德与性革命和色情联系起来。然而,事实上,就个人生活而言,他一生都苛守道德戒律,就目前所知,他从未有过不忠于他传统型妻子玛莎的行为。他认为,不受任何约束的性自由不会带来幸福;事实上,他反倒认为,如果让性爱更加放开就会导致性爱贬值,从而减少人类的幸福。(“当性满足的障碍不复存在之时,爱情就会变得没有价值,生活就会很空虚。”)当然,20 年代的文学和生活的一个特点

是,在性这个问题上很坦率,而且很开放。这让许多人吃惊,觉得这是史无前例的。(有人会问,那些人对 18 世纪的上层阶级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市井风情究竟了解多少。但是不管怎么说,1914 年之前的那一代人开了风气之先。)虽说弗洛伊德把性冲动和性习惯纳入了研究范围,但他没有鼓励它们摆脱一切道德和社会的限制。

在很多方面,弗洛伊德都表现出保守气质。他深深地怀疑这类论断: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重新改造社会,可以消除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共产主义与传统宗教一样,都是一种幻想。精神分析提供的基本真理适用于任何性质的社会。然而某些离经叛道的心理分析家,例如性情古怪的威廉·赖希<sup>[2]</sup>,试图将共产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嫁接起来。(结果赖希同时得罪了这两种专断的教义,被两派革出教门。)在许多青年激进分子看来,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似乎都是一针见血的怀疑论,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言,它们是“现代腐蚀剂”,能够颠覆传统的价值观。但它们也相互解构。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社会激进主义者受到了神经官能症人格的驱动;马克思主义者宣称,弗洛伊德是资本主义颓废的产物。

20 年代涌现的令人振奋的新文学和艺术,在很多地方借重弗洛伊德的

[1] W. H. 奥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 - 1973 年),美国诗人。

[2] 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 1897 - 1957 年),奥地利心理分析学家,后移居美国。著有《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性革命》等。被视为“性解放”的理论先驱之一。

思想,但是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一种神经官能症性质的幻想,也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幻想,它取代了为适应现实而进行的成熟的心理调整。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还会论及。在这一时期,总的说来,弗洛伊德俨然成为战后几十年中的一位思想巨擘。20年代的另一位思想巨擘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现在应当探讨一下20年代初自然科学领域发生的震撼人心的巨大变化。

## 爱因斯坦和科学革命

这场新科学革命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大致与当年文学、心理学、社会思想方面的惊人变化同期发生。它之所以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是因为它晦涩难懂。直到20年代,物理学家就那些触及科学本质的问题持续展开争论,才引起大众的注意。接着它就成为20年代的一个主要的轰动性事件,并使爱因斯坦的名字家喻户晓。

1919年,从6月末到6月,有关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大标题占据了报纸的头版,挤走了对凡尔赛和约的报道。诚然,1912年就有维也纳的一家报纸捕捉到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的理论,这条报道的标题是《危险时刻:数学科学的一场轰动》。它指的是所谓狭义相对论,说这个理论解决了科学研究所提出的有关时间和空间客观存在的问题,要么也许是把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神秘。这位才华横溢的德国犹太科学家是众多科学研究者中的翘楚。他们之间的合作反映了国际科学组织的力量日益加强。爱因斯坦得益于许多人的思想和实验(这里只能列出少数人的名字):奥地利的恩斯特·马赫,荷兰人H.A.洛伦兹,德国人亨利希·赫兹,在波兰出生、在巴黎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1903年,1911年)玛丽·居里;还有法国数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亨利·庞加莱,他早在爱因斯坦于1905年发表那篇论文的三年前,就写过相对性原理的论文。爱因斯坦本人在苏黎世工学院的老师、不幸英年早逝的赫尔曼·闵可夫斯基,处在欧洲青年科学家形成的这股沸腾的新思想的主流。

与爱因斯坦关系最直接的四位伟大前辈是:马赫、庞加莱、洛伦兹和普朗克。在19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爱因斯坦认为光是粒子(光子)而不是波,他认为这篇论文是他同年发表的三篇论文中最重要的一篇。就在这篇论文中,他发展了老一辈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在1899—1900年间提出来的、当时还不很清晰的量子论,使它名声大噪。相应地,普朗克也是



相对论的早期和热情的支持者,尽管他最初没有全部接受爱因斯坦的思想。与相对论相比,量子论在观念上的革命性一点也不逊色。1900年,普朗克就认为:“我的发现与牛顿的发现同样伟大。”后人已经同意他的看法。稍后我们再回到普朗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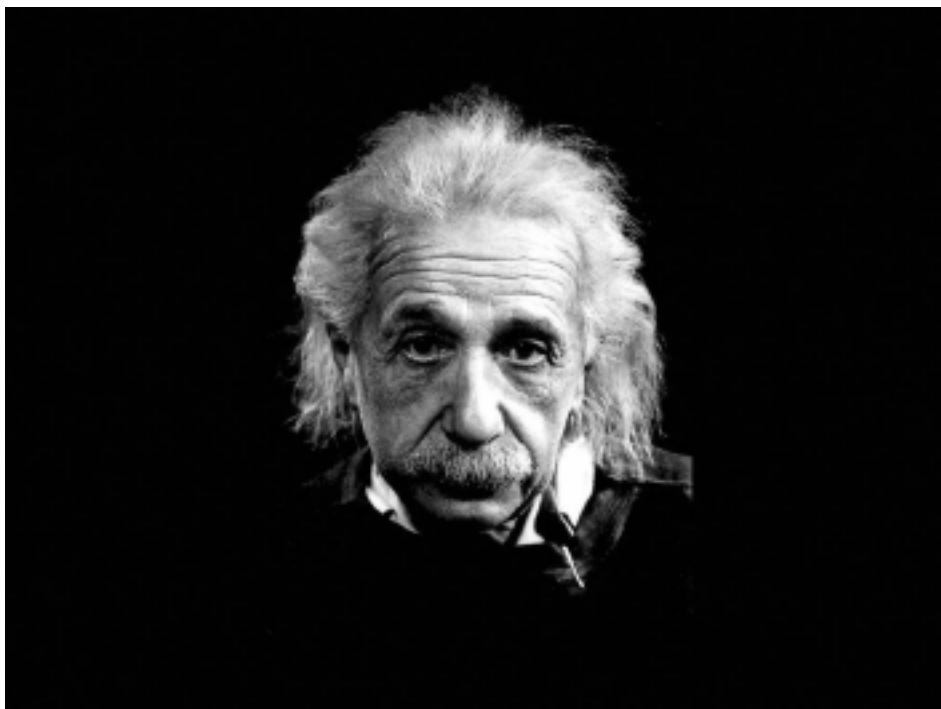
按照通常的说法,人们长期接受的那些科学观念获得澄清,始于两位美国人的一个实验。他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全然不知自己碰巧步入了物理学新时代。1887年的迈克尔森-莫雷实验,本来是想通过测量沿地球运动方向的光行时间,与逆向的时间相比较,来确定地球的实际速度。这个实验的结果似乎揭示了这样一种神秘现象:以太等类物质并不存在,地球和其他星体的运动无需穿过这类物质。迈克尔森—莫雷实验受到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的启发。这位杰出的苏格兰理论物理学家在1867年提出的电磁学方程组,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的重要开端。麦克斯韦向牛顿经典物理学的超距作用提出挑战,并谈到了相对性。但是站在麦克斯韦背后的是丹麦人汉斯·约瑟夫·奥斯特,据认为,他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为电磁场理论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地球周围并不存在气状物质。结果显示,无论在地球运动方向还是在垂直于这一方向上,光速并不改变,这就好比一个人在传送带(例如你在机场见到的那种)上行走的速度与一个以同样步伐不在传送带上行走的人的速度一样快。如果“以太”不存在,那么就对物理学进行各种修正。光和电都被认为与波的行为相似(富科近期的研究似乎证明,光是一种波而不是粒子)。假如供波传播的媒质不存在,那该怎么办?构成宇宙固定背景的一个实存空间是测量时间和空间必需的标杆。没有了它,空间和时间就不再是绝对的事物了,而是依局部的情况而定,在宇宙内不同位置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观测者看来,一系列事件发生的顺序可能有所不同,有人看到事件A发生在事件B之前,有人看到的结果正相反。统一的宇宙时间是不存在的,这就好像说,大学各个教室里的时钟报的是不同时间,但是每一座时钟所报的时间,对于那间教室里的人来说,都是正确的;就整个大学而言没有一个正确的时间。更惊人的是,一个人在宇宙中走了很长一段路程,回来之后就会发现,与一直待在家里的朋友相比,他变得年轻了;相对于没有运动的物体,运动物体的时间变慢了。

在20年代,时间的这些悖论很能抓住公众的想像力。在爱因斯坦发表的3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中,有一篇探讨了这个问题(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他26岁,还没有获得教职;当时他在驻波恩的瑞士专利局工作)。

他解释了惯性系的平等性,提出了他的四维时空统一理论,以取代旧有的、绝对的时间和空间观。<sup>〔1〕</sup>但是有关爱因斯坦的头条大新闻(《空间弯曲了》)直到1919年5月29日科学家进行日食观测时才爆出。这些观测是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公众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观测结果似乎证实了他的广义相对论,提供了比牛顿的神圣的重力理论更好的替代品。以前许多著名物理学家听爱因斯坦说,时间空间的曲线几何比牛顿的理论更能解释重力,他们昂然而去,小声抱怨“一派胡言”。可是到了现在,胡言居然成为事实。

爱因斯坦在他的理论中假设说,重力并非像人们一直信奉的那样是一种神秘的、瞬时的吸引“力”,事实上,相对性排除了这种情况,因为“同时”已经失去了意义;在整个宇宙当中没有“同时”,只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性时



爱因斯坦

间。当然,也没有传送这种“力”所需要的、类似于以太的媒质。爱因斯坦认为,重力是由类似于电磁波的波构成的,它沿着时空的测地线以光速行进,服从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纯粹的数学家,如罗巴契夫斯基、黎曼和高斯都已表明,基于不同的假设,根据曲线或双曲线,而不是直线,可以产生非欧几里得的体系,同样能够自圆其说。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场逻辑游戏,结果它比欧几里得几何学更适合解释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宇宙。)这些重力波受到物质场的影响。爱因斯坦的理论预言,从遥远的星球射向地球

---

〔1〕 一些忙碌而又无知的记者总是催促爱因斯坦,以简单快捷地总结一下相对性,后来爱因斯坦习惯于说:“在我之前,人们都认为,如果把所有的东西都从宇宙那中拿走,剩下的就是时间和空间,我却证明,如果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什么都剩不下。”——原注

的光线,经过太阳的引力场就会变弯。1919年5月一次罕见的日全食碰巧提供了检验这个理论的机会。观测的结论对爱因斯坦有利。其他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牛顿定律被推翻,或者说至少被修正,这已经够让人吃惊的了,试图从新的角度思考这个世界就更令人难以想像了。“物质宇宙的结构本身”发生了变化。广义相对论一直被称作“人类的思维所创造的最有原创性的观念”。它只是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科学革命的一部分,这场科学革命向17、18、19世纪科学家推导出来的、长期被肯定的许多定律提出质疑。另一项令人目瞪口呆的、对熟悉的科学里程碑的修订涉及到原子的内部世界,在20年代这门学科有了大发展。这场革命的开端同样可追溯到世纪之交的那几年,那时整个旧的“范式”仿佛轰然解体。从哪里开始的呢?1896年,德国科学家威廉·伦琴发现X射线。一个月后,法国物理学家亨利·贝可勒尔偶然发现,铀盐发散出的射线像X射线那样穿透物质。他碰巧发现了所谓的“放射性”,事实上这个词后来是玛丽·居里创造的。这位波兰移民科学家,与丈夫居里一同在巴黎工作。许多种射线即“波”被发现,正如克拉克·麦克斯韦的电磁学方程组所预言的。英年早逝、才华横溢的德国科学家亨利·赫兹当时已经于1885年发现了无线电波。1897年,J.J.汤姆森在剑桥大学重复赫兹的一个实验。在设计出阴极电子管(后来演变为电视显像管)之后,他发现了“电子”,即负电的单位。当时他并没有把它们和原子的辐射等同起来。

几年之后,欧内斯特·卢瑟福证明,带电粒子能够穿透原子。这很令人诧异,因为原子一直被认为是最小的物质单位(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就是这样)。与牛顿的粒子相似,原子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实心的、致密的、坚硬不可穿透的”。自从约翰·道尔顿在19世纪初重申这些特征以来,它们就构成了化学的坚实基础。化学家的世界就是以这些原子为中心的。它们重量不同,各自代表一种“原素”,并组合在一起形成分子。可是现在看来,它们绝不是实心的,而主要是空壳,具有一个核(集中了绝大部分的重量,而体积很小),周围被负电荷所包围。恩斯特·马赫甚至开始怀疑它们是否存在——或许它们只是语言制造的幻象。

卢瑟福,这位新西兰出生、在英国工作的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他最初在曼彻斯特大学,后来来到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使用了从放射中获得的“阿尔法粒子”。这些粒子体现了原子的自发衰变现象——这在以前看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就原子这个词的词义而言也是矛盾的。一些

重元素的某些原子是不稳定的,会逐渐裂变——实际上用人类的时间来衡量,裂变速度非常慢,但却是稳步进行的。构成它们的原子结构的粒子逃逸掉了。越来越明显的是,原子(如果它们存在的话)包含一个体积微小、较重的由质子构成的原子核(后来发现原子核里还有中子),带有负电的电子则维持着原子的平衡。在20年代它们之间的关系让物理学家困惑不已。牛顿提出的关于运动和重力的定律一直被当做金科玉律,可是在原子的内部却全然无用,一种新的力学有待于建立。原子本来被认为是不能继续划分的,可在它的内部,却有一个全新的、复杂的力的世界。使原子聚合在一起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分裂原子就可以释放出闻所未闻的巨大能量。

在19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爱因斯坦曾经推断出这种力,提出著名的公式:“ $E = mc^2$ ”。物质和能量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物质是高度集中的能量。(为什么这种联系与光速有关呢?)其他人也在进行同方面的工作。历史学家发现,爱因斯坦声称自己第一个发现了这个著名的公式,这是有道理的,尽管对此一直存在争议,而且这个将质量和能量联系起来的公式,在发展过程中<sup>[1]</sup>，“好些人都躬与其役”。弗里德里克·索迪在1904年提出的公式与爱因斯坦的公式几乎相同。皮埃尔·朗之万,玛丽·居里的好友,1906年在不知道爱因斯坦已经计算出这个公式的情况下得到了它。

1919年,卢瑟福分解了原子。早在1914年,他就在一次通俗讲座中指出,在爱因斯坦之后,我们已经知道,原子内部贮存的势能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比重量相同、最有威力的炸药(的能量)大上几百万倍。”科幻小说家H.G.威尔斯已经预见到了它的使用。作为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之一的卢瑟福的工作也被战争中断,在那期间他主要研究潜水艇探测技术。他利用少量剩余时间,一点一滴地去做,最后成功地用阿尔法粒子(即氦核)破坏氮原子,产生氢和氧。但是,卢瑟福认为,“在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而不是在几千、或上百万年里,让铀或钍这样的物质释放出能量”,来开发这种能源,换句话说,加快放射速度,“目前看来没有希望”。

他在1919年6月写道:“要是我能让原子核产生分裂,这要比战争的意义大得多。”但是卢瑟福的成就并没有立即产生轰动效应,而是被同时期爱

---

[1] 见W.L.法德纳:“爱因斯坦真的发现了‘ $E = mc^2$ ’?”《美国物理杂志》,56期(1988年),第114-122页。

因斯坦的重力观测给掩盖了。13年后,卢瑟福的学生和同事詹姆斯·查德威克发现中子,它是原子内部的一种粒子,既不带正电荷也不带负电荷,其存在早就被卢瑟福预言过。这将导致原子能的利用,因为中子——质量与质子相同——能够接近较大的原子的核而不被排斥,因而可以被用来使它们分裂。(这些都是30年代和二战期间的东西。)

与此同时,在20年代,顶尖物理学家就核物理爆发了一场引人注目和非常有名的激烈争论。科学家最初认为,原子的内部是一个微型的太阳系,原子核像太阳一样,周围是作行星式运动的电子。但是人们不得不摒弃这种看法,因为它得不到力学定律的支持。(按照力学定律的原理,电子很快就会撞到原子核上。)太阳系的运动规律在原子内部根本不适用。这样一来,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牛顿经典力学定律,先是在宏观层面上破产,现在又在微观层面上破产了。真正适用的似乎是马克斯·普朗克在20世纪初发现的量子原则。普朗克在从事热力学研究时发现,物体加热后不连续地以突发的方式散发出能量,这就违背了牛顿的另一条运动定律。热量使电子突然从一个能级跳到另一个。普朗克发现的能量与辐射频率之间的比率常数,在核物理中适用于描述电子的质量、速度和波长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认为电子既是波又是粒子)。

从1913年起,爱因斯坦在柏林就与普朗克一起对量子论做出了贡献,然而在20年代,他却反对新的量子力学理论。在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上,新一代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们攻击着神圣的关于确定性和决定性的科学原则。爱因斯坦相信宇宙是可以认识的,他无法忍受这类攻击(按照他的名言,上帝会向我们挑战,但不会欺骗我们)。令人感慨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代年轻人算是爱因斯坦的晚辈,现在他们却反抗父辈,真有点像弗洛伊德描述的弑父情结。其时爱因斯坦已年近半百;这一拨后起的科学天才却年轻得让人称奇。当沃纳·海森堡、狄拉克和德布罗意一跃登上舞台的中心时,海森堡23岁,狄拉克23岁,德布罗意年龄与他们相仿。丹麦奇才尼尔斯·波尔曾在普朗克和卢瑟福门下学习。在大众看来已经算是宇宙的颠覆者的爱因斯坦,现在居然成了保守派!爱因斯坦不肯接受不确定性这种定论,他调动自己出名的想像力进行思想实验,以难倒量子力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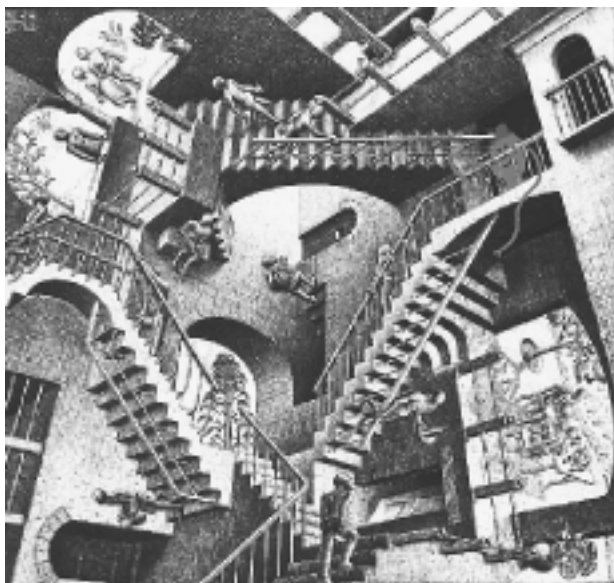
这是现代物理学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极有造就和产生重大修正的时代。物质的极限产生的难以名状的奇特现象引出了大量阐释。电子既有粒子的属性,又有波的属性,看上去这不可能。科学家们谈论“波粒二象性”和“波动力学”。两个电子可以同时处在一个位置上。更令人困惑的

是,它们的位置和速度都无从知晓。正如伯特兰·罗素所评论的那样,在量子论提出之前,没有人怀疑过,在特定的时刻,一个物体总是处于特定位置,按照一定的速度运动。但是你确定的粒子的位置越精确,你测定的速度却越不准确,反之亦然。事实上,我们知道的不过是某些方程式,对于这些方程式的解释很模糊。它们适用于在一定时期内大量电子的统计概率;个别的电子则是无法准确预言的。罗素说道,一个混乱的宇宙充斥着不顺从的少数派。例如,量子力学能够计算出固定时间内衰变的放射性物质的比例——比如在以后一千年中有 10% 的放射性物质发生衰变,但是下一个阿尔法粒子将在什么时间离开,还有它究竟是哪一个阿尔法粒子,却无法预测。

与相对性的悖论相似的是,这并不只是一个研究中的弊端,可以在未来克服;它是事物本质所设定的一个绝对的限制。一个理由是,我们达到了观测的极限,因为必须使用粒子(伽马射线,所有射线中最短的)观测其他粒子,这样一来,我们就干扰了它们。科学家无法超然处于他们的观察对象之外;他们本人就是观测的一部分。那些可怜的人文学者或社会科学家对此很感兴趣,或许他们为此感到鼓舞,可是对于整个科学传统而言,它却是一个警告;科学达到了它无法逾越的边界,它必须放弃寻找确定性。

德布罗意和薛定谔想像出一个充斥着奇怪的波动的室(chamber)——是什么东西的波呢?概率的,这是一个让人困惑不解的答案。有人认为,想像一个可以与人类日常经验相比较的物理模型,是错误之举;这个世界最好被视为一套数学公式。如果我们让自己不受这类日常经验的偏见的限制,我们就可以想像出各种东西——第五维或是十二个维度。

可是,把世界数学化却很有风险,这不仅让绝大多数不懂数学的人无从理解,而且把世界神秘化了,在某种意义上毁坏了现代科学的前提本身。另外,我们的思想局限可能也被带入我们的数学之中。数学自身的地位曾经遭到怀疑,在数学领域也发生过那种先前的确定性被摧毁的事情。从 1900 年的希尔伯特到



艾舍尔的画《相对》

与哥德尔的数学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1931年的哥德尔,数学哲学走过的道路类似于物理学从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到波尔和海森堡这条线路,那就是,对于客观性和一致性的怀疑日益增加。数学像语言一样(也许数学就是语言的一个分枝),好像不是对自然的反映,而是一种人为的发明。它的内容与其说与物质性的自然有关,不如说与人类的精神有关。

连爱因斯坦都感到惊异的矩阵代数,被引入物理学,以对付假想的“概率波”。1927年在比利时召开的索尔维物理学大会上,这场战役打响了。爱因斯坦在会上反对“不确定性”,波尔和海森堡与他针锋相对。躬逢盛会的大部分顶尖科学家站在了爱因斯坦的对立面。我们必须承认人类认识的局限、亚原子层面上物质行为的完全不同的性质,和我们无法获得任何超出理论上的概率之外的结论(只能归纳出统计上的规律,而不能预测特定事件)。对于这种困境的概念化呈现出好几种形式。也许正如尼尔斯·波尔推断的那样,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模糊的、互补的、矛盾的,每个事物也都有它的对立面。或者也许外在世界是澄澈明晰的,问题出在我们人类的思维,由于某种内在局限而未能弄清楚这个世界。似乎不是自然就是人类的思维存在缺陷,要么就是它们之间的配合出现了问题。这个矛盾没有答案,或者至少是凭“常识”所无法理解的。

但是当然,正如爱因斯坦在相对性问题上给人们的启示,常识只不过是先前接受的训练在我们的大脑中层层累积下的成见而已;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新科学就会同旧科学一样为人们所熟悉。但是它似乎高深得多,不



哈勃太空望远镜

容易掌握,更缺少人情味。人们长期以来所熟悉的世界图景已全然不适用,这使人们产生一种困惑和失望的感觉。几年前,一位20世纪思想综述的编者发现:“19世纪的世界图景在今天几乎荡然无存。”1930年,爱因斯坦访问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与查理·卓别林和厄普顿·辛克莱一起用餐(这位大科学家的政治兴趣时断时续,而且相当简单)。他参观了威尔逊山天

文台,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1929年,爱德温·哈勃在此发现,其他星系都远离我们而去,而且距离越远,速度越快。爱因斯坦的相对性曾预言一个动态的宇宙,就像它预言核能一样(还有激光,依据的是爱因斯坦认为光是粒子、“光子”这种看法)。现在这些理论都被证实。比利时教士勒梅特神父提出,宇宙在几百亿年前的大爆炸中形成之际,只不过是一个原始的蛋状物,极为稠密和炎热,体积不超过棒球。爆炸是仍在进行——无限期地进行下去,还是直到最终重新收缩为蛋状物为止?(今天我们得知,宇宙在最初形成之际,其大小只相当于一个原子,虽说它在100亿亿分之一秒中就长到了葡萄柚大小。)

这些奇怪的宇宙爆炸愈发让人们感觉到,宇宙之怪诞神秘超出了最荒诞的科幻小说。科学不再是稳固的保障;“最后的确定性”一去不返。在好几代人看来,科学对于一般人而言很像科学家看待他们自身:揭开神秘的面纱,在这神秘面纱的背后,无知和迷信一直阻止事情露出简单和清晰的真相。20世纪初著名物理学家C.T.R.威尔逊相信,科学定律甚至可以让酒吧侍女听得明白,因为说到底它只是常识而已。现在,事物所有的牢固的真实性,连同它们的空间和时间媒介,消失得一干二净。按照伯特兰·罗素的说法,事物已经变成用来描述发生了什么的公式,而它本不如此。1925年,著名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一书中指出,

从18世纪开始人们暗中相信,荒谬最终总是会被清除掉的。今天我们又走了思想的另一个极端。老天知道,今天看起来是荒谬的东西没准儿明天被证明是真理。

科学依然是一种令人兴奋的精神探险,实际上它变得比以前更令人兴奋,但是它已不再与神秘主义者和诗人直接对立。现在科学家们本人就很愿意谈论“神秘的宇宙”,而且寻求宗教的帮助。德国物理学家冯·魏茨泽克研究印度宗教以便获得科学上的感悟。沃尔夫冈·泡利和卡尔·容格试图合作研究诡异心理学。沃尔夫冈·泡利提出的著名的“不相容原理”,事实上与神秘学宣称的魔术同样让人不可思议。泡利认识到,科学诞生于开普勒时代的神秘主义;现在它似乎在向神秘主义回归。一位研究巫术的历史学家[查尔斯·霍伊特(Charles Hoyt)]暗示说,当代物理学与他研究的对象未尝没有关系!艺术、宗教和科学之间严格的界线倾向于消失。



在战后不容异说的政治意识形态氛围中,科学也被政治化。1933年,爱因斯坦在希特勒执掌德国政权之际,宣布放弃德国公民身份,最终定居美国。纳粹宣布爱因斯坦是堕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不接受他的科学理论。更糟糕的是,一些很有声望的德国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内斯·斯塔克,也接受了民族社会主义的观点:科学从属于民族主义。斯大林的苏联也不承认这些“资产阶级现代主义”理论。苏联的共产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有别于资产阶级科学。许多年间,招摇撞骗的生物学家李森科,代表拉马克主义遗传学对俄国科学家进行恐怖统治,这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

## 20世纪20年代文学中的观念

战后时期的文学和艺术,虽说受到绝望情绪的感染,却呈现出罕见的辉煌气象,因为它们标志着整个现代主义运动风格的成熟。在20年代,萌发于战前时期的文学革命突然在公众面前降临。在战后的英语世界里,乔伊斯、庞德、艾略特、劳伦斯和弗吉尼亚·伍尔芙大放异彩,虽说他们的写作生涯在战前就已经开始。他们一般都是在19世纪80年初左右出生。D.H.劳伦斯第一本重要小说《儿子与情人》在1913年完成;他在战争期间写了《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乔伊斯蓄势待发,准备推出《尤利西斯》,这本小说将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样震惊世界;战争期间,他在苏黎世动笔,1920年在巴黎完稿。

在其他地方,战前孕育的花蕾此时也突然盛开绽放。法国的保罗·瓦莱里和马赛尔·普鲁斯特就是例子。普鲁斯特的长篇巨著《追忆逝水年华》,在1913至1927年间问世,虽然他于1922年51岁时即去世。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声誉在20年代达到顶峰,法国人安德列·纪德和爱尔兰诗人W.B.叶芝也是如此。布拉格的弗兰茨·卡夫卡也注定要加入这个不朽的现代主义文学家行列,他的名字直到20年代末才广为人知,这时候,他已经患肺结核去世好几年了(劳伦斯在40多岁时也得了这种病)。

此外,与毕加索、康定斯基、克利和斯特拉文斯基等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美术和音乐,战前就已经出现,但是它得到主要认可,还是在战火平息之际。建筑方面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1914年之前,立体派以及其他先锋派实验画家创作的作品,除少数例外,大都被视为某些社会弃儿的怪诞之作,让人费解。战后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于新奇之物的接受。1919年,巴黎

的一群作家和艺术家打出了达达主义的旗号(这个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达达主义诞生于苏黎世的一家咖啡馆,那里距离乔伊斯和列宁住过的地方很近。达达主义者举办公共集会,用后未来主义风格的海报作宣传,会上,许多人做出了荒谬、无意义的发言。查拉<sup>[1]</sup>,这位达达主义创始人之一,把报纸上某一篇文章上的字剪下来,放在一个袋子里,晃上一晃,再从袋子里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取出来,连缀成诗。

这种野蛮的虚无主义精神盛行一时;达达主义促进了比较有建设性的美学理论的出现,特别是超现实主义。达达派故意搅乱各种意义的想法(从兰波那里借鉴的),以及他们激烈的政治抗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超现实主义者身上(超现实主义者与左翼政治运动眉来眼去)。<sup>[2]</sup>超现实主义借鉴了弗洛伊德和容格的思想:在睡梦中以及半清醒状态下,或在毒品的作用下,大脑思维摆脱了理性的严密控制,能够产生新鲜的、真正的象征,“心理自动机制”暂时中止了大脑的思考,放任词语源源涌现,产生了诗歌。超现实主义可



弗吉尼亚·伍尔芙

[1] 查拉(Tristan Tzara, 1896 - 1963年),罗马尼亚诗人,后来主要生活在法国,被公认为达达运动创始人。

[2] 1924年,安德列·布勒东创立了超现实主义,1927年他加入共产党,可是,当党的路线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超现实主义之时,他与共产党决裂。1938年,布勒东与流亡在外的列昂·托洛茨基合作发表宣言,反对党对艺术的控制。但是路易·阿拉贡在1932年脱离超现实主义,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斗士。——原注

被视为战前出现的象征主义的继续,这种象征主义带有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它是文学和绘画的一种模式,在这方面,它很像德国的包豪斯。<sup>[1]</sup>包豪斯先是在魏玛后来在德绍安家落户,它把艺术和建筑联系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现代美学。



达达派作品

实际上弗洛伊德对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文学中有大量的弗洛伊德主义主题——俄狄浦斯情结、畸恋、无意识的动机。例如,美国大戏剧家尤金·奥尼尔的作品就充斥着这类主题。有人说,弗洛伊德用本我和自我分别代表古典作品中命运和自由意志这两股力量,让个体与宇宙相对立,从而为悲剧的再生提供了可能。通常说某某人如何依赖弗洛伊德的思想,结果却发现,那是人家的独立发现。劳伦斯的伟大恋母情结小说《儿子与情人》,说的是一个青年人如何拼命挣脱他对母亲的暗恋,这种暗恋不许他与其他女人发生关系,当这位 27 岁年轻人、矿工的儿子开始写这本小说的时候,他还没读过弗洛伊德;后来他倒是读了,发现

弗洛伊德有许多让人钦佩之处,但他批评了弗洛伊德的科学实证主义。早在几年前,马赛尔·普鲁斯特就已经动笔写那部卷帙浩繁的、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注定要成为 20 世纪的另一部经典;他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是依据他对童年记忆的追寻。他想以文学对话的形式,把过去支离破碎的生活整合为一体。小说充满了性主题。不过,普鲁斯特当时也不知道弗洛伊德。

卡夫卡直接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虽说他可能更多地受到尼采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他们也影响了弗洛伊德)。托马斯·曼说过,要不是弗洛伊德,他就不可能写出《威尼斯之死》。但是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惊奇地发现,自己从未听说过弗洛伊德,居然也被算作弗洛伊德主义者。弗

[1] 1919 年 3 月,德国著名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在德国魏玛创办“国立建筑工艺学校”,后被称为“公立包豪斯学校”,1925 年,该校迁往德绍。包豪斯是德语 Bauhaus 的译音,由德语 Hausbau(房屋建筑)一词倒置而成。以包豪斯为基地,20 世纪 20 年代形成了现代建筑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现代主义建筑,主张适应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生活需要,以讲求建筑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为特征的学派。包豪斯一词又指这个学派。

洛伊德和容格对詹姆斯·乔伊斯产生一些影响——他把女儿送到容格那里去治疗,但是,对于《尤利西斯》和《菲尼根守灵夜》的创作至少同样重要的思想来源还有很多,从但丁和维柯到瓦格纳和易卜生,不一而足。(在心理学领域,莫顿·普林斯<sup>[1]</sup>,这位探索多重人格的美国人,对乔伊斯和容格都有影响。)时代、舆论风气的作用,要比弗洛伊德的作用大得多;他只不过是主要标志而已。一系列模模糊糊地带有弗洛伊德色彩的倾向,包括主体性、消除性禁忌以及多元主义社会中自我问题,是整个现代社会所特有的。

弗洛伊德从前的同事、目前在心理分析领域的对手卡尔·容格也开始名声远扬。20年代的文学作品大量采用神话,主要归功于容格,这位战后备受尊重的奇才。T.S.艾略特在《荒原》中采用了弗雷泽《金枝》里的神话;乔伊斯用神话充实了他的小说。艾略特认为神话是对抗嘈杂混乱的现代生活的武器,“是控制、整理、塑造和赋予徒劳无益和混乱无序的现代历史宏大画面以意义的一种方式。”20年代的经典作品,



包豪斯学校



乔伊斯塑像

[1] 莫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 1854 - 1929年),美国心理学家、医师。

像美国侨民 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其经久魅力在于它们的神话色彩;在某种程度上,那位私酒贩子(盖茨比)和他的女友代表了所有男男女女的困境。神话体现了人类社会中的一再重复的主题,即诗意地(以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容格所说的“原型”。叶芝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艺术怎样才能战胜人类心灵的缓慢衰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的进步,再一次拨动人类的心弦,而又无需像旧时那样成为宗教外衣?

神话提供了答案。詹姆斯·奥尔尼<sup>[1]</sup>在一本研究叶芝和容格的著作中(《根茎与花朵》),列举了这两位巨擘思想上惊人的相似处: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彼此也不太熟悉,然而,他们却用了不同的语言来探讨同样的事情。

乔伊斯主要用的是神话。一个人在1904年6月某一天中的生活,成为人类境况的寓言,或者说是西方文明史的总结;利奥波德·布卢姆(小说主人公)是现代的尤利西斯。尽管他是一个栩栩如生的、被安放在都柏林的个体人物,在他周围的是当地的景象、声响和事件,可是他也代表了每一个人。这种神话属性体现在,作者把布卢姆一天中所有经历与荷马史诗中尤利西斯的冒险历程对应起来(乔伊斯并没有在各章的标题中列举出这些经历,读者得自己去辨认,他故弄玄虚的伎俩在《尤利西斯》中还算是牛刀小试,在《菲尼根守灵夜》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人生的所有事项:生、死、吃、喝、婚姻都浓缩在一天当中,这就是人类的生活。这一点也明显表现在别的地方。作者明确提到了再生。莫莉责怪利奥波德用了她拼不出来的大字眼;主要例子是“灵魂转生”(metempsychosis) (“碰上了里面有着胶皮管的什么玩意儿那个词”<sup>[2]</sup>),所以说布卢姆既是尤利西斯,也是以利亚<sup>[3]</sup>,也是流浪的犹太人,正如书中一段所写的,他也是

水手辛伯达、裁缝廷伯达、狱卒金伯达、捕鲸者珥伯达、制钉工人

[1] 詹姆斯·奥尔尼(James Olney),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英语系教授。

[2] 译文见《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第1163页。

[3] 以利亚(Elijah),圣经人物。

宁伯达、失败者芬伯达、掏船肚水者宾伯达、桶匠频伯达、邮寄者明伯达、欢呼者欣伯达、菜食主义者丁伯达、畏惧者温伯达、赛马赌徒凌伯达、水手兴伯达。<sup>〔1〕</sup>

莫莉是一个原型式的妇人、大地母亲或女神，即便不是生命力本身（就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后来乔伊斯在《菲尼根守灵夜》中用梦呓般的语言搜索历史事件来解说原罪、家庭和社会冲突、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元性、生命永无休止的重复。它的主题是容格式的，即，个体的无意识包含了人类的全部经验；一个爱尔兰酒吧老板的一夜睡梦能够重复历史上的一切。

爱因斯坦对艺术的影响同样是无所不至，尽管很难准确描述。人们普遍同意奥尔特加·Y·加塞特的观点，相对论是“当今时代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思想事实”，但是对于相对论的意义却缺少共识。“它只是一个比较次要的伟大思想”，这是老托马斯·哈代《饮酒歌》每一节的结语。这首诗悲叹，人类从哥白尼开始，经过达尔文，直到爱因斯坦，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灰心丧气：

现在爱因斯坦来了，提出某种观念。  
这里许多人，  
对此还不太明白。  
它认为，时间、空间和运动都不存在，  
既没有早也没有晚，  
既没有方也没有直，  
有的只是弧形海面。

一切都陷入混乱之中，这种印象可能是抑郁的原因。我们“为逝去的时代而哭泣，”奥登写道，“在‘因为’变成‘仿佛’之前，或毋庸置疑的肯定变成偶然之前……”但是，在20年代的反传统信仰的氛围中，人们通常发现，科学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滑稽可笑的东西，可以与默片滑稽警察形象、乔伊斯的散文，以及股票市场相提并论，这种想法着实令人兴奋。D.H.劳伦斯思忖，“我喜欢相对性和量子理论，因为我不懂，它们使我感觉到，仿

〔1〕 译文见《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第1116页。

佛空间已经移动……仿佛原子是一味冲动的东西,总是改变它的主意。”在一本试图解释爱因斯坦思想的通俗读物(《相对论 ABC》)中,伯特兰·罗素赞同说,单个电子的不确定性,赋予宇宙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无政府主义特征。

一切老规矩都被废除,艺术向永无休止的实验敞开了大门。早在 1909 年,《未来主义宣言》就欢呼:“时间和空间在昨天已经死去!”立体主义和其他抽象的或表现主义艺术在某些方面受到相对论的影响。<sup>〔1〕</sup> 1929 年,建筑师艾里克·门德尔松造了一座爱因斯坦塔。全新的音乐体系,像勋伯格的十二音技法和序列主义,源于如下想法:规则是人为的,不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真理,人们可以制定新的规则。这种新规则让作曲家无比兴奋,但让一般听众颇感困惑。有一首打油诗《名门斯坦家族》对这个时代进行了一番调侃:

有 Gert 还有 Ep 还出了 Ein。  
Gert 的散文是废话,  
Ep 的雕塑是垃圾,  
还有,没人能懂 Ein。<sup>〔2〕</sup>

普通人就是以这种方式写下了他们对 20 年代思想和措辞的古怪路数的有趣怀疑。

巴黎一家杂志把乔伊斯和爱因斯坦联系在一起。这本名为《转变》的杂志是乔伊斯的崇拜者 20 年代在巴黎创刊的,它宣布自己的目标是“根据四维宇宙观念进行泛符号的、泛语言的综合”。经常有人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著名的乔伊斯研究学者休·肯纳<sup>〔3〕</sup>大声疾呼:“我们都知道,要是没有乔伊斯,简直不可想像文学该是什么样子;想一想物理学没有

〔1〕 最近出版的一部专著发现,在 1907 年,立体主义者还没听说过爱因斯坦,但是他们知道亨利·庞加莱,1902 年庞加莱论述过相对性观念;这种阐述艺术和科学观念之间联系的著作是很必要的。见琳达·达尔林普尔·亨德森:《现代艺术中的第 4 维和非欧几何学》(1983 年)。——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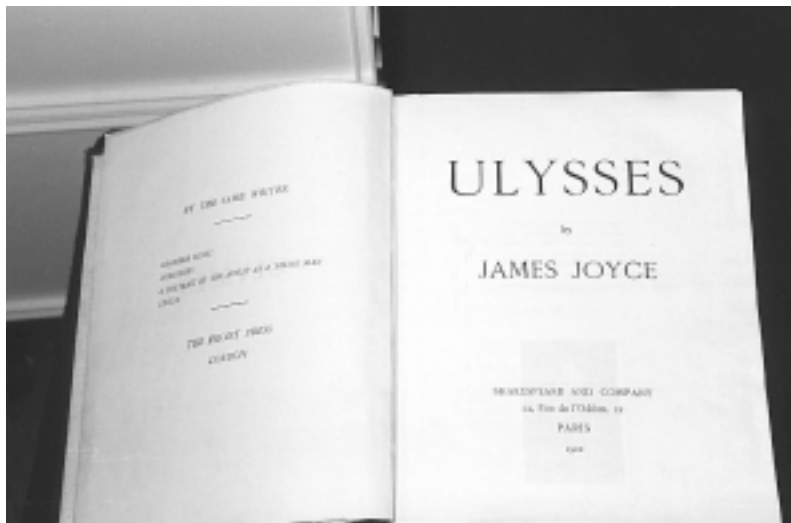
〔2〕 格楚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这位旅居巴黎的美国人写过有名的实验性散文。雅可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也是在美国出生,但主要在英国工作,他是最早的、有争议的现代主义雕塑家之一;他给爱因斯坦塑过像。——原注

〔3〕 休·肯纳(Hugh Kenner,1923 - 2003 年),美国文学评论家。

爱因斯坦该会怎样！”乔伊斯对于核物理几乎是一无所知，正如爱因斯坦对文学几乎一无所知（虽说《菲尼根守灵夜》涉及到一点点几何知识），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也不大了解彼此的工作。<sup>〔1〕</sup> 但他们的做法似乎很相似。乔伊斯重新塑造了语言，正如爱因斯坦重新塑造了宇宙的结构，弗洛伊德重新绘制了心理构图。后来一位物理学家从《菲尼根守灵夜》里选择了一个词，为一种微粒子命名，它就是“夸克”。

## 文学复兴时代的人物

乔伊斯的伟大小说《尤利西斯》的重要程度超过 20 年代其他所有文学事件。它在争议声中诞生；《尤利西斯》部分章节最早在 20 年代发表在美国先锋派杂志《小评论》上，这本刊物在英国遭到查禁，法官宣布它既让人不知所云同时也不道德（尽管很难说这两条理由成立）。1922 年版的《尤利西斯》是另一家不知名的美国公司、西尔维亚·比奇经营的莎士比亚公司在巴黎出版的，这个版本马上成为那些急于罗致藏品的收藏家们搜寻的目标。在 1922—1923 年间，除了少数印本之外，大部分被没收。直到 1934 年，这本不同凡响的小说才找到出版社。当时，兰登书屋获得了一项对淫秽文学的特殊解禁之后，买下它在美国的销售权。《尤利西斯》占据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这一独特地位，同时又是一本地下文学，它的晦涩难懂反倒更能激起人们的兴趣。



《尤利西斯》封面

乔伊斯试图展现布卢姆夫妇那些隐秘、凌乱的念头，还有都柏林的酒吧油子们的言谈话语，这中间确实赫然出现了一些

〔1〕 弗洛伊德在 1927 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和爱因斯坦聊了两个小时。他很愉快，很自信，和蔼可亲。他对心理学的了解同我对物理学的了解一样多，所以我们谈得很好。”——原注



通常不能付梓寓目的文字。可是,这部现代尤利西斯的故事书绝不是淫书(虽说萧伯纳声称,它只能证明,现在都柏林人的心地之肮脏,不逊于他少年时代)。书中某些文字,堪称英语文学最为精彩绝伦的散文,而且它还预示了《菲尼根守灵夜》中将出现的那种哲学深度。它反映了这个曾经想进医学院、但最终因无钱而未能如愿的爱尔兰人(指乔伊斯)阅读之广博和见解之精深(要是他能进医学院,没准儿会超过弗洛伊德)。《尤利西斯》使用的各种现代主义技巧中,有一个受到瓦格纳影响的技巧,即在不断重复主题的过程中,在“打结”的过程中,把情节分散开来叙述,而不是按照过去那种沉闷乏味的方式来平铺直叙。《尤利西斯》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它使先前所有的小说都显得过时,使先前所有的写作显得平淡无奇。尽管它时常引人愤恨(典型的判断有“病态和令人作呕”,“有史以来最恶心的一本书”),但是,眼光独到之士马上认识到它的价值,认为它是“这个时代迄今最重要的表达”(T.S.艾略特语),或者用美国批评家爱德蒙·威尔逊的话说,“一部天才之作,令其他作品黯然失色。”

完成《尤利西斯》之后,从1922年到1939年,乔伊斯在后半生全力写他那本在语言上更有探索性的小说,也就是后来出版的《菲尼根守灵夜》。正如人们最初所知道的那样,这部“进展缓慢的著作”(它的部分章节断断续续地在《转折》上发表),引起了一小撮乔伊斯爱好者的强烈兴趣,却令其他大多数人感到困惑不解,这种情况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下一章我们再对它进行详尽探讨。

在20年代的英美世界,与《尤利西斯》同病相怜的是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也四处遭禁。与乔伊斯相比,劳伦斯更像是“爱情的祭司”。与弗洛伊德相似,他认可性的力量,而不是赞美它的荣光。劳伦斯说过:“我总是费力去做同一件事情,使性关系获得合法地位,得到珍视,而不是让人感到羞耻。”他曾宣告:“我的信条是,血肉比理智更为明智。”(这与时代的精神非常一致。)

对于劳伦斯来说,回归健康的性生活本身并不重要,不过他认为,懂得爱情的人懂得怎样去生活。性对于他来说是创造力的关键;它不仅是一切能量的根源,而且是美、宗教以及一切精妙和有生命力的事物的源泉。劳伦斯痛斥毫无生气的唯理智论以及现代欧洲胆怯的资产阶级墨守陈规,他深切地感受到,需要某种更真诚的、更真实的东西。这种新原始主义思想使他的思想回到伊特鲁里亚人、印第安人或地中海地区的农民那里。在20年代,劳伦斯有许多信徒(例如青年W.H.奥登及其友人)。奥尔德斯·

赫胥黎才华横溢和见解深刻的思想小说(《滑稽的环舞》、《败叶》、《旋律与对位》,1923 - 1928年),探索了一切旧有的价值观念和角色模式的失败,在这些小说中,惟一能给人带来希望的是以他的朋友 D.H.劳伦斯为原型的一位艺术家。(劳伦斯也从事绘画,他写的一些诗歌通常也是非同一般。)或许,回归健康的性本能,使人能够找到走出沙漠之路。

劳伦斯的诚恳和“投入”,还有他身上的巨大创造活力,使他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位重要先知。劳伦斯能够深入人的内在心灵,探索其非理性的纷乱症结,在这方面,他与乔伊斯是一样的,虽说使用方式不同。劳伦斯的小说能够马上让我们与其中的人物认同,使我们同他们一道,与他们的生活和问题做斗争。这种对内心活动的探索是新小说的特征。弗吉尼亚·伍尔夫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指责老派小说家(例如阿诺德·本涅特)只会描写人的外在生活;她想从内心世界来考察人物,观察他们心理每时每刻的实际变化。就此而言,在20年代的文坛上,她毫不含糊地占据了中心位置。意大利戏剧大师皮兰德娄,揭示了世间人事当中幻想与现实的交织让人困惑难解——客体与主体不可分辨,正像新物理学中的情况一样。伍尔夫



《美丽新世界》封面

笔下饶有趣味的小说,总是悬在梦幻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引人入胜。

在所有讽刺现代文明浅薄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价值观的小说中,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年)的读者可能最多。它是反乌托邦小说的范例,在这类小说中,想像中的未来社会不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而是力图摆脱的一场恐怖。在30年代,移居加利福尼亚的赫胥黎,在隐居、神秘主义乃至迷幻剂当中找到了慰藉。有一些思想精致复杂的欧洲人,感

觉得自己置身于一种垂死文化,他们常常徒劳地寻找思想上的安身立命之所。赫胥黎就是其中一员,他细致入微地探索了价值观念,敏锐地感受到当时的思想氛围。在40年代,这类人物将一窝蜂地拥向苏联共产主义的怀抱。一个类似的、在荒原中寻找绿洲的例子是托马斯·曼的名作《魔山》(1924年)。小说中的人物体现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其中有一位是科学的理性主义者,有一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非理性主义者,还有一位是异教的酒色之徒,还有其他人等。这部寓言式的小说背景设在瑞士的一家肺结核疗养院,小说显示了死亡的迹象;到最后,小说的主人公汉斯·卡斯特洛普差一点在暴风雪中死掉,但是他凭借坚强的意志,唤醒了自已,重新振作起来,显然这是存在主义的预兆。

詹姆斯·乔伊斯的兄弟斯坦尼斯劳斯评论说:“在当今世界,严肃的文学取代了宗教。人们不再听礼拜日的布道,而是转向文学,以便找到对他们的情感和理智问题有教益的理解。”维也纳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最初想成为一名工程师,后来写了一篇论恩斯特·马赫的博士论文,然后在著名哲学家阿列修斯·迈农手下任职。但是穆齐尔开始感觉到,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写作,通过写“小说”,他才能把握全部现代体验,通过理解它而改变它。大约在同时,英国的D.H.劳伦斯产生了同样的看法,法国的马赛尔·普鲁斯特也产生了相同的看法:正如劳伦斯所说,小说是“生活的一本欢快的书”,它能够处理人类的全部问题,而不是一点一滴的问题,能够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解决这些问题。普鲁斯特曾把自己比作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奇》中的卡索邦,此人寻求“所有神话的答案”。伟大的现代主义小说家都是像弗洛伊德那样的心理学家(他们都对性感兴趣,只是程度不同),不过他们的方法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他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丛生问题的社会中的人类特性。

卡夫卡在1924年死于肺结核,时年40岁,这位布拉格作家身后留下了《城堡》和《审判》的未完成稿,它们是现代社会的出色寓言,在他死后几年出版,在30年代拥有众多的读者,此时,它们描述的“噩梦世界”已变成更生动的现实。在20年代,时代氛围可能还没有最深刻的悲剧意味,这个垂死的文化还有落日余晖的魅力,人们的交谈才智叠现,人们的思想丰富多采,还有绝好的书可读。在这十年当中,出现了乔伊斯、劳伦斯、普鲁斯特、赫胥黎、托马斯·曼,以及其他一批针砭病态文明的出色评论家,识文断字的人还有什么理由感到不高兴的呢?有如此之多的杰出人士前来送葬,也算是一种补偿了。叶芝写道:“虽说大雅之声一去不返,目前的一切却着实

让人高兴。”叶芝、普鲁斯特和赫胥黎所属的有教养的上层阶级依然存在，虽说它已经有点走下坡路。如果说这个十年期不是 1914 年前的“美好时期”，它也不是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经济萧条和战争的时代。这些事物出现在 30 年代、40 年代。

# 第十四章 从经济萧条到 30 年代的战争

## 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

20 世纪 30 年代伊始就出现了不祥之兆,从 1929 年 10 月美国股票市场大崩盘开始,经济萧条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到了 1931 年,也就是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说的“恐怖之年”,失业率攀升,银行倒闭,政府垮台,这些都是这个混乱阶段的标志。在英国,工党政府下台。在苏联,斯大林强化了共产党专制政权,同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有计划的经济发展方案,目的是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因此当时西方有些人把俄国看做希望的灯塔。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党逐渐羽翼丰满之时,德国正在议会危机中挣扎;希特勒在 1933 年开始掌权,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似乎也在法国抬头,而且法国共产党的势力也大大增强。从西班牙到奥地利,民主制度崩溃的声音不绝于耳;在 1933 年,由于严重的银行危机,连美国都决定授予新当选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前所未有的处理紧急事件的权力。

由于民主政府似乎无助于解决经济困难,30 年代的知识分子经常感到自己被夹在德国纳粹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中间。舆论氛围发生突变,从 20 年代的唯美主义转变为政治行动主义和社会现实主义。青年奥登告诫其他作家:“别再那么一本正经了,

不要像石头那样无动于衷。马上开始去生活。”(洛根·皮尔索尔 - 史密斯<sup>[1]</sup>在 20 年代宣告说:“他们说生活是重要的,但我更愿意看书。”)走出象牙塔,加入抗议的游行队伍或纠察队。乔治·奥威尔回忆说,这种新氛围,乍一看,更像童子军营地而不是诗人角<sup>[2]</sup>。这是从政治理想主义到悲观失望、从走出象牙塔到退守象牙塔这一循环过程中的另一次转向。这个循环过程可从 1848 年追溯到 1914 年以及 1914 年之后的时期。在 20 年代,于连·本达因建议“知识阶层”超脱政治之外而暴得大名,到了 1937 年他又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后来他要求判右翼知识分子的死刑。同以往一样,如今他又赶上了潮流。

30 年代,欧洲相当多的自由思想者选择了共产主义,但也有些人选择了法西斯主义。乔治·利希泰姆<sup>[3]</sup>指出:“说纳粹运动只代表暴民,这种说法是神话。它是征服了大学之后才征服整个社会的。”虽说这个判断可能有些偏激,然而有大量证据支持它。最近一项研究发现,汉堡大学 64% 的教员加入了纳粹党。有像爱因斯坦这样



诺尔迪的画

拒绝留在希特勒德国的人士,也有像斯塔克<sup>[4]</sup>那样加入纳粹党的人士;如果说以托马斯·曼和斯蒂芬·茨威格为首的人文主义者一般要表现得好

[1] 洛根·皮尔索尔 - 史密斯(Logan Pearsall - Smith, 1865 - 1946 年),英国散文作家。

[2] 诗人角,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有许多文学大师的纪念碑和纪念文物。

[3] 乔治·利希泰姆(George Lichtheim),20 世纪美国新闻记者、欧洲政治事务专家、历史学家。

[4] 斯塔克(Johannes Stark, 1874 - 1957 年),德国物理学家,191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一些,但也有很多艺术家如爱弥尔·诺尔迪<sup>[1]</sup>加入了纳粹党,或者像大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那样至少曾向纳粹示好。一些可敬的知识分子在拥护纳粹时的矛盾情绪所产生的反响,直到 1988 年还听得见。有人发现,首屈一指的文学理论家保罗·德曼二战期间在法国写过亲纳粹的社论。哲学家马克斯·舍勒,以及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作曲家理查德·斯特劳斯,是那些亲纳粹或至少不反对纳粹的顶尖德国文化领袖的范例。有“魏玛时期最受尊敬的政治学家”之称的卡尔·施米特<sup>[2]</sup>是希特勒早期和坚定的支持者。维也纳犹太作家卡尔·克劳斯(庸俗沉闷生活的讽刺者和鞭笞者)的崇拜者们不得不解释他为何对纳粹分子保持沉默。爱因斯坦的老合作者马克斯·普朗克也保持沉默,尽管后来他对此后悔不迭,况且他的儿子成为反抗希特勒的烈士。1933—1934 年是纳粹政府的蜜月期,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站在了他们一边。那种汹涌澎湃的团结浪潮,让人想起了 1914 年。大学、教会、知识分子都加入了为希特勒喝彩的群众队伍中。

稍后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德国的情况。有一位法国作家,显然由于彻底厌恶人类从而走向法西斯主义,他就是路易·费迪南·塞利纳<sup>[3]</sup>。他在 1932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长夜漫漫的旅程》曾轰动一时。这位医生长夜旅程的终点是反犹主义、纳粹主义、二战期间与德国占领军的合作。还有其他法国知识分子成了法西斯分子。罗伯特·布拉希拉克和德修·德·拉·罗歇耳<sup>[4]</sup>追随一战后法西斯主义主要先驱夏尔·莫拉斯的法兰西行动和小说家兼政客毛里斯·巴雷斯。巴雷斯是 1890 年到 1920 年法国文坛的重要作家之一。正如我们所知,莫拉斯和巴雷斯对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有很大影响,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正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近亲。

纳粹思想的内容是什么,它们对于纳粹在德国获胜发挥了多大的促进作用?在 20 年代,希特勒领导的那个由心怀不满的巴伐利亚人组成的小

[1] 爱弥尔·诺尔迪(Emil Nolde, 1867 - 1956 年),德国表现派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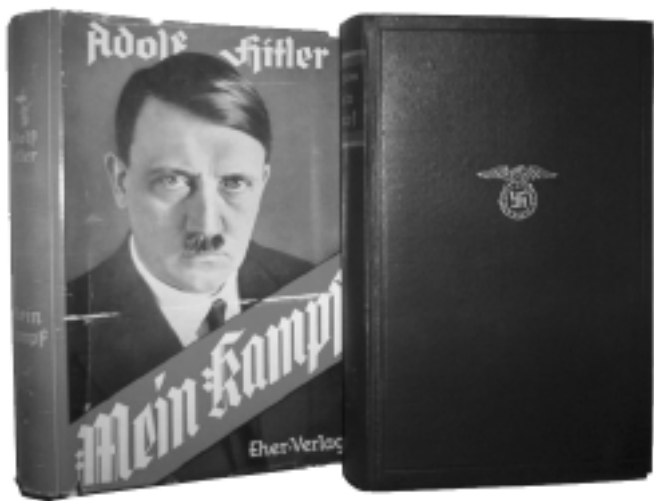
[2]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 1888 - 1985 年),德国政治学家。

[3]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 - Ferdinand Celine, 1894 - 1961 年),法国作家。

[4] 罗伯特·布拉希拉克(Robert Brasillach, 1909 - 1945 年),法国作家,报人。因与纳粹合作,被判处死刑。

德修·德·拉·罗歇耳(Drieu de la Rochelle, 1893 - 1945 年),法国作家,因与纳粹合作,受到审判而自杀。

团体,试图把组织扩展到全国范围,但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到了 1928 年,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的选票还不足 3%。早在几年以前,希特勒就已经确立了他的信条,而且从未偏离这些信条;极端固执是他的主要特征,这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弱点。他断定,必须全部摧毁自由民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思想统一和服从领袖的制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这个过程要求无情地铲除所有不协调的和导致软弱的因素,例如现代思想和艺术、知识分子、犹太人以及其他尚未同化的少数民族。(纳粹将像对待犹太人那样残忍地驱逐吉卜赛人,他们还要杀害精神病人,强制混血儿绝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希特勒要领导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政党,而是某种类似于军事组织的教会。他在战争期间发现,



《我的奋斗》

这样的组织非常可取。“我们的目的不是造就一大批政客,而是造就一大群信奉新哲学的士兵。”希特勒相信,生活的法则就是权力斗争:“大自然……把主人的权利赋予他最喜爱的孩子,那些最有勇气最勤奋的孩子……人类是在永恒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只有在永恒的和平中才会灭亡。”阿道夫在 1924 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中如是说。

早期追随希特勒的纳粹骨干力量,凡是没有在党内血腥的权力斗争中被希特勒干掉的,都跻身于纳粹统治阶层。许多研究著作强调他们原来的边缘地位,“他们模糊不清的个人和社会地位”(John Hargrave)。他们被称为“异己的知识分子”;“武装的知识分子”(Konrad Heiden);“逃学者”(Thomas Mann)。让·贝希勒<sup>[1]</sup>指出:“所有(纳粹)领导人,无一例外,都经历过实现人生志向的重大挫折”:希特勒最初想成为建筑师和艺术家,没有成功。这就定了调子。彼得·默克尔<sup>[2]</sup>发现,在最好斗的纳粹积极分子的经历中,有一个突出的因素,即“童年贫困以及在城市里往上爬的愿望受

[1] 让·贝希勒(Jean Baechler, 1937年 - ),法国历史学家,巴黎大学(索邦)历史社会学教授。

[2] 彼得·默克尔(Peter Merkl),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



挫”。在希特勒出席的德国工人党的首次会议上,与会的 45 人中,有一名医生、两名工程师,一名化学家、一名药剂师,还有作家、画家、学生,而且还有一名法官以及 12 名商人和工匠,社会各色人物应有尽有,把他们聚到一起的主要是他们对(简单)思想的兴趣。在纳粹党成立之初,那些冒牌知识分子中有一位诗人兼民俗学研究者,一位业余经济学家,一位异教的创始人。要不是他们在战后的非常时期发现了希特勒的领导才干,也许他们同其他许许多多的怪人、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以及冒牌的哲学家一样,几乎不会给后人留下什么记忆。

因为在正常时期,希特勒是不可能通过沉闷的常规渠道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但是在战后的德国,旧有秩序已经瓦解,所有的人都在摸索新的秩序。这种局面使希特勒得以浑水摸鱼。纲领确定之后,希特勒在设计表达方式上显示出惊人的技巧。他的公开演说才能既得益于美国的广告业,也得益于大歌剧。不过,直到纳粹党开始走上坡路,因而能够得到富人的捐赠,才举办第一次纽伦堡纳粹党徒大聚会。纽伦堡大聚会以精心设计的宏大场面著称。此前在 1926 年魏玛的一次聚会上,希特勒扎着皮带,身穿雨衣和军靴,像墨索里尼那样向穿制服的党徒们行礼致意,大多数观众认为这种场面索然无味。直到大萧条让摇摇欲坠的魏玛共和国垮台,希特勒的运气才有转变。

他执著地固守一个纲领毫不动摇,这无疑使他显得坚强有力。伊安·克肖<sup>〔1〕</sup>在研究这位元首的书中评论道:“希特勒以准救世主的姿态固守一念,不容异己之见,这赋予他一股顽强的意志力。他一出场就气势逼人。”这也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大众演说家。这使他集中精力玩弄争权夺利的伎俩,无须考虑目标。它的代价是僵化刻板和产生一套极其简单化的思想。希特勒宣称他从古斯塔夫·勒邦那里学到,总体上看,影响人民大众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智,不断重复的口号可以潜入群众的意识之中。不过,要是把他看做犬儒主义者,那就错了;希特勒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实际上相信自己的口号。他的真诚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并促使他奋斗多年投身于纳粹事业。

---

〔1〕 伊安·克肖(Ian Kershaw,1943年-),英国历史学家,谢菲尔德大学教授。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支配着纳粹的宣传。纳粹分子痛斥资本主义<sup>〔1〕</sup>、共产主义、所谓导致德国战败的卖国贼、接着削弱国家力量的和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破坏道德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文学和艺术(甚至科学)中堕落的现代主义风格、各种国际主义。集中了所有这些孱弱和分裂现象于一身的是公认的恶棍,犹太人。这种纯属杜撰出来的人物身上有银行家、社会主义者、报纸出版者、百货商店店主、艺术家、作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特征。

反犹主义在东欧比在德国盛行,德国犹太人数量很少,他们似乎被德国文化同化。其他德国人要求民族团结,但不诉诸种族主义。在20年代,包括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默埃勒·凡·邓·布鲁克<sup>〔2〕</sup>在内的一伙新保守主义者曾写道,需要意志的力量、民族的复兴和能够体现人民意志的领导人。在他们看来,如果德国要从战败的废墟中爬起来并且恢复它在太阳底下的地位的话,那就应当铲除所有导致虚弱的力量,例如民主(与“普鲁士作风”格格不入)、自由主义和阶级冲突。默埃勒和斯宾格勒甚至被贴上“保守的革命者”的标签,因为他们利用革命的手段来达到民族主义目的。希特勒本可以借鉴20年代这些作家的思想,但是,他们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看不起希特勒这种蛊惑人心的政客。希特勒掌权之后像迫害其他人那样无情地迫害这群人。

年轻时代在维也纳贫病交困的希特勒,很可能对当时正拥入维也纳的波兰犹太人十分厌恶;更重要的是,他受到奥地利民粹主义者格奥尔格·冯·舍纳勒尔<sup>〔3〕</sup>反犹思想的影响以及任职时间很短的维也纳市长、反犹主义者卡尔·卢埃格尔的影响。青年希特勒的偶像,舍纳勒尔,是一位工业巨头的儿子,后来反叛他的父亲,攻击资本主义,变成了农民阶级的激进代言人。虽说美国的民粹主义当中也不乏不满犹太人金融家的声音,安东尼·特罗洛普<sup>〔4〕</sup>的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也把一个英国犹太人描绘成资

〔1〕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把纳粹分子说成是资本家,但这种解释匪夷所思。纳粹意识形态的特征是,他们对待银行家和金融家几乎持有疯狂的敌视态度。它首先探讨的问题就是如何消灭“资本主义”。——原注

〔2〕 默埃勒·凡·邓·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uck, 1876 - 1925年),文化史学家。

〔3〕 格奥尔格·冯·舍纳勒尔(Georg von Schoenerer, 1841 - 1921年),奥地利反犹主义政治家。

〔4〕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 - 1882年),英国小说家。

本主义腐朽的象征,<sup>[1]</sup>但是舍纳勒尔往他酿造的意识形态饮料中添加了更多这方面的内容。

他在诸如罗特希尔德家族这样的“国际犹太银行家”身上,看到了“吸血鬼正在敲打窗户狭小的德国农民宅门”。卢埃格尔也猛烈抨击“金融集团”和垄断。左派的这种反犹主义把犹太人与富有的银行家和投机活动操纵者联系在一起(看看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的极端贫困状态,就会觉得这种说法真是莫名其妙)。在同时期的法国(1898年),与德累福斯事件相伴生的爱德华·德律蒙<sup>[2]</sup>的反犹主义也持有同样看法。但是卢埃格尔只是以 1881 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作为样板,建议限制波兰的移民。(他所在的基督教社会党在某些方面受到了教皇利奥十三世 1891 年颁发的著名通谕《新事物》<sup>[3]</sup>的影响。)

说来也奇怪,希特勒所接受的系统的种族主义学说来自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戈宾诺论述种族不平等的伪科学观点(见第九章)。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在他的《十九世纪的基础》(1901年)一书中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这本书相应地又启发了纳粹意识形态专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sup>[4]</sup>的《20世纪的神话》。张伯伦绝不是一个沉闷的人,而是英国费边社那一代精神朝圣者。他移居拜罗伊特,娶了瓦格纳的女儿;他是德皇威廉二世的朋友,在他晚年,遇到同样一心崇拜瓦格纳的希特勒。这个古怪的思想谱系在所谓的种族特性中找到了世界历史的答案,它把纯种北欧日耳曼人为代表的“亚利安人”视为独具创造性的种族。英国人塞西尔·罗得斯也发出了“北欧日耳曼人”及其优越地位的言论,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是为英联邦国家和美国的大学生创设的,直到现在每年都颁发,在美国,它被视为一项很高的荣誉,这项奖学金设立的目的

---

[1] 亨利·达维戈德史密斯在 1964 年(《今日历史》)4 日号)撰文写道,“50 年前,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反犹主义在英国得到了体面人的支持、可敬的人们的同情。”——原注

[2] 爱德华·德律蒙(Edouard Drumont, 1844 - 1917 年),法国报人,反犹主义领袖。

[3] 《“新事物”通谕》提出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要求政府对经济实施干预,以保证工人的基本权益,包括健康的工作条件和合理的工资。该通谕被视为天主教社会理论正式问世的一个标志。

[4]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 1893 - 1946 年),德国纳粹意识形态专家,被纽伦堡法庭判处死刑。

的在于将“北欧日耳曼种族”紧密联系起来。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约翰·W.伯吉斯<sup>〔1〕</sup>也是北欧日耳曼人种族优秀论的信奉者之一。

如果说这是希特勒世界观的来源,可能言过其实。不过,罗森贝格虽说不是非常有影响的纳粹分子,但普遍认为他是第三帝国的准官方哲学家。罗森贝格的《20世纪的神话》把犹太人等同于唯理智论,把犹太人与国际主义联系起来——这两种堕落倾向与一个有教养的民族的健康本能是对立的。基督教已经被犹太人和地中海沿岸的高加索人腐蚀,但是罗森贝格认为,一种健康的“雅利安基督教”依然存在,应当加以提倡。一种雅利安人的基督教会确实在希特勒德国出现了。这的确是一个神话。可是在那个时代,把一切都说成神话难道不是思想时髦吗?

纳粹大肆宣传说,德国农民身上充满了北欧日耳曼人的种种美德,他们没有受到现代性的腐蚀——希特勒的农业专家瓦尔特·达雷特别鼓吹这种说法。不过,纳粹党创始人中没有一个人种过地;在社会各阶层当中,纳粹党对农民的诉求是最少的。当然,希特勒的脑海里充满了农村朴实与都市腐败这类对立的原始意象。他的传记作者约阿希姆·费斯特<sup>〔2〕</sup>历数了希特勒的种种“恐惧”:大城市和(美国)科技,无限制的工业化、商业公司以及“乱糟糟的都市娱乐文化”。

这些观念在保守主义思想中很常见。<sup>〔3〕</sup>在另一方面,希特勒,还有墨索里尼,摆出一幅富有现代速度感的形象,乘坐摩托车,走下飞机;希特勒还想设计一座新的柏林城,世界之都,拥有1千万人口(按照当时的标准这是一个超级特大都市)。或许他最有建设性的行为是兴建一个超级公路系统和为大众生产汽车(大众牌汽车)。这都是受到固定意象和刻板成见而不是理性逻辑推动的思维所产生的悖论和矛盾。

纳粹政府没有前后一致的经济纲领;号称代表某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希特勒,清洗了建党之初的重要人物施特拉赛尔兄弟,因为他们推行社会主义过于卖力。希特勒应对经济萧条的计划,很像当时

〔1〕 约翰·W.伯吉斯(John W. Burgess, 1820 - 191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2〕 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 1926年 - ),德国历史学家。

〔3〕 犹太复国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谈论起因血缘关系而结成的同志式群体、大众灵魂和扎根土地的农业社会,他的谈论方式很像希特勒或D.H.劳伦斯。如果说血缘、土地和大众被认为是法西斯观念,那么根据其有神学家的看法而建立起来的这个新的犹太国家就一定是法西斯国家了。——原注

罗斯福总统制定的计划——外汇管理、公共工程、为农产品提供价格支持、号召自我牺牲。这场经济萧条似乎以同样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发展下去,无论在什么政府的管理下——英国的保守主义、美国的新政、法国议会的无政府状态、意大利和德国的专制主义。这些政府采取了大同小异的、有成效的措施。

## 共产主义与西方知识分子

对于寻求光明事业的知识分子来说,纳粹的魅力很有限,虽说如我们曾指出的那样,也有一些例外。其中的原因有:纳粹主义轻视知识分子(据说戈培尔说过,“我一听到‘文化’这个词,就想掏枪”),纳粹主义尤其看不上现代艺术和文学;它的种族观念已经过时,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反犹主义;最主要的是,1936年之后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大弹侵略调子,气势汹汹地提出领土要求,发出战争威胁。纳粹分子大肆焚书,烧掉了卡夫卡的手稿和克里木特<sup>〔1〕</sup>的绘画,在查禁现代艺术和文学的同时,还查禁现代物理学。这一切实在令文化人无法忍受。然而,必须承认,对于知识分子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共产主义俄国的斯大林政权,也犯下了许多相同的罪行。



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海报

〔1〕 克里木特(Gustav Klimt, 1862 - 1918年),奥地利画家,追求高度装饰性效果。

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当然是谴责艺术中的大部分现代主义的。(奇怪的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现代艺术的拒斥恰好基于两个完全相反的理由,一个说它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另一个称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立场可追溯到1932年左右,当时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经历了斯大林化。作家和艺术家被迫听任党对他们创作的控制;他们被当做阶级斗争的战士,必须按照要求创作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是宣传品。直到这个时候,尽管许多俄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已经移居巴黎和其他西方城市(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别尔嘉耶夫是例子),有的已经病死或自杀身亡(例如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他无法忍受党的宣传者的角色),但是苏联的文学和艺术依然保持着相当高的声誉。

但是,艺术受到政治监督,拒斥艺术现代主义(称其为“形式主义”)以及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共产党艺术的原则,这就意味着,这个所谓充满经济未来的国度在审美领域进入落后状态,很快就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斯大林惟一能接受的文学和艺术是赞美苏联的陈腐政治宣传,与此同时,抽象艺术、卡夫卡、乔伊斯、超现实主义、建筑方面的任何创新、世纪之交以来涌现的所有令人兴奋的东西统统被斥为反动。除了少数例外,留在苏联的大艺术家都给毁掉了,例如,诗人欧西普·曼德尔斯塔姆<sup>[1]</sup>因写了一首反对斯大林的诗(未发表)而遭厄运,要么就像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sup>[2]</sup>那样保持沉默。但是,当时在世的一位最伟大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在30年代热情地支持苏维埃政权。(斯大林后来把他给暗杀了,像对待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俄国人一样。)无声电影领域的天才人物谢尔盖·爱森斯坦在很多年里为苏联文化增添了光彩,直到他死为止。大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up>[3]</sup>和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竭力避免与现政权公开决裂。

西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努力使自己相信,一个新的时代正在这个陌生和充斥暴力的东方国家诞生,虽说这个诞生过程并不温文尔雅。在30年代初,共产主义的神秘氛围在灾难重重的西方世界散布开来。毕加索说

---

[1] 欧西普·曼德尔斯塔姆(Osip Mandelstam, 1891 - 1938年),1934年和1937年两度被捕,死于劳改营。

[2]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 1890 - 1960年),主要作品有《日瓦戈医生》。

[3] 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ff, 1891 - 1953年),苏联作曲家,1934年结束流亡归国。

过,他走向共产主义就像走向一泓清泉。成群结队地涌向“镰刀和锤子”的作家和艺术家对于苏联的现实生活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英国诗人史蒂芬·斯彭德,有一次在家中对一些青年大学生共产党员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对在斯大林主义的宣传中没有提到的俄国情况怀有哪怕一点点兴趣。”德高望重的费边社会主义学者韦布夫妇一直是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的代表;1932年,他们访问了俄国后写了一本书,盛赞苏联共产主义是一种“新文明”。它是30年代西方出版的第一部、而且很可能是许多非批评著作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后来,有人披露说,韦布夫妇只在苏联停留三周,他们使用的材料都是苏联政府提供的,而且他们还允许斯大林手下的官员审阅和修改手稿。韦布夫妇的《苏维埃文明》尤为赞美俄国人“放弃了刺激谋利的手段,消除失业,为社会消费实行计划生产”,还赞成“消灭地主和资本家”。斯大林向农民发动了无情的战争,把他们驱赶到集体农庄里,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在好多年里几乎毁掉了苏联农业,当时这场战争正在进行。但韦布夫妇宣称,苏联制度比西方制度更民主。还有人称赞它开辟了一个“公民自由的新时代”(路易·费舍<sup>[1]</sup>),是一种“新的民主制”。

坎特伯雷的“红色教长”休利特·约翰逊<sup>[2]</sup>写的《地球上的苏维埃六世》对苏联没有一点批评,这都著作极为流行,印了许多版。萧伯纳访问了苏联,大加赞美斯大林。急于在俄国革命之中找到希望的人们,像这样几乎放弃了批评理智的做法,到后来就像1914年人们蜂拥参战那样让人难以置信。没有比这更让知识分子声誉扫地的了。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要么成为党员,要么成为党的同路人,有名望的人士差不多都加入了这个行列。像诗人W.H.奥登和C.戴·路易斯,当时的超现实主义者法国的路易·阿拉贡,重要的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安德烈·马尔罗、亨利·巴比塞(此人借机写了一本过分吹捧斯大林的传记)和伊格纳里奥·西洛内,还有德国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这些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到了30年代末,上述泰斗人物大都出于义愤放弃了共产主义,但其他人从未放弃共产主义。)

甚至有人发现弗吉尼亚·伍尔芙也为共产党的喉舌《每日工人报》写稿。苏联高级领导人卡尔·拉狄克(不久就在1937-1938年大清洗运动

---

[1] 路易·费舍(Louis Fisher),美国著名记者。

[2] 休利特·约翰逊(Hewlett Johnson,1874-1966年)多次访问苏联,认为苏联实现了基督教的教义。

中被斯大林杀掉)吹嘘说:“在资产阶级英国的核心、在资产阶级子弟接受最后教养的牛津大学,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认为,只有和无产阶级在一起才能获得救赎。”其中名气较大的是后来因间谍案而家喻户晓的剑桥学生小组,其中有盖伊·伯吉斯、吉姆·菲尔比和安东尼·布伦特等<sup>〔1〕</sup>。在1932至1934年间,几乎所有思想活跃的大学生都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其中一些人加入了共产党。几乎可以说,在大学里,整整一代求知探索的年轻人都有过接近共产主义的经历,要么是在20年代,要么是在经济萧条困扰的30年代,在30年代的情况更多一些。

剑桥大学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莫里斯·多布<sup>〔2〕</sup>,向那些羡慕苏联的学生证明“有计划的”苏联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学生们之所以选多布的课,乃是因为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代表的流经济已经高度数学化;不懂数学的人根本理解不了。)著名生物学家霍尔丹<sup>〔3〕</sup>是一名身分公开的共产党员。在法国,玛丽·居里的好友、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皮埃尔·朗之万是法国著名的同情俄国的人士。居里夫人的女婿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加入了共产党。这些科学家相信,在苏联,科学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束缚,比在别的地方发展得更好。

在美国,有过同样经历的纳撒尼尔·韦尔<sup>〔4〕</sup>宣称:“在人民阵线时期和战时同盟时期,也就是1935—1939年和1941—1945年间,许多新政的支持者视共产党员为英雄人物,具有献身精神的、坚定的社会革命者组成的精英群体的成员。”他说,他认识一位政府高级官员,“一位接近白宫的人士”,他申请加入共产党,但得到的答复是他不够格。吉姆·菲尔比<sup>〔5〕</sup>说,他认为自己被选中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里弗-罗珀在他的著作《菲尔比案件》(1968年)中说:“当时我从未想过,因菲尔比过

〔1〕 盖伊·伯吉斯、吉姆·菲尔比和安东尼·布伦特等5人在二战期间为苏联收集情报,50年代起被陆续揭发。

〔2〕 莫里斯·多布(Maurice H. Dobb, 1900 - 1976年),自1924年起直至去世,一直在剑桥任教。

〔3〕 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1892 - 1964年),英国生物学家,群体遗传学创始人。

〔4〕 纳撒尼尔·韦尔(Nathaniel Weyl, 1910年 - ),美国学者,著有《红星照耀古巴》(1961年)等。

〔5〕 吉姆·菲尔比(Kim Philby, 1912 - 1988年),英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实际上是苏联间谍。



去的共产党经历而指责他。”

伯特兰·罗素虽然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是从 1920 年出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与理论》开始,就一直批评莫斯科。在 30 年代初,他的立场发生了动摇。当时他期望而且总体上欢迎他所看到的、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的胜利(见《教育与社会秩序》,1932 年,第 145 - 146 页)。约翰·斯特拉奇<sup>[1]</sup>出身于正宗英国世袭贵族家庭,他在那本风行一时的书《即将到来的权力斗争》(1932 年)中预言了这场胜利。这本书预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持续下降的利润而展开战争(美国同英国开战,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将在德国获胜)。由于希特勒好勇斗狠的反布尔维克主义控制了德国,而民主制度变得衰弱无力和犹豫不决,这种情况让人产生一种末世感: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仅存的两种活跃信仰之间必然要决一死战;人们必须在这场最后的斗争中选择自己的立场:

我心平气和地歌唱,  
在云彩的上方,光环的外侧……  
将来这类东西没有一样能活下来;  
无辜的翅膀马上被击落,  
隐秘的星辰在血色的黎明中消逝,  
那里,两个世界正在搏斗。

(C D 刘易斯<sup>[2]</sup>)

西方知识分子这么莫名其妙地向往苏联共产主义,可能是出于好几种原因。当然,经济是最主要的原因。30 年代,就在民主政体几乎毫无希望地对抗经济萧条的同时,俄国的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继续向前发展,至少斯大林的宣传机器和天真的外国同情者是这么说的。<sup>[3]</sup> 1929 年开始第一个伟大的五年计划,目的是实现俄国的工业化。“俄国没有失业现象!”对于这句话可能作出的解释是,那里实行的是经济奴隶制,但是在 30 年代失

[1] 约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 1901 - 1963 年),英国社会主义者,政治家。

[2] C D 刘易斯(Cecil Day Lewis, 1904 - 1972 年),英国学者、诗人,曾加入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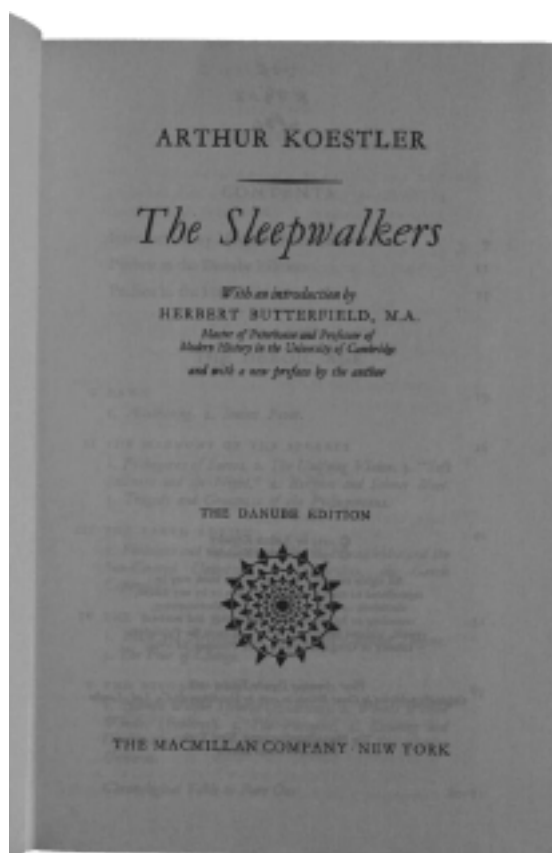
[3] 韦布夫妇转向苏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费边社的解决办法感到失望。韦布夫妇反思道:“我们错以为我们知道如何防止失业。我们实际上是不知道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直到 1936 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才给出答案。——原注

业的严峻氛围中,甚至经济奴隶制似乎也是可取的。苏联的友人们在书中宣传,苏联正在为工人创造天堂式的社会。

其次,共产党人还得益于30年代的厌战情绪。列宁是1914年极少数反对战争的人之一,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马上使俄国退出战争并且号召和平;他们公布了秘密条约,谴责整个欧洲的国家制度。列宁对战争做出了马克思主义解释,认为战争是由资本帝国主义引起的。而且社会主义者宣称,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即可实现普遍和平。后来在30年代,有些人认为,只有苏联一直在反对希特勒试图控制欧洲大陆的欲望。

在1936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斯大林向反法西斯一方提供了一些援助,而民主国家没这样做。在1938年希特勒提出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过程中,民主国家带头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把苏联排除在慕尼黑协定之外,据说是想利用德国来对付布尔什维克主义。这种说法可能把事情过于简单化了,但是它似乎确有道理。共产党人确实在意大利和德国同法西斯主义英勇地战斗。共产党人毕竟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经常痛斥的危险分子。有一些人像安列·纪德那样,他们热爱苏联是因为苏联在与敌人斗争。

1934年后,共产党路线发生了改变,提出了“人民阵线”策略,共产党人变得更加易于接近。在此之前,共产党人一直斥责社会党人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或“工人阶级的叛徒”,拒绝同他们合作。在苏俄,布尔什维克查禁并迫害前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20年代,在老的社会党人与新的共产党人之间,发生了一些激烈论战;共产党人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创建了第三国际,接受莫斯科领导。希特勒在德国得势后,共产党人认识到他们没有建立一个反法西斯战线(他们严重低估了纳粹主义),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现在他们根据莫斯科的命令,试图结交其他左翼团体,形成统一战线。他们在行动中不总是全心全意,而且彼此之间还存有许多不信任,但是人



凯斯特勒作品封面

民阵线一度很得人心；在 1936 至 1937 年，以社会党知识分子、饶勒斯的学生列昂·布鲁姆为首的一个人民阵线政府领导了法国。

西方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演出这场戏，归根结底缘于这一事实，他们正在寻找一种信仰。爱德华·厄普沃德<sup>〔1〕</sup>写道：“我对共产主义表示好感主要是因为绝望，而不是对政治和经济形势的认识。”亚瑟·凯斯特勒<sup>〔2〕</sup>在脱离共产党后成为“那个失败的神灵”最有力的分析家。他评论道：“摆脱悲剧困境，遁入一个不给踌躇和怀疑留有一点余地的封闭信仰体系，这使人获得思想的舒畅和解脱。”共产党最能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要求牺牲精神，”路易·麦克尼斯<sup>〔3〕</sup>回忆说，“你必须抑制自我。”那些皈依共产主义的人显然容易上当受骗，这是一种信仰意志造成的，这种信仰意志使他们不肯相信一切不利于苏联的话。（这是资本主义恶魔在作祟，目的是在信徒中制造混乱。）“我敢断言，此事虚妄。”<sup>〔4〕</sup>事实上党是不会犯错误的。打开天国大门的钥匙从马克思传到列宁，再传到斯大林手里，由教会式的共产党组织负责转交，由圣经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来证实。（当然了，马克思、甚至列宁著作中的那些不适宜的段落被留中不发，据说基督教会也曾干过这种事。列宁在 1924 年早逝之前曾发出不利于斯大林的警告，但是这份材料被严格保密了 30 多年。）在拥护共产主义的重要西方人物之中，布莱希特也许走得最远，主张为了推进美好的事业不惜“身陷污泥”和“敢于作恶”，成为“让革命在自己身上书写命令的白纸”。

凯斯特勒描述过他本人在党内的那段相当可怕的经历，他称之为“精神上的监禁”。尽管他开始认识到这是一段思想弯路，但他不想把这段经历从个人历史中抹掉。（见《无形书写》和《蓝天锋镝》。<sup>〔5〕</sup>）在他的伟大小说《正午的黑暗》中，这位作家（当过记者，很像欧内斯特·海明威）描述了一位共产党员把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交给了党，从而自我毁灭的心理。

一些艺术家出于自私的考虑，认为共产主义会释放出他们的创造性，结果往往发现，情况正好相反。绝大多数人即便不是利己主义者，在本质

---

〔1〕 爱德华·厄普沃德(Edward Upward, 1903 年 - ), 英国小说家, 曾加入共产党。

〔2〕 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 1905 - 1983 年), 英籍匈牙利作家。

〔3〕 路易·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 1907 - 1963 年), 英国诗人、剧作家。

〔4〕 “我敢断言, 此事虚妄。”出自古代基督教著作家德尔图良(约 160 - 220 年)的著作。

〔5〕 这是凯斯特勒写的两部回忆录。

上也是个人主义者,因此很难做出组织上要求的牺牲,去为斯大林越来越严重的罪行辩护。1937年苏联触目惊心的大清洗“审判”是转折标志;接着,1939年苏联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党的路线突然发生变化。如果继续留在党内,党员和“同路人”就得充当越来越不光彩的角色。美国前共产党员尤金·莱昂斯<sup>[1]</sup>称这种角色“是在为凶手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据,对死者进行污辱”。只有少数人能忍受得了。在这些人中,有的像吉姆·菲尔比那样涉足太深,成了苏联特工,为斯大林刺探情报。

## 脱离共产主义

前共产党人写了大量文字,讲述他们加入和退出共产党的经历。这段经历通常让他们彻底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虽说他们可能振振有辞地宣称斯大林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一个可以投奔的人物是列昂·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革命期间是列宁的主要助手,也是一位才智惊人的理论家。他流亡墨西哥,被斯大林的特工暗杀,成了殉难者。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犯了官僚化和个人崇拜的错误,背叛了革命。但是托洛茨基本人的观点似乎没有明显不同;他接受了列宁主义精英式先锋政党的学说,而且他本人也与内战期间实行的恐怖策略有关。

英国工党左翼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是原先的同路人的典型。他最终起来反对党的道德信条:“施展骗术、残酷无情、轻视公道、心甘情愿地利用谎言和变节行为……歪曲事实。”态度死硬的党员认为这类顾忌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伤感。乔治·奥威尔在西班牙开始对共产主义灰心和绝望。1936年,他和其他许多左翼人士一道奔赴西班牙,捍卫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反击“法西斯主义”叛乱分子(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支持的右翼分子)。这位未来创作《1984》和《动物庄园》、有力地讽刺斯大林主义的作者,看到属于一个社会主义小政党的朋友被逮捕和杀害,还遭到谎言的污蔑,但是这一切并不是法西斯分子干的,而是受共产党影响的共和国政府所为。从西班牙回来撰写他的经历时,奥威尔发现,左派分子几乎无人愿意接受他的控诉,他的《向加泰隆尼亚致敬》费了一些周折才出版(1937—1938年)。作为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作家奥威尔现在深信,苏联的集权主义与法西斯主

---

[1] 尤金·莱昂斯(Eugene Lyons),美国记者,著有《乌托邦中的任务》(1937年)、《红色十年》(1941年)等。

义不分轩轻,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敌人。在 1939 年之前的那些知识分子看来,这是异端思想。1939 年 8 月 14 日,400 名著名美国作家发表了一篇宣言,否认苏联与“集权主义”有共同之处。

俄国革命的神秘氛围很难消失,它已经深深地浸入一些人的意识中。据说在意大利农民的茅舍中,斯大林的画像与耶稣的画像并排挂在一起。少数人从未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有这样一个例子:西尔维亚·汤森·沃纳,这位二流的、却相当有名的英国小说作家,成了一名狂热的共产党人,她想把史蒂芬·斯彭德<sup>[1]</sup>从党内清洗掉,因为他的思想还不够正统。她信仰的共产主义似乎与她的艺术没有关系。她的小说描写的是琐碎的个人生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风马牛不相及,人们相信,她本来也不想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在她的后半生,她却捍卫斯大林主义,一直到 70 年代。或许她坚守信仰是出于简单的惯性,问题在于,很难找到一种新的思想框架,实际上很难塑造一种新的自我,很难找到新朋友。

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许多家庭都受到了另一种后辈反叛父辈的创伤。忠诚于共产党的爸爸和妈妈,对孩子大声喊叫:“法西斯!麦卡锡分子!”,而孩子们无法理解他们的父母怎能去捍卫一位大屠杀的制造者,怎能去美化一种奴役制度。这种惨痛的悲剧出现在许多自传、小说和戏剧之中(例如阿诺德·韦斯克的戏剧三部曲,1958—1960 年<sup>[2]</sup>)。英国出版家维克多·格兰兹<sup>[3]</sup>发现自己当做父亲来尊崇的斯大林竟然是一个恶魔,因此而一度精神崩溃。

但这十年并不完全属于左倾。伊芙林·沃满有道理地抱怨说,奥登、斯彭德和他们的朋友“结成一伙,霸占了这十年”,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好像每一个人都变得极左。沃本人是一位皈依天主教的重要小说家;同 C.S. 刘易斯相像,他又回到了“纯粹的基督教”——基督教在精神上比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暴发户的信条深刻得多。奥威尔把后二者称作“又臭又猥琐的道统”。T.S. 艾略特 30 年代的作品也不像从前那么激烈地反抗传统;《荒原》的作者宣布自己皈依英国天主教、信奉古典主义、成为保皇派(在这里夏尔·莫拉斯的影响的确不小)。艾略特编了一本名为《标准》的杂志,

[1] 史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 1909 - 1995 年),英国诗人。

[2] 阿诺德·韦斯克(Arnold Wesker, 1932 年 - ),英国剧作家。文中提到的三部曲是《大麦鸡汤》、《根》和《我说耶路撒冷》。

[3] 维克多·格兰兹(Victor Gollancz, 1893 - 1967 年),英国著名出版商。

纠集人马来捍卫传统的价值观。他既反对法西斯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认为二者是左道旁门,除非基督教文化未能坚持它的核心思想,否则它们决不能得逞。他晚期的诗歌陷入了深思冥想,很有宗教味道。法国有许多右翼知识分子刊物;乔治·伯纳诺和伊曼纽尔·穆尼埃<sup>〔1〕</sup>是高度介入、不太正统的例子,但在某些方面,他们是非常反动的思想领袖。与雅克·马利坦的新托马斯主义有关的基督教复兴运动方兴未艾,正像卡尔·巴特和鲁道夫·布尔特曼倡导的新的清教神学在德国的情况那样;莱因霍尔特·尼布尔和保罗·蒂利希把基督教复兴运动带到了美国。这股思想潮流时常与极左派的末世论观点混在一起。

W.H. 奥登也许是那一代中最伟大的诗人。他在学生时代就积极推动左翼运动。戴伊·刘易斯称赞他说:“威斯坦,孤独的飞行者,飞行员,我勇敢的小伙子!”,到了30年代末,他却成了基督教徒。还有一些前共产党员选择了一种民主色彩比较浓厚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一种比较精深的、非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者主要的思想来源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马克斯·霍克海默、赫伯特·马尔库塞和西奥多·阿多诺都是这个所的成员。在30年代初,他们被希特勒赶出德国,最终在纽约落户。他们属于当时德国学者、科学家、哲学家、建筑家和作家的文化大移民队伍。这场文化大移民改变了美国的思想生活,使之更接近欧洲的主旋律。这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二战之后影响最大;事实上,在思想史上的一次同样奇特的转折中,马尔库塞在晚年成为60年代青年运动的偶像。

在两次大战之间,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鲜为人知的马克思早期著作,拒斥斯大林主义,认为它简单化地歪曲了马克思,他们还尝试将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或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还活跃着其他非共产党领导的左翼团体,当然,纳粹革命将它们全部消灭,这不仅因为纳粹无暇区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细微差别,更由于这些团体中往往有很多犹太人(法兰克福学派就属于这种情况)。

与莫斯科全部由中央政府规划的集权做法相比,各式各样比较温和的社会主义思想在30年代获得了有力支持。大萧条令资本主义名声扫地。“以使用为目的、而不是以牟利为目的有计划的生产”优于无序和贪婪的资本主义;一切思想健全的、也就是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在原则上接受这种

---

〔1〕 乔治·伯纳诺(Georges Bernanos, 1888 - 1948年),法国小说家、政论作家。伊曼纽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 1905 - 1950年),法国作家、新闻记者。

看法,虽说他们不一定接受俄国的实践。不仅马克思主义者持有这种看法,而且许多反共人士,例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见他的《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和伯特兰·罗素这两位思想的游侠都持有这种看法。罗素敌视苏联共产主义,完全因为它缺乏民主和思想自由,但他没有将这归因于社会主义本身,而主要归咎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他认为“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是站不住脚的,不仅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是如此,而且,“对于社会所需的产品,它是一种很不经济的生产方式”,从这个角度而言它也是站不住脚的。可以比较一下萧伯纳就这个主题所作的许多演讲。整个西方社会主义传统植根于费边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它认为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更有效率。惟一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效率的获得是否以丧失太多自由为代价。

如果说社会主义这个词已经沾上了太多的污点,那么“集体主义”能够有效地取而代之。保罗·艾迪生<sup>[1]</sup>指出:“知识分子极为成功地将集体主义确立为一切有思考能力的人公认的智慧。”“集体主义”意味着“社会保险”、“福利国家”势力强大的工会、加强对“大企业”的控制和高税收;或许某些国有化形式也可划入此列。但是,由政府采取行动以对付经济萧条的主要理由,越来越多地由才华横溢的剑桥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来,凯恩斯以前属于布卢姆斯伯里圈子<sup>[2]</sup>,他的一些大学生朋友是共产党员,但他本人却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连同它的近亲——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都已无可救药地成为过时的东西。在 20 年代,凯恩斯就曾向传统的公共财政方法提出挑战,在 30 年代,他把自己的观点整理成为一般理论的形式,在 1936 年发表。

凯恩斯认为,与现行经济学理论相反,在自由经济中,不存在自动走向平衡和实现全员就业的趋势(萨伊定律);相反,很可能出现停滞和人力资源过剩现象。其中主要原因是,社会的全部储蓄不一定投资在资本设备上。本应该为保证储蓄投资提供机制的利率(储蓄增加,利率就下降),很可能不会有效地发挥作用,因为流动偏好(liquid preference,以货币的形式或以某种易于转变为货币的形式保存资金的想法)使储户可以接受他们货

---

[1] 保罗·艾迪生(Paul Addison),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

[2] 布卢姆斯伯里圈子(Bloomsburyite),指 1907 - 1930 年间经常在位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区的克莱夫·贝尔和瓦尼萨夫妇家里和瓦尼萨的兄妹(妹妹出嫁后名弗吉尼亚·伍尔芙)家里聚会的一些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

币获得的比较低的回报率。凯恩斯强调了成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过度储蓄和过低投资的倾向。其结果可能是经济停滞。

不能指望经济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就像老派经济理论家相信的那样;它需要政府干预的刺激。以前政府采取的应对经济萧条的对策是,削减开支和平衡预算,当时认为,经济萧条就是经济形势围绕一个平衡点而出现的暂时性波动,在30年代经济萧条的最初阶段,政府就采取这样的政策,但并未产生效果(有时候竟带来了政治灾难)。凯恩斯和其他人、特别是一个瑞典学派所倡导的新经济学,却提倡不平衡预算,主张政府把财政的重点投入到经济流动之中,以打破僵局。(凯恩斯从未打算把预算赤字制度化。暂出现的赤字可以在经济回升时期得以弥补。)倍数效应保证这种开支对于私人部门的刺激要比所提供的数额多上许多倍。

政府也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来调控经济,例如操纵利率、提高和降低税收——在总体上,根据特定的时间内经济的需要,利用大量财政资源发挥调节作用。整个方案赋予公共部门一种新的和更加积极的角色,虽说不管这个术语怎么用,它都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并未受到触动,虽说赤字财政和社会福利措施可能使它们受到高税收的控制。

凯恩斯主义的观点逐渐流行起来,随着老派经济学理论溃不成军,它很快就成为一种新的正统经济学理论。这场经济萧条的持续不断动摇了新古典主义的法规。英国著名主流经济学家A.C.庇古,最初是反对凯恩斯的观点的,1937年,他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在一定程度上认了错。坚持纯粹自由市场理论的一些大牌经济学家开始默默无闻。路德维希·冯·米泽斯<sup>[1]</sup>的一个学生曾回忆说,在40年代,这位曾试图证明社会主义行不通的著名奥地利经济学家,在大学里找不到教职,竟然沦落到在纽约市的一家商业学校作兼职教师的地步。<sup>[2]</sup>芝加哥大学,还有别的大学,也拒绝了米泽斯的学生和奥地利同胞弗里德里克·冯·哈耶克,而此人后来获得1975年的诺贝尔奖。

彻头彻尾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制度被贬低为人类社会的黑暗时代;卡

---

[1] 路德维希·冯·米泽斯(Ludwig von Mises, 1881 - 1973年),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始人。

[2] 理查德·科尔努埃尔:“论述看不见的手的新作”, TLS, 4月5日, 1991年。——原注



尔·马克思的前辈和导师亚当·斯密成为愚蠢的代名词。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彻底的国有化一样，将被证明是一场灾难。但是几乎没有人听他的。大部人认为，凯恩斯主义，美国的新政，瑞典的“中间道路”，或者再加上法国的“人民阵线”等等提供了另一种不同于俄国共产主义的、充满希望的民主道路，它们是应付这场严重经济困难的一种手段，虽说必须承认，在 1939 年以前它们的效果并不显著。



《意志的胜利》的镜头

大萧条产生的众多经济思想，包含着从最大胆的、业余的经济观念到极其精细的专业分析。其中约瑟夫·熊彼特<sup>[1]</sup>的著作值得一提。熊彼特曾在奥地利政府中当过部长，后来移居美国，执教哈佛大学。他把经济学研究放在一个比较广阔背景下，而不是在狭窄的经济背景下进行研究（这正是大多数专业经济学分析的一个严重缺陷）。熊彼特也许同情

奥地利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和米泽斯，但他相信未来属于社会主义。尽管熊彼特赞赏作为财富生产机制的资本主义，但他认为资本主义注定消亡。他的理由与其说是经济学的，不如说是社会学的。19 世纪资本家的企业精神慢慢消失；缺乏个性的官僚成为经理人，而资本家的后代则成了知识分子。熊彼特还认为，家庭，这个刺激积累财富欲望的重大因素，也正在衰弱。不会再有布登勃洛克家族了！<sup>[2]</sup>在成功地创造出财富的同时，资本主义本身也在削弱节俭和家庭等价值观。这是马克思“资本主义自我毁灭”说的翻版，但是它的弦外之音却大不相同，它更多地带有斯宾格勒而不是黑格尔的色彩，主要是悲观的而不是乐观的。在这方面，也许它比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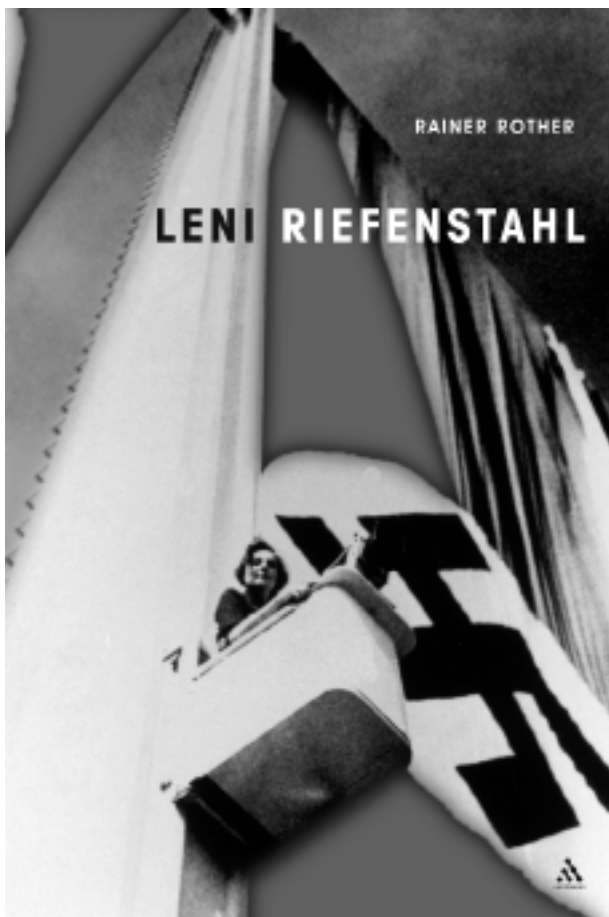
[1]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883 - 1950 年), 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

[2]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描写了大商人布登勃洛克家族的兴衰。

克思主义者更能适应时代的氛围。<sup>〔1〕</sup>

有充分的数字证据表明,投奔左翼的主要是知识分子。除了“左派读书会”<sup>〔2〕</sup>兴起以及其他大规模的政治信仰转变的现象外,还有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1930年英国共产党仅有1367名党员,到1939年则刚刚超过1.5万名。而大部分人都在剑桥大学读过书!诚然,欧洲大陆的情况大不相同;法国共产党办的《人道报》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大多数人在日益流行的电影所提供的逃避现实的精神食粮中,找到了更多的慰藉,以摆脱经济萧条带来的痛苦。30年代是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的时期,在20年代初露端倪的广播、电影,在30年代比较全面地发展起来,甚至电视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当时知道嘉宝和玛琳·戴德丽的人可能比知道斯大林和希特勒的人还要多。

这两位独裁者都认识到这种新媒体的宣传价值:莱妮·里芬施塔尔<sup>〔3〕</sup>颂扬民族社会主义获胜的影片《意志的胜利》,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有蛊惑力的宣传电影。虽说有一些好莱坞影星为了赶时髦,变得左倾起来,大众娱乐文化在气质上仍然敌视政治意识形态。获得惊人成功的英



里芬施塔尔给纳粹拍电影

〔1〕 比较一下詹姆斯·伯纳姆《管理革命》(1940年)中的观点:“资本主义”注定要完蛋,但取而代之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管理精英的统治,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西方,这个新阶级开始崛起掌权。其他研究斯大林主义经济的学者注意到,事实上,它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奇特组合。——原注

〔2〕 左派读书会(Left Book Club)是1936年由出版商格兰兹、“红色律师”克里普斯和作家约翰·斯特拉奇共同发起建立的左翼图书发行组织,一度风靡英国。

〔3〕 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 1902 - 2003年),德国纳粹时期电影导演。

国演员诺埃尔·科沃德<sup>〔1〕</sup>，或许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事实上，科沃德很像查理·卓别林，几乎打破了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藩篱。但是，与卓别林不同，这位出身寒微、集演员、剧作家、作曲家于一身的人物，对共产党却没有好感。他写道：“我希望知识分子们，也就是那些头脑聪明的家伙，都到俄国去。”可以想见，他创作的英国历史喜剧《骑兵团》（1931年）是以“二十世纪蓝调”为结尾的：

在这个奇怪的幻想，  
喧嚣和混乱之中，  
人们似乎迷失了道路。  
朝什么目标努力呢？  
爱情或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 哲学革命

维也纳出生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本是一名航空工程师。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受到伯特兰·罗素的影响，成了哲学家。他在1922年出版了《逻辑哲学论》（这是英译本的名字），与《尤利西斯》和《荒原》大致同时出版。它与后两本书一起成了现代主义宣言、成为让人顶礼膜拜的著作，与那两部昭示战后思想和道德危机的文学杰作一样既深奥晦涩，又引人入胜。《逻辑哲学论》也是一部文学杰作；见解犀利、篇幅紧凑、充满灵智，2万字的内容一下午就可以读完，但足以让人困惑好几年。这本书源于他在剑桥大学与罗素和G.E.穆尔<sup>〔2〕</sup>的尖锐辩论。1914年，他离群索居在挪威的一个小屋里写作这本书。在一次大战中，他带着它上了战场（在战争中，他在奥匈帝国军队中作为士兵英勇作战）。因此《逻辑哲学论》具有人们能想到的最传奇的经历；古怪、热情的维特根斯坦具有一切天才哲学家可能有的超凡魅力。结果，这是他生前出版的惟一一本书，虽说他在30年代著述颇丰，但那些著作在他1951年死后才出版。这本书的结论是，哲学解决不了生活的重要问题，维特根斯坦遵守这个结论，在20年代放弃了

〔1〕 诺埃尔·科沃德(Noel Pierce Coward, 1899 - 1973年),英国剧作家、演员。

〔2〕 G.E.穆尔(George Edward Moore, 1873 - 1958年),英国哲学家。

哲学。他解构了自己的学科：“我们最好对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也许一丝淡淡的安慰是，他相信，对一个问题进行完整的解释可以解决它。“这样一来问题就不会继续存在，这本身就是答案。生活问题的答案就在于这个问题的消失。”

在 1926 至 1928 年间，维特根斯坦与所谓维也纳学派<sup>〔1〕</sup>多次会谈。这个学派发表宣言，宣布发起一场哲学革命，称新哲学为逻辑实证主义。他们读到《逻辑哲学论》时，很钦佩维特根斯坦，可是与他交谈却发现，其实他的思想与他们并没有那么接近。他甚至不想谈逻辑，那可是他早年在英国极喜欢的东西；他谈文学和宗教，但对于像鲁道夫·卡尔纳普和莫里兹·石里克这些满脑子都是科学的哲学家来说，这两个学科是很讨厌的。不过，在 50 年代以前，维特根斯坦通常被当做逻辑实证主义者。正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他似乎在说，与语言相对应的、外在的事物状态是存在的。在这一阶段，维特根斯坦似乎接受了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根据“逻辑原子主义”，世界是由独立的、具体的事实或事物状态构成的，一些基本陈述能够与它们相一致。而且他赞同这种说法：“哲学的任务不是建立一套命题，而是澄清其他命题。”

与维也纳学派其他成员一样，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不应建立理论或体系，更不应该借此来探求真理；严格说来，它的目的是逻辑方面的，是为了澄清人们在试图思考之际陷入的思想混乱。这是“反对语言蛊惑我们理智的斗争”。哲学无法找到对自身的认识，形而上的真理不存在；寻找知识（真实命题）是科学的职责。“哲学描述不了现实，而且它既不能证实也不能驳斥科学研究。”哲学问题之所以提出来，完全是因为对语言的误解。”“在哲学著作中发现的大部分命题和问题不是伪问题或命题，就是无意义的问题或命题。”因此哲学具有两种功能：一方面证明先前被当做哲学思考的大部分内容是无意义的（它们都是通过文字游戏来回答无法回答的问题）；通过澄清和说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术语，在方法论上帮助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逻辑实证主义是由一群哲学家和数学家发起的。大约在 1920 年以来他们活跃在维也纳大学，到 30 年代，由于纳粹主义肆虐和战争爆发，他们

---

〔1〕 维也纳学派是以维也纳大学科学哲学教授石里克(M. Schlick)为中心形成的一个学术圈子，其成员有汉恩(H. Hahn)、赖特梅斯特(K. Reidermeister)、弗兰克(Ph. Frank)、纽拉特(O. Neurath)和卡尔纳普(R. Carnap)等。

四散而去。有些人去了英国和美国,在那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与当地传统融合在一起,这些传统(英国经验主义、美国实用主义)在精神上与他们很接近。他们受到一战前恩斯特·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的某些影响,也受到世纪之交语言学关注语言的形式结构的影响。(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决心“把首创精神让给词语”,强调这一点就是承认语言的优先地位,认为它不是思想的工具而是思想的创造者,是一个自律的领域,不同于自己临时和偶然遇到的“现实”。)对于卡尔纳普和他的朋友们来说,当务之急是设计一种新的语言,或改良旧的语言,使它与经验科学所揭示的可观测现象的领域相一致(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并不这样看)。语言本身往往是不值得信赖的指南;它们是出于某些目的而不是为了理性的思考而创造出来的,它们有掩饰和歪曲的功用。一种使用数学符号的语言,也许是实现科学目的所必须的。



维特根斯坦

正如我们从爱因斯坦那里所知道的一样,新兴的科学革命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像“原子”、“电子”、“力”、“物质”这类词语是怎样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的?显而易见,它们与现实世界不是一回事儿。它们也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仿制。我们将感觉材料转换成语言所使用的词语属于另一套法则,这套法则试图与现实世界保持一致,可是有的时候却未能成功,甚至还成为一个障碍。

“原子不是事物,电子不再是经典物理学意义上的事物……当我们到达原子层面上的时候,空间和时间当中的客观世界就不存在了,用于理论分析

的数学符号仅仅指涉可能性,而不指涉事实。”(海森堡<sup>[1]</sup>)坚实的、精确的、“真实的”物理世界似乎化解为“我们的想像的影子而已”(玛拉·贝勒<sup>[2]</sup>)。“坦诚地意识到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一个影子的世界”,亚瑟·埃丁顿<sup>[3]</sup>在他那本拥有广大读者的《物理宇宙的本质》中称,这是最有意义的现代“进步”。

一战爆发之前,青年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就与罗素在一起,试图以逻辑的形式表现数学原理。罗素在1905年发表的论文《论指称》,就是他早年潜心从事的、让语言更精确、更合乎逻辑的工作的一部分。与维也纳逻辑学家戈特利布·弗雷格相似(弗雷格也对维也纳学派产生过影响),罗素力求使代数建立在稳固的逻辑学基础上,在这个过程中,罗素试图证明,恒等式、集合因素(元)以及集合等这些纯粹的逻辑学观念,足以建立自然数的基数。他设计的“类型理论”就是为了克服在达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即那个有名的悖论,“一切不包含自身的集合所组成的集合”。

所以说,罗素、马赫、弗雷格、科学、逻辑学、语言学,所有这些都围着哲学革命打转。在30年代中期,英国逻辑实证主义者A.J.艾耶尔引人深思地提出这一点。这场革命与30年代左倾的氛围有某种联系。维也纳学派似乎有些偏左,它的一位成员奥托·纽拉特曾经参加过1919年在慕尼黑建立的短命的革命政权。艾耶尔说:“菲利普·汤因比差一点就说服了我加入共产党。”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反抗传统的学说;艾耶尔不无得意地回忆说:“老头子们都被气坏了。”我们只须看一看他起草的那部宣言《语言、真理和逻辑》(1935年)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氛围:“哲学家的那些传统争论,大部分是没有结果的,也没有必要。”传统哲学关注的许多问题——有关上帝、自由、精神、生活的目的和道德的问题——都是荒唐的。虽说讨论这些问题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制造术语混乱,这些问题也纯粹



维特根斯坦

[1] 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1901 - 1976年),德国物理学家。

[2] 玛拉·贝勒(Mara Beller),希伯来大学科学史教授。

[3] 亚瑟·埃丁顿(Arthur Eddington, 1882 - 1944年),英国天体物理学家。

是哲学家的情感投射,对于这些“情感”陈述,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只要一个问题无法被归结为经验的、可检验的陈述,就不要理会它,就只当一阵风吹过。

有人曾评论说,那些已经习惯于听别人说自己不对的神学家们,在听到别人说自己根本没有说出什么东西时,他们倒真的哑口无言了。应用到道德上,逻辑实证主义极具颠覆性。价值陈述无法在经验上证实,因此它们变成纯粹是偏好的表达。“我认为通奸不对”与“我不爱吃菠菜”或“我不喜欢现代艺术”,属于同一种陈述。逻辑思考无法为行为提供支持;我们必须到别处寻找价值观。我们可以在宗教或社会功用中找到。但是,把道德品味公然与其他个人情趣等量齐观,有鼓励放荡行为之嫌。因为这样一来,我选择应如何行动就像选择领带一样——都是个人情趣问题。(布鲁姆斯伯里圈子发现,G.E.穆尔在剑桥大学上宣讲的理论也能够提供类似的理由,从而支持人们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

这场哲学革命可以这样来描述:哲学不再“追求智慧”或寻求绝对的价值,相反,它只是科学的逻辑或用来澄清科学的方法或概念。这门追求彻底明晰的新哲学,多多少少反映了在一切思想领域开始占主导地位的职业精神。“文人”、业余人士,或者在成为现代职业化知识分子之前栖身于大学的那些人,他们的思想大胆活跃、无所顾忌,但是经常不够严密细致。新的专业人士想变得“讲究科学”,想精明干练,想做技术水准高的工作。知识必须精确。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了证实原则(真实的陈述必须得到感性经验的证实),并且把证实原则与细致地考察语言结合在一起。有些人可能抗议说,这样一来哲学岂不是放弃了它的主要功能,从而使迫切需要它提供价值观的现代人变得高傲自大和枯燥无味。对于这些人,新派哲学家尖刻地回答说:“对不住,这不是我们的事儿。你要是真的需要帮助,去问诗人或神学家好了。我们是科学家。”

专业哲学的敏锐的分析方法最终赶上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步伐。有人问:“证实原则怎样才能得到证明呢?”维特根斯坦本人转向更具怀疑倾向的立场。他在1929年重返哲学,继续进行哲学研究。1932年,他说:“过去我一直认为语言和现实之间有直接联系。我现在不这么看了。”我们怎样才能认识事物呢?我们无法不受语言的羁绊;我们是语言的囚徒。除了用语言之外,我们还能用什么来探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我怎样才能描述图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海森堡干扰原则的东西似乎在此为知识设置了限制:它的结构、它的规则构成了一个自足系统,这个系统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词语的意义与其说源于它们与外部世界物体对应一致,不如说来源于它们在语言系统中的使用方式。“只有在一个由语言和非语言行动构成的系统的语境中,名称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见解以及其他一些见解,主要是在 1953 年之后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一年他的遗作《哲学研究》出版。这本书包括了他晚期的核心思想。所以说,尽管他在 30 年代已经提出了这些思想,可是这些思想基本上算是后来的思想史的一部分。《哲学研究》取材于他在 1933 至 1935 年间的口述——显然这是维特根斯坦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当时他才四十五六岁。他已不再保持沉默;有人说他没有发表什么值得关注的东西,那是因为他不能创作出系统的东西。他死后面世的大量著作都是以笔记、评论、谈话、讲义或打字本的形式出版的。这符合他的禀性,也与他引导的新方向的特征一致。他已不再去设计一种新的、完全符合逻辑的语言。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够摆脱其他语言所具有的共同局限。所以我们必须设法应付我们纠缠不清的语言。哲学家能够帮助我们清理它,但这只是在个别情况下。

英国文学批评中也出现了严格的和专业性的分析精神。在 30 年代的牛津,F.R.利维斯<sup>〔1〕</sup>事实上是不善交际的维特根斯坦的朋友;他编了一本名为《细绎》(Scrutiny)的刊物,正如刊名所示,他鼓励对诗歌做逐字逐句的细致考察,以反拨在维多利亚时代被当做文学批评的那种相当随意的“闲聊”。必须建立和捍卫明确的文学标准。细绎派批评家自认为手持锐利的批评分析刀片,切开情感杂质构成的巨大外壳,以深入探究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坚实内核。与分析哲学家一样,他们被指责枯燥琐碎。但是他们在考察艺术作品的过程中,引入了某种令人振奋、类似于科学专业知识的东西。至少有利维斯看来,这项任务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马修·阿诺德式的、发现“伟大传统”中真正杰作的计划的一部分。(他喜欢 D.H.劳伦斯,不喜欢詹姆斯·乔伊斯。)

科学获得极大尊重。各个领域不断地发生进步,虽说有的时候是很不吉祥的进步。1931 年,英国的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此后,欧洲大陆的物理

---

〔1〕 F.R.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 1895 - 1978 年),英国文学评论家。



学家奥托·哈恩、丽萨·迈特纳、列奥·齐拉特<sup>〔1〕</sup>在发展可控制的铀裂变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铀裂变是产生原子能的根源。1934年,匈牙利人齐拉特申请一项有关链式核反应的专利。就在同一年,费米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使铀原子产生裂变。费米,这位“意大利的探索者”,后来到了美国,加入了爱因斯坦和齐拉特的行列。在他的指导下,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橄榄球场的地下建立了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奥地利人迈特纳是另一位先驱,她与爱因斯坦的老朋友哈恩以及她的外甥奥托·弗里希,在1938—1939年间完善了费米的实验。她也是为了躲避纳粹的反犹运动,来到美国定居。弗里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二战期间,在防止德国人造出原子弹方面出了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一名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这就是极权主义时代科学和政治变幻无常的情况。

在职业学术人当中,实证主义心理学往往比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更有影响。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 F. B. 沃森的主要论著在 1913 年问世,他与俄国的巴甫洛夫一道,避免分析内在的心理状态,认为它不适合精确的治疗;他们坚持可计量的、对外在行为的观察,他们往往更喜欢用老鼠而不是人作为研究对象。基调比较教条的行为主义往往认为,人的本性是由它的环境机械决定的,生命由一系列条件反射组成,精神本身并不存在,大脑组织中只存在一种电子反应图形。这种 18 世纪唯物主义的传统在下一代人中被 B. F. 斯金纳继承。这里体现的是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体现的相同的“形而上学”恐怖。

“科学人文主义”这个术语被朱利安·赫胥黎<sup>〔2〕</sup>大力宣扬,表达了一种通过科学取得进步的信念,它有强烈地敌视传统宗教的弦外之音。另一位赫胥黎,也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在 30 年代最流行的一本书《美丽新世界》(1932 年)中讽刺了科学文明,到 1970 年为止,这本书销售量将近三百万册。在《美丽新世界》中,在“福元”632 年(相当于公元 2532 年),丧失了

---

〔1〕 奥托·哈恩(Otto Hahn, 1879 ~ 1968 年),德国科学家,以研究元素同位素和放射化学著称。

丽萨·迈特纳(Lise Meitner, 1878 - 1968 年),犹太血统的奥地利和瑞典物理学家、放射化学家。

列奥·齐拉特(Leo Szilard, 1898 - 1964 年),匈牙利裔美国物理学家,敦促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倡议者之一。

〔2〕 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 1887 - 1975 年),英国生物学家、作家;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之孙,传记作家兼文学家伦纳德·赫胥黎的长子。

人性的人类经过调教,都用同样方式进行思考,事实上,他们是用同样的基因制造出来的(赫胥黎在这方面确有先见之明);通过让他们享受“可感觉作品”<sup>〔1〕</sup>和自由开放的性生活,而使他们保持谦卑恭顺。

在科学家与艺术家之间,就科技究竟是解放者还是奴役者这个问题展开的争论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但是,随着哲学让位,严肃的人们转向具有想像力的作家,希望在他们那里找价值观和拯救的信息。

## 左倾年代的文学

在30年代,创造性作家醉心于社会问题,给后世留下了一些出色的文学遗产,虽说它们现在已经过时,但依然是一座座里程碑,值得历史学家们深思。有一些作品,单就长度而言,就令人望而生畏。法国社会小说家于勒·罗曼,他创作的卷帙浩繁的社会现实主义小说《善意的人们》,长达一万页,篇幅超过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虽说质量可能稍稍逊色。他志在描绘社会世界的宏大画卷,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媲美。书中描写了政客、资本家、实业家以及怀抱济世安邦之志的知识分子。英国人罗伯特·布赖福特和美国人厄普顿·辛克莱<sup>〔2〕</sup>写出了类似的全景式社会史。令人印象更深刻的是,约翰·多斯·帕索斯<sup>〔3〕</sup>创作了美国三部曲,将社会现实主义与某些象征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技巧融为一炉。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是描写美国西部贫苦农民生活的感人的长篇小说,在30年代轰动一时。其他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批评家抱怨说,这些社会现实主义作家不大了解真正的资本家和政客,他们对工人生活所知更少,但他们却塑造了这类人物,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给他们的刻板形象。社会现实主义很可能毫无现实依据。它也会成为枯燥无味的说教,带有闹剧特征。不过罗曼的这部长篇大作是

〔1〕“可感觉作品”(feelies):《美丽新世界》中让观众能够摸得到、看得见、闻得到、听得见的作品。

〔2〕罗伯特·布赖福特(Robert Briffault, 1876 - 1948年),英国作家,医生,社会人类学,著有《母亲们》、《欧罗巴》等。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1878 - 1968年),美国作家,著有《屠场》等。

〔3〕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 1896 - 1970年),美国作家,在30年代创作的三部曲是《42度线》、《1919年》和《赚大钱》。最著名的作品是《三个士兵》(1920年)。

对 30 年代作家追求道德严肃性的礼赞,是对他们让生活重返艺术和理智



《西线无战事》

领域这种愿望的礼赞。在英国 30 年代“社会现实主义”的那些奇怪现象中,有一种试验性的“民意调查”诗歌,它起源于那些既想成为超现实主义者又想当共产党员的人。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人都要在他们的文学报告中讲同一件事:国王乔治·六世加冕,然后根据这些报告,创造出一首综合了各种典型特征的诗歌。可以想见,这种诗歌自然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914—1918 年的世界大战还在继续激发出许多小说、戏剧以及回忆录。在回忆前线生活的作品中,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向一切告别》和爱德蒙·布兰登的《列兵》尤为典型。罗曼的史诗小说中有整整一卷写凡尔登战役。海

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使卡波雷托战役名垂千古。或许最有名的,要数德国作家艾里希·马利亚·雷马克那部令人辛酸的小说《西线无战事》(这本书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出版,与海明威的小说一样,被拍成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影片)。英国保险代理人 R. C. 谢里夫的戏剧《旅途的终结》(1929 年)以战壕为背景,在国际上轰动一时。这类作品主要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面世。它们与 30 年代开始高涨的反战态度同时出现,而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伴随着左倾激进潮流。通常它们强调战争的恐怖和无意义,或者,至少从中可以感受到 30 年代的氛围。海明威小说的标题对此做出了总结:永别了战争。在英国,青年人立誓不再为国王或国家而战。

30 年代后期,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安德列·马尔罗两人都创作了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的激动人心的小说;后来成为苏联共产主义死敌的马尔

罗,当时为西班牙共和国军队提供了一批战斗机。这位法国大作家想成为一名实干家;他强烈主张文学和生活的统一,最重要的是落实在军事或革命行动中。这种不断地追求使他关注中国革命、西班牙内战,信仰和放弃共产主义,最终使他为一位二战英雄(指戴高乐——译注)效力。

既痛恨战争,又痛恨纳粹,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情感之间的激烈冲突,是30年代最后两三年的标志。反战小说、戏剧、集会、小册子产生的强烈的和平主义或许也促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降临。这种氛围使得希特勒相信,民主国家绝对不想打仗。这一代人的悲剧性讽刺在于,他们不得不回过身去参加他们深恶痛绝的战争,去消灭第一次大战人类残酷行径的产物: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

30年代更伟大的文学作品是20年代遗留下来的。弗兰茨·卡夫卡死于1924年,但是,他的未竟之作《城堡》和《审判》这两部小说,直到1930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之后,才引起大多数欧洲人的注意。在他去世之前,已经有少数人承认卡夫卡是现代文学大师,但是,在他的故乡布拉格之外,人们只知道他的那部著名小说《变形记》,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政府职员变成甲壳虫的故事。卡夫卡本人就是小职员,这位犹太商人的儿子活着就是为了写作,他试图在两个世界之间生活,他所承受的压力可能是他英年早逝的原因。他的后两部伟大小说是有关矛盾重重和压力不断的人类状况的寓言。人类的这种状况最适合与萨特式存在主义联系起来(这两部小说以超然的、客观精确的笔法描绘了一个弗洛伊德式的梦幻世界)。在30年代,它们似乎以怪异的手法记录了集权主义暴政之下的“噩梦世界”和战争的阴影。

纳粹分子在1933年焚烧卡夫卡的书,盖世太保销毁了他的许多手稿。斯大林手下的共产党人认定他就是他们所谴责的“形式主义”的象征,称形式主义是“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表现。假如“资产阶级价值观”这个被严重滥用的词是指卡夫卡的父亲的那种经商致富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以自由和创造性为代价、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社会的机械理性的话,只要想一想卡夫卡是如何全盘拒绝这种价值观,就会发现对他的指责是一个多么大的笑话。

瓦尔特·本雅明<sup>[1]</sup>在他30年代的论著中宣布:“卡夫卡的世界……与

---

[1]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 - 1940年),德国文学评论家,1940年在逃亡途中自杀。

他所在的时代非常匹配,这个时代正在准备大规模地让这个星球上的居民滚蛋。”在乱相丛生的 30 年代,在许多人看来,卡夫卡捕捉到了一个由经济萧条、纳粹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二战凶兆所构成的“噩梦世界”的特征;也许他们在他晦涩的寓言中看出了这种氛围。本雅明不可能知道在希特勒的大屠杀中、斯大林的恐怖下、无数的战役中以及 1940—1945 年空袭中,这个地球上究竟死了多少人。卡夫卡的作品似乎揭示了促成这些惨剧发生的奇特逻辑,他的一个短篇小说,也就是《在流放地》,讲的是囚犯经受施虐狂虐待的故事,可是这些虐待行为并非来自个人。(卡夫卡的三个姐妹死在希特勒的杀人工厂。)

卡夫卡的小说几乎都有一种梦幻性质。他笔下的人物言谈举止非常古怪,与人们在睡梦中稀奇古怪、伪理性的行事方式如出一辙。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通常介于梦幻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引人入胜,发人深省。我们可以解释说,退缩到梦中是逃避无法忍受的现实,或者从积极的方面说,是在寻找另一个世界,乔伊斯《尤利西斯》的续篇《菲尼根守灵夜》完成于 1939 年,也就是二战爆发的那一年,不久他就过早地去世了,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梦的故事;它企图记录梦的语言,这也是人类的梦想(用乔伊斯的话说,“the untireties of lives living being the one substance of a stream-becoming”),这一企图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胆的文学实验,大部分读者刚一打开它,就说看不懂。对于这部充满神话色彩的杰作的翻译和接受,目



卡夫卡

前仍在进行中(由它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部门)。

《菲尼根守灵夜》是《尤利西斯》的继续;它做出了同样巨大的努力,在一部文学作品中整个把复杂的传统和社会统一起来,显示出作者惊人的知识面。或许它首要的主题就是白日世界与梦中世界的对立,这一对立也代表了理想与现实、生活与艺术、此岸和彼岸、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之间的二元性(也是精神与肉体、东方和西方、阴和阳以及乔达诺·布鲁诺的二元论)。“有两个转向标志,西边和东边,正确的一方和错误的一方,昏睡和清醒,如此等等。”就文字(书中涉及多种语言)运用的精彩绝伦而言,乔伊斯的这部杰作举世无双,与爱因斯坦物理学恰成双峰对峙。它的含义不太为世人所理解。也许艺术能够昂首鹤立、高于生活,但是必须为此付出晦涩难解的代价。这位出身寒微的都柏林人旨在理解每一个人<sup>〔1〕</sup>(《尤利西斯》和《菲尼根守灵夜》既赞美文化精英,也赞美流行文化),但他本人注定要成为一个新的最具排他性的精英群体的集中代表:因为只有这些人能够理解他。

二次大战刚开始,他就去世了;弗洛伊德、威廉·巴特勒·叶芝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等其他才华横溢的著名代表也是如此,恰恰标志着这一代的结束。劳伦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早就去世了,他们都英年早逝,但他们的作品却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位置。托马斯·曼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死于1955年,但他们天才焕发的高峰时期已经过去。伯特兰·罗素差不多活到100岁,他最享誉盛名的时期在1945年之后。但是,他的门生、比他更年轻、甚至比他更出色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1951年辞世。马尔罗也在战后的政界发挥了非凡作用。他们基本上属于两次大战时期。在这段时期,人们自认为失落而且缅怀1914年之前的美好时代,但回过头去看,这段时期却是现代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的黄金时代。

## 萨特与存在主义

一部名叫《恶心》的小说,注定被认为是30年代最重要的小说。当它在1938年刚出版的时候,在法国之外,却极少有人注意到它。作者让·保罗·萨特是一位年轻的公立中学教师。此人原是一名“师范生”(在法国青

---

〔1〕 《菲尼根守灵夜》中昏睡的主人公通常为人所知的名字是 H.C.E.,主要代表 Here comes Everybody 这三个词。——原注

年人中选拔精华之精华的“著名学府”——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初期声名鹊起,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公认的领袖;他博闻多识是他有资格荣膺这一角色的一个因素,他集哲学家、心理学家、戏剧家、政治行动者以及小说家于一身。在存在主义的旗帜下,他率领的巴黎思想流派在战后的十年中风靡一时,因而我们把它放在下一章中探讨。但是深刻影响萨特的那一派哲学,属于两次大战之间。他深深地受惠于德国哲学家爱德蒙·胡塞尔和马丁·海德格尔,他的戏剧和小说生动地表现了他们的思想,在 1943 年出版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当中,他还对他们的思想做出了自己的阐释。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 年)在德国是一部开创性的而且相当有影响的著作。<sup>[1]</sup> 1901 年,海德格尔师从“现象学”鼻祖胡塞尔(现象学一词来自黑格尔)。胡塞尔这位德国犹太哲学家大约与弗洛伊德在同一时期出生于摩拉维亚,他也对内在的自我感兴趣。尽管他的探索形式不同于弗洛伊德。他力图通过“腾空”所有的内容,科学地研究纯粹的意识,就好像把所有的商品从货架上取下来,以显示货架的形状。这些原初的意识状态使我们想起了康德的知性范畴,只不过胡塞尔是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探讨(像其他观念一样,我们的逻辑也是心智的发明;在逻辑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实践证明,这种搜寻很难进行下去,很可能无法实现;“意识无法置身于意识之外”,这种见解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发现,即我们用来探讨语言的原语言是不存在的。

海德格尔给胡塞尔严谨的科学主义增加了道德含义。在意识的内部潜藏着现代欧洲人已经接触不到的那种存在。这位德国哲学家一直没有发表、他曾许诺发表的《存在与时间》的第二卷(有人可能说,他被存在给缠住了),他最初是拥护希特勒的,在纳粹当权时代他保持沉默,这是对自己立场的折中。与维特根斯坦相像的是,他在 1976 年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大量著述,因而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sup>[2]</sup> 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有许多不同之处;事实上,他们彼此反对,但是他们却有同样深切的

---

[1] 汉斯·乔治·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英译本,1976 年,第 133 - 139 页)有一段很显眼的论述,证明它对在战后废墟中寻求新的答案的德国青年产生的影响。——原注

[2] 其他哲学流派并不这么看,A. J. 艾耶尔的《20 世纪哲学史》只用寥寥几行文字便把海德格尔给打发掉了。——原注

渴求,渴望了解隐藏在一切观念、一切思想背后的那个基于意识的奇妙世界。先于所有客体而存在的纯粹受体是什么东西?

意识必须有客体,意识是呼应客体或“意指”客体的存在形式。按照萨特令人心动的解说,现象学变得极度悲观,虽说它带有一丝孤注一掷的希望的味道。萨特对海德格尔的自我概念进行了激进的改造,取消了它的任何本质或先验性;意识是一种虚无,一种“存在的空洞”,“吹向客体的一阵大风”,它是完全不同于客观世界中万物的一种存在。它完全是自由和没有根基的。它需要客体,而且必须将他人客体化。存在主义或现象学的心理学将成为一门引人入胜的学科;海德格尔本人以及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和卡尔·雅斯贝斯已经为它开辟了道路。萨特的超强想像力将使它生动地体现在小说和戏剧中。他有一种罕见的、融文学和哲学于一炉的能力,这种能力多少得益于他的导师阿兰<sup>〔1〕</sup>,在这方面超过他的恐怕只有他崇拜的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

《恶心》中那位胡塞尔意义上的主人公罗昆丁,除了活在世上之外,毫无身外之物;他没有工作也没有家,他失去了女友没有别的朋友;他唯一的任务是完成他的历史学博士论文,可又因历史无聊和虚假而弃之不顾。他留下了纯粹的意识,赤裸裸的人性。在这种纯粹的意识下——不再受其他人或事的羁绊——罗昆丁第一次感受到恶心(看到自己在镜子中的脸、肉体、他的“真实性”,第一次有了一种精神分裂的感受,感觉到他外在的自我是一个了无生气的东西)。罗昆丁地地道道是我们时代的形而上学英雄,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经常陷入孤独、精神迷茫、丧失自我等困境。

最后,罗昆丁对于存在的荒谬、自我游移不定的焦虑心情有所缓解。他认识到,正是因为缺乏固定的结构,他的意识才是无限自由的。它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塑造自身的存在。自我不存在,但是意识能够创造出一个自我。

萨特和其他法国人都卷入即将爆发的这场大战中,这场大战迫使他充当新的角色,使他成为民族英雄和轰动一时的文学人物,令人惊羨不已。他要继续进行一种让人称奇的写作和生活工程——写自己的生活、以写作为生、把通常无法兼容的艺术世界和生活世界融合为一体,现代人极少能做到这一点。1940年之后,他写出了主要作品,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而正是在1940年,希特勒的坦克群在法国长驱直入,开始了欧洲历史上恐怖与

---

〔1〕 阿兰(Alain,1868 - 1951年),法国哲学家,其著作影响几代人。



英雄主义交织的 5 年。

所谓存在主义,是一种相当宽泛的说法(存在主义有多种;它是一种“常在的哲学”,与其说它的特征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它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 19 世纪中叶丹麦作家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在 20 世纪被发现(他的作品直到 1938 年才译成英文,虽说早在 20 世纪初他在德国已为人所知),他对卡夫卡等人产生了影响:贯穿卡夫卡大部分著作的一种不可名状的、泛化的恐惧感正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恐惧”(Angst)。F.海涅曼在 1951 年评论说:“克尔凯郭尔的复兴是我们时代最奇异的现象之一。”克尔凯郭尔死于 1855 年,时年 42 岁,当时他穷困潦倒、默默无闻。他强烈的个人主义、他要求彻底的介入精神,他痛恨大众、机构,痛恨以虚假的外在之物取代内在的体验,这些让人想到尼采的许多思想,但与尼采不同的是,这位丹麦路德派教徒的精神之旅是宗教性的。克尔凯郭尔宣布:“存在先于本质。”这一点他与马克思相似,马克思认为,我们必须从具体的人类开始,而不是从黑格尔的理念开始;二人都反对黑格尔。但是马克思最终归结到另一种抽象之物:无产阶级。只有个体的意识存在。克尔凯郭尔留给存在主义的是他对灵魂从焦虑和畏惧到信仰“飞升”这段旅程的生动阐述;个体通过追求一种无法理解、但却遇见的超验的存在,选择和获得生存。这种绝望的信仰,“极端的绝望”,正是日后处于黑暗岁月中的欧洲所需要的。

## 第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 反复的震荡

路德维希·马尔库塞在回忆录中写道：“历史学家应当仔细比较一下1914年8月1日和1939年9月1日的景象。这两场战争开始时的情况并不一样。”一个主要差异就在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在二战之初没有那种欢呼雀跃的兴奋场面，没有颂扬战争的诗篇。在过去20年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及几乎其他所有的人都在谴责战争，誓不再战。为了对抗可怕的威胁，欧洲民主国家的人们迫不得已参战。他们多少有些沮丧忧郁，而不那么奋发激昂、跃跃欲试。（德国也是这种情况。）虽说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相比，希特勒的邪恶更为明显，其侵略行径也更为昭彰，但是，在1939年，公众舆论远不及1914年那样完全一致。T.S.艾略特思忖道：“1914年我们没有料到战争会爆发，当战争到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感到困惑。这一次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预料战争会爆发，但战争来了，我们反倒感到困惑。这是一桩很奇怪的现象。”

产生困惑的部分原因是，满脑子和平主义思想的公众关注着其他问题，面对纳粹的威吓，他们不愿意断然采取行动。在1936年发表的文章中（《哪条路通向和平》），伯特兰·罗素以惯有的明确态度对待这个问题，但或许也是以惯有的偏执断言：宁可向希特勒投降，也不要同他开战。后来连他自己也不可能恪守这种断言。大部分知识分子欢迎同德国妥协的慕尼黑协定，为此感到如释重负（西蒙娜·韦伊声称：“百分之百正确！”）。但是，当希特勒得寸进尺、显露出控制欧洲大陆的意向时，气氛就发生了剧变。在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政客们的态度突然转变，决定为无法防

御的波兰而战。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德国的威胁：希特勒是纸老虎，稀奇古怪的民族社会主义（纳粹）政权很快就会垮台，也许无须战争就能做到。1939年8月纳粹与苏联签订的条约迫使各国共产党表示反对与德作战；在法国，他们甚至要组织罢工，反对军工生产。

一些事后诸葛亮认为，从一开始就应当抵制希特勒的要求。当时未能做到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一战后的和平协议让人们良心不安。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历史学家们就一次大战的起因、根源以及战争责任展开了大规模的争论。这场争论虽然经常语义混乱，但却大量涉猎了相关档案文献。结果，“修正派”基本获胜。他们反对仅由德国一方承担战争责任。俄国和法国同样难逃其咎；或许应当责怪的是“制度”，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有关人的制度。大部分英国公众认为，如果希特勒要求归还莱茵地区和萨尔区的全部主权，甚至要求合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地区的德意志人，这些要求未必不正当。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939年3月宣称，“不管我们怎样强烈反对他们采取的方法”，德国目前得到的权益应当加以捍卫，“无论是基于种族的亲缘关系，还是基于长期受到抵制的正当要求”。后来被斥为懦夫的“绥靖”首相，事实上与公共舆论的步调相当一致。

除了在令人触目惊心的破坏方面，这场战争几乎在各个方面都迥异于上一次大战。法国人同上一次一样，等待着打一场防御战，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德国机械化师团发动闪电战，冲破他们的防线，疾速从侧翼包抄他们。希特勒的临时盟友斯大林吞并波罗的海三国，攻打芬兰，与德国人再一次瓜分波兰这个不幸的国家。与此同时，德国军团在六周内打垮了法国和低地国家。

在让·保罗·萨特的自传体小说《心灵之死》（系列小说《自由之路》之三）中，主人公大无畏地同德国人战斗，直到死亡；而在现实生活中，萨特是在他的上级军官都投降后束手就擒的。因此，小说就以虚构来弥补生活的败笔。在一片消沉的法国沦陷期间，萨特的实际经历实在是太典型了。他的恢宏夸张的存在主义伦理会说，德国的占领使法国人民面对严峻的抉择：要么合作，要么抵抗。许多勇敢的人转入地下，为盟军作情报工作，虽说商业（还有娱乐）居然像平常一样大行其道，令人咋舌称奇；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有人发现，萨特的女友西蒙·德·波伏娃居然在滑雪度假，这有点儿让人吃惊。另一位存在主义者阿尔伯特·加缪，主编抵抗运动的机关报《战斗》。他一度加入了共产党。

在战争期间,共产党人为反纳粹事业忠诚地工作,因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在法国抵抗运动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表现突出:基督徒和共产党人。他们都有坚定的信仰,可以适应危险的地下工作的需要。这两个团体都产生了加缪和萨特所推崇的英雄人物。1945年之后,共产党(在法国和意大利)和基督教民主党或基督教社会党(在法国是人民共和运动),从战争中崛起,成为主要政治团体。在战败的德国和意大利,以前几乎无法存身的基督教政党主宰了战后政治。在德国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和希特勒作对,其中主要是政治立场坚定的基督徒,像朋谔斐尔牧师<sup>[1]</sup>。



加 缪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相比,第二次大战中的宣传是软弱无力的。“民主”的周围又有了新的光环;自由社会的种种美德可能华而不实,但是,与希特勒的暴政相比,它们看起来还算是好的。加缪宣告:“集权主义自称要去治疗的任何一种邪恶,都比不上集权主义本身那么坏。”朱利安·赫胥黎在1941年宣布:“民主在胜利前进。”美国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称颂它是“普通人的世纪”〔与卡尔·弗里德里希<sup>[2]</sup>《普通人的新信仰》(1942年)相呼应],作曲家阿伦·科普兰<sup>[3]</sup>谱写了一曲“普通人颂”(不管这个人是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伯纳德·史密斯编了一本文集,名字就是《民主的精神》(1941年)。但是这些作品主要是鼓吹美国精神。

纳粹政权罪大恶极令人发指,以致于英、美两国几乎没有人去反战,虽说“按照良心行事的反对者”要比1914—1918年多得多。不过,针对德国

〔1〕 朋谔斐尔牧师(Dietrich Bonhoeffer, 1906 - 1945年),反纳粹的教会组织“忏悔的教会”的主要成员之一,1945年被纳粹绞死。遗著有《狱中书简》等。

〔2〕 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 1901 - 1984年),德裔美国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

〔3〕 阿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 1900 - 1990年),美国作曲家、指挥家,现代音乐的倡导者。

和日本的一些城市进行的近似于恐怖主义的空袭(就在1945年8月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以前),招致了一些抗议。罗伯特·洛威尔<sup>[1]</sup>(后来可能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在1943年8月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说,由于轰炸以及盟军向德国政府提出“无条件投降”政策,他拒绝应征入伍。事实证明,罗斯福总统对此并不同情,诗人坐了好几个月的牢,这段时光并非不愉快。

这种姿态极为少见。以前固守和平主义立场的左派人士,现已全心全意地改变立场,站在苏俄一边,向法西斯主义全面开战。有人说过,当激进分子转变为爱国者,他那种好勇斗狠的劲头谁也比不了;当时的情况就是

如此。立场强硬的共产党人与同路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受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阻碍,1941年6月之后,这种关系急剧改善;左翼—自由主义各个派别能够再一次在人民阵线中统一起来抗击希特勒主义。虽说保守派对与俄国人结盟心怀疑虑,但是,人们几乎看不出舍此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动员全部力量将战争进行到底。人们的分歧往往集中在“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上,因为这项政策能够彻底摧毁德国的力量,从而为苏联留下它注定要去填充的真空。盟国政府内部的苏联同情者想方设法阻挠双方妥协达成和平。<sup>[2]</sup>与反希特勒势力(尤其是德国军队内部的反希特勒势力)的合作是否能



死亡营里的犹太人

避免或缩短战争,乃至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字之时英、法两国是否错失良机,这一问题成为战后的一大争论焦点。

后来有人提出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问题,以此对盟军的政策大加责难——他们能否有更大的作为来终止这场屠杀?不过,在战争期间,这个问题几乎没人提起。最初人们不大相信这类恐怖故事,部分原因在

[1] 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1917 - 1977年),美国诗人。

[2] 著名苏联间谍、英国高级情报官员吉姆·菲尔比,在战争期间帮助苏联阻碍盟军同德国的反纳粹团体产生联系,以防止达成不足以全部摧毁德国的妥协。——原注

于,一战期间流传的种种残暴故事,常常被证明是有意编造作宣传用的。(在两战之间,参加一战的英国公务员承认他们撒了谎。)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1942年夏季之前,盟国中几乎没有人相信大规模地灭绝犹太人的故事,甚至盟国的犹太人领袖也不相信。只是到了1944年,这方面的证据蜂拥而至,直接进入公众的意识之中。盟国领导人避免对此大做文章,认为它对战事有些不利。直到战争行将结束之际,奥斯维辛、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等死亡营的恶名才昭彰于世。那些要求德意志民族必须为这个最严重的历史罪行承担责任的人,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非德意志人长期拒绝相信这些故事。

在战争结束之际,驻德美军接到命令:不许同德国人交谈,不许对他们表示善意;艾森豪威尔将军说过,德国人都是野兽。20世纪最伟大的一位作曲家安东·韦伯恩<sup>[1]</sup>出门买酒的时候被杀死。最近,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宣称,成千上万名德国战俘因遭受残酷对待和忽视而死亡。但是虐待德国人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加缪说:“报复是令人不快的。”他还认为,纳粹主义的污点可能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针对“合作者”(即维希分子)的报复行动却出人意外地温和(维希分子是贝当元帅傀儡政权的支持者,在1944年前,他们秉承希特勒的旨意,统治法国部分地区)。据估计,大约有12,000人被处死,10万人被捕。

在英国,这个身陷重围的民族同仇敌忾的心理,在整个战争期间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在1940—1941年间空袭当中,伦敦出现的休戚与共的情感营造了一种氛围:人们普遍期待着一个经济平等的新时代。战时经济成功管理鼓励了一种乐观主义,人们觉得有可能把这种国家权力用于和平目的。正如一位当事人后来回忆所说:“空气中弥漫着渴望和活力,人们都相信,变化不仅是可欲的,而且事实上是可求的。”“习俗之饼”已被打破,重新开始的机会出现了。30年代那段依靠救济活命的悲惨日子不应卷土重来。贝弗里奇是英国著名战时报告《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评按:应为《社会保险和联合服务》)的作者。过去他一直认为,计划经济牺牲了个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似乎过高。他没有和他的朋友韦布夫妇一同去访问斯大林的俄国。然而,在战争期间,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约瑟·哈里斯记载的那样,贝弗里奇“开始相信,某种形式的计划不再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绝对必要”。他在书中阐明了凯恩斯主义的方案:政府通过明智的财政管理来指导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同时借

---

[1] 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1983 - 1945年),奥地利作曲家。

此机会扩大社会福利事业。

爱德华·赫尔顿<sup>〔1〕</sup>的《新时代》(1943年)一书反映了一位保守派如何转变立场。他赞助了大众性的进步周刊《图片邮报》。这种兴高采烈的情绪不久就被战后的现实情况所打破,但它却导致了工党在1945年大选中出人意外地获胜,使领导英国在战争中获胜的丘吉尔政府下台。

鼓吹“计划化”(以及欧盟)的法国先知让·莫内相信,“同样的合作、对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同样调动”,能够启动法国停滞的经济、把它推向现代化。“要么现代化要么垮台”,这是莫内的口号。显然,战败和军事占领所带来的震动,使法国产生了某种革命,其标志是新的观念和新的领导人。这场战争扫除了旧有的政党,使从前的政敌团结起来,并且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国观,即“一个在发展、活力和实力方面能够同邻国竞争的新法兰西”(罗伯特·帕克斯顿)。

在德国人看来,战败、屈辱、大部分城市在空袭中变为废墟,灾难是如此深重,只有完全重新开始才能行得通。那些经历恐怖而幸存下来的人们经常证实说,在失去一切物质财产的震惊之余,在经历危险和恐惧的时候,他们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它给人们带来的感受,有些类似于萨特笔下人类被剥夺了一切、只剩下赤裸裸人性(人类的基本意识)时的感受。由于身处险境,生命反倒被赋予更多的价值;简单的东西变得宝贵起来。卡尔·雅斯贝斯所说的“临界处境”让人们接触到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发挥了净化作用,它可以治疗浅薄和自满。萨特领会了这种精神。他说:“我们从未像(在俘虏营)受奴役时那样感到这么自由。”

战争刺激了科技进步,这种进步在将来可能(或不可能)被证明是有用的。通常认为,这是欧洲人的头脑与美国人的科技富有成效、紧密配合的结果。在美国工作的欧洲科学家帮助美国发展原子弹,1945年7月16日首次进行了成功试验,不久原子弹就被投向了日本。据说电子计算机之父是德国人约翰·冯·诺伊曼,但是艾伦·图灵却让数字计算机在英国的布莱奇利公园<sup>〔2〕</sup>发挥了作用,战争期间,数以千计的人在那里破解截获的德国人的无线电电报。计算机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政府出于军事目的考虑为它提供了支持。

---

〔1〕 爱德华·赫尔顿(Edward Hulton, 1906 - 1998年),英国报业大王。

〔2〕 布莱奇利公园位于伦敦西北80公里。二战期间,英国破译德国军事密码的机构设在这里。

战争一开始,英国人孤注一掷奋力研制出一套有效的“雷达”系统,提供德国空袭警报,从而挽救了国家;雷达发展的最终产物是晶体管革命,它又导致了集成电路革命。这场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本世纪最重要的医学进步:青霉素的发现。(澳大利亚人弗洛里和逃离纳粹德国的犹太人难民恩斯特·钱恩,战前就在牛津大学研究青霉素。由于缺乏资助,研究一度搁置,直到战争期间美国政府介入,研究才得以继续进行。)在战时需要的刺激下,取得重大技术进步的另一个领域是飞机设计。A.P.斯派泽教授写道,二战期间“美国在以下领域,如电子学、通讯、计算机技术、飞机制造、卫星技术、原子能……领先的基础已经打好”。法国将在战时废墟的基础上修建世界上最优良的铁路系统。

盟国在军事和情报行动的高科技“奇才斗法”<sup>〔1〕</sup>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德国在研制原子弹方面落后英、美团队好几年,在一定程度上,这归因于后者在情报领域取得的惊人胜利。英国人在战争中最成功的一项成就是:破解了德国的密码,从而控制了潜伏在英国的德国特工人员。沃纳·海森堡可能暗中破坏了德国的原子弹研究;巴黎的弗里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确实在暗中向英国传递重要信息。这位法国科学家是研究“重水”的一位先驱,他协助盟军从德国人那里获得重水的供应,重水里含有稀有的氢的同位素,原子弹成功爆炸需要它。后来,在情报网的帮助下,英国人击沉了一船至关重要的重水,这是延缓德国原子弹研制步伐的关键之举。他们还策划杰出的原子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逃离丹麦。

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篇幅内全面评判这段历史的全貌;我们只能提到少数主题。这场战争是一场震撼世界的大变乱(它比1914—1918年的那场战争更有“世界大战”的意味),它是善与恶的奇特混合——令人难以置信的杀戮和蹂躏,滔天大罪,人口迁移引起的动荡,但是,战争的需要以及战争的破坏,也刺激了非凡的创造性,战争破坏了好的东西,也破坏了坏的东西,包括城市贫民窟和过时的看法。

## 战后景象

在战争结束之际,欧洲大陆呈现出一副荒凉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事实上,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一个愤怒的和发抖的世界”整个呈现出这

---

〔1〕 丘吉尔把争夺电子技术优势的竞赛称为“奇才斗法”(wizard war)。



副景象。法国存在主义者加布里埃尔·马赛尔<sup>〔1〕</sup>写道：“1946年，当我走过维也纳市中心废墟的时候，或者近些日子走过卡昂、卢汶或维尔茨堡的时候，我感受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恐怖和焦虑。”德国的主要城市都已经是一片瓦砾，被毁掉的比例从60%到95%（柏林）不等。俄罗斯广大地区被彻底摧毁。波兰首都华沙几乎不复存在。按比例来计算，南斯拉夫的伤亡甚至比德国和俄罗斯还要严重。这些物质上的毁坏，又是道德沦丧的外在表现，这种道德沦丧体现在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行为。

马赛尔继续指出，在许多人看来，其必然结果是否定欧洲的传统（《智慧的衰落》，1954年）。1946年出版的许多书与马赛尔的概括是吻合的：老H.G.威尔斯写了《智穷才尽》，马克斯·韦伯的兄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写了《告别欧洲历史》。《欧洲时代的消失》是一部著名的历史著作（作者是埃里克·费希尔），从标题就可以明显看出现代的状况：权力已经转移到美国人、俄国人，或许还有中国人那里，他们正在瓜分世界。阿诺德·J.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论文明衰落和解体的沉痛部分（第4—6卷）在1939年就已经面世，这是他在20年代开始的一次探索的产物；它们正好触动了1945年之后的思想情绪。汤因比最后判定，物质主义毒害所造成的精神衰颓是罪魁祸首：“我们被内在的虚假东西出卖了。”不过还有一线希望，因为人类的事务并非完全听天由命。

苏联和美国士兵占领了一个破碎和疲惫的欧洲。在一些欧洲人看来，他们都是外来的野蛮人。很快人们就看出来，俄国人不想给欧洲人带来解放，而是带来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奴役。大部分西欧人马上把美国人当成盟友，来对付苏联势力的威胁，许多人乐意与新世界的民主国握手言欢。少数欧洲文化的承受者认为，俄国和美国本质上是一样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同样令人生厌的科技狂热，同样不受限制的普通人的组织”（《形而上学导论》，1959年英译本），这种现象依然存在。这种态度不同于处于少数派的共产党人，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态度，在冷战中，他们站在了苏联人那一边。由于两个战胜者因瓜分战利品发生了争执，冷战很快爆发。

有一些人期望结束战争、清除德国制度中的纳粹主义（象征性地体现为1946年纽伦堡审判），认为建立联合国将会带来光明前途。对于他们而

---

〔1〕 加布里埃尔·马赛尔（Gabriel Marcel，1889 - 1973年），法国剧作家、哲学家，1942年创用“存在主义”一词。

言,1945年之后的那几年是令人失望的。苏联由信心十足和毫不妥协的斯大林领导(他坚信资本主义已走向穷途末路),西方盟国惟美国马首是瞻。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的争执很可能导致一场新的战争,即永远循环过程中的另一场战争,正像法国作家雷蒙·阿隆<sup>[1]</sup>一本书的标题所示:陷入“连锁反应的战争”。到了1954年,比二战末期毁灭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更有破坏力的核武器已经研制出来,它们足以让人类在似乎无法避免的下一次战争中毁掉大半个世界。

## 存在主义

在法国,以及在整个西方世界(据说,在访问美国的法国文学界人物中,阿尔伯特·加缪最受欢迎),存在主义为战后初期提供了最让人心动的和最为知名的哲学或意识形态。

直到1940年,萨特还是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一心想着写作,这是惟一可能逃离虚假存在的陷阱的途径。但是“战争教导我,一个人必须介入现实和明确立场”。1940年6月之后,萨特当了将近一年的战俘。在战俘营中,他感受到与各色人等休戚与共之情。他为战俘营的人们写了一出剧,这是一个反抗压迫的寓言。在设法获释之后,他以编辑和作家的身分在地下抵抗运动中发挥了一些作用。1943年,德国人允许他的剧本《苍蝇》在巴黎上演,尽管这部剧反抗暴君(及其教唆者)的思想主题非常明显。在这个经过他改造的埃斯库罗斯的古希腊悲剧中,俄瑞斯忒斯和伊莱克特拉姐弟俩杀死母亲为父报仇,追逐姐弟的复仇三女神(flies)因她们的名字变成了苍蝇(flies);不管你相信与否,同她们的主神宙斯一样,成为无害的东西。

萨特在1943年出版了他的哲学论著《存在与虚无》。1944年巴黎解放,他最有名的戏剧《间隔》首次上演。他在一夜之间成为令人瞩目的民族英雄和思想英雄。萨特的法国同胞、出生在阿尔及尔的小说家和散文作家加缪,在1945年之后与他一同领导“第二代迷惘的一代”。时髦的存在主义伦理规范从蒙马特尔区的咖啡馆四下传播开来,把幻灭绝望的悲观情绪与一点点孤注一掷的希望,恰到好处地掺合在一起。加缪这位英俊的前运动健将在二战期间也同样迅速成名。他不仅是小说和散文作家,还是一位

---

[1]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 - 1983年),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和行动分子。据称,他的崛起“在法国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萨特出身于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家庭(萨特是由当教授的外祖父养大的)。反之,加缪出身于工人阶级。他一岁,父亲死于马恩河战役,他在阿尔及尔由不识字的西班牙母亲拉扯大,他们的生活一直很拮据;他与萨特一样,都是自幼丧父。1932年至1936年,他在阿尔及尔大学学习哲学。他的第一部小说《局外人》(1942年)的主人公与萨特笔下的罗昆丁异常相像,他与客观的生存环境格格不入。加缪在1943年出版了可以与《存在与虚无》相媲美的《西西弗的神话》,表达了尼采式的存在主义观点:尽管存在是荒谬的,但我们必须奋斗。这本书不如《存在与虚无》有分量。加缪缺少萨特那种理论才华,但在很多方面,他显示了更迷人的思想个性。他44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因车祸去世,年仅47岁。他在40年代、50年代写的小说《鼠疫》和《堕落》,与萨特一连串才华横溢的剧作交相辉映。最后,主要在共产党的问题上,他与萨特发生争执。但是,要知道加缪曾经加入过法国共产党。



雅斯贝斯

我们在前面指出,存在主义植根于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以及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思想中。在二战中的一次学术历险事件中,胡塞尔的手稿被从纳粹魔掌中被抢救出来,带到了比利时,现在依然安放在那里。海德格尔还活在世上,名气还在提高,虽说像维特根斯坦一样,他的绝大部分著作在他死后才出版。他们不仅是萨特和加缪的思想先驱,而且也是萨特和加缪的同事莫里斯·梅洛-庞蒂的思想先驱。梅洛-庞蒂与萨特和加缪共同编辑过《现代》月刊。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被纳粹免去教职,险些被关入集中营。战后他在瑞士定居。

与爱因斯坦一样,他拒绝返回祖国。他是一位多产的和受欢迎的著作家。他早年学医,曾转向心理学,后来又转向哲学;在尼采和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下,他的思想道路与胡塞尔、弗洛伊德和容格的思想道路产生了交叉。

他的一本早期著作(1913年)开了现象学精神病学的先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雅斯贝斯在海德堡大学当哲学教授,但是他遭到比较传统的哲学家的敌视,直到1932年他的《哲学》使他成为令人振奋的存在主义哲学倡导者。(与几乎所有被贴上存在主义标签的人一样,雅斯贝斯最后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他最有名的著作《现时代的人》(1931年)被译成16种文字,拥有好几百万读者——它是30年代的一本开创性著作,足以同《美丽新世界》和《恶心》相提并论。在人类的个性可能遭到毁灭的时代,它呼唤着不可或缺的自我的复苏。

就本性而言,人是独特的东西、一种具体的特殊存在,不能像理解其他事物那样,把他理解为某个阶级或集团的成员。确实如此,因为人是血肉之躯,所以他们也是客观的存在,受客观存在的规律和决定论的支配;此外,社会总是在试图把他们变成模式化的客体。我本人的过去,只要我把它看成是已经消亡的东西,就是这种存在。但是人类的意识,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在萨特的术语(源于黑格尔)中,“自为”就是人类的意识,而“自在”是客观的存在。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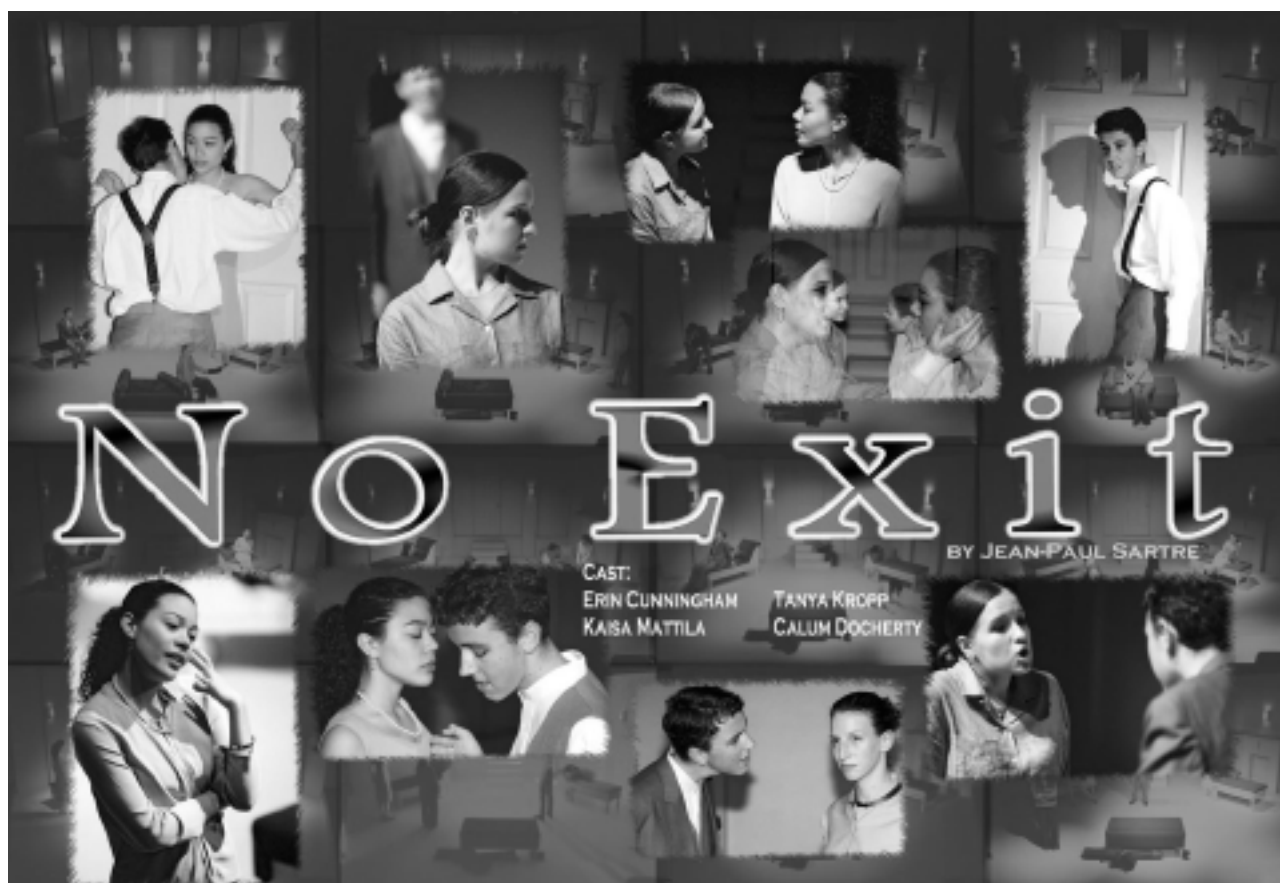


萨特“存在与虚无”

为实际上根本不是存在,只是一种可接受性,一种“存在的空洞”——一种否定性,但是有能力对客体作出反应。其他形式的存在主义不是设想出一个上帝,就是设想出某种形而上的存在(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但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却大胆坚持无神论。上帝不可能存在,因为意识不能够普遍化,不存在一个普遍的自为,只有海德格尔所谓“此在”(Dasein)的个别片段。正如金斯利·艾米斯<sup>[1]</sup>所说:“孤立无助和自我构成的人类精神(是)上帝不存在的最终证据。”

[1] 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 1922 - 1995年),英国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属于“愤怒的青年”文学集团。参见下一章。

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尤其在他早期成名著作中,萨特似乎否认,人与他人能够形成良好关系。人类的处境无法忍受,因为我们想有客观的存在,以必然性为基础的客观的存在,然而我们注定是另一种存在,既没有客观性也没有必要性的存在。当我们在其他人眼里成型的时候,他们把我们变成了客体,这既是对人的贬低,也不够真实;他们只能这样做,正如我们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因为人们的意识只能对客体作出反应。人们既需要又憎恨这种客观化;它赋予了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可是这是以丧失内在的完整为代价的。总而言之,我们注定去协调极不相同的和无法协调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一种他所不是和不是他的存在”。



《间隔》海报

“他人即地狱,”正像萨特在他最有名的剧本《间隔》所说的那样。最糟糕的是,我们离开这间地狱就无法活下去。在这部引人入胜的心理—哲理剧的末尾,那三个互相折磨的人有机会离开他们无奈共处的房间,但他们谁也没有离开。萨特尤为擅长描述爱情挫折,这是恋人们彼此折磨的一种“镜子游戏”,他们试图避免客体化、捕捉对方的自为,但这个任务不可能完成。然而,他本人不断玩下去的正是这种游戏。

## 萨特与共产主义

萨特、加缪和梅洛 - 庞蒂在战后的十年间继续领导知识界。他们的喉舌《现代》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严肃杂志。这个杂志的名字是萨特取自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这份杂志既登载他们之间的争执,也登载他们之间的共识。苏联共产主义和美国领导的敌对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使人们对新的矛盾感到沮丧,同时也感到无限兴奋。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加紧对东欧的控制、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冲突、封锁柏林、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以及朝鲜战争,所有这些冷战事件都迫使人们选择站在哪一方。对于许多欧洲知识分子而言,这种选择是很痛苦的。他们本能是反美的,一直持有亲苏立场,但是有关苏联劳改营上百万人死亡的故事越来越多,使他们内心无法安宁。像有关德国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描述一样,这类说法最初没有人相信,但是证据越来越多,势不可挡。

萨特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多次较量,这使他的立场反复不定。加缪曾是共产党员,但后来退党。马尔罗也有同样的经历;对斯大林的揭露令他十分震惊,他质问这位俄国暴君:“你是怎样对待我们的理想的?”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存在主义伦理的变色龙性质,它只要求人们在根据各自的情况做出选择时保持绝对的真诚。(对于那些向他讨教的人,萨特倾向于回答:“自己来下决心,只是要确保自己完全是真诚的,不要依赖他人制定的规则。”)在政治上,结果可能是一种准保守主义,敌视一切意识形态,即乔治·奥威尔说的那些“又臭又猥琐的道统”,既包括共产主义也包括纳粹主义,二者在两战之间都毒害过人们。

在战后的一段时期,萨特有这种感受。他对马克思主义从未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在1945至1947年间的著述中,他把官方马克思主义贬斥为产生有害后果的粗俗哲学:“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政策与文学行业的诚实活动格格不入。”他与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自由”团体建立联系。他还建立了一个短命的革命民主联盟,成员中有一些前托洛茨基分子。他还支持异端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与斯大林争论。共产党谴责他。他很受欢迎的剧作《脏手》(他后来不想再版)似乎指责那些完全顺从党的命令的人的糟糕信仰。

他的朋友和存在主义同道阿尔伯特·加缪,像英国的乔治·奥威尔一样,十分执著地相信,俄国共产主义已堕落成为“集中营社会主义”,是一场

可怕的骗局,应该把真正的社会主义从中挽救出来。在1946至1950年间,民主国家纠集起来反对苏联,产生了马歇尔计划和北约联盟。在这些年代,萨特本人大体上持与加缪相近的立场,另一方面,共产党在战时抵抗运动中的英雄表现赢得了赞誉。萨特接触过进行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因此懂得应该尊重他们。他的本意与其说是反对共产主义,不如说是想从斯大林主义的阴魂下把共产主义解救出来。他评论道,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毁掉了革命的可能性,因为它忽视了最重要的方面,即人的主观方面;机器人不会造反,造反的决心产生于意识之中。

在这个时候人们对另一个马克思的发现,<sup>〔1〕</sup>强化了这条思想路线——持批判立场的学者们发现,克里姆林宫歪曲和误用了马克思的权威。萨特本人表现得比苏联统治者更像共产党员——比国王更像保皇派!他提供比较时新的哲学和心理学,主动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当然这并没有讨得克



1955年秋,陈毅会见来华访问的萨特、波伏瓦。

里姆林宫祭司们的欢心。这个“波希米亚人”及其悲观的主观主义、与海德格尔的关系,给他们留下了一种更邪恶的印象。后来向萨特道歉的法国共

---

〔1〕 指当时人们对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的研究。

产党知识分子当时称他为法西斯分子。但萨特受年轻的法国知识分子的欢迎,这一点很难打消。

在 1951 至 1955 年间,萨特大幅度摆向共产主义。他访问了俄国和中国。他指责美国人在朝鲜战场进行生物战。他还在 1953 年接受心理分析,而且写了回忆童年时代的自传,即那本有趣的《词语》,这是躺在长椅上的对话。(这本书的写作,始于 1953—1954 年间,随后被放在一边,到后来才完成;1963 年出版。)1956 年,他再次与共产党决裂,但在 60 年代再次与它接近——他与这位替代性的父亲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与此同时,加缪却与他背道而驰。加缪依然坚持存在主义的人格主义。一种基督教的罪恶感出现在《堕落》(1956 年)中,正如邪恶问题萦绕着《鼠疫》一样;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尽最大努力减缓痛苦,同时他们知道,同痛苦本身一样,这类努力是没有意义、荒诞的。“既要提防虚无主义,又要提防乌托邦主义”,这是加缪的研究著作《反叛者》的主要思想;崇拜抽象物就属于这种危险。加缪认为,革命者落得的结果是,他们带来的暴政比他们反叛的那些暴虐行为还要糟糕。正如叶芝所言,乞丐们改变了位置,但笞刑依旧存在。

《现代》刊载了一篇声讨《反叛者》的评论,标志着萨特与加缪开始分裂;加缪所欣赏的低调的精神独立者不同于萨特开始情有独钟的激烈的政治革命家。真正无产阶级出身的加缪,指责萨特及其朋友是安乐椅上的革命者,这话很有道理。不久,他与萨特就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共产主义的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雷蒙·阿隆告诫萨特,他不可能既是马克思的继承人,又是克尔凯郭尔的继承人。但萨特自认为能够做得到。从克里姆林宫的官僚那里挽救出来的“新的”马克思,在萨特的手里,变得与存在主义者相像。人类通过他们的自由选择来创造历史;他们的主体性与一种僵化的社会秩序相互作用,僵化的社会秩序是人类在过去与吝啬的自然相斗争的产物。在选择反叛的过程中,他们克服了异化,形成了人际交往真正的纽带。

萨特渐渐相信,这种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个体所不可或缺的根本性哲学:“我们的思想,不管它们是什么,只有在这片沃土上才能成长。”这一断言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到了 1951 年,萨特已经明显转向正统的共产主义学说,虽说他从未加入共产党。他一直在说,不应该批评共产党,即使它犯了错误;他还说,苏联是一个自由社会,甚至说(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他的剧作《魔鬼与上帝》),残忍的暴君也有其必要性。1954 年(这是在斯大林死后,但是在赫鲁晓夫 1956 年谴责他之前),萨特访问苏



联,被奉为上宾,由于伏特加喝得太多,回来后进了医院。梅洛 - 庞蒂指责他奉行“极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违背了存在主义的自由信念。

1956年,当苏联坦克碾碎了匈牙利革命的时候,萨特谴责这种镇压行径。法国共产党对苏联行径的辩护,令萨特和无数知识分子、党员深恶痛绝。他的反应是,动手写社会理论巨著《辩证理性批判》。该书第一卷于1960年出版。第二卷未曾问世,但是有部分章节在萨特死后付梓,有一部分在他生前独立成书出版,题目是《斯大林的幽灵》。他想借助新发现的马克思著作,把马克思从克里姆林宫里解救出来。他想创造一种符合真实的人类状况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的历史理论。到最后,萨特不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表示,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克思本人所在的时代是完全正确的,但不适用于现在。不过,《辩证理性批判》在60年代左翼革命思想复兴过程中起了一些作用;有关这场复兴的情况,下一章将要论及。



萨特与波伏瓦 1960年

就在他的朋友雷蒙·阿隆论述“社会主义神话的终结”之际,萨特成为新一波激进主义浪潮的主要预言家之一。他最伟大的剧作之一《阿尔托纳的隐藏者》于1960年上演,其中包含了他的极其有趣的深层心理研究的因素,但一般认为,该剧是对当时阿尔及利亚动乱中使用酷刑的传言的评论。愤怒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往萨特的住所投掷炸弹,数以千计的退伍老兵在巴黎街头游行,高呼“杀死萨特!”他已成为一个公共人物,一种政治象征。

## 共产主义的没落

二战期间,在遭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共产主义表现得相当出色,红军是抵抗希特勒德国的主力,共产党人在组织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不仅在法国是这样,在南斯拉夫也是如此,铁

托领导的游击队被证明是最有能力反抗德国人的战士,而且能够克服这个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团结的问题。在法国,杰出的科学家弗里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改变原来的信仰,开始信奉共产主义,他是著名人物、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的女婿,他的妻子也是大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夫妇留在法国,同德国人玩一场危险游戏,德国人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帮助来制造原子弹。他很谨慎地避免为他们提供帮助,同时把消息透露给盟军。到了1943年,他已经确信,共产党人是抵抗运动最优秀的领导者,其他很多人也持有这种看法。他不加批判地迷信斯大林的苏联,他不是惟一在政治上轻信的科学家的。约里奥-居里暗示,如果发生反苏战争,他不会为法国而战。他狂热的亲苏立场促使他访问苏联,接受斯大林奖金,出席战后由苏联举办的世界和平大会。当时,苏联人力图延缓西方军备的步伐,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却在研制原子弹。

没有证据表明约里奥-居里帮助苏联造核武器,无论是1949年裂变的“原子”弹还是几年之后威力更大的聚变氢弹。但是,他以前在放射线研究所的同事、忠诚的共产党人布鲁诺·篷泰科尔沃提供了帮助。法国陷落后,篷泰科尔沃去了美国。在1943年,这位意大利科学家带着他的原子武器专长来到加拿大,在那里,他与另一位共产党人、剑桥大学出身的艾伦·纳恩·梅一同工作,从事重水研究。后来篷泰科尔沃去了英国,在哈维尔基地从事原子弹研究工作,1951年他叛逃至苏联,向苏联的氢弹研制计划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苏联以惊人的速度研制出原子弹,主要得益于忠实的欧洲和美国共产党人提供的大量信息。纳恩·梅和欧洲科学家德国人克劳斯·富克斯先后承认,他们向俄国透露过核机密。两人都曾大量接触过曼哈顿计划,二战中的第一枚原子弹就是根据这个计划制成的。1951年5月,两位英国高级情报官员逃往俄国,一场最有轰动效应的苏联间谍案曝光了。这件事的经过可以上溯到30年代的剑桥大学,最后还牵扯了其他很多人,包括著名的艺术史家安东尼·布伦特,此人是女王艺术收藏品的保管人。盖·伯吉斯、唐纳德·麦克莱恩、吉姆·菲尔比以及布伦特,在英国外交和情报部门占据要津,至少在1951年之前,他们向莫斯科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那一代人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及间或充当苏联间谍的故事,开启了一类著名的文学作品(现在依然如此)。在这类作品中,丽贝卡·韦斯特的《叛国的

意义》很突出。(她在书中还写了在战争中投向德国的英国人。)<sup>〔1〕</sup>

在冷战氛围下,对间谍案的震惊反应经常走向极端。一场围剿“疑似间谍”的政治迫害把每一个自由主义者都当成了潜在的叛徒。“麦卡锡主义”(这个词源于那位尤其多疑、偏执的美国参议员的名字)促使萨特和其他人对抗反共阵营。美国共产党员埃塞尔·罗森堡和朱利叶斯·罗森堡夫妇,卷入了向俄国提供原子弹秘密的案件,1951年被送上电椅,处以死刑,就在这一年,有共产党之嫌的阿尔杰·希斯被指控作伪证,经过一场轰动一时的审判后被判入狱。希斯是美国国务院高官,在雅尔塔会议上曾给罗斯福总统作顾问。希斯一案成了一种德雷福斯案件或萨科—万泽蒂案件,把左派动员起来,在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中去反击右派。

在欧洲,与此相对应的是巴黎的克拉甫琴柯事件。维克多·克拉甫琴柯是苏联叛逃者,他写了一本书,标题是《我选择了自由》。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刊物说他一派胡言。克拉甫琴柯控告对方诽谤。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共官员否认苏联有大清洗和劳改营。这件事让法共声誉大大受损。正如历史学家欧文·沃尔所指出的:“克拉甫琴柯事件使法共陷入孤立。”法共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说,如果与俄国发生战争,法国人民会欢迎红军,把他们视为解放者。法共的律师在克拉甫琴柯案件中宣告:“谁反对苏联谁就是反对法国。”1948年之后,法共陷入孤立,因为它反对马歇尔计划、反对北约同盟、反对南斯拉夫反抗克里姆林宫的控制、反对保卫西柏林以及其他被斯大林政权斥责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一切行为,然而,在大多数法国人看来,这些行动是对苏联侵犯自由制度的必要反应。

尽管遭到孤立,法共依然有一个由狂热的忠实追随者组成的坚强核心。1951年,他们在全国立法会议选举中赢得21%的选票——事实上它的得票数比其他政党都多,其他选票分散在社会党、两派戴高乐主义者、基督教人民共和运动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小党中间(有人曾说过,“所有政党中最大的那一个”是由不投票的人组成的)。战争结束之际,法共获得28%的选票;得票数在持续下降。总的说来,法共留住了旧有的忠实信徒,这些人在30年代以及二战期间聚集在党的周围,但是法共未能招募到新的信仰者。法共成员都是忠诚信徒,在他们看来,党永远不会犯错误。或许最

---

〔1〕 按照她的思路,逊位国王爱德华八世也属于这类,因为他的亲纳粹倾向是众所周知的;有一种传说,说安东尼·布伦特抓住了王室的把柄,他知道证明爱德华八世彻底叛国的纳粹文件。——原注

极端狂热的信徒就是那个名字叫珍妮特·弗美尔什的女人。这既是他们的长处也是他们的弱点：他们作为一股“反社会”力量而独立于其他所有政治家，他们是孤立但目空一切的少数派。真正打败他们的是主流社会的不断胜利。

历史，他们指望着能够证明自己正确的历史，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1956年，有关斯大林种种罪行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苏联领导人承认确有这些罪行。尼基塔·赫鲁晓夫那份耸人听闻的“秘密报告”从根本上冲击了世界共产主义。就在同一年，俄国派兵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企图，迫使萨特和法共大部分知识分子与莫斯科决裂。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领导人开始艰难地摆脱困境：如何“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恶劣影响”，同时又不“破坏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因为马列主义理论是使整个苏联政权合法化的依据（引自苏共中央委员会发给一家主要苏联历史期刊的命令）。

在赫鲁晓夫时期（1956—1964年），这一困境使苏共在解冻和再冻结之间摇摆不定。它既追求一定程度上的真诚和国际上的尊重，而又担心会破坏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毕竟是以他们曾经效力过的斯大林政权为基础的，而且这个政权的结构和原则还完好无损。所谓“个人崇拜”的说法是一种遮遮掩掩。他们声称，斯大林在某一阶段之前是正确的，后来变得妄自尊大了。那么，



《解冻》

为什么在这种趋势发展之时，没有人对它提出质疑呢？直到1961年，这位已故独裁者的坟墓才从红场上列宁墓旁边移走，他的名字才从全国各地的地名中消失。书报审查依然存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文学的标准。赫鲁晓夫继续支持骗子李森科，而此人恐吓那些令人尊敬的苏联科学家，给苏联农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新的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并没有准备放开言论自由。

不过，面对一种不那么坚决和不那么残忍的压制，苏联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很快在西方引起了反响。在战争刚结束那几年，官方对文学和思想的控制达到了顶峰，当时作曲家肖斯塔克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等苏联艺术家都遭到了官方的指责。声望很高的苏联作家伊里亚·爱伦堡抱怨说：“我们所谓的政治家给我们立下规矩，告诉我们哪类书应该写，哪类画应该画。”官方的立场是，“历史

学家不是一位不偏不倚的叙述者,确证事实和编排事实,尽管他根据的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程式。他是一名战士,他的目标是利用过去的历史为共产主义奋斗服务。”乔治·奥威尔著名的讽刺小说《1984》不符合这种要求,即,必须篡改历史以符合党的当前路线。(尤金·塔尔列<sup>[1]</sup>在写拿破仑入侵的历史书中赞颂俄罗斯民族主义,遭野蛮监禁;到了30年代末,由于斯大林改变了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看法,尤金·塔尔列获释;那些咒骂恐怖的伊凡和彼得大帝<sup>[1]</sup>的历史学家犯了错误,接替了他在集中营的位置。)

现在一批有勇气的作家站出来,主张不要跟着党的路线鹦鹉学舌。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斗争。在1956年秘密报告之后的解冻期间,出现了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尖刻讽刺趋炎附势官僚的作品(《仅有面包是不够的》),赫鲁晓夫威胁要枪毙一些作家,并强迫他们低头认错。1958年,他辱骂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强迫他拒绝因小说《日瓦戈医生》而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此前,这位俄国大作家的这部小说在苏联遭到拒绝后在意大利出版。这部小说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不久就在美国被拍成一部著名电影。法国知识分子写信给克里姆林宫,抗议他们这样对待帕斯捷尔纳克。萨特拒绝在信上签名。1964年,他本人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后来抗议苏联迫害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

作家丹尼尔和西尼亚夫斯基因大胆批评苏联的文化因而遭到逮捕和审判,这个消息泄露后,成为西方报纸上的头条新闻。这种不利的外界反应让赫鲁晓夫感到震惊,于是他解雇了那些文化顾问并在1961年再次下令解冻,但这次解冻也以失败告终。1962年,赫鲁晓夫口吐脏话,直接下令查封了大雕塑家恩斯特·内兹维斯特尼的抽象艺术展。萨特1963年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发现这位俄罗斯领导人脾气乖戾而且疑心重重。赫鲁晓夫现在同意法国共产党头目莫里斯·多列士的看法,萨特是一个危险的反动分子。在1963年早些时候,在布拉格召开的一次作家会议上,萨特做出了反应。他说,苏联官方路线把弗洛伊德、卡夫卡还有乔伊斯都贴上了“颓废”的标签,这是在妨碍对话。赫鲁晓夫不久就下台了,但事实证明,他的继任者还不如他开明。

就在这时,像罗伯特·康奎斯特这样的西方学者(《大恐怖》的作者),还有罗伊·梅德维杰夫这样的俄国持不同政见者,开始进行深入挖掘斯大

---

[1] 尤金·塔尔列(Eugene Tarle, 1875 - 1955年),苏联历史学家,著有《拿破仑传》等。

林时期的全部历史,揭露了当时惨无人道的行径甚至超过了希特勒时代。斯大林的继任者不喜欢或者说不敢用非法的残酷手段来压制异己分子。但他们采取了一个阴险的手段,即把不听话的人送进精神病院。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缺乏那个大暴君的超凡魅力。斯大林至少还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这也是他之所以把数以百万计的人送上死亡之路的原因:他们阻碍历史的前进和真理的胜利。赫鲁晓夫身后都是些没有个性、日趋腐败的官僚,他们陷入他们实际上不再相信、但又无法逃脱的制度之中。俄国革命最后一丝神秘色彩已经褪尽。甚至列宁身上的超凡魅力也难免受到时间和现实的侵蚀。如果说斯大林化使这种超凡魅力贬了值,后斯大林时代干脆把它毁得一干二净。

## 意识形态的终结

如果说列宁的共产主义是最后一个宏大意识形态,那么它的消亡当然也就让人长舒了一口气。意识形态,与那些不容异议的宗教一样,是教人学会仇恨进而导致屠杀的信条。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时代氛围。正是加缪宣告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以逻辑来替代现实,致使人们借着各种“主义”的名义互相残杀。在50年代几乎主宰英国文坛的乔治·奥威尔,表达了同样的对意识形态的恐惧。他退回到具体的个人体验。他说,在现实生活中,你不能随便杀死或折磨一个人,但是,意识形态却能把整个阶级或种族当做抽象之物来判决。波兰裔英国历史学家L.B. 纳米尔<sup>〔1〕</sup>写道,在体验过那些“严重破坏人类福祉的残酷或狂热的政治意识形态”之后,成熟的政治社会学学会了如何在完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依旧运行。

退回个体主义、退回具体的现实,可以说是世界大势所迫。J.M. 科恩在《这个时代的诗歌》(1959年)一书的结语部分指出,“现实的事态已经使任何关于公共事务的评论都显得苍白无力”,从而迫使诗人只能表达纯粹个人意见。“大难临头,他只是希望能够挽救出哪怕是瞬间的爱情、洞察的一瞥、一个清晰的真理观念。这些东西一旦保存下来,就不可能被毁掉了。”有人可能回应说,死亡的威胁不是什么新事物,人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可能遭到不测:先民们曾经在饥饿、疾病以及其他苦难的威胁下生活,比较

---

〔1〕 L.B. 纳米尔(Lewis Bernstein Namier, 1888 - 1960年),著有《1848年:知识分子的革命》等。

而言,现代欧洲人几乎免除了这些威胁。就人类生活的总体而言,现代世界人口的数量和寿命,远远超过了先前任何一个时代,即便经历一场热核战争也会如此。不过,几百年的进步成果很可能在瞬间全部毁掉,一场事故就可以造成这种结果,这种事故已经威胁我们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洲际核导弹也研制出来了,同时,冷战也开始肆虐,有时会变成热战,例如在朝鲜(1950—1953年)、阿尔及利亚或印度支那。最可怕的核对抗就在最近的时刻:1962年。

50年代末,哲学家斯图尔特·汉普希尔<sup>[1]</sup>写道:“英国政治带着倦态暂时平静下来,就大的原则展开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不复存在。就这种意义而言,两大政党都是保守派,它们都被日常的权宜之计缠住了。”工党在1945年的大选中获胜,这场胜利投入了许多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1951年,在一片幻想破灭的氛围中,工党政府下台,工党的胜利宣告结束。保守党卷土重来,从1951年到1964年执政。现在他们接受了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管制经济;有人会借用一个老套的比喻说,保守党偷了工党的外衣。后者发生了严重分裂,分为左、右两派,但是比较温和的集团占了上风。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担任工党领袖的休·盖茨凯尔要求放弃社会主义纲领,他赞成一个更加灵活的纲领。有人造了一个词“巴茨凯尔”,把信奉自由主义观念的保守党人R.A.巴特勒与盖茨凯尔联系在一起。两党实际上没有太大分歧;“共识”成为流行字眼。一种成功的经济模式,即自由企业与政府指导的结合,对于两大政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一样的。工党理论家W.亚瑟·刘易斯选择了一种更有活力的企业资本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其前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原型——已不再是社会主义政党!

在这种共识的背后,在不要使船晃动太厉害的愿望背后,是经济复苏的事实。到了1948年,由于美国的援助以及急于医治战争创伤的那一代人的工作伦理(在德国尤为突出),复兴已经开始。到了1963年,雷蒙·阿隆可以写道:“在1945年,西欧还是一片废墟;今天它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地区之一。”这的确是一个经济奇迹。许多人目睹1945年德国废墟景象后说,重建德国得花上一千年。这个药方,不管它是什么药方,似乎有神奇般的疗效。西欧的领导人相信市场,听取了自由企业经济学家的意见。后者

---

[1] 斯图尔特·汉普希尔(Stuart Hampshire, 1914年-),英国哲学家,著有《斯宾诺莎》、《正义即冲突》等。

包括雅克·鲁夫、威廉·罗普科、卢吉·伊诺第、列昂奈尔·罗宾斯和弗里德里克·冯·哈耶克等。(1947年,这类人在瑞士的朝圣山会面,密谋如何使资本主义卷土重来。〔1〕)但它被称为“社会市场”,政府在指导经济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这种体制有别于社会保险和福利措施,后者现在已经大大地扩展,保护工人免受竞争制度造成的最坏打击。法文是 dirigisme: 统制经济,它本质上是自由企业制度,但人们可以控制它驶向正确的方向。或许它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欧洲需要重建,美国人有资金,人们想工作。

希望的象征来自欧洲经济一体化观念。1957年签订的《罗马条约》,目标是建立共同市场,废除关税以及清除联邦德国(西德)、法国、意大利和其他三个低地国家(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之间的其他贸易障碍。《罗马条约》是以法、德煤钢共同体为核心发展起来的,而法、德煤钢共同体植根于德国和法国工业家在莱茵兰地区长期合作的传统,在这一地区,经济现实超越了政治界线。让·



哈耶克

莫内这类人物很有眼光,他认为,在现代,国家主权已经过时,成为经济进步的障碍。旧有的建立一个欧罗巴合众国的观念重新兴起。

然而,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初获得成功,主要归因于欧洲新的均势,而不是理想主义。建立欧共体是让联邦德国恢复经济元气而又不许它完全独立的一种办法。第二次大战和冷战将德国一分为二,与其说是有意为之,不如说是出于偶然。清除了纳粹主义的西德,成为西方盟国中颇受重视的成员,虽说它还未完全得到信任。德国需要法国,法国也需要德国。出于抵制苏联威胁、经济需要和势力均衡的共同考虑,往日的敌人(在1963年正式)握手言欢。一个分裂的德国不再像以前那样代表着威胁。就联邦德国而言,它盼望最终能够把东德从苏联控制之下解救出来。

在摆脱制造大灾大难的独裁者的过程中,出现向民主制回归的总体趋

〔1〕 这次会议由哈耶克发起,与会者36人,均为欧洲和美国的自由主义学者。会上建立朝圣山学社。会议通过的声明表示,这个组织只是推动研究,而不做宣传。



向,但这与其说是出于人们的热情,不如说是由于人们的冷漠。罗素在1952年评论道:“很难否认,民主制激发的热情,已经不同于它在卢梭那里以及它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起的热情。”人们新近在赞美民主制时,给它披上了温和适中和普通端庄的外衣,抗拒曾经危害世界的那种过度狂热的理想主义。民主的理念经历了同左、右两派极权主义信条的冲突,最后被塑造成一种很克制的理念。它强调,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可避免地有不完善的地方。它承认民主制的缺陷。民主不再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意识形态的反面。克里斯托弗·马丁在一篇题为《政治冷漠颂》(1960年)的文章中写道:“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民主的意识形态。”到60年代,缺少改革活动会让年轻人感到厌恶,可是,在50年代的人看来,这却是一种积极的美德;事实证明,世界的拯救者是世界的毁灭者。E.M.福斯特<sup>[1]</sup>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1951年)中这样提议,向民主欢呼两声,无须三声。<sup>[2]</sup> 是一个弯曲的世界,决不可能把它完全直过来;麻烦从来就有,无穷无尽。

## 保守主义的种种倾向

迈克尔·奥克肖特的保守主义理论,在战后的英国享有盛名。他认为,“政治理性主义”是一种错觉。汉娜·阿伦特<sup>[3]</sup>认为:“在人类事物领域中,凡是自称拥有绝对真理的主张,都冲击了所有政治和所有政府的根本。”这似乎又回到了爱德蒙·伯克。C.S.刘易斯<sup>[4]</sup>说,他之所以成为一位民主主义者,是由于他相信原罪:人类“过于邪恶,因而不能赋予他们多于最低限度的统治他人的权力。”阿尔弗雷德·韦伯进一步认为,反抗大众统治的最好的武器是“自由和民主”——他把多元民主视为阻止以极权主义方式实行“人民”统治的武器。对于权力的这种不信任态度,可见于这几

---

[1] 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 - 1970年),英国小说家,著有《霍华德庄园》、《印度之旅》等。

[2] 福斯特在《向民主欢呼两声》一文中解释:“向民主欢呼两声,一是因为它允许多样性,二是因为它允许批评。”

[3]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 - 1975年),德国出生的美国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以其关于犹太事物的批判性著作以及对极权主义的研究著名,最主要的作品是《极权主义的起源》。

[4] C.S.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 1898 - 1963年),英国学者、小说家,著有《爱情的寓言:中世纪传统研究》等。

十年中最有名的一本政治论著,伯特兰·德·儒维奈尔<sup>[1]</sup>的《权力论》。该书作者发现,政治演变中最重要的不在于政府形式,无论是贵族制还是民主制政府形式(不管怎么说,二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回事),而在于强制机器,即权力的稳步发展,无论是谁操纵这台机器。伯特兰·罗素在同名著作中认为,权力是一个独立的可变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的一种功能。J. B. 普里斯特利<sup>[2]</sup>(《文雅的无政府主义者》,1955年)描述了当时的一种担心,“在反对权力的同时个性消失了”,自由消失了,年轻的一代“把严密控制视为理所当然”。通常与这种有些沮丧的担心相伴的是对民主的低调认同,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如果不算其他没有尝试过的政体,民主是“曾经尝试过的最坏的政府形式”。



阿伦特

权力研究确实是战后政治和社会思想界很感兴趣的话题——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相当正常的结果。雷蒙·阿隆写道,“我们已经强烈地认识到,在所有社会中,权力是主要现象。”除了儒维奈尔的精彩论著之外,在诸多“权力精英”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深受马克斯·韦伯影响的海德堡大学社会学家 A. 吕斯托的论著。政治学家总是强调,多元主义是“多头”权力秩序中精英之间的竞争。在历史学家当中,路易·纳米尔和他的门生集中关注实际权力的定位。韦伯本人目前像马克思一样成为众人研究的对象;现代社会的官僚组织是异化的根源,它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中都存在——这种观点与反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氛围是合拍的。

这种对权力的关注也影响到小说创作。“没有什么东西比权力更有腐蚀力了”,这是埃维·康普顿—伯内特<sup>[3]</sup>精心创作的小说的基本主题。她的小说在 50 年代拥有广大的读者。她的作品,很像与萨特进行友好辩论的对手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小说,通常以家族为背景。(虐待儿童、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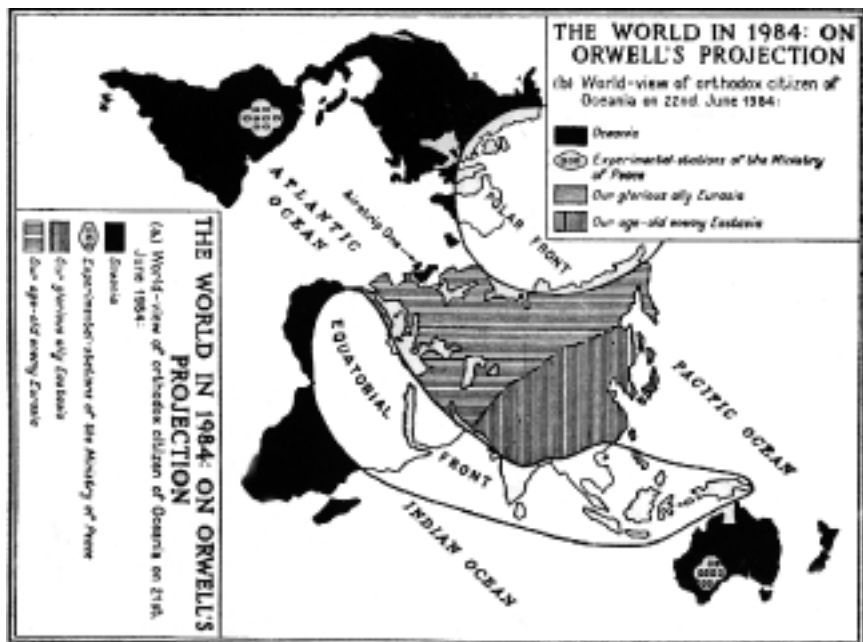
[1] 伯特兰·德·儒维奈尔(Bertrand de Jouvenel, 1903 - 1987 年),法国经济学家,涉猎甚广。

[2] J. B. 普里斯特利(John Boyanton Priestley, 1894 - 1984 年),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

[3] 埃维·康普顿—伯内特(Ivy Compton - Burnett, 1884 - 1969 年),英国女作家。

伦、家庭暴力很难说是最近时期的发现。)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于

1954年出版。在50年代它很可能是英国声望最高的严肃小说。这部小说对一群身处“自然状态”、与世隔绝的孩子们进行了霍布斯式研究,展现了原始状态下赤裸裸的强权状况。(与之相似的一部瑞典小说,施蒂格·戴格曼的《死亡岛》,写于1946年。)不



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显示的世界

过,50年代最轰动的小说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该书出版于1948年,不久这位魅力四射的作者就英年早逝了。作为一本“反乌托邦”小说,该书没有把按照科学方法组建的未来社会写成天堂,而是写成了地狱,这本小说可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及尤金·扎米亚京的《我们》相提并论,后者是在十月革命后不久的俄国写的。<sup>[1]</sup>

小说矛头显然指向了苏联(还可以参见奥威尔辛辣的讽刺之作《动物庄园》),但也有希特勒政权的影子,以及作者本人作为一名官员在二战中的经历以及冷战的影子。三大帝国瓜分了整个世界,显然它们治国方式是一样的;在它们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战争,或者说伪装成战争状态。(或许英国已经不幸地沦落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附庸。)一小撮统治精英受到疯狂规训,盲目服从老大哥,只要上方有命令,随时准备说 $2+2=5$ ,他们使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受压迫状态。这是暗指斯大林主义国家;可是那些让《1984年》成为西方经久不衰畅销书的读者却明确承认,书中也有西方社会的许多特征。《1984年》之中充斥这种悲观看法,即,这个世界无可避免地走向中央集权制和个体失去自由,这种悲观的看法不仅在自由主义者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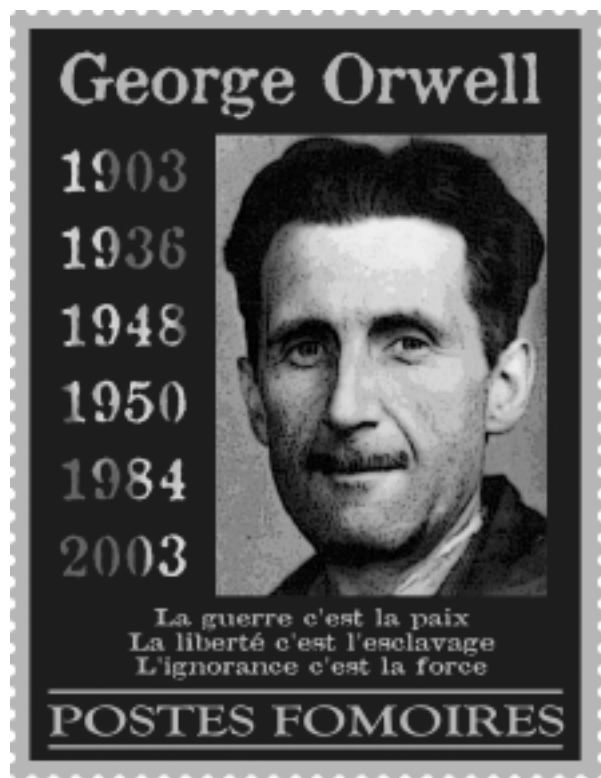
[1] 1952年,赫胥黎更新了这部经典,写了《重访美丽新世界》,他发现,先前的预言完全准确。——原注

盛行,也在保守主义者之中盛行。在奥威尔描写的国度,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精英控制语言的一种功能;统治集团发明了一套“新说法”,让人们相信,奴役即自由、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奥威尔说,这种欺骗比较容易生效,因为有太多的知识分子“崇拜权力和残忍的成功”。他永远忘不了他们是如何屈从斯大林主义、甚至屈从于法西斯主义。

奥威尔本人,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带着一种怀旧的情绪回顾一去不返的农业社会。他叹息道,要是他早出生几百年,他本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牧师。同他所钦佩的 D.H.劳伦斯(两人的命运也很相似,都因肺结核而英年早逝)一样,他也不喜欢整个现代工业社会。但是他毫不怀疑他的那种希望是徒劳的;“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中央集权和计划体制是大势所趋。”这种不再抱有幻想的现实主义态度是 20 世纪 50 年代保守主义思想的标志,一种很引人注目而且通常很著名的保守主义。它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很深刻。它嘲弄的是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傲慢,嘲笑他们天真地相信进步。R.G.

柯林武德质问,难道过去 60 代思想家都在浪费时间,而我们最正确,这可能吗?60 代思想家为解决人类所经历的战争、不公正和非人道行为的困境和悲剧徒劳地献计献策,而这一切现在都可以解决,这样认为合理吗?事实上,我们不如祖先有智慧;现代“社会科学”天真地相信科学技术可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这种“社会科学”远不如莎士比亚、蒙田、伏尔泰或柯勒律治对人类更有价值。

奥威尔在《李尔、托尔斯泰和傻瓜》一文中评论道:“总的说来,生活就是受苦,只有少不更事和头脑愚蠢的人才不这么以为。”年轻人立即责骂这种悲观看法。他们指责它是反对进步的一种反动密谋,但保守主义者认为它是智慧,并且坚信,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最终给人类造成的损害,远远大于谨慎的社会向善论者。想一下子找到永久的和平,结果撞上了全面战争。以恐怖的方式寻求乌托邦,只能以恐怖和一个可怕的乌托邦作为结局。



乔治·奥威尔

在 50 年代,政府问题困扰着法国;令人奇怪的是,它居然在经济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或许这是对政治无为的赞美。战后成立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只得到少数人认可,它遭到抵抗运动中的英雄夏尔·德·戴高乐将军的抵制。随着不稳定的联合政府上台和下台,政府也一再更迭。它缺乏坚决果断的决策能力,在印度支那以及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也深深地困扰着它。在 1951 至 1962 年之间,法国人政治兴趣之低难以置信。1958 年 5 月,在阿尔及利亚发生一次军事叛乱之后,第四共和国垮台,议会请戴乐将军主持过渡政府,制定一部新宪法。

新制定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带有戴高乐的思想痕迹,他被广大法国民众(不包括萨特)奉为民族英雄。宪法赋予总统一个更加有力的角色,并且试图削弱议会的权力。绝大多数法国人赞成这部新宪法,戴高乐成为第五共和国首位总统;1965 年他在全民选举中再次当选,这次选举,选民投票率达到创记录的 85%。戴高乐主义者称这是民主制的优越形式。它既允许强有力和负责的政府的存在,同时避免了政党制度的软弱和腐败。他的政敌指责说,戴高乐将军很想清除所有的政党,他喜欢借公民投票的形式搞凯撒主义。但戴高乐绝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他是真正的伟人,他得到了一些重要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知识分子离开那位失败的上帝后,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在他们当中,最有分量的当属安德烈·马尔罗。在法国在世的小说家中,他可能是最杰出的。他当上了戴高乐的文化部长。

戴高乐主义的神秘氛围包含一种对新法兰西的憧憬:现代化、强大、团结的法兰西,重新恢复它作为欧洲文明中心及其象征的历史地位。这种憧憬包括对整个欧洲文明传统的强烈感情,对于从英吉利海峡到乌拉尔山整个欧洲一体化的强烈感情,不过这个统一的欧洲是由各个主权国家构成的,而不是一个单一的超级大国。法国当仁不让地要做这个欧洲的领头雁,它应当领导和帮助整个世界。戴高乐最大的政治成就是使法兰西帝国非殖民化以及与德国言归于好。他本人就是一个文化修养很高、讲求尊严的人,对法国文化情有独钟,博闻多识。他并没有彻底消除法国恶名远扬的政治分裂痼疾;他曾经说过,治理一个有 350 种奶酪的国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他当政期间,法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经历了快速转变——相对于戴高乐将军对先贤文化的怀恋而言,可能有反讽意味。

因此,戴高乐主义不大可能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戴高乐提供了一套建立在灵活和务实基础上的政策,他也怀有那个时代温文尔雅的幻灭感。他最后叹息道:“我就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那位老人,只带了一副骨架

回来。”他一直坚持到 1970 年,这时候一股新精神迫使他离任。这股新精神体现在愤怒的和造反的大学生身上。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在反叛“意识形态”;不过他们拒绝 50 年代保守主义的清静无为。

## 战后时期的一些思想潮流

50 年代的那种大彻大悟、个人主义和不问政治的氛围,突出地表现在当时的思想和文学之中。萨特的那种行动主义和激进的存在主义并非典型。其他盛行的所谓存在主义哲学往往是内省的、耽于冥想的、政治上幻灭的。克尔凯郭尔复兴的势头没有减退,又出现了某种尼采的复兴;人们把这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从纳粹的盗用中给解救出来;就像对待马克思那样,人们借助于新发现的材料,对他做出了新的阐释。爱德蒙·胡塞尔身后留下了大量手稿。他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清楚地表明,他不赞成海德格尔,也不赞成存在主义者的非理性主义;现象学必须是“一门严密的哲学科学”,即便不同于实证主义科学。但是思想的范畴最终表明是没有系统的,无法还原为任何井然的秩序。它们数量众多、意义模糊。

马丁·海德格尔的探索,就广义而言,具有宗教的性质,虽说它没有涉及到一个人格化的上帝。1946 年,萨特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海德格尔的探索和自己的探索都是无神论的和人道主义性质的。事实上这两位思想家差别极大,从一套共同的理念出发而分道扬镳(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但是都关注人类主体性、绝望或焦虑的危机、本真的和非本真的存在)。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尊崇带有宗教的光晕——他所谓的存在不是一人格化的上帝,而是某种超验事物,它是所有意义的根源,欧洲人斩断了与它的联系,我们必须恢复那种联系。萨特没有看到这种超验的存



海德格尔

在,他只看到了个体的人类意识发明出来、并以它们为行动指南的诸种观念。两个人的文学风格和生活方式很不相同。海德格尔所倡导的是清静无为、保守、敌视现代科技、好古、逃到大森林里倾听天籁——这最终使他后来成为环保主义者“绿党”崇拜的对象。

为了寻找失去的存在,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使用的词语和范畴,回到语言(“存在的家园”)与存在密切接触的古代。由于尼采对他的深刻影响,海德格尔回到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回到了理智主义使词语失去了它们最初的魅力之前。艺术,尤其是诗歌,是恢复与自然接触的手段。作为文学作品的著名阐释者,海德格尔提供了一种令人振奋的美学,这种美学不仅认为艺术是对世界的摹仿,还认为,艺术生发出深刻的意义,是对“存在”的部分揭示。海德格尔“倾听存在的音乐”与东方神秘主义有契合之处。(有一位重要的自然科学家魏茨泽克<sup>[1]</sup>,发现这种思想很有价值,即科学应当是倾听而不是利用。现象学精神病治疗方法不同于弗洛伊德之处在于,它只要求倾听精神病人讲述他们的问题、理解那些问题,而不是将某种预先构想的理论框架强加给他们。)”人是存在的守护者。”海德格尔的词汇里充满了培育、守护、呵护、倾听等隐喻,他总是在寻找隐藏在现象世界内部的超验神秘。所有的哲学都是一种思乡病,说这句话的人试图回到他在巴登小镇上的少年时代。他是乡村小镇而不是通都大邑里的哲学家。

维特根斯坦的晚期思想,直到《哲学研究》在1953年出版后才广为人知,这是他死后不久的事情。他的晚期思想带有深刻的怀疑态度,它没有想方设法将语言(或数学、逻辑、任何一种表现形式)与外在世界联系起来。“去理解世界,这种想法是过了时的傻话。”我们都是语言的囚徒,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语言。(再去发明一种语言也没有用,我们依然是它的囚徒。哲学家应当接受语言的现实。)事实上,这种语言是各类习语以及各种层次的习语的混合,如果我们要想清楚地思考问题,我们必须清理它。不过这样做是有用的。我们能够(用他的话说)玩前后一致的语言游戏,从而避免混乱,以及与这种混乱相伴生的有缺陷的交流(以及有缺陷的人际关系)。我们能够考察困扰人们的问题,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并且证明,它们几乎总是依靠语言使用的前后不一致。在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看来,清理这些词语混乱的价值,与其说是自然科学的价值,不如说是人类的、心理的价值。

---

[1] 魏茨泽克(Carl von Weizsacker, 1912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学生。

维特根斯坦说,我们的言语中包含“庞杂多样”的语言重叠现象,它们是一个更大的语言框架的组成部分,这个语言框架就像由紧紧地卷绕在一起的纤维物质构成的一条绳子。混乱是由从一种范畴跳到另一种范畴的“范畴错误”造成的——就好像打桥牌的人大喊“我要王车易位”而不是率先出牌,或者喊“将军”而不是“叫加倍”。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我们直接思考所遇到的问题与下面情况有些相像:每一个人都认为,存在一个正在进行的大的游戏,这个游戏自有一套规则,而事实上,人类交往的世界由许多较小的游戏所组成的,每一种游戏都有不同于其他游戏的规则;人们不停地和随意地从一张桌移到另一张桌子。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当我们在艰难地清理这种混乱局面的时候,通常会发现,困难不见了。大多数争论其实都是不值得争论的事情,一旦对术语进行了界定,这些争论也就毫无意义了。研究者可以就人们争论的某些典型的热门问题试验一下,就可看出,例如,“堕胎算是谋杀吗?”“资本主义是否不公正?”

维特根斯坦原来是一位宗教情绪很深的思想家,他同海德格尔一样,关注事实世界、表象世界之外的意义领域。“世界的意义一定存在于世界之外。”世界是一个事实的集合,这些事实本身无所谓善或恶,只不过是事实而已;“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事情就是它表现出来的样子。”(W.H.奥登在一首优美的诗中说:时间什么都不会说,我也这样告诉你。)维特根斯坦曾多次说过,令人称奇的不是事物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而在于作为整体的世界的存在。这种情况的意义一定存在于世界之外。如果它处在世界内部,它一定是偶然事实的那个集合的另一部分;他认为,不证自明的是,“如果具有价值的价值的确存在,那么,它一定处在事情发生的整个领域之外,这就是事实。”

就他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而言,维特根斯坦与存在主义者没有太大的不同,可是,通常认为,存在主义者在这方面正好与他背道而驰。他们之间的相似体现在维特根斯坦就一个古老的神学论争发表的议论:上帝究竟是受制于一种预先存在的理性呢,还是他随心所欲创造了那种理性呢?——上帝必然向善呢?还是善是上帝臆想出来的东西呢?维特根斯坦认为,后一种立场更深刻;从中世纪角度来看,他站在奥卡姆的唯意志论那一边,而不是阿奎那的理性主义那一边。存在主义者萨特也认为,任意的、不受限制的意志是价值观的源泉;在他那里,这种意志是人的意志而不是上帝的意志。这一立场挽救了上帝或人类的全知全能特征,其代价是产生了明显令人尴尬的暗示:如果上帝(或人类)做出选择,宣布酷刑、谋杀或不忠行为是



善,那么它们就是善的吗?在这方面,维特根斯坦和萨特都处在尼采的阴影下,后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是无理性的,世界本身没有意义或解释,只是相互竞争的能量之间的盲目斗争。

维特根斯坦留给职业化学院派哲学的遗产是“日常语言”学派。由于它只关注细枝末节,因而经常成为批评的靶子。伯特兰·罗素也不再同情老门生了,他大声叫喊说,这种哲学思考只关心“蠢人说蠢话的不同方式”。尽管共同话语通常是混乱不清的,但它却提出了有关存在的重大问题。而且,我们的思考决不可能深入下去,除非我们一开始就澄清每一个个体的命题。“没有任何教条、任何普遍的方法,也没有任何终极性主张”,这种态度就把牛津学派与战后的时代精神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它谦逊(或许是伪谦逊)的外观表现在J.L.奥斯汀<sup>[1]</sup>对自己研究工作的描述中:“讨论做一部分哲学的一种可能方式。”做哲学”这种时髦的说法言外之意是,自己的目标很有限——不可能发现或揭示真理。它还暗含了对待学术活动的一种轻快的职业精神。在这方面,有的时候,分析哲学家与存在主义者当然有很大的分歧,在50年代,这两派人马在国际会议上由于缺乏理解而产生过有名的对抗。但是,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哲学实际上有许多相近之处。

二者探索的都是独特的、具体的人类的意义。战后小说基本上也是如此。《菲尼根守灵夜》在某种程度上让50年代的作家感到震惊——谁还能超过它?——他们往往避免运用宏大的象征画面,而是精心描绘平实的生活。文学背离了社会现实主义,但它往往也排斥“现代主义”实验。50年代一部概述英国小说的研究之作的标题就是“对实验的反动”(作者是鲁宾·拉比诺维茨)。艾里斯·默多克<sup>[2]</sup>所说的“短小、文字清晰、独立成篇”的小说得了宠,它们与“庞杂、无条理、准文献式的”小说形成了对照。一个著名的法国文学流派自称“就事论事”:一门心思去全面探讨对象本身,就事论事,不再把它看做什么东西的象征,也不再认为它是任何合乎逻辑的方案的组成部分。《太凯尔》(Tel Quel)这本重要的法国文学杂志的名字就是“如此”、“如是”的意思。“反阐释”,反深度成了口号。阿兰·罗布-格里

---

[1] J.L.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1911-1960年),英国日常语言哲学代表人物,讲演集《如何以言行事》影响甚大。

[2] 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年),英国学者、小说家。

耶<sup>[1]</sup>和纳塔利·萨洛特<sup>[2]</sup>等人创作的法国新小说,实际上在方法上是高度反传统的,但他们的目标是打破传统小说对秩序的幻想,这种秩序是上帝式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强加的,他们想让文学贴近于人的实际体验(或幻想)零散的、多层面的性质。

像格雷厄姆·格林、安格斯·威尔逊、伊芙林·沃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备受推崇的小说家,都带着一种忧郁的眼光看待人性,这种做法来自传统的基督教,老一辈诗人 T.S.艾略特也是如此,他在现代主义名篇《荒原》中的精彩刻画,已让位于《四个四重奏》中基督教谦卑思想。晚期的奥登也有同样经历,这位现在描写日常生活和普通事物的大诗人,回过头来审查青年时代满怀革命理想时写的诗篇。他写道,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强迫我思考上帝”之后,“狂热的克尔凯郭尔、威廉斯以及刘易斯引导我回到信仰”,他这里指的是才华横溢的批评家 C.S.刘易斯及其门徒在牛津大学主张重新回归“纯粹基督教”。

约翰·韦恩<sup>[3]</sup>在评论 50 年代的英国诗歌(见 1959 年研讨会的《宣言》)时,解释说,“一种刻意地、有意识地、有限地、谨慎地描写体验的诗歌,在今天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些体验都是经过仔细挑选和合理探索的。”瑞士戏剧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sup>[4]</sup>被一些人



《等待戈多》

视为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德语剧作家。他的作品散发出路德主义新正统

[1] 阿兰·罗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 1922年-),法国“新小说”作家。

[2] 纳塔利·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 1900-1999年),出生于俄国的法国女作家。

[3] 约翰·韦恩(John Barrington Wain, 1925-1979年),英国学者、小说家。

[4]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 1921-1990年),瑞士作家,著有剧作《贵妇还乡》等。

运动的强烈宗教气息。乔伊斯的朋友塞缪尔·贝克特,移居巴黎的爱尔兰人,写了《等待戈多》。50年代初的这部剧作可以说是那个10年中的戏剧事件,它的风格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极为独特、绝望,然而莫名其妙地令人振奋”。通常它与所谓荒诞派戏剧相提并论。罗马尼亚裔剧作家尤金·尤内斯库和萨特的朋友让·热内都是荒诞派成员。他们的剧作出色地描述了人类在一个丧失人性的社会中孤独无依的主题,以启示录的方式暗示了世界末日、存在的荒诞、在某种内在力量中发现意义的孤注一掷的希望。等待戈多,就是等待末日,或者说,可能等待上帝。

# WAITING FOR GODOT



《等待戈多》海报

事实上,由于令人生畏的毁灭性核弹头可被装载到可以迅速击中几千英里之外目标的导弹上面,人类的末日被认为几年后就要来临。尼维尔·舒特<sup>[1]</sup>描写核战争的书《在海滩上》、奥威尔的《1984年》以及戈尔丁的《蝇王》,在50年代最受读者欢迎。学生们请教授给他们上“最后一课”:在最后的大爆炸之前,你想说些什么?在50年代政治上无所作为的背后当然不是骄傲自满,而正好相反——人们非常吃惊地意识到,人类处境如此之糟,想通过某种政治灵丹妙药就能把它治好,简直太好笑了。一位年轻的法国人在一期名为NEF的杂志(教会刊物——译注)上就“世纪病”主题发表评论时这样说:“未来为我们准备的都是核灾难以及其他大

灾大难,每想到这里,我们的心头就笼罩着一股深深的忧伤。”

回归平凡的存在状态和回归宗教,菲利普·拉金<sup>[2]</sup>的一首诗体现了这个主题,这首诗在读者中激起了不同寻常的反应,这位英国诗人是50年代的主要代言人。《上教堂》这首诗写的是一位经历了世事沧桑而心灰意冷的现代人,偶然瞥见芸芸众生去教堂的奇特景象:或许这里有什么东西被

[1] 尼维尔·舒特(Nevil Shute, 1899 - 1961年),英国出生的澳大利亚作家。

[2] 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 1922 - 1985年),英国诗人,著有诗集《降灵节婚礼》等。

我们忽视了。

“当怀疑走了之后还剩些什么呢？”也许是旧有的信念：“它永远也不会过时。”这种观点在 50 年代很常见；它是精疲力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观点，他看穿了一切，认清了一切，从这个无比复杂的词语迷宫中抽开身，立足于普通人的领域。在美国，大致相当于拉金的人是霍华德·内梅罗夫<sup>〔1〕</sup>，他很钦佩这位英国诗人。

实际上知识的范围已经失去了控制。由于阅读内容受到严密监控，老百姓处于无知状态，奥威尔在《1984 年》中生发的这种想像与现实情况不可思议地产生了矛盾。教育大爆炸发生了。以英国为例，从东英格兰和肯特郡到兰开斯特和约克郡，新建了七所综合性大学；还创办了一些工科大学，苏格兰地区也兴建了一些大学。到了 1970 年，英国有 45 万名大学生。类似的、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局面出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在法国，从 1940 到 1970 年，大学生从 8 万增加到 60 万。1968 年革命就是从巴黎郊区新建的一所大学开始的，它是原来的巴黎大学的一个分部。

这种教育扩张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各门知识逐渐处于教授的支配下。他们人数众多，控制了出版物；他们创立了专业性协会和学术性刊物，建立了以圈内人的专长标准为基础的专业晋级竞争体制。这一程序在战后开始出现，一往直前地发展下去。甚至从事创作的作家现在也愿意跻身大学教员行列，而不是泡在“波希米亚区”或“格拉布街”。有人起来抗议这种职业化、尤其是人文学科的职业化，但抗议徒劳无益。英国小说家金斯利·阿米斯在《幸运的吉姆》（1954 年）中讽刺了目光狭窄的大学学人，发人深省，可这种势头是挡不住的。

欧洲知识界的小圈子至少扩大了 10 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书籍、杂志、电影、观念。1970 年前后，有人统计，自 1945 年以来，现已出版的图书超过了此前图书出版的总和。至少在思想上，世界是在爆炸声中而不是抽泣声中结束的。它正在扩张，而非匮乏待毙。因为民主和科学技术不断取得进步。过去那场可怕的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二者的发展。事实上，如此众多的书籍、“运动”和潮流问世，以至于对于某一时期进行概括总结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清澈见底、可辨水流的江河越来越像由无数条水域混成一片的大海。

---

〔1〕 霍华德·内梅罗夫(Howard Nemerov, 1920 - 1991 年)，美国诗人，被选为美国国会图书馆 1988 - 1990 年桂冠诗人。

## 第十六章 反叛与反动：1968—1980 年

### 新左派与激进的 60 年代

虽说探察思想潮流殊为不易，但 60 年代出现的激进行动主义转向却让人一目了然。这场激进运动在大规模的学生骚乱和造反运动中达到高潮，所向披靡，犹如共产主义在 30 年代时的气势。唐纳德·戴维<sup>〔1〕</sup>在 50 年代的一首诗《回想 30 年代》中指出，几年前的情景如今想起来“恍如隔世”。1954 年，约翰·韦恩<sup>〔2〕</sup>发出疑问：“我们认为 30 年代的人很傻，60 年代的人会不会也认为我们很傻？”他应当猜到，答案是肯定的。

当然，产生这种变化的部分根源在于，新一代急于表现得与前人不同，他们急于发表自己的主张，反抗父辈。这种代际效应（因现代通讯的步伐而加快了速度；现在两代人的间隔不过几年而已），是战后成长起来的那些人的反应，他们对那场战争中的英雄和恶棍一无所知；对他们而言，斯大林和希特勒就像伯里克利和凯撒一样，都是远古人物。甚至在 50 年代，这股苗头就已经在英国“愤怒的青年”中出现，“愤怒的青年”一称来自约翰·奥斯本<sup>〔3〕</sup> 1956 年编写的意义诡谲的剧作《愤怒的回顾》<sup>〔4〕</sup>。50 年代后期掀

---

〔1〕 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 1922 - 1995 年), 英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

〔2〕 约翰·韦恩(John Wain, 1925 - 1994 年), 英国学者、小说家、剧作家。

〔3〕 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 1929 - 1994 年), 英国演员、剧作家。

〔4〕 “愤怒的青年”是当时人们称呼一场新兴文学运动的名称。最先表现出“愤怒”与不满的是约翰·韦恩的小说《每况愈下》(1954 年)和金斯利·艾米斯的小说《幸运的吉姆》(1954 年)。1956 年家约翰·奥斯本的剧本《愤怒的回顾》上演。因剧中主角对社会作了全面的抨击, 这个剧本成为这个运动的代表作。

起了一场讨论,主要争论文学是否应该更加“介入”和关心社会。那些愤怒的年轻人因何而愤怒,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它更像是一代新人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顺理成章出现的反抗心理。青少年中间出现了“没有来由的反叛者”。几乎没有哪一个作家胆敢替社会现实主义说话,因为社会现实主义让人想起了30年代那些枯燥无味的宣传小册子。但是一位名字叫艾伦·西利托<sup>〔1〕</sup>的小说家(他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被拍成了一部很有名的影片),还是想方设法令人信服地表现了无产阶级的真实世界,而不带任何幻想。

与即将出现的局面相比,这一切还算是温和的。老左派的没落是行动主义复兴的重要刺激因素之一,它给不太守规矩的新生代左派人士留下了空间。到1965年,自从30年代以来一直由俄国人主宰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共产主义运动陷入混乱。在50年代,人们一度以为未来属于马克思和列宁。中国走向共产党人执政的道路;刚刚独立的亚非国家,在追求西方式“发展”的捷径时,主要青睐的是苏联模式而不是西方模式。尽管西方列强的殖民帝国在60年代土崩瓦解,可是在刚刚获得解放的那些民族眼里,他们毕竟与令人深恶痛绝的殖民主义有关联。

反抗欧洲“帝国主义”的英雄人物,像印度支那的胡志明、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也许还有加纳的恩克鲁玛或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突然闯入年轻人的头脑中。虽说南斯拉夫的铁托试图组织第三股“不结盟”力量,独立于美、苏大集团之外,但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愿意听从苏联的建议,似乎就要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虽说它们还不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卡斯特罗宣布自己皈依马克思主义,胡志明早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卡斯特的意识形态导师切·格瓦拉,这位新左派的英雄人物,正出没于南美洲的乡村,寻找一切可以发动的革命力量。

但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快出现了一幅争吵不休的乱象。内部分裂早在1948年就开始了。富有战斗精神和一度忠实于斯大林主义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执政后与年迈的苏联独裁者(斯大林)发生争吵,令世人注目。接下来更令人眼花缭乱的是,新中国红色政权与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之间的分裂。每当共产党人夺取一个重要国家的政权后,他们都想宣布独立和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头儿总以为其他所有国家的共

---

〔1〕 艾伦·西利托(Alan Sillitoe, 1928年-),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属于“愤怒的青年”一派。

产党都应当听命于莫斯科,通常这意味着为苏俄的利益服务。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都有其矛盾。1956年,苏联坦克出现在布达佩斯的大街上,向匈牙利工人开枪。莫斯科的声誉遭受了最致命的打击,它一直没有从这次打击中真正缓过气来。

世界共产主义声誉的跌落以及接下来的内部分裂,为左派更加自由地发展开辟了道路。斯大林的逝世有点像维多利亚女王的去世,据说,它让人感到如释重负。随着他名声扫地以及那些倒霉的继承人之间的斗争,老一代信徒都陷入了绝望或孤立。但是新左派所效法的新模式出现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有些新模式来自往日坚如磐石的革命阵营的分裂势力。像南斯拉夫的铁托一样,中国领导人与克里姆林宫因自尊和权力问题发生争吵之后,进而创造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某种方面,它比克里姆林宫现已老朽不堪的模式更加新颖。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当时欧洲出现的对马克思的重新阐释;在这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葛兰西,还有萨特本人都做出贡献。铁托的一些意识形态顾问也出了力;贝尔格莱德的《实践》杂志几乎成了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圣经。

事实上,新左派的思想来源很多、不一而足。1973年,一份颇感困惑的苏联出版物,试图找出所有诱使西方青年偏离正确信仰的“修正主义者”,它点了舍勒、胡塞尔、乌纳穆诺<sup>[1]</sup>、海德格尔、雅斯贝斯、加缪、加罗蒂、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的名字(引人注意的是,没有提到萨特)。其中有些人是存在主义者,有些人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艾里克·弗洛姆是一位离经叛道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而加罗蒂则脱离法国共产党,寻求“天主教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对话”,这一目标受到著名的教皇约翰23世的鼓励,在意大利也很受欢迎。深受葛兰西影响的意大利共产党在1956年后摆脱了莫斯科控制,成为思想非常开放的一个组织。

所以说,新左派形成革命的信条,有着多得近乎奢侈的新思想可资利用。在很多方面,他们比老左派的思维活跃得多。(在后斯大林时期,莫斯科好像不太愿意给西方民主国家制造严重的困难。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和戴高乐总统觥筹交错,令北京很是不快。在1962年与美国对抗的古

---

[1] 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1864 - 1936年),西班牙存在主义哲学家。

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临阵退却,令卡斯特罗很失望。)<sup>[1]</sup>事实上,学生激进分子经常蔑视所有的意识形态“定位”。他们是极其存在主义化的,他们更倾向于行动而不是言论。他们可能自称“境遇主义者”。在他们那里,无政府主义的黑旗要比红旗更醒目。实际上,许多学生激进分子根本不了解任何严肃的社会思想。编纂这一时期学生革命资料的编者评论道:这场运动应“更多地归因于马里内蒂、达达、超现实主义、阿尔托和马克斯兄弟<sup>[2]</sup>,而不是列宁或毛泽东”。说到马克思,他们所知道的很可能是格鲁乔·马克斯。他们最深切的情感是对理性化、官僚化社会的厌恶(这个社会正是他们接受训练、准备进入的)以及对冒险的热切渴望(这是1914年的影子,只不过这次针对的是内部“制度”,而非国外敌人)。

战后初期的那一代人过于注重物质价值,令他们的儿女极端反感。西德人,包括来自东德的难民,在1945年之后重建了这块破碎的土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到了1970年西德已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可能正是在西德产生了第一批和最激进的学生反叛分子,这一事实也是对重建者“工作伦理”的独特效力的一份颂扬。同多数情况一样,反叛的青年人出身中产阶级上层,他们的父母通常是专业人员。批评者认为,他们都被惯坏了;要是在从前,他们肯定是在田间或工厂里干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上大学。数量已经降低了教育的质量——金斯利·阿米斯声称:“越多越糟。”新学生往往去学



法 农

[1] 毛泽东曾发表评论说,如果爆发一场核战争,双方各自死亡2亿人的话,美国剩不下多少人,而中国却剩下很多人,这让赫鲁晓夫很担忧。他没有提到俄国怎样挺过核战争。苏联撤走对中国核武器项目的援助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原注

[2] 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是30年代美国好莱坞喜剧演员三兄弟,他们分别是格鲁乔、齐科和哈泼。



社会学,结果导致这个领域毕业生过剩。大学规模过大、发展速度过快,结果使校园过于拥挤;学生们抱怨说,他们就像在教育工厂中加工制造的产品,用萨特的话说,被打上了序号。

尽管人们已经指出了 60 年代青年大学生内心忧伤的社会和心理原因,但是,毫无疑问,使他们传达出这种不满的是各种观念;虽说他们倾向于回避沉重的理论,但观念起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在 1968 年五月巴黎学生革命的顶峰,上万名学生挤在一个剧院里听萨特演讲。像弗朗茨·法农<sup>[1]</sup>的《地球上受苦的人》(此书由萨特作序)这样的书售出一百万册,雷日·德布雷<sup>[2]</sup>讲述格瓦拉革命冒险经历的书也卖到了这个数。《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小红书”,是每一个大学生口袋里必备的。许多大学生知道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以及他的其他著作。马尔库塞这位老牌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理论家,在移居加利福尼亚、接触到这里的浓烈造反氛围后,成为激进的煽动家。这场学生运动是国际性的;它从加州一直扩散到西德,出现在英国、意大利、法国、荷兰、甚至东欧的大学里。它效仿的主要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鼓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老顽固手里夺取大学,“提高人们的觉悟”。法农是西印度群岛的一名医生,后来移居北非。贯穿这场国际性学生运动的是一套观念或思想态度,喷气式飞机时代的航空事业加速了它们的传播。

这些态度超越了正式的学说。它们大部分来自一种青年文化,这种青年文化与一种新音乐和一种新的行为自由相关,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可归因于审查制度的放松,至少在英语世界是这样。文化史上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60 年,英国法庭在听取一批著名作家和批评家的证词之后,判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并非猥亵之作。这道裁决为一大批汹涌而至的“黄色文学”打开了闸门。(其中一些只是维多利亚时代讲述男主人和女仆人故事,此前却不能合法地重印出版。<sup>[3]</sup>)法国类似的标志性事件是,出版商波韦尔由于印刷萨德侯爵的作品而获罪的判决被推翻。萨德侯爵已成为存在主义左派的英雄。即便情况并非像菲利普·拉金(带着讽刺

[1] 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 1925 - 1961 年),阿尔及利亚思想家,著有《黑皮肤、白面具》和《地球上受苦的人》,成为受压迫的非白人的代言人。

[2] 雷日·德布雷(Regis Debray, 1940 年 - ),法国记者,格瓦拉的战友。

[3] 1857 年通过的《猥亵出版物法案》是对人所共见的桃色文学问题的反应。瓦特·E·霍顿评论说,“维多利亚时代人所以谈性色变,主要原因在于这一醒目事实……淫乱行为不仅大量存在,而且还有上升的势头。”——原注

的口吻)所写的那样:

性交始于 1963 年，  
在查泰莱解禁和披头士  
首张密纹唱片面世之间。

可是许多青年人却认为是这样。所谓性革命与摇滚乐的诞生同期发生。学生们喊出了大量口号，其中一个，“我们什么也不怕，我们有避孕药。”不过他们不得不与艾滋病邂逅。

新左派的观念与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相关。经过修正和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恐怕马克思本人也认不出自己现在的这副形象，很少谈经济贫困，更多地谈“异化”问题，即个体在一个虚伪社会中的异化。实际上，新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承认一



披头士

个显见的事实，那就是，“资本主义”在物质方面太成功了。它已经收买了工人，给他们送去了汽车和电视机，工人们显然甘愿受诱惑，不过他们付出了丧失人类价值的代价。赫伯特·马尔库塞指责资本主义生产出的东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从而腐蚀了工人阶级。（可怜的资本家总处在必须认输的境地。）富裕而不是贫困成了批评的靶子；一位时髦的美国经济学家痛斥“丰裕社会”。〔1〕官僚制度、“技术社会”、“消费主义”都成为猛烈抨击的对象。真正的“资本主义矛盾”是文化上的。理论家们指出，它在物质上取得的成功，打破了社会纪律，导致个体意识极度膨胀，与此同时，它又用集体顺从观念和官僚化管理来约束人们。“自由主义者”通常的立场是，既要求个体享有更多的文化自由，又要求政府进行更多的经济调节，这是一个典型的矛盾。

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还有苏联社会几乎都持有批评

〔1〕 这里指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著作《丰裕社会》。

态度,二者是相关联的。苏联的所谓马列主义是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可悲误解。一个压制不同政见的邪恶的国家官僚制度,以及非人化的劳动,这些显然不是共产主义创始人想要的东西。斯大林主义已经把马克思主义贬值为一种粗俗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导致了一个精英统治阶层的产生,实际上这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中国共产党也加入了指责者的行列,他们指责说,俄国的“辩证唯物主义”歪曲了马克思,导致一种精英阶层专政。这实际上是一种非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它错误地把思想和文化当做经济状况的机械后果。乔治·卢卡奇宣称:“(那种人)把意识形态看成……经济进程的机械、被动的产物,根本没有理解它们的本质和发展,坚持的不是马克思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漫画化。”卢卡奇,这位匈牙利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像他的朋友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一样,长期忠诚于共产党,同时试图把党从斯大林主义手中挽救出来。1956年之后,他最终抛弃了莫斯科。



卢卡奇(卡通画)

由于大量利用现代心理学或现象学,西方批判马克思主义经常是主观主义的,有时候几乎是非理性的。法兰克福派的理论家往往认为“工具理性”、生产和科技,腐蚀了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导致了官僚主义和幻想破灭(这里有马克斯·韦伯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著作攻击“科学”,将“科学”说成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卢卡奇提出了意识的“物化”,据称这种资本主义的产物,源于韦伯所说的“合理化”的泛滥。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瓦尔特·本雅明对艺术品的批量生产表现出恐惧之情,正如阿多诺强烈反对爵士乐和马尔库塞鄙视“单向度的”流行文化一样——这些思想家的文化精英主义

使克里姆林宫给他们贴上了“资产阶级颓废派”的标签。不过,痛斥摇滚乐、长头发、毒品和性自由的莫斯科,与60年代的青年大学生在很大程度

上是格格不入的。

有人强调马克思思想中民主的一面,因为马克思很少赞同革命密谋。葛兰西宣布说,工人阶级在进行政治革命之前,必须先征服文化领域。卢卡奇表示赞同:“政治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斯洛伐克共产党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断言:“社会主义不可能仅靠少数人来引进和维护的。”这种异端思想立即招致莫斯科的武装干涉,但反映了1945年以来共产主义东欧国家中一种新型人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接受了捷克人卡尔·科西克<sup>[1]</sup>1963年出版的《具体的辩证法》的影响。其他东欧哲学家,例如波兰人科拉科夫斯基和沙夫也都为马克思的人道化做出了贡献。从苏联卫星国的角度看,认为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不太教条的马克思会支持如下观念,即,没有哪一种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适合所有的民族,每一个国家必须发展自己的模式,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学。这些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大胆地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当做武器,以反抗强加给他们的苏联模式。他们认为,一种开放的、进步的马克思主义比一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更忠实于马克思的本意。这种逻辑不大可能在莫斯科赢得信徒。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解释了“实践惰性”(practico - inert)领域,即最早产生于人类需求的一整套物化、异化的机制,是如何变得僵化起来,以及作为“加工过的东西”,它又是如何挫伤了这些需求,逃避了人类的控制。汤因比曾认为:“对转瞬即逝的过去大加推崇”是创造性丧失的一个原因,而丧失创造性是社会没落的标志。别的社会学家说过“社会停滞”。但萨特用更响亮的声调表述了这些陈词滥调。“序列性”是他的另一个术语,用来表示机械、人为的人类联系方式,即把人们偶然地组合起来,就像等待公共汽车时排队一样。

序列性和实践惰性始于物质匮乏,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是滋养它们的土壤,它们盛行于整个人类历史,它们使实践受到挫折,实践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真正的、创造性的相互作用。“混合的群体”,这种克服个体和社会之间矛盾的有机的和自发的共同体,特别容易出现在历次革命之中。尽管萨特后来断定“我不明白如何解决机制化的结构所产生的问题”,但是有些事情大多数人已经知道了。年轻人急于接受如下主张:尽管当前的制度几乎吞没了所有的人,但是革命可能来自于完全处在这个制度之外的人,例如

---

[1] 卡尔·科西克(Karel Kosik,1926 - 2003年),捷克学者。

学生和殖民地世界的游击队。

革命学生发动校园起义,从不知所措的院长们手里夺取大学的大楼。他们希望由此引发全社会的反叛。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制度,学校与社会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全盘否定、彻底拒绝现存社会,乃是实现激烈社会变革的关键,然后,所有的人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以某种方式获得性和审美方面的满足。必须扫除一切“权威机构”,应该让自我激励的个体自由地去寻找自我实现。这个充满幻想、乌托邦和否定的大杂烩,几乎包含了过去200年里每一种激进思想的回声——这些激进的思想,不仅有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还有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存在主义者的思想。它在1967和1968年的校园造反行动中实现了一次辉煌的爆发,在1968年巴黎之春中达到高潮。当时人们一度以为学生真的会推翻既定秩序。

在英国,“体制外政治”可以追溯到1959—1961年核裁军委员会组织的抗议活动,其目标是让英国销毁核武器,在冷战中宣告中立。最初在80多岁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启发下,核裁军委员会组织了大规模集会,集会最开始是非暴力的,但从1960年开始,他们使用了挑衅性策略:堵塞入口,占领大楼。罗素夫妇被捕。罗素可以称得上是最不遗余力引进挑衅性的“非暴力反抗”的人。“非暴力反抗”在60年代成为革命学生的惯用手段。圣雄甘地用过这些方法,他是从列夫·托尔斯泰那里学来的,而托尔斯泰又是从亨利·大卫·梭罗<sup>[1]</sup>等人那里发现这一思想的,如此等等,还可以往前追溯(罗素本人提到早期的基督教徒)。

## NEW LEFT REVIEW 23

SECOND SERIES

SEPTEMBER OCTOBER 2003

	ARTICLES	
GOPAL BALAKRISHNAN	Algorithms of War	5
FRANCIS MULHERN	What is Cultural Criticism?	35
FORREST HYLTON	Colombia: An Evil Hour	51
	POLEMIC	
KENNETH MINOGUE	'Managing' Nationalism	95
BRENDAN O'LEARY	Status Quo Patriotism	100
	ARTICLES	
FREDERIC JAMESON	Beyond Neuromancer	105
TOM NAIRN	A Myriad Byzantiums	115
	BOOK REVIEWS	
BARUCH KIMMERLING	From Barak to Road Map	134
JACOB STEVENS	Artificial Twins?	145
TONY WOOD	Russia's Maverick Prince	155

《新左派评论》目录

[1]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 - 1862年),美国诗人、随笔作家和实用主义哲学家。以实践超验主义原则和鼓吹公民自由著称。

由于不满于工党的谨小慎微和实用主义,《新左派评论》开始寻找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60年代末,由于对1964和1966年当选的工党政府失望,出现了更猛烈的抗议;1967年3月,激进的学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静坐抗议”。工党中激进的一派人说,“新政治”是一种“对抗”和“直接行动”的政治。剑桥大学的一帮学生打断了一位大臣的讲话,在那个讲究英式礼仪的地方,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当时,首相威尔逊(在美国的压力下)支持越南战争,成为抗议的焦点。正如我们所知,萨特先前攻击过法国当局试图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反抗运动;戴高乐总统结束了这场殖民战争,在1962年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此后,萨特就将注意力转向越南。虽说他几乎无法因这场战争而指责戴高乐,但他把怒火转到美国人身上,他请求苏联轰炸他们,他再次指控他们的战争罪行,他与罗素一道试图谋划审判美国的战争罪行。与此同时,在德国,老牌存在主义者卡尔·雅斯贝斯写了一篇长文,激烈抨击西德共和国,指控它正策划新的战争,再次走向纳粹独裁统治(《联邦德国冲向何方》,1965年)。与他一道批评德国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是杰出小说家君特·格拉斯<sup>[1]</sup>。

## 左派的没落

由于矛盾重重和纷争不已,学生起义迅速崩溃。它的目标模糊分散而且带有乌托邦性质。其基本矛盾在于,一方面主张民主(“争取民主社会的学生”是美国主要的激进行动主义团体,“权力归人民”是主要口号),另一方面,他们又声称,少数边缘群体可以通过革命来改变整个制度。这在逻辑上必然会导致像苏联那样的精英独裁政权。但新左派十分憎恶苏联独裁政权,他们考虑的是一个彻底自由的、权力下放的社会。有人可能要发出疑问,假如现存社会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腐败,那么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又怎能从中自发诞生呢?只有发生奇迹才能闯过这一关。

指责资本主义过于富裕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主动脱离了迷恋物质主义的工人阶级。迈克尔·哈林顿是一位很走红的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有人在评论他的著作时候指出:“他在谴责绝大多数工人阶级持有的价值观,他

---

[1] 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 1927年 - ),德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时代的良知之称”,他的著名小说有《铁皮鼓》、《猫与鼠》、《非人的岁月》。

说他们受到了这些价值观的愚弄。”这就回到了奥威尔的观点:社会主义一直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信条。巴黎的学生和工人未能展开良好的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些工人更同情受学生攻击的警察,这就是劳动人民与宠坏了的资产阶级子弟对立的案例。

就某些方面而言,这场学生造反运动极其愚蠢,有点像百无聊赖的大学生习惯于在春季玩耍的恶作剧。美国学生掀翻了汽车,突袭女生宿舍,夺取女式衬裤作为战利品。事实上,长期以来欧洲大学一直有“学生骚乱”传统。大部分法国人对学生的暴力和越轨行为惊恐万分,在造反运动中一度想与学生联合的工联主义者实际上来自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毫无疑问,萨特所说的“混合群体”在革命狂欢的时刻实现了,但是人不能总是生活在革命之中,现实世界依然摆在那里。玩够了闹够了之后,学生们要么离开学校,要么返校上课,他们留下的结果是教育做出了一些改革,但没有完全否定掉社会。

这场流产的反叛带来了种种后果。其中包括有人起来反对与这场反叛相关的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知识分子的不幸》(1976年)中,库尔特·宗泰默<sup>[1]</sup>指责德国左翼知识分子怂恿青少年盲目参与暴力活动。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答复是,学生运动从专业人员手里夺下了民主和文化,这永远是一件好事。但事实上,那些永远存在的后果并不显著。1968年的大部分“先知”迅速地从舞台中心退出。萨特、加罗蒂和阿尔都塞就辩证法的意义展开的争论,在巴黎依然有广大听众,但在别的地方并不这样。

萨特转向了毛(泽东)主义者,加入报纸《人民的事业》编辑部。1970年,戴高乐总统不肯下令拘捕销售非法的毛主义小册子的萨特。他说,“你们不要逮捕伏尔泰”;这次冲突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萨特忙于撰写他的福楼拜传,不能全心关注政治。不久中国人就让他失望;1976年毛泽东逝世使共产主义中国回到“实用主义”。萨特把余生大部分心血都花在大部头的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心理传记上。福楼拜实际上就是萨特,异化的资产阶级作家;乔伊斯的德达鲁斯和申姆<sup>[2]</sup>。最后他对政治形势彻底悲观失望,他宣布,“没有一个政党能提供希望”(《境况种种》第10集,1977

[1] 库尔特·宗泰默(Kurt Sontheimer, 1928年 - ),德国政治学者。

[2] 德达拉斯(Dedalus)和申姆(Shem),分别是乔伊斯的作品《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芬尼根守灵夜》中的人物。

年)。他依然在宣扬一种模糊不清的“自由论的社会主义”，他在已被“序列化”的无产阶级身上找不到任何革命的潜力。

萨特出来替西德的所谓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团伙<sup>〔1〕</sup>辩护。在1968年后的一段时期，一些青年激进分子转向恐怖主义活动，与世纪末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主义活动相像（新近的范例是拉丁美洲的城市游击队）。资产阶级子弟采取爆炸、暗杀和绑架等行为，这在意大利和德国尤为突出，恐怖主义也在爱尔兰革命军中复发。乌尔里克·迈因霍夫是一位神学家的女儿，她的前夫是一位办黄色杂志的和平主义者。1975年，西德政府对她和其他三人组成的四人帮进行会审，轰动了全世界。1978年，意大利红色旅<sup>〔2〕</sup>绑架和杀害了一位前政府总理。这类极端主义必然进一步损害新左派名誉，到了70年代末，新左派运动消退了。它的极度愤怒表达了它在思想上的破产。

与此同时，另一种反应是，阿尔都塞领导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反对存在主义和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感伤的“人道主义”，提倡回归客观主义和科学，但是幸好不是回归斯大林主义。在7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他是红极一时的文化英雄。他力图振兴法国共产党，同时他有足够敏锐的思想吸引知识分子。阿尔都塞绝不是意大利共产党人那种“欧洲共产主义者”。后者希望通过拒绝苏俄的领导使共产主义回归民主。1968年布拉格之春试图使社会主义政权人道化（它与巴黎之春同时出现，富有反讽意味）。阿尔都塞替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辩护。他试图维护法共与莫斯科的联系。阿尔都塞大刀阔斧准备创建一种新的正统观念，但教条性质毫不逊色，他想使理论家（他本人）成为中兴的共产党的主要人物。（因为这一点，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攻击他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异端。）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与时新的结构主义风尚嫁接起来。最终证明这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他杀了妻子，发了疯。

马克思主义论争主要由大学里的哲学家发起的，论争越来越晦涩，除了少数专家之外，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什么。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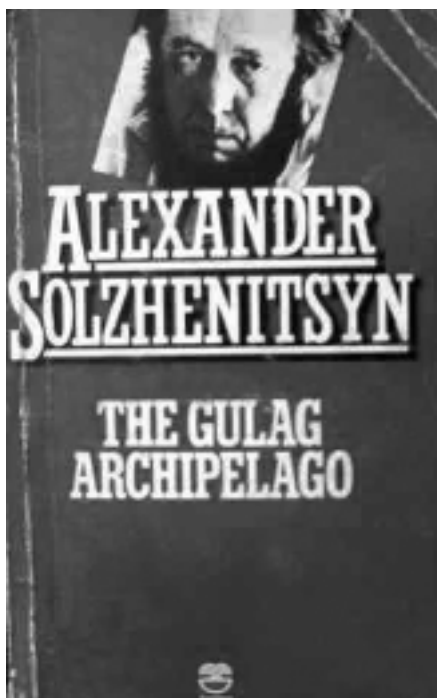
---

〔1〕 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团伙(Baader - Meinhof gang)，是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团的俗称，以早期的两位首领的名字命名。该恐怖组织成立于1968年，在70年代末制造了几起重大劫机案件。

〔2〕 红色旅(Red Brigades)，意大利极左派的秘密恐怖组织，自称其宗旨是破坏意大利国家，为“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暴动创造条件，1978年绑架并杀害了前总理莫罗。



克莱伦抱怨阿尔都塞的书难懂(“这本《阅读资本论》大部分内容简直不知所云”)。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门深奥难解的科学,距离普通人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十万八千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简单信仰现在被轻蔑地称为“庸俗的”。职业知识分子追逐新奇与马克思主义本应面对的现实世界在此发生了冲突。这些知识分子本人经常对自己无助于现实政治表示绝望。



《古拉格群岛》封面

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继续衰落。萨特抗议苏联当局逮捕著名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后者是苏联最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要求实现更多的自由和开放的社会。<sup>〔1〕</sup>秘密出版的地下报刊在苏联不再可能遭到有效压制了。70年代,西方有许多人听到苏联勇敢和雄辩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感到精神振奋,他们的言论越来越大胆,无畏地面对迫害。与斯大林的恐怖相比,这种迫害要温和,但并非无关宏旨。<sup>〔2〕</sup>全世界都为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榜样所鼓舞,团结工会运动向共产党政权不许自由组织工会的禁令提出了挑战。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读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对奴隶制劳动营所做的感人至深的记录《古拉格群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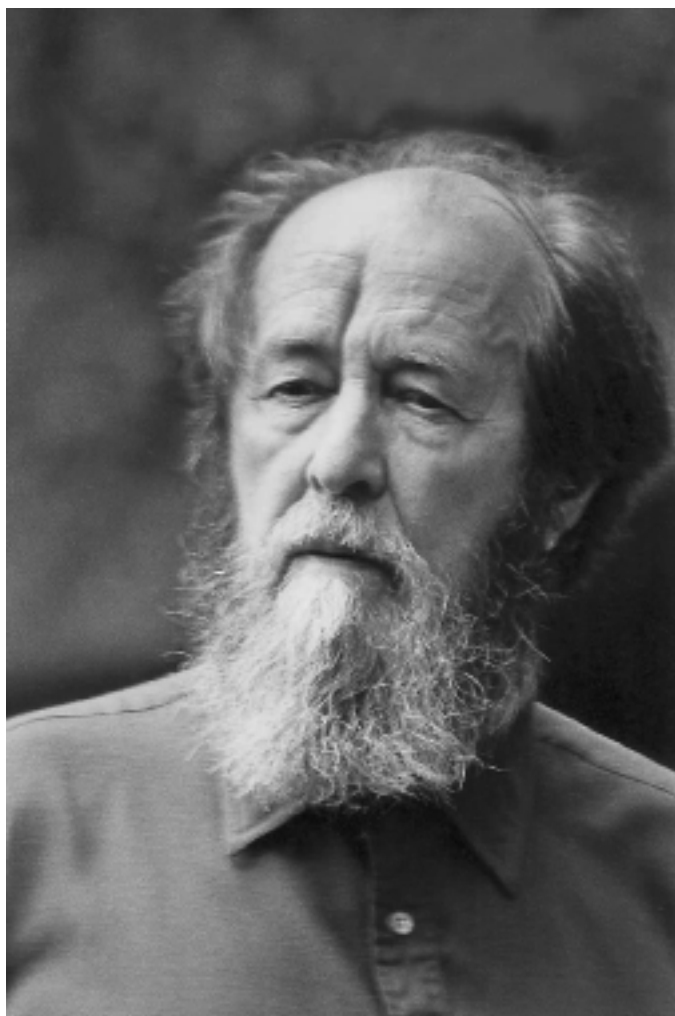
持不同政见者想结束腐败和堕落的勃列日涅夫政权。他们要求自由,要求结束书刊审查制度,摆脱国家权力强加给他们的粗鄙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并没有共同认可一个肯定性的纲领。萨哈罗夫选择西方式自由民主;1972年,这位苏联原子弹之父告诉一位美国采访者说,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一名自由主义者。梅德维杰夫兄弟要求一种改良的社会主义;大作家索尔仁尼琴似乎想回到东正教和斯拉夫民族灵魂。(这些现代俄国人重演了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

更重要的是,落后的苏联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显然预示了80年代末的

〔1〕 见他1968年出版的《进步、共存和思想自由》。与索尔仁尼琴、梅德维杰夫兄弟, V I. 奇利泽以及其他批评现政权的人不同,萨哈罗夫没有移居国外,而是一直留在苏联忍受骚扰,这种情况差不多持续到他生命行将结束之际。——原注

〔2〕 梅德维杰夫兄弟曾记述若列斯被关进精神病院,从而引起了国际上的抗议运动,最后他于1970年获释,这本书的名字是《疯子问题》。——原注

经济崩溃。苏联问题专家把 1976 年当做公众最终对这个政权失去信心的那一年。这个政权的腐败变得非常明显,它的辩护之词都已经用光。苏联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道出了实情:“我不再相信允诺。”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阿玛尔利克写了一本书《1984 年苏联还会存在吗》,在当时,这个书名似乎是夸大不实之词,可它恰恰一语中的。这本书导致这位青年历史工作者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但他还是活下来成了一位著名难民。苏共最后一任沙皇已经失去摧毁敌人的意志,或者说不敢因传出迫害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的消息而激怒国际社会。1974 年之后,也就是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之后,备感头痛的克里姆林宫官僚们越来越倾向于允许或鼓励持不同政见者离开苏联。(越来越多的著名人士在国外旅行期间以叛逃的方式走掉了,向苏联科学家和艺术



索尔仁尼琴

家否认这一事实是极端尴尬的事情。)在流亡当中,他们成为苏联政治不宽容的标志,一本接一本地抛出暴露苏联黑幕的书籍,例如罗依·梅德维杰夫以纪实手法讲述斯大林主义的大部头历史著作《让历史来审判》,于 1971 年在英国出版。

从事解构分析的约翰·格雷<sup>[1]</sup>(在评论 1983 年一个季度内出版的 14 本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时)发现,那些马克思主义社会本身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自我否定的体系”。“它在现实世界中取得的惊人胜利已经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信条最有毁灭性的批评。”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政权,完全是非社会主义和非革命性质的。马克思式社会主义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独裁的精英、最保守的人士。此外,十分

[1] 约翰·格雷(John Gray),当代英国学者,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滑稽的是,这种自我标榜的马克思主义秩序形象地显示了马克思最反对的东西,其中包括“思想的自主权力”。它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这种东西本来是马克思用于描述旧制度的,在新制度中是不应存在的。另外,这个制度以自身为例说明政治最为重要,而不是马克思所教导的经济应该居首要地位。在苏联,世界上最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掌握了令人生畏的权力,它把这种权力归因于纯粹的政治支配方式。资本主义这一边生机勃勃、不断进步、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土地上出现了停滞。角色正好颠倒过来了:马克思所说的陈腐社会秩序,“对生产的束缚”,文化上的贫瘠,在一个自私的特权阶级的统治下的苦难——这些都成了对那个自称马克思主义政权的精彩描述。

曾经满怀希望看待这片共产主义大地的第三世界国家,看到它未能提供真正的货色,也就失去了对它的信心。竞争性的自由市场发起经济大反击。经济成功的秘方似乎掌握在市场经济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手中,甚至苏联地区也开始利用自由市场。70年代一度很有希望的“欧洲共产主义”,由于未能在新的政治或社会方面带来新的东西,也逐渐黯然失色。

托尼·朱特在《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986年)一书中认为,从1973至1978年,“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它在法国知识想像中的立足点”。尽管法国共产党在1956至1968年之间受过致命伤害,然而党内还是有一批忠实的信徒,他们是在30年代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的,而且毕生坚持。(根据一项计算,到1975年为止,他们的收入高于平均水平,无疑这是他们的年龄使然。)现在这一代人快要死光了。与莫斯科分道扬镳之后,马克思主义通过萨特、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新的黑格尔化的或人道主义化的马克思、最后还有阿尔都塞孤注一掷地突袭结构主义而获得新生。当这些思想黯淡之后,作为一种重大选择,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期失效。随着无产阶级的数量和重要性降低,在科技变革中与烟囱工业即旧式工厂一道过时,马克思的分析与现代社会和经济学的距离越来越远。“一个神话破灭了——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神话”,路德维希·赖希霍尔德在1972年出版的《无产阶级幻想的终结》中宣布:新时代的革命者出场了,他们主要是学术和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

还有例外,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很难消除的;过去它一直是知识分子的经典意识形态。但是,在1986年,苏尼尔·基尔纳尼在评论科尔奈利乌

斯·卡斯托里亚迪斯<sup>[1]</sup>的《人类的产业》时说：“从1945年到70年代中期，几乎是一切法国思想活动参照点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几乎不再是严肃讨论的主题。”知识分子在后来出现的、更为精深复杂的思想中找到了新的消遣方式，这些思想都是学术界大量生产出来的，有一些可能利用了马克思的因素，但它们以折中的态度综合了新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想，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独立地位。而这种宣告马克思主义与众不同、地位独特的说法，却是马克思主义占据优势地位不可或缺的；不与其他思想融合，马克思主义就无法生存。

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矛盾在于，尽管它必须是一套独立和自足的思想，但它无法拒绝新思想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自称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而且能够与它展开互动。很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封闭体系。那些“修正主义者”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接受不断的变化，他们能够在马克思本人的生活和思想中发现许多支持他们观点的内容。马克思主义者真正面临的问题是，对于一套新思想要么拒绝，说它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要么说它是科学进步而大加欢迎。为了避免落后，他必须深入其中。到最后，他可能放弃任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企图。他使用马克思，就像他使用别的思想家一样，吸收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东西，摈弃不相符合的内容。有一本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sup>[2]</sup>试图在四分五裂的马克思家族当中找到共同点。它发现，惟一具有实际内容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尊崇马克思的“神圣光晕”。最后，《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一书（麦克尔·瑞安著，1982年）做出了裁决：拒绝“整体的”和“专断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使人们自由地从“多元斗争”中做出选择——建构你自己的马克思。

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能够将马克思的老式维多利亚语言转换成时髦的现代行话。可为什么走这条迂回之路呢？为什么不直接用相应的语言来探讨现代事件呢？这一套词汇既能够保留先前那位大师的一些说法，也能够保留其他新派和旧派大师的只言片语。不过很难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韦伯的、弗洛伊德的或维特根斯坦的。特别尊崇马克思

---

[1] 科尔奈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 1922 - 1997年)在1949年创办了杂志《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他是法国的奥威尔式人物,思想与加缪和雷蒙·阿隆接近,后者攻击苏联共产主义是反革命和反社会主义。——原注

[2] 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激进主义的意义》(1982年)。——原注

的惟一原因是宗教性的:他已成为一个神话人物,一个偶像、父亲和上帝,对于无所依傍的心灵来说是一个权宜的神灵。

当然,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弗洛伊德身上。弗氏家族继续分裂。在伦敦,在二战期间以及二战刚刚结束之际,安娜·弗洛伊德正在与梅拉尼·克莱恩及其门生进行了一场可怕的但却隐蔽的战争,她带着嫉妒心理守护父亲的遗产,以防有人进行在她看来属于颠覆性的修正。克莱恩在正宗弗洛伊德学术圈子受过训练:她认为弗洛伊德的真正精神是革新精神;他本人不会固步自封,希望后来人完善他的思想。<sup>〔1〕</sup>在另一方面,安娜往往认为,跳出严格的弗洛伊德主义信条的藩篱便是异端。这场争论很像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争执,而且同样激烈。要是这两个女人掌了权,她们可能彼此迫害,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一样激烈。问题集中在婴儿期最初阶段自我的形成,弗洛伊德在谈“自恋”形象的时候曾触及这一主题,但现在它被深化了。安娜和梅拉尼都是儿童心理学专家。后者通过观察儿童玩弄玩具,发明了一种描述儿童隐密焦虑和恐怖症的方法。克莱恩与苏格兰心理学家 W.R.D.费尔贝恩共同提出“客体相关”理论,推测婴幼儿如何区分自己和外部世界、她的自我形象的形成、对母亲的怒气以及对自己的过分依恋。这真是一段很吸引人的材料;弗洛伊德的继承人为了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分歧而大动干戈(不管怎么说,这些分歧都是无法证明的),她们的满腔怒火是当年弗洛伊德学派内部紧张关系的继续。

最后,弗洛伊德主义理论和后弗洛伊德主义理论融汇在一场更大的思想混合过程中。60年代法国最显著的弗洛伊德主义复兴,将弗洛伊德主义与结构语言学综合起来。由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幽灵与结构主义产生了意义重大的互动,我们下面就来介绍结构主义这一思想时尚。

## 结构主义

作为法国的一种思想时尚,结构主义往往被看做是存在主义的后继

---

〔1〕 克莱恩(Melanie Klein,1882 - 1960年)出生于维也纳,曾经与老派弗洛伊德主义者桑德尔·费伦茨在布达佩斯一道从事心理分析,后来与卡尔·亚伯拉罕一起在柏林从事心理分析,1926年定居英国,成为英国心理分析协会中执牛耳之人物。——原注

者。在 50 年代后期,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就以结构主义的名义,明确向萨特提出挑战。就基本特性而言,结构主义有意让自己的角色与存在主义截然对立;它冷静,超然,客观,非人格化。它并不认为人类从不确定的主体性中创造出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种种数学化的结构创造了人性。

结构主义源于语言学。几乎从一开始就有索绪尔的功劳。瑞士人费迪南·索绪尔生于 1857 年,与弗洛伊德和胡塞尔是一代人,他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尼采在这里学过哲学,仅比他早几年;后来索绪尔去巴黎和日内瓦教书,直到 1913 年逝世为止。索绪尔用语言学——对语言形式结构的分析——取代了语文学——对语言的历史研究。根据他生前讲稿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5 年)把语言当做一个符号系统,认为符号是任意规定的——词语与所指对象没有必然的联系。意义在符号系统之中,而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思想中;处于能指(词语)而不是所指之中。这个符号系统,语言,是一个结构,对于各个组成部分,只有根据特定的系统从总体上才能得以理解。我们回想一下,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持有类似观点。但是语言学这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专家的小圈子里,直到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方法用在人类学领域(神话、亲属关系);它很快就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工具,后来又被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采纳,作为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几乎是无处不用。它超越了专门化的学科范围,成为一股统一的力量,能够产生一种普遍的思想影响力。

结构主义是一种理性主义。仅凭积攒经验证据,无法发现隐蔽的和谐或模式,必须通过抽象的思想建构。一个简单的类比就是报纸:结构主义者感兴趣的是报纸的“版面设计”,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内容。结构主义者发现,版面就像句子一样是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安排的。内容倒不令人感兴趣;对于他书中涉及的数以百计的北美神话,列维—斯特劳斯有意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他对这些神话进行分类、列出表格,根据这些神话的构成成分,发现它们逻辑上的联系。

才华横溢的列维—斯特劳斯出生于法国一个犹太人家庭。他促成结构主义在思想地图上占据一席之地,其功劳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他从语言

学学者罗曼·雅各布森<sup>〔1〕</sup>那里借鉴了结构主义这种观念——雅各布森从莫斯科移居布拉格,最后移居美国,一路传播俄国“形式主义”的精彩见解。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在原始民族的亲属关系系统和神话的背后,存在潜在的秩序。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证明过程后来遭到攻击,说他遗漏了某些材料,也许每一种宏大的社会理论都要遭受这类攻击。有人认为,与其说他是一名科学家,不如说他是一名超现实主义诗人;当然,他文笔非常优美;与维特根斯坦一样,他力求让他的专著像乐谱一样。他的朋友和启发者雅各布森也是现代主义文学圈子里的人物,曾与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以及1917年前的其他俄国先锋派人物往来甚密。正是这种美学成分在结构主义最走红的50年代、60年代,赋予它以魅力,影响了小说和电影。但它自诩达到了科学的精密,却遭受质疑。列维·斯特劳斯显然带有这种倾向,他对这些原始民族所处的“冷清”世界情有独钟,这些原始民族生活在停滞不前的状态下,而不是过着一种西方式的、迅速变化的生活,他的这种倾向是对欧洲进步和科技的一种批评。

更年轻的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也受到雅各布森的影响,1957年,他出版了《句法结构》,引起了不小轰动。乔姆斯基发现,在句子表层形式之下存在一种深层结构;这种结构可通过数学符号表达;它是人类固有的能力,它能够理解基本的语法规则,并把这些规则转换成语言本身。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康德主义,是对语言理性的批判。但是结构主义者取消了主体。决定了语言、推而广之决定一切文化的结构,是利用个体的决定因素,正如黑格尔“理性的狡诈”所作的那样。黑格尔的能动者是世界精神,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它都发挥作用。结构主义的能动者是事物隐蔽的和谐状态,它产生语言、文化模式、意识形态和机构。

这种反人本主义立场是结构主义最惊人的那部分内容。人性被取消了;现在人们已经看穿,它是一种发明。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它的种种形态是由一种“隐蔽的机制”强加给人们的,就像语言迫使我们以某种方式去思考一样。在文学批评领域,结构主义宣布,研究作品不必涉及作者;作者在将词语连缀成文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并不重要。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方法,包括研究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让位于某种形式分析。结构主义史学家反对“历史主义”,倾向于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把过

---

〔1〕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 - 1982年),俄裔美国语言学家,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去当做社会进程而不是各种事件的延续来加以研究。他们与其他结构主义者一道,试图“从历史中解脱”。首屈一指的结构主义批评家罗兰·巴特宣称,人类文化就是一种“永不停息的重复”。

与结构语言学密切相关的是更有雄心壮志的符号学方案。符号学,或者说广义上的记号科学,不仅研究字词,还研究手势、图片、服装等一切承载意义的东西。符号学打算对所有文化现象的规则和指意过程进行编码。索绪尔给“符号学”下的定义是:

“研究在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符号的一门科学……它让我们知道符号的构成,以及制约符号的规则。”语言学只是这种广义研究的一部分。这门新的符号学科学可以追溯到约翰·洛克,尤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美国逻辑学家查尔斯·皮尔斯<sup>[1]</sup>。它有高贵的哲学血统,而且与符号逻辑学相交叉。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用它来证明,例如,莎士比亚和连环漫画用的是同样的交流模式。意大利符号学权威人物安伯托·艾可<sup>[2]</sup>,在一篇语义学论文中,就是以达·芬奇的作品、《菲尼根守灵夜》、费利克斯猫<sup>[3]</sup>、曼德拉克魔法师<sup>[4]</sup>为例证。在总是追求新方



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物布罗代尔

[1] 皮尔斯用的术语是 *semeiotics*, 现在通用的是 *semiotics*。——原注

[2]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 1932年-),意大利学者、小说家,著有《福柯摆》等。

[3] 费利克斯猫(Felix the cat)是1928年纽约电视第一频道创造的一个电视形象,后来长盛不衰。

[4] 曼德拉克魔法师(Mandrake the Magician)是1924年创造出来的漫画人物,10年后出现才在报纸上。



法的文学研究者中,它很快就成为一种时尚。

与法国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后来更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有联系的一群威望很高的学者,捧红了一种新的结构社会史。年鉴派历史学家最初在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领导下,后者是二战中的英雄和烈士。他们看不起叙事史、政治史、“事件”史,更喜欢分析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社会结构(他们对中世纪和现代初期的地中海世界情有独钟),从而拦腰斩断了传统的国家界线以及约定俗成的时代单位,例如“文艺复兴”。他们一边大量使用经过电脑处理的统计数据,一边利用地方档案中的新材料。他们寻找一种“整体历史”,描述社会生活场景的完整画面,以便超越所谓只讲“精英”的那些老式史论。这种社会史通常与左翼政治气息相通;包括 E·勒华·拉杜里<sup>[1]</sup>在内的许多重要的法国社会史家,最初都是法共成员。但是,它比较专业化的研究成果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就结构主义史学展开了一场有趣的争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冲突。路易·阿尔都塞认为,说人类创造了自身的历史,这是历史学家制造的神话,“资产阶级”的一种偏见。人类是受基本不变的语言和行为规律操纵的傀儡。



福柯及其著作

如果有人想发表政治见解,他可以这样说,权威结构依赖于话语,为统

[1] E 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Roy Ladurie, 1929年-),法国历史学家,著有《蒙塔尤》等。

治阶级的利益效力,一旦这种隐蔽的无意识权力逻辑被揭示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权威结构就可能被推翻。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发现历史自有其决定因素,它不是有意识的个体创造出来的。不过,无意识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心理的或语言的因素,而不是经济的因素。作为支配方式,文化因素似乎比社会经济因素更重要。法兰克福学派的结构化马克思主义者是于尔根·哈贝马斯。他以马克思忽视的心理维度为起点,强调语言在支配方式中的作用,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与“工具理性”相对立的“功能主义理性”,最终(1983年)他写出了厚厚的两大本《交往行动理论》。

米歇尔·福柯是一位更有争议性的人物,他从60年代、70年代起就声名远扬或臭名昭著,直到1984年死于艾滋病。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和文化变迁结构方面的论著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思想前后矛盾和立场不断转移(直到最后他还在自嘲),但它们还有一个特征:他对历史的精彩理论阐释显然是以精湛研究为基础的。福柯不是那种专事清淡的半吊子,而是享有盛誉的巴黎大学教授。他的许多引人入胜的归纳,最后证明很不准确。<sup>[1]</sup>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它们引起人们的诸多关切,因为它们焕发出才智的光彩。福柯提出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变迁包含语言 and 知识基本结构——也就是知识型——的整体突变;用另一位结构主义科学史家托马斯·S·库恩<sup>[2]</sup>(《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话说,是一种“范式转换”。

与其他结构马克思主义者相似,福柯提供了一种认识论的决定论而非经济的决定论。他对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文明”巨变的观点更像是韦伯而不是马克思的看法。合理性、规训、效率等原则已经取代了社会给犯罪、疯癫、疾病、文盲分类的方式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不仅工厂,还有监狱、精神病院、诊所、学校,出于工作和生产的目的,严格控制大众。福柯认为,这一切在一个大的过程中是彼此关联的,这个过程的标准是一套新的语言和意义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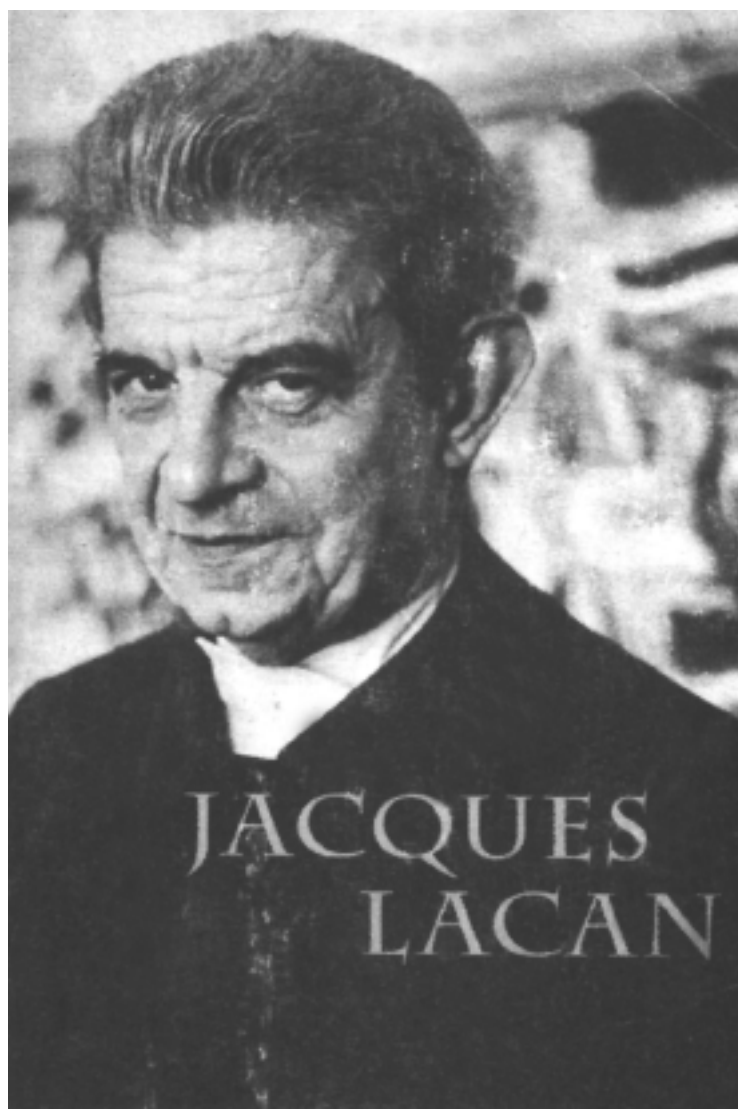
这听起来着实令人振奋,但无法归结为任何一种简单的体系。阿兰·

---

[1] 福柯早期著作、也许是最有名的著作《理性时代的疯癫史》(1961年)的基本观点是,18世纪以前,疯癫并不存在,人们从18世纪才开始界定疯癫;还有,当时疯人遭监禁是因为,这是工业社会的需求,工业社会把它当做一种理性化的工作规训形式。但是罗伊·波特在《英国疯癫史》(伦敦,1987年)中发现,在19世纪之前,几乎不存在监禁现象,而且这也不是国家行为;监禁与工业化没有任何联系。此外,精神病观念早在精神病治疗职业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原注

[2] 托马斯·S·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年),美国科学史学家。

谢里丹在他 1980 年出版的研究福柯的专著中指出：“福柯没有体系；一个人可能（依然？）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或弗洛伊德主义者，但不可能是一个福柯主义者。”“理智的颠覆”是另一部研究这位法国理论家的专著的副标题。到最后，福柯把所有的理论推定都归结为语言游戏。在此他触及下一章探讨的解构主义。结构主义在它最有思想锋芒的地方，往往莫名其妙地滑向解构主义。它原本设定，写作、历史、社会是有明确意义的，尽管同样的方法通常发现不同的意义，或者说没有发现意义：它必须被“解码”（这是一个风靡一时的词）。结构主义的结局是，它怀疑任何单一意义的存在。



拉 康

列维 - 斯特劳斯曾经提出，结构主义是对历史相对论的答复，它是一门“常在的科学”，一种新的肯定性原则；也是把人文研究的各个独立组成部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统一视角，它可适用于文学、社会学、历史、流行文化、艺术。（《艺术的隐蔽秩序》是一个醒目的结构主义标题。）尽管无可否认，它们的起源神秘莫测，这些神秘的机制，这些印在人的思想中、显现在一切人类文化中的深层结构，构成了一个基本现实。但是，显而易见，像此前许多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像他们中的第一人，“观念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结构主义者在寻找铭刻在事物本质中的这种逻辑时，发现的是非理性而不是理性。

“解构主义”的开端源于结构主义的一个论断，即个体的有理智的自我并不重要；他或她是由词语决定的，是“被语言所占据”的。

像所有气魄宏大的结构主义理论家一样，福柯的作品很难懂。多少让人感到费解，这是成为宏大理论的必要条件。法国高级知识文化中似乎有

一条不成文规定,越是晦涩难懂,就越有声望。要想让人望而生畏,作家就必须像有人所描述的朱利亚·克里斯蒂瓦那样,“故意玩些让人看不懂的花活儿”。这方面主要的例子是雅克·拉康。在高级思想时尚世界里,这位信奉弗洛伊德的法国结构主义者恍若神仙中人,备受顶礼膜拜。有人说,拉康是“跨越结构语言学领域的弗洛伊德,笔下流溢出一些自马拉美以来最令人头疼的法文”。拉康的著名演讲极力推崇弗洛伊德的理论:无意识——这个凶暴无礼、荒唐透顶以及淫秽不堪的领域——必须放开。有人说:“拉康不是在讲学,而是在制造共鸣。”他故意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讲话时嗓音颤抖、时有切分,或声如雷鸣,中间夹杂叹息和停顿。”一副模仿无意识的样子。

在从业之初,拉康是法国有名的弗洛伊德复兴运动的主要人物。其实,弗洛伊德主义在法国原本就不像在欧洲其他地方那样流行(尽管弗洛伊德本人的圈子中有一个显眼人物玛丽·波拿巴公主)。可以想见,正统的精神分析家把他当成异端而逐出教门。事实上,拉康所利用的思想来源极其广泛,令人称奇。他受到索绪尔、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的影晌,还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没有什么元语言;我们无法认识语言,只好听任它的存在)。拉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把这些现代视角串在一起;他渴望进行包罗万象的综合,在这方面,他可以与乔伊斯或汤因比相提并论,只不过他是在理论层面进行综合。他把结构语言学与心理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将无意识、俄狄浦斯情结和儿童进入公共话语的‘象征秩序’联系起来。

拉康还吸收了弗雷格、康托尔、布尔、罗素等符号逻辑学家的思想;在他的复杂思想中出现了无穷大和空集等观念,还有经过法国哲学家科耶夫和伊波利特<sup>〔1〕</sup>所复兴和重新阐释的黑格尔。拉康似乎想综合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所发生的一切,要是有人能够理解他的话。但拉康说了,任何人想做到这一点,至少要用10年时间。“我没有学说,我有风格。”或许他晦涩的用语还有他的故作神秘,作为无意识的语言表现出来,只是一种大张旗鼓的炫耀。这样一个作秀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人,真的是深刻思想家吗?他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的作用是,利用高级理论为胡闹滋事、搞恶作剧的学生辩护,与他并行不悖的是疯狂搞笑版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天启疯

〔1〕 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1907 - 1968年),法国黑格尔主义哲学家。

狂后来演绎成由“巨蟒小组”<sup>〔1〕</sup>演出的电视剧。

所有的结构主义者都表现出浓厚的异化感。列维·斯特劳斯曾以它为依据,推崇原始民族,认为它优于现代文明。罗兰·巴特(《神话学》,1957年)称自己是“神话学家”,也就是破解神话的职业人,他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讽刺关系。理解就是看穿。结构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一道去颠覆显在的意义。在走向自己显见的反面——解构主义——过程中,结构主义大部分内容被保留下来,尤其是这种颠覆约定俗成的真理和明显现实的强烈愿望。

## 女性主义革命

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在妇女制造的强烈不安气氛中,女性主义是一个常见术语,一些男士也昏头昏脑地加入了这场运动,而许多不理解的女士则反对这场运动;躬与其役的妇女主要目标是要求法律上的平等,尤其是投票权,她们大多出身上层阶级,使用的是令核裁军运动相形见绌的“非暴力不服从”方法。这些目标现在已经实现(至少在英国是这样;在法国,妇女在二战后获得选举权),普遍认为这一问题已得到解决。

妇女问题最能显示 50 年代和 60 年代之间的时代差距。妇女问题在 50 年代几乎是不存在的。著名英国人类学家 E.E.伊文思·普里查德在 1955 年的一篇演说中说:“强劲的女性主义和反女性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当然这些都是……‘不复存在和一去不返的问题’。”潘克赫斯特母女<sup>〔2〕</sup>和弗吉尼亚·伍尔芙那一代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 20 世纪前 10 年初露头角的“新女性”,在 20 年代安顿下来,现已成为常住居民。1956 年英国一家社会学杂志上有一则有关妇女教育书籍的广告,其中提到“她们在最近几十年获得解放”。普里查德对未来的预言大错特错。但是战后那 10 年的典型现象是,女性幸福地嫁给一位理想的男人,在温馨的家庭中生儿育女。这着实让后来的女性主义者懊恼不已。在 50 年代,杰弗里·戈

---

〔1〕 巨蟒小组(Monty Python),60年代后期形成的英国6人喜剧演员组合,经常拍摄电视剧。

〔2〕 潘克赫斯特母女(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年和 Dame Christabel Harriette,1880-1958年):前者是富有战斗精神的英国女权运动者,去世时终于使英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其女也成为女权运动的领袖,主张用激烈的手段争取英格兰妇女的参政权。

尔在调查英国女性杂志时发现,人们编织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贞洁”谎言,女性杂志从未开诚布公地探讨性问题以及后来出现的“如何变得更性感”的问题。性革命刚刚开始。思想激烈的“妇女解放论者”向父权制压迫发起猛烈攻击的时代还要等几年才能到来。

让·保罗·萨特的亲密伴侣西蒙·德·波伏瓦写过一本书,通常被人们赞颂为未来的先声;不过,在当时(1948年),她却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第二性》是一部出色的存在主义著作,它研究妇女的生命意义,以及女性看待事物的方式,例如,女孩看待未来的方式与男孩不同,而且她们的选择还受到限制。波伏瓦在晚年积极参加争取妇女权利的活动。萨特并不支持女性平等;存在主义的观点通常类似于D. H. 劳伦斯的观点,喜欢把两性截然对立,认为妇女体现了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原则——她们也许比男性优秀,但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一原则与男性所在的权力和政治王国彻底无缘。



西蒙·德·波伏瓦

男性知识分子自有其“单独存在的领域”概念。文学的、象征主义的、信奉尼采的先锋派一般认为,女性是非理性动物,热衷性爱和温柔妩媚,她们“很自然”,与文明的矫饰正好相反;她们不善于思考。早期的现代主义者都是反女性主义者,如果“反女性主义”意味着他们认为女性自有单独存在领域的话——阿波利奈尔和未来主义者都是例证。例如,马里内蒂(《婚姻和家庭》,收入《未来主义民主》,1919年)赞成,如果生活不和睦就可以离婚,但是,像劳伦斯一样,他认为两性应当分开接受教育,而且他还哀叹战争期间妇女参加工作所产生的后果。

实际上,女性主义者很难得到激进传统主流的支持。马克思是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俄国革命是一个男性俱乐部(罕见的女性布尔什维克,如亚历山德拉·柯伦泰<sup>[1]</sup>,感觉很不自在,而且她被撇到了边缘位置)。阶

[1]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ksandre Kollontay, 1872 - 1952年),俄国女革命家,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苏联外交家。

级放在第一位,正像社会民主党人向提出妇女问题的那些人所解释的那样;妇女应当站在丈夫的身后,团结起来思考其他问题。著名女性社会民主党人,如克拉拉·蔡特金和罗莎·卢森堡总体上接受了这种逻辑,尽管也有紧张和“矛盾”。事实证明,苏俄也还不是女性的天堂,除了用于装点门面之外,女性依旧被排除在最高权力堡垒之外,而且她们还得一边到工厂做工,一边操持家务。

尼采因为某些明显嫌忌女人的言论而恶名远扬,弗洛伊德也是如此,他的看法极大地冒犯了女性主义者。尽管在弗洛伊德最亲近的朋友和门生之中,女性相当多(包括他自己的女儿安娜,还有玛丽·波拿巴公主、卡伦·霍尼、梅拉尼·克莱恩、海伦·多伊彻、卢·安德烈亚斯·萨洛米),但是,经典的弗洛伊德主义注意到,女性没有俄狄浦斯情结(他们认为,女孩对母亲的类似嫉妒没有那么强烈),他们在此找到了解释所谓妇女创造力比较弱的原因。在嫉妒男性阳物的同时,她学会了自视低男人一等。弗洛伊德本人的生活反映出他信奉妇女的传统角色:待在家里做贤妻良母。诚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到了1932年,他的看法有些改变。不过,大部分女性主义者还是把他放在大男子主义者的阵营里,至少最初是这样的。引人注目的是,梅拉尼·克莱恩对弗洛伊德思想进行了修正。她认为,母亲在儿童情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大。

20世纪70年代,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强烈反对60年代反叛者常有的那种男性的傲慢自大。菲德尔·卡斯特罗很不明白,要是妇女也参与政治,那么谁去做饭和洗衣服。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新左派激进分子往往有“大男子主义做派”,令女性主义者感到不快。萨特本人,尤其在他早期著作中,表现出强烈的嫌忌女性的立场。一些女性主义者相信,性革命反而造成了一种使女性成为剥削对象的氛围。不管怎么说,1968年后涌现出一波激进的女性主义,其标志是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舒拉密斯·费尔斯通和杰曼·格里尔<sup>[1]</sup>等女权运动倡导者的思想激烈的(虽说有些天真的)著作。这场运动在英国和美国比在法国更强劲。

---

[1]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 1934年-),美国女性主义者,创办著名女性杂志《M》。

舒拉密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 1945年-),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著有《性的辩证法》。

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 1939年-),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者,以著有《被阉割的女性》(The Female Eunuch)而闻名。

就其比较简单的形式而言,这种革命性的信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相似,即妇女取代了工人,成为社会的弃儿,在先前的整个历史上,她们备受压迫,现在她们终于挺身而出,要求获得自由。敌对的压迫者是“父权制”而不是“统治阶级”。有趣的是,这场革命同无产阶级一样遇到了相同的分裂困境:它究竟是一场剧烈地改变先前社会的彻底革命呢?还是出现在旧社会内部、同时保留它的进步特征的一种渐进式和平革命?比较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先前的一切社会形式以及一切认识和话语模式都是暴虐的。如果女性进入这种父权制环境,必然受到它的腐蚀;与资产阶级化相类似的是人类化。妇女革命必须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必须改变语言本身。必须建立各种适合女性的制度,以取代现存的制度——自由大学、出版商和期刊——因为所有的旧制度都受到父权制的玷污。这种玷污使古希腊以来一切西方思想名声扫地;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女性主义对于逻辑史的解读”<sup>〔1〕</sup>发现,男性的渊源已经让思维过程本身声誉扫地。拉康认为,不光具体的词语,语言结构本身都是男性气十足的。“阳物是第一个能指。”

在日益增多的女性学者当中,那些笔下同情过去著名女性的人,或者挖掘被忽视的杰出女性的人,或者发现了大部分女性对于“单独领域”(把权力和政治让给男人)很满意的人,都要遭受指责,说她们宽恕父权制统治。她们是“性别合作论者”。因此,激进分子轻视先前的女英豪,她们在读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时候,发现她不是同党。仔细考察其作品就可以发现,她缺乏信仰,她过于喜欢写男性的事情,而且过于喜欢为男性写作,对于像文学这类事情的兴趣过于浓厚。(她的《夜与昼》实际上取笑了那些一本正经、主张妇女参政的女性。)

另一方面,这些革命者面临一个历史主义困境。如果妇女革命不是出自旧有的社会,那它来自何处?父权制一定有一些优点,因为它的环境孕育和滋养了女性主义。如果说这份遗产完全是父权制性质的,那么它怎么可能产生女性主义呢?为什么女性主义的果实经过许多世纪才最终成熟呢?温和的女性主义者只要求,应当允许妇女更多地参与当前社会事务,重新阐释和更正旧有思想,而不是谴责和放弃它们。她们并没有要求女性专政,而是要求平等分权、两性共治。事实证明,这些问题容易引起分歧;

---

〔1〕 安德里亚·奈伊(Andrea Nye):《权力的语言:女性主义对于逻辑史的解读》(1990年)。



在国际性会议上,女性主义领袖就像过去的社会主义者那样进行激烈争吵。1982年的那次大会证明是一场灾难。

组织起来的妇女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以前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女性的职业现在向妇女开放了。虽说这种情况还很不平衡,而且妇女还在抱怨不平等,但很多方面确实发生了惊人进步。到1990年为止,在西欧非军事部门的从业人员中,妇女占了40%,在英国和葡萄牙,1/3的医生是妇女,在丹麦议会中,女性议员占31%,虽说在科技和工程领域,妇女的构成比例似乎依然滞后。这是声势浩大的家庭革命的一部分。婚姻不再像从前那么普遍,离婚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单亲家庭迅速增多。在1990年,非婚生婴儿快达到出生婴儿的1/4,而在1960年,这个比例是5%。历史学家兼人口学家彼得·拉莱特评论说:“在这些方面,我们不再像以前的社会中的人那样生活了。”这是近年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原因,正如这类大事件通常发生的原因那样,显示出思想与科技、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密切交叉。

在很多方面,妇女运动的一些观念,甚至它的活动都不是全新的。某些不切实际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整个事情始于1968年(其中一位女性主义者说,这一年是新时代的第一年)。这种看法与事实简直是南辕北辙,因为过去就存在很多次重大的女性主义浪潮:从古希腊的希腊化时代,中间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爱德华七世时代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有人提出一种模式:历史上每一次女性主义反叛之后父权制都要卷土重来。如此循环不已。布里吉德·布罗菲<sup>[1]</sup>带着冷嘲热讽的语气指出:“妇女已经获得社会解放,与工人阶级的情况相似,她们每次获得社会解放,都把以前发生的情况忘得一干二净。”(文化健忘症的一个类似例子是,美国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发现美国印第安人。)最近的这一次反叛运动实际上利用了过去许多女性的著作,她们当中有18世纪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哈丽雅特·马蒂诺、乔治·桑、哈丽雅特·泰勒、约瑟芬·巴特勒等19世纪著名妇女人士,还有弗吉尼亚·伍尔芙等20世纪著名妇女人士。(人们重新发现了15世纪比萨的克里斯蒂安<sup>[2]</sup>,从中感受到一种生气。她使用了在格里尔和费尔斯通的著作中可以见到的支持女性解放的大部分论点。)

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形成澎湃激荡的大潮,这一点现在没有人怀疑。它的冲击力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女性侵入了大学,而大学此时已成为

[1] 布里吉德·布罗菲(Brigid Antonia Brophy, 1929 - 1995年),英国女作家。

[2] 比萨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ne of Pisa, 1365 - 1430年),著有《女儿国宝鉴》。

思想活动的主要中心,至少是形形色色出版物的主要中心。从某种角度来看,女性主义可以说是喜新厌旧、竞争激烈的人文学者世界中又一项标新立异的举动,它为重新阐释几乎所有的事物提供了可能。从女性的视角看待事物,就是要向既定的判断和经典作品提出挑战。伊夫林·絮勒罗特<sup>〔1〕</sup>宣称:“这个题目引起了非同凡响的思想旨趣。你感觉到好像是发现了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与通常的表述不相同。”法国大革命一直被没完没了地梳理和重新阐释,但迄今几乎还没有人把它看做是男性统治的胜利;人们没有记住雅各宾派是如何迫使妇女默默地呆在一边以及如何处决《女权宣言》的作者。

从女性角度看,几乎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或者每一个文学人物,或每一场文学运动,都有所不同。新社会史家主张“从底层看历史”的方法,产生了新的意味,这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所始料未及的。“妇女研究”很快成为最大的学术产业,每写一本书都要附上相应的大量参考书目。大批著作还在源源不断地涌现;过去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人都都会为这种重复找借口。

第二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兼学者,遵循学术界喜新厌旧的规律,不得不表现得与上一代有所不同,而且每隔几年就有新生代出现。这就导致了女性主义批评的风格发生细微变化。证明著名人物实际上是女性主义者,比揭露他们邪恶的父权制思想更为新潮。老姐妹们过于天真,竟然以为莎士比亚和康拉德都



克里斯蒂娃

是歧视女性的大男子主义者;她们本应当看到,这些大作家实际上使女性变得更加尊贵,或者说至少给她们提供了“获取权力”的机会,从“男性所有

〔1〕 伊夫林·萨勒若特(Evelyne Sullerot,)法国女性主义社会学家。

制”下解脱出来。这完全在于你怎么去解读文本,正如大家所学到的那样,文本没有确定意义。弗洛伊德曾被当做极端的性别歧视者,现在让许多女性主义者感兴趣;事实上,凯特·福特在评论1990年出版的几部有关这个论题的著作时宣布:“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之间‘修好’是现代思想的重大冒险之一。”(这种知识界的企业合并与金融界一样常见;这就好像两位理论竞争者发现,他们毕竟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在共享市场之后,会获利颇丰。)

在这方面,女性主义与下一章讨论的学术专门化交织在一起。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争夺大学职位和争取晋升的压力产生了一种微妙心理,割裂了学术界女性主义者与普通大众之间联系。这也使得她们彼此之间争论不休。经由拉康、福柯、德里达以及其他备受青睐的理论家如克里斯蒂娃和巴赫金等人,学界造就出种种神秘化的高深理论。它们侵入激进的女性主义事业,经常产生有害的后果。女性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杰曼·格里尔,在1986年抱怨说(TLS<sup>[1]</sup>,6月3日至9日,1986年),学术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每隔一个月就要改变一次她们的术语行话,“不管是谁,只要落在后面,使用过时的‘概念’,或更糟糕的是,根本不用术语,那么就变得没有资格说自己是在严肃思考。”掌握行话变得比理解文本更重要。”

这类狂热的闭门造车、标新立异行为,是学术竞争和过度专业化的产物,在80年代数量大增,多得惊人。女性主义已经被吸收成为学术游戏的一部分。女性主义者喜欢解构,因为解构使她们能够揭示所探讨的作品中暗含的父权制结构:父权制结构不仅存在于作品的遣词设喻之中,还存在于它的句子结构当中。音调最高的女性主义者之中有文学理论家,她们写的东西在学术圈子外几乎没人能看懂——而且(研究者们抱怨说)她们拒绝与任何人交谈探讨,除了极少数使用同类诡秘行话的人之外。让人吃惊的是,她们居然相信自己在努力争取大学终身教职的同时也在领导一场大革命。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女性学者陷入常见的、永无休止的专业化研究的细节当中而不能自拔。她最开始的目标可能是再造女性的精神世界,到了后来却穷余生之力在编辑克里斯蒂娜·罗塞蒂<sup>[2]</sup>的诗集(也许她一旦舒舒

[1] TLS是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缩写。

[2]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 1830 - 1894年),英国重要的女诗人之一。

服服地坐稳了终身教职的位子,就失去了最初的热情)。<sup>[1]</sup>这就得把事情往前推好几年,这倒不是否认第一波女性主义学术的生机和活力。它好像是发现了一片新土地似的。但一开始很难发现特定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存在,与此同时,女性内部也四分五裂,有实用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之分,有改良者和革命者之分。有些女性要求更多地参与现存社会,而有些女性则认为这种要求是卖身投靠。

事实证明,女性主义者领袖拿不准自己的立场。格里尔本人最后被许多追随者撇在了后边,那些人对她一再改变立场深感失望,例如,她鼓吹性解放之后又转而强调贞洁。在一些人看来,对于大部分看不懂克里斯蒂娃高深著作、不得不在这个世界讨生活的妇女来说,争取性解放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倒退。她们有可能为了就业市场上的竞争权利而失去婚姻所带来的相对保障,同时要么牺牲为人之母的身分,要么承担单亲家长的艰难角色。1971年朱丽叶·米切尔<sup>[2]</sup>(在《妇女的地位》中)担心“新一轮全民的性解放和婚姻关系的松弛,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情感上,只会让妇女失去保障”。在198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女性主义先锋贝蒂·弗里丹<sup>[3]</sup>呼吁两性之间休战讲和。

像其他在最初之际期望值很高的革命一样,女性主义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某种幻灭。有许多证据表明,“解放”并没有给大部分妇女带来幸福,而是带来了焦虑和不确定。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著作依然在抱怨没有太大的变化,妇女依旧不幸福。间或有人指出,男人也是如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80年代政界出现的重要女性人物并没有唤起女性主义的热情。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一连三次当选英国首相,创下了新纪录,但她在女性同胞中没有获得太多的支持。女性主义者一直企盼一个女性弥赛亚,将人类从男人恐怖的管制下解救出来,但她们对撒切尔夫人的评价并不高;她们通常是左派人士,人们发现她们

[1] 霍华德·尼梅罗夫(Howard Nemerov, 1920 - 1991年)有一首诗,题目是《正教授》,描写了人文学者是如何变成名利之徒的:

最初肯定是对文学有些喜好,  
使他开始了这种常见的登攀。  
他最后达到这种辉煌没有?

他毕竟已跻身自己的师长之间。——原注

[2] 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 1940年-),著有《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3]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1912年-),著有《女性的奥秘》。

主要忠诚于一种(男性发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纯粹的女性主义——令所有的妇女感到振奋的纯粹女性主义。在这里又有了其他价值观和事业的介入,妨碍了女性主义的团结。<sup>〔1〕</sup>

有人可能认为,对于大部分女性主义者来说,解放是个人的事情;她们要求个性自由,要求获得名利。与其他妇女团结起来反对整个男性部落是一种没有太多实质性内容的情感。她们进入了一个充满职业竞争的世界。她们的敌人和对手有些是女人,她们的盟友有些是男人。她们所要求的男女平等,仅仅是女性个人不应该因自己的性别而受到惩罚。

像女性主义这样的解放运动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它不得不同其他许多运动展开竞争。男同性恋挺身要求平等对待、受到尊重、不受歧视的权利;历史和文学批评必须重新书写,将曾经遭受压制的这部分人记录在案。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提出了类似要求。黑人女性主义者感觉自己与白人女性主义者有些格格不入。有人是黑人女同性恋,还有人是白人女同性恋;毫无疑问,黑人女同性恋者与白人男同性恋者中间又有一段距离。一位印度妇女自称“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这话听起来令人生畏。但有人可能会问,在现实的政治形势下,她如何解决不同的种族、性别和阶级提出的不同要求。(就伊斯兰教妇女而言,她们中间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反女性主义冲动,这体现出她们与中东地区盛行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渊源之深;她们自动将民族和宗教置于性别之上,这一选择要求她们接受残酷的父权制价值观。)

女性主义立场和学术中立性二者之间可能会产生令人不安的冲撞。把性别忠诚放在批评判断之上,或者不忠于这一事业,承认某位男作家比某位女作家更优秀,这是一种不良信念吗?(认为埃米·洛威尔<sup>〔2〕</sup>是比叶芝还优秀的诗人,说弗吉尼亚·伍尔芙是一位比乔伊斯还要优秀的小说家,这些女性主义观点的例证都令人皱眉头。)有一位女评论者在评论大量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时候(TLS, 3月11日至17日,1988年),指责好几位英国女批评家在做出自己的判断的时候没有关注集体的事业。碰巧,这些被

---

〔1〕 弗洛伊德和心理学能够揭示个人所感受的不幸是如何造就了公开反叛者的角色,从而像颠覆其他运动一样来颠覆妇女运动。例如,斯蒂芬·豪斯:《于贝汀·奥克勒尔:法国的妇女参政论者》(1987年)。凯特·米利特的回忆录,《The Loony - Bin Trip》(1991年),揭示了这位最早和最有才气的女性主义学者个人内心深处的躁动。——原注

〔2〕 埃米·洛威尔(Amy Lowell, 1874 - 1925年),美国女作家、演说家、意象派诗人。

批评者都是最有名的作者。一位真正具有专业批评水平的女性,很可能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人,她不愿意遵循党派的路线,即便是女性主义的党派路线(是谁设定的路线?)。这样一来,女性主义运动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争吵。

这一切导致许多图书出版、许多争执出现、无数会议召开,喧哗声充斥当代世界。可是,当社会分解为构成元素的时候,知识界和史学界就丧失了统一性,变成一团乱糟糟刺耳的声音,而且在总体上不再能够让人理解。女性主义只是诸多事业、诸多理论策略中的一种。

## 略论禁令的解除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结束之后,以道德为理由查禁出版物的现象逐渐消失,虽说还有些扫尾的小冲突。根据新的《淫秽出版物法》对劳伦斯著作进行判决后12年,也就是1972年,C.H.罗尔夫评论道:“赤裸描写和裸体图片,发展之迅速,简直难以置信。”它还有一段道路要走。到了1980年,所有欧洲国家都废止了对淫秽出版物的起诉。这个史无前例的过程,不消说,并非一帆风顺。大部人赞同不再受压制和虚伪的束缚之时,偶尔有人大声疾呼。英国作家和教育家大卫·霍尔布鲁克在1972年抗议“威胁我国心理健康的……一场可怕的流行病”。但10年之后,知识分子当中几乎没有人再替文字审查说话。朱利安·西蒙兹<sup>[1]</sup>在1982年是这样来估计英国的形势的:“几乎什么东西都能出版,丝毫没有被起诉的风险,任何东西,只要不是对性行为的逼真模仿,都可以在电影或舞台上出现。”此后愈演愈烈,赤裸裸表现性行为的影片出现在录像机和电视中。在60年代、70年代,性用品商店和X级影片可能仅限于“反文化”盛行的特殊区域,例如哥本哈根有名的“自由城”。10年之后可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人们花好大的气力来协调这个问题。但公众委员会和知识界的会议通常都不能对下列问题达成共识:什么是色情作品?它有害吗?如果有害的话,是

---

[1] 朱利安·西蒙兹(Julian Symons, 1912 - 1994年),英国作家,作品甚多,题材广泛。

否还有能够压制它、而且危害更小的办法?<sup>[1]</sup>

惟一有分量的抗议来自严阵以待的女性主义者。她们相信色情作品贬低了女性人格。吉尔·特威迪<sup>[2]</sup>评论说:“色情作品的整个形式就是一部贬低女性、可悲可叹的长篇叙事。”早先的女性主义者普遍认为,自由性爱和乱交是反女性的。1992年,有一位作家评论说,尽管书商向他显示了一下萨尔曼·拉什迪的名作《撒旦诗篇》(伊朗的伊斯兰教徒曾因《撒旦诗篇》判了拉什迪死刑),他也不能买安德烈亚·德沃金<sup>[3]</sup>和她的团体所抵制的一本小说。<sup>[4]</sup>在1992年,一位声望很高的英国女性牵头,费了好大力气使议院通过了一部新的和降低性放纵的法律。但是像德沃金这样的女性主义者,把色情作品对女性的贬低归因于男性的强迫。她们无视这一事实,一些开放的妇女自愿摆出姿势为《花花公子》(以及无数其他同类杂志)拍照,她们自愿在X级影片中表演。这类市场十分广阔。而且有些女性主义者认真考虑了这场“赤裸裸的”革命,她们认为,妇女应当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sup>[5]</sup>

事实证明,用禁忌字眼和表现禁忌动作取得震惊效果,是作家、尤其是戏剧家的一大笔资源。在20世纪60年代,用石头砸死婴儿、活活烧死士兵的场景以及包括鸡奸在内的大胆无忌的性交场景,活跃了伦敦的戏剧舞台。这依然可能让市民恼怒。后来被同性恋恋人杀死的乔·奥顿<sup>[6]</sup>评论说:“性是惟一一件让他们发火的事情。性交动作(在他演出的一出剧中出现)过多,他们就不停地歇斯底里地尖叫。”身材矮小的西班牙人费南多·阿拉

[1] 见戈登·霍金斯和富兰克林·齐姆林:《自由社会中的色情文学》,苏珊·古巴尔和琼·霍夫主编:《仅供成人使用:暴力色情的困境》(两书都是在1992年出版)——原注

[2] 吉尔·特威迪(Jill Tweedie, 1936 - 1993年),英国女作家,著有《吞噬孩子》等。

[3] 安德烈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 1946年 - ),美国激进女性主义者。

[4] 约翰·萨瑟兰在TLS上对爱德华·德·格莱齐亚那部讲述美国书刊审查历史的著作的评论,这部著作的标题很是古怪,《姑娘们随时随地躺倒宽衣》(1992年)。——原注

[5] 见琳达·威廉斯:《彻底赤裸》以及林恩·西格尔和玛丽·麦金托什主编:《被显露的性:性欲和色情文学争论》(两书都是在1992年出版的)。——原注

[6] 乔·奥顿(Joe Orton, 1933 - 1967年),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巴尔<sup>〔1〕</sup> 70年代在巴黎特别走红,他童年时代心理受过内战的创伤;他的主题包括“施虐狂、受虐色情狂、弑母、恋尸狂、性变态和舞台裸体表演”(弗兰西斯·多纳休)。

但是震撼效果最后逐渐减退了。到了1969年,自由主义的《纽约时报》评论道:“这种毫无道理地追求震撼效果的冲动……注定要在彻底厌倦之中走向自身的反面。”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艾滋病也给性革命蒙上了一层阴影——到最后,甚至《花花公子》杂志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这场现代瘟疫似乎与性放纵有关,因此,“性快乐”变得不那么令人兴高采烈了。<sup>〔2〕</sup>英国作家约翰·赖尔写道,这场性革命的真正赢家“是那些病毒和细菌,它们利用了四处泛滥的乱交和异常性行为创造的新影响”。

如果说性解放产生的物质后果非常可怕,有人也质疑过它的精神后果。西莉亚·哈登在《性的限度》(1983年)中认为,性解放产生的焦虑和内疚比它减缓的要多,这种观点重复了弗洛伊德本人的看法。不过,相反的观点还是存在的,“性补救”说(斯蒂芬·希恩的观点)也有忠实的追随者。

## 绿色革命

在20世纪末的几十年里,与女性主义一道成为一项主要“事业”、赢得了忠实追随者拥戴的是环境保护主义。二者的极端表现都带有浓厚的否定论色彩,本质上它们仰仗的都是激烈地反对西方文明几乎有史以来就坚守的主要价值观。他们认为,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彻底革命或大灾变将要发生。“绿党”的先知可以说是海德格尔,在他看来,甚至建一座桥也保不准干扰了自然的秩序。或如威廉·布莱克<sup>〔3〕</sup>所言:

不要杀死飞蛾或蝴蝶,  
因为最后的审判即将来临。

〔1〕 费南多·阿拉巴尔(Fernando Arrabal, 1932年-),出生于西班牙的法国荒诞派剧作家、小说家、电影制片人。作品内容多涉及暴力和色情。

〔2〕 “这场流行病在美国同性恋中爆发,不是因为他们犯下了有悖人伦的罪过’,而是因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比异性恋者更易于乱交……当一系列条件发生巧合,加快了高度致命性的旧品种病毒的传播,那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性接触……”米尔科·D·格尔梅克:《艾滋病史》(莫利茨和达芬翻译,1990年)第168页,158页。——原注

〔3〕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年),英国诗人、画家、版画家。



只要损坏伟大的存在之链的一个环节,整个自然界的平衡就会遭到破坏。神秘东方传来的声音告诫心神不安的西方人,每一个存在微粒都有灵魂。



蕾切尔·卡逊,环保运动创始人,  
1962年发表《寂静的春天》

在欧洲许多地区,绿党分子逐渐发展成为反对现行统治集团的重要政治组织,不仅在西德,甚至在苏联也是如此,在苏联,诸如瓦西里·舒克申<sup>〔1〕</sup>这样很走红的电影制片人,表现了对老式乡村社会的怀旧之情。一种典型的田园风味占据了绿党创造的神秘氛围,但是其中也有科技和经济等非常实际的东西。环境保护主义的早期阶段主要与反对原子能相关,这是从模糊的道德以及健康和安全立场出发的。后来,人们感觉到,原子能比燃油和燃煤更可取,燃油和燃煤会向大气中释放过多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温变暖。一开始,批评工业毫无节制发展的人也认为,稀有能源使用

速度过快,将会危害子孙。后来这种说法很少听到了,人们听到更多的是臭氧耗尽问题、全球变暖问题(“温室效应”)、酸雨问题以及滥砍滥伐森林问题。

1986年,基辅附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大灾难,把一团团放射性气体输送到全世界,重新唤起人们对核灾难的恐惧。尽管如此,在80年代走红的灾难预言家用环境危险替代了核灭绝。君特·格拉斯的小说《母老鼠》(1986年)就是一个例子。巨大的核爆炸无疑能将我们毁灭掉,但假如不是它的话,那就是臭氧耗尽或酸雨——许多人与这位著名德国小说家一样是坚定的悲观论者,他们的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随着发展中国家(它们占世界总人口的80%)决心沿现代化道路前进——虽说它们经常遇

〔1〕 瓦西里·舒克申(Vasily Shukshin,1929 - 1974年),苏联作家、电影导演。

到挫折——有人开始产生疑问,假如各个国家都像现在的少数国家那样消耗能量和产生废物、污染物,那么整个世界该怎么生存下去。

环境保护主义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把对自然的浪漫主义崇拜以及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社会的廉价价值观的敌视结合起来,试图把人类从生态灾难中拯救出来。“绿党”的呼吁大受欢迎。1992年,《经济学家》杂志抱怨:“环境保护主义者非常有效地绿化了公共舆论,以至于谁质疑追求更加环保和更加清洁的智慧,谁就成了不知羞耻的反动分子。”这家重要的新闻期刊就提出了这种质疑,其论据一是现行或拟议的法律要求社会付出惊人的成本,二是回报递减定律也适用于对空气、土壤和水高度清洁的追求。环境保护主义能否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新的反资本主义力量?资本主义的最终矛盾不是贫困的无产阶级,也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污染。资本主义制度在自身超强生产力产生的废气中窒息。

在意识形态上,绿党人士也分裂为现实主义者和纯粹主义者两派。前者愿意在“体制内”逐渐创建更多的保护区、公园,来净化空气,后者全盘反对整个技术—消费主义社会,虽说它还弄不清楚怎样毁灭这个社会。<sup>〔1〕</sup>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精神失落的青年人,漫游印度,寻找涅槃境界,虽说此时印度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有一类文学也开始盛行起来,在这类作品中,美国人已变得朴素自然,或许是发现了远古的美国土著的身分,这些作品描述了他们在西部乡村的漫游,就像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中的诗人们那样,不过现在他们通常骑着摩托车,寻找一种热门东西。

一般说来,不发达国家不太同情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对经济发展的态度。苏联本身就是一个生态重灾区。贫穷国家试图依靠出口来支付科技现代化成本。它们砍伐森林,最严重地冒犯了环境保护主义。由于砍掉了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温室效应加剧了。

各种“反霸权”事业之间的这类矛盾多得不可胜数。现行统治秩序,如果这种东西存在的话——它有一种时髦的说法,“霸权话语”——非常安全,因为众多持不同政见者行进的方向不相同,而且相互之间有矛盾。<sup>〔2〕</sup>

---

〔1〕 有关两派分裂的例子,见马丁·刘易斯:《绿色幻觉:一个环保主义者对激进环保主义的批判》(1992年),在书中,一位自称神智清醒的环保主义者认为,如果实行极端政策,所导致的生态破坏比它们打算预防的更加严重。——原注

〔2〕 保守主义者认为,左派人士主导了话语领域;“在美国各类媒体中大行其道的是同一种政治正统思想,”希尔顿·克雷默断言——“左派自由主义的种族、阶级和性别政治”塑造了这种正统思想。——原注

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痛恨包括左翼男性在内的所有男性,弗洛伊德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互相拆台。环境保护主义者与大力发展经济的倡导产生了矛盾。反科技论使一位女性主义作家转弯抹角地认为,妇女一直被“科技压得透不过气来”;在电动洗衣机发明之前的昔日美好时代,她们的境况要好得多。在其他角落,同性恋为争取他们的性解放而斗争,与此同时,信仰其他信条,包括种族的和宗教的信条的人群,也喊出自己的口号。在堕胎问题,有人主张堕胎自由,有人认为堕胎是无视生命、丧失人性,两派势如水火。

在国际都市文化的刺耳噪音中,激进的抗议成为无处不在的多元主义的牺牲品。本来有机会成功的一场大运动不但没有出现,形形色色的“反霸权话语”却彼此抵消。它们都得到了公众的关注,它们都有忠实的追随者。但是,它们只是当代世界这个巨大的、无形的社会集体的细小组成部分。当代世界过大,也过于分散,无法彻底改变它。它惟一成功的共同原则是自由市场。它们都在这个市场里面竞争,但是谁也无法形成垄断。

## 第十七章 解构的 80 年代

### 东方的没落

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变化,首屈一指的是苏联共产主义秩序的垮台。列宁时代走向终结;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它的存在几乎主宰了欧洲和世界舞台,无论是因为它产生的吸引力还是因为它招致的反感,它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现在它突然不复存在。苏联的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迅速走向崩溃;那些杰出的苏联问题专家,几乎没人预料到这一点,由此多多少少揭示了历史学家们的技艺是怎么一个状况,而且,这很可能也是 90 年代玩世不恭的反理智主义出现的原因之一。

1983 年出版了一本专题论文集,名为《苏联经济:走向 2000 年》<sup>〔1〕</sup>。书中有如下预言性判断:在 2000 年以前,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将以每年 3% 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发生根本性经济改革的可能微乎其微。在评论这本书的时候,苏联问题专家亚历克·诺夫<sup>〔2〕</sup>一边暗示可能出现制度危机,同时补充说:“如果认为苏联面临垮台或解体的危险,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是典型的专业判断。1983 年 9 月发表的一篇评论多部苏联经济研究著作的书评认为,没有理由相信,“东欧经济目前的失调状态比西欧经济更深重”。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解体过程正在进行。诚然,最终的结局是在

---

〔1〕 艾布拉姆·伯格森和赫伯特·S.莱文编;纽约和伦敦,1983 年版;评论文章见 TLS,8 月 5 日,1983 年。——原注

〔2〕 亚历克·诺夫(Alec Nove),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著有《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鼓吹“市场社会主义”。

1989 和 1990 年发生的一系列惊人事件中到来的。不过,至少从 1976 年开始,苏联已经显现出病入膏肓的态势。

雷日·德布雷曾是卡斯特罗主义者和格瓦拉主义者。他在《反欧洲的帝国》中向法国知识分子指出,苏联人已不再是威胁,他们在各个领域(包括文化领域)已经失去了同美国竞争的能力:“在最偏僻的西伯利亚农村,居民哼着加利福尼亚的摇滚乐。”但是,苏联长期以来就没有产生有趣的艺术作品。它的文化衰落,与经济崩溃毕竟不是一回事,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它的经济会崩溃。这个事变乃是 20 世纪许多令人惊奇的事件中的最后一个。(极少有人预见到一战爆发,希特勒上台,大萧条,1945 年后欧洲的复兴,芯片革命,以及其他许多重大事件。)

1922 年,维也纳经济理论家路德维希·冯·米泽斯声称,只有市场才能提供一个合理调配资源的制度。计划经济制度无法确定生产的真实成本。靠行政命令来确定价格只能导致混乱和垮台。“产生生产因素的整个过程的动力是,资本家和企业通过满足消费者的愿望,不断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样,管理人员的表现和管理人员的报酬之间产生了致命脱钩。米泽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完全行不通。对于这一指责最有力的回应来自波兰出生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sup>[1]</sup>。兰格主张大大下放经济规划的权力,确定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另一条理论路线则主张,可以用精确的数学方式来模拟市场。

然而这类主张在苏联从未得到实施。在 1989 至 1990 年,苏联及整个东欧地区旧秩序的迅速解体,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事实加以解释,即整个经济制度在惨败之后,必然被另一个所取代。一边是建立在中央计划部门指令基础上的制度,一边是建立在自由谈判和契约基础上的制度,一边是官僚机构进行调配,一边是市场决定生产和价格,二者之间不可能有中间立场。绝对没有折中(Tertium non quid)。制度转型注定是极端痛苦的,但最好尽快完成。现在新资本家已经出现在共产主义的国家中。

赞扬前苏联共产主义制度被颠覆后所产生的后果还为时过早。萨莉·莱尔德在 1991 年评论道:“在过去 5 年中,俄国文学创作经历了复兴,可与(1917 年)革命前后的情况相提并论。”追寻过去占据了大部分内容:很久以前写的、但未能出版的著作刊行于世,很有名气的地下作者现在能够抛

---

[1] 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 1904 - 1965 年),波兰裔美国经济学家。他在 30 年代提出“竞争性社会主义”,被一些人认为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开端。

头露面,对长期恐怖的回忆,对过去无数骇人听闻的罪恶的揭露,这一切与试图弥补半个世纪以来文学隔绝于西方的缺憾交织一起。这些内容充斥了杂志和图书。公众早已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官方宣传,如饥似渴地吸收这些东西。在俄国,文学历来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它那样珍视大作家。与此同时,以一种经济制度替代另一种经济制度,不仅有令人极度痛苦的困难,还有如影随形的政治动荡。这一切使情况变得错综复杂。一本很有代表性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汇编,取名为《不协调的声音》,可谓恰如其分,其中收入了一篇讲述30年代以来革命恐怖的作品、60年代到70年代一些作家的遗作,阿富汗前线士兵写的一个故事,还有几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声明。随着前苏联解体成为若干民族单位,它们急于维护自己独特的文化身分,增添了事情的复杂性,归纳俄罗斯地区的思想状况,的确需要勇气,否则只能说它变化不定。<sup>〔1〕</sup>

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退潮也表现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摈弃了毛主义,走向市场经济道路,尤其在农业方面。两个执政的共产党大国样板倒塌所产生的激烈震荡,在已经日趋衰弱的西欧共产党中迅速传播开来。意大利共产党一度很成功,它是西欧最有适应能力和受苏联影响最小的共产党,在1976年的选举中实际得票数直线上升,赢得了民



撒切尔夫人和里根

众1/3左右的选票。它在1979年开始衰落,而且一再下滑,在1988年的市政选举中,得票率不足22%。1988年之后,党的新领导人阿吉利·奥凯托试图带领意大利共产党彻底放弃“共产主义”,走向社会民主主义,加强与欧洲社会党的联系,并且最终放弃了“共产党”的名称<sup>〔2〕</sup>——就像它此前放

〔1〕 维克多·爱罗费耶夫的现代主义性爱小说,译成英文之后标题是《俄罗斯美人》(1992年),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另见他的文集,《在邪恶问题的迷宫里》(1990年)。——原注

〔2〕 意大利共产党在1991年更名为左翼民主党。

弃“马克思主义”一样。

但垮台的不仅仅是带有压抑和专制味道的共产主义。苏联的问题主要出在它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未能提供它曾许诺的丰富商品。计划经济失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到温和的社会党人。世界各地显然都在摆脱社会主义模式。在英国,工党政府几乎遭遇到与东欧共产党一样可怕的命运。在冬天一场失控的罢工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赢得 1979 年大选,揭开了对英国经济的反社会主义改造,旨在恢复自由市场和鼓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工党一分为二,工会势力下降。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革命。在蒙受几十年耻辱之后,资本主义突然不再是一个龌龊字眼。

有人曾指出,振兴后的保守党的这位强硬领袖,是惟一名字后带有“主义”字样的英国首相,但撒切尔主义只不过是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当工党从三次大选失败的震荡中东山再起之时,它在大多数问题上选择了比较温和的立场,试图摆脱它的社会主义政党名声。工党政治活动家玛格丽特·贝克福特在 1980 年属于工党左翼,主张单方面裁军,退出欧共体,扩大公有制范围。到 1990 年,她的这些政治立场完全颠倒过来。“世界已经在前进,它正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她在 1990 年 10 月如是说。新的计算机、机器人和电子科技已经使生产性质发生了革命。现在大部分工人是白领,而不是蓝领;服务业已经超过制造业;小企业已经复兴。

前马克思主义者赖泽克·科拉科夫斯基<sup>〔1〕</sup>写道,如果社会主义的定义是废除私有制和取消市场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一直在导致惨痛的失败……它带来了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低效率、停滞和贫困,以及文化上的灾难”。历史学家彼得·詹金斯写道:“20 世纪最主要的经历是社会主义在道义上的失败。”政治学家约翰·邓恩补充说:“几乎每一条曾经在实践中奉行的、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政策都被承认具有重大局限,而且……在任何发展阶段上,那些信心十足的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社会的模式,没有一个能够保持信誉不受损害。”关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政治理想主义者曾为之投入了大部分资本的事业,我们就谈到这里。

习惯上甘居左翼的人士不大情愿放弃这项事业,这并不奇怪。左翼这个范畴囊括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也许经济学除外)的大多数知识分子。

---

〔1〕 赖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1927 年 - ),波兰学者,著有《马克思主义主潮》等。

一大群精神焦虑的旧朋故友,聚集在社会主义尸体周围,寻找生命的迹象,或希望它神奇地复活。有些人倾向于保留这个术语,但重新界定它的方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界定它的目标;基于某种尚未清晰界定的特别立场,去追求“坚决平等的、自由主义的和反个体主义的政治道德”(斯蒂文·卢克斯<sup>[1]</sup>)。但至少在80年代,他们是逆流而动。与美国的里根时代不谋而合的是,在欧洲大陆上,法国总理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西班牙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在实践中放弃了社会主义。他们名义上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在他们的主持下,企业资本主义焕发了新的生机。

古典经济学复兴甚至打击了凯恩斯。迈克尔·普劳斯<sup>[2]</sup>在评论1991年新出版的这位伟大的剑桥思想家和实践者的传记时写道:“凯恩斯对政治经济学的持久影响受到了某种怀疑。”凯恩斯的基本分析看来是错误的。他否定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经济会自动进行自我调节。他宣称,总需求还不足以保证充分就业和资源的充分利用。只有在工会或垄断组织阻碍价格运动的时候,他的说法才是对的。几十年之后,需要政府干预来防止失衡的要求已经没有什么人质疑了,此时,政府干预的辉煌时期已经过去。就像连续服用兴奋剂一样,赤字开支最终会失效,反而



《新政治家》封面

还会带来通货膨胀,却没有带来更充分的就业——二者不可兼得。(有人一定会指出,凯恩斯从未推荐过长期赤字开支。)诚然,在这一点以及在其他方面,经济学陷入了相当严重的混乱(见下文),但凯恩斯至少不再被当

[1] 斯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 1941年-),英国社会学家。

[2] 迈克尔·普劳斯(Michael Prowse),美国学者,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



做宏观经济学大师了,而且,在总体上,这门学科又回到了古典模式。得到认可的政策是那些尽量减少政府干预、尽量保持规则一致的自由市场政策。

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的情况是,资本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苏联制度垮台,不仅因为它自身缺陷,还因为西方经济成功地产生了一个日益丰裕的社会。维尔纳·桑巴特早就写过:“所有的社会主义乌托邦都失败在烤肉和苹果馅饼上。”现代的馅饼是宝马车、录像机、个人电脑、在海滨胜地避暑。虽说这些福利待遇并非人人有份,但它们已经相当普及。在 80 年代中期,西欧的数字显示,大约每四个人拥有一辆汽车,每两个人拥有一台电视机(可能还是彩电);25%的家庭拥有录像机,10%的人拥有个人电脑,而且这些数字每年还在增长。一千六百万英国人到国外度假。那些批评家对于“消费主义”、批量生产的艺术品可能嗤之以鼻,对于乡村独居生活的式微感到痛心。他们大有自动脱离大众的危险,但是这些自命不凡的精英人士甚至也不肯实践他们所鼓吹的东西,因为极少有人能离开电视机或文字处理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艺术家在大众传媒中找到了有利可图的职业。如果他们是学有成就的时髦大学教授,他们肯定愿意坐飞机去参加配备视听和同声传译设备的国际会议。

80 年代的年轻人,在为人处世方面,与他们父母那一代人,即 60 年代人完全相反。他们不留胡须,思想不激进,一心追求成功。“雅皮士”,或玩世不恭者,比城市游击队或“花孩儿”<sup>〔1〕</sup>更引人瞩目。1988 年,《新政治家》这本在英国办了 75 年之久的左派知识分子的重要期刊(在国际上享有广泛的领导地位),在订户锐减和(按照某些人的说法)质量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停止了发行<sup>〔2〕</sup>,而且,当时这本杂志还面临身分危机:它前半部分的政治基调与后半部分的文学基调有很大的差异。一旦围绕社会主义主题结合在一起,政治和文化的构成成分就会貌合神离。这个左派的经典喉舌,最开始信奉费边社会主义,30 年代逐渐趋向斯大林主义,虽说它的和平主义也促进了对希特勒的“绥靖”。它似乎重复了政治左派的一切错误和缺陷,以及它们偶然的胜利。《新政治家》分享了工党从 1945 至 1951 年的胜利,后来因工党内部分裂而蒙受损失。在 60 年代,新左派多多少少让它恢

〔1〕 “花孩儿”(flower children):主张“爱情、和平与美好”的佩花嬉皮士。

〔2〕 1988 年,《新政治家》与《新社会》合并,改名为《新政治家与社会》,1996 年恢复《新政治家》的名称。

复了生机,在撒切尔时代,它最终染上顽疾。它的死亡是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被一个学究气十足的社会学机构吞并,这件事同样意味深长。

## 大学与知识的零碎化

正如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70年代所写的那样,大学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关键机构。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所谓特征就是脑力取代体力。“通讯革命”,电子媒体、计算机化、集成电路和卫星、空间技术,这一切都渗透到私人生活(娱乐、消遣活动)以及商业之中。其中的关键在于科学,包括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大学成了培养工程师、医生和程序员的场所,以使他们能够在高科技公司找到报酬丰厚的工作。要么,他们上大学是想成为这类公司大量需要的律师。即便是人文学科出身,也能在商界谋到一个职位,与过去相比,商界现在更需要文字能力好的人(写备忘录、经费申请书、宣传小册子)。

当今时代,知识分子要么是大学教授,要么是传播媒体的雇员。以前艺术家咖啡馆里的常客,如今占据着研究席位。我们也许会为此感到遗憾,但是,知识分子(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的衰落乃是现代生活日益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一个方面。

大学的扩张当然会把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各个行业包括在内。20世纪60年代爆发了一场极为激烈的有关“两种文化”的论争,在这场论战中,一方是科学家(以小说家C.P.斯诺<sup>[1]</sup>为首),他们采取了攻势,暗示说,反社会的诗人和小说家可能太多了。但后者不仅能够坚守住自己的阵地,而且,文学也迁移到大学里面。这种趋势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在此之前,有影响的作家极少是大学教员,按照现在的标准,他们大都不是专门之才,领跑的是诸如爱德蒙·威尔逊<sup>[2]</sup>、弗吉尼亚·伍尔芙、马尔科姆·考利<sup>[3]</sup>、T.S.艾略特这类批评家。这些人都是大学以外的作家、旧式“文人”。他们所参与的是一种以杂志和图书为主、面向大众的文

---

[1] C·P·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 - 1980年),英国小说家和科学家,1959年发表题为《两种文化》的演讲,引发了争论。

[2] 爱德蒙·威尔逊(Edmond Wilson, 1895 - 1972年),美国批评家、散文家,公认为当时批评界的泰斗,主要著作有《阿克塞尔的城堡》、《三重思想家》等。

[3] 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 1898 - 1989年),美国文学批评家、社会历史学家。

学文化。这类人现已成为濒于灭绝的物种。

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教学职位成倍增加,资金和晋升的竞争加剧,这必然导致专门化程度激增。胸怀壮志的学者寻找新的研究和写作方式,新的“方法论”。愈演愈烈的极端专门化使他们不了解其他领域,并且脱离广大读者。一位著名英国学者在 1968 年悲叹道:“当今的文学四分五裂……学术也四分五裂;生活也是如此。”

老资格文学批评家格拉海姆·霍夫曾说过,“专门能力”的巨大提高所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广度和厚重,“丧失了权威”。80 年代,用晦涩制造出权威,从文学本身转移到批评家之间理论论争的领域。这种转移与下一节探讨的解构有关。卖弄这个领域的所有时髦方法和堆砌所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成为“玩学术游戏”的一种必要条件。约翰·科格雷夫在评论 1991 年的一期《詹姆斯·乔伊斯季刊》时指出:“一套令人生厌的标识词汇已成为近年许多文学批评的用语。”这类深奥难解的阐释流派为数众多。在翻阅长达 1000 页的 1988 年《英文研究年鉴》(此书出版于 1991 年;同步出版要花费艰巨的劳动)的时候,吉尔斯·福登评论说:“人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这说明批评的标准四分五裂,各派争执激烈。”

专业期刊发表的大部分文章都想显示文章作者十分了解那些时髦的名字和批评理论。如果学生只对詹姆斯·乔伊斯和约瑟夫·康拉德这两位作家本身感兴趣、很想知道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何启发,那么他从这些文章中会毫无所获;它们只是在行业内部有用。1987 年,克里斯·鲍迪克在一篇题目为《内部交流》的文章中写道:“各派文学批评家没有共同立场,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最后只剩下互不理解的口号,每一派都用令人头晕目眩的行话进行交谈,他人自然被排除在外。”职业文学批评家尚不能互相理解,局外人就更无从理解他们了。

专业期刊和著作发表的大部分长篇大论不难被判定为糟烂货。查尔斯·马丁代尔在评论一批研究弥尔顿的著作时,发现这类学术写作“晦涩、空洞,经常杜撰新词”。“那些受过教育并且对弥尔顿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不可能愿意看这类书。想到这一点,令人感到焦虑。”除了极少数大学本科生外,其他人都会觉得它们无法理解。的确有高质量著作问世,但是此类出版物大部分带有欺诈味道。它处心积虑去发明一种新阐释,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自我推销。总的说来,这种转弯抹角、(让局外人读起来)艰涩费解的专业批评话语产生的后果是,使所要考察的作品显得褊狭和索然无味。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例如,他们强调的不是康拉德的

想像力所构想出来的神秘地方和异域人民,而是他的“叙事策略”,他的“修辞张力”。即使涉及到内容,那也是作者的父权制偏见或他的神经官能症候,而这些隐蔽的东西只有借助高倍的批评透镜才能揭示出来。

老资格文学研究者和编者约翰·格罗斯在一篇题为《封闭作坊里的文人》的评论中抱怨:<sup>[1]</sup>“你必须接受一种掺杂各式方言的新语言。你必须训练自己从借喻和重新编码、边缘化和困境、快乐和差异(拉康的术语)以及轻蔑权威等角度去看待世界,作为一种部分恢复元气的方式……”霸权的、争胜的、对话的等形容词,都貌似熟悉,其真正意义却令人困惑。格罗斯总结说:“在过去几年聚积而成的那一套理论,总体看来,我认为是一个可怕的赘疣,一场大玩闹,它取代了对文学自身的体验,是一种没有价值的东西。”麦克尔·坦纳也发出了类似的抨击。他在评论一本故作高深的歌剧研究专著时质问:“为什么一位很有天分的评论家会写出这样一本诘屈聱牙和毫无用处的书?我发现,最有可能的那个答案很令人沮丧:现在掌握学术体制的人只尊重会说内部行话的人。后者想运用一套晦涩难懂的手法让人困惑不解,这样一来,那些看得懂的人就踌躇满志,不再发出疑问:他们所谈论的伟大作品为什么是伟大的?它们为什么会在人人想去的地方召开的会议上成为永不休止地讨论的素材?”(TLS,11月1日,1991年)。

早在1929年,马丁·海德格尔就在尖锐批评现代文明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科学领域现在四分五裂。各门学科的研究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不相同的。今天,这个由各门学科构成的大杂烩,只有靠大学和院系的专门性组织来维持,才不至于散架,它只有通过不同的分支学科的实际目的才能保留其意义。”学术专门化的无数单位,每一个单位都成为一个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型的高度组织的世界,其内部成员的知识生活以会议、专业刊物和集体性学术为中心。根据他们所熟知的、委员会的各种规律,研究成果发表得越多,将来要做的就越多。在很大程度上,这类群体在各自为政、孤军作战,它们发展了自己的亚文化。老一点的常规组织,例如美国历史协会,其成员包括所有职业历史学家,与日渐专业化的团体相比,例如18世纪研究会,或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它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文学甚至划分得更详细,经常围绕某一位作家划分,乔伊斯研究会、约翰逊研究会、萧伯纳研究会或狄更斯研究会。每一个单位都形成了一个微观世界,在这个小天地

---

[1] 见约翰·格罗斯:《文人的兴衰》新版(1991年)前言,另见伯纳德·伯贡齐:《炸碎英语》(1990年)。——原注

里,可能会提出所有大问题,但是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无视在房间另一角进行的、或许是相似的争论。事实上,在旁人看来每一个小圈子都很好笑。

文学仅仅是这种遍布传统大学院系的情况的一个极端例子。它们不同程度地患有喜新癖,或许还过度专门化,因过分追求精细而切断了与别人的交流(“自言自语”),为出版而出版,因零散化而分解为大量的亚话语。有关情况下文将进一步探讨。同时,我们应该谈到一个新的重要文学理论流派,即解构主义,因为它不仅使文学批评变得晦涩难懂,而且与它的父辈结构主义一样,它扩散开来,成为也被其他领域应用的一种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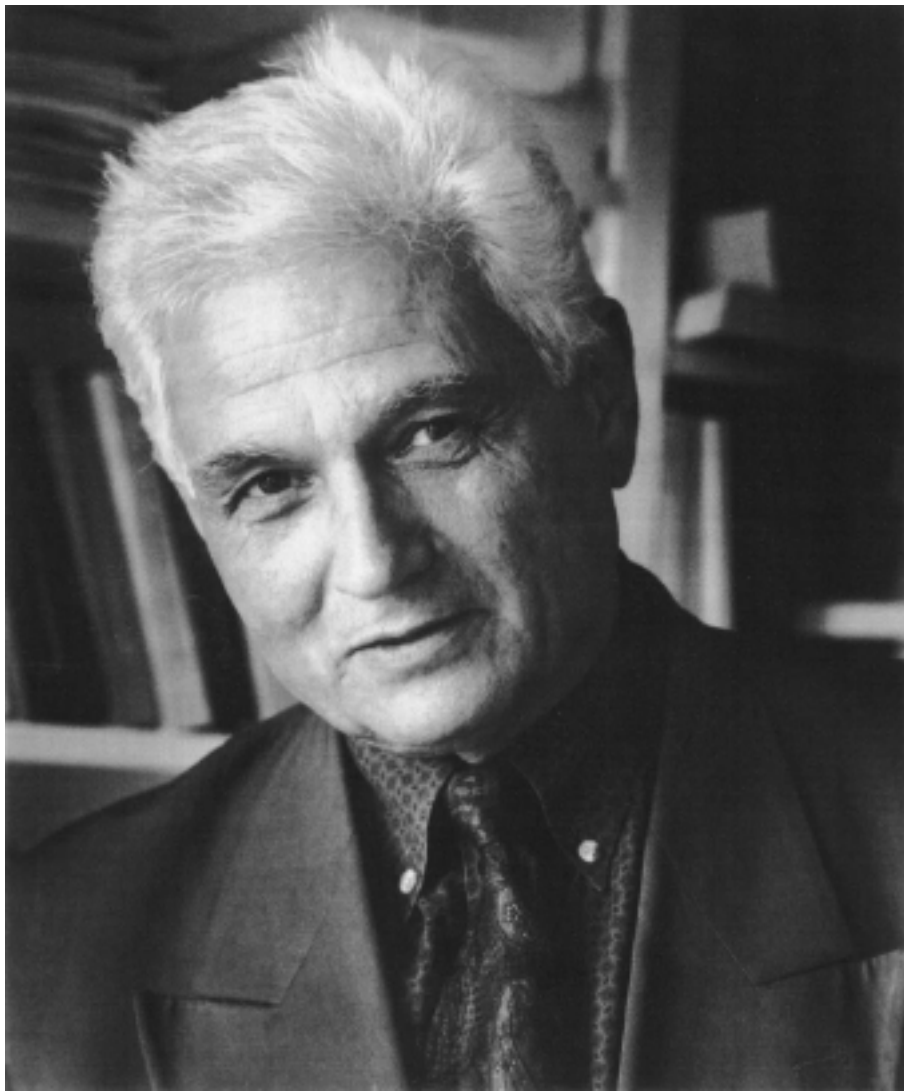
## 解构主义

作为一种主要思想时尚,解构主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盛极一时,即便没有取代结构主义,它也向结构主义提出了挑战,正如结构主义之于存在主义。解构主义或许与我们先前探讨的政治转向有关,它也是把学术界推向高深莫测之境、与普通人的认知相距甚远的重要原因。解构主义的领军人物是才华横溢的雅克·德里达。他差不多继承了福柯和拉康的巴黎明星知识分子角色。在他的领导下,解构主义者保留甚至强化了结构主义对人的作用的,揭露了“在场的形而上学”——后者使我们以为文本背后存在着一个人(即文本的作者)。这种貌似不可或缺的作者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只有文本。当我们写作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表达”我们自身,而是进入了一个由语言模式和非个人的公共话语文化所支配的词语领域。那种认为是“我”在写作、在把“我”的心理状态变成文字的观点,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谬误”。作者的生平活动与他的作品没有任何关系。作者所在时代的社会语境和历史事件似乎也与他作品毫无瓜葛。

不过结构主义曾预设,文本确实有某种意义,必须对这种意义进行解读,不过它可能是由某种逻辑结构决定的,它处在这种逻辑结构之中。结构主义者看到了一个反映了一切思维固有特征的基本结构,就此而言,他们是新康德主义者(容格原型论的信徒也是如此)。解构主义认为,文本没有内在意义,因为每一个读者对于作品都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意义因时因地而异(在阅读过程中,作者和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使二者生发出更多的意义)。在这些不可胜数的解释当中,哪一个是正确的,这样的问题问了也是白问。我们处在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宇宙之中;我们没有一个最终衡量

标准,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没有一种能够衡量语言的原语言。不存在一个单一的、高高在上的思想视角,可以把握事物的总体性。

最后,我们只有非理性的语言领域,一种宏大的无秩序状态,我们同尼采和乔伊斯一起置身其中,因生活的丰富多样而感到高兴,根本没有想到它的规划或统一性。解构主义对于文学批评家的吸引力在于,它允许他们对一个文本几乎可以作任何阐释——越离奇越好,只要有充分细致的技巧和有洞察力的理论意识。正因为这类肆无忌惮的做法,有一群备受推崇的美国学术



德里达

人赢得了“阐释学黑手党”<sup>〔1〕</sup>的称号。最受推重的方法是揭示出被压制的、隐蔽的意义,从作者忽略的地方推论出这些意义,作者的忽略可能是社会或个人禁忌所造成的,拉康说它们是“话语中的漏洞”。亨利·詹姆士小说《金碗》中的一个人物说过:“他说的不如他没说的多。”在生活当中,当然也存在人们不去谈论的东西,这是相关事实。它有待于解构主义者把它提升为一种批评原则。缺场或延迟同在场一样,在写作中经常遇到。

大部分解构主义批评坚持这样一种观点,文本除了与自身之外、与其

〔1〕 阐释学黑手党,指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年-)及其同事。

他事物没有任何关系。《包法利夫人》就是福楼拜的一部小说,它与资产阶级或法国社会或浪漫主义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自然和历史都是有待解读的文本,而不是有待理解的客观实体。按照德里达的说法,一切都是文本。

在解构主义之前,文学批评全力关注的是文学创作的技巧,关注的是挂毯花线的纺织方式而不是它们的耀眼光彩;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新批评”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它反映了现代时期的一个基本的总体趋向,它是文化统一体分解的结果。在一种多元主义文化中,人们开始意识到,事情一旦被视作理所当然,它就成了传统。历史学家在很早以前(19 世纪末)就发现了这一点。有人说,历史著作讲的都是实事,“完全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在每个人看来都是一样。早在 1914 年前,历史学家就认为这种论断是很幼稚的。只有当大家的体验、传统和价值观基本上相同时,这种论断才能成立,就像 19 世纪英国有文化修养的阶级一样。

历史学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点著书立说,他们认为值得注意的事情各不相同,而且他们感知这些事情的方式也不相同。这是因为他们触及各种由文化决定的因素,他们把这些因素编织到特定的语言当中,编织到他们在书写“过去”的时候必须使用的选择和评价框架之中。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与一个欧洲人相比,一个非洲人会怎样写 19 世纪的历史?在任何情况下数量极多而且必须加以选择的事实——什么样的事实?——是所有历史叙事的一小部分,历史叙事包含修辞、“阐释”、编排、聚焦,为的是让事实变得有意义和为人所理解。另外,这部分内容是“主观性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非事实的、非科学的——非认知层面的。

文学批评在经典小说中发现了同样的东西。天真的读者以为,小说中的人物是“真实的”,是对生活的模仿;叙事者在表现他们的时候就像一位摄影师那样不偏不倚、如实拍摄。这样的读者不知道有叙事策略这回事。事实上,当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去读这些小说的时候,或者说当一位英国读者去读法国或德国小说的时候,他对不同文化有些陌生,此时,他对特定传统的依赖有多深,也就一目了然了。(人类学家告诉我们,甚至在我们看来是对生活直截了当模拟的电影,也会让第一次看到它们的原始民族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可能看不懂电影。)不管怎么说,现代批评家开始自觉地对造就一部小说的所有陈规感兴趣。他们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为什么作家以他(她)这种方式把这一切组合到一起?他们讨论作品的叙事策略(如全知全能的作者、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内心独自)。他们指出,貌似真实的小说人物其实是一种特殊想像力的创造。狄更斯并没有为我们提供

对维多利亚人无比精确的描述,而是创造了维多利亚人的自我形象(正像他们有时带着不安的心情所意识到的那样)。这些人物是以叙述者或作者为中介的(作者和叙述者这二者可能有所不同)。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强行加了进去,或许是以间接的方式(作者创造出一个人称叙述者,这个叙述者不完全是作者本人)。此外,这些人物对于不同的读者呈现出不同的意义,读者带着自己的情感去理解人物。小说家本人开始写关于写小说的小说;如果这种游戏玩腻了,那就玩更复杂的:讲述小说家写小说。例如,在安德烈亚·卡诺比奥<sup>[1]</sup>的《中国花瓶》(1990年)中,书中人物一个小说家想像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多重身分。

在不断地求新的学术竞争游戏中,文学教授发现,由于解构主义取消了固定意义,就出现了一个有机可乘的大缺口。如果一个文本没有内在的、固定的意义,即没有惟一“真正的”《哈姆雷特》或《失乐园》,那么就可以随意进行阐释了。批评家的看法之所以正当合理,惟一的理由是,因为他或她能够利用充分的技巧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从任何一种现代理论——社会学、政治、心理学、语言学、哲学——拿来一套概念工具,再运用逻辑论证技巧,将这套概念工具用在某个已经作古、任由摆布的作者身上,很可能产生一种神秘的话语,也许还被称为“破除神秘”的话语(确定作者想要表达却没有表达出来的意义)。如做得巧妙,还有些新意,这就意味着在学术生存竞争中取得一点领先优势。人们也能由此而不知羞耻地放纵自己的偏见。

这种肆无忌惮的虚无主义如此明显,有时候甚至影响到解构者本人。它导致所有意义被颠覆,从而使所有的理性争论被颠覆。“关闭了所有的批评论坛,取消了关于证据、判断或价值的一切共同标准,”正如克里斯托弗·鲍迪克指出的那样。解构主义本身也可能被解构,这一点很容易让人看出来;德里达说他的著述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哪一位解构主义者敢说自己占据优势,能够写出真理;反过来,解构主义者的论述也可以从其他同样合理的视角加以解构。

在哲学上,德里达和解构主义喜欢证明,每一种思想体系都是基于某种未加检验的前提,而且它所采用的这个前提正是它明确反对的东西。例如,可以证明,马克思就采用了他旨在批驳的全部资产阶级价值观。声称以逻辑论证为依据的东西恰恰是修辞、文风——是对意志的一种非理性确

---

[1] 安德烈亚·卡诺比奥(Andrea Canobbio),意大利作家。



认(很多内容来自尼采)。科学家与艺术家没有什么区别!正如尼采指出的那样,隐喻主要存在于认知当中。任何坚持明晰性和肯定性的思想体系,实质上都是通过纯粹的强制力,即极权主义恐怖的暴力来做到这一点的;惟一货真价实的思考总是矛盾的、模糊的。《菲尼根守灵夜》的文字游戏似乎是解构主义者能够认可的极少数小说之一。各个学科的著作开始冠之以“××修辞”的名称。唐纳德·N·麦克洛斯基的《经济学修辞》(1985年)是众多修辞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包括会计学修辞和医学修辞,显然还有法律修辞。

这一类作品试图证明,即使是最自命不凡的科学实际上也是包含许多任意的论断,处于某一特定的语言和文化框架内。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生发出一套思想,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方式,与外在的现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例见艾伦·格罗斯《科学的修辞》,1991年)。科学判断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理性”分析的实验证据;大量的修辞和非科学话语也掺杂其中。科学根据它所处的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欧洲科学传统不应该以自以为占据优越地位。例如,欧洲之外还有许多种数学的存在,它们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但同样成立(见乔治·格韦尔格斯《孔雀的冠羽:数学的非欧洲来源》,1991年)。

手法巧妙娴熟的专业人士显然欢天喜地去这样操作,这印证了恩斯特·荣格尔<sup>[1]</sup>的说法:这是一种用理智来毁灭理智的快乐。弗洛伊德的信徒和克莱恩的信徒无疑会发现其中有一种潜在的施虐狂。

这时出现一种倾向,即对于那些未能掌握拉康、巴赫金、克里斯蒂娃、德里达等人思想的笨蛋不屑一顾。普通读者遭到轻蔑。大学教授不是为普通公众写作;事实上,他们写东西只是给彼此看的。出书目的就是为了在通往终身学术职位的道路上闯过一道难关。这种书要由其他教授根据书中表现出来的专业技能来判断;所谓专业技能就是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驾驭所有重要理论的能力。这场竞争游戏日益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新的和更复杂的理论,让昨日的英雄成为过气人物,允许新的候选人展示最新颖的、说明他水平的思想武器。结果便是,产生了许多术语满篇、煞有介事的文字垃圾;不过,通常来讲它做得比较巧妙,在模棱两可的边界线上游刃有余。这可苦了国家基金会的那些可怜的评委们;一般说来,将骗子和天才区分开来是很难的事情。无论分辨出骗子,还是识别出天才,除了对于

---

[1] 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unger, 1895 - 1998年),德国小说家。

那些精通这种学术游戏的人来说,对于其他人都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顺便说一句,这种晦涩难解的话语与后现代主义自称消除了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鸿沟的说法发生了矛盾;其实相反,这个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倒扩大了。例如,论述莎士比亚的权威性著作不再能够被大多数人理解了。

一般说来,这类著作总是尽力表现得睥睨一切,惊世骇俗;毁坏男性声誉的女性主义者不是惟一要取得对手性命的那种人。不管是谁,都可以成为猎取的对象;约翰·济慈成了一个伦敦东区的混混。年轻一代学术人试图批判莎士比亚,以前只有萧伯纳敢这么干。反对偶像崇拜的主张与蒙昧主义的乌云混为一团,少数标新立异的见解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诀窍。表现方式是极端理性主义的分析程序,通常鄙视像整部作品的想像力和情感效果这类事物,认为它们是头脑简单的东西。人们所做的是,指出逻辑上的前后不一致,揭示隐蔽的意义。把一套复杂的代码破译出来,这种感觉多么让人兴奋。据这一派人说,没有哪一位作家所说即所想;令人感兴趣的是他隐藏的东西。

解构主义的(潜藏的)政治倾向总体上是左倾的,这是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然趋向——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时代的遗留物。权威总是应该遭受攻击的。近些年来,随着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急剧衰落,不再有一个显眼的靶子或关注的焦点,而且,解构主义者总是想比旧式激进分子的简单做法来得更精巧一些。尽管如此,他们仍旧能够颠覆传统的真理。他们可能不想过于激进,因为他们薪水很高而且有经费资助——当然,据他们看来,他们的薪水和资助还不足的,而且还有降低的倾向。在英国,正像在大多数国家那样,怨声不断的学术人和怒发冲冠的政客展开相当激烈的斗争。矛盾的焦点是,应当给艺术和人文学科以多大程度的公共支持。撒切尔夫人是杂货商的女儿,绝不是贵族式左派教授的朋友。牛津大学拒绝授予她荣誉学位!有人发现,比利时理论家保罗·德·曼在年轻时代写过亲纳粹的文章。这可是一桩大丑闻,这位世界级的解构主义者受欢迎的程度多少有些下降。假如他当年写的是亲斯大林主义文章,很少有人会在意。

在 80 年代,“新右派”或“重新界定的保守主义”是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sup>〔1〕</sup> 像英国的罗杰·斯克鲁顿和法国的安德烈·德·伯努瓦<sup>〔2〕</sup> 这样杰出的知识分子唤醒了传统的左派,但几乎无法改变他们的观点。一篇评论亚瑟·塞尔登(编)《新右派启蒙:左派心头的幽灵》的文章中说:“由于 1968 年的校园暴力给新左派带来了狭隘偏执的名声,美国最引人注目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已经站到政界右派那一边去了。”到了 80 年代中期,英国的情况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80 年代末以来,随着撒切尔主义吸引力有些消退,大部分知识分子似乎反对撒切尔、反对里根,他们急于把自己定位在左派阵营,但无法确定准确的地点(见约翰·邓恩对罗杰·斯克鲁顿的相当偏激的看法, TLS, 4 月 4, 1986 年)。

1989 年 2 月,《纽约时报》报道说,达特默斯大学一伙激烈的学生扰乱了课堂,掀起了抗议,但这一次角色发生了转变,这伙右翼学生反对自由派教授,而这些自由派教授在 60 年代很可能发起抗议,扰乱课堂,现在他们却是现存体制的代表。这伙新右派主要信奉新自由主义,赞美自由市场战胜经济奴役,赞成对国有大型和低效的经济部门进行私有化。在性解放,女性主义、取消书刊审查制度、毒品合法化等当代核心社会问题上,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发生了分裂。他们一方面痛恨国家控制和绝对的道德准则,另一方面本能地反抗文化现代化的有害后果,二者发生了冲突。经常有人指出这个悖论现象:在现时代,自由主义者在经济上赞成中央集权论,在道德问题上赞成个人主义,而保守派正好相反:每一方都有自相矛盾。

在《谁之正义?谁之合理性》(1988 年)一书中,阿莱斯代尔·麦金泰尔认为,不存在普遍生效的道德原则,道德原则必须放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这种观点与保守主义相吻合,在某些方面让人想起了启蒙运动时期大卫·休谟的激进怀疑主义:如果理性无力告诉我们如何行动,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到传统和习惯。不相信人类理性所做的容易出错的脆弱设计,正是爱德蒙·伯克经典保守主义的基础。在这里,实际上并非那么新鲜的“后现代主义”似乎与保守主义有相近之处。当然,虽说批评理论破坏了来

---

〔1〕 见查尔斯·科维尔:《对保守主义的重新界定》;安德烈·伯努瓦:《右派的现实》(巴黎:1979 年);戴维·霍维勒:《注意右派:里根时代的保守知识分子》(1991 年)。——原注

〔2〕 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 1944 年 - ), 英国新保守主义或“新右派”哲学家。安德烈·德·伯努瓦(Andre de Benoist)当代的法国学者。

自“传统”或“霸权”文化的真理假说,但是它也同样颠覆了所有的“反霸权”话语;“反霸权”话语得到赞同,只是因为它们更有趣。

尽管解构主义的确好像走到了穷途末路,它的虚无主义是“一切过去之后”的产物(“一切过去之后”是一本关于现代知识文化的著作的名字),然而,就主要性质而言,它绝不是新鲜事物。怀疑主义毕竟像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up>[1]</sup>那么古老;它在启蒙运动时期得以复兴,此后可经常见到它。优秀的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总是要更正一些神话和对他们研究对象的误解;20年代的所谓“驳斥”现在成了“解构”,成了表示反传统或进行批评分析的一个最新的词汇。有人强调我们对一个时期或一个人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某种文学创造,这种说法也是一种老生常谈。(历史学家习惯于说米什莱发明了文艺复兴<sup>[2]</sup>,文学研究者习惯于说狄更斯发明了维多利亚时代。)一套新词汇取代了差不多表示同样意义的旧词汇。

## 后现代主义

与解构主义关系密切的“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一个时髦词汇。它的确切含义很难确定(因此这个词本身就是后现代的)。思想的零碎化也体现在这样一种趋势中,即对于不同的学科,后现代主义有着不同的意义。它们都想使用这个术语,把它当做一种急需的整合原则;需要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建筑 and 诗歌,甚至后现代主义科学和技术。每一个人都用它表示统一的丧失和综合的缺乏;它意味着彼此不可通约的多重话语、不同的“语言游戏”和生活世界。

作为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继承人,后现代主义者大谈消灭个体或消除个体中心,偏爱话语领域,提倡一种反人本主义。建筑学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风格折中、“蓄意的混乱”:你可以随意运用过去的风格,任意进行组合。事实证明,这尤其具有争议性。反对“体系”,信奉真理的相对性,而且总体上信奉断裂、零散化、非理性、易变性(真理时刻在变化,它也因人而易,因阶层而异),这些都是后现代性质的。每个人都同意,后

---

[1]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古希腊哲学家、历史学家,活动时期在3世纪初,曾领导过怀疑论派。

[2] 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在1855年发表的《法兰西史》中最早用“文艺复兴”表示15、16世纪欧洲文化艺术的变革。

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拒绝、否定或超越了“现代主义”。但是,现代主义是什么或者曾经是什么,对此几乎根本不能达成共识。经济学家保罗·温特认为,现代主义指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本质上是一成不变的、维多利亚时代旧有的正统论。<sup>〔1〕</sup>如此说来,凯恩斯究竟是后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所要反对的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艺术当然指的是 20 世纪前期的艺术革命者:立体派、表现主义者、未来主义者;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太紧密了,不可能一笔抹杀。但是这些美学上的革命者,除了它们都属于实验主义、而且反对旧有形式之外,并无相同之处。



后现代主义建筑

后现代主义往往强调并反对它们进行综合、整合的企图。但是,反科学、非理性主义、主观主义的特征在早期现代主义者那里是很突出的,当然他们彼此并不完全相似。在这方面,现代主义者似乎与后现代主义者相似(例如,后现代主义者经常崇拜和引用尼采和乔伊斯著作)。这两件事实际上往往被混为一谈,愈发加剧了混乱。因为如果有人

想把现代主义等同于经常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主流社会的话(“现代化”这个词经常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所使用),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主义者已经是后现代主义者了。一位很有名望的社会理论家写了一本论“现代性的后果”的书,<sup>〔2〕</sup>这本书所描述的似乎是后现代性。

其他的所谓后现代特征还包括反精英主义,这表现在,声称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同样优秀,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一贯的坚持。古典的现代主义者,例如第一批象征主义者被公认是憎恶大众文化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这样的,但很难说未来主义者和乔伊斯也是这样。老资格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很像“资本主义”,后者也是十

〔1〕 见 I 阿马里格里奥:“作为一种论现代话语的经济学”,评论见沃伦·J.塞缪尔斯主编《经济学作为话语》(1990年)。——原注

〔2〕 指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著作《现代性的后果》。

分宽泛的术语(见他的《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无法确定,是加盟后现代主义呢,还是做它的对立面?)克里斯托弗·诺里斯<sup>[1]</sup>也在后现代主义中看到了令人担忧的情况:老式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消失(《后现代主义出了什么问题》,1991年)。但一些神学家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其他人,包括教皇保罗二世),都属于后现代(D.R.格里芬等编:《后现代神学种种》,1989年)。

叶芝曾写道:“在我们之后是野蛮的神社。”充满反叛精神的伟大现代主义者都依附欧洲文化的伟大传统,“文明意识”:一套可供引用的文字、典故、参考书、回忆。这些往上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通过中世纪和现代历史早期阶段的大作家传承而发扬光大。这些伟大的作家包括从荷马、中经但丁,直到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现代主义者并不想失去这一整套高贵的表达方式。在20年代,知识分子凝神思索西方传统破灭的时候,带着一种忧虑,有时候还带着极度悲观情调,但他们还想谈论它,仿佛他们依然有可能逆野蛮主义潮流而上似的,或者,即使失败了,他们还要召集文明的少数人,在一个小小的、但非常重要的角落里,捍卫那面大旗。它至少还能引起轰动,令人震惊。例如英奇教长<sup>[2]</sup>曾写道(借用了巴雷斯的一个术语):

工业革命产生了一种全新的野蛮主义,全无过去的根基……一代人正在成长起来,他们并非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们所处的教育制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欧洲文化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不教古典作品;不教圣经;教历史也不考虑任何后果。更严重的是,没有社会传统。现代城里人是无根基的。

论述大学的著作,如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sup>[3]</sup>的著作,在此时面世。它们哀叹一个伟大的人文传统竟然沦落为职业教育主义。一大批欧洲知识界名流越过大洋,把他们的恐惧对象说成是“美国主义”(Americanism)。与此同时,整个文学课程宣扬这样一种思想:虽说遗产可能有问题,但它依然能够启发杰作,即便是相当怪诞的杰作——从托马斯·曼、乔伊斯、普鲁

[1] 克里斯托弗·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 1947年 - ),英国文论家。

[2] 英奇(William Ralph Inge, 1860 - 1954年),见第十三章。

[3]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 1866 - 1959年),美国教育家。

斯特、沃尔夫、卡夫卡到马尔罗的杰作。

后现代主义者对这个传统表示绝望。他们完全接受了,或装作接受了约翰·埃尔索姆<sup>[1]</sup>所描绘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西方不存在神圣不可冒犯的艺术、文化或社会标准,它们经常遭受攻击,而且随时存在取代它们的标准”(《爱欲剧场》)。有人可能继续崇拜西方文学的伟大传统,而且自认为是其中一员,与此同时,正如理查德·罗蒂<sup>[2]</sup>所写的那样,“把一切为它提供逻辑之外的合法性依据的企图都视为浪费时间”。知识只有在它自身的群体和传统之中才是有效的,不存在一个普遍的理性主义基础。甚至科学也不得接受这一观点;当然社会科学也得接受这一点。



斯坦福校园

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被称作“校园多元文化主义”的诞生地。

欧洲现在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受到来自亚洲和非洲各种风气的影响。各种文明相遇、交汇,在大城市的熔炉中融和为一种新的文化,或者在一个

---

[1] 约翰·埃尔索姆(John Elsom),英国作家,戏剧家。

[2]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31年 - ),美国哲学家。

“多元主义社会”中保留了多重文化特征,用乔伊斯的话说,变成了“欧亚化的阿非美国佬”(Europasianized Afferyank)。即便在西方国家内部,还只有单一传统吗?体现时代变化的一个症候就是,1988年,斯坦福大学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决定把西方文明这门课程改成包括黑人、拉丁美洲、亚洲内容在内的一种世界文明概述。(1990年,在英国,历史学家们就一份新的全国历史课程标准的内容进行了类似论争。)尽管有些人指责这是向混乱和政治压力投降,另外有些人则认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著名欧洲思想史家格楚德·希梅尔法布<sup>[1]</sup>教授表示反对。她说,即使我们不是以欧洲文明为主,我们也应当以“思想和言论的精华”为主。但是,由谁决定哪些东西是精华呢?又根据什么标准呢?在马修·阿诺德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人们还有获得共识的希望,但是在20世纪末的加利福尼亚呢?历史学家们已经认识到,所谓“历史的里程碑”只是特定共同体内能言善辩之士所青睐的景象。如果大部分人不再从属于欧洲文化共同体,我们很难证明研究它的必要。

毕竟科学技术正在用一种无处不在的流行文化将全世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追溯到20年代,“现代主义者”温德姆·刘易斯<sup>[2]</sup>说起过“宇宙人”,这种人没有国籍,是按同样的模式造就的。刘易斯以那个时代典型的风格把这种人与对“美国化”的恐惧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担心机器和大众文化



美国化

会使欧洲人失去了文明。在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最流行的严肃读物之

[1] 格楚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美国历史学家。

[2] 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 1882 - 1957年),英国旋涡画派创始人,作家。



一是《美国的挑战》。作者是雅克·塞尔旺—施雷贝尔<sup>〔1〕</sup>。现在看来这本书相当不合情理。美国人既没有发明现代科技,也没有发明现代民主,只不过碰巧它们在美国出现得稍微早一些而已。电视和电影、全球卫星通信、喷气式飞机旅行以及其他现代奇迹,是将全世界在文化以及商业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无所不在的”力量。在波士顿或慕尼黑,和在印度或马里一样容易看到禅宗信徒和非洲艺术爱好者。这还不算摇滚乐和体育运动、牛仔裤和迷你裙等随处可见的流行文化。看到地方文化灭绝而毫无特色的国际风格受宠,例如看到东京从一个日本城市变成对纽约这种异国情调的模仿,可能令人感到郁闷。但是思想的融合却让人想到以前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亚历山大时期和后来罗马帝国时期发生的事情,也许一种新的文明将会从这个巨大的融合过程中浮现,就像西欧从古代世界的暮色中出现一样。

不管怎么说,把伽利略以来在现代世界中孕育、在 19 世纪成年的东西说成是后现代的,的确是有些奇怪。然而,对激光和巨型电视时代表示欢迎,这种立场肯定是背离了那些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态度,因为后者对整个西方科学事业的进展感到痛心疾首。同它的近亲解构主义一样,后现代主义似乎不断地颠覆自身,随时走向自己的反面和销声匿迹。女性主义是后现代的吗?现在有了后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要求回归“家庭价值观”。性自由是不是后现代的?不过,艾滋病好像是后现代疾病。环境保护主义是不是后现代的?公开性和改革<sup>〔2〕</sup>是不是?它们的驳斥者是不是?

也许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这个文明所不可避免的命运。这个文明目睹了许多曾经强劲有力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遭受灭顶之灾。时尚和科学的无情推进吞没了过去的人类创造。从前的时尚被遗忘了,或者被扔进了垃圾堆。浪漫主义不再可行(就其纯粹状态而言),但是逻辑实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行。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度趾高气扬,但最终像水泡一样破灭了。弗洛伊德主义逐渐烟消云散;萨特的存在主义,曾经备受珍视,目前已不再被认为有很多内在的旨趣。20 世纪 60 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既被知识分子遗忘,也被政客遗忘。新的时尚已经兴起,但是哪一种时尚有机会持续超过一个季节?科学本身在不断变化。缺少一

---

〔1〕 雅克·塞尔旺—施雷贝尔(Jean - Jacques Servan - Schreiber, 1924 年 - ), 法国政治活动家、新闻工作者。

〔2〕 公开性和改革是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口号。

个最终标准,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仲裁人,“正如这种情况是伦理学和美学的特征一样,这也成为数学和科学的一个特征”(汉纳·皮特金:《维特根斯坦与正义》)。这样一来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下这样一种想法:人类喜欢思考,而且很可能一直在编织思想的网络,而这些网络注定要被下一阵大风给吹走。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高兴地玩这场游戏,而且不要太当真。

保罗·瓦莱里<sup>〔1〕</sup>在1919年论“欧洲思想的危机”时预言,欧洲文化最终的结果是“一种无限丰富的虚无”,知识不断扩散,达到了不再出现独到形式的地步;“一种完全失序状态”。有教养的头脑里包含一团杂乱无章、互不相关的观念。后现代主义似乎实现了他的预言。在1987年出版的《文化的形态》一书中,托马斯·麦克法兰预见到,各种文化形态崩溃,分裂成许多互不相关的团块。这很像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病症:分离性的老年性痴呆。

## 某些学术团块

因知识的零碎化而出现的各个专门知识领域,在行政上隶属于传统院系,例如文学系、哲学系、历史系、心理学系、社会学系和物理学系。事实证明,这些旧有单位惊人的稳定。许多人努力去建立新单位,或者将旧单位合并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之中,而且,有的时候,这些努力莫名其妙。有的时候,职业组织或多或少成功地跨越了学科边界,通常它们以一个有限的题材为基础:18世纪研究将历史工作者、文学研究者、音乐理论家、艺术史家以及其他对启蒙运动感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然而,经常出现失败;科学与文学合作失败的原因在于,每一方都认为,别人对自己所在的学科的无知是无法克服的。数学家通常鄙视数学哲学家对他们学科的意见;总的来说,向所有经验科学提供帮助的分析哲学并不太成功。极端专业化和小集团内部的词汇阻碍了交流——通常是同一院系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文学系,但是在各系之间更为严重。

毋庸赘言,当代的知识产出数量巨大,人们甚至无法做出明快的概述。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不可能全面掌握知识的情况,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历史事实。(正如奥尔特加·Y·加塞特所言,我们不知道自己身边发

---

〔1〕 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 1871 - 1945年),法国诗人、小品文作家、评论家。

生了什么事情,而这种情况正发生在我们身上。)圣杯<sup>〔1〕</sup>或亚特兰蒂斯<sup>〔2〕</sup>根本就不存在,甚至比梦幻还虚无缥缈。戴维·诺尔斯<sup>〔3〕</sup>所谓的“在自然层面对宇宙的一种惟一理由充分和明白易懂的解释,以及对人及其力量的一种分析……(虽然)对所有的人都适用,而且在其自身领域内部是决定性的”,却一直遭受怀疑主义的攻击,甚至在诺尔斯所论述的中世纪也是如此。不过,正如他补充的那样,这种怀疑主义“从来没有取得全面胜利,而且最终未被接受”。欧洲思想固守它引人注目的一种信仰:经过启蒙的心智能够获得最终的认识。尽管有黑格尔和达尔文的存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伟人们依然相信知识的统一性和个体在总体上掌握知识总和的能力。<sup>〔4〕</sup>直到 20 年代末,比阿特丽斯·韦布在日记中记载,她对于绝对真理并不存在这种思想表示震惊。今天,它已被接受,不再让我们感到震惊。如果说集大成之思想人物已不再存在,那么我们就走到了个体性的尽头,“人的解体”就发生了;未来肯定属于“人工智能”——我们时代的一项主要研究成果:人类正在被电脑取代。

1914 年,伯特兰·罗素在《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中写道,过去的许多综合正在崩溃,“使我们这个时代成为一个困惑探索的时代,正是在同一地方,我们的祖先曾经在‘绝对确定’的明彻日光下恬然漫步。”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又对这种情况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哲学走向精确的进步而不是停留在“未经证实的宏大概括”。旧有的概括曾经满足了大量的公众;新的精确性,更精确而且更复杂,不是他们所能理解的。职业哲学日益脱离广大公众,沉浸在一种专门化的亚文化当中,受到刺激,试图去创新,变得机巧起来,或许发明一个新论题。在 60 年代、70 年代,在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大学中,哲学增生出各种各样的组合形式。例如,出现了现象学社会学家

---

〔1〕 圣杯(Holy Grail),亚瑟王传奇中的骑士们所寻找的圣物。在 20 世纪文学作品中,圣杯仍是一个被描写得很多的一个主题。

〔2〕 亚特兰蒂斯(Atlantis),传说中的岛屿,据说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后沉于海洋。

〔3〕 戴维·诺尔斯(David Knowles),20 世纪英国天主教历史学家,中世纪修道院史专家。

〔4〕 有关一位 19 世纪学者对这种理想的感受的一个注解,见约翰·斯帕罗《马克·帕蒂森与大学理念》(1967)。在他最后一部未竟之作《布法与白居榭》这部小说中,福楼拜写了两位退休职员力求总结所有人类的知识。他们重新出现在萨特的《恶心》中,“颇具讽刺意味”。——原注

(许茨、伽达默尔,也许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也算得上),语言学心理分析学家。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作为一种重要新趋向崛起。1975年出版的一部哲学评论<sup>[1]</sup>认定了这种多元化的情况——从禅宗信徒到逻辑实证主义者,从革命行动主义者到严谨的分析家——从而否定了把哲学说成是一门统一学科的判断。

通常,哲学家们一心去钻哲学细枝末节问题的牛角尖,他们剖析的问题只是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这类问题的产生是出于职业上的某种偶然。有的时候,其中一个问题得到广泛关注,但是,随着争论进行不下去,它也逐渐销声匿迹;它已经被看透,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苍蝇从瓶子里给放了出来<sup>[2]</sup>。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年)中就有这样一种昙花一现的观点。这本书认为,如果(获得公共物品的)不平等所造成的额外特权有助于弱势群体的话,他会赞同这种不平等的正义。这个主题与当时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有关。但在10年之后,几乎没有人对它感兴趣;罗尔斯遭到驳斥;在大量的专著和文章争相讨论这个问题之后,至少他已经被人说腻了。其他观点取代了它,而且注定会这么发展下去。学术分析的惊人效率吞没了类似的每一个不解之谜,把它咀嚼成碎片,然后再吐出来,然后随时准备对付其他佳肴。对于这一切,一般读者,或者说职业哲学家小圈子外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太了解,这反倒是他们的福气。

学生造反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于一个四分五裂而且似乎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知识世界困惑不解。社会理论本身,学术风格,都体现出这种脱节。有人在评论安东尼·吉登斯和乔纳森·特纳主编的《今日社会理论》(1986年)时说:“把这么多完全不同的方案齐举并列放在一个题目之下,在启导那些不熟悉这些社会理论的读者的时候,很可能让他们茫然不解。”该书涵盖范围甚广,从“坚定不移的行为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塔尔科特·帕森斯<sup>[3]</sup>及后继者所信奉的韦伯主义思想、再到各种数学模式以及结构主义。面对这样一些“根本不同的社会理论,读者马上会感到不知所措,无法做出合理选择”。或许是出于绝望,这本文集收入了低调的、相对

---

[1] 查尔斯·J.邦当和S.杰克·奥德尔主编:《密纳发的猫头鹰:哲学家论哲学》(1975年)。

[2] 维特根斯坦曾经表示,自己的哲学是“给捕蝇瓶里的苍蝇指出一条出路”。

[3]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 - 1979年),美国学者、社会学家。他提出的社会行动学说对现代社会学产生重大影响。

注重经验的内容,例如拉尔夫·米利班德<sup>[1]</sup>的朴素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sup>[2]</sup>的“世界体系”。只有这些似乎还能与现实世界有些联系。

约翰·格雷在“哲学动态”栏目评论政治哲学近况的时候(TLS,7月3日,1992年),论及“一种老式传统的奇怪死亡”(当然,从现代学术文化角度看来这并不奇怪),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哲学与经济理论和历史相交叉,正如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思想相交叉一样;政治哲学逐渐受到“一个高高在上、与其他学科相隔绝的学派的支配”,这个学派也是远离现实生活的。经济学理论差不多也面临同样状况。经济学当然处于混乱状态之中,正如一本书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彼得·吉尔斯、盖伊·劳思主编:《陷入混乱的经济学》,1984年)。一些心怀不满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尊重事实”是主要问题,即未能看到现实世界如何不同于被主导经济理论高度理论化的世界。脱离现实世界以及其他研究领域,这种孤立的感觉明显体现在以下两本书中:威廉·N·帕克主编的《经济学史与现代经济学家》(1986年)以及安米亚·达斯古普塔的《经济理论的各个时期》(1985年)。

由于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时代精神”的深刻影响,《作为话语的经济学》(沃伦·塞缪尔斯主编,1990年)等著作试图剥掉这门学科身上的“科学”伪装。它是“意识形态”,它是“修辞性”的,它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只是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那种宣称有一门可以脱离具体环境的自主的经济科学的说法只是幻想;采纳这种说法,要么是为了自我推销,要么是为了减轻对社会的责任(“作为一种减轻焦虑的机制而发挥作用”)。这部由经济学界的一些初生牛犊完成的专题论文集,显然把目标对准了老派教授,有他们自私的打算。书中重印了伟大的数学边际主义者瓦尔拉斯<sup>[3]</sup>的一些东西,为的是证明,这些老家伙们认为经济学是同力学一样的科学,该是多么匪夷所思。按照他们的分析,像保罗·萨缪尔森<sup>[4]</sup>的《经济学》那样广受欢迎的教科书原来也是在玩弄大量的修辞把戏。当然,这些“解构主

---

[1] 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 1924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

[2]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年-),美国社会学家,著有《现代世界体系》。

[3] 瓦尔拉斯(Leon Walras, 1834-1910年),法国经济学家。

[4] 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 1915年-),美国经济学家,因在经济理论领域做出极其重大的贡献,获得197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义”经济学家意识到,他们对于公认传统的猛烈抨击,也会招致同样颠覆性的批评。它完全是一场游戏;谁的拆解工作做得好,谁就得分。

经济学证明了这一主题:专门知识掌握得越多,其范围和应用性就越小,这着实令人吃惊。令人耳晕目眩的高超理论技巧引出的结论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远,或者说根本导致不出任何结论:这是不确定的领域。政治家要求的是明确的解决办法,对于他们来说,专家简直毫无价值。早在1977年,有人引用一位老牌经济学家的话说,“我们这一行已经破产了”。不足为奇的是,虽说许多职业经济学家不以为然,但情况正如一位作者(弗兰克·哈恩)所抱怨的那样:“业余经济学家……还有非经济学家的看法……应该得到了少与职业经济学家的看法同样多的尊重,或许更多。”他所评论的是肯尼思·J·阿罗<sup>[1]</sup>的论文集(1986年)。

阿罗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纯粹经济学理论家之一,虽说他的名字不像凯恩斯或熊彼特那么家喻户晓,甚至不如哈耶克或弗里德曼<sup>[2]</sup>。同其他许多高级理论家一样,阿罗提供了许多模型,这些模型并没有故意去描述现存的经济问题,它们越来越脱离那个现实,因为它们发现“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规律……不存在确定性”(弗兰克·哈恩)。他们的理论并非没有得到应用,但这些理论太难懂,而且不管怎么说,非常有局限性。当然,对于社会制度进行总体说明,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是过于简单化的做法。从本质上说,这是象棋游戏中高智商棋手内部的一种话语。

像自由市场经济学与国家干预的对立这样紧要的问题,专家们无法达成共识。(哈里·杜鲁门曾大叫:“我要能够提供明确意见的顾问!”<sup>[3]</sup>)他们在非常基本的事情上发生分歧:“如果要争取高水平就业率,那么,在理论上是否会出现市场调节持续失败现象,从而需要政府的干预,或者说,如果需要国家干预的话,应当采取什么样的金融和财政手段……”针对一门学问而展开的这类思考,就技术而言,简直与核物理学一样复杂精细,这表明它在实际应用中是有局限的。选择你最青睐的经济学家。哈罗德·威

---

[1] 肯尼思·J·阿罗(Kenneth J. Arrow, 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man, 1912年-),美国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20世纪下半叶主要保守主义经济学家。

[3] 杜鲁门的原话是:“Give me a one-handed economist! All my economists say, ‘...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尔逊<sup>〔1〕</sup>运气不佳的最后一届政府任命的经济顾问是匈牙利出生的尼古拉·卡尔多。克里斯托弗·约翰逊在评论安东尼·瑟尔沃尔在 1988 年出版的研究卡尔多的著作时说,在讲求实用的人看来,卡尔多是一位有怪癖的教授,但是“在许多学术人看来,他是喜欢政治辩论的人”。玛格丽特·撒切尔任命基思·约瑟夫当经济顾问。在《国家与经济知识:美国和英国经验》(玛丽·弗尔纳和巴里·萨普尔主编)一书中,似乎可以看出,政治家对于经济学家是多么缺乏理解,或者说极少听从他们的意见。

对于人类历史最后一次整体综合,是阿诺德·J.汤因比完成的,上文中已提到,他在 50 年代很走红。他对各种文明的兴衰进行的大气磅礴的探索,显得有些过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它还在依傍实证主义框架去探求“规律”,它身上还有 19 世纪“历史哲学”的味道,虽说这位后来当上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的古典学者,其博大精深远在他的前辈孔德、巴克爾<sup>〔2〕</sup>或马克思之上。他对西方文明病态成因的追索,主要依据的是斯宾格勒的悲观主义精神。他的写作风格是深沉多思、旁征博引,这是与其他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的地方,从而给他打上了最后一位伟大浪漫派的印记。

像这样从容不迫地漫步于 21 种不同的文明之中,寻求它们成长和衰败的共同模式,自然会带来许多快意。可有的历史学家却发现,这种自称发现“规律”的说法,或者说,这种就像对待不同类型的树木那样、区分出许多不相关的文明进行比较的做法,几乎是不能成立的。汤因比的巨著,用他的话说,有“鲸吞万里”之志,事实证明,它具有全球性视野和现代历史学家的技能,而且显示了对于“人类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的永恒兴趣。但是他几乎没有提供答案。在最初产生一阵影响之后,汤因比的名气急剧消退。与《菲尼根守灵夜》相似,《历史研究》是终点。没有人愿意再承担这样的任务。总体性综合已经并非个人力量所能承受了。

法国社会史家的结构主义转向,上文已经提及。历史学家,同其他学科的专家一样,经历了职业化和专业化,他们往往追随以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特征的理论风尚。思想史家负有记载所有这一切的任务,但是他

---

〔1〕 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 1916 - 1995 年),英国工党政治家、联合王国首相(1964 - 1970 年, 1974 - 1976 年)。

〔2〕 亨利·托马斯·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 1821 - 1862 年),英国历史学家,他力求使历史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著有《英国文明史》。

们也不得不屈从于他们自身的、主要是方法论上的专业化。他们进行的理论论争,除了极少数圈里人外,没人能明白。因为,像大多数善于思考的历史学家一样,他们断定,根本没有真正的或确定的历史理解;历史只不过是受到时代局限、话语限制的历史学家所制造出来的特定主观产物。那么,历史知识是怎样获得的呢?在思考这一问题时,他们倾向于对历史著作的结构和修辞进行微妙细致的分析,把历史著作当做另一种文学体裁,当然它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内在或固定的意义。

一些老派历史学家坚决捍卫传统史学,但是他们无可避免地看起来像老顽固。G.R. 埃尔顿<sup>[1]</sup>(《回归本原》,1991年)激烈的长篇演讲中,批评现在流行的社会科学的晦涩术语、半生不熟的理论化、解构主义以及那些愿意将历史当做小说来处理的人。这篇演讲很像以前哈佛大学奥斯卡·汉德林<sup>[2]</sup>的一次演讲。杰弗里爵士<sup>[3]</sup>赞同汉娜·阿伦特和迈克尔·奥克肖特的看法:有关人类政治行为,根本没有理论可言。他在捍卫旧式政治史的时候认为,国家是具有统一性的历史惟一可能的焦点。在这些问题上,社会史家劳伦斯·斯通同意埃尔顿的看法,不过,他在评论埃尔顿的著作时,指责埃尔顿“意气用事、见识浅短,毁谤了过去50年历史、社会科学、文学批评和哲学等领域大多数有影响的人物”。

福柯、德里达、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年鉴学派乃至所有的法国人,都遭到这位杰出英国历史学家的痛斥,说他们故弄玄虚和自命不凡。他的声音是在现代荒野上的呼号,伸张了老派历史学努力发掘整理、精心考辨史实的优点。大部分科学方法论者与这种崇尚事实的做法背道而驰;事实无法替自己说话,我们所见到的事实,是我们受到某种内在“理论”有选择地指引的结果;新的理论使人们看到新的事实,而且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旧的事实。彼得·芒兹<sup>[4]</sup>(《时间的形态》,1977年)的主观主义很接近现代氛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对历史知识的认识,而不是对过去实际发生事情的认识。”而且“所有关于历史真相的讨论都是关于不同的书写历史方式的讨论”。

---

[1] G.R. 埃尔顿(Geoffrey Rudolph Elton, 1921 - 1994年),英国历史学家,以研究都铎王朝著称。

[2] 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 1915年 - ),美国历史学家、教育家,以研究移民问题著称。

[3] 杰弗里爵士(Sir Geoffrey Vickers, 1894 - 1982年),英国著名法学家、作家。

[4] 彼得·芒兹(Peter Munz, 1921年 - ),美国历史学家。



对于学者来说,无论他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还是社会学家,这种极端的“反思”,即方法论上自我意识,有可能导致瘫痪。运动员都知道,过多地考虑你正在做的动作,很可能因自我意识而导致失败。有人提过这样的问题:如果百脚虫在行进当中开始有意识地迈每一只脚,结果会是怎样呢?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论述他们自己写作的过程;他们展开一项研究,即用整本书的篇幅来提出他们的预设、成见和方法论,结果由于“一种认识论上的疑心病”而无法做任何事情。<sup>〔1〕</sup>

社会学家们抱怨说,至有六七种学派,包括功能主义者、行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和象征互动主义者,为争夺各个领域的控制权而展开了复杂的方法论之争。学生还没开始接触上述学派,就已经给这些争吵弄得头昏脑胀了。学生们受到鼓动,从有机论、电脑、逻辑等式、市场、戏剧以及其他事物当中选取他们的基本隐喻,也没有人指导他们哪一样是最佳的——这些只是不同的“视角”而已。这种情况与文学研究面临的情况相似:在文学研究中,有人曾指出,现在学生不是从作品的文本入手,而是从阐释文本的各种理论方法入手。A. W. 古尔德纳在《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1971年)中宣布了他的意图:用另外几卷的篇幅详述“有关各种社会理论的一种系统的和概括性的社会学理论”。当别人做同样事情的时候,有人能够设想出一种有关社会理论的理论的理论——如此延续不已。在1970年,罗伯特·弗里德里克写过一本《社会学之社会学》。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和巴黎知识分子皮埃尔·布迪厄<sup>〔2〕</sup>认为,社会学家必须从研究自身开始,去发现她/他所有的特殊成见和偏好;社会学家是否会走出这种“反思”事业而去进行社会学研究,还不得而知。

当今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史已不同于以往。以往它探讨的是,这些调查者如何受到达尔文和孔德的启发,去寻找一门关于人类发展的科学。现在它探讨的是,这些调查者如何受帝国主义的鼓动,或者由于厌女症、或许因同性恋欲望受到压抑,到海外在不幸的土著人身上宣泄自己的挫败感。

心理学家分化为对立的两极,一方是行为主义者,他们严格排斥任何主观的东西,另一方是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只对内心的主体性感兴趣。内/外这种两极对立,并不能涵盖事情的多样性(“内/外”是一本心理学文选的书名)。按照一位精神病医生的说法,精神失调倍增以及它

〔1〕 见克利福德·格尔茨:《著作与生平:人类学家兼作家》(1988年)。——原注

〔2〕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 - 2002年),法国社会学家。

不断被修正,有可能导致“分化为各种不同的语言”。在1952年版的精神失调分类标准手册上,有60种,在1987版的分类手册上,增长到了250种,至于1992年版的手册就更厚了。令医师们感到郁闷的是,精神病学每隔几年就要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按照那些最聪明的开业医师的说法,每一个案例都不同于其他案例,因此已经不再可能有一门通用学科。

在一个充斥焦虑和忧郁的时代,不曾经历过一场精神崩溃或短期精神病,简直是怪事(有数字显示,有的时期,医疗保险的25%左右用于精神治疗)。心理学成为最热门的学科。心理分析是联系流行文化和智识文化的一个纽带;每一位电影明星都有自己的“精神病医生”。玛莉莲·梦露曾经帮助安娜·弗洛伊德在汉普斯泰德的诊所获得补贴。只要有离奇的事情发生,例如一场奇特的谋杀案(在大多数美国城市里,这种事情每天都发生),充当权威报告人的肯定是心理学家而不是教士或诗人,他受到邀请来发表有针对性的评论。心理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它出现在常用来描述文化现象的术语中,例如“自恋主义文化”。

## 宗 教

自从19世纪基督教产生危机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替代性的宗教,也就是某种信仰似的东西,但并没有成功。在萧伯纳的剧本《真相毕露》中,有一个人物大声叫喊:“我们所有的信念里,都铭刻着那个致命的‘不’字。”在30年代,这种追求曾将西方知识分子领向共产主义,在40年代引向存在主义的虚无,在50年代引向一种默默的顺从<sup>〔1〕</sup>,在60年代引向革命的歇斯底里。但是,想回归传统教会的迹象一直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激发了人们对宗教的兴趣。意大利大作家伊格内佐里奥·西洛内曾是共产党员。他在1946年宣称:“在我们这个革命的时代,重新发现基督教的精神遗产,依然是我们这一代人在过去几年为了良知而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在文学界其他老一辈著名政治家当中,皈依基督教的有奥登、T.S.艾略特、格雷厄姆·格林<sup>〔2〕</sup>和弗朗索瓦·莫里亚

---

〔1〕 在冷战的背景下,阿多诺曾经提倡违心的顺从。

〔2〕 格拉海姆·格林(Graham Greene, 1904 - 1991年),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于1926年改信天主教。

克<sup>[1]</sup>。

牛津和剑桥的学者 C.S. 刘易斯, 是那一代作家中最有才华的人, 他已经找到了通往“纯粹基督教”的道路。他与他的那个“吉光片羽”(inklings) 圈子的其他成员 J.R.R. 托尔金<sup>[2]</sup>和查尔斯·威廉斯一起, 着手为现代人创立一种新的宗教神话。英国作家和电视名人马尔科姆·马格里奇<sup>[3]</sup>为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们在一位大暴君式的人物面前卑躬屈节感到惊恐, 他重新发现了耶稣(《重新发现耶稣》, 1969 年)。阿诺德·汤因比, 在他大受读者欢迎的文明比较研究的巨著的结尾(《历史研究》, 1934 年, 1939 年, 1954 年; 由索默维尔缩写的 2 卷本, 1947 年, 1957 年), 建议人们带着悔罪的心情回到宗教的怀抱中; 他认为高级宗教是历史进程的主要目标。罗杰·加罗蒂在 60 年代脱离了法国共产党, 为的是在共产主义和基督教之间展开一场对话。这些只不过是战后教义复兴之风中的一些现象。

还有一些人值得一提。卡尔·容格一直活到 80 多岁, 德高望重。他对于隐藏在宗教体验背后的普遍象征和原型的兴趣越来越浓。许多学者们致力于探索比较宗教研究。人们从历史和神学角度研究基督教, 其兴趣之浓, 是史无前例的; 可以说, 犹太教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世界犹太人劫后余生致力于发掘祖先的传统。方兴未艾的神学研究产生了一些大人物, 如深受海德格尔影响的卡尔·拉纳<sup>[4]</sup>。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绝对不是惟一的一种存在主义; 在那些被称作基督教存在主义者的人中, 也就是克尔凯郭尔的继承人当中, 有加布里尔·马赛尔<sup>[5]</sup>和保罗·蒂利希<sup>[6]</sup>; 马丁·布伯<sup>[7]</sup>则是一位享有盛名的犹太教存在主义者。在苏联, 长达 60 年的

[1]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 1885 - 1970 年), 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195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 J.R.R. 托尔金(J.R.R. Tolkien, 1892 - 1973 年), 英国小说家和学者。

[3]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 1903 - 1990 年), 作家, 基督教的捍卫者。

[4] 卡尔·拉纳(Karl Rahner, 1904 - 1984 年), 德国耶稣会司铎, 被公认为 20 世纪天主教最杰出的神学家。

[5] 加布里尔·马赛尔(Gabriel Marcel, 1889 - 1973 年), 哲学家、剧作家与哲学家, 通常被认为是最早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6] 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 - 1965 年), 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

[7]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 - 1965 年), 德国犹太教哲学家、《圣经》诠释家、德语散文大师。

政治迫害没有摧毁俄罗斯的教会；教会一直在地下潜伏存在。持不同政见的大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一再重申东正教信条。罗马天主教一直是抵制波兰全面共产主义化的一个堡垒，早在波兰籍教皇保罗二世鼓动波兰 1980 年以来的反叛运动之前就是如此。

可以说，这种经久不息的宗教冲动，与其他领域一样，也出现了同样程度的零散化。自从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各种教派和教会日益增多，但是许多会议和书籍并没有走得太远。基督教世界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大一统运动，试图打破它们之间的藩篱。现代世界孕育了更大的分裂趋势。新的基督教派和神学大量出现。有一些教派和神学几乎把特定的基督教内容剔除在外。在 60 年代颇有争议的是“世俗神学”，它的目标是使教会“有现实意义”。在英国，伍利奇主教宣扬的立场（《对上帝的诚实》），为摆脱基督教在正式教义或礼拜仪式方面特有的一切内容而自豪。教会能够绕过传统的基督教道德，转而依靠“境遇伦理”；它甚至大谈无神论的或不带宗教色彩的基督教。

同样，罗马天主教也遭受一场危机的冲击。这场危机主要表现为以瑞士人汉斯·昆<sup>〔1〕</sup>等左翼神学家的批评以及保守派对教会传统仪式现代化的抵制。拉丁美洲天主教会将天主教的一部分引入左翼政治。这一切似乎说明了，基督教会要么去适应现代世俗世界，要么消亡。但是，假如它去适应现代世俗世界，它不仅背叛了它的传统和疏远了忠实信徒，而且还要冒取消自身的危险。罗马教廷在这些问题上犹豫不定。

教会去适应世俗世界显然会遇到这样一种危险：它会失去一切明显带有基督教特色的东西，正如美国小说家彼得·德·弗里斯<sup>〔2〕</sup>所讽刺的那种分级结构<sup>〔3〕</sup>的惟一神论教会的情况，它们与激进的政治俱乐部没有什么区别。在 60 年代反叛青年中那群“耶稣迷”的信念中，很难看出正统基督教的成分（他们认为救世主是现行体制的死敌），与此同时，学养深厚的神学家们则去除圣经的神话色彩。但也有截然相反的情况，例如美因兹的潘年伯格教授坚持严苛保守的神学思想。

但是，现代都市世界里国际融合的程度越来越高，宗教冲动完全摆脱

---

〔1〕 汉斯·昆（Hans Kung, 1928 年 - ），瑞士神学家。

〔2〕 彼得·德·弗里斯（Peter De Vries, 1910 - 1993 年），美国小说家。

〔3〕 教会分级结构是指，有些教会把信徒分为两级，上层是专职教士，直接蒙受神恩，底层是普通信众，他们的得救有赖于教士。

了古老的基督教或犹太教模式。从基督教科学派(一位澳大利亚人的发明)到统一教会(这是从亚洲进口的),各种教派层出不穷,这有力证明了大众对信仰的需要。各种东西方宗教的混合产物繁盛一时。哈佛大学神学讲座教授哈维·考克斯在《转向东方》一书中声称:“在马萨诸塞大道和博伊斯顿大街交叉口的 20 个街区以内,活跃着 40 至 50 个各不相同的新兴的东方宗教团体。”当然,加利福尼亚在这方面超过了波士顿,而且这种宗教狂热遍布欧洲城市。在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一波宗教原教旨主义从伊斯兰世界席卷而来。在伦敦和巴黎,以及在纽约和洛杉矶,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有一些预言家,类似于伦敦那位自称收到天外信息的约翰·米歇尔,预言这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后者以新的“意识扩张”为标志。这些密码似的词语出现在世俗社会逃避者所聚居的地区。这种情况类似于曾经作为古代世界衰落时代标志的宗教骚动。世界末日的主题无处不在;根据德国的一份报告,甚至儿童文学也从传统的快乐结局转变为关注“心理灾难、暴力、不公正、不应得到的毁灭”(天主教杂志《时代的呼声》,1976 年 11 月号)。大灾变景象大量出现在科幻小说中;这种最受欢迎的文学体裁不再赞美科学奇迹,而是转向想像这个星球、或这个星系、或这个宇宙的彻底毁灭——“等待着终结”。

现代社会造成的种种压力促使人们大量需要心理安慰和指导,而宗教能够带来安慰和指导。自从宗教改革时代以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种精神现象。但是这种新的“宗教意识”最终只能说明现代人心神不安。精神病态、自杀、犯罪、离婚和吸毒等种种迹象,是失范和焦虑的征兆。如果说宗教的功能在于提供一套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统一和稳定社会,那么,这些为数众多的、掠过喧闹都市世界的狂热现象,并没有起到宗教的作用,相反,它们是缺乏宗教的标志。规模宏大的世俗化过程,构成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还在继续进行;现代社会的本质是非宗教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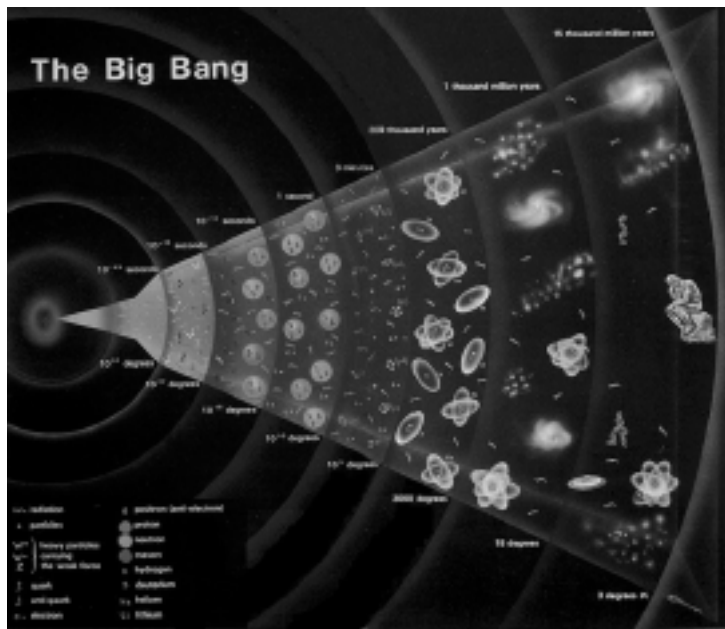
## 科 学

与科学论派相似,许多新的宗教崇拜与科学交织在一起,无论是虚幻的还是真实的、严肃的还是大众的科学。声望卓著的物理学家弗雷德·艾伦·沃尔夫写过一本向普通读者介绍量子力学的书,而他还写了《老鹰的寻求:一位物理学家在萨满世界寻求真理》一书(1992 年)。他去了(美国新

墨西哥州)圣菲市,到都市化的美洲土著萨满教中寻找教诲!人们把萨满教、德鲁伊教<sup>〔1〕</sup>、魔法、巫术像商品一样四处兜售,作为替代性的宗教,或者可能作为心理疗法;大众心理学,在书店里被归为“自我修炼”一类,逐渐变为伪科学和邪教。

由于科学领域不断增生,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知识整合。后爱因斯坦时代的物理学依然没有出现思想综合。正如我们后面要说到的那样,一个多元主义的宇宙表现在,科学家们未能发现某种统一的力。爱因斯坦坚信宇宙有一种秩序。他在晚年致力于研究一种统一场的理论(他死于1955年),通过假定物理实在最终不是由粒子而是由场构成的,试图将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统一起来,将电磁力和重力统一起来。场就是产生影响区域,很像绳子上的结。194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关于这方面的一般理论,但极少有科学家接受。

科学的未来似乎取决于粒子。越来越多的粒子被确认出来,最近已经达到200种左右。它们之间的关系还不清楚。中微子、介子、胶子、几种“夸克”(用“莫名其妙的”和“神秘的”等形容词来修饰)只是先导。夸克和轻子似乎是宇宙的基本建筑材料。现在好像不只有两种,而是四种基本作用力;除了电磁力和重力之外,还有将原子捆绑在一起的“强相互作用”,和将质子和中子捆绑在一起的“弱相互作用”。据称,人们希望最终发现一个公式,将其中几种力联系在一起,但没有人对此有把握。花费几十亿公共资金建造的大型回旋加速器,能够粉碎质子和中子,揭示它们的亚单位。到了80



大爆炸

年代末,最新理论倾向于如下观念:弱相互作用力和电磁力是某种单一力“电弱作用力”的两个部分。超过了一定的能量之后,差别就会消失。在非常高的(无法获得的)能量状态下,强相互作用力和电弱作用力可能会合为

〔1〕 德鲁伊教(druidism),古代凯尔特巫师宗教。

一体——在宇宙开始后的瞬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按照一种理论,五维空间已增加到十一维。有些亚原子的粒子存活时间不足十亿分之一秒,有些显然不占据任何空间。在另一个极端上,射电望远镜显示,存在数以十亿计的星系,每个又包含数十亿颗的恒星,每个恒星体系都像我们的太阳系一样。人们还进而发现了类星体、脉冲星,以及黑洞——黑洞是大质量星体的引力坍缩,导致对光线的吸收,是对爱因斯坦理论的轰动性证实。人们带着兴奋之情进一步了解到,宇宙形成的原始“大爆炸”理论,以及宇宙从这一刻发展到现在的各个阶段。当空间飞行器使科学家们发现地面工具无法探测到的大量射线的时候,这个宇宙波背景巩固了“大爆炸”宇宙模型对“静态”宇宙模型的胜利。1968年,科学家发现了脉冲星——从中子星散发出去的波动,进一步证实了显著是动态的宇宙。



《基因组研究》封面

宇宙,这个原来被当做原始蛋状物或棒球状的东西,变得更小了。如今,人们相信,宇宙最初的体积像原子那么大,尽管它在 100 亿亿分之一秒长到葡萄柚那么大。夸克和轻子在宇宙形成之后存在一秒钟,然后夸克聚集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质子和中子(冷却到足够程度时)发生熔合,形成原子核。接下来,电子绕原子核运动。轻子变成了中微子。重力随即出现。所有这些重新构建过程都是高度想像的、假设的,对于普通人,可能要用不可知论来辩解。大爆炸理论招致批评,然而在 1992 年,据说,从宇宙飞船上的望远镜得到的数据再次证实了大爆炸理论。大爆炸的一条证据是,以

它为基础的理论预见宇宙中各种元素的比例。不过,有一点未能得到解释,星系何以呈旋涡状群集,而不是均匀分布在宇宙中。那些试图追踪这些令人惊奇的物理学前沿的人可能怀疑,语言与现实发生了彻底分离。我们不应把这些作为工具的言语和公式与本体论现实混为一谈,它们之间没有逻辑联系。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之间的争论还在继续。

分子生物学家在令人称奇的遗传学中探索生命的奥秘,即便他们没有

超过揭示奇迹的核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也可以说二者旗鼓相当。遗传分子DNA的发现,是20世纪50年代最引人入胜的一个科学事件。DNA从父母身上遗传给子女,它上面载有经过严密编码的、对人类成长的说明。在80年代,基因工程成为一个迅速发展的行业,这时候基因开始用于治疗人类疾病和繁殖经过品种改良的植物和家畜。在90年代,耗资巨大的项目开始启动;生物学家们对粒子加速器的回应,是一个据估计将在今后十五年左右花费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对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工作。每个人都继承两套DNA,从父母那里各继承一套,据说每套基因包含大约30亿个核苷酸单位。完整地记录下这些核苷酸单位很可能发现以前许多不为人知的基因。正像击破原子一样,这究竟有多大实用价值,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全面理解现实的性质,还不清楚。但是追寻行动还在进行,有时候,科学家把这种追寻过去与寻找圣杯相提并论。在自然用来传播生命信息的复杂晦涩的化学语言中,能够发现它吗?如果能够发现它的话,那么它将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这些项目无论哪一个都离不开计算机,20世纪后半叶的一项神奇发明。微型计算机能够贮存、处理和传递数据,其速度和可靠性远在以前的方法之上,从而成为多重的飞跃。它能够进行以前需要用几百年时间、因而无法实现的计算。它能够描绘或模仿大量的数据材料之间的关系,开拓全新的知识领域。每隔几年就会有速度更快的计算机芯片面世。计算机屏幕上能够显示宇宙三维图像,能够模拟一座建成后的建筑物,供建筑师核查。在象棋比赛中,计算机能够战胜绝大多数人类选手,它们能够从几百万种可能性中计算出最佳走法,但是它们不能筹划战略。人工智能引起了“认知科学家”的极大兴趣。不过计算机也能够“模拟现实”,这样一来,如果现实中的人通过计算机以及其他通讯形式做爱的话,(据推测)他们还可以继续发展。

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奇迹都是从图灵计算机时代开始的。迈克尔·沙利在《硅神》(1984年)一书中宣布,集成电路革命有非人化的作用。但是,正如他所认识到的,这只是电话所开启的那场革命的延续。与此同时,他还得面对传真机革命。这种坚定的地平协会<sup>〔1〕</sup>心态(它早在托尔斯泰以及其他反物质主义者那里就已经有著名先例了),引起了我们的钦佩之情,

---

〔1〕 地平协会(Flat Earth Society)是1993年建立的一个北美、英国和澳大利亚跨国玄学协会,拒绝现有的科学解释,自创一套对宇宙的玄妙解释。



同时令我们觉得有趣。沙利斯先生可能是在电脑上写这本书的,他可能一边写,一边听光盘里的音乐,他可能借助图书馆的电子设备来检索信息;他的写作可能因为看牙医或看病而中断,而由于医疗技术进步,看病比以往更舒适。极少有人会拒绝所有这些现代的便利条件。在文化上,这意味着能够通过录像机和电视机,将电影、戏剧、音乐会、歌剧以及体育赛事原封不动地搬进家里,大大增加了高雅文化以及低俗文化受众的数量。

## 艺 术

该怎样评论当代艺术呢?一提到这个问题,数量惊人、支离破碎、商品化、怪诞、活力四射等字眼就闪现在我们的脑海里。肯·贝恩斯在 20 世纪 60 年代评论当代先锋派时宣称:“艺术家争取自由的勇敢呼号已变为小丑式的呐喊了。”对于艺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它已经分解成一个又一个哗众取宠的噱头。尼采曾经预言,一旦脱离古典规则和界线的束缚,就会出现“艺术解体”。第一代实验艺术家体验过一种使人振奋的自由;但是,用斯蒂芬·斯彭德<sup>[1]</sup>的话说,“接下来就会导致一种更新的和更彻底的支离破碎局面,晦涩难懂,没有任何目的地讲求形式(或者说无形式可言)。”永无休止地寻求新奇会导致益发怪诞的浅薄空洞,这是严肃艺术死亡的先兆。

近几十年来,艺术的特点是,流行风尚一阵接一阵地出现,而且一阵比一阵怪诞。“观念派”艺术家根本不动手去画,他们出绘画点子,把它们当做让你自己动手装配的元件卖掉。在 50 年代,“波普”艺术家绘制盛汤的器皿和成管的口红。简约主义也在大型作品中现身,例如被大肆宣扬的保加利亚裔艺术家克里斯托的雕刻作品:用织物包装的洛矶山脉或比斯开湾(在 1962 年,他的习作只是用织物包装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但是每一年都推出新的风格。

这一切很容易遭到攻击;早在 1956 年,诺埃尔·考沃德<sup>[2]</sup>的剧作《裸体与小提琴》里的一个人物说:“我想再也没有懂绘画的人了。艺术,像人

---

[1] 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 1909 - 1995 年),英国诗人。

[2] 诺埃尔·考沃德(Noel Coward, 1899 - 1973 年),英国剧作家、演员和作曲家。

性一样,已经失控。”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人文学者雅克·巴赞<sup>〔1〕</sup>在《艺术的用途及滥用》(1974年)一书中,赞同这位著名英国讽刺剧作家的意见:“我们在一切艺术中看到的……是500年的文明一扫而光。”从来没出现过这么多艺术。艺术得到补贴、宣传和吹嘘,成了猎取权力和声誉的法宝。(在战后几十年中形成的、如今方兴未艾的艺术史这门学术性学科,出现了一部比较怪异的著作。该书作者是一位年轻的艺术史家,他在60年代变成左翼人士,或者反过来说,他是60年代的左翼人士,转变为艺术史家。这本书宣称,在1945年后,艺术风尚的领导地位从巴黎转移到纽约,这是一个冷战阴谋,很可能是有名的鉴赏家总部——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的。这本书是那种拚命东拉西扯的典范。<sup>〔2〕</sup>)



〔1〕 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 (1907年)1997年),法裔美国文化史专家。

〔2〕 瑟奇·吉尔豪特:《纽约如何盗用现代艺术理念》(1983年)。杰克逊·波洛克和抽象表现主义在纽约地位提高,的确得力于广告宣传,一些著名的艺术批评家和《生活》杂志也参与这一宣传活动。——原注

为了抗击理性化的科层社会——工作的单调、闲暇时间的无聊、科学以及商业扼杀灵魂的实用倾向——人们需要艺术,就像需要宗教一样。艺术挺身而出,对抗骨子里与审美背道而驰的社会主流。艺术批评社会主流而且提供取代它的办法,或者说是解脱方法——为群众提供娱乐,即无神社会里麻醉人民的鸦片。那种将艺术视为激进批判手法的看法,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肆无忌惮的先锋派艺术却成了一种大生意,差不多是最大的生意。从纽约到东京,到阿布扎比(阿联酋首都),资本家们投资艺术,认为这是最好的投资方式。投资者用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购买早期现代主义者的绘画,如凡高和毕加索等人的作品,而当年这些画根本卖不出去。政府经常把现代艺术放在显眼的公共场所,常常让市民感到沮丧。(愤怒的市民起来反对损害城市空间和经济利益的雕塑作品,引起了一系列的冲突。)<sup>〔1〕</sup>

人们竭力理解这一切,但这种理解本身也越来越怪诞。伦敦批评家罗伯特·休伊森试图对此进行总结。他宣布,现代主义艺术已经死亡,不同的事物开始出现;他试着论述“多元主义网络”(团块之间的信使),一种关注自我形象的纯粹个人艺术,但同时也是“社会超现实主义”(《将来时:90年代的新艺术》,1990年)。“超越先锋派”的含义简直包罗万象。反对高雅的现代主义者,反对他们的抽象图案和自命不凡的象征主义,由此甚至导致接受旧式现实主义绘画形式;体现19世纪中产阶级趣味的绘画过去遭到人们嘲笑,现在居然也值得举办一个展览(巴黎,1978年)。按照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拉斯维加斯的建筑不应被贬为垃圾,朋克文化也不应遭到不公正的诋毁。不过通常来讲,电视尚未得到宽容对待,它的商业广告形象依然被认为体现了“大公司的利益”,而且具有腐蚀作用。

广义上的艺术,最能表现一个时代的精神。尼采认为艺术创作是最高贵的人类任务。他主张艺术应当是高度共有的、与宗教相关的。著名艺术批评家希尔顿·克雷默评论说:“我们的文学,就像我们的政治一样,已经分裂成为许多争吵不休的利益集团。”艺术的支离破碎反映了当今西方文化的处境。在这个支离破碎的过程中,艺术家感受到的痛苦超过了任何人。现代诗人、戏剧家还有画家的悲剧生活揭示出这一点。个体感受与公共文化之间的冲突,或许在美国最为尖锐,那里发生了一个又一个的个人

---

〔1〕 希尔顿·克雷默记述过这样的一次事件,见“广场上的人质劫持”TLS .11月8日,1991年。——原注

恐怖的故事,其中包括诸如哈特·克莱因<sup>[1]</sup>、罗伯特·洛威尔<sup>[2]</sup>、约翰·贝里曼<sup>[3]</sup>、田纳西·威廉斯<sup>[4]</sup>、杰克逊·波洛克<sup>[5]</sup>以及其他许多无法一一提及的大艺术家发疯、酗酒、自杀和短命的故事。不过,欧洲也好不到哪里去;看看以下的案例便可知道:弗吉尼亚·伍尔芙、伟大的德语诗人保罗·策兰(保罗·安切尔)以及马尔科姆·劳里<sup>[6]</sup>都患上了间歇性精神崩溃,伍尔芙和策兰最后自杀身死,安东尼·伯吉斯<sup>[7]</sup>精神失常,正如他在自传所叙述的那样。

这里没有足够的篇幅讨论文学。小说多得像森林中的树叶,还有大量的诗歌、戏剧、自传、历史。1927年,伍尔芙就预见现代小说的形态,它未来呈现的模式,“风马牛不相及事物的怪异组合,现代的心灵。”事情的确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正如罗杰·弗莱伊<sup>[8]</sup>在评论现代艺术时所说的那样,艺术越来越不是去试图模仿生活,而是去发现相当于生活的东西——替代的现实。

有人可能会大胆总结说,在所有严肃题材中,当今最盛行的是文学传记。个人生平从来都是颇具吸引力的;著名作家的生活,通常既饱受折磨又引人注目,既有丑闻又有成功,是最佳素材。在电子设备的辅助下,现代学术能够积累和组织堆积成山的材料。在心理学见解之外,可以再添加一点高级文学理论;现代思想中充斥的一切新奇方法论都可以聚焦于某一目标。不让淫欲好奇心窥视私人事情的藩篱和禁忌逐渐被打破(作家和演员毫无拘束地描述他们的痛苦和罪恶)。传记作者可以赞美意识形态英雄,也可以恶毒地贬损敌人,可以展示社会的罪恶或考察个体的过失。一个已

[1] 哈特·克莱因(Hart Crane, 1899 - 1932年),美国诗人,后来跳海自杀。

[2] 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 1917 - 1977年),美国诗人,自1949年患精神病症,间歇住院,死于心脏病。

[3] 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 1914 - 1972年),美国诗人,曾患有癫痫、神经衰弱。

[4] 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 1911 - 1983年),美国剧作家,长期酗酒和服药。

[5] 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 - 1956年),美国画家、抽象表象主义的主要代表,死于车祸。

[6] 马尔科姆·劳里(Malcolm Lowry, 1909 - 1957年),英国小说家、诗人。

[7] 安东尼·伯吉斯(Antony Burgess, 1917 - 1993年),英国小说家、批评家。

[8] 罗杰·弗莱伊(Roger Fry, 1866 - 1934年),英国美术批评家和画家。

经被写了好多遍的主题,当然还可以重写;众所周知,每一项研究都有所不同,但决不会降低真实性,而且有一种文化上的健忘症涤除了人们对几年前所写传记的记忆。精英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差距减小,这意味着题材范围可以扩大;电影明星同文学巨匠一样出色。对他们同样可以进行符号学分析,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

最重要的是,个体生平是可以驾驭的,而整个文化、国家、城市已经变得太大了;而且,人们普遍觉得,只有个体才是实实在在的。结构主义企图消除个性,但没有成功;现在人们对这些话语的囚徒如此感兴趣,这种热情是前所未有的。即便说某种传记是一种反传记,它研究的对象还是个体的人。传记、回忆录、自传以及改头换面的传记或自传性小说大大走红,这绝对说明了文化的原子化。正如近年某些作家所认为的那样,如果说我们处在“历史的终结”处,那么我们周围只剩下浩瀚如海的个人生活。

## 结 语

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对于西方文明传统的生存本身出现了悲观看法。美国全国人文学科基金委员会主席林恩·切尼在呈交美国国会的一份人文学科状况的报告中指出,在美国 37% 的学院和大学中,无须修任何一门历史课就可以拿到学位,在 45% 的院校中无须上文学课即可拿到学位,在 62% 的院校中无须上哲学课即可拿到学位。1992 年,希尔顿·克雷默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美国文学的“严酷局面”。他抱怨说,即使修文学课,学生们也是看电影或看连环漫画,而不肯读经典著作。(“今天美国的大学本科可能更熟悉艾丽斯·沃克<sup>〔1〕</sup>,而不是托马斯·哈代或亨利·詹姆斯。即便研究这两人的小说,他们考察的可能也是这两位作家在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方面的倒退看法。”他们很可能去看那些令他们昏头昏脑的论述低俗文化的高级理论。)欧洲的情况略微好一些。都市流行文化在青年人当中引发出一股狂热的厚今薄古潮流,轻视任何旧有的东西。

不过,这类抱怨早已有之,不绝于耳。“人们不再看书,不再有时间。精神高度分散,稍纵即逝。这种不允许延续或深思的加速运动……将会彻底毁掉人类的理性。”这话听起来好像是最近才有的抱怨,但它是拉梅内<sup>〔2〕</sup>在 1819 年说的。马修·阿诺德在评论下层民众病态的仓促忙乱和目标不专一时也重复这一论调,说下层民众遭受了社会变迁的不断冲击和旧有价值观的毁灭。150 年前,克尔凯郭尔说,精神“让过多的知识给弄糊涂了”。知识分子差不多总是认为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水准降低了。我们不得不

---

〔1〕 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1944 年 - ),当代美国女作家,1983 年因《紫色》获普利策奖。

〔2〕 拉梅内(Flicit Lamennais,1782 - 1854 年),法国天主教哲学和政治著作家。

带着几分慎重的态度来看待当前的抱怨；高雅文化总是少数人的专利。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人受过教育，从来没有这么多种类的文化产品可资利用。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英国，每一学年都有 200 多万人研修某类高等教育课程；有 30 万全日制在读大学生。25% 以上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不妨比较一下 1900 年的情况，当时只有 1% 的人口上过大学，工人阶级家庭只有 1% 的人读到中学。（如果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技能有限的体力劳动者都算作工人阶级的话，工人阶级已经从人口比例的 70% 左右降到 30%。）

现在看来，对于人数不断增加的群体来说，严肃的艺术、文学、音乐、戏剧和思想越来越重要了。这些都是赚大钱的生意。我们看到，交响乐团付给乐队指挥的薪水与足球运动员和摇滚乐乐师所得的报酬相此并非过于寒酸，像帕瓦罗蒂这样的歌剧演唱者取得了世界巨星的地位，绘画作品以百万元的价格出售，成功的小说家赢得大量的忠实读者。这些小说家可不都是在生产文字垃圾。当然，现在闲暇时间要比从前多了许多；医学的进步使人的寿命增加了三分之一，通常这是退休后的时间。

显然有许多人还生活在伟大的创造性作家所创造的世界里。许多年前，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过：“对于我们而言，越来越现实的生活是虚构的生活。”据报道，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仅法文版就卖了 600 万册。人们在小说之中游览了重要的地方。1982 年，数以千计的人从世界各地突然赶到有些不知所措的都柏林，参加“布鲁姆日”活动，庆祝乔伊斯诞辰一百周年，搬演《尤利西斯》中的场面。在他们看来，小说中的这些场面比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更真实、更有趣。《儿子与情人》、《布登勃洛克一家》、瓦格纳的《尼布龙根的指环》都搬上了电视；令人难忘的电影《小杜丽》<sup>〔1〕</sup>，以及其他许多通过录像机进入家庭、从而成为家庭常见的故事片，让亿万人欣赏到了文学经典名著。严肃思想家，例如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萨特、维特根斯坦、爱因斯坦和德里达，差不多像小说作家或诗人那样，成为人们的崇拜偶像。无法否认，当代社会固然有反智识的粗俗，（毕竟获得报酬最高的英雄是运动员和流行歌曲明星），但它也在消费文化，而且其消费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社会现代化的整个宏伟过程是迫使个体进入幻想世界的原因。直到最近时期，建立在牢固的家庭基础上的社会，利用慈爱、关怀和从孩提时代

---

〔1〕 《小杜丽》改编自狄更斯的同名小说。

到老年的各种仪式性活动,还为大多数人——不仅仅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提供了一个人类关系的网络。今天,个体可能更加孤独,或许因为密切的人类接触几乎不存在;孩子越来越少,家庭生活远不如从前丰富,而家人住处更加分散,相隔甚远。人们更有可能在图书、电影、电视节目中寻找发泄情感的途径。

与现代化同步进行的是,智识生活发生了一个最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产生了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在许多方面脱离了社会的其余人等。这一变化肯定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一位研究19世纪中期实证主义者的学者,曾论及这一事实,即那些批评自己所在社会的实证主义者,只算半个反叛者,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构成了另外一个社会。尽管罗素喜欢批评时政和对凡事持否定态度,但他感到震惊的是,20年代的人与自己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疏远社会的态度更坚决。他们已经对这个社会表示绝望;而罗素还是作为其中一分子来说话的。从那以后,经过共产主义、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我们可以几乎不带夸张地说,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开始走自己的道路。当然,我们可能把这种否定现实世界的态度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的象征主义者,如果不继续往上追究的话(就某些方面而言,第一位现代作家是塞万提斯。他笔下的唐·吉珂德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所经见的世界不像书上所写的那样)。“知识分子”这个词,表示的是遗世独立、卓尔不群的那一类人。它的出现是一种世纪末现象。

不过,事情从来不是绝对的。拉尔夫·达伦多夫<sup>[1]</sup>这位进入公共生活的著名社会学家,在《心灵内外的旅程》一书中提到了雷蒙·阿隆和亨利·基辛格——他们都是学者、历史学家、知识分子型的新闻工作者,发挥了重要的公共作用,但未尝没有付出代价:遭到心怀嫉妒的学术同事的诋毁,被讲求实际的政治家指责为书生论政。达伦多夫评论说,阿隆“距离权力太近从而无法影响思想,(他又)距离权力太远从而无法影响行动”。然而,至少这类人物几乎可以填平思想与行动、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巨大鸿沟。(在意识形态上)大相径庭的经济学家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都努力成为名声远扬、同时在思想上备受尊重的人。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up>[2]</sup>这类严肃科学家也写畅销书。无独有偶。少数人

[1] 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1929年-),德国社会学家。

[2]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进化论动物学家。



能够一边搞严肃的学术著作,一边写通俗的历史或传记,尽管做到这一点很困难。公众似乎既推崇骗子又推崇天才,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应当产生医治当今肆虐的诸多社会病症的功效。尤其在青年人当中,自杀、疯癫、吸毒以及犯罪的比例已经触目惊心,引起了社会的忧虑。欧文·克里斯托尔<sup>〔1〕</sup>等人对这一现象迷惑不解:自从1945年以来,“普通市民的经济富裕和经济保障达到一定的水平,在当时看来,这简直是幻想”,凭这一点,20世纪的后50年就可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出色的50年,然而,“与这一经济进步相伴生的是一股从未预见到的、社会解体 and 道德迷失方向的潮流”,具体表现是“犯罪率激增,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青年未婚先孕、吸毒和打胎。在欧洲,在伦敦和苏黎世等城市的中心地带,近年出现了奇装异服的年轻人吸毒或酗酒的情景,这已成为当地特色,大概他们不想在没完没了的“精神恍惚”状态下活得太长。

“从未预见到的”这个形容词在这里用的并不恰当;凡是熟悉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在19世纪末,现代性的社会危机促使韦伯、滕尼斯、涂尔干、勒邦、索雷尔以及几乎所有的严肃思想家对它做出充满焦虑的论断。按照韦伯的说法,在这个“铁笼”里囚禁着失去根柢的、都市化的、幻想破灭的现代人。遵循韦伯的思路涌现出大量的关于个体陷入“双重束缚”的讨论:个体的意识大大丰富,超出了以前的知识范围,他们可以从许许多多让人困惑不解的选项中任意做出选择,但是经济制度要求他们适应一个过于专门化的、极端复杂的有机体——要求他们成为一台巨型机器上的齿轮。而且这种职业专门化甚至侵入了知识领域,这个领域开始四分五裂,出现了一大堆彼此几乎毫无联系的分支。

在不知所措的职业心理治疗医生数量大增、政治煽动风行的时代,极少有人注意到对教育的需要。只有教育才会满足那些渴求有意义的文化世界的饥饿心灵。饥饿的羊群发现了适合它们的拙劣货色。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而言,不可企及的、排外的、精英主义的学术思想世界,现在没有什么帮助的。有一个人很晚才了解思想史,他从监狱中给我写信说:“我早应读一读托马斯·曼,不该看西德尼·希尔顿的畅销小说。想到这儿,我心里就难受。”

---

〔1〕 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 1920年-),美国评论家,杂志编辑,新保守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

耶稣会士德日进<sup>〔1〕</sup>将精神及其产物的领域命名为“精神圈”。他和朱利安·赫胥黎都暗示说,这个由“先民们大胆的推测和积极向上的理想、井井有条的科学知识、古人年代久远的智慧、全世界诗人和艺术家的创造性想像”所构成的广阔领域(朱利安·赫胥黎语),现在已经毫无条理,大部分内容“四处散落闲置”。今天,它患上了一种文化上的早老性痴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试图应付紧急的社会问题时,我们没有使用大量的相关分析。

一个世纪以前,恩斯特·勒南说过,沉湎于过去,可以逃避当下的沉沦时代;“那里(过去)的一切都是美的、文明的、真实的、高贵的。”在他的这个“思想乐园”中,他感觉自己可以稳稳当当地对付逆境。或许我们必须回到这个主题,因为这是我们为了生存而寻访前人言论和思想的主要理由。

---

〔1〕 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 - 1955年),法国哲学家和古生物学家。

# 索引

## 人名

- |                         |                          |
|-------------------------|--------------------------|
| Abelard, Peter          | 阿伯拉尔,彼得(3,6,8,377)       |
| Abraham, Karl           | 亚伯拉罕,卡尔(386)             |
| Action, Lord John       | 阿克顿,约翰,勋爵(214,310)       |
| Adams, John             | 亚当斯,约翰(84,192)           |
| Adam, Mme . Juliette    | 亚当夫人,朱丽叶(409)            |
| Addison, Joseph         | 艾迪生,约瑟夫(114,187,197)     |
| Adler, Mortimer         | 阿德勒,莫蒂莫(导论:6)            |
| Adorno, Theodor         | 阿多诺,西奥多(489,546,550)     |
| Aeschylus               | 埃斯库罗斯(382,517)           |
| Agassiz, Louis          | 阿加西斯,路易(323)             |
| Alain (Emile Chartier)  | 阿兰(爱弥尔·夏蒂埃)(507)         |
| Alain - Fournier, Henri | 阿兰—富尼埃,亨利(431)           |
| Albert of Saxony        | 萨克森的艾伯特(14,29)           |
| Albertus Magnus         | 大阿尔伯特(29)                |
| Alexander I of Russia   |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236,239,246)  |
| Alexander II of Russia  |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399)          |
| Alexander, Samuel       | 亚历山大,塞缪尔(379)            |
| Althusser, Louis        | 阿尔都塞,路易(555,556,558,564) |
| Amalrik, Andrei         | 阿玛尔利克,安德烈(557)           |
| Amis, Kingsley          | 艾米斯,金斯利(519,543,547)     |
| Anaximander             | 阿纳克西曼德(317)              |
| Anderson, Sherwood      | 安德森,舍伍德(462)             |
| Andreyev, Leonid        | 安德烈耶夫,列昂尼德(430)          |

- Anquetil - Duperron, Abraham 安吉提尔—杜佩隆,亚伯拉罕(186,234)
- Anselm, St . 安瑟姆,圣(2,8,50)
- Apollinaire, Guillaume 阿波利奈尔,纪尧姆(569)
- Aquinas, Thomas 阿奎那,托马斯(2,4,9,10,29,50,67~70,291,332,447,489,539)
- Aragon, Louis 阿拉贡,路易(461,482)
- Ardigo, Roberto 阿尔狄哥,罗伯托(293)
- Arendt, Hannah 阿伦特,汉娜(532,611)
- Aretino, Pietro 阿雷蒂诺,皮特罗(201)
- Aristarchus of Samos 萨莫斯岛的阿里斯塔库斯(30)
-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2,6~10,14,19,28~32,42~44,50,53,66~70,78,116,141,159,178,221,277)
- Arminius 阿明尼乌(73)
- Arnold, Matthew 阿诺德,马修(4,101,197,250,296,302,348,349,351,352,407,625)
- Arnold, Thomas 阿诺德,托马斯(250)
- Aron, Raymond 阿隆,雷蒙(523,530,533,627)
- Arrabal . Fernando 阿拉巴尔,费南多(578)
- Arrow, Kenneth 阿罗,肯尼思(609)
- Auclert, Hubertine 奥克勒尔,于贝汀(576)
- Auden, W .H . 奥登,W .H .(304,358,450,465,468,472,482,539,541,613)
- Augustine, St . 奥古斯丁,圣(导论:3,正文:2,4,6,52)
- Austen, Jane 奥斯汀,简(347)
- Austin, J L . 奥斯汀,J.L .(540)
- Aveling, Edward 艾威林,爱德华(335)
- Ayer, A J . 艾耶尔,A J .(497,506)
- Baader, Franz von 巴德尔,弗朗兹·冯(239)
- Babeuf, Francois 巴贝夫,弗朗索瓦(209,269)
- Bach, Johann Sebastian 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199)
- Bacon, Francis 培根,弗朗西斯(1,21,31,39,45~49,120)
- Bacon Roger 培根,罗吉尔(29)
- Baer, Karl von 贝尔,卡尔·冯(325,331)
- Bagshot, Walter 白哲特,沃尔特(297)
- Bakhtin, Mikhail 巴赫金,米哈伊尔(574)

- Bakunin, Mikhail 巴枯宁, 米哈伊尔 (303, 390, 399, 401)
- Baldick, Chris 鲍迪克, 克里斯 (590, 595)
- Baldwin, Stanley 鲍德温, 斯坦利 (443)
- Balfour, Arthur J. 贝尔福, 亚瑟·J. (313)
- Balzac, Honoré de 巴尔扎克, 奥诺雷·德 (229, 243, 249, 256, 272, 303, 354, 501)
- Bancroft, George 班克罗夫特, 乔治 (311)
- Barbusse, Henri 巴比塞, 亨利 (482)
- Barclay, William 巴克利, 威廉 (79, 80)
- Barrès, Maurice 巴雷斯, 莫里斯 (377, 412, 430, 443, 474)
- Barth, Karl 巴特, 卡尔 (447 ~ 449, 489)
- Barthes, Roland 巴特, 罗兰 (563, 568)
- Barzun, Jacques 巴赞, 雅克 (620)
- Baudelaire, Charles 波德莱尔, 夏尔 (282, 356 ~ 358, 361, 364, 369)
- Baudouin, Francois 博杜安, 弗朗索瓦 (19)
- Bauer, Bruno 鲍尔, 布鲁诺 (298, 407)
- Baur, Ferdinand C. 鲍威尔, 费迪南·C. (287)
- Baxter, Richard 巴克斯特, 理查德 (74, 75)
- Bayle, Pierre 培尔, 彼埃尔 (106 ~ 108, 124, 125, 129, 145, 157, 171, 173, 275)
- Baynes, Ken 贝恩斯, 肯 (620)
- Beauvoir, Simone de 波伏瓦, 西蒙·德 (510, 569)
- Bebel, August 倍倍尔, 奥古斯特 (397)
- Beccaria, Cesare, Marquis de 贝卡里亚, 切萨雷, 侯爵 (141, 190, 193)
- Beckett, Margaret 贝克特, 玛格丽特 (586)
- Beckett, Samuel 贝克特, 塞缪尔 (541)
- Becquerel, Henri 贝可勒尔, 亨利 (454)
- Beesly, E. S. 比斯利, E. S. (293)
- Beethoven, Ludwig van 贝多芬, 路德维希·范 (216, 217, 228, 243)
- Belinsky, Vissarion 别林斯基, 维萨里昂 (284, 289, 399)
- Bell, Daniel 贝尔, 丹尼尔 (589)
- Bella, Ben 贝拉, 本 (545)
- Bellarmino, Robert, Cardinal 贝拉明, 罗伯特, 大主教 (78)
- Belloc, Hilaire 贝洛克, 希莱尔 (393)
- Benda, Julien 本达, 于连 (444, 473)
- Benedict XIV, Pope 本尼迪克特十四世, 教皇 (140, 192)

- Benjamin, Walter 本雅明, 瓦尔特(503,550)
- Bennett, Arnold 本涅特, 阿诺德(428,469)
- Benoist, André de 伯努瓦, 安德烈·德(598)
- Bentham, Jeremy 边沁, 杰里米(170,172,257~262,266,343)
- Bentley, Richard 本特利, 理查德(62)
- Berdyaev, Nicolas 别尔嘉耶夫, 尼古拉(369,385,423,448,481)
- Berg, Alban 贝尔格, 艾尔班(375)
- Bergson, Henri 柏格森, 亨利(导论:6,正文:328,370,376~380,385,419,421,428,440)
- Berkeley, George 贝克莱, 乔治(59,64,117,118,121,133,164~167,219)
- Berlioz, Hector 柏辽兹, 埃克托尔(242)
- Bernanos, Georges 伯纳诺, 乔治(289)
- Bernard, Claude 贝尔纳, 克劳德(292)
- Bernard, St . 伯纳尔, 圣(4,6,21)
- Bernini, Giovanni 贝尔尼尼, 乔万尼(24,26)
- Bernstein, Eduard 伯恩斯坦, 爱德华(397,398)
- Berryman, John 贝里曼, 约翰(357,623)
- Berthelot, Pierre 贝特洛, 彼埃尔(297)
- Bertier, Ferdinand de 贝尔蒂埃, 费迪南·德(351)
- Besant, Annie 贝赞特, 安妮(372,394,422)
- Beveridge, William 贝弗里奇, 威廉(513)
- Beza, Theodore 贝扎, 泰奥多尔(72)
- Binswanger, Ludwig 宾斯万格, 路德维希(507)
- Bismarck, Otto von 俾斯麦, 奥托·冯(391,396,405,412)
- Blake, William 布莱克, 威廉(126,155)
- Blanc, Louis 勃朗, 路易(279,280,311)
- Blanqui, Adolphe 布朗基, 阿道夫(272,279)
- Blavatsky, Helena 布拉瓦茨基, 海伦娜(416,422,423)
- Bloch, Marc 布洛克, 马克(564)
- Bloy, Leon 布洛瓦, 莱昂(423)
- Blum, Leon 布鲁姆, 莱昂(398,486)
- Blunden, Edmund 布兰登, 爱德蒙(502)
- Blunt, Anthony 布伦特, 安东尼(483,525)
- Boccioni, Umberto 波丘尼, 安贝托(431)
- Bodin, Jean 博丹, 让(19,20,79,80,142,176)

- Boehme, Jacob 伯麦,雅各布(125)
- Bohr, Niels 波尔,尼尔斯(456~458,515)
- Boileau, Nicolas 布瓦洛,尼古拉(98~100)
- Bolingbroke, Henry St. John 博林布鲁克,亨利·圣·约翰(119,133,138)
- Bonald, Louis de 博纳尔,路易·德(253~256)
- Bonaparte, Marie 波拿巴,玛丽(570)
- Bonaparte, Napoleon 波拿巴,拿破仑(见拿破仑)
- Bonhoeffer, Dietrich 朋谔斐尔,迪特里希(511)
- Bonhoeffer, Karl 朋谔菲尔,卡尔(511)
- Booth, Charles 布思,查尔斯(393)
- Borelli, Giovanni 博雷利,乔万尼(37,60)
- Borromini, Francesco 普罗米尼,弗朗西斯科(26)
- Bosanquet, Bernard 鲍桑葵,伯纳德(291)
- Bouglé, Célestin 布格莱,塞勒斯坦(408)
- Bourdieu, Pierre 布迪厄,彼埃尔(612)
- Bourgeois, Leon 布尔茹瓦,莱昂(392)
- Bourget, Paul 布尔热,保罗(408)
- Bousset, Jacques, Bishop 波舒哀,雅克,主教(22,79,99,103,104,107)
- Boyle, Robert 波义耳,罗伯特(40,47,53,60,91)
- Bradlaugh, Charles 布拉德洛,查尔斯(372)
- Bradley, Francis H. 布雷德利,弗朗西斯·H.(导论:6,正文:291)
- Brahe, Tycho 第谷(34,37,41,58)
- Bramhall, John, Bishop 布拉姆霍尔,约翰,主教(90)
- Brasillach, Robert 布拉希拉克,罗伯特(443,474)
- Brecht, Bertolt 布莱希特,贝托尔特(482,486)
- Brezhnev, Leonid 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556)
- Briand, Aristide 白里安,阿里斯蒂德(392)
- Briffault, Robert 布赖福特,罗伯特(501)
- Bright, John 布赖特,约翰(264,267,277,309)
- Brissot, Jacques 布里索,雅克(206,208)
- Broad, C. D. 布罗德,C. D.(422)
- Brod, Max 布罗德,马克斯(445)
- Broglie, Louis de 布罗意,路易·德(456,457)
- Bront sisters 勃朗特姐妹(347)
- Brooke, Rupert 布鲁克,鲁珀特(431)
- Brooks, Van Wyck 布鲁克斯,范·威克(448)

- Brophy, Brigid 布罗费, 布尔吉德(572)
- Brougham, Henry 布鲁厄姆, 亨利(261)
- Brown, Thomas 布朗, 托马斯(171)
- Browne, Sir Thomas 布朗, 托马斯, 爵士(59)
- Browning, Elizabeth Barrett 勃朗宁, 伊丽莎白·巴雷特(346)
- Browning, Robert 勃朗宁, 罗伯特(354)
- Brunner, Emil 卜仁纳, 爱弥尔(313, 447)
- Bruno, Giordano 布鲁诺, 乔达诺(39, 54, 505)
- Bryan, William Jennings 布莱恩, 威廉·詹宁斯(368)
- Bryce, James 布莱斯, 詹姆斯(346)
- Buber, Martin 布伯, 马丁(385, 425, 448, 479, 614)
- Buckland, William 巴克兰, 威廉(318)
- Buckle, Henry T. 巴克尔, 亨利·T.(310, 329)
- Buffon, Georges, Comte de 布丰, 乔治, 伯爵(146, 174, 185, 317)
- Bultmann, Rudolf 布尔特曼, 鲁道夫(448, 489)
- Bunyan, John 班扬, 约翰(109)
- Buonarrotti, Filippo 邦纳罗蒂, 菲利普(209)
- Burckhardt, Jacob 布克哈特, 雅各布(104)
- Burgess, Anthony 伯吉斯, 安东尼(623)
- Burgess, Guy 伯吉斯, 盖(483, 525)
- Burgess, John W. 伯吉斯, 约翰·W.(479)
- Buridan, Jean 比尔当, 让(14, 29)
- Burke, Edmund 柏克, 爱德蒙(170, 172, 184, 204, 207, 210 ~ 214, 231, 250, 333, 532)
- Burlington, Richard Boyle, Earl of 伯林顿, 理查德·波义耳, 伯爵(113)
- Burne-Jones, Edward 伯恩-琼斯, 爱德华(419)
- Burnham, James 伯纳姆, 詹姆斯(493)
- Burns, Robert 彭斯, 罗伯特(243)
- Bury, J. B. 伯里, J. B.(292)
- Busch, Wilhelm 布施, 威廉(224)
- Butler, Joseph, Bishop 巴特勒, 约瑟夫, 主教(572)
- Butler, R. A. 巴特勒, R. A.(530)
- Butler, Samuel(1612 - 1680) 巴特勒, 萨缪尔(1612 - 1680年)(109)
- Butler, Samuel(1835 - 1902) 巴特勒, 塞缪尔(1835 - 1902年)(324, 347)
- Butterfield, Herbert 巴特菲尔德, 赫伯特(448)
- Buzot, Francois 浦佐, 弗朗索瓦(208)



- Byron, George Gordon, Lord 拜伦, 乔治·戈登, 勋爵 (228 ~ 230, 233, 238, 241 ~ 243, 262)
- Cabet, Etienne 卡贝, 埃蒂安 (269, 271)
- Calvin, John 加尔文, 约翰 (20, 33, 72, 73, 81, 82, 106, 130, 175)
- Camus, Albert 加缪, 阿尔伯特 (510, 511, 513, 517, 518, 521 ~ 523, 529, 546)
- Cannobio, Andrea 卡诺比奥, 安德烈亚 (595)
- Cantillon, Richard 坎特龙, 理查德 (176, 177)
- Cantor, Georg 康托尔, 格奥尔格 (569)
- Carlyle, Thomas 卡莱尔, 托马斯 (226, 231, 233, 234, 237, 247, 249, 252, 253, 263, 266, 270, 272, 278, 296, 301, 327, 343, 346, 352)
- Carnap, Rudolf 卡尔纳普, 鲁道夫 (495, 496)
- Carnot, Sadi 卡尔诺, 桑迪 (329)
- Carroll, William 卡罗尔, 威廉 (121)
- Casanova, Jacques 卡萨诺瓦, 雅克 (201)
- Castellion, Sebastian 卡斯特里昂, 塞巴斯蒂安 (72, 73)
- Castoriadis, Cornelius 卡斯托里亚迪斯, 科尔奈利乌斯 (558)
- Castro, Fidel 卡斯特罗, 菲德尔 (545, 547, 556, 570)
- Catherine II (the Great) of Russia 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大帝) (141, 190, 192 ~ 194, 239)
- Cavalieri, Francesco 卡瓦列里, 弗朗西斯科 (39)
- Cavour, Count 卡富尔, 伯爵 (279)
- Celan, Paul 策兰, 保罗 (623)
- Céline, Louis - Ferdinand 塞利纳, 路易—费迪南 (474)
- Cervantes, Miguel de 塞万提斯, 米格尔·德 (627)
- Chadwick, Edwin 查德威克, 爱德温 (260)
- Chadwick, James 查德威克, 詹姆斯 (456, 499)
- Chain, Ernest 钱恩, 欧内斯特 (515)
- Chamberlain, Houston Stewart 张伯伦, 休斯敦·斯图尔特 (312, 479)
- Chamberlain, Joseph 张伯伦, 约瑟夫 (391)
- Chamberlain, Neville 张伯伦, 内维尔 (510)
- Chambers, Ephraim 钱伯斯, 伊弗雷姆 (144)
- Chambers, Robert 钱伯斯, 罗伯特 (321)
- Chaplin, Charles 卓别林, 查理 (458, 494)

Charcot, Jean	夏尔科, 让(386)
Charlemagne	查理曼大帝(69)
Charles Albert, King of Piedmont	查理·阿尔伯特, 皮蒙特国王(281)
Charles-Brun, Jean	夏尔-布伦, 让(398)
Charles I of England	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80, 81)
Charles II of England	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75, 85, 100, 109, 111, 112)
Charles II of Spain	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191)
Charles III of Spain	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191, 193)
Charles X of France	法国国王查理十世(246)
Chateaubriand, René	夏多布里昂, 勒内(214, 228, 231)
Chatelet, Emile, Marquise de	夏特莱, 爱弥尔, 侯爵夫人(138 ~ 140)
Chatterton, Thomas	查特顿, 托马斯(241)
Chaulieu, Abbé de	肖利厄, 神父(133)
Cheney, Lynne	切尼, 林恩(625)
Chenier, André	谢尼埃, 安德烈(241)
Chernyshevsky, Nicholas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313, 399, 434)
Chesterton, G. K.	切斯特顿, G. K. (248, 256)
Chilidze, V. I.	奇利泽, V. I. (556)
Choiseul, Etienne, Duc de	舒瓦瑟尔, 艾蒂安, 公爵(147)
Chomsky, Noam	乔姆斯基, 诺姆(562)
Chopin, Frederic	肖邦, 弗雷德里克(229, 242)
Christine of Pisa	比萨的克里斯蒂安(572)
Christo (Christo Javacheff)	克利斯托, 亚瓦切夫(620)
Churchill, Winston	丘吉尔, 温斯顿(515)
Cicero	西塞罗(6, 69)
Cieszkowski, Count August	基耶兹柯夫斯基, 奥古斯特, 伯爵(288, 299)
Clare, John	克莱尔, 约翰(243)
Clarke, Samuel	克拉克, 塞缪尔(122, 129, 130)
Claudé, Paul	克洛岱尔, 保罗(430)
Clemenceau, Georges	克列孟梭, 乔治(392, 409)
Clerk Maxwell, James	克拉克·麦克斯韦尔, 詹姆斯(330, 452)
Clough, Arthur	克拉夫, 亚瑟(352)
Cobbett, William	科贝特, 威廉(214, 269)
Cobden, Richard	科布登, 理查德(248, 267)
Cogrove, John	科格雷夫, 约翰(608)
Cohen, J. M.	科恩, J. M. (529)

- Colbert, Jean-Baptiste 科尔伯, 让 - 巴蒂斯特(180)
- Colden, Cadwallader 科尔登, 卡德瓦拉德(64)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柯勒律治, 塞缪尔·泰勒(214, 226, 228, 231, 233 ~ 235, 240, 244, 249, 251, 252, 258, 263, 267, 276, 300, 339, 352, 384)
- Collier, Arthur 柯里尔, 亚瑟(121)
- Collier, Jeremy 柯里尔, 杰里米(113)
- Collingwood, R. G. 柯林武德, R. G. (129, 535)
- Collins, Anthony 科林斯, 安东尼(131)
- Compton-Burnett, Ivy 康普顿 - 伯内特, 埃维(533)
- Comte, Auguste 孔德, 奥古斯特(142, 185, 215, 255, 287, 292 ~ 298, 319, 333, 343, 349, 377, 410)
- Condillac, Etienne de 孔狄亚克, 艾蒂安·德(117, 144, 224)
- Condorcet, Marquis de 孔多塞, 侯爵(150, 182, 183, 189, 207, 214, 215)
- Congreve, Richard 康格里夫, 理查德(293)
- Congreve, William 康格里夫, 威廉(109)
- Conquest, Robert 康奎斯特, 罗伯特(528)
- Conrad, Joseph 康拉德, 约瑟夫(590)
- Constant, Benjamin 贡斯当, 本雅曼(214, 253, 309)
- Coolidge, Calvin 柯立芝, 卡尔文(443)
- Copernicus, N. 哥白尼, N. (29 ~ 34, 36, 37, 63, 465)
- Copland, Aaron 科普兰, 阿伦(511)
- Corneille, Pierre 高乃依, 彼埃尔(98)
- Cousin, Victor 库赞, 维克多(292)
- Coward, No 1 考沃德, 诺埃尔(494, 620)
- Cowper, William 柯珀, 威廉(187, 227)
- Craig, Thomas 克雷格, 托马斯(79)
- Crane, Hart 克莱恩, 哈特(623)
- Crane, Stephen 克莱恩, 斯蒂芬(358, 359)
- Cratylus 克拉提罗斯(5)
- Croce, Benedetto 克罗齐, 本尼狄托(291, 308)
- Cromwell, Oliver 克伦威尔, 奥利佛(66, 75, 88, 109)
- Crowley, Aleister 克劳利, 阿莱斯特(422)
- Cudworth, Ralph 卡德沃思, 拉尔夫(53)
- Curie, Marie Sklowdowska 居里, 玛丽·斯克罗多夫斯卡(293, 329, 451, 454, 483)

Curie, Pierre	居里,彼埃尔(454)
Cuvier, Georges	居维叶,乔治(215,318)
Dagerman, Stig	戴格曼,施蒂格(534)
Dahrendorf, Rolf	达伦多夫,拉尔夫(627)
D'Alembert, Jean	达朗贝尔,让(144)
Dali, Salvador	达利,萨尔瓦多(443)
Dalton, John	道尔顿,约翰(330,454)
Daniel, Yuli	丹尼尔,尤利(528)
Danilevski, Nicholas	丹尼列夫斯基,尼古拉(426)
D'Annunzio, Gabriele	邓南遮,加布利尔(362,364,425,439,440)
Dante	但丁(78,233,384,463)
Darré, Walther	达雷,瓦尔特(479)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查尔斯(6,293,301,310,315~331,346,382,427,465)
Darwin, Erasmus	达尔文,伊拉兹马斯(134)
Dasgupta, Amiya	达斯古普塔,安米亚(608)
Daudet, Leon	都德,莱昂(223)
Daumier, Honoré	杜米埃,奥诺雷(249)
David, Jacques	大卫,雅克(201)
Davidson, John	戴维森,约翰(426)
Davidson, Thomas	戴维森,托马斯(393)
Davie, Donald	戴维,唐纳德(544)
Davigdor-Goldsmid, Henry	达维戈德史密斯,亨利(478)
Davy, Humphrey	戴维,汉弗雷(330)
Day Lewis, Cecil	戴伊·路易斯,塞西尔(482,484)
Debray, Régis	德布雷,雷日(548,584)
Debussy, Claude	德彪西,克劳德(375)
Dee, John	迪伊,约翰(36)
Defoe, Daniel	笛福,丹尼尔(114,117,265)
Delacroix, Eugene	德拉克罗瓦,欧仁(229,242)
Derrida, Jacques	德里达,雅克(574,592,595)
Descartes, René	笛卡儿,勒内(19,39~45,47~54,56~59,61~64,78,86,91,105,116,122,123,125,127,133,139,332,377)
Destutt de Tracy, Comte Claude	德斯蒂·德·特拉西,克劳德,伯爵(215,566)

- Deutsch, Helene 多伊彻, 海伦(570)
- De Vries, Peter 德·弗里斯, 彼得(615)
- Dewey, John 杜威, 约翰(328, 379)
- Dicey, A. V. 戴西, A. V. (260)
- Dickens, Charles 狄更斯, 查理(243, 256, 258, 280, 313, 343, 347, 353 ~ 355, 387, 388, 595)
- Diderot, Denis 狄德罗, 德尼(135, 143 ~ 145, 149, 151, 154, 166, 185, 193, 200, 201, 206, 317)
- Digges, Leonard and Thomas 迪吉斯兄弟, 莱昂纳多和托马斯(36)
- Dirac, Paul 狄拉克, 保罗(456)
- Disraeli, Benjamin 狄斯累利, 本杰明(252, 405)
- Dobb, Maurice 多布, 莫里斯(483)
- Dobrolyubov, Alexandrovich 杜勃罗留波夫, 亚历山大洛维奇(361)
- Dillinger, John von 多林格尔, 约翰·冯(311)
- Donne, John 多恩, 约翰(23, 41, 78, 113)
- Dos Passos, John 多斯·帕索斯, 约翰(482, 501)
- Dostoyevsky, Fyodor 陀斯妥耶夫斯基, 费多尔(368, 369, 390, 423, 470, 507)
- Dowson, Ernest 道森, 欧内斯特(419)
- Dreiser, Theodore 德莱塞, 西奥多(359)
- Dreyfus, Alfred 德雷福斯, 阿尔弗雷德(405, 436)
- Drieu la Rochelle, Pierre 德里尔·拉·罗歇尔, 彼埃尔(443, 474)
- Drummond, Henry 德拉蒙德, 亨利(327)
- Drumont, Edouard 德律蒙, 爱德华(478)
- Dryden, John 德莱顿, 约翰(74, 100, 111, 114)
- Dubcek, Alexander 杜布切克, 亚历山大(551)
- Duchamp-Villon, Raymond 杜尚-维龙, 雷蒙(431)
- Dudintsev, Ivan 杜丁采夫, 伊凡(528)
- Dufy, Raoul 杜菲, 拉乌尔(373)
- Dujardin, Edouard 迪雅尔丹, 爱德华(363, 388)
- Dumas, Alexander 大仲马(229)
- Duncan, Isadora 邓肯, 伊莎朵拉(432)
- Dunn, John 邓恩, 约翰(586)
- Durkheim, Emile 涂尔干, 爱弥尔(412 ~ 414, 417, 418)
- Dürrenmatt, Friedrich 迪伦马特, 弗里德里希(541)
- Dworkin, Andrea 德沃金, 安德烈亚(578)

- Eachard, John 伊查德, 约翰(90)
- Eban, Abba 埃班, 阿巴(5)
- Eco, Umberto 艾可, 安伯托(564)
- Eddington, Arthur 爱丁顿, 亚瑟(497)
- Eddy, Mary Baker 艾娣, 玛丽·贝克(416)
- Edwards, Jonathan 爱德华兹, 乔纳森(134)
- Ehrenburg, Ilya 爱伦堡, 伊里亚(527)
- Einaudi, Luigi 伊诺第, 卢吉(531)
- Einstein, Albert 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64, 330, 376, 451 ~ 460, 465 ~ 467, 473, 518, 617, 618)
- Eisenhower, Dwight D. 艾森豪威尔, 德怀特·D.(546)
- Eisenstein, Sergei 爱森斯坦, 谢尔盖(481, 527)
- El Greco 埃尔·格列柯(24)
- Eliot, George 艾略特, 乔治(293, 296, 347, 354, 470)
- Eliot, T. S. 艾略特, T. S.(366, 444, 446, 447, 488, 509, 541)
- Ellis, Havelock 蔼里斯, 哈夫洛克(388)
- Elsom, John 埃尔索姆, 约翰(602)
- Elton, G. R. 埃尔顿, G. R.(611)
- Emerson, Ralph Waldo 爱默生, 拉尔夫·沃尔多(234, 243)
- Empedocles 恩培多克勒(317, 348)
-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268, 269, 299, 300, 303, 330, 396)
- Epstein, Jacob 爱泼斯坦, 雅各布(466)
- Erasmus Desiderius 伊拉斯谟, 德斯德里乌斯(4, 12, 15, 20)
- Erastus 埃拉斯都(19)
- Eratosthenes 厄拉多塞(2)
- Erofeyev, Victor 爱罗费耶夫, 维克多(585)
- Eucken, Rudolf 倭铿, 鲁道夫(380)
- Euclid 欧几里得(2, 453)
- Euripides 欧里庇德斯(382)
- Evans-Pritchard, E. E. 伊文思 - 普里查德, E. E.(568)
- Evelyn, John 伊夫林, 约翰(99, 111)
- Fadayevev, Rostislav 法达耶夫, 罗斯基斯拉夫(426)
- Fairbairn, W. R. D. 费尔贝恩, W. R. D.(560)

- Fanon, Frantz 法农, 弗朗茨(548)
- Faraday, Michael 法拉第, 迈克尔(330, 352)
- Febvre, Lucien 费弗尔, 吕西安(564)
- Feijóo y Montenegro, Francisco 费霍, Y. 门特内格罗, 弗朗西斯科(191)
- Fenelon, Francois 费奈隆, 弗朗索瓦(104)
- Ferenczi, Sandor 弗伦奇, 桑多尔(386)
- Fermat, Pierre 费尔马, 彼埃尔(36)
- Fermi, Enrico 费米, 恩里科(500)
- Feuerbach, Ludwig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298, 403)
- Fichte, J. G. 费希特, J. G. (217, 220, 224, 225, 273, 285)
- Fielding, Henry 菲尔丁, 亨利(187, 201)
- Figgis, J. N. 菲吉斯, J. N. (422)
- Filmer, Robert 菲尔默, 罗伯特(79, 90, 104)
- Firestone, Shulamith 费尔斯通, 舒拉密斯(570)
- Fisher, Louis 费舍, 路易(482)
- Fitzgerald, F. Scott 菲茨杰拉德, F. 司各特(464)
- Fitzhugh, George 菲茨休, 乔治(294)
- Flaubert, Gustave 福楼拜, 古斯塔夫(282, 354 ~ 356, 592, 606)
- Flexner, Abraham 弗莱克斯纳, 亚伯拉罕(601)
- Florey, Howard W. 弗洛里, 霍华德 · W. (515)
- Fontane, Theodor 冯塔纳, 西奥多(360)
- Fontenelle, Bernard 丰特奈尔, 伯纳尔(64, 105, 108)
- Ford, Kate 福特, 凯特(574)
- Forster, E. M. 福斯特, E. M. (532)
- Foucault, J. B. L. 福柯, J. B. L. (452)
- Foucault, Michel 福柯, 米歇尔(导论: 5, 正文: 363, 565, 566, 574, 592)
- Fourier, Charles 傅立叶, 夏尔(268, 271)
- France, Anatole 法朗士, 安纳托尔(265, 328)
- Franklin, Benjamin 富兰克林, 本杰明(119, 136, 173, 178, 192)
- Franz Ferdinand, Archduke 弗朗兹 · 斐迪南, 大公(430)
- Franz Josef, Emperor 弗朗兹 · 约瑟夫, 皇帝(374)
- Frazer, James 弗雷泽, 詹姆斯(341, 464)
- Frederick II (the Great) of Prussia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大帝)(139, 150, 180, 188, 189, 193, 194)
- Freeman, E. A. 弗里曼, E. A. (287)

- Frege, Gottlieb 弗雷格, 戈特利布(497)
- Freud, Anna 弗洛伊德, 安娜(560, 570, 613)
-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导论: 3, 6, 正文: 6, 63, 185, 200, 241, 304, 369, 383, 385 ~ 389, 410 ~ 412, 415, 419 ~ 421, 428, 449 ~ 451, 461, 462, 467, 505, 574)
- Friedan, Betty 弗里丹, 贝蒂(575)
- Friedman, Milton 弗里德曼, 米尔顿(627)
- Friedrich, Carl J. 弗里德里希, 卡尔·J.(511)
- Friedrich, Caspar David 弗里德里希, 加斯帕尔·大卫(243)
- Friedrichs, Robert 弗雷德里克, 罗伯特(612)
- Frisch, Otto 弗里希, 奥托(500)
- Fromm, Erich 弗洛姆, 埃里克(546)
- Fry, Roger 弗莱伊, 罗杰(623)
- Fuchs, Klaus 富克斯, 克劳斯(525)
- Gadamer, Hans-Georg 伽达默尔, 汉斯 - 格奥尔格(506, 607)
- Gaitskell, Hugh 盖斯凯尔, 休(530)
- Galbraith, John K. 加尔布雷思, 约翰·K.(627)
- Galen 盖伦(2, 14)
- Galileo 伽利略(导论: 3, 正文: 10, 21, 29, 31, 32, 34 ~ 40, 42 ~ 45, 47, 58, 61 ~ 63, 117)
- Galton, Francis 高尔顿, 弗朗西斯(336, 388)
- Galvani, Luigi 伽伐尼, 路易吉(330)
- Gambetta, Leon 甘必大, 列昂(403, 408)
- Gandhi, Mohandas 圣雄甘地(351, 368, 372, 552)
- Garaudy, Roger 加罗蒂, 罗杰(546, 554, 614)
- Garibaldi, Giuseppe 加里波第, 朱塞普(301, 346)
- Gaskell, Elizabeth 盖斯凯尔, 伊丽莎白(280)
- Gassendi, Pierre 伽桑狄, 彼埃尔(39, 53, 56)
- Gauguin, Paul 高更, 保罗(376)
- Gaulle, Charles de 戴高乐, 夏尔(379, 536, 546, 553, 554)
- Gauss, Christian 高斯, 克里斯蒂安(453)
- Gautier, Théophile 戈蒂耶, 泰奥菲尔(355)
- Gay, John 盖伊, 约翰(187)



- Genet, Jean 热内,让(542)
- Gentile, Giovanni 秦梯利,乔万尼(291,440)
- George, Henry 乔治,亨利(373,390)
- George, Stefan 格奥尔格,斯特凡(416,428,430)
- George VI, King 乔治六世,国王(502)
- Gibbon, Edward 吉本,爱德华(181,210,233,253)
- Gide, André 纪德,安德烈(376,380,444,460,485)
- Gilbert, William 吉尔伯特,威廉(36)
- Gilson, Etienne 吉尔松,艾蒂安(379)
- Giolitti, Giovanni 焦利蒂,乔万尼(391)
- Gissing, George 吉辛,乔治(导论:4,正文:347,408)
- Gladstone, William E. 格拉斯顿,威廉·E.(337,340)
- Gobineau, Joseph, Comte de 戈宾诺,约瑟夫,伯爵(312,479)
- Godel, Kurt 哥德尔,库尔特(458)
- Godwin, William 葛德文,威廉(158,213,214,276,346)
- Goebbels, Joseph 戈培尔,约瑟夫(480)
- Goethe, Johann W. 歌德,约翰·W.(214,217,219,221,227,241,384)
- Gogol, Nikolai 果戈理,尼古拉(369)
- Golding, William 戈尔丁,威廉(534,542)
- Gollancz, Victor 格兰兹,维克多(488)
- Goncourt, Jules 龚古尔,于勒(337)
- Gonzalez Marquez, Felipe 冈萨雷斯,费利佩(587)
- Gorer, Geoffrey 戈尔,杰弗里(568)
- Gorki, Maxim 高尔基,马克西姆(430,481)
- Gosse, Edmund 戈斯,爱德蒙(340)
- Gouges, Olympe des 古兹,奥林普(214)
- Gould, Stephen Jay 古尔德,斯蒂芬·杰伊(325,627)
- Gouldner, A. W. 古尔德纳,A.W.(612)
-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安东尼奥(546,551)
- Grass, Günter 格拉斯,君特(553,580)
- Graves, Robert 格雷夫斯,罗伯特(502)
- Gravesande, W. J. 格拉弗桑德,W.J.(64)
- Gray, Asa 格雷,阿萨(327)
- Gray, John 格雷,约翰(608)
- Gray, Thomas 格雷,托马斯(227)

- Greeley, Horace 格里利, 霍勒斯(301)  
Green, T. H. 格林, T. H. (289, 291, 391)  
Greene, Graham 格林, 格雷厄姆(541, 613)  
Greer, Germaine 格里尔, 杰曼(570, 572)  
Groddeck, Georges 格罗德克, 格奥尔格(383)  
Gross, Alan 格罗斯, 艾伦(596)  
Gross, John 格罗斯, 约翰(591)  
Gross, Otto 格罗斯, 奥托(422)  
Grotius, Hugo 格老秀斯, 胡果(94)  
Guesde, Jules 盖德, 儒尔(397, 398, 400)  
Guevara, Che 格瓦拉, 切(545, 548)  
Guizot, Francois 基佐, 弗朗索瓦(250, 310)  
Gurdjieff, G. I. 古尔捷耶夫, G. I. (423)  
Gurney, Ivor 格尼, 艾弗(431)  
Guy-Grand, Georges 盖伊 - 格兰特, 乔治(377)  
Guyon, Mme 居永夫人(103)
- Habermas, Jürgen 哈贝马斯, 于尔根(554)  
Haddon, Celia 哈登, 西莉亚(579)  
Haeckel, Ernst 海克尔, 恩斯特(418)  
Hahn, Otto 哈恩, 奥托(500)  
Haldane, J. B. S. 霍尔丹, J. B. S. (483)  
Halley, Edmund 哈雷, 爱德蒙(61)  
Hampshire, Stuart 汉普希尔, 斯图尔特(530)  
Handlin, Oscar 汉德林, 奥斯卡(611)  
Harcourt, Lord William 哈考特, 威廉, 伯爵(391)  
Hardy, Thomas 哈代, 托马斯(337, 347, 354, 356, 359, 371, 465)  
Harrington, James 哈林顿, 詹姆斯(84, 85)  
Harrington, Michael 哈林顿, 迈克尔(553)  
Harrison, Frederic 哈里森, 弗雷德里克(293, 295)  
Hartley, David 哈特利, 大卫(117, 121, 184, 185)  
Hartmann, Eduard von 哈特曼, 爱德华·冯(380, 387)  
Harvey, William 哈维, 威廉(29, 40, 58)  
Hastings, Warren 黑斯廷斯, 沃伦(212)  
Hauptmann, Gerhart 豪普特曼, 格哈特(336, 359, 367)  
Hawkes, Jaquetta 霍克斯, 雅克达(313)

- Haydon, Benjamin R . 海顿,本杰明·R.(217)
- Hayek, Friedrich von 哈耶克,弗里德里希·冯(491,492,531)
- Hayward, John 海沃德,约翰(78)
- Hazlitt, William 黑兹利特,威廉(216,232)
- Hearn, Lafcadio 赫恩,拉夫卡迪奥(377)
- Heath, Stephen 希思,斯蒂芬(579)
- Hegel, G .W .F . 黑格尔,G .W .F .(142,159,216,226,242,246,277,284~294,298~300,314,319,328,440,506,508)
- Heidegger, Martin 海德格尔,马丁(474,506,507,516,518,519,537,538,546,579,591)
- Heiden, Konrad 海登,康拉德(475)
- Heine, Heinrich 海涅,海因里希(219)
- Heisenberg, Werner 海森堡,沃纳(456,457,496,515)
- Helvétius, Claude 爱尔维修,克劳德(144~146,175,184,194,199,201,258)
- Helwys, Thomas 赫尔韦斯,托马斯(73)
- Hemingway, Ernest 海明威,欧内斯特(444,502)
- Henry, Emile 亨利,爱弥尔(402)
- Henry IV of France 法王亨利四世(22)
- Henry VIII of England 英王亨利八世(14)
- Heraclitus 赫拉克利特(5)
- Herbert of Cherbury, Edward, Baron 彻伯里的赫伯特,爱德华,男爵(116)
- Herder, Johann 赫尔德,约翰(183,217,232,285,294)
- Hertz, Heinrich R . 赫兹,亨利希·R.(451,454)
- Herzen, Alexander 赫尔岑,亚历山大(312,399)
- Herzl, Theodor 赫茨尔,西奥多(425)
- Hess, Moses 赫斯,摩西(299,300,302)
- Hewison, Robert 休伊森,罗伯特(622)
- Hilbert, David 希尔伯特,大卫(458)
- Himmelfarb, Gertrude 希梅尔法布,格楚德(603)
-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142)
- Hiss, Alger 希斯,阿尔杰(526)
- Hitler, Adolf 希特勒,阿道夫(291,312,336,383,384,410,416,434,438~442,472~480,485,503,509~512)
- Hobbes, Thomas 霍布斯,托马斯(40,53~56,79,84~89,127,

- 417)
- Hobhouse, L. T. . 霍布豪斯, L. T. .(288)
- Ho Chi Minh 胡志明(545)
- Hofmannsthal, Hugo von 霍夫曼斯塔尔, 胡果·冯(361, 366)
- Hogarth, William 贺加斯, 威廉(201)
- Holbach, Baron d' 霍尔巴赫, 男爵(144, 153, 180, 201, 202, 207)
- Holbrook, David 霍尔布鲁克, 大卫(577)
- Hlderlin, Johann 荷尔德林, 约翰(234)
- Holmes, Oliver Wendell, Jr. 霍尔姆斯, 小奥利佛·温德尔(184, 345)
- Holt, Henry 霍尔特, 亨利(332)
- Homer 荷马(303)
- Hooke, Robert 胡克, 罗伯特(60)
- Hooker, Richard 胡克, 理查德(90)
- Horkheimer, Max 霍克海默, 马克斯(489, 546)
- Hormel, Leon 霍梅尔, 列昂(393)
- Horney, Karen 霍尼, 卡伦(570)
- Hough, Graham 霍夫, 格拉海姆(590)
- Hubble, Edwin 哈勃, 爱德温(459)
- Hugh of St. Victor 圣维克多隐修院的于格(导论:7)
- Hugo, Victor 雨果, 维克多(229, 232, 243, 272, 354)
- Hulton, Edward 赫尔顿, 爱德华(514)
- Hume, David 休谟, 大卫(87, 117, 118, 121, 132, 167~173, 177, 181, 186, 187, 196, 219, 220, 258, 262)
- Husserl, Edmund 胡塞尔, 爱德蒙(379, 386, 506, 507, 518, 537, 546)
- Hutcheson, Francis 哈奇森, 弗朗西斯(258)
- Hutton, James 赫尔顿, 詹姆斯(317, 318)
- Huxley, Aldous 赫胥黎, 奥尔德斯(导论:7, 正文:445, 468, 500, 534)
- Huxley, Julian 赫胥黎, 朱利安(327, 500, 511, 629)
- Huxley, Thomas 赫胥黎, 托马斯(326, 332, 335, 408)
- Huygens, Christian 惠更斯, 克里斯蒂安(60, 64)
- Huysmans, Joris 于斯曼, 乔里斯(361)
- Hyndman, H. M. 海德曼, H. M. (308, 396)
- Hyppolite, Jean 伊波利特, 让(567)
- Ibsen, Henrik 易卜生, 亨利(358, 360, 366, 369, 407, 430, 463)

- Inge, William 英奇, 威廉(445)
- Ionesco, Eugene 尤内斯库, 尤金(542)
- Ivanov, Vyacheslav 伊万诺夫, 维切斯拉夫(366, 422)
- Jakobson, Roman 雅各布森, 罗曼(562, 567)
- James, Henry 詹姆斯, 亨利(593)
- James I of England 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78)
- James II of England 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二世(75, 89, 105, 112)
- James, William 詹姆斯, 威廉(221, 291, 332, 379, 419)
- Jameson, Frederic 詹姆斯逊, 弗雷德里克(600)
- Jaspers, Karl 雅斯贝斯, 卡尔(417, 507, 514, 518, 550, 553)
- Jaurès, Jean 饶勒斯, 让(397, 403)
- Jefferson, Thomas 杰斐逊, 托马斯(69, 91, 192)
- Jeffrey, Francis 杰弗里, 弗朗西斯(218)
- Jenkins, Peter 詹金斯, 彼得(586)
- Jevons, W. Stanley 杰文斯, W 斯坦利(307)
- Joachim of Flores 佛罗雷的约阿欣(8)
- Joad, C. E. M. 乔德, C. E. M. (394)
- Joan of Arc 圣女贞德(424)
- John of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6, 68)
- John Paul II, Pope 约翰·保罗二世, 教皇(601)
- Johnson, Hewlett 约翰逊, 休利特(482)
- Johnson, Samuel 约翰逊, 塞缪尔(232, 242, 317)
- John XXIII, Pope 约翰二十三世, 教皇(546)
- Joliot - Curie, Frédéric 约里奥—居里, 弗雷德里克(483, 500, 515, 525)
- Jones, Inigo 琼斯, 伊尼戈(112)
- Jones, William 琼斯, 威廉(186, 234)
- Jordanus 乔丹纳斯(28)
- Joseph II of Austria 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193)
- Joseph, Keith 约瑟夫, 基思(610)
- Jouvenel, Bertrand de 儒维奈尔, 伯特兰·德(533)
- Joyce, James 乔伊斯, 詹姆斯(365, 376, 404, 444, 460, 463 ~ 468, 504, 505, 600)
- Joyce, Stanislaus 乔伊斯, 斯坦尼斯劳斯(470)
- Jung, Carl G. 容格, 卡尔 G. (226, 236, 383, 388, 389, 419 ~ 421, 459, 461, 614)

- Jung, Edgar 荣格,埃德加(443)
- Jünger, Ernst 荣格尔,恩斯特(596)
- Jurieu, Pierre 朱里约,彼埃尔(106)
- Justi, J.H.G. 尤斯蒂, J.H.G.(190)
- Kafka, Franz 卡夫卡,弗兰兹(376,380,425,460,462,470,480,481,503~505,508)
- Kaldor, Nicholas 卡尔多,尼古拉(610)
- Kandinsky, Vasily 康定斯基,瓦西里(374,460)
- Kant, Immanuel 康德,伊曼纽尔(导论:5,正文:50,168,196,218~225,240,260,285,333,343,377,506)
- Karamzin, Nicholas 卡拉津姆,尼古拉(310)
- Kautsky, Karl 考茨基,卡尔(397)
- Keats, John 济慈,约翰(228,238,242,243)
- Keble, John 基布尔,约翰(236)
- Kelvin, William 凯尔文,威廉(329)
- Kepler, Johannes 开普勒,约翰内斯(29,30,34,35,41,49,60,459)
- Ketteler, W.E.von 凯特勒,W.E.冯(392)
- Keynes, John M. 凯恩斯,约翰·M.(导论:4,正文:264,269,333,484,490~492,530,587)
- Khrushchev, Nikita 赫鲁晓夫,尼基塔(527~529,545~547)
- Kidd, Benjamin 基德,本杰明(336)
- Kiekegaard, S ren 克尔凯郭尔,泽伦(226,290,292,448,508,515,541,614,625)
- King, William 金,威廉(124)
- Kingsley, Charles 金斯利,查尔斯(353)
- Kipling, Rudyard 吉卜林,路特亚德(426)
- Kissinger, Henry 基辛格,亨利(627)
- Klages, Ludwig 克拉格斯,路德维希(365)
- Klee, Paul 克利,保罗(375,460)
- Klein, Melanie 克莱恩,梅拉尼(560,570)
- Kleist, Heinrich 克莱斯特,海因里希(243)
- Klimt, Gustav 克里木特,古斯塔夫(480)
- Knowles, David 诺里斯,戴维(606)
- Koestler, Arthur 凯斯特勒,亚瑟(导论:4,正文:486)
- Kojève, Alexander 科耶夫,亚历山大(292,567)

- Kokoschka, Oscar 考考斯卡, 奥斯卡(374)
- Kolakowski, Leszek 科拉科夫斯基, 赖泽特(551, 586)
- Kollontai, Alexandria 柯伦泰, 亚历山德拉(569)
- Kosik, Karl 科西克, 卡尔(551)
- Kossuth, Louis 科苏特, 路易(274)
- Krafft-Ebing, Richard 克拉夫特 - 埃宾, 理查德(388)
- Kramer, Hilton 克雷默, 希尔顿(623, 625)
- Kraus, Karl 克劳斯, 卡尔(474)
- Kravchenko, Victor 克拉甫琴柯, 维克多(526)
- Kristeva, Julia 克里斯蒂娃, 朱利亚(导论: 5, 正文: 363, 567, 574)
- Kristol, Irving 克里斯托尔, 欧文(628)
- Kropotkin, Peter 克鲁泡特金, 彼得(336, 403)
- Krüdener, Julie de 克吕登纳, 朱莉·德(239)
- Kuhn, Thomas 库恩, 托马斯(565)
- Küng, Hans 昆, 汉斯(615)
- Labriola, Antonio 拉布里奥拉, 安东尼奥(308, 399)
- Labriola, Arturo 拉布里奥拉, 阿尔图罗(402)
- Lacan, Jacques 拉康, 雅克(567, 571, 574, 593)
- La Chalotais, Louis de 拉夏洛泰, 路易·德(185)
- Laclos, Pierre 拉克洛, 彼埃尔(201)
- Lafargue, Paul 拉法格, 保罗(398)
- Laforgue, Jules 拉弗格, 儒尔(366)
- Lagrange, Joseph, Comte de 拉格朗日, 约瑟夫, 伯爵(174)
- Lamarck, J. - B. de 拉马克, J. - B. 德(215, 318, 320, 324, 328)
- Lamartine, Alphonse de 拉马丁, 阿尔方斯·德(229, 233, 250, 272, 281)
- Lamennais, Felicité de 拉梅内, 费利西泰·德(254, 272, 292, 625)
- La Mettrie, Julien de 拉美特利, 于连·德(185, 199, 201)
- Landor, Walter Savage 兰多, 沃尔特·萨维奇(408)
- Lange, Oskar 兰格, 奥斯卡(584)
- Langevin, Pierre 朗之万, 彼埃尔(435, 455, 483)
- Laplace, Pierre 拉普拉斯, 彼埃尔(59, 174, 215, 329)
- La Popelinière, Henri de 拉波普里尼埃, 亨利·德(19)
- Larkin, Philip 拉金, 菲利普(542, 548)
- Laski, Harold 拉斯基, 哈罗德(212, 267)

- Laslett, Peter 拉莱特,彼得(572)
- La Tour du Pin, Charles 拉图尔·杜宾,夏尔(392)
- Laud, William, Archbishop 劳德,威廉,大主教(75,81)
- Lavoisier, Antoine 拉瓦锡,安托万(174,330)
- Law, William 劳,威廉(134)
- Lawrence, D .H . 劳伦斯,D .H .(376,407,442,444,460,462,465,468,469,470,535,569,577)
- Lawson, George 劳森,乔治(90)
- Leavis, F .R . 利维斯,F .R .(499)
- Le Bon, Gustave 勒邦,古斯塔夫(410,442,476)
- Lecky, W .E .H . 莱基,W .E .H .(277)
- Le Corbusier (Charles-Edouard Jeanneret) 勒·科比西埃(夏尔·爱德华·让纳雷特)(376)
- Leeuwenhoek, Anthony van 列文虎克,安东尼·范(58)
- Lehmbruch, Wilhelm 莱姆布鲁克,威廉(431)
- Leibniz, Gottfried W . 莱布尼兹,戈特弗里德·W .(60,64,94,107,122~126,139,148,165,189,219,220)
- Lemaitre, Georges, Abbé 勒梅特,乔治,教士(459)
- Lenin (V .I .Ulyanov) 列宁(弗·伊·乌里扬诺夫)(227,291,295,395,399,400,409,431,434~436,487,529,583)
- Lenotre, Andre 勒诺特尔,安德烈(99)
- Leo XIII, Pope 利奥十三世,教皇(392)
- Leonard of Pisa (Fibonacci) 比萨的莱昂纳多(28)
- Leonardo da Vinci 莱昂纳多,达·芬奇(30)
- Lermontov, Mikhail Y . 莱蒙托夫,米哈伊尔·Y .(243)
-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勒华·拉杜里,伊曼纽尔(564)
- Leslie, Charles 莱斯利,查尔斯(128)
- Lessing, Gotthold 莱辛,戈特霍尔德(133,189,194,195)
- Lévi - Strauss, Claude 列维·斯特劳斯,克劳德(561,562,566,567)
- Lewis, C .S . 刘易斯,C .S .(489,532,541,614)
- Lewis, Sinclair 刘易斯,辛克莱(449)
- Lewis, W . Arthur 刘易斯,W .亚瑟(530)
- Lewis, Wyndham 刘易斯,温德姆(603)
- Lichtheim, George 利希泰姆,乔治(473)
- Liebkecht, Karl 李卜克内西,卡尔(431)
- Liebkecht, Wilhelm 李卜克内西,威廉(397)



- Lilburne, John 李尔本, 约翰(82, 84)
- Linnaeus, Carl 林奈, 卡尔(174)
- Lippmann, Walter 李普曼, 沃尔特(442, 449, 450)
- List, Friedrich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263)
- Liszt, Franz 李斯特, 弗朗兹(229)
- Littré, Emile 利特尔, 埃米尔(296)
- Lobachowski, Nikolai I. 罗巴契夫斯基, 尼古拉·I.(453)
- Locke, John 洛克, 约翰(导论:4, 正文:49, 52, 66, 68, 88 ~ 95, 107, 108, 112, 115 ~ 123, 127, 129 ~ 131, 164 ~ 168, 170, 172, 174 ~ 176, 180, 184, 197, 219 ~ 221, 260, 262, 275, 333)
- Lombard, Peter 隆巴德, 彼得(14)
- London, Jack 伦敦, 杰克(337, 358)
- Longfellow, Henry W. 朗费罗, 亨利·W.(243)
- Loos, Adolf 洛斯, 阿道夫(375)
- Lorentz, H. A. 洛伦兹, H. A.(451)
- Loria, Achille 劳里亚, 艾基立(399)
- Lotze, Rudolf 洛采, 鲁道夫(380)
- Louis-Philippe, King of France 路易-菲利浦, 法国国王(281)
- Louis XIV of France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26, 65, 77, 95, 96, 98 ~ 108, 136)
- Louis XV of France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01, 102, 140, 201)
- Louis XVI of France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101, 208, 212)
- Louis XVIII of France 法国国王路易十八(246)
- Lovejoy, Arthur O. 洛夫乔伊, 阿瑟·O.(导论:6, 正文:230, 242)
- Lowell, Amy 洛威尔, 埃米(576)
- Lowell, Robert 洛威尔, 罗伯特(512, 623)
- Lowry, Malcolm 劳里, 马尔科姆(623)
- Loyola, St. Ignatius 罗耀拉, 伊纳爵(4)
- Lucretius 卢克莱修(15, 384)
- Lueger, Karl 卢埃格尔, 卡尔(477)
- Lukacs, George 卢卡奇, 乔治(550)
- Lukes, Stephen 卢克斯, 斯蒂芬(587)
- Lully, G. B. 吕利, G. B.(98)
- Luther, Martin 路德, 马丁(12, 14, 17, 21, 33, 83, 448)
- Luxenburg, Rosa 卢森堡, 罗莎(400, 570)

- Lyell, Charles 赖尔,查尔斯(319,325,331)
- Lynd, Helen and Robert 海伦·林德和罗伯特·林德(418)
- Lyons, Eugene 莱昂斯,尤金(487)
- Lysenko, T. D. 李森科, T. D. (460,527)
- Mably, Gabriel de 马布利,加布里埃尔·德(162)
- Macaulay, Thomas B. 马考莱,托马斯·B.(216,277,310)
- MacDonald, J. Ramsay 麦克唐纳, J·拉姆齐(335,428,431)
- Mach, Ernst 马赫,恩斯特(378,451,454,470,496)
- Machiavelli, Nicolo 马基雅维利,尼科洛(12,20,71,183,417)
- MacIntyre, Alasdair 麦金泰尔,阿莱斯代尔(598)
- Macke, August 迈克,奥古斯特(431)
- Maclean, Donald 麦克莱恩,唐纳德(431)
- MacNiece, Louis 麦克尼斯,路易(486)
- Madison, James 麦迪逊,詹姆斯(91)
- Maeterlinck, Maurice 梅特林克,莫里斯(365)
- Mahler, Gustav 马勒,古斯塔夫(375,384,389)
- Maimonides, Moses 迈蒙尼德,摩西(194)
- Maine, Henry 梅因,亨利(406,408)
- Maistre, Joseph de 梅斯特尔,约瑟夫·德(119,204,251,253~255)
- Malebranche, Nicholas 马勒伯朗士,尼古拉(53,54,121,165)
- Malesherbes, Chretien 马尔泽布,克雷蒂安(146,150)
- Malherbe, Francois 马莱伯,弗朗索瓦(98)
- Mallarmé, Stéphane 马拉美,斯特凡(291,361,365,366)
- Malpighi, Marcello 马尔比基,马尔赛罗(58)
- Malraux, André 马尔罗,安德烈(482,502,505,521)
- Malthus, Thomas 马尔萨斯,托马斯(180,210,264,265,293,315,321)
- Man, Henri de 曼,亨利·德(402)
- Mandelstam, Osip 曼德尔斯塔姆,欧西普(481)
- Mandeville, Bernard de 曼德维尔,伯纳德·德(262,265)
- Manegold of Lautenbach 劳滕巴赫的马尼戈德(68,81)
- Mann, Thomas 曼,托马斯(428,444,460,462,473,505)
- Manning, Cardinal Henry E. 曼宁,亨利·E.(278)
- Man, Paul de 曼,保罗·德(474,597)
- Mansart, Jules 芒萨尔,儒尔(99)

- Mao Tse-tung 毛泽东(546 ~ 548)
- Marana, Giovanni 马拉纳, 乔万尼(137)
- Marc, Franz 马克, 弗兰茨(431)
- Marcel, Gabriel 马塞尔, 加布里埃尔(515, 614)
- Marcet, Jane 马赛特, 简(263)
- Marcuse, Herbert 马尔库塞, 赫伯特(489, 546, 548, 549)
- Marcuse, Ludwig 马尔库塞, 路德维希(444, 509)
- Marinetti, Emilio 马里内蒂, 埃米利奥(569)
- Maritain, Jacques 马利坦, 雅克(447)
- Marshall, Alfred 马歇尔, 阿尔弗雷德(307)
- Marsiglio of Padua 帕多瓦的马尔西里奥(71)
- Martin, Christopher 马丁, 克里斯托弗(532)
- Martindale, Charles 马丁代尔, 查尔斯(590)
- Martineau, Harriet 马蒂诺, 哈丽雅特(263, 265, 271, 347, 572)
- Marx, Eleanor 马克思, 爱琳娜(303)
-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导论:3, 正文:9, 84, 85, 142, 180, 219, 228, 246, 270, 272, 280, 282, 286, 289, 292, 298 ~ 309, 335, 336, 369, 382, 390, 391, 403, 415, 424, 508, 569)
- Matisse, Henri 马蒂斯, 亨利(374, 375)
- Maupertuis, Pierre - Louis de 莫佩尔蒂, 彼埃尔—路易·德(317)
- Mauriac, Francois 莫里亚克, 弗朗索瓦(446, 533, 541, 613)
- Maurice, F D . 莫里斯, F D .(353)
- Maurras, Charles 莫拉斯, 夏尔(294, 403, 404, 409, 410, 424, 425, 440, 443, 474)
- May, Nunn 梅, 纳恩(525)
- Mayakovsky, Vladimir 马雅可夫斯基, 弗拉基米尔(481)
- Mayhew, Henry 梅休, 亨利(280)
- Mazzini, Giuseppe 马志尼, 朱赛普(230, 246, 253, 257, 273, 274, 279, 281 ~ 283)
- McCloskey, Donald N . 麦克洛斯基, 唐纳德 .N .(596)
- McCulloch, J .R . 麦卡洛克, J .R .(264)
- McFarland, Thomas 麦克法兰, 托马斯(605)
- Medvedev, Roy 梅德维杰夫, 罗伊(528, 556, 557)
- Medvedev, Zhores 梅德维杰夫, 绍列斯(556)
- Meinhof, Ulrike 迈因霍夫, 乌尔里克(555)

- Meitner, Lise 迈特纳, 丽莎(500)
- Mellon, Paul 梅隆, 保罗(421)
- Melon, Jean - Francois 梅隆, 让 - 弗朗索瓦(176)
- Mencken, H L . 门肯, H L .(384, 448)
- Mendel, Gregor 门德尔, 格雷戈尔(324)
- Mendeleyeff, Dmitri 门捷列夫, 德米特里(330)
- Mendelsohn, Eric 门德尔松, 艾里克(466)
- Mendelsohn, Moses 门德尔松, 摩西(195)
- Menger, Karl 门格尔, 卡尔(307)
- Meredith, George 梅瑞狄斯, 乔治(347)
- Merleau - Ponty, Maurice 梅洛 - 庞蒂, 莫里斯(292, 518, 521, 524)
- Mersenne, Abbé Marin 梅森, 马林, 神父(40, 41, 133)
- Mesmer, Anton 梅斯梅尔, 安东(387)
- Metternich, Clemens, Prince von 梅特涅, 克莱门特, 亲王(257)
- Meun, Jean de 墨恩, 让·德(17)
- Meynell, Alice 梅内尔, 艾丽斯(39)
-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25)
- Michelet, Jules 米什莱, 儒尔(279, 310)
- Michell, John 米歇尔, 约翰(616)
- Michels, Robert 米歇尔斯, 罗伯特(411, 412, 415)
- Michelson, A .A . 迈克尔森, A .A .(452)
- Middleton, Conyers 米德尔顿, 科尼尔斯(132)
- Mill, Harriet Taylor 穆勒, 哈利特·泰勒(344, 346)
- Mill, James 穆勒, 詹姆斯(258 ~ 260, 264, 266, 343)
- Mill, John Stuart 穆勒, 约翰·斯图尔特(160, 250, 258, 261, 264, 275, 293, 302, 343 ~ 348, 407)
- Millerand, Alexandre 米勒兰, 亚历山大(397)
- Millett, Kate 米利特, 凯特(576)
- Milner, Alfred 米尔纳, 阿尔弗雷德(391)
- Milton, John 弥尔顿, 约翰(76, 84, 109)
- Minkowski, Herman 闵可夫斯基, 赫尔曼(451)
- Mirabeau, Gabriel, Comte de 米拉波, 加布里埃尔, 伯爵(150, 180)
- Mirabeau, Victor, Marquis de 米拉波, 维克多, 侯爵(177, 180)
- Mises, Ludwig von 米泽斯, 路德维希·冯(导论:6, 正文:491, 584)
- Mistral, Gabriel 米斯特拉尔, 加布里埃尔(424)
- Mitchell, Juliet 米切尔, 朱丽叶(575)

- Mitterand, Francois 密特朗, 弗朗索瓦(587)
- Mivart, St . George 米瓦尔, 圣·乔治(324)
- Moeller van den Bruck 默埃勒 范·邓·布鲁克(477)
- Molière (Jean-Baptiste Poquelin) 莫里哀, (让 - 巴蒂斯特·波克兰)(42, 97 ~ 99, 109)
- Molyneux, William 摩利纽克斯, 威廉(144)
- Monboddo, James B ., Lord 蒙博多, 詹姆斯·B ., 勋爵(317)
- Mondrian, Piet 蒙德里安, 皮特(375)
- Monnet, Jean 莫内, 让(514, 531)
- Monroe, Marilyn 梦露, 玛莉莲(613)
- Montaigne, Michel de 蒙田, 米歇尔·德(18, 21 ~ 23, 72, 133)
- Montchrétien, Antoine de 蒙克列田, 安托万·德(262)
- Montesquieu, Charles, Baron de 孟德斯鸠, 夏尔, 男爵(导论:4, 正文:70, 107, 108, 133, 136 ~ 138, 141 ~ 143, 174, 176, 181, 185, 188 ~ 190, 206, 208, 418)
- Moore, G .E . 穆尔, G .E .(494, 498)
- Moore, George 穆尔, 乔治(359)
- Moore, Thomas 穆尔, 托马斯(243)
- More, Henry 摩尔, 亨利(53)
- More, Thomas 莫尔, 托马斯(12, 20)
- Moreas, Gustave 莫雷亚斯, 古斯塔夫(360)
- Morelly 摩莱里(162)
- Morley, John 莫利, 约翰(342)
- Morris, William 莫里斯, 威廉(308, 350, 373, 390, 394)
- Mosca, Gaetano 莫斯卡, 盖塔诺(411)
- Mosley, Oswald 莫利斯, 奥斯瓦尔德(442)
- Mounier, Emmanuel 穆尼埃, 伊曼纽尔(419, 489)
- Mozart, Wolfgang A . 莫扎特, 沃尔夫冈·A .(253)
- Mueller, Adam 米勒, 亚当(263)
- Muggeridge, Malcolm 马格里奇, 马尔科姆(614)
- Mun, Albert de 曼, 阿尔伯特·德(392)
- Munz, Peter 芒兹, 彼得(611)
- Murdoch, Iris 默多克, 艾里斯(540)
- Musil, Robert 穆奇尔, 罗伯特(366, 385, 470)
- Musset, Alfred de 缪塞, 阿尔弗雷德·德(229, 238, 243)
- Mussolini, Benito 墨索里尼, 贝尼托(291, 405, 416, 439 ~ 443)

- Namier, Lewis B . 纳米尔,刘易斯·B.(529,533)
- Napier, John 纳皮尔,约翰(35)
- Napoleon I (Bonaparte) 拿破仑一世(波拿巴)(214~218,227,245,246)
- Napoleon III (Louis Napoleon) 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281,293,301,357)
- Necker, Jacques 内克,雅克(254)
- Neizvestny, Ernst 内兹维斯特尼,恩斯特(528)
- Nemerov, Howard 内梅罗夫,霍华德(543,575)
- Nerval, Gerard de 奈瓦尔,热拉尔·德(229)
- Neumann, John von 诺伊曼,约翰·冯(514)
- Neurath, Otto 纽拉特,奥托(497)
- Newman, John Henry, Cardinal 纽曼,约翰·亨利,大主教(236,261,345,351)
- Newton, Issac 牛顿,艾萨克(5,34,39,41,43,44,47,51,58~64,112,115,122,127,138,139,148,181,195,197,240,262,330,453)
- Nicholas I of Russia 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281)
- Nicholas of Cusa 库萨的尼古拉斯(31,39)
- Niebuhr, Berthold G . 尼布尔,贝特霍尔德·G.(287)
- Niebuhr, Reinhold 尼布尔,莱因霍尔特(449,489)
- Nietzsche, Friedrich 尼采,弗里德里希(导论:6,正文:3,240,290,328,342,361,369,370,376~385,387,403,434,440,537,570,596,620)
- Nkrumah, Kwame 恩克鲁玛,克瓦姆(545)
- Nolde, Emil 诺尔迪,爱弥尔(474)
- Nordau, Max 诺尔道,马克斯(366,367)
- Norris, Christopher 诺里斯,克里斯托弗(601)
- Norris, Frank 诺里斯,弗兰克(359)
- Norris, John 诺里斯,约翰(121)
- North, Dudley 诺思,达德利(176)
- Novalis (Georg Hardenberg) 诺瓦利斯(乔治·哈登贝格)(228,234)
- Nove, Alec 诺夫,亚历克(583)
- Nye, Andrea 奈伊,安德里亚(571)
- Oakeshott, Michael 奥克肖特,迈克尔(275,532,611)
- Oates, Titus 奥茨,泰特斯(89,111)
- Occhetto, Achille 奥凯托,阿吉利(585)

- Ockham, William 奥卡姆, 威廉(4, 11, 12, 14, 50, 107, 539)
- O'Connor, Geargus 奥康纳, 费格斯(280)
- Oested, Hans J. 奥斯特, 汉斯·J.(452)
- Oldenburg, Henry 奥尔登伯格, 亨利(41)
- O'Neill, Eugene 奥尼尔, 尤金(462)
- Orage, A. R. 奥雷奇, A. R.(423)
- Oresme, Nicole de 奥雷姆, 尼科尔·德(14, 29)
- Orsini, Felice 奥尔西尼, 菲利斯(356)
- Ortega y Gasset, José 奥尔特加·y·加塞特, 胡塞(导论:5, 正文:191, 442, 446, 465)
- Orwell, George 奥威尔, 乔治(352, 395, 473, 487, 528, 529, 534, 535, 542)
- Osborne, John 奥斯本, 约翰(544)
- Ostrogorski, M. 奥斯特罗果尔斯基, M.(411)
- Overton, Richard 奥弗顿, 理查德(82, 83)
- Owen, Robert 欧文, 罗伯特(268, 270, 276, 280, 302)
- Owen, Wilfrid 欧文, 威尔弗雷德(431)
- Paine, Thomas 潘恩, 托马斯(192, 213)
- Paley, William 佩利, 威廉(258, 325)
- Palissot, Charles 帕里索, 夏尔(205)
- Palladio, Andrea 帕拉第奥, 安德烈亚(99, 112)
- Pankhurst, Emmeline, Sylvia, Christabel 潘克赫斯特, 埃米琳, 西尔维亚, 克里斯特贝尔(568)
- Pannenberg, W. 潘年伯格, W.(615)
- Papini, Giovanni 帕皮尼, 乔万尼(380)
- Paracelsus, Philippus 帕拉切尔苏斯, 菲利普斯(39)
- Pareto, Vilfredo 帕累托, 维尔夫雷多(302, 411, 416, 417)
- Parker, Henry 帕克, 亨利(80)
- Parsons, Talcott 帕森斯, 塔尔科特(607)
- Pascal, Blaise 帕斯卡, 布莱斯(37, 39, 40, 43, 47, 56, 57, 135)
- Pasternak, Boris 帕斯捷尔纳克, 鲍里斯(481)
- Pasteur, Louis 巴斯德, 路易(292, 323, 329)
- Pater, Walter 佩特, 沃尔特(导论:7, 正文:357)
- Pattison, Mark 帕蒂森, 马克(329, 606)
- Paul, St. 保罗, 圣(21)

Pauli, Wolfgang	泡利, 沃尔夫冈(123, 459)
Pavarotti, Luciano	帕瓦罗蒂, 鲁契亚诺(626)
Pavlov, Ivan	巴甫洛夫, 伊凡(500)
Pearsall-Smith, Logan	皮尔索尔 - 史密斯, 洛根(473)
Péguy, Charles	贝玑, 夏尔(342, 415, 418, 424, 428, 430)
Peirce, Charles	皮尔斯, 查尔斯(563)
Pepys, Samuel	佩皮斯, 塞缪尔(109, 111)
Perrault, Charles	佩罗, 夏尔(100)
Pestalozzi, Johann	裴斯泰洛齐, 约翰(191)
Pétain, Marshall Henry Philippe	贝当, 马歇尔·亨利·菲利普(513)
Peter the Great, Tsar	沙皇彼得大帝(239)
Petrashkevsky, Mikhail	彼得拉舍夫斯基, 米哈依尔(271)
Petty, William	配第, 威廉(112, 176)
Philby, Kim	菲尔比, 吉姆(483, 525)
Picard, Jean	皮卡特, 让(60)
Picasso, Pablo	毕加索, 巴伯罗(375, 460)
Pigou, Arthur	庇古, 亚瑟(261, 491)
Pirandello, Luigi	皮兰德娄, 路易吉(469)
Pisarev, Dmitri	皮萨列夫, 德米特里(399)
Pius IX, Pope	庇护九世, 教皇(341)
Pius XI, Pope	庇护十一世, 教皇(441)
Place, Francis	普赖斯, 弗朗西斯(257)
Planck, Max	普朗克, 马克斯(330, 451, 452, 456, 474)
Plato	柏拉图(2, 3, 5, 6, 20, 21, 30, 31, 43, 67, 104, 121, 159, 367, 382)
Plekanov, G .V .	普列汉诺夫, G .V .(399, 400)
Poincaré, Henri	庞加莱, 亨利(451, 466)
Pollock, Jackson	波洛克, 杰克逊(623)
Polybius	波利比乌斯(84)
Pompadour, Jeanne, Marquise de	蓬巴杜尔, 热内, 侯爵夫人(146, 147)
Pontecorvo, Bruno	篷泰科尔沃, 布鲁诺(525)
Pope, Alexander	蒲柏, 亚历山大(114, 120, 124, 148, 173, 187, 199)
Popper, Karl	波普尔, 卡尔(291)
Pound, Ezra	庞德, 埃兹拉(377, 443, 445, 460)
Poussin, Nicolas	普桑, 尼古拉(26)
Prevost-Paradol, Lucien	普雷沃 - 帕拉多尔, 吕西安(406)



- Prezzolini, Giuseppe 佩佐里尼, 朱赛普(380)
- Priestley, J. B. 普里斯特利, J. B. (533)
- Priestley, Joseph 普里斯特利, 约瑟夫(214, 330)
- Prince, Morton 普林斯, 莫顿(463)
- Princip, Gavriilo 普林西普, 加夫里洛(402)
- Prokofief, Sergei 普罗科菲耶夫, 谢尔盖(481, 527)
- Proudhon, Pierre - Joseph 蒲鲁东, 彼埃尔—约瑟夫(269, 276, 280, 289, 301, 309, 391, 398)
- Proust, Marcel 普鲁斯特, 马塞尔(351, 376, 446, 460, 462, 470, 501, 626)
- Psichari, Ernest 普西夏里, 欧内斯特(431)
- Ptolemy 托勒密(2, 31)
- Pufendorf, Samuel 普芬道夫, 塞缪尔(90, 94)
- Pusey, E. B. 普西, E. B. (236)
- Pushkin, Alexander 普希金, 亚历山大(228, 243, 369)
- Pyrrho of Elis 埃利斯的皮朗(5)
- Pythagoras 毕德戈拉斯(30, 35)
- Quesnay, Francois 魁奈, 弗朗索瓦(175, 177, 193)
- Quinet, Edgar 基内, 埃德加(234, 279)
- Rachmaninoff, Sergei 拉赫马尼诺夫, 谢尔盖(481)
- Racine, Jean 拉辛, 让(97)
- Radek, Karl 拉狄克, 卡尔(482)
- Radishchev, Alexander 拉吉舍夫, 亚历山大(194)
- Rahner, Karl 拉纳, 卡尔(614)
- Raleigh, Sir Walter 雷利, 沃尔特, 爵士(45, 73)
- Ranbouillet, Catherine, Marquise de 朗布耶, 凯瑟琳, 侯爵夫人(100)
- Ranke, Leopold von 兰克, 利奥波德·冯(183, 287, 311)
- Ravachol, Francois 拉瓦克尔, 弗朗索瓦(402)
- Ravel, Maurice 拉威尔, 莫里斯(375)
- Rawls, John 罗尔斯, 约翰(607)
- Ray, John 雷, 约翰(53, 58)
- Raynal, Guillaume, Abbé 雷纳尔, 纪尧姆, 神父(193)
- Read, Herbert 里德, 赫伯特(432)
- Reade, Winwood 里德, 温伍德(315)

- Reed, John 里德,约翰(436)
- Reich, Wilhelm 赖希,威廉(450)
- Reichold, Ludwig 赖希霍尔德,路德维希(558)
- Reid, Thomas 里德,托马斯(171)
- Remarque, Erich Maria 雷马克,艾里希·马利亚(502)
- Renan, Ernest 勒南,欧内斯特(295,296,339,629)
- Renouvier, Charles 勒努维耶,夏尔(409)
- Reuchlin, Jacob 罗伊希林,雅各布(12)
- Reynolds, Joshua 雷诺兹,乔舒亚(201)
- Rheticus (George Joachim) 雷蒂库斯(乔治·约阿西姆)(33)
- Rhodes, Cecil 罗德斯,塞西尔(478)
- Ricardo, David 李嘉图,大卫(178,180,263,264,271,305,307)
- Richardson, Samuel 理查森,萨缪尔(156,187,200)
- Richelieu, Armand Jean de Plessis, Cardinal 黎塞留,阿尔芒·让·德·普莱西,红衣主教(65,77,98,103,105)
- Richter, Jean - Paul 里克特,让 - 保罗(228,234,239)
- Riefenstahl, Leni 里芬施塔尔,莱妮(493)
- Riemann, Georg 黎曼,格奥尔格(453)
- Rilke, Rainer Maria 里尔克,雷纳·马利亚(376)
- Rimbaud, Arthur 兰波,阿瑟(358,361,365,461)
- Robbe-Grillet, Alain 罗布 - 格里耶,阿兰(540)
- Robbins, Lionel 罗宾斯,列昂奈尔(531)
- Robespierre, Maximilien 罗伯斯庇尔,马克西米连(207 ~ 209,276)
- Robinson, John, Bishop of Woolwich 罗宾逊,约翰,伍利奇主教(615)
- Roemer, Olaus 勒麦,奥劳斯(60)
- Roland, Manon 罗兰,马农(208,214)
- Rolfe, Frederick 罗尔夫,弗雷德里克(422)
- Rolland, Romain 罗兰,罗曼(385,428)
- Rolph, C .H . 罗尔夫,C .H .(577)
- Romains, Jules 罗曼,于勒(501,502)
- Röntgen, Wilhelm 伦琴,威廉(454)
- Roosevelt, Franklin D . 罗斯福,富兰克林·D .(472,480)
- Roosevelt, Theodore 罗斯福,西奥多(426)
- Röpke, Wilhelm 罗普科,威廉(531)
- Rorty, Richard 罗蒂,理查德(602)

- Rosenberg, Alfred 罗森堡,阿尔弗雷德(478 ~ 479)
- Rosenberg, Ethel and Julius 埃塞尔·罗森堡和朱利叶斯·罗森堡夫妇(526)
- Rosenberg, Isaac 罗森堡,艾萨克(431)
- Rossetti, Christina 罗塞蒂,克里斯蒂娜(574)
- Rossetti, Dante G . 罗塞蒂,但丁·G.(242)
- Rossi, Count Pellegrino 罗西,佩列格里诺,伯爵(281)
- Rousseau, Jean-Jacques 卢梭,让-雅克(导论:4,6,正文:93,144,145,150 ~ 163,170,178,185,191,197,200,204 ~ 210,220,222,227,232,233,268,276,288,369,440)
- Royce, Josiah 罗伊斯,乔赛亚(327)
- Rubens, Peter Paul 鲁本斯,彼得·保罗(26,27)
- Rueff, Jacques 鲁夫,雅克(531)
- Rushdie, Salman 拉什迪,萨尔曼(578)
- Ruskin, John 罗斯金,约翰(233,252,302,308,346,350 ~ 353,390)
- Russell, Bertrand 罗素,伯特兰(39,341,343,370,407,421 ~ 422,436,448,457,459,466,484,490,494 ~ 495,505,509,532,540,552,553,606,627)
- Russo, Vincenzo 鲁索,文琴佐(210)
- Rüstow, A . 吕斯托,A.(533)
- Rutherford, Ernest 卢瑟福,欧内斯特(454 ~ 456)
- Ryle, John 赖尔,约翰(579)
- Sacco & Vanzetti 萨科-万泽蒂(436)
- Sade, Marquis de 萨德,侯爵(185,199 ~ 201,548)
- Saint-Just, Louis de 圣鞠斯特,路易·德(204,207)
- Saint-Martin, Louis, Marquis de 圣马丁,路易,侯爵(126,210,239)
- Saint-Simon, Henri, Comte de 圣西门,亨利,伯爵(253,256,268 ~ 270,285,296,302,346)
- Sakharov, Andrei 萨哈罗夫,安德烈(528,556)
- Salome, Lou 萨洛米,卢(570)
- Samuelson, Paul 塞缪尔森,保罗(608)
- Sand, George 桑,乔治(229,243,272,346,354,355,572)
- Santayana, George 桑塔亚那,乔治(419)
- Sarraute, Nathalie 萨洛特,纳塔利(541)

- Sartre, Jean-Paul 萨特, 让 - 保罗 (292, 369, 505 ~ 508, 510, 514, 517 ~ 524, 528, 537 ~ 540, 544 ~ 553, 569, 570, 607)
- Sassoon, Siegfried 萨松, 西格弗里德 (432)
- Saussure, Ferdinand 索绪尔, 费迪南 (561 ~ 563)
- Saussure, Horace de 索绪尔, 贺拉斯·德 (317)
- Savigny, Friedrich 萨维尼, 弗里德里希 (255)
- Say, Jean-Baptiste 萨伊, 让 - 巴蒂斯特 (263)
- Scheele, Karl W. 舍勒, 卡尔·W. (330)
- Scheiner, Christopher 沙伊讷, 克里斯托弗 (37)
- Scheler, Max 舍勒, 马克斯 (380, 429, 474)
- Schelling, Friedrich von 谢林, 弗里德里希 (220, 224 ~ 226)
- Scherer, Edmund 谢勒, 爱德蒙 (407)
- Schiele, Egon 希尔, 埃贡 (431)
- Schiff, Adam 沙夫, 亚当 (551)
- Schiller, Friedrich 席勒, 弗里德里希 (380)
- Schiller, Johann 席勒, 约翰 (217, 219, 227, 229)
- Schlegel, August von 施莱格尔, 奥古斯特·冯 (228, 382)
- Schlegel, Friedrich von 施莱格尔, 弗里德里希·冯 (228)
-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施莱尔马赫, 弗里德里希 (228)
- Schlick, Moritz 石里克, 莫里兹 (495)
- Schmitt, Carl 施密特, 卡尔 (474)
- Schmoller, Gustav 施莫勒, 古斯塔夫 (393)
- Schnitzler, Arthur 施尼茨勒, 亚瑟 (389)
- Schoenberg, Arnold 勋伯格, 阿诺德 (375, 466)
- Schoenerer, Georg von 舍纳勒尔, 格奥尔格·冯 (477)
- Schopenhauer, Arthur 叔本华, 亚瑟 (导言: 4, 正文: 314, 319, 328, 382, 387)
- Schrödinger, Erwin 薛定谔, 埃尔温 (457)
- Schubert, Franz 舒伯特, 弗朗兹 (242)
- Schumann, Robert 舒曼, 罗伯特 (242, 272)
- Schumpeter, Joseph 熊彼特, 约瑟夫 (492)
- Schurz, Carl 舒尔茨, 卡尔 (303)
- Schütz, Alfred 许茨, 阿尔弗雷德 (607)
- Scriabin, Alexander 斯克里亚宾, 亚历山大 (422)
- Scruton, Roger 斯克鲁顿, 罗杰 (598)

- Sedgwick, Adam 塞奇威特, 亚当(325)
- Seeley, John 西利, 约翰(339)
- Seneca, 塞涅加(21)
- Senior, Nassau 西尼尔, 纳索(178, 264, 277)
- Servan-Schreiber, Jacques 塞尔旺 - 施雷贝尔, 雅克(604)
- Sextus Empiricus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599)
- Shaftesbury, 2nd Earl of 沙夫茨伯里, 伯爵二世(91)
- Shaftesbury, 3rd Earl of 沙夫茨伯里, 伯爵三世(130 ~ 132, 175)
- Shaftesbury, 7th Earl of 沙夫茨伯里, 伯爵七世(252, 338)
- Shakespeare, William 莎士比亚, 威廉(21, 26, 27, 43, 44, 241, 597)
- Shallis, Michael 沙利斯, 迈克尔(620)
- Shaw, George Bernard 萧伯纳, 乔治(88, 242, 308, 325, 335, 347, 369 ~ 373, 393 ~ 394, 442, 468, 490)
- Shelley, Mary 雪莱, 玛丽(347)
- Shelley, Percy B. 雪莱, 佩尔西·B.(216, 228, 238)
- Sheriff, R. C. 谢里夫, R. C.(502)
- Shostakovitch, Dmitri 肖斯塔科维奇, 德米特里(481, 527)
- Shukshin, Vasily 舒克申, 瓦西里(580)
- Shute, Neville 舒特, 尼维尔(542)
- Sidney, Algernon 西德尼, 阿尔杰农(91)
- Sieyes, Abbé 西哀耶斯, 神父(211, 263)
- Sillitoe, Alan 西利托, 艾伦(545)
- Silone, Ignazio 西洛内, 伊格纳齐奥(441, 482, 613)
- Simmel, Georg 齐美尔, 乔治(412)
- Simon, Richard 西蒙, 理查德(103, 128, 133, 339)
- Sinclair, Upton 辛克莱, 厄普顿(458, 501)
- Sinyavsky, Andrei 西尼亚夫斯基, 安德烈(528)
- Sismondi, Jean-Charles 西斯蒙第, 让 - 夏尔(263)
- Skinner, B. F. 斯金纳, B. F.(500)
- Smiles, Samuel 斯迈尔斯, 塞缪尔(296, 352)
- Smith, Adam 斯密, 亚当(导论: 3, 正文: 172, 175 ~ 181, 205, 262 ~ 265, 303, 492)
- Smith, Bernard 史密斯, 伯纳德(511)
- Smith, George 史密斯, 乔治(340 ~ 342)
- Smith, William 史密斯, 威廉(318)
- Smollett, Tobias 斯摩莱特, 托拜厄斯(201)

- Smuts, Jan 史沫,扬(224)
- Snow, Charles 斯诺,查尔斯(589)
- Socrates 苏格拉底(5)
- Soddy, Frederick 索迪,弗里德里克(455)
- Solovyev, Vladimir 索洛维约夫,弗拉基米尔(423)
- Solzhenitsyn, Alexander 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556,557,615)
- Sombart, Werner 桑巴特,维尔纳(415,588)
- Sontheimer, Kurt 宗泰默,库尔特(554)
- Sorel, Georges 索雷尔,乔治(312,385,395,402~405,439,440,442)
- Sorley, Charles 索利,查尔斯(431)
- Southcott, Joanna 索思科特,乔安娜(216)
- Spann, Othmar 施潘,奥特马尔(443)
- Spencer, Herbert 斯宾塞,赫伯特(291,310,321,329,332~335,405)
- Spender, Stephen 斯彭德,斯蒂芬(482,620)
- Spener, Philipp 斯彭内尔,菲利普(125)
- Spengler, Oswald 斯宾格勒,奥斯瓦尔德(312,442~447,477)
- Spinoza, Baruch 斯宾诺莎,巴鲁赫(54~56,69,95,107,127,136,195,339)
- Stael, Germaine 斯塔尔,热尔梅娜(214,229,239,253)
- Stahl, Georg 施塔尔,格奥尔特(174)
- Stalin, Josef 斯大林,约瑟夫(291,436,481~488,517,523~528,544)
- Stanhope, Charles 斯坦诺普,查尔斯(262)
- Stark, Johannes 斯塔克,约翰内斯(460,473)
- Starkie, Enid 斯塔基,伊妮德(377)
- Stein, Gertrude 斯坦因,格楚德(444,466)
- Steinbeck, John 斯坦贝克,约翰(501)
- Steinem, Gloria 斯泰纳姆,格洛丽亚(570)
- Stendhal (Henri Beyle) 司汤达(亨利·培尔)(238,241,246,354)
- Stephen, James Fitzjames 斯蒂芬,詹姆斯·费茨詹姆斯(345)
- Stephen, Leslie 斯蒂芬,莱斯利(342)
- Stephenson, George 斯蒂芬森,乔治(352)
- Sterne, Laurence 斯特恩,劳伦斯(119)
- Stevenson, Robert Louis 史蒂文森,罗伯特·路易(337,376)

- Stewart, Dugald 斯图尔特, 杜格尔德(171, 214)
- Stillingfleet, Edward, Bishop 斯蒂林弗利特, 爱德华, 主教(121)
- Stirner, Max 施蒂纳, 马克斯(300, 403)
- Stolypin, Peter 斯托雷平, 彼得(402)
- Stone, Lawrence 斯通, 劳伦斯(611)
- Strachey, John 斯特拉奇, 约翰(484)
- Strachey, Lytton 斯特拉奇, 利顿(342)
- Strasser, Gregor 施特拉塞尔, 格雷戈尔(479)
- Strauss, David 斯特劳斯, 大卫(290, 339)
- Strauss, Richard 斯特劳斯, 理查德(384, 474)
- Stravinsky, Igor 斯特拉文斯基, 伊戈尔(375, 460, 481)
- Strindberg, J. August 斯特林堡, J·奥古斯特(362)
- Suarez, Francesco 苏亚雷兹, 弗朗西斯科(78)
- Sue, Eugene 苏, 欧仁(280)
- Sullerot, Evelyne 絮勒罗特, 伊芙林(573)
- Sullivan, Louis 沙利文, 路易(376)
- Sumner, William Graham 萨姆纳, 威廉·格雷厄姆(335)
- Swedenborg, Emmanuel 斯维登堡, 伊曼纽尔(236)
- Swift, Jonathan 斯威夫特, 乔纳森(69, 100, 110, 137, 187, 201, 418)
- Swinburne, Algernon 斯温伯恩, 阿尔杰农(227, 356, 357)
- Symons, Julian 西蒙兹, 朱利安(577)
- Synge, John 辛格, 约翰(374)
- Szilard, Leo 齐拉特, 列奥(500)
- Tagore, Rabindranath 泰戈尔, 罗宾德拉纳特(423)
- Taine, Hippolyte 泰纳, 伊波利特(156, 199, 296)
- Tanner, Michael 坦纳, 迈克尔(591)
- Tarle, Eugene 塔尔列, 尤金(528)
- Tawney, R. H. 托尼, R. H. (129)
- Taylor, Jeremy 泰勒, 杰里米(74)
- 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德日进, 彼埃尔(629)
- Tennyson, Alfred 丁尼生, 阿尔弗雷德(228, 267, 321, 354)
- Thackeray, William M. 萨克雷, 威廉·M. (233, 347, 354)
- Thatcher, Margaret 撒切尔, 玛格丽特(575)
- Thales 泰勒斯(2, 3)

- Thomas, Albert 托马斯,阿尔伯特(400)
- Thomas, Edward 托马斯,爱德华(431)
- Thompson, Francis 汤普森,弗朗西斯(419)
- Thomson, James 汤姆森,詹姆斯(197)
- Thomson, Joseph J. 汤姆森,约瑟夫 J.(454)
- Thoreau, Henry David 梭罗,亨利·大卫(233,241,368,552)
- Thorez, Maurice 多列士,莫里斯(526,528)
- Tiepolo, Giovanni 提埃坡罗,乔万尼(199)
- Tillich, Paul 蒂利希,保罗(489,614)
- Tindal, Matthew 廷德尔,马修(131)
- Tintoretto (J. Robusti) 丁托列托(J·罗布斯蒂)(25,26)
- Tito (J. Broz) 铁托,(J·布罗茨)(525,545)
-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亚里克西斯·德(91,255,278,343 ~ 345,406,448)
- Toland, John 托兰德,约翰(131)
- Tolkien, J. R. R. 托尔金, J. R. R.(614)
- Tolstoy, Leo 托尔斯泰,列夫(239,349 ~ 351,354 ~ 356,366 ~ 369,552)
- Tonnies, Ferdinand 滕尼斯,费迪南(412,417)
- Torricelli, Evangelista 托里拆利,伊万格里斯塔(37,40,47)
- Toynbee, Arnold J. 汤因比,阿诺德·J.(3,129,142)
- Toynbee, Philip 汤因比,菲利普(497)
- Trakl, Georg 特拉克尔,格奥尔格(431)
- Trevor-Roper, Hugh 特里弗-罗珀,休(483)
- Trilling, Lionel 特里林,莱昂内尔(242,408)
- Trollope, Anthony 特罗洛普,安东尼(347,477)
- Trotsky, Leon 托洛茨基,列昂(434,461,487)
- Turati, Filippo 屠拉蒂,菲利普(398)
- Turgenev, Ivan 屠格涅夫,伊凡(313,354 ~ 356,368)
- Turgot, A. R. J. 杜尔哥, A. R. J.(265)
- Turing, Alan 图灵,艾伦(514)
- Tweedie, Jill 特威迪,吉尔(578)
- Tylor, E. B. 泰勒, E. B.(334)
- Tzara, Tristan 查拉,特里斯坦(461)
- Unamuno, Miguel de 乌纳穆诺,米格尔·德(546)



- Upward, Edward 厄普沃德, 爱德华(486)
- Vacher de Lapouge, Claude 瓦歇·德·拉普日, 克劳德(312)
- Valéry, Paul 瓦莱里, 保罗(366, 446, 605)
- Vanbrugh, John 范布勒, 约翰(109, 113)
- Van Gogh, Vincent 凡高, 文森特(375, 622)
- Van Musschenbroeck, Pierre 范·穆申布鲁克, 彼埃尔(173)
- Velasquez, Diego 委拉斯凯兹, 迭戈(25, 26)
- Verdi, Giuseppe 威尔第, 朱塞普(281, 355)
- Verlaine, Paul 魏尔兰, 保罗(362, 365, 366)
- Vermeersch, Jeanette 弗美尔什, 珍妮特(527)
- Vesalius, Andreas 维萨里, 安德鲁斯(29, 40)
- Vico, Giambattista 维柯, 詹巴蒂斯塔(182, 185, 285, 294, 404, 463)
- Victoria, Queen 维多利亚, 女王(247, 546)
- Vigny, Alfred 维尼, 阿尔弗雷德(229)
- Villiers de l'Isle-Adam, Philippe, Comte de 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 菲利普, 伯爵(364)
- Volta, Alessandro 伏打, 亚历山德罗(174)
- Voltaire (F. - M. Arouet) 伏尔泰(F. - M. 阿鲁埃)(导论: 3, 4, 正文: 57, 64, 101, 108, 119, 124, 133 ~ 140, 146 ~ 150, 151, 154, 155, 157, 158, 161, 163, 178, 180, 181, 193, 197, 206, 208, 231, 274, 275, 285)
- Vossler, Karl 沃斯勒, 卡尔(429)
- Wagner, Adolf 瓦格纳, 阿道夫(393)
- Wagner, Richard 瓦格纳, 理查德(282, 362, 363, 366, 369, 382, 383, 463, 468, 478, 626)
- Wain, John 韦恩, 约翰(541, 544)
- Wakefield, Gilbert 韦克菲尔德, 吉尔伯特(210)
- Wallace, Alfred 华莱士, 阿尔弗雷德(316)
- Wallace, Henry A. 华莱士, 亨利·A.(511)
- Wallas, Graham 华莱斯, 格雷厄姆(412, 413)
- Wallis, John 沃利斯, 约翰(54)
- Walpole, Robert 沃波尔, 罗伯特(186)
- Walras, M. E. L. 瓦尔拉斯, M. E. L.(307, 608)
- Walwyn, William 沃尔温, 威廉(82)

- Ward, Mrs . Humphrey 沃德,汉弗雷,夫人(342)
- Warner, Sylvia Townsend 沃纳,西尔维亚·汤森(488)
- Warton, Thomas 沃顿,托马斯(233)
- Watson, John B . 沃森,约翰·B.(500)
- Waugh, Evelyn 沃,伊芙林(443,445,488,541)
- Webb, Beatrice 韦布,比阿特丽斯(347,393,394,482,484,513,606)
- Webb, Sidney 韦布,西德尼(394,482,484,513)
- Weber, Alfred 韦伯,阿尔弗雷德(516,532)
- Weber, Max 韦伯,马克斯(导论:3,正文:295,381,411,412,414~417,428,533,550,628)
- Webern, Anton 韦伯恩,安东(513)
- Weil, Simone 韦伊,西蒙娜(419,509)
- Weitling, Wilhelm 魏特林,威廉(300)
- Weizsaecker, C.F.von 魏茨泽克,C.F.冯(459)
- Wellhausen, Julius 韦尔豪森,尤利乌斯(340)
- Wells, H.G. 威尔斯,H.G.(导论:3,正文:371~373,394,408,426,442,445,455,516)
- Werner, Abraham 威尔纳,亚伯拉罕(317)
- Wesker, Arnold 韦斯克,阿诺德(488)
- Wesley, John 卫斯里,约翰(125,129,134,236)
- West, Rebecca 韦斯特,吕贝卡(525)
- Weyl, Nathaniel 韦尔,纳撒尼尔(483)
- Whewell, William 休厄尔,威廉(279)
- Whichcote, Benjamin 惠奇科特,本杰明(53)
- White, Haydon 怀特,海登(导论:5)
- Whitehead, Alfred 怀特海,阿尔弗雷德(43,203,459)
- Whitman, Walt 惠特曼,沃尔特(366,407,430)
- Wilberforce, Bishop Samuel 威尔伯福斯,塞缪尔,主教(326)
- Wilberforce, William 威尔伯福斯,威廉(218,328)
- Wilde, Lady Jane 王尔德,简,夫人(306)
- Wilde, Oscar 王尔德,奥斯卡(357,361,363,364,430)
- Wilhelm II of Germany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391,478)
- William III of England 英国国王威廉三世(106,112)
- Williams, Charles 威廉斯,查尔斯(541,614)
- Williams, Roger 威廉斯,罗杰(75)

- Williams, Tennessee 威廉斯,田纳西(623)
- Wilson, Angus 威尔逊,安格斯(541)
- Wilson, C.T.R. 威尔逊,C.T.R.(459)
- Wilson, Edmund 威尔逊,爱德蒙(364,589)
- Wilson, Harold 威尔逊,哈罗德(553)
- Winckelmann, Johann 温克尔曼,约翰(201)
- Winstanley, Gerrard 温斯坦莱,杰拉德(83,84)
- Wittgenstein, Ludwig 维特根斯坦,路德维希(386,449,494,495,497~499,538~540)
- Wolf, Fred Alan 沃尔夫,弗雷德·艾伦(616)
- Wolff, Christian 沃尔夫,克里斯蒂安(125,189,220)
- Wollstonecraft, Mary 沃斯通克拉夫特,玛丽(213,346,572)
- Woolf, Virginia 伍尔芙,弗吉尼娅(342,373,376,384,444,460,469,504,505,568,571,572,576,623,626)
- Wordsworth, William 华兹华斯,威廉(228,232,233,241)
- Wren, Christopher 雷恩,克里斯托弗(99,112,113)
- Wright, Frank Lloyd 赖特,弗兰克·劳埃德(351,376,423)
- Wundt, Wilhelm 冯特,威廉(387)
- Wycherley, William 威彻利,威廉(109)
- Yeats, William Butler 叶芝,威廉·巴特勒(357,365,381,385,407,423,424)
- Young, Arthur 扬格,阿瑟(265)
- Young, Edward 扬格,爱德华(202)
- Zamyatin, Y. 扎米亚京,y.(534)
- Zetkin, Clara 蔡特金,克拉拉(570)
- Zevi, Sabbatai 泽维,萨巴泰(195)
- Zola, Emile 左拉,爱弥尔(337,354,356~359)
- Zweig, Stefan 茨威格,斯蒂芬(473)

## 概 念

- Academies, Scientific and Literary 科学院和文学院(41,45,47,61,77,98,111,122)
- Action Francaise 法兰西行动(见夏尔·莫拉斯)

Albigensians	阿尔比教徒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280, 368, 398, 399, 401 ~ 403, 440, 457, 533, 552)
Anthropology	人类学(334, 561, 612)
Anti - Semitism	反犹主义(383, 438, 477, 478, 480)
Arabs, Arabic civilization	阿拉伯人, 阿拉伯文明(9, 28, 128, 135)
Architecture	建筑学(7, 24 ~ 27, 97, 113, 187, 188, 198)
Arminianism	阿明尼乌派(73)
Art	艺术(2, 33, 135, 152 ~ 154, 163, 也见于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 立体主义; 达达主义; 表现主义; 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Atheism	无神论(11, 83, 85, 87, 116, 125, 127 ~ 130, 150, 161)
Atomic energy	原子能(454 ~ 456, 517, 525)
Averroism	阿威罗伊主义(30)
Baroque style	巴洛克风格(20 ~ 27, 98, 113)
Bible	圣经(8, 21, 37, 76, 83, 103, 107, 124, 127 ~ 133, 243, 297, 315, 318, 337 ~ 341, 447)
Biology	生物学(315 ~ 322, 460, 618, 619)
Buddhism	佛教(见印度思想)
Byzantine civilization	拜占廷文明(8)
Calas case	卡拉案件(149)
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18, 20, 33, 72, 73, 80 ~ 82, 107, 130, 175, 327, 447)
Cambridge Platonists	剑桥柏拉图主义者(53, 57, 74, 121, 129)
Cameralism	财政主义(190)
Capitalism	资本主义(175, 178, 269, 300 ~ 307, 344, 350, 413 ~ 415, 435, 441, 477, 481, 491, 492, 533, 546, 550, 553, 558, 586, 587, 600)
Cartesianism	笛卡儿主义(见笛卡尔)
Catharism	清洁派(7, 17)
Catholicism	天主教(见基督教教会)
Causation	因果关系(33, 42, 54, 168)

- Chartism 宪章运动(280,282)
- Chemistry 化学(174,330,455)
- Christian Churches 基督教教会
-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国教(73~76,81,109,121,129,134)
- Protestant Dissenters 新教的非国教徒(74,75,130)
- Roman Catholic 罗马天主教(33,37~39,72)
- Unitarianism 上帝一位论(135)
- Classicism 古典主义(见新古典主义)
- Communism 共产主义(83)
- Computers 计算机(515,619)
- 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212,213,248,250~256,488,532,535,536,585,598)
- Council of Constance 康斯坦茨会议(68)
- Council of Trent 特伦托会议(37)
- Counter - 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运动(17,24)
- 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267)
- Cubism 立体派(374,466)
- Dadaism 达达主义(461)
- Darwinism 达尔文主义(6)
- Decembrists 十二月党人(239,434)
- Deconstruction 解构主义(559,574,590,592~599)
- Deism 自然神论(17,22,57,121,127~136,143~145,148,155,170,199,203)
- Democracy 民主(67,82~85,93,150,151,158,159~162,208,249,255,259,275~278,405~411,438,440,477,531,532)
- Edict of Nantes 南特敕令(19,73)
- Economic theory 经济理论(19,175~181)
- Education 教育(14,156,157,185,250,406,626)
- Empiricism 经验主义(47,52,62,82,116~121,164~166,203)
- Encyclopedia, French 百科全书(法国)(143~147)
- Enlightened Despotism 开明专制(150,190~194)

-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20, 55, 59, 63, 119, 127 ~ 163, 219, 222, 230, 275, 299)
- Environmentalism 环境主义 (538, 579 ~ 581)
- Epicureanism 享乐主义 (15, 17, 53, 54)
- Erastianism 埃拉斯都主义 (20, 76)
- European Community 欧洲共同体 (531)
- Evangelicalism 福音派教义 (214, 236, 338)
- Evolution 进化 (见“社会达尔文主义”)
-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 (23, 57, 292, 505 ~ 508, 514, 517 ~ 520, 546)
- Expressionism 表现主义 (374)
- Fabian socialism 费边社会主义 (见社会主义)
-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384, 404, 410, 437 ~ 442)
- Feminism 女性主义 (213, 259, 336, 343, 346, 347, 360, 371, 568 ~ 577)
-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见革命)
- Futurism 未来主义 (376, 466, 569)
- Gallicanism 高卢主义 (104, 192)
- Geology 地质学 (317 ~ 322)
- Gnosticism 诺斯替教 (7, 106, 194)
- Gordon riots 戈登暴动 (149)
- Great chain of being 伟大的存在之链 (导论: 6, 正文: 319)
- Hegelianism 黑格尔主义 (142, 160)
- History, history studies 历史学, 历史研究 (导论: 4 ~ 6, 正文: 19, 142, 171, 181 ~ 184, 289, 309 ~ 313, 510, 516, 562 ~ 565, 573, 594, 611 ~ 612)
- History, intellectual 思想史 (导论: 3 ~ 7)
- Holocaust 大屠杀 (512)
- Holy Alliance 神圣同盟 (239)
- Homosexuality 同性恋 (576)
- Huguenots 胡格诺教徒 (73, 77, 82, 86, 104)
- Humanism 人文主义 (2, 8, 12 ~ 16, 20, 30, 194)

- Idealism 唯心主义(164 ~ 167)
- Ideologues 观念学派(214, 227, 576)
- Imagism 意象主义(377)
-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336, 426, 545)
- Indian thought 印度思想(186, 234, 423, 604, 615)
-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导论:6, 正文:261)
-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174)
- Intellectuals 知识分子(206 ~ 208, 282, 304, 358, 394, 395, 407, 440, 448, 449, 480 ~ 486, 494)
- Irrationalism 非理性主义(328, 365, 377, 378, 401 ~ 404, 413)
- Islam 伊斯兰教(616)
- Jansenism 詹森主义(52, 56, 135, 192)
- Jesuits (Society of Jesus) 耶稣会(18, 20, 24, 37, 49, 53, 72, 135, 192)
- Jews, Judaism 犹太人, 犹太教(257, 341, 349, 425, 448, 477)
- Kabbala 希伯来神秘哲学(16, 194)
- Labor theory of value 劳动价值理论(180, 307)
- Labour Party 工党(308, 395, 433, 514, 530, 586, 588)
- Latitudinarians, Anglican 圣公会的广教论者(73 ~ 76, 129 ~ 130)
-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433, 516)
- Levellers 平等派(83)
- Leyden, University of 莱顿大学(73)
- Liberalism 自由主义(66, 70, 175 ~ 177, 225, 247, 248, 250, 256 ~ 260, 277, 288, 333, 343 ~ 347, 391)
- Liberty Party 自由党(308, 394, 433)
- Linguistics 语言学(567)
- Lisbon earthquake 里斯本大地震(148)
- Logical Positivism 逻辑实证主义(495, 497 ~ 500)
- Lutheranism 路德教(12, 14, 18, 21, 33, 83)
- Mannerism 风格主义(25)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84, 142, 180, 298 ~ 309, 396 ~ 400, 434 ~ 435, 450, 545 ~ 560, 565, 585)

-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 (50, 53, 56, 121, 252, 286, 295, 298, 418, 500)
- Mathematics 数学 (28, 30, 38, 48, 49, 59 ~ 62, 122, 138, 174)
-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176)
- Middle Ages 中世纪 (2, 4, 6 ~ 9, 28 ~ 30, 66 ~ 70)
- Modernism 现代主义 (373 ~ 377, 460 ~ 470, 481, 599 ~ 605)
-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迈克尔森—莫雷实验 (452)
- Modernization 现代化 (182, 413 ~ 417)
- Motion pictures 电影 (493, 502, 578)
- Music 音乐 (98, 198, 242, 243, 281, 375, 415, 466, 481)
- Napoleonic wars 拿破仑战争 (214 ~ 217)
-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194, 217, 239, 245 ~ 246, 273 ~ 275, 287, 288, 310, 424, 425, 460, 528)
- National Socialism (Nazism) 民族社会主义 (纳粹主义) (437, 442, 472 ~ 479, 504, 510 ~ 512)
- Naturalism 自然主义 (见文学)
- Nature, idea of 自然观 (41 ~ 44)
- Neo - classicism 新古典主义 (219, 229, 292)
- Neo - Platonism 新柏拉图主义 (2, 9, 42, 194)
- New Left 新左派 (544 ~ 553, 588)
- Occultism 神秘主义 (422)
- Oratorians 奥拉托利派 (53)
- Oxford movement 牛津运动 (236, 256)
- Pacifism 和平主义 (266, 368, 433, 501, 509, 512)
- Padua, University of 帕多瓦大学 (29, 30, 71)
- Painting 绘画 (24 ~ 26, 198)
- Pantheism 泛神论 (54 ~ 64)
- Phenomenology 现象学 (506, 507, 518, 519)
- Philosophes 启蒙思想家 (206 ~ 209, 210, 254)
- Philosophy 哲学 (494 ~ 499, 607, 又见存在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 现象学; 柏格森; 黑格尔; 康德; 萨特; 维特根斯坦)



- Physics 物理学(330,451~459,499,616~618)
- Physiocrats 重农学派(150,175~178,193,205)
- Pietism 虔信主义(103,125)
- Platonism 柏拉图主义(5~8,20,30,38,43,67,104,121,159)
-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见经济思想)
-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科学(413~418,607)
- Politiques 政治家学派(19,22,73)
- Popular culture 大众文化(448,493,600)
- Populism 民粹主义(306,399,434)
- Pornography 色情文学(467,548~549,577~579)
- Positivism 实证主义(292~297,333)
- Post - 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599~604)
- Pragmatism 实用主义(328,379,380)
- Pre - Raphaelites 拉斐尔前派画家(356)
- Progress, idea of 进步观念(21,182~184,279,284~314,445~447)
- Protestantism 新教(4,17,18,22,71~74)
- Psychology, psychoanalysis 心理学,精神分析学(16,184,185,240~242,385~389,419~421,449~451,500,507,518,560,567,574,612)
- Puritan Revolution 清教徒革命(见革命)
- Quarrel of Ancients and Moderns 古今之争(100)
- Quietism 寂静主义(103)
- Racism 种族主义(312,477~480)
-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5,8,48~58,79,83,91,102~103,121~125,127~132,195 休谟对理性的批判 168~171,也见非理性主义)
-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12,16~18,71~74)
- Religion, religious ideas 宗教信仰(222,231~232,235~236,239,253,293,323~327,334,337~348,418~424,447~448,537~539,613~616)
- Religious toleration 宗教宽容(71~76,104,130,187)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2,12~17,71,96,182)
Revolutions	革命
<i>of</i> 1830	1830年革命(247)
<i>of</i> 1848	1848年革命(279~283,300,357)
<i>French</i> (1789)	法国大革命(导论:4,正文:161~163,181,186,204~214,237,279,573)
<i>Glorious Revolution of</i> 1688	1688年光荣革命(66,76,77,89~90,93~95,108,111,129)
<i>Parisian</i> (1871)	巴黎革命(1871年)(302,307)
<i>Polish</i> (1863)	波兰革命(1863年)(301)
<i>Puritan</i>	清教徒革命(65~66,73~76,80~84,89)
<i>Russian</i> (1917)	俄国革命(1917年)(433~436)
<i>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Student</i> , 1968	17世纪英国革命(89~95,260) 1968年学生革命(552~554)
Rococo style	洛可可风格(198,201)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23,24,55,156,195,206~244,278,299,355)
Salons	沙龙(100,101,144)
Scholasticism	经院哲学(8~12,14,20,28,29,45,48)
Science	科学
<i>ancient</i>	古代科学(5,9)
<i>early modern</i>	近代早期科学(28~65)
<i>Kant and</i>	康德和科学(220~222)
<i>Medieval</i>	中世纪科学(15,16,28,29)
<i>nineteenth century</i>	19世纪科学(329~331,378)
<i>positivism and</i>	实证主义与科学(293~298,495~501)
scientific revolution of seventeenth century	17世纪科学革命(导论:5)
twentieth century revolution in	20世纪科学革命(329,451~460,496,499,500,616~620)
Science fiction	科幻小说(371~373)
Scientific humanism	科学人文主义(500)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热力学第二定律(329)
Secularization	世俗化(331)

- Semiotics 符号学(562,563)
- Sexuality, sexual revolution 性,性革命(369~371,388,450,548,549,577~579)
- Skepticism 怀疑主义(5,21,72,106~108,164~173)
- 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86~94,137,158~163,170)
-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332~337,426,475)
- Socialism, 社会主义(158~163,246~250,268~272,344,350,351,390~405,415,450,489,490,521~524,552,555,557,585~587)
- Christian* 基督教社会主义(353,393)
- early, "utopian"* 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209,268~272,280)
- Fabian* 费边社会主义(262,391,393~396,490)
- Marxian* 马克思社会主义(390,391,396~401)
-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173,174,也见“社会学”)
- Sociology 社会学(173,174,185,255,295,333,411~418,606,607,611,612)
-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485,487,502)
- State, the (sovereign) (主权)国家(19,20,65~71,75,77~80,86~89)
- Structuralism 结构主义(560~568)
- Sturm und Drang 狂飙突进运动(227)
- Surrealism 超现实主义(461,481,547)
- Symbolism 象征主义(360~369)
- Technology 技术(14,124,174)
- Terrorism 恐怖主义(402,555)
-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65,94,96)
- Trade unions 工会(280,401,586)
- Trade unionism 工联主义(395,400)
- Unitarianism 惟一神论派(见基督教教会)
- Urbanization 城市化(412~414)
-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257~262,267)
-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553)
- Vitalism 生机论(328,379)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289,391,394,514,531)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380,427~433,511)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500,509~515)
Young Hegelians	青年黑格尔派(289,290,298,299,403)
Young Italy	青年意大利党(218,246,279)
Youth movements	青年运动(279,430,547~553)
Zionism	犹太复国主义(385,425)

# 推荐文献

译者说明:

原书两个版本均附有推荐文献,但体例有所不同。旧版本是分章列举文献,新版本是按照主题列举文献。中译本的前6章取自旧版本,后11章取自新版本。因此下面的文献也分成两个部分。

## (一)第一章—第六章推荐文献

### General Works

Suggested general works at the broadest level include John H. Randall, Jr.,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 (1940) and *The Career of Philosophy* (2 vols., 1970); Meyrick H. Carré, *Phases of Thought in England* (1949); Frederick Copleston,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8 vols., 1950–1967); Franklin L. Baumer (ed.), *Main Currents of Western Thought* (3rd ed., 1970), an excellent selection of source readings. A recent textbook, *The Emergence of Liberal Human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by W. H. Coates, J. S. Schapiro and H. V. White (2 vols., 1966–1970)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older Harry Elmer Barnes,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3 vols., 1937), also J. Bronowski and B. Mazlish,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Leonardo to Hegel* (1960). See also Friedrich Heer,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urope* (tr. 1966), and Philippe Wolff, *Histoire de la pensée européenne*, a multivolume French series of which the first volume was published in 1971. Also notable are distinguished histories of special areas of thought: for example, George H. Sabine,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3rd ed., 1961); Marcel Prélot, *Histoire des idées politiques*

(4th ed., 1970); Emory S. Bogardu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Thought* (4th ed., 1960); Eduard Heimann, *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s* (1964); René Taton, *History of Science* (4 vols., 1964–1966); Gilbert Highet,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1967);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1946); Arnold Hauser, *Social History of Art* (4 vols., 1963); Nikolaus Pevsner, *An Outline of European Architecture* (7th ed., 1963); Donald Jay Grout,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1960);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4 vols., 1955–1963); William Boyd,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9th ed., 1968); Walter M. Horton, *Christian Theology* (1955). For gener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by various authors (12 vols., 1957–1968).

## Chapter 1

Many of the works cited under *General Works* are valuable for obtaining an overview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 prior to modern times, for example, the earlier portions of Baumer, Lovejoy, Highet, Randall's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 and Carré. Herschel Baker, *The Image of Man: A Study of The Idea of Human Dignit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1947) is a book with breadth and flair. There are some excellent surveys of medieval philosophy, mostly not too technical, including Gordon Leff, *Medieval Thought* (1958); David Knowles, *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Thought* (1962); Etienne Gilson, *History of Christian Philosophy in the Middle Ages* (1955), a classic; Armand A. Maurer, *Medieval Philosophy* (1962); Walter Ullman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Middle Ages* (1965); John B. Morrall, *Political Thought in Medieval Times* (1958); Thomas Gilby (ed.), *St. Thomas Aquinas: Philosophical Texts* (1960); Charles H. Haskins,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1953); and J. Huizinga,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1924).

Paul O. Kristeller's *The Classics and Renaissance Thought* (1955), published in paperback as *Renaissance Thought*, is a masterful condens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covery of knowledg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See also his more recent *Renaissance Concepts of Man* (1973). Federico Chabod, *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 (1958) is the work of a great modern historian and contains a valuable bibliographical essay. G. de Santillana (ed.), *The Age of Adventure* (1956) begins the useful and inexpensive Mentor series of five volumes on the philosophers. Wallace K. Ferguson's *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 (1948) clarifies the question of this period's role in history. Volumes recently published on the Renaissance include some round-ups of current scholarship and some symposia: Bernard O'Kelly (ed.), *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Man and His World* (1966); Charles H. Singleton (ed.), *Art, Science and History in the Renaissance* (1967); and Eric Cochrane (ed.), *The Late Italian Renaissance* (1970). In *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in the Age of Humanism* (1965), Rudolf Wittkower makes luminously clear the foundations of Western order in the arts. Roberto Weiss, *The Spread of Italian Humanism* (1964) is a helpful summary.

J. S. Whale, *The Protestant Tradition* (1955); Karl Holl,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formation* (1911, repr. 1959); H. Daniel-Rops, *The Counter-Reformation* (1962); and Owen Chadwick, *The Reformation* (Volume III of *The Pelican History of the Church*, 1964) provide varying views of the Reformation. George H. Williams, *The Radical Reformation* (1962) is a thorough treatment of its significant subject. Gordon Leff, *Heres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2 vols., 1967) provides necessary background for the Protestant revolt. A. G. Dickens, *The Counter-Reformation* (1969) comes from an outstanding Reformation scholar. Further light on the troubled sixteenth century is shed by Lucien Febvre,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1946); Richard H. Popkin,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Erasmus to Descartes* (1960); and Hiram Haydn, *The Counter-Renaissance* (1950).

J. B. Bamborough, *The Little World of Man* (1952) and C. S. Lewis, *The Discarded Image* (1964) are brilliant dissections of the premodern psychology and outlook. On the baroque style, Frederick B. Artz,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Romanticism: Trends in Style, Art, Literature and Music 1300-1800* (1962); Jean Rousset, *Circe et le Paon* (1953); Jacques Ehrmann, *Un Paradis désespéré: L'Amour et l'illusion dans "L'Astrée"* (1963); Imbrie Buffum, *Studies in the Baroque from Montaigne to Rotrou* (1957); and a quantity of art books, of which Victor L. Tapié, *The Age of Grandeur* (1960) may serve as a sample. Randall's *Career of Philosophy*, again, contains a splendid review of the medieval heritage feeding into the modern world. Carl J. Friedrich's *The Age of Baroque 1610-1660* (1952), in the *Rise of Modern Europe* series, is excell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as is Friedrich and Charles Blitzer, *The Age of Power* (1957).

## Chapter 2

The history of science owes much to such pioneers as George Sarto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927-1948) and Lynn Thorndike,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1923-1941), authors of multi-volume works which deal mainly with ancient and medieval science. Also a pioneer in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 medieval predecessors of modern science was the Frenchman Pierre Duhem, *Études sur Leonard de Vinci* (1906-1913), and other works. Among more recent studies, Otto Neugebauer, *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 (2nd ed., 1958) and Marshall Clagett, *Greek Science in Antiquity* (1955) can serve as references for the scientific legacy of the ancient world. Nicole Oresme's *Le Livre du ciel et du monde* has been edited by Albert D. Menut and Alexander J. Denomy for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ublications in Medieval Science, general editor Marshall Clagett, a series which includes other notable documents. Edward Grant, *Physical Science in the Middle Ages* (1971) forms a part of the Wiley History of Science series. A. C. Crombi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cience* (paperback title, 2 vols., 1952), is an excellent study that includes the seventeenth-century founders of modern science, making clear the essential continuity from medieval founda-

tions. A splendid introduction for the general reader is Herbert Butterfield,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rev. ed. 1962); somewhat more detailed but still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nonscientist is A. R. Hall,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500-1800* (1954). Hall and others collaborate in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series, of which the third volume, *From Galileo to Newton* (1963), is by Hall, the second by Marie Boas dealing with the Renaissance period. Volume II of René Taton's *History of Science* deals with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Science* (1964). Edward Rosen (ed.),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containing a valuable Copernicus bibliography, appeared in a revised edition in 1971. Marie Boas Hall, *Nature and Nature's Laws* (1970) is one of a documentary series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Brief but authoritative is I. B. Cohen, *The Birth of a New Physics* (1960).

No writer has so vividly placed Copernicus, Kepler, Brahe, and Galileo in the framework of history as has Arthur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1959). The leading biographer of Kepler is Max Caspar (1960). On Copernicus, there are A. Armitage, *Sun, Stand Thou Still* (1947) and T. 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1956), Kuhn being also the author of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 G. de Santillana's *The Crime of Galileo* (1955) is a scholarly examination of the famous trial. Add John G. Gade, *Life and Times of Tycho Brahe* (1947).

Works on the intellectual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science include Alexander Koyré, *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 (1957); E. A. Burt,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 (1932);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Nature* (1945), an essay which contrasts the seventeenth-century mechanistic view of nature with both the ancient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evolutionary outlooks. Basil Willey, *The Seventeenth-Century Background* (1934) stresses the new climate of opinion in its impact on literature, as does J. A. Mazzeo, *Renaissance and Revolution: Backgrounds to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1967). Alfred North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1925) is a classic by a great modern philosopher; E. J. Dijksterhuis, *The Mechanization of the World Picture* (1961) is rather duller but well documented. Such books as E. M. W. Tillyard, *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 (1952) along with the previously cited books by Bamborough and Lewis help to delineate the older view of man and nature against which revolution was taking place. Franci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1964) examines an important figure, on whom Dorothea W. Singer has also written (1950). An interesting sidelight is John Dillenberger's *Protestant Thought and Natural Science* (1960).

Volume IV of Copleston's *History of Philosophy* (1959) covers Descartes to Leibniz, an admirable survey. Stuart Hampshire (ed.), *The Age of Reason*, Volume II of the Mentor series, presents selections from the philosophers with explanatory comments. *Descarte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ited by Elizabeth Anscombe and Thomas Geach (1954),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lexander Koyré and a useful bibliography, may be recommended from among the popular editions of the great Frenchman's writings. A. G. A. Balz, *Descartes and the Modern Mind* (1952, 1967); Leon Roth, *Descartes's Discourse*



on *Method* (1937) and Norman Kemp Smith, *Studies in Cartesian Philosophy* (repr. 1962) may be selected from a large literature on him, to which a good guide is Gregor Sebba, *Bibliographia Cartesiana: A Critical Guide to the Descartes Literature 1800-1960* (1964). There are also numerous popular editions of the writings of Francis Bacon. A useful paperback is Benjamin Farrington, *The Philosophy of Francis Bacon* (1964). Fulton H. Anderson, *The Philosophy of Francis Bacon* (1948), and also *Francis Bacon, His Career and Thought* (1962), are by the leading Bacon scholar in this country.

Pascal's *Pensées* is available in the paperback editio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 M. Cohen, and Ernest Mortimer, *Blaise Pascal* (1957) is among those that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Pascal—a sound brief study. H. Wolfson, *The Philosophy of Spinoza* (1957) and Beatrice K. Rome, *The Philosophy of Malebranche* (1964) deal with the other great philosophers of the Cartesian century; see also H. F. Hallett, *Benedict de Spinoza* (1957) or Stuart Hampshire, *Spinoza* (1954) in *The Penguin Philosophy Series*. S. H. Mellone, *The Dawn of Modern Thought* (1930) is brief and popular but good on Descartes and Spinoza. Other significant figures are covered in Ernst Cassirer, *The Platonic Renaissance in England* (English tr. 1953); F. J. Powicke, *The Cambridge Platonists* (1926); and Richard S. Westfall,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1958). Leslie Stephens, *Hobbes* (repr. 1961) discusses the materialist, on whom see further under the next chapter. H. G. van Leeuwen, *The Problem of Certainty in English Thought 1630-1690* (1963) discusses some philosophical issues.

John Herivel, *The Background of Newton's Principia* (1966) makes use of new materials, some of which are reprinted in A. R. Hall (ed.), *Unpublished Scientific Papers of Isaac Newton* (1962). *Newton's Philosophy of Nature*, edited by H. S. Thayer (1953), is still a usable introduction. Frank E. Manuel, *A Portrait of Isaac Newton* (1968) is an important new biography. Alexander Koyré, *Newton Studies* (1965) comes from a veteran historian of science. Voltaire's *Elements of Sir Isaac Newton's Philosophy*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1968). Cf. the modern commentary by I. Bernard Cohen, *Introduction to Newton's Principia* (1971). Ralph M. Blake, Edward H. Madden, and Curt J. Ducasse, *Theories of Scientific Method from the Renaissance through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60) puts this subject in perspective. A. E. Bell, *Christian Huyge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1947) handles Newton's distinguished contemporary and critic. Among other scientists, there is *Robert Boyle and Seventeenth-Century Chemistry* (1958) by Marie Boas, also G. Whitteridge's *William Harve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1971). Lester S. King, *The Growth of Medical Thought* (1963) covers this field capably.

### Chapter 3

In addition to Morrall's and Ullmann's books on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already cited, there are numerous others on that subject among which might be singled out Ralph Lerner and Muhsin Mahdi (ed.), *Medieval*

*Political Philosophy: A Sourcebook* (1963). In view of their primary importance, Ernest Barker, *Greek Political Theory* (1918); A. E. Taylor, *Aristotle* (1919); and Aristotle's own *Politics* should be read. Closer to our period, Otto Gierke, *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1500–1800* (1950) and J. W. Allen,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28, 1957) are classic studies. So is J. N. Figgis,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2nd ed., 1934). Leonard Krieger has recently remedied the relative neglect in the English world of a major figure in his *The Politics of Discretion: Pufendorf and the Acceptance of Natural Law* (1965). *The Political Works of Spinoza*,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 G. Wernham (1958), are relevant here.

Wilbur K. Jordan,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Toleration in England* (4 vols., 1932–1940), is a magisterial work of which the first volume covers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the last three the seventeenth down to 1660. Hugh Martin, *Puritanism and Richard Baxter* (1954) is an interesting little book dealing with a prominent figure. Joseph Lecler has two able volumes on *Toleration and the Reformation* (1960). Works o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are W. J. Stankiewicz,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1961) and J. H. M. Salmon, *The French Wars of Religion in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1959). Donald R. Kelley, *François Hotman: A Revolutionary's Ordeal* (1973)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understanding this important Huguenot political thinker. Henry Bertram Hill has recently edited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Political Testament of Cardinal Richelieu* (1961). The great Puritan Revolution in England may be approached via P. Zagorin's excellent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954) and Christopher Hill's stimulating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1958). Hill is also the author of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64). On Puritanism generally, see Marshall M. Knappen, *Tudor Puritanism* (1939) and Alan Simpson, *Puritanism in Old and New England* (1958). William Haller, author of *The Rise of Puritanism* (1938), also was the editor of *Tracts on Liberty in the Puritan Revolution* (3 vols., 1934), partially reprinted in a recent paperback. J. G. A. Pocock presents a significant aspect of the question in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957). Z. S. Fink, *The Classical Republicans* (1945) traces some seventeenth-century political ideas back to their ancient roots. Norma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1961), an uncommonly interesting book, traces the tradition of revolutionary messianism back into the Middle Ages and concludes with comments on its appearance in the era of Cromwell. Leo F. Solt, *Saints in Arms: Puritanism and Democracy in Cromwell's Armies* (1964) is another study in popular ideology. Further on Puritanism, B. R. White, *The English Separatist Tradition 1553–1620* (1971) and H. C. Porter, *Puritanism in Tudor England* (1970). The work of an older master, Rufus M. Jones, *Mystic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English Commonwealth* (1932) has recently been reprinted. John F. H. New, *Anglican and Puritan: The Basis of Their Opposition 1558–1640* (1964) is a work of exemplary scholarship. P. G. Rogers, *The Fifth Monarchy Men* (1966) does justice to the Left; see also Arthur L. Morton, *The World of the Ranters* (1970), B. S. Capp, also on *The Fifth Monarchy Men* (1972), and Christopher

Hill's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1972). Lewis H. Berens, *The Diggers* (1961), and *The Works of Gerrard Winstanley*, edited by George H. Sabine (1941), cover the communist phase of the Revolution. On the Levellers C. Howard Shaw, *The Levellers* (1968) supplements Joseph Frank's 1955 book with the same title.

Works on individual figures include Charles Blitzer, *An Immortal Commonwealth: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ames Harrington* (1960) and the older study of *Harrington and His Oceana* (1914) by H. F. Russell-Smith. Blitzer has also edited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Harrington* in paperback. On Hobbes, in addition to Leslie Stephen as cited earlier, see Leo Straus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1936); Howard Warrender,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1957); John Bowle, *Hobbes and His Critics* (1951), supplemented by Samuel Mintz, *The Hunting of Leviathan* (1962), and Richard Peters, *Hobbes* (1956). F. C. Hood, in *The Divine Politics of Thomas Hobbes* (1965) offered a reinterpretation of Hobbes as Christian rather than atheist; for further debate on this point see K. C. Brown, ed., *Hobbes Studies* (1965). Among later additions to the literature on Hobbes are M. M. Goldsmith, *Hobbes' Science of Politics* (1966), David P. Gauthier, *The Logic of Leviathan* (1969), and F. S. McNeilly, *The Anatomy of Leviathan* (1968). Hobbes's *Leviathan* is available in many editions; one of the best was issued by Oxford in 1947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Michael Oakeshott. Arthur Barker's *Milton and the Puritan Dilemma* (1942) and D. M. Wolfe, *Milton in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941) are of considerable relevance and interest here. Maurice Cranston, *John Locke, A Biography* (1957) introduces the author of the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which have often been reprinted but which should now be studied in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1960 edited by Peter Laslett. Ernest Barker (ed.), *The Social Contract* (1962) is a convenient source for Locke, Hume, and Rousseau. Standard commentaries are J. B. Gough, *John Locke's Political Philosophy* (1950)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1936); also Sterling P. Lamprecht,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John Locke* (repr. 1962). See also C. B.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and Locke* (1962), a Marxist interpretation; John M. Dun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1969), stressing links to Calvinism; James L. Axtell (ed.), *Educational Writings of John Locke* (1968),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Locke's influence. (Cf. Richard L. Greaves, *The Puritan Revolution and Educational Thought*, 1969). The third edition of Richard I. Aaron's *John Locke* was published in 1971. Other signs of the unflagging interest in Locke are M. V. C. Jeffreys, *John Locke: Prophet of Common Sense* (1967); M. Seliger, *The Liberal Politics of John Locke* (1969); and Willmoore Kendall, *John Locke and the Doctrine of Majority Rule* (1965) which has a somewhat controversial thesis.

#### Chapter 4

Albert Guérard,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 Ideal: France in the Classical Age* (1957) and Jacques Boulenger,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France* (repr.

*The Portable Voltaire*, edited by Ben Ray Redman. Peter Gay, *Voltaire's Politics* (1959) is a lively book; see also J. H. Brumfitt, *Voltaire: Historian* (1958); Constance Rowe, *Voltaire and the State* (1955). The older (1906) biography of Voltaire by Gustave Lanson has been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Gay (1960). More than ninety volumes now exist of the series *Studies i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ublished annually by the Voltaire Institute in Geneva; these are a rich source of knowledge about Voltaire 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general. See again Richard Brooks, *Voltaire and Leibniz*.

To the substantial biography of Montesquieu by Robert Shackleton (1962) may be added Thomas L. Pangle, *Montesquieu's Philosophy of Liberalism* (1973). L. Althusser, *Montesquieu: La Politique et l'histoire* (1959) is a succinct outline of ideas. Werner Stark has studied Montesquieu as *Pioneer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1960). Both *The Spirit of the Laws* and *Persian Letters* are available in inexpensive editions. Arthur A. Wilson, *Diderot* (1972) is a most informative and useful work; another excellent one on Diderot by a distinguished American scholar is Lester G. Crocker's *The Embattled Philosopher* (1954). A. Vartanian, *Diderot and Descartes* (1953) is a study in ideas. Jonathan Kemp, *Diderot: Interpreter of Nature* (1963) is a selection of his writings stressing his philosophical materialism. Ronald Grimsley, *Jean D'Alembert* (1963) is a thorough treatment of Diderot's fellow Encyclopedist. John Lough, *Essays on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and D'Alembert* (1969) is by a veteran scholar in this field. *The Encyclopedia: Selections*, edited by Stephen J. Grendzier (1967), provides excerpts from the famous reference work. The journal *Diderot Studies* has been appearing since 1950. Roland Mortier, *Diderot en Allemagne* (1954) is an admirably careful piece of research.

F. C. Green, *Jean-Jacques Rousseau: A Critical Study of His Life and Writings* (1955) is an admirable and usually reliable guide. Among the many who have tackled what Ernst Cassirer called *The Question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1954) are E. H. Wright, *The Meaning of Rousseau* (1929); John W. Chapman, *Rousseau: Totalitarian or Liberal?* (1956); and J. J. Broome, *Rousseau: A Study of His Thought* (1963). The *Confessions* and *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 have been printed in popular editions along with the much-published *Social Contract*. Ronald Grimsley's *Rousseau: A Study in Self-awareness* (1961) is 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J. 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960) joins Wright in being quite sure that Rousseau was not a liberal, but Alfred Cobban, *Rousseau and the Modern State* (rev. ed., 1965) disagrees. Older works of scholarship include C. E. Vaughan on Rousseau's political writings (1915) and P. M. Masson on his religion (1914). Testifying to a stream of interest in the Genevan that shows no sign of drying up are recent works in French by J. S. Spink, R. Derathé, Oliver Krafft, François Jost, and Jean Guéhenno. The latter's admirable two-volume biography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1966. Lester Crocker engaged in the same enterprise, of which volume 1, covering the years 1712–1758, was published in 1968, and the second and final one in 1973. See also Crocker's



*The Portable Voltaire*, edited by Ben Ray Redman. Peter Gay, *Voltaire's Politics* (1959) is a lively book; see also J. H. Brumfitt, *Voltaire: Historian* (1958); Constance Rowe, *Voltaire and the State* (1955). The older (1906) biography of Voltaire by Gustave Lanson has been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Gay (1960). More than ninety volumes now exist of the series *Studies i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ublished annually by the Voltaire Institute in Geneva; these are a rich source of knowledge about Voltaire 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general. See again Richard Brooks, *Voltaire and Leibniz*.

To the substantial biography of Montesquieu by Robert Shackleton (1962) may be added Thomas L. Pangle, *Montesquieu's Philosophy of Liberalism* (1973). L. Althusser, *Montesquieu: La Politique et l'histoire* (1959) is a succinct outline of ideas. Werner Stark has studied Montesquieu as *Pioneer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1960). Both *The Spirit of the Laws* and *Persian Letters* are available in inexpensive editions. Arthur A. Wilson, *Diderot* (1972) is a most informative and useful work; another excellent one on Diderot by a distinguished American scholar is Lester G. Crocker's *The Embattled Philosopher* (1954). A. Vartanian, *Diderot and Descartes* (1953) is a study in ideas. Jonathan Kemp, *Diderot: Interpreter of Nature* (1963) is a selection of his writings stressing his philosophical materialism. Ronald Grimsley, *Jean D'Alembert* (1963) is a thorough treatment of Diderot's fellow Encyclopedist. John Lough, *Essays on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and D'Alembert* (1969) is by a veteran scholar in this field. *The Encyclopedia: Selections*, edited by Stephen J. Grendzier (1967), provides excerpts from the famous reference work. The journal *Diderot Studies* has been appearing since 1950. Roland Mortier, *Diderot en Allemagne* (1954) is an admirably careful piece of research.

F. C. Green, *Jean-Jacques Rousseau: A Critical Study of His Life and Writings* (1955) is an admirable and usually reliable guide. Among the many who have tackled what Ernst Cassirer called *The Question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1954) are E. H. Wright, *The Meaning of Rousseau* (1929); John W. Chapman, *Rousseau: Totalitarian or Liberal?* (1956); and J. J. Broome, *Rousseau: A Study of His Thought* (1963). The *Confessions* and *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 have been printed in popular editions along with the much-published *Social Contract*. Ronald Grimsley's *Rousseau: A Study in Self-awareness* (1961) is 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J. 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960) joins Wright in being quite sure that Rousseau was not a liberal, but Alfred Cobban, *Rousseau and the Modern State* (rev. ed., 1965) disagrees. Older works of scholarship include C. E. Vaughan on Rousseau's political writings (1915) and P. M. Masson on his religion (1914). Testifying to a stream of interest in the Genevan that shows no sign of drying up are recent works in French by J. S. Spink, R. Derathé, Oliver Krafft, François Jost, and Jean Guéhenno. The latter's admirable two-volume biography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1966. Lester Crocker engaged in the same enterprise, of which volume 1, covering the years 1712-1758, was published in 1968, and the second and final one in 1973. See also Crocker's

*Rousseau's Social Contract: An Interpretive Essay* (1968). To an already long list of those fascinated by the Genevan one should add Ronald Grimsley, *Rousseau and the Religious Quest* (1968) and Judith Shklar, *Men and Citizens: A Study of Rousseau's Social Theory* (1969). The *Correspondance Complète* of Rousseau, in 12 volumes, edited by R. A. Leigh, wa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1970.

Thomas L. Hankins has written *Jean D'Alembert: Scien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1970). On other *philosophes*: David W. Smith, *Helvetius: A Study in Persecution* (1965) adds to the earlier I. L. Horowitz, *Claude Helvetius* (1954); William H. Wickwar, *Baron D'Holbach* (1935); J. S. Schapiro, *Condorcet and the Rise of Liberalism* (repr. 1963); M. L. Perkins,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Abbe St. Pierre* (1959); Aram Vartanian, *La Mettrie's 'L'Homme Machine'* (1960), to which may be compared Leonora C. Rosenfield, *From Beast Machine to Man Machine* (1941). Another of the French school receives competent attention in Isabel F. Knight, *The Geometric Spirit: The Abbe de Condillac and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1968). Convenient anthologies of the entire movement have been assembled by Frank E. Manuel, *The Enlightenment* (1963) and Lester G. Crocker,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1969). Among older works which attempted a survey of the whole Enlightenment, Kingsley Martin, *French Liberal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54) and George R. Havens, *The Age of Ideas* (1955) both tended to be rather uncritically adulatory; see Vincent Buranelli's criticism of the latter, "Another Look at the Philosoph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January, 1957. A more ambitious recent work of scholarship which attempts a reassessment is Peter Gay's two-volume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1966, 1970). Preserved Smith, *A History of Modern Culture: The Enlightenment* (Vol. II, 1934) is somewhat dated but still a useful survey, while Paul Hazard,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54) is comprehensive if rather superficial, and the recent book by Norman Hamps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Enlightenment* (1968) is more social than intellectual. Earl R. Wasserman (ed.), *Aspect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65) contains essays by a number of distinguished scholars on subjects literary, artistic, and philosophical. Other recent books of interest include Reginald J. White, *The Anti-Philosophers* (1970); Franco Venturi, *Utopia and Reform in the Enlightenment* (1971); Ira Wad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1971).

## Chapter 6

Bishop Berkeley, *Three Dialogues* and David Hume, *I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re both available in various editions; also H. D. Aiken (ed.), *Hume's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1948) and Eugene Rotwen (ed.), *Hume's Writings on Economics* (1955). Berlin, *Age of Enlightenment* and Copleston's Volume V are again relevant. C. R. Morris, *Locke, Berkeley, Hume* (1931) is a convenient short survey; G. J. Warnock, *Berkeley*

(1954) and A. H. Basson, *Hume* (1954) are in the Pelican series. The biography by Ernest Mossner, *Life of David Hume* (1954) is superb. See also the following: John Wild, *George Berkeley, A Study of His Life and Philosophy* (1936); John B. Stewart,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David Hume* (1964); L. A. Selby-Bigge (ed.), *The British Moralists* (1897); and, again, Leslie Stephen's basic stud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his *David Hume, Prophet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 (1965), Laurence L. Bongie noted the wide influence of Hume's historical writings. John Laird has studied *Hume's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1967). Norman Kemp Smith and A. G. N. Flew are among other philosophers with recent books on Hume.

William Letwin, *The Origin of Scientific Economics* (1963) studies English economic thought from 1660 to 1776. E. Strauss, *Sir William Petty: Portrait of a Genius* (1954) singles out perhaps the greatest of the mercantilists. E. A. J. Johnson, *Predecessors of Adam Smith* (1937) is a justly celebrated older work. Ronald L. Meek, *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1963) reprints some of the literature of Quesnay's school; it should be supplemented if possible with the several volumes in French (between 1910 and 1959) by G. Weulersse, the most assiduous student of the Physiocrats. Herbert W. Schneider (ed.), *Adam Smith's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1948) might serve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the pioneer economist, to be followed by a reading of his own often reprinted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 excellent study is Gladys Bryson, *Man and Society: The Scottish Inqui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45). Eli Ginzberg's elegant essay, *The House of Adam Smith* (1934) has been deservedly reprinted. Economic thought may be approached through a good general history such as H. T. Overton, *Social Ideals and Economic Theories from Quesnay to Keynes* (1962). That witty anticipation of the school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 Bernard Mandeville's *Fable of the Bees*, has been issued in paperback (1962, ed. Irwin' Primer). See also William L. Taylor, *Francis Hutcheson and David Hume as Predecessors of Adam Smith* (1965). R. L. Meek has recently translated and edited *Turgot on Progress,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1973).

Emile Durkheim, *Montesquieu and Rousseau* (repr. 1960) may be suggested for a stimulating approach to the birth of sociology. O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addition to Brumfitt on Voltaire as historian and passages in Collingwood's *Idea of History*, see J. B. Black, *The Art of History: Four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ans* (1926, recently reprinted); Benedetto Croce, *The Philosophy of Giambattista Vico* (repr. 1964), one great historian-philosopher on another; and A. R. Caponigri, *Time and Idea: The Story of History in G. Vico* (1953). The most exhaustive treatment of Vico's thought and influence is contained in the book edited by G. Tagliacozzo and Hayden V. White, *Giambattista Vico: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1969). The related theme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has brought forth a small library, headed by the older classic of J. B. 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1920), and including such later additions as Henry Vyverberg, *Historical Pessimism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1958); Charles Frankel, *The Faith of Reason: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1948); Charles Vereker, *Eighteenth-*



*Century Optimism* (1967); Ernest L. Tuveson, *Millenium and Utopia: A Study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1949); and John Baillie, *The Belief in Progress* (1950).

A short reading list on the Enlightenment in other countries could include Richard Herr, *The Eigh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Spain* (1958); J. Sarrailh, *L'Espagne Eclairée* (1957); A. P. Whitaker, *Latin America and the Enlightenment* (1961); W. H. Bruford, *German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35); G. P. Gooch, *Frederick the Great* (1947) and *Catherine the Great and Other Studies* (1954); and Eric W. Cochrane, *Tradition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Tuscan Academies* (1962). Allen McConnell, *A Russian Philosopher: Alexander Radishchev* (1965) and D. M. Lang, *Alexander Radishchev, The First Russian Radical* (1959) tell another part of the story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Russia, as also does Hans Rogge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1961), which argues that here, as in Italy and Germany, the Enlightenment helped develop a national spirit. Raphael Demos, "The Neo-Hellenic Enlightenment, 1750-1821,"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October, 1958) suggests the influence of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philosophes* on Greece. On microfilm, there is a dissertation by Isaac Eisenstein-Barzilay,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Jews* (1955; Univ. Microfilm 55-177); and a good chapter in Joseph L. Blau, *The 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 (1962), which may now be supplemented by Arthur Hertzberg,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and the Jews* (1968); see also an essay by Paul H. Meyer, "The Attitude of the Enlightenment toward the Jew," in *Studies in Voltaire*, Volume XXVI (1963). Further on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see the treatment of its greatest figure by Henry E. Allison, *Lessing and the Enlightenment* (1966); also Edward Heier, *L. H. Nicolay and His Contemporaries* (1965). Franco Venturi's *Italy and the Enlightenment* (1972) fills a gap. Nigel Glendinn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73), one of a six-volume history of Spanish literature (Benn), is especially useful on ideas.

Further o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roline Robbins's *The Eighteenth-Century Commonwealthmen* (1959) is a mine of information about lesser political writers; James L. Clifford (ed.),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1959) contains engaging and informative essays on most of the major poets and novelists from Pope, Swift, and Addison to Fielding, Gray, and Johnson; A. R. Humphreys, *The Augustan World* (1954) is charming and knowledgeable. Basil Willey, *The Eighteenth-Century Background* (1953) stresses ideas in relation to literature. An impressive work of scholarship by James W. Johnson deals with *The Formation of English Neoclassical Thought* (1967). On Dr. Johnson, possibly the greatest figure of the English eighteenth century, see Donald J. Greene, *The Politics of Samuel Johnson* (1960) and Walter J. Bate, *The Achievement of Samuel Johnson* (1955).

This book is not directly concerned with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but Durard Echeverria, in *Mirage in the West* (1957) catches the image of the New World as seen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See also A. Owen Aldridge's charming portrait, *Franklin and His French Contemporaries* (1957).

On certain other cosmopolitan aspects of Enlightenment taste and thought there are Elizabeth Souleyman, *The Vision of World Peac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1941); W. W. Appleton, *A Cycle of Cathay* (1957), on Chinese influence on English tast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cf. Basil Gray, *The French Image of China before and after Voltaire* (1964), one of the volumes of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Hugh Honour, *Chinoiserie* (1962). Also important are Emil Kaufmann, *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Reason* (1955), and Michael Levey, *Rococo to Revolution: Major Trends in Eighteenth-Century Painting* (1966). Helmut Hatzfeld's book on *The Rococo: Eroticism, Wit, and Elegance in European Literature* (1972) contribute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is aristocratic spirit. Daniel Foxon, *Libertine Literature in England 1660-1745* (1964) explores aspects of Enlightenment eroticism on which the curious might want also to consult John Masters's gorgeously illustrated biography of *Casanova* (1969). Robert Darnton, *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1968) contributes greatly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antirationalist reaction of the 1780s, which he relates to the Revolution. Michael Foucault's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tr. 1965) is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with fascinating revelations. The theme of *Irrationalis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s discussed in Volume 2 of the series *Studi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ulture* (1972), ed. Harold E. Pagliaro.

Evalua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Enlightenment might begin by comparing Alfred Cobban, *In Search of Humanity: The Role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History* (1960) and Peter Gay, *The Party of Humanity: Studies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1964), both largely admiring, with L. G. Crocker, *An Age of Crisis: Man and World i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1959), along with its sequel, *Nature and Culture: Ethical Thought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1963). See also Gay's *The Enlightenment*, previously cited. William F. Church (ed.), *The Influence of the Enlightenment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64) reprints a number of interesting reactions to the Enlightenment. Carl L. Becker's celebrated essay,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1932)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various comments on it in R. O. Rockwood (ed.), *Carl Becker's Heavenly City Revisited* (1958). Talmon's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previously cited, contains implicit adverse judgments on the main stream of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but has aroused opposition. Louis I. Bredvold's *The Brave New World of the Enlightenment* (1961) is a sensitive and polished essay by a literary scholar. Whitehead's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1926) includes some perceptive remarks. Geoffrey Clive, *The Romantic Enlightenment* (1960) is a striking reevaluation, in the sense of noting how much of the Age of

Reason was emotional or sentimental, while Henry Vyverberg's already cited *Historical Pessimism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similarly points to a strain of thought contrary to the dominant one. Shelby T. McCloy, *The Humanitarian Move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1957) is inclined to credit many enlightened reforms to *philosophe* influence. In conclusion, perhaps Ernst Cassirer's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English ed. 1951) is still as good a summation as any; but cf. K. B. Price's criticism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January, 1957.

## (二) 第7-17章推荐文献

### General Surveys:

Henry William Spiegel,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1983); Albert S. Lindemann, *A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alism* (1984); Geoffrey Hawthorn, *Enlightenment and Despair: A History of Social Theory* (1987); Roger Scruton, *From Descartes to Wittgenstein: 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1987); Frederick Copleston, *History of Philosophy* (7 vols., 1960-63); John Herman Randall Jr., *The Career of Philosophy* (2 vols., 1965); Hugh Lloyd-Jones, *Blood for Ghosts: Classical Influenc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1983);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 (7 vols., 1955-1992); L. Pearce Williams and Henry John Steffens, *A History of Science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3 vols., 1977-78); David Knight, *Ideas in Chemistry: A History of the Science* (1992);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70); Owen Chadwick,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European Mi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76).

###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Emmet Kennedy,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89); William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ition, 1988); Franco Venturi, *Utopia and Reform in the Enlightenment* (1970); Alan C. Kors, *D'Holbach's Coterie* (1976); Robert Darnton,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1982);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rans. Lydia G. Cochrane, 1988); Norman Hampson, *Will and Circumstance: Montesquieu, Rousseau,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83); Keith M. Baker, *Condorcet* (1975); Lynn Avery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84); Gary Kates, *The Cercle Social, the Girondin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85); John Lough, *The Philosophes and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1982); Carol Blum, *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85); Emmet Kennedy, *A Philosopher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Destutt de Tracy and the Origins of "Ideology"* (1978); F. P. Lock, *Burke'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985); John P. Clark, *The Philosophical Anarchism of William Godwin* (1977); Mark Philip, *Godwin's Political Justice* (1987); J. L. Talmon,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960); Claire Tomalin, *The Life and Death of Mary Wollstonecraft* (1974); J. F. C. Harrison, *The Second Coming: Popular Millenarianism 1780–1820* (1979); John O. Lyons, *The Invention of the Self: The Hinge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78);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1992).

### Kant and German Philosophy:

Roger Scruton, *Kant* (1983), one of the series "Past Masters"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ntham, Hegel, Kierkegaard, Marx, Mill, Bergson, and Wittgenstein are others covered in this series. W. H. Walsh, *Kant's Critique of Metaphysics* (1975); Howard L. Williams, *Kant's Philosophy of Religion* (1983); Patrick Riley, *Kant's Political Thought* (1983); Donald W. Crawford, *Kant's Aesthetic Theory* (1974); Gordon S. Brittan, *Kant's Theory of Science* (1978); René Wellek, *Kant in England* (1931); Ermanno Bencivenga, *Kant's Copernican Revolution* (1987); Tom Rockmore, *Fichte, Marx, and the Germa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1980); F. M. Barnard, *Herder'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1965).

## Romanticism:

Meyer H. Abrams,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1953); Northrop Frye, *A Study of English Romanticism* (1968); Geoffrey Hartman and David Thorburn, ed., *Romanticism: Vistas, Instances, Continuities* (1973); Jerome J. McGann, *The Romantic Ideology: 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1983); Paul de Man, *The Rhetoric of Romanticism* (1984); G. P. Thompson, ed., *The Gothic Imagination: Essays in Dark Romanticism* (1974); Leslie Marchand, *Byron: A Portrait* (1970); Michael Foot, *The Politics of Paradise: A Vindication of Byron* (1988); Peter L. Thorsley, *The Byronic Hero* (1962); William A. Veeder, *Mary Shelley and Frankenstein* (1986); Herbert F. Tucker, *Tennyson and the Doom of Romanticism* (1988); Jonathan Wordsworth, Michael C. Jaye, and Robert Woof, *William Wordsworth and the Age of English Romanticism* (1987); Fred Kaplan, *Thomas Carlyle, A Biography* (1984); Philip Rosenberg, *The Seventh Hero: Thomas Carlyle and the Theory of Radical Activism* (1974); Theodore Ziolkowski, *German Roman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1990); Nicholas Boyle, *Goethe: The Poet and His Age* (vol. 1, 1991); William Vaughan, *German Romantic Painting* (1980); Ronald Taylor, *Robert Schumann: His Life and Work* (1982); S. S. Prawer, ed., *The Romantic Period in Germany* (1970); D. O. Evans, *Social Romanticism in France 1830–1848* (1951); D.G. Charlton, ed., *The French Romantics* (2 vols., 1984); Chris Baldick, ed., *The Oxford Book of Gothic Tales* (1992).

## Political Ideologies:

Richard A. Lebrun, *Joseph de Maistre: An Intellectual Militant* (1988); René Remond, *The Right Wing in France from 1815 to De Gaulle* (1965); George Armstrong Kelley, *The Humane Comedy: Constant, Tocqueville, and French Liberalism* (1992); Klaus Epstein, *The Genesis of German Conservatism* (1966); John Stuart Mill, *On Bentham and Coleridge* (reprinted 1950); Richard Bellamy, ed., *Victorian Liberalism* (1990); J. W. Burrow, *Whigs and Liberals* (1988); Boyd Hilton, *The Age of Atonement: The Influence of Evangelicalism on Social and Economic Thought* (1989); Mary P. Mack, *Jeremy Bentham: An Odyssey of Ideas* (1962); Ross Harrison, *Bentham* (1984); Douglas Long, *Bentham on Liberty* (1977); Bhiku Parekh, ed., *Bentham's Political Thought* (1973); William Thomas, *The Philosophical Radicals* (1979); Nancy L. Rosenblum, *Bentham'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1978) and *Another Liberalism: Romantic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beral Thought* (1988); Frederick Rosen, *Jeremy Bentham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1983); A. Sen and B. Williams, ed.,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1982); O. H. Taylor, *The Classical Liberalism, Marxism,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60); William D. Grampp,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Liberalism* (1960); Jack Livel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1962); James J. Sheehan, *German Liber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78); Harold

Silver, *The Concept of Popular Education: A Study of Idea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1965).

### Political Economy:

William Letwin, *The Origin of Scientific Economics* (1963); Terence Hutchin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1988); Patricia H. Werhane, *Adam Smith and His Legacy for Modern Capitalism* (1991); Richard F. Teichgraber, *"Fair Trade" and Moral Philosophy: Rethinking the Sources of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1986); Istvan Hunt and Michael Ignatieff, eds., *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1984); Lionel Robbins,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in Engl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1953); D. P. O'Brien,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1975); Marc Blaug, *Ricardian Economics* (1958); William Peterson, *Malthus* (1979); Ronald Meek, *Smith, Marx, and After* (1977); Pedro Schwarz,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John Stuart Mill* (1973); R. D. Collinson Black, A. W. Coats, G. D. W. Goodwin, eds., *The Marginal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1973);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Idea of Poverty: England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Age* (1984); Margaret Schabas, *A World Ruled by Number: William Stanley Jevons and the Rise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1990).

### Socialism:

George Lichtheim, *Origins of Socialism* (1969); R. B. Rose, *Gracchus Babeuf* (1978); J. F. C. Harrison, *Quest for the New Moral World: Robert Owen and Owenism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969); Jonathan F. Beecher, *The Utopian Vision of Charles Fourier* (1987); Keith Taylor, *The Political Ideas of the Utopian Socialists* (1982); Frank E. Manuel, *The New World of Henri Saint-Simon* (1956); Christopher H. Johnson, *Utopian Communism in France: Cabet and the Icarians, 1839–1851* (1974); Robert L. Hoffman, *Revolutionary Justice: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f P.-J. Proudhon* (1972); James T. Billington, *Fire in the Minds of Men: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ary Faith* (1980); Martin Malia, *Alexander Herzen and the Birth of Russian Socialism* (1961); Noel W. Thompson, *The People's Science: The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of Exploitation and Crisis, 1816–1834* (1985); Peter Stearns, *Lamennais: Priest and Revolutionary* (1968); A. M. C. Waterman, *Revolution, Economics, and Religion: Christian Political Economy 1798–1833* (1991); Edward Norman, *Victorian Christian Socialists* (1987); Friedrich A.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1988); George Crowder, *Classical Anarchis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Godwin, Proudhon, Bakunin and Kropotkin* (1992); 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Anarchism* (1992); Jean H. Quataert, *Reluctant Feminists in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885–1917* (1979).

### Hegel:

Michael Inwood, ed., *Hegel* (1985); Peter Singer, *Hegel* (1983); George A. Kelly, *Idealism, Politics, and History: Sources of Hegelian Thought* (1969); David Lamb, ed., *Hegel and Modern Philosophy* (1987); Jean Hyppoli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1974); Michael Rosen, *Hegel's Dialectic and Its Criticism* (1982); B. M. G. Reardon, *Hegel's Philosophy of Religion* (1977); Bernard Cullen, *Hegel'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1979); George D. O'Brien, *Hegel on Reason and History* (1975); Burleigh T. Wilkins, *Hegel's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79); Charles Taylor, *Hegel and Modern Society* (1979); L. S. Stepelevich and David Lamb, ed., *Hegel's Philosophy of Action* (1983); William J. Brazill, *The Young Hegelians* (1970); Edward J. Brown, *Stankevich and His Moscow Circle 1830–1840* (1967); Michael S. Roth, *Knowing and History: Appropriations of Hegel in Twentieth Century France* (1988).

### Comte:

D. C. Charlton, *Positivist Thought in France 1852–1870* (1959); Walter M. Simon, *European Positiv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63); John Stuart Mill, *August Comte and Positivism* (reprinted 1961); T. R. Wright, *The Religion of Humanity: The Impact of Comtean Positivism on Victorian Britain* (1986); Christopher Kent, *Brains and Numbers: Elitism, Comteanism and Democracy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1978); J. B. 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1920); 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1991); Peter J. Bowler, *The Invention of Progress: The Victorians and the Past* (1989).

### Marx:

David McClella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 (1973);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2 vols., 1978–80); R. H. Hunt,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2 vols., 1974–84); Jo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1985); N. Scott Arnold, *Marx's Radical Critique of Capitalist Society* (1990); Peter Calvert, *The Concept of Class* (1982); P. N. Furbank, *Unholy Pleasure; or the Idea of Social Class* (1985); Frank Parkin,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1979); Terrell Carver, *Marx and Engels: 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1983); Thomas Sowell, *Marxism,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1985); M. C. Howard and J. C. King, *The Economics of Marx* (1976); G. H. R. Parkinson, ed., *Marx and Marxisms* (1982); Leonard Wessell, *Prometheus Bound: The Mythic Structure of Karl Marx's Scientific Thinking* (1984); S. W. Praver,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

ature (1976); Paul Thomas,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1980); Shlomo Avineri, *Moses Hess: Prophet of Communism and Zionism* (1987); Richard B. Saltma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 Bakunin* (1983); 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1971); Robert J. Antonio and R. M. Glassman, eds., *A Weber-Marx Dialogue* (1985); David W. Lovell, *From Marx and Lenin: An Evaluation of Marx's Responsibility for Soviet Authoritarianism* (1984).

### Darwin and Darwinism:

The fullest biography is *Darwin: The Life of a Tormented Evolutionist*, by Adrian Desmond and James Moore (1991). Bentley Glass, ed., *Forerunners of Darwin* (1959); Roy Porter, *The Making of Geology: Earth Science in Britain 1660–1815* (1977); Pietro Corsi, *The Age of Lamarck* (1988); Maureen McNeil, *Under the Banner of Science: Erasmus Darwin and His Age* (1987); John Langdon Brooks, *Just Before the Origin* (1984); Arnold C. Brackman, *A Delicate Arrangement: The Strange Case of Charles Darwin and Alfred Russel Wallace* (1980); David Hull, *Darwin and His Critics* (1973); Michael Ruse, *The Darwinian Revolution* (1979) and *Darwinism Defended: A Guide to the Evolutionary Controversies* (1982); William Irvine, *Apes, Angels, and Victorians* (1955); David Kohn, ed., *The Darwinian Heritage* (1986); Stephen J. Gould, *Ever Since Darwin* (1977) and *The Panda's Thumb* (1980); Bryan Leith, *The Descent of Darwin: A Handbook of Doubts about Darwinism* (1982); Alan Grafen, ed., *Evolution and Its Influence* (1989); Thomas F. Glick, ed., *The Comparative Reception of Darwinism* (1974); Alfred Kelley, *The Descent of Darw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Darwin in Germany 1860–1914* (1981); Alexander Vucinich, *Darwin in Russian Thought* (1989); Daniel Todes, *Darwin without Malthus: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nd Russian Evolutionary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89); Peter J. Bowler, *Theories of Human Evolution: A Century of Debate 1844–1944* (1986).

### Social Darwinism:

Robert C. Bannister, *Social Darwinism: Science and Myth in Anglo-American Thought* (1978);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1980); D. P. Crook, *Benjamin Kidd: Portrait of a Social Darwinist* (1984); Paul Heyer, *Nature: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Marx, Darwin, Biolog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1982); Richard P. Alexander, *Darwinism and Human Affairs* (1979); Linda L. Clark, *Social Darwinism in France* (1984); J. G. Kennedy, *Herbert Spencer* (1978); George W. Stocking,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1982); Murray J. Leaf, *Men, Mind, and Science* (1979); Michael P. Banton, *The Idea of Race* (1977); Michael D. Biddiss, ed., *Images of Race* (1979); Geoffrey Field, *Evangelist of Race: The Germanic Vision of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1981); Redmond O'Hanlon, *Joseph Conrad and Charles Darwin* (1985).



### Victorian Religion:

John Durant, ed., *Darwinism and Divinity* (1985); Mary Midgley, *Evolution as a Religion: Strange Hopes and Stranger Fears* (1985); B. M. G. Reardon, *Religious Thought in the Victorian Age* (1980); M. A. Crowther, *Church Embattled: Religious Controversy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1970); A. O. J. Cockshut, *The Unbelievers: English Agnostic Thought 1840–1890* (1966); Ian Bradley, *The Call to Seriousness: The Evangelical Impact on the Victorians* (1976); K. J. M. Smith, *James Fitzjames Stephens: Portrait of a Victorian Rationalist* (1985); J. Hillis Miller, *The Disappearance of God* (1963); Owen Chadwick, *The Spirit of the Oxford Movement* (1990); Lawrence F. Barmann, *Baron von Hügel and the Modernist Crisis in England* (1972); Josef L. Altholz, *The Liberal Catholic Movement in England 1848–1864* (1960).

###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Thought: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 ed. John Gray (1991); Gertrude Himmelfarb, *Victorian Minds* (1968); Alan Horsman, *The Victorian Novel* (1990), part of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Grahame Smith, *The Novel and Society: Defoe to George Eliot* (1984); William Myers, *The Teaching of George Eliot* (1984); Barbara Smalley, *Eliot and Flaubert* (1974); F. B. Pinion, *Thomas Hardy: Life and Thought* (1977); Trygve Tholfsen,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1977); Martha Vicinus, *The Industrial Muse* (1974); P. J. Keating, *The Working Classes in Victorian Fiction* (1971); Myron Magnet, *Dickens and the Social Order* (1987); Fred Kaplan, *Dickens* (1988); Jeffrey L. Spear, *Dreams of an English Eden: John Ruskin and His Tradition in Social Criticism* (1984); P. D. Anthony, *John Ruskin's Labour: A Study of Ruskin's Social Theory* (1983); Edward Alexander, *Matthew Arnold, John Ruskin, and the Modern Temper* (1973); Bernard Semmel, *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Pursuit of Virtue* (1984); John M. Robson, *The Improvement of Mankin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Stuart Mill* (1968); M. W. Taylor, *Men Versus the State: Herbert Spencer and Late Victorian Individualism* (1992).

### Realism and Naturalism:

Peter Morton, *The Vital Influence: Biology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1860–1900* (1984); Harry Levin, *The Gates of Horn: A Study of Five French Realists* (1963); Richard Terdiman, *The Dialectics of Isolation: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French Novel from the Realists to Proust* (1976); Philip Walker, *Zola* (1985); Brian Nelson, *Zola and the Bourgeoisie* (1983); Michael Bedlow, *The Fiction of Humanity: The Bildungsroman from Wieland to Thomas Mann* (1982); William M. Todd III,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Imperial Russia* (1980); Joseph Frank, *Dostoyevsky* (3 vols., 1976–86); Edward Wasiolek, *Tolstoy's Major Fiction* (1978);

Richard F. Gustafson, *Leo Tolstoy: Resident and Stranger* (1986); George Steiner, *Tolstoy or Dostoyevsky* (1959).

### Nationalism:

Eugene Kamenka, *Nationalism: The Nature and Evolution of an Idea* (1976); Anthony D. Smith,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1983); Hans Rogge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 Century Russia* (1960); Leonard Schapiro, *Ra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Russian Nineteenth Century Thought* (1967); M. B. Petrovich, *The Emergence of Russian Pan-Slavism* (1956); Gwilym O. Griffith, *Mazzini: Prophet of Modern Europe* (1970); Luigi Salvatorelli, *Thought and Action in the Risorgimento* (1970); Eugen Weber, *The Nationalist Revival in France 1905–1914* (1959) and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1976), also *The Action Française* (1962); Michael Sutton, *Nationalism, Positivism and Catholicism: The Politics of Charles Maurras and French Catholics 1898–1914* (1983); Marianne Heiberg, *The Making of the Basque Nation* (1989); Peter Brock, *The Slovak National Awakening: An Essay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1976); Rosalind Mitchum, ed., *The Roots of Nationalism: Studies in Northern Europe* (1980); W. F. Mandle and Pauric Travers, eds., *Irish Culture and Nationalism 1750–1950* (1983); David Vital, *The Origins of Zionism* (1975) and *Zionism: The Formative Years* (1982).

### Professionalization:

Marie Boas Hall, *All Scientists Now: The Royal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85); Mogali S. Larson,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1977); A. J. Engel, *From Clergyman to Don: The Rise of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Oxford* (1983); A. H. Halsey, *Decline of Donnish Dominion: The British Academic Profess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92); George Weisz,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Universities in France 1863–1914* (1983); Charles E. McClelland, *The German Experience of Professionalization* (1991); Nigel Cross, *The Common Writer: Life in Nineteenth Century Grub Street* (1985); Cesar Grana, *Bohemian vs. Bourgeois: French Society and the Man of Lette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64); Ronald Hingley, *Russian Writers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67).

### Wagner and Nietzsche:

David C. Large and William Weber, eds., *Wagnerism in European Culture and Politics* (1984); William J. McGrath, *Dionysian Art and Populist Politics in Austria* (1973); Jacob Katz, *The Darker Side of Genius: Richard Wagner's Anti-Semitism* (1986); Elizabeth Magee, *Richard Wagner and the Nibelungs* (1901). Bryan

Magee, *The Philosophy of Schopenhauer* (1983); Robert Solomon and Kathleen M. Higgins, eds., *Reading Nietzsche* (1989); George Stauth and Bryan S. Turner, *Nietzsche's Dream* (1988); Walter Kaufmann, *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 (1974); F. C. Lea, *The Tragic Philosopher* (1973); Arthur Danto, *Nietzsche as Philosopher* (1967); Giles Deleuze,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1983); J. P. Stern, *The Study of Nietzsche* (1979); Martin Heidegger, *Nietzsche* (1979); Karl Jaspers, *Nietzsche: An Introduction...* (1965); Keith Ansell-Pearson, *Nietzsche contra Rousseau: A Study of Nietzsche's Mo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1991); R. H. Thomas, *Nietzsche i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890–1918* (1983); Herbert W. Reichert, *Nietzsche's Impact on Modern German Literature* (1975); John B. Foster, *Heirs to Modernism: Literary Modernism and Nietzsche* (1981); William D. Williams, *Nietzsche and the French* (1952); Patrick Bridgwater, *Nietzsche in Anglosaxony* (1972) and *Nietzsche and Kafka* (1974); Bernice Glatzer Rosenthal, ed., *Nietzsche in Russia* (1987); Edith W. Clowes, *The Revolution of Moral Consciousness: Nietzsche in Russian Literature, 1890–1914* (1988); Rudolph Binion, *Frau Lou: Nietzsche's Wayward Disciple* (1968); Robert Eden,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Nihilism: A Study of Weber and Nietzsche* (1983); Frances Nesbitt Oppel, *Mask and Tragedy: Yeats and Nietzsche, 1902–1910* (1987); Colin Milton, *Lawrence and Nietzsche: A Study in Influence* (1987); Timothy Martin, *Joyce and Wagner* (1992); Otto Heller, *Prophets of Dissent* (Maeterlinck, Strindberg, Tolstoy, Nietzsche, reprinted 1968); Erich Heller, *The Importance of Nietzsche* (1988).

### Symbolism and Lat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Edmund Wilson, *Axel's Castle* (1936); Mario Praz, *The Romantic Agony* (1954); Philippe Jullian, *Dreamers of Decadence* (1971) and *D'Annunzio: A Biography* (1972); John Porter Houston, *French Symbolism and the Modernist Movement* (1980); Lawrence M. Porter, *The Crisis of French Symbolism* (1990); Jean Pierrot, *The Decadent Imagination, 1880–1900* (1981); Debora Silverman, *Art Nouveau in Fin de Siècle France* (1989); Richard Ellmann, *Oscar Wilde* (1988); Carl Schorske, *Fin de Siècle Vienna* (1980); Edward Timms and Ritchie Robertson, eds., *Vienna 1900* (1990); Roy Pascal, *From Naturalism to Expressionism: Germa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880–1918* (1973); Mark G. Ward, ed., *From Vormärz to Fin de Siècle: Essays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 Literature* (1986); James West, *Russian Symbolism* (1970); Oleg A. Maslenikov, *The Frenzied Poets: Andrei Biely and the Russian Symbolists* (1952); Hermann Broch, *Hugo von Hofmannsthal and His Time: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1860–1920* (1981); Jonathan Rose, *The Edwardian Temperament 1895–1919* (1985); A. M. Gibb, *The Art and Mind of Shaw* (1984); Robert F. Whitman, *Shaw and the Play of Ideas* (1977); David Smith, *H. G. Wells, Desperately Mortal* (1988); Robert M. Philmus, *Into the Unknown: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Fiction from Francis Godwin to H. G. Wells* (1975).

### Philosophic Irrationalism:

A. E. Pilkington, *Henri Bergson and His Influence* (1976); S. K. Kumar, *Bergson and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 (1963); R. C. Grogin, *The Bergsonian Controversy in France 1900–1914* (1988); J. R. Jennings, *Georges Sorel: The Character and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 (1985); Jack J. Roth, *The Cult of Violence: Sorel and the Sorelians* (1980); Richard Vernon, *Commitment and Change: Georges Sorel and the Idea of Revolution* (1978); John Stanley, *The Sociology of Virtu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mes of Georges Sorel* (1981); Janet Oppenheim, *The Other World: Speculation and Psychic Research in England, 1850–1914* (1985); I. L. Horowitz, *Radicalism and the Revolt against Reason* (1961); Robert A. Nye, *The Origins of Crowd Psychology: Gustave Le Bon and the Crisis of Mass Democracy in the Third Republic* (1975); Graham Hough, *The Mystery Religion of W. B. Yeats* (1984).

### Early Twentieth-Century Modernism: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 eds., *Modernism 1890–1913* (1976); Roger Shattuck, *The Banquet Years: The Arts in France 1885–1918* (1958); Carl and Ellendra Proffer, *The Silver Age of Russian Culture* (1971); Marjorie Perloff, *The Futurist Moment* (1986); Marianne W. Martin, *Futurist Art and Theory* (1968); Vladimir Markov, *Russian Futurism* (1969); Paul Raabe, ed., *The Era of German Expressionism* (1974); Peter Paret, *The Berlin Secession: Modernism and Its Enemies in Imperial Germany* (1980); Stephen Bronner and Douglas Kellner, eds., *Passion and Rebellion: The Expressionist Heritage* (1982); Donald E. Gordon, *Expressionism: Art and Idea* (1988); Douglas Cooper, *The Cubist Epoch* (1972); Christopher Green, *Cubism and Its Enemies, 1916–1928* (1988); John Golding, *Cubism: A History and Analysis* (1968); Wilfred Mellers, *Caliban Reborn: Renewal in Twentieth Century Music* (1967).

### Sociology and Social Thought:

H. Stuart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1930* (1958); Raymond Aron, *Main Current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2 vols., 1967); Robert A. Nisbet,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1966); Arthur Mitzman, *Sociology and Estrangement* (1973); Anthony Giddens, *Studi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1977); Philip Abrams, *The Origins of British Sociology 1834–1914* (1968); Wolf Lepenie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The Rise of Sociology* (trans. 1988); Dirk Käsler, *Max Weber: An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and Work* (1988); Frank Parkin, *Max Weber* (1982); Donald G. Macrae, *Max Weber* ("Modern Masters" series, 1974); Reinhard Bendix,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1960); Bendix and G. Roth, eds., *Scholarship and Partisanship: Essays*

on Max Weber (1971); Gordon Marshall, *In Search of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 Essay on Max Weber's Protestant Ethic Thesis* (1982); Ronald M. Glassman and Vatro Murvar, eds., *Max Weber's Political Sociology* (1984); Sam Whimster and Scott Lash, eds., *Max Weber, Rationality and Modernity* (1987); Robert A. Nye, *The Anti-Democratic Sources of Elite Theory: Pareto, Mosca, Michels* (1977); Steven Lukes, *Emile Durkheim: His Life and Work* (1973); William Logue, *From Philosophy to Sociology: The Evolution of French Liberalism 1870–1914* (1983); Fritz 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1969); Rudolf A. Makreel, *Wilhelm Dilthey: Philosopher of the Human Studies* (1975).

### Late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ism:

William Maehl, *August Bebel* (1980); Vernon Lidtke, *The Alternative Culture: Socialist Labor in Imperial Germany* (1985); Mark F. Blum, *The Austro-Marxists, 1890–1918: A Psychobiographical Study* (1985); Gary P. Steenson, *Karl Kautsky, 1854–1938* (1978); Peter Gay,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Bernstein's Challenge to Marx* (1952); J. P. Nettl, *Rosa Luxemburg* (1966); Harvey Goldberg, *Jean Jaurès* (1962); George Lichtheim, *Marxism in Modern France* (1966); F. F. Ridley, *French Syndicalism* (1970); Patrick H. Hutton, *The Cult of 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The Blanquists in French Politics 1864–1893* (1976); Temma Kaplan, *Anarchists of Andalusia, 1868–1903* (1976); Willard Wolfe, *From Radicalism to Socialism: Foundations of Fabian Socialism, 1881–1889* (1975); Norman and Jeanne MacKenzie, *The Fabians* (1977); Ian Britain, *Fabianism and Culture* (1982); J. W. Hulse, *Revolutionists in London: A Study of Five Unorthodox Socialists* (1970); Peter D'Arcy Jones, *The Christian Socialist Revival in England* (1968); Stanley Pierson, *English Socialists* (1979); Norman Dennis and A. H. Halsey, eds., *English Ethical Socialism: Thomas More to R. H. Tawney* (1989); Lillian P. Wallace, *Leo XIII and the Rise of Socialism* (1966); Peter Stansky, *Redesigning the World: William Morris, the 1880s, and the Arts and Crafts* (1985).

### The Intellectuals and World War I:

Roland N. Stromberg, *Redemption by War: The Intellectuals and 1914* (1982); 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1975); Robert Wohl, *The Generation of 1914* (1979); J. D. Ellis, *French Socialists and the Problem of War 1904–1914* (1967); Georges Haupt, *Socialism and the Great War: The Collapse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972); Peter Vansittart, *Voices from the Great War* (1981); Jon Silkin, *Out of Battle: The Poet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1977), and (ed.), *The Penguin Book of First World War Poetry* (1981); Bernard Bergonzi, *Heroes' Twilight* (1964); Robert Giddings, *The War Poets, 1914–1918* (1988); George Parfitt, *Fiction of the First World War* (1988); Kenneth Silver, *Esprit de Corps: The Great War and French Art 1914–1918* (1988); Paul Delany, *D. H.*

*Lawrence's Nightmare: The Writer and His Circle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Great War* (1979); Frank Field, *Three French Writers and the Great War* (1975) and *British and French Writer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1991); John Cruickshank, *Variations on Catastrophe; Some French Responses to the Great War* (1982); William T. Starr, *Romain Rolland and a World at War* (1956); F. L. Carsten, *War against War: British and German Radical Movement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1982); Jo Vellacott, *Bertrand Russell and the Pacifist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1981).

### Freud:

Eckbert Faas, *Retreat into the Mind: Victorian Poetry and the Rise of Psychiatry* (1989); Harry F. Ellenberger,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1970); Marthe Robert, *The Psychoanalytic Revolution: Sigmund Freud's Life and Achievement* (1966); Ronald W. Clark, *Freud: The Man and the Cause* (1980); Peter Gay, *Freud: A Life for Our Time* (1988) and *Reading Freud: Explorations and Entertainments* (1991); W. J. McGrath, *Freud's Discovery of Psychoanalysis* (1986); M. Kanzer and J. Glenn, eds., *Freud and His Patients* (1980); Sara Kofman, *The Enigma of Woman: Women in Freud's Writings* (1985); Paul Ricoeur, *Freud and Philosophy* (1970); Frank J. Sulloway, *Freud, Biologist of the Mind* (1979); Harry Trossman, *Freud and the Imaginative World* (1985); Steven Marcus, *Freud and the Culture of Psychoanalysis* (1984); Marie Balmory, *Psychoanalyzing Psychoanalysis* (1982); Marshall Edelson, *Psychoanalysis—A Theory in Crisis* (1988); Erich Fromm, *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1970); H. J. Eysenck,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Freudian Empire* (1985); Gerald N. Izenberg, *The Crisis of Autonomy: The Existentialist Critique of Freud* (1976); B. A. Farrell, *The Standing of Psychoanalysis* (1981); Martin J. Kalin, *The Utopian Flight from Unhappiness: Freud against Marx on Social Progress* (1974); Morris Lazerowitz, *The Language of Philosophy: Freud and Wittgenstein* (1977); T. S. Szasz, *Karl Kraus and the Soul Doctors* (1976).

### Other Psychoanalysts:

Robert S. Steele, *Freud and Jung* (1982); Walter Kaufmann, *Freud versus Adler and Jung* (1980); Paul J. Stern, *Jung, the Haunted Prophet* (1976); Harold C. Coward, *Jung and Eastern Thought* (1985); James Olney, *The Rhizome and the Flower: Jung and Yeats* (1980); Andrew Samuels, *Jung and the Post-Jungians* (1985); Bettina L. Knapp, *A Jungian Approach to Literature* (1984); Charles B. Hanna, *The Face of the Deep: The Religious Ideas of Carl Jung* (1967); Paul Roazen, *Freud and His Followers* (1971); E. J. Lieberman, *Acts of Will: Life and Works of Otto Rank* (1985); Phyllis Grosskurth, *Melanie Klein, Her World and Her Work* (1986); Judith M. Hughes, *Reshaping the Psychoanalytic Domain* (1989); the British school

including Klein, Fairbairn, Winnicott);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1990); Richard Lichtheim, *The Production of Desire: The Integration of Psychoanalysis into Marxist Theory* (1982).

### Lenin and Bolshevism:

Philip Pomper,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Intelligentsia* (1970); Franco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 (1970); James H. Billington, *Mikhailovsky and Russian Populism* (1958); Andrej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 (1969); Tibor Szamuely, *The Russian Tradition* (1974); Paul Avrich, *The Russian Anarchists* (1967); Samuel H. Baron, *Plekhanov: The 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 (1963); Vera Brodovitch, *Apostles and Terrorists: Women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Russia of Alexander II* (1977); Robert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1985); A. J. Polan,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1984); A. B. Ulam, *Lenin and the Bolsheviks* (1965); R. H. W. Theen, *Lenin: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Revolutionary* (1973); Alain Besançon, *The Rise of the Gulag: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Leninism* (1981); Z. A. Sochor, *Revolution and Culture: The Bogdanov-Lenin Controversy* (1988); Joel Carmichael, *Trotsky* (1975); Curtis Stokes, *The Evolution of Trotsky's Theory of Revolution* (1982); Stephen F. Cohen, *Bukhar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73); Robert C. Williams, *The Other Bolsheviks: Lenin and His Critics 1904–14* (1988) and *Artists in Revolution: Portraits of the Russian Avant-Garde 1905–1925* (1977); Edward J. Brown, *Mayakovsky: A Poet in the Revolution* (1973); Barbara Evans Clements, *Bolshevik Feminist: The Life of Aleksandra Kollontai* (1979).

### Einstein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P. M. Herman, *Energy, Force and Matter: The Development of Nineteenth Century Physics* (1982); Lewis Pyenson, *The Young Einstein: The Advent of Relativity* (1985); Elie Zahar, *Einstein's Revolution: A Study in Heuristic* (1989); Russell McCormmach, ed.,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vol. 7 (1976); Arthur Miller, *Einstein's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Emergence and Early Interpretation* (1981); also his *Frontiers of Physics 1900–1911* (1986); Christa Jungnickel and Russell McCormmach, *Intellectual Mastery of Nature: Theoretical Physics from Ohm to Einstein* (2 vols., 1986); Stephen Kern, *The Culture of Space and Time 1880–1918* (1983); Jed Z. Buchwald, *From Maxwell to Microphysics* (1985); Don Howard and John Stachel, eds., *Einstein and the History of General Relativity* (1989); L. Pearce Williams, ed., *Relativity Theory: Its Origins and Impact on Modern Thought* (1968); Bertrand Russell, *The ABC of Relativity* (1959); Lincoln Barnett, *The Universe and Dr. Einstein* (1964); Nigel Calder, *Einstein's Universe* (1979); Stanley Goldberg, *Understanding Relativity* (1984);

Albert Einstein, *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 (latest edition, 1988); Robert M. Wald, *Space, Time, and Gravity* (1977); Arthur Fine, *The Shaky Game: Einstein, Realism, and the Quantum Theory* (1986); Bruce R. Wheaton, *The Tiger and the Shark: Empirical Roots of Wave-Particle Dualism* (1991); John Hendry, *The Cre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and the Bohr-Pauli Debate* (1984); Michio Kaku and Jennifer Trainer, *Beyond Einstein: The Cosmic Quest for the Theory of the Universe* (1987); Arthur Eddington, *The Philosophy of Physical Science* (1939); James Jeans, *Physics and Philosophy* (1942); Milic Capek, *The Philosophical Impact of Modern Physics* (1961); Alan J. Friedman and Carol C. Donley, *Einstein As Myth and Muse* (1985); Thomas F. Glick, *Einstein in Spain: Relativity and the Recovery of Science* (1988); Harvey R. Brown and Rom Harré, ed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Quantum Field Theory* (1988); a life of Heisenberg called (what else?) *Uncertainty*, by David C. Cassidy (1992); Helge S. Kragh, *Dirac: A Scientific Biography* (1990); Walter J. Moore, *Schrödinger: Life and Thought* (1989); John Honner, *The Description of Nature: Niels Bohr and the Philosophy of Quantum Physics* (1988); David Wilson, *Rutherford: Simple Genius* (1983); Larry Laudan, *Science and Relativism: Some Key Controvers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0).

### Fascism:

Renzo de Felice, *Interpretations of Fascism* (1977); Stein Ugelvik Larsen, Bernt Hagvet, Peter Myklebust, eds., *Who Were the Fascists?* (Oslo, 1982); Stanley G. Payne, *Fascism: Comparison and Definition* (1980);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66); Denis Mack Smith, *Mussolini* (1981); Adrian Lyttleton, ed., *Italian Fascisms from Pareto to Gentile* (1975); David D. Roberts, *The Syndicalist Tradition and Italian Fascism* (1979); Walter Struve, *Elites against Democracy* (1973); Andrew Cox and Noel O'Sullivan, eds., *The Corporate State: Corporatism and the State Tradition in Western Europe* (1989); Peter Pulzer, *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 (revised edition, 1988); George L. Mosse, *Toward the Final Solution: A History of European Racism* (1977); Werner Maser, *Hitler: Legend, Myth, and Reality* (1974); Eberhard Jäckel, *Hitler's Weltanschauung* (1972); Ian Kershaw, *The Hitler Myth: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 (1987); Joseph W. Bendersky, *Carl Schmitt: Theorist for the Reich* (1983); Robert Soucy, *French Fascism: The First Wave 1924-33* (1985) and *Fascism in France: The Case of Maurice Barrès* (1973); Zeev Sternhall, *Neither Right nor Left: Fascist Ideology in France* (1986); W. F. Mandle, *Anti-Semitism and the 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 (1968); A. D. Beyerchen, *Scientists under Hitler* (1977); Robert R. Taylor, *The World in Stone: The Role of Architecture in National Socialist Ideology* (1974); J. M. Ritchie, *German Literatur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1983); Peter Hoffman,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1977); Ian Kershaw, *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 Bavaria 1933-1945* (1983).



###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between the Wars:

Graham Hough, *Image and Experience: Studies in a Literary Revolution* (1960); Leon Edel, *Bloomsbury: A House of Lions* (1979); C. K. Stead, *Pound, Yeats, Eliot and the Modernist Movement* (1986); Hugh Kenner, *The Pound Era* (1971); Ronald Bush, *T. S. Eliot: A Study in Character and Style* (1984); Louis Menand, *Discovering Modernism: T. S. Eliot and His Context* (1986); Stanley Sultan, *Eliot, Joyce and Company* (1987); 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revised ed., 1982); Frank Budgen, *James Joyce and the Making of Ulysses* (reissued 1989 with introduction by Clive Hart); Clive Hart, *Structure and Motif in Finnegans Wake* (1962); Colin McCabe, *James Joyce and the Revolution of the Word* (1979); Hugh Kenner, *Ulysses* (revised ed., 1987); John Bishop, *Joyce's Book of the Dead* (1986); Quentin Bell, *Virginia Woolf* (1972); John Worthen, *D. H. Lawrence: The Early Years 1885–1912* (1991, first of projected 3-volume biography); Anthony Burgess, *Flame into Being: The Life and Work of D. H. Lawrence* (1985); Gamini Salgado and G. K. Das, eds., *The Spirit of D. H. Lawrence* (1988); Valentine Cunningham, *British Writers of the Thirties* (1988); Michael O'Neill and Gareth Reeves, *Auden, MacNeice, Spender: The Thirties Poetry* (1992); Joseph G. Brennan, *Three Philosophical Novelists* (1964; Joyce, Gide, Mann); Ernest Pawel, *The Nightmare of Reason: A Life of Franz Kafka* (1984); Ritchie Robertson, *Kafka: Judaism,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1985); Frederick G. Peters, *Robert Musil: Master of the Hovering Life* (1978); Herbert S. Gershman, *The Surrealist Revolution in France* (1968); Roger Shattuck, *Marcel Proust* (1974); J. M. Cocking, *Proust: Essays on the Writer and His Art* (1982); J. E. Rivers, *Proust and the Art of Love* (1980); Keith Bullivant, ed.,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Weimar Republic* (1978); Anthony Phelan, ed., *The Weimar Dilemma: Intellectual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1985); Dagmar Barnouw, *Weimar Intellectuals and the Threat of Modernity* (1988); Alan Bance, ed., *Weimar Germany: Writers and Politics* (1982); Uwe Westphal, *The Bauhaus* (1991); Reginald Isaacs, *Gropius* (1991); Peter Blake, *The Master Builders* (1976); H. Allen Brooks, ed., *Le Corbusier* (1987).

### Logical Positivism, Philosophy:

Leszek Kolakowski, *Positivist Philosophy* (1972); Oswald Hanfling, *Logical Positivism* (1981); Gustav Bergmann, *The Metaphysics of Logical Positivism* (1967); Arno Naess, *Four Modern Philosophers* (1965); Klaus Christian Kohnke, *The Rise of Neo-Kantianism* (1991); David F. Lindenfeld, *Alexius Meinong and European Thought 1880–1920* (1980); Michael Dummett, *Frege, Philosopher of Language* (1973); Paul Levy, *G. E. Moore and the Cambridge Apostles* (1979); Peter Hylton, *Russell, Ide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1990); Brian McGuinness, *Wittgenstein: A Life*, vol. 1 (1988), and (ed.), *Wittgenstein and His Times* (1982); P. M. S. Hacker, *Insight and Illusion: Themes in the Philosophy of Wittgenstein* (1987); David Pears, *The False Prison: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vol. 1, 1987); A. C. Grayling, *Wittgenstein* (1988); Friedrich Waismann, *Wittgenstein and the Vienna Circle* (1979); Gordon Baker, *Wittgenstein, Frege, and the Vienna Circle* (1988); Jorn K. Braman,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and the Modern Arts* (1985); John W. Danford, *Wittgenstein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1978); Henry Staten, *Wittgenstein and Derrida* (1984); Ray Monk, *Ludwig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 (1990).

### Soviet Communism and Stalinism:

Robert A. Maguire, *Red Virgin Soil: Soviet Literature in the 1920s* (1968); Alexander Erlich,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 1924–1928* (1961); Adam B. Ulam, *Stalin: The Man and His Era* (1973); Robert C. Tucker, *Stalin in Power, 1928–41* (vol. 2 of a projected three, 1991); Robert H. McNeal, *Stalin: Man and Ruler* (1988); Walter Laqueur, *Stalin: The Glasnost Revelations* (1991); C. Vaughan Jones, *Soviet Socialist Realism: Origins and Theory* (1975); Robert C. Tucker, ed., *Stalinism: Essays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1977); G. R. Urban, ed., *Stalinism: Its Impact on Russia and the World* (1983); 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Stalin's Purge of the 1930s* (1971; revised ed., 1990); Sheila Fitzpatrick, 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1984); Graeme Gill, *The Origins of the Stalinist Political System* (1990); Nadezhda Mandelstam, *Hope against Hope* (1970); Victor 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1901–1941* (1965); George S. N. Luckyj, *Literary Politics in the Soviet Ukraine 1917–1934* (1990).

### Commun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

Dávid Cate, *The Fellow Travellers* (revised ed., 1988); Neal Wood, *Communism and British Intellectuals* (1964); R. H. S. Crossman, ed., *The God That Failed* (1950); Raymond Aron, *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1952); Arthur Koestler, *The Invisible Writing* (1954); Samuel Hynes, *The Auden Generation* (1977); Humphrey Carpenter, *W. H. Auden: A Biography* (1981); Bernard Crick, *George Orwell: A Life* (1980); Stanley Weintraub, *The Last Great Cause* (1968); Frederick R. Benson, *Writers in Arms: The Literary Impact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67); Irwin Wall, *French Communism in the Era of Stalin* (1983); Michael Scriven, *Paul Nizan: Communist Novelist* (1989); Sudhir Hazareesingh, *Intellectuals and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Disillusion and Decline* (1992); Lee Congdon, *The Young Lukacs* (1983); Arpad Kadarkay, *Georg Lukacs: Life, Thought, and Politics* (1991); Andrew Sinclair, *The Red and the Blue: Cambridge, Treason, and Intelligence* (1986); Peter Clarke,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the Making, 1924–1936* (1989); G. L. S. Shackle, *The Years of High Theory: Innovation and Tradition in Economic Thought 1926–1939* (1967); Richard F. Kahn, *The Making of Keynes' "General Theory"* (1984); Richard Swedberg, *Joseph A. Schumpeter, His Life and Work* (1992); Norman Ingram,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Pacifism in France 1919–1939* (1991).

### World War II and the Intellectuals:

Robert Hewison, *Under Siege: Literary Life in London 1939–1945* (1977); José Harris, *William Beveridge: A Biography* (1977); George Orwell,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vols. 2 and 3 (1968); Stephen Brooke, *Labour's War: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1992); James D. Wilkinson, *The Intellectual Resistance in Europe* (1981); H. R. Kedward, *Resistance in Vichy France: A Study of Ideas and Motivation in the Southern Zone* (1978); Andrew Shennan, *Rethinking France: Plans for Renewal 1940–1946* (1990); Gerhard Ritter, *The German Resistance: Carl Goederler's Struggle against Tyranny* (1958); Klemens von Klemperer, *German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1992); Wilhelm W. Schutz, *Pens under the Swastika* (1971); T. E. J. de Witt, *Hitler's War and the Germans: Public Mood and Attitud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77); Ilya Ehrenburg, *The War 1941–1945* (1964); Milovan Djilas, *Wartime* (1977);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5* (1969); H. Stuart Hughes, *The Sea Change: The Migration of Social Thought 1930–1965* (1975); Lawrence L. Langer, *Versions of Survival: The Holocaust and the Human Spirit* (1982); Sidra G. Erzähl, *By Words Alone: The Holocaust in Literature* (1980); Linda M. Shires, *British Poet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85); Holger Klein, John Flower, Eric Homberg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Fiction* (1984).

### Sartre and Existentialism:

Luc Ferry and Alain Renault, *Heidegger and Modernity* (trans. 1990); Annie Cohen-Solal, *Sartre: A Biography* (1987); Ronald Hayman, *Writing Against: A Biography of Sartre* (1986); Paul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Jean-Paul Sartre* (1981); Dominick LaCapra, *A Preface to Sartre* (1988); Christina Howells, *Sartre: The Necessity of Freedom* (1988), in the series "Major European Autho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k 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1976); Raymond Aron, *History and the Dialectic of Violence: An Analysis of Sartre's Critique* (1973); Howard Davies, *Sartre and "Les Temps Modernes"* (1987); Maurice Merleau-Ponty,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1973); Ronald Aronson, *Sartre's Second Critique* (1987); Thomas R. Flynn, *Sartre and Marxist Existentialism* (1986); Gila J. Hayim, *The Existentialist Sociology of Jean-Paul Sartre* (1980); Hazel Barnes, *Sartre and Flaubert* (1981); Betty T. Rahv, *From Sartre to the New Novel* (1974); William Plank, *Sartre and Surrealism* (1981); Betty Cannon, *Sartre and Psychoanalysis* (1991); Germaine Bree, *Camus and Sartre* (1972); Patrick McCarthy, *Camus, a Critical Study of His Life and Work* (1982); Herbert Lottman, *Albert Camus* (1979); Mary Evans, *Simone de Beauvoir, a Feminist Mandarin* (1985); Deirdre Bair, *Simone de Beauvoir: A Biography* (1990); Tony Judt, *Past Imperfect: French Intellectuals 1944–56* (1992).

### Other Existentialists and Phenomenologists:

Joseph Fell, *Heidegger and Sartre* (1979); Leszek Kolakowski, *Husserl and the Search for Certitude* (1975, 1988); Zygmunt Bauman, *Hermeneutics and Social Science* (1978); Hans-G.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1976); Joseph A. Kotarba and Andrea Fontana, *The Existential Self in Society* (1984); Thomas Sheehan, ed., *Heidegger: The Man and the Thinker* (1981); John Sallis, ed., *Radical Phenomenology: Essays in Honor of Martin Heidegger* (1978); R. Bubner,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1981); Karl Jaspers, *The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1971); Leonard H. Ehrlich, *Karl Jaspers: Philosophy and Faith* (1975); Rudolf Bultmann, *Existence and Faith* (1960); John O'Neill, *Perception, Experience, and History: The Social Phenomenology of Maurice Merleau-Ponty* (1970); Hugo Ott, *Martin Heidegger: A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Portrait* (trans. Allan Blunden, 1992).

### Neo-Marxism and the New Left:

Dick Howard, *The Unknown Dimension: European Marxism since Lenin* (1972); Raymond Guess, *The Idea of Critical Theory* (1981);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1973); Jack Lindsay, *The Crisis in Marxism* (1981); John O'Neill, ed., *On Critical Theory* (1976); Gillian Rose, *The Melancholy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Theodor Adorno* (1979); David Hel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to Habermas* (1980); Julius Sensat, *Habermas and Marxism* (1979); Walter L. Adamson, *Hegemony and Revolution: Antonio Gramsci'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1980) and *Marx and the Disillusionment of Marxism* (1985); Neil McInnes, *The Western Marxists* (1972); J. G. Merquior, *Western Marxism* (1986); Paul Piccone, *Italian Marxism* (1983); Robert Gorman, *Neo-Marxism: The Meanings of Modern Radicalism* (1982); Eugene Lunn, *Marxism and Modernism* (1984); John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An Anthology* (1986); Maurice Cranston, ed., *The New Left* (1971);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1984); Arthur Hirsh, *The French New Left: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Sartre to Gorz* (1981); B. Marie Perinbaum, *Holy Violence in the Thought of Frantz Fanon* (1981); David Caute, *The Year of the Barricades* (1988); Alex Callinicos, *Althusser's Marxism* (1976); Klaus Mehnert, *Moscow and the New Left* (1976).

###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after 1953:

Joshua Rubenstein, *Soviet Dissidents* (1980, 1987); Alec Nove, *Stalinism and After* (1981); Michael Meerson-Aksenov and Boris Shagrin, eds.,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Religious Thought of Russian "Samizdat": An Anthology* (1977); Loren Graham,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the Soviet Union* (1972); Stephen F. Cohen, ed.,

*An End to Silence: Uncensored Opinions in the Soviet Union* (1982); Geoffrey Hosking, *Beyond Soviet Realism: Soviet Fiction since "Ivan Denisovich"* (1980); Oleg Chukhontsev, ed., *Dissonant Voices: The New Russian Fiction* (1991); Norman Stone and Michael Glenny, *The Other Russia* (1990); Michael Bourdeaux, *Gorbachev, Glasnost, and the Gospel* (1991); Gerson S. Sher, *Praxis: Marxist Criticism and Dissent in Socialist Yugoslavia* (1977); N. Markovic and Robert S. Cohen, *Yugoslavia: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ist Humanism* (1978); Osker Gruenwald, *The Yugoslav Search for Man: Marxist Humanism in Contemporary Yugoslavia* (1983); A. Hegedus, A. Heller, N. Markus, and M. Vajda, *The Humanization of Socialism: 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 (1976); Vladimir Kusin,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Prague Spring* (1971); Vaclav Havel, *Living in Truth* (1990); Timothy G.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1980-1982* (1984); Janos Kornai,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1990).

### Structuralism:

Howard Gardner, *The Quest for Mind: Piaget, Lévi-Strauss, and the Structuralist Movement* (1981); Edith Kurzweil, *The Age of Structuralism* (1980); John Sturrock, ed., *Structuralism and Since: From Lévi-Strauss to Derrida* (1979); Fredric Jameson, *The Prison House of Language: A Critical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and Formalism* (1972); Thomas G. Pavel, *The Feud of Language: A History of Structuralist Thought* (1990);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1972); Alan Sheridan, *Michel Foucault: The Will to Truth* (1980); Mark Poster,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Mode of Production versus Mode of Information* (1984); Gary Gutting, *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Scientific Reason* (1989); Joseph H. Smith and William Kerrigan, eds., *Interpreting Lacan* (1983); Sherry Turkle, *Psychoanalytic Politics: Freud's French Revolution* (1978); Stuart Schneiderman, *Jacques Lacan: The Death of an Intellectual Hero* (1983); Samuel Weber, *Return to Freud: Jacques Lacan's Dislocation of Psychoanalysis* (1991); Malcolm Bowie, *Lacan* (1991); John Sturrock, *The French New Novel* (1969).

### Deconstruction and Postmodernism:

John Sallis, ed., *Deconstruction and Philosophy: The Texts of Jacques Derrida* (1987); Christopher Norris,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1982); Jonathan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1982); Bice Benvenuto and Roger Kennedy, *The Works of Lacan: An Introduction* (1986); 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rn Culture* (1989); Allan Megill, *Prophets of Extremity: Nietzsche, Heidegger, Foucault, Derrida* (1985);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1991);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1984); Jonathan Arac, ed., *Postmodernism and Politics* (1986); Pauline Marie Rosenau,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1992);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

*quences of Modernity* (1991); John Gros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n of Letters* (1991); Bernard Bergonzi, *Exploding English* (1990); John Lechte, *Julia Kristeva* (1990), one of a series on Critics, general editor Christopher Norris, including Lacan (by Juliet Flower MacCannell), Leavis (by Michael Bell), Barthes (by Mary Bittner Wiseman); Geoffrey Hartman, *Saving the Text: Literature, Derrida, Philosophy* (1981); Allen Thiher, *Words in Reflection: Modern Language Theory and Postmodern Fiction* (1984).

### Recent Philosophy:

Charles J. Bontemps and S. Jack Odell, eds., *The Owl of Minerva: Philosophers on Philosophy* (1975); Anthony Giddens and Jonathan Turner, eds., *Social Theory Today* (1988); Kenneth Baynes, James Bohman, Thomas McCarthy, eds., *After Philosophy: End or Transformation?*; A. J. Ayer,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84); Paul Franco,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ichael Oakeshott* (1990); 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1991).

### Recent Science:

Robin Herman, *Fusion: The Search for Endless Energy* (1990); James S. Trefil, *From Atoms to Quark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range World of Particle Physics* (1981); Fred Alan Wolf, *Star Wave: Mind, Consciousness, and Quantum Physics* (1985); Yuval Ne'eman, *The Particle Hunters* (1986); Herbert Friedman, *The Astronomer's Universe: Stars, Galaxies, and Cosmos* (1991); Alan G. Gross, *The Rhetoric of Science* (1991); Robert Shapiro, *The Human Blueprint* (1992).

### Recent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Mitchell G. Ash and William R. Woodward, eds., *Psychology in Twentieth Century Thought and Society* (1988); Anthony Clare, *Psychiatry in Dissent* (1979); G. E. Zuriff, *Behaviorism: A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1985); Charles C. Lemert, *French Sociology since 1968* (1981); A. W. Gouldner,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1971); Pierre Bourdieu,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 (trans. 1991).

### Recent Economics:

Warren J. Samuels, ed., *Economics as Discourse* (1990); Peter Giles and Guy Routh, eds., *Economics in Disarray* (1984); Eamonn Butler, *Hayek: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 of Our Time* (1984); Donald N

eds., *Keynes and Economic Policy: The Relevance of the "General Theory" after Fifty Years* (1989); Robert Skidelsky, ed., *Thatcherism* (1989); J. F. Shackleton and Gareth Luskley, eds., *Twelve Contemporary Economists* (1981).

### Recent Arts:

Robert Hughes, *The Shock of the New: Art and the Century of Change* (1991); Charles Russell, *Poets, Prophets, and Revolutionaries: The Literary Avant-Garde from Rimbaud through Postmodernism* (1991); Christopher Butler, *After the Wake: An Essay on the Contemporary Avant-Garde* (1980); Malcolm Bradbury, ed., *The Novel Today* (1977); Anthony Thwaite, *Poetry Today: A Critical Guide to British Poetry 1960–1984*; Peter Austin Jones and Michael Schmidt, eds., *British Poetry since 1970* (1980); Christopher Innes, *Modern British Drama, 1890–1990* (1992); Maurice Valency, *The End of the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Drama* (1980); Ronald Hayman, *Theatre and Anti-theatre: New Movements since Beckett* (1977); J. Mordaunt Crook, *The Dilemma of Style: Architectural Ideas from the Picturesque to the Post-Modern* (1989); Daniel Wheeler, *Art since Mid-Century* (1990); Hilton Kramer, *Abstract Art: A Cultural History* (1992); Sandy Nairne, *The State of the Art: Ideas and Images in the 1980's* (1988).

### Recent Religion:

David Ray Griffin, *God and Religion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1988); R. J. Reilly, *Romantic Religion: A Study of Barfield, Lewis, Williams, and Tolkien* (1971); Paul L. Holmes, *C. S. Lewis: The Shape of His Faith and Thought* (1977); Daniel Cohen, *Waiting for the Apocalypse* (1983); Warren Wagar, *Terminal Visions: The Literature of Last Things* (1982); Hans Küng, *Does God Exist? An Answer for Today* (1980); Helmut Thielicke, *Modern Faith and Thought* (trans. 1991); David F. Ford, ed., *The Modern Theologians: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1, 1989); James P. Mackey, *Modern Theology* (1987); Julian N. Hartt, Ray L. Hartt, and Robert P. Scharlemann,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Th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Culture* (1987).

### Feminist Perspectives:

Marlon B. Ross, *The Contours of Masculine Desire: Romanticism and the Rise of Women's Poetry* (1989); Anne K. Mellor, ed., *Romanticism and Feminism* (1988); Margaret Homans, *Bearing the Word: Language and Female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Writing* (1986); Elaine 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 (1976); Barbara Taylor, *Eve and the New Jerusalem: Soc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83);

Barbara Caine, *Victorian Feminists* (1992); Irene Calder, *Women and Marriage in Victorian Fiction* (1976); Martha Vicinus, *Suffer and Be Still: Women in the Victorian Age* (1972); Jane Nardin, *He Knew She Was Right: The Independent Woman in the Novels of Anthony Trollope* (1989); Richard J. Evans, *The Feminists: Women's Emancipation Movements 1844–1920* (1977); Richard 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1860–1930* (1980); Brian Harrison, *Separate Spheres: The Opposition to Women's Suffrage in Britain* (1978) and *Prudent Revolutionaries: Portraits of British Feminists between the Wars* (1987); Sheila Rowbotham, *The Past before us: Feminism in Action since the 1960s* (1989); Bonnie Kime Scott, *Joyce and Feminism* (1984); Germaine Greer, *The Obstacle Race* (1979); Jean Grimshaw, *Philosophy and Feminist Thinking* (1986); Hester Eisenste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 (1983); Shari Benstock, ed., *Feminist Issues in Literary Scholarship* (1987); Elaine Showalter, ed.,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1985); Nancy J. Chodorow,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tic Theory* (1990); Margaret W. Ferguson and Jennifer Wicke, eds.,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1992); Pnina G. Abir-am and Dorinda Outram, eds., *Uneasy Careers and Intimate Lives: Women in Science, 1789–1979* (1987); Terry Lovell, ed., *British Feminist Thought: A Reader* (1990); Lorna Sage, *Women in the House of Fiction: Postwar Women Novelists* (1992).

### Other Books about Recent Thought and Culture:

Christopher Booker, *The Neophiliacs* (1970);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1987); Barry Cooper, Allan Karnberg, and William Mishler, *The Resurgence of Conservatism in Anglo-American Democracies* (1988); Roland N. Stromberg, *After Everything* (1976); Robert A. Nisbet, *The Twilight of Authority* (1975); M. Ashley Montague and F. Watson, *The Dehumanization of Man* (1983); Raymond Aron, *In Defense of Decadent Europe* (1979); G. Santoni, ed., *Contemporary French Culture and Society* (1981); Irving Howe, ed., *1984 Revisited* (1983); John Sutherland, *Offensive Literature: Decensorship in Britain, 1960–82* (1982); John Carswell,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 in Britain: Programme and Performance 1960–1980* (1986).



## 译者后记

本书中译本的底本是美国学者罗兰·斯特龙伯格教授的一部英文著作、两个不同版本的合编本。

斯特龙伯格教授于 1966 年出版《欧洲现代思想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所涵盖的时段是从 16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期。该书旋即成为北美大学广受欢迎的教科书。1994 年, 该书做了大幅度修改后更名为《欧洲思想史——1789 年以来》(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Since 1789)。新版舍弃了旧版的前 6 章, 将论述时段改为从 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 80 年代。新版各章的内容和表述也与旧版本有很大区别。新版问世后也是一版再版, 享有盛誉。

2002 年, 我与斯特龙伯格教授直接联系, 才得知这位学者生于 1916 年, 此时已值 86 岁高龄。他自 1952 年于马里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一直在大学任教, 1987 年从威斯康星 - 密尔沃基大学退休。

经斯特龙伯格教授认可和授权, 我们将 1966 年版的前半部分(6 章)与《欧洲思想史——1789 年以来》(原书共 11 章)合编成一本书。因内容涉及欧美, 故中译本定名为《西方现代思想史》。斯特龙伯格教授曾表示, 旧版被腰斩, 并非他的本意, 而是屈从于出版社的要求。一个修订后的完整版本乃是他的宿愿。他对这一旧愿最终以中文版的方式实现感到欣慰。他感到遗憾的是自己年事已高, 无力再对前 6 章加以修订。

旧版和新版在体例上略有差异。中译本保持了两个版本的原貌。读者会看到, 本书前 6 章都摘引语录作为题记, 而后 11 章没有这种题记; 推荐文献的编排方式也不相同。

全书翻译是由我和赵国新承担的。我翻译前 9 章, 赵国新翻译后 8 章。

最后由我做了统校。为了方便中文读者,我们尽可能地对书中提及的人物和典故做了简单的注释。

全书基本定稿后,有 20 多位研究生看过部分或全部译稿。他们对译文提出了许多修改或商榷意见。我的朋友沈一对书中涉及现代物理学的译文做了审订。插图由张灵灵选供。索引由于艳茹编制。

从选题到编辑成书,中央编译出版社王吉胜先生的诚挚和辛劳贯穿于始终。

对上述以及其他提供过各种帮助的朋友和学生,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翻译计划确定以后,我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最大的鞭策来自于对斯特龙伯格教授年龄的担忧。遗憾的是,我们落后了一步。正当我们对译稿进行最后校订的时候,斯特龙伯格教授于 2004 年 5 月 18 日去世,未能亲眼见到这个中译本。我们希望,本书能够以较高的翻译质量和印制质量来告慰罗兰·斯特龙伯格教授的在天之灵。我们更希望,本书能够使较多的读者开卷获益。

刘北成

2004 年 6 月 15 日